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日伪政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葉選平

日伪政权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日伪政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
ISBN 7—5034—1254—2

Ⅰ．文... Ⅱ．全... Ⅲ．①文史资料—中国②汪伪政府(1938)—史料 Ⅳ．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5635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　　装：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63.75　　（全书总印张：1491.25印张）
字　　数：1479千字（全书总字数：34453千字）
印　　数：2000册
版　　次：2002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00元(全书26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日伪政权

主　编　　徐延华

副主编　　于海鹰　原建新　谢凤英　王俊林　李洪远

编　辑　　吕方好　姜东平　宋梅英　冯大可　王玉珍

关　波　李　蕾　张玉清　刘俊清　谢凤英

田乃立　陆宏宁

目　录

·伪满政权和伪满人物·

·华北伪政权·

·伪蒙疆政权·

·汪伪政权和汪伪人物·

·伪满政权和伪满人物·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武装侵略攻占沈阳同时袭击长春

李 士 英*

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沈阳沦陷的经过

日本强盗为了达到其对中国东北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竟在1931年9月18日夜间10点钟，在铁路沿线以军事演习为借口，悍然地暴露出其侵略的凶狞面貌，公然疯狂地向中国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驻营地——北大营开始炮轰。

北大营的中国东北边防军，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在19日凌晨，驻营地被日军的奉天独立守备第五大队占领。

沈阳的另一个东北边防军驻营地一东大营，也遭到日军驻辽阳的第二师主力部队的攻击，在19日下午2点钟，东大营也落于敌手。

日军的平田部队，也向沈阳城关进犯，在19日晨3点钟，攻陷城门，进入城内，于是整个沈阳完全沦陷人日本的魔掌。

日本强盗发动残酷血腥的九一八事变，是蓄谋既久、有计划的、武装侵略东北的策动，所以日本在沈阳打响了侵略的炮声，相随着驻长春的大岛部队也掀起向长春宽城子二道沟的中国东北边防军步兵部队展开了野蛮的进攻，在19日拂晓，宽城子二道沟的东北边防军步兵部队营地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同时，驻在长春南岭的中国东北边防军炮兵部队，也受到日军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的攻击，在19日下午2点钟，南岭也被日军攻占。

当时，长春尚有吉长警备司令李桂林部，及其他武装部队各兵种，因奉到吉林省的暂代主席熙洽以遵守国民政府中央“不抵抗的指示”，命令全部撤退，故长春便轻易地陷落于敌手。

长春是吉林省的门户，也是进入北满各地的跳板，所以日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增派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率长谷部及天野二个劲旅的主力部队，驰驱北上进驻长春，以胁迫吉林，而窥图北满。

---

* 作者曾在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任职。

二、汉奸卖国求荣，背叛祖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

当时，吉林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遭父丧，离职回原籍锦州奔丧，遗职由吉林省政府的政务委员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的参谋长熙洽暂行代理。

熙洽是清爱新觉罗嫡族，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嫡亲兄木尔哈赤的后裔。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恰值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封建腐败的清王朝，成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熙洽的封建遗毒根深蒂固，屡做清王朝复辟的梦想，在军阀混战时期，他曾在东北讲武堂任教官，以后任至吉林省东北边防军的参谋长兼省政府的政务委员。

熙洽和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素有“师生之谊”，熙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多门洽任该校的教官区队长。这次多门统率日军的侵略部队，进驻长春，虎视眈眈，威胁吉林，因引起熙洽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侥幸心理，况又有以蒋介石为首反动的国民政府中央的“不抵抗指示”，也恰恰与熙洽以藉口的机会，因命令驻守长春的所有武装部队，及各兵种，避免和日本侵略军冲突，全部撤出长春。又在9月21日，召开了吉林省城内的各机关团的首脑会议，在会上，熙洽力主降议，大事宣扬日军兵强械精的恐日论调，并恫吓与会人等，说：“如欲抗日，则战必败，如全部撤出，日军进入吉林，省城内的各机关，以及商家百姓，必然遭到日军铁蹄的蹂躏，生命财产将要蒙受巨大的损失。唯一万全之策，唯有派代表赴长春，往谒日军统帅多门二郎，通诚，表示欢迎日军、中日亲善的态度”。这样决议后，就派了一个代表，去往长春，面谒多门，就在9月22日，开门揖盗，把侵略者多门二郎引入吉林。

三、吉林在日本威逼利诱下组成伪独立政府

多门安抵吉林后，下榻于车站前新开门外日人经营的一个名古屋旅馆，做为第二师团的临时司令部。

熙洽当即趋赴名古屋旅馆，往谒多门，希望“师生”重晤话旧，迎降邀宠。但多门和熙洽见面后，不事寒暄，相反的是以占领者的傲慢野蛮态度，对待被征服者的囚徒，对熙洽叱责，喝令：“限在三天内，把吉林省驻在各地，所有的武装部队及各兵种召回缴械，并立即撤销吉林省政府及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以及各机关。”咆哮毕拂袖而出，继又有一伙日军武装士兵闯入，向熙洽气势汹汹地厉声恫吓。当时的熙洽殊感意外，嗒然若失，瞠目不知所措。

以后多门又派关东军的中佐、驻吉林陆军特务机关长大迫通（是熙洽在士官学校时的同期同学）和日本外务省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分别往窥熙洽的动静和态度，并以温言“抚慰”，又向熙洽说明时势的趋向。

及至多门再次和熙洽晤见时，多门向熙洽说，吉林所有一切，军政各重要机关，及军械厂、永衡官银号、交通、邮电以及车站等处，皆被日本军分别占领。今后，张学良在东北的军阀势力，业已丧失，不可再存异图，应和日本一心一德地携起手来，共同开

发满蒙的富源，以抵制苏联共产的赤化，而期达到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美满生活，在吉林省内，应另建立一个与日本合作、脱离张学良及南京国民政府、亲日的独立政府，政府各机关，不得任用对亲日有疑问的分子（言时，交付熙洽一个日本认为可疑、不得任用的人名单）。以日本驻吉林的陆军特务机关长大迫通中佐为独立政府的顾问，改编旧东北边防军及各地方部队为独立政府亲日的军队，和日本皇军共同携手，对敌作战，并限制在永衡官银号提款的数目，如超过限定的数目时，必须有多门和熙洽双方的签字、盖章，方准提款。

熙洽在多门的威逼利诱下，获得日本卵翼护庇下的伪政权，受宠若惊，积极地纠合其狐群狗党的败类们，着手筹划、组织伪吉林省独立政府，由吉林省政府的秘书长荣孟枚（满州旗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和两署的秘书张燕卿（河北省南皮张之洞之子，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曾任天津县的县长，贪污搜刮，声名狼藉，臭名远扬）起草拟就伪吉林省独立政府的组织大纲，并发宣言和通电声明：撤销前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及前吉林省政府，同时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及东北政务委员会，宣布伪吉林省独立政府在9月30日正式成立。

由熙洽集拢的伪吉林省独立政府的组织名单如下：

李铭书：任伪政府的秘书长（前吉海铁路局总办）。

王　扬：任伪民政厅厅长（前永吉县的县长）。

孙其昌：任伪财政厅厅长（前吉林省建设厅长）。

荣孟枚：任伪教育厅厅长（前吉林省政府秘书长）。

张燕卿：任伪建设厅长（前吉林省两署秘书）。

郭恩霖：任伪军政厅长（前吉林陆军训练处参谋长）。

谢介石：任伪吉林交涉署署长（台湾省台中新竹市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曾任清腐败王朝的外务府右丞，民国成立之后，曾奔走于张勋复辟活动，失败后，落魄津门在三不管卖卜为生，以后又到东京明治大学当支那哲学史的讲师，九一八事变爆发，由寓居在旅顺的清遗老罗振玉介绍到吉林，恰值前国民政府外交吉林特派员施履本、钟毓等因避日本的凶焰，潜逃失踪，故任谢介石为伪吉林交涉署的署长）。

齐知政：任伪吉林省城警备司令（前吉林陆军军官训练处总办）。

于琛澄：任伪吉林省剿匪司令（前东北边防军第十六师的师长）。

修长余：任伪吉林省警务处处长（前长春公安局长）。

艾乃芳：任伪吉海铁路局总办（前吉海铁路局帮办）。

金壁东：任伪吉长铁路局局长兼铁路守备司令（清肃亲王的第七子）。

熙洽收罗了前东北边防军及吉林省旧属驻各地的武装队伍，又通过顾问大迫通，请求日本关东军本部，发给大批枪弹（数目不详），招募新兵，共计扩充成为四个混成旅，任前东北边防军的团长马锡林、刘宝麟、王树棠、李文炳等，分任为四个混成旅的旅长，又编成两个铁路守备队，杨登举和李文龙分任为该守备队的第一、第二区队长。

熙洽又分别训令旧吉林省所辖四十四县，归附伪吉林省独立政府。当时，仅仅有邻近各县来归，其余各县取观望态度以应付吉林省的伪独立政府。

四、叛国投敌汉奸的企图、幻想及阴谋活动

熙洽为了更进一步的巩固他那在日本卵翼护庇下的政权，扩充其武装势力，多方向前东北边防军的武装部队施展拉拢和诱惑的手段，企图收为己用，做为将来清封建统治王朝复辟的本钱。

熙洽曾数次向多门二郎奴颜婢膝地献媚，希望日本尽快侵占中国的全东北，而实现在东北重建立一个以满族为主的"新国家"，统治东北人民。曾一再地向多门游说：吉林是清朝的发祥地，东北是"满洲人的东北"，如迎清逊帝溥仪来东北执掌政权，也正"符合东北人民的愿望"……种种谰言呓语。但多门对之皆以"日本的企图是否准备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此时尚谈不到"或"迎溥仪来东北执政的问题，须待日本政府和军部详加研讨并考虑"云云的言辞而拒绝。

当时，驻在长春至哈尔滨东省铁路沿线及北满一带等处的东北边防军武装部队有：代理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滨江镇守使丁超、依兰镇守使李杜、绥宁镇守使赵芷香、东北边防军第七混成旅旅长苏德臣、第十混成旅长张作舟（张作相的族弟）等的队伍，因尚未遭遇日本侵略军，故尚保持有相当的实力，于是便引起熙洽的觊觎，思欲染指。乃求哈尔滨的大汉奸张景惠（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对丁超、李杜等饵以原职原防不动，和补发饷、械、弹药为条件，加以诱惑拉拢，熙洽并派专人赴哈磋商，约经一个月期间的酝酿，方有成议。熙洽欣喜自得，在12月下旬及1932年的1月上旬，派了许多伪吉林省政府的接收人员分别赴哈接收，计有汤武涉为滨江道外公安局局长，刘宝源为水上的公安局局长，李桂林为路警处处长，金名世为哈尔宾市电业局总办。又派伪吉林交涉署署长谢介石为滨江市政筹备处处长（即市长），赴哈负责接收伪吉林交涉署滨江办事处及永衡官银号，并所属市政各机关，携带的随员有参事官翁振清、日文秘书李士英、俄文秘书王平波、挂名秘书何絜湘、会庶科员杜啸尘等。

五、激起丁超、李杜哈尔滨抗战的原因

熙洽既允诺丁超、李杜等原职原防不动，并发给饷、械、弹药，但侵略成性、猜疑多忌的日本侵略者，坚欲将丁、李等所部的队伍，另行改编，更换亲日可靠的将领管带。关东军本部因命令熙洽，委任丁超为伪吉林省政府的光杆顾问，一方面又派关东军本部的部附、少佐东宫铁男和小野正雄二人，督率伪吉林省的汉奸队伍于琛澄所部，向哈尔滨方面进军，进至榆树附近和双城堡一带，与东北边防军第十混成旅旅长张作舟部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汉奸于琛澄部的马锡林和刘宝麟二个混成旅被击垮。于是日本关东军本部在1932年1月28日，派长谷部旅团长率部北上增援；又于2月19日，急派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率第二师团的全部主力，迅速地向北满进军。东北边防军的第十混成旅张作舟所部队伍，终于在敌伪合击下因众寡悬殊，而被击散。

丁超、李杜等，既愤恨熙洽的失信食言，复激怒于日本野蛮侵略的进攻，发表宣言，丁超就任抗日军的总司令，宣布：反对以熙洽为首的吉林省伪独立政府，并布防和

日伪侵略军相对峙，展开了抗日锄奸斗争。

经过顾乡屯和傅家甸两大悲壮的战役，由2月3日到2月5日之间的激战，给予日本侵略军以重大的打击（日本军部发表是役日军战死伤者达96人，汉奸队伍死伤除外）。最后，丁超、李杜等因所部较日伪侵略军众寡悬殊，为了保存抗日的实力，不得不忍痛撤出哈尔滨，于是哈尔滨又沦陷于日本之手。

六、溥仪和熙洽往来勾串，互通声息

溥仪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被迫逊退帝位，结束了他的封建统治、腐败王朝。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由于旧类型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仅仅地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而溥仪个人尚拥有剥削和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所得，积累着巨量的资产，使他得能养尊处优，怡然逍遥地在天津度其寓公生活。

但溥仪当时蜗居天津是不甘雌伏的，常怀死灰复燃、重登帝位的梦想，张勋的复辟活动就是他蠢蠢欲动的具体表现。

九一八事变后，熙洽攫得吉林省日本卵翼护庇下的伪政权，就和溥仪书电往来，互通消息，或通过一般的清遗孽、旅顺的寓公们，代通声息。

九一八事变后月余，据说溥仪已由天津到达东北，住在南满铁路线上的汤岗子温泉。当时，在吉长铁路线上的吉林、长春，南满铁路线上的沈阳、汤岗子、大连、旅顺等地，一班汉奸和清遗孽们的往来更为频繁，伪吉林交涉署长谢介石奉了熙洽的密嘱，大事奔走，经常赴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本部，探询日本对迎溥仪来东北执政的态度，并赴旅大与罗振芳等联系（那时我投宿在沈阳附属地的万国旅社时，曾遇到有吉满铁路局总办艾撷华、蒙古王公凌升、罗振玉，还有金司令、齐司令、吉司令，此外尚有一些，我不知名和不相识的败类们和谢介石往来）。

溥仪在10月下旬（20日）到达汤岗子温泉，那时，日军已侵占了辽宁省及吉林省，正在布置向北满延伸魔掌，进攻侵略，而溥仪的幻想犹未成熟，只好滞留在汤岗子，悠然自得地洗洗温泉，又转道赴旅大，和他的旧臣遗老、一班清遗孽们盘桓，静候日本屠杀东北的中国人民，侵略的铁蹄残踏全东北的土地，整个地沦陷于日本之手时，以实现他那做皇帝的迷梦。

七、日本侵占东北后，寻求方策

日本强盗公然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行为，是日本政府、陆军省阴谋策动的。这种暴虐的血腥罪行，不但为全世界国际间的舆论所不容许，而且激发了日本国内的稍有正义感的朝野人士的非难和抨击，日本陆相南次郎因此被迫辞职，改任为陆军省的参议官。南次郎既贸然地发动战争武装侵略中国的东北，然忌惮世界上的舆论，不敢把中国的东北公然据为日本所有，如何善后，南次郎自己也属渺茫的不知所措，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只好只身密来东北，寻求东北事变善后的方策。

南次郎只身秘密地来到中国东北的沈阳，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陆军特务机

关长土肥原贤二等秘议后，决定先试探中国的汉奸们的意见。乃征询奉天省省长臧式毅，答："以吉林省熙洽的意见为意见"。于是南次郎决意亲赴吉林往访熙洽，乃电令日本驻吉林陆军特务机关长兼伪吉林省政府顾问大迫通，通知熙洽：将有日本的贵宾往访，准备迎接。南次郎到达吉林时，车站及沿途由日本宪兵和武装兵士布岗，警戒森严，如临大敌，熙洽在事前，因不知贵宾究为何许人，故派孙其昌为代表，赴站迎接。南次郎和熙洽会见后，进行密谈，由南次郎从关东军本部带来的中岛翻译从中译话，其他任何人不得参加（密谈内容，事后由熙洽泄露给其亲信谢介石、孙其昌等、以后外部才稍知端倪）。密谈的内容：首由南次郎说明此次访问吉林的目的，为了解决东北事变的善后，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为了结束东北事变后的混乱局面，拟在东北建立一个军阀割据形式的统一政权，以前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为首脑统治人选，是否恰当（这一提案，是因为熙洽是张作相的旧属，南次郎为了迎合熙洽，而提出的）？第二，拟在东北建立一个"满蒙独立"的"新国家"，迎清逊帝溥仪，为执政统治者。按南次郎这两个提案，都是以分裂中国和东北脱离南京政府及张学良的统治为原则。这是日本关东军本部在搜集了一班卖国求荣的汉奸们的心理和欲望，后而拟出这两个鬼蜮的阴谋。熙洽当时以张作相庸禄无能，难孚众望，并其威信也不足以统驭旧东北军的各将领，不堪为东北的首脑统治者，否决了第一个提案；而第二个提案恰正符合熙洽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宿望，他说："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溥仪曾是清朝末代的皇帝，迎溥仪来东北，以满洲人统治满蒙的新国家，当无不合，而东北人民亦当能心悦诚服，但恐世界列强各国的干涉。"南次郎接着说："既然同意在东北建立一个满蒙独立的新国家时，其他一切不必顾虑，倘有任何国际间的干涉，由日本政府负责应付可也。你们就着手筹划满蒙独立新国家的建立，做好迎溥仪来东北的准备工作吧"。

南次郎通过和熙洽密谈，明确了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方向，心满意足地返回沈阳，对关东军本部又做了新的策划布署后，才又只身行踪诡秘地回返日本。

南次郎回国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1932年1月中旬（或下旬），派该本部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赴吉林和熙洽磋商伪满洲国的筹建计划。熙洽向板垣提出：建立"满洲国"，迎溥仪为首脑执政，为了隆重长久的百年大计，必须实行帝制。板垣答称："日本军部仅决定建立满洲国和迎溥仪来为执政，至于实行帝制做皇帝，日本军部尚未裁可。但新国家成立后，各机关应请日本人做顾问，本诸日满一心一德，共同携手，开辟满蒙的富源，同仇敌忾地抵制外敌。这次东北的事变，就是因为张学良阻碍了日本既得的开辟满蒙的权利，所以日本军部花费了许多的战争消耗，才将张学良的军阀势力驱逐出东北去，大力支持建立满蒙独立的新国家，应本日满亲善，共存共荣，彼此互利的精神，为共同建设一个美满幸福生活的乐园而奋斗。"

板垣又赴哈尔滨向大汉奸张景惠传达本庄繁的命令，叫张景惠领衔召集，拟于2月中旬，在沈阳召开四省巨头会议，商讨"新国家"的筹建事宜。

板垣在哈尔滨事毕，又转赴齐齐哈尔，做对马占山的诱降工作。当时，马占山所部在嫩江桥畔抗战，给予日本侵略军以严重的打击，日军又增派重兵攻取了黑龙江的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的汉奸玉春、韩云阶、王守清降敌，日军又用重兵把马占山的抗日队伍压迫至海伦，取包围的攻势，一方面又派汉奸韩云阶、王守清等，到海伦劝降马占

山，未得结果。这次板垣征四郎到了齐齐哈尔后，叫韩、王二人陪他，亲赴海伦和马占山当面接洽。马占山为了保存抗日的实力，佯允降意，板垣又诱致马占山在2月中旬去沈阳参加商讨筹建伪国的四头巨首脑会议。

板垣征四郎完成了这三个使命，回到沈阳，吉林及哈尔滨的汉奸们，也如蝇逐臭地先后在2月15日以前到达沈阳，日本侵略者又派飞机接马占山到了沈阳。

八、在日本侵略者主持下召开的四巨头会议以及伪满洲国的建立

1932年2月16日，在沈阳日本附属地的大和旅馆，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主持，四省的首脑、巨头会议宣布开始。参加与会的日方有本庄繁以下三宅参谋长、板垣高级参谋、土肥原陆军特务机关长、驹井德三关东军本部政治部长并中岛、清宫等并关东军本部的翻译书记工作人员；伪方汉奸们计有伪奉省省长臧式毅、奉天伪治安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奉天省伪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奉天市政公所所长赵欣伯、伪吉林省省长熙洽、伪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伪黑龙江省代理省长马占山（马占山在首次会议时，藉词不惯乘坐飞机，下机后头目晕眩，故未参加）等。

会议首由本庄繁说明东北当前的形势，主要的是在东北结束张学良的统治势力，并脱离中国南京政府的羁绊，而建立一个“满蒙独立”的“新国家”，应和日本“一德一心”地共同携手开发满蒙的资源，而达到各族协和“共存共荣”，得以生活改善，安居乐业，建设一个幸福乐土的“新国家”。

继由日本关东军本部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宣示各项草拟的议案，付诸讨论。这些当然不能是在首次会议中如数的表决，首次会议不过仅仅地说明开会的目的，并提出议案的提纲，至于具体的商讨和表决是在以后每次的夜间于翠花及八千代的日本料理店（妓馆）内，四五次碰头会进行的。通过的议程：“新国家”命名为“满洲国”；“建都”指定在长春，更名为“新京”，因长春属于吉林省管辖，故“新国家”一切“建都”事宜由熙洽负责筹备；迎溥仪来就任“满洲国”的执政事；由日本关东军本部和熙洽双方负责办理“满洲国”的行政机构：设执政府（设在前长春吉黑榷运署旧址），以下设“参议府”，以张景惠任议长，袁金铠、贵福、增韫、宝熙及日人筑紫、田边等为参议，于冲汉任“监察院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院长”，“国务院”以郑孝胥为“国务总理”（郑孝胥是福建闽侯人，清举人出身，曾为溥仪幼时的辅师，在清政府修建川汉、川粤两铁路而引起争路风潮当中，曾建议清廷铁路国有策并出任湖南布政使。迨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为董事，兼卖字为生，郑当时屏条的笔润为20元），“国务院”以下，臧式毅任“民政部”的总长，熙洽任“财政部”的总长，但熙洽和臧式毅二人皆不愿丢掉他们原有的吉林省长和奉天省长的势力范围，日本允许二人可以总长而兼任省长。但熙洽尚以为未足，自谦不谙财政，因推荐吉林省财政厅长孙其昌为“财政部”的总长。日本见熙洽在讨价还价，患得患失，意在扩充其势力范围，只好叫熙洽再于各部“总长”当中再择二席，以位置伪吉林省系的人员。但日本

对奉天臧式毅和熙洽的看法，同样的重要，不能“厚此薄彼”，于是也令臧式毅在各部“总长”当中，也择二席，以位置奉天系的私人，这就形成了吉、奉二系汉奸的分赃会议，“外交部”的“总长”委任了谢介石，张燕卿任“实业部总长”，孙其昌任“财政部次长”，襄助熙洽办理财政，奉天的冯涵清任“司法部总长”，丁鉴修任“交通部的总长”，其他“文教部”的“总长”由“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唯独马占山为“军政部总长”，不许兼任黑龙江省的“省长”，——日本怀疑马占山的降意不诚，故欲剥夺其带兵权利，就近监视，防生变端。但马占山早猜透日本的用意，就在会后回省一去不返，不但没就“军政部总长”的职，就是在3月1日伪满洲国“建国”成立时，也没来参加，相反的在4月中旬，李顿率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时马占山更揭穿日本的侵略阴谋，宣传其玩弄汉奸、利用伪满傀儡的真相，给予日、伪以沉重的打击。于是日寇又派劲旅向马占山进攻，而马占山也部署了英勇抗日的队伍和日本的野兽侵略军相周旋。伪满洲国的组织成员，模仿旧中华民国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蜕化成为：满族、汉族、蒙古族、大和族（即日本）、朝鲜族“五族协和”，“国旗”定为黄色代表满族，在左上角四分之一的位置并列红蓝白黑色长条，牵强附会地“代表汉、蒙、日、朝”等四民族。在伪满成立的同时，日本就利用这“五族协和”，掠窃了伪满的主权，横行无忌地独裁专政，成为日本对东北人民任意屠杀、掠夺、压榨和奴役的有力手段。

熙洽在碰头会上（按日语为“打合会”，译做“碰头会”是否洽当）对有关迎请溥仪来伪国当执政的问题上，又提出别开生面的花样，以为溥仪既为“一国元首执政”，虽非做皇帝，亦当“隆重”地敦请，应有代表全东北三千万群众的“代表”前往敦请，使外部观之，溥仪是“顺应”全东北三千万的“民意”而出山就“满洲国”的执政，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就去，轻率的没有价值。日本侵略当局认为熙洽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本侵略满蒙的企图无关轻重，并无妨碍，也就任凭熙洽去胡闹。于是熙洽便搬出一个老古董，前吉林旧省会议员林鹤皋来，唆使他冒充全东北三千万民众的“民意代表”前往“敦请”溥仪，来伪满就职。

溥仪却会装模作样地自高身价，向日本提出条件：此次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约期一年，如一年后，仍不使他做皇帝时，可任凭他辞职。于是就在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长春（改称“新京”）宣告成立，又委派修长余为“首都警察厅”的“警察总监”，邢士廉为“京师宪兵司令”，金壁东为“新京”市的“市长”。“国务院”设在长春六马路以前的督军公署旧址。不意日本关东军本部的政治部长驹井德三又提出一个伪满的任用名单来，“国务院”又增设一个“总务厅”的“长官”，由驹井自任，下设“次长”一人，亦为日人，“国务院总理”以及各“部”的“总长”进行各部的应行应革，承上启下的一切事务，概须通过“总务厅长官”的裁行，“总务厅”以下设：秘书处、人事处、主计处、需用处、情报处、统计处，各处处长皆为日人，于各“部”的“司长”，均为简任，其他如各“部”的“次长”（“财政部”及“文教部”例外）、“司长”、各部及各处的主要科长，亦皆为日本人。当时，一般被任为“总长”的汉奸们，早将自己所属下的位置许给自己的私人，驹井居然提出任用日本人为伪满官吏的名单来，确出乎意外，且于公私诸多不便，虽然内心里不满，但无一人敢答辩一词。熙洽

处在这种僵局下，忍无可忍地说："各机关请日本人做顾问则可，任用日本人为办公官吏，成何体统？那如何能行！"驹井见熙洽提出异议，便疾言厉色地予以回击："日本为了经营满蒙的利权，曾在日清、日俄两大战役中，付出莫大的人力流血的牺牲和许多战争物资的消耗，这次又是由于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威力，方将张学良的恶势力逐出东北。此时，日本如欲把东北据为己有，易如反掌。现在日本以善邻友好道义的精神，日满亲善的真诚，大力的支持满蒙新国家的建立，为了使满洲国日趋繁荣而达到五族协和，共存共荣，日本人加入满洲国做官吏，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共同开发，共同建设，共同努力，有何不可？除非是另有居心，别有异图，反满抗日分子，才会反对日本人做满洲国的官吏呢！"（驹井德三是一个日本浪人，因来中国多年，成为一个有名的中国通，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总裁，九一八事变勃发，日本关东军本部因他有一套惯用无赖讹诈手段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故用为本部的政治部长），伪满的汉奸们，被驹井德三的狡猾讹诈压迫得缄默屈服。于是在伪满成立后，各机关内，便有了日系官吏（日本人及朝鲜人）、满系官吏的分别，各部的"总长"虽为满系，但一切行政事务，皆由日系的司、处长、科长等办好，指令由满系的首长签字盖章而已。至于荐任以下的下级官吏，更是"满系"听"日系"的指示行事，甚至一个"满系"的事务官（荐任）须按照"日系"的一个雇员（办事员）的吩咐行事，"日满两系"的待遇更是不平等，一个"满系"的薪俸仅仅的一二百元（伪满币），而"日系"的一个雇员每月除了优厚薪俸外，尚有各种津贴如额外津贴、家族津贴，住宅津贴等，每月竟达三四百元之多（伪总务厅需用处，一个朝鲜族的"日系"汽车司机，每月佣金及各项津贴竟有三百多元）。"满系"官吏还经常受到"日系"官吏嘲讽，不但不以凡事俱被"日系"官吏把持，而满系官吏得不到事情做，反说："你们满系官吏太舒服了，每天随随便便到衙门来，盖盖图章，到月终就可以领薪俸。"提起满系官吏的薪俸，更是菲薄得可怜，记得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处文书科，一个满系姓周的事务官（荐任），每月薪俸所入，尚不足养三口之家，只落得当卖皆空、家徒四壁，贫病而死，死后仅仅领得无几的恤金，甚至衣衾、棺木都无从营办，并遗下他的妻子及一子一女，无倚无靠，他又身后萧条，状极凄惨，由我发起代他向日满同仁们，捐募了一些金钱，其爱人对我说："别只顾死人，还得要可怜可怜活的哪！"这种伤心话，令人听到寒心，于是便草草地殓葬了周某，余资（权）做孤儿寡妇的生活日用之资。自伪满建立，以至溥仪"称帝"，各机关内的"日系"官吏与日俱增，当时，伪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处总务科的办公人员将及二三十人，其中"满系"官吏连我在内才仅有四人。官级小的"日系"官吏因为比他官级大的"满系"官吏阻碍了他升官晋级（伪满规定，每到年终考核，例进一级，有优越成绩的，可以越级超升）的道路，可以勒令"满系"官吏辞职，如不按其授意辞职时，即被寻故免职，不但得不到退职金，或者要招来无妄之灾（我就是被勒令辞职中的一个）。伪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实行帝制后称大臣）、一般特任级官吏，一旦被淘汰、授意辞职时，以"依愿免本官"加以"前官礼遇"的美称，每年只发给一个月的薪俸，因为不够生活的费用，只好跑到华北另寻出路。先后被淘汰辞职的计有伪立法院长赵欣伯、伪实业部大臣张燕卿、伪驻日大使谢介石、伪滨江特别市市长鲍观澄（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长的私人英文秘书，出任滨江市）、伪财政部次长洪维

国（这些人，于1940年，我在北京都遇到），其中只有张燕卿一人，在北京任“华北新民会”的副会长外，其余都求日本军部的权要的介绍，由伪华北临时政府政务委员会给以政治顾问的名义。

驹井德三任伪总厅的长官，遇事专权，蛮横跋扈，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的长子郑垂，任伪总理秘书官（简任），因其父屡受驹井之欺，一次竟忍无可忍地打了驹井两个嘴巴，事后自觉一个高级官吏动蛮打人，一方面也深怕驹井挟嫌报复，因懊恼成疾，本无大病，就日人经营的满铁病院诊治，而日本医生却坚持必须住院医治，在住院后的次日，接到电话通知，据说郑垂已于夜间死去。我等随其家属到病院去看视，并料理其后事，经其家属临近郑垂的尸体，见其肛门用药棉堵塞，揭而视之，见有绿色水液由其肛门汩汩渗出，都以为是被毒致死。但处于日本强权的天下，故皆敢怒而不敢言。究竟是否由驹井挟怨而被毒死？颇成疑问。

驹井被所谓满洲人打了两记嘴巴，当时的日本官吏颇觉有失日本人的体面，并驹井此后在伪满的威信亦颇成问题，而驹井本人亦觉羞愧难当，势难恋栈，不得不提出辞职。驹井的亲信、秘书处长上野巍倡议由“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捐资，赠送给驹井德三“惜别纪念品留念”，捐启是叫我代写的，捐了钱由上野经手购买了一对金花瓶，刻上郑孝胥等赠送的名字，给驹井德三送去。驹井的后任，日本又以东京市池袋区的区议员远藤柳作继任为伪总务厅长官。

远藤柳作在任伊始，由日本带来一个柔道三段的日本青年松崎为其保镖，以伪国务院总务厅的属官任用，每日随远藤来去，给松崎在总务科设一个办公座位，终日默坐，无事可做。远藤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吃中国料理（宴席），每天叫我和松崎陪着他，甚至把长春所有如公记饭店、大陆春宾宴楼、益兴楼等著名的大饭店都吃遍了。那时，我心里暗想，每次三个人吃一桌酒席，未免过于浪费，但远藤尚以为未足，叫我问饭馆里的司事，还有较每桌翅子官席36元贵的没有？饭店的掌柜的也会做生意，于是由36元抬高到40元，远藤还要贵的，于是又抬高到50元，远藤见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特别花样及个别的味道，不过仅仅的把筵席价由36元抬高到50元而已。从那时起，长春各饭店的鱼翅、燕菜全席就固定为50元了。当时，日本内地经常有如“产业视察团”、“学徒视察团”等等，到伪满洲国“视察”，远藤命以“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名义在大饭店设宴，举行招待会，“视察团”的成员人数众多，有时摆一二十桌、二三十桌，最多时，达到五十多桌（“学徒视察团”为日本东京各大学学生组成，人数达五百余人），郑孝胥因不胜其烦，每次都是派我代表出席致词（重要的宴会，方肯亲自出席）。就在“学徒视察团”的招待会上，使我感到一个的刺激，因该团的领队有东京明治大学学生课课长兼嘤鸣会的会长（专研究中国的事情）师尾源藏，昔日我在日本明治大学念书时，他非常拉拢我，他给介绍一个赤神良让博士，叫我经常向赤神求教，研讨学术，我们三人并摄有照像；中国在明大留日的同学求到我，我转求师尾时，他对我有求必应。他还要给我介绍日本当时的一流电影女明星，领我到摄影场去参观化妆。我和师尾在长春重逢，他对我不但不似昔日在东京时那样亲昵客气，相反地对我叱呼命令，我当时还没感到自己业已当了亡国奴，尚以为是主人，是代表“国务总理”招待他们，对他的轻慢甚感不快，而师尾却处之泰然，以为理所应得。

在溥仪称帝后，日本殖民当局人事更迭，派菱刈隆元帅为"驻满全权大使"。到任后，发表谈话说："满洲国在建国成立时，如婴儿的呱呱坠地，是由日本的大力扶持而诞生的，满洲国的成长，也是在日本的抚育下长成的，故满洲国和日本国间的关系，当视为小孩和大人之间的关系"。继而郑孝胥谈话却说："满洲国成立，如婴儿的降生，自不待言，由日本大力抚育而成长，亦莫可否认。但从建国大同元年到大同三年，又改号康德元年，婴儿是在成长了，由会爬到学步，现在可以说会跑了，但大人却束缚着他，不叫他跑，甚至走步都要受到限制，试想，这个小孩的处境是如何的苦恼和可怜呢？请看，现在满洲国的各机关内，日系官吏多于满系官吏，而且一切政务，不许满系官吏伸手办理。这情况，不是正如大人不许一个会跑的小孩走步同样么？"于是菱刈便装样说："是这样么？"便立即革除了两个"日系"荐任官，次日溥仪便传见郑孝胥，勒令其辞职。郑孝胥以为自己"有功"于"满洲国"，又首倡"王道政治"，力争，即便辞职亦当保留其"功勋元老"的位置。溥仪说："叫你辞职便辞职，什么功勋元老（前官礼遇），都休妄想。"郑孝胥无可奈何地辞出，以后经菱刈居间调停，郑孝胥才得到以"前官礼遇"而辞职，更换了一个昏聩无知，对日本百依百顺的张景惠为伪国务总理大臣。

郑孝胥在就任伪满的国务总理时，妄想沽名钓誉地做为一个"良相名臣"，凡事标新立异，提倡"重仁义，尚礼让，善导厚民，以愚忠愚孝，王道政治"，实行愚民政策。平素的日常生活，嗜饲鸽，自购高粱为鸽食，云：高粱为东北人民的主食，经常藉买鸽食，得知高粱的粮价，而可以知道人民生活高低。但虽知民间生活的疾苦，亦无法解民倒悬，纯系盗名欺世之谈。他自己起居的书斋，自题名"夜起轩"，缘以夜不明辄起，跃桌上下，以锻炼身体，颇为自豪。喜吟苏东坡的联句，好为人书写联条，甚至一个日本的侍役求其"法书墨宝"，不但是有求必应，甚至落款，亦是"某某先生属正"，当时颇有洛阳纸贵之慨。伪满洲国的"国歌"，是他的"杰作"，可惜在每次开会唱"国歌"时，被一般的"满系"公教人员及学生等改唱为对伪满不满的词句，兹将郑孝胥的"杰作"伪满"国歌"并不甘做伪满顺民改唱伪国歌的词句，一并抄录如下：

伪满洲国国歌　郑孝胥作词　杨孝毅作曲

郑：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众：天地内有了小满洲，小满洲，便是放狗屁。

郑：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只有亲爱，没有怨仇。

众：昏天黑地，真苦真忧，造成小国家，没有亲爱，只有怨仇。

郑：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

众：人民三个半，人民三个半，

郑：总加十倍，也得自由。

众：总加十倍，也得完蛋。

郑孝胥自负小有歪才，孤芳自赏，企图鞠躬尽瘁于伪满，做一代"良相"，而其长子郑垂被日本鸩死，自己被逼辞职，甚至连元老的一个虚名尚系由菱刈说情，才得"恩赐"，他在伪满世态炎凉的环境里，实思欲回南，然既做了叛国汉奸，有始无终，确亦"羞见江南父老"。况且当时，南方沦陷日寇之手，中国南方的人民是否能容纳汉

奸败类，确也成问题，进退维谷，只好厚颜滞留在伪满，为期仅一年有余，终于抑郁而死。

九、日本横行无忌地侵略中国，国联调查团证明其为侵略者，终于声明退出国联

日本疯狂的侵略中国的野心，并没有因为吞占了中国东北而得到满足，又在1931年11月8日，掀起了天津事变（由11月26日夜间开火，至29日停战议和），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又发动了凶残的淞沪战争。

国际联盟理事会因见日本无止境而肆无忌惮、猖獗地侵略中国，且侵犯到西方列强各国在华既得的利益，国联中国东北调查团李顿报告书确认，日本为侵略国家。加盟的44个国家，除日本一国反对，尚有一国弃权外，其余42个国家全数通过，于是日本在国联陷于孤立。在1933年2月24日，日本不得不退出国际联盟，在2月26日于东京正式声明，日本昭和天皇在27日又颁布了退出国际联盟的诏书。

十、溥仪想做皇帝，阴谋活动，日本占领全东北

溥仪在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时，和日本约期一年，如不实行帝制，叫他做“皇帝”，可以任凭他辞职。在离一年的约期尚差一二个月时，溥仪的亲信劝他向日本关东军催促，履行约言。但溥仪深恐被日本拒绝，弄成僵局，任其辞职，而无处可归，是以未敢轻易向日本启述。

熙洽为了促使伪满帝制如期实现，积极地阴谋活动，唆使老古董林鹤皋纠合了五百多人（内有清朝遗民及东三省的旧国会议员等），在长春的一个小学校内，召开实现帝制的“促进会”，当正在开会时，被日本的宪兵赶至，将开会人众冲散。事后日本驻满“全权大使”武藤元帅找溥仪谈话，溥仪深恐受到武藤的叱责，心中忐忑，惴惴不安。但武藤仅仅向溥仪解释说：“改称帝制，未为不可，不过时机未至，不可操之过急，目前日本政府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待事机成熟，自会解决。”

在1933年3月2日，日本关东军本部宣布，全部占领了中国的东北。

兹将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东北各省的日期节录如下：

1931年9月19日，日本奉天独立守备第五大队及第二师团主力，分别占领沈阳北大营及东大营，日本平田部队攻陷沈阳城。

同年同日，日本驻长春大岛部队及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攻占长春宽城子及南岭的东北边防军步、炮兵驻营地。第二师团长多门率长谷部及天野二个旅团进驻长春。

同年9月22日，吉林叛国汉奸熙洽迎降多门，吉林沦陷。在此前后，日本驻朝鲜第二十师团主力及平壤飞行队，分别侵略沈阳及吉林各地，先后侵占了昌图、营口海港军营、吉长铁路局、抚顺城、洮南等地。

同年11月2日，日本滨本支队在嫩江江畔架桥，企图进犯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被江北岸马占山的抗日部队英勇阻击，日军又增派步兵二大队及炮兵三中队，激战了六

昼夜，日占领江北岸阵地。

同年 11 月 17 日，马占山部对日军进行反攻。18 日，日本多门部队由大兴进军，马部退走海伦，19 日日军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市。

同年 12 月 28 日，日军嘉村旅团沿北宁铁路干线向集中在锦洲的张学良部进攻，又派多门部队由营口进犯。

1932 年 1 月 2 日，日本又派室部队率依田部队，绕道多门部队的后方，沿北宁铁路主线进犯。

3 日至 4 日之间，依田部队的先头、白滨中尉的装甲列车队侵占了锦州。

同年 1 月 9 日下午，由热河境内侵略锦西的日本骑兵第二十七联队古贺联队长在锦西西方战死，同时，在塔子附近的日军松尾监视部队所有 24 名日军，全数被歼灭。

1932 年 2 月 5 日，日本长谷部及多门部队，侵占哈尔滨。

同年 4 月 3 日至 5 日、21 日，日军多门部队及松木、广濑部队，在北满各地、方正附近并延东省铁路东部和丁超、李杜部展开激战，由于日军飞行部队参加爆击，丁、李所部遭到打击，日军继续向依兰附近及松花江下游进犯。

同年 6 月 16 日，日本松木部队和马占山部队战于克山附近。7 月 3 日，日本松木及广濑部队将马占山部包围在庆城附近。27 日至 29 日，又加田中及甘粕部队和马占山部激战在刘家店附近。

同年 10 月 21 日至 28 日，日军吉冈部队及服部部队，向活跃在东边道方面的抗日联军进攻，10 月 30 日，吉冈、服部两部队，更协同茂木及松木两部队的主力，和在呼伦贝尔以苏炳文为首的抗日军队战于泰安镇附近，11 月 11 日战于拜泉，苏炳文军经过和日军数次的苦战恶斗，最后不得已而撤退到大兴安岭的西部。

1932 年 12 月 13 日至 1933 年 1 月 5 日，日军多门部队会同独立守备队，对满铁本线中间的三角地带，进行残酷的“扫荡”后又转向吉林省境的东部，沿穆棱河地区向丁超、李杜、王德林等作战，丁超被迫降敌，李杜等退人兴安岭，又转人苏联国境。

1933 年 1 月 1 日，驻山海关的日“满”警察队与何柱国所部军队发生冲突，日军驻山海关守备队亦加入战团，日军又在 1 月 3 日派西部队及铃木部队的主力急向山海关增援，在 1 月 10 日，日本侵占了山海关。

1933 年 2 月 13 日，日军向热河省进犯，至 3 月 19 日，日军侵占承德及热河省全境。

日本在 1933 年 3 月 2 日宣布：业已全部占领东北四省。在这次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中，日本物资消耗达 3.6 亿日元，战死士兵 2566 名，战伤 6969 名，根据这些数字不减于当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中所受的损失和伤亡的数目云（参考材料：日本大百科事典第二十四卷 332 页至 333 页）。

十一、溥仪称帝前后

日本认为“事已成熟”，而溥仪朝思暮想做皇帝的迷梦“时机已至”。日本关东军本部便通知溥仪，在 1933 年 3 月 1 日，准备就位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和一班附庸

汉奸们，得到实现他们遐想的幻梦的通知，莫不欣喜若狂。溥仪早在来伪满时，就在北京敦庆隆定做了全付皇帝服装（滚龙袍、冲天冠，朝靴、挂、带等等）。但日本却主张，他在就位时，要穿戴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制服，而溥仪却以为做皇帝，不穿龙袍，戴冲天冠，觉得不够味，因与力争，日本不欲使其过于扫兴，最后才叫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传达，只许他在就位前祭天坛时穿戴一次滚龙袍、冲天冠。

溥仪在就任伪满执政时，就网罗了些擅长于武术技击之辈，充其保镖。在这次即位称帝，共募集约三百余名，改组“翊卫军”，“以壮观瞻”，以佟济煦为警卫处处长，张海鹏为侍从武官长，将“执政府”改称为“宫内府”，任沈瑞麟为“宫内府大臣”。但伪满军政部不发给翊卫军的经费和军械服装，只好由溥仪自掏腰包，购置军械及服装，并按月发给饷俸。

1933年3月1日，长春的郊外，在杏花村筑起高坛，由市区通往郊外杏花村的街道两旁，布满日伪的武装军警的戒备，枪上刺刀、实弹，如临大敌。溥仪的前驱，一个摩托脚踏车，上插一面书写“遮断交通”的红旗，临风招展，驰驱而过后，须臾，溥仪的车在前后左右警卫摩托车的护卫下，风驰而过。车到杏花村两旁有翊卫军和仪仗队列队，溥仪身着“皇帝”的服装下车后，踏上黄土铺的道路，高视阔步地走向临时筑起的天坛，各伪大臣汉奸们亦步亦趋地随在后面，祭天、献爵，跪拜如仪，状甚严肃，“御极典礼”就在这神秘的气氛下宣告结束，于是溥仪便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天坛上不知究竟供奉的什么神道，事后我以好奇的心理私往窥视，原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木牌上写：“长白山之神”）。

溥仪即“皇帝”位后，第一件事就是筹办“全满武道大会”，计有中国的拳术、兵器表演和摔跤比赛，日本的柔道和剑道，选手是由东北各省市选拔出来的，据说是由日本授意溥仪而举办的。最初都以为是提倡尚武的精神，交流中日武术的经验。首次大会在长春头道沟西公园比赛表演，选拔优秀选手，第二次再进宫表演。对优秀的选手们除发给银杯银盾及奖章等奖品外，因中国选手服装不整齐，有碍观瞻，给他们置买了白色的运动服装，又发给他们食宿及来往的旅费。大会的一切都是责成我着手筹备的。二次进宫到溥仪面前表演，需要我随时向溥仪报告节目，但我不谙见“皇帝”奏对的礼节，又没有如清朝旧时设有礼部教导面君习礼，并且穿着伪满的制服（蓝袍、青马褂、“装死”的帽子，即皮边瓜皮帽、朝靴），每次奴颜婢膝地当磕头虫，我心里也有所不甘，只好自做聪明，改穿燕尾服进宫，意在每次奏对时，可以只鞠躬，而避免跪拜磕头。

当时，溥仪坐在宫内府一个厅堂内迎面正中用屏障圈成一个仅容一人的小方格子内，屏障的左侧坐着一个身穿白绸白羽毛高围领斗篷的妇女，她就是溥仪之妻婉容，而廊下陪坐的是：伪满国务总理大臣以下各部伪大臣及近侍武官等。至于我在报告每项节目时，如何奏对，颇费踌躇，我便信口胡诌：“现由某某某表演某项节目，恭请御览”云云。报告毕，我窥视溥仪，见他微颔其首，面有喜容，于是我才自幸“说对了”，放了心。当天溥仪观看武术表演，兴致很好，俟选拔了选手，表演后，他又叫一个粗率的山东人武某（“宫内府翊卫军”，据说武某在宫里常闹笑话，他对于溥仪都是跪接跪送，有一次他跪在地下，溥仪只顾同其他人讲话，忘记他尚在跪着，他于是便大声呼喊：“万岁爷，这里还跪着一个呢！”溥仪才笑着叫他起来），表演了一趟奇形怪状的兵器，

又叫一个穿绸长衫的人（大约是润×，可能是溥仪的近族?）练了一趟拳术操手，也可以说是示范表演吧。在“宫内府”的御前武术表演告终，但日本人还不叫把各地的武术选手遣散，一般都在猜想，欲立武术馆。不久，便揭穿这个谜：因为日皇裕仁之弟秩父宫雍仁，衔日皇之命欲来伪满访问，因为雍仁素嗜体育活动，故一班驻伪满的日本高官为了投其所好，以博得其欢心，才浪费了许多的经费（东北人民的血汗）和时间及人力。兴办此举，并非是为了提倡尚武精神和尊敬溥仪即了“皇帝位”。

日皇弟秩父宫，到达长春住于日本“驻满全权大使”官邸。见了溥仪，传达日皇祝贺溥仪即位伪满的“皇帝”之意，并赐给溥仪菊花颈饰及菊花大绶章（按：菊花是代表日本皇室的纹章）各一，又赐给溥仪之妻婉容一个宝冠章，同时，溥仪也向雍仁祝祷了日皇裕仁的健康。

全满武道大会和陆上竞技运动大会，为了欢迎日皇弟雍仁，同时在长春头道沟西公园体育场举行。大会会场是由伪新京市市长金壁东布置的，由西公园的入口处通往体育场的道路上，也是用黄土铺路。我在雍仁尚未到来的开会前，由黄土铺的路上走向体育场，被金壁东看见，他笑着把我拉下黄土路，并向我解释，凡是用黄土现铺的路未经雍仁走过，任何人不准先在上面走。在我走过的黄土路，金壁东又叫夫役重复摊平。

当天，中国武术表演及摔跤比赛的会场和日本柔道及剑道的会场比邻，陆上竞技田径赛在其他的体育场内，另有人主持。雍仁来到会场，对田径赛以及日本的柔道、剑道因是司空见惯，不感兴趣。对中国武术，双手带对花枪成套表演，颇感新奇，陪侍雍仁的日本人误把双手带向他解释为青龙刀。当时有一个日本人请求临时加入中国的武术表演，表演的名称叫做卡拉推（译做“唐手”）。我对武术是一个门外汉，通过筹办武道大会以来，和各地的武术选手盘桓了一个多月之久，略知中国武术有太极、八卦、形意、通背、六合、燕青、花拳、螳螂等等，但不知“唐手”是属于哪一门的手法？然既称做“唐手”，可能是昔日从中国唐代传到日本的一种拳法。我由于好奇，就答应他临时参加表演。他在场上类似中拳术的比划了一阵，我是看不出什么门道来的。大会的经过情况，还拍摄了纪录电影，雍仁在参观武道大会后的翌日，就启驾返回日本。雍仁在长春逗留仅仅二三日的期间，就支使得伪满大小汉奸和日本殖民官僚们，忙的屁滚尿流，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许多的人力、物力和资财。

十二、伪满皇帝溥仪，做了名副其实的傀儡

1935年4月，溥仪亲自赴日答礼，见了日本天皇裕仁并其母，奴颜婢膝，曲意承欢，孝子贤孙般地丢尽了丑，闹了许多笑话。由日本东京返回长春后，立即对伪满的日、“满”系官吏训谕日、满一体的意旨，并在5月2日颁发“回銮诏书”晓谕全“满”的臣民。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即日皇的诞辰。是日溥仪亲赴南次郎在长春的官邸，参加日皇寿诞的“遥拜式”，并向日本称贺。

日本关东军派了一个本部的高级参谋吉冈安直（曾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战史教官）任溥仪左右的“皇室御用挂”（这个职名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如认作“内廷行

走”或“皇室秘书”或“伴驾随从”均不洽当）。这个“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职权，对溥仪的言行一举一动，都要横加干涉、牵制及命令，溥仪对他亦百依百顺，不敢违悖，畏之如虎。例如禁止溥仪学英语，将其英文秘书吴沅业调到东京伪满“驻日大使馆”，又控吴某私通英、美驻日大使馆，被日本宪兵队拘押，刑讯以后下落不明。由吉冈教授日本语“祝大日本天皇陛下身体健康”一语，录成录音盘，贡献给日皇裕仁。日本宪兵的便衣和溥仪的“翊卫军”斗殴，“翊卫军”被日本宪兵队由宫内府逮走，酷刑拷打，并灌辣椒水，后经吉冈处理，将一部分“翊卫军”驱逐出“国境”，一部分解散，缩减了编制，缴去长枪，一律佩带手枪，警卫处长佟济煦向日方赔礼道歉后，又被撤职，更换一个日本人为队长，并在宫内府里设置了一个日本宪兵室。

日本又限制溥仪和他的关里的亲故们会见，并扣留他的来往的书信，又限制溥仪和伪满的参议、大臣们相见及随意谈话，规定伪满的参议、大臣们只许在每年末进宫面奏一次，尚须有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侍立旁侧监视，张景惠亦须按规定每周进宫报告“国务”一次。

蒙古德王昔日曾馈赠溥仪名马，来伪满公干，日本关东军准许进宫谒见溥仪，恰值吉冈未在旁监视，溥仪对德王微露在伪满为“帝”不自由的苦衷。德王辞出后，吉冈归见溥仪时，急声厉色地质问溥仪：“陛下都向德王说了些什么话?”当时溥仪疑为德王向日本出卖了他，心内颇为恐慌，以后见吉冈没有下文，方知是吉冈对他使诈语，然而溥仪却饱受了一场虚惊，心中数日未得安宁。

溥仪初来东北时，携来旧日北京宫内的一尊古佛像，供奉在伪满宫内府溥仪的起居室内，被吉冈看到，提出干涉的意见：“陛下最尊敬崇拜的应当是日本，信仰也应供奉日本的始祖‘天照大神’。”于是强制溥仪撤销了佛像，由日本东京迎来“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镜、剑、玉串，在宫侧建设一座“建国神社”，设置一个祭祀府，任前关东军参谋及宪兵队司令官桥本虎之助为总裁，沈瑞麟为副总裁，每逢初一、十五由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以下“日满系”官吏前往神社，膜拜祭祀，以后在伪满各地亦仿建了“建国神社”，除由各地官按时祭祀外，一般人行经“神社”前皆须默致敬礼，不然即以不敬罪加以严惩，这样就剥夺了溥仪以及东北人民的信仰自由。

吉冈干涉溥仪之弟溥杰的婚事，亲自赴北京给溥杰和其前妻唐石霞办理离婚手续。因溥仪之妻婉容未生子女，倡议给溥杰选择一个女子为偶，又通过伪满立宪院，制定“帝位继承法”，“帝死子继，无子孙继，无子孙以弟继，无弟以弟之子继之”。由在日本东京的南次郎和本庄繁给溥杰物色选择日本侯爵嵯峨实胜的女儿浩子，与溥杰为偶，1937 年 4 月 3 日，在东京军人会馆举行结婚典礼。溥杰夫妻结婚归国后，和溥仪夫妻家庭相处，又给溥仪的精神上增加了负担，每逢浩子对溥仪夫妻馈赠食物或同桌进膳时，凡是未经溥杰先下箸食用的食品，溥仪都不敢先吃，恐在食物中暗下毒药，而被鸩死。

日本在 1935 年以后，更疯狂的发动侵略战争，因苏“满”国境的边界问题，试图向苏联挑衅，掀起张鼓峰和诺门罕战争，结果，日本遭到严重的教训，每天用火车从前线载回许多日本战死士兵的骨灰。每个骨灰匣由日本兵用白布吊在颈上，捧在胸前，甚至挤满数车厢，停后手捧胸木匣的日兵默默无声地鱼贯而下，日本命伪满国务院每次须

派官吏代表赴站迎送，伪满官吏代表除须对骨灰致敬外，须致悼辞，并说“谨送大日本皇军战士，无言凯旋回国。”

从那以后，日本在伪满的恐怖政策更加凶恶残忍，日本的宪兵队不但是对东北的民间，就是伪满的达官显要，一旦被其疑忌，即被逮捕酷刑鞫讯，或被血腥处死。计有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为了内外蒙的边界问题，代表伪满和外蒙的德卡给札布在1935年5月31日开始第一次谈判，到7月22日，因双方未达到协议停止谈判，而日本疑凌升与外蒙古私通，将凌升及其秘书侦讯，在1936年4月将凌升及其秘书以惩治叛徒罪例，枪决于长春南岭。凌升被枪决后，日本关东军植田司令官方告知溥仪，使溥仪不寒而栗。因凌升和溥仪之间有亲属之谊，私自和其妻婉容窃议：是否应声明和凌升继绝亲属关系，而免被瓜连。

在这一年里，伪安东省的教育厅长孙文敷（未改省前的安东县的县长），因过去朝鲜族租用土地问题而引起的万宝山事件，孙文敷曾参与调查处理，日本侵略者时刻未曾忘怀。安东改省孙文敷就任教育厅长，日本侵略者突然忆起前嫌，因令宪兵队究办将孙文敷拘捕酷刑讯问，终于将孙文敷用“坐飞机”的酷刑处死（用四根绳各缚四肢的一肢，在空中游荡）。还有长春伪首都警察厅的警察总监修长余不知何故也被日本宪兵队拘捕，严刑拷问未得结果，将修长余释放出狱后，已奄奄一息，未几便死去（我因和修长余的长子修国瑛在日本明治大学同学，其父死后，我曾到灵前悼唁）。至于日本宪兵队对东北民间更为残酷，东北人民每提起日本宪兵队都是谈虎色变，不寒而栗。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愈益肆无忌惮的凶毒。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宣战，溥仪遵奉日本关东军的指示，也颁布了对英、美宣战的诏书。

日本穷兵黩武，扩大侵略战争，一个小小的岛国对于战争的消耗人力物力，当然要感到不足、捉襟见肘。想在伪满弥补其缺欠，除增加一切苛捐杂税并附加税外，大肆搜刮剥削，“号召”东北人民捐献国防献金和献铜献铁，市上流通的当十铜币早被搜刮一空，居民和商店的铁栅门窗亦令拆除捐献，又令各校学生将破铜烂铁五金供器，即便一根断针亦可捐献。组织伪满各大臣之妻为“国防妇女会”，以张景惠之妻为会长，每日斜佩“国防妇女会”的标志到街头向行人劝募“国防献金”，又叫各剧院的名优伶人宣唱“国防献金义务”戏。

吉冈叫溥仪捐献了宫内府的大铁门，及室内陈设地毯等物，溥仪和其妻婉容个人的金、银、珠、宝、玉器及衣服等项，也捐献了许多。

当时，伪满对粮食实行限制，“满人”（即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倘如偷吃大米，即按犯罪论，设有经济警察及特务等专案司检察其事。我在1942年秋以“华北视察团”的名义又到伪满视察，火车上的食堂以及各地的旅馆、饭店都吃的已不是纯大米饭而是大豆、高粱、谷子等做成的混合饭，“高粱”美其名曰“文化米”。及至到了长春，见到市面萧条，满目荒凉，亦非复旧观，颇有今昔之感。又到伪满国务院，参见招待会，见伪满的日、“满”系官吏穿的都是草绿色更生布的协和服。

日本更不顾东北人民无衣缺食，啼饥号寒凄惨苦，巧立名目，如每年例行的“粮食出荷”，又有“报恩出荷”的名目掠夺东北人民的食粮。

最后在1945年又在伪满挤榨出食盐70万担、大米30万吨，日本欲令溥仪亲自前往日本慰问，溥仪恐被英、美海空的潜艇、飞机炸死，故未敢去，于是张景惠便做了溥仪的替身，做了“慰问专使”。

在1945年的8月9日，一声雷响，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致使日本号称百万的关东军相形见绌，逼使日本就在8月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伪满洲国便寿终正寝，而沦陷十四年之久的东北人民得以重见天日，获得解放。溥仪当时尚希日本人携他逃往日本，但那时的日本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不保，又何能顾及到他那一个被玩弄的傀儡呢？

溥仪的“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以日本陆军中佐（中校）的官级跟随溥仪为“皇室御用挂”，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降服为止，始终未离溥仪的左右。其官级却累升到日本的陆军中将，显系日本因其牵制溥仪有功而对他破格晋升的，殊不知吉冈的晋级是用溥仪的多少恐惧烦恼和痛苦换得来的。吉冈安直就在伟大的苏联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吉冈和溥仪等解往苏联，以战争罪犯受到应得的惩罚。

溥仪又做了一代伪满洲国的“皇帝”，虽然遂了他私人幻想的迷梦，但实际却成为被日本玩弄的一个木偶——傀儡，吉冈就是傀儡的幕后牵线人，牵之则动，教之便言，强令他做不愿为的事，说不愿说的话，凡事不敢违悖，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但溥仪究竟是一个有感性的人，他做傀儡皇帝的个中滋味，唯有他自己知道，至于溥仪在伪满的丑事过程，许多书著已多见，且较我为详细。溥仪本人亦在写他亲自体会的自传，而我不过是想到就写，难免重复赘言，浪费笔墨之讥。

（1964年12月）

九一八沈变纪闻

黄曾元*

余早岁供职沈阳政界有年，不啻第二家乡，张作霖统治东北时代为奉天省长公署第一科主稿，迨1930年杪前，奉天省长刘尚清请人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余相从赴南京任内政部秘书。1931年秋间“九一八”变起，沈阳沦陷举世震撼，明年余卸部职来北平，其时沈阳旧侣亦纷纷避地前来相见，辄纵谈沈变时事。前奉天政务厅长阎君定保字又安，更出其日记相示所载时间人名尤为详晰。关原亦辽省政界中心人物，与出任地方治安维持会委员长之袁金铠同籍辽阳，交情素笃，乱时犹常相晤，所见背驰，割席西上，其言尤足征信。当时曾略摘纪念九一八事变及吾国近代大事，国家征集史料，载笔者当不乏人，即如《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王君子衡《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一文内容虽似详尽，但就余所闻尚多差距，现就当时所录溉成斯作，日期按关君日记记载，则更汇集当日来京沈阳故交所谈，虽并非全面，似不妨各述闻见，以待辽左父老之能辨之者，而供后之修史者参考焉。

1931年9月18日夜间约10时忽闻炮声自西向东（沈阳南满站在城西方）约5分钟一次，拂晓始止，内有重炮数声声震屋瓦，枪声更一夜未停，夜半有日军数百人持枪由西向东疾驰，由西城墙缒入城内，沈阳事变起矣。

9月19日见闻如次：

商埠地一带已到处布有日哨兵，三经路汤玉麟私宅内花园假山上亦有日兵布岗，居民率扃户不出。

东北兵工厂、迫击炮厂、北大营、警察厅及警察各分局、监狱均被日兵占领，闻以上各处守卫兵警均有伤亡，兵工厂尤多，凡类似军人者，遭遇日兵辄被枪杀，商埠九纬路口亦死有我宪兵一人

上午5时许，日兵二十余人到东三省官银号封库，并以方纸书“日军占领，犯者死刑”八字分贴各门，至20日晨将员役逐至北院南院，无旧人矣。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出布告，谓出兵近因系因南满铁路柳树沟铁道被我兵撤毁，远因则因连年“侮日”太甚，权利被“压迫”，不得已出以膺惩东北军权利手段，以维持满蒙“利益”。

闻袁金铠（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荣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时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住北京，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由荣臻代行）、吴家象（陆海空副司令行营秘书长，时方在沈）、赵鹏第（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等要人均赴辽宁省政府

---

* 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秘书。

主席臧式毅私宅会议，历时一昼夜始散。

9月19日以后数日见闻如次：

城内外各机关陆续被占，教育厅、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公署、沈阳县政府、东北最高法院分院以及各级法院最后被占，于门首贴有“日军占领”字样。

闻营口、安东、长春、吉林等地先后被占。

重要军官住宅、大帅府（即张学良住宅，张作霖生前即居此，在南门内，民间皆称为大帅府）以次如张作相、汤玉麟、荣臻、吴俊陞（吴虽已逝，其家仍居东关小河沿）等家均被搜检，武器均被搜去殆无幸免，未数日间军人威势一扫而空，后闻惟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住宅特被保护，似张景惠之投日，此时已有默契矣。

重要军政官吏多逃避，荣臻亦脱身西上。

各机关皆悬日本国旗，各要人住宅多高插欧美国旗。赴街者多带欧美领馆及洋商臂章，触目皆是，除日军军用及欧美人外，街上汽车极少，情况极黯淡。

商铺关闭，城关民户被抢者，时有所闻。小西边门外某商运送面粉十袋，被街上贫民分劈，日兵开枪击毙一人，众始散。

日方以大佐土肥原贤二为沈阳市长，下设课长七人皆日人，闻设有中国顾问四人。

9月22日，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教育厅长金毓黻均被日本官兵队长三谷押送至鲍文越住宅，其后即与外间不通消息。

邮政电话及北宁铁路机关尚如故。

自事变迄今数日，商号闭门，百业停顿，抢案迭出，治安不能维持，日方固望组一伪政权供其驱使，迭经示意可由地方团体出任维持治安，设立“治安维持会”。热衷投日之徒固思藉为终南捷径，而稍明事理之人终未敢轻任此事，尤恐日方进一步以组织伪政权见迫，无法抵拒，以是迭经酝酿，未即成立。终以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金铠坚决主持，遂告成立

袁金铠籍隶辽宁省辽阳县，为辽省士绅中坚。辽阳为辽南大邑，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代，政者多人，指为辽阳派，袁金铠、于冲汉实为魁首。袁前清末年充奉天咨议局副议长，张作霖既为督军兼省长，袁曾任军政两署秘书长数年，隐操政柄，1922年第一次奉直之战，直胜奉败，北洋政府夺作霖职，采虚誉曾授袁奉天省长。张学良继柄军政，以袁负乡望遂推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人起辽阳秀才，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东北为俄军所据地方成无政府状态，袁乃办团练卫乡里，其后所办团改为巡警，袁又为全县巡警总局局董，以是渐负乡望，遂跻显要。至是狃于往事，犹欲从中建功名，而且拥厚资钜产，为辽阳、沈阳间大地主，亟欲自保遂不惜甘冒不韪矣。

9月24日，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成立，正副委员长及委员共九人名单如次：

委员长袁金铠，字洁珊，原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副委员长阚朝玺，字子贞，前热河都统。

副委员长于冲汉，字云章，前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中东铁路督办。为东北著名之亲日派。

委员张成箕，字星南，前奉天省议会议长。

委员金梁，字息侯，前奉天政务厅厅长、清室内务府大臣。

委员佟兆元，字德一，前奉天辽沈道道尹。

委员李友兰，字香斋，前奉天洮昌道道尹、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公司总办。

委员孙祖昌，字笙舞，前奉天纺纱厂厂长。

委员丁鉴修，字幹元，原任中日合办弓长岭煤矿公司总办。知名之亲日派。

以上委员等，佟兆元、孙祖昌皆始终未到会，殆皆因与袁关系较深之故，被袁将姓名列入，佟兆元、李友兰不久俱避地入关。孙祖昌虽住在东北，然始终未就伪职，至素称亲日巨子之于冲汉，当“维持会”成立时住在辽阳未到会，有谓赵欣伯系委员者，赵虽为日军部与“维持会”居间奔走，但并非委员。

“维持会”成立之初，袁金铠犹声明此会系为维持民生及地方秩序，并活动金融，既非组织政府亦非独立自治，并不涉及军政官治，日方示意将市政交由地方“维持会”接办，袁犹以“维持会”无此行政权力，加以谢绝，乃未几日方严促各行政机关开始办公，即责成“维持会”办理，盖日人视为伪政权矣。

“维持会”初期系设在沈阳故宫附近，设立已数日，友人有往访委员者，见门首尚未悬牌，委员亦非稔交不延见，状颇诡秘。

“维持会”成立首，召旧有警察持木械站岗，名为警备队。其后又改为自卫警察局，派冯子敬为局长，实在仍不能维持治安，各大住宅墙上用电网者甚多。

9月25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均开业。

日本关东司令官布告谓监狱人犯多系被军阀官僚压迫，本吊民伐罪之旨将其开释，嗣经维持会劝阻作罢，但看守所仍逸出人犯30余名。

9月29日，地方“维持会”推举原东三省官银号会办吴恩培筹办该号开业事宜。

此时吉林伪省政府已成立，原督署参谋长熙洽为长官，又传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已“独立”。

日方敦促开办财政厅，“维持会”答以官银号未开业，财政无法办起。

10月5日，沈阳县政府及省城税捐局均开始办公，有日员参与监视。

10月8日，日本关东司令部招集中交两行嘱与官银号、边业银行合组金融委员会，附设于“地方维持委员会”内，意在官银号开业后防止关内提款。

官银号及边业银行现洋券骤跌，每一元换现洋八角九分。

各县胡匪蜂起，每股多者至七八百人、一二千人，辽阳遍地皆匪，共达万人以上。

与“地方维持会”先后设立者尚有一“四民维持会”，意指士农工商而言，阚朝玺亦为其中主要人物，并闻该会与素居大连之清恭亲王溥伟关系甚深，“地方维持会”以其形同对立，迭与日方接洽商得同意，于10月10日即由阚朝玺经手将该四民维持会解散，所有文件移交“地方维持会”。

10月11日，“地方维持会”推举委员丁鉴修为沈阳铁路“维持会”会长，盖即路局局长。

10月15日，官银号、边业银行皆开业，日方各派顾问咨议数人。

铁岭、抚顺、辽阳各县相继宣布“独立自治”，均有日本顾问咨议参加，阴主县政。

“地方维持会”商得日方同意，委原法库县公安局局长赵梦周为新民、康平、昌

图、彰武四县“清乡局”局长，集合各县警队3000余人并陆军散兵800余人，竟达4600余人，实力不可谓不厚，其后赵不仅不能维持治安，而辗转被张学良军队拿获，以附日枪决，盖所部皆乌合，为虎作伥，亦不得人民拥护也。

10月16日，“地方维持会”徇日方要求，促令简任各机关一律开始办公，至是“地方维持会”于金融治安外涉及行政，扩大权限矣。

有人夺原大帅府东北隅日岗兵枪，击死日兵一人，附近均被搜查，袁金铠适赴“维持会”亦被检查。

“地方维持会”派翁恩裕（字卿，前奉天硝磺局局长）为财政厅厅长，赵欣伯（原法学研究会长）为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并接收沈阳市政，高毓衡（字钧阁，原官银号总稽核、前财政厅征榷科科长）为实业厅厅长，旋均就职。

财政厅与日本军方商订办法数条，主要者关于财务须尊重日本顾问咨议意见，组织仍旧但略缩小，税则另设税则委员会商议改定，财政厅各科长、商会代表均为税则委员会委员。

10月，“地方维持会”正副委员长袁金铠、阚朝玺访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此为事变以来第一次之访晤，过去则均系由日本顾问等居间传达也。袁、阚要求：（1）各县纷纷独立，务请一律取消其独立，并不得截留税款。（2）各机关日本顾问咨议太多，请减派。（3）编清乡队以便肃请匪患。本庄答谓所请均可有磋商，日本顾问咨议有不当者可告知金井顾问（“维持会”之日本顾问），并希望“维持会”行使省政府职权，并谓可移省政府办公。袁、阚答以权限非不可扩大，但不迁入省府办公，现在只作此过渡，以前、以后均不敢过问云云。然日酋所言原系命令性质，袁等尚有意见，何其不解事也。

11月初，亲日巨子于冲汉经日本军部邀请，由辽阳原籍来沈，下车即晤本庄繁。

11月5日，日本军部复约晤袁金铠，袁归后即向“维持会”各委员宣布即日代行省政府职权，宣告“独立”并携有布告原稿，一时会内颇为紧张，均主张开会解决。

11月6日，“维持会”开会讨论，布告有所修正。

11月7日，袁金铠复访日军部，布告仍照前日原稿付印，其要点：对交涉不管既往、不问将来，过渡时期与国民政府及张学良断绝关系，代行省政府职权，维持会进入省政府办公。

11月8日，“维持会”布告正式张贴，所列委员长委员姓名如次：

委员长袁金铠　副委员长于冲汉　副委员长阚朝玺　委员金梁　委员翁恩裕　委员高毓衡　委员张成箕　委员丁鉴修。

上列姓名较之9月24日成立时所列计删去佟兆元、李友兰、孙祖昌三人，添人新任财政厅长翁恩裕、新任实业厅长高毓衡，盖已改组矣。

11月9日，“地方维持会”进人原辽宁省政府办公，10日开成立会，中日人员到者颇多，于冲汉为“自治指导部”部长，部员多为日本人，权在“地方维持会”上。至是“地方维持会”已成为“自治指导部”下伪自治政权矣。

各机关经费已定，薪给均从优，首领薪俸尤高，系出日方主张，以资鼓励。

前奉天政务厅厅长阎定保，沈变前原任辽宁烟酒事务局局长，其日记载云，沈变后

数至袁宅（袁金铠宅），告以此次与辛亥戊辰不同（辛亥武昌起义清帝退位，奉天成立保安会，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以为过渡。戊辰张作霖遇难后成立保安会推张学良为委员长以为过渡），万勿将“维持会”放大并嘱其家人劝之勿近而易入。7日早事态益紧，密诣袁宅，谓已出浴，是时附近已有警探，颇少行人。急至连奉澡堂因婉言：公为修史人物（袁曾参与清史稿印行事宜，盖馆长赵尔巽因史稿略集，无款印行，因畀袁以名义，似系任校阅及发刊事宜，利用其向东北军阀张作霖、吴俊陞辈筹款，非修史也，世谓其曾任清史馆馆长者尤误，任清史馆长者始终只赵尔巽一人，赵逝则总纂柯劭忞代此，世之所共知，关定保非不知此，殆亦当面恭维耳），兹事体大万不可行。袁曰三千万人浩劫独不救乎，你诚杨子主义。余曰救不了徒自陷耳。继至垂涕，而道仍不入，遂声色俱厉曰公细思宋明之末文（天祥）史（可法）诸人若何？袁另有所见，谓谈不到此。掉臂而去入浴室矣。“维持会”曾宣言既非组织政府与非独立自治，乃急转直下。袁意坚决，似有成算在胸云。关定保旋亦避地赴北平烟酒事务局则经维持会之核定，归并财政厅办理。

11月15日，沈阳南满站举行市民游行大会，集约八九千人庆祝“政权有归”，并张贴反对日本撤兵、反对国际联盟决议及要求日本增兵各项标语，由日方军警保护经过中国街干路至日站忠魂碑而散。

地方维持会对各级机关公文均用公函，然主持准驳语气固若上司也。

袁金铠为首之“地方维持会”既一味阿附事：顺从宜邀日方之欣赏矣，乃日方尤以为未足，欲起一更为听命者组织，一更为具体之伪政权，以供指使。早已属意于原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臧自沈变后又被日方拘留软禁，威胁利诱终为所动，遂于是年12月13日晚10时解除监视，一面商会等地方团体即进行请愿解散“维持会”成立“新政权”。15日午后4时臧式毅出任“新辽宁省政府”主席，于是伪政权正式成立，袁金铠为首之“地方维持会”旋全体解散，盖皆出日人导演也。

臧式毅就任后首以赵鹏第（原辽宁省政府秘书长）为财政厅长，原教育厅长金毓黻亦复职，后金亦弃职入关。

其后臧式毅复改称奉天省长，并将全省现任县长重加任命乃称县长（从前奉天省长时代系称县知事）。

闻日方之所以用臧者：（1）臧式毅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久任高级军职，历为张作霖父子之参谋长、总参议，认为可以招致军队拉拢军人；（2）是时对于成立“满洲国”已有酝酿，臧本满族正属相宜；（3）臧式毅原任辽宁省政府主席，日方认为更有号召能力。有此种种，遂舍袁而用臧矣。

（1965年4月）

“四巨头会议”与迎请溥仪就职

任 广 福

一、“四巨头会议”

所谓“四巨头会议”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中佐板垣征四郎所布置的会议，是板垣征四郎同当时的所谓四大巨头张景惠（原驻哈尔滨的东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熙洽（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臧式毅（原辽宁省省长）和马占山（原黑龙江省的黑河镇守使）等所举行的会议。

在1932年2月中旬之初，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中佐板垣征四郎①赴吉林、黑龙江等地“旅行”之前，曾对伪奉天省长臧式毅示以拟在沈阳举行“四巨头会议”的意图。数日后，臧式毅忽然接到板垣征四郎由哈尔滨拍来的电报，叫他给熙洽、马占山等准备宿舍，以便举行会议。他们及其随行人员，遂即齐集在奉天省的沈阳，开始了“四巨头会议”。

坂垣征四郎所布置的这个“四巨头会议”共举行了三次，每次是在晚间以闲谈的形式进行的。所有的议题，都是板垣征四郎预先拟定、临时宣布，经由闲谈后，再由板垣征四郎做出最后的决议。

第一次会议

第一次的“四大巨头会议”是在沈阳的伪奉天省长公署举行，出席会议者有板垣征四郎和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及马占山，当时的伪奉天市长赵欣伯也列席参加。

板垣征四郎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议题是：东北人民脱离中国的中央政权，施行自治。

这个议题，首先得到了张景惠和熙洽的赞同，及臧式毅、马占山等的附合后，便在板垣征四郎的主持下，以“近些年来，中央及张氏政权殃民，现为出人民于水火，并修好邻邦，而施行自治”的大意，草拟通电，该电文中的领衔者为张景惠。

第二次会议

这次“四巨头会议”的地点是在沈阳张景惠的公馆行之，参与会议的人员，与第一次会议的出席者同，当时板垣征四郎提出的议题为：“国家”的国体问题。

在这个议题上，曾发生了意见的分歧，展开了一场争论。即是熙洽是以不忘故君溥

---

① 此时板垣为关东军高级参谋，其权限仅次于参谋长，军阶为大佐。

仪为念的，并曾在这个会议之前，函请溥仪来东北主持大计，因此，他主张实行君主制。张景惠恃其在东北军政界中的资格最深，怀着元首欲的奢望，遂反对君主制。马占山因为在江桥抗战失败后的投降，曾受到张景惠的居中周旋，而支持张景惠的意见。

臧式毅是在熙洽到达沈阳的晚间，曾由他谈到了这个问题并请他支持。臧式毅曾表示不同意的意见，现在熙洽主张的君主制，现已遭到了张景惠和马占山的反对，而认为自己不便再表示反对的态度，故只采取了不作重要发言的态度。

熙洽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支持，但仍力行争论，就造成了一个争论的局面，最后则在板垣征四郎的反对下而结束。

第三次会议

这次的"四巨头会议"是最后的一次会议，其举行地点是在伪奉天市长赵欣伯的公署，出席会议的人员与出席第一次会议的相同。板垣征四郎在当时提出了"国家"和"元首"的"名称"、"年号"、"国旗"及"国都"地点等议题。经过商谈取得了如下的决议：

"国名"："满洲国"；"元首"："执政"；"年号"："大同"；"国旗"："黄、红、蓝、白、黑五色旗"；"国都"：长春。

其后，在板垣征四郎的主持下，关于上述决议的细节具体事项，由"四巨头"指派随行人员去商定而闭会。

这样就结束了这个"四巨头会议"。

次日的晚间，板垣征四郎同张景惠及大汉奸们，在奉天的日本大和旅馆举行了宴会（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出席了该宴会，并照了一张照片"之说，这虽是可能的，但是我给臧式毅代笔交待有关这段的历史时，他没有向我谈到这一点，故未写入）。宴会间，板垣征四郎忽然对张景惠说：现在东北"四民"（指士、工、农、商各界人士而言）都希望溥仪就任执政，溥仪已经住在了汤岗子的温泉旅馆，汝可前往迎请。张景惠遂即去汤岗子。

二、"迎请"溥仪就任伪执政

关于对溥仪的"迎请"就职，计分别作了三次，都是在板垣征四郎的示意下去"迎请"的。溥仪在旅顺初次被"派居"在汤岗子的温泉旅馆时，受到了以张景惠为代表的"迎请"，这虽然符合着溥仪来东北的意图，但在日本方面的示意下，使他采取了拒绝的态度，是即所谓第一次"迎请"。

以张景惠为代表的"迎请"遭受拒绝，回到沈阳后，板垣征四郎即命他所预先纠集的所谓"四民代表"如张燕卿（原吉林省公署的秘书）、林鹤皋（曾当过吉林省议会的议长）、赵仲仁（曾当过黑龙江省的黑河道尹）和在奉天日本站开设旅馆的祖显廷等，假借东北"四民"的名义赴旅顺"迎请"溥仪就职（此时溥仪已回旅顺住所），而又受到了与第一次"迎请"相同的拒绝，是即所谓第二次"迎请"。

第三次"迎请"是所谓"四民代表"向板垣征四郎报告了被拒情形后，板垣征四

郎又命张景惠等赴汤岗子的温泉旅馆（此时溥仪又由旅顺到了汤岗子）做再度的“迎请”。当即得到了允诺，爱新觉罗·溥仪遂于第二天在张景惠等的陪同下，乘车到了长春，于1932年3月1日宣布就“执政”职，傀儡的满洲国建立了。

板垣征四郎以这次“四巨头会议”费用的名义交给了张景惠30万元。张景惠分给了臧式毅7万元，熙洽和马占山各5万元，他自己得到了13万元。

（1962年）

日伪“国旗”怪态

宋淇涵

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诞生，“国都”、“国号”、“国旗”、“国歌”等同时宣布。“国旗”黄色占全面四分之三，左上角的四分之一横列红蓝白黑均等的四条，是由原来的中国五色旗演绎出来的。伪满“国旗”上的黄色代表满族，意味着“满洲”为清朝发祥之地，清逊帝统治其祖先旧疆内各民族，标榜所谓“王道乐土”，显示“天与人归”名正言顺，用以麻醉当地居民和掩蔽世界耳目，竟称日本辅助“满洲”建国，非侵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日本大陆政策积极派推行者田中义一首相的建议书七条之一妄称：“中国领土以十八省为限……”（见细野繁盛所著《满蒙管理论》）。伪满建立，就是此种邪说的产物。

日本人强调黄色象征满族，硬使伪满洲国合法化。以黄代“满”，在当初制定五色国旗时中国伟人（孙中山先生曾对黄色代表满族表示异议）即对此持有异见。日本人又怕民众认识不清，向往清朝，不服征服者的指挥，赶紧声明“满洲”“建国”不是清朝的复辟。伪满“国歌”开宗明义：“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新天地显然不是后清，所以不恢复黄龙旗。也不遥承清太祖的基业而奠都沈阳；改长春为“新京”，“新京”是对东京而言，饱含着殖民主义的味道。英国地名有约克、泽西、吉兰等，而对当时的殖民地则加上新字“NEW”命名纽约、纽泽西、纽吉兰等。法国殖民地冠以新字的实例也不少。在伪满还有许多处不明加新字，而在形式上或蓄意上暗射日本性一部或全部，如将日本邮徽掺配汉语的“文”字，而制成伪满“邮徽”，此字在注音字母上又恰读如“邮”。伪满铁路标志全局似“王”字，表示“王道乐土”的铁路，以铁轨的横断面和中间的云形（称祥云）相结合，“祥云瑞日”，又归结到老根上。

惟“国旗”一项与自谓“日初出之邦”的太阳旗，形义全不相涉。置重点于黄色，用示满族正位居体，汉族无权过问。另一方面未尽脱五色旗的范畴，避免刺激当地居民兴亡国之叹。日本人从多边多角弄出这种伎俩，“国旗”仅其一。这个变相的五色旗与中国好像脐带未断，连日本要人也供认不讳。伪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曾警告部属说：“满洲民众有他们七分之六的叔伯妈在，对待他们不可过于迫切”。用此迷惑人心，为进攻关内的张本。此后三年果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背叛中央悬挂五色旗的出现，由此逐步走向“华北特殊化”，变为第二“满洲国”。

日本人费尽苦心，纸里包火，不久就丑态毕露。“新五族共和说”，与“国旗”含意相矛盾，是其显著的一个例子。日本学者伊泽道雄著《开拓铁道论》昌言：“五族协和为满洲国之本旨，亦即由大和民族之移殖，才达到五族协和之妙谛。”他主张加速筑路大量移民，他和其他的一些日本人认为代表黑色的藏族，在“满洲”或全无或绝少，

应由朝鲜人加入五族之内。日本人虽也参加，惟抱着征服者的优越感，发号施令，不肯“屈驾”与他族并列。在“满洲”的日本人，与其说参加，莫如干脆地说“指导”“民族协和”工作。日本人不失却其本国国籍，不具日“满”双层国籍，也非客卿洋员。“新五族协和”说出世，使“国旗”所能代表的“五族”陷于没法解答的混沌状态。沦陷期的本质就是个混沌体，自难以真理来衡量。这个混沌行为冲破长城线而浸入华北。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于1935年12月25日在通州成立①，悬挂五色旗，宣称五色旗是辛亥革命时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以示脱离国民党的统治为合理。未创国号与伪满有度数上的不同，而一切要政由特务机关长横山大佐来裁决，隔着山海关与伪都“新京”一鼻孔窜气。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依临时参议院的决定，阐扬五族共和的大义，建设民国。其后国民党虽秕政累累全国唾弃，但不能据此作为汉奸附逆叛国的挡箭牌。殷汝耕在中国本部高揭五色旗首先投敌，“华北特殊化”的悲剧从此开演，污辱五色旗过甚，真死有余辜。五色旗自身虽受到数次摧毁，都由内乱所引起，不似外患所加的灾难那样沉重。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于1939年9月1日成立，德穆楚克栋鲁普充伪首脑，李守信掌军权，其“国旗”蓝色占四分之三，左上角具有红黄白黑四个均等的横条，我往张家口旅行时亲眼看见，与伪满国旗的取义根本相同。日本人素以“满蒙”并称，这对孪生子可谓异曲同工。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由三个委员会组成，“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是对外的最高首领，初任是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类似一种三权鼎立、非驴非马的伪机构。它管辖河北、山东、山西及实力尚未充分达到的河南。“临时”二字含有过渡性，为日后的伪统一开辟道路。1938年2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入。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于1938年3月28日创立于南京，梁鸿志任伪行政院长。那时候侵略者高唱“建设东亚新秩序”，“维新政府”的名义应运而生。

“苏北行政特区”介于南北两京之间，管辖丰、沛等14县，初任“长官”郝鹏，继任郝鹏举。

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先后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自然不肯采用青天白日旗。两个伪组织都冠以中华民国字样，不改正朔，又不能创造新式的旗帜，所以全用旧有的五色旗以蒙蔽人心，“苏北行政特区”亦同。

帝国主义一贯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占领一个大区域，划分为若干小单位，名称不同，旗帜各异，使各个傀儡俯首贴耳，随手得用。在七零八碎的局面下，企图组成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结合体，便于进行压榨，这就要建立一个大型的木偶机构，汪精卫恰应其选。他于1939年从重庆逃出，翌年建立伪国民政府。他恬不知耻地以正统自居，恢复青天白日旗，对人炫耀，使民众重见“汉家威仪”，中国本部各沦陷区一律易帜，从此不再见五色旗。

---

①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于1935年11月25日。

沦陷期内，中国大地上的“国旗”弄得五花八门，丑态百出。其中特怪而大怪，令人闻之喷饭见之肉麻者，首推汪伪政府“国旗”上加条一事。他所引以自豪者，正表露他的奴颜婢膝。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加上黄色横条，上边印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黑字。这个制法是有它复杂来历的：（一）日军占领华北、华南许多地域，汪精卫当了汉奸。关于“国旗”问题，据说日本内部意见纷歧，兴亚院主张用青天白日旗，军人坚持用五色旗，势成僵局，乃采取一种调和办法：青天白日旗，具青（蓝）、白、红三色，加上黄条黑字，凑足红黄蓝白黑五色，藉此塞日本军人之口，得以解围。（二）汪精卫自任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虚位以待，替日本劝诱蒋介石投降，若不恢复青天白日旗，面子所拘，怕难以迁就。（三）日本人造成汪精卫作臣妾式的大一统的首领，好有资格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如“中、日、满”在南京发表的共同宣言，承认伪满洲国独立，提高伪满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掩护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四）更有一部分幼稚可笑、不值一谈的日本人信口狂吠，以大日管小日，以红日压白日（青白旗上的日型小而色白），虽使用民国旗帜，正叫日本占上风。

扣实以求，汪伪的中央政府，对内对外，均属于私生子中的薄能儿。“临时政府”的名义虽取消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而它的权力不减于从前，只把治安、实业、财政、内务、教育、工务和法部改称总署，总长改为督办，次长改为署长（原来未设外交部和交通部，只有外务局和交通局，一仍其旧）。各总署与南京各部遥遥对峙，官制规定简任官以上由伪中央任命，荐任以下专行之，人位内定后报请上去，仅走一个下令的形式。提到对外，更是龌龊。汪精卫自身负有卖国叛党的重罪，应处极刑，哪有资格代表国家缔约条约呢？日本人中的半通知识分子，兴高采烈地扬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时，双方在法国凡尔赛离宫签定条约，今满洲国在中国的首都得到母体的承认，其意义更郑重而深切。”抗战期中，迁都重庆尚未还都，那时候的南京处于陷落也不得谓之首都。加条的妖旌飘摇于大陆上空，六字（和平反共建国）含义又十分鲜明：“和平”是投降的饰词，既然投降必追随主子的步调以反共，俯仰敌人的孵翼下自然变成一个附属国。国旗加条加字，开千古未有的怪例。若平心放眼去细想，加与不加，无何惊奇，小丑卖乖，活生生的一台驴皮影就是了。

综合起来，以黄色为主的伪满旗，以蓝色为主的伪蒙旗，伪冀东政府、伪临时政府等的五色旗和汪伪加条的青白旗，或利用原物或变更形态，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全没离开五色，全依附日伪的命运，不同生而同死。

上面说明各旗的共同点，另一方面具有其不同点。伪满“国旗”比其他伪帜出生较早，历年较多而行程亦较远。1932 年 9 月 15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书承认“满洲国”独立，丁士源被派为首任“驻日大使”，揭扬伪旗于东京上空。1934 年苏联和伪满交换领事（附带声明：这不是承认“满洲国”），伪满政府命李垣（曾充京兆尹，字谦六）为驻赤塔领事，黄鸿墀为驻武市（海兰泡，俄文名卜拉勾威斯金斯克）领事。1936 年 11 月德日防共协定成立，此后二年，吕宜文被任为驻德“公使”，安祥云为驻汉堡“总领事”，罗振邦为驻意“公使”，伪满国旗随之到柏林、汉堡和罗马。1938 年 8 月伪满在北京设置通商代表部，生松净为代表，并开设天津、济南两“办事处”。

1938 年 9 月伪临时政府派周珏为驻“满”通商代表，把五色旗携至“新京”。

“中”、日、“满”共同宣言后，汪伪派廉隅为驻“满”大使，加条的青白旗首见于“新京”。同时伪满派吕荣寰为驻“华”大使至南京，原驻北京的通商代表部也挂驻“华”“大使馆”的牌子，由日系参事官主持对华北各事，天津、济南两办事处改升“领事馆”。

日本国旗在“满”境满天飞，自不待言。此外有德、意国旗，伪中国政府旗、伪蒙古政府旗、未建交国的苏联国旗（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驻绥芬河领事馆于1937年自动封闭）英美等国旗（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奄息起来）。伪满每逢大典，邀请各建交国的使领观礼，梵蒂冈的代表也参加。萨尔瓦多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虽对“满洲国”正式承认，以路远事少，未派使节。

以上是伪满“国旗”分布在外和外国旗在“满”的大概情形。

日本铁蹄所至，疯狂屠杀，兼施诡计。人民浴于血泊中，深恐罹万劫而不复。幸赖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正规军冲锋陷阵，游击队箝制多方。论持久战闻世，激发人民的信心和勇气，刚毅豪迈，以生死决胜负，卒能败挫强敌，还我河山。沦陷期中所产生的畸形怪状、邪气歪风，俱随降将的白旗以消灭。

（1965年）

伪满见闻琐记

韩 茂 森*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即1932年1月，我由大连市皮口日本警察署被调到伪满沈阳警察厅担任翻译兼秘书，现将能回忆起来的几个事件记述如下，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吉长护路军”的解散

溥仪为了要掌握一支武装力量，在他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之前，就把肃亲王的儿子金壁东派到长春，组织了一个“吉长（吉林—长春线）护路军”，让金壁东任司令，溥仪到长春就任“执政”后，金壁东又兼任了长春特别市长。金壁东的“吉长护路军”刚刚组成不久（当时只有几百人），就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反对。他们认为，“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有日本军队来维持，如果各条铁路都组织起护路军，日本军队还有什么用？这是表面理由。实际上是怕溥仪自己有了武装以后，不听他们的摆布，如果溥仪同他们闹翻了脸，这支部队会站到溥仪一边，因为它的司令是溥仪的亲族—金壁东（从下文肃亲王的女儿金壁辉的谈话中可以说明一点）。于是，金壁东的“吉长护路军”很快就被解散了。这是我所听到的日本人对溥仪不信任的第一个例证。①

“热河宣抚军”的解散

“热河宣抚军”是金壁辉所组织的。② 金壁辉是肃亲王善耆的小女儿，辛亥革命时，肃亲王逃亡到旅顺。张勋复辟之际，他又匆忙回到中国。在回国前夕，他把金壁辉寄养

---

* 作者曾任伪满沈阳厅翻译兼秘书。

① 关于“吉长护路军”，作者所述有误：一、“吉长护路军”从不是溥仪组织和掌握的。不过，溥仪一度确曾有权掌管过伪宫的“翊卫军”和“护卫军”。“翊卫军”是在伪帝宫之外站岗的卫队；“护军”则是在伪帝宫之内站岗的卫队。“翊卫军”约有一营兵力，是熙洽从吉林各伪军部队挑选拼凑而成。“护军”约300人，由溥仪招募组成。1937年关东军借“大同公园事件”，将溥仪出资供养的这支私人武装也给瓦解了。二、溥仪“执政”之前，金壁东正在吉林市，被熙洽任命伪吉长铁路吉敦铁路局长兼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溥仪就任“执政”后，1932年3月9日，金壁东被任为伪执政府的内务官，后被任为翊卫军司令官，数月后任伪新京市长，其弟宪原继任翊卫军司令官。

② 川岛芳子（金壁辉）1933年前后在朝阳一带组织的伪军称为“安国军”。

在日本“华族”川岛家，认川岛为养父，改名为川岛芳子，并取得了日本国籍。[①]

溥仪对金璧辉也是不信任的。因为她生活作风放浪无羁，同日本的一些军人、政客、大浪人都有来往。所以溥仪对她是“敬鬼神而远之”。而这位在日本报界著名的新闻人物，素有“男装丽人”头衔的川岛芳子，从来就喜欢穿军装，穿马靴，爱挎战刀。当她看到日军占领后的东北三省的混乱局面时，她就野心勃勃了。她终于在她的姘夫、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日军特务头子喜多中将[②]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叫“热河宣抚军”的队伍，她自任“中将司令”。她的班底多数是她哥哥金璧东的原“吉长护路军”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程宪章的，是我的同乡和小学同学，是金璧东从大连带到长春去的，在“吉长护路军”里当一名上尉副官。这个人长得很健壮，高高的身材，当时年龄是二十四、五岁。金璧辉把程弄到手之后，封为“少将旅长兼副官长”。金走到哪里就把程带到哪里，程实际上成了金璧辉的“随从丈夫”。

当时，金璧辉的“部队”驻扎在辽宁省西部彰武、锦西一带，架子摆得很大，声势闹得挺高，名义上旅、团、营、连等编制应有尽有，实际上金军官兵总共只有一千多人。她的作法是先委派好了旅、团、营、连长，然后设机关招兵买马。所以有的“单位”只有官没有兵；有的“单位”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有的“单位”只有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金璧辉带着她的“随从丈夫”程宪章和一帮护兵马弁，忙着到处转游，鼓动她的部下加紧招兵。1932年春，[③] 金璧辉、程宪章带着一群护卫，到奉山（奉天—山海关）线石山子站“视察”完了之后，她（他）们从石山子站乘火车准备经由沈阳去长春，她（他）们上车不久，火车到达新民车站时，上来一批日本兵，将她（他）们缴械逮捕了。当天晚上伪满的广播电台就播出了一条新闻消息：“‘热河宣抚军’赵×卿旅兵变，袭击了奉山线石山子火车站，包围了日本皇军守备队，并且解除了皇军的武装，‘热河宣抚军’总司令金璧辉和她的副官长程宪章以及随从人员十多人，于今天下午在火车上被缴械逮捕，已解送奉天处理。”

程宪章的家属住在大连，听到广播以后都很吃惊，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从广播里知道程宪章等人已经被押解到沈阳去了。所以程的父亲和他的妻子当夜就乘火车赶到沈阳去找我，要我代为探听消息并设法营救。当时我也不知道程宪章等人的下落，只好向我顶头上司、伪沈阳警察厅副厅长兼特务科长的日本人田中完三郎说明了情况，并要求他帮忙。田中很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下午，田中告诉我：“程宪章一伙被送往奉天守备队司令部了，守备队没有地方看管他们，所以把他们寄押在南市场警察分局，川岛芳子（即金璧辉）已经被长春要走了。”田中接着说：“我见到守备队长了。他说，程宪章他们不是直接参与者，不会有危险的，告诉他的家属放心好了。”在田中完三郎的奔走

① 善耆自1912年2月5日潜至旅顺后，一直居住在旅顺，没有去日本；川岛浪速出身于武士家庭，并非“华族”；将8岁的金璧辉收为养女是在旅顺，而非日本；金璧辉虽为川岛养女，却从未取得日本国籍，所以抗战后以“汉奸”处死，是有法律依据的。

② 1933年伪军最高顾问是日本陆军大佐多田骏，此人在当时确实与川岛芳子关系密切，后升为陆军中将。而非喜多。

③ 时间有误，1932年春，辽西由在中国东北军控制，金璧辉等无法立足，时间应是1933年上半年。

下，约有一个月的时间，程宪章等人被释放了。

程宪章被释放后，我问他“怎样?”他说：“就只在送到日本警备队的当天，问了一次话，晚上就把我们送到南市场分局，再就一次也没问。”我问他“害怕了吧?”他说：“害怕是真的，因为不知道他们（指关东军）要采取什么手段，其实，也是早就害怕了。”我问：“为什么?”程说：“早在半个月以前，金司令（金壁辉）就对我说过：‘咱们这个官儿恐怕干不长了，关东军认为咱们的势派太大，吃醋了，要解散咱们。可是我去找喜多，喜多对我说，你不要听那些风言风语的，有我哪！他们（关东军）本来要限制‘执政’（溥仪）自己的武装力量，因为你是‘执政’的亲属，怕你把队伍扩大以后，倒向‘执政’一边。其实我（喜多）最知道你，我可以向他们（关东军）担保，你放心好了。’尽管喜多向金司令这样担保，可是我（程宪章）总是不放心，唯恐他们找碴儿。”程宪章又说：“我听了这番话以后，几次劝金司令别干了，不受这份洋罪。可是金壁辉总说：‘唉！创业难呀！好不容易铺开这么个摊子，看看再说吧！’看看再说吧！这才几天，人家下手啦！唉！真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没把这条命搭上还算便宜!”

从此，喧闹一时的“热河宣抚军”烟消云散了，轰动一时的女司令金壁辉，脱去军装马靴，摘下腰刀，在日军大特务头子喜多①扶持下，又当上了日本侵略军的女特务头子。

一箭双雕的侵华毒计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下，东北军撤到关内来了。但是遗留下的散兵游勇和原有的小股土匪，拿起当地地主隐藏起来的枪支弹药，出来兴风作浪，扰乱地方治安，严重地威胁着日军的安全，闹得他们晕头转向，看不见，摸不着，想打打不了，想抓抓不到。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收缴枪支。通过发命令，贴布告，督促地方政权收枪收子弹，大大闹了一阵子。结果是收效甚微，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所谓的土匪仍然在不断地威胁着日军的安全。接着，他们又设计第二个方案，就是组织军队，招兵买枪，然后送到关内。1932 年夏初②，奉天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召集流落在东北的、待报效忠日本的原山东军阀方永昌、程国瑞、王×哲、刘佩忱以及大土匪头子刘桂棠③等人开会，把他们一个个都封为军司令，并向他们面授机宜：1. 招兵的目的，是为了肃清地方的匪患；2. 招募的对象是散兵游勇和土匪；3. 没有枪支的不收，枪多的封官儿；4. 每支枪根据新旧和好坏程度，发给枪价现大洋 50～100 元；5. 招募齐了以后，可以开进关内自行选择适宜地方驻扎。关内的日本皇军支持你们，目前的经费由关东军供给。

---

① 以上所提的“热河宣抚军”应为安国军；“喜多”均应为多田骏。

② 应为 1933 年夏初。

③ 本名刘桂堂，诨号刘黑七，1932 年 6 月率土匪部队万余人驻热河省林东、林西县，1933 年 2 月 20 日降日，被封为第三路军总指挥，6 月又投宋哲元。

这样一来，把整个沈阳市闹得更加乌烟瘴气了。仅仅两三天时间，沈阳市内就出现了什么“华北挺进军司令部”、“忠义救国军司令部”、“××救国军司令部”等等许多“军事机关”。这些“机关”都没有像样的房子，大都在一些中小型饭店、旅馆的门口贴上纸糊的牌子，一看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同时，无论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见到穿着新军装、新马靴和佩带新军刀的“军人新贵”。各个县、市、镇，也到处都有招兵的“办公处”和“兵站”，大大小小的“军官”像雨后的蘑菇在短短的几天里突然出现了，当时人们把这叫做“下官雨”。

在这场喧闹一时的招兵竞赛中，刘佩忱捷足先登，他纠集了千把人，在日本关东军的指使下，开进了冀东地区滦县的稻地。不久，又开到津浦线的马厂。刘部在马厂还没有站稳脚，就被东北军的于学忠缴械了，刘佩忱下落不明。

正在做着黄粱美梦、忙着招兵买马的方永昌、程国瑞、王×哲等人，听到刘佩忱的消息后，犹如冷水浇头，立即停止了招兵。关东军见此法不灵，也停止发给他们“经费”，因而这伙“司令”们也鸟兽散了。关东军精心策划的“一箭双雕”的阴谋毒计彻底破产了。可是，大土匪头子刘桂棠却不甘心罢手，他趁方永昌、程国瑞、王×哲等部散伙的机会，大大捞了一把，他把其中的许多惯匪拉了过去，利用这些人手中的枪支，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打进关内来，流窜了几个省，给华北一带的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

三位一体——日本、军阀和土匪

我过去只认为中国的军阀、政客同日本的军阀、政客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张宗昌、田中玉、阎锡山、方永昌，还有清末的肃亲王等人，失势以后都住在大连，日本人还保护他们。在我被调到沈阳以后，我才知道土匪同日本军阀、政客也有关系。

就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一箭双雕”的毒招，程国瑞、方永昌、刘桂棠、王×哲、刘佩忱等人积极活动，招兵收枪的时候，住在沈阳的原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儿子张济乐，被大土匪头子刘桂棠请去当了他的“少将副司令”，这件事当时我不知道。

我和张济乐在大连时就认识，但不知他已移居沈阳。1933 年 4 月、5 月的一天晚上，张济乐突然来到我家，对我说：“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打来长途电话，让我明天到长春去见他，还要我带一位可靠的翻译，我来求你给我帮帮忙，辛苦一趟。”我说：“关东军的翻译多得很，何必自己带翻译呢？”他说：“小矶和我父亲是结拜弟兄，我叫他叔叔，明天我不是到关东军司令部去，而是要到小矶的家里去，可能要谈我们的家务事，大概因为用司令部的翻译不合适吧！”我答应下来之后，第二天（星期日）上午同张济乐乘火车去长春，中午到小矶国昭的家。小矶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小矶首先向张询问了我这个翻译的来历和同他的关系，接着问他母亲的身体情况和他大妹妹的婚姻问题，还问了他小妹妹的学习情况。随后招待张济乐和我在他家里吃午饭。在吃饭当中，小矶问张济乐：“听说你在刘桂棠那里当了少将副司令，是真的吗？”张济乐回答说：“是的。”小矶立即把脸一沉，用讽刺的口气说：“二十刚出头就当上了将军，真了不起！中国有句老话：‘老子英雄儿好汉’，真是一点儿不假！”张济乐低头不言语了。小矶又说：“在我们日本，要想当上将军，起码得是陆军大学生毕业，并且得从中、下级

军官一步一步升起来，都得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你只是一个普通中学毕业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更没有作战经验，你怎样去指挥军队呢？起码的军事常识你都不懂，恐怕连说话都没有人听，你说对吗？”张济乐又是一个“是”。小矶问张：“刘桂棠为什么要请你去当他的副司令，你知道吗？”张说：“这个我知道，刘桂棠以为我是小孩子，又没有带兵的经验，可以随他摆布。当时我曾向他表示：‘我年轻，又没有经验，干不了’他说：‘没有关系，就凭你是张督办大少爷这个头衔，就没有人敢不听你的。谁敢不听你的。我也不答应’。”小矶说：“对，刘桂棠自己说出了一小部分，他请你当他的副司令，不是把你看作‘将才’，而是利用你是‘张宗昌、张督办的大少爷’这块金字招牌去招兵买马。刘桂棠知道你父亲同日本的关系，也清楚你父亲和我的交情。一句话，他就是要拿你做他的铺路石，以便达到他的野心。你是知道，刘桂棠是个最危险的人物。你和他在一起，弄不好，你会受害的！”。小矶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把底细交给你，不过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就行了，绝对不许对别人说，一定要记住”。小矶接着说：“关东军用他，是利用他的土匪头目的头衔去招降土匪。他很清楚我们不太相信他，所以他把你拉出来，给你一个副司令，就是要利用你替他办事。”小矶又说：“我和你父亲是最要好的弟兄，我不能眼看你掉进泥坑不管，今天找你来，主要就是为了这件事。”小矶说：“我的意见是：你马上离开刘桂棠，马上离开奉天，到日本上学去。你不是愿意当军人吗？你到日本后，先学日语，然后上陆军士官学校，到达日本以后的事都由我来安排，一切你都不用管，有我的亲戚朋友管，你放心好了。你回家之后，只对你母亲说清楚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更不要让刘桂棠知道，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如果被他知道了，恐怕要出麻烦，那时后悔就晚了。你回去就在家里等着，三两天内，我选派好了人，让他拿我的亲笔信去找你，由他陪送你到日本，那里有我的亲戚朋友接你。”就这样，张济乐被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去了。后来听说，张济乐在七七事变后由日本回来，投入汉奸齐燮元的怀抱，在伪治安军里当了一名校级军官。

“宪派”和“警派”的勾心斗角

伪满洲国的“官制”，明文规定分为两个系别，即“日系”（日本人）和“满系”（中国人）。而沈阳警察部门中的“日系”，又分成两派：一派是来自日本警察界的，我们称它为“警系”；一派是来自日本宪兵或部队的，我们叫它“宪派”。这两个派系的矛盾斗争，颇为激烈。在奉天（辽宁）掌握全省警政大权的省警务厅长是日本宪兵大佐出身的三谷清，而第二把手的警务厅警务科长小坂则是日本警察界的老手，属于地方执行机关的沈阳警察厅厅长是中国人齐恩铭，而实权人物的副厅长兼特务科长是日本警察出身的田中完三郎。省警务厅和市警察厅的其他各科处，都配备有“警派”和“宪派”的处长和科、股长等掌权人物。当时，伪满政府还没有公布各种法令和规章制度，因而在处理日常事务中，“宪派”依据日本宪兵的一套作法办事，“警派”则依据日本警察的一套办法办事，两派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和顶牛现象。“警派”说“宪派”不懂事务，硬充内行；“宪派”则说“警派”独断专行，同过去一样排挤宪兵（据宪兵方面的人说，九一八事变前，在日本的地方事务中，根本不许宪兵插手，宪兵只能管理军纪一

类的事情，地方事务全由警察包了)。因此，两派争权夺势斗争的浪潮总是接连不断。我是被这个浪潮所卷进去的一个。

1933年春季，伪满沈阳警察厅司法科的搜查股伙同侦缉队，通过叛徒逮捕了中共奉天省地下省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和党员、工人约40人。奉天日本宪兵队闻讯后，立即派人到伪警察厅，要求把这批人“引渡”给宪兵队。伪警察厅副厅长田中完三郎拒绝说：“不行！这是我们警察厅办的案件，要由我们来处理，不能移交给你们。”宪兵队的来人被碰回去了。田中又对我说：“过几天，等司法科的审讯告一段落后，把这个案件全部移到特务科来，你和张股长（特务股长张廷一）负责审理，把案卷整理好送交法院，决不交给宪兵队。”过了一个多月，这个案件由司法科移到特务科来了。田中阅过全部案卷后，对我和张廷一说：“我们历来主张‘证据裁判’，没有证据或此证据不充足的，就要考虑放人。共产党是一个政治派别，只要它不组织暴动，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就不能算作犯罪。政治信仰是思想问题，那不是犯罪。宪兵队想把政治信仰不同的人都杀掉，那怎么行？我们办事必须讲公理，决不能随便杀人。”我和张廷一研究，又另外安排了两个人，对这案件进行复查。又经过约两个月的时间，复查告一段落，整理好书面材料，按照田中的意图，先后释放了30多人，只剩下所谓有证据的6位主要负责人，送交奉天伪高等法院检察厅了，在送案之前，田中完三郎亲自走访了伪高等法院的日本人顾问、伪院长和伪检查厅长，向他们一再交代：审判权在法院，不要将案件转给日本宪兵队，审判也不要受宪兵队的干扰。后来，这6人被伪高等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或五、六年。

在这场派系斗争中，“宪派”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接着又策划了一个新的阴谋，妄图从参与审讯的中国人（主要是我和张廷一）身上，打开缺口，以便搞垮“警派”。1933年9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我和张廷一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第三天，沈阳《盛京时报》、《大同日报》第一版上，以大字标题刊登一条新闻：“卖放共产党义勇军，受贿120万元—张廷一、韩茂森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对此，“警派”人物立即指出：“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针对我们而来的。”于是，田中等人向上述两家报馆追究这条新闻的来源。经证实是出自宪兵。省警务厅的警务科长小坂到日本宪兵队去提讯我和张廷一，问我们是否有报上所登的事实，又问是否受了刑，说了些什么。我俩回答：绝对没有那种事实。没有受刑，也没向宪兵队说什么。小坂对我俩说：“你俩放心好了。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公正的解决。耐心等几天吧！”小坂回去，会同田中一面给伪满中央的民政部警务司长拍电报，报告事实经过；一面又去奉天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找土肥原贤二，向他说明情况后提出：“满洲国是日本首先承认的‘独立国家’，它的司法行政和裁判权，也应该得到日本的尊重。满洲好官吏，即或有了犯罪行为，除违犯日本军法以外，都应由满洲国政府司法机关来处理。日本宪兵队应将韩、张二人和有关材料，立即交警察厅处理。”土肥原照办了。过了两天，日本宪兵队就把我和张廷一送回沈阳伪警察厅。又等了将近两个月，日本宪兵队也无法拿出所谓的材料，这个所谓“卖放”、“受贿”案件，至此也就不了了之。半年后，我被调到热河。关于“宪派”、“警派”的情况，后来听说，田中和小坂等主要“警派”人物，先后都被排挤出去，“宪派”占了上风。

靠姨太太起家的“省长”

1934年，我由热河省平泉县调到承德，担任伪省府警务厅特务科的翻译兼伪厅长办公室的秘书。1934年春夏之交，[①] 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到热河省“视察”，我临时被派充“总理”的侍卫班长，因而得以接近张景惠。在张景惠“视察”的第二天中午，伪热河省长刘梦庚，在他的“公馆”里请张景惠吃午饭，因没有外人，所以我也被邀作陪了。三杯入肚以后，张景惠打开了“话匣子”，笑着对刘梦庚说：“老弟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这回该心满意足了吧?”刘说：“兄弟我能够有今天，完全是五哥您的大力栽培。兄弟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张景惠说：“你应该好好地感谢你那位‘好夫人’，她替你出了多少力呀!”张、刘二人对话，我因是局外人，摸不着头脑，所以只好坐着旁听。张景惠见我不说话，就转向我说：“孙老弟可能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法插言。”张接着说：“人生如梦！有时做好梦，有时做坏梦。有时官运亨通，有时寸步难行。我们这帮老朋友个个都是这样，可以说是三起三落了。拿你们刘省长来说，他虽然满腹经纶，可是就是不得志。为了生活，他在一家药铺里当了‘坐堂先生’，给人家看病。后来他在班子里结识了一位姑娘，两人很投缘，跟他从良当了姨太太。从那以后，他就时来运转，青云直上了。这位姨太太在班子里的时候有一位结拜干姐姐，她后来当了曹锟大总统的姨太太，他（刘梦庚）的这位姨太太为他奔走，他在曹大总统那里当了官。不久就被提升为京兆尹，接着又做了一任选币局长，曹锟下台后，他才在北京赋闲起来，我想请他出来，可是他的条件很苛，就要热河省长，别的不干。理由是热河出产好大烟土，他要好好过过大烟瘾。当时，热河省长是张海鹏，一时没有办法。后来张海鹏被调到新京（长春）当了皇帝的侍从武官长，热河省长出了缺，我想给他（刘梦庚）正合适，可是我一摸底，这个省长早就有好几个人惦记着了，都是日本人的门子，还都够硬的。我没有办法了，只好给他去信，叫他在天津北京一带自己托人活动。这次又是他的那位姨太太替他奔忙，由曹锟找到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才把这件事办成了。”他最后说：“我们可不要看不起女人，女人也能办大事啊！这位女人就是他命中的‘贵人’。”

汉奸内部的争夺

1938年8月，我的顶头上司、原伪满热河省警务厅长山田一隆奉华北日军特务头子喜多之命，由热河调到华北，充当北平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保定出张所（分支机构）所长。计划提拔汉奸黄锡龄（山东军阀张宗昌旧部、原承德警察厅长）在保定筹建伪河北省政府。当时，黄锡龄名义上是保定警察局长兼伪河北省政府筹备处长。山田隆一又把我从承德叫到保定，派充伪保定警察局特务科长兼伪河北省政府筹备处秘书。由于伪保定警察局建立伊始，正在忙乱之中，所以伪省政府的筹备工作，尚无暇顾及。就在

① 时间有误，应为1935年，因为张景惠就任伪总理大臣是1935年5月21日。

这个当口，1938 年 5 月，汉奸高凌霨通过汉奸头子王克敏和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渠道，以保定治安情况不好为由，在天津另行筹设了伪河北省政府，他自己当了伪河北省第一个省长，保定改为清苑县，黄锡龄被委为伪清苑县长。伪保定警察局改为伪清苑县警察局，原保定警察局的各科长一律降为伪清苑县警察局的股长。当然，日军的特务机关出张所也失去存在的价值。于是，山田一隆去北平找喜多，喜多表示是最高司令官的意图，他也没有办法。就这样，这一伙争权夺势的失利者，忙乱了两个月之后就散伙了。黄锡龄到南方当了伪武汉市长，山田一隆去济南当了伪山东省会警察局的顾问。我也跟山田去充当秘书和特务科长。对于保定之行，山田一隆发牢骚说："我在热河干着好好的警务厅长，硬把我调来，让我帮助黄锡龄组织河北省政府，现在最高司令官一句话，我们都成了喜多的牺牲品了。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真倒霉！"

（沈滨整理，1982 年 11 月）

日本控制伪满的实况

王　贤　沣*

一、伪满最高决策机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公然对我国东北的广大土地，实行军事侵占。日本明目张胆地网罗一些民族败类，组织起伪满洲国殖民地政权，以清逊帝溥仪做伪皇帝，藉以麻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地镇压、屠杀、奴役、奴化和残暴的掠夺。

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机构是伪国务院，伪国务院是制定、推行日本对东北实行殖民地政策的主要机关，负责整个伪满洲国的内政、外交事务，公布各种法令政策。

伪国务院的事务机构是伪总务厅，有伪总务长官一人，总务次长二人，其下设有七处、一室和三个局，在伪总务长官统辖下，由总务次长二人分担掌握着七处一室和三局，有地方处、法制处、统计处、企划处、人事处、弘报处、主计处、监察官室和兴安局、总务总局、恩赏局。领导着伪军事部、民生部、经济部、交通部、司法部、文教部、国民勤劳部、兴农部等九部，制定、命令、推行着各种残酷的殖民地政策法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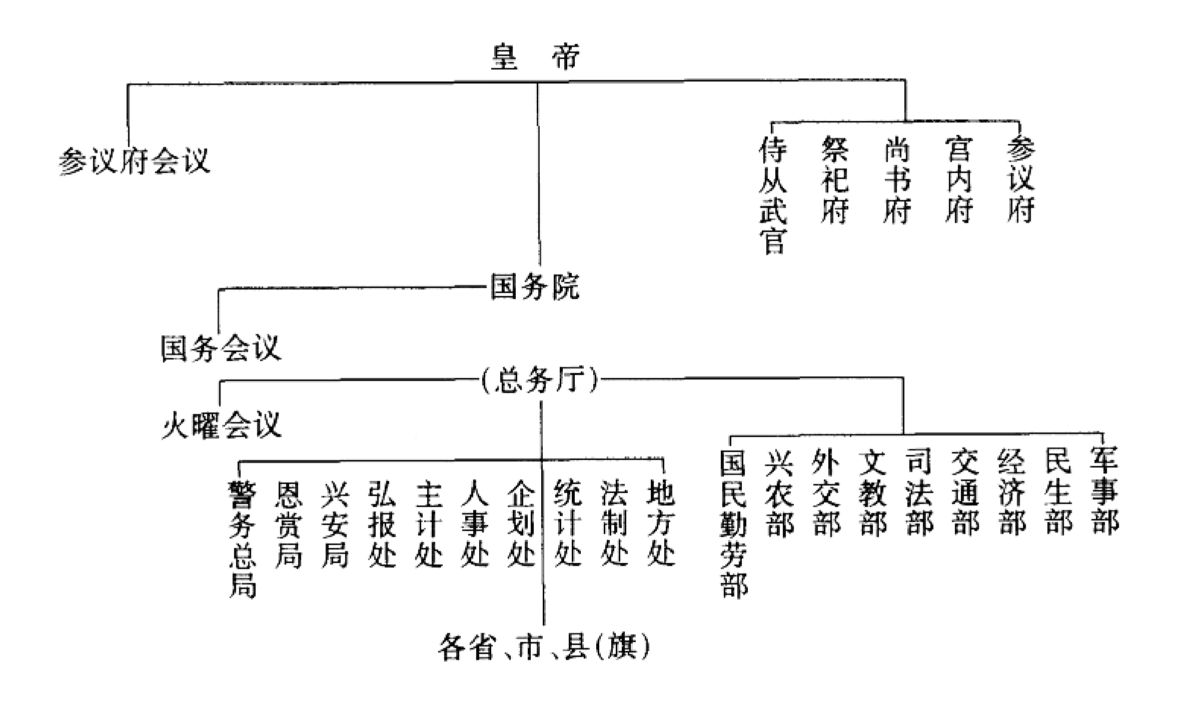
如全伪满的地方行政，由伪国务院总务厅地方处掌握；全伪满各种政策法令的制定等，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法制处掌握；全伪满人力、物力、财力等的统计，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掌握；全伪满的物资经济、动员等计划，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企划处掌握；全伪满官吏的升迁、调转、采用等，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掌握；全伪满的宣传、书报杂志出刊等，由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掌握；全伪满的预算、收支等，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主计处掌握；全伪满施政的监察等，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监察官室掌握；全伪满的警察行政等，由伪国务院总务厅警务总局掌握；全伪满官吏的奖赏、叙勋等，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恩赏局掌握；整个的内蒙地区的施政等，由伪国务院总务厅兴安局掌握。

由此可见，伪满洲国的一切施政，都是通过伪国务院总务厅制定、命令、推行的。可以说，伪国务院总务厅，是伪满洲国的一个最高决策机关，通过这个决策机关，制定出各种残酷的政策法令，再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火曜会议”、“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使这些政策法令合法化，由伪国务院公布，令各伪部、各伪省、市、县（旗）实施。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

伪满洲国组织机构概略表



从 1931 到 1933 年的期间，伪满洲国最高统率是“执政”。在“执政府”里，有府中令、参议府、侍从武官。其下有伪国务院、伪监察院、伪立法院，还有伪治安、文教、民政、财政、司法、交通、实业等八部，和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

从 1934 年以后，伪满洲国最高统率是“皇帝”，在皇宫里，有伪宫内府、伪尚书府、伪参议府、伪侍从武官。其下有伪国务院、伪监察院、伪立法院，还有八个部和十个省。就是把奉、吉、黑三省，划分为奉天、吉林、龙江、滨江、安东、锦州、四平、黑河、北安、三江等十省。

从 1937 年以后，伪监察院、伪立法院取消，伪外交和民政部取消，设伪外务局、伪内务局。增设通化、东安两个省。

从 1940 年以后，伪外务局、伪内务局取消，仍改为部，添设祭祀府。

从 1943 年以后，伪警察统辖机构，把伪警务司从伪军事部里拿出来，改为伪警务总局，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直接领导。

从 1945 年以后，扩大伪国务院总务厅企划处，改为伪企划局。

二、日本人的“集权制”和“中央集权制”

伪满洲国之所以谓“满洲国”，日本认为溥仪是“满洲人”，东北又是清朝发祥地的“满洲”，所以把清逊帝溥仪抬出来当伪皇帝，这个“国”即是“满洲人”的“国家”，故名为“满洲国”。这是麻痹人民，掩盖侵略实质的一个烟幕，实际是一个日本

对殖民地的统治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它用了“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的招牌幌子，欺骗东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以，对外美其名曰“东北人实行自治的独立国”，而日本人则是伸出“友谊”的“援助”之手，“帮助”东北人的建设开发。对内则是在“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的招牌幌子下，派出大批的日本官吏，参加到伪满洲国组织内，美其名曰“指导”，实际则是实行日本殖民主义的“集权制”，控制着整个伪满洲国的施政。

所谓日本“集权制”，就是在伪满洲国的组织机构中，特别是在人事的安排上，日本为了控制指挥灵活方便起见，在每一个伪组织机构中，都安排了日本伪官吏。但在为首的伪官吏中，尽可能地不用日本人。就是采取了以汉奸为首，以日本人为副的方法，外表当招牌的都是汉奸，不知内情的，以为伪满洲国确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但实际内容，恰恰相反，则是在日本人的控制和监视下，进行殖民统治。

例如，有汉奸伪皇帝，就有一个日本人的“御用挂”控制着伪皇帝；有汉奸伪国务总理大臣，就有一个日本人的伪总务长官控制着伪国务总理大臣；有汉奸伪部大臣，就有一个日本人的伪部次长控制着伪部大臣；有汉奸伪省长，就有一个日本人的伪省次长控制着伪省长；有汉奸伪市长，就有一个日本人的伪副市长控制着伪市长；有汉奸伪县长，就有一个日本人为伪副县长控制着伪县长；有汉奸伪局长，就有一个日本人的伪副局长控制着伪局长；有汉奸伪科长，就有一个日本人的伪科副事务官控制着伪科长；有汉奸伪军司令官，就有一个日本高级顾问控制着伪军司令官；有汉奸旅、团、队长等，就都有一个日本教官，控制着伪旅长、团长、队长等。

所有这些日本人的“次长”，或“副长”、“顾问”、“教官”等，虽然明文没有规定，但事实上，他们有绝对地命令、指挥、推行、执行各种政策法令的权限，可以不通过汉奸“长”，秉承着上级、日本的指示、命令，办他们所要办的事。

虽然在伪满各部大臣和各伪省、市、县（旗）的长，以及各伪军司令官都是汉奸担任，但在伪机关内部，不是这样，是分职务的重要和不重要，来决定某一职务，由汉奸或日本人来担任。如伪部内，在“大臣”、“次长”以下设有各司，有的“司长”是汉奸，有的司长是日本人；在司以下设有各科，有的“科长”是汉奸，有的科长是日本人；在“司长”、“科长”之下，设有“副司长”或“副科长”的设置。不过在每个司里，有首席科的规定。如果某个司是汉奸司长的话，这一司的事务多是操在日本首席科长之手；如果某一个科是汉奸科长的话，这一科的事务多是操在科内日本事务官之手。例如，伪奉天市公署内，有行政、财务、经济、卫生、工务等五处，行政、财务处长是汉奸担任，经济、卫生、工务处长是日本人担任。日本人的处长能自己来领导一处的事务，汉奸处长不能自己领导一处的事务，则是由日本首席科长把持着。如行政处内有行政科、教育科，行政科是首席科，科长是日本人，他不仅自己领导一科的事务，还有权代理行政处长，办理一切事务。教育科长是汉奸，科内事务则是由日本视学官或日本事务室来领导。这样，在伪满洲国机关内的人事安排上，无形中形成一个由伪满洲国最高中央组织的日本人伪总务长官、到伪满洲国下层组织的日本人副县长，在他们中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贯串起来，由上到下，由下到上，互相联系着，执行他们的殖民地政策。

伪满洲国的伪官吏人数，到伪满垮台时期，共有十余万人。在这十余万人中，特任官有三十余人，其中日本人约有三分之一；简任官有三百余人，其中日本人约有三分之一；荐任官有三万余人，其中日本人约有三分之二；此外属官、临时雇员等，有六万余人，其中日本人约有五分之一。

在伪官吏中间，还规定了差别特遇。如伪满的荐任官，共分一、二、三等，俸给分八级，同等的伪官吏，日本人的官等俸给比汉奸的官等俸给高。日本官吏有官舍和国外津贴的待遇，汉奸没有。

在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关于伪官吏的任用、升迁、调转等，汉奸还有权，或参加意见；到了 1937 年以后，伪文官令制定实施，汉奸已没有权，也不能参加意见了；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怎样办，就怎样办。并且以是否会日本话为权衡人事的首要条件，日本留学生和会日本话的伪官吏人数增多，老的、不会日本话的伪官吏逐渐被淘汰。在汉奸伪官吏中，日本殖民统治者逐渐安排了所谓“青年中坚分子”做为将来的帮凶接班人。这些“青年中坚分子”都是日本殖民者认为可以信赖的帮手。从 1941 年以后，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长日本人星子敏雄曾经多次召集这些所谓的“青年中坚分子”伪官吏开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伪满洲国施政的意见，并从中权衡这些“青年中坚分子”是否忠实效忠于日本，以便决定其将来的汉奸地位。

在这种“集权制”的殖民组织中，又以“中央集权制”紧密地控制着伪满洲国的施政。如前所述，伪满洲国最高组织机构是伪国务院，伪国务院事务机构是伪总务厅，控制这一事务机构的是伪总务厅长官，辅佐伪总务厅长官的有两个伪总条厅次长，分担着伪总务厅七个处的事务，由七个处来制定全伪满的一切施政。在这种组织形式下，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治系统。就是伪总务厅长官高高在上，听取由下而上的报告，在殖民者的需要下，制定出各种殖民地政策法令，再由上而下地发号施令强迫执行。我们说，这样一个集权的统治系统，一定是一个暴力政权。在东北人民不甘心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况下，而日本一定要实现它的殖民统治，就必然要用暴力来推行。

如从 1935 年到 1939 年的期间，日本在伪满各地实行所谓“坚壁清野”的“集团部落”，也就是所说的“并村”，就是日军配合伪军进行打击东北人民的抗日义勇军时期。① 如果日军在“讨伐”中，认为某一地区需要“坚壁清野”，以便利它打击爱国力量的时候，日军即指定一个地区，命令伪县公署负责，强迫当地居民义务劳动，出工修建一个“集团部落”。所谓“集团部落”就是修上一圈土高墙，两个出人的大门，在高墙内划出街道，用土和草盖成小房，把几个村屯的居民，全部迁至“部落”内，出入必需有伪警开的“路条”，没有“路条”出入的人，即认为是“通匪”。日本侵略者用这种方法，以隔离当地居民和抗日义勇军的联络。因为农民的房屋土地都在原住地的近旁，不愿意离开远走搬到“集团部落”内居住，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即命令伪警强迫执行，有的农民在伪警的强迫下仍不走的，即命令伪警不管人和用品搬未搬出，就点火烧房子。这样，把农民闹得家败人亡，悲惨极矣。关于这种所谓“并村的集团部落”，在

---

① 此处抗日义勇军，作者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和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下同。

东北各地都曾实行，特别是在“东边道”、“佳木斯下江一带”，最为残酷。当时人们在这种残酷统治下，把“集团部落”叫做“人圈”，因为这种临时盖的房子又小又潮湿，不挡风不遮雨，和牲畜圈一样。

又如1940年，所谓的“三肇事件”，就是在肇东、肇州、肇源三县活动的抗日义勇军在徐泽民率领下进肇源县城，杀了伪县警务指导官日本侵略者多人，又退出县城。这个事情发生后，伪县报告给伪滨江省，伪滨江省警务厅长秋吉威郎又报告给伪中央。① 伪中央派伪司法部日本检察官，会同伪滨江省警务厅和日本宪兵队到现地，本着伪“治安维持法”在现地组织“临时法庭”，命令、指挥伪警，实行检举、逮捕并在现地处理，不经过任何正式的司法手续，屠杀了数百善良人民。直到最后，伪司法部大臣还不知道，伪国务院总理大臣更不知道，只有日本人的伪总务长官、日本人伪司法部次长知道的不仅清楚，而且是直接的指挥命令者。

在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的时候，伪满的警察人数有四万余人，伪满的军队，有二十余万人。在这个时期，日本殖民统治者主要是集中力量，打击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利用伪满军队在各地“围剿”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

在1936年以后，伪满的警察人数增加到六万余人，伪满的军队人数裁减了约有一半，剩下十万余人。在这个时期，日本侵略当局主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思想控制。因为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大部由于日伪军的残暴镇压而转移了，所以实行裁减伪满军人数，增加伪警察人数，用暴力推行各种残酷对待东北人民的政策法令。

从1940年到1945年伪满垮台止，伪满的警察人数增至十万余人，伪满的军队人数又裁减了约有一半，剩下五万余人。但为日本殖民者作奴隶的伪满军的工兵，由原有的万余人增加到五万余人。在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主要是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统治、经济统治，物力、财力等掠夺和统治。同时，日本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结成日、德、意反共的轴心国，扩大反共的侵略战争，日本在伪满增加了驻军，在伪满和苏联接近的边缘上代替伪满军队加强防卫，大修军事工程和道路，所以，伪满军队人数裁减，伪满军工兵增加。

在伪满时期，人们背地里称军、警、宪为三大祸害。因为“军队”、“警察”、“宪兵”横行霸道，以“反满抗日”、“思想不良”为帽子，乱扣一气，所以人们畏之如狼似虎，人们对“军”、“警”、“宪”都敬而远之，敢怒而不敢言。当时人们对伪满警察有这样一个说法：“家有警尉补”，“强似作知府”。这就是说，在伪满警察的官阶中，有警正、警佐、警尉、警尉补、警长、警士的区别，警尉补的阶级在伪警中是小官，别看官小，因为警尉补阶级多是事务把当者，是和老百姓直接办事发生关系的人，所以他有“发财致富”之道。又因为日本利用伪警暴力执行政策法令，所以对于这些残害人民的伪警有所袒护，有点过失也放任他，以便为它效力，伪警有这个仗势，更加强了对人民的诬赖、勒索金钱等及残害人民的行为。因此人民恨之入骨，在伪满时，有人称伪

---

① 经过多次“大讨伐”，日本殖民当局没料到在伪满洲国腹地，出现抗联十二支队于1940年9月11日夜袭肇东县丰乐镇，11月8日，在代支队长徐泽民及张瑞麟率领下又攻克肇源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

警为“警匪”，言其为害人民之甚也。

三、伪满汉奸“长”与日本次长的关系

从伪满洲国的日本人的集权制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伪满洲国这一殖民地政权的控制，是采取了它控制朝鲜殖民地政权的方式，到最后，消灭了汉奸“长”，日本将直接取而代之了。所以，日本在不信任汉奸，但为了它们的利益又不能不利用汉奸这一初期阶段，它普遍地安排了日本次长、副长、顾问、教官等的形式。就是以汉奸作招牌，麻痹东北人民和世界人民。

所以在伪满洲国的组织机构中，除了必须由伪皇帝亲笔“决裁”的公文书以外，在其余的各伪机关中，日本次长、副长、顾问、教官等有全权代理汉奸“长”，裁决一切公文书。特别是日本人所谓的“密件”或所谓的“极密”公文书，根本就不通过汉奸“长”，直接由日本人办理。

如1942年，伪龙江省次长山菅正诚为了完成掠夺农民粮食的“出荷计划”数字，他指挥“粮谷出荷督励班”到伪省管下各县的农村去，“督励”农民交出粮食。由伪省的日伪官吏和伪协和会的日伪事务人员，共同组成多少个“督励班”，分别到各县各村去，在现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督促农民按规定的“出荷数字”交出粮食，不管年景和收获如何，一定要完成规定的“出荷粮数”。因为农民辛勤劳动所得的粮食，如果年景歉收的话，全部交了“出荷粮”还不够。在农民已没余粮可交的时候，在督励班的严厉督促下，有的农民不管自己有没有吃的，先东挪西借，拼凑交上，免去眼前的灾难。有的农民没有地方去挪借，拼凑不上，就有家破人亡的灾祸。伪龙江省的“督励班”，在某县的一个村子里（县名、村名忘了）看见一户农民，所交的粮食达不到“出荷数”的要求，再三的督促，也交不出粮食，这时“督励班”的日本人看见一堆柴草，就指着柴草说：“你没有粮食，为什么有柴草堆呢?”农民实在没有粮可交，只有哀求，日本人就用木棒子把农民打伤，还不解恨，命令“督励班”的人员，点火烧柴草垛。被打的农民，当时一急，因气伤重死亡。

这个事件发生后，伪省次长山菅正诚根本就没有告诉伪省长，事过多日，伪县长卢贤德到省，向伪省长黄富俊报告了这一事实。伪省长黄富俊问日本次长山菅正诚，山菅正诚说：“省长不必管，一切由我来办，我有根据。”

据说伪满为了“粮谷出荷”，中央对各伪省次长有“密件”文书，伪省长不知道，所以伪省次长日本人山菅正诚敢于命令部下这样做。

如伪满国务院，每年召开一次伪省长会议，听取伪省长作“省政”报告，伪国务院再作指示，是一种官面文章的例行会议。在伪省长会议以后，由伪总务长官出名，一定要召集一次或每年二次的伪省次长会议。这个会议，没有汉奸参加，全部日本人。在这个会议中，各伪省次长对于“省政”，要作一个具体全面的报告，日本人的伪总务长官也要作具体全面的指示，内容和伪省长会议大不相同。所有的日本人对付东北人的残暴措施和不能让汉奸知道的问题，都要在这个伪省次长会议中来谈。所以在伪满时期，在执行某一政策法令的时候，汉奸“长”有时不太了解，但日本次长、副长、教官、

顾问等则胸有成竹地十分了解。因此，有时汉奸“长”遇到问题时，必须求教于日本人的次长，或请次长来处理。

如伪满警察组织机构中的特务科，专负责对东北人思想动向的调查、检举、逮捕和书籍、报刊、电影等的检查取缔，是一个所谓“特密”工作。这类公文书属于“极密”，绝对不经过汉奸，由日本人直接办理。按照伪警的组织系统，伪县有特务股，伪市有特务科，伪省有特务科，伪中央警务总局有特务处，由下到上、由上到下，以伪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为直接指挥命令者。这类所谓“极密”公文书，不经文书收发手续，而是用一个木箱装好，锁上，传递。不仅东北人民，即使汉奸伪官吏，也在特务系统的监视调查之中。

就因为伪警是日本利用来镇压东北人民的，所以伪警的事务，多是属于密件工作，因此伪警在执行职务和事务处理上，与其他伪机关不同。如伪奉天市警察局，每月有一次科署长定例会议，这个会是由日本人的副局长主持，汉奸局长不出席，也不知道“会”了些什么问题，“议”了些什么事情。

此外，东北人民对于伪满洲国所施行的“政策法令”有什么样的反映等，还有弘报关系部门随时向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汇报。按照伪弘报的组织系统，伪国务院总务厅有弘报处，伪省有弘报股，伪市有弘报股，伪县有弘报担当的负责人。这也是由下到上、由上到下，以伪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为直接指挥命令者。这类公文书也属于密件公文书，由日本人负责办理，不经过汉奸之手。

关于东北人民的思想动向的反映情况，还有伪协和会向上级汇报。按照伪协和会的组织系统，有协和会中央本部，有协和会省本部，有协和会县本部，日本殖民者把协和会叫做“民意机关”，和伪满政府为表里一体，它辅佐伪满政府推行各种政策法令。伪协和会的工作，分布于各区村基层机构中，有直接和老百姓接触的机会。因此，它以“民意上达”的方式，由下而上，由协和会中央本部向伪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汇报。这类公文书也属于“密件”公文书，也不经汉奸之手。

在伪满当时，有些人称日本次长、副长、顾问、教官等为“下上司”。这个意思，就是说日本次长、副长、顾问、教官等虽然在汉奸“长”之下，但它的权则是在汉奸“长”之上，汉奸“长”还必须听日本次长、副长、顾问、教官等的话，去办理一切事务。因此，称日本人为“下上司”。特别是日本伪官吏只服从日本次长、副长、顾问、教官等指挥命令，不服从汉奸“长”的指挥命令。从实际情况说，伪满的日伪官吏，不仅不服从汉奸“长”的指挥命令，有的汉奸伪官吏还要假借日本伪官吏的势力，反抗汉奸“长”。

所以在伪满时期，任何一个汉奸，都要抓住一个日本人作为护身符，以维持自己的汉奸地位。如果能抓住一个日本军人作为护身符，这不仅其他汉奸羡慕他有能力，就是日本伪官吏也要高看他。一方面，日本人认为这个汉奸是一个可靠的亲日家；一方面，人们都畏惧日军的势力，看在“日军的势力”份上，日本人就不能不高看这个忠实的汉奸。就因为在伪满时期日军的势力高于一切，无论日伪官吏，日军认为他不适任时，或认为他忠实于日本统治当局应当重用时，可以命令伪总务长官撤换或提升他。

如在1936年，伪满警务司的一个荐任二等的保安科长谷次亨，因为他和日本关东

军的参谋片仓中佐、辻大尉等日军所谓的“少壮派”军人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少壮派”军人在日军中很有势力，就日军司令官也得听他们的意见去办事，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力，这是日军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就因为这些“少壮派”参谋认为谷次亨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可以重用的汉奸，即命令伪满总务长官要特别提拔，不应当把这一个得用的汉奸放在这样低的地位。于是，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按照日军的意见，就把一个伪荐任二等的保安科长调升为伪简任二等的安东省公署教育厅长，不过半年，又由伪简任二等的省教育厅长调升为简任一等的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不过二年多的时间，又提升为伪特任的伪满民生部大臣。他这样飞快地爬上去，大为汉奸们羡慕，所以当时的报纸和人们都说这是三级跳的升官者。

所以伪满的伪官吏如果想要爬上去或干的牢靠，最好和日军有联系。否则，也必须把自己的副手，就是日本次长、副市长、副县长、顾问、教官等联络好，也就是把自己的副手看做是“下上司”，毕恭毕敬地用种种卑鄙手段逢迎他，拉拢他。这样，副手可以向上级总务厅人事处反映或向日军方面说好话，不仅可以保持自己现有的汉奸地位牢靠，还可以爬上更高的汉奸地位。

四、伪满洲国的最高决策会议

如前所述，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是伪政权的最高决策机关。在这个决策机关里，有一个决策性的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名之曰“次长会议”。因为出席这个会议的成员，除了主持会议的主席是伪总务长官，还有两个关东军参谋是这个会议的成员外，其余的都是各伪部的次长和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所以名之曰“次长会议”。又因为这个会议是在每周的星期二召开，因此，又名之曰“火曜会议”。

在1937年以前，伪国务院总务厅长还没有改名为总务长官的时候，这个会议叫做“火曜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成员，是以伪总务厅长为会议的主席，各伪部总务司长和关东军参谋为会议的成员。在1937年以后，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改名为总务长官，各伪部总务司长，改名为次长，这个会议，也随着改名为“次长会议”。又因为开会的日期改在每周的星期三举行，也把这个会议，叫做“水曜会议”。在1940年以后，这个会议又改在每周的星期二举行，于是又名之曰“火曜会议”。

无论这个会议叫什么名，就因为这个会议的成员除了伪满洲国的日伪官吏外，还有日本关东军参谋为会议的成员，并且会议的全部成员中，除了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有一个是汉奸，其余的成员全是日本人。就是说，由实际控制伪满洲国施政的日本人的次长和关东军参谋出席会议，审议案件，决定各种日本对伪满殖民地所要实行的政策法令，作为伪满洲国施政的基础会议。

伪国务院总务厅“火曜会议”是在伪国务院总务厅的会议室里召开。在会议室里，有一个长形的桌子，桌子横头，坐着主持会议的主席伪总务长官。在伪总务长官两旁，坐在会议桌子两面的，是会议的成员。一面是关东军参谋两个人，一面是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两个人，再排坐下去的是各伪部次长和伪总务厅各处长。在桌子另一面横头，与主席对坐的是伪国务院总务厅官房文书科长和记录者。在会议开始时，由主席宣布开

会，并提出审议某一议案。当即由担当部门的次长给予说明，然后进行审议。在审议中，互相质问发言，没有异议时，主席即宣布结束该议案的审议，继续往下审议另一议案，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议案审议下去。

这些提出审议的议案是由伪国务院总务厅各处和有关的伪部对于要制定的政策法令进行充分研究以后才制定出来的。如有关法令条文等，由伪法制处和有关伪部研究后制定之。如有关政策措施等，由其他关系担当处和有关各部研究后制定之。但无论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的那个处制定出的议案，都必须经由法制处审查，据说这是为了有“合法的根据”。然后，再经关东军的审查后，没有问题时即由伪国务院总务厅官房文书科打字、油印、装订成本、议案完成，分发给有关出席“火曜会议”的成员，定期开会。

在“火曜会议”席上通过的议案，虽然还要通过其他性质的会议，如伪“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等，但都本着这个基础会议所通过的决定进行形式上的会议，只有通过，不能有所变更。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说伪国务院总务厅的“火曜会议”就成为伪满洲国施政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会议了。同时，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是“火曜会议”的主席，又是伪“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的一个成员，以伪国务院总务长官的身份控制着这两个会议。就因为这两个会议所审议的案件，是经过“火曜会议”通过决定后才提交审议的，如果在这两个会议的成员中提出意见时，伪总务长官一定要力争通过，因此这两个会议就成为形式性的会议，没有不通过的议案。

五、伪满洲国的形式会议

伪满洲国的“国务会议”，为什么人们称之为“通过会”，又说它是走一走形式的会议呢?

因为伪“国务会议”的成员是由各伪部大臣和伪总务长官组成的，以伪国务总理大臣为主持会议的主席，全部是汉奸，只有伪总务长官一人是日本人，并且这一个日本伪总务长官就等于代表日本殖民当局参加会议。

例如，伪国务会议开始时，各个与会成员携带事先由伪国务院总务厅官房文书科分发给他们的已经油印装订好的议案，到伪国务总理大臣官邸去参加会议。

在伪“总理官邸”的会议室里有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整齐地排列着一圈沙发，在靠近门口有一条长形桌子，一面排列着几把椅子。伪国务总理大臣坐在会议桌的一头，伪总务长官坐在他的身旁，各个伪大臣围坐在会议桌的周围。列席会议的有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和伪国务院总务厅法制处长、官房文书科长等，坐在靠近门的长桌旁。在与会成员到齐后，佣人给每人送来一杯带糖的红茶。时间到了，主席宣布会议开始，并提出审议某一议案。当即由某一有关伪部大臣，开始说明议案的制定理由和内容条文。

如经济统制问题的议案，则由伪经济大臣说明经济统制的意义和制定条文的方针、宗旨。说明完了后，与会成员有不明了之处，可以提出质问，再由说明者说明。如有关法令问题说明者伪大臣，说不出理由，即由伪总务长官或伪国务院总务厅法制处长给说明。这个事先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文书科分发给各伪大臣的“国务会议”议案，各相关的伪大臣并不清楚其内容和意义，都是由伪部有关的事务担当的司长或科长来给伪大臣

先说明一下，议案是本部有关的事情，应该如何在会议席上说明等情况，以备伪大臣在“国务会议”时好说明。有时某一议案，特复杂、很费解时，这个有关部的伪大臣就不用脑子去记，而是在开会时带着部里一个事务有关的司长或科长，在会议席上给说明。但这个司长或科长说明完了后，即退出会议室，不能参与会议。

在会议时，有人提出不同意实行某一政策法令或发生意见分歧时，伪总务长官一定要发言，力争通过这一议案。如果力争无效，伪总务长官就说这是“军的意思”，这是“战时体制”，不能不这样做，或以这是“日本国策”等言辞来阻止不同意的人。如果再不同意时，那就等于“反满抗日”。当然在伪国务会议席上，还没有一个伪大臣敢这样坚持不同意的人。只要伪总务长官用大帽子一扣，各个伪大臣就闭口无言地默许了。到了这个时候，作为会议主席的伪国务总理大臣就说：“这一议案大家没有别的意见时，就通过了”。于是各个与会成员伪大臣接着说：“没有意见，通过”。这个议案，就算审议完了，主席又提出进行下一议案，就这样一个一个的议案，无异议地都通过了。

在伪满洲国刚成立的时候，伪国务会议与会的成员有时还提出质问或持有不同的意见。以后，与会的成员都觉察到凡是在伪“国务会议”上提出的议案，不容许持有不同的意见，必须通过。因此，与会的各伪大臣每逢“国务会议”开会时，就坐在那里喝茶、睡觉、看闲书等等，不再提质问或意见，只等主席说“没意见就通过时”，大家随便敷衍几句，就说没有别的意见，于是议案就通过了。日子长啦，各伪大臣就说这哪叫会议，就是“通过会”，这样形成了一个形式的伪“国务会议”，也就像唱戏一样，每逢开会时往那一坐，只等说完“通过”二字，戏就算演完。各伪大臣约会好了三一群两一伙，到某人家里去，抽口大烟，打八圈“麻将”，吃一顿饭，夜深了回家睡觉。就这样，伪国务会议与会成员各伪大臣高高在上地一通过，日本残酷对待东北人民的政策法令就公布实施了。

在伪参议府会议中，日本人的伪总务长官也起了如伪“国务会议”中的同样的作用。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凡是经过伪“火曜会议”通过决定后的议案，再通过伪“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的形式，使议案“合法”地产生出来，不能有所变更。所以说伪“国务会议”、伪“参议府会议”是形式的会议。

六、伪满真正的决策会议

伪满洲国的“火曜会议”、“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这是在伪满洲国“组织法”中所明文规定的、公开性质的会议。但在明文规定以外，还有一个非公开性质的秘密会议。这个非公开性质的秘密会议，这个会议是以伪总务长官为主席，由各伪部次长、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伪国务院总务厅各处长组成的。在这些与会成员中，没有一个汉奸，全部是日本人。如伪国务院总务厅汉奸次长、伪国务院总务厅汉奸统计处长，都没有出席这个会议的资格。因为这个会议是在每周的星期六开会，所以日本人称之为“土曜会议”。

这个会议是在伪国务院总务厅的“迎宾馆”里举行。在会议之前，先聚餐一顿，饭后开会。也有时先开会，会后聚餐一顿。在这个会议中，日本殖民统治者所讨论、研

究的问题，有的是就要在“火曜会议”上提出审议的议案，先进行一次非正式的商谈，看看大家是否有不同的意见，或是对某一政策法令还有不完备的地方进行修改补充；有的是还未正式制定政策法令的具体方案，但已由日本政府或关东军决定了，并已经命令伪满洲国需要制定实施的某一政策法令，事先在这个会议中大家研究一下，结合伪满洲国的具体情况，应如何制定法令措施等。在这个会议中，日本殖民者根据他们统治伪满洲国的经验和需要，互相交换意见，得出一个概略的结果，再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的事务担当处，正式着手制定具体的方案、措施等，以便提出在“火曜会议”审议。

可见，在伪满洲国组织法中，所明文规定的三个会议：“火曜会议”、“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都是形式的会议，在会议时所提出的议案，只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和说明。所以，我们看到在每次的“火曜会议”席上，日本次长们对于议案的讨论并不那样的热心，表现了胸有成竹的态度，也没有发生过因为意见不同而彼此争论起来的事件。同时，出席“火曜会议”的关东军参谋是坐在那静听，很少发言，即或发言也不过是说一些政策法令的重要性。也没有因为意见分歧对于某一议案表示不通过的事件。就因为出席“火曜会议”的成员都是非公开、秘密性质“土曜会议”的出席人员，再一次公开正式地通过“合法”的会议手续，使之“合法化”而已。所不同的就是在“火曜会议”的成员中多了一个伪国务院总务厅的汉奸次长和伪国务院总务厅的其他汉奸数人而已。

由此可见，伪满洲国最高决策的“火曜会议”以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决策会议，那就是所谓的“土曜会议”。

七、伪满洲国内的日本决策机关

日本本着田中义一的“满蒙大陆政策”，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组织了伪满洲国殖民地政权。这次的侵略行动是以日本驻在其租借中国的旅大市（日本称之为关东州）的关东军为主体。

在伪满洲国殖民地政权成立以后，日本把长春做为伪满的“首都”，改名为“新京”。关东军就由关东州内迁至长春，实行了日本所谓的“三位一体制”。这就是日本驻在伪满的“关东军”；日本在“关东州”内实行殖民统治的“关东局”；日本驻在伪满洲国的大使馆，三者联合起来由关东军为领导，共同进行对“关东州”、伪满洲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决策。这样形成为日本政府的代表机构，驻在伪满洲国内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镇压、屠杀、奴化、奴役和掠夺政策，以实现日本的“满蒙大陆政策”。

首先，日本以它的军事力量进占沈阳，然后，本着“以华制华”的方针利用民族败类，仅以两个师团的兵力就把整个东北三省拿到手里，组织了伪满洲国政府。进一步又夺取了热河省，把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地区纳入它的殖民地版图之内。又进一步在日军的监督配合下，驱使伪军，以“治安肃正”为名，实行“三光政策”，打击抗日爱国力量，屠杀东北人民，巩固伪满殖民地政权。以“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的口号，把大批的日本官吏参加到伪满洲国组织机构中，控制着伪满洲国的施政，对东北人

民进行无情地镇压和屠杀，对东北的经济进行了无情的掠夺。

其次，日本以“开拓移民”的方针，把大批的日本人民，强迫移至中国东北，美其名曰“帮助”伪满洲国“开拓荒地”，实际则是霸占东北人民赖以为生的耕地。又以日、德、意轴心国的联合，实行“反共”，准备对苏作战。伪满以“北边振兴”为名，公布了“北边振兴计划”，掩盖日本的对苏备战。日本把大批的武装移民运送到东北北边、内蒙和苏联接近的地带，造成三道防线：无人区、军队区、武装移民区，以防御苏军进攻和截断东北人民抗日爱国力量和苏联的联络线，以达其大陆基地的目的。

最后，日本计划将它的殖民地的朝鲜人民一部分强迫移住东北，把东北人民一部分强迫移住中国内地，再把日本人民一部分强迫移住朝鲜和中国东北。到了这个时候，伪满的汉奸走狗将逐渐被淘汰，而代之以日本官吏。伪满洲国政权同时被消灭，东北将同日本统治朝鲜那样设一个“总督府”，以一个日本“总督”为最高统治者。伪皇帝溥仪将成为日本皇室的亲王、宫殿下，豢养在日本。东北人民成为名实相符的亡国奴，以达其岛国日本变成大陆日本的目的，以完成其所谓的“满蒙大陆政策”，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主要目的。这个主要目的的实现，完全依赖于日本关东军。所以，伪满洲国最高决策机关——伪国务院总务厅，是听命于日本驻在伪满洲国内的决策机关——关东军司令部。

例如，1942 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年，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以后，在 1943 年关东军为了表示伪满洲国是在它领导下，实行了镇压、屠杀、奴化、奴役和掠夺的残酷统治，令溥仪亲自到日本去进行访问，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谢“日本援助的好意”。同时，在伪皇帝回伪满后，关东军决定要伪皇帝颁发一个“回銮训民诏书”告诉全伪满官民，今后称日本为“亲邦”，说明了日“满”两国的“亲密”关系。肯定了日本是伪满洲国的父母之邦，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儿子国。儿子要绝对服从父母的教导，如果父母需要什么，儿子要无条件地奉上。所以，伪满洲国生产的粮食，每年约有 600 万吨，其中有 400 万吨运送到日本去。日本人吃大米、白面，东北人吃粗粮、混合面，生活在伪满统制配给经济制度下的东北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到了 1945 年，日本所谓“战时体制”，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日本国内虽然从东北掠夺去这样多的粮食，还是粮食不足，伪满洲国特派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亲自到日本去进行慰问，并送给日本大米 400 万吨，食盐 100 万担。同时，还把伪皇帝的“亲书”当面交给日本昭和天皇，表示儿国对父邦的孝意。至于东北人的死活，那是另一回事。用当时汉奸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亲邦大日本的援助，满洲国就存在不了”。

由此可见，伪满洲国称日本为“亲邦”，这也是日本按照它已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实现“满蒙大陆政策”所需要实行的一个前奏曲。

八、日本关东军与伪满的关系

日本从 1906 年日俄战后继承了俄帝在中国的权利，租借了中国东北的旅大市，驻在旅大市的日军名之曰“关东军”，关东军司令部驻在旅顺。1931 年九一八事变，就是由关东军挑起的，以至侵占了整个东北。因此，关东军就成为实现日本“大陆政策”

的先锋队，因而也成为日本在伪满洲国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者，成为指导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组织不太详细。据了解，有军司令官一人，参谋长一人，参谋副长一人，其下设有参谋部、经理部、军医部、报导部、兽医部、法务部、交通监理部、兵机部等八个部。在这八部中，与伪满发生直接关系的是参谋部。在参谋部里共有三课，第一课为指导伪满军事关系等事项，第二课为指导伪满交通、道路、运输关系等事项，第三课为指导伪满政治、经济、文化、人事等关系事项。总之，所有伪满的一切施政，都要通过关东军参谋部的同意和谅解，否则是行不通的。

所以，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所要办的一切事务，都必须事先和关东军第三课取联络，[①] 在得到关东军第三课的指示和同意以后，才能着手制定出政策法令的具体条文措施等。这些具体条文措施等制定出来以后，还必须通过关东军第三课的审查，经审查后得到了“谅解”，才能提到伪满洲国的三个会议——“火曜会议”、“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

如日本殖民统治者在秘密性质的“土曜会议”所商谈决定的问题：一般的问题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事务担当的处长拟出草案，亲去和关东军第三课协商说明，得到第三课参谋的“谅解”后正式制定；较重要的问题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亲去和关东军第三课协商说明；重要的问题则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亲去和关东军参谋长协商说明。就是说凡是伪满洲国所要实施的政策法令，在日本官吏针对伪满洲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以前，必须通过关东军的审查。在关东军表示没有意见、谅解以后，伪国务院总务厅才能制定具体方案。也有的问题不用亲去和关东军协商说明，只用伪总务长官的名义，用公文书的方式给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军在寄去的公文书上盖一个“谅解济”的图章，又把原公文书寄回来，伪国务院总务厅就可以正式办理了。

如伪满简任官以上的伪官吏遇有升迁调转采用时，都要经关东军的审核。审核的方法多是由伪总务长官出名，用书面公文书向关东军请求谅解。关东军在原公文书上盖一个“谅解济”的章，寄回原公文书。这样，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就可以办理正式手续。但有时关东军有意见，这个书面公文不返回，只是用电话通知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长或伪总务长官，说明它所持的意见。这时，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就要重新考虑，再别斟选一个人或几个人，请关东军决定。

在1940年，伪满洲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公使”，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决定由伪经济部参事官郭宝森为伪满首任驻意大利“公使”，关东军没有“谅解”。于是，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拟定了三个人选候补者，有伪专卖总局长罗振邦、伪民生部厚生司长王秉铎、伪经济部参事官郭宝森，用伪总务长官的名义备文呈请关东军，从这三个候补者中，给决定一个人。关东军决定由罗振邦当伪满驻意大利“公使”。“谅解”回来后，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正式办理人事调转手续。但在公文书的

① 关东军内辖机构不是固定不变，1931年12月11日设统治部取代第三课，1932年又改称特务部，1934年12月又撤销，而伪满洲国成立后设置的第四课担当对伪满殖民政策的指导和贯彻。

后面，付上关东军“谅解济”的公文书作为根据，呈请伪国务总理大臣、伪总务长官裁决后，再呈请伪宫内府，由伪皇帝裁可，然后发布命令。

但也有的问题，如日本所谓的“思想犯”问题，除了由伪满洲国直接办理的以外，还有由关东军直接办理的。这就是由关东军命令其驻在伪满洲国内的日本宪兵队直接办理。

在伪满洲国内日本宪兵队遍布于伪满各省市，专门负责日本所谓的“特务思想”工作，和伪满警察有相互联络的关系，伪满警察是服从日本宪兵队的指挥命令的，特别是关于特务思想问题，两者相辅而行的。如沈阳市有日本宪兵队，在宪兵队以下有两个宪兵分队，一个是在铁西区，一个是在大东区。日本宪兵队里有日本宪兵，有汉奸宪兵补。在他们手下，每个人都有所谓“腿子”若干人，就利用这些坏蛋各方面搜集情报等。这些汉奸宪兵补和坏蛋腿子假借日本宪兵队的势力，狐假虎威地勒索人民，其害大矣。

日本宪兵队对于东北人民的思想动向和所搜集的情报等直接向日本宪兵司令部汇报，再转报关东军，作为关东军统治伪满施政的根据。

如到了1936年日本所谓的“治安肃正工作”，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进行到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对于东北人的思想也要进行一次所谓“思想肃正工作”。也就是对东北的知识分子，要进行一次恐怖大镇压。伪满洲国政府在此时期也公布实施了“治安维持法”，以配合日本宪兵队的行动。日本宪兵队以杀一警众的口号，在伪满各地制造各种莫须有的所谓“反满抗日”的“思想犯”事件，镇压、屠杀东北人民。其中之一的安东报国会事件，就是日本宪兵队在伪安东省公署所在地的安东制造出来的。这次事件扩大到伪安东省各县，日本宪兵队共逮捕了约有五百余人，以教育界的人居多数，伪安东省公署教育厅长孙文敷和礼教科长荆百斛也被日本宪兵队所逮捕。

据当时的安东日本宪兵队长谷口对人们说，大意是：“知识分子是最危险的，他们有文化，‘反满抗日’思想浓厚，如果不进行一次‘肃清工作’，对于满洲国的安全，是不能确保的。报国会事件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们秘密组织的‘反满抗日’活动，我们日本军有保护满洲国安全的责任，对于这样的组织活动必须彻底肃清。”

就因为日本宪兵队负着保卫伪满洲国“安全”的责任，所以它在伪满洲国内通过各种形式和方法，进行“思想特务工作”和毒辣的镇压，是人人畏惧的一个杀人机关。

如1940年，伪滨江省警务厅长秋吉威郎召集伪滨江省长于镜涛、伪哈尔滨市长赵震、伪哈尔滨警察厅长白铭镇开会，秋吉威郎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宪兵队委托张慕贤（一个流氓坏蛋）在哈尔滨市的太平桥打算开设一个赌博场，各位认为如何?”这三位汉奸听说是日本宪兵要办的，没有异议，当时就点头表示同意。在这个赌博场开了以后，每天有一二千人出入赌场，热闹非常。由于赌博而斗殴的事件、开枪事件、自杀事件日渐增多。据说，日本认为哈尔滨市俗称小上海，约有二十余个国家的侨民和相当多的白俄人居住在市内，思想情况很复杂，想从这个复杂的社会情况中侦缉“思想犯”和搜集国际情报，利用赌博场的掩盖，较比方便一些。同时，“特务思想工作”费用一部分可以由赌场缴纳。秋吉威郎曾说过，日本宪兵队每天从赌场收一笔钱，就是伪“保安局”每天从赌场也收50元钱的费用。

伪保安局是伪满警察组织以外的一个秘密的特务活动组织。虽然有些和伪警有关的汉奸知道有一个保安局，但内部的组织情况和它具体的工作谁也不知道。

如1942年，伪铁岭市召开学校长会议，伪市长徐渐九本着伪文教部的指导宣讲伪满洲国供奉日本“天照大神”，所谓的“唯神之道”的意义。在伪市长讲完了以后，休息时有一位校长问伪市长，究竟“唯神之道”是什么“道”？伪市长徐渐九随便开玩笑地说：“这就是老张家的祖先，给老王家拿去供上。”这个话，被另一位校长听见，报告给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伪市长徐渐九，经过严刑讯问后，决定他是“反满抗日”，侮辱“天照大神”。因为他是日本留学生，并和日本方面多有来往，才没有处死。结果，日本宪兵队把徐渐九交给了伪满司法方面，判处徒刑8年。

九、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伪满的决策会议

日本关东军是“指导”伪满洲国施政，代表日本政府驻在伪满洲国内的一个主要机关，它控制着伪满洲国的一切。特别是它对于保卫伪满洲国的“安全”方面，负有绝对的责任。它不仅指挥命令伪满洲国执行镇压、屠杀和掠夺殖民地的政策，还直接地通过它所属的“关东军”和它所属的宪兵队协助伪满洲国政府，实行对东北人民的镇压、屠杀和掠夺政策。同时它也通过伪满洲国政府和它的宪兵队获得日本在伪满洲国所实行的统治情况和东北人民对它实行统治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情况，综合起来以决定对伪满洲国应该执行某种政策法令，以便有利于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所以，在关东军司令部里，不例外的也有一个对伪满洲国施政的协商会议。这个会议是不定期的，在需要的情况下随时由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召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有伪满洲国总务长官、伪满洲国军事部顾问、日本驻伪满洲国海军司令部参谋、日本驻伪满洲国宪兵司令部人员、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人员以及关东军参谋等人。这个会议由关东军参谋长主持。在这个会议中，所研究讨论的问题就是日本政府对伪满洲国所需要执行的政策法令等，和针对伪满洲国的现况、东北人的思想情况等应如何进行统治等问题。共同发表意见，得出一个概略宗旨，决定如何决策。然后，责成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拟出具体方案，再经过关东军第三课的审核，认为完善以后，再在伪满洲国各种形式的会议上提出，通过决定，公布实施。

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或第三课参谋等有时也召集一些为它信任的汉奸开会。这个会名之曰座谈会，也是不定期的。在这个会中，主要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听听汉奸们对于日本统治东北所实行的政策和应该如何施政等的意见。能被召集出席会议的人，大部是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伪官吏，即日本所谓的伪官吏中的“青年中坚分子”。这些人的意见，据说，大都是迎合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心理，帮助日本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的意见。日本殖民当局也根据这些人的意见，作为决定在伪满洲国实行政策法令的参考意见。同时，关东军参谋等在会中说一些伪满日本官吏的不好，对伪满政策法令的执行上犯了某些错误等的批评意见。如伪满对日本开拓移民用地的规定，只许占用荒地，不许占用已开垦的熟地。而实际则是强占和强买已垦的熟地，这是东北人民反对并曾向伪国务院联名请愿的事实。关东军在这个会中，把东北人反对某一政策的事实，推到某一执行政策的日

本伪官吏身上。就是说，“政策是好的，执行政策的人错了”。关东军参谋等的这种掩盖日本殖民统治的狰狞面目，只是为了借这些出席会议的人的口，宣传关东军，企图表明它所主张的都是对东北人民好的事情。这样，就更坚定了汉奸们和所谓中坚分子们积极地效忠于它，以便利用这些人的手作它忠实的帮凶。

有时关东军也利用这些为它信任的和所谓中坚分子向日本国内作宣传，介绍伪满洲国的施政情况，以麻痹日本人民。如日本在伪满洲国所实行的“开拓移民”政策，大为日本人民所不满，日本人民不愿意到寒冷的东北开垦荒地种田。关东军决定在日本举行大会，宣传伪满的“开拓移民”政策。命令伪满政府派几名为它信任的汉奸，在关东军参谋的率领下，到日本东京去作宣传工作。有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伪龙江省长卢元善、伪协和会实践部长曲秉善等七八人到日本东京出席大会、座谈会等，说出伪满实行“开拓移民”政策的优厚条件，比在日本国内的生活要好得多等等引诱日本人民的话。因为这是出自东北人的口里，日本人民不明伪满的真相，信以为真，上当的不少。

这就是关东军为了实现它的决策，假借汉奸之口欺骗日本人民，使伪满的“开拓移民”政策按期完成，以免牵扯它整个的决策计划。

如在1935年，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召集伪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和关东军参谋等人开会，讨论更换伪国务总理的问题。因为伪国务总理郑孝胥曾经是代表溥仪和关东军协商成立伪满洲国的主要人物。在当时日本曾说过伪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话，郑孝胥却始终作着清朝复辟的迷梦，坚持伪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说法，幻想实行清封建王朝一套把戏，和日本侵略东北的目的背道而驰。日本认为既然伪满洲国政权已经组织起来，国际联盟调查团也已经应付走了，伪满洲国基础已渐稳固，溥仪也已经上台，像郑孝胥这样的老顽固已经没有再利用的价值，所以要研究一个适当的伪国务总理人选。起始日本殖民统治者想利用熙洽或臧式毅，从二人中挑选一个。坂垣征四郎认为，需要挑选一个在东北军阀政权时代较比有名的人物，就挑到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的头上，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合适。于是，就决定由关东军第三课参谋花谷大尉负责，通知伪国务总理郑孝胥辞职，郑孝胥大哭一场提出辞呈①，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就当上了伪国务总理。

十、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改名为“总务厅长官”的意义

在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它吃到口的一块肥肉，是不愿

① 郑孝胥因争权夺利多次与总务长官驹井德三冲突，并以“请假”、“辞职”相要挟。1935年5月又发牢骚，惹怒关东军，曾发生关东军兵围其官邸，郑孝胥不得不“辞职”了。另外，不可能派“大尉”军衔的军官去通知伪总理辞职。此说可能与当时已升为关东军中佐的花谷正对于郑孝胥所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不该把着不放手”的话，大为愤怒，力主关东军立即撤换郑孝胥有关。

吐出来的。因此，它把伪满洲国说成是一个“独立国家”，是中国东北人民要“脱离军阀统治”，“实行自治”而组成的国家。所以，在伪满洲国的组织上，在利用汉奸的程度上，初期的伪满洲国多少有些和以后的伪满洲国有些不同的地方。

在伪满洲国成立当时，伪满政府的组织中有伪国务院，其下有各部、各部总长，是国务参与者的身份和日本国内的组织大同小异。

伪国务院有“国务总理”一人。伪国务院的事务机构是总务厅，有总务厅长一人，有权代理伪国务总理；各伪部里有总长一人，其下有各个司，以总务司为首席司，总务司长有权代理部长。各伪省里有省长一人，其下有各厅，以总务厅为首席厅，总务厅长有权代理省长。各伪市里有市长一人，其下有各个处，以总务处为首席处，总务处长有权代理市长。在伪县里有县长一人，其下有各个科，但另外有参事官一人，他有权代理县长。

1934 年伪满洲国的组织机构改革，伪国务院的国务总理改为国务总理大臣，各伪部总长改名为各伪部大臣，由国务参与者的身份，变为办理各部事务的身份。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改名为总务厅长官，总务厅次长增添次长一人；各伪省的总务厅取消，增添省次长一人；各伪市的总务处取消，增添副市长一人；各伪县的参事官取消，增添副县长一人。这样明确了日本次长、副长的职权范围，具体地实现了集中领导，以免因为有首席之别，而发生彼此相互间的争吵。

如在 1936 年，伪安东省公署总务厅长别宫秀夫，因为他是首席厅长，要总揽伪省各厅的事务。警务厅长日本人连修认为同是厅长，没有大小厅长之别。因此，别宫秀夫与连修两下发生了意见，别宫秀夫认为自己是首席厅长有权代理省长，所有给省长裁决的公文书必须经过他的手，然后才能交给省长。至于在伪警中的秘件公文书，虽然不能给伪省长看，但也必须给首席厅长看。连修认为你虽是首席厅长，我就不服从你的领导，我直接和省长接头，秘件公文书我直接办理，为了保密谁也不给看。由于两个厅长的互相冲突影响了两厅的科长，警务厅的科长和总务厅的科长也相互地斗起来了。因此，在一次宴会席上，警务厅长连修和总务厅长别宫秀夫又争吵起来。连修倒了一碗白水送到别宫秀夫面前，命令别宫秀夫喝了这碗白水。按日本的风俗习惯，只有对死者才能供白水，绝不许用白水敬客。所以别宫秀夫不喝这碗白水，经连修再三相强，别宫坚持不喝，并斥责连修的不当行为，连修大怒，招手就打了别宫秀夫一个嘴巴。像这类事件，在日本官吏中间由于互相争权的关系，不只伪安东省公署、其他伪满各地也有类似事件发生，这也是伪满组织机构改革的一个原因。

十一、伪总务厅长、总务长官们的出身和各阶段所实行的统治殖民地的政策法令

从 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到 1937 年的期间，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是日本人驹井

德三。驹井德三是日本北海道农业专门学校出身,[1] 在日本经营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工作，当过南满铁道式会社公主岭农业试验场场长。以后，又到中国内地调查研究中国的农业经济情况。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关东军的财政顾问。伪满洲国成立他当了伪国务院总务厅长。1936年，他转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1940年退职回日本去了。

伪满洲国在驹井德三总务厅长这一段时期中，日本着重在巩固稳定伪满洲国基础的方针。就是利用东北军阀余孽，收集改编旧东北军为伪满军，划定伪军管区，利用伪军组成“讨热部队”，侵占热河地区。又在日伪军联合下在东北四省地区进行了所谓“治安肃正工作”；实行坚壁清野的“集团部落”政策，造成了所谓“三光”，建立了基层行政组织的街村制度，确立了“保甲制度”，把东北人套上奴隶枷锁、束缚了手脚，如果没有“良民证”是寸步难行。并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把东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划分为“奉天、吉林、龙江、滨江、黑河、热河、安东、锦州、北安、三江”等10省，和内蒙地区的兴安东、西、南、北等4省。

“总理并列”：在控制整个伪满洲国的施政上，总务厅长由于地位低于伪国务总理，也低于国务部长身份的各伪部总长，在指挥、命令、控制上不仅日本伪官吏不愿接受，就是汉奸伪部总长也有些不服。同时，伪满洲国成立几年来和有些国家发生了“外交关系”，伪国务院总务厅长的职位也不为人重视而忽略。这时，日本在国际上已不怕有人说它是侵略，侵略已成事实，也不用再装模作样地说伪满洲国是东北人“自治的国家”了。因此，提高伪国务院总务厅长的职位名义，以控制整个伪满洲国的施政是十分重要的。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改名为伪国务院总务长官，这样和伪国务总理大臣并列起来，各伪部总长改名为事务大臣，伪总务长官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高高在上，不怕再有人不愿意接受他的命令指挥了。

这样的改革明确地固定了日本殖民“集权”的系统，实现了伪国务院“中央集权”的制度。伪总务长官就成为代表日本政府，在伪满洲国执行殖民地政策法令的主要人物。从此开始，伪总务长官的任命不是由日本驻伪满的权威机关关东军来任命、选派，而是由日本政府决定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的人选，“奏请日本天皇”的裁可，派遣到伪满洲国来。就是最有权威的关东军，只有指示命令的权利，而没有罢免的权利。如果对伪总务长官有意见时，也得向日本政府提出意见，由日本政府决定其去留，这就是日本加强了对伪满洲国殖民地统治的阵容，以达其统治殖民地东北的目的。

“中国通”驹井德三把他对中国所了解的具体情况，结合到实行殖民统治政策中。首先是迎合中国军阀政客的地方割据的心情，给以相当的“地位待遇”，满足其“名利双收”的愿望，以便作为帮凶，巩固稳定殖民地的基础。这就严重地打击了东北人抗日爱国力量，使抗日爱国力量逐渐分崩瓦解。同时，伪满洲国公布实施了“叛徒惩治法”、“治安维持法”、“集团部落法”、“街村行政实行要纲”等一系列镇压屠杀东北人民的政策法令，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实施了“专卖法”、“基本法”等，东北的

---

① 驹井德三先在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复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论文《满洲大豆论》很引人注意。

整个人力、物力、财力，都出卖给日本。成立"协和会"，发给汉奸们"建国功劳金"，以假的"民族协和"、"日满一德一心"作招牌，拢络、收买人心。

当时获得所谓"建国功劳金"的人，有郑孝胥、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阎传绂、王静修、张燕卿、冯涵清、于冲汉、赵欣伯、丁鉴修、吕荣寰、蔡运升等，约有30余人。"建国功劳金"的最高额为伪满币50万元，其次有30万元、20万元、10万元，最低额为5万元。这是日本所谓的"论功行赏"，按照伪满洲国成立当时所贡献的力量而决定的。

从1937年的伪满洲国组织机构改革到1940年的期间，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是星野直树，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出身。在日本大藏省财产课工作，1933年当了伪满洲国财政部总务司长，1937年当了伪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1940年退职回日本，当了日本近卫内阁无任所大臣兼企业院总裁，1941年当了日本东条内阁秘书官长。

伪满洲国在星野直树当伪总务长官的这一段时期中，日本着重执行掠夺东北的物资财富的方针。就是成立各种垄断组织的所谓"特殊会社"。如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满洲飞行机制造会社、满洲粮谷会社、满洲炭业会社、满洲电业会社、满洲电信电话会社、满洲畜产会社等等，约有20余个会社。日本垄断资本大批渗透到伪满洲国内，企图造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掠夺经济体系。在伪满洲国内实行了统制经济政策，限制私人工商业的扩充发展，规定出统制品与非统制品。棉布为统制品，无处购买，代之以非统制品"混纺"。对于农产品，规定掠夺的定量为"谷粮出荷量"，大米、白面为统制品，无处购买，代之以非统制品"粗粮"、混合面。

以星野直树为"理财能手"，就是制定怎样实行经济侵略和经济掠夺政策，能更多地榨取殖民地的物资财富，增强日本国内的繁荣，星野直树是有他的一套办法的。如伪满洲国所成立的这些特殊会社规定为日"满"双方投资，按投资数共同分配利润。但是，如果没有利润可分时，伪满洲国应按日方投资额数付给日方五厘年息以补其损失。又如伪满洲国实行禁止吸食鸦片的命令，实际是在伪满各地开设约有100余个"鸦片零卖所"，是专供吸食鸦片烟者吸烟的场所，并雇用"女招待"以吸引吸烟者，并扩大种植鸦片烟的地域和面积。

在星野直树这一时期伪满洲国公布实施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经济统制令"、"土地法"、"粮谷出荷法"、"商工会改组法"、"开拓法"、"禁烟法"等等残酷掠夺东北物资财富的政策法令。为了限制汉奸伪官吏搞集团派别实施"文官令"，所有伪满中央地方的人事统归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掌握。由于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侵略中国内地，对于雇佣伪满军不敢信赖，因此伪满实行"征兵法"，征用有身家财产在伪满洲国内的青年子弟为"国兵"，以免对其东北有后顾之忧。为了实行"神道设教"的奴化政策，修"建国神庙"，宣扬"唯神之道"，以日本的"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把东北人民说成是日本人民的子孙。实行"北边振兴计划"，把大批日本"武装移民"送到东北北边，一为疏散日本国内人口，二为以武装移民代替日本军队加强防卫苏联的进攻，此之为"亦兵以农"的办法。

日本在1937年的组织机构改革中，为了掩盖其集权控制伪满洲国施政的真面目，

缓和汉奸伪官吏和东北人民的注意力，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增添了几名汉奸伪官吏。从1931年到1936年伪国务院总务厅内除了有两个汉奸科长和有几名办事务的汉奸伪官吏外，其余都是日本官吏。从1937年开始，伪国务院总务厅内增添了汉奸总务厅次长一人，统计处长一人；首席监察官一人，人事处参事官一人，法制处参事官一人，企划处参事官一人，弘报处参事官一人。这样，无论其实际情况如何，在表面看伪满最高决策机关的伪国务院总务厅内，也有了汉奸伪官吏参加其中了。同时，缩小了伪民政部、外交部，改为内务局、外务局，这意味着“内政”、“外交”没有什么重要，最重要的是镇压、屠杀和掠夺了。也取消了伪监察院和立法院，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增设一个监察官室，这意味着伪满洲国已没有必要再装作“独立国家”了，殖民地政权就是殖民地政权。

从1940年到1945年，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是武部六藏，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出身。在日本内务省工作多年，当过日本内务省秘书课长、青森县知事①。约在1933年当了“关东局司政部长”，1934年当了“关东州厅长官”，1935年当了“关东局总长”，1938年当了日本内阁的企划院次长，1940年当了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到伪满垮台。

伪满洲国在武部六藏这一段时期中，由于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不仅加强掠夺东北的物资财富，还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统治。也就是说，日本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着重地实行镇压屠杀的思想恐怖政策。如果有谈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圣战”不利的话，就是“反满抗日”的“不良分子”而遭逮捕。把伪警察的统辖机构伪警务司改为警务总局，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直接指挥，加强了暴力政权组织。实行所谓“思想矫正法”，把大批东北人民加一个“思想不良”的名义逮捕起来，关押在“辅导院”里名为进行“思想矫正”，实际是集中起来送到矿山等地去作劳工。为了贯彻执行“经济统制令”，于1941年在伪警察机构中增设经济保安科，专为负责取缔违反经济统制令的事件。于是，在“思想犯”以外又加上一个“经济犯”，甚至多吃一口饭都在违反经济统制令之中。实行“日满华共同防卫”，在伪警察机构中增设警防科，专为负责都市防空，组织“义勇奉公队”实行都市防空演习，对于都市人口强迫向郊区疏散、迁移。实行总动员，凡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随便征用。冻结物资、关闭合并私人工商企业。强迫收集民间的金属，名之曰“支援大东亚圣战的捐献”，凡是民间所有家具上的铜制品，全部征收。在伪满中央设立伪国民勤劳奉公部，把伪满实行“国兵检查”后所有不合格的青壮年编成“勤劳奉公队”，进行义务劳动三年。把全伪满的学生组成“勤劳奉仕队”，进行定期半年或一年的义务劳动。在伪满各大都市进行不定期的、每年四次以上的所谓“都市治安确保大检查”，就是在都市的各要路布置伪警察，对于通行中的车马行人进行检查，如果没有证明就是“无业游民”，逮捕起来送到需要场所做劳工。同时，在伪满各地征集劳工，家家出人，把这些不同名词的劳工送到工厂矿山或送交日军去修军用道路、军事工程等。实现了日本所谓的“战时体制”，东北人民生活在恐怖、死亡的边缘。

---

① 武部六藏曾经任过秋田县知事。

在武部六藏这一时期，为加强对东北人民的镇压，伪满洲国公布实施了“治安特别法庭组织法”、“国防保安法”、“国防资金秘密保护法”、“劳工法”、“思想矫正法”、“总动员法”、“时局特别刑法”、“时局诏书”、“都市人口疏散对策”、“日满华共同防卫协定”等等。为加强掠夺公布实施了“战时增税法”、“粮谷统制配给法”、“产业统制令”、“七·二五价格统制令”、“种植鸦片法”等等。为加强奴役公布实施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勤奉法”、“勤劳部组织法”等等。

在1940年以后，伪满洲国的组织机构方面又进行了一些改革。如伪满洲国中央的警察统辖机构，从1937年伪组织机构改革时取消了伪民政部，在伪民政部所属的警务司改为伪军事部所属的警务司。这次又把伪军事部所属的警务司改名为警务总局，成为伪国务院总务厅直属的外局。把各伪市内和市机关相并行的警察厅实行市警合并，改为市直属的外局——市警察局。如把外务局改为外交部，内务局取消，把地方行政事务改归伪国务院总务厅地方处直接办理。如在伪文教部里增设学生勤奉司，专为组织计划全伪满中学以上的学生实行“勤劳奉仕”。如在伪满中央增设一个国民勤劳奉公部（简称为勤劳部）和勤劳奉公队总司令部，专为负责计划管理训练“勤奉队”，实行统一调度指挥。如伪国务院总务厅企划处扩大组织，改为伪国务院总务厅直属外局——企划局，等等。

伪满洲国这样的加强暴力统治，也解决不了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完遂”，而且日趋末落。到了1944年，日本国内和伪满洲国受到了美机的空袭，人心惶惶不安，所有的暴力对策挽救不了日本侵略者垂死的命运。伪满洲国在1945年采取了怀柔的办法。组织了以汉奸韩云阶为首的“厂矿监察宣抚使”，一行十余人到伪满各地，监察厂矿对于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要各厂矿尽量加以改善，宣抚工人们：对于时局要信赖“皇军的必胜”，勿听信谣言，要努力生产，支援“皇军圣战”。同时，伪满洲国又组成了以汉奸张景惠为首的“赴日慰问使节”，一行五六人。慰问日本国内受到空袭的灾难，送去慰问品：大米30万吨、食盐70万担，以表示伪满洲国对于亲邦日本的敬意。

（1964年5月）

伪总务厅文书科是怎样准备火曜会的

荒川秀次*

“火曜会议”是在伪总务长官主持下，以伪总务厅次长、各处长、伪各部次长、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伪国务局长等为构成之人员，每次必定要有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长或其代理参谋出席，否则就不能开会。“火曜会”的议案，必须全部提到伪国务院会议上，于是凡是在“火曜会议”上通过了的，就列为第二周伪国务院会议的议程。但只有伪简任官人事案不提到“火曜会议”，而直接提到伪国务院会议。我从事通知火曜会的召集、整理议案、记录决议等事务。

提到“火曜会议”上的议案，按其惯例是由伪各部负责人负责起草之各案，要受伪总务厅企划处的审查，还要受关东军在此部门参谋的审查和私下承认，再通报给伪文书科长。对伪总务长官、伪总务厅次长，是由伪企划处说明原案或会同有关各部审议，这两种方法皆可行。伪文书科长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内部联络并获得结果，促使原部门和关东军之间的联络。这些联络完成后，就于每周星期五前，由原部门向伪文书科提供25份，伪文书科得到伪总务长官的同意，就正式作为“火曜会议”的议案，于星期五傍晚前送发给“火曜会议”的各位成员。“火曜会议”就根据此议案，从每周星期二午前9时起在伪国务院总务厅会议室举行。议案每次平均有十几件，多的时候有三十几件，少的时候有几件。审议多为形式上的说明和质疑，于午前就结束了。我以伪文书科长的身份，记录此会议议案的通过或保留，认可的议案于会后得到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决定，就作为翌周伪国务院会议的议程进行整理。

以上是我以伪文书科长的身份从事整理关于“火曜会议”的议案之过程的概要。

由伪国务院会议通过的议案中之法律、命令、预算，要经过“上奏裁可”之手续，同时还有对伪参议府的“咨询”手续，由伪参议府决议后，再行咨询“答复”之手续，这些手续都是由伪文书科执行的。完成了这些手续之后，就将被“裁可”的法律、命令、预算登载于“政府公报”上，就算“公布”了。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文书科长。

伪总务长官是个什么角色

王 贤 沛*

伪总务长官的使命

伪国务院总务长官的任命，不是伪国务总理大臣的推荐和任命，也不是关东军的推荐和任命，乃是日本内阁的推荐，由日本天皇裁可后再经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向伪满皇帝推荐，由伪满皇帝任命的特任官。

伪总务长官的使命，是披上伪满洲国务院总务长官的外衣，以伪满组织机构为工具奉行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政策，对东北实行殖民地统治。

例如，1937 年，伪总务长官根据日本政府企划院的指示，在工业方面，为了在伪满生产更多的侵略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命令企划局，筹划成立一个托拉斯性质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这个会社，规定为“日满”双方合办，共同出资，由日本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经营指导，总社设在长春，为“母体”。在伪满各地成立“子体”会社，预定为二十六个企业单位，并由伪满政府负责保证其一定的利润，如果年终没有获利时，即由伪满政府按各企业的资金额数，付给六厘利息，做为企业的利润。并且把成立这一会社为了掠夺更多的军用物资的目的，说成是为了提高伪满的生活水平而实行的“满洲”“产业开发”。因此伪总务厅主计处根据这个决议，计划规定了该会社的资金和六厘利息保证金等，为此强行向人民摊派，购买公债和储蓄，作为资金来源。

伪总务厅法制处根据这一决议，和有关部门共同立案起草，制定出“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管理法”、“特殊会社法”等法令；

伪总务厅人事处根据这个决议，计划规定出该会社的人事制度，总裁、副总裁、理事、监事、部长、科长等会社员的阶级待遇；

伪总务厅地方处根据这个决议，通令各省、市、县对于该会社的子体企业单位所需用的土地，给予方便，负责提供适当的用地；

伪总务厅统计处根据这个决议，通令各省、市、县、地方，提供有关的参考资料；

伪总务厅弘报处根据这个决议，对于该会社成立的目的，进行“是为了开发‘满洲’的产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宣传；

伪总务厅警务总局根据这个决议，通令各级警察机构，对于该会社所属子体企业单位的生产安全和保卫，要尽力作到万无一失。

从此所有伪满的属于重工业性质的工矿企业，就由“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一手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

垄断，并且为了这一垄断经济政策顺利进行起见，伪总务长官命令伪总务厅和有关部门，制定了“满洲重要产业统制法”，使东北民族工商业陷入破产和倒闭。

伪总务长官的作用

伪满政权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指导监督下，奉行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伪总务长官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策划、立法和推行者。

日本政府把它对殖民地所需要推行的某一政策，通过日本关东军来实行，由关东军通知伪总务长官，伪总务长官命令伪总务厅企划局和法制处，来拟定计划，制定法令，和关东军进行协商后，通过次长会议的决定，再经伪国务会议、伪参议府会议的形式，决定通过，由主管部门根据制定的政策法令制定出实施要纲和执行细则。或由伪总务长官根据伪满洲国的实地情况，需要实行某一政策时，即命令伪总务厅企划局和法制处拟定计划，制定法令，和关东军协商，和有关部门研讨，通过次长会议的决定，再经伪国务院会议、伪参议府会议的形式上通过，然后付诸实施。

例如，在农业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更多的农产物，供其国内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伪总务长官的命令下，伪满政府制定出“粮谷统制法”、“农产物交易法”、“粮谷管理法”、“棉花统制法”、“农产物管理法”等等法令，进行了无情的掠夺，使东北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其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伪总务长官的命令下，伪满政府制定出“军机保密法”，是为保守军事、军用物资等的秘密；制定出“国防保安法”，是为防止颠覆伪满政权和社会秩序；制定出“特别治安庭法”，是对于所谓“思想犯”进行秘密处理；制定出“思想矫正法”是对于所谓思想嫌疑者进行管制；制定出“保安矫正法”，是对于所谓无业游民加以管制；制定出“时局特别刑法”，是对于所谓不满时局的言行予以镇压等等。

所有以上提出的各种政策法令，都是在伪总务长官的命令下，由各主管部门和伪总务厅企划局法制处制定，经伪总务厅次长会议讨论和关东军的同意后，再经伪国务院会议、伪参议府会议后公布实施的。但也有的法令，只由次长会议决定通过后，不经伪国务院会议、伪参议府会议即付诸实行的，仅由伪总务长官在这两个会议席上作口头报告。

例如，1941 年 7 月 25 日所公布实行的《七二五物价停止令》，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华北地区进行侵略，为了掠夺更多更便宜的物资作军需品。这个法令就是由伪次长会议决定通过后，未通过伪国务院会议、伪参议府会议，伪总务长官仅在上述两个会议席上作口头报告、说明原因就算了。

伪满政权所制定的各种政策法令，是经过三个会议程序而产生出来的，在这三个会议中，伪总务长官是伪次长会议的主席，是伪国务院会议的首席成员，是伪参议府会议的成员。而在这三个会议中惟有伪次长会议有日本关东军参谋列席。本来在伪次长会议的成员中，规定的有关东军参谋长，因为公务忙，由主管伪满事务的关东军第四课参谋代理出席，这就明显地说明了伪次长会议的重要性。就因为伪次长会议是一个决定性的

会议，所以，非伪满政权组织内的成员、但却站在监督“指导”地位的关东军，一定要参加这一会议的。

伪协和会麻痹人民的实况

曲秉善

一、伪协和会的成立和它的主要沿革

伪协和会是在1932年7月25日成立的。当时的组织是在名誉顾问、名誉总裁、会长之下，设伪协和会中央事务局。名誉顾问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名誉总裁是伪执政溥仪，会长是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中央事务局在局长、副局长之下，设总务处、组织处、宣传处、审查处。局长是伪外交部长谢介石，副局长是中野琥逸，总务处长是于静远和小泽开策，审查处长是伪奉天市长阎传绂和山口重次，组织处长是伪国都建设局长阮振铎和纪井一，宣传处长是伪执政府掌礼官张格和永井亮仁。中央事务局还设委员和理事数人，由伪官吏和所谓知名之士担当，在各地从事募集伪协和会会员。这时伪协和会的主要工作是，在日本军对东北各地抗日人民进攻之后进行“宣传宣抚”工作。

1934年2月，伪协和会举办了第一次协议会，表示所谓“民意”，要求溥仪当“皇帝”。这时在各大城市逐渐设立伪协和会的地方事务局或办事处，其下设立以协和会会员组成的分会。由于伪满实行帝制，溥仪当了“皇帝”，伪协和会取消了“名誉总裁”。

1936年6月，为了强化伪协和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表声明说：“协和会不是政府的机关，也不是人民的团体，乃是唯一的帝国一致的政治的思想的教化的实践组织体。它与政府的关系，不是从属的，也不是对立的，乃是与政府表里一体的，政府的精神母体”。伪协和会根据植田的声明而制定出伪协和会的纲领，这个纲领称伪满“帝国协和会是唯一的帝国一致的政治的思想的教化的实践组织体，与政府表里一体，政府的精神母体。显扬建国精神，实现民族协和，彻底宣传达情。提高国民生活，完成国民动员，以创建道义世界”。同时将“中央事务局”改称为“中央本部”，将理事改为参事，并强化委员和参事的阵容，凡伪中央各机关的伪大臣、伪次长、伪总务厅的总务长官、次长、各处长，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第四课长以及特殊会社的理事长等都是伪协和会的委员或参事。在“中央本部”设总务部、指导部、监察部。“中央本部”长是于静远，总务部长是甘粕正彦，指导部长是古海忠之，监察部长是和田劲。在伪满各省市县都设立“省本部”、“市本部”、“县本部”，在“市本部”和“县本部”之下，设立地域分会和职场分会，分会之下设班。省本部在省本部长和事务长之下设广务科、指导科、辅导科或广务科、指导科。市本部在市本部长和事务长之下设广务科、指导科、辅导科或广务科、指导科等。县本部在县本部长和事务长之下设广务班、指导班、辅导班或广务班、指导班。分会在分会长之下设书记，班设班长。省本部长、市本部长、县本部长、分会长，有的由伪省长充省本部长，由伪市长充市本部长，由伪县长充县本部

长，由伪街村长充地域分会长，由职场长或干部充职场分会长，也有的另由专人充之。各级本部的事务长由“中央本部”任命调动，分会书记由主管市县本部任命调动，省本部、市本部、县本部都设有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凡25岁以上的男子，都算为伪协和会会员。伪协和会各级本部的一切费用都由伪满国库拨给，伪协和会分会的一切费用都由该会的会员会费充之，会员的会费每月为1元至2元。伪协和会的工作，根据伪协和会纲领由“中央本部”制定计划，指示各级本部执行。

1937年，伴随伪满地方行政机构改革，伪协和会在省本部、市本部、县本部都设副本部长，并实行二位一体制，即伪省长都是伪协和会的省本部长，伪省次长都是伪协和会的省副本部长，伪市长都是伪协和会的市本部长，伪副市长都是伪协和会的市副本部长，伪县长都是伪协和会的县本部长，副县长都是伪协和会的县副本部长，伪区长、街长、村长都是伪协和会的分会长。

1938年9月，伪协和会中央本部的组织改为总务部、实践部、辅导部、企划局。中央本部长是桥本虎之助，副本部长是伪电业总裁丁鉴修，总务部长是皆川丰治，实践部长是曲秉善，辅导部长是恒吉，企划局长是丰田敏治。

1941年5月，伪协和会中央本部的组织改为总务部、指导部、调查部、青年部。中央本部长是三宅光治，副本部长是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和皆川丰治。总务部长是管原达之，指导部长是王子衡，调查部长是坂田修三，青年部长是解良武夫。

伪满协和会组织与伪满政府狼狈为奸，对东北人民进行监视、欺骗、奴化、奴役和掠夺，推进殖民地统治的一切残酷政策，以及贯彻灭亡中国、反苏反共的政策，被东北人民称为“蝎虎会”。

二、伪满的协和会运动

所谓协和会运动，就是根据伪协和会的纲领，组织各种活动，对东北人民进行监视、欺骗、奴役和掠夺，推进殖民地统治的一切政策。

（一）显扬“建国精神”

什么是伪满的所谓“建国精神”。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是：“建设王道乐土，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他们进一步解释说：“满洲由于军阀长期盘踞，施行暴政，民不聊生，现在军阀已被日本军打走，要在这块土地上建设无苦无忧的王道乐土。新国家是要消灭在军阀执政时期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要实现各民族只有亲爱、没有冤仇的民族协和。日满的关系不仅是同文同种近邻，而且满洲国建国的由来和给与满洲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军事的援助，甚至日本为了承认满洲国而退出国际联盟，所以日满是必须亲善的。”1935年，在溥仪第一次访日并发表《回銮训民诏书》后，日本解释日满关系为“一德一心”的关系。即溥仪在他的“诏书”里所说的：“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应与日本一德一心。”并将所谓“建国精神”中的“日满亲善”改为“日满一德一心”。1940年在溥仪第二次访日后发表《国本奠定诏书》后，日本侵略者将日本的“天照大神”作为伪满的“建国元神”，将“国本奠于唯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作为所谓“建国精神”的主要内容，强调必须崇敬“天照大神”，对“天照大神”感恩报德，对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尽忠尽孝”。伪协和会的会务职员就拿上述说法在各分会向人民大肆宣传，凡集会都必须向“建国神庙”遥拜，向日本天皇住所“皇宫”遥拜，向溥仪的住所“帝宫”遥祷，凡行至日本神社前必须止步或下车对“神”敬礼，又组织所谓“奉仕队”到建国神庙去“勤劳奉仕”。伪协和会在它的纲领中“显扬建国精神”，制造舆论，开展运动，用以麻痹人民，其目的就是摧残东北人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妄想使东北人民在太阳旗下当顺民。

（二）实践“民族协和”

日本将“民族协和”作为伪满所谓“建国精神”的构成要素之一。日本侵略者对于所谓“民族协和”的解释为“各民族相互协和”，将日本入侵东北说成是为了帮助“满洲”建设“王道乐土”，功成之日即“返回”日本。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于日本的侵入东北又说成是“日本人是满洲国构成民族之一。满洲国是由日鲜满蒙回五个民族构成，各民族应相互协和”。1939年的春天，伪协和会中央本部企划局局长丰田敏治在委员会上公开提议说“民族协和须有中核，日本人是满洲国构成民族中的重要民族，日本人富有协和精神，其他各民族应以日本人为中核，向日本人协和”。参加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的日人和汉奸们都赞成他的说法。从这以后，对于“民族协和”的解释就改口“以日本人为中核，各民族都应向日本人协和”。伪协和会的会务职员经常拿这种说法在各分会向人民宣传。并在“问事运动”中时常用“民族协和”的词句迫使农民给日本开拓团从事劳动和供给物资。例如吉林韩登举后人的矿产权被日本侵略者霸占，这个纠纷很久未能解决，终由伪协和会通过“问事运动”用“民族协和”的词句，迫使韩登举的后人忍受巨大的损失而算了事。桦川县日本千振开拓团的伪协和会和桦川县日本弥荣开拓团的伪协会经常用“民族协和”的词句唆使日本开拓团对当地农民进行压迫奴役，给日本开拓团盖房、修房、种菜等。并迫使在日本开拓团附近居住的农民将蔬菜、鸡蛋、猪肉和柴草等“送给”日本开拓团。1945年春天，伪满的殖民地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伪协和会大肆宣传“日满民族协和”，每个民族的人都要交一个异民族的“朋友”，要相互“援助”，作为伪协和会运动在各地推行。伪协和会在它的纲领“实现民族协和”的项目中，搞“协和会运动”，用以麻痹人民，其目的就是妄想使东北人民听任日本的掠夺奴役残害和侮辱，甚至在其将要被打垮之前，还妄想让东北人民保护他的敌人。

（三）彻底“宣德达情”

什么叫作“宣德达情”？拿日本侵略者的解释说，宣德就是宣扬“满洲国”的“德政”躬行实践，达情就是表达下情说出心里的话。“满洲国”的政治不是专制政治，也不是议会政治，乃是独创的“王道政治”。这个王道政治的精髓，就是“宣德达情”，宣德达情的机关就是“联合协议会”，伪协和会市本部和县本部的事务长和会务职员经常到所属分会去进行“宣德达情”工作，宣传伪满政府的各种政策，要求人民照样去做。同时要求人民表达下情，说出心里的话，为此他们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又表

现出一个诚恳的态度对人民说“协和会是你们的母亲，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对我说，我一定给你们解决。”可是当人民讲出一些问题时，他们就将人民所讲出的问题，编制成为情报，通过上级本部汇集到中央本部的总务部，又分别转送到伪总务厅弘报处、日本关东军情报局、日本宪兵队等处，作为伪满政府、日本关东军、日本宪兵队等活动的根据。伪协和会为了引诱人民加入协和会，藉以达到“宣德达情”的目的，而在各本部进行“识字运动”和“问事运动”。有时，伪协和会故意装出与伪政府对立的态度，表示反对伪政府的政策，藉以引诱人民表达下情说出心里的话。所谓“联合协议会”每年都开一次，先由市本部、县本部举办市联合协议会、县联合协议会，再由省本部举办省联合协议会，最后由伪中央本部举办“全国联合协议会”。“联合协议会”是由议长、副议长、书记长、协议员组成的，协议员又分为政府协议员、会务协议员和分会协议员，议长和副议长由各级本部长、副本部长或委员担当之，书记长由省市县本部的事务长和中央本部的部长担当之，政府协议员是由伪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派去的负责人，会务协议员是由各级本部指派的负责人，会员协议员是由省市县本部的事务长从会员中指派的。“协议会”的开会程序，先由伪协和会会长训示或读伪中央本部长的训词，次由伪政府的负责者说明当年的施政方针和伪协和会本部的负责者说明当年的会务运动，在这以后就进行议案的协议。特别是在“全国联合协议会”开会的第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皇帝都来到会场接受参加者的敬礼。关于议案的协议先由提案分会的协议员或提案的市县省协议员说明议案，次由有关的伪政府议员或会务协议员作答辩，然后进行协议，伪议长综合协议的经过作出决议，全体伪协议员即鼓掌表示赞同。关于议案的作成，都是市县本部的事务长或省本部副事务长授意分会制成的或由他们直接制成的，“会员协议员”对于议案的说明和发言，都是在事先由主管事务长授意并给予一定的范围限制，在这范围内发言，如果说错了日后就要受斥责，若是说出与要求相反的话，日后就要被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调查或逮捕。伪市县联合协议会、省联合协议会、全国联合协议会三者的关系是：在伪市县联合协议会上未能解决的重要议案都提到伪省联合协议会去协议，在省联合协议会上未能解决的重要议案都提到伪全国联合协议会去协议。伪协和会之所以制造出所谓“宣德达情”的机关——联合协议会，并年年举行之，就是为了推进伪满的各种残酷政策而进行麻痹人民的“宣德”，为预定施行的毒政制造前提根据。例如，在我充当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实践部长期内，1938 年的“联合协议会”，伪满政府主要地宣传和推进了当时所谓“三大国策”，即：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开拓政策、北边镇护，以及推行新学制、鸦片十年断禁政策等，伪满政府将这些政策说成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协议的议案主要是关于劳工问题，关于收买开拓用地问题，都市建设问题，兴办学校问题，断禁鸦片问题等。所谓“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东北为其投资场所和廉价原料产地、奴隶劳动力的来源地、商品销售市场、军事工业基地，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开拓政策”，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东北为其农业原料和食粮的基地，准备进攻苏联，消灭抗日力量，巩固伪满的殖民地统治和保卫日本在东北的企业，而向东北移入大量的日本人，掠夺农民的土地。使抗日力量受打击，使苏联受威胁。“北边镇护”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东北为其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在东北与苏联接壤的地带，修筑军用道路、军事要塞、碉堡、地上和地下飞

机场，修建兵营、仓库，驻屯大量日本军队。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被迫去做奴隶劳动，由于沉重的奴隶劳动和残酷虐待，以及为了保密，竟将劳动人民活埋，死在这种悲惨情况下的善良劳动人民不知有多少人。“新学制”，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奴化和奴役东北青年学生，摧毁他们的民族意识，使他们在太阳旗下当顺民、奴隶，而降低教育质量，加强奴化，加强奴役。“鸦片十年断禁”政策，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毒化东北人民和加强掠夺东北人民的财富，而于 1937 年 10 月在伪国务院总务厅组成以总务长官星野直树为中心的“禁烟促进委员会”，制定了所谓“鸦片断禁方策要项”，规划出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政策”。1938 年 1 月又用伪国务院训令组成地方的“禁烟促进委员会”，以后就用这个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做烟幕，来扩大罂粟的栽种面积，增加鸦片和吗啡的产量，强化贩卖鸦片吗啡的机构，实行鸦片瘾者记录，增加鸦片收入。这个政策使千千万万的人变成鸦片中毒者，倾家荡产死于非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1939 年的“联合协议会”，伪满政府主要地宣传和推行了“兴农合作社”、“劳工供出”、“粮谷出荷”、“国兵法”等，伪满政府对这些政策都进行了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的欺骗说明，所协议的议案主要是为了掩盖这些政策的实质，或者为了这些政策的顺利进行，以及为施行这些政策制造前提条件。如关于兴农合作社问题、劳工汇款问题、劳工供出问题、取消粮栈设立交易场问题等，实质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东北为日本的农业附庸，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而特将其在农村设立的金融组合和农业生产组合合并起来，成为兴农合作社，用以控制农村的经济和农业生产，并掠夺农民的农产品和金钱，使东北广大农民陷于破产和贫困，饥寒交迫，大批死亡。“劳工供出”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其在东北进行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开拓政策”、“北边镇护”等对劳动力的需要，而强迫东北劳动人民做奴隶的劳动，这个政策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奴役，在苛刻的条件下给日本殖民者做沉重的劳动。“粮谷出荷”，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掠夺东北农民的粮食，而取消粮栈，广设交易场，禁止粮谷的私人买卖，指定农民将一定量的粮食在一定的时间内送到交易场去，由粮谷会社将它运往日本。这个政策使东北农民劳动终年的果实白白被夺去。“国兵法”，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和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实行用中国人镇压中国人，用中国人打中国人政策而公布的，强征年满 20 岁的青年人伍充当伪满国兵，用以镇压东北人民，打击抗日力量，并参加对中国内地的侵略战争，充当镇压自己的同胞、打自己同胞的炮灰。

1940 年的伪联合协议会，伪满政府对于“经济统制”作了欺骗的宣传，硬说实行物资配给制是为了安定人民的生活，所协议的议案也是配合这个政策的实施，“协议”了“关于物资配给”的问题，为这个政策的实行开辟了顺利的途径。“经济统制”，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用东北的人力、物力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进攻和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而于 1937 年公布“七二五”物价停止令，开始“经济统制”，又于 1940 年实施“物资配给制”，发给配给帐，不许人民买卖吃穿使用，这个政策使东北人民贫困破产、饥寒交迫，失去生活的条件。伪协和会在它的纲领“彻底宣德达情”的项目中，制造那些胡说和活动，以及利用伪协和会运动与举办联合协议会，用以麻痹人民，其目的就是为了推进殖民地统治的各种残酷政策和监视控制人民的思想与行动。

（四）“提高国民生活”

伪协和会以“提高国民生活”为招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会运动”，其中主要的有“识字运动”、“问事运动”、“富家强国运动”、“禁烟运动”、“爱护资源运动”、“低温生活运动”、“扶助中小工商业运动”、“援助贫雇农运动”、“健全生活运动”等等。所谓“识字运动”，是以教给人民识字扫除文盲为名，与人民建立关系，藉以达到伪协和会不可告人的秘密目的。所谓“问事运动”是以所谓解难答疑、代写书信、调解纷争等为幌子，诱人民接近伪协和会，出入伪协和会，伪协和会通过这个手段与人民建立关系，刺探人民的思想，监视人民的行动。又利用调解纷争，帮助日人霸占中国人民的财产和强迫中国人民忍受日人的欺凌和侮辱，并袒护地主、土豪劣绅，欺压劳动人民，横行霸道。所谓“富家强国运动”是以“节约物资”、“储蓄报国”、“努力生产”为其主要内容，藉以掠夺人民的物资金钱和劳动果实。所谓“禁烟运动”，是以宣传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政策为主要活动，使伪满政府得以在这个欺骗的禁烟烟幕的掩盖下，逐步加强毒化人民、掠夺人民财富的狠毒政策。所谓“爱护资源运动”，是以爱护资源为号召，奖励将所谓“不用的”各种物资送到伪协和会市、县本部去，而伪协和会的市、县本部则以物资收回为藉口，将它给与日本侵略者利用，即变相的掠夺。所谓“低温生活运动”，是以“节省用煤”、“协力战争”为号召，强调虽在严寒的冬季里，室温不超过摄氏十度，通过这个运动将东北的煤大量运往日本。所谓“扶助中小工商业运动”，是以所谓扶助为名，来控制东北中小民族工商业，使之变成日本企业的附庸，藉此达到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摧毁东北的民族工商业的狂妄企图。所谓“援助贫雇农运动”，是以所谓援助为名，强迫贫农和雇农在封建地主的极端残苛的条件下从事粮食生产，藉以维护封建地主对贫农和雇农的压迫与剥削，并藉以确保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掠夺的粮食量。所谓“健全生活运动”，是以“敬神崇孔”、“奉公守法”、“民族协和”、“勤劳生产”、“节俭储蓄”为其主要内容，其实质则是，以敬神崇孔的宗教迷信思想和封建思想，来麻痹东北人民的思想和摧毁人民的抗日意志；以“奉公守法”来迫使东北人民屈服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奴役，守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之法，在太阳旗帜下人人当顺民；以“民族协和”来迫使东北人民忍受日本的残酷蹂躏、掠夺、奴役和侮辱；以“勤劳生产”，来强迫东北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做奴隶的劳动，生产出它所需要的东西，听任它的掠夺；以“节俭储蓄”来强迫东北人民忍受饥寒，将自己的物资和金钱献给日本帝国主义。伪协和会在它的纲领“提高国民生活”的项目中制造出那些“会运动”，用以麻痹人民，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东北人民的生活陷于愚昧、贫困、疾病，终日啼饥号寒，失去生活的条件。

（五）“完成国民动员”

“完成国民动员”拿日本侵略者的话来说，就是要完成伪满的“动员体制”，伪协和会的电纽一按，全伪满的人民都能行动起来。为此伪协和会将25岁以上的男子都算为协和会会员，将妇女都算为协和会的外部团体——“国防妇女会会员”，将从10岁到14岁的小学生组织成为“协和少年团”，将从15岁到19岁的青年学生组织成为“协和青年团”，将都市从20岁到35岁的男子组成“协和义勇奉公队”。按当时日伪发

表的数字是："协和会"会员750万人，"国防妇女会"会员750万人，"协和少年团"40万人，"协和青年团"30万人，协和义勇奉公队10万人。伪协和会对这些组织经常进行奴化训练和奴役。例如对"协和会"会员，伪协和会市、县本部经常派人到分会进行奴化的宣传讲演，又任他们去"慰问"日本军队和伪满军队，并迎送日本兵的遗骨，还使他们进行防空演习。对"协和少年团"、"协和青年团"是伪协和会作为"青少年运动"而进行的。为了奴化青少年的思想，特发行"新青年"杂志，并至各地设立"青少年之家"，又发给"团旗"，还实行军事训练和进行奴役；对"协和义勇奉公队"，伪协和会市本部经常召集他们，使他们听讲话受训练，使他们担任都市防空并协助伪警察整理交通，做为警察的助手，以及服各种劳役。伪协和会为了奴役进入这些组织内的人，而制造出"勤劳奉仕"（即献劳动的意思）的办法，迫使上述那些组织内的人，去到日人占的工厂、矿山做奴隶劳动，去到伪皇宫和"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做奴隶劳动，还于1939年从伪满各地逼来150名青年组成勤劳奉仕队，由中央本部辅导部科专高元良率领，到日本的神宫去给日本人修庙，经过三个月时间才返回伪满。伪协和会为了伪满的防空巩固，时常命令各都市分别进行防空演习，使协和会女会员——"国防妇女会会员"、"协和少年团"、"协和青年团"、"协和义勇奉公队"都参加，由中央本部长或中央本部的部长率人去检阅。伪协和会为了演习国民动员，而在1940年5月举行了第一次"国民动员大会"，在"新京"市公署前广场，集合了市内的"协和会"、"国防妇女会"、"协和少年团"、"协和青年团"、"协和义勇奉公队"等三万多人，当伪满皇帝溥仪来到会场登上两丈多高的高台时，齐向溥仪行四十五度的最敬礼，在溥仪走后，伪协和会会长张景惠登上高台致词，要求人民"要在协和会的统率下完成国民总动员的体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奋斗"，并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大满洲帝国万岁"。在张景惠走下台后，参加者即列队受伪协和会会长、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检阅。1942年5月又在"新京"举行了第二次"国民动员大会"，表示对伪满建国十周年的庆祝。伪满各地方也相继举办"国民动员大会"，表示"国民动员"业已完成。伪协和会在它的纲领"完成国民动员"的项目中，制造出那些国民组织，进行的活动，用以麻痹人民，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东北人民带上枷锁，以便进行监视、奴化、奴役，以便进行操纵和驱策。

（六）"创建道义世界"

伪协和会的最后使命是"创造道义世界"，它主张"实践"上述的五项纲领来实现道义世界。1938年7月，曾在西广场"满铁"会馆举办过德意日等"六国同盟排共大会"，大会通过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桥本虎之助宣读的宣言。宣言里说"共产党破坏世界文明，扰乱世界和平，协和会以协和万邦之精神，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它赞成法西斯匪徒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活动，将派所谓经济使节团，以韩云阶为团长，到欧洲去访问德国和意大利，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勾结。它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和日本军阀、政客声称的"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它也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太平洋侵略战争，它于1938年派以伪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为团长，到华北去慰问日本侵略军，并在每年的"全国联合协议会"都以"联合协会会"名义，给日本陆军

省、海军省去电报祝贺侵略战争的胜利。它又以支援日本侵略战争为号召，展开了“金属献纳运动”、“献纳飞机运动”、“国防献金运动”等。伪协和会制造出“创建道义世界”的胡说，并进行这一连串的活动，用以麻痹人民，其目的就是为了创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世界。

（1962 年）

狠毒至极的“保安矫正法”

董孝友*

伪满“保安矫正法”大约是从1944年夏季开始施行的。施行“保安矫正法”当时社会背景是这样的：伪满政府已经成立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当中，犯罪被处徒刑，期满获释的前科犯人为数不少，这些人被释放出狱后，大抵没有正当职业，往往流浪街头。日本统治者认为这些人容易滋生是非，扰乱社会治安，这是一种“付保安矫正”的对象。伪满吸鸦片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发给鸦片吸食证、准许吸食的，一种是没得到鸦片吸食证，不许吸食的。这种政府不许吸食的鸦片瘾者，往往是要私买鸦片吸食。私买鸦片和私吸鸦片，都算是犯法，触犯鸦片法的规定。而这种违法犯人，因为长期吸食，长期私买，所以往往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反复复地违犯“鸦片法”而受处罚。犯案既多、时间既久，当地警察对这些人都很熟悉了，一声令下，要抓保安矫正犯人了，这些违法吸食鸦片的人就倒霉了，往往要被抓而去。这是“付保安矫正”的第二种对象。第三是无正当职业，而经常在街头浮浪，容易紊乱社会秩序，也要被抓。这是第三种对象。此外还有许多，就按着矫正法规定“付保安矫正”的对象，约有十几条，就是有十几种人。前面说过的三种人，是主要对象。也就是“付保安矫正”的大多数属于这三种人。这三种人往往又都是贫困无告，饥寒交迫，携儿带女，身体羸弱，一句话，是受侮辱损害的阶层。

伪满末期，日伪统治者对这些人已经乏于统治之术，而这一阶层的人又相当多，而且逐渐多起来。所以才想出这种恶毒的法子。

这项法令和其他法令一样，由伪政府制定，由伪检察厅执行。

组织机构是在长春成立“矫正总局”，隶属于伪司法部，下设“辅导院”。检察厅将付保安矫正的犯人统一集中在辅导院，受到一定期限的矫正教育，统治者认为可以释放了，就放回去。或者到矿山森林无偿劳动，而矿山也好，森林也好，大抵都是气候恶劣，交通不便，劳动又特别累，吃的、穿的、住的等等生活条件极差，所以到那里十之八九是要饿死、冻死，或者累死的，得以生还者十无一二。

执行“保安矫正”的程序是先由警察到市内街头去抓，或者就到犯人住所逮捕。抓来之后，简单地讯问一遍，作成讯问笔录。在市内大街往往是隔十天半月抓一批，或者连续的遇见可以付保安矫正的就捕起来。警察署抓来一二十人，或者三五十人，或者是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连同人犯记录，一并送交当地检察厅，或者是通知检察厅，检察官去到警察署讯问。检察官再按着警察署讯问时的所作的笔录，简单的讯问一遍，再

---

* 作者曾在伪满洲国司法部门任职。

作成笔录。不合于交付保安矫正的，就具结释放，合于保安矫正规定条件的，就在当天交付保安矫正。检察官讯问过后，和其他办案手续一样，拿着这些案件的记录，去到日本检察官或日本人次长那里去请示，日本主子说放就放，说付就付，检察官本人无自主之权，付矫正与否，一切决定于日本统治者。而警察署逮捕交送检察厅者，十之八九是要付保安矫正的。放的不用说了，当然是如鱼入水，欢喜非凡，而付矫正的就只好统一汇总人数交到矫正辅导院。从此抛家舍业，骨肉离散，或者竟身死他乡，葬身异域，凄苦之情，可以想见。

被付矫正的人，比普通刑法犯罪者更可怜。被付矫正的人，一经被抓，即失去了人身自由，始终被关在监狱里，哪有上诉的机会？不许上诉，是矫正法残酷的第一点。其次，被付矫正，有没有确定日期，期满可以获得自由呢？在记忆中，似乎是没有期限的。那么被付矫正的人，比什么罪犯都苦，岂不等于死刑或无期徒刑了吗？这是矫正法残酷至极的第二点。还有，一般刑事犯罪，都需要有一定的与罪件相符的佐证，矫正法犯人则只是一纸空文，除前科犯者，或者在记录后面附有前科照含者外（也有没附前科照含的），其他类矫正犯人，完全是口头供述。因而被付矫正的人，很难说是冤枉与否了。只要被抓，就只有断送生命一条道了。这是矫正法残酷至极的第三点。

有此三点，则足以荼毒尽天下之生灵，离散尽天下之子女。

笔者在长春地检时期，到警察署办理过此类案件。一同去四五个检察官，每人讯问四五个至五六个犯人，讯问过后，就到日本人检察官那里去请示，大体是都要付矫正的。所以根本谈不到什么侦查和搜查证据。每一个犯人只是讯问二三十分至三四十分钟，然后就在印就的有固定格式的书面上写上被告的姓名、年龄、住址、籍贯等等，然后，在最后写上“右者付保安矫正”或“不付保安矫正”就可以了，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

因此，办案的过程是极其简单的。

记得大概是在长春吧，当时我到警察署去办这类案件的时候，曾到拘留这类犯人的场所看过。时候正是冬天，东西两个大屋子，炕上地下乱七八糟地坐着的都是这类犯人，他们正在吃晚饭，因为当中过道就是厨房，所以东西两屋内，满是烟气。屋子没有窗和门，或者有窗而无纸，所以屋子里还是相当冷的。犯人们的穿着自不必说，褴褛已极，胳膊、大腿、肩背等等地方，还都在外面露着，有的衣服破的已经不成衣服，简直可以说是布条子。一个个面上沾满了泥垢，都已麻木，没有什么表情了。我们见了，心中凄凉得很。当时还不知道他们付保安矫正以后的去向，只是见到那时的情景，就已经够凄苦的了，下面还有更苦的劳役在等待他们，他们将何以生存呢！

伪满“涉外”史料琐忆

宋　淇　涵*

本文十分之九是根据我亲历甚至亲办的事项按时序写出的，因受此局限，追溯补遗，致稍有前后颠倒之处。大标题加一伪字，其余都采取当时通用的名称以符实况。伪满14年所谓的“外交”案件繁多，自己仅知片段，惟对铁路、移民、法权等重大事项都详加论述。自愧失节，也可兼作自白。

一、承认伪满洲国的面面观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捏造“东北军的一部破坏奉天城北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北大营的军队在王以哲的指挥下向日本守备队袭击，日军应战”① 一套诡计，炮声隆隆。次晨日军占领奉天，各机关首长纷纷逃匿，政权崩溃，就造成九一八事变。这时候张学良在北平，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令东北军队全撤至关内，专靠向国际联盟提诉制止日本，9月21日中国向国联事务局正式提出抗议书。10月26日，日本政府阐明直接交涉基本原则的态度，积极酝酿创造“新国”。1932年2月18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对中外发表“独立宣言”，3月7日“满洲国”正式建国，3月12日对17个国家通电“新国家成立”。9月15日，日本发表声明书“承认”“满洲国”“独立”。② 关于“独立”的各种见解在篇末逐条驳斥。

国联调查团入满

国联接受中国申诉，迭次劝告日军撤退至附属地内，日本毫不理睬，惟言直接交涉以推却。1931年11月10日，国联决定派遣调查团到肇事地点，由英、美、德、法、意五国委员组成，以英人李顿为团长③，携带交通、财政、军事、法律、教育等专家及秘书、翻译、记者共30余人，于1932年到东京，追问日本在奉天发难的缘由及善后办法，嗣到南京与中国政府要人交换意见，继而到北平观察华北动向并参观中国人冲破险峻自修的京绥铁路。为传达方便，中日两国各派参与员一人与调查团同行，中国派顾维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国驻绥芬河、驻山海关“外交办事处”处长。

① 关东军制造爆炸后，由事先埋伏的日军进攻北大营，中国军队奉命“不抵抗”，最后迫不得已，边打边撤。当时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并未在北大营内。

② 日本于1932年9月15日发表承认伪满洲国的声明书。

③ “国联”于1932年1月20日组成以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

钧，日本派有田大使，在南京、北平备受宾礼待遇。正准备东上日本，自奉天来电称：“中国参与员到附属地外对其身体安全不负责任。”日本以恫吓手段阻止中国参与员前往，意在等他到后以严加保护为名断绝他和当地人接近。调查团极端愤慨，向国联请示行止，日内瓦复电斟酌现地情况自决。最后商定行程，于4月20日到奉天大和旅馆，发一声明申述调查团来此的使者，并谓接受当地官宪的招待不是承认“满洲国”——为报告书的最后建议安根。

日本派许多便衣队包围大和旅馆，同时召集农、工、商、学等各界“代表”，加以周密训练，让他们去见调查团痛陈“恨怨张家苛政”，“切愿脱离苦境”，“建一独立自由的新国”等语。正直勇敢的人随大帮退出后单独去翻案：“前言非我本意，全由日本人强迫我那样说的。”委员随员四出暗访，出没神秘，致特务无法跟踪。调查团在奉、吉、黑各地共接1504封信，其中两封欢迎日本，其余一片控诉声，殷殷眷恋祖国，誓死不作异族的奴隶。中外文字都有，在奉天接得较多，一部分从邮局送递，大部分由领事馆转达，调查团认为这是足以代表真正民意，报告书叫作“一千五百接书”，……“自有其合理之不平鸣”。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简称《李顿报告书》。大致说来，英、美同情中国，因他们在华的利益将逐步受到损害。德、意有些袒日，法委员不偏不倚暗中倾向英、美，李顿又任团长，结局是英、美的主张占比重较大。

我对报告书在此不加评议，只摘要举例。日本诬赖中国军队拆毁柳条湖附近的铁路，报告报书下一判语云：“无害南下列车的准时到站，不足据为引起国际战争之理由”。漏洞穿破，遁词立穷。又如关东军下令禁止日本军人干预各项政治活动，装腔作势迷惑人眼。报告书的结论云：“若无日本军人在场，即无‘满洲国’的出现”。干脆响亮，透入心脾。另一方面，全书的大部分叙述赖他们的使领馆供资料，限于列强的传统贪欲，自然有睥睨中国人新警觉之处。特别是最后建议，名义上把东北交还中国，实行国际共管，不惟严重地违反中国人收复主权的渴望，日本也不肯轻自退出独占的舞台而贬为股东之一，在法理上事实上全行不通。调查事毕，商讨编纂，用英文成节于1932年9月30日，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处同时发表。10月21日，日本派松冈洋右为出席国联大会的全权代表而渡欧，与顾维钧舌战七八回合，理屈词短。于1933年2月24日，日本退出国联①，从此不畏人言，一直蛮干到底了。

萨尔瓦多承认满洲国

1934年5月萨尔瓦多承认“满洲国”②。它的主要目的在出卖咖啡。用大箱运来，该国无侨民在满，“外交部”委任官以下替它包装咖啡三四天，还有几个青年给它外出推销。大家笑着说：“各国都像这样来承认，外交部员变为洋商店员了”。

“满”华通车

九一八事变后，北宁路照常通车。1932年1月7日奉天至山海关的铁路与北宁路

---

① 1933年3月27日本退出“国联”

② 萨尔瓦多于1934年3月3日承认“伪满洲国”。

分立改名奉山路，阚铎任局长。车至山海关为止，次晨再换车西上，入“满”的旅客也同样住一宿。旅馆不能容纳，多有露宿者，乘客太嫌麻烦。1933 年 5 月 31 日，《塘沽协定》的附带事项涉及及早实行通车。但那时双方隔绝，政府方面不便出头商洽，1934 年日人在大连召开会议创立东方旅行社，双方代表在山海关东方宾馆商定细目，7 月 1 日奉山与北宁两路开始正式通车。

是日由北平开往奉天的第一次直通列车，行至茶淀站稍西地点，车上炸弹爆炸，女学生宋龙舟登时丧命，还有少数受伤。直通列车对中国旅客诚多方便，但为日本人大量进入华北和军运车直冲关内创造了有利条件。旅行社的业务是出卖车票，哪能代表政府执行交通政策，高悬一幅掩面布来巧弄双簧。置弹人怒气腾腾，若放在头等车厢上炸死几个侵略者该如何大快人心！置弹人的智慧未能及此，总是屡试未遂。轰然一声不仅日本人闻之耸肩咋舌，正在萌芽的冀东、冀察附逆分子也十分胆颤心寒。

与此相类似的一事是实行通邮。九一八的次晨日本占领奉天军事、政治、财政等机关，惟邮局接收较晚。奉天邮政管理局长巴里第效忠职务，供给调查团方便很多。以后奉南京之令所有奉、吉、黑邮局职员一律撤至关内分发各地服务。日人以新员补缺，这时发行了“满洲国”邮票。“满”华双方的信件邮至山海关私人处托他换贴邮票，无亲友者感受寄信困难。经双方商妥特印一种不带“满洲国”字样的邮票，叫作通邮专用票，共两种图案，一是山水风景，一是高粱花。“满洲国”定高粱花为“国花”，追根清底，还是摆出一座迷魂阵。

“通车”“通邮”演出国民党反动当局默认“满洲国”存在的前奏曲。

“满洲国”护照签署

1935 年 6 月，“外交部”制成“满洲国”护照，让我假扮商人往西贡、海防、新加坡、火奴鲁鲁（檀香山）等地贸易，分赴奉天法、英、美三国领事馆签署。我先到法国领事馆，法领事克瑞班毫不思索地在护照上签署，贴上印花后我急速辞开转赴英国领事馆，按法领事的先例让他签署。他问我有多少资本，贩运何货，可见英国人喜欢和人做生意。随之他答称：“我们不能签在原照上”，他在另纸上签署。又转赴美国领事馆，用法领事的签署幌动而隐藏英领事所发的另纸。主管人一见愕然，两分钟后他持照入别室商量，出而告我：“你须自写一张申请书，应找一个现地著名商号的商人来证明你确是营商才可”。我邀同洪顺茂丝房三号经理王佩伦去作证，询问几句后用另纸发给签署。我回“外交部”复命。当局分别通知各部院以法领事在本国所发护照上签署就是承认“满洲国”，英、美虽签在另纸上，允许“满洲国”人入境，也是大半承认。法领事办事粗疏，自应受其本国政府的责斥；而伪外交部大肆宣传，藉此小事以提高国际地位，也有点自涂粉黛，我也作了讹赖者的帮凶。

英国商务调查团入满

1936 年 9 月，英国商务调查团一行 10 余人包括纺织业、机制业等到“新京”（长春）。在大和旅馆发出声明：“一行之来纯为商业，不涉政治”。他们逗留 10 余日，商订了一些贸易事项。

在绥芬河的对苏交涉

1937 年 2 月我充驻绥芬河“外交办事处”处长，那时海参崴至绥芬河停止通车，已无外国人入境。办事对手方只是苏联领事馆，只限于现地小事，而较大事项由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和北满“外交特派员”施履本商洽。绥芬河苏方所提出的交涉不外油槽车问题、华语教师问题（苏联馆员学习汉语不能自聘教师须经日方推荐）、领事馆前高冈上日军设岗向院内窥探、馆员外出有人在身后尾随监视等项。关于以上苏领事屡次向办事处抗议，绥芬河有日本领事馆和日本特务机关，他明知办事处无解决此事的权力，惟以地域关系，不能不来追问这个高等传达。办事处向苏方要求的几乎全是放还越境者问题。市外 5 华里三道洞子即是国界，无铁丝围或其他障碍物隔离，乌蛇沟一带放牧人、砍柴人不知不觉地越过边境被哨兵扣留，办事处向领事馆口头一要就给交还，勿须争辩。7 月间苏联领事馆自动封闭，关于运送行李和看管大门的人选又生出层层波折。苏联领事郭鲁普措夫精通英语，在欢送宴上我对他道：“希望你到旁处升任总领事。”他答：“我不想升官但愿早离开此地。”张鼓峰事件后日军饱尝滋味，“外交部”曾秘令言行上避免刺激苏联，但如上所述又生些微细枝节。从前是“满”苏二对二互设领事馆，“满”在赤塔、武市（海兰泡）各一，苏在哈尔滨、绥芬河各一，绥芬河领事馆封闭只剩二比一了。绥芬河为国境地带，在此前一二年一般旅客至牡丹江为止，无特殊许可者不能达到国境，以后稍松。绥芬河街外有两座炮台，相距三里，据说地道相通，行人不准接近。

对山海关法国兵警的交涉

1938 年我调任驻山海关“外交办事处”处长，4 月下旬驻山海关南海沿法国兵营准备在长城外海岸平地上实弹射击，埋插标桩。山海关日本特务机关长和“外交办事长”闻讯后去公函阻止。法队长宣称：“依据 1901 年条约，关系国有在山海关驻兵权，就有演习权，旁人不得枉加干涉。”日方则谓自“满洲国”成立，长城以东变为“满洲国”领土，中国对外的旧条约一律失效，因而不准外国人在境内武装演习。法队长态度强硬，扬言我这 200 多人宁肯全部牺牲也不屈服，加紧备战。日军以压倒的优势重重包围。我被派同村上到意国（意大利）兵营，申说轴心国应友谊互助，若日、法两军开火请其守中立。意队长全盘应允。在情势紧急之下，驻京法国公使馆高级武官驰往山海关，力戒法队长轻举避免眼前吃亏，事遂平息。

“通商代表部”的设置

通车通邮到通商，乃“满”“华”逐步接近的自然发展。1937 年 12 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① 成立。1938 年 7 月伪满洲国在北平设置“通商代表部”和天津、济南设

① 1937 年 12 月 14 日在北平成立的所谓的“临时政府”是日本在华北地区拼凑的汉奸傀儡政权。

“办事处”。[1] 生松净为代表。“代表部”一行到达北平时，伪临时政府外务局关科长等迎至车站并陪送至六国饭店。伪代表部租定中南海静谷办公，伪外务局局长杨廷溥正式往访。伪代表部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披露宴，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首席，伪各部院首长及“中”日有关方面人员约百人出席，生松净致词，我汉译，王克敏答词，香槟祝杯全用外交仪式，满露出承认意味。伪临时政府派周珏为驻伪满洲国通商代表，伪临时政府的重要典礼都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祝词。

伪满洲建国后，怕有信不住的人混入活动，防范极严。事变以降逃入关内的人士久离乡井，探亲访友望眼将穿，必须持有日本外交或军事机关的介绍信才能放入。一般人哪能办到？“代表部”开设以发给“入国证”为中心任务，领证人蜂拥而至，平津两处初发时每日近百份，无暇一一详询，只具备机关或相当保证即照例发给。人多情急中下级承办员司有勒索情事。持证到山海关由伪国境警察检查盖印通行无阻。联合准备银行与伪满洲中央银行币制不一，山海关站上设立兑换所限额换给，海关吏验货上税，有时防疫所验病，车停40分钟，闹得手忙脚乱。身临其境，才体会到“过关”二字。

对外国人护照签署和发给运货证亦常有之。日本人处处着意争取承认“满洲国”。英国公使馆往奉天运货来函上款 To all whom it may concern，生松表示不露出“满洲国”字样，咱不给他办。英人坚决要求，我对生松解释“致有关方面”为西人函件所恒见，推迟几天才发给他。

除上述职务外，宣传“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满一德一心”。平津方面加强对轴心国的好感，伪外务局长官蔡运升[2]到京（长春）访问西班牙公使、德国参事官温提渥兹、意大利武官杰式，我均随译。借广播、报刊协助伪劳工协会招募工人大量入伪满筑路开矿，所持的理由是赴“满”做工能疏散人口，节省食粮，活动市面金融。初期每人每次向家汇款30元，在指定银行汇寄，以后增至50元，任何银行均可。此皆新京政府采纳驻华人员的建议所致。宣扬“满洲国”的有关政令和各项成就，转达司法调查案件，拨寄抚恤金，对要人送往迎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设“使领馆”，正式“建交”。

在“华”开设使领馆

“满洲”建国日本首先承认，后经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几个小国承认，在日本人眼中无关轻重。“满”“华”通车通邮以至通商代表的交换，实际上促进双方勾结，法津上究非承认。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纵横南洋，博得昙花一现的赫赫盛名。1942年日本驻“华”阿部大使、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伪满洲国参政府议长臧式毅在南京签定“中日满共同宣言”。[3] 臧赴宁的专机一架、随员9名在济南降落，

---

① 作者记忆有误，1937年7月伪满在北平设伪通商代表部及在天津、济南设代表部办事处，1941年10月22日，伪满将北平通商代表部和天津办事处改为总领事馆，济南办事处改为领事馆，又于1942年6月15日在青岛开设济南领事馆分馆。

② 蔡运升1938年任伪满外务局长官，1940年转任伪经济部大臣。

③ 作者回忆有误，1940年11月30日，伪满、与日本、汪伪政权在南京，签定《日、满、华共同宣言》。日方代表为阿部信行大使。

我往机场迎接。驻济南日本总领事有野学率领事馆警察20人担任机场警卫，其余各机关都没通知。

日本人兴高采烈，以为取得“母体”的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愈见充实。甚至用英国承认美国的先例来比拟，并谓美国独立条约是在法国凡尔赛签订的，而“三国”共同宣言是在母国首都公布的，法律上的含义更较深长。孰不知汪精卫本身就是卖国叛徒，绝无代表母国的资格，迁都以后南京也非首都。他把国旗上加上黄色横条上有“和平、反共、建国”六字，开千古未有的怪例，见之者浑身肉麻。可是日人藉此生风，使“满洲国”在南京开设“大使馆”，派吕荣寰为首任“大使”。原在北平的通商代表部改为“满洲帝国”大使馆的牌子，由日系参事官处理在华北的事项，由中南海迁至东交民巷，显示与各国驻华使馆一道同“风”。在上海开设总领事馆，原有的天津、济南两办事处改升“领事馆”。1943年5月又开设驻青岛“领事馆”①，山田任副领事。

按一般国际惯例，领事的职务是保护侨民、调查商务和公证。“满洲人”在华北任官、经商、寄居，特别在京、津、济者成千上万，本是一家，硬分两“国”无显然界限可分，从未闻以伤害“侨民”向中国官宪提出抗议的事。调查商务不占主流，还不如报告现地政情为多，公证更少。

二、接收北铁

中东路于1935年日人改称为北满铁路，简称“北铁”。1935年3月25日庆祝接收“北铁”，伪外交部在“鹿鸣春”② 招待有关各方面，伪本部高中级官吏列席。伪外交部大臣张燕卿、次长大桥忠一都有兴奋的致词。我摘录要点补充己见写出：

“北铁在苏联实力下经营，呈现‘满洲国’交通体系上的特殊存在。苏联独占北满市场，吸收巨量大豆运至海参崴，以保持海参崴的繁荣，日人认为这是南北满联络上一大阻碍。从前绥芬河车站与乌苏里铁路联运共同使用，1933年5月31日本用实力封锁阻止联运。‘满铁’受‘满洲国’的委托在北满重要地筑成最捷的交通线以抵制北铁。如京图路的急修，于1933年10月新京清津直通列车，由原有的吉敦线延长至图们，过图们江铁桥经会宁直达清津港，东段能接至罗津、雄基两港，构成北朝鲜通日本北部的最近路线，同时也是控制海参崴的要枢。再一线由吉林省城东的拉法站至哈尔滨名为拉滨线，1934年9月开始营业，把北满的农产品从拉法、吉林、长春，完成哈尔滨大连间的直通运输。北铁至海参崴的吞吐机能大见萎缩。”

苏联洞悉四面包围形势不利，莫若着出卖该路财物到手之为得计，1933年6月22日，“满”苏“两国”代表在东京开始商谈③，其后“三国”间非正式交涉继续进行，

① 作者记忆有误，日伪当局是将北平的伪通商代表部和天津办事处改为总领事馆，济南办事处改为领事馆。另外，在青岛设济南领事馆分馆，分馆设立时间是1942年6月15日。

② 长春当时颇有名气的大饭店。

③ 让售中东路交涉于1933年6月25日在东京举行。

1934 年 9 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代表尤立诺夫①成立协定，价值 1.4 亿元，苏联职员退职金 3000 万元，共 1.7 亿元，三分之一付现款，三分之二付物资，1935 年 3 月 23 日在东京正式签字。北铁由满洲里至绥芬河的大陆横贯线，及由哈尔滨至长春的南下纵线成一短柄丁字形共 1732.8 公里并附属财产及一切设施全部接收。飞电传来，同日正午北满铁路管理局长和铁路总局哈尔滨铁路局长之间正式办理交代。

苏联职员 6027 人从 4 月到 8 月运送回国，所有私人家产等一律出卖。

接收后南部线哈尔滨至长春改名京滨线，西部线哈尔滨至满洲里改名滨洲线，东部线哈尔滨至绥芬河改名滨绥线。

原来北铁轨间 50 英寸，南满铁路轨间 48.5 英寸。接收后第一要务在使运输系统与“满铁”一致。同年 8 月 31 日午前 5 时起至 8 时止完成哈尔滨长春间 242 公里的缩改轨间工程，1936 年 7 月滨洲线缩轨，1937 年 6 月滨绥线缩轨竣工。

全“满洲”的铁路轨间统一达成“满洲国”交通体系的一元化和哈尔滨大连间客货运输的最短距离。同年 9 月开驶“亚细亚”特别急行车，大连至哈尔滨朝发夕至。世界最快的火车苏飞人（伦敦至苏格兰首都爱丁堡）第一，巴黎金箭第二，“亚细亚”第三。它的装备和速度占亚洲王牌，因而得名。

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为日俄战争的最大原因。大陆横贯线于 1902 年筑成，1904 年日俄战起。1917 年十月革命该铁路由联合国管理，日本出兵 10 万到西伯利亚，日本的迷梦犹酣。“满洲”建国，日本的国防线展至西伯利亚前壁及外蒙古之间。苏联精兵配置在西伯利亚沿线。西疆满洲里、北疆黑河（黑河省公署所在，对岸海兰泡有纵支线通黑龙江迂回干线）、东疆绥芬河均负有国防上重大使命。接收后运兵神速，滨洲、滨绥两线改轨预防苏联兵车的闯入，绥芬河仍留有一段旧有的宽轨，准备将来进攻海参崴。

旧日迂回线与大陆横贯线到海参崴会齐，构成“两线一港”。横贯线出卖后，黑龙江迂回线至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南折构成乌苏里迂线达海参崴，途经远而费时多，即日人讽为“单腿跳”。此前日本的铁路政策是“一线两港”，大连商港供应旅顺军港，旅顺军港捍卫大连商港。北铁接收后“多线联多港”，纵横交错，大连、营口、葫芦岛、釜山和北朝鲜三港都可呵成一气。在日本人看来，北铁所有权转移实东亚全局动向的一大枢纽，是“满洲”“建国史”乃至铁路发达史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

九一八前就主要来说，大连是大豆和豆饼、豆油输出港，运至东洋市场，营口高粱输出港运至华中、华南（上海大酒店墙上四个大字牛庄高粱），安东是小米输出地，供给朝鲜人食用，中东路输出原料大豆至欧洲市场。北铁接收，上述分职的界限大致变更。葫芦岛筑港原为与大连争衡，日本人不惟不废弃反而继续修筑，使竞争点变为培养点。

日本侵吞大陆蓄意已久，始终受俄国美国的牵扯未得如愿以偿。日俄战争日本虽系战胜国但未得占据全满，仅于 1906 年 8 月 1 日俄国将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的一部，宽城子以南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所属的一切权利、特权、财产割让与日本。美国铁道大王

① 应译为：尤列涅夫。

哈里曼策划收买南满路与桂内阁签订草约，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自华盛顿回国竭力反对而取消。哈里曼仍不甘心，于1909年10月与奉天巡抚缔结中美英锦州至瑷珲的锦瑷铁路预备协约，受日俄的合力反对而中止。美国国务卿诺科斯倡“满洲”铁路中立案。美国始终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藉口而图染指阻碍日本的独占。今日本三十年的渴望一旦达到，“江山一统”指挥如意，排除苏联在北满的势力，无怪大桥喜气洋洋地说：“擦掉最后一块遗锈”。这给日本“产业开发、实行移民”、“加强国防”和进攻中国本部开阔了平坦道路。

三、移民开拓

1943年1月我视察延边由图们赴龙井村，访问驻龙井村日本总领事清水，得知“满”朝交界处朝鲜人的概况。该领事馆大楼高耸，气宇宏阔，不亚驻京的使馆。清水曾充驻意公使，由此可见日本对“间岛”地方的重视。

“间岛”日本官宪的职务错综复杂。一方面保卫朝鲜人督促他们往西移殖，如1907年统监府设临时派出所，朝鲜内地向“满洲”移住者激增。又一方面明暗监视朝鲜人的行动，如对1930年5月头道沟、龙井村朝鲜人暴动破坏天图路桥梁事件加以镇压。有时与中国缔结协定共同取缔在东边的“不良鲜人”如“三矢协定”，又有时如1927年12月日本政府对东三省官宪压迫住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提出抗议。①

“间岛”本是图们江分岔处的一个小岛，因自然国界不明，日本把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含浑列入认为它是朝鲜的延长。“满洲国”设立“间岛省”统辖延、汪、和、珲原属吉林的四县，又加入奉天省的安图县共五县，任蔡运升为省长，不久蔡调升“外交部大臣”。由双方的人位来看，显示“间岛”地方的重要性。交通上直通北朝鲜三港，珲春又邻近海参崴，国防的意义重大。

日本的一贯政策是：“米往东去，人往西来”。朝鲜的气候、土质等天然因素适合种稻。新设路图们线、白茂线助长稻米的推销。满洲产的小米运往朝鲜，朝鲜产的大米运往日本，这叫“米往东去”。日本人移往朝鲜，把朝鲜人挤入“满洲”，这叫“人往西来”。

1876年釜山开港，日人移住者54人，甲午战后增至1.2万人，其移住只限于港口。1909年达14.6万人。铁路修建及移民奖励政策，耕农、工商业者和雇佣业者进入朝鲜内地，1927年达45.5万人。

“间岛”地方“满”、朝国境毗连，人口稀少，土地肥沃，朝鲜咸镜南北道居民不断移住，1931年达14.19万人，占“间岛”总人口之八成。一游其地如入白衣之乡而青兰服反而罕见。京义铁路和安奉铁路的开通，南朝鲜农民向南北满铁路沿线和吉林地方迁徙。“满洲国”成立，“保护力”浓厚，更如洪流冲来，1935年达82.7万人。据传此后超过百万人。

---

① 1927年12月14日，东三省当局根据国际惯例下令驱逐未入华籍朝鲜流民出境，日驻奉天总领事对此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人居住大连和沿路各附属地，经营工商以及抚顺煤矿、本溪湖煤铁公司、鞍山铁矿、弓长岭铁矿、鸭绿江采木公司等人员总数，我未得到精确统计，大约有几十万。岛国日本地狭力图向外开拓，1923 年 7 月 1 日美国排日的移民法实施，日本进一步倚靠“满洲”为其生命线、“日本国防第一线”，日本的重要外交以满洲为中心点。产业的开发、农民移殖外，商、工、林、渔、矿各种移民相继齐来，百业竞进，特别是木材、矿产和农产品，由原来的“米往东去”扩大到（白）“物往东去”。由以前的日人入朝鲜、朝鲜人入“满”逐步推移，达到日人由本国直抵“满洲”的“人往西来”。这对日本内地人口、粮食总量的解决和农村更生都一帆风顺。一个政策的施行，时间上不是偶然的，空间上不是孤立的。以前汉人移民“满铁”曾特减运费，1932 年 3 月 10 日“满铁”废止此项减价办法，堵塞一方面正为诱导另一方面保留隙地。至于招募华工从事筑路和兴修土木，只限独身入境，工竣遣回又当别论。

这种必然的趋势中国人早已看明。1921 年末华盛顿会议时，在纽约的东北留学生 4 人开碰头会议寄与中国代表团一信，我也署名。大意谓诸公力争山东权利至深钦感。日本野心向大陆大量移民。山东人口密自然限制虽欲多移而不能容纳；“满蒙”人口稀又有朝鲜为之津梁，实日本开拓政策之首要目标。想荩筹周至必能挫彼奸谋……。

此后 6 年田中奏折出现，此后 10 年“满洲事变”爆发。伪国建成，官署林立日本人大下官雨，单就新京一处新建房屋方圆 10 余里。预定对满移民 20 年间 100 万户 500 万人，为“满洲”人口的一成五。“满洲国歌”醒目指出：“新满洲便是新天地，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业得自由”，门户大开来者不拒。“满洲”疆土略同德、法、意三国之和，百年之内不患人满，修筑铁路担当此开拓的重大使命。日本农业开发主力在东北满，所以新建的铁路东部较多，如京图、图佳（图们至佳木斯）、虎林（虎林至林口），依傍路线的密山、勃利、宝清、虎林定为移民重点区。移民分集体移民和会社移民，按照计划第一次在桦川县的永丰镇，第二次在依兰县的湖南营，第三次在绥棱县的北大沟，第四次在密山县的城子河，第五次在密山县的永安屯。“满洲拓殖会社”折减运费，教育、卫生、金融、产业及救济诸般设施也都统筹兼顾。中部铁路如北黑、拉滨、京白、白温、四西等线两旁分布着许多铁路自警村，社员担任铁路警备，其家属从事农耕。牧畜属于自由移民的一种，依此以开拓沿线。西部新建之路较少，锦承、叶峰的主要任务在辅佐旧路线侵略华北，中东部新线在开发产业、促进移民和加强“国防”。

1934 年 11 月“满洲国”政府把奉天、吉林、黑龙江 3 省分为 4 个省，以后陆续加添至 18 省。① 每个伪省公署必倚旧有的或新建的铁路线，实施其开发、移民和“国防”的既定政策，使日本坐享其成。

四、平行线交涉粘着的回溯

1943 年 7 月“满洲国”驻“华”大使吕荣寰在北平日本大使馆招宴。那时我充驻济南“领事”以随员资格被邀。席间谈到：1928 年 4 月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为解决

① 1937 年 7 月伪满设 18 个省。

满蒙铁路诸悬案至怀仁堂访张作霖。吕自称他任中东铁路督办，事先应张作霖的电召来京参加这个会议。反复申述数小时之久不得要领，芳泽“粘着”上了，至夜深12点不走。在张作霖生前和张学良继任，下列各项“满铁”认为受严重损害，抗议纷纷：（1）沈海、吉海两路接轨，东面与“满铁”平行；（2）打虎山至通辽东连四洮形成西面平行线；（3）1930年银价暴落，由奉天至沟帮子换车至营口比用金票直达营口能省钱，致“满铁”客运萧条；（4）北宁铁路局与荷兰筑港公司签订葫芦岛筑港契约，1930年7月1日在外宾参加下举行开工式；（5）营口河北岸建造的码头和市场与南岸“满铁”站对峙；（6）吉会铁路借款敦化至会宁一段，日本急欲修通中国竭力建者；（7）洮昂、泗洮两路与打通、北宁联运减低货物运费以对抗“满铁”。总握全局，造成对抗的大干线：敦化—吉林—海龙—奉天—葫芦岛，西大干线：克山—宁年—齐齐哈尔—洮南—通辽—葫芦岛。东西夹击，经北宁路联运到渤海面上连山湾的不冻港葫芦岛。南北贯串，陆海衔接，能吞能吐，扼住“满铁”的命脉。

日本人急了，1930年1月“满铁”理事木村追见北宁路局长高纪毅，高闪躲拖延，当时所称的“木村高会谈”未能圆满达到。日本人认为正面无法解决，不得不诉诸武力。这未免太凶暴太护短了。

平行线的说法片面利已，狡诈过度。我试作一法理上的解答：（1）1905年“满洲”善后条约及附属协定缔结之际，会议记录中中国代表约定：“中国政府为保护南“满铁”路的利益，在中国政府未收回该路以前，该路附近不敷设并行线”。这只把口头语言载入记录而非正式条文，其约束力比较薄弱。（2）平行的距离限制未加明文规定。“附近”二字，在私人生活上常指五八里，在国家不过五八十里。严格以求，奉海路距“满铁”较近可勉强列入平行。奉天至沟帮子、沟帮子至营口，与“满铁”略成三角形。且沟帮子至营口一段1899年10月通车，南满铁路1907年4月接管营业，孰先孰后是非分明。至于洮昂、呼海、齐克三线远在南满路北端长春以北，更牵扯不到平行。必把平行线扩大到漫无边际，加拿大和美国的横贯铁路主要的都是平行，那么，彼此间可提出无止无休的抗议而永无宁日。（3）国际间的条约继承须履行全部，不能专享受权利而抛却义务。1898年3月27日中俄两国在北京签订的旅顺、大连25年租借条约，到1923月3月27日期满。日本从俄国手中继承南满铁路，应履行条约的义务把期满的旅大租借地交还中国。1922年10月20日金州市民发动收回旅大运动确有法律上立脚点。日本何以专哓于会议记录中的口头诺言而把正式条约上的义务放在九霄云外？

中国为维护自国的利益曾对抗中东路，1931年4月23日齐克、洮昂、四洮三线减低运费，北满的货物南下激增，苏联未提出任何异词。“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新修拉滨线，封锁绥芬河车站联运，“新京”清津直通列车，伸出绞杀中东路的辣手，在人则头上冒火咄咄逼迫，在己则心安理得，毅然行之而无愧。

一个独立国家有权在自己疆土上开港筑路，不能因有一条外国人经营的铁路存在，数百里或数千里外全部瘫痪。所谓包围线的语言不攻自破。同时也痛恨当时外交承办人昏昧懦弱，受诸诸多丧权辱国的字句如“附近”、“一带”、“一手承办”、“至相当时期”等等，给后人留下祸患根苗！

（1964年）

七七事变前随清水良策赴中国内地“视察”

曲秉善*

清水良策于1934年12月从日本和歌山知事来到伪满充当伪民政部总务司长。他是日本神奈川县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当年有40多岁。按当时日本的官场情况来说，40多岁充当县知事的是很少的。拿当时日本统治阶级话来说，人是很优秀的。而实际是他善于逢迎日本统治者的意向剥削和压迫日本人民。他之所以能来到伪满充当伪民政部总务司长，是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将他找来的。因为远藤柳作在日本充当爱知县知事时，清水良策曾充该县的内务部长，二人有旧关系。远藤柳作对外表示，他找清水良策来的理由是：“民政部以前的总务司长如中野琥逸、竹内德亥都是行政经验比较少，所以有必要从日本内务省找来经验丰富的行政专家来指导满洲国的民政行政。”

清水良策来伪满就伪民政部总务司长时，从日本内务省带来三名帮手，一名是粟原，充伪民政部总务司长文书科长；另一名是冈本，充伪民政部地方司总务科长；还有一名是大岛，充伪民政部警务司总务科长。清水良策就任伪民政部总务司长后，即在伪民政部内设立拓政司，执行向伪满移入日本人掠夺东北农民的土地，准备进攻苏联，消灭抗日力量，巩固伪满统治和保护日本企业的“开拓政策”，并在地方司着手调查研究东北的街村制，妄想制定出仿照日本地方行政与产业组合相结合的街村制，统治东北，将东北变为日本的粮食基地。

1935年12月下旬，这时正是我在伪民政部充当资料科长的时期，伪总务司长清水良策有一天找我，对我说，他将去中国“视察”，叫我随他去，还有总务司经理科福士晴夫事务官随同，预定于本月27日从长春出发先到天津，后再到其他各地，时间约为一个月。他还对我说，他已经印了日本化名的名片，叫我也印一份日本名字的名片，在中国内地见着中国人，不要说是中国人，不要说是从伪满来的，可以说是从日本来旅行的。“我叫什么日本名字好呢?”我问清水良策。“可以叫太田兼善吧。”清水良策回答我说。清水良策究竟去中国内地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对我说，这事关他的秘密，我当然也不能问。

1935年12月27日我随伪民政部总务司长清水良策同伪民政部总务司经理科事务官福士晴夫从长春出发，28日到天津，由敷岛旅馆的接客人引导我们三人到日租界敷岛旅馆，这是在事前由福士晴夫用电报与敷岛旅馆联络好了的。

在敷岛旅馆看见伪满新京特别市市长韩云阶，他也住在这个旅馆里。从清水良策与

---

* 作者时任伪满民政部资料科科长。

韩云阶二人的谈话中，知道了韩云阶是受日本关东军的命令前来勾结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部下萧振瀛，妄想通过萧振瀛使宋哲元完全依附日本，把冀察两省变为第二个“满洲国”。韩云阶为了进行这个阴谋活动，带来了他的日本秘书浅井和秘书许兰坂及金卓等许多帮手。据韩云阶说，他来到天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通过萧振瀛对宋哲元提出了许多收买的条件，但是对方始终不表示真诚态度，又计划叫金卓勾结地方土匪搞暴动，但是，日本军又不表示坚定的态度。韩云阶还表示说：“这个活动很困难，我决定停止这个工作，预定在最近回满洲国去。”韩云阶的秘书对清水良策献策说：“最好是把宋哲元害死，由日本方面推荐能听话的亲日分子充当冀察委员会的委员长，一切事情都好办啦。”在清水良策与韩云阶二人见面谈话的晚间，韩云阶邀清水良策去吃饭继续谈话。第二天上午韩云阶领清水良策到萧振瀛的天津公馆去拜访萧振瀛，据说萧在清水良策个人访问日租界内的日本总领事馆后，由日本总领事馆派来一名年青的日本官员，领我们三人到天津市内和各国租界内看了一遍市容，还去看了李鸿章的祠堂。清水良策看见在各国租界内，有着各不相同形式和风格的建筑物与道路，有着各不相同的企业，各商店里陈列着各不相同的商品，住有各不相同国籍的人，和他们的走狗进行着各不相同的阴谋活动。他表示他立刻感觉到日本租界比较其他国家的租界在各方面都有逊色，日本必须加紧扩张势力范围压倒它们。

在 12 月 31 日那天的晚间，日本总领馆的那个年青日本官员来到旅馆，领我们三人到日本租界内的舞场去跳舞。清水良策、福士晴夫和日本总领事馆的那个年青官员都在舞女的陪伴下跳舞，因为我不会跳舞，只坐在一旁看。我们从舞场回旅馆已经是翌日凌晨 3 点钟了，途中看见许多日本人在日本神社前迎接 1936 年的新春。

1936 年 1 月 1 日早饭前，敷岛旅馆的主人和日本侍女都身着盛装来到清水良策的住屋里给清水良策贺年，早饭特别拿出屠苏酒和杂煮表示过年了。

1 月 2 日上午日本领事馆的那个年青官员领两名中国人来到旅馆，一名中国人有 50 多岁穿着长袍马褂，另一名中国人有 40 多岁只穿长袍，看光景，那 40 多岁的人好像是那 50 多岁人的随从。日本总领馆的那个年青官员指着那 50 岁的中国人对清水良策说：“他就是那天我对你说过的亲日活动家，他主张日中合作成立新政府，他拥有强大的秘密组织，你听听他的意见。”那个 50 多岁穿长袍马褂的人通过我的翻译对清水良策讲起话来。我从他的讲话口音知道他是天津人，但是他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和清水良策换名片，也没有做自我介绍。清水良策也没有问他的姓名。想像是在事前日本总领馆的那个年青日本官员对清水良策提这个人时，说过这人的姓名。那个 50 多岁的人说：“中国历史记载着秦始皇派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到东方海岛去取长生不老药。徐福一去就没有回来，在现在日本的土地上生下子孙，日本人都是徐福的后人，是和中国人同一祖先，就是黄帝轩辕氏。现在中国老大了，日本强壮起来，日本人是应当回到老家来分一份产业，帮助中国人治理家务。”他还说：“中国应是由中国人、日本人共同成立新政府，新政府的最高首领应当是皇帝，在总理大臣之下设七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外七部，分掌国家对内对外大事。”他又说：“我有秘密的组织遍于全中国，我一召号，能行动起来。这个组织具有高度的保密性，每人只能知道自己组织内的五个人，对于组织外都有谁、有多少人一概不知道。”他一直说了一个钟

头才把话停住。在他把话停住的时候，那个40多岁的人忙笑着说："今天说话太多，对吧？渴不渴？"他摇了摇头。我听他说的话是支离破碎，好像是一个疯人。而清水良策对他表示很恭维的态度说："你说的太对啦！日本和歌山县就有徐福的墓，地方人对他很崇敬。希望你很好地协助日本方面工作，来实现你的主张，发挥你的秘密组织的机能。"清水良策又对日本总领事馆的那个年青日本官员说："找一辆汽车把他送回去吧。"年青日本官员将那两名中国人领走了。

1月3日我们三人从天津去北平，到车站来接清水良策的有佐藤慎一郎和北京饭店的日本人接客人，他们引导我们到北平饭店。佐藤慎一郎是前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的小舅子，当年有30岁，能说一口好中国话，曾充旅顺公学堂的教员等事，奴化中国小学生。1932年秋天竹内德亥充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的时候将佐藤慎一郎调到伪满民政部充他的秘书，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后，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就派佐藤慎一郎驻在北平调查研究中国情况。佐藤慎一郎引导清水良策到北平饭店后，即进入清水良策的住房里，对清水良策报告他在北平工作的情况。这时福士晴夫示意叫我同他出去，我们都各归各自的房间了。在这以后佐藤慎一郎每天都来到北平饭店，先到清水良策的房间，然后才和我以及福士晴夫打招呼。

清水良策到北平的第二天，他个人到日本特务机关去拜访。他回来时对福士晴夫和我说，他已经求特务机关长给设法和宋哲元会晤。次日的下午2点多钟日本特务机关长来到六国饭店清水良策的房间。清水良策找福士晴夫和我去见特务机关长。日本特务机关长拿出两张宋哲元的请帖交给我们两人，上写福士晴夫、太田兼善。他对清水良策说："今晚你们三人都要去，在7点钟以前我来接你们，同你们一同去，一般的汽车不能进入宋哲元的公馆院内，很不方便。"晚间6点将过，日本特务机关长就来接我们来了。他穿着晚餐服，表现这一个宴会是很郑重的。他对清水良策说："宋哲元今晚请的客人很多，都是日本人，因为我是日本机关的一个首领，又负有一种特殊任务，在服装上不得不表示恭维他。"叫我、福士晴夫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同坐一辆汽车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公馆的警备森严的院内，宋哲元住的是一幢宽大的二层楼房，当即有人引导我们到楼上的客厅，里面坐有许多日本人，主人还没有下来，招待人殷勤地倒茶劝烟。墙上的大挂钟鸣了七下，有人喊"委员长来了"，客厅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宋哲元身穿兰色长袍从里面走出来了，阴沉着脸站在客厅的中央向他请来的日本人点了点头。这时就有人喊请到餐厅入座。宋哲元在前面走，其他的人跟在后面进入餐厅。餐厅里放有五张大圆桌子，上边摆着整洁的食具。各人都按指定的座位坐下了，清水良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坐在第一桌，我坐在第三桌，福士晴夫坐在第四桌，宋哲元陪坐在第一桌。倒酒上菜开始吃席。在吃席的过程中很少听见说话声。在吃席将终的时候，宋哲元拿着酒杯到各桌前与客人同饮了一杯酒。席散后，日本特务机关长请清水良策到日本妓馆去喝酒，也叫福士晴夫和我一同去。在清水良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都喝有醉意的时候，清水良策牢骚地对日本特务机关长说："今晚大失所望，本想借机和宋哲元谈谈话，听听他的意见，不曾想这家伙一言不发。"日本特务机关长也用不满意和愤慨的口调说："宋哲元这家伙太顽固了，这样继续下去怎能达到华北政权特殊化所要求的目的呢？可惜日本对他的好意。这种局面早晚是必须改变的。"我们在北平期间，佐藤慎一

郎引导清水良策、福士晴夫和我们去故宫、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颐和园、东岳庙等处去参观，逛了北平市街。清水良策在参观东岳庙后对我说：“这个庙对于中国人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满洲国’各地都应修建这个庙，使民众信仰它。”

在我们将要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清水良策叫我和福士晴夫随他到通州见殷汝耕。殷汝耕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主官，我和福士晴夫随清水良策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清水良策拿出伪满民政部总务司的片子交给传达人，殷汝耕很快地出来迎接清水良策到客厅。殷汝耕和清水良策经过初次见面的客套谈话后，他用流畅的日语像对长官报告似地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在本年11月成立的，它统辖冀东二十二县。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组织是在长官顾问室之下设总务科、文书科、经理科、调查科四科和民政厅、实业厅、教育厅、警务厅、财政厅，还编有保安大队两千名。由于冀东各县土地贫瘠，并且地少人多，财政收入将够开支，没有多大的发展。我是日本陆军省参谋部推荐来的，我本着与日本合作的精神，遇事都与日本军和本地的日本机关联络，彼此很融洽。”最后他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办这么大一块地方的事情。”从殷汝耕的这个口吻来说，他是不满足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官的现状的。清水良策也听出了殷汝耕有不满足现状的意思，他遂对殷汝耕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以来，日本的舆论很称赞，它的前途是大有发展的。”清水良策给殷汝耕打完气后，就返回北平。

我们在北平一共住了五天，又随清水良策到张家口，住在察哈尔大饭店。清水良策个人出去拜访日本领事馆，他回来时对福士晴夫和我说：“这处也有日本特务机关，由领事馆和察哈尔省政府联络我们去见张自忠主席。什么时候去，听领事馆的电话。”日本领事馆来电话了，叫我们就到察哈尔省政府，张自忠主席在等候我们。我和福士晴夫随清水良策到察哈尔省政府见着了张自忠主席。张自忠主席完全以接见外宾的态度，接见了清水良策。张自忠主席对清水良策只谈些外交词令的客套话，关于政治问题一句未谈。我和福士晴夫随清水良策回到察哈尔大饭店后，由察哈尔省政府送来张自忠的请帖三张，上写日本外务省嘱托清水良策、福士晴夫和太田兼善，邀我们在当日晚7点钟便酌，席设在察哈尔省政府。晚间我同清水良策准时到了察哈尔省政府，看见应邀前去的还有日本领事馆领事、日本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在席间清水良策突然说出他是伪满民政部的总务司长，是从伪满来不是从日本来。对此，张自忠主席表示了毫不介意的态度，对伪满的一切一句也未谈，仍然与清水良策谈些关于风俗习惯和起居饮食的琐事。张自忠主席的参谋长把清水良策和我找到餐厅的旁边屋里，他表现着严肃的面孔，用严肃的音调通过我的翻译对清水良策说：“你们日本人常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可是，跟你们亲善就得亡国灭种。现在李守信的伪军在你们的唆使下，侵占了张北，在那里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强奸妇女，这是怎么一回事？对这一切你们是应当负责任的。”清水良策听见参谋长这番话，脸立时发红，尴尬地说：“我是一个旅行者，这些事与我无关。以后我回去把你的意思对有关方面传达一下。”我恐怕参谋长对我说什么，不自禁地心脏的跳动加快起来，可是参谋长对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愤怒的目光瞧了我几次。清水良策在参谋长对他谴责后又回到席上继续饮酒。席将终，日本特务机关长提议请张自忠主席到日本妓馆去饮酒。张自忠主席慨然应允。张自忠主席、日本特务机关长、清水良策、福士晴夫和我几人同乘日本特务机关的小汽车到日本妓馆去。

这日本妓馆据说是在两天前新开市的，在此以前张家口没有日本妓院。在饮酒间，张自忠主席仍然是关于政治问题一句不谈，直饮至深夜始散。

第二天下午，清水良策从日本领事馆叫来小汽车一辆，叫我和福士晴夫随他到张北去见李守信。我们在张北县政府的最里边院的房间里看见李守信正同日本军官在一起吃晚饭，一个伪军装束的士兵正往餐桌上端包子。李守信看见清水良策已经进屋，用手示意叫那个士兵把包子端回去，迎上前来与清水良策打招呼。他说，他在日本军的帮助下率领伪军侵入张北，唯因时日尚短，一切都没就绪。他表示决心说，他“决心”为蒙古民族的“独立”奋斗到底。清水良策首先祝贺李守信率领伪军侵入张北的胜利，然后说，他希望李守信为蒙古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在李守信住的外院房间里看见了以前曾在伪满民政部充当过事务官的安斋在整理皮包里的物品。清水良策问他在这做什么工作，安斋回答说，他随李守信伪军侵入这里，他担任行政指导工作，也就是他把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宁省各县里进行的所谓自治指导拿到这里重版，清水良策鼓励他要好好工作。

第三天离开张家口去大同。我们是在早晨很早到大同的，到旅馆稍事休息，早饭将用完，就来了一名宪兵向我们要片子，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什么事？今天预定上哪儿去？他还说，他是要保护我们的，有什么事尽管对他说。清水良策说：“从张家口来，到太原去，今天预定到云冈去看看石佛，请给我一辆汽车。”那个宪兵说：“汽车很不好找，我去问问长途汽车公司能包租一辆车不?”不多时，一辆大长途汽车开到旅馆门前。那个宪兵对我们说：“汽车雇好了，这就去吧，我也同你们一同去，途中保护你们。”我们参观完了云岗的石佛后，又参观了大同城里的市街。

次日早晨，那个宪兵很早就来了，送我们到开往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看我们登上长途汽车，直到汽车开驶后他才回去。午间汽车停住了，许多旅客都下车在长途汽车站旁边的面铺吃面，我们也去吃面。这时来了一个宪兵询问，各自说出自己是谁。这个宪兵也是看我们登上汽车，直等到长途汽车开驶后才回去。晚间天已经黑了，长途汽车驶到太原城外停下了。有一个宪兵走近我们说：“你们三人都到了，太辛苦了！我们这里有山西大饭店，住在那吧。叫洋车送你们去，下车后不要直接给车钱，可让饭店给代付。”

第二天的早晨，在食堂里看见有一名日本人在吃饭，清水良策和他打招呼，让那个日本人到他的房间里去谈话，我和福士晴夫也跟到清水良策的房间。那个日本人有30多岁，据他说，他是商人，他来卖给阎锡山火车头，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将有可能实现。他还说阎锡山是一个门罗主义者，对别省的事向不参加。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来到太原开会，也住在这个饭店的楼上，昨天夜里回来得很晚，今天早早就走了。他又说：“这处没有一个日本机关，对于阎锡山若是没有特务介绍是见不着的。你们如果没处可去，我可以领你们到街上去看看。”清水良策问：“这处的排日运动怎么样？北平的排日运动闹得非常的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和市民有好几万人参加，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连冀察的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也不得不宣布延期。”日本商人回答说：“这里很平稳，由于当局严命禁止。”清水良策和那个商人谈完话后，我们三人就在那个日本商人引导下到街上去参观。先参观了山西土货公司，这是一个三层的四面大楼，

里面出售山西省所有的产品，日用百货应有尽有，可以说是价廉物美。从山西土货公司到古玩市去看古玩，清水良策买了一对乾隆年间的蛋黄色大瓷瓶，他很珍视那对瓷瓶，他对福士晴夫说：“这对瓷瓶可以作我的传家之宝。”我们又游览了太原主要街道，都是整齐清洁，利用了一切空间，都写满了新生活运动的标语。清水良策对我说：“阎锡山的政治很好，因为这里没有日本机关，到这里来的日本人又少，所以日本人对这里的情况一般多不详细。”当天夜里我们乘火车去石家庄，在我们在太原车站登上火车后，将要开车前，有一个宪兵到睡车里特意看看我们在车里没有。

次日早晨抵石家庄，换乘平汉路火车前往汉口，午间清水良策叫我和福士晴夫同他到车上食堂去吃午饭。清水良策看见食堂里坐有许多男女学生，他扭过身来就往回走，小声对我说：“咱们回去。”车服务员奇怪地问：“怎么回去了。”我说：“因为人太多没有座位。”车服务员说：“那么，你们到睡车那边的食堂去吧，那可能人少些。”

到了汉口，我们住在日本租界的一个日本式旅馆。清水良策一个人出去到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同仁医院去拜访。日本领事馆派来一名日本官员引导我们在日本租界内走了一遍，日本租界的面积虽然不太大，可是，使人堕落毒化和掠夺金钱的施设无所不有。那名日本官员又引导我们过江去看黄鹤楼、珞珈山、大东湖和武汉大学等名胜和文化机关。第二天同仁医院院长来电话找清水良策去谈话，清水良策叫我和福士晴夫随他一同去。这间同仁医院是一个规模极小、设备极简单的医院，院长有50多岁，带着一副伪善的面孔，在他和我们谈话的屋子里墙上挂有许多中国政界人士的照像。同仁医院院长对清水良策说：“我知道你们到这里来，是要了解些什么带回去，我特意把我的中国朋友找来，你们好好谈谈，或者可能达到你们的要求。”他走进屋去领出来一位穿西服、有40多岁的中国人，给清水良策介绍说：“这是张君，在日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现充市政府的卫生科长，对政治很有远见，你们好好谈谈吧。”这位卫生科长警惕性很高，也没有和清水良策换片子，也不谈关于政治上的问题，只谈些关于卫生保健、风俗习惯等。例如，他说汉口的卫生情况过去很不好，每年在夏秋之间都发生各种传染病，死亡人很多。近二三年里由市政府积极讲求约束，传染病逐年减少了。又例如，他说汉口附近的名胜风景幽美，人多利用为避暑地，而一部分人为风水说所迷惑，竟往那处埋坟，于卫生上、于风景上都不好，是必须废除这种风俗习惯的。他和清水良策谈不多时就以事忙为理由先走了，同仁医院院长在那位卫生科长走后对清水良策说：“今天张君有些举止不安，平时对我什么都谈。”

我们在汉口住了三天，乘日本客轮前往南京，沿途长江两岸物产丰富、风景绝佳。日本客轮要在九江停两个多钟头，我和福士晴夫都随清水良策登岸到市街参观，路旁看见挂有日本领事馆的招牌，清水良策领我和福士晴夫进入里面找日本领事谈话。日本领事是一个30多岁的人，问清水良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有什么事？清水良策说，他是伪满洲国民政部总务司长，特意来到中国内地视察，今天乘船从此路过，借机特来问候。日本领事说谢谢你的盛意。清水良策又问：“此地的反日运动怎么样？”日本领事将头一摇说：“没有事，此地不是政治中心，只是一个商埠。”日本领事还对清水良策说：“此地是中国著名的江西瓷产地，你们可以买些作礼品。”我们离开了日本领事馆来到瓷器店，看了一家又是一家，清水良策买了一个瓷弥勒。

我们到南京，住在一家日本旅馆里。清水良策先到日本大使馆去拜访，他回来时对我和福士晴夫说，今天晚间大使馆请我们吃饭，我们一同去。晚间我和福士晴夫随清水良策到日本大使馆，在吃饭时没有看见日本大使，据说他是去上海了，一名日本参事官招待我们吃饭。在吃饭时这名日本参事官对清水良策主要谈话说："目前蒋介石在美英的帮助下倾注全力剿共，对于我们日本则采取表面缓和政策。对于各地的反日运动都采取镇压措施，例如对学生代表团就曾关押起来过。蒋介石的对外总方针还是远交近攻，积极拉拢美英排斥日本。日本也有时由于短见而受巨大的损失，例如，在蒋介石实行法币政策上，美国和英国积极支持，而日本却极力反对，其结果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入美国，使美国得到更多的利益，美元和英镑完全支配了中国的货币。"次日，日本大使馆派来一名日本官员领我们参拜了中山陵，游览了明孝陵，参观了鸡鸣寺和其他古迹名胜、主要市街。清水良策看见遍处都是新生活运动的标语，他突然对我说："中国的新生活运动很彻底，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发扬东方道德、反对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买一套有关新生活运动的书，带回去以备研究用。"

我们在南京住三天就乘火车去上海。我们到上海时，有日本大使馆驻在上海的日本馆员来到车站接我们，他把我们安置在日租界的一个日本旅馆里，我们在上海住了五天。在我们到上海的第二天，清水良策在日本大使馆驻在上海的馆员引导下到日本海军机关和日本大使馆驻在上海的分馆去拜访。在这以外的四天，那个日本大使馆驻在上海的日本馆员每天都来到旅馆，引导我们看白天的上海，还看夜晚的上海，又看虹口的日本工厂和日本的文化侵略机关同文书院。他还引导清水良策、福士晴夫和我到上海郊区看十九路军英勇与日军作战的战场遗址，看完后，清水良策对那日本馆员表示，他对当年日本的估计失算认为是遗憾。馆员和清水良策谈话中，他曾说："上海一向是排日运动最剧烈的地区，主要是由于工人多，有共产党的领导。自从日本和蒋介石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以来，中国方面不在上海驻兵并允许取缔全国排日运动，排日的浪潮才渐平稳。但是，仍在其他国家的租界内活动着，这是日本势力达不到的地点。"

我们乘日本客轮离开上海去青岛，在青岛住在一个日本旅馆里。在清水良策访问日本领事馆和日本海军机关后，日本领事馆派来一辆小汽车和一名日本人领我们在市内参观，并看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德帝国主义修筑的"东方炮台"。清水良策在看完炮台和散兵像后，他表示说："日本为夺取这个炮台阵地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而日本在山东的权利是从德国手中夺取过来的，并且在对德和约中已经明确规定由日本全部继承，而中国竟反对此点，真是岂有此理!"清水良策曾问过领我们到各处去参观和游览的日本馆员："青岛的反日运动情况?"那个日本领事馆的日本人回答说："青岛有日本人开设的大规模的纱厂，过去曾发生过重大的排日事件，而现在是比较平稳。"

我们在青岛住了两天乘火车去济南。由一个日本旅馆的接客人将我们引导到日本的旅馆。我们到济南正是除夕那天的晚间，在旅馆途中看到街上很少有来往行人，各商店都紧紧地闭着门，时有叫卖酸梨、瓜子的声音，划破了除夕之夜的静寂。我坐在日本旅馆的草席上，有时听见从窗外传来叭叭的爆竹声。次日早饭后，清水良策出去拜访日本领事馆，他回来时带来一个日本人，这日本人是由日本领事馆派来领我们到各处参观的。我们就在这日本人的引导下参观了春节的济南市街，来往的行人都穿着节日的新

衣，许多小孩穿着红色、绿色的鲜艳的衣服，拍着手跳着脚嘻笑地玩着。我们看了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上的石佛，也看了在1928年被日军炮火击毁的济南砖城的一块遗址。晚间日本领事在日本饭馆招待我们吃晚饭。这个日本领事是一个50多岁的日本人，在吃饭间他对清水良策说：“日本政府作事有时虎头蛇尾，在山东出兵时如果始终不退兵，华北不也成为满洲国了吗?”清水良策点头表示同意他对日本政府的抱怨。

我们在济南住了两宿，就乘火车开始返回东北长春之途。我随清水良策和福士晴夫回到伪满民政部后，清水良策叫我把这次在中国内地各处所看见的情况，综合地对伪民政部内事务官以上的汉奸讲讲。他叫他的秘书官在中银俱乐部订妥了房间，我遂在中银俱乐部清水良策订妥的房间里对伪民政部事务官以上的伪官吏30多人，作了关于我随清水良策到中国内地“视察”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主要说：“这次我随总务司长到中国内地去视察，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前后到了天津、北平、通州、张家口、张北、大同、太原、汉口、九江、南京、上海、青岛、济南等地，我们在这些地点视察过程中，除了在山西省内有宪兵以保护为藉口监视我们的行动外，在其他地方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和盘问。在去年即1935年由于日本军对华北的威力，迫使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已经取消了河北省、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驻河北省的宪兵、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市长，撤消了北平军事分会的政治训练处，取消了河北省的排日运动。中国政府为了实行华北政权特殊化，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治委员会，把冀察两省放置在中国行政区域以外。在去年11月在冀东区成立了以殷汝耕为长官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完全独立了。李守信的军队已经从多伦进入张北，他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在组织蒙疆自治政府。总之，日本的势力已经深入华北，并在逐渐伸展。

总务司长在天津见过一位民众秘密组织的中心人。据他说，在华北有很多亲日的民众。在北京受过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招待，在张家口受过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的招待。他去通州看见了殷汝耕，殷汝耕表示他决心与日本合作，他又去张北见着了李守信，李守信表示他决心为蒙古民族的独立运动而奋斗。蒋介石的对外政策虽然仍然是远交近攻政策，但是，对日本已经表示了和缓的政策，他倾注全力进行剿共，积极压制排日运动，过去排日活动最激烈的上海和青岛目前也是很平稳。张学良、杨虎城连袂来到太原与阎锡山进行剿共的协商。阎锡山仍然坚持门罗主义，目前在与日本商人进行购买火车头的交易。各地的外国租界里，所有的娱乐场所都通宵达旦地充满着游人，中国对于满洲国的成立表示着好像漠不关心的态度。中国目前在进行着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在所有的城市里都很彻底，这个运动是发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总务司长很赞美这个运动，叫我购买这个运动的全部小册子带回来，我已经带回来了。”

此外，在报告中还介绍了各地的幽美风景和各地租界内的“繁荣”情况。而对于日本关东军派遣韩云阶到天津去进行阴谋活动，以及清水良策在张家口受到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的参谋长的责问都保守秘密根本没有说。

据说清水良策对伪民政部事务官以上的日本人在中银俱乐部作了他的中国内地“视察”报告。我认为按伪满当时情况，清水良策必然将他视察中国内地的情况报告给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伪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和火曜会议。

清水良策在当年即1936年4月由伪民政部总务司长转回日本，充四国德岛县县知事。这是怎样一回事呢？据伪民政部地方司司长黄富俊说，这是因为清水良策与日本关东军的意见不合，他是必须离开伪满的。上次他到中国内地去“视察”，那就是伪国务院总务厅长为了慰劳他叫他去的。清水良策与日本关东军意见不合的焦点是否属实呢？又据黄富俊说，关东军主张在兴安省内所有警察都用蒙古人充当；清水良策主张只限于蒙古居民多的地方用蒙古人充当警察。二者的主张互不相让遂成为意见不合。

（1962年8月28日）

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大典侧记

张 大 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入了东北，第二年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满洲国”，经过几度对反侵略运动的残酷镇压，在表面上似乎稍微安全一些。于是以更多的剥削方式，搜刮东北人民的血汗所得，从而也引起了日本更大的野心；竟而在长春—“新京”筹建新皇宫，借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据说日本还准备在通化建筑一所别宫，在必要时，日本天皇可以移居长春，把溥仪送到通化去）。又于1942年准备一个庆祝建国十周年大典，炫耀其不可一时的侵略气焰。但时不旋踵，这个迷梦就烟消云散了。我当时参加过那次庆祝大典，据今能回忆到的情况，略记一二。

一、庆祝大典前的准备

1. 筹备一个规模较大的“东亚博览会”。日本为了通过这次“庆祝大典”，炫耀一下它的威力，作了许多准备工作。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日本即以东亚盟主自居，把“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圣战”等口号，叫嚣得很响亮，也把伪满洲国作为它作战的基地，“动员”群众，为大东亚战争捐献飞机，为“大东亚共荣圈”贡献力量，一切都是为了扩大日本的侵略范围，为了显示它的野心和威力，所以在伪满“建国”十周年之际，就要大事准备一番；为极大争取人们在心理上的赞仰，从3月开始，就筹备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展览会。筹备这次展览会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是日本几个财团，如南满株式会社、煤炭株式会社等所提供的，地址选在长春市南岭一个广阔的空地上，计划有几十个展览馆，都是新设计、新筑成的。其中技术人员日本人和中国人参半，因为这样规模的展览馆，过去在东北是没有见过的，因此一切布置和设施都得听日本人的。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才于秋后，在庆祝大典闭幕以后，可以正式开始展览。就这一点来看，日本确实用尽苦心，想巩固它的既得势力。但事与愿违，这一措施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

2. 建筑一个临时观礼会场。伪满时的皇宫和各大部的场所，都无法举行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为了有个像样子的观礼台，所以必须新建一个临时会场。这个会场的地址，也选在南岭。其中有高搭起一座亭阁式的高台，长宽各约30米左右，亭阁中间有一张方正的大桌，是“皇帝”御临之所，东边是“外宾”席，西边是“国内”高级官员席，亭阁前面是平列长条案桌，长宽约近百米，是“国内”各地来参加观礼人的席位，

* 作者光复后曾为国民党牡丹江铁路特别党部委员。

观礼台四周，军警警卫森严，虽属临时的设施，但颇具威严气势。

二、参加“大典”的伪满人选

日本为了把它的意图更广泛地渗透到各阶层，所以在指定参加观礼的人选上，也是十分斟酌的，上至伪各省市的首脑，是当然的出席人物，各省市的工商、教育界都有代表参加；各县的伪县长和各科、局长，也是必然要出席的（这并不是全部，而是大部分人）；县属各村伪村长必须参加，因为这是基层组织的重要部分，各伪村长能对广大农民作如实的宣传；各县的工、商和教育界，也有代表参加。我是在凤城县以“教育界代表”参加这次观礼的。所有这些“代表”，都是伪满国库支给旅费，当时长春的各旅馆和饭店，统统被官家包了下来，以供这些人的食宿场所，从到达后到公事毕为止，每餐都成席，并且供给烟酒，使这些来观礼的人个个心满意足，轻松愉快。但也有些人（包括我在内）在内心感到不是滋味，认为这种局面，何时才能终结？对许多的现象，只是走马观花地一过而已。到晚间，还不如凑几个人玩玩麻将，倒觉痛快些。

三、当时参加仪式的情况

在庆祝“大典”的当时（时间已忘记），会场的情况是相当严肃的。第一，有一个防卫的问题，“皇帝”出宫，不是等闲之事，必须严加防范；第二，是个表面观瞻问题，当时不仅有伪满各阶层的“代表”参加，以外还有几个“外宾”来参加，必须使会场井然有序，以壮观瞻。当我入席时，远观台下的长条案上，摆得整齐而有序的黄色小包，它的摆法很讲究，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成行，一线笔直，入席的人，按指定的席位，鱼贯就坐，鸦雀无声。约有四五千人进场，除了微微的脚步声外，没有任何杂声杂响，真是肃穆之至。全体就座之后，“外宾”亦陆续就座，不多时，宣布开会。十几声礼炮鸣后，但见傀儡溥仪自后台走出，身着黄色军服，腰佩军刀，头戴高缨帽，两肩佩有丝穗肩章。虽名为“皇帝”，却不着古装龙袍，而俨然像一个陆军将军模样，长长的脸形，戴上一副眼镜，高挺头颈，足登高筒皮靴，虽然是一个假像，倒也神气十足。但不知当时他是怎样想法？只见他向各“外宾”招招手之后，对台下人略一示意，讲了几句话之后（当时扩大器不灵，听不到说些什么），遂由护卫的武官护送下去了。然后由伪总理大臣张景惠讲了几句话，仪式便告结束。这里并没有什么检阅军队或其他活动。会后便是庆祝宴会了，一些“外宾”（当时我只知道除泰国、缅甸几个在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之外，绝大多是日本人，还有日本属下的朝鲜的一些首脑）参加。“国宴”是在另一个场所举行的，而台下参观席上的黄布包，是这些人的午宴食品，黄包皮是柞蚕丝绸的，内包有一个精制的漆盒，盒内装有一个黄色蛋糕，上面做有“庆祝建国十周年”字样；这本应就席会餐，但谁也没在这里吃，一个个都拿起布包，回到旅馆去用餐了，散会时，大家仍然有秩序地退出会场，这出导演戏就告结束了。

四、“大东亚博览会”一瞥

在“庆祝大典”之后，用一天半的时间，去参观“大东亚博览会”。这个展览会之所以名之谓“大东亚博览会”，是有一定用意的。因为当时伪满洲国的产品有限，凑不出来十几个馆的展览品，因此必须从日本内地运来一些产品，充实这次展览的内容，也是宣扬日本产品的一个机会，所以才命名为“大东亚博览会”，实际上也不过是日“满”一些产品的大杂烩而已。从日本运来的产品方面，以人造丝制品居多，花色品种都是过去很少见过的。在“满洲”的产品方面，着重宣扬了鞍山的铁锭，规格品种多样；抚顺的煤炭，把1米高、2米长的大煤块搬上展览台；其他矿产有金和铜等铸块；轻工业方面以柞蚕丝和丝绸为多，也有些人造丝之类的制品；农产品以大豆为主，玉米和高粱次之，当时大米的产量尚不大，但也展出很多。在展品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块约1.5米见方的鸦片烟土，这种毒品的展出，就充分证明日本的恶毒用心了。多少年来，日本就利用鸦片、娼妓和盗匪来搜刮民财。伪满洲国成立后，公开迫使农民种植鸦片，不仅从中大发其财，而且荼毒了多少青壮年人。此时作为一种产品展出，凡是有心的人看到，怎能不痛心呢！我在展览会上，越看越觉得生气。心想：日本人真是欺人太甚，强占了东北的土地，奴役了东北的人民，把所收到的物资运回本国，当地老百姓吃“橡子面”，饥饿劳累而死，今天反拿劳苦大众的所得，来炫耀自己，有朝一日，你是必然吃其后果的。我无精打采地看了一遍，然后回旅社休息了，这次的所谓观礼，也到此结束。

第二天，全体观礼的人都把展览会看完了。经过参观之后，反应不一，有的人很赞扬“满洲国”发展得很快，说“满洲国”已成铁桶了，不必有什么顾虑了。又有的人认为这些东西虽然好，但是日本人在掌权，我们只是个奴隶而已；也有人说，别看小鬼（指日本人）花招多，大东亚战争一败，它就完蛋了。这只是少数知心人的谈话，谁敢公开这样谈。有一个村长说得很老实，他说：今天出荷（送公粮）明天出荷，结果都送到日本人手里了。展览会上的东西，哪一样不是劳苦大众所供给的？农民的苦头真是无尽头啊！由此可以看出，伪满洲国虽十年了，日本想尽办法来奴化老百姓，恩威兼施来统治东北，但人心的向背各异，这就预示着它的覆灭，立即可待也。

（1981年3月）

我所知道的“三肇事件”

王 贤 沛*

这个事件发生在1940年，我当伪哈尔滨警察厅长时期。

约在11月的一天，伪滨江省警务厅长秋吉威郎打电话约我去。日本人秋吉威郎说，在三肇地区，反满抗日的“土匪”，闹得很凶，现在要到现地去作“肃正”工作，警务厅的人不够用，需要从伪警察厅调20个人，你回去准备20个人，明天到省警务厅集合，将由伪省警务厅司法科长带领到三肇去。

伪哈尔滨警察厅从司法、特务两科，抽调出20个人，以司法科警佐叶大年为小队长，到伪省警务厅报到，听伪警务厅的指挥命令。

所谓“三肇事件”，是以徐汉民为首的东北抗日军，在肇源、肇州、肇东三个邻县地区，进行抗日活动而引起的，日本人名曰“三肇事件”。

在所谓“三肇事件”发生以前，东北抗日军徐汉民，在三肇一带以在各道德会作讲道活动，隐藏身份。道德会信徒都认为他讲道讲的不错，对他都很尊敬，谁也不知他是抗日联军的人。

约在1940年秋，抗日联军在肇州县的老城基地方，和伪县警察所警察相遇，因伪警开枪，两下打起来，抗日联军占了老城基街，这时徐汉民才暴露了身份，人们才知道讲道的徐先生，就是抗日联军。抗日联军进城后，对于受伤的伪警，每人发给300元治伤费。徐汉民在街上作了讲演，声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起来打日本人，收复东北失地。当时把日本指导官杀了，烧了伪警察所，带走了街长。

约在当年11月，在肇源一带驻在的伪满国军，他们受到抗日联军的教育，愿投诚反正打日本。这部分伪满国军打死日本教官，要上山和抗日联军联合打日本，因为事先和抗日联军没有联合上，途中被日军包围，人少力孤，遭到日军的屠杀。据当时日军官说：我们日本人对满洲人，比当年的德国人对奥国人好得多了。那时如果奥国人杀了德国人，需要15条人命抵一条命。我们把这些反满抗日的满军，统统杀了，也不过三个人抵一条命。

过了不久，抗日联军闻信赶来，把日军打得大败而逃。因为仇恨日军把伪满国军全部杀光，有人见着日本妇女小孩也把她们杀了。徐汉民当时就制止不许这样做，他说，我们打大人不打妇女小孩子。

所以在三肇地区的老百姓，都知道抗日联军好，徐汉民更好，专打日本鬼子，对老百姓非常之好。日本军怕遇上抗日联军，伪满军不怕遇上抗日联军，因为抗日联军看是

* 作者时任伪哈尔滨警察厅厅长。

伪满军就不理他们，伪满军都躲着抗日联军。

伪满洲国政府司法部、治安部，日本军、宪，为了对付三肇地区的抗日联军，共同组织了三肇地区治安肃正工作会议，决定由伪司法部派日本司法检察官，伪治安部警务司派日本警察官，伪滨江省警务厅组织司法搜查班，日本宪兵队派日本特务宪兵，根据伪满洲国政府公布实施的“叛徒惩治法”、“治安维持法”，在三肇地区现地组织临时法庭，可以不通过伪中央裁定，现地执行。

日本认为徐汉民曾在三肇各地道德会讲过道，首先逮捕道德会长，其次是道德会信徒，严刑拷问追查徐汉民的下落。

日本在三肇地区外部，利用日伪军包抄抗日联军，在三肇地区内部，利用“治安肃正”班，逮捕所谓嫌疑份子，徐汉民被日本捕获。

日本把在三肇地区所逮捕的道德会长、道德会信徒，村长、街长、商务会会长等善良的人民，用铁丝捆绑扔进冰窟里，有的青年人还大喊中华民国万岁。

据说这次被日本杀害的东北人民，约有六七百人。事后问伪司法部大臣张焕相，他还不知道有个“三肇事件”。问伪总理大臣张景惠，他也不知道，问伪滨江省长于镜涛，他也不清楚“三肇事件”是怎么回事。但在三肇地区执行者，是伪中央派去的，谁知道？只有日本关东军、日本宪兵队、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知道。

事实证明，日军官所说的“日本人对满洲人比德国人对奥国人好得多”，完全是一派鬼话。

这个事件从1940年到1941年秋约有一年的时间才结束。约在1942年伪滨江省长于镜涛到三肇现地作省政视察时，问当时的情况，都变颜色，惊恐不安，谁也不敢谈这一问题。可见当时在现地，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的凶狠残暴无人性了。

因为我在1940年12月1日，伪满政府实行市警合并，改组伪市和伪警的关系，我调转到伪奉天市警察局长，故对三肇事件在现地的详细情况说不出来，仅写其概略以供参考。

（1965年）

恢复伪满佛山县公署的回忆

曲 秉 善*

佛山县是伪黑河省管辖的八县中的一个，它面临黑龙江，与伪黑河省省会中间隔有奇克县和乌云县，并且多山，交通极不便，在开江期间赖航运往来，在封江期间虽然可以利用爬犁，但是交通多是梗塞。在伪满当时愈是像这样交通不便的地方，日本对县内人民的统治愈是残酷苛刻。

在我充当伪黑河省公署民政厅长时期内，1936 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伪总务厅长河内由藏找我和伪警务厅长大园长喜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们说："方才大泽部队长把我找去对我说，在前天佛山县城被'匪'袭击了，县公署被烧毁，日本官吏都被杀死，陷于无政府状态。现在日本军和满军都已出动前去'讨伐'。我们省公署应立即去人恢复县公署，重整县政。"他对我们说："这谁去呢？我的意见是民政厅长去为当，因为恢复县公署是民政厅主管范围的事项。"这时我内心想，这次前去虽然是有危险性，但是，我也不能表示孱头。于是我说："我去。"大园伪警务厅长也表示赞成我去。伪总务厅长河内由藏问我要携同谁去？我想是必须带一名日本人去，遇事好同他商量，并且经过他与日本人联络也方便。我遂提出要带伪民政厅行政科长石井贯一和教育科股长张耀先二人一同去。伪总务厅长也表示赞成。他还对我说："你今天准备，明天就起身吧！也要同日本军和满军去联络。"我接受伪总务厅长的吩咐后，回到伪民政厅里告诉石井贯一和张耀先准备明天起身。又去见伪黑河省长钟毓，他对我说："他们既叫你去，你承担过来，准备明天起身，这是很好。不过是'匪人'还在移动，要特别小心，牺牲了可不值当。"我到日本军见大泽部队长中佐，他对于我要到佛山县去恢复县公署整县政的行动表示赞许，他说我具有日本人具有的大和魂。我听到日本人对我这种"夸奖"不但没有羞耻，反而无耻地高兴起来。大泽又对我说："日本军已经去'讨伐'，有事可以和他们联络"。我又到伪黑河地区司令部见伪司令长官贾金铭，他对我说："郎参谋长和刘团长同日系教官带兵到佛山去'讨伐'，在现地可以和他们取联络。"

次日早晨，我携同伪民政厅行政科长石井贯一和教育科股长张耀先乘小汽车起身。这天北风呼啦啦的，雪花丝丝的，是零下 30 多度的天气，我穿着双层羊皮的大氅和狍皮的靴子，戴着羊皮的防寒帽子，坐在小汽车里满身是汗。在瑷珲县境内的沿途上，有许多农民穿着破烂的单薄衣服手持木棒来往放哨，冻得浑身发抖，颜面苍白。这是瑷珲县县长为了我途中安全，特叫农民冒着风雪严寒出来给我放哨。当时我对于瑷珲县长的

---

* 作者时任伪黑河省公署民政厅长。

安排感到满意和感谢。而对于农民遭受的无妄之灾丝毫没有感到是自己的罪过，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是反人民的。

下午到了奇克县公署，伪县长周铸新和伪参事官村田都对我说：“据乌云县的电话，袭击佛山县城的不是普通‘匪人’乃是‘思想匪人’，现在还没有离开县城。厅长此去必须小心。”第二天早晨，乘上由县公署给我们准备的三辆爬犁继续前往佛山县。因为从奇克往前去都是山道和江道，汽车不能通行。我离开奇克县城经过了半小时的时间，听见前边有人马的嘶喊声。因为我知道在县城附近是没有“匪人”的，遂安心前进。愈走愈接近，乃是一堆日本兵在那里打骂人。我凑近去看，是黑河大泽部队的小队长日本人领着五六十名日本兵打骂赶爬犁的车夫。这是怎么一回事？小队长看见了我就和我打招呼。我问他怎么的啦？他说：“这些你呀（日本人轻视中国人的称呼）不听我们的命令，好像似有意反抗我们。厅长告诉他们，他们要再不听命令，就把他们打死。”他发令停止对车夫的打骂。我问车夫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听他们的命令呢？”车夫们争着说：“我们不是不听他们的命令，他们在爬犁上放那么重的东西，还坐那么多的人，马是实在拉不动，不让我们坐在爬犁上赶爬犁，叫我们在地下跑，我们也跑不动了，我们对他们说话，他们就打我们骂我们。”我把这话翻译给小队长听，他晃晃脑袋。我知道他是对这话不满意，我遂装腔作势地大声叱责车夫们说：“你们不要胡说，你们不听日本军的命令不行，小队长说了你们再不听命令，就要把你们打死。”车夫们看见我完全替日本人说话，也是横蛮不讲理，他们就都不吱声了。日本小队长看见我把车夫叱责了一顿，车夫们都不吭声了，他满意地对我说：“谢谢民政厅长。”他回头便对日本兵发令前进。饿狼般的日本兵都上了爬犁，霎时间每个爬犁上都长出了人山。车夫们看看爬犁都坐满了人，他们满脸都是带着愤恨的情绪，在雪地里跑着将爬犁赶走了。我们也坐上爬犁继续前进，由于我们的爬犁轻快，行不多时，就把日本兵坐的爬犁抛在后头看不见了。我们经过了一段山道又经过一段江道，交换了好几次，下午4点多钟到了乌云县城。

乌云县的土城围子上有许多保甲，手持木棒放哨，炮楼子上站满了持枪的伪警察，钉满“刺鬼”的卡子门紧紧地闭着，来往出人这门的人都受严厉的盘问和搜查。街上看不见一个普通人，来往的都是伪满军人。伪县长赵畏将我领到伪县公署内，县公署院内拴着很多的马匹和放着许多爬犁，有许多伪满军人出人，非常杂乱。伪县长赵畏对我说：“昨天黑河的满军开到这里，因为前方的情况不明，不能开往佛山去，暂时都住在这里，有骑兵有步兵，人数又多县城又小，家家户户都住满了兵，他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院的厢房里。我们听说‘匪人’向这方面移动，县里加紧了警备，每天都派保甲四处放哨，侦察‘匪情’。为了防备万一，把县的重要文件都埋起来了。厅长暂时不能往佛山县去，可以住在县里等候。”伪参事官增田和伪总务科长窦毓清也来见我们，也都说佛山县暂去不得，听听情报再说。我到厢房去见伪满军郎俊哲参谋长，我在那里看见了郎参谋长、刘团长、日系教官等人。郎参谋长对我说：“佛山县暂时不能去，有情报说‘匪人’已经离开佛山县城向这边移动，也有情报说‘匪人’仍然盘踞在佛山县城附近的山里，情况不明确，我们也不能前去，以后我们出发时再通知你。”我同石井贯一和张耀先都住在县公署最后院的房子里，伪县长、参事官、总务科长都天天来向我报

告情况，说什么日本军也来了，住在县城里把无线电架在县公署里了；还说什么抓住了一名从佛山县来的“奸细”。有一天伪满军的日本教官找我去谈话，他对我说：“将来你到佛山县城去对于现地的一些情况可能了解些，但是希望你要注意的是，对于袭击佛山县城的‘匪人’要说是从苏联过来的，这些‘匪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受苏联的指挥。我们日本军人都是以战死为荣，对于佛山国境监视队队长的战死，我是这样写的”。他把他写的原文读给我听。大致是说：当国境监视队被‘匪人’包围的时候，在‘匪’众我寡的情况下，国境监视队队长率领部下坚强抵抗，并奋不顾身跳到房顶上督励部下奋战，直战到弹尽力竭，遂割腹自决。他还对我说：“虽然与事实有些出入，这是我们替死去的人宣扬，你也必须要这样说。”他最后说：“我们出发的日子还没有决定。因为这些兵都不妥靠，不能急速进军。”我听了他对我的嘱咐，立即表示绝对遵守他的嘱咐。这时省里派往佛山县的伪参事官和伪警务指导官携带枪械来到乌云，伪黑河地区司令部的顾问内田实也来到乌云指挥伪满军。有一天郎参谋长派人告诉我说，他们当天下午出发。我要和郎参谋长取联络，将走出后院，张耀先从对面走来拦住我说：“厅长快回去吧，满军要砍人”。我听了就赶紧往回走又回到屋里。张耀先又走出去了。不多时张耀先来对我说：“方才满军砍了一个人，据说这人姓王，从佛山县城逃到乌云来的，县里将他抓去说他是‘奸细’，就将他交给满军，经过满军的军法讯问，今天拉到卡门外就砍了。那个人临被砍之前还喊冤，说他在佛山有家有业怎么说他是‘奸细’呢?他们不听那个，一战刀就把那个人的脑袋砍掉了，脖子上的肉皮往里一卷，血就蹿出来了，真惨啊!”我听他讲感到身上发麻，但是对于那个人是否应当杀，我没有深去想。

下午我准备要同伪满军往佛山县城去，这时伪满军的顾问内田实阻止我说：“你先别去，恐怕要有战斗，你暂留在这，等他们进入佛山县城后，你再去。我也不去，我也暂住在这。”石井贯一也从旁说：“厅长先别去，我同河上参事官、警务指导官先去，一切都准备了给厅长来电话，那时再去。”由于他们都那样主张，我遂和张耀先没有同伪满军去，石井贯一、河上参事官、伪警务指导官都随同伪满军出发了。这时我在乌云已经住了八天了。在伪满军出发后的第三天上午，我和内田实顾问、赵畏伪县长在屋里闲谈，因为我和内田实住在一个屋子里，县的伪警务指导官忽然从外面慌张地跑来，面色变得苍白，声音发颤地对内田实报告说：“‘匪人’已经来到离县城十里的山里”。内田实也立时面色变了，对伪警务指导官说：“赶快准备战斗!”伪警务指导官答应了一声“是”，就慌张地跑出去了。内田实掏出手枪对门对窗户都比量了一回，又把战刀抽出双手抱着也比量了一回又纳入刀鞘里，手持手枪坐在椅子上，好像在等着什么似的。过了一点多钟伪警务指导官缓步地走来，对内田实说：“方才的报告错了，据老百姓说在昨天晚间那山里有‘匪人’在那休息，早就走了。”内田实说：“‘匪人’虽然走了，再回来也未可知，必须小心戒备。”就这天的夜里，内田实一夜没有睡，坐在椅子上，有时掏出手枪比量比量，有时抽出战刀双手抱着比量比量。

又过了两天，石井贯一从佛山县城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同日本军、伪满军进入了佛山县城，县城里很平静，一切都准备好了，要我前去。我遂携同张耀先和十名护送的伪满兵乘爬犁前往佛山县城，途中在乌云县的雪水温住了一宿，于次日晚间到了佛山县城。虽然是天已经黑了，北风在怒吼着，伪佛山县夏县长和伪警务科宋科长率领着县城

的人列队接我。夏县长和宋科长领我先到石井贯一和河上参事官、伪警务指导官的住处，石井贯一悄悄地对我说："厅长，对地方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他们有许多人有'通匪'的嫌疑。河上参事官以前曾在这当过参事官，对于地方的一切都熟悉，对于每家每户都详细，明天再和厅长详细谈，今天厅长太累了。"我在那用晚饭后，伪夏县长又领我到另一个院的两间房子里，屋里点着煤油灯，没有一个人。他对我说："这是给厅长预备的住处，佛山县城一共才有七百多户人家，来了这么多的日本军和满军，房子都叫他们给占了，老百姓好几家挤在一家住。这家是个成衣铺，老少两辈，为给厅长预备住处，叫他们到别人家去行宿去了。"在这两间房子里，外屋有锅灶，放些盆碗筷子等食具，里屋地上放着做衣服的长案子，炕上放着旧箱子、旧柜子和几条旧被子，看屋里情况也是一个穷苦的人家。

我们刚坐下，从外面进来了十几个人，伪夏县长忙给我介绍，是商务会长、公医、保长、甲长……。他们满脸陪笑地对我说："厅长太辛苦了，特为我们县的事，冒着风雪严寒远道来到这里，我们是非常感谢的。因为遇到了这样不幸的事件，住处也不方便，请厅长原谅。"他们说完后都注视着我，看我说什么？按人情来说，是应当用善言安慰他们，对他们的厚意，应当表示感谢。而我在当时竟把脸一沉说："这没有什么。如果你们要是好好协助保卫县城，哪能发生这回不幸的事呢？哪用得着我大冬天的来呢？你们也少遭些罪呀！"他们看见我的脸色太冷酷，听见我所说的话太蛮横，便都沉默下去，表现出一种疑虑不安的表情。伪夏县长看明了这种情况，从旁说："厅长今天坐爬犁太累了，各位请回去吧，明天再来谈话来。"他们听夏县长那么说，也就借便对我说："天道太晚了，厅长请休息吧。"就都走了。

在那些人走后，夏县长对我说："这里的许多地方人，每天不是受满军的讯问，就是受日本宪兵队的调查，或者就是受警务指导官的调查，他们都是战战兢兢的恐惧不安，并且来了这么多的日本兵和满军，每天向他们要烧的要吃的，要米面酒肉，他们也是难于应付的。"那么县城是怎么受袭击的呢？夏县长回答我说："袭击县城的不是'胡匪'，乃是抗日联军景司令的部队。在那天晚间9点多钟，忽然听到县公署的墙外有枪声，因为我同参事官都住在县公署的里院，我们都急忙来到院里，问守卫炮楼子的人，是谁放枪，他们说夜黑什么也看不见。在我们正说话中，墙外的四面都响起了枪声，守卫炮楼子人随着也就放起枪来。我听见墙外有一个人说话公鸭嗓，好像国境监视队某人的声音，我疑惑是国境监视队兵变，我遂问：'你们是国境监视队吗？''不是'。墙外人回答说。我又问：'那你们是胡匪吗？''不是'。墙外人回答说。我又问：'那么，你们是谁，干什么来啦？''我们是抗日联军，来替你们杀日本人来了，赶快把日本人送出来'。墙外人回答说。我遂说：'日本人去喝酒去了，这里没有日本人，都是中国人'。这时国境监视队的警报喇叭连续地响，还听见窦商务会长在墙外叫我说：'司令有话，他们不杀中国人，你们不要放枪啦，赶快把日本人送出来，就完事啦'。参事官听说是要他，就拿枪上炮楼往墙外放枪，并督励守炮楼子的人往外放枪，参事官放了一会枪，子弹卡住了，他下来探枪，从门房窗户进来几个人，一枪就把他打死了，问我是谁？我说是县长。他们叫我告诉炮楼子上的人不要放枪啦。我看见参事官已经被打死了，遂大声喊着说：'你们别放枪啦，把枪放下，赶快下来吧？'枪声就停止了。

他们把大门打开，墙外的人进来点火就把县公署的房子烧了，说这是危害人民的机关不留着它。他们要我同他们到国境监视队去，告诉国境监视队不要放枪。我同他们到国境监视队，看见国境监视队都在屋里，从屋里往外放枪，外面有很多人包围着，窦商务会长正在劝说国境监视队。他们叫我说话，我遂对国境监视队说：‘你们别打啦，放下枪吧，他们决不杀你们，我们县已经不打了。’国境监视队听我说也就把枪放下都从屋里出来了。”“国境监视队的队长是怎么被打死的呢?”我问。夏县长说：“那天晚间他没有在队里，是从他家里把他搜出来杀死的。”我这才明白伪满军教官关于国境监视队长所谓战死的报告完全是伪造的。我又问夏县长：“小林警务指导官是怎样被杀的呢?”夏县长说：“小林警务指导官不是住在县公署里，在外面租房住，当时他同他的老婆离开了他的家，藏在别人家的天棚上，因而在当夜没有被抓住，次日他们逐户搜查日本人，把小林警务指导官和他的老婆搜出来，带到江沿就杀了。”“那么以后又怎么的啦?”我又问。夏县长说：“抗日联军在杀完了小林警务指导官和小林的老婆之后，对老百姓说，我们是给你们报仇来了，这些日本鬼子对你们太残酷了，不杀死他们是不能解你们的恨的。讲完话后就整队退入山里去了。他们这次来，对于老百姓丝毫没有损害，只是杀死了四个日本人和把县公署房子烧毁了。在他们走后，由于电话和电报都被破坏，遂派人到稻田地给乌云县去电话，求他们给联络报告。在抗日联军退去的第三天，来了一架飞机，我们认为是从省里来的一定有所指示，遂急忙往飞机场跑，不料想飞机没有着地，在县城上空绕了好几个圈子投下数颗炸弹，把老百姓炸伤了好几个人，而后飞去了。以后日本军、满军和石井科长、河上参事官及警务指导官等来到县城，我已经将经过情形对他们详细报告了。可是他们每天不断找地方人讯问和调查，对我都很疏远。”

次日早晨，我同张耀先还在炕上睡觉，被一种声音惊醒了。我睁开眼睛看是窦商务会长领两个人抬来一口杀死的肥猪，他们将猪放在地桌上，窦商务会长对我说：“厅长为了我们县的事，不避风雪严寒远道来县，我们非常感谢，特送一口猪来，以表示我们的心情，请收下吧”。我抬头看看那口肥猪，本想把它留下，但是又一想留下它不好，要是被日本军和满军听说了，与自己不利。于是我对窦商务会长说：“我谢谢你们，我不要，你们把它抬回去吧。”表示了很坚决的态度。窦商务会长看我拒绝不收的态度很坚决，遂叫那两个人把猪抬走了。

我起床后同张耀先先到石井贯一的住处。在我同石井贯一、河上参事官、伪警务指导官等吃早饭的时候，窦商务会长领着许多人走出屋来，站在地下对我说：“厅长，昨天责备我们不协助县保卫县城。他们听说，都要来对厅长表示决心，今后一定好好协助县保卫县城。”这时那些人都说：“我们一定好好协助县保卫县城。”也有人说：“请发给我们枪，来‘匪人’时我们好打去。”我看看这种情况，知道是昨晚对他们说得太重了，使他们发生了恐惧不安的情绪。但是，话已经说出又不能把它收回来，更不应当对他们表示软弱，承认说错了，我遂疾言厉色地对他们说：“你们别在这闹腾啦！你们有决心协助县保卫县城，那是很好的。但是，对于这回事件，你们是都负有责任的。”他们看见我的态度和言语仍然是那样冷酷蛮横，遂都以沉默回答了我，而就走出去了。

在那些地方人走后，伪民政厅行政科长石井贯一对我说：“厅长方才对待地方人的

态度和对他们所说的话都太对了。对于这次事件的发生和经过的情况，想县长已经报告过了。从一切事实来看，这里的地方人有许多人是通‘匪’的，特别是那窦商务会长这个东西太明显了。县长也应负责任的，他在参事官死后就投降了‘匪人’，还制止了国境监视队抵抗。”河上参事官从旁插嘴说：“小林警务指导官的所以被抓住，是由于有人告密。小林警务指导官的房东孙寡妇是有很大嫌疑的。小林住她的房子，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不大好，孙寡妇很仇恨小林。”我听了这两个日本人的这番话，在我的脑子暗想，幸而自己从昨天晚间到县以来，对地方人采取了冷酷的态度，使用了蛮横的语言，对县长也采取了客观的冷淡的态度。如果是对他们表示了亲近和同情，那岂不是与自己很不利了。

我命令伪民政厅教育科股长张耀先用我名义写布告，主要说由于窜来“匪类”将县公署烧毁，县城呈现了一时的混乱状况。现在“匪类”经日本军和“满军”的讨伐、殆被歼灭，县公署将立即恢复，开始办公。仰县民都必须安份守己、各安己业、听从县令，勿作庸人自扰。如有造谣生非、违反县令破坏秩序、紊乱治安，予以严惩。不多时，张耀先将布告稿拟好了。这时夏县长和宋伪警务科长问：“哪可以利用作为县公署办公地点?”夏县长说：“只有小学校可以利用。”河上参事官从旁也说：“除了小学校以外没有适当的房子。”我遂对夏县长说：“那么，就把佛山县公署的牌子挂在小学校的门口，暂时在小学校办公，学校可以暂时停课。”我还对夏县长说：你们要从现在就着手准备，明天给死去的人开追悼会，要邀请日本军小队长，“满军”郎俊哲参谋长、刘团长和日系教官来参加，也还要告诉地方人来参加。我最后对夏县长说：“后天县公署就开始办公，在那天的上午要举行一个恢复县公署的仪式，我去讲话要县公署的全部职员和地方人参加。”夏县长听我指示后，立即将布告稿交给宋伪警务科长，叫他回去找人办理并着手准备一切。

在宋伪警务科长走后，夏县长引导我们到伪县公署的旧址去看，过去伪县公署的面貌完全没有了，只剩下焦黑的残骸，散发着一种刺人的臭气，在那前边放着盛有日本人尸体的四口大棺材。我在当时感到凄惨。夏县长又引导我到小林伪警务指导官被抓的地点去看，那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家庭，一间房子里吊有半截席子的天棚，小林和他的老婆就是藏在这个天棚里而被搜出来的。这家只有两口人，一位 50 多岁的男子领着一个 7 岁的孩子以劳动为生，这位老乡的妻子已经死去多年了。据这位老乡说，那天夜里小林和小林的老婆跑到他家藏在他的天棚里，第二天，他们挨家挨户搜查日本人，从天棚里把小林和小林的老婆搜出带到江沿就杀了。那位老乡在和我说话的时候，他脸上呈着恐惧不安的情绪。那个 7 岁的孩子紧紧地拽着他爸爸的手，身子紧紧地靠着他爸爸的大腿，惊慌地瞧着我。夏县长还又引导我到国境监视队的旧址去看，院子里躺着一匹被枪弹打死的马，据说，那是队长的马，在他回家后还把马留在队里喂。房子的四面墙上有一些弹痕，还有从屋里掏的大窟窿。

次日上午，我携同张耀先、石井贯一到小学校去给死者开追悼会。一个五间房子的大教室挂满了地方人送给死者的挽联，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伪县公署全体职员、日本军小队长、“满军”的郎参谋长、刘团长、日系教官外，还有许多地方人。追悼会的仪式是按日本的仪式进行的，在我和日本军小队长、“满军”参谋长、伪县长读完祭文后，即

开始逐次烧香，地方人也都烧了香。我为了给活着的日本人看，特在我读的祭文中大肆为死者吹嘘，把他那种对人民灭绝人寰的残暴，说成是所谓爱民如子的人民的恩人，对这些人之死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惋惜。

又次日的上午，我携同张耀先和石井贯一又到小学校去参加恢复县公署的仪式。在小学校的大门上已经挂上了伪佛山县公署的牌子和日“满”国旗，伪县公署的职员已经开始在这办公了。恢复县公署的仪式还是在昨天开追悼会的那个大屋子里举行的，在屋子里的一头放着一个讲桌，墙上挂着日“满”国旗。面对那个讲桌，一边站的是伪县公署职员，另一边站的是地方人。在一同向日“满”国旗敬礼后，伪县长宣布佛山县公署从今天起在这开始办公，其次就是我的训示。在训示里我主要地说：“发生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你们对于治安的马虎大意，县民对县公署的协助不够，县内日满的团结不好。县公署被烧毁，县政中断了十余日，从今天已经恢复，并从省派来熟知佛山县地方情况的河上参事官和警务指导官，你们要在他们的指导下推行县政、保卫县城。现在日‘满’大军来县讨伐‘匪类’，你们要尽全力协助他们，不论是人力、物力，以便他们在短时间内将‘匪类’歼灭罄尽。旧县公署虽然被烧毁，我回到省后立即请求中央拨款，修建比旧县公署更壮观更坚固的堡垒式的新县公署。”最后我说：“不论是县公署的职员或是一般县民都要认真奉公守法，安份守己，实践日满亲善，如敢违反，必予以严惩。”听我讲话的地方人的眼睛里，都闪着鄙夷的亮光，似乎是在骂我。在我讲话后，伪夏县长和河上参事官都相继讲了话。他们讲话的内容，大致都是敷衍我的训示。在恢复伪县公署的仪式终了后，我到各办公室巡视了一遍，就携同张耀先、石井贯一离开县公署返回我的住处。在途中石井贯一很称赞我说的“训示”。他说：“今天厅长的训示说得很好，很有意义，是给县公署职员和地方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诲。”我叫石井贯一给总务厅长去电报，报告恢复伪县公署的工作已经完成。

第二天下午，石井贯一来到我的住处，掏出一张从日本军转来的电报给我看，那是伪总务厅长给我来的电报，告诉我明天派飞机来接我回省。我约石井贯一随我一同回去。他说他暂时还不能回去，因为死去的遗骨还没有处理好，以后他携带遗骨回去。次日的午前11点多钟飞机飞来了。我携同张耀先到飞机场去。伪夏县长、河上参事官、伪警务指导官、石井贯一、伪县公署职员的一部分和许多地方人到飞机场来送我。在我临上飞机之前窦商务会长凑过来对我说：“我们地方人一定根据厅长的指示去做，请厅长放心。厅长回省后，多给我们地方人美言美言。”说这话时窦商务会长挤满皱纹的脸上表现出轻蔑的微笑。好像他的心里在说：你这丧心病狂的汉奸，对你说什么也是无动于衷。

我回省后，立即根据伪夏县长、石井科长、河上参事官所说的佛山县城被袭击的情况和日本人被杀的情况，以及我到县后所采取的措施和经过的情况，都详细地报告给伪省长钟毓、伪总务厅长河内由藏、伪警务厅长大园长喜。但是，对于国境监视队长的被杀情况，根据伪黑河地区司令部日本教官的主意，而没有说出他是在他家里被抓住的。我并建议佛山县城一面临江三面环山地势不佳，必须修建一个堡垒式的县公署和住有大量的军队。警务厅长大园长喜主张将山里的居民全部赶出，将山内所有的房屋全部烧毁制造无人区。伪黑河省长钟毓、伪总务厅长河内由藏和警务厅长大园长喜部都很重视佛

山的事件，伪总务厅长和伪警务厅长都先后分别乘飞机各到佛山县城一次进行调查和指示。

在1937年的5月里，伪民政厅教育科股长张耀先对我说，他听人传说，佛山县的夏县长被带到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受军法裁判，窦商务会长和小林警务指导官的房东孙寡妇以及她的男仆人都被伪满军杀死了。我问伪省长钟毓是否有此事？钟毓对我说，他也听人这样传说，但是，没有听总务厅长和伪警务厅长报告过，只听见伪总务厅长报告说，关于佛山县堡垒式县公署问题，已经得到“中央”认可，即将动工修建。还听见伪警务厅长报告说，关于佛山县制造无人区问题，已经得到“中央”批准，即将施行。

6月的伪政府公报发表伪佛山县长夏某免职，后任由伪乌云县总务科长窦毓清调充。

（1962年11月）

从弓长岭辅导院看“矫正”的实质

刘殿凯[*]

日本为了统治和残害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中国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统治机构，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手段。这里记述的是“矫正辅导院”的情况。我在1944年4月被抓，押送去辽阳弓长岭“矫正辅导院”，直到1945年8月光复时才逃出这座人间地狱。在那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受尽了人间的苦难。这一段的经历，虽然事隔近20年，但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

一、“矫正辅导院”是一个什么机构

1944年，我三十岁。我学的是瓦匠手艺，这种职业带有季节性，每年只能在解冻和上冻之间，大约有六七个月的时间，在各城市搞修建，其余的时候就得呆在家里。这时农业也无活可干，只好做点小买卖，或者赋闲。在旧社会，我们这些人，被称之为“手艺棒子”，在农村来说算是手头富裕的人，也是被敲诈勒索的对象。在我被抓之前，伪警察署的一个叫吴恩涛的杂役有一天对我说：“你应当破点财，不然对你可能要不利。”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事，吴没有直接回答，只说：“若是舍不得钱，就出外躲躲，我同你的老人不错，才来告诉你，信不信由你吧！”我当时想，自己没有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只是看小牌，这也算不了什么。而另一方面，又见姓吴的说得很恳切，心里总是半信半疑，想通过他去行贿，可是我知道三十、五十的数目是绝对拿不出手的，若拿二百三百元，自己又实在拿不出，只好出外躲躲。在我还没来得及出走的时候，一天晚间我就被抓去了，罪名是“赌后犯”（赌钱当时没抓，以后抓的叫赌后犯）。我当时想，什么“赌后犯”，我要是有钱行贿就不会有这件事。当晚被押在伪警察署的拘留所里。那一天一共抓了四十多个人，其中确实有一些不务正业的赌棍和抽大烟、扎吗啡的人，其余大部分是农民，干我们这行的手艺棒子有六七个人。第二天，就把我们这些“犯人”，用三辆大车解往伪辽阳县公署。这时发现那些真正不务正业的人，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来，有一些家庭比较富裕的人也没有来，剩下的就是我们这几个手艺棒子和十几个穷苦农民，共计能有二十余人。我们都被绑上了双手，不准说话，真像被解往法场的犯人一样。家属前来送行，只允许把送来的东西留下，根本不准接近说话。

当天下午，我们被解送到伪辽阳县警务厅。当时还幻想可能有人来过堂，也好诉诉冤枉，但没有一个人出来问我们，也没有人说将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惟一引

---

* 作者曾在辽阳弓长岭“矫正辅导院”被关押。

起这些豺狼们兴趣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衣服口袋和随身携带的小包袱，都经过彻底的检查，结果使他们很失望。因为钱和比较值钱的一点东西，都早已在路上被掠夺光了。剩下的是一些臭袜子、破裤衩子，当然不会引起这些“皇帝陛下的警察官”（这是伪满警察给自己加上的头衔）的兴趣。我们随身剩下的这点东西，才算幸免于难。

就在当天的傍晚，一共四百多人，被押上火车闷罐，一直开到弓长岭。下车后，由武装人员押解到这座人间的地狱—弓长岭“矫正辅导院”。后来逐渐了解到，集体被抓解送来的占绝大多数。

“矫正辅导院”，究竟算是一个什么机构呢？说它是监狱，可是被“矫正”的人都不是犯了什么法、被法院判了徒刑的人；说他是劳工，可是被“矫正”的人，既无自由又无固定的劳动期限。因此，说它是人间地狱，残害中国人民的劳动集中营，这是切合实际的。

二、矫正院的统治内幕

作为被“矫正”的人来说，是不能了解统治者的内幕的，但可以提供被迫害的情形，通过我们被迫害的情形，是可以看出其统治内幕的。

“矫正院”的组织

“矫正院”的详细组织情况，我不大清楚，经常同我们有关系的是辅导科和医务科，科长都是日本人，副科长是“满洲人”（这和其他机构是不同的），连同辅导警在内，大约七八十人的样子，它的主要任务是防止逃跑和监督劳动。

当时弓长岭“矫正院”，约有六千多人（年龄大约从十六七岁到五十岁左右），编为九个大队，大队下设小队，大队长是由辅导警担任的，小队长是由院方指定被“矫正”人担任。劳动和生活都是以大队为单位，小队不起什么作用。

平素“矫正院”并不进行什么“思想矫正”，只在我们初来时，听过一个日本人的一次训话，大意是：你们都是流浪者，无家无业的人，良心的通通地坏了的，现在在这边干活，跑了的不行。跑了的抓回来一定打死，磨洋磨洋的干活不行，随便说话的不行……。大概说了十多个不行。以后又说，好好的干活，可以放出去找职业。这就是惟一的一次“思想矫正”。以后，除不断听过因干活不好而挨骂和听过所谓皇军胜利消息之外，再没有什么“思想矫正”的活动。在日常管理上，是十分严的。“矫正院”的周围有一个高的双层电网，晚间有拉着洋狗的武装巡逻警卫。并有明文规定：不论任何时候，不准单独行动，不准走近电网，走近者即以逃跑论处，打死不论。晚间熄灯后不准说话，上厕所要经过请假批准等等。

“矫正院”中的“矫正院”

这是专门为逃跑被抓回来以及所谓不好好干活的人设立的。被“矫正”的人都把它叫做“黑屋子”。被抓进“黑屋子”的人，十个许能活着出来一二人，也是被打得遍体鳞伤，是一个活死人；其余全部被折磨而死。几乎每天晚间“黑屋子”里都要发出

凄惨的叫声，使人听之毛骨悚然。监工人员也经常以此相威胁说：谁要想逃跑和不好好干活就抓进“黑屋子”。造成所有的人胆战心惊，不敢越轨一步。

“十八层地狱”

被“矫正”人员所住的十八栋宿舍，我们都叫它是“十八层地狱”。六千多人分住在十八栋宿舍里，开始是拥挤不堪，晚间睡觉要想翻身，根本翻不了，只好起来重新躺下。在夏天的时候，屋子里闷热，又有三百多人住在一起，真是挥汗如雨，散发的臭气熏人，加上蚊子、跳蚤，使你很难睡觉。到冬天炕不烧火，屋子不严实，四处透风，所有的人都只有一床薄得可怜的小被，如果人多拥挤在一起还可互相取暖，可是这时由于逃跑和大批死亡，有的屋子差不多减少有一半人，所以想挤在一起，互相取暖都不可能了。开始还准许自己拾点乱柴禾取暖，后来也被禁止了，晚间冻得都不能入睡。

“摩登的服装”

我们所穿的衣服，一律是土黄色的半袖和紧腿的衣裤，所以我们叫它是“摩登的服装”。为什么要半袖呢？这是为了防止我们逃跑而设计制造的一种特殊的服装。个人携带的衣服，也一律要改为半袖，不然就会被认为“图谋逃跑”，轻则是衣服没收，重则是顿毒打。其实我们这些人，不用穿特殊的服装就可以被识别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是长长的头发，经年不洗，又黑又黄的瘦脸，再加一套土黄色的服装，还会不被认出是囚犯吗？

被层层克扣的伙食

说到吃的那就更可怜了。据说，上边“规定”我们这些人的食粮是按重体力劳动的定量配给的（每天大约一斤七两到二斤），可是经过层层的克扣，我们所能吃到的东西，每天早上是高粱米粥，午间是发了霉的小窝头三个，晚间仍是粥，就其数量来说，充其量不过一斤多一点；就其质量来说，粮食发霉，粥里的砂子多得几乎可以和饭相等，喝粥的时候，只能像喝水那样，根本不敢用嘴去嚼。至于说到菜，除了咸菜就是盐水。偶尔咸菜里有点生豆油，或者偶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臭鱼，就算是给我们改善生活了。当时，除了不能吃饭的病人之外，是没有一个人能吃饱的。

皮鞭下的劳动

弓长岭是伪满鞍山昭和制钢所的附属矿山，主要劳动是给鞍山昭和制钢所开凿矿石。全部工段，坑上坑下共9层，坑深在3米左右。我们是开采矿石和把矿石抬出来，然后装火车运往鞍山。每天纯劳动时间在11小时以上。这种劳动不仅是很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也有很大的危险。劳动事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小的是碰伤，稍重一点的是残废，再重的就是当场死去。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现在所能回忆起来的塌顶事故就有四次，共死伤百余人。

在我们被抓进来时，日本人讲过“好好干活可以放出去”，所以大家开始劳动时，总幻想通过好好的劳动，好跳出这个火坑。可是时间久了，一方面被折磨得实在干不

动，一方面也不相信日本人的鬼话了。于是比较普遍地采取了“磨洋工”的态度。监工的在场就干，不在场就不干或者假干，所以劳动定额经常不能完成。日本人采取的办法是加强监视，打人骂人那是经常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没挨过打骂的。

病人的遭遇

在这样恶劣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折磨之下，所有的人都有一两种甚至更多种的疾病。小病根本不能得到休息，也要照样干活。大病名义上可以到医疗所就诊，可是，这个医疗所根本没有什么给病人治病的药，病人去看病，有病志和处方，可就是没有药，他们却可以用此作为向上边领取药品的凭证。有时“医生”（实在是一些杀人的刽子手，不能算是医生）对病人说，你的病很重，不治很危险，接着就说什么是特效药，需要多少钱在外面可以买到等等。你若是怕死就得拿出钱来求他。至于用钱买诊断书，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不管你是真病还是假病，有钱才能开出诊断书（有诊断书才可以休息），每张诊断书的价钱，按实际病情而定，一般是十几元至百元左右，真病和病重的就贱一点，假病和病轻的就贵一点。后来发展到出几百元可以买到回家就医的诊断书。大家都明白，这是拿钱买命，不管多少钱，命总比钱贵，可是家里拿不出钱来，也就只好认命了。

三、一笔难以计算的血债

被“矫正”的人，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并且在监工的皮鞭子监督下，每天从事11个小时以上的劳动，加上心情的忧愁，在这种情况下，全部6000人没有一个不患有这样或那样病症的，形成了规律是：没病到有病，小病变大病，大病到死亡。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矫正辅导院”，究竟残杀了多少中国人民，这个具体数字恐怕连日本殖民统治者也说不清楚。就我在弓长岭这一个地方，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最少在2000人以上。死去的从来也不通知家属领尸（虽然他们说我们是无家无业的流浪者，可他们确知道我们是真有家的）。死了就往距宿舍三里远近的一个大坑里一埋（我们叫它是万人坑），招来无数的乌鸦和野狗，一到夏天臭气难闻。

根据我一年多时间的体验，日本人设“矫正辅导院”，就是通过这野蛮的统治，一方面强迫劳动，一方面大量地杀害中国劳动人民。简单地说，就是又叫中国人给它干活，又要中国人的命。我看这就是“矫正辅导院”的实质，不能再有别的解释。

（金杰根据作者口述记录整理，1965年）

记日伪监狱见闻三事

张 大 光*

1944年春我被日伪警察逮捕，先拘押在伪满滨江省警务厅特务分室，后又到哈尔滨监狱。目睹耳闻许多日伪的残暴情况，每忆及此，不觉毛骨悚然，今仅记其三事。

一、严刑逼供 饿死了案

严刑逼供、饿死了案，是伪满滨江省警务厅特务分室的残暴手段。这里是伪满拘押所谓“国事犯”的秘密场所（地点在当时的哈尔滨道里警察街），也是日本宪兵队的代理机关，这里拘押的人很多，有苏联人，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凡是有反满抗日嫌疑的人，被逮捕后多半都是送到这里进行秘密审讯。有许多人是从大马路上被追踪逮捕的，也有的是在半夜里从某处抓来的，一经送到这里，家人就无从知其下落。这个秘密杀人的地方从外面看，和普通住宅一样，但一进角门，便有兵把守，警戒森严。拘禁室的看守都是日本人，每周要更换一次，恐怕走漏消息。我当时被关在一个小号里，有三个人在内，禁止谈话，每次都是日本警察亲自来提审，翻译都不能和我随便说话。每天给两小碗饭吃，有时给一块咸菜，有时只给几个盐粒。拘押过十几个月的人大半被折磨死，每天晚间都听到刑房里受刑的人呼天嚎地，有不少人在当时被“大挂”刑挂死或被电刑打死，或被凉水灌死，也有受其他刑回到号里死去的。对死了的人都是把尸体上下折到一起，用柳条包装好送到万人坑里（在哈尔滨近郊某处），因此到这里的人来去不明、死活不知。更惨的是，有的人活活被饿死在这里，死后仍用柳条包装好送到万人坑里去，家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初到拘禁室时见到墙上写有某年月日，某某饿死于此室，我还以为每天给两碗饭吃不至饿死，以后才知道，这是对不招供的人，不给他饭吃活活饿死的。在我住的隔壁一个号，共有六个人竟被活活饿死五个，据事后知道，其中有伪满巴彦县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孔庆尧，还有一个叫李忠孝的，其余三人，忘记其姓名，他们都是反满抗日人士，因为招不出什么供来，日警就不放他们，所以就把他们饿死在这里。其中另一个人以后被送到哈尔滨监狱，我俩又住到一个监号，他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我，以后我曾问过从巴彦县送来的犯人，有一个青年说孔庆尧正是他们的校长，在一年前某夜，在回家途中失踪以后，遍寻不得，不知所终。我把他遭遇的情况说了一遍，希望他能转告孔的家属，是否已转达到就不得而知了。

---

* 作者曾在日伪监狱被拘押。

二、集体审讯　成批屠杀

1943年日伪当局在哈尔滨监狱屠杀一批农民，这批农民都是从肇源县逮捕来的，有的是由于给当时的抗日联军送过饭的，有的是住在山林地方被日本侵略当局目之为抗日联军的“探子”，也有的说成是“通匪”的。总之，在各种借口之下，搜捕了数百名农民，除有些在当时即被处死外，送到哈尔滨监狱的有二百多人，当时监狱里的人都呼之为“豆包”案子（其中有些人曾成车地给抗日联军送过豆馒头而被逮捕）。这些人在被捕后都受过残酷的刑讯，有的被折断了手指，有的被打穿了肋骨，但都不曾供出什么，日警深怕这一案人多势众发生意外，所以就急于处理，乃于1943年春实行成批屠杀。手段是在监狱里有几十个日警同时审询，问明年龄、住址，迫令划押，立即送到刑场执行死刑，在三天之内竟屠杀了180多人，只剩下十几个老弱病残的。1944年夏，我到哈尔滨监狱不久，曾有几个人告诉我这件惨案，其中一个是宾县人姓李（忘其名），就因为他说话是山东口音，日警就说他是抗日联军的“探子”，刑讯了几个月什么事都不知道，但日警仍关押不放，像他这种情况而被关押的还很多。日本对抗日联军深恶恐惧，所以就对农民进行疯狂的屠杀，特别是在“三肇”地区（肇源、肇州、肇东）更是杀人无数。

三、加罪有名　判决无词

日本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为了大批驱使青年人去服劳役，曾想出许多名堂对一些失业青年妄加罪名，集中起来去服劳役，“思想矫正院”就是一种。这是一种加罪有名、判决无词的拘押失业青年的机构。在所谓“矫正”青年思想的借口下，大量搜捕失业青年，然后再成批地送到服劳役的场所去。期限由一年到三年，如幸得不死，才得恢复自由。此外，各地的警察署也是一种搜捕失业青年的地方，凡是被逮捕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给加上“窃盗”的罪名，然后送到监狱，在一周内由法院送来判决书一张，名为“料事判决”，上面仅仅写着根据逮捕机关的提诉，判处几年有期徒刑，别无其他词句。这也是藉名加罪迫令服役的一种手段，这种判决形式既简单，时间又来得快，凡是集中到监狱的一些失业青年，很快就被“料事判决”而送到服劳役的地方去。有许多人在劳役场所，由于不堪虐待而死亡，也有的冒死逃跑出来，但在逃出之后，仍然会再被抓回去。我在哈尔滨监狱就遇到一个姓王的青年，在七个月之内，就被“料事判决”过三次，第一次被送到劳役场所之后，在一个多星期就冒死逃跑，不到一个月又以无业而被捕，被第二次“料事判决”送到劳役场所，后又冒死逃回，不久又被第三次逮捕，为了加重其逃跑“罪行”被“料事判决”五年徒刑，照例是送到劳役场所去，这不过只是一个例子而已。青年由于失业而一番两次被警察抓去，以“料事判决”的办法而强迫其服劳役，及在这种加罪有名、判决无词的情况下而死亡的青年不计其数。

（1962年9月）

日本推行民族离间政策的几个具体事例

爱新觉罗·溥杰*

（1）日本在九一八以后，便致力于东北各民族间的离间挑拨。例如大肆煽惑蒙古民族仇视汉族。把蒙古民族聚居的“兴安省”划为关东军直接控制、支配下的地域，不论行政、军队等等的事项，都把它与伪满窃据下的一般各地区截然地分开来，甚至于特地炮制出“成吉思汗旗”，以表示日本“重视”蒙古族（但是后来那种政策又改变了）。

（2）满族与汉族的分家，也是日本一贯实施的奸策中的最毒辣的一环。例如在选派伪满驻汪伪政权的伪大使馆武官时，也曾公然表示汉人靠不住，须选用满族的人才能放心。佟衡及伊贵亨的前后当选，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3）在1943年—1945年的“铁石部队”中，也是表示愿意大量地使用蒙古族的伪官和兵，夸示蒙古人的“勇敢”和“诚实”，并寝食难安地防范着汉族伪官、兵的反正。

（4）日本殖民者也曾空中楼阁地硬作出一本伪历史来，用以蛊惑蒙古、汉民族的视听，藉以缓和或麻痹对日的仇视或不平不满。书中引用了许多牵强附会的事例，硬说成吉思汗就是日本的源义经（源义经是日本古代历史中的一个失败亡命的英雄），说他在日本兵败，辗转逃到中国的蒙古地方，一变而当上了成吉思汗；又作书宣传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也是源义经之后，并无耻地硬说满清的皇帝乾隆曾在“诏书”中说过：“朕，源氏之后也”。凡此种种都是日本处心积虑地想要拆散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所用的鬼魅伎俩。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中校侍从武官。

离间破坏民族感情

曲 秉 善

在伪满时，中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老者死，幼者病，壮者勉强挣扎在饥寒劳役线上，而日本殖民者们却常自夸地说："我们日本人对待异民族比希特勒对待被征服民族，比英国对待印度好得太多了。"这话，1941 年我在伪协和会听半田敏治讲过，1942 年又在伪民政部听次长源田松三讲过。

日本侵略者用离间挑拨手段，使在东北杂居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互相之间，彼此攻击，互相杀斗，妄想藉此得渔人之利。日本殖民者对朝鲜族人常说："你们虽然是朝鲜民族，但你们也是皇国臣民，不应当受满洲人（指中国人）的欺辱。"据海龙县的伪县长对我说，日本警察就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挑拨是非，破坏民族间的感情，使县内居住的朝鲜族和汉族相互间常发生冲突。日本殖民统治者们又常对蒙古族说："你们不要忘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血债，我们给你们做主，尽管报复，向汉人讨还血债。"所以，蒙古族、汉族杂居之处，常起民族间的纠纷。双辽县的伪县长曾对我讲过，在双辽县境居住的蒙古族中，因被日人煽动，有过要向汉族报仇的言论。

金川耕作与“五三部队”和成吉思汗庙

郭 文 林*

（一）在日本战犯金川耕作的主持下，于1942年8月间，在通辽编成“谋略部队”。这是直辖于关东军的，队长是矶野，队员都是蒙古族。该部队于1943年3月间队号改为“五三部队”，移驻王爷庙（街的北方，距街15公里处）。这时队长是由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兼任，队附是松浦中佐。部队的内部极其秘密，不许外人进一步，有违犯者打死勿论，甚至于队员的家属也不许进去。金川耕作编成这种部队的目的，是一旦发生战争时，用这部队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而且做间谍特务活动，撒布细菌，散布传单等等，总之是扰乱人心，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不用说，它的矛头是指向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这个部队教育训练的主要课目，是灌输用惨无人道的恶辣手段来杀人放火的日本帝国武士道精神。这个部队为什么单要用蒙古族呢？大特务金川耕作说：“蒙古人有成吉思汗遗传下来的武士道精神，蒙古人是服从心强，而你们的祖先成吉思汗被谁而灭亡的，不是别人，正是明朝，就是汉族人，他就是蒙古人的敌人，也是日本的敌人。所以日本信不着汉人，因此要用蒙古人。”那么它真信得着蒙古族吗？肯定地说，不可能的。金川耕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特务，这样作是笼络人心，另一方面也是用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的老一套来恶化民族之间关系。

（二）1943年9月30日，在王爷庙隆重举行了成吉思汗庙的竣工典礼。这座庙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鼓动者和主持者是谁呢？不是别人，还是金川耕作。他在1941年得到日本关东军的许可后，这就开始东奔西走，到各王府、各省、县，鼓动建筑该庙。结果是，决定首先在王爷庙设立奉建委员会（委员长是伪兴安总裁巴特玛拉布坦，副委员长是伪陆军兴安学校校长甘珠尔扎布少将，他补第九军管区司令官，由我接校长和副委员长），委员会决定建筑预算是300万元。但决定首先要建筑庙的正殿，因此先捐募了160万元。关东军捐了20万元，各王公捐了一部分，其余都是由老百姓担负。建筑所需要的手艺人员（如石匠、画匠、雕刻匠），都是金川耕作托驻在北京的特务机关从北京招集来的。他还到日本各地弄来了很多的钱。他在委员会上发言时说：“我在兴安呆了已有十余年，我现在一心一意为奉建该庙而奋斗，一定把你们祖先伟大的人物成吉思汗的庙建筑完竣。”金川耕作为什么要这样作？这是金川耕作以成吉思汗庙作为幌子，以此笼络人心，麻痹蒙古族人民的思想，好给日本帝国主义忠心耿耿去当奴隶。这就是帝国主义统治、奴化其他民族的一种最恶辣的最有毒素的政策之一。

---

* 作者时任伪陆军兴安学校校长。

日伪推行反动民族政策及其后果

王之佑*

一、日本从帝俄手中夺去了中国领土旅大、金州各地使其变成了“关东州”，又取得了南满铁路沿线的“治外法权”之后，就一直实行帝国主义民族政策，不但日本人在东北犯法不受中国法庭及警察的裁决，就是在东北的朝鲜人和“关东州”内人也援例享有特殊待遇。由此引起的人民间的纠纷是太多了，著名的万宝山事件，就是一个实例。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在武力侵略的同时，更要尽伎俩，分裂东北人民的团结，极力挑拨引起民族间的恶感。当时执行侵略政策的这些日本战犯们，在军事和政治上，把满、蒙古、朝鲜、回、汉以及“关东州”内各民族，都对立起来，分别等级，层层压迫，于是东北人民口中很流行的说法是“金大哥、鲜大叔、日本二大爷”，这句话表示出人民群众的反感。

二、日本实行殖民地民族政策的罪恶事实

（甲）日本人高于一切，其他民族都是奴隶牛马：

日本人在中国的强横凶暴，是每个中国人所熟知的。只就在伪满供奉“天照大神”和以昭和天皇为“现人神”一事而言，就是表明：日本人是大神子孙，是优秀民族，他们是高于一切民族的。日本天皇是东北各民族的“现人神”，所以东北各民族都应受其统治，并作他子子孙孙的奴隶和牛马，永远不得平等。而对“关东州”的中国人竟直称“州人”，与称朝鲜人为“鲜人”同出一例，就明确指出是亡国奴了。在这个基础上，于是在统治伪满的各机构中，日本人是指挥驱使东北各民族的主人，高于一切。同时又把东北各民族间，区分出奴隶等级，给予差别待遇。官吏俸给，日本人是最高，而“鲜人”次之（这是1933年由古海忠之任给与科长定的）。加俸进级，日本人足年就加俸，够停年就进级，朝鲜、满、蒙古族比较稍优，汉民族有够三个停年以上始进一级的。而日本退役军官，加入“满军”就进一级（例如伪满最后的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就是日本“二二六”事变退下的炮兵大佐，来充伪满训练处干事，就先补少将）。生活待遇，日本人和朝鲜族（这指准日本人的官吏）就吃大米鱼肉，配给日用生活用品；其他民族的，就没有这种待遇或差别待遇（例如高级官吏给点米面，配给品里有“日、鲜专用，满系无”的规定，最后中国人连锅碗都买不着）。至于东北人民，则少衣无食，高粱米、豆饼面也供给不上（因非日本人而吃大米被检举的案子，无处不有）。就是伪满军在“讨伐”行动时也不准吃，我就因给部队和病伤兵大米吃，被伪通化省控

* 作者曾任伪满第八军区司令官。

告，调去治安部受到过责斥。最后1941年"大东亚战争"开始，生活愈益下降，我在1942年冬初次巡视增援热河的步兵五团时，曾亲见在山中打柴的男子，只披一张羊皮，没有裤子。在新集家的部落里，看见女人小孩赤身蹲在豆秸里。而在法院法庭上，日本人犯罪也决不受"满系"法官讯问；在伪满学校里，日本学生决不来入学，在日本人学校里，挑选收一些"满系"学生，或就一律不收。至于散居在伪满各县的日、朝鲜人，尤其是日、朝鲜的移民团，用着什么家具或农具和牛马时，就到附近中国农民家中去取，甚而种地也得附近农民替作（我看到过宣传移民的一部电影，银幕上的扶犁的就是中国人）。

（乙）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一贯分裂东北人民团结和制造各民族间恶感的：

其一，日本在"关东州"内施行其殖民地政策。用法令与教育，离间、分裂"州"内人民与祖国人民的关系，强迫他们与同胞对立。这种现象在当时一入"州"境，由黑帽子警察身上就表现的十足了。在九一八当时，凡是日本的侵略机构中，都分布下由日本豢养的清朝余孽和"州"内汉奸，这个实例，由在伪满政权初据要津的金壁东（宗社党首领肃亲王的七子，就是在1916年参加巴布扎布祸乱东北四省、攻陷海拉尔事件中的"小王爷"，九一八之后充吉长铁路局长兼长春警备司令，在黑龙江省伪省长任内有病退去，最后病死了）、郑孝胥（伪满初任国务总理，出卖溥仪的，我在长春曾听到人说，在春节时他家门上，有爱国者给他贴付门联，是"郑家老铺，出卖皇帝"）、罗振玉（1920年帮助日本谋取沧石铁路的投资权未成、伪满成立当时的立法院长）、韩云阶（金州商人，当马占山抗日时，他去说降，后任伪龙江省长、伪满大臣）看起，直到翻译、"黑帽子"、特务，乃至火车上的"小使"止，在当时是举目皆是。就这样，日本把一小撮汉奸，造成一个特殊阶层，在东北三千余万的人民中，处于走狗帮凶的地位，从而达到其瓜分中国，奴役东北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目的。

其二，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由田中奏折的暴露，是举世周知的。他们经常挑拨离间东北蒙古族，往事如巴布扎布的占领郭家店，中村大尉的在"满蒙"调查工作，都成了历史中的材料。九一八当时，在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就首先召集蒙古族武装。当年9月下旬，或者是10月初，我同丁超的代表杨公衡由哈尔滨转道昂昂溪赴锦州，去见张作相开会研究组织抗日机构时，到大林站火车被蒙古族武装劫住，除把乘客财物洗劫外，把我带下车去，问我是不是驻通辽骑兵三旅的军官，我说不是，就用马棒打我，肩背均出紫伤，后有一刘姓的人替我讲情，才将我放回车中。当晚到通辽，王县长说这是日本主使巴布扎布的儿子召的蒙古族武装，专抢汉民不抢蒙民。后来这部武装，就在佐佐木到一充伪满高级顾问的期间，改编为兴安南警备军，来镇压该地区的中国人民。再如伪满政权，把汉族较多的县，也改为旗，搜罗些蒙古王公子孙来作旗长，高唱"满洲人的满洲"，"蒙古人的蒙古"和要报"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前仇。这种制造蒙古、汉民族间恶感的结果，导致发生兴安骑兵甘支队在平谷县一带奸杀汉族群众的惨案。"七七"事变后，由军事顾问部主持，用伪满蒙古族骑兵编成甘支队，以甘珠尔扎布为支队长，进驻在古北口南密云、平谷县境，1938年回到承德，我代表伪大臣到承德"慰问凯旋"，邢士廉密向我说，这部骑兵在口里闹的很凶，尤其是在平谷县北有烧杀淫掠的惨重事情，还以报"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仇为理由。我回来报告了伪大臣于

芷山，但在日本顾问的庇护下概未究问。

其三，助长少数朝鲜族人的欺压行为，加强了民族歧视和利用鲜奸削弱抗日力量：

先在东北的朝鲜族就有亲日、亲华两派，九一八后，日本就残害亲华派，庇护亲日派。这批鲜奸就乘机插足伪满行政、军队的机构中，日本是以“准日本人”看待他们的，他们就造成许多事件，据我所身经的就有：

（1）1939年冬，我任伪满第八军管区司令官时，陪同伪大臣于琛澄视察“讨伐”（当时目标就是指向杨靖宇将军），一天到了临江县北松树镇，住在警察署，遇到该镇学校女教员，因伪安东省警察大队的朝鲜人翻译要对之强行无礼，逼得她逃到警察署请求保护。

（2）1943—1944年间，我在沈阳先后就有两次朝鲜人强买民地的事件。其一，是伪满一军参谋长岩田薰，同伪满军械部厂长大久保受沈阳馆主人（这个旅馆是九一八当时本庄繁所居地）的贿买，以驻奉部队种菜为名，由朝鲜族浪人（总经理）和汉奸梁某（副经理）出手，在马三家子东南强买人民土地。其计划案是乘我外出由岩田代理时呈送伪部的，案内地数只百多垧。实际钉的界标，据人民代表（这是控告时地主的真代表，梁某等先有个代表名单是假造的）说包括熟地、洼地、土坑、牧场约在千垧。经人民控告后，由我同伪省长于镜涛同意经在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小畑少将出面把沈阳馆主人那方面制止了，又把岩田参谋长转走了。经过一年期间，才把这个强买民地案子撤销，汉奸梁某逃避，鲜奸就无人敢问。其二，是在一个朝鲜族小财阀的活动下，主使居沈阳朝鲜族组织代表贿买省市机关的日系官吏，在杨士屯、宁官屯一带强买大宗民地，买卖未成，就开工挖沟（此事是我的同学王子文，他是宁官屯人，请求我向省长说的），经我告知伪省长于镜涛设法取销了。这两件强买民地的案子，都是由少数亲日朝鲜族出面办的，使十余个村屯的农民受到劳力上、农产上的损失，及很多天的骚扰，几乎发生械斗，在朝鲜、汉民族的感情上，烙一印痕。

（3）1944年春，伪满陆军少尉王殿荣及刘少尉的惨死，也是由日本唆使朝鲜族中败类欺负汉人而引起的。王、刘二人是航空学校军官学生，同住沈阳的茂林旅馆度寒假。一日，王殿荣在南市场某旅馆门口，见到朝鲜人坐车不给钱，大打车夫，便出面干涉。适逢沈阳日本宪兵队曹长武田（此人是中国通，有鸦片瘾，商民周知的坏蛋）经过，他就帮朝鲜人把王殿荣带走，行到三经路无人地方王掏手枪把武田击毙，日本宪兵到茂林旅馆拘捕时，把刘少尉打死，王殿荣逃跑。日、满宪兵警察动员约千人，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逮捕无辜人30余名，受到残酷刑讯，始在通化林子头把王殿荣逮捕，由日本宪兵问讯后交伪第一军管区军法会审，在伪中央派来的法官和伪第一军管区法官鹤田审讯时，王殿荣痛责日本和少数朝鲜民族败类欺压东北人民的罪行，并提出刘少尉无辜被杀，日本宪兵应负责任，而对自己杀人部分承认不讳，从容就刑。

以上所举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地民族政策所引起的事件与恶果，这只是东北三千余万人民中所受到的一小部分。

园通观监院田崇雨之死

孙高苑

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我国东北发动了军事侵略，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根据制定的“大陆政策”采取的向外侵略步骤。这时蒋介石抱着不抵抗主义，致使祖国大好山河沦于敌手。但是却激怒了东北的群众，青壮年都挺身而起参加了抗日武装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就以医巫闾山为根据地，与日军作殊死斗争，拖住了敌人很大一部分兵力，使日军不敢很快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医巫闾山在辽宁省义县、北镇、黑山三县境内，绵亘七百余里，气势雄伟，山中名胜古迹颇多，辽代东丹王耶律倍藏书处“望海堂”遗迹犹在。佛道教丛林大刹遍布山中，为东北著名宗教圣地。道教著名大庙“大芦花”，系明末辽东总兵李成梁“家庙”，明清萨尔虎战役毁于火，经清初道士王合悲重建，易为今名，医巫闾山道教“四大丛林”之一。地处海拔2900多公尺高峰，由一天然石洞穿入，在山阳处依山势高低修建神殿、丹房，共约百余间，前面是绝壁千仞，深不见底，地势奇险，每一登临，恍如置身方外，令人尘虑顿消。清末翰林缪纫绂由沈阳原籍赴京上任时，路过“大芦花”，曾赋诗赞美：“旧闻古庙压重峰，满院芦花秋意浓，奇石可人呼米拜，贞松拔地傲秦封，岩前树老墙三匝，岭后门开石九重，怅望吹笙王子晋，余音空听梵王钟。”由当时名写家刘春烺书，字迹苍劲，惜已毁于日军飞机轰炸之下。缪翰林还为该庙树立石碑两幢，亲自撰文，极力赞扬“大芦花”风景秀美，仍为刘春烺书丹。这两幢碑现在仍屹立于“大芦花”院内，均完好无恙。

由于“大芦花”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东北抗日义勇军”以此地为大本营，不时往北宁路沿线袭击日军，给日军以很大打击。日军恼羞成怒，乃于1932年的春天，连续派飞机对医巫闾山滥肆轰炸，在“大芦花”上空共投弹30多枚，巍峨壮丽的神殿被炸毁了，整齐坚固的住持丹房全毁于火。医巫闾山著名的道教大庙顿成一片瓦砾，事后参观的群众，睹此惨状，有不少掩面哭泣者。偏巧这天义勇军往北宁路一带出击，未伤一人，亦一大幸事。

在旧社会卜筮的风气很盛，义勇军都是来自民间，他们对占卜都很信仰，所以每在出征之前必找道士给占卜吉日吉时，问问出师是否顺利。这样一来，会占卜的道士简直就成了他们的“军师”了。道士们也乐于给他们占卜，这当然是一种爱国表现，但是却遭到日本侵略者忌恨，当时在北宁路沟帮子车站被日军枪杀的道士不少。

不管日本侵略者凭借什么样的优势兵力，他们只能白天以装甲车做掩护，在平原上活动，对于医巫闾山他们是裹足不前的。后来日本人只得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把山区的居民都给迁到山外，企图断绝对义勇军粮食的供应，但是人民在夜里还是偷着给他们送

粮，直到1937年义勇军才由医巫闾山转移，日本人才准许山区居民返回家园。

压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强，日本看到专靠武力镇压是不易收到全面效果的，又采取怀柔手段，想利用宗教缓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抵抗情绪。乃于1938年秋季先后成立了所谓“满洲佛教总会”和“满洲道教总会”，企图利用这些伪组织以达到麻醉人民的目的。所谓“满洲道教总会”，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组织，无论什么事都要秉承日本人的意志去办。比如利用庙会向人民灌输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组织“慰问团”到各地慰问伪满军队等，完全是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

日本为了便于统治，把东北三省给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大大缩小，锦州地区当时就是一个省份。自“满洲道教总会”成立后，各省相继成立了所谓“省分会”。“锦州省道教分会”第一任的“会长”叫田崇雨，系医巫闾山道教“四大丛林”之一园通观的道士，为人知书善画，对道教经典尤有研究，在道教中颇有声望，道士们都尊称他为田大师。因为他赋性耿直，不会趋炎附势，在担任“会长”期间失欢于日本人，任期未满，即毅然辞归医巫闾山，复被道众推选为园通观监院（领导人）。

这时日本已和美英宣战，在太平洋上的战争正激烈进行。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长期备战，乃大肆搜刮中国人民的财物，尤以粮食为甚，在所谓“出荷粉”（公粉）的名义下，向人民漫无止境地搜刮，非把人刮到断炊不可。园通观经常住有道士百余人，按照人数和土地数量已经交够“出荷粉”了，但伪北镇县公署的“公务员”们仍一再催逼。田崇雨为了维护全庙人的生活，与之力争，结果被这些“公务员”们暴打了一顿。田崇雨经过这番奇耻大辱，即服毒自杀了。如果日本侵略者真是对道教尊重的话，像田崇雨这样学识丰富的道教上层人物，起码对他应该宽大一些吧，但却把他逼得自杀了，这就完全暴露出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当时日本人普遍都存有一种优越感，自视甚高，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优等民族，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民族，应该受他们的宰割，受他们的统治。他们有人竟然说，中国人这样愚蠢，在二千多年前，绝不会生出孔子那样有智慧的人来，说孔子是后来捏造出来的。在这种心理驱使之下，他们根本看不起中国人，那么像田崇雨这样不会逢迎的人，他的被侮辱也就是必然的了。

田崇雨自杀这件事很快就震动了东北整个道教，东北的道教徒都愤怒了，誓死为这件事作后盾，一致要日本惩治元凶。日本人一见事态扩大，恐怕不易平息，乃一面派伪道教会的人到园通观说服，一面由伪北镇县公署副县长（日本人）亲到园通观道歉。他说现在敌人（指中国）正在千方百计地找我们的毛病，如果这件事被敌人的间谍（指中国地下工作人员）知道了，这是绝好的宣传资料，说我国（指伪满）为要“出荷粉”把道教徒给逼死了，这样会对我国不利。另外以伪北镇县公署的名义，为田崇雨举办“慰灵祭”，以“安慰”田崇雨在天之灵。在敌人铁蹄蹂躏之下的东北人民，生命毫无保障，也只能取得这样一个毫无实质的“胜利”而已。至于肇事者仍逍遥法外，依然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1963年）

关东军二三事

苑乃安*

一、特务机关

1935年6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亲日分子何应钦，与侵华日军华北日军司令梅津举行谈判，签订了秘密条约，史称《何梅协定》。以后，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16人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从此以后，撤销了河北省和平津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驻河北省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动措施，国民党政府满足了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日本大大加强了在华北的侵略势力。日本为了谋取华北五省（冀、鲁、晋、察、绥）的进一步日化，先后在各省纷纷设立侵略我国的急先锋——特务机关。

日本关东军以绥远地处内蒙古境内，又煽动和支持内蒙古的民族败类、反动上层分子德穆楚克栋鲁布（德王），组织“内蒙自治军政府”，并指挥伪军向绥北、察北等地进犯。所以绥远省特务机关是由日本关东军派去的，住在归绥（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特务机关头子羽山喜郎，校级军人，另有佐藤一郎等13人。

羽山仿效沈阳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的故技，也在特务机关门外悬挂一面“羽山公馆”的小木牌，意思是方便于搞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挑拨地方派系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又可以掩盖人民的耳目，避免刺激群众抗日救国的情绪。

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为了认真对待日本这一侵略机构，在省政府内设有“外事室”。当时以第三十五军高级参谋李英夫为主任，以苑乃安（绥远省政府秘书）为副主任，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该侵略机构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我奉命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无法保护他们的安全为理由，将其驱逐出绥远。

以后听说驻宁夏额济纳阿拉旗的7名特务机关成员，均被就地枪毙，以代替驱逐出境，大快人心。

二、索还骨灰

当日本制定侵略华北的军事行动计划的同时，关东军的侵略矛头完全指向我国北方的内蒙古地区。1936年3月，新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谈到内蒙古的重要地位时说，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方面的势力之下，积极的可以成为进一步怀柔同民

* 作者时任绥远省政府外事室副主任。

族的外蒙古的根据地，更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势力，并切断中国与苏联的陆上联系。

在日本"蒙古政策"的推动下，以德王为首控制的内蒙古地区，很快便完全落入了日本的魔掌中。不久，就成立了伪蒙古军司令部，于同年5月，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并策划建立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领域，以葫芦岛为海口的"蒙古国"的方案。

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日本又以四名日本军人进入察北县时遇到当地驻军检查"受侮辱"为借口，强行签定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使得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就侵占了察北。绥远东部屏障已失，日本因成功甚易，鲸吞内蒙古的野心日益猖獗，于是加紧武装德王、李守信等伪蒙军队，并利用多年来豢养的汉奸王英，大肆收罗匪徒，扩充伪军，在板垣征四郎的策划下，加紧指派日本顾问军官，参加指导训练，大举向我绥远进攻。于同年12月，在洪格尔图和百灵庙连吃败仗后，德王驻守百灵庙的伪蒙古军第七师又纠集王英伪军残部1000多人，向百灵庙附近的锡拉木伦我军阵地发起进攻。但是伪军中的士兵看到他们的败局已定，大都不愿再为日本卖命，所以枪一打响，便如惊弓之鸟，作鸟兽散了。这时王英伪军中的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等已和绥远的傅作义部队取得联系，在傅部的策动下，在12月9日夜间，趁日本顾问小滨大佐和蒙古军矛盾之际，举行暴动倒戈，并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全部枪决，还袭击了伪蒙古军第七师，缴获了该师的全部武器。

至此，日伪军进犯绥远的行动，遭到彻底的打击，以失败而告终。

战后不久，关东军驻绥远的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曾再三通过我要求归还小滨等死者的骨灰。我均依照上级指示，以"骨灰已随风扬弃于茫茫草原上，无法搜集"为理由，拒绝了他的要求。

一日，羽山以恳求的口吻对我说："苑先生，关于骨灰事，你们何必那么死心眼儿呢？我一再解释过，我只是为了我能向上级复命，关东军也只是为了对死者家属有个交待，别无他意，此事只要你们肯帮忙，也不过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比如说广阔的草原上，还愁找不到一点骨头？把它烧成灰给我一点，不就把此事圆满结束了吗？谁管它是牛的，还是马的！"以后，经上级同意，就按羽山的设计，满足了他的要求。

三、讹诈丑剧

西安事变后不久的一天，日本关东军驻归绥的特务机关头子羽山喜郎在电话上对我说："现在有特急要事，要马上拜访傅（作义）主席。"当时正在百灵庙大捷之后，北平各大学慰问团的学生出入省府，络绎不绝。傅大概因此不愿意接见他。派我去说："傅特忙，有什么事，可否由我转达？"羽山对我说："若按纪律，在见到傅主席以前我不能向你透露片言只字，但按情理，我又不应让你太为难，回去无法复命。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刚接到关东军一份火急电，命令我刻不容缓地面交给主席。我的话只能说这些。"

傅在省政府接见了他，除了他们二人外，只有我一个人在场。羽山见傅后，一反常例，没作寒暄，很严肃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向傅读了一遍，内容大意是：西安事

变后，中原鼎沸，内战即将爆发，我关东军为了稳定西北局面，决定假道贵省，进军宁、甘。贵主席是否同意，时机紧迫，限于24小时之内明白答复。

傅听我译后说："我就答复你：我是一省主席守土有责，假道无权。"羽山听后，登时面色苍白，起身告辞。这时服务员刚送进茶水，还没放在茶几上呢，他就离去了。

第二天，关东军派来一架飞机，将羽山的姘妇接走，以示大战即将爆发。

我方只得严阵以待。

一周过去了，二周过去了，直至抗日军兴为止，绥远境内，没见到日本一兵一卒。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自从1935年关东军侵略绥远惨败后，板垣征四郎参谋长、武藤章第二科长，以及田中隆吉参谋等阴谋侵绥的负责人，觉得抬不起头来，无法下台，殷切盼望能找到一个机会，把面子挽回来。正在此时，西安事变发生了。盛传蒋介石被扣，亲日派何应钦企图趁机取代，南京、西安之间刀光剑影，厮杀火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板垣等欣喜若狂，认为抬头的日子来到了，不费一枪一弹，囊括中国大西北的美梦可以实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兴高采烈地向绥远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电报。通牒碰了钉子，理应施以大兴问"罪"之师。可是，关东军司令部对于田中等早已失去信心，又兼陆军省（部）已经制止过关东军的出兵意图，因而反对出兵的松井等人的主张占了上风。田中等人没能派出一兵一卒。美梦破灭了，面子没能挽回，又丢了一次脸，表演了一出讹诈丑剧。

（1980年）

日伪军在热河

赫慕侠*

关于伪满洲国末期日军、伪军、伪武装警察队在热河活动的情况和日本对伪军干部的教育，提供资料以备参考。

热河毗连河北，长城内外为八路军冀热边区的根据地。山地较多，地形复杂，适宜于小部队活动。在抗日战争中，为解放东北地区必由之路，因此成为八路军与敌伪必争之地。八路军不断向热河挺进，袭击敌伪，敌伪受到严重打击，损失颇重，感到威胁。因此关东军在热河设立西南防卫司令部，以关东军一部为主体，配属伪军与伪武装警察队，统归日本西南防卫军司令官指挥，抗拒八路军进入热境，以保伪满洲国西南边界。1943 年是日军一个旅团长担任防卫司令官，尔后由师团长担任，驻承德离宫，日军并在离宫建设兵营，在 1945 年夏移驻锦州，残留一个联队常驻承德。

日军与伪军划分警备地区

日军警备地区—青龙、兴隆

青龙—兴隆地区，接连长城，八路军经常活动其间，在敌伪看来是一个重要地区，划归日本防卫军担任警备，由各伪军管区派来增援部队约有五六个步兵团之多，归日本防卫军直接指挥，分驻青龙—兴隆地区担任警备。关于教育训练、卫生补给和军纪等由伪第五军管区担任。

由伪满各省调集来热增援的伪武装警察队，也归日本防卫军指挥，分驻青龙—兴隆地区担任警备，其补给等由伪热河省担任。

日军在八路军经常活动的地区，以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强迫山区居民迁移集团部落内，深沟高垒地把人圈起来，断绝人民与八路军的往来。在集团部落内住有伪警，掌管户口，监视出入，封锁物资，搜集情报，并住伪武装警察队防守，以防八路军袭击与捣毁。老百姓说这叫做“人圈”。为了使八路军无法在就地补给，特别划定了“无住人地区”，如有老百姓通过其间，“射杀勿论”。在长城内外，到处都可以看到“无住人地区”，并构筑公路，架设通信网，以方便日伪运送兵力和搜集情报。

---

* 作者曾任伪热河省第五军管区司令官。

伪满武装警察队

由伪满各省调集来热增援的伪武警察队，在1945年春与日伪军联合起来，围攻进入热河的八路军冀热挺进军，并向长城内推进，进驻遵化，其目的是“拒敌于国门之外”，但八路军有良好的民众基础，还是自由自在地出入长城内外，没有因此而受到阻碍。

伪武装警察队的来历。在1938年冬，日本驻吉林的防卫司令官野副少将所属的一个大队长叫古川的，住通化，指挥日伪军伪警，围攻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因此，杨靖宇将军不幸壮烈牺牲。事实经过是这样的：长白山区内，除了有采伐木材的工人而外，已成为无人烟的地区了。在春夏秋三季，是可以在田野间找到充饥的食物的，但到了严冬季节，在冰天雪地之中，是找不到食物的，抗日联军的给养补给是特别困难的，惟一的来源只有靠木把房子的供给。在敌伪的“讨伐”下，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下有敌伪的跟踪追击，杨将军与武装警察队遭遇战后，至晚间找到了木把房子，刚刚要吃饭的时候，伪武装警察队跟踪追至，包围了木把房子，在此危急的情况下，杨将军勇敢地突围而出，因为在夜间，以致脱离了部队，又因连日的战斗与饥饿，疲劳殊甚，因此到濛江县（今靖宇县）南门外的山上，找到一个打柴的人，杨将军拿出几块银元交给他，叫他给买吃的东西。这个打柴的人，不但没给买，反而把真实情告诉了伪武装警察队。这时在濛江县内驻有许多的伪武装警察队的病号在休养，内中有一个日本的伪武装警察队长，听到了这个消息后，立即集合了残部，分乘几辆汽车出了南门外，向打柴的地点驰去，由那个打柴的人引路，把杨将军包围起来，杨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毅然决然地用自己佩带的手枪壮烈自决。在这之前，杨将军的部下有个名叫程斌的，是个叛徒，经过伪通化省警察厅长岸谷隆一把他收留下来，并给他一个警察队长当，因此关于杨将军的内部情况完全被他泄露无遗，这也是杨将军抗日联军受挫的原因之一。因此这帮伪武装警察出了名，受到敌伪的表扬与信赖。敌伪鉴于热河是个多事的地方，所以把这帮伪武装警察队又调集热河来，对抗八路军。又将原来在通化省当过伪警察厅长的岸谷隆一也调充伪热河省次长，妄想在热河境内收到在长白山地区那样的“讨伐”效果。

其次，谈谈伪武装警察队兵的来源。伪武装警察队兵是由地方招募来的，不是流氓就是兵痞，他们的生活是靠当警察队兵吃饭的，是属于职业性质的。又因为他们是当地出身的，所以他们对地方的情形熟悉，又和地方警察是属于一个系统的，因此他们搜集情报比较快，所以他们的危害性也就比较大。

1938年，所有的伪警统归伪治安部管辖，那时伪军的总数约17万人，伪警的总数要比伪军的总数多得多。1935年伪国务院曾向关东军要求取消伪军，理由是：“满洲国”的国防有关东军保卫，地方治安由伪武装警察队担任维持。据说，关东军没有同意。认为既是个“国家”就应该有个“国军”，因此没有取消。

说起岸谷来是一个大流氓，又是一个中国通，伪武装警察队归他操纵，他妄想平定热河，以显身手。但与他的愿望相违，热河地区与长白山大不相同，日军对八路军都没有办法，区区的伪武装警察队还不是螳臂挡车一样？1945年8月苏军入境，岸谷同他

的老婆和两个女儿全家自尽。进驻遵化的伪武装警察队被国民党华北治安军的头目门致中收编为第二师，陈天玺充师长。

伪第五军管区的资料

九一八事变，东三省相继沦亡，日本为了占领热河，派服部旅团长与伪军张海鹏（在张学良将军统治东北时期，他是洮辽镇守使）和伪安东地区警备司令兼伪第一旅长李寿山（他是军阀张宗昌的旧部，其副司令张宗援，是日本浪人），跟着日军进入热河，原热河都统汤玉麟溃败避至天津。

敌伪占领热河后，伪满任张海鹏为伪热河省第一任第五警备司令官，以后改为第五军管区司令官，以后司令官顺次为：王静修、邢士廉、吕衡、吴元敏、赫慕侠。

伪第五军管区编制：

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陆军中将赫慕侠，自 1943 年 8 月至 1945 年 8 月。伪参谋长林少将，在抗战胜利之前，被调充伪蒙古军第二骑兵师长，其后任为伪少将栾彪。伪高级参谋南清一中校，以下大崎中校，赵国沂中校，苏畹天少校等。伪高级副官从猿渡中校，以下日本马场少校等。伪军需处长军需上校李盛林，以下日军的增田军需中校等。伪军医处长日军某，伪兽医处长日军某，伪军法处长日军某。以上仅就能记忆的写出来。

伪军管区所属的部队及驻地

伪军管区直辖四个旅：

伪第五旅长少将代元驻丰宁（大阁镇），所属伪第一团长上校胡景贤驻白草，伪第七团长上校陈琨驻丰宁一带。

伪第八旅长少将于泽浦驻滦平，所属伪第三十四团长上校刘裕贤驻大水峪，所属第一营长北部少校（日军官）驻白马关，伪三十五团长上校王景南驻千户村。

伪第二十五旅长少将陈明山同所属第十二团团长上校张祥恩驻平泉，伪第三十三团长上校程春桂驻承德。

伪第三十三旅长少将曹瑞征同所属上校团长李甲辰、冯玉绅两个团均驻赤峰，伪第三十二团长冯玉绅和该团士兵均系回族。

其他：因热河山地多，和当时的汽油不足的关系，新编第一第二两个运输队担任运输的任务，均驻承德。

配属自动车队驻承德。

临时配有侦察机一架驻承德，有时驻围场。

伪第五宪兵团驻承德。

日军在伪军每个单位内都安插进日本伪军官，在日本顾问指导下，掌握机要，控制人事。

伪军事会议

在每年的年初，伪军事部召集各伪军管区司令官及其他，在长春伪军事部召开军事会议，把新的一年应行的各项事情预先下达，以备付诸施行。

各伪军管区司令官及其他，到长春后，向伪皇帝报告军情，内容概括为四类：一、境内治安状况；二、教育训练进度；三、征兵的情况及数目；四、军纪风纪的概况。每个人报告的时间限五分钟。

伪军事部大臣对各伪司令官及其他有训示，各伪司令官及其他根据管区内的情况向伪军事部大臣报告，内容还是像以上所说的那样，不过加以详细说明而已。

继各伪司令官会议后，复召集各伪军管区的参谋长会议，按照召集各伪司令官会议的纲要，详加说明，准备作好计划，彻底实施。

继伪参谋长会议后，还召集各伪司令部的各处长到长春会议，按照各处所负的任务，加以细部指示，并和有关业务联系。

各伪军管区司令官及其他，在伪军事部会议终了后，回到本军管区内，把会议的内容与本军管区的任务结合起来传达给各伪旅团长等以便实施。

总之伪军事部召开伪军事会议的目的，是策划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伪第五军管区的重要任务，是抗拒冀热边区八路军。

1942 年伪治安部召开军事会议后，由顾问部的高级顾问藤村大佐对参加会议的伪司令官等，作了一次国际形势的报告，他说：为什么日本要向南进出，而不向北攻俄呢？向南进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质的基础，培养战斗力，支持长期战争。谁得了印度及印度支那等地的物质来源，谁就富强起来，美英就是得到以上的物质来源，所以富强起来。现在要乘着英美向德意两国开战不暇东顾的机会，在其海军分离之际，不能集中到亚洲来，捉住这个战机，发挥日本海军的威力，给予敌人各个击破是有利的，是以向南进出而不向北攻俄。但德国希特勒最希望日本出兵攻击俄国，在战略上以收东西遥相策应之利。但日本考虑到，向北攻击是无利可图的，只于德国有利。假使德国击败俄国，则乘势向东进出印度等地，取代英美的利益，则与日本的利益相冲突，因此也不能向北攻俄。只好让德俄两国相互消耗战力，待其双方势穷力尽，则日本坐收鹬蚌相争之利。日本的真正敌人不是中国而是美英，日本和中国长期战争下去，于日本不利。蒋介石依靠英美的势力，听英美的话，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先把美英驱逐出亚洲，遮断中国与美英的联系，则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他的报告要旨如此，是以简记。

伪第五军管区的警备地区—滦平与丰宁：

滦平—丰宁地区接连长城，八路军经常活动其间，也是一个重要地区，划归伪第五军管区担任警备。

伪军是八路军攻击的重点，历年受到的袭击、伏击，严重地打击了伪军的士气，只要八路军冲击上来，喊个“缴枪不杀”，就乖乖地把武器放下来，这样例子是很多的。八路军优待俘虏，释放时还给几块银元，作为回家的路费。这个事实，不用八路军宣传，伪军官兵都知道，但日伪军官们最怕这一手，因为这能瓦解士气。伪军的士兵都是

被强迫征来的，他们都是些知识青年，不愿为敌伪卖命，但也不敢逃跑，怕连累家属，被俘释放的兵不敢回家，只好回队，队里是不留的，怕他们代替八路军做宣传工作，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凡被释放回来的士兵，要经过伪兵团的调查了解后，再经过伪军法处的审讯，即使没有“通敌”的证据，也不令回家，更不令回队，要留置在伪军法处监视起来，进行“思想教育”。

对被释放回来的伪军官，则采取严厉的处分。例如：1944 年冬，住大水峪的伪军第卅四团的刘连长、日军的中尉副官某和一名日军少尉连附某，均被八路军俘虏，刘伪连长和日军少尉连附某，被释放回来，日军中尉副官某被俘后未释放，，把他向后方解送，走到南口以西的某村庄宿营时，他在深夜里听到南口火车站的火车放汽的声音，他识辩了方向，乘夜潜逃回来。伪军管区把这被俘的伪三名军官通过伪宪兵团和伪第五军管区的军法处调查审讯后，报请伪军事部处理，经过伪军事部的顾问部的指示，叫这三名被俘的伪军官“自杀”，学习武士道的精神，以肃军纪。刘连长是在伪宪兵监视下用手枪自杀的。日军少尉连附某，经顾问部的授意，选派他在伪军官学校同期的毕业生的代表来承德劝进自杀，还写了几份自决书分送给顾问部、伪军官学校、伪军管区和他的家属。那个日军中尉副官某，拒不自杀，是经过伪第卅四团日军少校团附某强迫他自杀的，先用酒把他灌醉，然后把着他的手用枪帮助他自杀的。

伪军防地的部署

滦平地区属于伪第八旅的防地，伪旅部驻滦平，其左翼由白马关起至大水属于伪第三十四团的防地，右翼至千户村属于伪第三十五团的防地。

丰宁地区属于伪第五旅的防地，伪旅部驻丰宁，其左翼由丰宁起属于伪第七团的防地，其右翼至白草属于第一团的防地。

伪第八旅与伪第五旅的防地，在长城线上属于第一线。

平泉地区属于伪第二十五旅，伪旅部同伪第十二团驻平泉，伪第三十一团驻承德。

赤峰地区属于伪三十三旅防地，伪旅部同伪第二十三团及李甲辰团均驻赤峰。

伪第二十五旅与伪第三十三旅防地属于第二线。如八路军突破第一线，进入热境，则第二线的部队立即增援。

伪第五军管区司令部驻承德。

伪军兵力的布署，是以营团为单位的，不敢采取分散配置，怕被八路军吃掉。在青纱帐起时，龟缩在防地内，深沟高垒防守，特别注意夜间警备，秋冬季节出动时，也是兵力集结使用，以防八路军的袭击与伏击。

伪军采用的战术—袭击与长追：伪军在长城线以内不敢追击，怕受伏击，因此采用袭击。在长城线以外，因为是伪满洲国境内，情报收集得快，因此采用长追。

伪军的保密工作

日本顾问和日军的军官们，鉴于伪军的历次作战不是受到伏击就是被截击，而且受

到的损失很大，并且是每次对八路军的包围也没有一次成功的，因此他怀疑伪军内部有通八路军的人，还怀疑伪军驻防地内的老百姓有通八路军的人，因此伪军内部特别注意保密。其保密的法子是，在每次出动时，不事先说明而是临时下达命令，目的和所去的地点也不说明。假如向东去的话，要先向西走，然后转过头来再向东走，以此来骗人。关于作战的命令，一般的干部和士兵是不知道的，仅旅团营长知道。伪军的保密工作，是掌握在日系伪军官手里，以防泄露军情。通信的机关，也都是掌握在日本军官手里。

八路军截击伪军的战例：

1943 年冬，住千户村的伪第三十五团长王景南率领该团主力向八路军的根据地的前进中，后卫的赵营长以下四五十名伪军，被八路军截击，因当时的风雪大，前卫和本队还没有听到枪声，赵营长等就被俘虏，伪士兵等被释放，把赵营长带走，因赵营长在平时为恶多端，后来被镇压。伪军在山地行军，走的是羊肠小路，行军的队伍拉的太长，等到前卫和本队知道情况后，追击也没追上，而八路军早已脱离战场。

八路军伏击伪军的战例之一：

黑龙江伪第三军管区派来增援部队第四旅长王家善所属的伪第四十团驻防青龙地区，在 1943 年冬，因为移防的关系，在途中被伏击，该团的武器、弹药、被服、粮秣等被八路军所获，兵舍被焚毁，日本顾问说王家善通八路军，不然，为什么遭到这样的损失？其实，不是王家善通八路军，而是该团因为移防的关系，向附近的老百姓要车运输东西。这个情报为八路军所获得，八路军就预先在道路两旁的山上潜伏起来，等到伪军的运输车马通过其间，伏兵四起，全部被俘获。

八路军伏击伪军战例之二：

1945 年秋，伪第五旅所属第七团第一营长太田率领该营主力进至赤峰城附近“掩护”秋收，这个情况被八路军获得后，就预先在伪军“掩护”秋收的地点，布下天罗地网，自伪营长以下全部被俘。该伪营长生死不明，他的老婆抱着他的灵牌回到承德。因抗日战争胜利来临，其后情况不明。

日军与伪军联合袭击八路军战例：

1944 年夏，伪第五军管区日本顾问根东大佐接到驻北平的一个防卫司令官名叫寺仓小四郎的通知，要求伪军派出一部兵力协同日军袭击长城线内某地八路军的根据地。伪军派住千户村的伪第三十五团长王景南带领该团兵力一部参与袭击。据王景南回来说，他们为了不暴露，企图利用夜间行军，将接近根据地时，抛开道路前进，在拂晓时，到达目的地，这时被在练兵场上几个八路军的战士发现，发出警报，所有的八路军由地道脱走。因在仓促间遗弃一部武器，王景南部分得步枪二三十支。

伪军长追八路军的战例：

1945 年初春，八路军第十三团团长师军，率领战士 300 余众，由古北口地区越出长城以外，一直挺进到热河围场境内。因围场境内，没有建立集团部落，居民散住各地，是一个容易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可是伪军鉴于以上情况很不利于伪军，因此迅速组织战斗司令所，进住围场。同时并由各伪团抽编五六个游击队，每队的兵力约 300 余人。并出动飞机侦察，布署长追。伪军以五六倍的兵力，轮番长追，致使师军团长不能发展革命工作，不得已化整为零，潜伏起来。待苏军进入热境时，师军团长协同苏军

进至丰宁，将伪第五旅缴械。

伪军干部的学历

伪军干部的学历，一部分由东北陆军讲武堂、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伪满军官学校、伪满训练学校专科毕业，还有一部分是行伍出身的。

日本军官：一部分是由日本军队退役的；一部分是少尉候补生，又在伪满训练学校再受专科教育的。

日本对伪军干部的思想教育：

无论在什么场所，说起话来，总是千篇一律地“日满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圈”并灌输忠君爱国之道，在每天的早晨要先拜日本天皇，次拜伪满洲国皇帝。凡有仪式时，总要读诏书或军人敕谕。并建立“建国神社”，供奉“天照大神”。以封建的余毒结合迷信，用愚民的政策，来统治伪满洲国军队。

伪军的末日：

1945 年 8 月间，苏军进入热河，伪军大部溃散。住在千户村的伪第三十五团和住大水峪的伪第三十四团两个营，因在长城附近，与华北毗连，未受到苏军冲击，被华北伪治安军的头目门致中收编为第一师，王景南充该师长。一部增援的伪军，汪张两个营长被索景清（原张海鹏的旧部）收编为一个旅，汪充旅长。

（1979 年）

日本殖民统治控制下的伪满军

王 贤 沣*

日本殖民统治者始终一贯地使用日本军事顾问控制着伪满军这个侵略工具。但在使用的人员和实行的方式上，也随着其任务和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更。

日本在旧东北军中派遣顾问，是依据所谓“二十一条”的侵华计划，在张作霖接受下而实现的。日本军人本庄繁就曾在1923年充任过最高军事顾问，参与东北军的整训及第二次直奉战争①。人们都称他们为“中国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以本庄繁为首的“中国通”主持下而掀起的。事变发生后，在沈阳的土肥原贤二，在吉林的大迫通贞，在齐齐哈尔的林义秀，在洮南的佐久间亮三等人，就更发挥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军事间谍作用。而筹设伪满军的军政部的指导者，就是佐久间亮三和住谷悌一。到1932年5月，日本关东军始发表曾任中国陆军大学教官的多田骏少将为伪军政部第一任最高军事顾问，率领骑兵大佐滨田阳儿等数十人，组成伪军政部的军事顾问部②，开始攫取伪满中央的军政大权。并同时派遣一些“中国通”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一些投敌的伪军里，充任军事顾问，掌握伪军行动。用投降的旧东北武装力量，去打击不投降的武装力量。

伪满军的军事顾问，都兼任着关东军司令部部附，是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这样，他们对于关东军的一切侵略计划和日本军事行动，都是事先洞晓，再去伪满军中推动执行。所以说关东军司令官，是通过军事顾问们来执掌溥仪在未就伪满执政前出卖的军政大权，控制着伪满军令军政。到1932年9月15日，郑孝胥同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后，才公开地“合法化”了而已。

一、伪满军的军事顾问部

伪满军事顾问概况

日本关东军军事顾问部，不论在伪中央或伪地方，都是同伪满军机构并列的，站在指导地位而不是从属。其实际，“指导”就是领导，并列就是高高在上。一切军令军政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

① 本庄繁是于1921年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参与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参与制订奉军对直军的作战计划。

② 1932年4月13日，关东军任命陆军大佐多田骏等21名军官，以关东军司令部人员身份充任伪军政部顾问。随后，多田骏在当时伪军政部所在地奉天（沈阳）设立伪军政部顾问部，7月随伪军政部迁长春。

的施行，不经顾问的认可，是不能施行的。甚至是依据军事顾问的决定而决定，从伪总长（或大臣）起，伪满军官是要受军事顾问的指导和监视的。

伪军政部成立初期，日本侵略者急于用武装力量消灭抗日武装力量。所以这时的军事顾问部，编制庞大、人数众多，从伪中央到伪地方军事机构及至旅团，都有军事顾问，控制着伪满军的军事行动。

在伪军政部的军事顾问部里，设有最高军事顾问，他领导全体军事顾问的行动，并操纵着伪总长（大臣）职权。其下设有高级顾问一人，辅佐最高顾问，领导部内全体顾问的行动，同时也是指导伪次长和伪司长们行使职权。主管各课股事务的主任顾问和顾问们，则深入课、股领导业务的进行，同时也就是对伪满人员的监视者。他们为事务进行的方便，更采用一些“中国通”的日系人员，担任课长、股长职务。同时采用大批通译担任翻译任务，这些通译多是由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的所谓“中国通”的日本人及出身于留学日本和毕业于南满公学堂的所谓“日本通”的中国人来充当。

在日常事务的进行上，最初，是多由主任顾问和顾问们来起草，交由课、股译稿，送请司课长核阅盖章后，再交还顾问部，得到高级顾问、最高顾问盖章，才送请总长、次长盖章，因而伪总长（大臣）是不见最高顾问盖章就不盖章的。同时也又说明，任何事务不经最高顾问认可是行不出的。到1939年松井任最高顾问、花谷任高级顾问时，一切上呈下达的公文中，则改为伪大臣同最高顾问并列署名，各机关主官同主任顾问并列署名，控制形式又为加重了。

这样的周密控制，就需要较多的日本现役军官，补充不易，尤其是在地方军事机构和部队里，还不能达到完全控制的程度。于是关东军就在1933年唆使伪军政部“聘请”日本退役军官百多人，称为军事教官，分布在伪满军事教育机构和各旅团里，来担负指导任务。于是各旅和正在“讨伐”行动中的各团，均有了日系的军事教官。在各警备司令部的军事顾问指挥下，控制着旅和团的一切事务。为造就“日系军官”，更在沈阳的陆军训练处里，开设日系军官候补者队，教育日本的退伍军士，一年卒业，任伪满中尉，称为日系军官。自1934年起，伪满部队里就有了日系军官。他们的任务，是以参谋、副官等职务，来帮助军事教官，控制伪满军的用兵、情报、通信和人事。更在所谓“精军”的口号下，逐步深入到营、连，控制伪满军的教育训练和“军心把握”。

1939年，又实行了军事教官的“解聘”，把他们就原阶级各晋一级，改为伪满军官。于是伪满从伪治安部起，到各军管区和各旅团里，又出现了大批高级幕僚的日系军官，控制着伪司、科到伪高级司令部的全部事务。到伪满末期，这千余名的日系军官，从伪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中将起，在伪满军中，上自司令官下至连排长，是无所不有。他们都占据着重要职位，掌握着军政权柄，把伪满军的事务控制得周密无遗了。

随着日系军官势力的增长，军事顾问部的人员就逐步缩减。到1945年，伪军事部的顾问部里，由原50余人缩减到10余人，各军管区里由原30人缩减到只有主任顾问一人，而部队里是一律没有军事顾问的。

军事顾问的任期，一般是二年以内异动一次。但也有因特殊情况延期或临时异动的。

伪满最高军事顾问的日本人

伪军政部时期

1932 年——1934 年	第一任多田骏少将
1934 年——1934 年底	第二任板垣征四郎少将
1934 年底—1937 年	第三任佐佐木到一少将

伪治安部时期

1937 年——1939 年	第四任平林盛人少将
1939 年——1940 年	第五任松井中将
1940 年——1941 年	第六任中野英克少将
1941 年——1942 年	第七任竹下义晴少将
1942 年——1943 年	第八任楠本隆实中将

伪军事部时期

1943 年——1944 年	第九任河野少将
1944 年——1945 年	第十任秋山义隆少将

上列曾充任过伪满中央军事机构——伪军政部、治安部、军事部的最高军事顾问的主要活动：

多田骏，是“军事顾问部”的创始者。所有日本关东军控制伪满军的人员——军事顾问、军事教官、日系军官等等，都是由他制造、布置的。一切控制伪满军的制度、措施等等，都是由他主持规定的。他在完成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上，使用了投降的武装力量消灭了不投降的武装力量。并曾亲自指挥张景惠、张海鹏和丁强、金壁辉（川岛芳子）等匪帮，配合日军主力攻下热河，进占冀东，给所谓统一伪满和侵略华北打下了基础。

板垣征四郎，是侵略东北、建立伪政权的元凶。他在建立伪满政权之先，就同土肥原贤二等，盗运溥仪至旅顺，让溥仪出任伪执政。并在他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时，使溥仪即伪满皇帝位，实现他们在旅顺时期秘密交易的诺言。他实行了伪满的军管区制，更把日伪“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口号，进一步改为“日满一体，一德一心”。

佐佐木到一，他是久在中国勾结各派军阀，参与数次中国内部战争的特务间谍，竭力推行“以华制华”侵略政策者。在板垣任最高顾问期间，他就是高级顾问①，代板垣主持军事顾问部的一切行动。继任最高军事顾问之后，对所谓反满抗日的行动，厉行恐怖镇压。在 1935 年至 1937 年之间，曾使用伪军法会审，处决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杀害了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伪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寅卿②，以及各地的文教职员等多人。更在伪满军中，在所谓“军心把握”的工作上，密布密探，密报明检，杀害和判刑了数百伪军官。因而也引起了多次的所谓“满军叛变”。从 1936 年秋季起，他曾亲去通化，组织“讨伐指导顾问部”，使用伪满军事力量，进行所谓“东边地区独立讨

① 1932 年 12 月即多田骏任最高顾问时佐佐木到一即为伪军政部高级顾问，1934 年 12 月继任最高顾问。

② 王宾章，字寅卿，1887 年生于黑龙江省泰来县，1936 年 7 月 20 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遇害。

伐”，更使用伪满政权力量，进行地方“肃正”，给抗日武装力量以重大的损害，给广大人民以严重灾害和极端恐怖。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就是在他的亲自执行下开始的。1937 年 7 月，他在离任之前，又派遣大批伪满军，在顾问监督下，帮助日本侵略华北，伪满军开始进入长城线。

平林盛人，是佐佐木的计划继续推行者。完成了东边地区和三江地区的所谓“独立讨伐”，更在 1938 年派遣“甘支队”在平谷到遵化，帮助日军实行残酷的镇压。但是在所谓“肃正工作”和“思想检举”中，鉴于引起“变乱”的扩大，在关东军指示下，缓和一些，因而得到所谓的“人心的安定”。同时他也撤换了几个惨无人道的顾问，因而惹起顾问内部的不和。只鉴于日系教官，均以顾问自称，飞扬跋扈，他主张将全部军事教官，改为伪满军官，更引起日系军官同军事顾问之间的矛盾加深。他更主张日、“满”军官要加深“造就”，开办军官学校正式军事教育机构。于是受到了绝大多数的日系军官的反对，称他为“缓和派”。

松井（名忘了）中将①，他是日本用中将级军官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的肇始者，也是伪满军事顾问同主管并列署名的开始者。他同高级顾问花谷正少将，是为了矫正平林盛人的“软弱”做法而来的。花谷正把他称为“皇军的第五部队长”，伪满军是“皇军的一翼”。对外部是使用伪满军侵犯苏蒙边境，但是由于失败，更引起伪满军的“叛变”和混乱。在内部开始采用日系军官充任伪军政司长，但是由于美崎丈平反对他的强硬控制，更加深了日系军官同军事顾问的矛盾。他还撤销了所谓“独立讨伐”，从此又在用兵上将伪满军置在日本部队长区处之下。更实行了所谓“国兵法”，从此征兵数十万东北青年，去充当日本侵略炮灰和奴役劳动。

中野英光，他曾充任过伪满主任顾问和佐佐木到一的高级顾问，并自称为伪满军对他是有“好感者”。到任之后，又开始矫正松井、花谷的强硬控制。废除了由日系军官充任伪军管区司令官的做法，加强各种学校教育，重用日系军官充当幕僚，缩减各顾问部组织人数，因而日“满”系军官和顾问之间的矛盾，一时缓和一些。但最后也造成其后日系军官的尾大不掉。

竹下义晴，他曾任过关东军司令部科长，也自命为“中国通”。虽然在中野英光造成的所谓“小康”情势中，一时缓和，但是他认为伪满军心还是不稳的。因而在所谓“神道”教育上大作文章。借溥仪访日、迎接“三宝”的机会，大讲“唯神之道”。他曾召集各伪司令官，亲自讲授“唯神之道”，令他们对部下宣传神道，并在伪军中普建神庙，供奉“天照大神”，定期拜祭，宣读“回銮诏书”，示意“日满一体”。但是这一思想控制，并未得到所期效果。相反地引起官兵一致的反感，说成是日本要当祖宗，把一贯的惧日思想变成仇日了。

楠本实隆，他是久在中国活动的“中国通”，由驻黑龙江境内的师团长改任最高军事顾问。这时日本已发动“大东亚战争”，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日益炽烈，日本军官感到不够用了。由他开始大量减少伪满的军事顾问人员，各伪军管区和各伪司令部及学校，只设立主任顾问一人，配属日系军官二三人，伪中央军事顾问部则只剩顾问数人，

① 1939 年 9 月，松井久太郎任伪治安部最高顾问。

及不满十名的日系军官。但是他主持将各高级幕僚均改以日系军官充当，藉以维持军事顾问的控制。因此成为其后的日系军官当权，反而不受军事顾问的控制，事事要听日系军官的摆布。就伪军事部来说，是伪次长真井鹤吉控制着的伪大臣邢士廉。就各伪司令部来说，是日系的伪参谋长控制着各伪司令官。并且在一般公文上，废除顾问署名。

河野（名忘了）少将，他到任后，伪满军事部已控制在真井鹤吉的手下，而伪军各管区用兵控制在关东防卫军各司令官的手下。因而一般是照例行事，他不满一年离职。

秋山义隆，他曾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也是所谓“中国通”。到任伊始，就是苏、日互不侵犯协定失效时期，关东军又忙于对苏增防。他加紧地裁减伪满部队，收缴武器、营房，提供日本训练新军。更扩编伪满工兵、粮食等后勤部队，用以为日军构阵地，修建道路和运输物资等谋求便利。更因日本侵犯华北军的请求，抽编“三铁部队”① 派遣入关，去对付蓟东的八路军。关于伪满军内部事务，是一任真井鹤吉处理了。但是他们是公认伪满军不可靠。因而在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时，他指示各伪军管区主任顾问“五项注意”中，第一条就是“严防满军的叛变”。日本在14年间，使用数以千计的军事顾问、军事教官、日系军官，用尽千方百计，控制着伪满军。

二、伪满军的使用

伪满军这个武装组织，是在日本的“以华制华”侵略政策下，一贯为日本武装侵略服务的。它的反动作用，不仅是祸害了东北，祸害了祖国，并且也祸害了蒙古和苏联。因此，在叙述伪满军的使用上，我概要地把它分作四个项目来说，即使用伪满军打击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帮助日本进攻中国；配合日军侵略苏蒙；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

使用伪满军打击东北抗日武装力量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武装侵略东北的当时，起来抗日的武装力量主力，还是旧东北的军队和警团。这种反动统治的武装力量在本质上就同人民有着矛盾，不能也不愿发动广大人民，共同抗日。又在蒋介石三令五申地不许他们抗日的约束下，就产生“遵命”和“不遵命”的分歧，人心和行动就产生种种的不一致。因而在日本的“拉”、“打”，和“既打且拉”的阴谋手段下，出现了投降和抗战的严重两歧现象。这种现象在东北四省中，除热河省尚未遭到侵略就取“中立”态度外，其余三省中，概要的形势是，辽宁省的国防军及部分武装警察，遵守命令撤入关内了。省防军张海鹏部，事先通敌，接受饷械，猛力扩编，帮助日军侵犯黑龙江省进攻江桥。于芷山部，事后降敌，极力扩充军事势力，打击自己部下的抗日军官唐聚五，因而取得伪辽宁省警备司令官地位，就一直同东边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敌。在吉林省内，由于熙洽的迎敌叛国，于琛澄的受贿投敌，旧吉林省的武装力量，就分成抗战和投敌两系，引起哈尔滨和

① 1944年末，抽调伪军编成“铁石部队”，以伪满军训“铁石纪律”取名，并作为进关部队代号，下辖“铁心”（步兵旅）、“铁血”（骑兵旅）两支伪军，号称“三铁”部队。

哈绥线的争夺战争。在黑龙江省，自江桥抗战起，到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失败止，约有一年的混战。其它如在吉林磐石县的宋国荣营长和在延吉县的王德林营长等率部抗日，也都属于旧东北军的抗日系统。只到了宋国荣失败后杨靖宇将军领导磐石游击队，王德林失败后周保忠、孔宪荣等继续抗日，及赵尚志将军在哈尔滨东北领导抗日之后，才形成由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联军。对此，伪满军是一贯起着打击抗日武装力量的反动作用的。

伪满军打击抗日武装力量的经过概略，就辽、吉、黑三个区域来叙述如下：

在原辽宁省地区内，首先举起抗日救国旗帜的是原步兵第一团中校团附唐聚五。这个步兵团，为防守东部国境，分布在“东边道”的咽喉孔道凤凰城和长白山南麓的通化县一带。当日军抢占凤城、团长姜全我离职逃走后，唐聚五收集残部，结合地方爱国人士，奋起抗日。因人心所向，群众拥护，不久就集合起附近各县抗日军警及民众万余人，共同抗日。同时也反对于芷山的观望与投降。而于芷山在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凶手河本大作的勾结下，不仅不抗日，反而以消灭唐聚五为第一目标，加紧扩充军队，招纳土匪，死力打击唐聚五领导的军民抗日武装力量。只数月间，就将唐聚五压迫出走，给日本侵略者建立了后方无忧的功劳。在伪满政权出现当时，于芷山投降敌伪，当上了奉天的第一任伪司令官。至此，他又以肃清东边地区任务为己任，竭力地同“东边地区”抗日武装力量为敌。从1932年到1934年，他使用了六个旅的兵力，配合日军，先后击散了邓铁梅和李春润等领导的抗日军，残杀了王凤阁领导的会众多人，使东边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从五万人减少到两万。因而于1935年春，他接任了伪军政部大臣。

于琛澄继于芷山后任，仍继续使用更多的伪满军，去打击“东边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但这时在“东边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起了根本不同的转变，即是由唐、邓、李等领导的旧军警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抗日组织，已经消散，由王凤阁领导的“东边地区”农民和大刀会等抗日武装力量，正在锐减，而由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这个新兴的抗日武装力量，深得农工群众的支持，对于鸭绿江两岸的朝中人民起着共同抗日的联合作用。因而日伪称他们为“思想匪”，加以特别重视。为此，佐佐木到一主持计划，实行了所谓“东边道”区“独立大讨伐”。

1936年9月1日，佐佐木到一亲自率领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数十人，及日系军官和军用文官多人，到通化组织“东边地区”“独立讨伐指导顾问部”。他以伪满最高军事顾问和日本特务机关长名义，指挥伪满军开始“独立讨伐”，并指挥伪省、市、县行政机构，实施“肃正工作”。这个所谓“独立讨伐”，就是伪满军不受日本部队长指挥了，而由他指挥行动。这个所谓“肃正工作”，就是依照他的计划，在伪满军武力支持下，令省市县行政机构，实行“集家并村”、“检举”等“三光政策”。

在“独立讨伐”行动中，以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任“讨伐司令官”，率领幕僚在通化组成“独立讨伐司令部”，指挥伪第一军管区的主力部队和调来的增援部队，向王凤阁、杨靖宇所领导的抗日军，发动总攻击。又将东边地区九个县，划分为五个小地区，指定专人和专用部队来负责。计通化小地区，由于琛澄直接负责，指挥伪第一教导队（中将队长吕衡）、伪独立第一自动车队（两个连），担任通化县境内的“讨伐”。临辑（今吉林省临江市、集安市）小地区，由安东地区（今丹东地区）伪司令官张益

三负责指挥伪第一混成旅和由伪第五军管区调来的索支队（少将队长索景清，步兵一团，骑兵不满一团）担任临江、集安境内的“讨伐”。长抚小地区（长白县、抚松县），由伪第三混成旅长李寿山负责，指挥伪第二混成旅（旅长高明少将）伪第三混成旅，担任长白、抚松境内的“讨伐”。濛辉小地区，由伪奉天地区司令官廖弼辰负责，指挥伪第五混成旅和由伪第三军管区调来的伪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朱凤阳少将）担任濛江（今靖宇县）、辉南境内的“讨伐”。金柳（今辉南县境内金川及柳河县）小地区，由伪第六混成旅长董国华负责，指挥伪第六混成旅和伪第三骑兵旅旅长赵秋航少将，担任金川、柳河境内的“讨伐”。这些所谓小地区司令和旅长们，都是在指导“讨伐”的军事顾问们的“指导”下，去指挥部下，就是于琛澄也要听佐佐木到一的“指导”，佐不在时，是由军事顾问下山琢磨大佐来代替。而“讨伐”的各团长，则听从军事教官的“指导”。这些指导顾问和教官，是无恶不做，惨无人道，尤其是在“指导”“肃正工作”中，更是造孽多端。

这次所谓“独立讨伐”的行动，持续实行两年余，到1938年末，才撤销“讨伐”指导顾问部。其结束是由伪第一教导队，诱捕住王凤阁夫妇，送到沈阳杀害了①。在“东边地区”的农民抗日武装力量，就此瓦解，抗日联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害。统计起来，“东边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减少了17000余人，到1939年春，杨靖宇将军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据伪满军情报所载，是不足3000人了。伪满军方面，总计伤亡和冻废者，也达千人，而民夫伤亡还不在内。所谓增援部队，先后撤回原防地了。

在“肃正工作”中，是依据佐佐木到一的计划，在他和顾问、教官们的“指导”，及满军尤其是伪宪兵的协助下，经伪省、市长到县长们，各局所属行政人员，警察和地方“协和会”的绅商等会员，进行“集家并村”和检举。这个大规模的检举，是在密告和认为嫌疑的根据下实施的。其处理方法，交到伪司法处理者寥寥无几，秘密处决的占被检举者多数。因而其结果是许多教员学生、旧官吏和稍有人望的朝鲜族男女，多被残杀，商人、富户多被牵连，这类人口，一时大批失踪。而“集家并村”，更是为害尤巨。在“民匪分离”的口号下，在这个地区里，制做出若干个“无居地带”。其中较大的，如在通化东北部、柳河金川的东部、濛江抚松的南部、临江县的西部，在这些山林地区，造成一个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长一百余里的大“无居地带”。由这些县的工作人员，用伪警察的暴力，将这个地区里的农民一个不留地驱逐出山，到指定的所谓“集团部落”里去居住，限期移完。违者即以“通匪”论，焚毁房屋食粮，没收牛马农具，还交司法惩办。迁出的农民，到“集团部落”后，须先出人力畜力，建筑“集团部落”的外壕内围，“义务劳动”完毕，才许自己盖房。其结果，在这一个地区里就有约万户农民，失去四周田园庐墓、生产工具和畜力的很多，而食粮、财物更难以数计。人畜被枪杀的，也为数不少，这就是“三光政策”的实质。这个地区在“集家并村”之后，因为失业而逃散或改业者，更是不可数计。更因为生活条件突然恶劣，于次年春夏之交，瘟疫盛行，仅一个约3000余人的部落，就死亡将达千人。这些恶果，就使这

---

① 作者所述有误，王凤阁夫妇及幼子于1937年4月在通化玉皇山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就义地点不在沈阳。

个地区的人民数目锐减，土地荒废渐多，给“东边地区”广大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然而，“东边地区”的所谓讨伐的行动，还未终止，在1939年8月，又有所谓日满军警“联合讨伐”。

这次伪满军的使用，是在日本吉林地区警备司令官野副昌德指挥下施行的，其目的是要消灭杨靖宇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俾以肃清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后患，更进而由所谓满洲重工业会社，在通化地区筑路开矿，掠夺战争物资。伪满方面于1939年5月，增添了伪第八军管区，其管区是伪安东、通化两省，其兵力是伪第一、第二、第三、第六这四个混成旅及通信部队一部。这些都是由伪第一军管区所分出，在新任的伪司令官王之佑和主任顾问立花大佐的督促下，改编成为伪第八军管区司令部，伪第八通信队、第八教导队，和伪第一、二、三混成旅。同时伪宪兵总团司令官又派遣第八宪兵团，驻在通化，听受指挥。

伪第八军管区成立当时，其所属兵力的布置如下：

伪第八军管区司令部及伪第八通信队，驻通化市内。并有伪通化治安部病院，受军管区区处。

伪第八教导队，少将队长赵振邦，率炮兵连驻通化。其伪步兵第一团，上校团长朱彦儒，率该团驻在柳河县的孤山子镇，及凉水河子和回头沟子。其伪骑兵第五团，上校团长李希才，率全团驻通化县的八道江。

伪第一混成旅，少将旅长李裕平，率步兵第六团，团长于泽浦，伪骑兵第三团，团长部凤麟，全旅驻扶松县城内。

伪第二混成旅，少将旅长高明，率伪骑兵第四团，团长马国栋，驻长白县城。其伪步兵第二团，团长李海澄，率该团驻长白县十三道沟。

伪第三混成旅，少将旅长王士琇，率伪步兵第七团，团长杨春煜分驻金川和小金川。其伪骑兵第八团，团长魏传镛率全团驻辑安县。

伪第八军管区成立后，在6月里，伪司令官王之佑同主任顾问立花大佐，即去金川、抚松、长白各县，巡视伪第三、第一、第二各旅。当到十三道沟巡视伪步兵第二团时，就得到伪治安部令，因诺门罕战事发生，须将炮兵连派遣到前方，编入伪兴安军管区指挥，参加诺门罕战役。于是立即回防执行命令，这是参加这次作战的派遣兵力。

同年7月初旬，又奉到伪治安部令，伪第八军管区从7月起，脱离日本沈阳地区司令官的区处，今后要听日本吉林地区警备司令官野副昌德的区处，于是改变了从前的日、满军的指挥系统。不久就接到野副昌德的通知，在吉林召开防务会议，请伪第八军管区派遣参谋长同作战顾问届时参加。伪第八军管区遂派遣司令部参谋长赫慕侠同军事顾问安永中佐前往。他们回来后，宣布本年“日满军警联合讨伐”的计划。

这次在野副昌德的指挥下，进行“日满军警联合讨伐”的实施，是这样进行的：

所谓“讨伐”目标，是指向杨靖宇和陈翰章等所领导的抗日联军（陈部是在吉林）。

所谓“讨伐”地区是包括伪通化省的辑安、通化、临江、濛江、辉南、金川、柳河八个县，及伪吉林省的磐石、桦甸、敦化、额穆四个县。

使用兵力，野副昌德指挥下，日本守备大队五（约计人数三四千）千名，伪满军

四个混成旅和两个教导队及伪通化、安东、吉林三个省警备大队（每队千余人），共计一万六七千人。

实施过程和结果，这次所谓“讨伐”的实施，是由南向北逐步推进，在东西两侧严密封锁，企图一网打尽。

在伪通化地区内，于7月间，调伪第八军管区的第八教导队步兵第一团，分布在柳河县的东北境内，伪骑兵第五团，分布在通化北东境内。伪第三旅的骑兵第八团，往辑安县西北境内。北接伪步兵第二旅的骑兵第四团和步兵第二团，在临江、通化境内。再北接连伪安东省警察大队，在临江县境西部。更北接联伪步兵第一旅的步兵第六团、骑兵第三团，延伸在抚松县南部到濛江县东南境内。再西连伪通化省警察大队在濛江西部到辉南东部，同伪第三旅的步兵第七团连接，布置在金川县境。这样就成为包围通化北部“大无居地带”的形势。

8月1日开始，在日军三个守备大队长的指挥和日军的分段配合下，实行所谓“帮助”农民秋收，全线向内圈推进。一方面强迫农民将可食的农作物，一律收割，运进“集团部落”交地方警察看守，断绝抗日联军食粮；另一方面，打击抗日联军，焚毁山寨，消灭抗日联军根据地。一月之间，将外围农作物收尽，将零星山寨焚毁。并在十多次小冲突中，双方各有少数的死伤。于是紧紧包围住这个“大无居住地区”。

9月中旬，令在东北包围线上的伪步兵第一旅和伪安东警察大队严密防堵，更将伪第八教导队扼守东起八道江，中经板石沟岭、回头沟子，西至凉水河子，防止抗日联军的突围。于是令伪骑兵第四、第八团从东南方，伪步兵第二团从南方，伪步兵第七团从西南方，配合日军，进入这个大“无居地带”。在使用飞机的侦察指挥下，日伪军同抗日联军，不断发生小“部队冲突”并焚毁许多山寨，互有数百人的伤亡，被抓用的民夫也死伤约百名。到12月上旬，日伪军出山后，抗日联军是以化整为零巧妙突围战术，脱离了包围圈。金日成所部，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杨靖宇将军在濛江、桦甸之间，又集合起来了。

1940年元旦，伪第八军管区的步兵第一、二两旅，又由在龙泉镇的“讨伐”指导顾问安永中佐，受野副昌德命令，派遣到磐石、桦甸等县境，归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指挥，进入桦甸县东南境，于是又发生在桦濛交界的截击战斗。

约在2月上旬，伪第一混成旅长李裕平，率全旅进入桦濛交界的某山口，其骑兵第三团，在团长部凤麟率领下，突遭抗日联军的袭击，陷入被围。虽得伪步兵第六团长于泽浦的增援，入夜同陷于被围。次日伪第二混成旅长高明，率全旅来援，战斗至下午，抗日联军方突围而去。这时始知是杨靖宇将军的主力约500人。这次战斗结果，伪满军伤170人，死百余人，抗日联军约有同等死伤，并损失枪械200支。是这次所谓“讨伐”的最大战斗。这两个旅，从此就归入吉兴指挥系统，至同年秋季，才归还原建制。

杨靖宇将军在这次重大损失后，又化整为零，再向南进。在遇到日军古见大队和伪通化省警察大队（大队长是叛党降敌的程斌）的不断截击后，于2月25日，行至龙泉镇北的某集团部落外，被伪通化警察大队一部截击，弹竭力尽战死了。据目睹遗体的伪濛江县长吕书铭说，杨将军两足冻伤，腹有青草。日军古见大队长捧着杨靖宇将军的

首级，去向野副昌德献功。野副昌德和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遂称为这次所谓日满军警“联合讨伐”的首功者。

如上所述，在原辽宁省地区里，日本侵略者使用伪满军，在所谓“讨伐”行动下，概尽于此。其后，称为“治安确立”，兵力渐向伪热河省移转。

在原吉林省内，也有着使用伪满军打击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事实。自熙洽叛国降敌后，旧吉林省的军、警、团，就分裂成为降敌和抗战两派。日本侵略者就利用于琛澄、吉兴等的投降武装力量，去打不投降的武装力量。到1934年，旧吉林省的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是已经消除。但是，赵尚志将军等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逐渐强大，成立了抗日联军。日本侵略当局不断使用伪满军进行所谓“讨伐”。其中最大规模的用兵，要以1937年至1938年的“三江地区大讨伐”为最。

这次使用伪满军“讨伐”也是在佐佐木到一和高级顾问大迫通贞的主使、支持下实施的。佐佐木到一和于琛澄，在东边道独立“讨伐”的过程中，认为有成效，于是又产生了三江地区的“大讨伐”。

这次用兵是这样实施的：

1937年夏，又将于琛澄调回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并兼任伪三江省省长，常驻佳木斯。针对赵尚志、周保中、张寿篯①、夏云阶等领导的抗日联军和谢文东领导的武装队伍，进行打击，期在一网打尽。

使用兵力，计有伪第四军管区的七个旅和伪第四教导队。更调来伪第三军管区的两个旅，并派遣两个骑兵团在汤原、通河一带沿江防堵。同时伪第六军管区也派遣部队，在密山、穆棱、林口之线防堵。这样，伪满军就动用了两万余人的兵力。

“讨伐”实施。在日本军的支持下，于琛澄同其主任顾问高桥大佐，于9月初，以伪第四教导队及一个旅，在参谋长赵振邦和顾问森中佐的指挥下，协同驻方正的日军某旅团，防守方正、延寿到依兰县以西，阻止抗日联军的西进。以一旅兵力，配备在佳木斯、桦川县，东联驻富锦、同江的伪靖安第一师，阻止抗日联军的渡江，更以其它各旅开始在依兰、桦川、勃利、宝清、虎林、饶河6县，仿照“东边地区”独立“讨伐”的方法，配合省、市、县行政人员和伪警，实行搜剿和“肃正”。到1938年秋，总计结果，使抗日武装力量约8000人惨遭损失，并诱降了谢文东，伪满军也死伤千余人，被害人民难以统计。至此，原吉林地区里，抗日武装力量只有抗日联军的一个系统，赵尚志将军等的抗日力量也大大减小了，于琛澄因而升任了伪治安大臣。

在原黑龙江省内，引起江桥抗战的是张海鹏叛军。他们初一进攻，就被原黑龙江军所击溃，先头的伪支队长徐景隆被地雷炸死，王之安、鹏飞等支队就观望不前，日军第二师团始继续进攻。这时原黑龙江军还是全部抗战的。

在1932年马占山再起抗战时，在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和大汉奸韩云阶的策动下，程志远、张文铸等就各率所部，被日军驱使“讨马”。其后半年间，跟随日军打击马占山的伪满军就是程志远、张文铸、贾金铭等部，及王殿支队。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失败后，虽然曾有程志远的部下邓文、霍刚、檀自新等继续抗日，都在张文铸派遣伪满军

---

① 即李兆麟，抗联第六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

进攻下先后失利。到1934年，在原黑龙江省内，旧东北军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不存在了。所以伪军政部曾先后由黑龙江省调出数个旅，移归伪军政部和伪滨江地区隶属。在龙江地区里号称“肃清”。

但是赵尚志将军领导的抗日军逐渐发展，其活动地区由珠河（今尚志县）、延寿、方正等县，逐步扩展到江北的汤原、通河、木兰、铁力、海伦、通北、北安、德都、嫩江之线。当时张文铸曾不断派伪满军沿江堵截或进行打击。

1940年冬，王之佑任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时，就曾同主任顾问原和三郎中佐，派遣伪步兵第四旅步兵十七团的第一营，在海伦县东北山边防堵，派遣伪第十二混成旅的骑兵（不足一团）入山搜剿。其结果，虽未发现抗日联军第三军，没有发生战斗，但是焚毁了数个山寨，并将山中烧炭农民全都驱逐出山。同年年末，又配合昂昂溪守备队司令官辖下的日军，派遣伪骑兵第二十一团及第三教导骑兵团，经嫩江县“搜剿”王明贵所领导的抗日联军骑兵游击队。追过嫩江西岸，在西布特哈旗及阿荣旗境内，两次遭遇战。抗日军死伤数人，伪满军也死伤日系军官以下四名。

1941年，又曾派遣伪骑兵二十一团信连长率该连在嫩江县北霍龙门，再次打击王明贵部的抗日军。抗日军死伤四五人，死马数匹和失枪数支。

同年冬到1942年春，又曾派遣伪骑兵第二十一团，到伪第十军管区，增援其“讨伐”。经此之后，在黑龙江省里，抗日军只有王明贵的不足百人的小部队。伪第三军管区每年用骑兵打击，而将伪步兵第四旅移归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指挥，在伪热河省内对付八路军去了。

日军侵华战争的帮凶

使用伪满军进攻中国，也是佐佐木到一计划实施的，它开始于1937年8月，即七七事变之后。

这个罪行是在这样情况下实施的：

伪满军在佐佐木到一任最高顾问阶段中，部队整编了，装备充实了，使用的效果也扩大了。于是佐佐木到一就要处处试用，一显其侵略阴谋的本领。七七事变一发生，他就同伪大臣于芷山，命令由伪靖安军和第五教导队合编为伪热河支队，以藤井重郎任支队长，经锦州到滦平集结，于8月初进抵丰宁县向赤城县进攻。当这部伪满军到达黑河川的长城线外时，就受到国民党军队高桂滋师阻击，在左起茨儿沟，中经黑鞑营子、猴石，右至喜峰口一线上展开攻防战。在8月20、21两日，伪第五教导队步兵团遭到夜袭，伪少将队长朱家训被击毙，一个营反正。藤井重郎在阵地上被某中士刺杀①。右翼的伪第五教导队骑兵团长富璇善被迫率全团退走，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其后，在中国军队自动撤走后，这部伪军重整旗鼓，在顾问皆藤喜代志中佐和美崎丈平率领下，从哨咕营子入口，进占了赤城县，更推进到宣化，为日军守护铁道线数月。至1938年1月，始撤回原驻地。这次战斗，中国军队没有损伤。皆藤喜代志同美崎丈平互相埋怨，大肆

---

① 1937年8月18日（另有8月21日之说），藤井重郎在热河黑鞑营子被伪靖安军第一机关连中士班长李玉峰举枪击毙。李玉峰被捕，慷慨就义。

争吵，显现出他们内部的矛盾。只是刺杀藤井重郎的这位民族英雄，被日本侵略者守密瞒过，是一憾事。

石兰部队进驻北平也是佐佐木到一所派遣的。在同年8月初，以将补热河防务的命令，令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派遣伪第三教导队进驻承德、滦平，归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指挥。但是在8月下旬，就由池田顾问擅自命令少将石兰斌，率全队自古北口进入长城线，因简称为"石兰部队"。他们最初是队长率步兵团长张金祥所部进驻密云县城，骑兵团长刘玢率所部进驻怀柔县城。其后，又由密云进入驻北平北郊高丽营子，到年末撤回原驻地。这部伪军始终未发生战斗，只是给日军后方起了镇压人民的作用。

再当七七事变后，伪满又以默许形式，听任军事顾问的布置，叫伪第三混成旅长李寿山及伪安东地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张宗援①偕同伪团长赵保元等数百人，经海上潜入山东，在鲁东地区招集土匪，勾结帮会，作乱年余。失败后，又逃回伪满，晋级退役。又将他们安置在东边地区，帮助日本殖民统治者掠夺森林、矿产等资源。

1938年夏，在平林盛人任最高顾问时，伪满又应日本华北军的请求，派遣甘支队入关。这部伪满军是由伪兴安军管区派遣的，以甘珠尔扎布任少将队长，率蒙系骑兵两个团、山炮兵一连，在西起密云县，东北至前蓟县一带长城线以南，进行所谓"讨伐"，给华北抗日武装力量以相当的损害，尤其是在这年中秋前后，洗杀了若干乡村的农民，引起极大的恐怖。到年末，还以"凯旋"的形式，回归伪满"入宫奏凯"。

最后由1944年到1945年，伪满又派所谓"三铁部队"入关。

铁石部队，在岩田薰率领下，是以对付八路军为目的。入关后曾沿京榆大道沿线，经过榆关镇、扶宁县、卢龙县渡过滦河，经过榛子镇、沙河驿，进到遵化境内，专事打击八路军。

铁心部队，在栗野少将率领下，以同样的目的经滦州下车后，继续铁石部队进攻，进驻于沙河驿、榛子镇一带，其后方补给线均在滦州，由伪第一自动车队担任运输。

铁血部队，在铁路警护军日系某旅长指挥下，专事保护铁道交通任务。并由伪宪兵第十六团（或是第十五）担任车中检查任务。

以上三个伪满部队，均在伪大臣邢士廉的直接派遣下，充由日本华北驻屯军指挥使用。至1945年"八一五"尚未归还。

配合日军侵略苏蒙

伪满军在配合日军侵略苏、蒙中，要以"诺门罕"战役为最。这是在日军试行"北进政策"的侵略计划下实行的。原外蒙古车臣汗同内蒙古索伦旗的境界，是从哈里哈河东西岸划分的。但在牧地使用上，是往往不分疆域，互相过河，也从无争执。当伪满洲国出现后，牧民们还是依照旧习惯往来，于是日本在其侵略满蒙、威胁苏联的政策下，就大作起文章。不许车臣汗牧民东渡，暴力强扣过河牛羊，甚至拘捕牧民的情事，

---

① 张宗援系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他与王殿忠、李寿山都曾为张宗昌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军唆使下，三人在辽宁省营口、大石桥、丹东招集土匪3500余人，自称司令、副司令。

就不断发生。因则产生了“满蒙划境问题”，在日本东京进行了谈判。1939年春，谈判决裂，日本向海拉尔方面大增兵力，威胁苏、蒙，不断引起小范围的武装冲突。同年6月，日军集结步、骑、炮兵两万余人，并配合空军、装甲兵等部队，在日军小松原中将指挥下，以武力威胁蒙古，而其实质是意在苏联。在名义上是“满洲国”的问题，就需要派遣伪满军。于是就命令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李文炳，派出石兰斌的伪国防第一旅，又令伪兴安军管区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抽调骑兵四个团，更命令伪第一、第二、第八各军管区及陆军训练处，各将所有炮兵抽出，合编为炮兵一团，临时编成伪兴安骑兵第二师，任日军某少将为师长，率领该师参加作战。更调某自动车队、医务人员，担任前后方输运、医疗任务。这些伪满军是在哈里哈河东岸诺门罕高地南北展开攻击阵式的，所以称为“诺门罕”战役。

据听说，这次侵略战争一开始，日伪军就遭到苏联远射程炮火打击，人马死伤甚重，从未渡过哈里哈河，遂转攻为守。更在苏联强大空军的轰炸下，日本空军消灭殆尽。因而在前方是人人埋首沙坑，静待死伤和活埋。伪满炮兵不仅打不着对方炮兵和飞机，就是步兵阵地也观测不明，成了哑子。后方补给线完全断绝，弹药难以补充，就是汲水，也受到定时的炮火阻碍。一经苏、蒙步骑兵的反击，就全线溃散，很快地结束了战局。日本认败乞和，停战后小松原撤免，侵略军撤退，最后松冈洋右去苏联，签订了五年之内苏日互不侵犯协定。伪满军的国防第一旅第一团的营长库久珍（或是西九珍，因听说恐有误）率全营投苏联去了。伪满军死伤很重，回防后旅长石兰斌、团长崔凤鸣等免职，全旅改编为一个团。伪兴安骑兵第二师，当时伤亡600余人，逃亡更多，实际损失人数计千余名，马数百匹，武器约相当于人数。自动车也损坏20余台，及若干通信器材。撤退后，伪师长免职免官，该师全部解散。到1940年，这些战败军官士兵大多数免官退役。这就是“诺门罕”战役的结果。从此日本的所谓“北进政策”销声匿迹。

集中兵力对付八路军

自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用张海鹏伪军，配合日军，攻占原热河省之后，在热河省内，就再没有什么抗日武装力量了。伪满军的使用，除在该地区里，有少数土匪经由该管区驻在伪军随时消灭外，一时号称“治安确立”。因而这个伪军管区的伪军，曾一度派遣增援伪第一军管区的所谓独立“讨伐”。

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长城线内外，就产生抗日武装力量的组织，因而伪第五军管区的伪军是不断使用在长城线内外去“讨伐”。到1940年，感到兵力的不足，首先在所谓日满军警“联合讨伐”的终了时，由伪第八军管区，抽调李海澄的步兵第二团和于泽浦的伪步兵六团，合编一旅，以周大鲁任旅长，拨归伪第五军管区隶属，移驻丰宁县，担任黑河川沿线的“讨伐”。更派伪第一军管区的步兵第五团，在团长戴元率领下进驻平泉县；派遣伪第二军管区的宁宝祥步兵团，进驻承德以北某地，均受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的指挥，担任“讨伐”和“集家并村”的援助任务。到1943年，野副昌德任师团长，驻密云县，施行对八路军的封锁剿共时期，伪满一方面委任岸谷隆一任伪热河省次长，率领他的得力打手程斌等，实行“三光政策”。又一方面，派遣伪第三

军管区的步兵第四旅、伪第八军管区的步兵第三团，进驻热河，归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指挥，去对付八路军。

1944 年，又将伪第一军管区的骑兵三十九团移驻赤峰县，伪第七军管区的赫奎部队移驻热河某地，均编入伪第五军管区的隶属部队。

这时，伪热河省内，在大部分兵力镇压、厉行“三光政策”之下，人民是穷困已极，食不得饱，衣不蔽体。在“讨伐”和“肃正”中，死者无法计算，被押在监狱中尚未判决者约有三百余人。其凄惨景况，比东边地区“独立讨伐”等，有过之无不及。

综合上述概况，伪满军在最后八年中，随着八路军抗日力量的不断发展，也就不断集结兵力来对抗。但是在战斗上，从未有任何所谓胜利。而被俘后放回的日“满”系官兵，因为称赞八路军的人道主义，被迫自杀或处死刑者，时有所闻。

三、实行“国兵法”

奴役人民是殖民主义政策之一。旧东北军的兵员补充，一贯是募兵制伪满军就沿用旧习惯，除蒙系骑兵是“按户抽丁”外，一般均是招募佣兵。在最初四年中，由于逐渐裁军减额，人心不定，所谓拐械潜逃、零星叛变，是常见不鲜。尤其是在 1935 和 1936 年，在穆棱县梨树镇，发生过团部卫兵打死团长，在密山县三人班因阴历除夕士兵包饺子被日系军官踢翻，引起众怒，全连将日系军官枪杀。事后他们都拐械逃往苏联，这就更引起佐佐木到一的注意。他认为这是佣兵，多无家可考，就仿照蒙古族募兵方法，试行过三年的新招募办法。其办法是：依照各伪军管区所需募补人数，由伪国务院通知各伪省长，再由省将人数分配与各市、县。各伪军管区募兵官到市、县时，伪市、县公署就将各区应出壮丁加倍派出，听候挑选。这样募兵，是有了固定住所，逃了就找家长，当时称为有辫子可牵了。然而，这样募兵，是有钱有势的子弟不当兵，苦了贫农子弟。更使户警发了招兵财，所以后来，就实行“国兵法”，改了征兵制。

伪满为实行征兵，先曾于 1935 年由伪军政部军事调查部，开始调查人力物资。1936 年又交与伪国务院总务厅，组成征兵调查委员会，继续负责。到 1939 年，所谓“国势调查”完毕后，于 1940 年 4 月 15 日，颁布“国兵法”。依法规定，凡汉、满、蒙古、朝鲜等民族的男子，年满 20 岁均应受检。合格的入队当兵，不合格的要服一年劳奉（“勤劳奉仕”）义务。逃避和协助逃避者，要交由伪司法机关处以有期徒刑。其后五年，因此而被处徒刑者，就每县均有，人数不能统计。而雇人顶替者，更是屡见不鲜，雇用价格，由最初一名 300 元伪币，涨到最后每名 3000 元伪币。这种民财耗费就以亿万计了，伪军、警官员和户警，更借端勒索，贿赂公行。

伪满治安部，在“国兵法”将公布之前，就召集各伪军管区军官数十人，传习了兵事业务和征兵检查一般知识，并准备了壮丁调查和检查应用表册。他们归还后，又传习于军官、军用文官和军士。“国兵法”颁布后，在伪军政司内设兵事科，掌管征兵诸事务。各伪军管区在司令部里内设兵事处，在管区内的省公署所在地内设兵事分处，主管兵事业务。同时各伪省、市、县、旗公署，内设兵事科、股，办理壮丁调查和征兵检查诸事务。

在兵事业务中，是伪军政同民政机构合办，但以军政方面为主，地方行政为辅。如在发布征兵布告时，伪军管区司令官用征兵管区征兵官领衔，省长用省征兵官名义，共同公布。又如在征兵检查时，伪军管区征兵官领导主持全部，伪市、县、旗长的地方征兵官，只是辅佐地位。

每年度征兵业务，由市、县、旗负责调查适龄壮丁，造成名册，报省秉报伪军管区，再由伪军管区秉报到伪部。伪兵事科统计“全国”适龄壮丁人数，用下期应补兵员额数除得本期应征壮丁比例额和确定应征兵员数目，令各征兵管区检查录取。更在各种兵科的兵员特点上，规定资格标准，以使征兵检查官们核定。

伪满征兵，原定于1940年8月1日开始，实行第一期征兵检查。但因为地方征兵事务准备未完成，改于1941年4月补行。这次具体情况，全伪满适龄壮丁约28万人，而应补兵额为27000余名，比例数不足百分之十。在民族关系上，是朝鲜族编入步兵科，回族编入骑兵科，集中在延吉和沈阳单独训练，生活照顾到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兴安骑兵仍由蒙系补充。其余各管区和部队，基本上是用部队驻在地的合格壮丁补充。但因南部人口密，是要用有余补不足的。如锦州，辽宁的合格壮丁，历年要为佳木斯补充新兵。而高官子弟，则一定补入伪禁卫团。

征兵检查，开设检查场及一切准备事务，省、市、县、旗地方征兵官负责办理。军征兵官，由各伪军管区按所需要的数目，编成几个乃至十几个征兵班。每班由校级军官一人负责，率领征兵事务官、征兵军医官及宪兵等十余人，到市、县、旗征兵现地，会同地方征兵人员、协助人员（地方商工会、“协和会”、“国防妇女会”等人员）施行检查。在检查实施中，地方征兵官先考核壮丁的家庭情况、学历；征兵军医官考核体格实况；再由军征官复核决定合格或不合格，更决定应补入的兵种，即作最后决定。

合格壮丁，在检查合格到召集入队期间，仍各守本业。伪满入队日期，概定于每年2月，届期，各市、县、旗将合格壮丁护送到指定的集结地，交军方接收，自接收日起，即算入队期。三年兵役期满，退役归还原职业。因而雇农、店员等壮丁，有家庭生活困难者，地主和商店要负救济责任。入队壮丁家庭为“国兵之家”，农商人民应负责爱护。而士兵受军士教导队教育者，则留队延期退役。

伪满新兵入队教练，一般是集中训练，到第一期教练完成后，分入各连。在这个新兵教练期间，军士毒打新兵，是一个特殊情况。据闻（因在秘密行动下实行，就是营长以上军官，也不可能看见）伪军士在日系连排军官的指导迫令下，到夜间就寝时，将房门关闭，新兵赤体自动动手，或新兵相互用皮带抽打下体。个人不好就打个人，全班不好就打集体。今天成绩不好要打，明天成绩不好再打。

伪满“国兵”实行入队共五期，总员数为十四万余人。这些比较优秀的青年是被强迫去受蹂躏当新兵。而所余的所谓不合格的青年，其遭遇更是凄惨，在这百多万青年中，除去在日“满”军队、行政、特殊会社和大学入学等数十万人外，均依伪法令规定，要服一年期限的劳役。这种劳役，必须在三年以内实行。这就是当时人民所说的：“合格的要当三年兵，不合格的也跑不了三年苦力”。他们在建设要塞、机场，修筑公路、铁路，开采矿山、森林和其它等等劳役中，受尽暴力压迫，饥寒交困，甚至遭到惨杀和死伤病残。

伪满却把这一苛政郑重其事地视为要政。在征兵检查时，伪皇帝要派遣侍从武官，“如朕亲临”地赴征兵场视察。伪大臣、最高顾问、伪司令官、参谋长、主任顾问，以及伪中央有关征兵人员，全部要分头到各现场“视察”、“慰问”，新兵入队及新兵第一期教练期满，伪军政当局及地方团体也要前往“慰问”，还得向广大人民收集慰问品或慰问金。

伪满士兵到实行“国兵法”阶段，其素质是比较以前较“优”的，因为如上所述的合格壮丁绝大多数是中农阶层，家庭固定，生活确立，有着相当学历，并且体格强健没有宿疾。但到入队以后，由于上述军士毒打新兵等情形，士兵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就又将旧的士兵关系——即所谓的“大家都是弟兄”被日系军官给消除了。

如上所述是关于伪满军派别、素质的概论说法。到这里还要说说伪满军警之间的矛盾，及人们对这两种暴力在态度上的矛盾的差别。

伪满军警之间矛盾，在日本侵略政策上和伪满军政机关里是根本存在的。从治安部的军警统一，又分离对立，就看出它的驱向尖锐化，而不能消除。这个矛盾影响到全军中，是同实行“国兵法”有着根本联系的。在壮丁调查中，“国兵”及其家族亲友受着伪警严重迫害，仇恨思想更加深一层。有少数不合格的壮丁，才去充当伪警，就又加深轻视思想。子弟充当“国兵”，父兄受警察迫害，就更足以产生用暴力打击暴力的思想。这样，在伪满时期，军队打警察的事件就不断发生。而在肇事当时，往往是因警察镇压商农所引起，有人说是军人打抱不平。这样，不仅在当时伪军受到一些人的庇护，就是所谓依法判罪时，必往往得到宪兵、军法人员的原谅。于是在公怨、私仇的积怒下，打警察的情形更多了。因而军、警之间冲突越多，矛盾也越深。

四、伪满军的消灭

伪满军是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随着日本的投降，也放下武器投降而消灭了。但在当时，因为关东军要作最后抵抗，伪满军在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最高军事顾问秋山义隆的命令下，配属于日本军，也曾做过垂死挣扎。

在 1945 年伪满兵力配布状态中就可以看出，集中大部分兵力于蓟东、热河地区，是抵抗八路军，在东北“国防”线上，兵力并未调出，是为防御苏联。

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空军轰炸长春、吉林后，企图以通化为根据地，集结驻伪满和朝鲜的兵力，在图们到长春、长春至旅大的铁道沿线，作最后的抵抗。一方面，由他率领关东军司令部及伪皇帝以下伪满政府诸大臣，移向通化，继续发号施令，作垂死挣扎。另一方面，命令日伪军向这条防御线上集结，并调驻朝鲜军由图们入境增援。8 月 10 日，邢士廉同秋山义隆也曾给伪满军下达作战命令。

就伪第一军管区司令部接到命令来说，首先就说，苏联“背信弃义”，出兵“进攻”，日“满”军要在预定线上联合抗战。命令在伪第一军管区内的所有部队和学校，都在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的统一指挥下，依照规定，将各部队配属在“强”兵团长（这就是指日军第三方面军团长后宫淳大将，因守秘，当时用“强”字代替）指挥系统下，伪司令官王之佑直接隶属于“强”兵团长等等。

8月11日，王之佑见到后宫淳时又受到他的命令，将伪高射炮队司令官刘牧禅所部，全部听受日军高射炮队司令官指挥，将伪航空学校长所部及第一航兵队，全部听受日军航空部队长指挥，将伪陆军训练学校的军士教导队骑兵连、炮兵连、重机枪和迫击炮连，均交由日军师、旅团长指挥，其步兵两营，在校长梅村率领下，归王之佑指挥，担任沈阳城内的守备。更命令王之佑调某工兵队，在沈阳郊区构筑防御阵地，调自动车学校和自动车队的车辆，为日军运送物资。同时又命令驻锦州的伪步兵第一旅长金毅率领驻锦部队，受日军某旅团长指挥。这时的伪满军通信机构已归日军通信部队掌握，收发电信，必须经过“强”兵团司令部。只五日间，在日满军和民夫的日夜工作下，在沈阳郊区构筑成长达20余公里的防御阵地，企图对苏联红军作最后决战。

其他各伪军管区，也接受到类似的命令。如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甘珠尔扎布率所部受“远征”军军长指挥。在开鲁县附近被苏联红军击败后，退到通辽随同日军投降了。

日本投降，开始于同年8月15日。在这天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下了诏书，宣布日本投降。就伪第一军管区来说，伪司令官和主任顾问率领驻沈阳的全体日系军官及伪满军官的一部听完广播后，即宣布依“诏”投降。同时，各军事顾问即日离开伪满军。日系军官次日离开伪满军。所有伪满军均停止作业，撤出阵地，归入营房或旅馆、学校居住。18日苏联红军进入市区，日满军放下武器投降。依照苏联军代表命令，日本军退出沈阳市和南满铁道以西，徒手移驻南满铁道线以东。伪满军驻在市内，放下所有武器，沈阳治安由苏联红军负责。19日即将后宫淳以下日系将官40余人及王之佑，用飞机运往赤塔。10月间又转去哈巴罗夫斯克。伪第一军管区参谋长女屉岩少将及伪校长梅村中将、米山中将、野口中将等也继续被捕，送往哈巴罗夫斯克。这些日军将领均在1950年由苏联运送回日本。王之佑于同年8月遣送回国，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61年12月25日，依特赦令第一条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特赦释放了。

其他各伪军管区情况，大致如下：

在西北“国境”线上的伪第十军管区，当9月中旬苏联红军进攻时，伪司令官郭文林率部退出海拉尔。于9月13日同伪参谋长正珠尔扎布谋划，将全部日系军官枪杀后，率部向苏联红军投降。他同正珠尔扎布及副官鄂新泰被送往赤塔，又转到哈巴罗夫斯克。1958年8月遣送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于1969年被特赦释放。

驻在齐齐哈尔的伪第三军管区，在伪司令官赵秋航的率领下，同日军依诏投降。苏联红军到达后，将部队集结在齐齐哈尔、五虎马一带，缴械投降。他同伪参谋长任广福，被送往哈巴罗夫斯克，1950年8月遣送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受教育改造，现仍在继续关押中。任广福于1961年12月被特赦释放了。

驻在东北“国境”线上密山的伪第十一军管区司令官郭若霖，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只身潜逃，被苏军俘虏后送往苏联，曾判处有期徒刑25年，入监狱执行。其部下旅长杨崇武率领部队，其后情况不明。郭若霖其后也由苏联遣送回国，现在关押改造中①。

驻在牡丹江的伪第六军管区，在投降前，是归日军第一方面军团长喜多诚一大将指挥的。所属伪第八旅及工兵队，均在镜泊湖附近构筑防御阵地。日本投降时，伪司令官

① 郭若霖于1975年3月18日，第七批特赦。

贾华杰只身逃走。所属部队在工地由旅长刘玢率领投降。刘玢被送往哈巴罗夫斯克，于1950年遣送回国，后在抚顺关押改造中。

驻在哈尔滨的伪第四军管区，伪司令官李文龙同伪旅长刘显良，依令率部投降。他们被送到哈巴罗夫斯克，1950年8月，遣送回国。现刘显良于1961年被特赦释放，李文龙仍在关押改造中①。

驻哈尔滨的伪江上军司令官曹秉森及其舰艇司令赵竞昌，伪地上部队司令吴国贵，是依令投降的。但因部队零散，难于掌握，内中因发生小部队“叛变”，反同日军冲突事件。于是又发生过派遣地上部队打击“叛变”部队的内部战斗，因而这部伪军，是分成为投降和起义，其后情况不明。他们三人均被送往哈巴罗夫斯克。1950年遣送回国。吴已病死，曹秉森、赵竞昌仍在关押改造中。

驻在北安的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周大鲁，旅长富璇善、参谋长赵玮等，是依令投降的。他们及兵器处长郭上校，均被送往哈巴罗夫斯克。郭已病死。周、富、赵三人，于1950年遣送回国。现周大鲁、赵玮，已于1961年特赦释放，富璇善仍在关押改造中。据当时在苏联听说，伪第八军管区部队，有一部从黑河渡江，在布鲁郭威什臣斯克铁路线上作劳动工作的，其后情况不明。

驻吉林的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关成山依令投降，他同参谋长肖玉琛、第二旅长张印符、军法处长王光寅、军医处长宪均，及独立通信队长吕梦龄等，均被送往哈巴罗夫斯克。关成山判处有期徒刑，在监狱病死。其余诸人于1950年遣送回国，张印符、吕梦龄先后病死，余三人尚在关押改造中，② 部队均在原驻地缴械投降了。

驻承德的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依令投降，原属部队及各军增援部队，均在长城内外原驻地，投降时情况不明。据传闻，赫同旅长陈明山、张金祥等，在被拘押中逃走，不明去向。部队长中有率部反正者。

驻长春的伪军事部，伪大臣邢士廉及伪侍卫武官长张文铸等，曾随同伪皇帝于同年8月12日逃往通化。日本投降，伪皇帝退位后，又回到长春。③ 在备战和投降之间数日里，伪次长真井鹤吉是负责处理一切军政事务的。驻长春的伪禁卫队同军官学生等，曾一时起义，同日本军演成巷战，被他同伪大臣于镜涛等迫压停止了。苏联红军进入长春，均依令投降。其后邢士廉、真井鹤吉、佟衡、落合镇等被捕送往苏联。1950年，真井、落合被遣送回日本。邢、佟被遣送回国。邢士廉于1953年在哈尔滨因病人医院，以后不明。佟衡仍在关押改造中。张文铸同伪禁卫队司令官张名久、伪宪兵总团司令官刘南华等潜逃，其后不明。

（1964年）

---

① 1964年12月28日，第五批特赦名单中，有李文龙，及肖玉琛、赵竞昌、佟衡、宪均。故下文涉及四人，不另加注。

② 王光寅于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同批特赦的还有赵秋航。

③ 溥仪于19日从大栗子抵达通化，之后转道沈阳企图逃亡日本，在沈阳机场被苏军逮捕。

日本殖民者榨取农产品

金　名　世*

伪满自1939年施行全面的经济统制，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榨取，其中危害人民最甚者，则是公布“粮谷统制法”，榨取农民的农产品。伪满政府根据粮谷统制法，从这一年开始实行“粮谷出荷”，直接向农民要粮。该年规定的“粮谷出荷”总数量是500万吨，因着手较晚，大部分粮谷多半被日本垄断资本三井、三菱所收买。所以，伪满政府在开始征粮的第一年，所征收的粮谷大约是250万吨，未能达到它所要榨取的数量。

1940年武部六藏任伪总务长官后，一方面加强扩大榨取农产物的组织机构，如“兴农合作社”、“农产公社”等；一方面责成省、县以“增产出荷”为主要业务，并命令省、县经常设置“粮谷出荷督励本部”。从此以后，完成了榨取粮谷的密网，逐年增加“粮谷出荷”数量。1940年“粮谷出荷”总数量是620万吨，1941年是680万吨，1942年是720万吨，1943年是780万吨，1944年是820万吨，直到伪满崩溃的1945年是900万吨。这样，伪满政府每年仅以最低的价格，就把东北农民生产的粮谷掠夺到手。然后，再按照它的榨取物动计划，除每年拨给关东军10万吨外，其余则分别运往日本、朝鲜、关东州、华北等处，每年约在300万吨以上。伪满政府确定榨取物动计划时，完全是由武部六藏根据日本政府的意图决定的。

因实行粮谷统制法，伪满政府于1941年对城市人口实行“粮谷配给制度”，按着户籍在家人口的实数，发给“粮谷配给通账”，分为大人、老年人、小孩三种规定。开始实行的时候，大人的配给量每人每月杂粮15公斤，老年人和小孩则按大人的配给量减量配给。由于“粮谷配给制度”的实行，中国人配给的数量和品种越来越少。1942年起，伪满政府把榨取东北的粮谷大部分都运往日本等处，致使现地粮食不够，于是又改变都市人口的粮谷配给量15公斤为9公斤，并配给豆饼、橡子面，从而造成市民的饥饿和身体健康的损害。在农村虽未实行粮食配给办法，但生产是有限度的，而榨取是逐年增加，每当“粮谷出荷”搜刮之后，就发生粮荒，农民的生活更是悲惨。

武部六藏榨取农产物最厉害的时期，我适任伪吉林省长，在1942年10月至1944年12月上旬的两年多的时间，而赶上三个年度的“粮谷出荷”，就是1942年160万吨，1943年170万吨，1944年180万吨。1942年10月，我到伪省长任时，伪省次长日本人饭泽重一告诉我说，“政府”认为吉林省是谷仓地带，所担负的“出荷”量也是最多的，吉林省“出荷”的好坏是与全满有重大影响。还说，省公署经常设有“粮谷出荷

* 作者时任伪吉林省省长。

督励本部”，现在已经组成四个督励班正在各地区工作，要求我赴各县作初度巡视，兼对粮谷出荷加以激励。我当时是抱着个人“成绩”和“前途”的观点，当即应允，遂以两个月的时间走遍各县、旗，每到一县都对县里的官吏讲话，鼓励他们要完成“出荷”数量。每到一处，都要去粮谷交易市场看“粮谷出荷”情况。该年规定的“出荷”粮谷160万吨，于1943年1月完成了“出荷”任务。1943年因为年景丰收，吉林省所担负的170万吨粮谷，于这一年的12月末就完成了。不料伪省次长饭泽重一暗中勾通各副县长，策动“协和会”假造“民意”，说年景丰收尚有余粮，农民甘愿向国家作“报恩出荷”，于是吉林省又多出了10万吨粮谷。

（1963年）

日本对东北人民的粮食掠夺

黄 富 俊*

一、日本在伪满实行了一系列罪恶政策

1932年3月伪满成立我就参加汉奸行列，任伪民政部地方司伪司长。1937年7月1日，在关东军主持下，伪满政府中央机构实行改组，扩大伪国务院总务厅权限，总务厅长（日本人）升格为总务长官，在国务会议时，列为首席，在各伪部大臣以上。把民政部和文教部裁撤，改设民生部，财政部改为经济部，实业部改为产业部，军政部改为治安部，把民政部原有的警务司并入治安部，地方司改为内务局，局长由日本人担任，命我担任伪安东省省长。当时我对改组原因，完全不知道，7月1日到安东任职，不几天，就在报上看到日本军在北平郊外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听此消息，令我惊异的是日本兵车在安奉路线，每隔半小时，即向西开往一次，接连不断，经过两星期后，铁路运输才逐渐恢复常态。仅就安奉一条铁路运输的兵力，估计日本发动这次侵略规模是很大的，有准备、有计划的。到8月中旬，接到伪政府颁布“七二五”价格的命令。所谓“七二五”价格，就是随命令附带的经伪政府在1937年7月25日那一天所调查的，全满各大城市，各种物质和粮食批发和零售价格表，限定以后商民买卖均须根据表列价格交易，不准涨落，违者处罚。这种价格表的颁布，就是伪满实行“统制经济”的开端。确切地说，就是把过去的自由经济，变为今后的“统制经济”。以后在伪政府公报上陆续看到发表各种物质“统制法令”和制定出“开发东北产业五年计划”。同时日本内地和“满铁”沿线住在的大大小小日本资本家，组成各种物质统制“特殊会社”和附属加工各种会社，例如重工业会社。所谓特殊会社，就是由伪满政府，把东北工矿企业和农业一切生产分配的权利，完全交给“特殊会社”经营管理，会社资金由伪满政府、日本资本家和“满铁”会社三方面出资，每年结算，无论盈亏，伪满政府须保证对日方出资付给六厘利息。从此，东北地上地下的资源，以及工商业、农业，都被日本利用各种“统制法令”，完全垄断在自己手中，东北人民完全处于日本军阀、财阀和帮凶的汉奸奴役宰割之下，丧失了一切的自由。特别是粮食，经过日本的残暴掠夺，东北人民所受的灾难更为严重。根据上列事实，人们清楚地认识，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妄想达成独霸东亚的野心，特在伪满推行“统制经济”政策，把东北的人力、物力、

---

* 作者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奉天陆军粮秣厂第二科科长，镇威军兵站处兵站监，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公署顾问等职。1932年投敌后任伪民政部地方司司长，1937年后曾任伪安东省、龙江省省长职务，1942年至1945年8月任伪兴农部大臣。

财务，作为他们军需资源地。为了实现这种阴谋，特对伪满机构实行改组，扩大总务厅权限，以达成其掠夺目的，这就是帝国主义多年预定计划，也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一向惯用的手段。

二、日本掠夺粮食的各种机构

（一）增产出荷督励委员会

伪国务院总务厅在1940年正式开始统制粮谷时，即在厅里秘密组成所谓“增产出荷督励委员会”，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任委员长，伪总务厅企划局长古海忠之、主计处长饭田（名忘记）①、兴农部次长稻原征夫、粮政司长田中信一、兴农合作会理事长松岛鉴、粮谷会社理事长结城清太郎、经济部次长青木（名忘记）② 任委员，担当事务的有日本人参事官，没有中国人参加。它的任务，专管策划决定全满农村生产和出荷，直接了当地说，这个委员会，就是日本掠夺粮食的大本营，它是专门谋求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从农民手中掠夺更多粮食，这是惟一目的。伪满历年农民出荷数量，是根据伪总务厅企划局物动计划决定，伪企划局物动计划是依据“战时总动员法”制定出来的。物动计划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全“满”一切生产物质，亦包括粮食在内，与日本国内物动计划有连带关系。伪企划局制定粮食计划时，（1）是根据“伪满”各都市官民和劳工配给需用数量（日本人在内）；（2）关东军需要的数量；（3）是日本国内需用，经过关东军审查核定的数量；（4）是向朝鲜、旅大和中国内地输出的数量，伪企划局把这些需用数量集合在一起，刊入物动计划。为了保证出荷总数量的完成，特由伪企划局根据各省耕地面积和生产情况，在每年春季，按照出荷总数量分别定出各省出荷分担量，提交到增产出荷委员会，通过委员会审查修正（开会时关东军主管参谋列席），作出决定后，即由伪总务长官协同企划局长、伪兴农部次长秘密到哈尔滨，召集北满各伪省次长开“打合会”（历年打合会照例是在2月下旬），经各伪省次长按照决定负担量审议，如对负担量有意见时，由大家讨论，在数量多寡上，彼此可以互相修改，但总的数量不能变更。通过各伪省次长决定以后，再到奉天省，召集南满各伪省次长开同样的打合会，通过南满各伪省次长决定，回到长春，即照各伪省次长决定认可的负担量，翻译成中文，一面由伪国务院定期召集各伪省省长到伪中央开会，（历年伪省长会议照例是在3月中旬），在伪省长开会的前一天，伪总务厅把译好的有关伪省长开会的各种文件，在上午送到各伪部，下午由伪次长向伪大臣，对有关本部文件，作大略的说明（例如伪兴农部有关文件主要是各省出荷和农业增产），以备伪大臣在伪省长会议时，向各伪省长公布，以上是伪总务厅历年对农民出荷所采取的定例程序。

1942年11月，我由龙江伪省长担任伪兴农部大臣，对每年出荷的内幕情况，亦有

---

① 此时总务厅主计处长为饭泽重一，东京帝大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曾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实业厅顾问。

② 任委员的应是伪经济部金融司司长青木实，此人当时负责伪满农村金融合作社的“监督”，职衔不是伪经济部次长。

初步的经验，1943年3月开伪省长会议时，伪兴农部次长稻原征夫，对有关本部文件向我作说明以后，问我对各伪省出荷分配的负担量有无意见，我说这是经过层层审议决定的数量，我没有意见。他对我笑一笑说好吧。当我在伪省长会议席上，把分配各省出荷负担量宣布后，参加会议的伪省长中，也有少数人提出意见，说明他省内农村困苦实际情况，要求把出荷量削减，我只作简单的勉励回答，有不满意的我空洞回答。如还有继续要求的，这时坐在我身旁的次长就站起来用严肃口吻，说什么现在当皇军正在"大东亚圣战"，需要满洲官民尽力支援，"中央"对农业增产，已定出相当计划，对农村需要物质和工具，已有充分的准备，规定的出荷量，虽有增加，只要努力去作，就一定能完成，希望省长不必为难等等，给他扣上个大帽子，让他无话可说，实际各省负担量，已经在伪次长打合会议认可，伪省长会议不过走形式，数量决不能变更。这种真正的事实，他是秘而不宣。

伪省长由"中央"领回本省出荷负担量，交给伪次长同有关厅长、科长会议，决定出分配各县的负担量，一面定期召伪县长到省开会，由伪省长在会议席上把分配各县的负担量，向各伪县长宣布（实际在伪省长赴"中央"开会时，伪省次长已经集合各伪副县长到省决定好各县负担量），各伪县长对分配的负担量有要求削减时，则与伪省长会议同样，绝不能变更。

伪县长由省领回本县出荷分担量，即交给伪副县长同有关科长、股长会议，决定出各村负担量，一面定期召集各伪村长到县开会，由伪县长在会议席上向各伪村长宣布。

伪村长由县领回本村出荷负担量，再向各农户宣布。所谓粮谷出荷，就是这样，由"中央"到地方，层层手续，把出荷重担扣在农民肩上，农民负起这种重担，如同负债一样，到了秋收以后，无论年成好坏，必须按照负担量交出粮食，才算了事。

上述事实，很清楚地看出日本掠夺粮食所采取的欺骗方法和毒辣手段，同时也能清楚认识到，伪总务厅是主持掠夺粮食的枢纽，伪总务长官和几个当事日本首脑人，在关东军支配下，一手包办，汉奸的大臣、省长、县长，都是日本人的工具。

（二）农业增产问题

伪兴农部于1940年8月由伪产业部改组成立，是管理全满农业生产和执行农民出荷的机关。实行"统制粮谷"以后，为了考核监督粮谷会社和兴农合作社业务执行情况，在部里添设粮政司和兴农合作社司，伪兴农部对于粮谷出荷怎样执行，已在伪总务厅内说明，其次比较重要的就是农业增产问题。伪兴农部担当粮谷增产计划的是农政司，农政司长是吕作新，他是中国人，而主持事务的是日本技正三宅公。农政司每年作出增产计划，照例由伪部交伪总务厅企划局审查，然后提交"增产出荷委员会"，通过委员会审议决定，交还伪兴农部执行。伪兴农部每年提出增产计划重点，主要是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采取下列三种办法：（1）农民出荷配给棉布，鼓励农民努力生产。棉布倒是适合农民的需要，但是粮谷出荷开始，规定大豆每百公斤配给棉布三码，粮谷三品（高粱、谷子、苞米）每百公斤配给棉布两码，以后每年缩减，最后到一码、半码，质地亦非常单薄，甚至有些地方竟停止配给，这对推动农民增产已失其作用。（2）改良种子。由各县兴农合作社把各地方农业实验场所试验出的各种改良种子，收买到

手，在各农村中选择人强马壮、种地较多的农户，给他加了美名，称为“笃农家”，把改良的种子分给“笃农家”，让他们大量地种改良种田，并由社发给一定的补助费。秋后，种田生产出来的粮谷，由“笃农家”尽数送交合作社，照统制价格收买，再由合作社用交换方法，分配给农村农户，这种办法曾经收效一时。以后，因为物价和劳动工资暴涨，“笃农家”生产的良种收回来的代价，不够消耗的费用，“笃农家”对于种田，也就无力多加工、多上粪，生产出来的良种质量一年比一年下降。1943 年 9 月，我任伪兴农部大臣时，兴农合作社中央会副事长启彬，同我到滨江省双城县五家子村，王姓笃农家去视察改良种田。农民领我们到他所种的三垧高粱、两垧谷子种田去看，我看种田所长的庄稼和将要成熟的籽粒，与一般地里的庄稼籽粒并无多大区别，我说农民，他向我咳了一声，说没有法子，这是合作社日本人让我种，实在说我种这五垧地，不但得不到好处，而且还要白搭工夫钱。回到哈尔滨，启彬还要同我到南满去看，我说算了吧，哪个地方都是一样，在这玩两天再回去吧。（3）改良农具。东北农民使用的工具，一向是由农村的铁匠炉和木匠铺当地生产，就近出售给农民。“统制经济”以后，这些手工业得不到原料配给，完全停业，这种工业就完全落在日本人手中，他们在各地建立制造农具会社和工场，由统制会社领到大批原料，制造大批铁镐、铁犁杖等等农具，交给合作社配给农民，名为改良的新式农具。实际各会社为贪图利润，偷工减料，不按规格制造，所生产出各种农具，质地单薄，式样半中半洋，不适合农民使用，有勉强能使用的，也几天就坏，还得另行改造。特别是铁制的改良犁杖，价格昂贵，农民领到手，试用不好使，竟变成废物。

1943 年初，因为三江省、北安省有日本开拓民放弃的许多撂荒地，伪总务厅增产出荷委员会决定让就近农民尽量开垦，每垧由伪政府补助开垦费 10 元，交伪兴农部执行。2 月中旬，三江省开农业增产座谈会，伪次长让我到三江省查看农民对开荒心情怎样，给农民“打打气”。我到三江省看到，出席座谈会的有桦川、勃利等县农民 30 多人，伪省长、次长和有关厅长、科长均参加。首先由伪省长孙柏芳说明伪政府开垦撂荒地意见和办法，让农民表示意见。大家彼此相观，谁也不吭声。孙柏芳说，现在兴农部大臣在场，你们有意见只管说，不要为难，农民才将农村的痛苦真实情况，尽量陈述出来，主要问题是打下来粮食出荷以后，人吃马喂均感不足，农民的生产生活物质配给，逐步减少，没有力量开荒地，补助的 10 元开垦费，仅够一个农工的两天工夫钱，无济于事。也有农民说，这 10 元钱将够买五盒烟卷（指私行），若拿它开地，什么也不当。在场的农民把感受的苦况说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我看农民对开荒的心情非常冷淡，我勉励他们说，农村的困难，政府都知道，但是现当支援皇军“大东亚圣战”，国家需要大宗粮食，希望你们要尽量去作，能多开一垧地，对国家对你们自己，都有好处。农民对我这番话，口头表示接受，实际农民已筋疲力尽，哪有力量开荒地，座谈会就在这样情况下结束。

（三）粮谷会社

“粮谷会社”，是根据伪满“粮谷统制法”，于 1940 年 8 月成立，理事长结诚清太郎（伪产业部次长），资本两千万，由伪满政府和日本内地财阀及满铁会社三方面分

担。1943年初，改为“农产公社”，资本有增加，数目不详。该社是掠夺伪满粮食的一个特殊会社，它掌管全满粮食的出纳调拨，和分配。关于粮谷收买，由社委托“兴农合作社”代办，收买用款由社支付（价款大部由伪“中央银行”透支），收买的费用由会社担负，总社设在长春，各省均设分社，特别是在大连，因为向日本内地调运大量粮食和加工副食品的关系，不仅设分社，而且还有许多附属加工的子会社，如日清株式会社、化学工业会社、三泰油坊等等。我任伪兴农部大臣时，于1943年5月到大连视察，到该社所属的各加工会社，看到他们都是利用东北农民生产的大豆、芝麻、花生、向日葵等油料作物，制炼出适合于日本人口味的食用油，运往日本内地和配给住在伪满的日本官民，还有一部分输运到德国。这些农民血汗，自从“统制”以后，都被该公社用统制极廉的价格，掠夺到手，加工作为日本人享受，而中国人反被限制，不准自己食用。我离大连时，公社送给我一面袋花生仁、一小桶芝麻油、一小桶花生油，这也算是对我这个汉奸大臣的特别恩惠吧。

（四）兴农合作社

“兴农合作社”，于1939年初，根据“兴农合作法”成立。[①] 首先在长春建立“兴农合作社”中央会，由伪产业部农务司长松岛鉴担任理事长，各省设“兴农合作社联合会”，各县设“兴农合作社”，各村公所设“兴农会”，各省联合会和县兴农合作社事务，均由伪“中央会”选派日本人任理事负责处理，受“中央会监督”和伪省次长、副县长指导，伪省长、县长任顾问，不参与事务。

“兴农合作社”主管任务，是指导农村生产，督励农民出荷，管理农民生活物质和生产资料配给，经办农村贷款，经收农民储蓄。更重要的是，在各县交通便利地方，建立交易市场，担当为粮谷会社收买农民出荷粮谷任务。各县合作社，因为掌管这些重要任务，就产生了种种罪恶行动，农民出荷到交易场，由他们检查、验等、过秤时，任意多打粮样子，压等，压秤，农民领配给，如棉布、食盐、豆油等等，他们任意减缩尺度和重量，农民不仅受剥削，而且还要受种种刁难，在日本人和汉奸的威胁下，只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1940年，我任伪龙江省长，出荷时，到洮南、白城两县各交易市场视察，听到农民背地谈论，亲眼看到交易场把所打的粮样子囤存在屋里，但我向农民讲话时，只是督促他们赶快出荷，并未提及他们受剥削。回省后，我把视察所得的情况，向伪次长说明，让他想办法查禁，他口头答应，实际并未实行。以后，伪中央会了解各交易市场压迫剥削农民情况，由伪兴农部和合作社中央会对各县交易场的各种非法行动实行整顿，并制订出检查过秤种种规章，一时稍见好转，但未能彻底。到1944年，因为物质特别缺乏，钱法日益毛荒，各地物价，比“统制价格”已高出十倍或几十倍，这时法令的约束力，仅对老百姓有效，而对日本人已失其机能。因此，各机关各团体的日本人，都想趁机最后捞一把，各县合作社对农民的剥削，又普遍有所发展，农民感受的痛苦，更

---

① 作者有误。1940年3月23日公布《兴农合作社法》，将金融合作社、农事合作社解散合并，于4月1日正式成立“兴农合作社”。

行加剧。特别是1945年初，我任伪兴农部大臣时，兴农金库副事长邱任元向我谈到兴农金库主要任务，是办理农村贷款，经收农民储蓄。1944年伪经济部规定农民储蓄共四亿元，其中半数指定由各县“合作社”在农民“出荷”价款内扣留，直到现在，各县“合作社”从农民出荷扣留的储蓄款项，并未全数送交金库，其中有一部分被合作社截留，作社里临时支出的借垫。我听金库里的日本人说，这里很有毛病，表面是借垫，实际多半是主事的日本人吞入自己的腰包，这篇胡涂账不好算。我问他数目有多少，他说，至少有2000万以上。由此可见，“合作社”负责的日本人，不仅是剥削农民，而且也欺骗了殖民政府。

兴农合作社的法令，内容规定是。以发展农村经济，对农民需要共同购买，农民生产共同贩卖，为主要目标。哪知实行竟变成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不是发展农村经济，相反地是剥削农村经济，掠夺农民生产的吃人肉喝人血的机构。当时全满农民把“兴农合作社”称为坑农合作社。

三、日本每年掠夺粮食数量和分配情况

（一）掠夺的粮食数量

伪满对农村实行粮谷出荷，是由1940年正式开始，是年春公布的全国农民出荷负担量共620万吨，1941年增加到670万吨，1942年增加到720万吨，1943年增加到780万吨，1944年增加到850万吨，1945年增加到920万吨（未到出荷时，伪满垮台）。由1940年到1944年，这五年中，从农民手里拿出来的粮食，约计共为3640万吨。

（二）粮食的分配情况

粮食的分配情况，以1940年作比例，拨给关东军70万吨，运送华北约35万吨（大部换煤和盐运日本内地），输送朝鲜约35万吨（换大米运日本），输送旅大约7万吨（换油料作物加工运日本），输送日本国内约220万吨，伪满都市官民配给（包括劳工和住在日本人）约250万吨。以后，每年出荷数量，均有50万到70万吨的增加，关东军自用和输送华北、朝鲜等数量均无多大变动，而增加的数量完全供给日本国内。东北人民的消耗量，不但没有增加，相反地日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竟把东北人民的配给量，大大加以削减。这样，从五年农民拿出粮食的总数量，东北人民消耗所占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而日本掠夺数量，竟占三分之二以上。

1943年，东北的年成比较稍好，到1944年初出荷完成以后，吉林省“协和会”的日本人认为农村尚有余粮，发起所谓报恩出荷运动（报恩就是“报答”日本皇恩），强迫农民再拿出一部分粮食。吉林省伪次长饭田报到伪总务厅，通过“出荷委员会”合议，用伪国务总理名义，召集各伪省长到伪国务院，由伪总务长官说明吉林省发起的报恩出荷运动，让各伪省长斟酌本省情况，“鼓励”农民，仿照吉林，“自动”拿出一部分粮食。各省根据伪总务官指示，就用敲骨吸髓的方法，又从伪满农民手中挤出粮食50万吨（主要是大豆），送到日本。

粮食不仅是东北人民生活惟一需要，同时也是东北农村经济命脉。1940 年统制粮谷开始时，对农民出荷的各种粮谷，是按 1937 年公布的“七二五”统制价格收买，大豆每百公斤 7.5 元，高粱、谷子、苞米每百公斤 5.5 元，小麦每百公斤 11 元，稻子每百公斤 9 元。头一年，因有棉布配给，农民感受损失尚属轻微，以后两年，各种物价和农民工资成倍增长，农民出卖粮谷价格不变，农民的经济感受极大损失。1943 年收买价格有增加，大豆和粮谷三品，每百公斤均增加 2 元，小麦增加 3 元，稻子增加 2 元，这时的物价和雇用农民工资，就不只是成倍增长，而是几倍和几十倍的增长，这两、三元粮价的增加，对农民毫无补救，相反，农民经济损失益形加剧，到 1945 年，伪满农村经济普遍陷入枯竭状态。

四、日本对农民出荷采取各种非法残暴手段

伪总务厅“增产出荷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从每年出荷开始，即以总务厅名义，令各省通知各县“兴农合作社”，把每天交易场收买的粮谷总数量，用电话报告到省，由省即时报告伪总务厅委员会，每五天工作一小结，由合作社把交易场五天收买的各种粮谷数量（如大豆、高粱、谷子等等）分别列表，书面报告到省，由省转送伪总务厅“委员会”，“委员会”考查各县收买的数量，如认为较少时，即由伪总务厅通知各省，组成伪厅长以下“粮谷出荷督励班”，到各县去督催，县组成伪县长以下督励班，到各村去督催。到了出荷将要结束的时候，各县如有尚未完成出荷分担量，这时即由县动用警察力量，到各村未完成出荷分担量的农户家里去搜翻，使用种种非法手段，强迫农民拿出所留的吃粮和种子去出荷，对农民将来怎样生活，怎样种地，一概不管。

1941 年，我任伪龙江省省长时，因受水灾，林甸县到 1942 年初未完成出荷分担量，伪次长山茨正诚令县动用警察下乡搜翻，伪副县长小牧（名忘记）① 带领警察到王家窝棚去搜翻粮谷，用木棒毒打王姓农民昏倒在地，并令警察烧毁他的住房和柴草垛。伪林甸县长卢贤德来看，向我报告，并说林甸县协和会已在当天向中央报告，伪总务厅已派人到王家窝棚去调查。我想林甸县出了这样骇人听闻的事，省里应当早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向我说呢？当时告诉卢县长赶紧回县，一面找伪次长问他知道不知道，我说：县长、副县长是百姓的父母官，无故打百姓、烧房子和柴草垛，这真是稀奇事，带警察下乡搜翻粮谷，统制法并无这种条文。林甸县副县长，他是根据什么这样办，是谁让他这样办的呢？山菅次长说：省长不必着急，搜翻粮谷是我叫他作的，但他打人烧房子不对的，我已派警务厅长去调查，并酌给人民补偿费。我问你这样办有根据么？他说：省长不用管，这样作不仅是龙江一省，其他各省也都有。我说：县里发生这样的事，我亦有责任，现在国务院既派人去调查，我得去中央报告。他说：省长不用去，这事由我完全负责任，请放心吧。就这样很有仗恃地走去。第二天下午，伪警务厅长神子敏雄向我报告说，被打的农民伤痕已见好，房子烧毁半间，柴草垛全烧，我给农民 200 元钱，作

---

① 作者记忆有误。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林甸县伪副县长为中岛荣夫，在农村“督励出荷”，大打出手，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时称“林甸事件”。

补偿损失，事情已经完了，请省长放心。过了半月，伪国务院有命令，伪林甸县长卢贤德调伪总务厅任参事官，[①] 伪副县长小牧（应为中岛荣夫，下同）免职，伪省次长罚俸三分之一，伪省长“谨慎”三天。公文到省，并未给我看，以后，从报上看见，问文书科长，他说，次长不让我知道。以后听说，小牧回到伪中央，很快即转任“兴农合作社”理事。

1941 年 11 月，农民正在出荷的时候，白城伪县长刘鸿谟同“合作社”理事到土砍村催收粮谷，进入刘姓农户家里，正当吃午饭，看到桌上放着一盆热腾腾的高粱米干饭，刘鸿谟拿起来就摔在地上，骂道：他妈的真混帐，现在出荷未完了就吃干饭，不知是犯法么？吓得农民跪地哀求。日本理事说：你明白就好了。同刘悻悻走去。以后，刘鸿谟到省向我陈述，我说，这样作对农民真有点过火，他说，我要不摔饭盆，农民就一定要受惩罚，这是没有法子。[②]

1942 年 9 月，庄稼正要成熟的时候，伪泰来县长林云青来省见我，看他面色很紧张，问他有事么？他说：“现在不准农民吃青粮，省长知道不知道？”我听他说话很突然，就问：怎回事，你详细说说吧。他说：“我们县里合作社理事（姓名忘记）带翻译到营城子村视察，走到村边，看见农民背着半袋青苞米，他就让跪下，拿出苞米打农民脑袋，说，谁叫你吃青粮，将来拿什么出荷，后经农民哀求，才让走去。理事到村里向村长说，省里有命令，不准农民吃青粮，你要严加禁止。村长来县向我说，村民多少日子吃草根树皮，好容易盼青苞米下来，合作社理事不让吃，这是让农民饿死，叫我想办法。副县长听合作社理事报告，又叫我通知各村，禁止吃青粮，我实在没有办法，特来请求指示。”我说：“你是老实人，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死。副县长让你下命令，省里或者中央，一定有指示，你不能不办。农民饿着肚皮，有青苞米指望，也不能不吃，夜晚还可以吃，好在再有 20 多天，就可以接上新粮，有点困难也能度过。”他听了这番话，才明白，说“好，我就这样去办。”

1942 年 11 月，我由伪龙江省长转任伪兴农部大臣，回想在龙江二年，对农民出荷所遇到的日本人种种非法榨取和限制，他们究竟根据什么做出来的，成为疑问。有一天，我到伪总务厅参事官陈万铠的屋里谈天（他是由伪龙江省实业厅长转调），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以前我也不知道，现在我知道，这些坏道都是有根据的，粮谷统制法另外还有实行细则，这个细则，是由总务厅次长会议决定的，日本当事人手里都有，中国人不知道，你所怀疑的问题，细则里都有规定。”我才明白日本人的掠夺手段，真是想得周密，残苛到了极点。

五、东北人民遭受饥饿死亡的情况

东北农村土地耕种面积，据伪满土地局调查，有 2000 万垧，伪总务厅企划局作物动计划时，每垧每年平均生产量定为 1 吨，计全年生产量共为 2000 万吨。1940 年出荷

① 另说：将伪县长卢贤德调往他县。

② 刘鸿谟任伪白城县县长时，将全县实际耕地 14 万垧，上报为 20 万垧。

开始，对全满农民出荷负担量，规定为620万吨，若按农民全部生产比较，已占三分之一，农民的担负不为不重。以后，每年出荷量，又有50万到70万吨的巨额增加，所谓增产，已等于具文，并无实效，日本人就采取了从乡村和城市人民口里夺取的方法，来满足他的欲望，因此对农民的出荷掠夺手段，一年比一年严苛，到1944年8月，因为保证是年850万吨的粮食完成，又把“粮谷统制法”修改为“农产物统制法”，扩大了农产统制范围，如小豆、荞麦、糜子、杂粮以及土豆子、红薯等等，均划入“统制”以内，从此农村一切生产，完全禁止外运，农民自己流通也严格禁止，进一步把农民推向饥饿死亡道路。我有一家亲戚高关氏，住沈阳东郊杨官屯，中年守孀，领四个孩子度日，家无产业，每年由我贴补食粮六石，因为“农产物统制法”的实行，我的粗粮均须全部“出荷”，不能外运，他们一家竟至离散。

日本人对城市居民夺取的方式，就是尽力消减配给量。1941年实行配给时，规定劳工每月配给量24公斤到22公斤，一般住民每月配给量18公斤，完全是粗粮；官吏每月配给量18公斤，简任以上是细粮，荐任以下粗细按成搭配。1942年劳工重劳动未减，一般劳动的由22公斤减为20公斤。住民和官吏由18公斤减为16公斤。1943年，劳工未减，住民的官吏由16公斤减为14公斤。1944年，住民和官吏配给量未减，但一律搭一成不能食用的橡子面。1945年，三江、热河两省都市住民配给量，有时减到12公斤，日本官民每月配给量由18公斤到16公斤，都是大米，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从上述配给量一再消减的实际证明，当时住在城市的人民生活困难已到极端严重的程度。这时，有钱的人能用高价买私粮接济（私粮来源，大部分是日本包工的由劳工配给克扣下来的）。所苦的是一般失业劳动人民，他们无钱买私粮，只好忍饥挨饿，有的死亡，有的流浪街头被警察抓去，送“辅导院”作劳工，那也是走进死路。

1944年以后，在日本人残暴掠夺下，无论城市和乡村的人民，普遍现出饥饿的颜色，死亡逃散到处均有，特别是城市中国人经营的大小工商业，家家关门闭户，乡村住民夜晚不能点灯（无灯油），这种凄惨景象，令人目不忍见，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人民才得摆脱沉痛的苦难。

六、日本军阀利用汉奸欺骗日本人民

1945年3月中旬①我任伪兴农部大臣时，伪总务长官来电话，让我到伪总务厅有事面谈。我到伪总务厅与五部六藏见面，他向我说，现在日本国内，又向我们多要50万吨粮食，由关东军向日本陆军省一再磋商，决定由我们供给35万吨，请你到东京面见东条首相报告。我当时很觉奇怪，伪满供给日本粮食数目，从来守秘密，这回为什么让我去报告？武部见我沉思不语，说：“没有什么，我已同你们稻原次长②核计好，让粮政司长田中信一同你去，报告文件已由他准备好，你向东条首相念念就行，飞机已预备好，明天即请动身，下午还请你到关东军司令部见司令官。”午后，我见到关东军司令

① 作者有误，时间应为1944年3月。

② 通常译为：（伪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

官梅津美治郎，当时有参谋长笠原（名忘记）① 和日本翻译侍立。梅津说：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吧。日本政府很欢迎你去。随问笠原参谋长，一切事务都准备好了吧，笠原答都准备妥当，他说那好，明天即去吧。我回到部里问次长，都作了哪些准备，他说：让参事官尚希文随大臣去，担任翻译，粮政司长担任同日本政府一切事务接洽和文件的准备，另外带事务官两人和协和会参事一人，大臣到东京有事即问田中，他能向大臣说明一切。我于3月14日午后2点钟到东京，住帝国旅馆。大东亚省派人住旅馆作招待，第二天上午同田中司长与尚参事官，到首相官邸见东条英机，在座有官房长官星野直树，东条首先说，昨天飞机到的很早，政府人员预备到机场欢迎，都未赶趟，真对不起。说着话拿起烟卷，划火让我抽烟。当时我很感到他今天对人的和气，不由得回想他过去，在伪满关东军任职时的蛮横。这时田中交给我写好的文件，我照文件所列原计划供给日本各种粮食数目，以及这次追加的50万吨，由政府在预备配给人民的粮食数内，撙出35万吨支援日本，念给他听。念完后，在翻译时，东条拿出日记本，把各种数字记入日记，站起来说很好，现在我有事不能多谈，午间预备便餐，请你和同来的人一起，在官邸吃便饭，再细谈吧。回到旅馆休息一会，12点钟，我和同来的五个人一同到官邸，与东条和各省的首脑人见面握手后，仅由大东亚相青木（名忘记）② 陪我在客厅谈话，其余的人都像有事到别屋里去。1点钟后入席，东条说：今天不是正式宴会，我们随便谈谈吧。现在正当大东亚战争紧迫之际，日本官民都在节衣缩食援助大东亚圣战，满洲拿出这样多的粮食，供给日本民间生活，当然有些困难吧。我硬着头皮应合他的意志说:，现在满洲官民都认识到，支援皇军圣战，是全国人民应尽的责任，有困难都能忍受，决心要完成应负的责任，请首相放心。东条笑答：满洲官民对当前局势能有这样认识，能有这样决心，都是你们的努力所致，这完全符合日本人民的希望。请阁下明天进宫，向天皇报告。他又问田中司长：放送的事，你和陆军省接洽过了吧？田中答：放送稿已拟好，明天翻译，后天即可放送。东条说：那好，就这样办吧。我看东条说话故意表示镇静，而形态时现张皇，这里显示出其内心包藏着有不可告人的隐痛，也显示出“大东亚共荣圈”已面临最后的危机。宴会匆匆完了，回旅馆问田中：我向天皇报告什么？放送什么？田中说：现在日本天皇和日本人民，对满洲粮食援助都很关心，乘大臣到日本的机会，希望把满洲计划援助的真实情况数量，向天皇报告，和向全国人民放送。正谈话间，“宫内府”翻译官，林出（名忘记）③ 来见我。林出在伪满给溥仪作翻译多年，是熟人，他说：大臣明日进宫见天皇，我特来请阁下今日到宫里，对晋见礼节先作一番演习，你看怎样？我说“好”，随同他到凤凰间，这是裕仁见外宾的处所，演习完了，6点钟赴大东亚省官邸出席青木招待宴。

16日午前11时进宫，由伪满驻日大使王允卿介绍，在凤凰间见日本天皇，宫内府

① 应为笠原幸雄，军衔中将。

②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在外务省新设大东亚部，任命曾担任过大藏相的青木一男为大东亚部大臣。

③ 林出贤次郎自1932年月至1938年4月曾以伪“宫内府行走”充任溥仪翻译，林出贤次郎是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官员。“行走”是入值办事的意思，清制，不改原来官职而调充其它职务，即称在某处“行走”。

大臣、侍从武官侍立，林出作翻译。裕仁同我握手后，问坐飞机来时很安全吧。接着说：满洲拿出这样多的粮食支援日本，这是官民同心协力的时候，对日本军民有很大的帮助，你在东京多住几天，休息休息吧。我答：支援皇军圣战，这是满洲官民应尽的责任，我保证一定能按照计划数量，完成应负的责任。通过翻译，裕仁表示满意，我随用90度鞠躬敬礼辞去。

第二天上午9时，田中拿出译成中文的放送稿，同我与尚参事官，到东京中央放送局，我看放送稿所列计划，向日本供出各项粮食数量，大致和东条报告相同，最后不同的就是上述计划给日本的粮食，由我这个伪兴农部大臣保证，一定能按照计划数量完全交送日本，请大家安心等等。我以原稿宣读后，尚参事官用日语又念一遍（另有录音）完成放送手续。田中把原稿收回，现在我能记准的，仅是1944年计划供给日本内地的粮食总数量约有450余万吨。

3月21日离开东京到大阪，住新大阪旅馆，大阪工商界200余人在旅馆设宴欢迎，我们六个人入席后，见桌上所摆的食具，仅有酒盅一个，叉勺各一个，我很惊异。上过汤盘，对面坐的主人，是住友会社理事长，年岁很大（姓名忘记）站起致辞。把我称为伪“满洲国”派来的“大东亚经济使节”，大阪工商业一致表示欢迎。并听说我在东京放送，保证计划供给日本的各种粮食，一定照数送交日本，实在由衷感谢，等等。听他这样致辞，感到无法回答。只好对大家欢迎我们的盛意，表示感谢。作简单的答辞，完了这场无味周旋以后，上来一个炸牛排，拿起叉子扎了半天，才剔下一块肉，对面主人看我这样情况，说，对不起，今天的宴会，是头三天订好的，没想到昨天大阪府奉中央命令，为厉行节约，大小宴会一律禁止，并将料理店宴会的食具，完全收去，因此，今天的宴会很简略，连斟酒的姑娘也没有，因为她们都被限制停业。他说话时，邻坐的人都用眼瞧他，觉得不好意思，随改变口吻，谈了一些别的话。散会以后，回到我住的房里，尚参事官拿过一份大版新闻报，说报纸已经登出，欢迎满洲派来的“大东亚经济使节”，并登载了放送的全部文件。我找田中问这是怎么回事，他犹豫半天，笑对我说：这事临来时，我也不知道，到陆军省才知道，现在日本内地生活物质极端缺乏，特别是都市食粮问题，商民都感受恐慌，惟一指望，是依赖由满洲接济，数量越多越好，因此，陆军省和关东军核计，让大臣以大东亚使节名义，来到日本，把满洲计划援助日本粮食数量，向天皇作报告和向国内人民作保证，以安人心。我听田中这番话，才明白让我来日本的原因和所负的“任务”，才明白东条对我“和气”，大东亚省对我的特别招待等，都是别有用意的。

此后，由大阪到福冈，等候飞机住了三天，返回长春。今天想当年情景，日本万恶的军阀，不仅利用汉奸帮助他们宰割自己的人民，到了最后垂死挣扎的时候，还能利用汉奸欺骗他们的天皇和他们的本国人民。

（1962年5月）

日本如何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

曲 秉 善*

一、日本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所采取的方式

1894年的中日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开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等特权。在这以后，更妄想鲸吞中国的东北以作其进一步侵略中国内地和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将东北富饶的煤铁矿藏和丰富的粮食作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通过其垄断组织三井、三菱，组织例如三泰栈等和在其所谓附属地内开设的取引所控制粮价，用低价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运往日本，以作其发动侵略战争之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便通过伪满政府协力三井、三菱，操纵粮食价格、压低粮价，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同时，由伪协和会大肆宣传农民利用已久的粮栈是“剥削农民的营业，它并从事投机倒把扰乱粮价”，因而极力废除粮栈。这是日本废除粮栈、用新的方式掠夺东北人民粮食的前奏曲。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华北发动卢沟桥事变，进一步向中国内地进攻，遂于7月25日伪满公布“七二五”物价停止令①，将物价粮价都停止在7月25日那天的价格上，开始经济统制禁止人民买卖所谓统制品，还公布了控制农民经济和生产的兴农合作社法。于1938年在全伪满各农村里组成兴农合作社②。伪兴农合作社组成后，即着手在各城镇修建交易场，实行废除粮栈、废除粮市，迫使农民到伪兴农合作社设立的交易场去卖粮。在这些措施之后，1938年10月公布粮谷统制法和特产物专管法，规定粮谷和特产物除由伪满政府买卖外不准人民买卖，并发表了用粮谷出荷的方式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所谓粮谷出荷，就是伪满政府指给农民一定数量粮食的出荷量，严令在秋收后必须如数将粮食送到交易场按伪满政府规定的价格和等级卖给伪满政府，无论有何理由也不许可拖延或达不到指定的数量。由于伪满政府所规定的粮食价格极低，粮食等级又多，检等又严，使农民遭受巨大的损失，在形式上伪满政府是付给农民了粮价，而其实际则等于是抢夺。关于伪满政府执行出荷的程序是：伪国务总理大臣在伪省长会议上指

---

* 作者曾任伪满四平省省长。

① 伪满政府于1941年7月28日发表《七二五禁止令》，即东北全部商品价格，以7月25日为准，一律不准上涨。

② 兴农合作社是1940年4月1日正式成立。

示各伪省的粮谷出荷量，伪兴农部指导各伪省公署办理粮谷出荷；伪省长根据伪国务总理大臣所指示的伪省的粮谷出荷量，在伪县长会议上指示各伪县的粮谷出荷量，伪省公署的实业厅指导各伪县公署的实业科办理粮谷出荷；伪县长根据伪省长所指示伪县的粮谷出荷量，在伪村长会议上指示各伪村的粮谷出荷量，伪县公署的实业科指导各伪村公所办理粮谷出荷；伪村长根据伪县长所指示的村的粮谷出荷量，在伪屯长会议上指示各伪屯的粮谷出荷量，伪村公所指导伪屯长办理粮谷出荷；伪屯长则将伪村长指示的屯的粮谷出荷量分与各农户负担，在伪警察的协助下，监视和督促各农户将指定粮谷出荷量的粮食送到交易场去卖。为了用粮谷出荷方式掠夺人民的粮食而特组织一个所谓日满共同出资的特殊会社——满洲粮谷会社，由这个特殊会社用“粮谷”出荷方式强迫农民把粮食送到交易场进行所谓收买和保管以及运往日本以作侵略战争用。伪交易场的管理和设备都由该县的兴农合作社担当。在交易场内办理所谓收买手续，则多由伪粮谷会社委托伪兴农合作社给办理，从而交易场内的检等和过秤人都是由伪兴农合作社派出的人。

1939 年 11 月，就是公布粮谷统制法和特产物专管法的那年的 11 月，在伪满各地实行了试行粮谷出荷。1940 年伪中央规定了粮谷出荷量，正式用粮谷出荷方式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从这年起伪满每年都用这种方式继续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1939 年的试行粮谷出荷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达 100 多万吨，1940 年的全伪满粮食出荷量为 620 万吨，以后每年的粮食“出荷”量都有大量的增加。

二、伪满中央对于“粮谷出荷”的指示和措施

我在 1943 年 4 月被伪满任命为伪四平省长。当我将要去四平就职时，我到伪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处去辞行。武部六藏对我说：“四平的设立是为了增产粮食大量粮谷出荷以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四平省的九县一市都是中满地带的著名产粮区，即开原县、东丰县、西丰县、西安县（今辽源市）、海龙县、梨树县、双辽县、长岭县、昌图县和四平市。但是，去年的粮食出荷四平省的成绩最不好，没有达成粮谷出荷量，并且距中央要求的数字相差太远。这固然是去年年景不好，然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办理粮谷出荷的不当。你到四平省后要与省次长好好地找找去年失败的原因，改正办法，务必将今年的粮谷出荷办好达成粮谷出荷量。我忙答应说：“是！我到省后与省次长取得密切联络，找出没有达到去年粮谷出荷量的原因，改正办法，保证达成今年的粮谷出荷量。”武部六藏面带微笑地点头。这是他表示欢迎我这样做。武部六藏又对我说：“今年四平的粮谷出荷量比去年多些，千万不要大意。”我答应说：“是！”

1943 年 9 月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召集各伪省长在伪国务院讲堂开伪省长会议。这次伪省长会议是专为当年的粮谷出荷而召开的。在会议上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在训词里说：“日满两国有生死存亡断弗分携的关系，现在亲邦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方酣，我们满洲国必须举全力协助这个战争。粮食对圣战的支援极为重要，一粒粮食就等于一粒子弹。因而我们满洲人必须忍受一切困苦艰难勒紧裤腰带，多多支援亲邦日本粮食。各省长必须竭尽全力，排除万难务必达成今年的粮谷出荷量。”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他

的指示里说："去年各省的粮谷出荷成绩都不好，特别是四平省尤为不好。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省办理粮谷出荷在秋收后着手晚了，给予农民将粮食隐藏起来的时间，以致达不成粮谷出荷。今年必须改正去年的办法，来一个早期快速出荷。现在秋收在望，粮谷出荷即将开始，各省长必须作好一切准备，想尽一切办法督促农民出荷，务必达成今年的粮谷出荷量，只许多出，不许不足。"在伪国务总理大臣和伪总务长官的训词和指示后，由各伪省长分别报告该省关于粮谷出荷的一切情况。我在报告里说："四平省在春天就将中央所指示的粮谷出荷量指定给农民并督励他们增产粮食，夏季雨水调和年成很好，关于粮谷出荷的各项准备都已就绪，只等收割时期一到，就监视农民尽快出荷，保证能达成今年的粮谷出荷量。"

在1943年的10月将要收割大田的时候，伪中央就组织了一个以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为委员长，以伪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和各伪部次长、伪协和会总务部长、伪兴农合作社理事长、伪粮谷会社理事长等为委员的粮谷出荷督励本部，由伪兴农部办理本部的事务。该本部命令各伪省公署，每天必须将该省的粮谷出荷情况，用电话或电报报告给粮谷出荷督励本部。

伪中央为了利诱农民出荷，特将必须配给农民的食盐也拿到交易场去配给。但是，规定必须有粮谷出荷、发了证方与配给。又规定每出荷100公斤粮食配给3公尺布。但是，同时规定农民在交易场必须将所得粮价的20%储蓄。

在粮谷出荷期间，伪中央的粮谷出荷督励本部为了督励各伪省认真办理粮谷出荷又组织了粮谷出荷督励队到伪省去督励。这个督励队是由伪中央的特任官、简任官和荐任官临时组成的。在1943年的粮谷出荷期中，来伪四平省公署实行督励的有伪兴农部参事员和该伪部的日本职员数人。

1944年3月在伪国务院讲堂举行伪省长会议。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在他的训词里关于粮谷出荷那段，又重复了他在去年9月间伪省长会议上所说的话。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关于粮谷出荷的指示里，他首先指示1944年全伪满的粮谷出荷量为850万吨，比1943年的780万吨多70万吨，伪四平省1944年粮谷出荷量为90万吨，比1943年80万吨多10万吨。其次他说："去年的粮谷出荷都在一个月里先后终了，其中最快的是在年前完成。我对于省长各位的努力衷心感谢。今年的粮谷出荷量比去年稍有增加，我确信省长各位既有了去年的经验和不懈的努力是必能完成任务的。"再次他说："去年全满各地，都是风调雨顺，得到了近年来所没有的大丰收。这完全是天照大神的神庥和天皇陛下的保佑。我们为了感谢天照大神和天皇陛下，应使农民再出些报恩出荷，以支援亲邦的圣战，使圣战早日完遂。"最后他说："粮谷的增产是粮谷出荷的前提，不能多增产就不能多出荷。省长各位必须督励所属各县，使农民务必做到增产粮食以保证达成粮谷出荷量。"我在伪省长会议上，报告的省政府关于粮谷出荷项目中说："四平省去年的粮谷出荷是在年前完成的。今年决定根据中央指示的粮谷出荷的数字督励农民增产粮食以保证完成今年的粮谷出荷任务。"在伪省长会议的休息时间，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秘书周开亭找我，叫我到伪总务长官办公室，我看见武部六藏站在他的办公坐位，满面笑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边递给我他手拿的信封边对我说"去年的粮食出荷辛苦了！今年更要努力，务必达成我们要求的粮谷出荷数量。"我答应一声"是"，接

过信封，行了一个礼就出去了。我回到休息室打开信封一看是2000元伪币，据说各伪省长都领了这笔粮谷出荷奖金。

在伪省长会议期内，伪协和会中央本部也开临时的协议会，找各伪省长以伪协和会省本部长资格去参加。这个协议会决议："为了感谢天照大神的神庥和天皇陛下的保佑，将在完成粮谷出荷量之外出报恩出荷，以支援亲邦的圣战。"还决定通过协和会运动来进行报恩出荷。

在伪省长会议终了后，伪中央的粮谷出荷督励本部改为粮谷增产督励本部，命令各伪省要按时将省内粮食的增产情况报告给该部。粮谷增产督励本部也有时派人到伪省去听取增产的情况和到现地去视察，曾派伪兴农部的日本人到伪四平省公署实业厅听取省下各县的粮食增产情况，并由实业厅的日本高级事务官领他们到昌图县去视察。

1944年5月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为了报恩出荷召集各伪省到伪国务院讲堂开会。伪四平省决定由我前去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各伪省参加的有伪省长自己参加的，也有派伪厅长和县长参加的。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主持这个会议。会议的程序是：伪总务长官训示，伪兴农部次长指示，各省报告报恩出荷的情况。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训示说："各省对于报恩出荷都踊跃进行，我们衷心感谢。由于粮食对于圣战完遂的重要性，希望各省愈多出愈好。"伪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在他的指示里说："对于报恩出荷中央要求的数字是30万吨，各省共同负担，有的省是10万吨，有的省是5万吨，希望各省务必达成这个数字。"我在报告四平省报恩出荷的情况里说："四平省在3月的省长会议后，即使协和会四平省本部召开临时协议会，决议出报恩出荷。但是，那时省发表的数字是5万吨距中央的要求少5万吨，我回省后即命令各县再出5万吨的报恩出荷"。

1944年9月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又召集专为粮谷出荷的伪省长会议。在会议上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训词仍然与去年9月他在伪省长会议上所说的内容大致相同，要求各伪省长必须达成粮谷出荷量，以支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圣战"。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他的指示里说："去年的粮谷出荷量由于各省都采取了快速出荷的良好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成绩。今年各省还必须采取快速出荷的办法，务必达成今年的粮谷出荷量。但是，在今年的出荷期间不采取用报纸鼓动的办法，各省要自动地争先完成粮谷出荷的任务。""关于出荷配给的问题，因为战争的关系棉布极为缺乏，本想停止配给，然而为了奖励农民出荷又不能停止配给，遂将出荷每100公斤粮食配给3公尺布改为1公尺布，希望省长各位谅解。"在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训词和伪总务长官的指示完了后，各伪省长进行有关粮谷出荷的情况报告。我报告说："四平省的年成今年不如去年，但是，对于达成粮食出荷量尚不成问题，省方保证一定达成粮谷出荷量，并也要在年前完成任务。"

在伪省长会议后，伪中央的粮谷增产督励本部又改为粮谷出荷督励本部，照旧命令各伪省报告出荷情况和由该部派人到各伪省去督励出荷。在出荷期内伪报纸虽然没有像去年那样天天登载各伪省的粮谷出荷情况，鼓励各伪省尽快出荷，挑起各伪省的互相竞赛，而实际上各伪省都是争先恐后地尽快办理出荷争取领先完成粮谷出荷的任务。因而各伪省对于农民出荷的督促逼迫与去年同样的严重。这年到伪四平省进行督励粮谷出荷的又有伪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和伪参议府参议张焕相，他二人到伪四平省公署听取

了关于四平省各县的粮谷出荷情况，又到四平市交易场所去视察，看农民的出荷情况以及对于出荷的粮食伪粮谷会社的保管情况。

1945 年 3 月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召集伪省长会议。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在他的训词里特别强调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号召各伪省长努力遂行国策努力增产粮食支援战争。他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已经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我们仰体生死存亡断弗分携的帝训，要竭尽全力努力遂行国策、努力增产粮食，来支持亲邦日本的战争，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亲邦日本的。"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他关于粮谷出荷的指示里说："今年全满的粮谷出荷量是 900 万吨，比去年稍有增加。因为大东亚圣战已经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粮食更为重要，省长各位必须排除万难务必达成今年的粮食增产出荷任务。"他又在指示各省的粮谷出荷量时说："四平省今年的粮谷出荷量是 100 万吨，虽然比去年又有增加，在此决胜的最后时期是必须发挥谷仓省的机能来支援大东亚圣战的完遂。"在各伪省长报告省政时，我报告说："关于去年的粮谷出荷，由于省下各县的积极努力，虽在年成不好的情况下，也在年前达成粮谷出荷量。现在大东亚圣战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胜时期。当此重大时期，省决定更加努力来完成粮食的增产出荷任务。"

在伪省长会议休息时，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秘书周开亭又找我，叫我到伪总务长官办公室。当时我就意识到必定是和去年同样给我出荷奖金。今年给我的奖金是 3000 元伪币，据说给各伪省长的粮谷出荷奖金比去年都多 1000 元伪币。

在伪省长会议开完后，伪中央的粮谷出荷鼓励本部又改为增产督励本部，并不断向各伪省索要关于粮谷增产情况的报告，也有时派人到各伪省去视察。该本部曾派伪兴农部的日本职员来到四平省梨树县、西安县等现地去视察粮谷的增产春耕情况。

三、伪四平省对于粮谷出荷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

我于 1943 年 4 月中旬到四平省充当伪四平省长，我在接伪省长职务时，对伪省公署职员训话说："四平省是谷仓省、劳工供给省、开拓省，是满洲首都新京的前卫，它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特别是当此亲邦日本正在进行着大东亚圣战的时期，四平省的任务尤为重大。皇帝陛下在时局诏书里教导我们说：'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我们极应仰体圣旨，认真彻底积极努力执行中央的各种政策，对于粮谷出荷、劳工供出、开拓移民、储蓄等必须达成中央的要求以支持大东亚圣战。"

伪省次长田边与我进行第一次事务联络时，他说："去年四平省的粮谷出荷是 70 万吨，没有达成这项任务，由于省下各县对于粮谷出荷着手晚了，致使农民得到时间将粮食隐藏起来，找不到粮食，这是主要的原因。至于年成不好那不成问题。今年四平省的粮谷出荷量是 80 万吨，省根据这个数字，由实业厅参事做出各县的粮谷增产和出荷的具体数字，已经在 3 月里召开县长会议指示完毕。过几天省长到各县初度巡视的时候，要听各县的粮谷增产情况，必须命令各县务必做到省指示的粮谷增产数字。"

我在任伪四平省长职务一个星期后，就携同伪总务科长村田与小田参事官及秘书长罗仙樵等，前后三次到省下九县一市——梨树县、西安县、海龙县、昌图县、西丰县、

双辽县、长岭县、开原县、东丰县、四平市去巡视。我们在各县对伪县公署的职员都训话说："在时局下为了支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必须排除万难完成省交给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关于粮谷的增产和出荷尤为重要，你们必须用尽一切方法督励农民来完成省交下的粮谷增产数字和出荷量。"各伪县长在他对我关于县的粮谷增产情况的报告中大致都说："在3月县长会议后，就将省指示的粮谷增产数字和出荷量，由县编成县下各村的粮食增产数字和秋后粮谷出荷量后，召开村长会议指示各村长执行，严令各村长负责，在现在必须达成县要求的粮谷增产数字，在秋后必须达成县要求的粮谷出荷量。各村长则将县指示的粮谷增产数字和出荷量编成村下各屯的粮谷增产数字和出荷量，责成屯长将屯的粮谷增产数字和出荷量分给各农户，在警察的协助下，各屯长督促农民种地和出荷，必须达到要求的数字和量。据县的调查，现在县已经按省指示的粮谷增产数字都种上了，虽有农民以人力不足畜力不足或是没有种子为借口，想要拖延种地，经县的严励督促强迫其种上了。一切都没有问题，可以放心。"我听完各伪县长的报告后，夸奖各县的办法甚恰当，又指示各伪县长说："地虽然是都种上了，今后还要督促农民铲蹚方能达到要求的粮谷出荷量。"我在各县还招待各伪县长、伪副县长、科长、各伪机关的首脑人、伪协和会县本部事务长和所谓地方士绅等吃饭，在对他们讲话里都要求他们协助县来完成各种政策，特别是关于粮谷的增产出荷。我在西丰县巡视，将要从县城去平岗的头天晚间，伪西丰县长郭连璧对我说："据警察的报告说，农民知道省长明天要去平岗，他们要乘机请愿，要求配给粮食救济，因为去年年成不好达不成出荷量，县对每户只给留两斗粮，其余都拿去出荷了，现在早就没有吃的了。"伪西丰县副县长平山插嘴说："西丰县人就是有好告长官的毛病，省长不要听他们的，他们把粮食都藏起来了，有吃的，没有问题。"我听平山这番话，在我的思想里暗想还是少管事为妙，遂对郭县长说："可以告诉警察传达那些农民，现在正是春耕时期，种地要紧，不要集众请愿，有什么事日后对县公署说，不必对我请愿。"次日我到平岗时，仍有农民三三两两地想要接近来，可是伪警察不停地驱逐他们走开，不让他们接近我。

1943年9月，我从伪省长会议回到四平省后，即专为粮谷出荷召开伪四平省县长会议。我在伪县长会议上训示各伪县长说："四平省是谷仓省，在时局下一粒粮食等于一粒子弹的时期，本省的使命是非常重大，我们是必须完成粮谷出荷的任务，皇帝陛下在时局诏书里说：'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张国务总理大臣在最近的省长会议上说，现在正是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援亲邦圣战的时期。我们必须仰体帝旨和遵照张国务总理大臣的训示，排除万难，达成粮谷出荷量，以支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去年我们四平省粮谷出荷的成绩最不好，没有达成粮谷出荷量。今年必须改正去年的办法，必须达成粮谷出荷量，总务长官在最近的省长会议上指示各省，必须采取快速出荷的办法，以确保达成粮谷出荷量。我们省根据总务长官的指示，也采取快速出荷的办法，各县要想尽一切办法督促农民尽快出荷，不仅是必须达成粮谷出荷量，而且又必须在年前办完。"在我训示完了后，由伪实业厅小田参事官说明对于快速出荷省的要求。他说："快速出荷是防止农民将粮食隐藏起来以致达不成粮谷出荷量的最好办法。要达到快速出荷的目标，就必须不给农民以喘息的时间，督促农民收割，督促农民打场，督促农民送粮。"他还说："在出荷期内，各县必须每天将出荷的情况用电话

报告给省实业厅。今年的出荷是省与省比赛、县与县比赛，看看哪个省最快、哪个县最快，希望各县特别努力不要落后。”各伪县长报告关于粮谷的出荷问题时，大致都说：“今年的年成丰收，关于粮谷出荷没有问题，保证一定达成出荷量并要用各种方法尽快完成出荷任务，争取领先。”

伪县长会议后，伪四平省公署也成立了粮谷出荷督励本部，由实业厅办理事务，参加这个本部的除了伪省长、伪省次长和伪省公署的各厅长、科长、参事官外，还有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事务长、伪兴农合作社省联合会理事长等。在10月里，各县都开始了粮谷出荷，伪省公署内粮谷出荷督励本部天天接到省内各县关于粮谷出荷的情况报告，该本部将各县的报告汇在一起，作为省的粮谷出荷的情况报告给伪中央的粮谷出荷督励本部。这时在伪报纸上天天登载着各伪省和县的粮谷出荷情况。我恐怕伪四平省的粮谷出荷落在别省的后边，我除了发出命令叫各县要尽快办理粮谷出荷外，我还组织粮谷出荷督励队，由我和伪省次长关口保分别率领伪民生厅长、实业厅长、警务厅长、总务科长、参事官、实业厅各科长和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事务长、伪兴农合作社省联合会理事长、记者等到各县去督励出荷。我与省次长各走遍了九县。我每到一县，先交给伪县长出荷奖励金500元伪币，听取伪县长关于粮谷出荷的情况报告，对伪县公署职员训话，晚间设宴招待伪县公署科长级以上者、伪协和会县本部事务长、伪县兴农合作社理事、各伪县机关的首脑以及所谓地方士绅等，然后到县城内的交易场去视察。从伪县长的报告中知道，各县对于粮谷出荷所进行的办法各有不同，可是大同小异，最普遍的办法是：各县都与伪协和会县本部、伪县兴农合作社联合在一起，组织以伪县长、伪副县长为中心的县粮谷督励本部，在伪县公署内办理该本部的事务，每天听取各村屯的粮谷出荷情况，并汇集成县的粮谷出荷情况，向省粮谷出荷督励本部报告，又组织数个粮谷出荷督励班，在伪县长和伪副县长的指挥下深入村屯农户各家庭督促农民割地、监视农民打场、督促农民把粮食送到交易场去出荷。参加县粮谷出荷督励班的有伪县公署的警察和职员，伪协和会县本部的事务长和职员，伪县兴农合作社的理事和职员以及所谓地方士绅等。伪县长和伪副县长也有时到村屯去督励。比较特别的办法是：例如梨树县利用在伪协和会梨树县本部青年训练所受过训练的青年编成粮谷出荷行动队，将他们分配到县内各村屯去监视农民打场、督促农民出荷，硬将农民的粮食装上大车，插上粮谷出荷行动队的白旗送到交易场去出荷。又例如长岭县用伪县公署与村屯订立粮谷出荷合同的办法，限期由村屯长负责将一定数量的粮食送到交易场。我对伪县公署职员的训话主要是说，要他们尽一切可能必须达成县的粮谷出荷量，而且要在年前完成粮谷出荷的任务。我在招待会上的讲话主要是，对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粮谷出荷的积极协力，并要求他们更要协力这个工作，使县的粮谷出荷早日达成，以支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我在各县城的交易场所都看见在交易场门外的空地上，排列着100多辆的送粮大车在等候着赶进院去交粮。在零下30度左右的严寒里，冻得农民不住地搓手跺脚打颤，眉毛和胡须都冻结着冰霜，颜面又红又紫。农民按序将送粮的大车赶进交易场的院里后，立即要办检等、过秤、交粮、算账、领钱、储蓄等等手续。农民送来的粮食有的一堆一堆地用茓子茓起来了，也有的散堆在地上，任意践踏。这些粮食日后都由粮谷会社

运往日本。这年的粮谷出荷，各县都达成了县的粮谷出荷量，省达成了80万吨的粮谷出荷量，并且是在12月里完成的，省内各县中长岭县是比较最先完成的。在省达成粮谷出荷量时，我特对各伪县长发出表示感谢的电报，又对伪村屯长和地方士绅表示感谢和奖励他们热诚推行粮谷出荷政策和积极协力粮谷出荷，都发给奖状一张和特制瓷花瓶一个。

1944年3月我参加伪省长会议，听到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关于1944年粮谷增产出荷的指示，以及报恩出荷的号召。我回省后，将1944年伪四平省粮谷出荷量90万吨的数字交给伪实业厅做出分给省内各县的粮谷出荷量和粮谷增产的数字，并命令伪总务科长村田准备召开伪县长会议，指示1944年各县的粮谷增产出荷任务。又找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事务长吉田门一到伪省公署，叫他准备召开临时四平省协议会决议再出报恩出荷。在伪县长会议上，我训示各伪县长要严厉监督农民增产粮食，不得误了春耕，不许撂荒土地，必须达到省要求各县的粮谷增产数字，以保证在秋后达成粮谷出荷量。省次长关口保指示各伪县长今年各县的粮谷出荷量和粮谷增产数字。在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召开的临时协议会上，我对来自省下九县一市的协议员30人作报告说："1943年的粮谷出荷在年前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对各位的热心协力衷心感谢，各位都知道去年的年成很好，特别丰收。这是天照大神的神庥和天皇陛下的保佑。我们为了感恩报德，当此大东亚圣战方酣、一粒粮食等于一粒子弹的重要时期，目前必须尽可能多出粮食以报答神庥圣恩千万一。现在别的省已经有报恩出荷，我们四平省为了不落他省之后，是否也能出报恩出荷，请由大家决议一下。我的报告刚说完，即有一名协议员举手要求发言。他说："去年的年成是为近几年来所没有的大丰收。这完全是天照大神的神庥和天皇陛下的保佑。为了感恩报德，我省也必须再出报恩出荷支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其他协议员都鼓掌表示赞成。我遂又发言说："各位协议员都主张我们四平省不落于别省之后，也出报恩出荷感谢神庥圣恩及支援圣战，这是很好的。那么，我们四平省再出报恩出荷5万吨怎样?"各协议员鼓掌表示同意遂决议四平省再出报恩出荷5万吨。在这次临时协议会上那个首先发言的协议员乃是在事前经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事务长吉田门一的示意。为了使农民再出报恩出荷，所以特开临时协议会要这一套把戏，就是为了避免叫人民说是强迫，可以借口说是由于临时协议会的协议，必须履行协议员的诺言。在临时协议会开完后，伪省公署即将5万吨粮食的数字分给各县，使各伪县公署向农民逼迫督励农民将粮食以报恩出荷名义送到交易场。

在伪县长会议和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临时协议会于3月里先后开完后，伪四平省粮谷出荷督励本部改为粮谷增产督励本部，频繁与各县联络，掌握各县的粮谷增产和春耕实况。又为了督励各县的春耕，组织春耕督励队到各县去督励。参加春耕督励队的有伪省公署民生厅长、实业厅长、警务厅长和总务科长、实业厅参事官、各科长以及伪协和会四平本部事务长、伪兴农合作社省联合理事长等。我同伪省次长关口保各率领一队分别到县去督励，我曾到了西安县、东丰县、海龙县、开原县、西丰县，其他各县都由伪省次长关口保去督励。我每到一县都是先到伪县公署听取伪县长、伪副县长、伪协和会县本部事务长、伪兴农合作社理事等关于春耕情况的报告。据他们所说的，使我了解到各县的情况是：各伪县长在省召开伪县长会议后，即召开伪村长会议，指示各村的粮谷

出荷量和粮谷增产数字，严命各伪村长必须督励农民达到粮谷增产数字不许撂荒土地，以达成粮谷出荷量的要求，并将县粮谷出荷督励本部改为县粮谷增产督励本部，又以参加县粮谷出荷督励班的人组成春耕督励班到村屯去督励春耕。各县的春耕大致都已做好，没有什么问题。在我听完伪县长等的报告后，伪县长又引导我到县城附近村屯去视察。我看见各县有的土地已经种上并长出了幼苗，但是长得很细；有的土地正在耕种，从事耕种的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十二三岁的少年，所使用的牲畜都是瘠瘦不堪，还有的土地尚未着手耕种。我在西丰县视察村屯时听伪村长说，由于没有铁，把庙里的剑都摘下来送去铸铧子。

1944 年 5 月，我参加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召开的关于报恩出荷会议回省后，即与伪省次长关口保商议关于伪中央指定的 10 万吨报恩出荷粮食如何处理。因为前段召开过临时协议会决定为 5 万吨，现在又不能为了增加 5 万吨报恩出荷再召开临时协议会，遂决定由我命令各伪县长将以前省指定的报恩出荷量加倍向农民索要，以达成 10 万吨的报恩出荷量。

1944 年 9 月，我从伪省长会议回省后，即召开伪县长会议。在伪县长会议上我训示各伪县长说："去年的粮谷出荷，由于各县都采取了快速出荷和各种适当的办法，不仅是在数量上达成了省的粮谷出荷量，而且在速度上达到了占全国第二位的良好成绩。现在全年的粮谷出荷就将开始，希望各县必须发扬去年的经验，仍然采取快速出荷的办法，要比去年更早地达成粮谷出荷量，以支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圣战。"伪省次长关口保在他的训词里说："今年中央对于粮谷出荷的方针，仍然是快速出荷。但是与去年不同的是，不在报纸上鼓动、要各省自动地争先完成粮谷出荷量。我希望各县长要理解到尽快达成粮谷出荷量是我们支援亲邦圣战最重要任务之一，无论中央报纸鼓动与否，你们也要同去年一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地完成粮谷出荷的任务。对于粮谷出荷棉布的配给，今年改为每 100 公斤配给 1 公尺，这是由于战争的关系，要不是总务长官特别关怀农民连 1 尺也不能配给。各县长要向农民讲明白，要感谢总务长官，如果希望多要配给布，就得多出荷支援圣战，使圣战早日完遂。"在我和伪省次长的训示之后，各伪县长都相继发言，他们都一致表示说："今年的年成虽然不如去年好，可是对于达成粮谷出荷量尚不成问题，我们一定用尽一切办法来尽快完成粮谷出荷的任务，以支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圣战，使圣战早日完遂。"

在伪县长会议后，即将省的粮谷增产督励本部改为粮谷出荷督励本部。在粮谷出荷开始后，天天询问各县的出荷情况，并汇报给伪中央的粮谷出荷督励本部，还同去年同样组织省的粮谷出荷督励队，我同伪省次长各率领一队到各县去督励出荷。我仍然是走遍了九县，每到一县仍然给伪县长 500 元伪币出荷奖金，仍然进行对县公署职员训话、听伪县长报告情况、视察县城附近的交易场和晚间设宴请客等一套工作活动。我在各县看见伪县长以下职员等都是同去年同样紧张地督促农民出荷。今年的粮谷出荷是在 12 月里达成了伪四平省的粮谷出荷量 90 万吨。

1945 年 3 月，我在伪省长会议上接受伪中央关于粮谷增产和出荷的指示后，即回到伪四平省将 1945 年四平省 100 万吨的粮谷出荷量数字，交给伪实业厅命其做出各县的粮谷出荷量和粮谷增产数字，并命伪总务科长准备开伪县长会议指示 1945 年各县关

于粮谷增产和出荷的任务。在伪县长会议上。我根据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在伪省长会议上所训示的内容与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伪省长会议上的训示里所强调的内容而训示各伪县长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已经进入最后的决胜时期。张国务总理大臣说：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仰体生死存亡断弗分携的帝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遂行国策和增产粮食多多出荷，来支援战争。特别是今年的粮谷出荷与圣战的完遂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各县长必须排除万难，尽一切可能务必达成省指示的粮谷增产数字和粮谷出荷量。"伪省次长角田忠夫在他的训示里除了指示各县的粮谷增产数字和粮谷出荷外，特别强调今年（1945 年）是日本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决胜时期，各县长必须变不可能为可能，务必达成本年的粮谷增产和粮谷出荷任务。各伪县长也都相继表示决心"不论有何困难也一定达成今年的粮谷增产和粮谷出荷任务以支援圣战"。

在伪县长会议后，即将省的粮谷出荷督励本部改为粮谷增产督励本部与各县紧密地联络，掌握各县的春耕情况，并不断地将全省的春耕情况报告给伪中央。就在这时伪省公署总务科长松川对我说："现在民间盛传'日德意完了，今年不用出荷了'的谣言，农民对于春耕也多不关心。省长必须和省次长亲自出马督促春耕，以保证秋后能够达成粮谷出荷量。"我遂与去年同样组织春耕督励队，我和伪省次长角田忠夫各率领一队到各县去督励春耕。我前后到了昌图县、梨树县、双辽县和长岭县。我每到一县都听取伪县长关于粮谷增产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各县都是在伪县长会议后，即召开伪村长会议，指示各村屯的粮谷增产数字和粮谷出荷量，严命伪村长督促农民必须完成任务，并将县粮谷出荷督励本部改为县粮谷增产督励本部，与村屯和省紧密联络，又组织春耕督励班到村屯去督励春耕。我又命令伪县长召开伪村长会议，听取各村屯的春耕实况，各伪村屯大致都是说："由于畜力的不够、人力的不足以及没有种子，种上的地少，没种上的地多，现在正和县联络想办法督促农民必须赶快种上，不能容许农民迟延。"我在伪村长会议上训示伪村长说："无论有什么理由，到了秋收后的粮谷出荷少一点也是不行的，你们必须严令督促农民赶快种地，多多增产粮食。"我还为了鼓励伪村长努力工作，在晚间设宴招待他们。

1945 年的 5 月，我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粮食迫使农民增产粮谷，而写一篇号召农民给土地尽孝道的荒唐无稽的反动文章，登载在伪四平报上。在这篇反动文章里，我硬把农民的土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而日益贫瘠减产、荒废，说成是由于农民不施肥、不栽树、不疏浚河道的掠夺式的耕种方法所致。我更狂妄地号召农民给土地尽孝道，要大量施肥，广泛栽树不断疏通河道，以保持地力，增产粮谷以"支援亲邦日本大东亚战争"。日本人对我写的这篇反动文章很表示满意，特在伪康德新闻上以"给土地尽孝道"为题出了社论。

这年的粮谷出荷，还没有到秋收期，日本帝国主义即被打垮，伪满也随之垮台，诚如奉天人民所说的日德意完了，今年不用出荷了。

四、粮谷出荷加给农民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危害

日本殖民者用粮谷出荷的方式掠夺东北农民的粮食，迫使农民将一年辛勤劳动的果

实送到日伪设立的交易场出荷。在形式上收粮时付给农民粮价，而其实际所出的粮食收买价格，尚不够人民间互相通融的粮食价格的几十分之一。例如，高粱的收买价格每100公斤仅给7.8元伪币，大豆的收买价格每100公斤仅给12元伪币，而人民间互相通融的价格则比此高出十几倍或数十倍。并且日伪当局还在交易场强迫农民必须储蓄所得粮价的20%。所以说粮谷出荷就是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农民实行粮食掠夺。

粮谷出荷不仅是使农民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对农民加给严重的危害。在每年春季将要开始种地的时候，即由伪村屯长传来伪县公署对每个农户要求必须种多少地、种什么、到秋收后出荷多少粮食。从这时候起几乎每天伪村屯长都来农民的家里催促种地，他们有的携同伪警察一起来，他们从不问农民有无种子、人力够不够、畜力有没有，就是强逼种地，如农民稍有迟慢和应付得不合乎他们的要求，即行打骂或以反抗论罪。因而农民被逼无路，有的出高利贷种子种地，有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十二三岁的少年出来种地，有的完全用人力种地。这时伪县的春耕督励班也常来到村屯督励，他们来得更为凶暴，他们携同伪村屯长伪警察逐地段观察逐农户询问，如稍有不合乎他们意思之处即对农民进行辱骂和暴打甚至带到县城惩罚。在西丰县以没有铁铧子为理由，春耕督励班竟将村屯庙里的大钟摘下拉走。

秋天将到，伪村屯长就携同伪警察来催促农民割地，地将割完，就催促农民边打场边送粮食到交易场去出荷，使农民彻夜不得休息，终日不得安宁。由于收割和打场过早过快，农民也遭受很大的损失。在粮谷出荷期内，农民在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被逼赶车到交易场去出荷，傍晚或者黑天才能回来，不仅是两头不见日头，还得饿着肚子受冻，并且在交易场内要经过检等、过秤、交粮、算账、领钱、储蓄等等复杂手续，不仅是到处受呵叱、挨打，还经常遭受压等、压秤和去零等危害。伪县的粮谷出荷督励班也携伪村屯长、伪警察经常到各村屯去督励，他们所到之处，人人都是昼夜不得安宁，每天都听见孩子哭妇女喊，他们经常用打骂、罚跪、冷冻、上三江口（即学王八爬）、过电等惨无人道的暴行强迫农民打场、装车送粮出荷。还始终怀疑农民将粮食隐藏起来逃避出荷，所以他们经常搜索农民的家里，翻箱倒柜刨炕找粮食，连给小孩子做奶布子吃的苞米也拿出出荷。他们都住在伪村公所里，或者地主家里，每天肥吃肥喝，所花的钱，还得农民给分担，昌图县伪副县长佐藤特别惯用这种残暴手段危害农民。

农民在每年出荷后，手里就没有余粮了，都是吃草根、树皮度日，连糠菜半年粮都做不到。在农村里看不见一处院墙和草房整齐的农民住宅，虽在严寒的季节里窗户上连纸都无力糊。农民所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甚至衣不遮体，穿不上棉裤穿不上棉鞋的农民到处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没有裤子，小孩子没有衣服穿放在草穴里，人人都是面黄饥瘦，颜面浮肿。虽在这种悲惨的严重情况下，日本人对于粮谷出荷量少一点也不行。

最后我引证伪四平省农民在1943年5月给我的匿名信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农民由于粮谷出荷遭受危害的严重与万分痛恨的心情。在匿名信中写道："自从四平设省你来当省长，粮谷出荷量年年增加，两斗粮怎么能够吃一年？你饿死了老人，饿死了小孩，也饿死了牲畜，他们都向你要命。我们恨不得寝你的皮，吃你的肉。"

（1962年）

伪满时期对于东北粮食统制和掠夺

刘 德 权

日本对东北农产物的掠夺可分为两个阶段：从 1932 年到 1938 年为自由经济时期，从 1939 年到 1944 年为统制经济时期。再把统制经济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39 年到 1941 年为混乱阶段，1942 年到 1944 年为严苛阶段。在统制初期，由于统制方法年年改革，而奉行工作人员大都是一些贪污破坏分子，因此使农产物经济陷于混乱状态，致令一般的经济界也大受影响，发生了动摇。当时各方对于伪满政府及其统制机关，攻击纷起。于是伪满政府对于所施行的方策，尤其是收买方策，不断地再加以修改，并根据所谓动员计划，将一切农产物按照输出和境内民需数量，加以区分，实行输出和出售计划，于是他们的收买的数量，直追求达到最高的指标，以满足其欲望。

一、自由经济时期一些统制措施

1937 年和 1938 年两年间，关于东北农产物的措施如次：

（一）大米：自伪满成立以后，日本人、朝鲜人移住东北的人数骤然增加，因之大米的需用量也随之增加。当时东北各地所产的大米，虽然产量还多，但是仍感供不应求。因之大米价格逐渐上升。及至七七事变以后，所有物价也一律随之增涨，更加大米商人藉以囤积居奇，从中操纵市场，于是大米的价格愈加昂贵。

（二）麦粉：麦粉乃是东北各地主要高级的食品，自从 1937 年禁止输入以后（以前多为美国输入麦粉），因之也同样供不应求，而价格也日见昂贵。

（三）大豆及其加工的豆油、豆饼：这三种产品，向来是东北输出的农产物的极大宗。在自由经济时代，约占东北输出农产物总额的一半，尤其对于其他各国输出额中，占 70% 至 90% 均为大豆及其加工品。所以由日本以外的外国输入物品应需款项，其大部分都由东北所输出的大豆及其加工品所得外汇抵充。及至七七事变，伪满政府为应付日本战事的需要，积极建设伪满的工矿业部门，所输入各种物质的需用外汇，也完全依赖所输出的大豆及其加工品。但是当时一般的物价，均都逐步上升，大豆价格当然也随之上涨，加以由印度输入的麻袋也受到限制，因之麻袋的价格也加增长（装用豆类必须利用麻袋）。所以在很长的时期，竟和伦敦市场的价格，相差无几，于是大豆及其加工品的输出，大受阻碍，甚至输出完全停滞。伪满政府为振兴大豆的输出起见，除特定对于大豆实施奖励方法外，更对交易所采取平抑价格的措施，以便促使大豆的价格低落，而利输出。但是也并未达到所期望的目的。

（四）高粱、苞米、谷子：由于大米、大豆、小麦等价格的高涨，当然也要影响了

其它的农产物的价格，尤其华北正值粮荒，更是影响东北的粮价。若不设法阻止，势必暴涨不止。伪满政府便实施了对于农产物特别加以统制方案，于是东北人民便日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聊生矣。

二、统制经济时期一些统制方策

甲：收买对策

关于农产物的收买，乃是伪满政府“统制粮食”、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最重要的方策。

（一）伪满农产物统制第一年度（1939年）收买对策

1. 东北特产的农产物，仅指大豆、豆饼和豆油三品，其决定要纲如下：

东北粮栈及特产商，仍准其买卖。惟对于混保大豆（混保大豆乃是经过检定合格后特加保管的大豆和其它加工品的简称），统由伪满洲特产专管会社，于承办各车站收买之。至于豆饼豆油，于必要时，得准照混保大豆实行统制。专管会社根据上述纲要，除对于粮栈或其粮商等，所委托铁路将要运销的混保大豆及豆饼予以收买外，并将他们收买的大豆委托指定油房施行加工所制出品，不论合格与否，悉数予以收买。此外并同有力的特产商例如三井、三菱和宝隆等会社，订购混保大豆期货，以谋收买的数量增加。

关于伪满洲特产专管会社的组成，完全由伪满政府和日本财阀三井、三菱和宝隆等会社，各派出负责人，分别担任理事。其理事长系由“满铁会社”开拓部长调充，负责总其大成。至于伪满政府推荐的副理事长和理事各一人，不过备位而已。在自由经济时代，对于大豆、豆饼和豆油的交易，都以交易所为中心，并由多数粮栈和特产物商以及油坊参加买卖。这些粮栈、粮商等，在过去都是经济界中有力分子，在实行统制初期，统制机关本想利用他们的实力进行收买，不料结果适得其反，竟至完全失败。追究其失败的原因，乃是在统制开始以前，这个消息便透露在外，以致在农产物收买以前，各粮栈早同农户暗订契约，使农民提前收割脱谷和干燥，把大豆大量地卖给油房，所以在统制开始以后大豆上市的数量甚为减少。因之专管会社未能按照所定的计算，收买足额。其次一般粮商和农户鉴于统制规定仅限于混保大豆，他们便暗把所存的大豆掺杂一些劣品，甚至把豆粒压扁故意使其成为不合格品，以避免统制机关的收买。尤其是收买价格过低，在统制开始以前，大连交易所的大豆价格，每60公斤，在8月为9.13元，最低为7.89元。而统制机关所定的价格仅为7元，它是参照欧洲大豆的行情，以为输出的价格标准。当然这些粮商都不愿意把大豆卖给统制机关——特产专管会社。

至于在油坊统制实施后，对于大豆加工业，也和一般粮栈商的同样。统制机关虽然照旧许可他们营业，却规定了油房所制出的圆豆饼，均一律的按照法定价售给统制机关。但是油坊业者也同样为避免统制机关收买，故意把所出制品造成低劣，使其不合格品，好便留作私卖。如是统制机关收买豆饼也同样遭到了失败。

总之，统制第一年度，对于收买大豆、豆饼对策，造成种种失败。这是一般农民和农产物商，不肯同日本人合作，也算是一种消极的抵抗。

伪满政府鉴于统制收买成绩不佳，急忙把统制收买价格提高，每60公斤，原定7元，提高至8.5元。但是已到旧历正月，即是1940年，而农民所有农产物都已卖完，至于粮栈等都想期待再次提高价格，多把大豆不肯出卖，以待善价。于是统制机关的收买成绩，终至失败。

当时伪满政府鉴于大豆收买失效，此事关系甚大，便再次在1940年发动了一种收买大豆的方策，以期达成第一年度统制收买的计划成绩。他的办法，除对于粮栈所存大豆一律强行收买外，并对于大豆运输再行加以严格的限制，并停止了油房的营业，但是也卒未能达成所望的效果。在自由经济时代，每年的数量在300万吨，而伪满统制机关，就是在第二年度，所收买的大豆数量也不过73.1万吨，此外则完全秘密输出和当地消费以及暗自囤积。

2. 在统制第一年度所统制主要的粮谷，仅指高粱、苞米、谷子等类，伪满统制机关起初仅对高粱、苞米加以统制，后来又加入谷子。当初期实行统制的时候，将高粱、苞米的主要集中地计99处，指定为统制机关的收买地点，并决定了收买价格。凡由指定地点利用铁路和船舶运出一货车以上的高粱和苞米，全由伪满洲粮谷株式会社收买，至于谷子则不强行统制，仅由自愿出售者，予以收买。以上收买方法，因有种种缺点，以致收买成绩仍不见好转。查其原因，乃是农民以及粮商者对于统制都取观望态度，加之一般生活必需品价格昂贵，又以日本国内的大米价格提高，于是农民和粮商者大都多囤积，不肯轻易出售。统制机关的收买的数量，是以一货车（指火车）为单位，粮商便利用零担方法，把农产物到处私自运销于其他各地，或者避免统制先把粮谷运自非指定地点，然后再用铁路或船舶公然运出。尤以起初对于谷子和小米未加统制，所以农民都先把未受统制的粮谷尽先售出，因之粮商者也同样把不受统制的粮谷先行运出，至于高粱、苞米则留作当地销售之用。故一般盛行投机买卖，因之价格高涨，对于统制的收买价格大受影响，由于统制机关的收买价格较低，他在收买上自然受到困难。伪满当局不得已只得同样把高粱、苞米、谷子等项收买价格提高了20%，并把铁路沿线地域均指定为粮谷地域，实行输送的限制，以谋增加收买数量。但为时已晚，并未收到效果，预定估计其收买数量为160万吨，但是第一年度的收买数量不过58万吨。比较预定数量，相差甚多。所以他们预定计划内的对于城内一般的食用粮谷的出售方策完全失败，一般消费者只有用高价在黑市上购买食粮，而贫穷的人唯有挨饿而已。

3. 关于小麦和面粉，在1938年，伪满制粉联合会（该会系由99个工厂组成）。各工厂所用的小麦，在各厂分摊的生产数量范围内，可按照伪满政府所定的官价，自由收买。各制粉厂所制出的面粉，应以一定的价格，售予制粉联合会，至于输入的面粉，也统由该会办理，然后再用官价实行出售。对于小麦，虽经规定收买价格，但是并无任何统制收买办法，所以加入联合会的各工厂收买小麦常在官定的价格以上，因此各制粉厂不得不把所制出的面粉用高价在黑市上私卖，尤其是加入联合会的大制粉工厂和未加入联合会的磨坊，对于小麦的收买，竞争甚烈。这时一般市民面粉的供应极为缺乏，于是各小磨坊便把所制出的面粉乘机以高价在各处私自零卖，以获厚利。他们更不惜用高价到各处私买小麦，因之大制粉厂所收买的小麦数量，反较减少，以致所产的面粉的数量，自然不能加多，就是加入联合会的大制粉工厂，也各自为争取利益，收买小麦时也

发生了互相倾轧。

在1939年9月，伪满政府乃将伪满洲制粉联合会取消，从新设立伪满洲谷粉管理株式会社，又特制定了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除对于小麦和制粉业施行统制外，还对于面粉施行专买制度，兹将该年度的小麦及面粉收买法规记于次：

（1）对于小麦，除由谷粉管理会社得以官价收买外，其他任何人不得收买之，但制粉业、制酱业及麦子制造业等不在此限。

（2）除由谷粉管理会社购买小麦及其他制粉原料外，小麦生产地以外的制粉业者，不得向其他各地购买。

（3）除谷粉管理会社外，不得办理小麦的输入。

（4）由谷粉管理会社购买原料的制粉业者，其所制出的面粉，亦由专卖总局办理之。

根据以上办法，谷粉管理会社在专卖小麦的粮商中选出资本雄厚及信用卓著的13家，由该会社指定为代理收买人，使其担任收买小麦的事务；而指定代理收买人则于小麦生产地，选择适当的粮栈，作为下层机构，使其担任直接收买小麦的工作。此外小麦生产地的制粉工厂，所需用的小麦，得在其应生产面粉数量范围内，受谷粉管理会社的委托，自行收买之。

按照以上收买组织，对于收买的成绩，似应获有效果，然而实际上，仍和其他统制收买农产物同样，未能达到所希望的数量。

伪满政府为争取小麦收买的第一年度的预定计划数量，直到1940年3月还再次订立了一种补充收买对策如次：

（1）为使指定收买代理人得以发挥能力俾能完成收买责任起见，应按照市、县、旗别，规定其收买区域，以免在同一区域内，发生互相争购的现象。

（2）除指定代理人下层机构的特别粮栈外，严行禁止其他粮栈收买小麦。

（3）除谷粉管理会社指定的制粉工厂以外，其他工厂无论在小麦生产地远近，一律禁止营业，其所有的小麦，应由谷粉管理会社收买之。

（4）特定粮栈以外的粮商，不得整车运输小麦，并由各铁路当局临时取缔之。

（5）一般的粮栈所存有的小麦应使其报告数量，以便谷粉管理会社随时收买之。

以上办法，同样因小麦已过上市最盛的时期，也未能收到任何效果。据估计第一年度的小麦生产约为93万吨，而谷粉管理会社所收的数量不过29.9万吨。

4. 大米：伪满政府早在1938年设立了“粮谷株式会社”，由1939年开始统制大米，凡东北所产的大米，完全由该会社收买。但是实际上收买工作系由该会社委托于伪满洲兴农合作社代为办理。因为兴农合作社在伪满成立最早，专门经营买卖粮食，该社的势力甚大，在各地重要的城市都设有分社。或是在分社的人员不足分配时，他可以委托当地大米加工业或是适当粮商，代为收买。大米一项，为日本人和朝鲜人特别需用，不像其他的农产物，可以假手于普通粮栈。至于大米加工业各粮商，向来规模既小，而且资本又弱，不用他们收买，也没有任何影响，于是乃依赖兴农合作社，它在地方上基础巩固，而收买能力却是在一般的粮栈以上。例如在第一统制年度的大米的生产量，约为78.9万吨，它竟收买到47万吨以上，确实是比其他农产物的收买成绩效果卓著。其

原因就是在统制开始前，对于农民的各种工作。及至统制施行以后，对于大米黑市取缔又严苛，而它所订的收买价格比较自由经济时代并不低，尤其实际上在东北的大米加工业和经营大米粮商等资本大都单薄，所以没有收买大米的能力。

统观在第一统制年度，对于各项农产物的统制方式和收买方法，除大米一项外，其余均告失败，以致农产物经济始终陷于混乱状态，并引起一般的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最感受痛苦者乃是城市的贫民。因为在乡村的农民，还可设法私自掩藏，或向城市的黑市上私卖，当局总防也不胜防。当时各方面，对统制机关纷起攻击，甚至有主张取消这种害民的统制农产物条例。

（二）农产物统制第二年度（1940年）收买对策

由第二年度起，第一，除将官厅的机构及其所管事务加以整理外，再次对于各种统制方法彻底加以改革，于是把东北所有的农产物及其加工品一律列为统制品类，但是限制愈严，弊端愈甚，这时统制下层机构的工作人员，以所谓日系当权人员为首，勾结一起，无恶不作，更使人民痛苦不安。第二，伪满当局更加强在各重要地点，增添了统制机关的分社和办事处，再次规定收买代理人制度，将大规模的粮栈和粮业贸易商，精选为收买代理人，直属于统制机关，计选定收买特产农产物的为15家，收买粮谷的为20家，收买小麦的为13家，共计为48家。第三，对于一般的粮栈，更按照市、县、旗单位分别，令其成立所谓“组合”。凡加入“组合”的粮栈，全由“组合”统辖之。凡其收买代理人在事务上的联络，也由粮栈组合行之。这些“组合”，都由日系人员主持一切。第四，更以从前对于交易市场未能加以规定，随意买卖，因之黑市盛行，无法取缔，乃把统制农产物交易市场的地点，特限定为“兴农合作社”的交易场，另外一概禁止交易。同时还制定了一种交易场法，于是数十年来所有农产物交易的旧有粮栈院所，以及地方上的粮市，均被全部消灭。第五，限制在交易场上收买农产物的粮商资格，即是除了各省和特别市许可的粮栈收买代理人及“兴农合作社”和统制机关以外，无论任何人等都不得在交易场所收买所指定的统制农产物。但是大米仍由统制机关委托“兴农合作社”收买。第六，关于收买的限制，除大米外，至于其他农产物品，凡指定的粮栈和“兴农合作社”均在交易场所有收买的权利。此外，在第一年度曾许可的一部分农产物的自由买卖，这次则一并禁止。凡他们已经在交易场所收买的农产物品，一律按照规定，尽数售给收买代理人或统制机关。然后，收买代理人和兴农合作社把他们所收买的农产物，只准其售给统制机关。

此外，对于加工业的限制，以及铁路和船运输农产物的限制，除了统制机关以外，任何人均不得办理农产物的输出。

另外，更特别规定了所谓“出荷”奖励金制度，以为诱夺诈取的手法。对于农产物的压轧或掺入混杂品类等项，希图避免统制，均严令禁止。他们又重新制定粮谷管理法，并把大米和小麦的法规，加以修改。

如是，在统制范围内，虽然加以种种的措施比较完备，而收买成绩也较增加但是按照预定计划相差甚远。因此对于所需用的配售和输出的数量，均极感不足，其混乱的情形在第一年度以上，东北人民所受生活的困难，更随之加重。

追究其原因不外以下所述：

1. 东北农民、粮商和加工业，在自由经济时代，农产物交易占经济的主要的地位，他们大都习惯于自由和投机买卖，当统制经济实行以后，一时仍难以改变黑市交易、秘密输出和私自加工等旧习。当时虽然设有经济警察，随时取缔，乃以地广人多，一时难以胜防。尤其这些警察和负责下层的统制机构人员，互相勾结，只要给钱，他们便私纵卖放。就是司法人员，亦所难免，况且这些商人，又善于纳贿和迎合这些统制人员的心理。

2. 在第二年度，又因正遇年景欠收，对于农产物的收买的数量减低。

3. 由第二年度起，所有农产物的种类和统制的地域，俱都扩大；统制方案，也大致划一。唯独是三社互相鼎立，且拥有下层的机构，便经常发生互相竞争和排挤的情况，各自谋求收买的数量增加，因之造成了复杂的现象。

最重要的是在第二年度的农产物收买，不但成绩欠佳，而且因为有“出荷”奖励金制度关系，农民急于提前争取出售，反而在农产物还未成熟或者还未干燥的时候，大量出荷，统制机关收买这种农产物以后，对于保管和出售，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三）统制第三年度（1941 年）统制机关合并和伪满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1. 关于农产物统制，原定大米（包括稻子）、粮谷（高粱、苞米、谷子）、大豆及各种油料、小麦、面粉五项，因而所定法规，便分为米谷（大米、稻子）、粮谷管理法、特产物管理法（大豆油料）、小麦制粉统制法、面粉专卖法，更随之设立了各项农产物的统制机关，即：伪满洲粮谷株式会社（大米粮谷）、伪满洲特产专管会社（大豆及油料）、伪满洲谷粉株式会社，独是面粉又由伪满政府专卖总局统制。当统制施行的初期，对于农产物的需要的程度不同，因之统制的方式，也不能一致。所以上列的统制机关陆续成立，分别统制。以前几经复更，对于各项农产物的统制方式，大致相同，所以第三年度起，决定把上列三个统制机关，合并成立为伪满洲农产会社，俾使担任各种农产物统制事务，便于统制。三机关合并的同时，把“中央”行政机构也加以改革，在伪满洲兴农部内，添设了粮政司，专任农产物的行政，及时指导统制农产物各机关（面粉由伪专卖总局办理）。由此统制系统，既为划一，免去了各种联系事务上的繁琐，并把最有能力的伪满兴农部结城次长（日本人）调充伪满洲农产会社理事长，所有负责的理事、科长下至职员，完全由日本人充当，还照例安排了他们所谓满系的副理事长一人，理事二人，以为表面的配合，此外所谓满系人员只有少数的日语职员和杂役及马车夫而已。

2. 实行先钱后货制度：乃是自由经济时代，所谓买青的方法，对象为大豆、高粱、苞米、谷子、小麦、燕麦、苏子、大麻子等。对于收买数量、交货期限、交货地点，同农民事先双方合议决定后，订立契约，根据这种办法，使“兴农合作社中央会”，按照省别，拟定先钱后货付款计划，同时参照该项计划，设立了春耕、除草、收割等资金放款计划，俾使这两项计划互相结合。并由各伪省长公署担当这项事务，特别组织一个所谓“增产出荷推进本部”。决定各市、县、旗、分别农产物种类的增产及收买数量，设立了增产实行计划，即所谓先钱后货卖约数量综合计划，另外组织此项农耕资金发放状况的调查，并向各市、县、旗及农村派遣办理先钱后货的契约督励班，在各市、县、旗也各自组织“增产出荷推进本部”，对于各乡、村、屯指示增产及先钱后货契约的目标

数量。另外又加派了确保生产面积和先钱后货制度工作督励班，加紧整理计算农产物交易市场，以及种类分别的先钱后货的数目。自准备以致订立契约期间，还有种种措施。统观由4月农耕开始，直至次年旧历正月底，约在一个年的期间，伪满政府中央各行政机关，集中全力推行这个先钱后货制度，它动员人数之多，工作地面之广，致使所有农民应接不暇，受到了万分的繁扰不安和压迫剥削，苦状莫可名言。但是它这种所执行的先钱后货的妙策，仍然以失败告终。

（四）农产物统制第四年度（1942年）收买对策

在这年度开始，正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时局紧张万分，日本在他本国以内和伪满洲国内，均感受格外需用食粮问题异常困难。他们不顾东北人民如何的困难，竟悍然发动极为苛酷的手段，硬向农民强迫勒逼，非达到他们所期待的收买数量不止。伪满政府日系人员秉承日本关东军意图，对于统制农产物收买对策，用尽了狠毒暴烈的方法，立即执行，大致规定如次：

1. 对收买农产物时，用配售布匹和必需品，以为诱导。因东北农民在伪满时期对于布匹需要甚急。伪满政府为提高农产物的收买数量，特别由统制第四年度起，把在都市的布匹配售数大加削减，对于农村准备了布匹约1亿码，棉线约1200万支。收买农产物不分种类，每一吨按照官价搭配布匹五码、棉线2支、袜子1双、手巾2条，用这样方法诓取农民的大量农产物，直至东北人民受到缺粮的灾害。

2. 采取对农村“集团出荷”制度。利用村落有名望的人物，责令负责奖励一般农民互相协力出荷，同时担任养成共同团体，互相监视，不做黑市交易。总之“集体出荷”就是禁止农民单独走私或在黑市上偷卖。

3. 实行“钱租制度”。东北农村的习惯，佃户多以粮租交纳，据推测其数量约占上市的农产物的半数。因为先钱后货制度施行是以村、屯、甲、长等为对象，但是收纳粮租的地主多有土地所在地居住者，其所收的租粮多半漏在统制数目以外，在农民订立契约时便把这项租粮不订立在契约以内，因之不但使契约内的数量减少，而且这项农产物多半流人黑市交易。故于第四年度起，对于地主不在佃户同一村落内居住的，禁止收纳租粮，一律改折钱租交纳，以防农产物流入于村外。

4. 发动全力收买农产物。伪满政府由第四年度起，除设立了彻底收买对策及使直接有关的机关发挥了最大能力外，并使其他各机关及一般民众对于农产物工作予以协力，他们的措施和方法，列述于次：

（1）在伪首都召开了农产物的收买会议，参加者为伪中央行政机关首长，伪各省省长和省次长（日系）、市、县、旗长和副市县、副旗长（日系），以及农产物统制机关——兴农合作社中央会、协和会、“满铁会社”等首长。在这会议以后，更由其会的各机关首长，另在各该任地召开下层机关首长举行同样的会议。

（2）以协和会为中心，在全伪满各地展开扑灭黑市的交易的运动，宗教、教育机关也一体协助收买，并动员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等极力宣传。

（3）以关东军、伪满中央各行政机关、统制机关、兴农合作社、中央会、协和会为主体，组织了“出荷督励班”，并以省、市、县、旗为中心，将已设的“出荷推进本部”实行强化，在各市、县、旗等也召开村落的首长会议，“督励”农民尽量交纳所产

粮食。

(4) 实施表彰制度。对于农民或其团体，以及农民以外人员，凡是对于农产物收买工作有巨大贡献者，由伪满政府予以表彰，更把大豆、苏子、大麻子、小麻子的收买价格提高30%左右；并使兴农合作社在发放农耕贷款时，特别对于种植大豆及其他油料农产物的农户，配量增加贷款额数，以示鼓励。

据上所述，日本当太平洋战争正酣的时际，他们对于搜刮东北的粮食，不遗余力地用尽了种种的威胁利诱的手段，以期达成所抱的愿望。而东北的人民至此已陷入断粮的危急阶段，而伪满政府以及统制机关，反而扬扬得意地夸张他们的收买对策大获效果，在该年度收买得到较好的成绩。据发表收买的数量，竟达到了600万吨，占预定的收买目标的90%，比较上一年度收买数量增加50万吨。

(五) 关于农产物统制第五、六年度（1943年—1944年）收买对策

这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他们在第五年度更把以前所定的收买对策加以修改。因为这时金融逐渐毛荒，不得不把农产物收买价格加以提高，并对于"出荷"超过摊派数量以上者，更增加配售生活必需品。推行先钱后货制度的缺点甚多，即行废止。也不用另行订立契约办法，即由伪满中央行政官厅，下至各省、市、县、旗，以致于各村屯甲等，逐层决定收买数量。或直接对于农民规定他们"出荷"数量，这是明显地用官吏的势力，直接向农民掠夺食粮。日本，至此已把他们所言扬"把握人心"的虚伪面貌脱却净尽。

于是在统制第五、六两年度内，加以年景颇佳，统制工作又"更彻底"，因之第五年度收买数量，竟达到760万吨，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62万吨。同样在第六年度收买数量更高达885万吨，比较第二年度增加到500万吨巨大的超额。

乙：配售对策

关于配售对策，细分之乃为配售机构、配售方法、配售数量。当统制经济施行开始的三年间，他们的收买对策连续遭到失败，就提不到配售对策，配售是一塌糊涂，混乱已极。嗣后几经修改和强化，直到第四年度，才有好转，渐次对于配售的数量增加，以及第五、六两年度，更因收买农产物数量特别加多，对于人民的配售的数量，似乎照理应该使一般人民得到充裕的供应。但是据我所闻见的，这些担任配售责任的下层机构工作人员，大都从中克扣，把好粮换发腐粮配售。一般的人惟依靠黑市交易，以资糊口度命而已。总而言之，在东北地区无论年景如何丰收，统制机关收买数量如何增多，东北人民丝毫不能得到好处。细加分析当时的情况，不外下述所列：

在统制第一年度，对于大豆在东北境内的配售，并无任何特殊对策，至于高粱、苞米、谷子等，也和大豆雷同。因为统制方式既未完备，则配售方策当然不能健全。但是统制机关在东北重要消费地点，由大粮商组成了叫作配售业者工会（组合）担任配售事务，再由粮谷商人和零卖人等向各用户配售。惟是统制机关对于配售业者工会的供给难以充足，配售数量当然不能按照计划实行，因此多寡不均，致使一般消费者感到断粮绝炊的痛苦，万不得已，只有用高价向黑市买。

关于大米配售方法，乃是由配售业组合为一种法人，内分成为第一部组合员和第二

部组合员。第一部组合员，系由大米加工业所组成。第二部组合员，系由大米零售商人所组成。大米加工业，受统制机关的委托，按一定的工资实行加工。至于零售商人，则按照官价由统制机关供给大米，再按照各市、县、旗公署所定官价，向一般消费者实行配售。但是特别规定，大米配售应以居住各镇市的日本人、朝鲜人和极少数所谓满系官吏为配售对象。此外一般人则无权享有，甚至有偷吃大米的，一经查获，则严加惩罚。当时只有朝鲜人手中，有时可以买到一点大米，都视为珍品。

小麦和面粉的配售方法，当时共有953家制粉厂组成的自由团体（联合会），由这个团体实行一种统制。在第一年度时，因为小麦的收买的成绩不佳，由外地输入的面粉数量又少，故对于配售数量，当然不敷所需，结果造成统制机关的下层工作人员和零售商人勾结一起，从中由黑市出售。而一般需用面粉消费者，可以用高价购用，当时虽施行一种配售票和配售账的制度，也都成为具文。关于高粱、苞米、谷子等的配售和价格，全由统制机关负责办理，所以不但在各处所需要的配售全数由统制机关负责收买，即对当地以及以外地域的配售，也由统制机关负责处理。但是粮谷类的统制，在第二年度时期虽然加以改善和强化，惟对于收买和配售，均未能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及至第三年度以后的配售对策，除面粉以外，所有其他各农产物及其加工品，均由伪满洲农产会社统制，比较以前，虽见改善，但在该年度对于农产物的收买数量，并未显著增加。更以时局关系，所有运销于日本、朝鲜和华北各地的农产物，愈需格外增加，因之在东北境内保存的数量，非常减少。所以对于各地的配售，益感不足。尤其对于第三年度的农产物的对策，最是令人注目的，是所谓农产物动员计划。就是把一切农产物，按照输出和东北境内民间需用的数量加以区分，然后再行分别实施输出和民间需用的配售，其计划分别列述如次：

1. 输出用，计日本、朝鲜、华北。

2. 东北境内需用，计关东军特需，重要事体团体用，勤劳奉公队用，统制机关直辖国工厂用，大酱、酱油工厂用。

3. 其他需用，计酒精工厂用，淀粉及农药工厂用，味之素工厂用，种子用，伪满军用，收买洋麻和棉花时特别配售用。至于各省民需农产物，应由各省按照各市、县、旗别和农产物种类别，加以区分，再由市、县、旗根据伪省公署所拟定计划，并按配售对象别和种类，加以区分。这种动员计划，须于该农产物年度开始的五天以前要计划完毕。

关于农产物配售机构，例如大米、杂粮和油类等配售，是在市、镇设立“批发组合”和“零卖组合”，其他较小地区则只设立“零售组合”。所有这些组合，应由统制机关领到的配售品，直接配售给一般消费者，或配售给所指定的零卖商店再由其转卖给消费者。其配售方法，系采用所谓配售票制度，或者配售账制度。这种制度，逐渐普及，直至统制第五年度（1943年），在东北各地，全面采用。

嗣后又把由伪满洲专卖总局所管的专卖面粉，也归了统制机关内统制。根据他们宣扬说，东北农产物的逐年增加，配售量也随之加多。究其实际，确实年景丰收，产量增高，他们统制机关，也用了威胁利诱和巧取豪夺的高压手段，把民间所生产的农产物全部刮净收绝，而对于配售数量，并不加多，甚至把民间所私藏的微少食粮，也都搜去，

至此人民大多感到食饭艰难，想在黑市用高价购买。而一些"经济警察"恰像一群恶魔，到处寻风搜索，如有所获，便把农产物作为他个人所有，否则就送法院罚办，判以经济犯罪，真是暗无天日。

在上述农产物及其加工品统制的制度中，有所谓大米外食券制度。原先对于一般饭馆所用的大米，向来以营业用大米名目予以配售，由1942年4月起才把这种制度取消，改用外食券制度。其做法是凡于饭馆用膳者（包括旅馆），须先采用大米配售账，到大米配售店请领大米外食券，由配售店在配售账上记载其所领大米外食券张数，从下次配售大米数量中扣除大米外食券的数量。但是，要明白的是，大米只配售日、朝鲜人和伪满少数官吏（最后也取消）。此外普通中国人不但无吃大米资格，甚至如被查出，还要受到法律制裁。

关于高粱、苞米、谷子专类的配售定量，这是他们所指定的东北的一般人民应当享有的口粮，起始在各省互有出入，嗣后调整，直至1945年即统制第六年度，才经划一。计成年人和儿童平均定为每人配售定量每月10公斤，但对于重要产企的重劳动工人每月配售定量为27公斤，次者为22公斤，轻劳动工人则为18公斤，对于宿舍学生则每月增配3、4斤不等，以示笼络。但是从第三统制年度起，伪满统制当局为使农产物加工品增加配售数量提高起见，他们设出诡计，对于大米、高粱、苞米、谷子和小麦的碾米或制粉，特别使其出米率和出面率格外增加。在自由经济时代，各种食粮的出米和出面率，计大米为50%至60%，高粱为65%，面粉为67%，至统制第三度起，即逐渐提高。至统制第五、六年度，大米出米率增至70%，高梁出米率增至80%，面粉出粉率，增至为82%。所以制的米和粉的品质大为减低，粗糙不堪食用，而且减少兼并。因此，统制当局受到了各方责难。

关于豆油（包括白绞油）的配售方法，反不如粮谷类，其基本配售数量，不分农村、市、镇每年每人配售量约2公斤，但是豆油的需要量和猪油等的供给数量，有密切关系。在自由经济时代，猪油等的供给丰富时，每人每年配售豆油2公斤，足可敷用，然而自伪满实施皮革统制以后，猪油也由统制机关收买，一般人都难买到，而豆油又说是运输困难，并不能按照量配售，以致民间日用食油异常缺乏。

丙：统制经济时代的伪满输出农产物数量

大豆：

1939年向日本输出480万吨，1940年向日本输出576万吨，1941年向日本输出617万吨，1942年向日本输出627万吨，1943年向日本输出15.5万吨；

1939年向德国输出10万吨，1940年向德国输出15.5万吨；

1939年向朝鲜输出2.8万吨，1940年向朝鲜输出4.3万吨，1941年向朝鲜输出4.1万吨，1942年向朝鲜输出6.4万吨，1943年向朝鲜输出3万吨；

1939年向华北输出2.8万吨，1940年向华北输出15.5万吨。

豆饼：

1939年向日本输出70.7万吨，1940年向日本输出57万吨（包括朝鲜在内），1942年向日本输出37.5万吨，1943年向日本输出5.8万吨；

1939 年向朝鲜输出 1.4 万吨，1942 年向朝鲜输出 11.9 万吨，1943 年向朝鲜输出 5.8 万吨；

1939 年向华北输出 4000 吨，1940 年向华北输出 1000 吨，1941 年向华北输出 2000 吨，1942 年向华北输出 4 万吨；

1943 年向华北输出 3.5 万吨。

豆油：

1939 年向日本输出 2000 吨，1940 年向日本输出 6000 吨，1941 年和 1943 年向日本输出均为少量；

1940 年向德国输出 4000 吨，1941 年向德国输出 5000 吨；

1939 年向华北输出 6000 吨，1940 年向华北输出 1.1 万吨，1941 年向华北输出 6000 吨，1942 年向华北输出 2.5 万吨，1943 年向华北输出 1 万吨。

统观上列的大豆、豆饼、豆油三品的输出额，占全东北农产物质总额的有 46.6%，而尤以日本对我东北农产物的掠夺占最大多数。而对于其他粮食农产物，计向日本输出在 1940 年为 16 万吨，1941 年为 8.6 万吨，1942 年为 6.3 万吨，1943 年为 22.7 万吨；对于朝鲜输出在 1940 年为 14.4 万吨，1941 年为 1.5 万吨，1942 年为 18 万吨，1943 年为 29.3 万吨。直至太平洋战争，远航受到危险，它才停止输出。但是这些大量的农产物，他们还不肯配售人民。

丁：伪满公布的调查统计概况

根据伪满当局所公布的对东北农产物调查统计，东北全地域的农产物每年度生产量，大约为 1758.7 万余吨，在统制时期收买量通常为 746.5 万余吨，在农村保留数量为 1012 万余吨，再按伪满当局不完全的统计，农民户数为 440 万户，农民每户平均应当每年售出的农产物为 1696 公斤，农民每户平均保留量数也不过约在 2300 公斤左右。再把农村人口加以细分为 2761.0533 万人，计每一个农民平均须售出 270 公斤，于是每个农民的保留数量每年应为 367 公斤。根据伪满统制机关当时所调查的农村出售量和保留量大致分列于下：

（一）大豆：每年平均生产量为 326.6 万余吨，出售量 212.2 万余吨，农村保留量 110 万余吨。

（二）高粱：每年平均生产量 456.6 万余吨，出售量 150.2 万余吨，农村保留量 306.3 万余吨。

（三）苞米：每年平均生产量 335.4 万余吨，出售量 121.5 万余吨，农村保留量 231.8 万余吨。

（四）谷子：每年平均生产量 302.4 万余吨，出售量 53.9 万余吨，农村保留量 248.5 万余吨。

（五）苏子：每年平均生产量 4.23 万余吨，出售量 2.91 万余吨，农村保留量 1.32 万余吨。

（六）小麻子：每年平均生产量 7.52 万余吨，出售量 4.2 万余吨，农村保留量 3.32 万余吨。

（七）油料子实（落花生、大麻子、芝麻）每年平均生产量18.83万余吨，出售量9.47万余吨，农村保留量8.35万余吨。

（八）水稻面粉：每年平均生产量70.33万余吨，农村保留量28.4万余吨，售出量41.9万余吨。

（九）小麦：每年平均生产量66.12万吨，农村保留量37.61万余吨，售出量28.5万余吨。

（十）其他杂粮（小麦、燕麦、大豆以外杂豆子）：每年平均生产量149.57万余吨，售出量28.39万余吨，农村保留量121.17万余吨。

再把伪统制机关出售农产物价格和农民出售农产物价格，分别列记于后，以便详细比较其差别：

（一）大豆：

统制机关出售价格每100公斤22.98元，农民出售价格每100公斤19.51元。

（二）高粱：

统制机关出售价格每100公斤14.79元，农民出售价格每100公斤10.11元。

（三）苞米：

统制机关出售价格每100公斤14.79元，农民出售价格每100公斤10.65元。

（四）谷子：

统制机关出售价格每100公斤16.39元，农民出售价格每100公斤11.88元。

（五）大米：

统制机关出售价格每100公斤45.2元，农民出售价格每100公斤38.44元。

（六）水稻：

统制机关出售价格每100公斤29.3元，农民出售价格每100公斤24.2元。

此外，伪统制机关对外输出价格，从1939年至1944年期间，向日本输出价格净重每100公斤大豆价格28.42元。他们在农村价格每100公斤则为12.35元，在1939年向德国输出大豆价格净重60公斤则为6.53元。

总观以上，在伪满统制时期，对于农产物的掠夺程度，从它所发表的生产量、收买量和农村保留量的统计数字上观察，颇难发现它的真实情况。但是从收买和配售的数量及价格方面，并从它的方式方法的方面，再从输出的对象的价格和数量方面，由各个角落里加以分析，不难揭穿他们所执行统制经济的诡计，完全是剥削我东北农民血汗辛苦所获农产物，尽量运往日本本国，以作为他们执行侵略政策的资源。独是我东北沦陷的人民每人每月仅能买到极为粗糙的杂粮10公斤，用以糊口，过的是半饥半饱的生活。至于农村人民，每人每年名为保留下的余粮，除去种子和饲料外，所余的食粮未必比都市人民多。他们每年所经营的农产物，照上表所列，尽被统制机关利用贱价收买和高价配售，更降低了所配售的粮面的加工生产率，不管粗糙与否，只要碾出的数量提高，惟图多获利润，真是层层剥削，恰似竭泽而渔，作一网打尽之计。只逼得农民都想抛去田园，流入城市，以求生路，而城市人民也大半面有饥色，路有饿殍。

最可恨的，关于伪统制经济关系机构人员，例如督励班成员、统制机构成员、经济警察、司法官吏等他们大都利用职权，假借伪满统制经济制度为名，敲诈勒索穷凶极

恶，俾满足他们的欲望。据说这些督励班人员，在收买农产物时，对农民交纳农产物有不足额数量时，不管青红皂白先是一顿毒打，甚至打得昏倒在地。他们更把无辜的平民，任意科以违犯统制经济罪名，投入监狱。据说从1941年至1944年，伪满各处监狱内，禁押的所通称为经济犯，大有人满之患。

最可恶的是有一群狗腿子，他们专门利用日系下层的官吏作为护身符，为虎作伥，通同舞弊。这群坏蛋更勾结一些的奸商利徒，大搞黑市交易；合伙分赃，大发洋财，举不胜举。使东北沦陷之区，成为黑暗地狱，人人自危，日处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行路亦均视为危途，例如在火车上的旅客时时受到铁路警察搜查，一经发现有携带食用物品，便有“经济犯罪”的可能。有一次在火车上，见有一旅客，因为晕车，呕吐出来大米饭粒，被押车路警发现，立时严加追究，并把这个人逮捕下车，虽百般哀求，竟不宽恕。同车旅客都代为求情，反遭斥辱。群众心里忿怒，但不敢言。

至于面粉配售，更为可怜，当时有一篇“领面谣”说：“王城似人海，着我盈尺面，手账配齐民，月给五两面。通衢数里长。小市万头颤，前呼而后号，直以爪嘴战。我觉力不任，负隅怀印绢，得隙交账钱，核发待其便，忽闻呼我名，头颅如中电……踯躅携面归，老妻治晚膳。面恶不成条，粗恶难下咽。无油且少盐，肉亦偶然见。丁此唯怨尤，争奈世界变。”读此可以了然当时对于配售面粉的实在景象。又闻有日本科学家，在沈阳东山里，发明了一种石灰面类，可以掺在面粉内，以代替面粉一样吃用。对于大豆配售同样有名无实，有一次曾见到宣扬配售大豆，及至领到大豆时，细看并无成形的品类，仅为杂碎的各种豆类，还掺混一些碎石块和沙土。原来是些大豆囤底的废品，发给人民，还得用钱去买。

至于配售一般食粮，如前所述为增加出产数量，碾米故意使其粗糙。即如高粱一项，在碾米时，甚至外皮都不去掉。人民购到家中，多半用砖或石磨去外皮，才能煮用。有一名伪满省长，也配售到这种高粱米，曾派人送到碾房去加工去皮，不料被经济警察发现，便向该碾房追究。碾房经理只得供出为伪省长公馆所碾。这位经济警察立刻便向伪省长追询。吓得这个伪省长竟不敢承认，最后经理被警察毒打一顿，并送交法院法办。

据说这些警察，时常把他们所查获的农产物品，全没归私有。这些经济警察的家里，储藏的粮食和面粉却都非常的丰富，除他们自己家里受用，还到外边黑市去贩卖。恰巧经济警察有一天抓住了一个经济犯，便送交到上级日系警官头子讯问，这个经济犯非常狡猾，当警察讯问他时，他便抗言说：我和这个经济警察是邻居，我贩卖的私粮就在这位警察家里买的。不信就请到他的家里去查。当时警官便到这个警察家里一看，果然不差，才把这个经济犯释放了事。独是伪满当局日系高级人员，因何竟任令这些下层机构人员，如此的违法乱纪，毫不过问？推其原因，日本侵略的战争，已经到了最后将要失败关头，也不得不用这群坏蛋作他们走狗，巧用统制经济方法，一面控制东北3000万人民，不敢反满抗日，另一面加紧搜刮大量农产物，企图援救将要垂死的所谓“大东亚圣战”复活。

曾有日本一个中坚人物扬言说，你们满系人，若是造反，我们把配粮账一扣，你们就活不了，全得饿死。不想不久日本全面投降时，饿死的不是东北人，却是日本人，真

是自食其果。这些日系高级人员，只顾迎合日本军阀，挽救战局，加紧搜刮物质，以供日本国的需用要求。他们不顾一切，宠任下级人员们胡作非为，不加过问。“满系”高级汉奸，他们只知顾全个人的权位，只要有官可做，谁还去管老百姓的死活。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也大有人在，我也不愿一一指出，当我写这篇史料时，不禁感慨万分。

（1966 年）

伪四平省“开拓政策”的执行情况

曲秉善*

伪满四平省是在1941年6月①新设立的省，它所管辖的有九县一市，即昌图县、开原县、东丰县、西丰县、海龙县、西安县（今辽源市）、梨树县、双辽县、长岭县和四平市，设立这个省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开拓政策、粮食出荷和劳工供出。伪四平省设立后，伪四平省长徐家桓和伪四平省次长田边秀雄为了适应伪四平省设立的目的，根据伪中央的指示，按伪满“开拓政策”的“第二期五年入植计划”的要求，即制定了伪四平省的开拓计划，决定在梨树县境内东辽河地区的赫尔苏地方修拦洪大坝造水库，在其下游二龙山、老公林子等地方造农地，从日本移来“开拓团”定居在这个地区。这个“开拓计划”决定在第一期中造农地5万公顷，从日本移入“开拓团”1万户计5万人，以后再进行第二期计划。在第一期中决定从1943年开始动工，到1945年将拦洪大坝和水库修完，将农地5万公顷即由日本移入“开拓团”。第二期计划的总工程费为9000万元伪币，由伪满国库开支。关于赫尔苏的水库用地，在伪吉林省通阳县（今伊通县、双阳县）境内有1万多垧土地，必须从农民手中夺取，有500多户居民必须强迫迁移，在伪四平省梨树县境内有1000多垧土地必须从农民手中夺取。关于造农地的用地，其中有5000多垧土地必须从农民手中夺取，其他都是未经利用的东辽河河套子地。他们恐怕这个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和深切痛恨的“开拓计划”发表出去，必然遭到农民的反对，于是他们用东辽河治水的名目来掩盖这个“开拓计划”，称这个“开拓计划”为东辽河治水计划。对外宣传则说：“东辽河连年泛滥，沿岸居民受灾奇重。政府为了根除东辽河水患，拯救沿岸居民，特制定计划修拦洪大坝，造水库，造农地，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伪四平省公署就在这虚伪的名目和虚伪的宣传的掩盖下，进行其“开拓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为了麻痹东辽河地区的居民，伪四平省长徐家桓曾派人和亲身到该地区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

1943年4月伪满国务院发表派我充当伪四平省长，前任伪四平省长徐家桓调充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当时我本想立即去伪四平省公署就任伪省长职务，忽然接到伪四平省公署来电报，叫我晚十几天再去就职，因为徐家桓收买土地的事务没有办完。于是我就暂停去伪四平省公署就职。过了十几天，伪四平省公署派来罗仙樵秘书官和矢部展务股长前来长春接我去伪四平省公署就职。据来人说，“为了进行东辽河地区的开拓计划，必须收买一些土地。徐家桓省长和田边省次长怕在收买土地上出问题，徐家桓省长

---

* 作者曾任伪满四平省省长。

① 伪四平省于1941年7月设立。

曾亲自到东辽河地区数次，对当地居民进行宣传工作，这次是最后的收买土地工作，已经平安无事地收买完了”。我到伪四平省公署就伪省长职务后，伪省次长田边对我进行事务联络时，他着重地对我说明了东辽河治水名目掩盖下的省的“开拓计划”。他谈到收买梨树县境内东辽河地区的土地时说：“我们怕在收买土地上出问题，前徐省长特到现地去过数次，做宣传工作，最后才进行了收买土地工作。共收买了6000垧土地。地价是每垧从30元到60元（当时每垧地的一般买卖价格是从3000元到6000元）。对于收买东辽河地区吉林省通阳县境内的土地是由吉林省公署负责办理的，吉林省长金名世也曾到现地进行过宣传工作和土地收买工作，他们在赫尔苏共收买了1万垧土地并使赫尔苏村的居民500多户迁移。地价同这边一样也是从30元到60元。对于迁移者的房子，每间发给70元作为收买（当时每间房子的一般买卖价格是2000元以上）。水库的位置大部分是在吉林省通阳县境内，赫尔苏的一个村子被淹没了。”田边还对我说：“现在一切准备都已经准备就绪，按照原定计划就要进行动工。”

1943年6月伪四平省省次长换为日本人关口保，前省次长田边转到伪特殊会社充当理事。关口保到伪四平省充当伪省次长后，即与伪中央联络在伪四平省公署成立一个外局，名曰“东辽河开发事务局”。伪省次长关口保兼任这个局长，由伪中央派来十几名日本人负责东辽河地区的工程和与伪开拓总局的事务联络，由伪开拓总局经过日本关东军与日本拓务省联络移入日本“开拓团”。

在1943年的6月里，我发布命令动员省下各县市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叫省下各县市供出劳工到东辽河地区从事奴隶的劳动，在赫尔苏修拦洪大坝造水库，有1万多人在二龙山、老公林子等地造农地，从事这个奴隶劳动的有2万多人。

1943年7月中旬我同伪省次长兼“东辽河开发事务局”局长关口保到梨树县赫尔苏去参加拦洪大坝的起工式，与我同去的还有四平“日本神社”的“神官”，伪协和会四平省本部事务长吉田门一、伪满洲拓殖会社驻在四平的办事人等。起工式是包修拦洪大坝和水库的檀原组准备的。他们在预定修拦洪大坝的河床上，搭起一个一丈多高的台子，上边摆着一张白木桌子，台子的周围扯有系着白纸条的稻草绳。日本“神官”穿上法衣登上台去进行所谓“修拔降神”、“献撰献词”等一套仪式，然后下台将一个木匣交给檀原组的代表人，让他把这个木匣放在修拦洪大坝的最底层。据说匣子里装的是“神”，能保佑大坝坚固长久不坏。在仪式终了后，我同日本人边饮酒边听檀原组的代表人说明工程的梗概和进行的情况。他说：“这是利用天然地势修拦洪大坝造水库灌溉水田。拦洪大坝是要连结辽河南北两旁的山修建起来，水库是利用拦洪大坝上游的地势，只要拦洪大坝修成，水库就自然形成了。因为河床是板石，修拦洪大坝可以不必全部使用洋灰，可以用一部分土石，造价比较低些。现在，在这个工地上劳动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共有1万多人，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将溢洪道开凿好，堵住河的正流，使河水暂由溢洪道流往下游，露出河床以便修拦洪大坝。按工程进行的速度来说是很快的。我们的这个工程是昼夜干的。”我同日本人饮完了酒。檀原组的代表人又领我们去看溢洪道与劳工劳动情况。我看见溢洪道是从东边的一个山腰开凿到西边的山脚下，是由开凿岩石而修成的。劳工们在日本监工的严厉督促下，用粗笨的锹镐挖土刨石，用土篮挑土运石，累得他们各个大汗淋漓。

1944 年 6 月我到东辽河地区造农地的工地去视察。这个工地是从赫尔苏沿东辽河的南岸，经过二龙山到老公林子一带有 40 多里长。我用 4 天的时间看完这块工地，有的地方是农地，有的地方是居住区。二龙山和老公林子的许多农民住宅，被日本人占据了，使用这些房子的是日本人包工的、“东辽河开发事务局”的办事人、“满洲拓殖会社”的出张人等等。在这块工地从事奴隶劳动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有 2 万多人，有的在挖掘大小沟渠，有的在造农地，有的在修道路，有的在架桥梁。我为了督促这些劳动人民多多劳动，为日本“开拓团”早日修完这个工程，我叫他们分别地集合在一个适当地点，我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们讲话，我欺骗和麻痹这些劳动人民说：“东辽河年年为患，沿岸居民受灾奇重，经过这次治水工作，不仅使水患永远消失，而且向来不能利用的土地都变成良田，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工程。你们担当这样重大意义工程的劳动是很光荣的。你们要了解这个工程的重大意义，要努力积极劳动，尽快完成这个工程。”我在各处都看了“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的劳动实际情况和他们的生活实际情况。我看见这些劳动人民都是在早晨天刚亮就出去劳动，挖土、平地、挑土、架桥、修沟渠、修道路等等，大黑才收工，平均每天做十三四小时的繁重劳动，劳动中有日本监工站在旁边监视，强迫他们每天必须挖 4 立方米以上的土方，他们如有做错了或者是做少了、做慢了，就要遭到日本监工的辱骂或者殴打。这些劳工都光着脊梁劳动，皮肤黑黝黝的，好像在强烈的阳光下晒裂的地皮一样，两个肩膀都是红肿隆起，每人都是身体削瘦，累得满身是汗呼呼地气喘。劳工们住的是用席子搭的地窝棚，睡在潮湿的土地上，在住处的四周都挖有又深又宽的壕沟，夜晚有人持棒监视，不许他们出入。吃的是一天三次吃不饱的饭，每顿只给一个小的苞米面饼子或者是只给一小碗高粱米稀粥，经常不给菜吃，仅有少时给一小碗无油少盐的白菜汤。劳工患病也没有医药，又不许他们回家治病。有时据说来了医生，而那不是医生，乃是医科学校没有毕业的学生来实习，拿他们做实习对象。我所到之处都有病人躺在秫秸洞里呻吟。我还听见在这些劳动人民之间，流传着“五死”的话：“活重累死，日头晒死，下雨淋死，不饱饿死，有病病死。”

1944 年 8 月，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来四平，要到梨树县东辽河地区“视察”给日本“开拓团”造农地的工程。我同伪省次长关口保领他到梨树县小城子附近的工地去“视察”。首先叫他检阅“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在检阅地点集合有一万多名“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用席子搭起一个检阅台。当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登上检阅台后，那一万多名劳动人民就列队从检阅台前通过，向张景惠行注目礼，张景惠举手还礼。据说在这事前，工地负责人接到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要来“视察”和“检阅”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的通知后，就每天叫“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练习排队、练行走、练习行注目礼，闹得不宁。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检阅“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后，我领他去看“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修沟渠和造农地的情况，先由工地的负责人向他说明工程的大致梗概，继之我使他看这些劳动人民一锹又一锹地挖土，一土篮又一土篮地挑土。这时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秘书官松本益雄他为了显示自己给“国民勤劳奉公队”队员看，遂逞能地接过一位二十多岁青年将要挑起两土篮土的扁担，放在自己的肩上，用力挑了两次都没有挑起来，最后又用力挑才把土篮挑起走了两

步，左右摇晃几乎跌倒，忙将扁担放在地上说：“他们挑的真重呀！”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在“视察”完毕后对我说：“在时局下，对于开拓政策的遂行非常重要，要尽快完成这个工程，使日本开拓团早日进来”。

1944年9月，赫尔苏的拦洪大坝修成了。遂在梨树县小城子附近的工地上搭起席棚举行东辽河拦洪大坝落成式，伪中央各机关和伪省公署以及其他有关机关一共来了100多人。在举行典礼时，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代表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读“训词”。“训词”里说：“在时局下开拓政策的遂行对于粮食的确保，对于满洲国国防的巩固都极为重要。现在东辽河地区的开拓计划、拦洪大坝的工程已经告竣，今后应极力进行农地的造成工程，使开拓团能早日从日本进来是为至要。”典礼完毕后，饮酒开宴表示庆祝。这时还使“国民勤劳奉公队队员”表演节目助兴。

1945年6月我又到梨树县东辽河地区造农地的工地去“视察”。这时在这个工地上从事奴隶劳动的“国民勤劳奉公队”和劳工共有二万五千人。我和去年一样从工地的西头一直看到东头。关于那些劳动人民遭受沉重的奴役和严重的虐待情况与去年所看见的情况完全相同。关于工程的面貌，则与去年完全不同了，大小沟渠都已经掘完修好，所有桥梁道路都已经架完修好，5万公顷农地接近造成，只有居住区的房屋尚没有动手修盖，那是等日本“开拓团”的先遣队进来后，就着手修盖。

1945年8月在东北光复前，日本“开拓团”的先遣队有100多人侵入伪四平省梨树县东辽河地区，为日本“开拓团”的继续侵入从事各种准备和修建工作。由于日本战败，日本“开拓团”未能按其预定侵入我国东辽河地区。伪四平省在执行其“开拓计划”期间，共夺去农民的土地1.6万垧，迫使500多户居民迁移，有约9万劳动人民被强迫从事沉重的奴隶劳动和遭受残酷的虐待，其中有2%以上惨遭伤亡，用去人民的金钱9000万元和大量的各种物资，还强征农民的车马运送物资，计征用了大车1800多辆、马4500多匹，车马的损失在15%以上。伪四平省关于“开拓政策”的执行给人民带来灾难和损失，真是万分严重和极其巨大的。

（1962年）

伪东安、间岛省的日本移民

岐部与平*

“开拓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最坏的罪行。伪满政府成立同时，关东军就实行了“移民开拓政策”，原定计划每年移入日本人20万人，在20年内迁入500万人，预计20年后全东北人口可增加为5000万，这500万日本人就成为伪满“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以此达到长期统治东北的目的。这一任务的实施，是由伪满开拓总局与满洲开拓公社、省公署共同实行。省负责准备土地与修建开拓道路，在准备土地当中除了划分荒地外，就是强制收买中国农民的熟地，强占他们的房屋，撵他们移到别的地方。这一政策在我到任伪省长以前就已经实行了。在我到任以后，伪东安省密山县就移来6个“开拓团”，林口1个，虎林1个，宝清5个，总计有14个“开拓团”移入东安省，合计起来有650多户，占用土地有6500公顷，山林有6500顷。在这些土地中，掠夺中国农民的耕田有620余公垧，占用房屋100余间。我是根据移民团的户数和当时的情况而计算出来的，可以说是接近实际的。另外，在勃利也有“开拓团”，它是1941年7月编入东安省，我于同年10月生病休养，所以，具体情况不了解。其次，在伪间岛省，1942年9月到1944年3月我任职期间，“开拓团”的迁入数是珲春县1个，汪清县1个，安图县2个。这些“开拓团”都是先遣队，共计有120余户，550余人。他们被迁到无人地带，在这些荒地中有一些小块耕地被强制掠夺了，“开拓团”总计占用土地1200公顷，其中包括被掠夺来的农民的熟地有180公顷，占用房屋33处，被驱逐的农民约60户计300人。随着移民团的迁入，省内修建了一些开拓道路，就地征发了中国人民的劳役，来完成这一工作。

---

* 作者曾任伪满东安省省长，亦在伪间岛省任过职。

日本怎样在东北执行移民计划

黄 富 俊*

一、伪满前日本对东北土地垂涎的野心和机构的建立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南满铁路经营权利，在大连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1907 年开业对中国东北大陆积极推行政治经济侵略政策，同时对东北广阔平原的土地也有垂涎的野心。为了实现这种野心，特于 1913 年由“满铁”和日本内地财阀出资在沈阳“满铁”附属地设立东洋拓殖会社（以下简称“东拓会社”），以后又在铁路沿线各大站陆续设立支社和出张所。会社的业务主要是对中国人实行以土地作抵押的金票贷款，由会社利用当地的汉奸作引线拉拢有大宗土地需要借款的人或由地主拿出地照，经汉奸向会社介绍，双方成立契约，以六厘或八厘的利息借出长期或短期的金票贷款。日本人采取这种贷款方式是因当时对东北人民的土地并无买卖的权利，所以他先由借款入手，把人民的地照骗取到手，等到借款的人无力偿还时，即将抵押的土地收归会社所有，这就是他们的阴谋目的。但是“东拓会社”设立将 20 年，贷出的款项已有相当数目，而对没收土地迄未实现，原因是无力偿还借款的人虽愿意交出地照，但会社不能向中国政府请求更名，仍不能取得所有权。其次是农民不愿与日本人打交道，如果土地由会社没收，他们自己无法经营，若想租给农民，那是绝对无人种。因此在“九一八”以前的几年里，日方对此曾经感到束手无策，会社的业务日趋向停顿状态，直到 1932 年伪满政府成立，日本才实现了多年的欲望。

我多年的同事刘秉璋（以前在奉天财政厅，以后在伪满民政部），他家住开原县尚阳堡，在西安县（今辽源市）境内有土地千垧，经他父亲在 1914 年由开原县孙家台“满铁”车站“东拓支社”，用地抵押借金票 3 万元，每年六厘利息，头一年到期去会社交利，会社说利钱不用交，还本时一齐算好了，他父亲还认为这是便宜事，以后经过十七八年，他的父亲已死去，会社还未向他家问过一次，而土地仍由刘家照旧吃租。直到 1932 年秋，“东拓会社”首先在伪满政府取得土地商租权，而开原县“满铁”车站的“东拓支社”才派人到伪民政部拿着原定的贷款契约和由会社预备好的商租契约找刘秉璋，说明这项贷款截至现在连本带利共合金票 6.8 万余元，如愿还款即请如数交出，如果不能还款即请在商租契约签字，交出原押土地归会社所有。刘秉璋因无力偿还如此巨额贷款只好放弃了祖业，在商租契约上签字，以后刘秉璋向我谈到此事的经过，我问他商租无期限吗？他说日本人所谓商租就是买卖，哪有期限。由此证明日本早就垂

---

* 作者曾任伪满兴农部大臣。

涎东北土地。

二、关东军在伪满建立的各种执行机关

1934年，关东军为了推行日本“开拓政策”，特在伪满民政部设立拓政司，由日本拓务省科长森重政男任司长。拓政司的任务是一面用行政力量协助“东拓会社”“购买”人民的土地，一面调查南北满已耕地和未耕地的面积以及土壤肥瘠的状况，以为将来实行大量移民作准备。

1937年6月，关东军为了让“东拓会社”在伪满取得合法地位，为了使伪满政府承认“东拓会社”在东北有购买土地和经营土地的权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与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签署一项协定，成立：“满洲拓植会社”（东拓会社化身，以下简称“满拓会社”），资本日金300万元，由日“满”政府分担，会社事务完全由日本人担任。会社的业务除经营“东拓会社”没收中国人的土地以外，并可在南北满自由购买熟地，由日本内地移民来耕种。

1937年7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公开宣布对伪满实行“开拓政策”，制定出20年向东北移民500万计划。关东军根据这一罪恶的阴谋策划，于同年8月组成日“满开拓委员会”，并在伪满设立“开拓总局”。“开拓委员会”是担当开拓移民事务的决定和监督执行的主管机关。开拓总局是在“开拓委员会”直接指导监督下担当开拓移民事务的执行机关。“开拓委员会”组织成员为（日方）关东军参谋长任委员长，“大使馆”参事官、关东局长、“满铁”总裁、日满拓植会社理事长任委员；（伪满方）国务院总务长官、经济部大臣、兴农部大臣、外交部大臣、新京特别市市长任委员。委员会以下设有干事会，干事会的成员为：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任干事长，总务厅企划处长、主计处长、兴农部次长、经济部次长、开拓总局长、关东军主管参谋任干事（干事会没有中国人参加）。“开拓委员会”成立，首先制定出开拓移民事务“实施要纲”，交给“开拓总局”按照要纲项目，例如收买土地和对移民种种设施等等，做出每年实施详细计划提交“开拓委员会”，通过“开拓委员会”审查决定，再由“开拓总局”遵照执行。日本殖民当局就是这样拿自己决定的要纲，代替伪满法令（凡关于开拓事务法令一概不经过伪国务会议决定），霸占东北人民大量的土地。

三、“日满开拓委员会”开会的实际情况

1943年8月，我任伪满兴农部大臣时，在日本军人会馆出席过“开拓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名忘记）、日本大使馆参事官谷正之、关东局长官三浦、“满铁”总裁大村卓夫、“满拓会社”总裁斋藤、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伪外交部大臣（缺席）、伪新京特别市长张联文，关东军参谋长笠原作主席。会议开始，首先由开拓总局长五十子作报告，一部分是报告1942年7月到1943年6月底“开拓总局”执行开拓移民事务的结果；一部分是报告1943年7月到1944年6月底“开拓总局”拟定的开拓移民事务计划。报告完了，笠原即站起来说，

开拓总局长所报告的两种文件，已经干事会做过详细审查，对过去执行的成果和预定今后进行的计划，均认为很满意，大家如果没有意见即通过。当时出席的日本人均表示没有意见，我对报告的内容，因会议席上不做中文翻译完全听不懂，见伪经济部阮振铎不懂装懂，也说没有意见。笠原随宣布报告经各委员一致表决，并勉励“开拓总局”长对今后计划要好好认真执行，会议就是这样简单结束。第二天上班后“开拓总局”文书科长拿着一项签字文件到办公室，让我签字，并说这是完成昨天委员会通过表决报告文件的手续，我看笠原参谋长和日本委员都签了字，我也签字。他又拿出一个信封内装伪满币 100 元，我问他这是什么钱，他说这是昨天大臣出席“开拓委员会”的车马费，每年照例均有请收下吧。以上是我出席委员会亲身经历的实际情景。从这里清楚看出“日满开拓委员会”开会，仅是走形式，拿汉奸大臣、市长作欺骗人民的招牌，实际开拓移民事务完全在关东军支配下，由干事会当权的日本人一手包办。

四、“开拓总局”强力霸占东北人民大宗土地

“开拓总局”于 1937 年 8 月成立，初任局长是由伪滨江省次长结城清太郎转任，开拓总局成立后根据“日满开拓委员会”制定的“开拓要纲”，伪首先拟出收买北满土地计划通过“开拓委员会”决定。由 1938 年春，开始着手在吉林、牡丹江、三江、东安、北安、黑河、龙江、滨江各省区收买大片荒地，中间也加杂一部分熟地，收买的价格荒地每垧定 1 元，熟地每垧土地由 20 元到 40 元，截至 1939 年 8 月大部收买完毕，仅剩龙江南部 11 县，因发生诺门罕战争未能收买。1939 年 10 月，我由伪安东省长转任伪龙江省长，这时诺门罕战争已经结束，“开拓总局”土地处长（日本人，姓名忘记）即于 11 月中旬来到伪龙江省署开会，宣布要继续收买南部各县土地，要求省里通知各县协助。当时伪省次长多田和警务厅长神子敏雄都表示现在诺门罕战事才结束，地方人民尚未安全，这时即着手收买土地恐怕对治安有影响，不如缓解。土地处长听到省方意见不能做出决定，即回长春。隔了一天，“开拓总局”长结城匆匆赶到龙江，在伪省署开会宣布收买土地是关东军决定的政策，期限紧迫不能延缓，地方治安如果发生问题，“中央”完全负责，省方不必顾虑，现在局里收买人员已经准备好待命出发，省署赶紧通知各县好了。省方参加会议的人看到他的来意很坚决无法再加阻挠。这时次长多田看着我让我答复，我说“中央”既负完全责任，省里无意见，即照局长的意旨通令各县协助办理，不过龙江南部各县开发较早，民户较多希望少买熟地，以免人心动摇，结诚答应在可能范围内绝对避免买熟地。经过这次决定，“开拓总局”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把龙江南部 11 县土地共收买 400 万垧（其中包括熟地两万多垧）。由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开拓总局”在北满各省收买荒熟土地 3000 万垧的计划任务。

日本采取什么方法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霸占了北满全部这样多的荒熟土地呢？根据我所经历的龙江省实例做下列说明。

“开拓总局”“收买”土地的方法是：按照地图所列载的土地面积，根据调查划分出荒地区域和熟地区域，凡是荒地区域或中间包括少数熟地，均指定为“收买区域”，“开拓总局”派人到各县去“收买”时就拿着标志好的地图，让县里召集全县村长到县

开会，由开拓总局的人员，在会场上向各村长宣布，凡地图内指定的“收买区域”荒熟土地，均责成各村长通知土地所有人在一个月内向村公所交出地照，由村交送到县，定期发价。如果逾期不交地照，即由警察到土地所有者家里督催或押追，到三个月后尚未交出地照的土地，即认为是土地所有者弃权，按土地无偿没收。日伪当局用这样低微的代价和强迫的手段，名为“收买”，实际是抢夺霸占。

日伪在北满采取这种残暴措施，给北满农民造成巨大损失和沉痛灾难，有的含泪交出地照，有的经过警察关押不得已交出地照，有的赌气抛弃所有权，不交照也不领价，甚至把地照贴在树上，全家搬走，也有认为生活无路悲愤自尽，有的不甘心放弃产权，背井离乡逃避在外，这种悲惨情况，当时人所尽知，只是不敢公开暴露。举出一个实例：1942 年 11 月我任伪兴农部大臣，经过半月以后在伪国务总理官邸开完国务会议时，伪总理张景惠向我说，有三江省桦川县五家农民到家里向我恳切哀求说：他们是由 1939 年春，因开拓总局把他们的大量荒熟土地划入收买区域，警察强迫勒令交照，逃到长春躲避，现在住了三年多，回去怕官治罪，不回去川资用尽，无法生活等等。要求设法救济，请你替他们想想法子吧。第二天，我到部里把伪总理说的这番话向伪次长稻垣征夫商议，让他同“开拓总局”接洽，以后稻垣答复已和“开拓总局”说好，他们的土地本来已经由局没收，现在姑念他们长期飘流在外，准予从宽，让他们回县交照，补领价款，不加惩罚。由伪总理转达这五人，听到这种消息，如同得到特赦一样，才敢安心回家。

五、日本对移民分布计划准备的条款和所得的结果

日本向伪满北部移民是由 1939 年春开始着手实行的，关东军根据日本政府原订 20 年移民 500 万计划，分成四期执行，每期定为五年，每年移民 25 万人。移民分布的地域主要分出三个重点，一是围绕苏“满国”境后方，目的是为防御苏联；二是选择山林要冲，目的是为消灭抗日武装力量；三是临近工矿地域，目的是为保护军事生产。

日本移民分下列两种，一种是由退伍军人和青年团体选拔出来的，既武装集体移民。这种移民平日一面从事农业劳动，一面实施军事训练，无事为农民，有事即复为军人；另一种是由农村中选拔出来的农民，携带家眷，到东北从事农业。每户由日本政府补助迁移费 500 元，到东北后，由开拓总局贷给每户开垦费伪满币 500 元，无利息，五年后分五年陆续偿还。“开拓民”需用的土地，每一户规定为五垧，三年内不收租税，三年以后按照各农户经济情况，把土地照收买原价拨交各民户，归他们自己所有再照章交税。另外还由开拓总局按照每一个部落住民户多少，拨分给一定的牧养地，作为部落里公有公用，不收价款。“开拓民”的部落和房屋的建设，由“开拓总局”拨款，责成省县预备材料、选择地址、设计修建，暂时作为“开拓总局”的财产租给民户占用，将来“开拓民”经济充裕时，再行作价，拨归民户自有。至于武装集体移民所需的费用，日“满”双方如何负担，应用的土地如何分配，我记不清楚。

是日本对于移民做出这样周密计划和优越条款，满想从此达成其吞并东北大陆的多个妄想，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计划竟未能完成实现。原因是日本的统治阶级在

1939年开始向东北大量移民的时候，虽然在日本掀起了全国运动对城乡人民开展普遍宣传，说什么“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东北有大量广阔平原、肥沃土地专待日本去开发，政府对开拓民不但有大力的援助，并且能保障其富裕生活等等，而日本农村中，真正安分守己的善良农民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环境，不愿离开自己国土，没有侵略别人国家土地的野心，很少有人应募愿意报名参加的，只有农村中少数游手好闲者他们贪图日“满”政府补助费和贷款，眼前能够得到愉快生活。另外还有一部人，因为和在东北军政机关任职的人有亲属关系，平日受这些人传染，妄想依靠这些人势力转换自己的环境，趁机谋取特别利益。这两种人到东北可以说都不是想用自己的劳动开发土地，而是别有用心妄想从中找便宜。至于集体武装移民，无论城市和乡村中的日本青年和退休军人都清楚认识到，去东北当“开拓民”实际等于前线出征一样，谁都不愿意参加，所来的人多半是军阀用强迫手段征集，并非自愿。因此，日本虽规定了每年移民25万的计划，实际由1939年到1945年垮台的六年期间里，移到东北的两种“开拓民”总计尚不到10万人（应为32万），这对原计划的三项移民重点完全落空。

日本自1942年掀起太平洋战争，海上运输力就感到异常薄弱。在这个时期，日本拓务省虽在农村募集了一部分“开拓民”，同时伪满为了响应日本内地需要大米，特征募大量劳工，在四平省东辽河流域（梨树县境）、吉林省松花江流域（郭尔罗斯前旗）替日本人修筑好水利工程，并在这两个区域霸占人民10余万垧土地，为日本人准备好作开阔稻田之用，专待日本“开拓民”来耕种，但是日本没有船，不能把募集好的“开拓民”运送到东北来，致使日本军政首脑干着急，不能达成其需要大米的愿望，这就是日本移民计划所得到的结果。

日本移到东北的“开拓民”，在各种优越条件下所做的成绩怎么样？一、日本移到东北的“开拓民”名为开垦荒地，实际“开拓总局”为移民谋便利发给开拓民的土地完全是熟地。“开拓民”耕种的方法大致每五户结合在一起，搭成一付犁杖同种、同铲，秋后个人地里生长的庄稼，由自己收割归自己所有。但是“开拓民”每户领到手的熟地五垧，至多种一半，其余一半完全撂荒，所能种上的土地因为“开拓民”没有劳动积极性，懈弛铲蹚不及时，侍弄管理能力不够，草苗一齐长，秋后收获的粮食多数不够自己的消费，同时把原领的好熟地，也变成了半撂荒地。二、最初，主管开拓事务的日本人尚借口日本农民对耕种旱田不习惯，以后关东军看到各开拓团耕种土地的不利情况，一再督促主管开拓事务机关设法整顿。经“开拓局”同各省开拓厅的农业专家按照北满的天时气候和东北农民耕作的方法，制订出各种规章制度，督励“开拓民”认真执行，但是实际“开拓民”所种的土地荒漠情况，一直继续到“八一五”日本投降，并未改变。至于武装移民所种的土地亦和“开拓民”一样，所不同的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北满驻军陆续调往南方，北边防务责成武装移民担任，因而把所种的土地完全撂荒。三、开拓总局原订拨给“开拓民”的土地，三年后照原价归“开拓民”自己所有，“开拓民”所住的房屋，五年后也作价归“开拓民”自有，但是因为“开拓民”没有交付价款的经济能力，并无一户实行。伪满自1940年实行“粮谷统制”，每年农民均担负一定的“出荷”数量，“开拓民”也在内，但“开拓民”所种的土地因产量低，自己吃的尚不够，并无一家“出荷”。1943年我任伪兴农部大臣时，曾向伪次

长要求到北满“开拓团”去看看，他对我说，日本移民到东北有五六年的时间，但对土地经营并未做出成绩，现在驻北满的日本军人和北满的原住农民，有一个共同的评论：哪块地草苗一齐长，那块地就是开拓民所种的地。这种评论谅大臣早已知道，我自己深感有责任，大臣不用去看吧。

六、日本移民政策给东北农民带来的灾难

日本移民把北满各省未耕种的土地全部霸占，其中还霸占了农民百余万垧熟地。在“开拓民”未来以前，所占的熟地由“开拓总局”租给原业主耕种，这样就使被霸占土地的农民由业主变成佃户，“开拓民”预备来到东北，“开拓总局”事前即撵原业主搬家把土地拨给“开拓民”耕种，农民当时就变成破产无家可归的流民户。从 1939 年至 1942 年这四年的时间里，“开拓总局”根据日本政府预定移民人年数，撵走农民和准备土地，可是实际来到东北的“开拓民”人数，每年比预定的人数相差均有十倍以上。这样一方面把所留的土地大部分变成撂荒地，另一方面徒使被撵走的农民遭受流亡的灾难。

1943 年 3 月，我任伪兴农部大臣时，到三江省参加该省召集农民开垦“开拓民”放弃的撂荒地座谈会期间，伪三江省长孙柏芳到旅馆闲谈，我问他日本“开拓民”与附近住的中国农民感情怎样，他说日本“开拓民”人人都抱着大和民族优越感，表面说亲善，实际是压迫掠夺，日本“开拓民”向来自己不种蔬菜，专赖附近农民供给，不但不给钱，而且对质量还任意挑剔。农民地里的苞米和土豆子到将成熟的时候，他们随便到地里取用，特别是在农忙时期，农民在自己地里铲蹚劳动，有时“开拓民”竟借口他们的人力畜力不够，强迫农民到他们地里去帮工，到吃饭的时候，让农民回到自己家里去吃饭。甚至有“开拓民”把自己耕种的半撂荒地到第二年强行与附近农民换种。这些种种事实，受害农民也有向县里请求过，而各县的主事的日本人，口头答应禁止，其实是放任不管。因此，附近的农户，有能找生活出路的人家多半搬走，找不着生活出路的人家，只好忍气吞声，甘受压迫掠夺。一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日本“开拓民”全部变成逃亡的俘虏，东北农民才得摆脱多年的沉痛苦难，收复了被霸占的土地，重见天日。

（1962 年）

日本“开拓团”和移民的实况

谷 次 亨*

日本在东北的移民，其沿革可分为下列几个时期和几种方式。

第一个时期的移民方式（1911—1933 年）

光绪二十年公元 1894 年甲午战争（中日战争）以后，朝鲜失去了中国的保护，日本逐渐施其侵略魔手，又经过日俄战争，于 1911 年日本侵吞了朝鲜，掠夺朝鲜农民的大批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给移植朝鲜的日本农民所有。

（1）所谓“日本国籍的鲜农”移民的方式

被掠夺了土地的朝鲜农民，在日本武装力量的逼迫和掩护下，来到了中国东北的延吉一带，即吉林省延吉道的管辖内，侵占中国人民的土地，并归其所有耕种，或者把中国人民的土地，名义上是租赁，实质是逐渐不交租，却把土地归己所有。甲午战败后的中国政府，对于日本这种侵占蚕食中国人民土地的行经，不敢过问。日本把这些侵略强占了中国人民土地的朝鲜农民，叫着“日本移民”，以此为借口，来“保护”这些“日本移民”的安居和发展。离延吉不远的“龙井村”，日本还特设了具备武装力量的日本总领事馆。总领事馆的直属下，有警察队和警察署，这些组织，就是变相的武装部队。如果中国方面有阻止“日籍”朝鲜农民侵占中国人民土地的动作，他们便强行无理干涉。

日本人的这种行为，决不是为了维护朝鲜农民的利益，而是在“保护”朝鲜农民的幌子下，驱使朝鲜农民做牛做马，以遂日本侵略中国之野心。日本以逐渐蚕食的政策强行侵占中国延吉道管辖下的珲春、和龙、汪清、延吉等县，并把它称为“间岛”，把这些地方在地图上画成日本的版图。

自日本侵吞朝鲜后，就逼迫朝鲜农民越境占领“间岛”一带的地方，以后扩展到延吉所管辖下一些地方，强占中国人民土地的朝鲜农民更多。为了实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它千方百计巧使欺骗，或以威胁手段逼迫朝鲜农民为它作强占中国人民土地的工具。

这种行为，不仅在延吉道一带实行，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又扩展到东边道和吉林省一带。如 1931 年在吉林省长春县的“万宝山”地方，日本帝国主义使用各种手段迫使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

在“万宝山”的朝鲜农民，不仅抢占了中国人民的土地，而且又在邻居的中国人的土地里挖水沟灌溉他们侵占来的水田。中国方面过问时，日方就发动武装力量来干涉，因而引起了所谓“万宝山”事件，这就是日本所谓保护它的移民的“正当防卫”的手段，也是日本为其“移民”掠夺土地的一种方式。

（2）以低利息放借贷，引诱中国人用土地做抵押的掠夺土地方式

日俄战争后，日本企图在与南满铁路沿线相联接的大平原上取得土质肥沃的土地，作为在南满沿线的移民用地。因此，1913 年日本政府拓务省命令其所直辖的在东京的“东洋拓植株式会社总社”，在奉天附属地内，设置了一个大规模的资金雄厚的所谓“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奉天支店”（略称为“东拓银行”），在开原、铁岭、辽阳都有它的出张所，表面上看不过是个金融企业，其实质，主要是以年利 6 厘乃 5 厘半的最低的利息为钓饵，来引诱中国方面的大、中地主，实行以土地为抵押的无定期的贷款政策，是执行日本掠夺土地阴谋诡计的机构。

例如：在 1928 年我所知道的奉天省东丰县电话局长陈文东，以其 200 垧好地，经奉天东拓银行的汉奸所谓华经理的拉拢，以年利 6 厘的行息，借了 2 万元金票，“九一八”事变的那年年底，陈文东拿本利到奉天交款时，该行当事者说，现在不能接受这笔款，等到政府有令之后再通知，土地还得抵押。1934 年，该行根据其政府命令，通知一切贷款的本利必须同时收回，如有交不上的，将其抵押的土地变为商租，永远归该行所有。这个时候，陈文东措手不及，卖地无人买，并且本利滚的很多，只得任凭其处分，祖业的遗产就这样被“东拓”侵吞去。

在与南满铁路沿线相接联的远近地方，如此被该行的这种阴谋诡计所欺骗的中国人民土地，是无法估计的。

第二个时期的移民用地掠夺方式及其经营管理的系统（1933—1937 年）

在伪满政权成立后的第二年，即 1933 年春，关东军为了实现日本国内各方面的主张和所谓军部的方针（即日本陆军的方针，关东军是其代表者），在伪满实行掠夺，中国农民土地据为己有。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1944 年任日本首相），根据日本国内的主张和陆军的方针，制定一个所谓“满洲移民计划”，其内容是公开他“收买”满洲的大批土地和南满铁路沿线 20 里以内的全部土地，作为日本移民用地。他携带这个计划，“访问”了当时的伪满政权各伪部的负责人。伪满政权没有人敢反对，小矶国昭认为，得到了“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即以此作为日本在“满洲国”实行移民政策的“法律根据”，同时就把这个“满洲移民计划”向日本方面非公开的发表了。

在发表计划的同时，命令关东军参谋东宫铁男开始实行军部的移民方针。

（1）关东军经营管理的“武装移民”

1934年东宫铁男携带关东军的移民计划，到达了伪三江省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命令当地的日本联队长饭冢某大佐，用武力强迫土龙山一带的农民让出土地交出地照，激怒了当地农民，以谢文东为首，群起反对日本的收买土地政策，武力反抗被镇压，土地尽被掠夺，日本殖民当局把这次移民称作“第一次武装移民”。

1935年初，关东军又以武力，在伪三江省桦川县的湖南营，掠夺了一批土地，把湖南营改称为日本的地名叫“千振”。日本称这次移民为“第二次武装移民”。这是日本军部在满大批掠夺农民土地的一个起端。前述这些地方的移民和其管理者（“开拓团团长”）主要是退伍的携眷的后备军人，并且该移民直属于关东军管辖，第一次武装移民的永丰镇“开拓团”团长，是关东军所属部队退伍的陆军中佐加藤某；第二次武装移民的千振“开拓团”团长，是关东军所属部门退伍的陆军佐吉良某，都是关东军任命的。

（2）日本拓务省经营管理的“自由移民”

在日本军部以外的方面，根据日本国内各方面的主张，在满洲执行日本一般移民的行政机关是日本政府拓务省。该省根据关东军制定的“满洲移民计划”，于1933年年底，在关东军司令部，以该省的会计课长小何正义为首脑，设置了所谓“拓务省满洲开拓事务所”，办理日本人移民的业务。

（3）朝鲜总督府经营管理的“朝鲜农自由移民”

在日本军部的另一方面，朝鲜总督府为了把朝鲜境内的朝鲜农民送到满洲做移民，也根据“满洲移民计划”，也是在1933年年底，在关东军司令部，以该总督府的商工课长堂禾某为首脑，设置了所谓“朝鲜总督府满洲出张所”，专办朝鲜农民移民的业务。

（4）拓务省和朝鲜总督府的两个系统，掠夺土地的过程以及产生的悲惨情况

该两个系统为了掠夺移民用地，从1934年初，在伪民政部内，设置了所谓拓政司，以日本拓务省警务课长出身的森重政男为该司司长，在其下边设置了土地科和管理科，朝鲜族的尹相弼（日本陆军退伍少佐）为土地科长，土地科的任务是专门调查北满各县的土质的好坏和面积情况，供其选择自由掠夺；田中某为管理科长，管理科的任务是帮助前述两个系统的人员进行土地掠夺，在移民未到来以前，掠夺到的土地由该科负责管理。

该拓政司从1934年成立以来，直到1937年，受拓务省满洲开拓事务所的委托，在伪三江省的依兰、富锦和其他地方，掠夺了相当数目的农民土地；受“朝鲜总督府满洲出张所”的委托，在伪吉林省和伪滨江省等地，掠夺了相当数目的农民土地。掠夺的办法是：完全是按着日本单方面的自由选择的决定，丝毫不顾忌农民的生活情况，交地价逼迫农民搬家，搬晚了即命令警宪扣押。

例如：一家有8口人，只依靠十几垧土地维持生活，而日本人所给的地价，不过市

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北满最好的熟地，在当时的市价，每垧不过 60 元左右，如按着三分之一的价格，每垧不过 20 元，10 垧的地价不过 200 元，这 200 元不够一家 8 口人半年的生活，怎么能生活下去呢？因而造成了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上吊的、投井的、一家自杀的悲惨情况，充满了东北，其中为谋生活奔往华北方面的人不在少数。

（5）日伪官吏和社员，打着日本向满洲实行移民的幌子，利用其地位或职权，掠夺农民土地为其私有土地财产而进行的“自由移民”

伪满政权成立的同时，在各伪县的政府机构里，有逐渐进入的日本伪官吏，即所谓县参事官、县伪警务指导官，这些日本人经常是注意着本县什么地方土地好，什么地方不好。

1933 年关东军小矶参谋长发表了“满洲移民计划”后，这些日伪官吏，打着推行满洲移民计划即满洲国国策的幌子，花言巧语的愚弄农民，或以威胁手段强迫农民把土地“让”给日本人。被掠夺的土地，在南满方面土质好的平原县，每县至少有数千垧以上。

例如：在奉天省复县的岚崮河两岸的好地，就被曾在该县当过县参事官的荒川某，用他的化名，一个人就掠夺了五六百垧。他的掠夺方式还较“温和”些，因为当时不逼迫搬家，仍然让原地农民耕种。在中满方面，日本人不仅掠夺土地，还逼迫农民搬家。

例如：伪四平省梨树县内，在该县参事官和伪警务指导官指导下，组织一个由几人组成的小团体，在他们的掩护下，一次就掠夺了 6000 多垧熟地，并逼迫农民搬家，农民结成团体到长春伪国务院向张景惠请愿，后来日本人害怕激起农民暴动，没有派伪警、伪宪拘捕，幸而得免。

在伪满政府中央各伪部门的日本高级伪官吏和特殊会社的高级干部也大肆利用他们的地位或职权，以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大量土地（熟地），作为其自己的私有土地财产。

仅我所知道的，例如：伪经济部金融司长田中恭某（后转任满洲重工业会社理事），在长春近处的范家屯附近，掠夺了 500 多垧熟地。

再如：伪总理张景惠的秘书官松本益雄，在长春就占有 800 多垧熟地。

又如：伪特殊会社满洲矿山开发株式会社理事长竹内德亥一个人在长春近郊就掠夺了两块好地共有八百多垧。

即在 1940 年后来的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以其名，在奉天省清原县内，掠夺了森林地一百多垧。

这些日伪官吏和社员，掠夺中国农民的土地，不仅是为了实行“移民政策”，还借机中饱私囊。

上述行为，在伪中央和伪地方的各种行政部门和其他方面，比比皆是。这些日本人都是根据关东军制定的所谓的“满洲移民计划”，打着日本移民的幌子，从 1933 年底起直到 1937 年初，以各种方式“自由”进行掠夺，日本称它为“自由移民”用地。

由于关东军制定并推行所谓"满洲移民计划"，把东北中国农民的生活保障的土地，变为日本人个人或几个人的小团体所私有，因而造成了东北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其中有向所谓官府请求中止这种掠夺土地的农民，即遭到宪兵、警察的扣押，因而投井的、上吊的、一家自杀的悲惨情况到处可见，其中奔向华北方面谋生者也不在少数。

（6）所谓"日满拓植株式会社"（包括"满鲜拓植株式会社"在内）的产生

1935年关东军新任司令官南次郎，根据日本二位一体的新制度，以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代表其政府和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签订了一项所谓协定，成立了所谓"日满拓植株式会社"，其中包括一个"满鲜拓植会社"（因为朝鲜是"日本领土"的关系，不能独立和"满洲国"签订协定），在表面上，是日"满"双方合资的形式（300万金票），其实际，完全是日本方面一手掌握和主持。

所谓"日满拓植株式会社"，即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奉天附属地的原"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奉天分店"的变身。它的业务内容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奉天东拓支店时代以"商租"的名义，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没收中国人的抵押土地，现把这些土地以日满两国政府合办的"日满拓植株式会社"的"合法"地位，变为该社的正式所有。另一种是承受日本拓务省的命令，继承拓务省"满洲开拓事务所"的业务，办理日本人移民的事务。

所谓"满鲜拓植株式会社"的业务内容，一种是前面已经提过，在日本人的逼迫下，迁移到中国的朝籍农民，在东北占据中国人民土地，其所有权的法律手续在当时没有取得（例如关于土地执照文件，土地被强占去的中国人地主是不会交出的），该社以"日满两国政府合办的满鲜拓植株式会社"的合法地位，来完成他们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另一种是奉朝鲜总督府的命令，继承朝鲜总督府"满洲出张所"的任务，办理朝农移民的业务。

与该两社成立的同时，所谓拓务省"满洲开拓事务所"和朝鲜总督府"满洲出张所"，同时被撤消。以后，"日满拓植株式会社"名义上改为"满洲拓植株式会社"，略称为"满拓会社"，"满鲜拓植株式会社"略称为"满鲜会社"，又称为"鲜拓会社"。

第三个时期以"开拓团"用地为主要的掠夺方式（1937—1939年）

（1）日本实行"开拓团"移民的缘故

日本根据广田十大政策之一，二十年向满洲移民500万人口的方针（这是为了北边镇护，即在北部国境地带，对苏防卫的一种体制），把移民编为若干的集团，每一个集团或一个团体单位的组织称"开拓团"，其分布和任务有三种；

第一种主要选定在北边地方，即靠近苏联国境地带，防守苏联的"进攻"；

第二种主要选定在矿山地带附近，保护军事生；。

第三种主要在森林地带附近，“围剿”抗日游击队。

(2) 所谓“日满开拓委员会”的产生

1937年的初夏，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大将代表其政府和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签订了一项协定，成立了所谓“日满开拓委员会”，关东军当时的参谋长东条英机任委员长，奉天铁道总局长宇佐美莞尔（后改为满铁总裁）、驻伪满大使馆参事官藤沼某为日方委员，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星野直树、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伪国务院外务局长官蔡运升（后改为伪外交部大臣）为伪满的委员。在这个“委员会”的指示下，以伪总务厅次长神吉正一为干事长，伪产业部次长西村淳、驻伪满大使馆一等书记官花轮某、关东军第三课长片仓衷大佐等为干事，成立了所谓“日满开拓委员会干事会”。

在这个“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下，1937年秋，在伪产业部里，以日本人结城清太郎为总局长，以五十子某为土地调查处长，以汉奸李叔平为管理处长，设置了所谓“开拓总局”。该局成立后，立即根据以往的自由土地掠夺方式为内容，制定了一个所谓“开拓移民事务实施要纲”，经过“日满开拓委员会”通过（并未公布），以此，为该局进行办理移民事务的章程。

(3) 所谓“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的产生及其经过

伪开拓总局成立后的当年，即1937年的冬天，关东军命令“开拓总局”拟定了一个所谓“日本移民用地收买要纲草案”，以此为“开拓团”用地“收买”的标准，其主要内容是关于“收买”移民用地，只限于满洲农民不种的碱地、二荒地和三角地这三种土地，并且以适当的价格，在双方同意下进行“收买”，以此来限制从来毫无限制的自由掠夺移民用地的方式。

为什么日本人正在实行自由收买移民用地中，又抛出了这样的收买“要纲”来限制既往的掠夺式的办法呢？

这是在1937年初春，日本进军华北以前，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根据驻天津司令官香月中将的建议，而拟定的。

香月的建议是：为进军华北，必须同时树立一个愿意和日本合作的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几年来，驻津日军在华北方面进行了各种宣传，但是到处都遭到了在“满洲国”土地被日本人掠夺去而逃奔华北谋生的东北农民的影响。他们受日本人的欺骗的事实对华北中国人影响很大，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产生一个强大的障碍。所以为了日本的“远大前程”，希望“满洲”日军在进行土地“收买”时，万不要引起中国人妨碍日本前进。

1938年夏天，日满开拓委员会审议了这个纲要，于10月，在长春“日满军人会馆”召开了审议这个纲要草案的扩大会议。

在扩大会议召开的头几个月，我几次和伪总务长官星野植树、关东军参谋长矶谷中将、直接担当指导“满洲国”的第三课长片仓大佐等在宴会后闲谈。他们问，对于收买日本移民用地，满洲农民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和怎样的态度？我谈到农民被掠夺土地等

情况。在一次会后，片仓大佐招手叫我到休息室谈一谈，在休息室，他说，关于收买移民用地的方法真是有些粗暴的地方，为了让他们改正粗暴的手段，关东军已经命令开拓总局做了一个草案。要开一个审议会，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谈一谈。我担心发言会带来一些影响，有顾虑，认为最好还是不发言。片仓略带不满意，认为我还是有必要发言的。

会议期间，我因病回家疗养，一天晚间接着星野事务长官的电话，他说：明天午前10点，在“日满军人会馆”开关于日本移民用地收买要纲草案的扩大审议大会，希望你务必出席并且要发表你的感想。

我有些犹豫，但第二天午前9点50分，在秘书官的扶持下，我还是去了。

被召集出席的人，日本方面的代表是拓务省管理局长、内务省管理局长、内阁参事官、内阁法制局参事官、拓务省文书和调查两课长等；伪满方面的代表有伪总务长官、伪总务厅各处长、各伪部次长和日本司长和各伪省次长、日方厅长，以及各伪市的副市长、日方处长和所有特殊的日本高级干部、社员，加上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共有260多人。和伪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伪外务局长官蔡运升、伪经济部商工司长罗振邦、伪协和会指导部曲秉善等四名汉奸。在委员长矶谷中将的召集下，以片仓大佐为会议的主持者，开了为期三天的审议会，日本方面的意见，总起来说是一致的，他们是一致主张本要纲是没有必要，特别是伪间岛省次长有田某，说的最露骨，他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失去了十万同胞的生命，从满洲把俄国赶走了，这次日本又牺牲了许多生命和财产，才把满洲拿到手里，为了解决日本的人口稠密，而向满洲移民是应该的，所以我们看哪个地方适于日本人居住或耕种，就把它占领过来，丝毫没有顾虑满洲原居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必要，也没有顾虑他们生活的必要，他主张仍然按照旧的形式自由选择收买和定价。

在日本方面大体发言完后，谷次亨发言，他说满洲国的产生，举世周知，是因为国民党统治政权不顾人民的生活如何，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而向人民征捐课税，以此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另一方面“满洲国”是根据日本政府自动地愿意保护和正义的支持，并且在平等权利的原则下，以民族协和的精神来建设王道乐土，因而东北三省人民和国民党政府声明脱离关系，而成立了“满洲国”。因此，几年来东北中国人民信赖了日本政府的诚意，拥护了“满洲国”政府，忠实的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由于实行了日本移民政策以来，到了今天，农民一家的生命保障——土地被夺走，农民生活无路，这种局面，不利于日本在“满洲国”统治，因此衷心的主张本要纲的通过。

我发言后，曲秉善以“协和会”的立场发表了一些农民受害的具体实例，罗振邦和蔡运升二人虽然没有发言，当然他们是和曲秉善、谷次亨同样的意见，希望“要纲”的通过。

最后，矶谷中将以关东军参谋长的立场，把华北军司令官香月中将向关东军司令官的建议内容当场发表（这个时候我才了解“要纲草案”产生的来历），矶谷讲：日本前进的事业还有很多，决不能以在“满洲”实行移民政策的手段不相当而影响了日本的前进，我们应该为全局着想。

据说由于关东军的建议，日本拓务省大臣小矶国昭，以他的名义，于第二年，即1939年夏天，在东京首相官邸就“要纲草案”召开“日满恳谈会”。

在这个“恳谈会”的头两天，星野通知我参加，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日满开拓

恳谈会议”。“满洲国”方面出席的有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为团长，还有移民现地的伪省长，伪三江省长卢元善和我。开会当天，我赶到了东京，坐上伪满大使馆来接我的汽车，直到大使馆。在大使馆的客厅里，遇着了伪开拓总局结城清太郎，他对我讲，这次会谈是日本政府关于开拓政策的一个重要恳谈会，“满洲国”出席的人是被邀请而参加的，所以在谈话中，应该取客气的态度和稳健的语词而对之，而不可以辩论的态度相对，你去年在会馆所说的那些情况，最好不说。随后，片仓大佐又挂来电话，片仓说：这次的恳谈会，日本方面，一定有很多人出席，并且一定还要反驳那个要纲，主张以照旧的的办法去收买移民用地，所以还希望你按照去年在“日满军人会馆”时那样的发言，坚持下去。

会议如期举行，日本方面出席有小矶拓务大臣、田中拓务省次官，以下拓务省各局长和主要课长，石黑农林省大臣，该省的管理局长，文书课长，内务省管理局长，内阁参事官，陆军省的满蒙班长小尾大佐，东京帝国大学移民学教授加藤博士和民间所谓著名的人士等为中心，共60多名。

伪满方面以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为团长，伪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伪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伪三江省长卢元善、伪总务厅参事官秦免斋、高仓正等为中心共30多名。关东军高级参谋片仓大佐也出席了这个“恳谈会”。

小矶大臣致开会词后，吕荣寰对于被邀请参加恳谈会的厚意作了致谢词。随后即就“日本移民用地收买要纲草案”展开了辩论，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加藤博士的议论最露骨，代表着全场的日本人的意见（除了陆军省的代表意见外），坚持照旧自由选择，谷次亨重申其观点。

谷次亨发言后，片仓大佐代表关东军的立场，说明了关东军的意见。他说，关东军是日本的关东军，而不是“满洲国”的关东军，关东军是领导满洲政府推行各种政策，推行的政策结果好坏，是关东军的责任，也就是日本政府的责任。现在日本政府正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时期，决不应该在“满洲国”为了实行一种移民政策，用了一种粗暴的手段，而影响了日本前进的全局，这是不可取的。谷次长所说的情况，是丝毫不错的，关东军也是那样了解的。正因为是那样的情况，关东军才命令开拓总局，根据关东军的意向而拟定本要纲草案。希望日本朝野的各位，为日本的前进全局着想，对于本要纲的看法，再加以考虑，这是关东军的盼望。

在这个“日满恳谈会”上，所谈的附属性的小问题也有不少，但主要是，关于自由收买土地和定价问题，到了第三天，就得到这样程度的一个结果，而散会。

据说，在散会后，经日本陆军省和拓务省之间磋商的结果，把关东军主张的“日本移民用地收买要纲草案”作为主要内容，又增加了在“开拓团”地域内设立“训练所”对开拓民实行军事训练；为了“开拓团”的保健，在“开拓团”地域内，设立医务学校和医院等，并制定开拓医疗法；为了在“开拓团”用地以外的地方，设立“开拓团”自用的农作物试作和畜牧业的经营等，制定“开拓农场法”。在此以外，把“满拓会社”和“满鲜会社”合并，成形一个以“满拓会社”等为内容的所谓“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

这个“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形式上是经过日“满”两国政府当局商定的。因

此，在东京，于1939年12月通过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后，又经过枢密院会议的审议后，以日本的敕令而公布。同时，以同年同月同日，在伪满长春，通过伪国务院会议后，又经过伪参议府的审议，以伪满的敕令公布。

根据本要纲的条款，1940年公布了“开拓团法”、在“开拓团”地域内设立训练所的通令，并公布了开拓医疗法，1941年又公布了“开拓团农场法”等。

本要纲，主要是为了适用于开拓团用地的收买，开拓团进入后，在开拓团地域内应布置的各种设施和开拓团独立的保证等目的制的。

根据“开拓团法”“开拓团”每户订可领5垧土地，可借安家费500元，但由第六年起到第十年初还清，每户按月纳租住房到第十年初归为自己所有。“开拓团”住宅，由伪满政府事前给准备好。但是，开拓团的用地收买，在前面已经提过，1937年“开拓总局”成立后，到1939年年底，全部掠夺完了之后才公布本要纲，对于中国东北农民来说，“纲要”丝毫没起作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实行的移民政策，给东北农民带来的只是永世不能忘的一部悲惨历史。

(4) 所谓“开拓团”的计划预定地区和其所掠夺土地的数目、价格以及“开拓团”成立业务的开始

“开拓团”预定的地区是：伪吉林、牡丹江、东安、三江、北安、黑河、龙江、滨江等省的大片荒地，约3000万垧和一部分熟地约100万垧。其价格，市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荒地每垧1元伪币，熟地20~40元。

以上所说开拓团用地，到1939年年底全部掠夺完了。因此，1940年起，即将开始日本移民进入“满洲”成立“开拓团”。在这以前，即1940年初，根据“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的条款，把“满拓会社”和“满鲜会社”合并，而成立一个所谓“满拓公社”，以此来继承前两社的任务，开始办理日本移民进入满洲成立“开拓团”的业务，这个“开拓团”移民，直到1943年为止，它的总人数将近10万人。

为了这不过10万的日本移民，而被摧残的东北农民却达100多万。

总　结

1. 所谓移民

日本对于它在东北的移民，为了掩饰侵略性的面貌，把它叫作“开拓民”，其内容如上所说。从朝鲜被侵吞后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用其武装力量驱使朝农到中国东北来，作依赖性的移民。并且又特命令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在奉天设置了阴谋机构即所谓奉天支店，使其欺诈诱骗中国人民的土地，作为其移民用地。

在九一八事变后，以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奉天支店为基础，以此作为日满两国政府合力的形式，成立了所谓“日满开拓株式会社”，该社除了继承以往的业务外，并承日本政府拓务省的开拓政策，办理开拓业务。

另一方面是以朝农在东北依赖的土地为基础，成立了日“满”两国政府合办的所谓“满鲜拓植株式支社”。该社除了继承办理朝农以往的土地业务外，并承朝鲜总督府

的移民政策办理朝农移民的业务。

再一方面，日伪官吏和日伪社员，为了私人获得私有土地财产而单独进行土地掠夺、所谓自由移民用地。

在这些移民用地里，已经到来的移民除了朝农移民之外（也并不多）极为寥寥，并且刚来到满洲后的这些系统的移民，并没有听说他们将负何种具体的任务，除了特别情形外都是随着伪满洲国的行政方针从事耕种。

2. 所谓“开拓团”（包括关东军第一二次的武装移民在内）

如上所说，“开拓团”有三种任务，因而他们的布置地区又是分为三种地区，所以他们按着他们不同的任务，受着不同的随行任务的训练。

“开拓团”移民为了完成三种任务，在起初是以日本退伍军人为骨干再配合青年团的方针，但因为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而兵力愈感不足，所以就不能不参加以非军人出身的人，但非军人出身的这些人，必须受过军事和其他必要的训练才能够条件。因此，在东京的近处“内京”地方，设置了一处大规模的“移民训练所”，经过一年后，才能携着家眷来参加“开拓团”，所以靠苏联国境地带接近的所谓东部国境地带的“开拓团”绝大多数是退伍的军人，而所谓北部国境地带的“开拓团”，只是团的领导者是退伍的军人，其余大多数是青年团和“内京”训练所出身的非军人出身的人。

这些“开拓团”，在形式上是和“开拓总局”与“满拓会社”保持着联系，其实际主要是奉北边地方的日本司令官和关东军的命令而行动着，不受伪满政权的约束。

（1962年10月）

日本对东北的武装移民和中国人民的反移民斗争

冷 铁 铮*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陆续占领了我国东北四省，他们在这块地方进行了“农业移民”。这种“农业移民”，从性质上讲，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殖民地的重要手段之一，今天我们还有必要加以回顾和认识。

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移民史，作为它的侵华史的一个部分，也是一部失败的历史。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执拗、凶狠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中国人民在这方面的斗争应该表诸史册，永垂不朽。

日俄战后，日本在我国辽东半岛上取得了铁路经营权和其他若干权益的时候，就安下了移民的念头，并且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开始了试验性的移民。这种移民为数不多，据说因为生活水平较高，和勤劳朴素的中国农民比起来，竞争不过，所以最后失败了，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说：日本农业移民，从经济上看，没有前途。

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实行农业移民，主要是为了它的政治目的。日俄战后，日本唯恐帝俄卷土重来，就想到用移民的办法来巩固其在“满洲”的地位。他们认为：如果在“满洲”能有50万日本移民，俄国虽强并不足惧。十月革命后，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非常鲜明，日本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准备对苏战争，其中移民问题又是一个战略环节。一直到“八一五”投降，日本的农业移民始终是和治安、国防等重要“国策”结合起来的。

日本移民的大批来到我国东北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到“八一五”光复这一段时间。根据移民的具体情况和他们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斗争形式，这一历史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到“土龙山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这块新到手的殖民地，加强掠夺，并解决所谓的人口过剩问题等，都需要大批移民。移民需要很多经费，每一农户要用4000—5000元的补助金，这在当时的财政上又有困难。于是，在一个时期内日本政府并未拟出具体的移民计划。“满洲事变”多半是现役军人关东军搞起来的，日本政府实际上当了军部的尾巴①，在移民问题上也是为此。当移民问题迟迟不能进展的时候，现役的关东军召

* 作者曾任伪满北安省开拓厅事务官。

① 此论错误，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是其“国策”，关东军只不过充当侵略政策的急先锋。

开了移民会议。会议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参谋长桥本、参谋板垣、石原，还有一个姓东宫的大尉。这个东宫大尉名叫东宫铁男，后因侵略有功升至大佐，在侵华史上虽不如板垣之臭名昭著，但作为移民工作的积极推动者和“讨伐”行动的积极指挥者，是中国人民的凶狠的敌人之一。

关东军的移民会议结论很明确：农业移民在经济上可能赔账，但在政治上却非此不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东北军有的放下了武器，有的投靠了日本，中国当时的反动政府标榜不抵抗政策。但是中国人民在东北各地依然对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1932年初，反满抗日的各种武装力量仍有30万之多，日本军处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处处感到孤立和危险，他们想假借农业移民的名义，招募屯垦军，给他们作一个有力的助手。第一批移民就是根据这种方针，由日本在乡军人组成的武装移民。大约在1932年夏秋之交，他们经过沈阳、哈尔滨到吉林东北佳木斯一带，他们不是拿着锄头，而是揣着手枪，扛着洋枪，来到中国“耕地”来的。

1932年夏季，在吉林省的东北部依兰、佳木斯一带（今属黑龙江省），中国的抗日游击队正和日伪军展开英勇的斗争。当时汉奸于琛澄早已投敌，他的部下成为第一批伪军也在配合日本人进行“讨伐”。东宫铁男当时正在佳木斯指挥作战，而且正在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批武装移民（500人左右）[①] 的到来，对日军来说，是来了一支“别动队”，从中国农民的眼里看来，他们和日本正规军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实际上这批移民的编制和军队一样，一个大队分为几个中队，不仅队长是军人出身，每个队员都是具有军事经验的在乡军人。据说入队时候也和壮丁入伍一样，举行了效忠天皇的宣誓。

移民来到佳木斯的时候，因为治安情况不好，手持枪械不敢下船，第二天由日本军队来接才跄跄踉踉地进入佳木斯。到达佳木斯后，立即和日军共同作战，确切地说，和日军一起在佳木斯被围困了一个冬天，1933年春才好歹到达了目的地——依兰县的永丰镇。

第一批“农业移民”和接踵而来的第二批移民名称都不统一，有的叫“农业移民团”，有的叫“屯垦第一大队”，有的叫“试验移民”等等，其中最恰当的是中国农民送给他们的绰号——“屯匪”。这一群人的所作所为的确和“皇军”是百步五十步，大则烧杀淫掳，小则敲诈勒索，无所不为；至于强买强卖，殴打居民，更是屡见不鲜。诚如日本政府对他们所期待的，他们给日本“移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中国农民中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印象，终至引起了轰动一时的“土龙山事件”。

1933年夏，继第一批“移民”之后又来了第二批，地点仍是佳木斯附近的永丰。当时的情况是，旧东北系吉林军已经瓦解，散兵游勇为数很多，各地农村藏有大批武器，东北民众抱着强烈的抗日情绪，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武装斗争。日本军为了“确保治安”，对中国人民进一步实行殖民统治，迫切想要做的是从民间缴收武器，同时，移民陆续到达，必须从中国农民手里购买大批土地。两次武装移民涉及千人左右，日本军有了这些助手就决定把缴收武器的工作和“购买”土地结合起来同时进行，他们没

① 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团总数为423名。

想到这样做会把中国民众逼上梁山。

1934 年初，吉林省依兰县所属土龙山附近八虎力村的农民们听到收地收枪的消息以后，纷纷起来表示反抗，当地保董谢文东和农务会长景某①、景某的儿子井龙潭在民众的鼓动之下率领数百名有枪支的农民组成东北民军，以谢文东为总司令，竖起了反满抗日的旗帜。收地收枪是对全体中国农民的重大威胁，于是，反收地反收枪的口号就吸引了附近许多村镇的农民，不出数月，谢的部队将及万人，其中有枪支的占半数。他们由八虎力开到土龙山，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②，士兵带着红色袖标，军纪相当好，他们首先消灭了土龙山的伪警察队，缴获了枪械火药，接着把饭冢大佐率领的日伪军消灭，军威大振。“冲击日军最薄弱的一路，打他们的屯垦队”，于是包围了永丰镇的屯垦第一大队，并把闻风逃跑的第二批“移民”（第二大队）追至湖南营，加以包围攻击，相持两个多月，打死武装移民队数十人，后由于日军增援，并用飞机轰炸，才得解围。但这场战斗对狂妄不法的屯垦队给了一个下马威，两移民队抱头鼠窜，事后大部分要求退队回国，当局制止无效，1934 年夏所余队员不到半数。当地中国农民说：“这一脚把日本屯垦队踢回老家去了。”这句话说的可谓恰如其分。

第二阶段：土龙山事件后到七七事变

“土龙山事件”以后，日本移民论者茫然不知所措，关东军本身也发生了动摇。事实胜于雄辩，日本武装移民在经济上赔账，在政治上更赔账，他们来了不仅不能协助日军搞好治安，反而引起了重大事件。据说日本政府内部反对移民的人们又抬起头来，1934 年的移民的一部分被取消了。

大约半年以后，关东军又在长春召开了一次移民会议。这次会议“清算”了“土龙山事件”后的混乱和动摇，把移民工作又推向了新的阶段。关东军的顽固分子认为“土龙山事件”是局部事件，为了提高日本人在东北的人口的比重，用人口的优势控制“满洲”，为了对苏备战，一定要实行全面的移民。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 2 年多的演变，使日本政府当局也加强了永久占领“满洲”的欲望。他们也对移民问题作了重新考虑，拟定了在 5 年中移民 2 万户的所谓“五年移民计划”，并设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作为日本政府执行这一政策的辅助机关。根据这一计划在 1936 年送出了第一批农业移民。接着，1937 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反对移民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被打死③，军部的力量有了相对的提高，对外侵略的步骤逐渐加紧，移民计划也扩大起来，新的计划内容是在 20 年内移民百万户（500 万人），并且把这项移民政策提高为重要国策之一。1937 年以后的移民就是根据这一新计划来进行的。

---

① 景某应为景振卿，当时为依兰县第三区（土龙山区）辖下五个保长之一。后于 5 月 1 日在围攻湖南营日本武装移民团时，不幸牺牲。

② 改称应为“抗日民众救国军”，而且改称时间是在 3 月 10 日击毙饭冢大佐之后。

③ 1936 年 3 月 26 日，日本“皇道派”极端军国分子袭击首相和大臣住宅，高桥是清在赤坂麦町私宅被杀。

1937年以后的移民在编制上没有采取屯垦队的形式，他们是以农民的姿态出现的，土地在原则上是收购荒地自行开垦，实际上他们所买的大部分都是熟地，有一些荒地并没有开起来，甚至把到手的熟地都荒废了。有的雇佣中国农民试作富农经营，有的变卖马匹和农具吃光了以后要求回国。总的说来，移民在经济上始终没有好转，他们陆续来到东北主要的还是加强日本实力，巩固治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斗争也没有停止过一天，中国抗日力量的游击目标，始终没有离开“移民”。不过，在这期间中国的抗日力量也有了巨大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绝大部分是张学良部下的正规军，其中一部分由锦州撤退以后，遗留下来的还有旧吉林军和黑龙江军，也就是丁超、李杜、马占山等将领的士兵。从性质上看，他们原是代表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的。由于战争的长期化，这部分军队由动摇而叛变，大部分则被遣散瓦解自消自灭了。“土龙山事件”的英雄，作为总司令的谢文东，以后也投降了日军。其次，中国农村固有的自卫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等等在战争初期也有过相当的活动，但是这些组织的阶级基础也是封建地主、富农、大商人等等，并且他们的活动往往是配合正规军队作战起补助作用，所以在正规军逐步垮台，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不断投降的情况下，这部分力量也渐渐销声匿迹了。正在敌人力量逐步加强，我国民众抗日力量渐趋涣散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来到了抗日第一线，民众的武装力量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很快又壮大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最先存在于吉林省的磐石县。早在1932年就有中国红军南满游击队，队员很多是朝鲜族人。另外还有一支中朝游击队，也是中朝混合部队，为数大约500人上下①。1933年是大转变的一年。上述磐石县境的南满游击队在这一年发展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司令员是杨靖宇。当时在“间岛”（今延边地区）附近活动的中朝游击队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不久扩充为两个师。在珠河（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境内原有的少数红军游击队，这年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等等，到1934年末大约有6个正规军，在东边道一带和日本军及负有治安责任的日本移民团，作战。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以后，在东北成立了抗日联军江北指挥部，所有抗日力量完全由共产党统一领导，抗日力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及至1938年红军进攻热河，在伪满西南境内建立根据地以后，日军和他们的移民团形成了腹背受敌之势，以日本移民为中心的斗争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由七七事变到八一五光复

日本关东军由1932年开始就实行他们的“五年治安计划”，预计在五年之内把东北的各种抗日力量基本上予以消灭，以便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和兵站基地。没想到五年以后，通过一系列的南征北“讨”，却扩出一支强大的抗日联军来，而且这个部队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强了。1937年以后日本关东军以及伪满的治安部门透露了一种意见，就是说要想根除“匪患”，“确保治安”，“讨伐”只是“治标”的办法，除此以外必须

① 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各地创建了十余支抗日武装。

有个“治本”的办法。这个“治本”的办法就是“三光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在东北所进行的“三光政策”也和他们武装移民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从日本移民的根本性质来看也不足为奇。

日本军人认为对付共产党的惟一办法是把他们的游击队同农民群众隔开，即所谓“民匪分离”。这种办法的步骤是首先实行“讨伐”，建立一个势力范围，日军自称为“威力圈”，然后把他们认为是“良民”的农户强迫迁移到这个势力范围以内，建立所谓“集团部落”，用一道墙围起来和外界隔离，对剩下的部分实行“三光政策”。最后在烧光、杀光、抢光的废墟上招入日本武装移民，使之在民“匪”中间起隔离作用。由于实行“三光政策”，就可以不需要收购土地，避免因收购土地引起的摩擦。这样，就可以在“巩固治安”的同时，逐步地把中国居民变为日本居民，从而，把中国领土实质上变为日本领土。“三光政策”的实行范围和移民的指定地点等等都是机密事项，无从得知全貌，从各地的实际情况看，特别是1937年、1938年、1939年的几批移民全部是在游击区的周围，或者竟占据了游击队从前的外围据点，可见他们的地点是日本军方根据上述方针给他们选择的，而他们的命运也是日本军方给他们注定的。“三光政策”使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生命财产的损失无法统计，但是从效果上看，日本军又失败了。无端被剥夺了土地财产，无辜被惨杀了父母兄弟的中国广大农民，从此以后，眼望着烧杀的残迹，眼望着一批批到中国来坐享其成的日本武装移民，怀着无比的仇恨，更加顽强英勇地投入了战斗。

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的抗日联军发挥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他们用灵活的游击战冲破了日军的封锁，他们袭击“集团部落”，袭击“武装移民团”，有时袭击火车，截获汽车，缴获武器和物资，越发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集团部落”中的中国农民仍旧保持着和游击队的联系，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有时整个部落揭竿起义，成为游击部队的据点。日本军自作聪明惨无人道的“治本”办法，结果只是欺人自欺而已。在这中间，日本武装移民一方面尽到了帮凶的职责，一方面收到了挨打的实惠，他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过着军不军民不民的尴尬生活。饱尝了给“皇军”当助手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滋味。

1940年、1941年以后的武装移民，似乎又有些改变。中日全面开战以后，在中苏边境上连续发生了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日本军人一方面感到对苏战争的不可避免，一方面又切实认识了苏联的力量。为了培养基地，拉替死鬼，他们又在移民方面动了脑筋。1941年以后的移民大部分来到了北部国境地带，从北安到孙吴都散在着日本的“开拓团”（即武装移民团）。新来者的任务是作为军队的助手巩固“国境”地带的治安，给日军搜集情报，增产粮食，支援战争，一旦有事发挥兵站基地的作用。他们的目标实现了。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只数日解放了东北，关东军自顾不暇，把大批移民遗弃在他们所散在的地方，他们不知所措地对苏军进行了没有组织的抵抗。他们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被俘，大部分则被集中起来遣送回国了。事后日本反动政府反而提出移民失踪问题要求调查，我们有权利指出事实真相，日本移民不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他们是日本政府应关东军的“邀请”派来的帮凶，他们在侵略战争中是动了手脚的。由于中苏两国的厚意，他们绝大多数得以安然回国，他们应该感谢中国人民。假如

他们真正蒙受了一些损失，应该向日本军国主义者去清算。

本文的根据

笔者于1938年由日本前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即回伪满入长春大同学院学习，在一年学习期间听过多次伪满各部门当局的报告，保存过一些零散的笔记。其中，关于日本农业移民问题也听了很多，并参加过几次移民问题的座谈会。某日，伪满治安部的一个伪职员把一度抗日又投降日本的谢文东领来大同学院。谢文东简短地讲了几句话，当晚又开了一次有关日本移民的座谈会。1941年后，笔者任伪北安省开拓厅事务官，工作和移民团（开拓团）有关，了解了一些移民的情况，并看过一些带有保秘性质的文件，可当时未做笔录，多半都忘记了。日本投降后，笔者想写一篇文稿投出去，因材料不具体未完成，现材料仍不够具体，但这件事情本身有注意研究的价值，特整理出来以供参考。

（1965年）

伪满电信电话会社的设立

阮 振 铎*

1932 年我在伪满建设局时期，曾兼“满洲电信电话会社设立委员会”委员。当时伪政权的各部总长、次长、局长等，和长春市各大商号老板，以及地方银行经理等，都是委员。委员长是日本退役海军中将山内静夫，副委员长是三多。这个会社是“满日”官商合资，伪满是以原东北各地电报局、电话局等各种设施作为现物出资，并加入了一部分股份。“委员会”目的就是为了募股，因之各“委员”不拘多少都得认股。每股 100 元，分四期交纳，我认了 20 股。这个会社于同年成立，把伪交通部所管的电报、电话和放送（新闻广播）等事业，全部交给该会社经营管理。这个会社因有日本方面出资，是属于“特殊会社”的一种。从此就切断了东北人民获得对内对外消息的渠道，任凭日本侵略者捏造欺骗宣传。

* 作者曾任“满洲电信电话会社高立委员会”行员。

日伪阴谋独占东铁之一幕

李　慕　涛*

九一八事变后，凡服务东铁者，几皆有山雨欲来之感。1933 年，日方果操纵伪满妄图独占该路，6 月间乃举行所谓部（伪交通部）路（伪北铁）① 联络会议，借以进行买收准备，部门由伪总长丁鉴修及司长森田等出席，路方由伪督办李绍庚理事、范其先、窦青林等出席，议题多至十六项并追加两项，历时五日乃竣。笔者曾与报界有联系，当时涉历所及，触目惊心，既未即能自拔，乃以咨议名义列席该会，所有当时商决概况，事隔 30 余年，仅能从零篇断简中追忆及之，特将要项综合叙述如下：

（一）路警管辖问题：考虑当前情况并此后可能发生之案件，例若苏方不正当行为，仍归督办掌握，加以裁制；况侦察苏方阴谋，亦以谙习路务之重要人员为适当，倘移交民政部管辖，苏方对于该处经费，势必拒绝，或减少款额改为补助费，转增国库之负担。

（二）商务代办所贷款事业问题：该所创设于 1926 年间，路局所拟规程中列有贷款事业一项，理事会批准后，预算委员会遂签定年额 90 万金卢布，发交苏方局长全权支配，实则注重苏商之援引与救济，内容极秘密，款额年有增加。1933 年增为 135 万金卢布，其宣传赤化，毋待推测，应于预算会议时提出废止之。

（三）贷载招揽费问题：东铁时代，为对抗邻路并奖励输出计，乃设置该项科目，年额初为 10 万金卢布，前昨两年曾高达 200 万金卢布，本年度预算亦列入 130 万金卢布，据闻路局于确定预算前先已动用，半属违法，应先饬稽核局彻查究竟，讲求适切手段，不妨行使武力，一面提议废止，致以“国币”为计算本位。

（四）宣传费问题：伪满封锁绥芬河道岔后，传闻苏方做种种反宣传，日方特务机关长小松原曾于宣传会议时，谓利用白俄最属得策，但需相当款额，尚难于筹措，质询部、路双方，路款中有无可挪用者，实则局长权限、用人、平均“国币”本位、索还车辆等等问题，均待扩大宣传，但苏方势必反对支拨本项费用，决由文化费项上临时支拨 500 金卢布充用，先行报部审定。

（五）买收问题：买收系指其合办权利而言，应先究明“北铁”内部一切价格即买收款额，至中方租给之土地及附属财产当然除外。苏方竟有主张 20 亿金卢布者，其所提平准账（贷借对照表）即系 14 亿金卢布，中列日俄战争及义和团事件之亏损并全俄储蓄会内设苏俄没收之本路路员义务贮金等之不确当款额，而华俄道胜银行应按 1896

---

* 作者曾以咨议名义列席伪满交通部会议。

① 1933 年 5 月 30 日，伪满交通部擅自决定将中东铁路改称“北满铁路”，简称“北铁”。

年建设契约于通车日拨付中国政府库平银500万两之本息，却未计。按其平准账（贷借对照表）剔除计算，仅系2.32亿金卢布，实则估算当前价值或不愈1亿元，应由路方先行编送下列文件，以便研究后，商定方针，一面清算各国复杂关系，避免买收后之纷纠：

1. 债权债务关系之详细文件。

甲、凡满方清算文件对照苏方提出之表报说明其理由。

乙、1917年3月9日以后部分。

2. 关于买收之参考文件。

（六）哈尔滨工大问题：

（1）工大改革：

依据1928年规定，华方校长一人直接掌管行政事务并主持庶务，苏方副校长一人，所有一切命令及财政均由正副校长联署行之，讵教务竟由副校长把持，仅容校长管理满方预科，实则全校教务概取决于博士会，校长几乎不能过问，其他尚有不合通则，应迅将校章分别修改，商承部方后，向苏方提出。

（2）官费生：

该校所设建筑、电机、商运三科中，督办公署共有官费生26名，支给全额学费，年各150金卢布，其中11名并支给全额膳费，各给大洋60元，现为整理计，一律考试，以成绩优良之10名为全额官费生，其余撤消原案。来年度对于新生即按此案办理，所有经费仍由电报主权费拨充，将来改归伪电政管理局掌管后，以文化费及一般经费充之。

部方最后表示：

国际问题之通例，不问理由正当与否，其结局概由大后方势力支配之，今后发展势力，应采用一切手段，但鉴发于现况，应先从（甲）具有理由者（乙）紧急者（丙）有可能性者推进之。

是月26日（即1933年6月26日）“满”苏双方即由日外相内田康哉之仲介，于东京举行北铁转让会议，历时19日，始克商洽，转让价额系日金1.4亿元，遂于1935年3月23日签定“北铁”转让契约，“满”方代表为“驻日公使”丁士源、伪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等，苏方为远东部长列聂支卡滋洛斯基等①，日外相广田弘毅、次官重光葵等，且参列仪式，同日伪满发表完全委任“满铁”经营之，附此注明。

（1963年）

---

① 今译卡兹洛夫斯基或柯兹洛夫斯基，苏方代表还有驻日大使尤列涅夫、中东铁路理事长库兹涅佐夫。

洮南铁路局十四年

董　绳　武*

洮昂铁路修筑的概述

中国被不平等条约束缚，东北新修建铁路，多半须由日本包修。在民国14年，正是张氏父子统治东北时代，修筑铁路，也不能例外。

由1925年起，开始修建由洮南至昂溪之线，大约借日本款2000万元，一切铁路沿线用地内，如掘土方、铺石子、枕木、铁轨及车站员工办公和职工家属宿舍总局楼等等大小建筑，统由日本工头包办。当时的中东路局，不许洮南铁路线横穿过他们的中东路线，经几度交涉，才允许横穿修筑。

日本的资产阶级工头们，修路时，除少数技术人员和重要职员外，一切劳力工作，均雇用廉价的劳工。所有建筑物，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有的宿舍房未完工，山墙即行倒塌！其质量之差，就可想而知了。

所有建筑材料及机货客车等，闻只有四台机车购自捷克，其余按合同统统购自日本，松花江大桥及沿路桥梁涵洞，也由日人指导负责修建。建材料工具等，由南满铁路托运，合同规定，均系半价，但日人巧立名目，改为铁作品，核以整价，嗣经据理交涉，方按合同半价托运。

洮昂路于完工通车后，向日本铁路的借款被他们包工头大量的剥削，车辆材料工具等等价款又被他吸收了去，带回他们国家，而中国所剩的是质量太差的铁路和大量的外债！

我入铁路局十四年

我于1925年8月，经人介绍，在洮南铁路局当练习员，后升为科员，在总务处材料科办公，月薪55元。连续在路局工作了十四年。因为个性耿直，家庭人口多，负担重，不善交际，不会逢迎，截至我退职时，月薪才增至68元。那个时代，单凭热心负责，工作积极，是行不通的！如那些能活动善应酬的职员，每到新年，给局长处长小孩压岁钱，即须20元之多，我呢，不名一文！更有变相的送礼，即是在大官公馆里搓麻雀牌，多输钱，即能赢得长官之欢心，印象即好，升官容易，我呢，不会这一套。职员之间，多搞小集团，每日狂嫖滥赌，酒绿灯红，互相吹嘘，互相吸引，也成为升级的终

---

* 作者曾在洮南铁路局任科员。

南捷径，我呢，对这样的作风，不发生兴趣。

伪满时期铁路员工思想行动及所受的迫害

九一八后，东北大片的土地，均归日本掌握，划入伪满版图，将总局由洮南移至齐齐哈尔。齐齐哈尔至克山间之铁路，也由日人直接掌握经营。好的方面是：公文简化，取消已往“等因奉此”冗长的俗套，改为简快的局报；又由满铁转调来的职员，认真遵守规章制度，对业务负责热心。坏的方面即是：把每个人心灵上，罩上一层恐怖气氛！人人自危，死神随时可以降临，并有失业的危险！于是铁路一些青年，发生反抗思想，各找门路。1938 年，黑龙江北部闻有红军出现，有些青年与北部有联系，也有些与国内国民党有联系的。他们分别开秘密会议，未料到“机事不密则害已”，被日人侦悉，当被逮捕 30 余名，囚于黑龙江监狱，闻有数人被秘密处死。不甘心作亡国奴有民族气节的人，终遭残害者，如工务处处长张远泽，为人忠实，工作负责认真，修洮南路时，因日本包工头子工程草率，他就破口大骂，有一次将日本工头吊起来痛打一顿。九一八事变时，张远泽已调升洮南铁路局长，住白城县，大汉奸金壁东派他的亲信、某县县长到白城劝降，张大怒，当打了劝降人一茶碗子，日本包工头子和该县长向日本关东军告密，将张逮捕处死。

另外还有以下四位被迫害者：1. 日本侵占东北后，有人密告洮南站长郝某，“反满抗日”，被宪兵队抓去，备受酷刑，查无实据，才被释放。2. 齐齐哈尔站长张晓霞，因车站收入款项，被胡匪抢走，日本即将张逮捕，严刑拷打得遍体鳞伤，拘禁一个多月，才放出来，已奄奄一息，不能饮食。3. 路局科员胡覃之，被莫须有的罪名，突遭逮捕，拘禁在哈尔滨宪兵队，日人嗾使狼狗，将胡咬得体无完肤，其结果无从探悉。4. 1938 年春，黑龙江教育所所长王某，他有一个弟弟，在法国留学，与他来一封信，日人早在邮局检查偷阅，然后封好，交与王本人，王阅后将信烧掉，事后日人逼索此信，因已焚烧，不能交出，致将王处死。因王案株连，致省城教师被逮捕者竟有十余人之多。并闻吉林全省教育界此类迫害案甚多，惜当时不敢记载，事隔多年，模糊忘却。

在日伪统治时期，对路局职员，将旧的一批一批的裁撤，由他们一手培植的新职员代替，少数高级职员冷血的忠实走狗，才能幸免，其余一些职员，每日均在失业和死亡边缘上生活和工作。有一次下班时，日本人说丢了钱，即拦阻每个人，搜衣兜及检查办公桌抽屉，结果毫无所得。又一次说路局丢了东西，即将所有职员家中箱箧衣物翻遍，无所获悻悻而去。

那一群新来的职员，业务多半不甚熟练，仍须利用我们这些旧职员维持这一个摊子，所以怕我们防备他们，还得利用我们，于是派了很多特务，秘密监视我们的言行。即我这样不与任何人来往、不善交际的人，退职后，特务们尾随我很久，曾被拘禁一次，检查后放出。那时职员早上上班，没把握晚上可以平安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无故把活人丢了的事，时有所闻，以致下班时间，家眷们多在门口提心吊担地守望！

我在伪满铁路局工作十余年中，均在恐怖气氛里，过着忍辱偷生的生活，既不敢坚

决的辞职，而导致全家无以为生的失业困难后果；又恐因辞职，引起日人疑忌，而遭到飞灾横祸，只得忍气吞声！除本身业务而外，对国内国际的事，是充耳不闻不问，更不敢记载。可是在那个偶语者弃市的黑暗世界里，又谁敢找麻烦呢！所以我知道的不很多，也不全面，又因年届七旬，往事多半遗忘。

1939年得以安全退职，转入教育界，解放后，又恢复了精神上的自由，得到了新的生命，年老退休后，党照顾我，每月给我退休金，吸收我充当政协委员，过着幸福晚年，这是我已往在恐怖中委曲求全的时候，始料所不及的！

（白玉林整理）

我所知道的“满铁调查部”上海分所

张 绍 甫*

一

1942年秋，我经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分馆”馆长蒋某介绍，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调查部上海分所，担任外出调查时的临时翻译。1943年秋正式进所，职位是嘱托，担任翻译工作，对上海分所的情况有不少亲闻目睹，但因职位关系所知不多，今叙述于后，以供参考。

二

“满铁”有着悠久历史，从日本侵入东北，到建立伪满洲国，替关东军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起了积极的先锋作用。伪满洲国建立后，“满铁”也是关东军进行经济活动的一支别动队。1936年“满铁”加强与扩大，总裁由松冈洋右担任①，设有铁道总局、经理部、用度部、产业部、矿务部、调查部、中央试验场、技术研究委员会、东京局等等，其中以铁道、矿务、调查三部规模人员最大最多。

“满铁调查部”根椐关东军所需，专门进行各项经济调查研究，调查部“人才济济”，在日本知识分子中是有名的。“七七”抗战前，殷汝耕投敌，“满铁”调查部人员大批入关，在华北各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调查后，日本“北支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了中日“合作”、“投资”等要求，如“塘沽筑港”、“津石铁路”（天津至石家庄）、“白河水利”、“开矿”、“植棉”、“电力”、“农业仓库”等项目。

“满铁调查部上海分所”（下简称“分所”），原在上海外滩日本正金银行大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接收英美财产，“分所”迁入了外滩英商汇丰银行大楼二楼全部及三楼、四楼一部。“八一三”前，“分所”主要工作是作本部的补充，所内人员大部系本部调来。“八一三”后，日本侵入京沪杭地区，“支那方面派遣军司令部”急需了解沦陷区经济情况，以便抢夺资源，控制物资。华中地区物产丰富，是富庶之地，久为日本所垂涎，解决“以战养战”问题。“满铁调查部上海分所”有的是经济调查的老手、专家，派遣军司令部（简称军部）除了设立各式机关，专做经济工作

---

* 作者曾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上海分所任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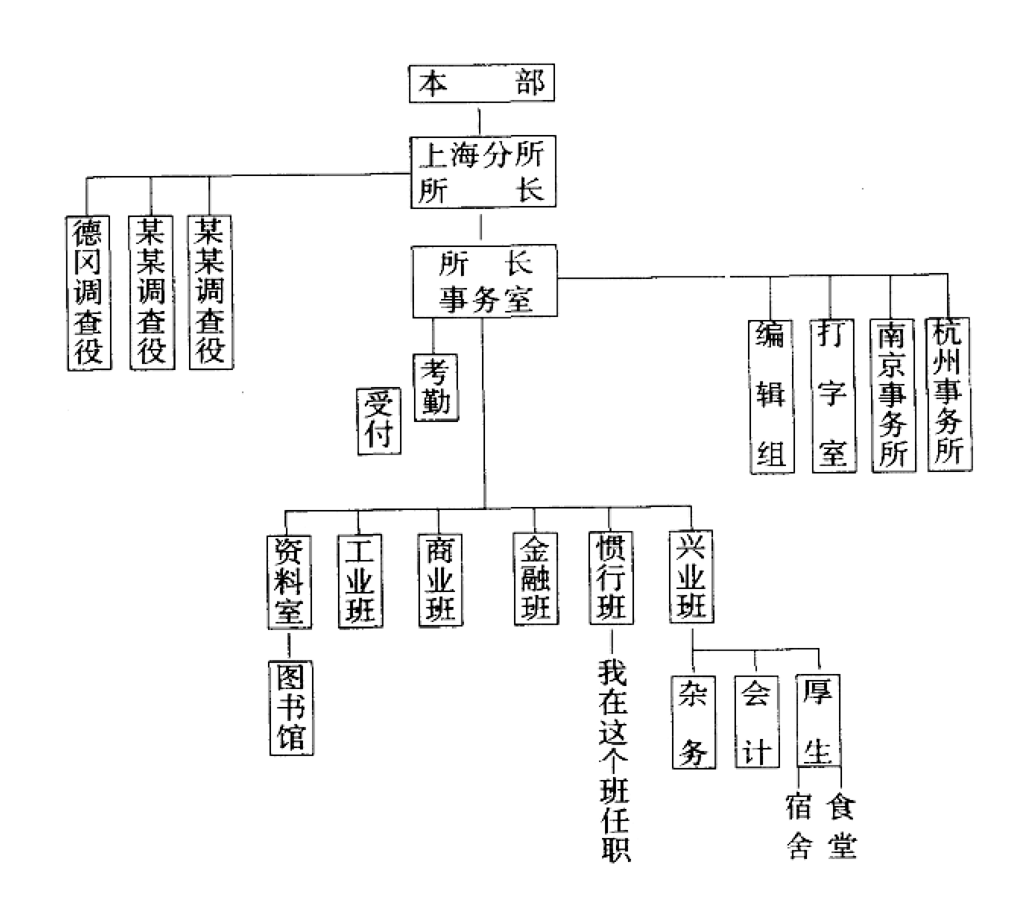
① 松冈洋右曾任外相，日本投降后，列入甲级战犯，判处绞刑。因病住进美军医院，1946年6月27日在病中死去。

外，又将部分项目委托“分所”。这时开始，这些工作成了“分所”的重点。为了适应工作“分所”又扩大了组织与编制，除从本部调入外，又就地进行招聘。我所知道的（公开的）“分所”调查项目有：银行、钱庄、国内外汇兑、矿产、麦、面粉、猪鬃、皮革、木材、茶叶、桐油、各地同业公会（资方组织），以及调查研究当时的经济趋势动向、经济规律、各业中的风俗习惯等等。其中有的是自上而下规定项目，也有在一定范围内由所员自立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每个项目的完成，要花相当时间，有时为了一个项目，一个班全体出动。调查报告有的刊在上海出版、公开出售的“满铁上海调查月刊”上，供各方面参考；有的经济论文专门讨论当局的经济政策方针等等。

1944 年下半年起，各项调查有的已告段落，有的中止。这时战局于日本不利已趋明显，“分所”经济上亦拮据，缩编撤消班室，所内所员有的转入军部做情报工作（见下），有的回国，有的转业。1944 年底，我遇原惯行班同事林耕本（日本籍台湾人），这时他在中贸联（日本人工商业的组织），他说：“‘分所’全盛已过，再像昔日那样，是不可能了。”

三

1942 年—1943 年时，“分所”内部组织编制，大致如下表：



所长伊藤是从德国回来的所谓经济问题专家。"德冈调查役"，德冈是这个役的负责人，有专用的会客室、办公室，调查役有5—6人，干些什么，一点不知道，我只见过德冈一次，是个大胖子，还有两个以名姓为役的，姓忘了。内部情况，究竟干些什么，不知道。工业、商业、金融三班在一个大办公室，人最多，约30—40人。当时的商业班长芝池靖夫是东京外国语专门学校出身，说一口流利北京话，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后在军部做情报工作（见下）。金融班长盐谷是金融问题的调查研究专家，能说中国话，但不开口，他年纪已不小，著有有关中国银行、钱庄等不少研究书籍，解放后，我还在忠良书店①见到过他的著作。盐谷地位较高，他是金融、商业两班的领导人。我与芝池、盐谷外出调查二次（见下）。工业班不详。惯行班专做经济中的风俗习惯调查研究。我在惯行班工作，班长松山贞夫，日本帝大出身，英文很好，架子大，完全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班附笠原仲二不问政治，自以超脱，对中国字画、汉文有相当的研究。班员高桥（关东军特务分子）、一条、长尾义子、林耕本（台湾籍日本人，台湾帝大出身），以及青年音光寺德次（我和他用一个双人写字台）加上我全班共8人。资料室7—8人，日本姑娘为主。附设一个图书馆，书籍五花八门，样样有，而且多，入内不需任何手续，借书只要写个名字，不规定还书日期。编辑组主要搞"满铁上海调查月刊"，打字室有20多个日本姑娘。南京事务所我去过，有七八个日本人，南京事务所、杭州事务所做什么工作不详，附表内"受付"是传达、收发的意思。

"分所"在外白渡桥下一所洋房里，有一个对外不开放的食堂，设备讲究，供应日本式、西式两种饭菜，取费极低，靶子路有宿舍。原先有大汽车（像公共汽车）上下班接送所员，后来汽油紧张、人员分散而停办。

四

"分所"工作人员，分为三种：嘱托、职员、雇员（本部也如此）。嘱托有一定专长，从外聘人，也可兼职，但不能享受会社（公司）年期升级、年期增薪、退休金等制度。嘱托地位可高可低，工资可高可低，视对象而临时决定。惯行班内班长松山是嘱托，工资在班内最高。我亦是嘱托，工资在职员、雇员之间。嘱托入所，不需办手续，嘱托入所日子久了，可转为职员，但职员转嘱托是没有的。职员与雇员是所的正式人员，有规定学历、经历，其中又分几级，工资也有固定规定，一般职员须大学毕业，雇员中学程度，雇员晋升到职员至少十年。职员与雇员入所时，要填社员表格，发任职书。职员与雇员之间，工资相差很大。"分所"对男雇员要求，除了规定学历，还须是熟悉中国情形的青年人，以作助理，如惯行班青年音光寺德次是生长在上海的日本人（音光寺1943年应征入伍当兵）。职员与雇员，根据任职年数，可以升级。"分所"内有一半是日本青年姑娘，是未婚的中学生。她们担任食堂、资料、图书馆、会计、打

① 忠良书店在虹口一条弄中，不登记，不公开，是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中国职员王宝良所开，专售日本书，旧书全系内山书店的，新书有从日本带来。王宝良与内山在日本投降到上海解放后，始终保持联系，王宝良现在上海，内山曾数次来北京。

字、受付、抄写及其他杂务、助理等工作。女的一律是雇员，做一辈子也不能升为职员，工资亦低，她们对男的说“敬语”，心甘情愿地替男的每天倒茶、擦桌子、整理，每天来得早，去得迟。

每天9时上班，大门口有三本又厚又大的册子，分嘱托、职员、雇员，大家在自己名字下盖章，嘱托最少，雇员最多，职员亦不多，所长伊藤也是职员。

1942年—1943年时，“分所”约有150人（包括南京、杭州事务所、在外食堂、宿舍工作人员）。集合过三次，一次伊藤所长召集全体人员谈话，用官腔讲形势，二次在虹口日本青年会礼堂开晚会，人员不少，100余人中，仅我一个中国人。

“分所”有两个中国工人，做擦地板，替大家从食堂搬饭，不进办公室。日本人叫这两人“BOY”（仆役），坐在一间BOY室内。1943年资料室曾有个十七八岁的中国女孩，用剪刀剪报纸，是个失学初中学生，不懂日本语，空闲时她去BOY室。这三个中国人，签到簿上无名，没有职位。

1942年，工作人员工资、出外调查费，均发日本军用手票、当时通用军票、伪法币、“中贮券”，军用票兑换率高，每人收入相当高。1943年军票停用，发“贮备券”，物价上涨，工资外出费未动，收入大为下降。

五

1942年秋，我第一次入所担任翻译，陪同惯行班班附笠原仲二去镇江调查桐油。我自作聪明，认为他们要买桐油。

笠原和我住在镇江金山饭店，他带着许多当时流行的50支纸盒大前门、大英牌香烟，还有日本出品的装璜美丽的“日东红茶”。头两天，他在巡视镇江一番后，整天埋头整理带来的资料、提纲。之后，他和我在镇江街上，寻找中国人开的桐油行（较大的店，合股性质），走进去报名片自我介绍，找老板、负责人。虽然笠原态度和善、很客气，但行中突来日本人，都是很害怕，又不敢拒绝。笠原拿出准备好的问题，一条条地问，从这家行的开设、合股情况，到进货、售出，这中间什么都问，又特别着重用人制度、行中的老式规则，直到为什么供奉关公，为什么供天地君亲师，每一细则、细节，无所不问。有时要行里陪着到加工场去看，这时又要找几个工人，问工资多少，是月给，还是日给，桐油业工人与它业收入比较、工作比较如何等等。实际上，笠原对桐油业已非常清楚，连进出货中的切口暗语，他都了解。这样，每天搞两三家，问题全是一样，问毕就走，临走他总要在行礼后送给答问人大前门50支装香烟、大英牌50支装香烟2盒至5盒，答得好的多送，不好的少送，有的再加一听“日东”牌红茶。搞了三四天，桐油商行相互传说，已知这样一回事，还知答的好（主要指仔细），香烟多。桐油行居然准备了人等候。五六天后，笠原又关门整理材料，对不够清楚的、遗漏的，又是一家一家地访问，又问一两个小时，再送香烟。当时，镇江有日本人开的桐油组合，有日本人专办桐油的洋行，笠原从不进去，笠原也不到中国官方机关去。一星期后，笠原带来的礼物送光了，问得也差不多了，又关门整理小山似的一堆资料。在这次调查中，笠原除了上述机械问答外，从不宣传中日亲善、经济协作等大东亚新秩序理

论。我问他"你这么做为什么"，他说："我写研究报告书。"

以后我又和他们到苏州进行公会（资方组织）调查。这次去的，除了芝池、盐谷，还有两个日本青年。到苏州后，五人乘车到苏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在一所花园洋房里，门口挂着"大日本苏州陆军特务机关"招牌），芝池和盐谷与机关相当熟悉，日本军官见了他们很客气，日本女职员见了他们鞠躬到地。芝池、盐谷上楼，我和两个日本青年在会客室。记得那天我看见了个佩刀陆军大佐，我问日本女职员，她说："你连金子机关长也不认识?"后来知道盐谷是向机关长作应酬访问。

通过苏州陆军特务机关介绍，下午会见了苏州伪经济局局长林大中。林是日本留学生，能说日本话。这个局长，对日本人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还不如镇江商行里店员，芝池的话尤如命令。夜里伪局长出面，在一家酒菜馆里，来了苏州同业公会会员三四十人，都是公会里的大户，苏州上层资产阶级，有的原来与芝池、盐谷相识，相互交换名片，席上谈笑风生。芝池用清楚流利的北京话，起立讲演，大谈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共甘共苦"。宴会上分发了上海带来的表格，表上是询问题及了解苏州各业情况，详细已忘。这样工作方式，与笠原在镇江不同，当天即完毕。

1943 年秋，我正式入所，担任惯行班嘱托。从这时起到年底止，半年内，除了班长松山贞夫、事务员长尾（女），他（她）二人不外出调查，我和其他班内人都先后分别外出调查。笠原仲二的桐油调查已搞了一年，仍未结束，我再次和笠原到镇江，他的调查方式还是和一年前一样，调查的仍是一年前这几家，有新问题，也有重复的，一条条问。后来，笠原仲二的"镇江桐油业中的风俗习惯"刊在"满铁上海调查月刊"上，洋洋数万言。只记得文中有统计数字、百分比等，还与其他地区作了对比，详细极了，样样俱有。他这篇论文写了一年多，笠原经常讲"高价的稿费"。

我和高桥到南京、无锡两地，调查过面粉业在经营中、人事中的风俗习惯。他以南京、无锡两地中国人开的大、中型面粉工厂为重点，一天调查一二个厂，就关门整理一天。他在厂内与厂长、技术人员、资方、劳方分别询问谈话，然后到厂的每一部分、角落参观。他在调查中经常关门深思，再行整理，方法与笠原又有不同。

日本籍台湾人林耕本是和高桥分工搞面粉调查，高桥调查工厂，林耕本调查零售店及批发商行。我与林一起到过无锡，方式与笠原差不多，也是用准备好的提纲询问店里负责人，送香烟，但较笠原简单，是问这些行与店业务，包括人事风俗习惯。林耕本曾在无锡生病，将提纲委托我，他先回上海，我根据提纲，随便找几家面粉店问，问了两三家，填在稿子上回来，回忆我所问的内容有店员进店规矩、学徒拜师怎样拜、用什么仪式等等。

高桥与林耕本有关面粉业的调查报告，没有公开发表过。

我又与一条到南京、扬州等地调查钱庄业中风俗习惯。方式与上述几人一样，在我离所时，一条的报告尚未完成。

平日在所，大家在规定时间内上下班，晨 9—12 时，午 1—5 时，星期六下午不办公。"分所"是完全日本式、正规化的组织，虽无规定，大家不乱说。我在惯行班半年，除了图书馆，从不走进其他办公室，其他班人员也不来，对上联系由松山、笠原办理。

在班内，只有高桥是特殊的，他迟来早去，有时不来，不知在外做些什么。他的职位是嘱托，他在“分所”是兼职。他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关东军中，他熟悉中国人生活习惯，是日本反动会社团体成员之一。高桥生活比班内其他人好，他在虹口有所小洋房，外出调查随便花钱。

六

“满铁调查部上海分所”，对外甚至在内部是以学术研究机构出面，“满铁上海调查月刊”（每月出版一本，所内人员免费发给）上经常有“学者”们介绍“学术研究”的经验，日本国内学者博士进行研究的方法、体会，以及他们的论文报告，日本各大学经济系科学生、教授的经济论文。有谈日本国内，也有研究国外等。他们往往以一付“菩萨面孔”，充满了“慈悲之心”，来议论中国经济上的矛盾、问题、解决方法，以及追根到底、无微不至地暴露中国各行各业中的细细节节、经营、人事、风俗习气，有的还专题出版了书籍。

“满铁调查本部”以官僚法西斯分子作领导，间谍、特务分子为骨干，这些人也以学者面目出现。宁波在抗战前有个日本间谍芝原平三郎，化名徐芝原，潜伏宁波，他曾在“满铁”工作过。他们在其人选上不过分强调思想上的一致性，因而也有许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日本共产党大叛徒、原日共中央领导人佐野学，在“早大”毕业后，曾在“满铁调查部”做过研究工作，当时佐野还是人所共知的“新人会”①会员，1943 年“泊事件”② 发生，事件主角细川、西尾，也是“满铁调查部”人员。

由于人员较复杂，日本人往往把“满铁调查部”说成是“纯学术机构”，其实这完全是欺骗，不值一驳的。

“分所”和本部一样，在人选上注重专长，不强求思想上的一致性。因而有芝池靖夫这样的法西斯分子、关东军特务机关人员高桥，他们在 1944 年穿上军服，佩上东洋大刀，做了没有军籍的军官③，芝池在十三层楼④司令部专做对华情报工作。但是，也有像班长松山贞夫思想上属于西田派⑤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这样的人往往被当时军部视为“圣战”障碍，都安身于分所做班长。松山读过唯物论，对马列主义，他认为是庸俗之见，却又认为日本给军部拖上了一辆汽车，前途不堪，厌战

---

① 早期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马列主义的组织，由进步学生教授参加，曾发起反军事教育运动。

② 1943 年，“满铁调查部”细川、西尾和“改造社”、“中央公论”人员在日本富山泊町游玩，日本当局说他们是在会谈重建日本共产党，全部关押，后查封了“改造”、“中央公论”两杂志，细川、西尾两人在狱拷问而死，这次称为“泊事件”。

③ 日本陆海军中，有一种穿军官服，挂洋刀，领口、袖口阶级上与军官不同的人，与军官一样待遇，在军队中工作。

④ 现在上海的锦江饭店，日本为防美机轰炸，陆军占了这所大楼，作为司令部。

⑤ 西田是哲学家，所谓日本自由主义正统派京都学者之一，西田有许多门生。西田哲学实际上是脱离现实，资产阶级代言人和帮凶，西田在日本投降前，和京都学派曾遭到日本军部的残酷镇压，有的入狱，有的致死。

之话常出于口。1943年时，他就看出战局对日本不太有利，曾说：“在电气时代，用志士式[①]来处理国事，是可悲的。”也有像笠原仲二不问政治，埋首为研究而研究，称写调查报告为拿稿费。他承认日本是侵略中国，却又认为是局势所然，没有办法的。松山自以为超然、高贵，笠原热爱调查研究，其他不问。这两个自称为学者的，1944年时均离所回到日本老家去，原因不详。

班内许多人，都认为“分所”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不承认这是军部一个经济情报机关，实际上大家在替军部作特务，他们还强调调查部与特务机关子机关的不同之处[②]。大家又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任何一个日本公司、大的商行，不与军部发生直接、间接关系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给这些高级特务弄糊涂了，竟也把“分所”当作了“学术研究机构”，自以为他们说的对。

七

抗战胜利后，“满铁调查部上海分所”是被国民党文化单位接收的，拖了不少日子，重要资料、有价值文件，全都给日本人烧毁、隐藏了。

1945年12月时，我途遇芝池靖夫，这个日本法西斯特务分子却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特务王凡生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又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的部下，手拿公事皮包，住着花园洋房。我和他谈到“满铁调查部上海分所”，芝池说：“中国人（指国民党）对“分所”一点不感兴趣，不值一顾。日本人搞的东西，如果不认识，叫他们乱弄是很可惜的。”事实上，国民党忙于“五子登科”，确也如此。

（1964年8月）

---

① 日本明治维新，出现了许多武士，以爱国报国之名，借牺牲生命，主观武断地处理国事，进行恐怖活动。

② 日本陆海军特务机关，往往是陆海军的外交机关，机关长拜访地方当局、交际等。又收税，发市民证，什么事都做。门口挂了特务机关招牌，特务机关以现役军官为主，1945年改为联络部。机关是专做不能公开或不便公开事，机关是秘密的，有以代号的机关，有以机关负责人姓作名称的，如“梅机关”、“竹机关”、“松机关”、“儿玉机关”、“影佐机关”、“岩井机关”等等，机关有搞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的，领导人有军人，也有非军人。机关有长期的，也有办完一件即结束。有五六个人的机关，也有几百人的机关，全属陆海军。属大使馆的后来设有调查部、研究所，与机关一样，以一件事为中心，不同的是公开。有属民间，也有公司、工厂等，内中没有现役军人。日本样样行业，大一些商行、公司、工厂全附设有调查所、研究所，这中间也有进步团体办的。在日本国内调查所更多，机关在日本国内（过去）是没有的。调查所、研究所在侵华时期，在中国的，几乎又全成了军队的帮凶。

艰难的四个月——勤劳奉仕队追记

王 福 翔*

我家住吉林省海龙县梅河口街内，当时家里只妻子和三岁的女儿。1942 年 12 月毕业于伪东丰县国民高等学校。由于我出身在贫寒家庭，亦无权贵的亲朋，因而，毕业后连个正当和固定职业都没找到。为了糊口度日，当时在伪东丰县公署地政科以绘图、制图为生，有活干就去，一天一元三角钱，没活就另找地方，曾在东丰县城内小学代过课，也到过“兴农合作社”给抄写传票，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苦难生活。

1943 年 2 月初，我满 19 岁，到此年龄的男性必须检查“国兵”。旧社会俗语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况且谁都知道，检查上“国兵”，立即开到山海关一带去打仗，多半是九死一生，所以兵是不能当的。又怎么能不去当兵呢？当然，有权有势的不用去，就是一般有些钱的人，想方设法弄一百张绵羊票（当时的纸币，一张为一元钱）买通检查兵的医生，就说是有病也就不合格了。这种办法对我来说是毫无能力和门路的，就是在检查“国兵”时，在“规定”中有一条是：凡体重不够 50 公斤以上的人是不合格的。当时我是 54 公斤，想法减掉 5 公斤，就可以不去当炮灰。于是我在检查的头二十天，每日晚上不睡觉，白天既不合眼打盹，又不吃饱饭，不下炕不出家门，有问者便说患了伤寒病，就这样，让急速瘦下来。在临检查的头两天，开始吃饱一点的饭，不然是起不来的，头也抬不起来，怕看出是假装的，因临时有病，可延期检查。检查时，我挺着胸，满有精神，当医生问我有什么病没有？我说：“没有。”医生说：“没有病为什么这么瘦弱？”我又高声说：“不知道。”接着我按顺序到外科、五官科等各处检查。快要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到了最后日本检查官那儿，他在台上坐在转椅上翻看着我的身体检查表，看了一会，他走下台阶到我的面前，上下打量看我。当时我明白，因为两个月前才从学校毕业，如果这个小样哪能像个学生。检查官没有通过翻译（因国高毕业生的日本语都得是二等翻译）问我：“你认为你能不能合格？”我也用日本话说：“不知道。”日本人走上台坐下来又看身体检查表，他也不时地看着我，我像高粱秆似地立正站着，约有半小时左右，他又下来了，站在我的面前，喊起口令，当喊着向后转时，我一转身就栽倒了，这个野兽用大皮靴踢我七八下，骂了一声“八嘎亚路”，又回到台上坐下，气呼呼地说：“不合格。”他生气我可乐坏了，就这样成了“国兵漏”。

“国兵漏”下来了，乐得几天没睡好觉，邻居们向我道喜，给地主扛长工的舅父和表弟也在夜间从 20 里路远来看我。可是没乐几天，街公所通知“国兵漏”，每年服六到八个月的劳役，连服三年期限。当时尽管笑颜消逝了，但总还是认为万幸，当劳工一

---

* 作者曾为勤劳奉仕队队员。

是离家近，二是总还是有个盼头。

1943 年 2 月初，伪街公所通知我准备参加“勤劳奉仕队”。真的要当劳工了，也为起难来，一走半年多，老婆孩子谁给养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托人给伪街公所劳工股长送了四色礼，就以我在东丰县小学当教员（教员不服劳役）也就免了。1944 年也用同样办法又免了一年。到了第三年，也就是 1945 年，梅河口由街改为镇，编制增加了，原来管劳工的姓吴，这回是赖兴国当了劳工股长，姓赖的胃口大，四色礼是拿不出手的，必须得赶“一百只绵羊”（也就是当时的一百元钱）送去。这对吃上顿没下顿的我来说是无能为力了。只是以“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去参加了“勤劳奉仕队”。

1945 年 4 月 11 日我被抽抓参加了勤劳奉仕队，任务是在吉林省东丰县二十方地（距梅河口街 25 华里，是海龙县与东丰县相接的地方）修军用飞机场。

“勤劳奉仕队”是日本名词，它与当时的“国兵”都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霸占全世界服务。当时劳工有两种：一种是抓来的老百姓或伪满所谓政治犯（在押犯人），也有所谓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被抓进“矫正院”去当劳工进行所谓的“矫正思想”；另一种便是抽“国兵”没合格的人（即“国兵漏”）叫“勤劳奉仕队”。

“勤劳奉仕队”每年服劳役六到八个月，连服三年。这些劳役，在当时发给一套黄色衣服、一顶战斗帽、一对绑腿、两个铜碗，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这和抓来的劳工稍有区别的就是劳工只发给两个铜碗，没有其他物品，但其宗旨都是为“大东亚共荣圈”，也就是为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和东南亚而服役。

我刚去时是编在第一大队二中队一小队，是队员。去后不到一个月，医务室的一个卫生员家里有钱，买通了大队长，以患痨病（即是肺结核）为由而回家治病去了。李仲琛是我青梅竹马的好友，他竟当上了大队的文书。他看我挑土篮、抡大镐实在吃不消，便通过中队长把我抽出来当了卫生员。

由于当勤劳奉仕队队员的时间不长，新改做卫生员，又和上边的人都是敬而远之，没有什么接触，知道的不多，特别是一些人物的姓名原来就不知道，就是知道的，因印象不深，距今数十年也记不清了。仅将组织机构、生活情况及几件事记述如下：

一、组织机构

1945 年的勤劳奉仕队，全海龙县分三个大队，即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三个大队均统一受伪海龙县公署劳工科领导，劳工科的几个日本人成立“劳工指挥部”，直接领导处理几个大队的劳工事宜。每个大队长和大队附还有中队长都是劳工科的科员担任。大队文书和中队附、中队文书等人都是伪县公署某科的科员，他们也都是“国兵漏”。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在哪儿干活不知道，我们是第一大队。我们第一大队的大队部设在第二中队部（住在一个院，分别办公）。第一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五个小队，每个小队五六十人左右，每个小队下面又分几个小组。

我是在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大队长张旭庭，大队附姓杜，大队文书李仲琛。

第二中队队长姓龙，我们都叫龙队长，中队附姓孙。中队部下设医务室，由四人组

成：医务室主任刘医生（是位中医），孙大夫（西医），二名卫生员，王铎、王福翔。中队部下还设有炊事班，炊事班班长张德才，采购员李林，还有七八名炊事员。

每个中队有一辆三匹马的胶轮大车，还有二匹骑马（是中队长、中队副使用的），马夫四个人（因大队长、大队副的马也在中队一起喂养，一匹马一个人），还有一名队员每夜专门喂马。

二、牛马生活

勤劳奉仕队队员，每日早6时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晚7时停工（实际有时干到8点多），除午间吃饭1个小时外，上下午各6个多小时的劳动。如果有几天下雨停工未干，也得按规定的土方按时完成，完成不了的就得挑灯夜战，当时曾有人计算过每日的劳动时间为14小时零5分钟。

任务是修军用飞机场，从百米之外的地方，挖出土运到中央跑道上，因地面高低不平，有的要垫起一二米，有的是一条大沟，这样需用的土方就多了。每个队员一副土篮、一把锹、一把镐，装满土篮挑起就得小跑，不跑叫小队长看见特别让日本人的监工看见，举起洋镐把就打，往往把人打倒在地，倒下必须立即爬起来，挑起土篮再跑，跑慢了还得挨打，有的跑着跑着一头栽倒了昏迷过去，在确认是真的昏迷就抬到一边的草地上，有的逐渐苏醒过来，再去干活，也有爬不起来，没有医救，时间一长也就一命呜呼！

我在小队干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挨过两次打：第一次是我挑起土篮就跑，没跑几步被一个病友倒在地上扔在一旁的扁担绊倒，这时，正赶上日本人在旁边站着，他抢上几步，抡起镐把打了七八下，我忍痛急忙爬起又跑，就在我爬起将跑的时候，日本人因我起的太慢，又挨了两镐把。第二次是我发疟疾，全身发抖，一点力气也没有，可是还得挑起重重的土篮，别说跑，就是走也直不起腰。这时，小队长侯崽子（他名侯福林）看见了，走过来气急败坏地说："我看你就不顺眼，净装熊，我看你跑不跑！"我心里真害怕，知道不跑马上棒子上身，可是我只往前走两步，一头栽倒了，这侯崽子抡起镐把，一直把我打昏过去。苏醒过来时，是躺在一块乱草地上，嘴角流着血，四肢不能动弹，当时也觉不出哪儿疼痛。在草地上躺了三个多小时，停工时被难友抬回席棚里，接着病情加重了，又在病号房里躺了七八天。后被老同学李仲琛救出小队，到医务室当了卫生员。

在我病倒之后，又有一位是姓林的队员，他拉痢疾，俗语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他已经拉了一天了，小队长又不准假，出工时他东摇西晃手捂肚子，走路都十分困难，哪有力量去挑沉重的土篮。他挑起来，没走出十步，正赶上日本人在现场，日本人说他"泡磨菇"，一顿拳打脚踢，口里不停地骂"八嘎亚路"。小队长一看，这边给他丢了脸，也想在日本人面前讨讨好，便抡起镐把全身乱打，当即不省人事，抬回送到席棚里，半夜就死了。满棚的难友号啕大哭，真是目不忍睹，万分凄惨！

每日三顿饭，早饭是每人"两个头"，即是橡子面的窝窝头加上一块咸菜头；午饭是一中碗干饭（小米饭或有时高粱米干饭）和一中碗仅有一星半点的生豆油（菜做好

后满锅滴上几滴生豆油，油就飘在上面，显出菜里有油）和几片菜叶的汤；晚上是“三个一”，即是一碗稀粥、一个窝窝头、一块咸萝卜头。如果这些饭菜要让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的人吃了还可以活着，而让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并且干着极其劳累的活的人怎么活呢？

队员住的是席棚，就是在平地上，中间挖成一米左右深的长沟，作为中间通道，两面铺上一层木板，周围用席子一围，老百姓叫席棚。队员们一个挨着一个躺着，夏日炎热，湿气侵人，外面下着雨，棚里也是下雨，每个人的被褥全是湿淋淋的，这又怎么能不得病呢？

吃的、住的和所干的活，这能说是人的生活吗？牛马还有个不漏雨的圈棚，有草料能填满肚子。饿得队员们都偷马料吃，特别是喂马的豆饼能充饥，可几头骡马又有多少马料呢？

可是大队长、大队附、中队长、中队附加上医务室主任，他们是专门小灶，吃的是高粱米、苞米面（他们不吃橡子面），还有玉米粒子，菜是专做的，每顿四个菜。住的是民宅，这些吸血鬼坑害了多少人。

当时，队员患病的极多，主要是三种病，一是伤寒，二是霍乱，三是痢疾，前两种病死的人最多。此外，还有一种拉不下来屎的病。人们吃了橡子面，吃时虽然发涩不好往下咽，但往外便时就不容易了，一拉就得很长时间，屎蛋也下不来。人们一开始都用木棒往外抠，木棒太粗抠不出来，后来又用细铁丝弯个钩，但弄不好把肛门周围弄破了，大热的天容易发炎，记得一个队员就因为往外抠粪便，把肛门周围弄破了，烂得化脓，后来也死掉了。

三、巧救病友

第二中队医务室共四人，主任刘医生，年近四十岁，是全队年龄最大的一个，为人正直坦率，具有白衣战士的救死扶伤精神，他经常说：“人活着得对起得良心，人非禽兽之类。”他在敢怒不敢言的恐怖之中，有时在没有外人（得仅有我一人）的时候，也骂上几句，他看到队员在挨毒打时气愤地骂道：“这些人（指队长）就不是他娘养的，真是禽兽。”他看到队员患病，特别临危之际，他总是说：“这是什么世道！”我几次低声对他说：“注意点，别吃眼前亏。”他说：“没关系，再过四十年还这么大。”说实在的，据前两年就当过队员的人就说：“前年（指 1943 年）在辽阳市附近的首山，队员死了大约四分之一，去年（指 1944 年）没有四分之一也有十分之一。”群众议论说，咱们这个中队长是队长中最好的，他从不动手打人，而且还过问队员吃的、住的，所以，头二年别的中队长都提升为大队长，只有他仍然是中队长，而且在上司面前老挨克。是呀，大队长动不动就打人，把队员按在长条凳子上，从臀部往下排，一直打到脚后跟，真是皮开肉绽。今年又有个好医务室主任，老主任看病认真，都是好言安慰病号，可没药也是无法治好病。

7 月下旬的一天，从工地抬回一个膀大腰圆的人，经刘医生、孙大夫诊断后，说是伤寒病，于是就把他送到患伤寒病的病号一起。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小队曾与我住在

一起的冷玉柱。我俩曾在睡不着觉的时候，用被蒙上头唠过家常，知道他家只有一个50多岁的老妈妈和不足10岁的小妹妹，爹爹已去世六七年了，租地主九亩薄地维持家中生活。他的病一天天重起来，怎么办呢？我想他要死了，他妈妈可怎么活呢，今后生活怎么办呢？我又想，怎么也不能让他死去。想来想去还得马上把他送回家。但又怎么送呢？他家住在梅河口街东边的莲河车站的后山里，30华里的路程实在是不好送，这事要让队长，特别是让张大队长知道，可就非同小可。我在无计可施之时想到了刘主任。晚饭后，我约刘主任到房后的空地上（屋内有那个卫生员），说出了我想救冷玉柱的想法，他也很同情冷玉柱，可是怎么救法，当时他提出最好让冷家来接回去，那么谁能去送信呢？就是送去信，他老娘又怎么能把他弄回去呢？这一夜没想出办法。第二天起床后，看到冷玉柱命在旦夕。午饭后，刘主任从队长那知道了明日大车要到梅河口街（距冷家18华里）往回拉东西。我问他，能不能借大车去梅河口之机，把冷玉柱送回去。他沉思了一下说："不行，车老板一旦泄露出去就坏事了。孙大夫虽然回家不在队上，可还有王铎又怎么办？"这事确实难呀，经过我俩反复商讨决定，还是乘机送回去，这个好时机不能错过。刘主任立即决定让卫生员王铎马上出发，到山城镇（去山城镇正好与去梅河口的方向是相反的）买药（药名忘记了），实际要买的这种药，根本买不到。这样把他支走，同时又告诉他顺便回家看看（王铎家在山城镇附近），可以晚回来一天。刘主任很严肃地对我说："小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关系到咱俩的切身利害和生命攸关。"我再一次表示决心，同时我又提出说："我会赶车，能不能把车夫也支走。"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俩正商量之时，车夫小耿来了，他说他拉肚子，刘主任开心地笑了，他给车夫压压肚子，摸一会脉说："你可能是痢疾，别看你现在还能走动，怕明天你就要起不来了，你马上到病号室住，及时给你吃药。"他还笑嘻嘻地说："好事好事呀！"刘主任快步向队长室走去，二十多分钟后回来了，对我说："小王，我和队长说好了，让你替小耿赶车，明天早点走，限你午饭前回来。"接着他又说："小王，你想没想过，把冷玉柱放在车上，一旦让人发现怎么办，这真是冒险呀！"我说："刘主任，你放心，出任何事我一个人顶着，绝不连累别人，我豁出来了！"他热泪盈眶深情地说："好，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是真正的好心人。"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刘主任偷偷地把冷玉柱抬到车上，用张旧炕席盖上，并用几根粗木棒压住两边，悄悄地赶车走了。冤家路窄，走出部队约5里左右的路，迎面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走过后又调转马头，高声叫道："哪儿的大车？"我这时也没看出来是谁，也就没吱声，可他认出我来，说："王卫生员，你干什么去？"这时我也认出他了，急中生智地说："大队附，你好，这么早啊，我到梅河口拉货，顺便将一名患传染病的死尸送到前面的小峡谷里去。"他下马围车转了一圈，断定席子下面真的躺着一个死人，也就走了，吓我一头大汗。一路上我几次把手伸到他的鼻子上，试试还有没有气，反正下定决心，死了也把他送到他妈妈的面前。在吃早饭的时候，总算摸到了他家，他家是在一个小沟里，孤家独院，他妈妈和小妹妹一看车上是他们的亲人，蹦到车上，伏在身上就哭，他娘俩认为已断气了。我急忙说："还有气，快抬到屋里，不要紧的。"这样我们三个把冷玉柱抬到炕上，我从兜里拿出三元四角钱（我和刘主任走前筹备的）说："大娘，快找医生抓药治病，我得马上回去，这是偷着把你儿子送回来的，

别对别人说呀！”老妈妈拉住我的胳膊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快告诉我。”又叫小梅子（她女儿的名字）“快做饭让你王哥哥吃点。”我急步走到车前举起鞭子吆喝着便跑。到梅河口街的供应站（专供劳工施工用品的），装上20袋水泥回到了队部。刘医生看到大车进了院，便飞也似地到我面前说：“小王，送到了吗？”我告诉他说：“一切平安无事，冷玉柱现在已经躺妈妈的身边了。”我俩会心地笑了。刘医生回到医务室写了一份死亡报告书（谁死后都得写一份死亡报告书），送到了中队部。他叫我和他一起进了病号室。看看车夫小耿，小耿看到刘医生便说：“刘主任，我肚子不怎么疼了，也没拉肚子，我出去吧！”刘医生笑笑说：“你出去吧，不好再来找我。”车夫出门后说：“谁愿在这死地方住！”晚饭时，刘医生把饭菜端回医务室，又让我也把我的饭菜打回来（我是在伙房里面吃），他叫我把门关上，他从装衣服的小木箱中取出一小瓶白酒，敢笑不敢说地干杯。

但未想到，事隔两年，被救出去的冷玉柱突然见面了。记得是在1947年冬，一个身穿黄棉袄的八路找我，到面前一看，正是冷玉柱，他把我抱起来转了好几圈，告诉我说：“妈妈让我找到你，给你叩头谢谢救命之恩！”他刚要跪下时被我抱住，他又对我说：“我当八路了，马上随军南下。”我向他说：“你妈妈那么大年纪，你走了今后生活怎么办？”他说：“妈妈和妹妹在家就行了，翻身不忘共产党！”这是后话了，不赘述。

四、豆油风波

这些天，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张大队长总是气势凶恶，张嘴骂人，看谁不顺眼举手就打。天黑后，队员们正准备睡觉，大队文书李仲琛悄悄地在门外招呼我，出去后，我俩到房后的黑暗处，李说：“前天不知谁在大队部的门外面贴张纸条，上写着：‘张大队长往家偷豆油’等话，大队长看见了，说是你写的，你写没写？”我说：“我没写，我要写的话，我就敢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我接着又说：“李文书，当真人不说假话，大队长在前天早上，他父亲走时，确实拎走四大绿棒子（装四斤豆油的瓶子）的豆油。队员每天连星点油腥都尝不到，怕队员闹，在从锅里往外盛菜前，滴上几滴生豆油，油飘在上面，真他妈的缺德，偷油做贼，实在太残酷了！”李又说：“你怎么看见的？”我说：“有个队员要咽气了，我起来看看，在往回走时看见的。”李仲琛说：“小王，既然不是你干的，你可千万别乱讲，大队长把中队长臭骂一顿，限三天之内查出人来，当心呀！”

事隔两天的早上，二中队的队员好似翻了天，有的在骂，有的在喊，有的甚至说话中要落下泪来。为什么呢？原来是在大队部的房山头的墙上，贴出一大张黄牛皮纸，上写着：“张大队长不给我们油吃，可他让他父亲往家拿，队员一个个瘦的风来能刮倒，死的死，病的病，大队长太没人性了。”这下队员明白了，有的说：“到县里告大队长。”有的说：“咱们大家团结起来，和大队长讲讲理，牛马还有草料，牛马吃的豆饼咱们谁能吃到，咱们真不如牛马啦！”中队长一看不好，立即集合，命大伙扛起锹镐，挑起土篮，都去干活。到工地后他可真火了，他第一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找死吗？”接着他又讲几句，大意是：根本没有的事，纯粹是捏造的，坚决要把人查

出来，严惩不赦。是谁干的要站出来，真正好汉就应当敢做敢当。我也在猜想，这是谁干的呢？当然看见大队长偷豆油这件事倒不一定只我一个人，但能有这么大的胆量和写得一手好字，是谁呢？我沉思着，在脑子里又细细考虑着，也想不出人来。当然我想找出来，不是去告发，而是要赞扬他，助他一臂之力。我和刘医生从工地往回走的路上，刘医生偷偷地对我亲热地说："小王，你别把我当外人，你说实话，是不是你写的？"我说："刘主任，你把我当成亲弟弟，我有什么还不能告诉你吗？"刘医生惊奇地说："这就怪了，咱队除你能写一手好水笔字，再有大队李文书，还有谁呢？"

张大队长看见头一个纸条生了气，可看见了这张大的纸张，气得暴跳如雷，一头栽倒炕上，大家都知道，预示着即将来临的一场灾难。吃了晚饭后，大队副把我叫到大队部，大队长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横眉立眼，张口就骂道："姓王的，我和你有什么怨仇，你坑害我，煽动劳工和我做对，看谁干过谁，你知罪吗？"我说："我没有什么罪！"张大队长说："是你写的！"我接着说："我没写。"张大队长从桌角过来，左右开弓的大耳光子打在我的脸上，不知多少下，反正也不觉得什么了，鼻口往外窜血，我气愤地说："你们怎么知道是我写的，你们看看是我的笔体吗？诬赖好人！"张大队长接着说："我看就是你写的，你再不承认就打死你！"随后，他们一齐都出去了，大约十多分钟后，大队长、中队长、大队附等人又回来了，大队附向我说："你说这事不是你干的，那你知道是谁干的？"我说："反正我没干，我干我就敢承认，好汉做事好汉当。"中队长说："问你知道是谁干的？"我又说："那我怎么能知道，我整天在医务室里。"大队附让我回去。

从这一事件发生后，大灶的菜里也确实增添了黄黄的豆油。晚上正好医务室的孙大夫让第一中队借去了，因为他们那有病的太多，所以孙大夫和卫生员王铎去一中队。李仲琛来到医务室，首先看看我被打的伤口，然后说："真怪，是从天上飞下来的纸条，不然是谁干的呢！"刘医生说："李文书，得想个办法，不然小王还得挨打，保命要紧呀！"李仲琛说："刘医生，我看这么办好不好？道北那么多抓来的劳工，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明天咱俩一齐想法与大队附讲，不管谁写的，就说是道北有劳工看见后打抱不平而写的。"我说："那不行呀！大队长要问你俩怎么知道的，怎么办？"刘医生说："那不要紧，现在大队长认定是你写的，咱把小王写的医务室日记，还有死亡呈报表等都拿去，让大队长、大队附认认笔体，只要证明不是小王写的，然后提出疑问和猜测，他们既要否定不是小王写的，又确实找不到别人，他们也就会不了了之。"我们三人又说了一会话，李仲琛回去了。第二天一起床，又贴出一张纸条，只写六个大字："小心你的脑袋。"这样，大队长等人都认为不是我写的，后来知道他们所以否定了我，一是因为字体不对。二是我这些日子已被监视起来（监视人为大队附和大队文书李仲琛），后来就认为是道北的劳工干的。

事过半月左右，在一个晚饭后，大队长的马夫小栗，大声地吆喊我说："王卫生员，你没有什么任务来帮忙不好吗？我牵六匹马顾不过来的。"我也高声地说："行呀，这么多匹马，你一个人怎么行，我帮帮你。"我跳上马背，同小栗一起到较远的地方放牧，当我俩把马安排好后，马贪婪地吃着青草。小栗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说："王哥，你受苦了，小弟向你请罪。"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说："小栗，怎么回事？"小

栗说："弄大队长的事是我干的，是我看到队员病的病，死的死，这些马都能填满肚子，可队员吃的那口饭菜。"说到这，他抽泣地说不出话了，我说："小栗，你说是你干的，那字是你写的吗?"他说："那天早上我起来给马拌料，看见了张大队长送他父亲走，他父亲手拎的豆油，我把这事说给我舅舅了，他很生气，他是个私学馆的教书先生，是他写的字。特别我看到张大队长那天晚上打你，我急坏了，半夜我偷偷跑到舅舅那又写出一张，好在他们不打你了。"我一听，真相大白了，连忙对他说："小栗，你真行，为大家争得了好处，有勇有谋，使人敬佩!"小栗说："王哥，你受苦挨打，太对不起你!"我说："没啥，受点屈倒换来了好处，现在伙食好了不少，张大队长这些天不仅不再骂人打人，连影都很少见到了，你做得对，真是好样的。"我们俩商定，这个事谁也不能讲出去，谁泄露了就不够朋友，晚上躺在木板凉床上，越发感到这个小马夫真了不起。

五、东北光复

8月上旬以来，看到路北的劳工住地经常吵闹，也有些人不干活了。大队长一次讲话中曾说："你们是有组织的，叫个队伍，不能像那边（指道北劳工）的混蛋们，整天泡磨菇，磨洋工，你们谁敢那样就打死谁。"一天晚饭后（每晚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在附近走一走），李仲琛来到医务室，约我和刘医生去工棚看看病号（豆油事件后使我们三人更加亲近），走出工棚后，我们三人到一块空地上，也正好在那儿还有两个人蹲在那唠嗑。我们上前问他们俩是干什么的?他俩说是道北的劳工，说是从奉天（今沈阳市）抓来的，他又指指那个人说："他叫董玉良，是被日本鬼子抓进监狱，判处徒刑的。"又说了几句话，我们三人有些害怕回去了。又隔两天，我们三人又走到那个地方，又遇上了叫董玉良的人。董玉良很客气地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家庭情况如何，董玉良说："咱们都是穷苦人，当劳工的。哪有地主和有权有势的人来当劳工，我们快干出头了，这个人压迫人、人吃人的日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有八路军打日本，苏联也出兵东北，东北要光复了!"刘医生一听很吃惊，拉着我和李的手就往回走，刚走五六步，董玉良抢上来说："大哥，不要怕，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是穷光蛋，难道我们还希望地主老财压迫我们吗!还让小日本在中国随便杀人吗?难道我们还没当够这苦劳工吗!大哥，小兄弟，你们记着，几个月后小日本就垮台了，中国八路军就打胜仗了，咱们这些穷苦人就不当牛做马了!"董玉良这个人很善讲，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屋里。以后我们不敢再去那个地方，这要让张大队长等人知道，这真是"反满抗日"的政治犯。我和刘医生也在猜测这个董玉良不是一般人，很可能是这个（这个是用大拇指和二拇指一伸开形成"八"字），表示八路。八路是什么当时也不清楚，只听道北劳工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比划着，我们也听到些。

一个晚上，我和刘医生不知不觉又走到那块空地，一眼又看到了董玉良和另一个人坐在那儿说话，当他看见我俩时，急忙站起来，十分和蔼地说："大哥和小兄弟来了，快坐下。"我大胆地向他说："你（指董）当劳工前干什么活的?"董说："咱们都一样，是个穷光蛋，我在奉天市拉洋车，跑一天也填不满肚皮，这日子真没法过。你们二

位看，那地主一天什么也不干，粮食堆成山，商号的大老板胖得像个大肥猪，有的是钱。可咱们干呀，干呀，累断了腰还是吃不饱，这是什么道理，就是不平等。你们二位想想，这是个什么理。”刚说到这，从远处往这儿来了好几个人影，就这样我们俩快步回到医务室。

8月16日这天，道北劳工们大喊大叫，有高呼口号的，有唱歌的，也有哈哈大笑的。我们莫名其妙地在院子里看。正在这时，从道北跑过来一群人，高喊着说：“穷哥们，小日本垮台了，中国胜利了，我们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又有一个高个子说：“快回家吧！胜利了！”董玉良从后面挤过来说：“有个日本鬼子让我们打不行了，咱们快把仓库打开。”我们叫他这么一说，也就叫起来了。我急忙找李仲琛，问问他怎么办？李说：“大队长和大队附天一亮他俩就走了，不知哪儿去了，我看咱们也往家跑吧。”这时道北劳工高喊：“老乡们，劳工同胞们，快去取粮食呀，仓库里什么都有……”。这时队员也乱了营，都收拾行李，有的跑到仓库背一袋米，也有扛着一捆新苇席，也有背一捆新衣服的。我收拾完被褥，和刘医生、李仲琛话别后，也背了一袋高粱米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当我突然闯进家门，妻子和女儿都问我怎么回来了，当知道日本鬼子投降了，亡国奴的生活结束了，再也不当劳工了，我们幸福地流下了眼泪。

我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驻了梅河口。当我知道是八路军，正是董玉良大哥所说的打鬼子的八路军，我一定要参加，一定要为中华民族兴起，为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流尽最后一滴血。从此，我参加了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后来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伪满四平省执行奴化教育实况

曲 秉 善*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教育本质就是奴化、奴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即改变了以前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忠良的“满洲国国民”，并将劳作教育为其根本的方针；又修改了教材，将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完全废除而代之以“满洲国”历史、“满洲国”地理，并灌输所谓“满洲国”建国精神——“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等谬论，提倡崇敬“皇帝”、尊重孔子和求神拜佛，奖励劳作，极尽奴化、奴役的能事。学制仍然沿用以前的三三学制，即初级小学三年，高级小学三年，初级中学三年，高级中学三年，大学三年或四年。1936 年伪满实行新学制，将小学缩短为五年即国民初级三年，国民优级二年，将中学缩短为国民高等学校四年，大学三年或四年，并使各级教育都不相衔接、各个独立。中等学校只限于工科、商科、农科，不设文科、理科，高等学校也只限于法科、工科、农科、医科。此外还有四年制的师道学校（即师范学校）和四年制的师道大学。这又降低了伪满的教育质量，并且用各级教育不相衔接的办法来限制学生继续受教育。1943 年伪满文教部制定了“时局下教育方策”，迫使学生信奉“天照大神”，加强对学生灌输唯神之道——“反本报始”、“忠孝一致”、“感恩报德”，加强学生劳作，积极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进一步奴化和奴役学生。1944 年 12 月伪满政府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强迫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学生每年服三个月的劳役，将奴役学生制度化了。

伪满四平省有学生 18 万人，这 18 万名学生在国民初级学校、国民优级学校、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和伪协和会的三年训练所等教育机关受奴化奴役教育。我于 1943 年 4 月充当伪四平省省长直到 1945 年 8 月。我在充当伪省长后，伪四平省就执行了伪文教部新制定的“时局下教育方策”，加强对学生的奴化奴役教育和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对省内各学校都配置了日本教员、日本主事或日本校长。除了乡村的一部分国民初级学校外，所有各学校都发给了伪满皇帝溥仪的“御影”、“国本奠定诏书”、“时局诏书”，还都设置了供奉“天照大神”的神龛。各学校在每天早晨上课前，学生都要遥拜“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的小庙），遥拜“皇宫”（日本天皇裕仁的住所）、遥拜“帝宫”（伪满皇帝溥仪的住所）。每逢举行典礼时，都对日“满”两国旗敬礼，遥拜“建国神庙”、遥拜“皇宫”、遥拜“帝宫”，读“时局诏书”和“国本奠定诏书”。

---

* 作者曾任伪满四平省省长。

每月8日都举行“诏书奉戴日”，宣读“时局诏书”，并由校长对学生讲话，宣传日本太平洋侵略战争的胜利，强调日“满”两国有“生死存亡断弗兮携”的关系，号召学生积极“协力”日本的侵略战争。每年的2月6日是伪满皇帝溥仪的生日，都举行“万寿节”的庆祝典礼，使学生对溥仪的“御影”行“最敬礼”，并由校长对学生讲话，对溥仪歌功颂德，训示学生对溥仪尽忠尽孝。每年5月2日是伪满皇帝溥仪第一次访日回来后颁发“回銮训民诏书”的纪念日，举行纪念典礼，宣读“回銮训民诏书”并由校长对学生讲话，强调日“满”的关系，必须与日本“一德一心”。每年的7月15日是“建国神庙”建立的“纪念日”，都举行纪念典礼，遥拜“建国神庙”，读“国本奠定诏书”，并由校长对学生讲话，麻痹学生必须奉“天照大神”，实践“唯神之道”，对伪满皇帝尽忠尽孝，对日本要感恩报德，“反始报本”举全力援助日本的侵略战争。每年在春秋两季都举行祀孔，宣传仲尼学说，麻痹学生遵守封建道德。凡学生出入供有“天照大神”神龛的屋子时，都必须对“天照大神”神龛行礼。同一个学校的学生，下级学生必须对上级学生行礼，上级学生有管教下级学生的义务。

各学校在课堂上都以日本语为伪满的“国语”之一，迫使学生学日本语，说日本话，读日文书，写日本文。日本殖民当局教育都是用日语教授学生课程，使学生日本人化。各学校都迫使学生学习日本侵略者编造的“满洲国历史”、“满洲国地理”。这个编造的“满洲国历史”和“满洲国地理”，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地理割分开，硬说东北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早就是一个实质上的“独立国家”，硬说伪满洲国是世界上一个“独立的国家”，生活在东北的人民就必须爱护伪满洲国。还设有“建国精神”课程，在这个课程里，说伪满的“建国精神”是“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国本奠于唯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所谓唯神之道，就是“反始报本”，“感恩报德”，“感谢”日本的大恩大德。所谓“忠孝之教”就是对伪满皇帝溥仪尽忠尽孝。并使学生背诵“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时局诏书”、“录定诏书”、“讲解诏书”。学生在听课时，听见说“天照大神”、“天皇”、“皇帝”等时，就必须挺起胸来端坐。又提倡尊孔、求神拜佛和鼓吹封建道德。对于社会科学则根本不教授学生，对于自然科学所教授学生的仅限于浅肤的皮毛，不深人理论，而且不能理论联系实际。

各学校都用“勤劳奉仕”的名目，迫使学生经常或者是天天出去帮助修道路、拔草、扫街和在日本人开设的厂矿企业里做工。伪开原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迫使女学生种稻田，由于不重视学生的生理条件和强迫劳动，因而患病者甚多，所收获的大米则完全由学校的日本教员支配，一方面留他们自己吃，一方面拿到县、省和伪中央去送礼邀功。海龙县命令小学生给日本军采集制造酒石酸用的山葡萄，强迫一千多名小学生每日爬山越岭采集山葡萄，受蜂蜇虫咬，中毒受伤，脸面红肿鳞伤，刺破了衣服，磨坏了鞋子。将山葡萄采回来后，还必须放进锅里加人生石灰加热熬，熬成后压成石灰脑，然后才能交给日本军。一个学生登上锅台用木棒搅拌，由于脚滑而堕人锅里，惨被烫死。梨树县强迫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在整个暑假期间到县内赫尔苏参加给日本“开拓民”修拦洪大坝造水库的劳役，到县二龙山、老公林子等地给日本“开拓民”造农地。在1944年12月伪满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后，伪文教部指定西安县（今辽源市）国

民高等学校的学生每年在西安煤矿服三个月的劳役，和普通工人一样下矿挖煤。

各学校都以实践“唯神之道”、“反始报本”对日本“感恩报德”、协助“亲邦日本的大东亚战争”为号召，迫使学生“献纳金属”和“献纳飞机献金”。所谓“献纳金属”，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人民的金属的一种手段，学校命令学生经常要从家往学校里拿铜铁等金属，“支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学校将学生拿去的金属交给伪协和会县本部或市本部，然后经由“日满商事”运往日本用于侵略战争。学生为了献纳金属，甚至将家里正在使用的金属器皿拿去献纳。也有的学生由于不止一次地献纳金属，最后由于无物可献而不敢上学。所谓“献纳飞机献金”，是在1943年5月根据伪满文教部的命令，各学校强迫学生每年每月每星期每天都“献纳飞机献金”。有的学生为了交“飞机献金”，向家长哭闹逼要，有的家长为了给其子女筹备“飞机献金”而典当物资和出卖物资，也有的学生为了交“飞机献金”而不吃午饭、节省零钱作为“飞机献金”。这个所谓“飞机献金”，截至1945年5月已经达到伪币40万元之巨，当时由我送到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献纳”飞机两架。在“献纳”仪式上我对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说：“这是四平省18万学生支援圣战的诚意，谨祝圣战早日完遂。”参谋副长说：“我们对学生支援圣战的诚意表示感谢，我们越益发挥皇军的威力，使圣战早日完遂。”

伪四平省每年都从省内32个中学学校中，奴化大约一千六百多名毕业学生，其中有10%升入伪满的高等学校继续受奴化教育，其余的90%都充当伪满军吏、伪警察、伪教员以及到其他伪机关、伪组织里为日本侵略当局服务。

伪协和会的“青年训练所”与学校完全不同，专对农村的青年施行军事训练和灌输奴化思想。伪协和会县部长是“青年训练所”的所长，其下设有专任的日本主事和军事教官、普通教官，担当对受训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和用欺骗的言词讲解“建国精神”、“唯神之道”、各种“诏书”、伪协和会运动、伪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农业常识等。分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由浅入深，每部都是四个月毕业，每年训练一次或二次，每次40人到50人，伪四平省各县都设有一个“青年训练所”。

我在伪四平省长期内，前后到学校去视察对学生讲过话的中等学校有四平市师道学校、昌图县国民高等学校、昌图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开原县国民高等学校、长岭县国民高等学校、双辽县国民高等学校。参加学生毕业典礼的中学学校有西安县国民高等学校、西安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东丰县师道学校、东丰县国民高等学校、东丰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开原县国民高等学校、开原县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昌图县八面城农业学校、四平市师道学校。我在对学生讲话中主要说：“亲邦日本在进行着大东亚战争，在此时局下，我们仰体‘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的帝旨，都必须实践唯神之道，对亲邦日本感恩报德，积极支援圣战。你们学生要一面努力求学，一面积极参加劳作，积极支援国策，协力战争，以使圣战早日完遂。”我在对毕业的学生讲话中主要说：“皇帝陛下在国本奠定诏书里说，国本奠于唯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又在时局诏书里说，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你们要仰体帝旨，今后无论是升学继续读书，或是到各方面去服务，都要给满洲国尽忠，给皇帝陛下尽孝，对亲邦日本感恩报德，竭诚服务和努力求学，积极支援大东亚圣战。”

1945年5月，伪文教大臣卢元善来到四平，要到西安去看西安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在西安煤矿服劳役的情况。我领他到西安县西安煤矿，西安煤矿的日本社长又领他到泰兴矿井的井口前，从里面叫出从事挖煤的西安县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五十多人，站在我们的面前。他们每个人头上都带着电灯，颜面苍白，满身灰尘，两脚泥土，身子发颤。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还麻痹他们说："劳动是神圣的，你们在这劳动，既能锻炼你们的身心，又能给国家生产煤炭，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这种劳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你们必须听从煤矿当局的指挥，好好努力劳动。"当天的晚间，西安煤矿的日本社长在他的俱乐部设盛筵招待卢元善和我。伪西安县孙县长也乘机找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对县城内的学校教员讲话。孙县长将县城内所有中等学校和小学校的教员约80多人都集合在县公署的大礼堂内，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对他们讲话，主要说：目前教育者的重要使命，就是要根据"时局下教育方策"来教育学生。"时局下教育方策"的具体主要内容，就是对学生教育"唯神之道"和加强奖励学生的劳作。各教员们要深入地钻研"时局下教育方策"，耐心地教育学生，领导学生实践"唯神之道"，协力国策支援"亲邦"日本的"大东亚战争"，以使圣战早日完遂。

在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离开西安县的时候，伪西安县公署为了对他表示敬意，特送给他一筐鸡蛋。

（1962年）

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教育

薛 蓝 石*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法西斯强盗以武力强占沈阳，进而强占东北各地。

于冲汉、袁金铠等出来组织地方“维持会”，并以此代表“民意”机关，召开“东北各省市县代表大会”，要求组织伪政府。

当时铁路沿线各大城市中小学多半停办，仅有少数职工在校看守，有的学校被日本法西斯强盗作为兵营，教员也多离散。

不久，地方“维持会”派韦秀石为教育筹备处的处长，南满中学堂日本人坪川与吉为第一科的科长，筹备中小学开学事宜。

伪满洲国成立后，教育筹备处改为教育所，因此，韦秀石便成了所长，第一科长仍是坪川与吉，还增添许多日本人为科长、主任，各地学校也陆续开学了，沈阳女子师范校长仍为林耀山先生，我也回到女师，做教员。

当时伪国务院通令说：“嗣后各学校课程，着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见《第一次满洲国年报》）。

因此，日伪教育方针也规定为“重仁义，讲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独立安全，交谊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大同为宗旨”。（见《第二次满洲国年报》）。

《满洲建国宣言》也说：“政本于道，道本于天，新国家建设之旨——以顺天安民为主，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见关毅《国民道德参考资料》）。

《执政宣言》又说：“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见关毅《国民道德参考资料》）。

伪外交部《宣言》也说：“新国家以王道为政纲，不取杂霸诈欺之术，以大同为主业，亦无种族歧视之心。”（见关毅《国民道德参考资料》）。

这样，所谓“王道”、“大同”等的名词便成为日伪统治东北人民的麻醉剂。

但这时学校课程标准，日伪因忙于军事，尚无明确的规定，一般课本仍使用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各科教科书，做教员的只是“照本宣科”，什么“满洲国”、“王道主义”、“大同”等，皆闭口不谈，学生没有人提出这样问题。有位日籍教员，叫做广赖庆次，是从“满铁”一个小学调转来的，担任日语教学，一般同事很少和他往来，有人和他接近，同事总无任何表示，但心里是瞧不起的，有时学生还嗤之以鼻，因此，

* 作者曾任伪满沈阳女子师范学校教员。

一般教员的精神，是苦闷的。

1934年3月1日，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加强统治东北，驱使溥仪重登皇帝宝座，宣布“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执政”改为“皇帝”，“大同”年号改为“康德”，因此，“执政府”一变而为“宫内府”，各部“首长”也一变而为“大臣”了，大大小小的汉奸们更都认为“满洲国基”已经巩固，张学良不会收复失地，大汉奸冯涵清说他最少也能做20年的司法大臣。

同时，日本法西斯强盗在东北的最高统帅也改为驻“满洲帝国”“全权大使”兼关东军司令官，其实，就是变相的“满洲总监”。

因此，所谓满洲帝国，只是日本法西斯强盗和国内汉奸大地主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日本法西斯强盗把从前统治朝鲜的各种各样恶毒的手法，一步步地移植到东北来。

这些日本法西斯强盗，不仅企图把东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更企图把东北变成他们的领土。

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这些强盗们首先是提出的“王道主义”，及“康德”重登“宝座”后，便一变而为“皇道主义”。如：

《满洲国组织法》说：“满洲帝国，由皇帝统治之，皇帝之尊严，不可侵犯。”

《帝制实施总理声明书》说：“是遵由天命，上承天意。”又说：“若误以此为清朝的复辟，则殊非忠于建国理想与使命之政府所取者也。”

《即位诏书》说：“朕以藐躬，乃承天眷，假我尺柄，授我丘民，流亡渐集，兴起讴歌，兵气潜消，化为日月，夫皇天无亲，唯德斯辅，而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吁请正位，询谋众同，敢不敬承天命。”

《回銮训民诏书》说：“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

日本人田村敏雄著《教育国家论》说：“满洲国是立于与日本国不可分一体之关系上，各民族才能协和，在国内才能建设王道乐土，把满洲国建成理想的王道乐土后，才能进而建设道义世界。”

这样看起来：

（1）日伪统治东北建立“满洲国”认为是“天兴人归，王道乐土，理想世界”。

（2）日伪认为“满洲国”与日本是一体不可分的，是“亲邦善邻，一德一心，共存共荣”。

（3）日伪认为“满洲国皇帝”与清末皇帝，虽同是一个人，但“满洲国皇帝”不等于清末皇帝的复辟，“满洲帝国”也不等于后清。

其实，“满洲帝国”的“皇帝”，只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满洲帝国”也只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谓“日满不可分”、“日、满、鲜三位一体”地叫嚷，正是如此。

在学校教育，当时也有很大的变化，日语增加授课时数，日语教员也增加人数，沈阳女师校长林耀山不甘心做汉奸，离职到北平去，伪教育所即派侯宝山接充。侯是辽宁省盖平人，北洋优级师范毕业，时已60多岁，一切校务多和日籍教员请教，看颜色行事。一般教员，也是没精打采，只是教课罢了，别无活动。

伪满“皇帝”访日回来，发表《回銮训民诏书》，便成学校教育最重要的指导方针。因此，学校把它用黄绫包起，放在特制木匣内，并恭恭敬敬地悬挂在校长会议室正面，任何人经过“诏书”前，必须用脚尖轻轻走路，同时向“诏书”行注目礼，并不得在“诏书”前大声说话，否则便是“大不敬”，是“有罪”的。每逢学校开学或节日举行任何仪式，必须恭读“回銮训民诏书”，校长和日籍教员皆着协和服、礼帽、白手套，校长鹄立在主席台上等接“诏书”，日籍教员从校长室俯首高捧“诏书”，慢慢步入会场，全体师生徐徐俯身90度，不许仰视及有任何声音。及日籍教员到主席台前，双手高举“诏书”，校长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诚惶诚恐地轻声慢语宣读“诏书”，全体师生连大气都不敢出。及毕，仍由日籍教员把“诏书”送回校长室，全体师生才长出了一口气。这一幕趣剧，真叫人哭笑不得。

沈阳女师学校原出有校刊，是学生练习写作的园地，由我主其事，每年出版一期。学生踊跃投稿，但多故事、小说及其他小品文字等，其中以广庄璘、霍士俊、穆桂芸等写的较好，尤其是描写劳动人民及反侵略战争的几篇文字，如《陈妈》、《李大爷的故事》和《俾斯麦尔娜》等，皆具有比较清醒的进步因素。日籍教员广濑庆次不懂汉文，校长侯宝山也只看看封面和标题。因此，这个刊物发行，并没有引起任何问题，同时有几位校外青年作家对上述几篇文章发生兴趣，在报纸上加以好评，校长侯宝山也很高兴(时间是在1936年，是校内刊物，校外散发为数不多。特此注明)。

一次，在我印发教材中发现有内容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传单，是用英文写的，这都说明了沈阳女师学生及工作人员中，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其后穆桂芸到关内参加抗日游击队伍，据说是在大同一带，但全国解放后，穆桂芸迄无消息，其姊见着我也说她下落不明。先班毕业生佟淑娴也是参加游击队伍的，据说牺牲在大同一带，其他当时在沈阳女师学习的，如中十一级的李凤珍、新师七级的李敏晖、新师八级的郭光洁等，先后皆参加革命队伍，对人民做出一定贡献。

女师照例毕业班皆到校外各地参观见习，1936年有两班新制师范毕业，学生计有90余人，分为两组，一组由日籍教员广濑庆次和日语教员傅喜珍率领，到日本各大城市参观见习，一组由我和一位日籍女教员率领，到旅大参观见习，并约定日期在大连聚齐再回学校。我率领学生在大连参观见习，如期，我即同学生到大连码头迎接，及轮船靠岸，到日本参观见习的学生，刚一见面，皆落泪，有的还失声地哭起来。我愕然，和日籍教员广濑庆次寒暄数语，便暗示学生某，把失声哭泣的几个学生送到旅馆休息，并说她们因晕船的关系，暂时不能活动。其实，她们在日本参观见习，受到委曲。如在火车上，所谓皇军坐在学生近旁，很不老实，做种种丑态，学生敢怒而不敢言，日籍教员广濑庆次也熟视无睹。因此，全体学生对日籍教员皆怨恨不已。对日语教员傅喜珍也有意见，我不敢过问，尤其我被日伪逮捕释放出来不久，深怕惹起误会，是吃不消的。

但返校后，日籍教员广濑庆次处处寻我差头，我只是不理，其实，我是不敢理的，只有俯首忍受罢了。

现在，我每一回忆起来，独有余痛，这一段亡国奴的教育生活，真是够人呛的。

并且，在这期间，日伪更加紧统治东北文化教育事业，更加反动。

在中小学普遍增加日籍副校长一人，沈阳女子师范的副校长叫做中村敏男，40来

岁，是日本新调来的。他不在校长室办公，却在教员预备室正面设置办公桌，每天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好像日本教育所说的教头。同事上班来也只有坐在自己的位置，也是不言不语地埋头备课，有课即上，无课即坐在预备室，装模作样地备课。因此，教员预备室的空气，是很紧张的。相视以目，平时爱说爱笑的人，现在早也变成“静默寡言的君子”。每个同事内心的苦闷。是不言而喻的。

1937年，日伪统治者更进一步提出神道主义来，如：

《国本奠定诏书》说：“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只承，有孚无穷。”

“天照大神”是溥仪二次访日时“接”回来的，并奉为“建国元神”，各地立庙奉祀。日伪言称：“满洲帝国”和日本帝国，都是“天照大神”所创造的，也是日“满”不可分的“一体关系”上的“神道根据”。因此，“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和日本帝国天皇裕仁，便成为“双生”的兄弟了，日本帝国的皇太后也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太后”了。日本人田村敏雄著《教育国家论》说：“同至庭园散步，每值上下坡之际，皇帝陛下（指伪满洲国皇帝）辄行近皇太后陛下（日本天皇的母亲）之侧，以手相扶；皇帝陛下在新京（长春）宫内府时，皇父醇亲王升阶之际，皇帝陛下必趋前相扶，今扶皇太后陛下，盖完全同此敬意也。”

因此，这又是“日满不可分一体关系”上的“伦理根据”。

伪满《新国歌》中也说：“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帝德之隆，巍巍荡荡莫与俦，永受天佑兮，万寿无疆薄海讴，仰赞天业兮，辉煌日用侔。”

这样，日伪初则提出所谓“王道主义”，既而又提出所谓“皇道主义”，最后更提出所谓“神道主义”，并强迫东北青年崇拜傀儡皇帝和日本天皇，以及遥拜“建国神庙”和日本神社等，这就充分暴露了日本法西斯强盗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的真实面目。

因此，日本法西斯强盗在东北14年所施行的文化教育，是在灌输东北青年学生崇拜皇帝的封建迷信思想及尊敬天皇的亲日思想，从而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及反满抗日的爱国活动，以达到它奴化东北3000万人民的目的。

在1932年，中小学开学，是仍照“九一八”前的学制办理的，并没有改革。但是日伪为了消灭东北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对于高等学校教育，就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封闭了旧政权时代的各种高等教育机关，事实上，就是取消了大学教育制度。

同时，还限制东北青年到关内各大学就业，如滨江伪省公署曾向各县发出通令略称：“各县现在仍有多数在中国留学生，殊深遗憾。”又称：“满洲建国，实施王道教育，与中国教育旨趣，显有不同，身为学生及其家长，于此自能明了，而尤狃于旧习故蹈非理……今后在中国方面于建国后留学卒业之学生，一律禁止采用。”并规定：“现在留学中国之学生，应由县长商令其家长，转入友邦日本相当学校，或其他国家相当之学校；此后志愿国外留学，事先向本县长提出户籍证明、履历书及留学所在国名等。”（以上见日伪文教月报第十六号及滨江省公署训令滨教学字第八四二号）。

在这同时，日伪特设立许多教育机关，如资政局训练所、法学校、陆军训练所、警察学校等，招收中学毕业的学生，训练汉奸特务及其帮凶。资政局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

院，法学校后改为法政大学，皆不在文教行政范围以内，如大同学院是隶属于伪国务院总务厅，并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有联系的，是训练汉奸的大本营。法政大学和警察学校，皆隶属于伪国务院司法部，陆军训练所是隶属于伪军政部（见日伪《第一次民生年鉴》及《满洲国现势》）。

1933年日伪公布“私立学校规程”，承认沈阳小河沿医科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圣乌拉吉米尔专门学校等的设立。

在1934年又恢复了高等教育制度，即设立培养中等学校师资的吉林高等师范学校。1935年又设立了培养农林畜牧人材的沈阳高等农业学校（见皆川丰治著《满洲国之教育》）。

在中小学沿用“九一八”前旧制外也有改动，主要是为便于宣传“建国精神”，进一步麻痹东北3000万人民，把旧中国封建时代的私塾恢复起来，和民众学校皆列为初等教育的一部分。而这两种教育机关的设置，在山林及边远地区为最多。

在中等教育方面，设置初级小学毕业就能升入的职业学校，从而培养具有初级文化的职工，以便任其驱使。特别注重实科中学，甚至把原来的普通中学改为实科中学，其中改为农科中学的更多。

日伪在1937年5月2日，公布他们所谓“新学制”，1938年1月间开始实行。这个所谓“新学制”，是有很大的变革的。

在初等教育阶段，仍为6年，儿童满7周岁入学，前4年改称国民学校，相当于以前的初级小学校，后2年改称国民优级学校，相当于以前的高级小学校，但这两种学校多设在城镇，学习年限并未缩短。此外，还设1至3年的国民学舍，并把私塾改为国民义塾，学习年限也是3年，这两种学校多设在边远地方，设备是极其简陋的，师资也很低劣。这显然，是一种双轨制的变形。

在中等教育阶段，缩短为4年，高级中学、初级中学的名称取消了，改称国民高等学校，分为农、工、商、水产及商船五科，目的在培养各种各样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技工，不做升大学准备。

在高等教育阶段，缩短为3年，其所谓大学，只是具有中国高中和专科学校的水平，只是在培养所谓“实用人材”，如师道大学、法政大学及哈尔滨学院等，而不做学术的研究。日伪当局把它叫做第一次大学，凡第一次大学毕业生愿意深造，或被认为适于研究高深学术的，可能选入最高的大学，如农业大学、工业大学、医科大学及建国大学等，但前三者，皆为自然科学的研究，仅建国大学后期是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

职业学校，是为国民学校毕业不能升入国民优级学校，而给以职业常识的训练，其目的在培养能为日伪当局驱使的劳工。

师道学校，是由师范学校而改变的，招收国民高等毕业的学生，而授以教育专业的训练，便可充任国民学校的教师。

师道特修科是由师范讲习科而改变的，招收国民优级学校的毕业生，而授以教育专业的训练，便可充任国民学舍或国民义塾的教师。

学前的教育，日伪当局虽然把它列入所谓新学制系统以内，是由私人自由办理的（以上见《满洲教育》第三卷第六号）。

总之，日伪当局所谓新学制，是其统治东北14年实施殖民教育的具体内容之一，见表1：

表1：　　　　新学制系统表

程度	学年	年龄			
高等教育	3	19	大学　师道高等学校		
	2	18	特修科　师道学校		
	1	17	师道科女国民高等学校		
中等教育	4	16	国民高等学校		
	3	15		师道特修科	职业学校
	2	14			
	1	13			
初等教育	2	12	国民优级学校		
	1	11			
	4	10	国民学校		
	3	9			
	2	8	国民学舍		
	1	7	国民义塾		
学前教育			幼稚园		

从表1学制系统分析起来，很显然地暴露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3000万人民恶毒的教育手法：

（1）普遍缩短教育年限。固然初等教育阶段，从7岁到12岁仍为6年，但边远及山林地区，只设立国民学舍及国民义塾，只是3年，设备简陋，教师文化水平又低，因此一般学龄儿童所受到的教育就极其可怜了。即或住在城镇地方有国民优级学校可入，但一般劳动人民吃混和面也来不及，哪有力量供给子女进入国民优级学校和国民高等学校，自然都被打入职业学校了，尤其是农业职业学校是很多的，东北有广大的可耕土地，这些学生以实习的名义整日整月在田野做无偿的劳动。

（2）国民高等学校是分科的，其中也以农业为最多，在田间实习时间也比较多，或美其名叫做劳作，并正式规定在课程时间表内，更有所谓"勤劳奉仕"，也就是徭役的变名。因此，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女从7岁到16岁能读完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阶段，所学得的知识，也是不多的，大学也是如此。

（3）不重视幼儿教育。九一八事变前的幼儿教育机关，在1936年撤消了，所有保育员给资遣散，因此幼儿教育阶段，在日伪所谓新学制中，虽也列入，但只是些有钱人家在家中雇用女保育员，负责教养，一般劳动人民是办不到的。最高的大学，在所谓新学制中，并无任何科系及学习年限的规定，只是在一般教育文件中规定有第一次大学毕业生愿意深造，或被认可选入最高的大学，如农业大学、工业大学、医科大学及建国大学等，这又不是一般劳动人民的子女所能进得去的。

因此，"新学制"，是不折不扣地为殖民地服务的学校制度。

随着这个所谓新学制的施行，于同年又公布了各级学校规程，统一了教育方针任务、组织与内容各方面，因此，各级学校课程也有统一的标准，见表2、表3：

表 2：日伪国民学舍、国民义塾课程标准表

学校类别	学年及时数	建国精神	国语科	数学	自然科	实务科	体练科	艺能科	勤劳奉仕	合计
单级的国民学舍·及国民义塾	第一学年	3	14 日语7 满语7	7	3	2	3	3		35
两个年级的国民学舍及国民义塾	第一学年	3	13 日语6 满语7	6	2	2	3	3		32
	第二学年	3	14 日语7 满语7	7	3	2	3	3		35
三个年级的国民学舍及国民义塾	第一学年	3	(12 日语6 满语6	5	2	2	3	3		29
	第二学年	3	13 日语6 满语7	6	2	2	3	3		32
	第三学年	3	14 日语7 满语7	7	3	2	3	3		35

表3： **日伪国民学校国民优级学校课程标准表**

学校类别	学年及时数＼学科	建国精神	国语科	数学	自然科	实务科	体练科	艺能科	勤劳奉仕	合计
国民学校	第一学年	2	12 日语 6 满语 6	3	2	1	3	3		26
	第二学年	2	12 日语 6 满语 6	4	2	2	3	3		28
	第三学年	4	12 日语 6 满语 6	5	2	2	4	3		32
	第四学年	4	12 日语 6 满语 6	5	2	2	4	3		32
国民优级学校	第一学年	4	12 日语 6 满语 6	5	3	4	4	3		35
	第二学年	4	12 日语 6 满语 6	5	3	4	4	3		35

表2、表3说明：（1）建国精神包括“王道主义”、“皇道主义”、“神道主义”的主要内容：如《建国宣言》、《执政宣言》、《帝制实施总理声明书》、《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等。综合在一起，叫做“建国精神”，并包括“满洲国”历史及地理等问题都在内。

（2）“国语”科，包括日语、“满语”和“蒙语”的，在原东北地区学校，“国语科”只教日语和“满语”，在原内蒙地区学校，“国语”科，只教日语和蒙古语。日伪这种区分，是有政治上的恶毒作用，也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东北大块土地的真实面目（“满洲帝国”只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3）数学科，就是算术科。

（4）自然科，包括生物理化等的知识。

（5）实务科，包括农工等的生产劳动。在规定时数外，每学年还增加整日实习1日至20日。

（6）体练科也是在规定时数外，每学年还增加整日训练1日至20日。

（7）艺能科，包括图书音乐及书法等。

（8）"勤劳奉仕"每学年必须参加1日至10日。

（9）括弧内的数字，为每周授课时数。

（10）"满语"就是"协和语"，也就是汉语和日语的混合语，原来满族语言早为汉语所同化而不存在。

表4： **日伪国民高等学校课程标准表**

学校类别	学年及时数＼学科	建国精神	国语科	数学科	自然科	实务科	教体练科	艺能科	外国语科	勤劳奉仕	合计
国民高等学校	第一学年	4	9 日6 满3 或 蒙3	4	4	10	2 3	3	2		41
	第二学年	4	9 日6 满3 或 蒙3	4	4	10	3 3	3	3		43
	第三学年	4	9 日6 满3 或 蒙3	3	4	12	3 3	1	3		42
	第四学年	4	9 日6 满3 或 蒙3	3	4	12	3 3	1	1		41

表5：

日伪师道学校课程标准表

学校类别 \ 学年及时数 \ 学科		建国精神	国语科	教育科	数学科	自然科	实务科	教练科 体练科	艺能科	勤劳奉仕	合计
本科第一部	第一学年	4	12 日6 满6		4	4	5	2 3	5		39
	第二学年	4	12 日6 满6		4	4	5	2 3	5		39
	第三学年	4	10 日6 满4	4	3	4	4	3 3 3	4		39
	第四学年	4	10 日6 满4	4	3	4	4	3 3	5		40
本科第二部	第一学年	4	12 日6 满6	6	2	2	4	2 2	5		39
特修科	第一学年	4	14 日8 满6		3	4	4	2 3	5		39
	第二学年	4	10 日6 满4	4	3	4	4	2 2	5		38
训练部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表4、表5说明：

（1）“建国精神”，在表2、表3两表后，曾加说明，但在中等教育阶段，不论内容及时数，均较初等教育阶段有所增加，也更加反动，如强调东北“地理条件”和“历

史条件”，说“东北从远古就属另一个独立国家和民族”，就这样把东北和中国内地割裂开来，做种种恶毒的宣传，以混乱世界人民的耳目。

（2）“国语”科和初等教育阶段一样，包括日本语、“满洲语”或蒙古语，但时数不同，日本语适为“满洲语”或蒙古语的二倍，这也说明了所谓满洲帝国的语言文字，是以日本帝国的语言文字为主体的，不言而喻，“满洲帝国”便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日“满”不可分一体之关系上，正是如此。

（3）数学科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

（4）自然科包括生物及理化等。

（5）实务科，指各专业如农、工、商、水产、商船等的生产劳动，在每周规定授课时数外，每学年还增加整日实习1日至30日。师道则改为实业科，在规定每周授课时数外，每学年还增加整日实习1日至24日。

（6）体练科，在规定每周授课时数外，每学年还增加整日训练1日至15日。

（7）教练科，在规定每周授课时数外，每学年还增加整日训练1日至15日。其目的在培养东北青年学生绝对服从的思想和习性，并愿为“皇帝”效忠。这种军事训练的科目，是在1941年规定的。

（8）女校实务科，为家事、裁缝、手艺、烹饪等。

（9）“勤劳奉仕”，每学年必须参加20日以下。

（10）教育科还包括教材研究，但没有教育实习的规定。

在1932年时，各地中小学逐渐开学，日伪通知各级学校，凡是含有反满抗日内容及其他“不适当”的教材，皆严禁使用，如“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归还旅顺大连”、“琉球本为中国藩属，日人废其王，改为冲绳县”等语句的教科书，有一百多种，及至“康德皇帝”访日归来，颁布“回銮训民诏书”后，日伪就大力搜集和编纂教科书强迫各级学校使用，如所谓满语课本内容，就有“靖国神社”、《仁德天皇》、《王孝子故事》、《山田长政》、《佐久间大佐事略》、《忠孝一本》、《康熙皇帝东巡诗》、《游日本五浦记》、《日本三景》、《曾国藩谕子书》、《良好之满洲国人》等。日语课本也有《桃太郎》、《乃木大将》、《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国民精神》、《御巡狩》、《御访日》、《奉迎满洲国皇帝陛下之歌》、《拜受大诏》、《回銮训民诏书》等。以上所有“诏书”宣言，学生均须熟读深思，默写时须一字没有错误。

其他各科教材更甚于此，如1935年出版的“满洲国史”，是从“太古的肃慎、挹娄、扶馀叙起，直到近世，满族人民始终没有失掉独立存在，因此，溥仪，即满洲帝国的皇帝位，是满洲民族的正统，是天与人归的”。这样，就把东北人民和祖国隔离开来。又如“近世因受俄国的侵略，满蒙地方迫于危机，此时，日本不顾本国的存亡，便毅然奋起，救此危机，于是日满关系，由此密切”，但是“军阀跋扈，破坏和平，满蒙复陷于危机，幸赖日本军的再起，才脱却此难”（以上参看原书）。如此颠倒是非，把侵略说成正义，使人不胜气愤。

又如地理教科书上说：“日本帝国和满洲帝国的关系，只是一衣带水、唇亡齿寒的形势，成自天然，更竭诚相助，互亲善，共存荣，已成为两国不可磨灭的事实。”又说“苏联是‘满洲’的邻国，两国界线最长，尝以北满铁路为导线，宣传共产主义，从收

买北满路权后，其赤化手段，已无从入手”（以上参考原书）。因此，日伪所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只是断烂朝报，实无科学的价值。但不久又把历史地理二科，合并为地历科，及所谓新学制施行，更把历史及地理二科的教材，统归于“建国精神”，便成日伪宣传“皇道主义”有力的工具。地历名辞，也就勾消了。

其他自然科中的教材，也只是片断的、零碎的科学常识，缺乏系统的原则的阐发。就是日伪所重视的实务科和职业教育，其内容不外以下各种，如：农业、铁道、园艺、养蚕、养蜂、畜牧、自动车、航空、航海、照像、电气、修理、机械、家具、陶器、漆器、印刷、测量、打样、制图、养殖、打鱼、兽医、裁缝、手艺、洗染、烹饪、打字、速记、簿记、珠算、美容、理发、助产、看护、针灸、按摩、制丝、演艺等等的常识（见皆川丰治著《满洲之教育》33 页）。

这些课程及其内容，是为日本垄断资本家培养各种各样具有奴才思想的熟练职工。

大学课程及其内容，因学校性质的不同，是由各该学校自行编定，但“建国精神”、“国语”、体练、教练等，也皆定为必修，“勤劳奉仕”更须参加。实务实习日数，和中等教育阶段有过之无不及者，盖因日伪大学教育目的是在培养实用人材，而不是从事学术的研究，因此，有些人员是缺乏祖国观念的，并心甘情愿地给日伪做工具。

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教育，不仅是通过课堂教学来控制青年学生的思想和活动，而且利用课外活动及日常生活来麻痹和欺骗一般青年学生，如吉林伪组织为监督青年学生思想，提倡“建国精神”，曾征集特务部门的意见，从而制订《统制青年学生思想方案》（见《第二次敌伪文教年鉴》）。

同时，在“满洲帝国”成立后不久，日伪分子就把“康德皇帝”这位活招牌抬出来，到各地区游行，日语叫做“御巡狩”，大肆宣传。到沈阳时，命令各级学校叫师生列队，到南站欢迎。我校师生四五百人，是分配在南市区一带鹄候。街上也断绝行人，商店及住民皆关闭门户，并有警卫持枪站岗，不得有任何声音和活动。及“康德皇帝”到来，有成排的小卧车、摩托车，载有全副武装的兵车、机关枪，真是“威武”极了。一个个的日伪分子，如演戏然，一声号令，全体师生徐徐俯首行 90 度的鞠躬礼，不许仰首，不许咳嗽，再声号令，解除了。这是什么事？“康德皇帝”是谁？是清末最后一代的宣统皇帝，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皇帝，而今又落在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手里，与其说是“巡狩”，毋宁说是“白相”。我曾偷视他一眼，坐在轿车中，好像木偶一样，一切活动另有牵线人，他本人是没有意志自由的。我的思想很沉闷，回校十里路上一言不发，学生也是抑郁寡欢，及入校门，不约而同地皆长吁了一口气。

在 1934 年后，“康德皇帝”访日归来，发表“回銮训民诏书”，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皆须根据“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的原则，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为转移。因此，“回銮训民诏书”便成学校教育青年学生极重要的文件，不论在开学和节日集会时，皆须恭读“回銮训民诏书”，已如前述。

在 1937 年后，即向各级学校颁发“康德皇帝”的照片，日伪称做“御影”，及“即位诏书”、“访日回銮训民诏书”等。在“康德皇帝”二次访日归来，又把日本“天照大神”接来，奉为“建国元神”，到处立庙，叫做“建国神庙”，这是日伪统治东北的一件大事，并发表“国本奠定诏书”。

以上“御影”，及各“诏书”等的保存，校长及教员须以生命担保，一般放在学校特设的一间屋子里，叫做“奉安殿”。这是学校很重要的“文件”，没有它，学校是不能开办的，如有火灾及战争发生，校长、教员、学生等，须不顾一切牺牲来抢救，否则，要受到严厉的惩办。

此外，在各级学校内，都建筑所谓“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强迫青年学生朝晚礼拜，而所谓“建国忠灵”原来是些屠杀东北人民不眨眼的刽子手。

在1941年后，日伪为培养崇敬“天照大神”及绝对服从的习性，特在国民高等学校订立下级生绝对服从上级生的制度。学生每早出家门，就开始军事训练的生活，路遇上级生就得行举手礼，否则，就是一顿毒打，或是呵责。路过日本神社，要脱帽行最敬礼，如慢行而过，一被发现，就要受“不敬罪”处分。及进校门，要向“建国神庙”及“建国忠灵庙”行礼，遇着教员要行脱帽礼，对军事教官行举手礼。一闻铃声，即在操场集合，举行“朝礼”，其顺序是先升“国旗”，次即向“建国神庙”及“建国忠灵庙”遥拜，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死英灵”，再次，校长领读国民训，值日教员讲话，进行“建国体操”。值日教员讲话时，如果提到“皇帝陛下”或“天皇陛下”，全体师生即须立正。

所谓“国民训”如下：

一、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唯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

二、国民须“以忠孝仁义为本”，“民族协和”，努力于“道义国家”之完成。

三、国民须尚勤劳，广公益，邻保相亲，精励职务，贡献于“国运之隆昌”。

四、国民须刚毅自立，尊节义，重廉耻，以礼让为先，企图“国风之显扬”。

五、国民须举全力实现建立理想迈进于“大东亚共荣之达成”（见《建国教育第九卷》）。

在每一班级中设有班长一人，是由班级学生中指派一人担任，权力很大，其他学生均须受他管制，谁也不敢惹，否则他报告日籍教员，一生命运是不堪设想的。

日籍教员不时对学生进行思想调查，不言而喻，是一种特殊的手段。

在一天功课完了，以班级为单位，还须举行“终礼”，要学生反省一天学习的情况。出校时，须向“建国神庙”及“建国忠灵庙”行礼，路过“御影奉安殿”，须行最敬礼。在回家路上遇见上级生必须行礼，如经过“神社”更须行礼。一直进入家门，这一天军事训练的生活才算完结。

在校住宿的学生更是麻烦，每天早起集合在校院举行“朝礼”。用饭时，先行默祷后，才得开吃，不许说话，要肃静，吃完饭还须默祷“感谢天照大神”和“天皇陛下”赐给我们这顿好饭吃。就寝前，还须整队，俯首静默三分钟，反省有无失敬“天照大神”及“天皇陛下”的地方，然后分向父母所在地行礼，同学相向行礼，最后再向舍监先生行礼，并用日语齐声说“请安息吧”，这才回室入睡。

住宿生也是下级生服从上级生，好宿舍、好床铺，都是上级生住，下级生要服一切杂役，如扫地、提水等。

日伪训练青年学生，不仅是如此，还规定各级学校须参加祀关岳、祀孔、丁祭、万

寿节、天长节、明治节以及日伪重要人物迎送，皆有一定的仪式和规定，如果违反便以“不敬罪”论处（参考《伪满奴化教育第三节》）。

因此，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教育，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也是为汉奸走狗及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对此，在下列资料中，就可得到证明：

据1935年调查全东北学龄儿童是418.7016万人，得入学校的儿童是96.3145万人，未得入学校的儿童是325.3871万人，这样，得入学校的儿童只有23%，未得入学校的儿童就有77%。又据1937年调查全东北学龄儿童是446.1928万人，得入学校的儿童是134.9371万人，未得入学校的儿童是311.7557万人，得入学校的儿童只有30%，未得入学校的儿童就有70%。

再据1936年调查全东北学龄儿童在开学前请求入学的是58.5756万人，得入学校的儿童是42.0709万人，未得入学校的儿童，是16.5047万人，这样，得入学校的儿童是72%，未得入学校的儿童是28%。未到学校请求入学校的学龄儿童，尚不知有若干人。

从以上三年调查的数字看来，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很低，但相反的，儿童的退学率却又很高。

据1935年调查全东北小学退学儿童数，就有25.4474万人，是逐年增加的，伪教育司长日人皆川丰治说：“退学率，由康德三年度（1936年）到康德四年度，在初级小学的四年内达53%，在高级小学二年内达24%”（见皆川丰治著《满洲国之教育》），这是惊人的。

再看一看中学的情况：

据1935年调查全东北中学生数，男生是2.0887万人，女生是5437人，合计是2.6324万人。

据1937年调查全东北中学生数，男生是2.6453万人，女生是7197人，合计是3.3650万人。

由于日伪认为中学是反满抗日的导源地，因此，在“九一八”事件后，就封闭或强占中学校舍，如龙江一中校舍一部被日本关东军占为仓库。也有教员学生被逮捕或监禁，从而学生数大为减少，直到1937年，还未能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从以上3年调查的数字也得到证明（按“九一八”前中学数是194校，学生数是3.8575万人；1935年中学数是184校，学生数是2.6324万人；1936年中学数是170校，学生数是2.9375万人；1937年中学数是173校，学生数是3.3650万人）。但日伪为统制青年思想及培养顺驯的工具起见，在1936年把许多初级中学改为职业学校，同时取消高中文理分科，而改设农、工、商三科。因此，东北当时只保留三所高级中学，即沈阳第一高中、吉林第一高中、黑龙江第一高中，而农工商各科高中只侧重职业班。女子高初中全部撤消，改为女子职业班。各县中学着重施以地方实业的教育为主，并以一县一校为准则，女子中学改为女子补习科，专授以家事、裁缝、育儿等必要学科等。及至1938年实行所谓新学制，就连这点保留的中学，也都取消了，一律改为四年制具有职业学校性质的“国民高等学校”，从此，“九一八”前所有中学的痕迹完全不存在了。但国民高等学校，是分为农科、工科、商科、水产科及商船科等5科，商船科并未开办，因此，当时“国民高等学校”只有四科：

据1939年调查，农科“国民高等学校”计69校，学生1.9209万人；工科“国民高等学校”计17校，学生4447人；商科“国民高等学校”计30校，学生1.2081万人；水产科“国

民高等学校”计1校,学生207人,合计学校数是117校,学生数是3.5944万人,而农科学生居53%。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想对东北农产品进行掠夺,从而设立许多机构,如“兴农合作社”、“兴农金库”等,“农科国民高等学校”就是培养这些掠夺机关的下级工作者。因此,“农科国民高等学校”不论从学校数或是学生数,都是比较多的。一般的“国民高等学校”学生的就学率是很低的,据1939年调查就学率是38%,1942年调查就学率是25%,也有的省区学生的就学率低到15%。相反的学生的退学率和小学一样,也是很高的。但退学的具体原因是些什么?兹根据日伪出版的《文教年鉴》及其他有关文教资料,表列如下:

表6:

学校别	退学原因及人数 \ 调查年度	1936年	1937年	1939年
小学退学人数统计	死亡	1374人	1830人	
	患病	11053人	12982人	
	贫困	27316人	31008人	
	转学	20610人	27569人	
	其他	20519人	22606人	
	合计	80872人	95795人	
中学退学人数统计	死亡	65人	109人	77人
	患病	582人	627人	483人
	贫困	1809人	1207人	621人
	转学	897人	740人	642人
	其他	1253人	1125人	722人
	合计	3806人	3808人	2545人

从表6看起来，学生退学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贫困、患病和死亡。绝大部分的东北劳动人民，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迫害和剥削，每日连混和面都吃不上，更谈不到对子女的教育，因此，学生大量退学在校学生大量减少的现象，无可置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造成的。

在大学教育方面，在“九一八”前东北原有大学，如东北大学、锦州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特别区法政大学、冯庸大学等不下三十多所，在事变发生时遭到破坏，师生也各自离散，学校无形停办。多数东北青年学生在关内参加救亡

运动，对此日伪是害怕的。因此，日伪在1932年恢复各级学校正式上课时，对于原来的高等教育机关，便完全给封闭了，但日伪却说“各高等教育，因规模宏大，需款浩繁，以目前财力谈何容易”等语（见日伪出版的《文教年鉴》）。其实，并不是什么财力问题，而是考虑当时一般青年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是否能接受教育，心甘情愿地做奴才，他们是不相信的。直延到1933年，才开始办理高等教育。到1943年，共计二十所校院：（1）奉天农业大学，（2）哈尔滨农业大学，（3）新京畜产兽医大学，（4）哈尔滨工业大学，（5）新京工业大学，（6）奉天工业大学，（7）新京医科大学，（8）哈尔滨医科大学，（9）佳木斯医科大学，（10）盛京医科大学，（11）盛京医科大学附设药剂养成所，（12）北安开拓医学院，（13）齐齐哈尔开拓医学院，（14）龙井开拓医学院，（15）新京法政大学，（16）哈尔滨学院，（17）兴安学院，（18）北满学院，（19）奉天商学院，（20）王道书院等。其中农工医商四科在高等教育机关中居主要地位，约在80%以上，又皆是单科大学，缺乏社会科学及文科性质的大学，其目的在培养实用人才，也就是技术人员的养成，而无任何学术研究的设备。因此，日伪如此大学只是中等专业学校的程度。此外日伪还有所谓“特殊的高等教育机关”，即“建国大学”，是在1937年成立的，分前后期（各为三年）、大学院及研究院。大学院是收后期毕业生或其他大学学生中日人认为适当者，入学后做专门事项进一步的研究，研究院是由建国大学主要教职员组成，共同研究“建国精神”。

“建国大学”的课程，前期规定有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作业训练、精神讲话、自然科学及数学、人文科学、历史、地理、日文、汉文等；后期授与法政、经济、伦理、哲学、历史等科目，更行勤劳实习，军事训练等如前期，但训练是把全体学生聚在一起，叫做“民族共塾”，从而进行分化和挑拨中国民族间的关系。这个大学是不收费的，不论学费和宿膳费，全部供应，每年招收150多人，如第一期招收东北籍学生55人，日本籍学生70人，朝鲜籍学生10人，台湾籍学生3人，蒙古籍学生7人，白俄学生5人，但日籍学生，每年都在增加，最后增加到三分之二。

这个大学的毕业生，是无条件地被任为高级官员，因此，这个“建国大学”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培养汉奸走狗和特务的高等教育机关。

教职员总数，除“建国大学”不计外，最多是1056人，其中东北人只有263人，日本人则有756人，其他是37人。日本人在全体教职员中占绝大多数约71%，东北人约24%，其他5%。

学生总数也除掉“建国大学”不计外，是6793人，其中东北籍学生数是2716人，日本籍学生数是3717人，其他外籍学生数是360人，因此，日本籍学生在全体学生中也是占大多数，约54%，东北籍学生约40%，其他外籍学生约6%。

这样说来，日伪大学不论是学生或是教职员，皆以日本人为最多的，也可以说日伪的高等教育机关，是纯为日本人而服务的，例如工业大学，东北籍的学生只有34%，日本籍学生则有64%，其他外籍学生是2%。又如医科大学，东北籍学生只有41%，日本籍学生则有56%，其他外籍学生是3%。

再1941年实行所谓《入学志愿者纲要》，其中规定日本籍学生只要学校长及机关首长一次推荐即可入大学，东北籍学生必须经过两次推荐，首先是由“国民高等学校”

校长推荐到伪省长或伪市长，再由伪省长或伪市长推荐到各大学。但具有同等学历经“协和会”支部长认为适当者，也可推荐到各大学。因此，日伪所有大学只有日本人和汉奸走狗特务的子女，才能入学，一般劳动人民的子女，是办不到的。就是中小地主及小商人的子女能否办到也成问题。

但推荐标准，日伪也有规定：（1）“建国精神”的实践及品行；（2）各科考试成绩；（3）体操卫生；“劳动奉仕”（见日伪《法令辑览》）。这个标准，是决定入大学或做官的重要关键，这就是说一个“国民高等学校”的毕业学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如果在思想和行动，没打上汉奸走狗的明显烙印，那是不可能被推荐的，尤其是东北籍的学生。

综括说起来，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教育，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服务的，也就是说，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教育，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教育的一个具体见证。

（1964 年 5 月）

奴化教育亲受记

张德伟*

我自幼生长在东北辽宁省辽阳市，从童年起我就饱受着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东北共沦陷了14年，我就受了10年之久的奴化教育。现将我在这10年中所亲身经受的奴化教育写在下面以供参考。

我于1936年2月进入伪满奉天市（现沈阳市）大东“国民学校”读书，1940年升入伪奉天市立城东男子“国民优级学校”读书，1942年考入南满中学堂读书。

伪满洲国创“国民学校”，除了农村的有所不同外，城市里的“国民学校”，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学制为四年制，男女合校而不合班。

一般的“国民学校”都有两个校长，正校长由当时的所谓满洲国人担任，副校长由日本人担任。除正、副校长外，还有一个负责纪律的训育教员和一个负责军事训练的教官，当时的训育教员是由“满洲国人”担任，军事教官则由日本的现役陆军上尉军官来担任。大东国民学校正校长叫王文举，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止，他都在这个学校当校长。在国民党统治沈阳时期，在竞选沈阳市参议员名单中我还见到过他的名字。

副校长叫本庄漱石，训育教员叫李春萤，教官叫武藤健男。

正校长王文举是不经常到校的，他每星期只到校两次，一次是星期一的校会，另一次是星期六下午的“日满协和青少年团”日。除此之外，他是不露头的。他到校所穿的服装也与众不同，是一身黄呢协和服，从肩上到腰间还斜挎着一个青丝线编织成的绣有红黄兰白黑五色穗的文官带，耀武扬威地出现在师生面前。

副校长本庄漱石早晚都在学校指挥学校的全盘工作。我们这些小学生因此也就和他常常见面。早晨我们一进校门就会看到他在校门前，踱来踱去地散着步。上课铃响了之后，他也会在教堂外走来走去，有时他还会回教室里窃视。当时我是不明白他这种举动是干什么的，直到“八一五”之后才知道，他的这个举动就是对伪满洲国师生的监视。课外活动的时候他也常常走出校长室站在操场上，巡视着我们这些小学生在操场上的各种动态。他整天穿着一身洋服，在洋服左上衣口袋上，常常挂着一个“大日本在乡军人会”的大铜徽章，这表示他是一个“日本在乡军人会”的会员，无疑的他也就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一个法西斯走卒了。

军训教官武藤健男同所有的校头头都不同，他终日穿着黄色的日本陆军军服，肩上还佩带着中尉肩章，上下班到校时总是挎着指挥刀，穿着马裤和长统马靴，走起路来不

* 作者曾在伪满奉天市读小学、中学。

仅仅迈着方步，而且马靴碰地时还发出喀喀的响声来。他对着我们这些小学生经常是瞪着眼睛的，他扮出的这种严肃面孔，使我们一见到他就感到可怕。他也和本庄漱石一个样，常常出没在室内外做着巡视的姿态。他的权利很大，和副校长几乎相等，有时比校长管的还多还严格，吃喝拉撒睡、行立坐卧走样样都管。在校外如果我们这些小学生遇到了他而没有给他打个“立正”，他就会把你的班级和姓名记下来，第二天早晨到校时他就会把你传到训育室重重地打两个嘴巴子。和我在一班读书的李玉忱同学，礼拜天跟姐姐上街买东西，路上没瞧见他，因此就没给他打“立正”。事不凑巧，他把李玉忱同学瞧见了，李玉忱同学第二天早晨一到校就被他叫到训育室打了一顿手板，手都被他打肿了，并且还罚了两个小时的站才放了回来。回来时还得好好地上课，上课时他的手疼得连笔都拿不起来了。教官武藤打我们这些小学生是非常凶狠的，他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传教士。

我还记得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早晨上学由于路上贪玩了一会儿，进校门时迟到了两三分钟。这天早晨，教官武藤正好带着值日生站在校门检查，连我在内一共有12名同学被他堵住了，他把我们12个人排成队带进训育室，迟到原因他连问都不问，对每个学生打两个嘴巴加上一脚，嘴里大骂不止，挨个打还不算完，在朝会时又把我们12人排成队带到操场上，面对全校同学立正站着，他以我们这12个人做为典型向全体同学们作警告。

东北是一个盛产玉米的地方，每到7月苞米熟了的时候，人们常常喜欢吃煮“青棒子”（青苞米），早晨上学有时就带上一穗棒子，以备跑玩饿了的时候吃。日本教官武藤对这种行为的限制也是很严的，每到吃“青棒子”的这个季节，他早晨经常站在校门外，检查学生的书包，谁要被他检查出来了就该遭殃了。他对这种事的体罚手段，也是叫人感到深恶痛绝的！他对带“青棒子”的同学的处罚手段是站在校门前罚站，被罚者两手必须把“青棒子”高高地举过头顶，一站就是两节课的时间，这两节课站下来时，真是痛苦极了，腰软腿酸胳膊疼痛！

在他领导下的学校军事训练中，对我们的要求是“快、静、齐”三个字，谁要是疏忽大意，达不到这三个字的要求，就要受他体罚，他的体罚方式也是手打脚踢。

在日敌伪统治下的我们这些“国民学校”的小学生，不分男女和年龄大小都被日本法西斯教官训练的像木头一样，只知道绝对服从命令，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命令。因此少年儿童所固有的那种天真活泼的稚气劲被军国主义的棍棒教育消灭得干干净净。

伪满“国民学校”当局为了贯彻军国主义教育，手段要达到一体化，每年都由学校包做学生“操衣”，每个学生都必须交纳一笔“操衣费”。如果交不起这项费用，就要遭到更加残酷的凌辱！

我记得在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毛小立的，他父亲是伪造兵所的工人，兄弟二人一个在里仁“国民学校”读书，毛小立和我在大东“国民学校”。他的家境非常贫苦缴不起两套“操衣费”，只买了一套“操衣”，哥俩个在军训课中换着穿，不料这天军训他哥俩都在一个时间，这样一来一套“操衣”就倒不开了。这天军训时，毛小立没穿就给了他的弟弟穿走了，军训开始时，教官武藤立刻发现了他没穿“操衣”，就凶狠地立刻把毛小立同学从队伍里拉出来，举手就打，抬脚就踢，毛小立很不服气地说出

了一句家里没钱买的话，这句话把武藤惹火了，他左右开弓的打起毛小立来，没打几下就把毛小立打的嘴上流血了，然后叫级长（即班长）把毛小立送到训育室。下课之后，武藤用专门打学生的木板打毛小立，到了放学时还不许毛小立回家。武藤这个法西斯分子又叫级长把毛小立的母亲找到学校把毛小立领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毛小立被开除了。毛小立的母亲请求武藤保留毛小立的学籍，终因毛小立顶撞了这个法西斯军训教官没有挽回学籍，从此我们在学校里，再也看不到毛小立的影子了。毛小立回到家以后一直躺了四五天才下床，他屁股上的一块青一块紫的伤痕还可以看见。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惨无人道地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中国儿童！

伪满国民学校校门，左侧挂着学校校名的牌子，校门右侧挂的是一个“日满协和青少年团”的牌子，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从事法西斯教育的一个重要工具。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青少年的打扮上也都是不放过奴化机会的：伪满洲国的男学生一律不许留头发，凡是学生都必须一律剃成光秃子。因为伪满洲国的兵和日本兵都不留发。他们认为留发同军事生活和军事训练要求不符合。因此从小学生起就不许留头发。在贯彻降级服从的教育手段下，小学生的服装打扮和穿着也是带有极浓厚的洋奴风味的。“国民学校”的男学生头上一律带战斗帽，在战斗帽的帽沿上也缝有一个圆布帽徽，印有一个“学”字。学生服（即操衣）样式，在伪满洲国都是统一的，上衣类似日本兵的服装式样，下衣是制服式的裤子，无论春夏秋冬都得绑裹腿，在“操衣”上服的左口袋上，人人都佩带一个有班级姓名的符号，上衣左袖上边还佩带一个学校印好的校名袖章符号。在衣领上还别有一个铜制的阿拉伯数字的号码，一年级带1、四年级带4。这是为了区别年级高低，是进行阶级服从教育的标志。

女同学一律和日本女学生穿戴一样，不许留辫子只能留短头发。上衣是海军服的式样，下衣是裙子。冬天是普通的裤子，女学生和男学生的佩带，除了不带帽子以外基本上是一样的，女学生不带铜制阿拉伯号码，她们年级的区分在海军服后边的披肩上，一年级带上一个白条、四年级带上4个白条，来区别年级高低。低年级见了高年级，都必须立正敬礼，不立正敬礼，高年级学生就有权打低年级的学生，这就是阶级服从。这种阶级服从制度，成了伪满洲国各级学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常规。

在学校内的各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着一个蒙着黄布的镜柜，镜柜里面装的是带着眼镜，身穿“皇帝”服装的“康德皇帝”照片，“皇上”的照片是不准随便看的，所以镜柜上面蒙着一块黄绸子。我们也不敢随便揭开看，只有在放学后做扫除时，背着老师用教鞭偷偷的掀开黄绸子胆战心惊地瞧一眼，看完之后，我们的心情还是很恐惧和紧张的，生怕被校长教官老师知道了挨一顿毒打。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这种教室内的“皇帝”照片的摆设，就可不动声色地达到他养成中国少年盲目崇拜、盲目服从的奴才性格。

伪满的国民学校，把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利用为推行日本军国主义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安排每周的礼拜一上午有周会，星期六下午半天，是“日满协和青少年团”军训日，每天早晨都要举行升旗式。伪国民学校除了这些固定性的活动外，每逢到伪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和“昭书”颁发日都要停课大搞“纪念”和“庆祝活动”。每逢春秋两季，还要集体到日本神社祭拜，现把这些活动的内容分述如下：

一、关于伪满国民学校的校会

每周礼拜一早7时开始，全校师生都集合在操场上，面对旗杆和讲台排成纵队，开始的第一个仪式是升日“满”两国国旗，先升伪满洲国的红蓝白黑满地黄的“国旗”，然后升日本国旗。一边唱“国歌”一边往上升，旗升完歌也就完了，然后在日本教官的口令下，向日“满”两国国旗行注目礼；第二个仪式首先向日本的皇宫遥拜，这时全体师生面对东京方向行90度鞠躬礼，礼毕后把头转向伪满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作“帝宫”遥拜，也是行90度大鞠躬礼；第三个仪式是向为“建设新满州”而“牺牲”的日本英灵默祷三分钟，默祷形式就是把头低下来一直低到三分钟的时间为止。默祷之后由校长讲话，正校长是不常讲话的，他只是穿着一身黄呢子协和服身上挎个文官带陪站罢了，对我们经常讲话的是副校长日本人本庄漱石。他讲话的原意我已记不清了，其要点是：

（一）“日满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新“满洲”；

（二）“发扬东方道德则世界和平”；

（三）要打倒英美，注意间谍和流言蜚语。

本庄的讲话内容，也是根据当时伪满洲国内的政治形势来进行的。据我所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伪满从1935年到1945年期间，正是大搞国际调查大抓“思想犯”的时期。本庄的讲话，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也是不放过大抓思想问题的，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们，思想各方面都很是不成熟的。也正因为一切都处在不定型的时期，也就成为最容易暴露问题的对象了。

本庄漱石、武藤健男教官和我们这些小学生的接触更频繁。早自习的时候，这两个人有时候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一看我们温功课，二看我们除了温功课外还谈论些什么？有时他们俩人还要对我们这些学生进行口试提问。提问的内容，也不外乎他在校会报告的范围，如：

（一）什么叫“东亚和平”；

（二）什么叫“日满亲善”；

（三）什么叫“五族协和”；

（四）什么叫“柳条湖事变”（即九一八事变）。

有时还问我们这些东西：课上课下“满语”老师是怎样给我们讲的！在家时爸爸、妈妈又是怎么样给我们讲的，等等……。

二、“日满协和青少年团”团日

“日满协和青少团”，每礼拜六下午半天是它的固定活动日，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军事训练，走走分列式、练练劈刺。有时也搞一些游园划船远足（郊游），或到“忠灵塔”向日本“英灵”开个追悼会，每年春秋两季也到孔庙去祭孔。

“日满协和青少年团”的组织是以校为单位的，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大队，大队下有

中队、分队，中队按年级分，一个年级就是一个中队，分队按班级来划分，每一个班为一个分队，每十个人中又分为一个小队。队队都设有队长一人、队附两人，队长右肩上都佩带有符号，大队长是两条金线一个花仿似日本兵的少佐符号，中队长是上尉、分队长是中尉、小队长是少尉。

“日满协和青少年团”的“团旗”是蓝地中间印有一个圆白的周围有弧型的24个齿轮，圆的代表太阳、24个齿轮代表昼夜24小时，是象征着“日满协和精神”永远不停的旋转。

“日满协和青少年团”的成员来源，凡是入学的学生就是“日满协和青少年团”的团员，必须办申请批准和退出手续。

“日满协和青少年团”的团日和校会一样，每个“团日”活动的仪式都是唱日“满”国歌、升日“满”国旗，然后是向两个日“满”国旗行注目礼，礼毕之后全体整队，按队别层层报告人数，报告完了之后，在大队长的一声立正口令下，由他向穿着军装挎着指挥刀的教官报告总人数。报告完毕是出旗，出旗时，在旗手的后面排有五个护旗的，定五个护旗的是代表日满蒙朝汉“五族协和”的意思。出旗仪式结束后，在教官武藤健男的一声“立正”口令下，向正副校长行注目礼，然后由他来请求正副校长检阅。当正校长、副校长登上检阅台以后才算礼毕。礼毕完了之后，在教官武藤的指挥刀下由纵队变成分列式队形，前边由他率队，后面是“团旗”，在“日满协和青少年进行曲”的音乐声中走分列式。

我们这些小学生虽然年纪不大，但是由于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教育下，走起来的分列式队形步伐是相当整齐的，各个中队一进入检阅区时，由中队长用日本话发出“敬礼”的口令，我们这些被检阅的小学生们一齐把头甩向检阅区。这种场面具体地表现出军国主义教育的“风度”来。检阅结束后，各队开始由队长发木头枪，穿上保护衣开始练刺杀。

这种“团队”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约四个小时左右。时间这么长是我们这样小年龄的孩子难担负的，在活动中的四小时内还一律不许上厕所，因此，有的同学就把尿撒在裤子里头了。

在伪满洲国的国民学校里，除了这两个固定性的活动外，还有些其他活动，每到伪满“建国纪念日”、“诏书颁发日”、初一、十五的“祭神社”都要停课大举活动的。

三、“建国纪念日”活动

每逢3月1日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纪念日”，即溥仪登基之日，这一天要放假一天以表“庆祝”。所谓放假也只不过是到校不上课而已，这一天要想个人活动或留在家里都是不许可的。

这天到校后，全体师生就开始整队集合于操场上，庆祝仪式的程序是由升日“满”两国国旗开始，其次是唱日“满”两国国歌，随着向日本皇宫做90度大礼遥拜，然后再向新京遥拜，拜完之后向为“建设新满洲”之日本“英灵”默祷三分钟。祷毕，全体立正行大礼鞠躬90度来奉迎“皇帝诏书”。

“满洲国”人担任的正校长这个时候出来了，他带着五色穗的文官带，手上套着白手套，正步走向“诏书”室，把“诏书”高高地举过头顶，弯着腰把“诏书”捧出来，与会者全体在一声“立正”的口令下，立刻一齐弯下腰来，当校长把“诏书”捧上讲台上放在桌子上后，才算迎毕而直起腰来。校长接着打开黄布从里面把“诏书”取出来，再掀开黄绸条，面对学生，当宣读“诏书”两字后，人们又立刻把身子弯下来低下头，鸦雀无声一字一句地静听着“诏书”。伪满的小学生各个都必须把“诏书”熟背下来，因此时间虽已过了20年，这个充满浓厚的奴化毒害的诏书我还能记忆犹新的背诵出来，其原文如下：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亲致诚悃，复加意观察，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致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要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我，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祀。钦此。御铭御玺。康德五年五月二日。

“诏书”宣读完毕之后，在教官送“诏书”的口令下又一齐弯下腰来成90度去奉送，这时校长又和奉迎时一模一样地把“诏书”装入木盒中，包好黄布，迈着四方步，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地捧过头顶，一步一步的慢慢腾腾地送回去。

“诏书”迎送宣读之后，接着由日本副校长讲话，由教日文的老师翻译，向我们这些小学生宣传起“诏书”的内容来。归纳起来他的讲话有下面几点：

1. “满洲国”的建立，“皆赖日本友邦之仗义尽力”；

2. “满洲”“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叫我们这些小孩子要“忠勇奉公”。（康德八年成立的“勤劳奉公队”的“奉公”两个字就是从这里转引出来的）

3. “满洲皇帝”和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日满之间要一德一心”，“以奠两国永久之基础”。

以我这四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当时是不懂伪诏书中一些字眼的，而那一二三年级的同学们就当然更加不懂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贩子们在贯彻推行奴化教育方面是不择手段的，他们采取强迫的手段，来毒害中国少年儿童的纯洁心灵，以期达到它彻底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目的。

四、利用课堂贯彻奴化政策

伪满国民学校

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在伪满洲国的国民学校内煞费苦心大搞校外的奴化宣传活动，在

课堂里，更是露骨地贯彻着它的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思想来残酷的毒害东北少年！

伪满国民学校的课程表是这样安排的：第一节课为算术，二三节课为日语课，四五节为“满语”课（九一八事变后把中文改称“满语”），第六节是体育、音乐、图画、手工等课程。

早晨一进校门即可听到群声嘈杂地背诵着日语字母。伪满国民学校里，从小学的第二年级开始就学习日文，在伪满的国民学校里，在课时份量的分配上，日语这一科份量占一切学科的首位，日文课程的学习成绩好与坏是决定每个学生能否升级升学的一条重要标准，因此学生们都在拼命地学习日语。

日文教师对学生的日文学习质量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每一天留给学生的作业完不成是绝对不许可的，课堂上学生如果答不出来，就必须把手伸出来挨日文老师的手板打，一手板打下去就会把手心打得通红，两手板之后手心被打的会立刻红肿起来，打完之后连笔都拿不起来了，我就挨过多次的手板打。

在我三年级的日文学习里，头一次挨打的印象最深刻，是因为日文教员提问了我两个单词叫我把音读出来，这两个单词是鸡蛋和纸烟，两个词在发音上相近似，不注意音质区别就容易混淆起来，我当时的回答就把鸡蛋读成纸烟，把纸烟读成了鸡蛋，日文教员听完我的回答之后，怒气冲冲地立刻把我叫到讲台前打我三个手板。我第一次伸出右手，他狠狠的拿着木板照手心就是一大板打下来，打的我当时两眼冒金光，第二大板没等我把手掌伸开日文教员立刻就打下来，这一板打下来时正好打在我的手指头上，疼得我当时混身是汗，第三板我是不敢伸手去接了，可是不接是不行的，只好忍着疼痛又把手伸出来，第三板落下后，我的手心立刻红肿起来，肿得像个小面包，打完回到座位上后，手掌心火辣辣地直发热，我当时赶快把被打肿的这个手掌心往桌板子上去磨擦，这样做就是利用手掌与桌板磨擦时发出来的热来麻醉手掌心上的疼痛，磨擦完之后，两手再合在一起，偷偷的在桌子底下来搓，这样做可以使掌心消肿。这两套办法，在日伪国民学校里每个小学生都会运用。因为在伪满国民学校里，读书想不挨打、不挨手板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这些小学生在挨打之后如何处理伤痛和痛苦都是很有相当经验的。

我们这些被奴役的小学生们，如果说为了升级和今后的升学而拼命学习，倒不如说是为了解除挨打的痛苦更为确切些。因此，每一学生都在日夜地拼命狠读日文。

伪满国民学校的日文，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始学习平假名和片假名及发音。第二学期进入单字学习，到第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进入到短篇课文的学习，四年级的时候学生们就必须能够独立的读、写、译。日本侵略者以高速度的手段对东北青少年大灌日文，这与他为缩短全面侵略中国的速度是分不开的。

日语课文是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对东北少年儿童放毒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四年级的日语教课中除了生活用语和会话的学习外，还大量地通过课文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在四年级日语教课书中，有一篇关于乃木大将的课文，课文大意是这样（原文我已记不清了）：

“日俄战争时，乃木大将率领大日本皇军进驻满洲，登陆旅顺口，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是发生在尔灵山上，日军为消灭在旅顺的俄军，在战事上日军的鲜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

“乃木率领三个儿子来到满洲旅顺作战，乃木的大儿子率领皇军攻打尔灵山的俄国兵，战事进行的十分激烈，由于俄国兵守备严密，乃木的大儿子率领的皇军没有攻下来阵地，回来向乃木大将报告说俄国兵很厉害，乃木大将一听就怒起来了，立刻下命令处他的大儿子死刑，他的大儿子问乃木为什么处他以死刑，乃木告诉他的大儿子说：世界上只有大日本皇军是最勇敢、真正最厉害的兵，你说俄国兵厉害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辱所以处你死刑。接着乃木又派他的二儿子又去指挥作战，他的二儿子也没有取胜败了下来，他的二儿子也依然说俄国兵厉害，乃木又处以他二儿子以死刑。乃木接着又派他的三儿子去指挥作战攻打尔灵上的俄国兵阵地，终于在尸堆成山的激战中打败了尔灵山上的俄国兵，获得了满洲旅顺、打败俄国侵略满洲的胜利。这个赫赫成果是乃木全家的光荣，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因为乃木大将在率领皇军进驻满洲的日俄战争上有功，日本天皇特召他回国受勋，乃木大将回到东京时，皇帝出宫迎接，国民也夹道欢迎他，乃木大将走到离皇宫附近的两孔桥时他想到了，日本皇军虽然在进驻岗山战事上打败了俄国兵取得了胜利，可是日本皇军在旅顺尔灵山战事中牺牲最大，是对不起天皇的，因此乃木大将感到很难过，就在两孔桥下拔剑自刎了。当天皇闻知赶到两孔桥时，乃木大将已为国光荣报效皇恩了。

“乃木大将教育子女是伟大的，忠于天皇、忠于大日本的。有一次他三个儿子冬天在外边玩，二儿子说外面冷，乃木听到后，立刻命令他二儿子站在井旁用冷水泼身，一直到他二儿子说不冷了才停止。乃木大将是忠于日本天皇、忠于大日本帝国的英雄将领，是教子有方的父亲，乃木大将的精神永垂不朽。日本天皇为了纪念他的这种精神，忠勇奉公的行为，在尔灵山为他建筑了纪念碑永远的纪念他。”

在我记忆中还有一篇印象较深的课文叫做“柳条湖事变”。课文大意说：“日本在满洲的驻守军，9月18日在柳条湖附近演习军操时，从树林中跑出来了满洲胡匪数十人抢日本驻屯军的武器，因此引起了一场柳条湖战事。日本驻屯军为了满洲3000万百姓过好王道乐土的生活，打败了这些土匪，从而奠定了新满洲。”

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它侵略中国的真相，有计划、有目的地歪曲、伪造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用“柳条湖事件”的手法来蒙住中国少年儿童的眼睛。

伪满国民优级学校

伪满洲国的国民优级学校是二年制，相等于高小五六年级，有男校、女校之分。

我所在的学校是奉天市立城东男子国民优级学校，这个学校的前身，原是张作霖时代所开办的兵工厂的子弟学校。校内规模较大，一进校门处还陈列着一个飞机。校内共有26个班，每班学习人数为40人，一年级十三个班、二年级也是十三班，总计校内人数约1000人以上。班级排列是日本式的，按日文字母的顺序排的；校内活动如起立、敬礼、坐下、默祷，集合、立正、报数、稍息等等一律使用日语。

国民优级学校虽说仅仅只是高小的水平，但每年入学名额是相当少的。大东区这么大的一个区，国民优级学校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城东男子国民优级学校，另一个是城东女国民优级学校。这两个国民优级学校只能录取国民学校应届毕业生的六

分之一左右，应届毕业生能够升上学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升上学的少年儿童除了失学无别的出路。因此国民优级学校的校长和教员比国民学校的校长和教员肥多了。

城东男子国民优级学校一共有三个校长，正校长仍是由所谓“满洲国”人任职的，他的名字叫李时光，个子矮小而胖，我们这些学生们背地都称呼他树墩子。副校长叫浅井一郎，是学校权力中最大的一个，他什么都管，另一个副校长（名字记不清了）他只是管行政和人事，经费开支都得经过他。城东男校（简称）的教官名叫武田，是当时日本陆军上尉级的现役军官，训育是由所谓“满洲人”丛玉田来担任的。

国民优级学校的校内活动，每礼拜一上午为校会，礼拜六下午是军事训练，每天早晨还有30分钟的朝会。

校会的形式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但各次的校会内容就完全不同了，每次校会内容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来进行的。如“开发新满洲建设王道乐土”，“日满共存共荣保卫东亚和平”，“大东亚圣战完遂”、“皇军赫赫战果”等等都是各次校会的主题中心，校长常常领着我们喊“打倒英美”，“东亚和平”的口号，还经常嘱咐我们要“警惕反满抗日情绪”。他经常口不离题地对我们说：“日满青少年要精神如一体，共同的开发东亚，建设新满洲，在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下，来共同享受王道乐土的幸福生活”。

除了每周星期一校会对我们这些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外，每当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攻占了一个地区时，浅井副校长还要对我们进行“时局训语”，以此来“庆祝”日本“皇军”的“赫赫战果”。

在日军攻战新加坡的时候，浅井副校长立即命令全校停课，把全体师生召集在大礼堂对我们做时事训话。

时局训话与历次不同，形式和内容十分庄严，这次礼堂讲台后面的墙上，挂上了一幅相当大的地图，在地图的两侧，左面插日本国旗一面，右插“满洲国旗”一面，在讲台上方，悬空挂着一个巨大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庆祝大东亚圣战完遂，庆祝皇军赫赫成果”。在礼堂各侧墙壁上也贴满了各色各样的标语。除了“打倒英美东亚和平”的陈旧语外，这次使我们特别惊奇的是出现了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标语，如“日满华三国提携”和“日满华共存共荣”。

浅井主持的“时局训话会”，在日“满”两国“国歌”声中开始。他的讲话内容，回忆起来，共分了三个内容：第一是报告日军的“赫赫战果”；第二是“日满华三国提携才能保卫东亚和平”，“日满华才能共存共荣”；第三个是“日满”青少年在“大东亚战争”中负有的“使命”。

浅井报告的第一个内容完全是从当天盛京时报上刊载的所谓皇军战果新闻中抄来的。第二个内容是特别新鲜的，从而引起了我们这些被奴化了的青少年们的很大兴趣。浅井说：“日满华中的日是大日本、满是大满洲、华是中华即支那，首都在南京，它是日满两国的友邦”。第三个内容是对我们的号召：第一个号召是要我们“学习为大东亚战线而捐躯的日本皇军的精神”；第二个号召是要我们“为大东亚战争，做好金属献纳”；第三个号召要我们“学习好军事训练的常识，准备为大东亚战争贡献力量，为帝国效忠”，“一人捐躯全家光荣”。

日伪国民学校的校内生活中，在第一节课前定为晨检，晨检时间为十分钟，具体活动是以班为一个小集体，共同背诵“国民训”。“国民训”共六条，第一条原文是：“国民须念建国源渊，发于唯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其余五条我已想不起来了。

每日中午12时，定为默祷时，每天中午12时学校大喇叭一响，我们立刻从座位上起立，低下头“为大东亚战争牺牲的日军的亡灵默祷”，“默祷”完毕才能下课。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想尽各种手段，连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也被利用来为它这一毒化目的服务。每当春天，清明节到来时，城东男子国民优级学校全校师生打着“青少年团”旗，列队前往沈阳马路湾“日本忠灵塔”，去“祭祀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士兵的亡灵。

祭祀开始时，先是默祷，祷毕，由日本教官为代表，向“忠灵塔”献花圈，接着由日本校长向学生训语。浅井在祭祀上的训话，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传是特别露骨和狠毒的。他说，日本“皇军”死亡的将士们，是为“开发落后无知的满洲而牺牲的”，是为“满洲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东亚和平”而死的。他在训话中要我们这些青少年学习日本“皇军”不怕牺牲的“武士道精神”，学习“大日本国民的尚武精神”，这样才能“建设新满洲”、“保卫新满洲”，“建设王道乐土”的生活、“保卫王道乐土”的生活。祭祀讲话结束后，全体师生在浅井的带领下高喊：“大日本帝国万岁、万岁、万万岁”，喊三句“大满洲帝国万岁”。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东北青年推行奴化教育时，连旧中国封建文化也被窃为工具。伪满洲国文教部下发的满语课本，国民优级学校的第一册中，就载有“孔庙”为题的一篇课文。课文开头，首先写的是孔子故乡：山东曲阜和孔庙四周松柏的景象，接着写的是孔子诞生情况，课文是这样描写的：孔母在要生孔子的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麒麟、像一条龙似的，嘴中含着一本书，驾着黑云，落在房顶上。因此，孔子才成为人间的大圣人，最后一段写的是：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一节论语上的话。

这个课文讲完之后，教我们“满语”的日本老师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命运好与坏都不是个人所能够决定的，上天早就给人法定了命运”。教室黑板上面，除了悬挂蒙着黄布镜框的皇帝溥仪像之外，为什么对面墙上还挂着孔子的画像，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些人都是天命所定的。

日伪国民优级学校课程中除了“满语”、日语、军训、音乐、图画、手工之外，其它课程是没有的。至于地理、历史的知识在日伪的国民学校里是根本学不到的，我和其他被奴化的同学，读了六年书，连个地球仪都不认识。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做，是怕我们从历史的、地理的知识上识别出它侵略中国的真相！

五、军训课、时局训话、金属献纳、勤劳奉仕

军训课

日本教官武田除了在操场上教我们军训操练外，他还经常的在教室内向我们灌输反

动的军国主义思想，他对我们训话的内容除了讲一些“阶级服从”、“尚武精神”、“武运长久”之类的话以外，还讲一些关系日“满”两国的问题。

我记得在伪康德10年12月6日，距离“大东亚战争纪念日”前两天的时候，日本教官武田在教室里给我们上军训课，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学军训课，是为了今后去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发扬日满协和精神的重任完全在你们这些学生肩上”。他还说：“因为满洲人落后无知，因为满洲地广人稀，所以，日本人才来到满洲帮助满洲建设王道乐土的新国家”。

武田在黑板前面挂上一个东亚形势的大地图，指着地图对我们说：“请看！日本国土像个蚕，支那像个桑叶一样，蚕必须在桑叶上生存繁殖，这个道理诸君是知道的，现在日本国民很多，由于日本国民人口的日益增长，日本的国土已不能满足和解决国民的生存，现在日本和大满洲帝国以及支那中国，都有共同开发的振兴计划，这是大东亚的幸福，东亚道德之真义，只要日满华三国提携，就能实现振兴计划，就一定能够打倒英美，东亚就能永久和平”。

武田这番课堂训话之后的第二天，早晨第一节课刚刚开始，副校长浅井匆匆忙忙地宣布，临时改为“国民道德测验”课。所有题目都没出武田在军训课中给我们所讲的内容。我记得这次“国民道德测验”共有四个题目：第一题：试问东方道德之真义是何？第二题：试问满洲王道乐土的昌盛和繁荣是怎么来的？第三题：试问怎样才能建设东亚新秩序？第四题：满洲国民之义务是什么？

仔细分析了试题之后，我认为试题内容完全没出康德皇帝所颁发的诏书内容。因此，我就本着背得滚瓜烂熟的诏书内容，挑词捡句地结合武田对我们所作的训话内容答了起来。

早晨测验刚过，下午的军体活动也停止改为室内活动了。武田教官手拿40张“国民道德”试卷跨进教室，武田皮笑肉不笑的对我们说：“诸君的答案可分四类，甲类的不到十人、乙类的仅有十人、丙类的八人，其余的是不入类的。”

接着他就声色俱厉地指责了我们“抄袭”“皇帝诏书”。他说：“把皇帝诏书抄来答题，看来意义虽对，但没有充分的内容，这是很不好的！如果把日本国民对‘满洲’的建设行动写上去，就最好不过了，你们‘满洲’青少年决不能忘记柳条湖事件中日本皇军的流血和英勇牺牲，你们决不能忘记满洲的昌盛是日本国民血汗的贡献造成的。有人写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这种答题是大大的不对，因为‘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这是满洲皇帝的话，你们小小的满洲青少年说了的不行。满洲青少年只能这样说：政本所立在乎日本皇军的仁爱；教本所重在乎日满亲善！”

武田对我们说：“满洲国民不是一个主体，满洲国民是日本大和民族的一部分，因此满洲国民应忠勇奉公，为皇军大东亚圣战完遂做出牺牲是满洲国民的义务”。

武田评卷训话完毕后，试卷又重新发给我们这些学生，每个人又都按照武田的训话内容去订正试卷。在订正试卷中，我们这些学生都不约而同地把“满洲”的昌盛写成是由于日本“皇军”的“仁爱”和日本国民血汗的“贡献”，“满洲国民”要“忠勇奉公”，为“皇军”的“大东亚圣战完遂”做出“贡献和牺牲”是“满洲国民”的义务。

武田把我们订正好的卷子收回后，又把三四类卷的同学紧逼着进行了一次口试。武田虽然又不厌其烦地讲了一遍，但仍有十几个同学回答不上来。这时武田的法西斯狰狞面目立刻暴露出来，他把回答不上来的十几个同学叫到黑板前，一边喊“混蛋”，一边左右开弓地打这十几个同学的嘴巴。

我们这些幸免挨打的学生，也被武田的这种举动吓得目瞪口呆，气都不敢大声地出。下课铃响了，武田也不停止毒打。打完这十几位同学后，又命令这些同学双手捧着卷子背念。直到20分钟后，武田才怒气冲冲地宣布下课，答题较好的学生在室内作扫除，答题差的学生去操场锅炉房运煤。太阳快要落山了，东北12月的隆冬是相当寒冷的，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们，早就冻饿了的肚子想吃点饭了，可是武田仍不放走一个。一直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武田才从饭店里带着满面的红光走出来，他检查一下运煤数量后才放我们回家。

时局训话　金属献纳

12月8日是“大东亚战争纪念日”。当这一天到来时，全校师生都要停课举行纪念仪式。这天早晨从8时开始，都要由本班级长（即班主任）带队进入礼堂，礼堂的讲台上悬挂日“满”两国国旗，中间放一幅写着“庆祝大东亚圣战完遂”的标语。

仪式开始时，首先低下头来，仍然进行默祷，祷毕要把身子弯成90度来奉迎“皇帝”颁发的“时局诏书”，然后由校长宣读，读完后低下头90度奉送回去，这种“奉迎”“奉送”的仪式是各次活动中不变的。

日本副校长浅井接着登台，对我们作“时局训话”。浅井的时局训话内容：第一个是大讲“皇帝”“时局诏书”的内容，以“康德皇帝”的时局诏书当材料给我们来作“时局训话”这个“诏书”的内容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东北人民的一把毒刀。

浅井讲完“诏书”内容之后，接着大讲特讲“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战果”。这些战果都是伪满盛京时报上刊登过的消息，只不过浅井再来给我们读一遍而已。

浅井讲话的第三个内容是对我们提出要求，并对东亚时局作具体指示：“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为了大东亚战争，献纳出大量的御铜御铁和御物，身为满洲青少年的你们，要为大东亚圣战完遂贡献一切力量”。这就是“日满精神如一体”。“日满两国要一德一心的团结起来，打倒英美”，这就是“日满两国共同防御之义，生死存亡是断弗兮携的”。“大满洲帝国官民一心，万众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这就是“满洲国民对皇帝陛下咸以克体朕意”了。

浅井最后要求我们这些小学生要尽一切努力做好“金属献纳运动”。他说：“谁要是金属献纳的多，谁就是大东亚圣战完遂中的好学生”。

武田也跳上台去对我们说：“日本国内的青少年正在加紧军事训练的演习，这是日本青少年为东亚和平准备牺牲的表现”。“英美不死，东亚大乱不止，满洲青少年要下决心练好军训，学好各种防空知识，为大东亚永久和平做出牺牲”。

大会结束后，全校放假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四出各地，去捡破烂找寻废铁滥铜。这个时候，在伪奉天市到处都可以看到“献纳金属支援日本亲邦大东亚圣战完遂”的宣传标语。我们这些学生们的父兄们，也被卷入这个“金属献纳”的运动中去，家中

即便有些废铜滥铁，轮到我们这些小学生头上去“献纳”也是所剩无几了。

第二天上学时，我只是从家中拿去了几个窗户钩。未曾料到，一进校门就早已办上了“金属献纳展览”，凡是“献纳”质量好的数量多的都把实物和名字摆上去了。在这种展览的刺激下，我们“献纳”较少的学生们也都不示弱，学校下午宣布停课两天为“金属献纳日”，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更充裕的时间去搜集废铁滥铜了。在公开的指令下，找不到废铜滥铁时，我们就三三两两成群结伙地去偷。先偷的是沈阳当时较大的商店吉顺丝房的窗户钩，接着由于数量上的不够满足，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又去小东边门外的天祈庙，偷烧香用的铜香炉。

两天过后，早晨校门一开，各个学生书包里都装着满口袋的废铜滥铁，校长浅井看了之后十分高兴，接着又开了一个校会，大大的“夸奖”了我们这种“支援大东亚战争”的行为。

凡是在这次“金属献纳”中“献纳”数量少的就是表现不好的学生，“献纳”特别少的学生都被武田传到训育室去接受他的处分，每个人手上都被武田打了五大板。武田打我们的时候，从来都是多一板也不打，少一板也不打，一打就是五大板。武田之所以一打就是五大板，这里还含有着政治意义在内，武田公开的告诉我们说，“五大板是代表日满蒙回汉五族协和”的意思，凡是违反“五族协和精神”的人，都必须受五大板的处罚。

我班同学周宝连，因为“献纳”的太少挨了武田五大板，手掌心被武田打的立刻红肿起来，肿的像面包一样。第二天上学时他为了不再挨武田的五大板，竟然从家中把祖父的铜水烟袋偷了出来“献纳”了。

勤劳奉仕

从1941年起，在全伪满洲国的各个地区的各个学校里，都开展起一个“勤劳奉仕”运动。从这个运动起，我们这些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学生，课堂学习时间又被挤得寥寥无几了。一个学期仅仅只有5个月的时间，除了参加各种活动外，实际授课时数，每天最多只上4节课，再加上“勤劳奉仕”50天，课堂学习就更少了。

我第一次参加“勤劳奉仕”的地方是在伪奉天市京塔的一个造兵所（即兵工厂）的子弹厂。“勤劳奉仕”就是义务劳动，在这个厂内我们的劳动任务是把制好的子弹压进一个铁匣子里，每天上下班时间，均和厂内工人上下班时间一样。

工人上下班，进出厂要持验身份证，我们这些学生的“勤劳奉仕队”进出厂要靠着“日满青少年团团徽”，加盖校章的袖标。其间休息吃饭和工人一样，每一个工人带领我们5个学生干活，抬、扛、拉、搬、运样样都干。凡是工人干的我们都得干，在“勤劳奉仕”的劳动中，是不分年龄大小和体质强弱的。

不同的一点是每当晚间下班离厂时，我们这些“勤劳奉仕”人员都必须集合一起排成队走到工厂大门，去接受日本驻厂警卫队的搜身检查，日本厂警队检查完了之后，还要再去接受学校驻厂教官武田的训话，武田宣布放行命令后，日本警卫才能放我们出厂。

武田每天晚间都准时在厂警卫室内等候，当天谁要是迟到了，谁要是在劳动中违犯

了制度，他都是利用这个时候给予处理。凡是进厂迟到的，离厂时都会被武田从队伍中拉出来送到警卫室罚一个小时的站，凡是违反纪律的都要被他送进警卫室处以五大板。

不幸的一个惨事就在这“勤劳奉仕”的第5天发生了！不知是怎么弄的，日本警卫队在这天晚间出厂前，从同学王福的上衣下口袋内搜出来一个铜的上面印有一圈红线的机枪子弹头。这一事件，当时就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子弹头从王福身上口袋刚一拿出，我们都听到一声猛烈高喊，意思是“小偷”。只看见一个日本兵拿着子弹头匆匆进了警卫室，不知如何是好的我们只有静悄悄的等候。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从警卫室出现了身挎战刀的八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这八个日本兵对我们每个人身上浑身上下的搜查起来，搜查了好半天也没有搜查出什么玩艺，八个日本兵怒气冲冲的返回警卫室了。

夜幕降临了，我们这个“勤劳奉仕”队全部都被留在外面，吓得我们你瞧我我瞧你的张望着。

我们这些幼小心灵虽说是无知的，但也能够断定这件事凶多吉少。半个钟头过后，武田和日本小队长一起出来，他俩人把我们领到一个大屋子里，日本警卫队小队长首先给我们训话，他说：“偷出子弹是敌人的干活，是破坏大东亚战争圣战的干活。”这个小队长的语音还未落，武田把王福从队伍中拉出来，命令王福脸朝着大家，双手捧着子弹头跪在地上。武田接着也对我们开了腔，他严厉的责骂了王福一阵之后，才把我们放走。我们走的时候，王福还在那里跪着呢，王福跪了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王福被校方当局开除了，开除布告校内门前贴了一张，在兵所的大门内也贴了一张。我们的家长日夜地为我们参加“勤劳奉仕”出现意外担心着，每天早晨离家前，家长一再嘱咐着说：出厂前，千万要检查一下，衣袋里有没有兵工所的东西，生怕我们年小把东西放在衣袋里，出厂前忘记拿出来而引出一场大祸来。

事实就是这样，子弹头又小又滑，在搬运的时候，子弹头很是容易滑掉到衣袋里，滑掉到衣袋里的子弹头是否就是偷，因为我们是“满洲”的青少年，不是偷也是偷，这就不奇怪了。

“勤劳奉仕”刚刚开始时，我们还不够重视它，10天之后，学校当局正式公布，凡在“勤劳奉仕”中表现不好和不参加“勤劳奉仕”的均不得参加毕业和升学考试。这一决定公布后，我们这些学生们各个都把“勤劳奉仕”重视起来，都拼命的干。

六、欢迎“皇帝”、庆祝“建国”十周年

欢迎“皇帝”

一天下午，校长突然下了一道紧急集合的命令，我们像一群野蜂似的，气喘嘘嘘地跑到操场待命。副校长登上司令台向我们宣布：明天紧急停课，并命令我们第二天早晨4时穿好“操衣”到校集合。

干什么去呢？我们也不敢问。第二天早晨4时，大家整齐地集合于操场上，教官武田站在讲台上和往常不大相同，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呢子日本军服，肩上扛起了金光闪闪的肩章，腰上挎着又长又白亮亮的指挥刀，马裤大皮靴。武田按军训队形编好队形，正

副校长老师们这时从楼里走出来。正副校长都穿上了黄呢子的协和服，脖子上还挎着红黄蓝白黑五色穗的文官带，好像过大年办喜事一样的场面。

在正副校长和武田的带队下，我们跟着“日满青少年团”旗和校旗，迷迷茫茫地走下去。穿过了无数的大街小巷，走了约三个钟头的时间到了大和广场（即现在的沈阳中山广场）停了下来。这时校长才郑重地告诉我们，此行是来迎接“满洲皇帝”陛下的。这一回我们可以亲眼看到“真龙天子”了，队伍中的我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好奇的心来。连续行走三个小时近40华里的路程，我们感到很疲劳了，但由于浅井宣布出来的这一个消息，确实也消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一部分疲劳。

大街两旁站满了迎“帝”的各校师生队伍，惟独行人百姓一个也看不见了，街道两旁的商店都关了门，只有日“满”两国国旗在飘动。一队一队的宪兵警察和“国兵”在大街中心荷枪而过，这些人的大马靴喀喀落地，不时的发出有节奏的响音来，使我们的心紧缩一团。两个钟头后在我们队伍的面前出现了三条警卫岗线，第一岗线是警察，第二岗线是“国兵”，第三岗线是宪兵。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培养起来的这些喽罗们各个都是枪上膛、刀出鞘，目不转睛地以警备的姿态面对我们监视着。

武田下达命令说，“迎帝大礼”行90度鞠躬，绝对不许站着直瞧“皇帝陛下”，违者严惩。马路上不停地来回奔驶着嘟嘟直响的军用摩托车。约中午时分，一辆挂着黄旗的摩托车开过来，这时各校教官都不约而同地发出“立正”口令，我们这些欢迎者立刻都把腰弯成90度，约五六分钟左右，马路中间突然间开来了一批摩托车，在这群摩托车后面紧跟着出现了一辆方型的汽车，汽车前后左右角都紧跟着一辆摩托车守卫，由南向北驶来。

弯着腰成90度的我，此时此刻的心中在想，一个人一辈子也不易能够看到“皇帝”这个“真龙天子”。“皇帝”究竟长的是个什么样，“皇帝”与众人到底有何不同！为了弄清这个，因此在“皇帝圣驾”没有到来前我就想，虽说不准直站着瞧，我也要设法在90度弯腰中把“皇帝”瞧出个究竟来。

当“皇帝”的汽车驶来时，我用力的把眼睛向上一翻，憋足了劲一瞧，“皇帝”带着眼镜，圆顶帽上还插有一个雪白的鸡毛掸子式的白毛穗，下衣因为“皇上”坐在汽车里没看见，“皇上”的上衣花花绿绿的满镶金边，上衣两肩上还挂有金黄的丝条穗，两手带着白手套，还握着一把大洋刀放在两腿中间，像个木头人似的坐的笔直。“皇上”坐在汽车司机后面，他的旁边还坐着一个穿协和服的、秃顶大脑袋的圆胖子，事后我才听人说，这个大秃顶圆胖子就是汉奸、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皇上”的汽车，行驶速度不快也并不算太慢，可以说是个中速，这个汽车的形状与一般汽车不同，像一个长方型的匣子，汽车装饰我记不清了（大概是红色的），汽车的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好像龙头的圆球，这个圆球究竟是什么玩艺我记不清了。

“皇上”的汽车过去之后，它的后面紧跟着又过了一串汽车，在这一串汽车的最后面是满载着穿黄呢子军服全副武装的国兵的大卡车。这些“国兵”个头几乎一般高，年龄也几乎一样年轻，相当精神，长相也比较好，站在车上前后左右排列的非常整齐，手握三八步枪，上着刺刀，白晃晃地发着亮光，我已知道这就是“皇上”的近卫军了。

跟随在“皇帝”后面的近卫军过后，马路上立刻沉寂下来。“皇帝”的大队人马虽

然已过，但我们这些欢迎者仍站在原地不许挪动一步，不多时，一辆插着“贵”字旗的三输摩托车驶过来后，马路中间最里层的宪兵开始跑步集合撤岗，当插有“兵”字样黄旗的摩托车过来时，“国兵”和宪兵一样撤了下去，剩下来的警察在一声长鸣的警笛声中走了。

武田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他宣布迎“帝”结束，全体解散。我们这些人像一群鸟雀似的乱作一团，东奔西闯起来。历时达六小时之久，我们都滴水未尽，因此大家干渴不得不到处去乱跑并找水源来解渴。也有一部分人由于肚子里尿憋得要命不得不到处乱跑去找粪坑。水喝足了，尿撒完了，大家各自找各自的同伙，带着饥饿和疲劳回家去了。校长老师们都坐车走了，我们都没有带车钱，因为欢迎皇帝对我们要保密，我们只好再走三个钟头40里路了。天已黑下来，我们才艰难地走到家，住在同一条街的所有同学的家长，正在挨家每户打听我们的下落。

第二天下午，校长浅井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他说：“满洲皇帝陛下，这次驾临奉天市，是前往东陵祭祀祖先坟墓的。东陵是埋葬清太祖的地方，清太祖的坟是当今皇帝陛下的祖坟，女真族长期生活在长白山上，以狩猎为生，人数很少，努尔哈赤曾率领女真族战胜过支那人，胜利后改女真名为满洲。”“俄国人侵占满洲后，大量地杀死满洲人，在满洲的土地上，到处可以看到被俄国人杀死的死尸，满洲这块土地。从此就变成了灾难的土地。大日本国民，看到俄国人的放火烧杀、无恶不作这些痛心的事情后，决心打倒俄国人拯救满洲，这就是日俄战事发生在满洲的起因。”在日本侵占东北的十四年中，“贼喊抓贼”是他们欺骗宣传的一惯手法。

浅井接着对我们说：“日本国民用自己的鲜血和性命，解除了满洲的痛苦，从旅顺口大湾开始，由南至北，日本皇军用武力把所有的侵占满洲的俄国人，统统的赶走了，从此，天地内有了新满洲（这句话是伪满洲国“国歌”开头的第一句歌词）”。“日本国民用鲜血和生命，为满洲同胞换来了新满洲，从此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这句话也是伪满“国歌”的一段歌词）。

浅井说：“俄国人叫俄大鼻子，是一个野蛮人种。满洲人和日本人从体形和面貌上来看，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血种，不同的地方只是语言而已，其它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因此满洲是日本大和民族的一部分，日满朝回汉五族协和就是大和民族的总称”。“诸生不能忘记，俄大鼻子在满洲这块美丽的地上的所作所为。俄大鼻子为了抢夺满洲物产，在满洲的土地上修筑了铁路，把旅顺大连也窃占为俄国人所有。北清事件并没有把俄国人赶出满洲，直到‘日俄战事’由于日本皇军的神武，才把俄大鼻子赶出满洲。”

浅井还恬不知耻地说：“满洲皇室为了满洲三千万人民自由自在的、无苦无忧的生活，和大日本帝国签定了‘日满议定书’。大日本天皇陛下为了满洲三千万人民自由自在的、无苦无忧的王道乐土的生活，不再受俄国人的侵略，建设东亚新秩序，永保东亚之和平，派来了有知识、有技能、有教养的日本国民来建设新满洲。这是日本天皇陛下对满洲皇室恩爱，是大日本国民对满洲的无限忠诚和贡献！”浅井说到这里后，他又引用了康德颁发的“回銮训民诏书”中的一段话：“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日本）之仗义尽力，没有大日本就不会有新满洲，诸生一定要衷怀铭刻殊不能忘的。”

浅井在训话结束时说："满洲青少年们，你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好好学习，特别是要学好日本语，这是发扬东方道德之基础，而发扬东方道德之重要基础在于学好日本语，日本语言，是东亚和平、东亚共荣的语言，不会日本语，就不可能为东亚和平、东亚共荣、建设王道乐土贡献力量。""目前皇军为达成大东亚圣战，大东亚之永久和平，在前方英勇奋战，满洲青少年要支持东亚圣战，必须练好军事体育。皇军在前方取得了赫赫战果，攻陷了很多城市，这些已被攻陷了的城市，正等待着满洲青年去建设。"

每天上学时，我们都得绑裹腿，带上有五折布耷拉下来的战斗帽，还要不断地参加防空演习，练抬担架等等。

我们每天学习最多的是日文，早晨一进校门就听到朗读和背诵日文的声音。当时这种学习日文的态度，已经形成了普遍自觉的态度了，——在日伪统治的"满洲国"内，人人都知道，不会日文，找工作是十分难的，想升官发财，不会日文是办不到的。日本对"满洲国"人的工作，几乎都是按照日语一、二、三等合格与否来分配工作的。

日文学习成绩的好与坏，也是我们学生升学毕业的一大关，日文成绩差是不会考上学校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奴化东北青年达到最彻底的程度，以便做侵略中国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爪牙，每当学习升学考试时，日语口试都列为第一试，第一试不合格，一切也就全部宣告完蛋了。

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日本语的学习，学校每年都举行两次日语朗读会，以此来"激发"我们学习日文的情绪，朗诵比赛成绩好的，由学校送往市内各校的比赛会去参加比赛，比赛最好的选送到市放送局（即广播电台）去比赛。一切可以刺激我们学习日文的手段都用上了。

在大力推行日语学习中，日本老师还开展家庭日语夜读补习班的活动，我们除了白天在校学习日文外，晚间还要去参加在日本老师家中举办的日语夜读班的学习，这种夜读班，每周一、二、三、四、五，晚上都要上两小时日语课，每人每月交的学费多少钱我记不清了。

这个夜读班的开展是日本侵略者彻底奴化中国青少年的一把最毒的利箭，一箭三雕：第一，可以达到日语为"国语"的程度。第二，可以把我们拉进日本生活方式中，而又是"满洲"青少年在客观环境中所接触不到的境地中去。第三，感激"日本皇恩的栽培"。

晚饭后，我们每个人都拿一本日本语读本去当时教日文的老师家中，上课前日本师娘早已把学习环境布置妥当，踏踏密（草垫子）上已给我们放上了桌子。

日本师娘叫田中爱子，她常常对我们说："诸生今后有机会要争取到我们日本去看看。你们一到了日本国土之后，就会感到日本帝国的伟大。你们就会亲身地接触到日本的文明，你们就会亲眼看到日本帝国皇恩事业的昌盛"。

田中爱子还常常对我们说："满洲人不常常洗澡刷牙，这都是极不文明的。满洲女人，脚脖子上缠扎腿带，下衣裤都是大裤裆，这种落后衣装看来叫人感到十分讨厌。""满洲人信的神佛太多了，这是违反'八纮一宇'的。'八纮一宇照满洲、永受天呼兮万寿无疆（这是满洲国第二个新国歌的歌词一段）。'日本国民信奉的是创造文明昌盛、繁荣富强的天照大神。满洲人信奉黄鼠狼和狐狸，这些都是要不得的。你们满洲青少年

现在就应该反对家长这些行为。”

田中爱子还时常拿出一些日本画报和一些日本名胜照片来给我们看，有时她还坐在我们身边当义务讲解员。田中爱子拿着一张两孔桥的照片给我们看，一边指点着照片，一面对我们说：“这座桥跟皇宫很近，是东京的名胜，这座桥所以成为名胜，主要是来源于乃木大将。两孔桥是乃木大将为国光荣捐躯的地方，你们还记得吧，日俄战事在尔灵山上和侵略‘满洲’的俄国人打仗的故事吧！你们应该好好学习乃木大将的报国献身的行为，不怕牺牲的为国家捐躯的精神”。

学校有时也在礼堂放映电影给我们看。我记忆最深的影片有：《万世流芳》影片导演是张天赐，李香兰为主要演员。《万世流芳》内容是以写英国向中国输卖鸦片烟为主题的影片。日本侵略者放映这个影片，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个名震世界的鸦片战争历史，来激发起我们这些“满洲”青少年对英国的仇恨和反抗，因为只有“打倒英美”才能“东亚和平”。更重要的是，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鸦片战争的历史来培养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敬爱。在我们这些幼小的心灵中树立起“大日本帝国”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把东北青少年绑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车上，去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卖命！

庆祝“建国”十周年

1942年3月，适逢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在伪满洲境内，上上下下大搞庆祝活动。

学校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也不例外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在“建国”十周年“纪念日”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就开始了校外的社会活动。日本校长浅井叫我们每个人背上两个收音机，挨门串户的到市民家中去推销。

每天还要到大街上去站两小时的岗，胸前带上个红纸条，上面印有“交通训练周”的字样，去训练来往行人遵守交通规则。有时还代替戏院去挨门挨户的卖“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戏票，马连良的戏票我们卖得最多。

上下午，我们以军训的小队为单位，串街走巷到市民中去动员老百姓参加“国防献金”活动。

学校的课堂生活在这个节日前后都处于停止状态，教官武田是这个日子里最忙的人，他一个劲地训练我们走“分列式”。为了练好分列式参加“建国”十周年，忙得马不停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参加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举办的各种日语作文、歌咏、图画等各种比赛活动。

3月9日“大庆日”到来时，全校在副校长浅井的主持下，举行了很是隆重而庄严的“庆祝”仪式。仪式开始时同以往一样照旧是升日“满”两国“国旗”，唱“国歌”，向日“满”两宫遥拜、向英灵默祷。与往常不同的是，全体都面对新京方向（伪满首都长春）弯成90度，低下头来奉迎“皇帝”颁发的“建国十周年诏书”。“满洲”人的正校长，从外面迈着方步，双手高过头顶捧来了装在木盒内、用黄绸布包着的“建国十周年诏书”。宣读“诏书”的一声令下，场内鸦雀无声，我们大气不也出，静静地听着“诏书”内容：

“我国自肇兴以来圣兹十载，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

神之道……”“诏书”读完后，浅井接着对我们作了“建国十周年训话”，他的训话内容也是以“诏书”为基础的，说“满洲国民”须念“建国源渊”发于“惟神之道”，要“致崇天照大神之神庥和天皇陛下之保佑”。“日本天皇陛下，对满洲皇室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满洲国民就更应万民一心万方一志的尽奉公之诚援亲邦之战”。浅井更恬不知耻地说“大日本国民”为建设“新满洲”都是忠诚做事，都是勤勉治业的，“满洲国民”就更应“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之圣战”，“满洲青少年”就更应该“不惜一切的生命去奉献大日本亲邦之大业”，只有这样做，“满洲青少年才能奉答皇帝陛下建国之明命，尽辅东亚勘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

浅井训话后，教官武田代表全校师生讲话，武田的讲话很简短，但他留给我们的奴化影响确是相当深远的。武田说：“满洲自建国十年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积极效日本皇恩，努力国本之培养，我命令全体生徒（即学生）立正！请正副校长登台检阅。”他的命令下达之后，正副校长耀武扬威神气十足地登上台来，检阅我们这些已被奴化了的学生们军事训练的“成绩”。

从这以后我们早晨一到校就开始背诵“建国十周年诏书”，人人都必须把“诏书”背诵得滚瓜烂熟，否则我们就要遭到惩处。

没几天，在一进校门的校训栏上，换上了“献身大东亚圣战”的报片，从此“满洲皇帝”的这个御言竟成了我们的校训了。

七、南满中学堂

南满中学堂，简称“满中”，是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投资兴办的，不隶属于伪省市政公署，所以与一切伪国民高等学校的名称不同。从教育等级来看，和“国民高等学校”是同级学校，国民高等四年制，南满中学堂也是四年制，从“满中”和“国民高等”毕业后，才能取得投考大学的权利。

南满中学堂经费是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来供给，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侵略东北的经济大本营，因此南满中学堂在校舍和其它设置上都比当时其他国民高等学校好得多。

南满中学堂，从行政领导直至教职员都是日本人，除学生外，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校任职，学生大部分是“满洲国籍”的，也有极少一部分是朝鲜人或通熟“满语”的极少数蒙古族人。

南满中学堂堂长是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任命的松本，在校内负责全面事务，他曾编了一本“日满语辞典”，是一个精通中国文字的日本汉学家。

南满中学堂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东北青年的一个重要基地，是对东北青年散放毒剂的一个大中枢，是扼杀东北青年报国忠心，驱使东北青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怀抱、反对自己祖国的一把锐利尖刀！

南满中学堂校内纪律森严，学生的行立坐卧走，都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方式。为了达到彻底奴化的目的，所有的学生都住在校内。就每天吃饭来说，都必须整齐排队进入饭厅，还必须听值日队长发“开饭”的口令，否则不能端碗动筷。

南满中学堂在教育培养的手段上，比之其它日伪学校更高了一层。在课堂上除了设有数理化生物课程外，还设有欧洲史、亚细亚史、支那史以及地理等课，每周星期二下午定为时局恳谈会。

“满中”的历史课

龟田是“满中”专门讲历史的教员，他在给我们讲欧洲历史的时候说：“英国是欧洲的一个自称世界的日不落强国，英国的强大主要是靠对外输出鸦片，英国是一个用输毒的办法来统霸世界。支那战争都是由于英人输出鸦片引起的。”“日本从历史上早已注意到了英国对亚细亚的输毒行为，同时也已看到了英国输毒对亚细亚的危害。打倒英国拯救亚细亚，日本国民曾经做了很多的奋勇牺牲。日本政府的‘四一七’宣言（即天羽声明）和‘九国公约’，这些都是日本拯救支那的历史见证。历史上有名的成吉思汗，为了拯救支那，曾经派兵打过英国，成吉思汗带领支那人英勇地征服过欧亚两大洲，这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崇拜的”。“俄国人也仿效过英国人，对支那、对满洲采取过侵略行动”，“俄国人特别怀恨日本，因为日本把俄国势力赶出了支那，赶出了满洲。自从日本来到满洲之后帮助满洲建设，俄国才被迫同日本全权代表松冈洋右签定了互不侵犯协定，这是日满两国的光荣，也是支那的幸福”。

龟田在讲亚洲史时对我们说：“从人种、皮肤、像貌、生活方式、文化方面来看，亚细亚各国都是一个人种，都起源于一个祖先。因此亚细亚人对亚细亚人应当友好相处，不应该打仗。”“亚细亚的国家都是很落后的，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成了亚洲的惟一文明国家，日本有义务帮助亚细亚的其它落后国家。日本和亚细亚各国及支那人都是同一人种，都是同一祖先，因此，日本帮助满洲人、支那人来共同建设东亚文明，这是日本的权利。日本帮助亚细亚人、支那人来建设东亚新秩序，这是日本的光荣任务。”

龟田还说：“一百多年来英美就开始向亚细亚、支那进行侵略活动，破坏了东亚和平，从而引起了大东亚战争。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为了拯救东亚和平，勇敢的投入了这场反对英美侵略东亚的正义战争。满洲国民、支那国民、所有的亚细亚人都应支援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完遂。”

“满中”的奴化教育

南满中学堂距离日本“神社”是很近的，这就给我们这些被奴化的学生们去祭祀带来了交通上的方便，学校里每到初一和十五的时候，清晨起床后都要集体到日本“神社”祭祀一番。祭祀的仪式每次都一样，行三个 90 度鞠躬就算了事。各次“神社祭祀”虽然都是一样，但每个人要都参加不得请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学校当时明令规定，这是因为“八纮一宇”照今天。伪满第二个新“国歌”中歌道：“神光开宇宙，万里山河壮皇由，帝德巍巍荡荡渤海流，永受天呼兮，万寿无疆莫于愁。”这就是必须参加的理由。

有人说日本人不讲迷信。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东北沦陷的 14 年中，我和日本人的接触中证明日本是讲迷信的。日本人信奉的鬼神是天照大神，日本人供奉的是一把

剑、一面铜镜和一块石头。有人说日本人仅对神佛是迷信，这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不过日本人所反对的迷信是中国信奉的宗教。

在日伪统治时期，是不允许我们这些青年信奉中国神佛的。每逢沈阳的三月二十八日祈庙、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庙会时，“满中”的学生都是决对不许去参加这些庙会活动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挖空心思地从各个方面奴化我们，就连中国人自己的民俗和宗教信仰都是不许保留的。

凡是考入南满中学堂的学生，入学报到后学校都发给每个学生一张学生证。学生证背面印有“校训必读”五条，就回忆整理于后：

第一，我校生徒（即学生）须念建国源渊发于唯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

第二，我校生徒，永念大东亚战争牺牲之英灵。

第三，我校生徒为大东亚圣战完遂忠勇奉公。

第四，我校生徒应团结友爱发扬协和精神。

第五，爱护校誉，尊敬师长。

这五条“校训必读”把我们紧紧地捆起来，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任他们随意地驱使。

1943 年春天，市“国民高等学校”秋季运动会上，南满中学堂在参加竞赛的项目中没有夺取锦标。这次运动会锦标被号称“五驴子”的第五国民高等学校夺去。堂长感到运动会上没有得到锦标有损于南满中学堂的荣誉，实质上有损于日本奴化教育的荣誉。堂长对我们表示了极度的不满，回校后立刻把全校同学召集到大礼堂，对我们大训而特训起来。堂长在雷霆大作中对我们说：“南满中学堂是日本‘满铁’的学校，你们没有夺取锦标，这不仅是你们的耻辱，也是‘满中’的耻辱，更是‘满铁’的耻辱。爱护校誉勿论如何，你们明天必须把锦标夺回来。”堂长训语结束后，军训室的日本总教官立刻把全校各班的大中小队长召集到军训室去开会，布置明天运动会上抢夺锦标的行动计划。当第二天去参加闭幕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各班会日本柔道和击拳的同学，平时体质好、个头又高又大的同学们，都脱掉了校服，穿上了普通服装。

闭幕式一开始，伪奉天市长王贤沛刚登上授奖台，还没有来得及公布竞赛成绩，我们这些穿便服的同学，一拥而上把锦标抢过来。刹时间运动场立刻成了战场，“满中”和五高学生在呐喊声中立刻厮杀起来。王贤沛吓得像只地老鼠似地抱头钻进汽车溜跑了。运动场上这种格斗的场面一直到伪南区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到来后，在军刀武器的弹压下才停息下来。日本宪兵当场把五高学生用警绳绑定了十几个，而肇事者的南满中学堂的夺标犯，包括我们参加大会的学生在内，一个也没缺，在日本总教官的带队下唱着“凯歌”高举锦标回校了。

这一事件本身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的需要，这个需要本身就是叫我们在日本统治者面前做个奴才，在“满洲”奴才前再去做个暴君。“暴君面前是奴才、奴才面前是暴君”，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们满中学生，需要培养起来一个特殊的性格。

各校与各校的学生之间互相格斗厮杀的行为在“满洲”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事，而

且这种校与校、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格斗厮杀行为是“满洲”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风气，是日本侵略者对“满洲”青年贯彻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产物。

特别是南满中学堂的学生，无论在任何一种互相厮杀和格斗中，学校当局都不欢迎我们带着败像回校的。带着败像回校就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污辱，就是对“满铁”、对南满中学堂校誉的破坏。松本堂长、宫田训育长对我们经常不断地讲这些话。

土产的奴才和经过洋加工的奴才在奴隶主面前其待遇是不一样的。小奴才和大奴才在奴隶主面前也必然有所不同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秋季远足（即旅行）中，为了去风景名胜千山，“满铁”特意给我们在普通客车后面挂了几个车厢，火车开动前上来了一个伪满警察，他一看车厢内还有宽位可坐，就顺便坐下了，我们这些学生也未加阻止。没过多久，教官穿着军服带着中佐肩章从前车厢检查完毕走了过来，一眼他就发现了这个伪满警察，教官立刻声色俱厉地把这个警察驱逐出去，接着就把我们训斥了一阵，他说：“这个车厢是‘满铁’特意给我们准备的，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叫一个小小的满洲警察来坐，真是混蛋。”日本侵略者经常不断地培养着我们这种上等奴才的优越感。

“满中”的夜谈会

学校里每月不定期地利用晚自习的时间举行“夜谈会”，“夜谈会”内容均由学校训导处出题，每次“夜谈会”的题目是相当繁多的，在这些繁多的题目中每个学生均可由自己来任选一题，然后就自己任选之题准备发言稿。这些题目就我的回忆所及整理如下：

大东亚战争中我之观感；胡乡粮谷出荷之所见；（缴纳粮食）

满洲社会未来之展望；柳条湖事变后父兄之希望；（九一八事变）

胡乡国防献纳之所见；满洲十年之建设；

日满亲善之花；满洲国民生活之所见。

各次“夜谈会”的题目大致都是这一类的。实际上，这种“夜谈会”就是日本侵略者对东北青年进行“思想测验”、“校正思想”的手段。不仅如此，这种“夜谈会”的真正实质是日本侵略者搜集东北人民对日本统治者反映如何的一种情报手段。同时更是他们捕捉“抗日犯”、“政治犯”、“思想犯”的一个大罗网。

在“夜谈会”上，凡是被校方认为内容充足“具有一定水平”的发言，都会被选到全校性的讲演大会上去讲演，日本侵略者利用这种互相传染的手段来彻底的奴化我们，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奴化手段是令人发指的。

在南满中学堂的北侧，是南满医科大学以及有一个日本在“满”浪速女高。浪速女高全校学生均是日籍女生。浪速女高和我们常常在一起举行一些活动，如日语朗诵会、讲演会、歌咏会、冬季溜冰比赛等等。

由于两校活动相联，浪速女高的女学生中有些人和我们“满中”的同学交上了朋友恋起爱来。究竟是哪一方面最为主动我不知道。就在这浪速女高与南“满中”学的联系中，南满中学堂的同学中，竟然有一少部分人和浪速女高的日本女生在共同合作下制造出了“日满亲善”的混血儿来。在“满中”三四年级的同学中，娶一个日本姑娘

作老婆的想法是相当多的。因为娶一个日本老婆就可以飞黄腾达，更可以达到东渡日本的目的。“满中”学生的这种思想倾向，受伪满“麒麟”杂志登载的“康德御弟”溥杰和日本女郎嵯峨浩子的结婚宣传影响有着密切关系。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南满中学堂的教育本身，不但造就了我们这些东北青年对日本武力、对日本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女性也使人感到不胜羡慕的。

我上一班同学王维邦，就是这种典型中的一个例证，他不顾父母的的反对，在毕业前夕同一个日本姑娘结了婚。“八一五”东北解放后，在遣送日侨的时候，他又冒充是日本侨民同他的日本老婆一起离开了祖国。

败亡之际的“满中”

1944 年前后，南满中学堂和所有伪满各校的学生们都坐不稳了，只要一听到空袭警报的汽笛长鸣，我们就得赶紧抱头钻进防空壕去躲避。每当听到南部防空司令部的广播通知，就立刻拔腿逃跑。从这个时候起，空袭经常不断地出现，我们的课堂生活也因此而经常地中断下来。学校里佩带“大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证章的教师陆续地离开了学校。这种日本战败前的紧张局面，在当时我们是分析不出来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是一个初秋的漆黑夜晚，正在甜睡中的我们被紧张的长鸣的响声惊醒，各个宿舍楼的楼道里都站有一个老师，高声地向我们下达“到礼堂紧急集合”的命令，这种突如其来的一刹那间，把我们吓得不知所措，在晕头转向中我们边穿衣服边紧腰带直奔礼堂冲去。

十几分钟后，礼堂已人员满座，除了宫田这个老训育主任在场主持秩序外，其他教职员们一个也看不到，窗外星光闪灼，初秋的月光照在窗上，映射出淡淡的微光来，在夜幕下，“满中”的整个校园更加显得死一般地沉寂。由于这种我们从未遇过的气氛，使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惊异的眼神和恐惧的心情来观察着一切。

不多久，松本堂长率全校所有教职员，迈着日本军人特有的方步进入礼堂。松本踏上讲台后沉默了片刻才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他那狰狞的眼睛向我们在座的全体同学们扫视了很久之后他才开腔：“我奉天皇陛下和国府的命令向诸生宣布‘大东亚战争’结束!”

已被完全训服了的我们，这时都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又自觉地为“大东亚战争英灵”默祷。此时此刻，我们都以为“大日本皇军”取得了最后“胜利”。被蒙在葫芦里的我们正要为“大日本皇军取得大东亚战争”最后“胜利”欢呼时，松本又立刻开始了讲话，松本说：“这次东亚战争的结束，是由于圣上愿望‘日满生存’、‘人类幸福’、‘世界和平’才结束的。”松本寥寥几句短暂训话后，他命令全体师生起立收听从东京传来的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广播讲话。天皇的投降广播讲话结束时，“满中”的教职员们，这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面对东京向着战场，由于战败流出了他们感伤和惋惜与悔恨的眼泪!

从这天起我们这些学生们仍被关在奴役的牢笼中，已被日本奴化了达十年之久的我们，此时此刻也以一个日本侵略者的战败心情对待着这个极新的事态。

8 月 16 日早晨，我们带着一夜睡眠不足的疲惫精神，在不知所措中，仍按部就班

地走进教学楼，在大门告示牌前人们在争先恐后地抢看学校当局公布的“东亚战局告学生书”，学校布告原文已记忆不清了，其原文大意如下：

“美利坚，8月6日上午时分，在广岛上空用新型飞机投新型炸弹一枚，杀伤广岛国民数人。8月9日，美利坚又在长崎空投了此种新型炸弹，杀伤长崎国民数人。当此情况下，圣上为了日满国民生存、人类幸福、世界和平，才颁诏停止东亚战争。这决非我大日本皇军无能，只因我圣上与国府在东亚战争中过于重视人命，阻碍了防御和进攻武器的发达。美利坚在战事中视命如鸿毛，杀人如杀犬和蝗虫，这决非战争胜利之真理。现在赤俄背信弃义，毁日苏互不侵犯条规，于8日偷袭满北。当急之下望日满国民团结一致奋身击灭北来毛敌，以堪日满之安宁。”

这个布告看完之后，使我们感到很是奇怪，到底是战败了呢？还是叫我们做好击灭“毛敌”的准备呢？天皇已经命令战事停止，为什么又叫我们做战争准备呢？这一切都使我们糊涂起来。外来的奴隶主和土产的奴隶主，在培养奴隶成为他驯服的糊涂虫为他服务、为他卖命的标准上都是一致的。事后我们方知这个布告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用“满洲”这块土地，和驻“满洲”的关东军势力做最后垂死挣扎有关。

学校里除了训育主任、教官在校坐镇外，其他教职员此时一个都见不到了。中午过后，训育主任宫田把我们又集中到礼堂，由教官给我们作军事训话，教官对我们说：“军部命令，各校从现在起，全部进入军事战斗的戒备状态。为日满共存共荣，决心战斗到只剩一草一木为止。”

苏军攻克东北、进驻沈阳城下的军事行动，日本侵略者无法再对我们进行欺骗和隐瞒了。南满中学堂的“解散会”，就是在这天夜里的灯火管制中举行的。

对苏军毫无一点印象的我们，从未见过这种紧张的军事动乱的我们，正在惊恐万分不知所措的时候，宫田又抢先一步，把我们都赶到了礼堂。

礼堂讲台上只有亮度不大的灯泡一闪一闪地发光，玻璃窗上的防空帘早已拉放下来，从远处偶尔传来的枪声，更加重了我们对这种环境的恐惧。宫田训育长这时是一个最忙的人，他命令几个同学把墨迹还未全干的三张标语贴了上去，这三张标语至今仍在我的脑中记忆犹新：

“拜听玉音感泣呜咽”；“朝夕捧读诏书走向重新建设”；“大满洲生徒们20年后再见”。

宫本接着又命令同学把“满中”的旗扛来，放在讲台上方长年不解下来的日“满”国旗下面，未来究竟如何，虽然我们难能问卜，但是我们从这些举动上看，已经察觉到南满中学堂就要散摊子了。

松本堂长为首，率全体“满中”教职员进入礼堂，有气无力挪动脚步登上讲台，在漆黑而又凝固的气氛中，这些侵略者排成一队，向日“满”国旗和南满中学堂校旗行了告别礼。这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们一一的把腰弯下来，90度三鞠躬之后，松本用他的两只魔爪把“满中”校旗高高地举过头顶，亲手交到当时的学生大队长手中。

接下来传下去，帝国主义分子们，在战败的时刻里还想迷住中国青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永远奴役中国青年的这笔血债，中国人民，特别是受害的东北青年将永远不忘！

松本交旗之后，接着对我们全体同学作了极其露骨而又可耻的“解散训语”。松本

说："从昭和16年（1941年）12月8日晨6时起至今日战事止，日本帝国陆海空三军同英美战斗了四年，这四年是日本国民拯救东方民族文明的四年。这四年的历史是日本用血和肉堵住英美侵略东亚的历史。这四年的大东亚战争中，日本国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日本国民的一切牺牲，将永远地写在东亚的史册中。

"从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夜10时柳条湖事件起，日本帝国军民为满洲地方的永久安宁做出了牺牲，直到大同元年满洲帝国成立始，满洲国民方开始过着王道乐土生活。

"在满洲建国的十四年中，日本军民对满洲国民做出了人类史上从没有做过的巨大帮助。把蟊贼四起、国民落后的满洲，变为富强的王道乐土，这个历史将永远地刻在日满两国国民的心中，南满中学堂，是日满共存共荣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东亚战争结束了，支那之夜是不会叫你们睡好觉的，因为支那（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我们就要回国了，我们走了以后，满洲将有可能回到14年前的那种蟊贼四起的社会的动乱中去。诸生今后何去何从要当之小心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用满洲人的这句老话，我以全体老师的名义赠给大家做为纪念。

"这次战争结束，决不是日本大和民族强盛精神的结束。东亚战争这样早地结束，主要的是因为天皇陛下和日本国家，在战争中过于重视人命的摧毁，阻碍了日本军事防御和进攻武器的发达。我们回国以后，将要朝夕捧读诏书，走向日本的重新建设，20年后再见不晚。祝满中师生的精神像长白山上的松树一样永远长青，像黑龙江中的流水一样永不停息！"

松本的"解散训话"结束后，率所有的教职员在一片恐惧的气氛中，在低沉的脚步声中离去。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文化中心、奴化东北青年的大本营南满中学堂，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恶梦一齐遭到彻底的破产！

会散了，"满中"的学生们每个人都几乎带着感伤的心情回到各自宿舍，在灯火管制的黑夜里，互相间情不自禁的开始议论着未来，议论着前途。

校外枪声不断传来，"支那之夜是不会叫我们睡好觉的"、"蟊贼四起"、"动乱的社会"，松本的这些话，使我们更加感到"当之小心"的重要了。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出去看新世界的到来。

曙光射进窗内不久，光明降到了"满中"，操场的平地上出现了大批荷枪实弹的苏联武装。苏军武装已经知道这是学校，因此对我们没有做任何近敌的准备，只是在相当距离内，对我们做了目光接触。

大约黄昏左右，从教职员宿舍内传来了激烈的喧嚣声。我们跑去后才知，以松本为首的这群日本人，挨了中国人民一阵毒打。原来不可一世的松本堂长，平日我们常常不敢正视的老训育长宫田，这时变成了落汤鸡，顶着秃光的头，在嚎叫着，往日那种杀气腾腾的凶相至此一扫而尽。

出于师生的"感情"，同时也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我们"千锤百炼"的结果，我们大家把这群日本人接到教室内居住，这群日本人在我们的庇护下才转危为安。为了日本先生们的彻底安全，我们又尽了一切的可能，把日本先生们的日服撤换了下来。

如果不是由于我们"满中"学生是"日满亲善的种子"，如果不是由于我们这些

“满中”学生是“日满共存共荣一面不倒之旗”，以松本为首的这帮侵略者，早就进入“忠灵塔”变成了“东亚英灵”。

8月20日，以松本为首的这群毒害中国青少年的刽子手们，凝望了整个校园后，同一切侵略者一起在苏军的武装监押下，向日本战俘营走去。

树倒猢狲散，日本精心炮制的南满中学堂至此宣布垮台，东北青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八路军进驻沈阳后，张学思、陶铸等领导人都来学校给我们作报告。报告开始时，首长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齐声回答说是“满洲国人”。首长又问我们什么是“满洲国人”？我们齐声回答说：“满洲国”的人就是“满洲国人”。不知有祖国，不知自己祖先，不知自己是什么人，这是日本毒害中国青少年的结果，中国人民和受害的东北青年，是要清算这笔血恨的。至今想来我仍感痛心和羞耻！

关于日伪时期东北主要的几家日办汉文报纸

韩 篁 洲*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中国大陆强占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地区，一方面把它的经济和军事势力继续向内地深入和扩张，并利用南满铁路尽量吸吮东北的经济资源，一方面又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竭力发展，作“长治久安”之计。

日本先后在大连、沈阳等地出版各种报纸和杂志，宣传日本的强大、日本的文化，并从中对干涉中国内政，进行颠倒黑白，挑拨离间、制造混乱、腐蚀读者的勾当，作为它进一步侵略东北的别动队。

我在东北新闻界滥竽十年，对事变前后各主要报纸（包括伪满时代的）还有一些印象，现在略述如下：

在大连方面，《泰东日报》是日本人创办最早的中文日报，创办人是日本有数的汉学家金子雪斋。该报资金是由日方与当地的士绅和工商业资本家捐助的，最初的主笔（主编）是傅立鱼，安徽人，中华革命党党员。

傅立鱼在当时颇有些名望，是大连中华青年会（不同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办人之一。这个青年会还附设了一所中华青年会小学，每逢祖国国庆，这个小学的师生还举行庆祝游行，悬挂中国国旗。旅大沦陷已近五十年，至是当地人民始初见祖国旌旗，无不兴高采烈。但日方早已按剑怒视，阴谋制止之。果在数年后，诬指此项活动有共产党嫌疑，下令取缔。这时金子雪斋已死去，傅立鱼又被日方驱逐出境，《泰东日报》由日本某政党人士接办，此人不在大连，领导乏人，逐致被后起的《满洲报》所压倒。

由于创办人金子雪斋表现对中国抱同情，所以内容有时还能维护中国人的一些利益。比如，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早先大连有个名叫《电气游园》（即今《鲁迅公园》）的公园，有一个时期以中国劳工污秽不清，有碍观瞻，被禁止人内。傅立鱼便在报上发表文章，痛加驳斥，认为《电气游园》是中国劳工所建，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入园。经他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胜利。

金子雪斋头脑比较开明，为了拉拢中国职工努力为他效劳，曾由报社出资，先后指派该报编辑沈紫暾等到日本读大学，以资深造。

大连的《关东报》是日本人永田善三郎创办的，主笔为旅大本地人王子衡（后来充当了伪满省长级的大官），曾为大连华商力争“市议会”席位，认为华商多，席位反比日商少，不公平，因此颇为华商所拥护。永田善三郎后来当了日本众议院的议员，把资本抽走了，由他过继别姓的胞弟司川年房接办。此人不务正业，鸦片嗜好很深，不擅

* 作者曾任《满洲报》文艺副刊编辑。

经营管理；又因人命案敲诈华商，被投入监狱；无法维持，曾停刊一个时期。后来由大连沙口商会副会长刘儒风接办。但旅大为日本“租借”地，向来不准中国人办报，所以仍由司川年房出面，把《关东报》复刊，社务则由刘儒风主持，由曾充日本警所巡捕的刘召卿担任主笔，我担任了总编辑。这张报每日出版两大张，八版。

大连《满洲报》是日本人西片朝三创办的，他是医师出身。总编辑是安徽人金念曾。该报原是日文《满洲日日新闻》的一张十六开中文版附张，后来单独扩版发行。刚出版的时候，社址和一切设备都很简陋，销路不广，但西片朝三有一套资本主义商业性报纸的经营方法，不久就有所发展，并且很会赚钱。

例如：他为了推广报纸销路，就发起准备编纂一部《东北人物志》，哪些人是东北人物，用读者用投票方式来推选，而选票就印在这张报纸上。当时有许多人企图向上爬，谋求在社会上跻于“人物”的地位。于是，这批人一方面大量订阅他的报纸，剪下选票来投自己的票，一方面向他贿买。因为如果得不到报社的支持，即使选票再多，也可以被他操纵而落选。西片朝三是一举两得：在扩大报纸销路的同时，又大大开辟了其他的财源。

西片朝三还能顺应读者的心理来推广销路。东北沦陷后，当地人民思念祖国，关心祖国的一切。他就一方面叫上海的通讯员设法秘密寄发剪报，一方面偷听南京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消息，由编辑部酌情改头换面来发表，骗取了更多的爱国的读者。因此这张报纸在不多的几年中，销数扶摇直上，营业收入激增，声誉雀起，成了大连第一流的汉文报纸，甚至压倒了当时东北最有名的沈阳《盛京时报》。

《满洲报》畅销以后，西片朝三就扩大社址，盖洋楼，购置轮转印刷机，篇幅由每天两大张八版增加到三大张十二版。每逢年节，又召登祝贺广告，篇幅增至六大张、二十四版，东北机关矿厂都拨有巨额广告费来刊登祝贺广告，报社因此大发其财。

我那时担任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曾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刊登一些讽刺时事的小品文，东北的青年作家和学生都争相投稿。

新闻版编辑还利用日本各通讯社的消息，凡中国报纸不敢登载的消息，它都抢先发表，直到伪满时代还是这样，因为最初旅大还没有划入伪满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将在旅大的最高行政机构关东厅迁移长春，把旅大划入伪满范围。伪满当局为了统制东北报纸言论起见，特设了一个名叫“弘报公会”（即“报业协会”）的机构，强制东北所有中文报都加入这个组织，而《满洲报》为了自由发表消息可以赚取更多的读者，始终拒不加入。这时西片朝三已因年老退休，改由其子担任社长。

最后，这家报纸连同它在沈阳另设的《民声晚报》同时受到伪满政府的停刊处分。

沈阳《民声晚报》是伪满洲国成立以后，由大连《满洲报》在沈阳开办的，以《满洲报》沈阳分社社长马星垣出面为发行人，我担任总编辑。最初每日四版，后增至八版。走的是《满洲报》的路线。

沈阳《盛京时报》的出资人是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日本“租借”地出版，每日对开两张、八版。是日本人在东北所办报纸中声势最大、实力最厚的。

哈尔滨《大北新报》也是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资开办的，等于《盛京时报》的哈

尔滨版，销路很广。

在这里，附带简单谈一下中国人办的几家主要的报纸。当时的新闻报纸中心是沈阳和哈尔滨。

沈阳《东北省公报》主办人是王光烈，是个书家，被称为辽阳才子之一，总编辑是柳旭光。

沈阳《东三省民报》，在张学良统治时期销路很好，接受张的津贴，等于是奉系的喉舌。

沈阳《醒时报》是一张回民办的报纸，版面较为粗陋，印刷模糊，销路很少。创办人是张鸣歧，他的长媳和次子担任编辑，其他工作也由张姓一家人包办。

哈尔滨《国际协报》是张复生主办的，在当时是当地销路最广、读者最多的第一流报纸。萧红和萧军（当时笔名“三郎”）经常在这张报纸上投稿，并且也是由于投稿而相识进而结为夫妇的。

此外，哈尔滨还有《哈尔滨公报》（主持人是关弘翼）、《滨江时报》和晚报型的小报《哈尔滨午报》。

长春《大同报》是伪满洲国的政府机关报，社长是《东三省公报》创办人王光烈，因为是派销的，当时销数很多。解放时为我人民解放军全部缴获。

（张功良整理，1963 年）

把握“文化国策”关键的“满图”

赵 朴 谦*

“满洲图书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图”），是依照特殊法人的规定而组成的“特殊会社”，在法定上受伪经济部的监察，在“国策”上受伪文教部（或民生部）的监督。在执行它的业务上，为了欢迎大主顾，并为了解各地文化的程度来结成图书的“配给网”，就与伪“满洲帝国教育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我曾任该会的参事，因经常有业务的联系，对于“满图”略有片断的认识，想把它的轮廓谈一下。

从它的设备来看，拥有当时号称尖新的自动轮转机，工人职员将近千名；有最新式的铸字炉，能铸出中、日、蒙、俄、英文等各种各体的铅字，每种每体还有大小不等从特号到九号和各样类型；附设照像制版、金属精版和精装平装的装订机器；生产能力每天近20万册，俨然是一个大印刷工厂。

从它的业务来看，承印“满文”（中文）、日文、蒙文、俄文的教科书；“满洲帝国教育会”的各种期刊单行本；警察协会的“满文”、日文、俄文等版的月刊“警友“；司法部的月刊“法曹”……等等；将工厂划出一部分，禁人往来，由拣字、组版、印刷，到校对，都是日系工人，利用专机，在军人监视下为关东军印制地图和书册。此外，“满图”本身还出了销量占当时首位、大众性（娱乐性）的月刊《新满洲》。这本杂志当然以宣传“文化国策”为主眼；但是编辑的方法，是从人人易于接受的趣味出发，避免了伪政府机关月刊硬性的注入式的形式，采用了迂回曲折的技巧，来达到宣传的目的。例如每期除刊载内外时事之外，往往记录“满映”明星或舞台坤伶的座谈会中的“沐王道恩泽才能发挥艺术”等类的话。并附照片，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另外，延聘前《大同报》社长、号为东北三才子之一的王光烈，同几个通日文的青年，翻译和编纂一些与“建国精神”有关的、面向大众的单行本，和与“教育方针”有关的面向学校方面的参考书。“满图”原拟用“新书”来代替旧书，凡属于由“外”输入各种文字的所谓排日、侮日和诽谤伪满的进步书籍，就会同警察机关，严加取缔，一举而廓清之。但是“新书”（包括“满图”本身的刊物，“满日文化协会”的《东方国民文库》，“满洲帝国教育会”的各种定期、不定期的刊物，和其他的新图书）在当时还是一股微乎其微的细流。相反的，所谓旧书，正泛滥在伪满社会的各阶层中。于是“满图”的常务理事（代理事长）驹越五贞采取措施，将“满图”的股本增为1000万元，从中提出200万元，创立了“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配”）。一面同日本政府官营和民营的图书“输出组合”结成由“满配”一手贩卖的合同；一面将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帝国教育会参事。

伪满各地的日“满”图书商店，在伪政府的支持下，一律变成了“满配”的经售店。这一措施，不仅为伪政府机关尤其是伪警察机关，节省了防谍、检阅的劳力和时间；同时，也形成了图书“配给”的一元化。在这种形势下，大量的为伪满认为含有毒素的旧书籍，就一律地禁阅了。各阶层的读者，非通过“满配”的“配给网”就无从购到书籍，达到了所谓“文化国策”时期的最高阶段。

后来“满图”的常务理事驹越调归日本，由曾任伪满教育司长的都富佃，从伪哈尔滨副市长任内调来“满图”，接驹越的职务，且兼理事长。都富是曾参加过“奴化教育”上层建筑工作的，任事后对于彻底消灭旧书，又大刀阔斧地搞了一阵。

“满图”额设“满系”理事（不上班的）两名，他（都富佃）来时适值一名出缺，他向我商量转“满图”，担任上班的理事。并说：“理事级的人事，须通过关东军、文教部、经济部和国务院，由我来办；帝国教育会方面，由你妥为安排。”后来，该会常务理事中泽仪三郎认为四名参事（日系、满系）已经被召入营了两名，他本人召令朝下，夕即成行，拟定我代其职务，不同意我转“满图”（他们都是日本在乡军人）。

我虽未转“满图”但有业务关系，常和都富见面。有一天见他的桌上有“辞源应禁”的草单。我说：“辞源”同于日本的“辞海”，是一种辞书的性质，何必禁它？都富哈哈大笑，立时把草单揉毁了。这算救了当时东北仅有的辞书一条命。谈“满图”时想起来了，无意识地附写在这里，借以说明伪满取缔书刊的严苛和荒谬。

（1963 年）

真井鹤吉“出巡”黑河随行记

刘 启 民*

1943年我任伪满政府军事部秘书官，一直随同伪军事部次长日本人真井鹤吉中将行动。军事部相当于国防部。真井鹤吉中将在名义上是次长，实际上他是伪军事部的实权者，伪军事部大臣亦只不过起着装饰门面、盖图章的作用而已。真井本身亦无完全的决定权，他要接受最高顾问和高级顾问的指示和普通军事顾问的指导。这些顾问是日本现役军人，是由关东军派驻伪军事部的，他们由关东军直接接受命令。所以关东军实际就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真井鹤吉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日本陆军大学、日本陆军大学研究院（日本称专修学生）毕业，德国留学生，得过明治天皇恩赐奖（怀表）。1945年他58岁，他与石原莞尔、町尻量基共称为21期的“三羽乌”（编者注：即三个才智出众的人），在青、壮年时被认为是该期中未来可晋升到陆军大将的人物。真井以大佐任炮兵联队长（炮兵团长）时，他的属下一个少尉排长指挥一个排的炮兵，参加了轰动一时的少壮军人发动的“二·二六事件”，因而引责被编入预备役。1937年由陆军省介绍到伪满军服务，他历任伪满陆军训练学校教育部长，1939年转为伪满军少将任军官学校干事（即教育长），1941年晋级陆军中将任伪满治安部军政司长。1943年伪治安部改组，伪满洲国的军警分离，治安部改称为军事部。邢士廉任伪军事部大臣，真井鹤吉任伪军事部次长。警察另成立警务总局，直隶于伪国务院总务厅，由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领导，伪总局长由日本调来现任的县知事接任。此一事实足以说明日本和伪满究竟系何等关系，它行将何处去的一个最显明的标志。它预示人们：伪满将是“第二个朝鲜”！真井鹤吉是日本四国地方香川县人，我从1943年4月起，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方与他分手。在苏军进入长春后，他作为战犯被苏军逮捕押往苏境伯力，尔后情况不详。他有独生女儿澄子1946年病死长春，妻独自一人1946年秋被遣送回日本。

1945年6月初我随同真井伪次长到北满一带视察伪满部队，其中包括到黑河附近国境查看希特勒德国投降后有关苏方动向的一般迹象。我们由长春出发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等地视察伪满军队，此后北去黑河。中途在孙吴会见了日军的司令官。孙吴是北部临战境地防卫上的军事重镇，有重要军事设施，被划为军省地带，一般人员除持有特殊证明是不准进入的。这里驻扎着一个军司令部，附近居民已经迁出军事区域外。由孙吴北行越过一段丘陵地带，黑河就在北端尽处，濒于黑龙江岸，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城镇，举目一望，四域均可收入眼中。黑河附近的江宽约300—500公尺，对岸的城市

---

* 作者曾任伪满政府军事部秘书官。

是海兰泡（俄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即帝俄当年驱赶中国居民淹毙于黑龙江中、制造惨绝人寰的民族血案的肇事地点。该城距江岸约千公尺开外，它位于较高的台地之上，市面平静很似萧条，远处相望有数所楼房稀稀落落，墙上的涂料到处剥脱而下落。只见附近有苏军青年军官两人在高阜处席地闲叙，表现出德军降服后得能舒一口气的景象。遥望更远处有铁路线通往伯力，但觉察不出运输频繁迹象。黑河市区东北，江的北岸有一条木船，上边有数个类似工人模样的老年或中年人，间有女性，在不太紧张地劳动着，他们衣着不整近于褴褛，从此可以看出苏联在苏德战争中人力物力缺乏的实况。在隔岸，离岸约百公尺地方有苏军监视哨一所，哨兵在岗楼上向中国境内了望。在黑河靠近江边的饭店屋顶上，关东军情报部门设有连续监视哨，记录每时每刻的动态。此间的宪兵分团、国境监视分队都在执行监视任务。我随同真井和现地负责人员曾换上便装乘坐江轮，在黑龙江上属于中方界限的江面上作了一次巡游，但所见也仅止乎上述迹象。在黑河驻留两天一夜，我们达成了目的，搭车归返了长春。

真井在归途或此前此后都有些谈话，我更参考由其他方面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对1945年6月的形势作了以下的概括：“日本和苏联存在着中立条约，苏联与美英之间仍然存在着勾心斗角。根据目前的诸般情况和我们在黑河对岸国境情况观察的感应，估计苏军可能尚未开始大规模的兵力转移。因此可以推定苏联对日宣战可能推迟。最早亦不能提前到8月。如果日本加强对美作战，苏联的宣战甚至可能推迟到明年。因为消耗美国的实力对苏联有利，日本对美国抵抗强烈，很可能促成美国对日本予以有利条件，提前停止战争进行媾和。关东军的精锐早已投于菲律宾诸岛的作战。如第一师团本来是对苏作战的关东军的建制，但它早已出现在菲岛了。现在的关东军已经由战略攻势改变为战略守势，将在8月底前改变军队的配备，完成新的部署。目前在国境的部队，将利用工事进行绪战的防御战。第一线的部队以一部担任上述任务，主力将后撤到第二抵抗地带。此地带预定东起以依兰为中心的一线，西与小兴安岭连结，这也是北满作战的主阵地带。今后的作战对美国将是主战场，对苏联将是支战场了”。

此前大约在1943年的特命检阅中，在牡丹江随同当时的“特命检阅使”、伪军事咨议官于琛澄和首席随员、伪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以及伪牡丹江第六军管区司令官李文龙参加过日本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的请宴。在这里我得知山下部队对外的番号是第一部队，它是当日苏宣战时，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可能是限定在三个月内）攻陷海参崴，拔掉指向于日本心脏的匕首，解除“大日本”的心腹之患为任务的。另外在齐齐哈尔的方面军将由满洲里发起攻势，直捣赤塔切断苏远东军与欧洲的联系，以迫使苏联屈服。1943年我随同真井在海拉尔曾与关东军驻海拉尔的军司令官十川中将会晤，十川与真井系陆军大学时的同学。这里有一个值得回忆的事实，那就是在宴席上侍酒的一个“女中”，问其来历，她已24岁，系高中毕业的女学生，父亲是文学博士，她很有教养，表现娴雅。她作为“挺身队员”来到军队服务，幸而膺选在军司令官麾下把盏。她是牺牲了个人一切，为军国主义卖命的。然而运命不如她的另外一些“挺身队员”，每日呻吟在无聊的军旅之中，过着受人戏侮欺凌的生活，岂非更堪怜惜！这里可以看到军国主义者对广大日本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一斑了。

1943年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作战方针仍是攻势作战。然而时至1945年的此刻，

确实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它力不从心，但是却依然固执它那冒险、铤而走险的方针，企图负隅顽抗而希图侥幸，在“满洲”采取了守势作战方针。然而由于科学的成就出现了原子弹，日本出自免于民族绝灭的恐惧，举国舆论大哗，苏联认为机不可失，在日苏中立条约废弃后、效力尚未终了之时（终效应是8月31日），于1945年8月9日黎明，苏联飞机飞越“满”苏国境进入长春投下了数颗炸弹，而向日本宣了战。这个情报我是随同真井伪次长赴佳木斯途中，在松花江上的客轮中驶抵通河时，由江上军防空监视哨人员登轮向伪次长报告时知道的。真井决定仍向佳木斯进发，到达佳木斯后作下一步区处，我们在不安中继续了航行！

（1979年）

关东军的兴亡

高丕琨*

我在东北沦陷期间做过伪满官吏，接触日本人，知道一些日本人的内情，特别是光复后在苏联俘虏营又与日本俘虏军士官共处五年，听他们讲过侵华情况。今就对日本关东军的了解，整理一些资料留作史迹。纰漏良多，幸盼读者予以匡谬补正。

一、日本关东军的由来

1905年，日本打败沙俄，从俄国人手中夺取原被帝俄“租借”的关东州（指辽东半岛普兰店至貔子窝一线以南地区）和南满铁路，不顾中国的抗议，强将这块土地据为己有。

日军1904年5月初进入中国，占领了九连城和凤凰城（辽宁省凤城县境内）。继而日本天皇即批准成立“满洲军总司令部”，任命大山岩为天皇直隶的总司令官。于是大山总司令官统率幕僚进出满洲，依《满洲军总司令部勤务令》，担任特别指定的独立师团的统督及作战指挥。“满洲军”具有比日本内地军相对的独立地位。这一点，与以后的关东军略有相似，但不是关东军的前身。这个军队不久即废止。

1905年8月29日，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在该条约中规定，日本由俄国手中接收辽东半岛南端所谓关东州及长春（宽城子）至旅顺之间的铁路以及有关沿线与支线煤矿的权利。又在追加条款中规定，为保护铁路沿线，得在每公里内设置不超过十五名的守备兵。这是日俄两国对中国领土及领土内的铁路的任意交易。但日俄有关铁路及关东州“租借”权转让的谈判缔约是在清政府承认下进行的，1905年11月，日本在北京与清政府就对日俄讲和同中国有关的事项开始谈判。但因势力悬殊，是非莫辩，终于12月23日，清政府承认日本的全面要求，在《中日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正约及附约》上签字。依该善后协约，胁迫清政府承认由沙俄将以往在南满所谓的既得权益出让给日本。清政府的代表是袁世凯。

《朴茨茅斯条约》缔结不久，1905年9月26日，日本制定了《关东总督府勤务令》，依该令新设的关东总督直隶于天皇，其任务是统辖所指定的军队及其他各机关，

---

* 作者曾任过伪满警备总队秘书；伪哈尔滨特别警察总队总务科长；伪哈尔滨特别警察厅警正；东省特区警察管理处秘书；哈尔滨警察厅长秘书；伪牡丹江省警务厅保安科长；伪警务司刑事科长兼任指纹管理局鉴识科长；伪大同学院教官；伪总务厅监察部参事官；伪四平省参事官；伪总务厅秘书官（伪总理张景惠秘书）；伪九台县长等职。

守备关东州，同时监督民政，统辖管理卫生及兵站任务。陆军大将大岛义昌就任总督，本部设于辽阳，于是关东总督府正式成立。日俄战后，在关东总督指挥下，驻留了两个师团，约1万兵力，这才是关东军的前身。

都督府是一个千奇百怪的制度。官制规定以陆军大、中将充任关东都督，除管辖关东州的守备、南满铁路沿线的保护和监督“满铁”业务外，还握有驻东北部队的统率权。以前的关东总督与新设的关东都督不同之点在于前者是属于天皇的直隶，后者则归外务大臣指挥。而在中国和第三国方面则认为这不过是命令系统的改换，而实际仍然是以大将或中将为最高权力者，拥两个师团兵力。握军政两权进行统治南满的实质是没有变的。

1911年，中国燃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火炬。10月10日，革命党占领了武昌。各地革命党人举起反封建的义旗蜂拥而起，仅一月有余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震动了日本。日本当时是西园寺公望第二次组阁，日本政府为防止其邻国成立共和国，乘革命大乱之机，借口为维护其在满洲的既得权益，准备侵略中国本土，尤其是陆军蠢蠢欲动，特别活跃。日本陆军从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急于在满蒙夺取更多的权益。

日本陆军中一部分人和川岛浪速等辈，以辛亥革命为契机，策划“满蒙独立”（第一次）。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1月30日，冈陆军省次官向星野金吾关东都督府参谋长发的电报中说：“此际，鉴于大局，即使在满洲，酿出几多纷乱事端，亦勿须予以过于清正的处置”。其含蓄之深，令人不难理解。当然，关东都督府也是此计划的热心支持者。

中村觉中将是继福岛安正中将而任关东都督的。1915年5月7日，日中签定“二十一条”后，关东都督府随之大肆活动起来。中村都督在条约正式签订的同时，5月25日，向冈陆相提出《关东都督府官制修改有关的意见书》及《满洲驻扎陆军有关意见书》。在《关东都督府官制修改有关意见书》中，中村都督主张：关东都督府及驻扎师团司令部及其军队主力，由旅顺转移到奉天。“满铁”附属地的行政固无庸论，凡在满蒙一带日本人居留地的警察、司法、行政以及外交一切职权统属于关东都督。并认为移到南满及内蒙东部中枢的奉天，最为适宜。又在《满洲驻扎陆军有关的意见书》中，将原驻扎一个师团的最北驻地公主岭，改为进驻至长春的新方案。中村都督更于8月1日，向日本政府呈递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境界有关的意见书》，把南北满的界线划到第一松花江，将吉林、奉天两省全包括在南满之内。在内蒙古东部，将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等四盟及察哈尔部的左翼四旗作为境域。于是，将“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条款的适用范围愈行扩大。中村都督乘“二十一条”成立之机，不但对日本政府陈述非同寻常之见，声援加油，也在东北积极支援浪人川岛浪速等辈所策动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计划。

川岛浪速等策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失败后，迨至袁世凯称帝，他们又想乘反袁势力的抬头，策动第二次“满蒙独立”。中村关东都督立即向东北的各领事及军宪传令，意图在于对当时已经开始进行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计划予以侧面援助。川岛等自1915年夏季，与在蒙古盐湖方面活动的马队头领巴布札布取得联系，加上拥戴肃亲王

的宗社党，还拉进几个陆军预备役军官和在中国的日本浪人，作为有力的支持者，进行“满蒙独立”计划。在中央部，特别是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也是该计划的热心支持者。

二、关东军的理想和现实

1932年8月8日，日满机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任武藤信义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实行“三位一体”制。任小矶国昭中将为关东军参谋长，新设参谋副长一职，由冈村宁次少将担任，关东参谋部的主要幕僚也更换了阵容。新设的关东军虽仅掌管在满的军权，但在其统帅独立的盾牌下，反而容易随便行动，故得以强行发动事变和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关东军已经在东北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1932年9月15日，武藤“全权大使”在伪满国都“新京”（长春）与伪总理郑孝胥会见，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1934年3月1日，溥仪又登基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日本既以东北为他的生命线，承担了伪满的“国防”，于是伪满洲国的“国防”便成了日本国防的“第一线”，日本认为伪满洲国的“国防”与日本国国防相连结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既承担伪满洲国的“国防”，就应有驻兵权。必要时，愿意出多少兵即可出多少兵，在数量上无所限制。伪满就是赋有这种性格而出生的国家。关于治外法权的撤消和“满铁”附属地的转让，自不待论，也想把关东州“归还”给“满洲国”。抱有理想主义的石原莞尔就是这样计划并指导伪满洲国的。但自1932年8月，石原莞尔被调离开东北，伪满洲国则一步一步地向傀儡化转变。例如，1933年8月，日本内阁会议所决定的《对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中指出，“对满洲国的指导方针是在现制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的内面统辖之下，主要是通过日系官吏身体力行”。按此规定，“满系”官吏则无权处理事务，特别是在1934年末，在伪满机构改革之后，离“建国”的构想越走越远，什么“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等，汉奸们所期待的这些东西，全被践踏净尽，幻梦彻底消散。

三、关东军进军关内与天津特务机关

关东军于1935年5月31日，因滦东等两次作战的结果，在河北省的白河河口塘沽，与中国军队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所谓滦东作战，指的是在河北省东北部，以滦河以东一带为战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在此期间，关东军向华北的中国军队展开了反蒋和拉拢的工作。欲将华北中国军队变成亲日的势力，以强化伪满的侧背。因此，于1933年2月13日派板垣征四郎少将来到天津，这就是天津特务机关的开始。其后天津特务机关拥有多数职员，利用原湖南省督军张敬尧为牵线，诱宋哲元以下多数华北军将领反蒋联日。原来日本以滦东作战作为这个谋略的后盾，是声东击西的作战，是为延长在重要关口附近作战而开始的。日本派第六师团出兵，2日后就将中国军队击退滦河东岸。然而其谋略的另一方面却迟迟无进展。19日，日本忽以天皇之旨而停战，关东军

又撤回长城线，滦东作战终结。尔后，关东军又派第八师团向古北口以南地区继续进攻，与抵抗的中央军展开激战。此时，中国方面在与第三国进行斡旋的同时，又派知日和亲日分子出头向日本驻外官宪接触，试探日方的真意。日方亦为探访中方的真意煞费苦心。一时以日本驻上海武官根本博为中心，制造停战气氛甚嚣尘上。由于天津特务机关与驻北京武官永津佐比重等极力反对而束之高阁。5 月 3 日，关东军又对第六师团和第八师团发出开战命令。第六师团于 5 月 6 日向中国杂牌军队追击而渡滦河；第八师团筑成围攻中国军队右侧背的阵势。第八师团攻破中国军队阵地继续前进，又于 5 月 11 日向北平上空进行威胁飞行，使平津地方陷于混乱恐怖状态。中国方面似有讲和之意。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于 5 月 13 日发出切勿深追的命令，明示关东军的进攻限度。又于 15 日发表了含有停战意思的声明。在此以前，5 月 3 日，中国方面成立了以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郛见到武藤的声明，5 月 17 日由上海到北平。另一方面，关东军仍继续进攻，第八师团于 19 日占领密云，23 日攻陷怀柔，北平也在指顾之间了，平津地方混乱已甚。黄郛经日本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的斡旋，22 日夜与永津武官秘密会见，表示希望停战，日本方面亦因天津特务机关的谋略迟迟无进展（中心人物张敬尧于 5 月 7 日被暗杀），同意黄郛的提议。

四、关东军在华北的活动

《塘沽停战协定》将河北省的东北隅暂时划为类似“非武装地带”，但非完全的“中立地带”。盖因关东军按此协定，使中国军撤退到一定地点，而日军在协定上仅“大致”撤到长城线的字样，日军以“大致”二字为借口，在此地带尚留有若干兵力。而且关东军以此为理由，多次与中方磋商，关于滦东地区与“满洲国”之间的通车通邮、电信电话联络以及设立税关、维持治安等也协定了一些办法。本来应为“中立地带”的滦东地区也“满洲国”化了。所以说，塘沽协定的签订不但成全了伪满洲国的保安机能，也为其后华北工作奠定了基础。

与关东军互相协力又互相竞争的日本驻华北的天津驻军，于 1935 年 6 月与中国方面签订了《梅津何应钦协定》，把于学忠军与所谓的排日机关全驱出河北省。紧跟着关东军也签订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于是日本驻外军部的势力，一步一步地向察哈尔和河北两省延伸开来。日本陆军对中国分治合作的阴谋，可说已实现其一端。由于日本驻外军部的活动，广田弘毅外相对华的“亲善外交”（曾将中日间互派公使升格为大使）却走向死胡同。

《梅津何应钦协定》成立以后，日本驻外军部便乘机嗾使河北一些投机分子搞“自治活动”。11 月末，将亲日分子殷汝耕拉出来，使其宣言自治，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以后改组为“政府”）。同时日本驻外军部也向宋哲元进行拉拢。而在此前，中国方面早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作为国民政府的机关，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赋予其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1936 年，日本驻外军部进一步指挥伪冀东政府，令其公然从日本进口商品，扰乱中国市场，使中国方面税收大减。这当然要引起中国方面的反感，也招致有利害关系英

国的不满。

五、关东军在内蒙古活动

1936 年 5 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将天津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改为与关东军司令官同格的亲任（特任）职，由天皇任命，明确了两军的任务和责任，划清了两军行动的范围和界线，令今后的关东军专门从事伪满洲国的培育和对苏联的防卫。对内蒙古的活动以松室大尉为中心，早在侵略热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行动了。关于内蒙古工作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 1936 年末的“绥远事变”，这是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策划的。以锡林格尔盟副盟长德王为首的蒙古军，在百灵庙被傅作义军打得丢盔卸甲，一败涂地，狼狈逃窜，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而且使久僵而不决的中日邦交调整问题以及川越茂和张群之间拖拉不断的交涉，亦一举而结束。

另外，1936 年 12 月 12 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拘捕，也称为“双十二”西安事变。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抗战政策。在这个局势下，日本帝国主义感到惊慌失措，好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于 1937 年 7 月 7 日，策划了卢沟桥事变，疯狂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六、国境纠纷与关东军

东北本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一段时间，日苏关系是比较平稳的。第一，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为期尚浅，其国内的兴革事业繁多，对远东方面没有余力；第二，日本只顾保持或扩大在中国的既得权益。特别是以往关于边境纠纷，都由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或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处理。然而自伪满洲国成立后，却一反常态。首先是苏联革命后，其国内建设成果累累，自 1933 年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其经济重点转向远东地区，防卫力量亦积极加强，在远东地区配备的飞机，从 1933 年的 350 架增加到 1936 年的 1200 架，几乎是三倍半。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成立傀儡政府，关东军承担伪满国防亦大幅度增强兵力，而且在此时期，日本拒不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解决中东路的纠纷等等。苏联认为日本奸滑，没有诚意，关东军对苏联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所以互相间的气氛甚为紧张。于是双方在伪满区域内形成了正面的对峙。而且边境也有容易引起纠纷的因素：原来中苏边境是根据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伪满洲国成立后原封未动。然而这个规定本就含糊不清，可以作多种解释；尤其所置的界标既少，又经累年累月不加整修，已不能起其界标的效果。边境线中最不明确的是兴凯湖到图们江之间 600 公里的东部边境及与蒙古共和国相连的西北部呼伦贝尔草原地带。关东军和参谋本部是按自己方便来认定边境线，对方也不例外。就是说，随着任何一方守备所占边境地方的变更，其边境线亦随之而变更。关东军随其在东北统治的进展，亦将其势力向边境推进，从而边境防备就成为具体问题，当然要引起一些纠纷。

具体纠纷，自 1935 年起多了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到 1934 年，两年半是 152 件，1935 年是 136 件，1936 年增至 203 件，据报到 1945 年日本投降那年，竟达到 1600 件

以上。1934年以前，事件规模小，只是一二人越境，或以步枪互射而已。但由于件数增多，规模亦随之扩大。1935年关东军出动骑兵集团，造成“哈尔哈庙”事件，1936年关东军空军和机械化部队所造成的“敖拉浩德卡”事件和“塔乌兰”事件。1937年又发生击沉苏联舰艇一艘的“干岔子”事件。所谓“干岔子事件”，是在黑河附近黑龙江中的几个小岛子，在这年2月，因有人到这岛上，苏方对伪满洲国提出数次抗议，及至6月，苏方认为抗议无效，就派少数士兵登上此岛。关东军发现，遂派一个师团兵力到现场，苏方亦集结炮舰和炮舰部队，互相对峙，颇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之势。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在僻远地区一个小岛上不值得付出大的代价，所以采取不扩大方针，由外交方面交涉处理。同时也向关东军发出中止反击的命令。而关东军不理会这种消极态度，竟于30日擅自向苏联炮舰攻击，击沉其中一艘。此事件，最后由苏方的全面让步而告结束。这个事件的特点，是现地与参谋本部、陆军中央部缺乏协调，特别是关东军的独断独行。这在以后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战争”中都充分地暴露出来。

1932年，日本政府提出成立日“满”苏三国委员会的建议，其后通过外交途径也屡次议论，但始终未成立一个全面审议边境问题的委员会。日方特别是关东军一贯认为确定“满苏”边境殊属重要问题，而苏方则谓国境线早已由中俄之间以条约规定完毕，不予理睬。而且在两国意向不同的背后，日本含有使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的意思，因而问题更不易解决，所以只能在发生纠纷时临时谈判处理。其后不久，于1937年11月6日，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发表，于是日苏之间的空气，急剧变为冰冷，在远东形成对立，颇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与此同时，陆军特别是关东军之中，有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者。不过，以全面开始侵华战争的陆军中央部与专以兵力对苏的关东军，两者对苏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七、张鼓峰事件

1938年7月，在苏联同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边境，日苏两国发生了军事冲突。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叫张鼓峰的丘陵，所以称为“张鼓峰事件”，而苏联称之谓“哈珊湖事件”。这次日苏间的纠纷，最初由战略单位的军队参加，可以说是准真格的战斗。张鼓峰在苏“满”边境附近，是标高约150米的丘陵，除其附近有“满鲜铁路”火车开动外，别无重要的战略价值。但自伪满洲国成立，日苏两军配备国境警备队以后，夹着不明确的国境线，有日苏军队持枪对立。从张鼓峰到沙草峰这一段陵线（日本主张的国境线）由两军交替占据。日方将属于伪满珲春地区的警备，委托朝鲜军第十九师团担任。7月11日，日方接到有40名苏军在张鼓峰山顶构筑阵地的情报。对此，陆军部内反应不一，有的说卢沟桥事变耗费颇巨，陆军正在集结总力向中国派军进攻汉口，反对与苏联作战，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对大本营表示：纵令苏军真的侵犯了国境，乃适值汉口作战的重要时期，作为皇军须先尽条理，要求现地军队直接撤退。大本营大致也同意这个方针。然而，以作战课长稻田正纯中佐为中心的少壮幕僚，主张在此时进行“限定战斗”以恢复威信，据此，以试探苏联是否有介入中日战争的意图。这是他们的“威力侦察论”。关东军在此以前，早已派参谋到现地考察，如确属苏军越境，则

向大本营和朝鲜军警告，还表示希望在事件发生后行使实力的强硬态度。大本营方面以逐渐高涨起来的“积极论”为背景，拟采取“限定战斗”的方针，7 月 16 日下令向现地集中兵力。30 日板垣征四郎陆相与闲院宫参谋总长参办，向天皇奏请对张鼓峰行使实力的计划。依此方针对朝鲜军及现地的第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退役后当了伪满“建国大学”副总长）下达了攻击准备命令。然而这个方针却遭到了外务省和海军方面的反对，未得到天皇的裁可。参谋本部没有中止攻击和解除动员。急欲开始攻击的现地军队很难接受这样的命令，更使问题复杂化的是大本营的少壮幕僚亦对此不满。这个消息传到现地军，亦迟迟不愿回归原驻地，好容易才要真开始移动时，后现地又发生了第二次纠纷。

第二次纠纷是 8 月 29 日午前，尾高师团长接到苏军在沙草峰南方陵线上构筑阵地的报告，当即命令国境守备队长进行攻击。他强辩说，这和张鼓峰事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此与先前的现地军撤回原驻地的命令也不矛盾。请求朝鲜军司令官许可其再集中兵力。朝鲜军和大本营后同意他以“另一种事件”处理这个问题，但必须坚持不扩大的方针，禁止追击苏军于国境线外。然而素以强硬派自居，以未能参加全面侵华战争为遗憾的尾高师团长总觉得这个方针“不够劲儿”，事前未向朝鲜军司令官报告，便擅自决定出击。30 日拂晓，向张鼓峰、沙草峰一带的苏军阵地，以一个联队（团）1600 名兵员进行夜袭。主力集中攻击张鼓峰，暂告成功，苏军向东方后退。

接到这个攻击报告的大本营，对攻击成功虽表示庆幸，但又觉得与不扩大方针有矛盾。大本营内部意见不一致，但感到事态的结果严重。于是严令现地军专心防御，问题由外交方面交涉处理。最后并未追究尾高师团长独断专行的责任。

一时后退的苏联军，在飞机、战车、重炮的支持下又开始反攻。已经被禁止在陵线上守备的日军，恰好成为苏军攻击的绝好目标，其损失日益增加。苏军以两个师团的兵力，在 8 月 6 日开始的第二次攻势中，日军每日损失竟达 200 人。对这样严重的事态，现地军曾不断地要求出动飞机增援，转移攻势，而大本营由于“撤退”与“攻势转移”两论对立，未能确定作战计划。而挽救这个危机的竟是苏军的意外让步，签定停战协定。从 8 月 4 日，由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与苏联外长李托比诺夫进行停战交涉。苏方察觉世界舆论未必于自己有利，同意在 10 日夜的战线上停战。从苏军驱逐日军得利这一点来说，日方认为这个条件已有利可以接受。大本营（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后于 1937 年 11 月成立的）以大部队集中于边境为愚策，从 13 日起向后撤退，越过图们江。这比原来的边境线后退了很远。

就这样，由一个师团的独断而引起的战斗，不但未得星星点点的成果，反而丧失了全师团 20% 以上的兵力，却未能追究其责任。对于热衷于“积极论”的少壮参谋等亦未追问其责任。如此结局，抱有强烈不满的，首先是关东军。他们对大本营特别是参谋本部的作战指导，增加了不信任感。这一事件后，将张鼓峰附近地域划归关东军管辖。有一部分人曾主张乘机将苏军全部逐出日本所主张的边境线外。关东军对参谋本部只考虑侵华全面战争，躲避边境纠纷，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边境纠纷一发生，虽有限定，亦应采取对苏联彻底地打击方针才对。

八、“满”苏边境纠纷处理要纲

对边境纠纷，关东军的强硬态度表现在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所颁发的《满苏国境纠纷处理要纲》，这个要纲的中心特点是国境问题，应由日本单方面按日方的主张来处理。其要点如下：

首先是它的基本方针，在“满”苏边境，对于苏军（包括蒙军）的“不法行为”，要以周到的准备，加以膺惩，使其慑服。这个“不法行为”是根据日本的判断。在边境线不明确的地域，由日本防卫司令官自主地认定……万一发生冲突，不管兵力多少，边境如何，都必须期其必胜。因此也可以说，要纲是为战术服务的，就是说，各部队为达到其目的，一时可以进入“苏领”或将“苏兵引来满领内寄居”。以积极果敢的行动处理其派生的事态。必须信赖上级司令部，竭智尽力以完成第一线现场的全面胜利。同时声明：以往的指示和通知自今而后一律作废。

此要纲的内容，很明显是与自张鼓峰撤退时参谋本部的方针根本不同。然而参谋本部接到这份报告，却无任何表示。而作战课的部分参谋，虽属个别人，反以为要纲切实可行，表示赞同。因此，边境地区的防卫司令官不但认为有自行认定边境线的责任，还更主张有恢复日方所主张的边境线的责任。那么，在现地军只顾忠实地执行司令官的命令，而苏联军亦不让步的情况下，围绕边境线发生大冲突，恐怕是难以避免的。诺门罕战争的第一报是在这个要纲发表后还不到二十天就接到的。

九、诺门罕战争

关于诺门罕战争的真相，当时很少见到。苏联对张鼓峰事件曾大事宣扬其大胜以鼓励其民气，而对诺门罕战争却讳莫如深。诺门罕在呼伦贝尔高原地带，属于中国东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段不甚明确的国境线，在此曾频发国境纠纷。为什么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纠纷成了“日苏间的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24年成立，得到苏联的援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迨日本建立“满洲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确保国境之安全，于1934年末，同苏联缔结了君子协定，互相援助，以防日本势力侵入，当然这也合乎苏联利益。而日本特别是关东军也想染指，欲离间蒙苏关系，一旦有事，收为己有。因此“满”蒙边境之间，时常发生纠纷。1939年4月，苏蒙签订了相互援助条约，尔后，边境纠纷与日俱减，遂撤销了欲成立国境纠纷处理委员会之议。日军的行动被制约，又加上张鼓峰事件的败北，使关东军内部的气氛愈趋尖锐，那个《满苏国境纠纷处理要纲》就是这个症结的集中表现。

关东军司令部于1939年5月13日午后，接到驻海拉尔军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曾任过日本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长，苏联通）的电报，说“蒙兵约700名，于12日由诺门罕南部过哈尔哈河与满军一部正在交战中，彼有从后方增援的迹象。故以师团之一部与满军共同予以歼灭”。关于蒙军是否非法越境问题各执一词，这都不足为怪。当时关东军以哈尔哈河线为边境线，本无明确根据。二十三师团认为过河就是非

法越境，立即进行了大规模攻击。这好象是根据《满苏国境纠纷处理要纲》干的。以前在三四月里，蒙兵曾不止一次地越过哈尔哈河，都未过问。

见到第一报的关东军参谋，据说谁都不知道诺门罕这个地名，好不容易在地图上找到。作战参谋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少佐等一贯把这个交战说成是苏联军方面有意进攻的。不过，屡次发生过纠纷的地方，说关东军参谋部都不晓得地名，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即或是真的，也推脱不了责任。主要责任应归关东军。

东骑兵联队全军覆没

进入正式战斗是5月28日以后，小松原师团长于5月13日把东八百藏中佐所带的骑兵联队主力，又加上两个步兵中队，编成东支队，派往现地，另外还加上驻海拉尔的300名“满军”。当东支队在空军掩护下进攻时，见蒙军向哈尔哈河左岸后退，东支队遂撤回海拉尔。而蒙军又追其后向右岸进军，开始构筑阵地。对这一仗如何打法，小松原师团长与关东军司令部之间的意见小有出入。司令部主张暂时静观，俟蒙军侵人，一举而歼灭之。而小松原则想立即一击。结果按小松原的意见进行，而等待他的却是一个联队的全军覆没。

下决心确保哈尔哈河线的小松原师团长又给东支增加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编为山县支队，还加强了飞行队。以此与蒙军和新派来的以机械化部队为中心的苏联军相对阵。28日，以日军的攻击揭开战幕，日方以步兵为中心的主力与苏军正面相对，以东骑兵联队断其后路，迂回向侧面进攻。然而苏军是用战车队和炮兵队作战，攻击激烈凶猛，使日军主力陷于苦战，特别是向侧面进攻的东联队，后退无路，被战车队包围，全军覆没。东部队士兵或重叠倒在一处，或烧死于汽车之上，现场极其悲惨。师团长便派去三个炮兵中队相对抗，亦遭惨败。日军于31日痛离战场，这是第一次诺门罕战争。

这个事件，据关东军司令部当时的战报说，是“彼我一胜一败”。除空军方面胜利外，日本方面是完全败北了。其实况，连参谋本部亦未作正确的报告。30日参谋次长向关东军发来胜利的贺电。面对这种局面，小松原中将的沮丧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满苏国境纠纷处理要纲》的重压下，师团长几乎都以独断的形式进行战斗，使这种悲惨的情绪，又导演了第二次诺门罕战争。

关东军与参谋本部的矛盾

第二次诺门罕战争也是由小松原师团长的电报而开始的。第一次诺门罕战争的善后处理尚未完结，6月19日小松原师团长拍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1. 诺门罕方面的苏军在继续增加，18日驱逐了“满洲国军”；2. 敌机轰炸了温泉方面及甘珠尔庙，受到了损害。关东军司令部当即召开作战会议，于20日下令向诺门罕方面大肆集中兵力。以新补充的第二十三师团的全军和第一战车队之一部加第七师团之一部，编成安冈支队以及第二飞行集团。这是自国境纠纷以来，未曾有的大规模动员，声言即使与苏军正面冲突亦在所不惜。这个方针的决定也经过许多曲折。多数参谋认为必须考虑目前正在对华全面战争及天津租界问题的日英交涉，主张慎重为要；而参谋辻政信少佐持强硬论，

作战主任参谋服部卓四郎中佐表示赞成。结果经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及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同意采取强硬态度。最初的作战计划，拟以最出名的精锐部队第七师团为主力，最后司令官命令由第一次战争的当事者第二十三师团为主力。主张以第七师团为主力的理由是：第二十三师团去年刚成立，战斗力不堪信赖。但是，投入最精锐的部队亦非寻常事，故费周折。陆军中央部对于关东军的这个方针亦相当踌躇，鉴于第一次战争，与关东军之间无任何的大意见。对此主张始予以容许。不过，关东军在此计划中也包括对蒙领使用飞机轰炸，猜度中央部的意向，故在事前未露出请求谅解的字样。而参谋本部偶然得知有轰炸的计划，惟恐事件扩大，故急电认为不适当，同时派作战课长有末中佐到关东军司令部劝其中止。然而关东军竟在有末到来之前，于6月27日即向蒙古据点塔木斯克强行轰炸，将第二次诺门罕战争变成大规模的战争。

塔木斯克空袭是以确保制空权为目的，以130多架飞机的大编队，对苏蒙军的空军基地进行轰炸。据公布已击坠击毁苏蒙飞机100架以上。这种空袭使苏联觉察到日本怀有大肆进攻的意图，以致苏联对诺门罕周边加强武力。因此，参谋本部与关东军的关系更加恶化了。据说稻田正纯作战课长接到战果报告的电话时，怒吼：“什么战果？糊涂虫！”并认真地考虑了给关东军司令官以“谨慎”的命令。而关东军方面对中央部的态度亦加以反驳，强辩说，空袭轰炸是对敌的报复，仍坚持强硬态度继续战斗。到事件结束，竟动员56000多人，可以说是一场相当规模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没有得到日本中央部的协助，关东军独断专行的。而苏联方面，不论空中、地上，完全是现代化、机械化。

日军完全败于苏军的机械化部队

以7月1日开始攻击为目标，集结到诺门罕的第二十三师团和安冈支队，依赖日方的制空权，以轻松的心情，渡过哈尔哈河，向左岸苏军阵地深入，立好了一举打垮苏军的作战方案。按预定，于2日夜，第二十三师团主力向左岸出动。然而却受到苏军的强烈抵抗，有数百辆战车反击。在此次战争，日方使用了对战车炮和汽油瓶，以肉搏进击，燃烧战车的战法，相当有效。但从3日午后战局倾于不利。第二十三师团向右岸撤退与安冈支队合流。另一方面，向右岸苏方阵地进攻的安冈支队，战车40辆被击毁而后退。日方于5日再次开始攻击，亦被苏军战车重炮所阻而未成功。战线从10日以后暂成胶着状态。得知此状态的参谋本部，认为诺门罕在短期内恐难以取胜，拟以日方让步，承认苏蒙方所提的边境线以结束交战。而关东军认为苏方的损失也不小，主张用大规模的进攻，不肯让步。于是参谋本部20日召唤关东军矶谷参谋长到东京，提出事件限定局部及哈尔哈河右岸持久问题由外交解决为框架的《诺门罕事件处理要纲》。矶谷以为苏方并无全面战争的意图，彻底打击，可以解决问题，不同意《处理要纲》。

苏军兵力异常的强大，自感炮兵力量不足的关东军，由日本国内增派重炮兵3个联队，从7月23日开始第3次攻击，结果也失败了。战线仍陷于胶着。在此期间，关东军曾于6月中旬，将受创的安冈支队解散。对东北全土，施行防空管制。到8月，新成立第六军，任命荻洲立兵中将为司令官，指挥诺门罕方面全部日军，准备持久战。

再说苏军，在朱可夫将军指挥下，设立第一军团，以机甲5个师团（战车、装甲

车各430辆）为中心，陆续加强兵力。到8月，将曾被日方控制的制空权也夺了过来。正在日本作持久战越冬准备之时，苏军计划大规模“八月攻势”。10日前后出现了小规模攻击的苏军，从20日开始进入了正式攻击。在此以前苏军集中于此地的兵力就有狙击3个师团、骑兵2个师团、机甲5个师团。实属日军预料之外。苏联对日军的强硬态度，是决心坚守自己的国境线且要短期决战。苏军采取这样方针，也是从欧洲形势考虑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在8月23日签字的。果然，苏军于20日在有力的航空部队支援下，实行全线进攻，大部队在精锐的战车群守护中巧妙地作战步步压倒日军，形成大包围网，于23日截断日军退路。而关东军新投入第七师团主力，25日又决定投入第二和第四师团，以扭转战局，但为时已晚。退路既被切断，防御阵地亦被隔离，陷于各个孤立。各守据点的日军自24日以来，内外两面反击，试图突破包围网，亦成泡影，徒增损害。各个孤守的据点亦次失掉。于是日军完全被逐出于蒙方所定的边境线之外。

命运尤其悲惨的是第二十三师团，在第一次诺门罕战争中，已遭到一个联队全军覆没的打击，其后虽然补充恢复了师团的兵力，但仍无有力的装备，在24日攻击时，由小林恒一少将所指挥的步兵团分配到浩尔斯汀河东方的第一线，终日苦战之后，又于黄昏时刻突入苏军阵地，被对方战车队所践踏。面对新型战车，日本的战车炮和汽油瓶，同初战时不同，一点效力没有发挥。步兵团陷于不可收拾的混乱状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小林少将被轧在自己的战车下受了重伤，士兵们也多数被战车轧死，战争的激烈可想而知。另在28日、29日，欲将师团司令部转移到浩尔斯汀河时，受到飞机和高地方面的攻击，师团全部被苏军包围。最初，在第一线的山县武光联队长烧毁军旗而自杀。小松原师团长也给军司令官留下遗书，以期最后突击而殉职，但被军司令官劝住，带随身卫兵撤退。已将暗号解读表焚掉。第二十三师团死伤11000多人，死伤率达到70%以上，几乎是全军覆灭。部队长大部分阵亡，幸存者怕关东军司令部追究无故向后退的责任，自杀者亦不乏人。小松原师团长在事件结束后回东京，在等候另行分配时病死。

恢复后刚满一年便崩溃的第二十三师团的历史，可以说是诺门罕战争悲剧的体现。由于师团长所持的“强硬论”扩大为关东军司令部“强硬论”，使师团本身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卒陷于全军覆没。

十、关东军首脑部的更迭与停战

日本参谋部面对偌大的惨败，无论如何，也要结束这场战争。8月30日派遣参谋本部中岛铁藏次长到“新京”，向关东军司令部做说服工作。事已至此，而司令部仍主张短期集中威力决战，其意气之激昂，竟使中岛次长也暗许他们于9月10日前后预定攻击的意向。参谋本部闻讯，大为震惊！遂请示天皇，再次派中岛次长去“新京”。9月4日严令立即撤出交战地带，停止攻击。而关东军请求限定打扫战场（收拾阵亡者），如不许可，军司令官即辞职。参谋本部不但禁止新的攻击，紧接着由6日到8日连续发布命令，以植田军司令官为首，矶谷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参谋副长、寺田雅雄作战课长，以及服部、辻政两作战参谋均予免职，并令参谋副长以上退出现役。将关东军内的强硬派一扫而净。诺门罕战争交由外交方面交涉处理，任命梅津美治郎中将为新的

关东军司令官。

苏联方面并未进一步进攻，如果乘第二十三师团溃退继续进攻，夺取海拉尔则易如反掌。为什么苏蒙军未越国境而追击呢？原来，9月1日德国开始进军波兰。这事牵制了苏联。而通观张鼓峰及诺门罕战争，苏军除了固守自己所定的国境外，从未有其他行动，这是其一贯立场。对比之下，关东军的侵略本性却暴露得淋漓尽致。

事件的处理，在莫斯科进行谈判，气氛平和，条件不苛，停战协定于9月16日黎明时签字。关于国境问题亦经过多次折冲于1940年7月，大致按苏方的主张全面承认，达成协议，事件结束。

由边境纠纷引起的这次战争，主要原因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这是无庸讳言的。据说，这次战争是关东军一次真正的战斗，也是日本军队第一次同具有近代装备的军队作战。惟其对苏军估计不足，没有摸清底细，尤其对苏军日新月异的战车战，简直是束手无策，这对于“不败”的日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日军好象还没有十分汲取教训。它虽然强调机械化，但在其陆军中，对以白刃战为中心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所谓的“精神主义”也包括武士道精神。陆军中央部与其驻外司令部之间，缺乏协调，似乎也是一个致命原因。至于关东军的实际行动，究竟与中央部有多大出入，谁也说不清楚。在侵华战争与欧洲形势的进展中，日本陆军中央部希望诺门罕战争是小规模的，这是事实。参谋本部在战争时期，对关东军主要幕僚加以更迭，其决心之坚，是不言而喻的。

从大局来看，日本的假想敌国是苏联，始终未变，其中也包括西伯利亚出兵。因此可以说，关东军的行动，并不过分，对于必发事件，他不过先走了一步而已。日本陆军对苏的方针，乘德苏开战之机，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共同协作，制定了一个对苏大动员计划即《关东军特别演习》（简称“关特演”）而表现出来。

十一、对苏备战车“关特演”

“打倒苏联”，是日本陆军的传统使命。在每年的作战计划中，都以苏联为“假想敌”。对苏作战的主力当然是关东军。因为关东军负有伪满的“国防”责任，日本又以伪满为“生命线”，从而出了不少问题，已如上述。经过张鼓峰和诺门罕事件的较量，它才知道苏军的厉害。从1941年以后，关东军对苏的武力准备叫“关特演”。在“关特演”的前一年，即1940年末，发表了初年度的计划，说：不管战争的原因、动机和开战形式如何，准备34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向苏联远东发动攻势，占领北桦太（桦太即沙哈林岛，也叫库页岛，南桦太在日俄战后期割让给日本），包括喀牟卡喽在内的苏联远东重要地区。从1941年6月开始准备兵力，由日本国内抽调6个师团，由侵华战线抽调14个师团，加上在伪满国内的14个师团（包括朝鲜2个师团），共计34个师团。如何运往东北都作了详细计划。对苏开战有以下的打算：第一，在北方（指苏联）威胁已解除的期间，可以向南方（指美英）“进出”；第二，看形势可以与德国相呼应，就参加对苏攻击，这好像柿子未熟，把它打下来吃，叫“涩柿子主义”，带有积极性；第三，不参加欧洲的任何战争，对南北都布下准备阵容。陆军中央部参考这些意见，于

6月14日制定了一个《随形势推移的国策要纲》。这是对南北两方面战略准备的具体方针，再按德苏战争的实际情况，于日本有利时，就参加对苏作战，这好像等柿子自然熟了，再摘下来吃，叫“熟柿子主义”。参谋本部对此国策全盘用兵计划作了研究，于6月18日又作出了一个新方案，是考虑当时正在进行侵华战争，又同美英关系紧张等情况，将对苏兵力缩小为25个师团。

德苏开战以后

德国撕毁了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于1941年6月22日黎明，越过东部国境向苏联进攻，拉开了德苏战争的序幕。与德、意有同盟关系的日本当然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往不同意与苏作战的日本海军也改变了态度，以不妨碍向南方进出为条件，与陆军共同制定了《随形势推移的国策要纲》陆海军方案。准备在适宜时候，就是在德军占优势，苏军的远东兵力减到相当少的时候，便是对苏攻击的最好时机。关东军将陆续运来的大部队分散于东北各地。

在德苏战争前，苏军在远东的兵力，有狙击师团30个、骑兵师团2个、战车2800辆、潜水舰约100艘等，这些兵力减半时，关东军以12个师团、2个飞行集团、1个骑兵旅团、13个国境守备队、9个独立守备队的兵力与之周旋。日本认为苏军的兵力主要安排在欧洲，在远东不如日本强，其对比为1：0.75。日本因为摸不清德苏战况，一直作不出出兵的决定。6月30日和7月2日，德国前后两次要求日本对苏参战。松冈洋右外相和原嘉值枢密院议长等人的意见是，中止向南部法印进兵，参加对苏作战。可是，这个时候，苏联由远东向欧洲输送的兵力为数甚少，远东尚有雄厚兵力。7月2日，御前会议决定不介入德苏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关于备战问题仍然激烈争论不休。最后，还是东条英机陆相同情参谋本部，决定暂用教育召集的形式，动员10万人，使双方妥协，归于平静。于是，7月1日首先发表了本土要地防空部队人员的召集。这是为“关特演”动员的第一步。3日实行要塞高射炮部队人员的教育召集，5—8日实行北朝鲜罗津、永兴湾要塞的战备和北千岛要塞、下关—釜山联络地区要塞准战备的召集。7月5日，为指挥本土的防空，成立了防卫总司令部，司令官由教育总监山田乙三大将兼任，任命河边虎郎中将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对北方最挠头的是怕以沿海洲为基地的苏联轰炸机向日本本土进袭。当时日本本土的防空设施非常薄弱，据参谋本部担任防卫防空的第四课判断，“夜则10架，昼则30架机继续轰炸几次，东京即化为灰烬”。故设立了一个防卫司令部，也是“关特演”的产物。这仅是一个作战指挥部，而非统率机关，其权限不大。

《国策要纲》经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关于正式动员、规模、日期，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之间经常磋商，往来不绝，结果是经双方同意使关东军任何时候都能采取作战行动，有必要将平时编制改为战时编制。

对苏作战煞费苦心

东条陆相和杉山参谋总长关于动员问题的上奏，天皇认为没有重点，兵力分散，困难很多，兵力增强，反使关东军难以出手。最后，还是认为此时动员是出于不得已才认

可了。7 月 13 日，在日本国内第一次动员了 300 多个大小不同的部队；16 日，第二次动员了约 450 多个军直部队和航空部队，这些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动员令的传达，不用电报用书简，不用召集令状用“临时召集”，不用动员用“临时编成”等字样加以隐蔽。对应召者，禁止开壮行会或欢送会。动员的部队，大部分编入关东军司令部管下。在东北、朝鲜的登陆地点，指定为大连和釜山等地。听说，每日经过朝鲜最多人数是一万，马是 1500 匹。关东军的兵力共有 20 个师团。

正在第一次动员时，派往德、意军事视察的山下奉文中将（后升大将）回东京见到东条陆相说，德军优势压倒一切，对于北方问题，他作摇树的手式说：觉得涩点，打下来吃也行。东条小声说，我知道了。山下归国前是军事参议官，归国后不久，被任命为关东防卫军司令官，属于关东军司令官隶下，担任伪满洲国内陆的防卫，也是“关特演”的产物。传说东条英机特意将具有下届内阁陆相资格的山下奉文逐出国外，以期稳坐第三次（下届）近卫内阁的陆相。一点不错，东条果然又连任了第三次近卫内阁的陆相。

另外，据驻日本苏联大使建川美次（预备役中将）说，莫斯科沦陷也只是时间问题。参谋本部认为远东的苏军兵力西送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对苏开战亦应为期不远。正在此时，日本海军也在向南部法印遣兵，准备对英美作战。因此日本陆海军之间形成了感情上的对立。不过海军方面为了对北方备战，还是建立了第五舰队（专对海参崴）。

参谋本部对于师团数和用兵计划都作了研究。到 7 月 10 日左右，远东苏军西送的状况仍然不甚活跃。这样一来，对苏作战，非有 25 个师团不可。必要时，真需要人 120 万、马 30 万匹。参谋本部的这个计划，根本得不到陆军省同意，是不可能实行的。在 8 月 10 日的内阁会议和御前会议时，参谋本部正期待着德苏战局于德国有利。以田中新一中将作战部长为中心，不但做用兵计划，战争指导计划，还在对苏战争中“满洲国”怎么办以及发动武力后占领地的行政问题都作了研究。

对“关特演”的异议和不安

参谋本部在不断地准备，其最关心的是远东苏军的西送，但仍迟迟不甚活跃。到 7 月 12 日，仅西移 5 个狙击师团和 5 个战车旅，前者占德苏开战当时的 17%，后者占三分之一。他们认为有压倒优势的德军，从 7 月 11 日以来向莫斯科正面进攻，战线呈胶着状态，相持不下。据参谋本部的机密情况透露：德苏战争的推移缺乏明朗，有如东京之阴雨连绵。都说斯大林政权的韧性分外强，出人意料。原以为由德苏之战可以结束战争的想法，恐怕要付诸东流。7 月末，田中作战部长的观测也不例外。虽然如此，参谋本部还始终未停止对苏作战的准备。7 月 27 日，欲由华中战线抽调 2 个师团，由华北战线抽 3 个师团转用于北满，加上从日本国内动员派遣 4 个师团，凑足 25 个师团的数目。然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横加拦阻说：“抽调 5 个师团派遣军。是忘了‘七七事变’的根本，漠视国民的公约”。特派其参谋副长野田谦吉中将到东京陈情抗议，惹得参谋本部极不愉快。天皇对“关特演”仍然怀有不安情绪，他指责杉山参谋总长，“关特演”给各国不良影响，使日本愈困难，远东苏军西送似乎停顿，把关东军的动员也停止了好不好？虽然如此，参谋本部也没有停止对苏动员兵力的考虑。参谋本

部不管对苏作战开始的估计如何，总想将关东军充实的计划贯彻到底。他的理由是：第一，关东军的充实是多年的悬案，即使是平时警备也需要16个师团，可是此时不搞，更待何时？第二，为了准备将不可避免对英美的南方战争，此时也有必要将关东军充实为完全不败的态势。

7月31日，田中作战部长会晤东条陆相，提出对苏决战已经迫不及待，试探陆相的真意，也陈诉了参谋本部的意图。结果，关于满洲方面决战的规模定为24个师团得到了东条陆相的同意。就是说，从中国战线抽调5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遣3个师团，共计24个师团，专对苏联东方的正面。另外，以第七师团及桦太混成旅为主体，编成二十六军对桦太作战；对喀牟卡喀作战，以第五十五师团充任之。预定8月上旬决定，9月上旬可能开战。

日本参谋本部怕大批向东北运兵引起苏联的警觉，认为日本要开战，以先下手为妙用飞机空袭。因此，田中作战部长特向东条陆相说明缘由，拟请杉山参谋总长进宫向天皇奏明：苏军颇有先发制人来攻之势，我方须作准备还击。这个报告有重要意义，就是说对苏联空军来袭，不另请大命即可立即还击或越境追击，实质上就是开战行为。天皇对此上奏没有表态。可能是默认，也可能是不满意或不同意。据说天皇对重大问题不回答是不满意的时候居多。

8月2日黄昏，关东军情报参谋向参谋本部报告说，苏军东部国境开始无线电封闭，认为这是苏联空军攻击先发制人的行动。后来查明，是“德林格尔（Dellingen）现象”（是因为太阳耀斑引起对短波无线电通信的严重障碍），真是疑心生暗鬼。

8月2日夜，梅津关东军司令官向中央部打电报说，“敌如大举进攻，当必向中央联络，如迫不及待，可能立即予以进攻”。中央部当即回电云：“须以不向其国境内还击为原则，中央希望关东军采取慎重行动”。这里含有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其中。根据前日的上奏，比如说关东军的飞机为应战进攻到“满洲国”以外的领土时，实质上似乎得到了天皇的许可。但在“大陆命”（大本营陆军命令的简称）未发前，关东军司令官就独行开战时，即等于天皇和政府对陆军根本失去了信赖，则容易引起放弃自己对陆军的国策指导权（九一八事变创了先例）。作为陆军统帅部，在这种场合理应给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使其俯首听命。身为中央统帅部的参谋本部如不将责任搞清楚，对苏作战的指导则成为渺茫无可捉摸。至于“大陆命”，有些事情如不经政府同意，也不能得到天皇的允可，所以必须政府同意开战。

对苏应战的“大陆命”

陆军省及参谋本部认为，对苏联的真正来袭必须不失时机地应战。为提交内阁会议作好了一份《对苏态度案》，并通知了海军方面，而海军以为同美英战争之必至，正在紧张焦虑，故对陆军的北方开战漠不关心，亦无暇顾及。而最后还是制定了一份陆海军合议的《按日苏现实情况日本所应采取的措施》。此案中只有“对苏方的真正进攻，在防卫上不失时机地予以应战”这样一句废话。陆军当然不能满意。但考虑到“应战”这个词是国家意志的确认，就不多言了。这个陆海军合议案，虽在8月6日大本营与政府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但也经过几多争论，并非一帆风顺。同日上奏，得到天皇批准，

并发表了“大陆命”。1941年8月6日“大陆命523号”的条文如下：

1. 关东军司令官受到苏军航空部队的真正进攻，情况不得已时，为完成其任务，得以航空部队向苏联领内进攻；

2. 关于细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当时由杉山参谋总长奉敕命传宣给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其细项指示如下：

基于“大陆命523号”，受到苏军航空部队的真正袭击，认为迫不得已，得以航空部队向苏联领内进攻的场合大致如下：

对满洲（包括关东州）的主要航空基地，主要军事设施，主要中枢都市等受到苏军的真正进攻行动时，考查当时的彼我情况，认为开战的意图确属明显无疑的场合。虽在这种场合，仍须以在满洲领内攻击为原则。

制止对苏挑衅

自8月1日以来，在联席会议上继续讨论《对苏外交交涉要纲》，最后通过。其内容梗概如下：

1. 暂时按下列条款进行折冲，但须注意不妨碍日本的将来企图：

（1）撤废远东水域以及该水域给日本的损害；

（2）不得对第三国割让、出卖、租借苏联在亚洲的领土以及提供该地区的军事据点；

（3）苏联与第三国军事同盟的运用范围不得涉及亚洲，与第三国之间不得签订以日本为目标的同盟等；

（4）中止援蒋行为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指令与援助；

（5）确保北桦太的利权事业完全由日本办；

（6）交换满苏间的扣留人员与物件；

（7）关于诺门罕地方国境制定工作，仍继续进行满苏、满蒙间全面的国境交涉，暂不进行。

（注）A：以上之中，（2）（3）是重点；B：只要苏方严守中立条约，又在远东不予日本威胁，日本则明确表示：一定遵守日苏中立条约的义务。

2. 斟酌和考虑前项外交交涉经过、日本对苏武力准备的进程，苏战线进展和国际形势以及今后的日方企图等，再决定对下列条款一部或全部的交涉：

（1）渔业条约（抛弃以往交涉的过程，以贯彻日本最初的主张为目的）；

（2）北桦太的收买或割让；

（3）喀牟卡喀地方向日本租借，割让等；

（4）黑龙江以东的苏领向日租借、割让或非武装地带化等；

（5）关于其它的远东苏领非武装地带化等。

丰田贞次郎（海军出身）外相于8月5日召见苏联驻日大使斯梅他宁，提出《对苏外交交涉要纲》的第一项内容，说明德苏战与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签订约）的关系以及日德意三国同盟与中立条约的关系等各具有法律论据，姑且另作别论，他坦率地表示日本一定诚实地履行日苏中立条约各款义务。

《对苏外交交涉要纲》罗列了一些与日本有利条款，对此参谋本部自无异议。而丰田外相主张苏联只要遵守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就没有理由向苏联挑衅，这顺利地得到了联席会议成员的谅解。在8月6日的联席会议上，关于《按日苏间的现实形势日本应采取的措施》一案，经过争论后通过，又发表了“大陆命”，就不可能任意再向苏联挑衅了。

参谋本部于8月9日，终于不管德苏战争如何发展，干脆就停止了1941年度的对北方武力解决的工作，专心对待南方，于是决定了一个《日本陆军作战要纲》，其梗概如下：

1. 以在满洲和朝鲜的16个师团对苏严加警备；
2. 对中国按既定方针，继续作战；
3. 对南方以11月为目标，促进对美英的备战。

陆军以东条英机的口头禅“最后御奉公”（意思是全心全意服务）为信条，鼓劲拚命。曾长年累月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参谋本部，吹嘘要以一掷乾坤的猛劲，一决雌雄的企图，虽然万事俱备，竟成为黄粱一梦而告终。此时已经集中到北满的兵力有70万，马匹14万，飞机600多架。为备战集聚于满洲和朝鲜的大量资材，以后虽经转用，而在日本战败时尚余一大半。

另据某方面透露：有一个叫原善四郎的关东军参谋，经他缜密筹划和详细计算，按军队人数性欲的需求量及女性对此的承受和应付能力，乘飞机到朝鲜征集大约1万名朝鲜女人（预定2万人），送到北满旷野的特设场所，作为从军妓女开始皮肉生涯。这一幕实在令人发指！

关东军最初不过两个师团，后不久又变为驻扎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大队。自伪满洲国成立，其野心愈益膨胀，经过多次集中，最后竟达到70万。正要以这70万大军向北方发挥其全面性能登上擂台时，忽被制止。其后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将转向南方战役。

部分关东军转向南方战线

自日本海军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以来，初期自诩成果赫赫。但是，到1942年在中途岛作战时，日本海军吃了败战，美军转为反攻。迨1943年春，在东南方战场，日军完全陷于窘境，日本中央部决不能让在北满旷野对苏放哨的大兵置之不动，遂将关东军抽调南方战线。关东军迫不得已，只好以“同甘共苦”、“义不容辞”的口号奔赴前线。用逐步抽调换防的方式，光是完全的师团就调动了20个整师。这些师的编成装备、教育训练都是优秀精锐的兵团。还另外抽调特别攻击飞行队派往菲律宾和冲绳战场。

关东军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确保静谧”的口号。此口号的具体意思是向对方装成强大而不示弱，万事俱备而不动。不给对方刺激，纵令对方有刺激亦忍而不动。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日本对苏采取的根本方针。当时，德军已入苏领土，欲保“静谧”尚属容易。然而到1942年的下半年，美军反攻得胜，德军又在斯大林格勒作战失败。受此战局影响，静谧的苏“满”国境亦起风波而不太平。尤其是关东军的兵力反

而逐步削弱，“确保静谧”更为不易。1944年7月末，在珲春正面五家子阵地；8月上旬，在满洲里北方蒙古西里附近，“苏军入侵放火”。听到这两个事件，大本营向关东军打电报说：“特基于绝对不行使兵力的方针，避免向这方面移动兵力，即使我国境警备队现驻的后方高地被占领也希望不行使兵力，如情况确属不得已时，亦必须经中央认可而后行动”。

7月13日，美国空军从中国方面初次空袭鞍山，9月8日又第二次空袭，关东军想乘机令“满洲国”亦对美英宣战，而大本营以不予苏联过度刺激为由未予许可。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天，见太平洋战况愈趋艰苦，对防止苏“满”国境纠纷，大本营对关东军又作了如下的指示：在“满洲国”中，对于邻国易发生国境纠纷的地域，不得以兵力进行防卫；又当国境附近发生事件时，为避免事件扩大，不得以兵力进行防卫。

关东军自满洲国成立以来就担任伪满的“国防”任务，时至今日则解除一部分。就是说，指示关东军，苏军进入时袖手不管可也。1944年后半期，中央部与关东军对苏联都缩手缩脚，畏如虎狼，“关特演”时代的劲儿一去不返。

然而关东军当然也有其他作战计划。在1944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时，大本营将作战计划作了180度的大转弯，令关东军打“持久战”。它的《帝国陆军对苏作战要纲》中说，在“满洲国境”方面的前方要地击毁苏军，同时利用满洲的广阔土地以阻苏军侵入，进行“持久战”。在迫不得已时，则确保由满洲东南部至朝鲜北部地带进行“持久战”。将进攻的关东军改为守护的关东军了。

十二、关东军形同逃遁

1944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大会上，斯大林的讲话中有“日本是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是侵略国”这样的评语。1945年2月下旬，苏联开始由西伯利亚铁路向远东运兵，这都是对关东军的重大警号，而且又于4月6日声明废除日苏中立条约。5月8日，希特勒德国全面屈服，战局已定。苏联对日宣战亦成为时间问题。1945年5月中，日本大本营和关东军认为8、9月间，苏联可能有动作。因此，于5月30日命令关东军改为战时态势，依照《满鲜方面作战计划要纲》准备作战。其内容是“关东军须确保新图线（新京—图们）、连京线（大连—新京）以东要地，策划持久战，以利大东亚战的完成”。这本是大本营“本土”决战之一环。意味着放弃全满的四分之三，以通化为中心，蜷曲于东边道一带，将苏军诱于此地，大打“持久战”。乍一听这个计划好象很有道理，其实是关东军拟以全副武装作垂死的挣扎。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衔天皇之敕命，于6月4日到大连，召请关东军总司令官（于1942年10月10日改为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传达《满鲜方面作战要纲》，同时对战局进行恳谈。又于14日在新京关东军总司令部举行兵团长聚会，令属下各军作计划，开始作战准备。据说必须作的准备，上自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至末端小部队，多的数不胜数。但由于部队调遣和改编，变动频繁以及资材和指导员不足，迟迟未能如愿实行，使关东军当局徒感心情焦躁，局促不安。关东军将筑城部改编加强，成为关东军建设团，以此为中心，开始全军的筑城（筑城就是修筑阵地，也包括最后

抵抗阵地的复廓筑城)。由6月末又开始动员伪满“国军”3万人和大批伪满“勤劳奉公队”参加筑城劳动。

另外，刚到1945年，就开始大批移动军司令部。早春，将掖河（牡丹江附近）的第三军司令部移至间岛，东安的第五军司令部移至掖河，又决定将牡丹江的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于开战同时转移至敦化，这都是秘密进行的。西部地方一直驻在奉天的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于初夏转移至郑家屯，使其任正面防卫，同时具有野战军的特点，作为第四十四军司令部。将齐齐哈尔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一发移至奉天，使其担任中南满的防卫与作战。又将孙吴的第四军司令部，移至齐齐哈尔的原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兵舍，使其担任正北面与西北面的防卫与作战。这样的大军移动，中国人很少知道也不注意，日本人却警觉起来，说是“关东军夜奔”。

关东军变成纸老虎

陆军中央部将关东军大部分精锐部队调到南方战线，现因北方吃紧，不得不从6~7月先由中国战线抽调第六十三、一百一十七、五十九、三十九，4个师团到东北；由华中战线抽调第三十四军司令部到北朝鲜，又新编成第三十军司令部，以备南满的防卫与作战；更搜尽、动员在东北的所有资材，新编了8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和另外1个师团。1945年7月末，关东军的主要兵力是24个师团，9个混成旅团和1个机动旅团，光是兵员之数已达70万。然而新设兵团的装备、编制及其素质都非常差，这是因为在兵器与资材缺乏的情况下，滥竽充数、不得已而凑凑起来，与以往的关东军相比，其战斗力只能抵其三分之一而已。与此相反，1945年5月左右，苏军兵力则大为增强。

1945年6月，日本边境监视队也望见铁路上苏军在搬运汽车一类的物件。各方面也认为苏军在往远东国境方面输送军队和军需品。7月26日，在波斯坦会议期间，美英中三国对日本投降条件及战后处理，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于是，日本大本营综合军政各方面的形势，作出判断，认为苏军于本年初秋时节或可对日动手，认为5月的判断有水分，这次判断较为实在。关东军的判断更有水分。也许因为它本身尚未作好准备，虽认为本年夏秋为危险期，但又揣度苏军远东后方部队完全集中就绪概在10月以后。稍一延迟就到11月，那时“满”苏边境，冰封雪冻，不能作战，势必延到翌年(1946年）解冰期，这是愿望的观测。8月5、6日，在虎林方面的申嘎岔河地区，发生苏军小部队的越境事件，又见绥芬河正面苏军移动频繁，却置之未理，也未想到这是全面进攻的前兆。

败走、混乱、完蛋的关东军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自8月9日起苏联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就苏联政府对日宣言发表声明，代表中国人民表示热烈欢迎，并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材，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8月9日零点10分，苏联红军三个方面军，从西、

东、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关东军发起进攻。东北抗日联军各部按照统一部署，分别配合作战。8月9日6时左右，关东军牡丹江第一方面军电话报告关东军总司令部：在东宁、绥芬河正面苏军已开始进攻，继而又报："牡丹江市街正在受苏军空袭"。下午1时半许，关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伪满国都新京，亦有数架飞机来袭。这说明大本营与关东军对苏的愿望观测错了，必来的终于来了。

9、10日两天，苏军几乎全线进攻，势如怒涛汹涌，胜负之局，不言可喻。关东军于10日晨命令所属部队实行全面作战。大本营却迟迟未能采取同样措施，从军用直拨电话得知，大本营此时处境非常狼狈。既尔传到关东军的命令是"鉴于帝国全盘战况，以绝对地保卫朝鲜为最后一线，满洲全土为前进阵地，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由以前须"保卫东边道"的计划又后退一步，改为"最后保卫朝鲜"的计划。自8月12日开始，关东军总司令部与伪满政府机关，由长春向通化转移（逃窜）。总司令部转移的理由是，不管大本营有何命令，关东军最后以"保卫东边道"为目的，长春附近早晚必成为第一线，遭到空袭，实属危险。关东军置"顺应"其"国策"而来的日本移民于不顾，说什么是"过度重视作战"，其实是亡命逃跑。日本人暗地叫骂，中国人也看得清楚关东军末日已到。10日左右，看到战局极端恶化，曾被任为管理日本居民事务的关东军参谋，根本不理一般日本人，只把关东军的家属先移至安全地带。

从11日到13日，苏军与关东军之间展开激烈战斗，阵地的日本守备队继续不断地被轧死在苏军战车之下，声嘶力竭地喊着其母亲的名字，络绎不绝地奔赴黄泉！阿南惟几日本陆军大臣向全军发出训示，曰："苏联竟入寇皇国，不论其如何夸口粉饰，而欲侵略制霸大东亚的野心则昭然若揭，惟有断然维护神州，贯彻圣战到底之一途耳"。只有其字迹空留在关东军总司令部的电报板上，没有人去看它。总司令部于14日午后接到伪满洲国通讯信社的联络，说有终战消息。另据第二课（主管情报）留守参谋说，东京似有重大问题，请总司令官务必回"新京"。于是，山田乙三总司令官率幕僚于当日黄昏由通化回到"新京"。当天深夜，大本营来电报说："明15日有重大广播须谨听"。15日听到的是日本天皇的投降广播。15日夜半，关东军总司令部召开了决定其命运的历史性会议，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以下幕僚大部分聚集于作战室，由草地贞吉参谋司会，对此非常事态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彻底抗战"、"继续作战，俟有利条件再停战"、"立即停战"三个方案。纷纷发言，甲论乙驳，莫衷一是，难以定论。最后，秦彦三郎站起来说："吾侪军人除了服从天皇陛下之命令，别无忠节之望可行。如有不服从者则永远成为乱臣贼子。主张抗战到底者，请先割我等之头颅而后行之。"声咽泪绝，全室静而无言，只闻呜咽而已。继而由山田乙三总司令官奉戴圣旨，以"竭尽全力而终战"的誓辞，经众议通过而闭会。

自日俄战争以来40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尖兵，穷凶极恶的关东军，卒于1945年8月15日夜半寿终正寝，它实非光荣，是肮脏透顶的历史。伪满洲国亦同时垮台为其殉葬。伪皇帝溥仪还恬不知耻地在汉奸大臣、参议及总务长官面前宣读"退位诏书"。溥仪于8月18日乘飞机逃亡日本途中，在奉天机场被苏军逮捕，带到苏联，拘留于伯力战犯收容所。

日本大本营停战命令16日到达关东军，17日日本天皇特使竹田宫到"新京"关东

军总司令部传谕“善处终战”。其后，关东军总司令部处于全军缴械状态。此时在通化的一百二十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不情愿缴械，率部分同志者行踪不明，还发生过其他许多混乱现象。大致于8月末，关东军全军武装解除完毕，70万关东军都成了苏军的俘虏。

（1991年）

在苏联战俘营

高丕琨*

我是从1945年4月1日由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秘书转任为伪九台县长的。我4月到任至“八一五”光复，才不过四个多月。所以对九台县的事情，只能说是一知半解。好在，这一篇不是写这个，要写的是我“八一五”光复后的一段经历和在苏联俘虏营的一些感受。

一、光复前后

8月1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伪满皇帝溥仪和伪总理张景惠等所谓日满要人悄悄地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避难。这暗示着他们大势已去，末日之将临。九台县的日本人于8月11日夜间，聚集在县公署开秘密会议。副县长江幡（日本人）突然到我家来报告了这个消息。说是想组织“敢死队”以应付时局之变化云云。我问他到底为对付谁？他说“宫内府”禁卫军一部叛乱，要来九台袭击日本人，现已到龙家堡等情。其实，日本人是以此为借口，想搞个应急措施。江幡请我临会指示。我就同江幡到了他们的会场。一看，九台县各机关单位的日本人几乎全到了。我问清了他们开会的目的，他们所讲的大致和江幡所说的相同。于是，我便对他们说，九台与长春甚近，长春的消息可迅速地传到九台，我们应以政府命令是从，在没有政府命令或指示之前，决不轻举妄动，违者必自负其后果。现在你们日本人还是应以江幡副县长为中心，有事由江幡与我取联系，我如安全，保证你们也安全。关于禁卫军问题我负责妥善解决。我遂叫通了龙家堡的电话（警备电话），向龙家堡村长说明了情况。不久，就得到村长的回话，出于意外，问题很顺利地就解决了。日本人散了会，各自回家。事后听说是有的日本人想乘机夺江幡的权，故意给江幡出难题；因为我支持了江幡，才给他救了急。江幡本是学者家庭出身，他本人喜欢研究学问，家里藏书很多，日本人认为他是书呆子无能。我告诉江幡，要日本人安分守己，万勿庸人自扰，无理取闹。自此到日本投降为止，一直相安无事。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向日本全国上下宣读了停战诏书，向中苏美英四国投降。九台县的日本人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失声恸哭，如丧考妣。祖国光复了！九台县居民们都拍手称庆，欢欣鼓舞。一切都解禁了，市面上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大米白面自不待言，其他生活必需品如猪牛羊肉、白糖点心、布匹服装等应有尽

---

* 作者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的秘书，后任伪九台县县长。

有。旧县公署除注意维持地面的安宁秩序外，对商贩买卖则采取了保护并任其自由活动的态度。我想中国人民遭受了14年的压迫，其怨艾难伸，今日得到解放，一旦发作起来，其力量将是无穷的。随之而来的，那就是对日本人的问题了，日本人一向是养尊处优，其细软物品皆取之于中国人民，这当然要成为众矢之的，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的不当，肯定会酿成难测的祸殃。于是我找来日本人代表江幡（原副县长）、三刀屋（原“协和会”事务长），问他们对目前的处境抱何态度有何打算？三刀屋首先表示说，日本人所有的物品都是取之于中国人民的，愿尽其所有拿出来交还给中国人，请中国人民原谅活命等语。我说：“好！如果你们能这样开通，一定可以得到群众的谅解，希望你们马上行动，还要把枪支弹药交出来，以防发生意外。”他们都一一地实行了。果然得到群众的谅解。在日本人集中的地区适当派了警察岗哨予以维持。因此九台县的日本人，除原火车站长和温泉旅馆经理与群众斗殴被打死外，未死一名。有个日本警察听到日本投降后当即剖腹自尽。这种人是受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毒害所造成的。就我所知，当时有三个日本人剖腹自杀，一个是甘粕正彦，时任伪满映画公司理事长，他在东京任宪兵分队长时曾借机杀死日本进步人士大衫荣的一家；一个是当时伪满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另一个是当时充任伪满哈尔滨学院院长的涩谷三郎。涩谷是日本陆大出身，当到陆军大佐，在日本“二二六”事件时退役，到伪满历任治安部警务司长、牡丹江省长等职。这三个人都是典型的法西斯信徒。

因为伪满洲国垮台，县里已成为无政府状态。正在此时，我根据长春广播电台公布的让各县及时组织临时治安维持会的命令，负责成立了九台县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委员会除维持地方治安外负有地方行政及一切临时性事务的处理权。这虽然没有法律根据但在非常时期公认为是权力机关。治安维持会，拘留了原伪九台县日本人科长以上人员和全部日本人警察、“协和会”事务长、“兴农合作社”理事长、日本警察的特务腿子刘裕民。将九台县监狱的犯人除重大杀人强盗犯外，全部释放。同时向各村长发出公函，令其按照县治安维持会的办法，着即成立村治安维持会，负责维持村中秩序。

二、苏军进驻九台县

从9月开始，苏军就零零星星地时来时去，随到随走。有一天从长春来了一苏联红军上校率领一行七八人到九台县找我，我遂出迎接。上校说，有人报告说，营城子煤矿日本人藏有枪支弹药，我们特来帮助你们去搜查。我表示感谢和欢迎，并愿作向导陪同前往。当即乘他们的大卡车到营城子煤矿。找来日本人的煤矿代表，由苏军说明了来意。经日本人报告了一些情况后，就到各处检查搜索了一番，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武器。之后，他们就回长春了。事后有人对我说，这是国民党九台县党部向驻长苏军报告的。他们怀疑营城子煤矿日本人有枪，想借苏军的手，如搜出枪来，就可以把现在负责者撵走，取而代之云云。不过这也是揣测之词，未必是事实。在此，顺便把九台县的煤矿作个简单的介绍：

九台县共有三个煤矿，都在营城子。裕东和隆吉煤为中国人的私人经营，属于统制外的煤矿，其一切计划产量均未包括在“国家”计划之内。营城子煤矿属于国家（伪

满）统制煤矿，其一切事业均置于“国家”产业计划之内，与其他的大型煤矿如西安（现在的辽源）、抚顺、阜新等煤矿，均属同一性质，不过规模较小而已。也算一个小的特殊公司，由日本人管理经营，年产量有指标，也设有专务理事等角色。其设备设施规模则大大地超过了另外两个私人煤矿。煤矿是伪满的重点企业，县里当然也把这个煤矿的产煤看成是县政重要的一环。日本人副县长经常到营城子煤矿和其主要的负责人进行座谈研讨。我到任后日期虽短，也去过两次。他们还特意设宴欢迎我这个新任的“县长”。县里也曾向矿里提供过劳工。县里为坑内作业的安全，曾派动员科长李雪年经常下坑视察监督。当时我感到这的确是九台县的一个沉重包袱。

对于裕东、隆吉两个私营煤矿的事业，我也极力予以可能的支援。因为他们生产的煤有充分的机动性，当有人托我买煤不可推谢时，就利用这条渠道应付他们。

光复后，我对保全营城子煤矿倍感责任之重大。我不但对县里的干部讲，还到矿上召集重要职员中的日本人谈话，责成他们要负责保管煤矿一切设施设备，不许发生丢失破坏。我对他们说，这对于你们的安全是大有好处的，如果经你们的努力保全了这些设备，中国人不但不怨恨你们，还要感谢你们的。我也必尽力排除困难保护你们的安全。原有矿警和私人枪支请主动地缴出来，以防不测。希望你们选出可靠的人来维持矿上的设备，我将派出警察到矿上协助你们的工作。要保持将来任何时候都可能生产的准备。武部六藏长官曾托人寄信让我照看你们。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九台县的日本人，除两人不听我们的劝告和群众斗殴遭到不幸外，其他无一人死亡。我希望你们以事业家的高尚精神保全营城子煤矿的设备，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去作，因为这是维护你们生命的唯一保障。他们都表示保全煤矿与煤矿共存亡。在我被苏军逮捕前两天还派人到煤矿去看过，据说仍安全如故。

在苏联红军搜查营城子煤矿不久，就有一个上校衔的苏联军官率一大卡车士兵来到了九台县，说是要住在这儿，让给安置住处。我问暂住还是久住？他说时间不好确定。我欲请周岩峰（从监狱解放出来的抗日联军少尉）与他周旋，证明九台县治安情况良好，酌情谢绝他们的驻在。而周岩峰不会苏联话，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我当然不好拒绝他们的进驻。通过治安维持会的决议，就把他们安置在原日军仓库。我并向上校说明仓库的来历和准备将来交给中国政府的意图，请他派兵看守。于是我们把警察撤回，他们就住在那里了。他的军队是一批一批地开进来，究竟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粮食由仓库取用，副食品如肉和蔬菜最初由维持会供应，到后来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大，我们就有点供应不起了。在苏军未开进九台之前，地面还是很平静的。苏军随来随走，我们就已经疲于奔命，迨苏军进驻以后，事情就更麻烦了。

首先，他们提出不许各家各户使用收音机，须将收音机（包括各机关单位）全部交给苏军。我率先垂范把收音机交给苏军了。第二，当官的要弄几块手表或怀表。我向给他们办事的李雪年科长说，你对他们讲，这些东西都是目下难以买到的。没办法，最后只好把我和李雪年的手表献给他们了。这两件事挺突然，虽感蹊跷，究竟影响面小，还算不了什么，更有一件使我棘手难办的事，苏军到九台后要大量收购牛、猪、羊，却没有经费。这怎么好办？再说农民的牛是耕牛，猪不肥，饲主不卖，因为无利。我向苏军诉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农民折腾得已经筋疲力竭，山穷水尽了。可是，有些利

欲熏心的中国人甘愿出来当经纪，企图从中捞一把，惹出一些很不得人心的事。还有一件使我最痛心苦恼的事情，就是苏军进驻九台之后，有些兵素质不好，不守军纪，私人民宅，随便拿东西，追赶妇女强行奸污。对此，我向苏军上校提出强烈抗议。我郑重地提出要求，请上校以中苏友好为重，勿使败坏苏军名誉，从严约束，肃正军纪，则感甚幸甚！苏军上校说，任意取走民物，等于抢掠，实属恶极，定加严办，决不宽贷。至于奸污妇女，似有误会。按苏联人的习惯，正经女人见人不躲不藏；不正经的妇女，见人就跑，就是招蜂引蝶，表示首肯愿意的意思。请告诉她们以后见了苏军不要跑，苏军决不敢强行无礼云云。我说中国人不懂苏联习惯，内中也许有误会。不过拼死拼活地挣扎拒绝，世界上能有用这种方法来表示欢迎首肯的吗？中国女子见了不相识的男子，一般是要回避的，特别是见了从未见过的外国士兵更是要回避的。中国女子绝没有同素不相识的男人对视而不回避的习惯。我请上校把中国人的习惯也向贵军上下介绍一下，以免误会。要入乡随俗嘛，千万不要闹出不相当的事情来，影响中苏友好，给中国群众留下不良的印象。最后我又把日本女子的情况向上校作了介绍。我说现在日本女子不惜把最喜爱而又最珍贵的青丝发忍心剪掉剃光，或许上校也听说过中日尼姑才落发，而日本女子现在剃光头发，还不敢充尼姑，硬要扮成一个男子，这是为什么呢？请上校仔细研究一下其中的奥秘。我以为苏维埃的军人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请上校收下我对苏联红军的祝愿！我对那个常来本县侦察情报的苏军克格勃少尉也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他以中苏友好为重，制止这些有伤两国人民感情的行为。他听我说之后，叫骂连天，好像也痛恶这种恶劣行为。从那以后，苏军的不良行为，似乎有所收敛。

这个少尉常来九台，行踪极为诡秘；但他穿着军装，人都认识他。他在苏联人中算是个矮个子，30 多岁。据说是苏联国家保安委员会的，以后大家都称为克格勃，因为他随便抓人，所以又叫他宪兵。就是他把拘留于公安局的日本人和日本的特务腿子刘裕民带走了（听说刘裕民在途中逃跑）。他 9 月末来九台，分别从于作舟（伪检察官）周法官（名忘记）和董子芹（伪街长）的家里将他们逮捕，拘留在日本侨民会。他为什么突然逮捕这三个人？又怎么知道他们的家？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我听说苏联克格勃抓人的根据是，一个他认为可以抓，另一个根据密告。治安维持会研究三人被捕的问题时，大家的意见是让我见少尉要求释放。第二天我见了他，我说董周于三人是治安维持会的委员，他们都是对苏友好的积极提倡者和工作者，你无故逮捕他们，影响不好，希望你考虑，予以释放，以后若有问题，保证随找随到。他说我有必要拘留他们，你不要干涉。说完就带着白俄翻译走了。

三、被苏军逮捕和审问

以后我对公安局长傅国卿说，看样子，他还要捕人，这是给我送信。可是，我不能为怕克格勃逮捕，在中国政府接收前躲起来，以后怎么向政府交代呢？我作了等着他逮捕的准备，我不打算躲避。就这样，于 10 月 2 日少尉亲自把我带到日本侨民会，拘留起来了。10 月 3 日用大卡车把我等四人载到吉林市，拘留于天主教会。

根据我当时的观察，我认为苏联进军东北，其进驻地方的一般官兵对中国老百姓尚

属和蔼可亲，即对在伪政权下当过差的人，也很客气；惟独克格勃则不然，认定了就办，独行其是，概不宽容。也许是其职务的性质，克格勃不讲人情，也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一被逮捕，有口难辩。我是待罪之人，只能等着中国政府来处理。倘在中国政府接收之前害怕苏军拘留而逃之夭夭；如在逃避期间发生其他问题，将来究起责任，则推卸不了。听说伪省长徐家恒和各伪厅长均被苏军看管，所以我之被捕亦非例外。况且我的现在处境非常艰难。群众都说苏军之所作所为不甚友好，我无依无靠实在应付无方，而且地方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心想不如借克格勃逮捕之机，在拘留所休息休息。将来政府问起责任来，可以苏军逮捕为由进行推诿，政府也不至于给我罪上加罪。再说我没有犯苏联的法，他也无法处我的罪，即或把我带到苏联，权当留学。我就在这样的糊涂思想支配下，心平气和地任凭克格勃的摆布了。

10月3日克格勃少尉把我们四人带到吉林市天主教堂，锁在一间小房子里就不管了。当时董子芹和老周患病，不进饮食，身体极度虚弱。几天后少尉叫我过堂，一个少年白俄当翻译（用日语）。我首先向他请求给董周二人治病，我说他二人病势甚重，不进饮食。我们并未违犯苏联法律，应以中苏友好为重，尽快释放我们。翻译说完了，少尉也不理我，就开始审问。

问：你当县长是干什么的？

答：县长是根据国家的法令，执行有关县内一般行政事务。县里有县长、副县长，下设科长科员，办理事务。

问：你都干过什么（让我具体地说）？

答：省长根据中央命令，指示县长征购粮食及其他物资，动员民间有劳动力的人服劳役。我因到县不久，这些事尚未作过。

问：你到县以后干过什么？

答：我到县以后，作过一次征兵检查，合格的国兵尚未入伍，日本就投降了。

问：还干过什么？

答：日本军托县里代购军马，但未成交。

问：你当县长以前干过什么？

答：当过张景惠国务总理的秘书。

问：秘书是干什么的？

答：给张景惠拿皮包，见日本人给他当翻译。

问：你干了几年？

答：将近四年。

问：在那以前，你干过什么？

答：当过治安部刑事科长。

问：刑事科长抓共产党吗？

答：刑事科是管杀人、放火、强奸、窃盗等犯罪，不管共产党。刑事科是治安部警务司的一个科，是事务机关，不是直接执行机关。

问：假设现在有个共产党，你抓不抓。

答：假设有个共产党在这里，他不说你也不会知道。这个假设根本不能成立。我知

道中国共产党都是好样的。我认得一个叫周维斌的，他就是共产党地下人员，我不但没有抓他，还保护他。

隔了两天又作了第二次审问，翻译是老年白俄，用汉语。

问：你管小学教育吗？

答：有关中小学的教育，县里都管，县里设有教育科，专管教育行政，教学有教员。

问：从小学就开始反苏，教科书里印有反苏宣传。

答：我看过小学教科书，没有一本有这样的内容。

问：你撒谎！（少尉怒气冲冲大发雷霆，拿出手枪向桌上一摔。）

答：绝没有这种事，你可以拿给我看看。

少尉：（把一本教科书投到我的面前）你看！

我一看，是一本白俄小学的教科书。于是我说，我们县里没有白俄，我也不懂俄语，这根本与我无关。我老实告诉你，中国儿童的教科书，根本没有这一段。

问：你是协和会员吧？

答：我不但是协和会员，我还是县协和会本部长。

问：协和会是反苏的。

答：协和会是搞日满协和的，其主要任务是帮助日本说服中国人不要反满抗日。自从日本向美英宣战以后，特别注意不让刺激苏联。在苏联对日宣战前，日苏还订有互不侵犯条约。

问：大东亚共荣圈是反苏的。

答：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想称霸世界，拉拢亚洲各国的圈套，以达到他的狂妄野心。

问：大东亚共荣圈里包括苏联的乌拉尔。东条和希特勒想在乌拉尔会师，你知道吗？

答：我没有听说日本的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还包括苏联的乌拉尔。法西斯的头子们想在乌拉尔会师，我看那都是白日做梦，妄想。

审问我这两次白俄翻译，都不透彻。在签字前，翻译念笔录给我听时（笔录是少尉自己写的），他念的笨笨卡卡，和我的意思不合，我遂把我意思说一遍，让他更正。少尉问何事，翻译回话后，少尉又说了几句。随后，翻译说，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不必修改了。就这样，我们三人都在笔录上签了名。

在天主堂和我拘留在一起的有个名叫陈宝罗的，是南方人，当时充任吉林俱乐部电影院经理，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俄语。他先是给这个少尉当翻译，以后因为少尉发现在电影院每日向警察厅和宪兵队填报看影人数的表格上印有“认为有可疑者须即时报告”的字样，少尉认为陈保罗是特务就把他拘留起来了。陈对我说，有一次少尉审问我时，他在邻室听见那个翻译关于大东亚共荣圈那一段有些出入。我闻听之后，就求陈得机会代我向少尉致意，要求再审问我一次。但少尉以后再未问过我，就这样定了案，把我带到苏联准备交军事法厅裁判。在归国前半年，有一天苏联俘虏收容所专案组的军官找我查对口供，翻译是一个姓金的朝鲜人，俄语汉语的水平都相当高，他把我的口供

一一地译给我听。我一听大为震惊：笔录上说“我为日本人向农民征购粮食和牛、猪以及军马，供给日本关东军作为攻击苏联的准备。并极力教育中国人协助日本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日德在乌拉尔会师作贡献”等等，这简直歪曲事实，任意捏造。我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审问的军官一一都记下来。他也认为一个新上任的县长不会如此供述和丑化自己，认为是翻译人员的失误。结果断定我没有触犯苏联刑法，是无罪的。

四、从敦化到苏联的古劳帖槁（四站）

有一天早晨，苏军把我和于作舟、陈保罗，还有3人，由天主教堂转移到附近的民宅。陈保罗说克格勃上级来视察，才把我们这些不合乎拘留条件的移到此处，看情形，我们有释放的可能。可是第二天又迁回原地。隔了两天，由几个苏军带我们几个人到市内浴池沐浴。翌日早晨，苏军用卡车将我等10余人送到开往敦化的火车上。这里面没有陈保罗，可能他被释放了。不久火车开动了。沿路各站都叫卖烧鸡和馒头，我们也有钱，但没有食欲，所以没买。车行至秋梨沟站，在站台上放的火药爆炸了，车耽误了3个小时，夜间才到敦化。从车站步行到目的地，辨别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好像人很多，我猜测是被拘留者的集中地。在这里住了几天，没有任何动静。在我住的邻间有个叫李士令的是伪吉林市动员科长。他说苏军要把我们带苏联去，服劳役，恐怕再也回不去家了。言下颇有潸然泪下之慨。因为中间是胶合板壁，听的很清楚。有一天夜间，一个苏军上尉找我等去问话，问的都是关于健康情况，我立即感到要离此远去。果然，于11月7日早饭后让我们分乘布篷木凳大卡车，我那辆车坐了30多人。我由家走的时候穿着棉袄、棉裤，身上不感觉冷；脚穿单皮鞋、单袜，冻得厉害。当夜在牡丹江露天过夜。同行者有七、八辆车。在翌日活动时，我遇见了伪吉林省长徐家恒，全身缠着日本女孩子的花棉衣，冷得直打哆嗦，其状甚为狼狈。他对我说，没有想到晚年还要流放到外国去受罪。言下不胜悲酸！以后，在四站，苏联把他释放送回吉林。这是我以后听说，是实有其事。于11月8日夜间到了苏联古劳帖犒。

我们乘的大汽车，到古劳帖犒的时候正是夜间。这个城市好像不大，路灯很少，连市容轮廓都辨别不清楚。目下虽属冬令，屋内也没生火，可是，分外暖和；又加上屋小人多，都出汗了，似乎已经忘了白天挨的冻。就是渴得厉害，渴比饥饿还难受，这是我们自被捕以来最难忍受的。所以有人说等我释放回家了，一定在火车站设一个义务供水站，作好事。在这里，苏联士兵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喝个够。

再说说中国人为什么把古劳帖犒叫四站？原来，沙俄在中国修中东铁路时，西线是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接俄国国内；东线是从哈尔滨到绥芬河（现在的绥阳）接俄国国内。这条铁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为头一站，以乌苏里斯克（双城子）为三站，古劳帖犒是四站，中国境内的绥芬河为五站，越往西号数越大，穆棱叫九站。四站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据说，那时候中俄边境，两国居民随便往来，互不阻拦。所以双城子、海参崴中国人非常多；而俄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铁路沿线居住的也不少。自十月革命后，往来即有所限，迨至伪满成立，日苏关系更趋紧张，继而日本把国境划成无人地带，则两国只能对立相望，互相监视，此路不通已有年矣。至于苏军这次从中国东北逮

捕多少日本人过来（包括为日本效劳的中朝两国人），我们无法知道。因为苏军控制非常严密，不给大家见面的机会。我住的屋，不过10多平方米却挤了30多人，起卧不限，白天还好，惟夜间睡觉，必须大伙都睡小面，然则想翻身还是困难的。苏军作好名簿，隔两天点一次名，但每日放风时必查人数。除我和于作舟外，其余都是日本人。我们这些人都不是正式军人，苏联管这样的人叫“抑留者”，按士兵给以待遇。在此拘留期间，每日开三顿饭，好像也有定量。当时每人每日供给黑面包300克（6两）一次交给，另外，每餐分给每人一中碗小豆或高粮米稀粥，没有菜。据说这是临时的。虽然质量不好，但大家都盼着这三顿饭。有的人把分到的面包一次全吃光；这点东西当然不能果腹。孟子说“食色性也。”又说“仓禀实而后知礼义”。其意思是说吃饭是人的天赋本能之一，不吃饭不能活，吃饱了才能懂礼义。食不必珍馐，但是需要吃饱。否则牵肠挂肚，尽琢磨吃了，连想家的心思也没有了。有时苏军叫人出去干活，偶尔给几个土豆或小块面包，这倒使人很向往。公推来自哈尔滨的日本工商会长加藤明为室长。加藤年将70，是老哈尔滨，擅长俄语，又健谈。另选两人给大家分饭及办其他事。因每日闲居无聊，请加藤讲讲其在外的经历，他就谈起有关俄国的事情，有声有色，却不懂现在苏联的事情。大家都希望能被释放回到中国。有个日本人叫田村敏雄，曾当过伪满滨江省次长，后任伪文教部次长，50岁左右，见多识广，颇有风度，也是漫谈的主角。这样一来，精神上也得到些许慰藉。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回国问题，都希望我谈谈这个问题，我说，有的人认为能送回中国，在这里是暂时的，理由是因为其中有许多中国人；而我不敢雷同这种想法，我认为苏军如想释放我们，那在中国就把我们释放了，又何必带到苏联呢？也可能有例外。不过，我想，既把我们带到苏联，在短期内决不能释放。苏军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日本政治有关，它想通过这些人弄明白日本对苏关系，换言之，就是想知道日本对苏联作过什么和有什么打算；它想从这些人中间采寻线索，进一步有所猎取。如果是青壮年，就更有用处，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人的物的损失最大，苏联又是劳动国家，俘虏或“抑留者”都是很好的劳力资源。人人必须有思想准备：第一要保重身体，作艰苦耐劳的打算。欲要和家人重聚，必须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活着。和我同屋的伪九台县副县江幡和县“协和会”本部事务长三刀屋，他二人极力地照顾我；其他日本人对我和于作舟深表同情，认为我们和日本人同样作为“抑留者”是不公平的。不过我不这么想，我以为日本人给本国的军国主义者作帮凶，尚情有可原；而我帮助异国侵略者当走卒，欺压自己的同胞是最可耻的，是不能原谅的。然而内心却是以为应当由中国政府来处理我，对苏军的逮捕总觉得冤屈难伸。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一个多月。

在12月末，苏军忽然把我们带到街上浴池洗了一回澡。两个多月连脸都未曾洗过，脚皮长的很厚，脏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认为苏军颇讲人道，过年还让洗个澡。翌日，就是12月31日，又把我们用大汽车拉到火车站，驱入“瓦罐”（“瓦罐”是俄语，中国人也叫“闷罐”）。“瓦罐”就是像车厢那样无窗只有拉门的货车，运兵用的“闷罐”车。车里用木板作的上下两层铺。我们这个“瓦罐”里共装有50人。

五、坐瓦罐火车去阿赞卡

这个“瓦罐”分上下铺，用木板打成的，最大限度能睡40人，上下各20。苏军吩咐说，睡铺不足，要串通交替使用，除病者外，不要独占。我们这车50人中，除我、于作舟和19名日本人外，其余都是白俄。白俄最邪乎，对日本人连打带骂，动不动就说你们日本人过去横行霸道，欺负我们，今天让你们也尝尝那个滋味。这个车上白俄说了算。他们29人占了四分之三的铺；四分之一，先让我和于作舟睡下，其余的铺位让日本人利用。日本人是敢怒而不敢言。这些白俄全会说中国话，有的也会点日语。从四站开车经过乌苏里斯克北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再经西伯利亚，气温逐渐下降。车上虽安了一个小铁炉子，而木柈子不足，等同虚设。车走走停停，一日走不了半日路，而且又很慢。每天的饮食都是在车站停车时临时筹措。每天还是给300克一块黑面包，不定时地给上两次或三次稀粥和凉水。我上车两天后就病了，发高烧，不进食物，就是渴的想喝水。于作舟把分的水全省下给我喝了，他光吃面包喝稀粥。有时给小豆汤，他也尽量让我喝。在地板上挖一小窟窿作便所。最初我上过便所，其后就很少上便所了。每天日本人在铺上轮班休息，白俄为所欲为，看哪个日本人不顺眼就大骂一阵。有一时期我烧得很厉害，白俄利用上饭开门时，乘机向苏军替我报告要药，有时候也给我药。我病重的时候对于作舟说，别说我发高烧，就说我感冒了，要点药即行。我怕他们把我扔下喂了狗。我悠悠忽忽地总做梦，好像是见了妻子儿女，有时梦见家里的弟弟说老父病故。这都是我平素所想的，居然入梦了。有时在梦中伤心地哭了。于作舟问我，我假说腰痛心酸发愁，于作舟劝我一阵他也哭了，就这样，不知对哭了多少次。我睡的靠边，霜都透到里边来了，幸而我带来一床棉被，救了我的命。我渴了时用手抓冻霜吃，其实即使是霜，能有多少水，用以聊解心渴耳。我渐渐烧退了，能少进饮食了，自觉不至于死在车中了。坐了30天火车，有时在车中闻马嘶牛哞，说是从关东军得的胜利品。途中给我们吃的小豆高粱米，也是胜利品。我不禁为苏军的获胜而庆幸！坐了30天的瓦罐车于1月31日到了阿赞卡。

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自以为命该休矣的重病，没有想到不仅痊愈，身体竟得到了恢复，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在阿赞卡下车已是夜间，四面漆黑，举目能见到的只是白雪。下车的地方没有站台，是雪地，人声嘈杂，“打外”（俄语命令口吻）之声不绝于耳。我乘上雪橇到了医院，在外室候办手续。忽听一个中国人说话：“谁是中国人?”我和他搭上话。他说姓王是山东人，十几年前由中国到苏联，从未见到家乡人。他给我拿来面包和土豆、大头菜汤。我们边吃边谈，他说他在医院洗衣房工作，限地居住（欲去外地须经许可）。他问中国现在如何和我们为什么到此地来等等，极为亲热。遗憾的是他没有文化，也不能看报，不懂得世间的形势，将庸碌地老死于异国。我以后再也没有见着他。既而办好入院手续。在入浴前先寄存衣服，一个老者发给我一个证件，让我妥为保管，出院时凭此来换衣物等情。这个医院虽简陋但很整洁。有一名德军俘虏大夫，人称医学权威。医院伙食不错，我永久也忘不了那个鸡蛋炒豆腐的滋味，太美了。经过治疗和休养，两星期我出院了。到澡堂子取衣服，我一查，少了一件西服上

衣，我原来穿了一套藏青色料子西服，裤子背心尚在，唯独上衣不见了。老者说你的证件，就是这些，再没有别的了。存衣时不是经我的手，我不能负责等等。我当时不懂苏联决不许克扣俘虏的严格规定，又说不透彻俄语，就认背了，吃了一个哑巴亏。我的单皮鞋因为脚冻肿穿不下，和那个老者换了一双破胶鞋带两只破厚袜子，他很高兴。我出院归队见到于作舟。我被派在以白俄考卡也夫为班长的作业班。考卡也夫在日本管辖的白俄事务局当过营长，军衔是少校，年50多岁，人还不错。这个班共有20人，就我一个中国人，其余都是白俄。是夜间作业，装卸木材。每人发一双毡靴和一件不挂面的羊皮大衣。班长因为我手脚不灵敏，叫我保管斧子。用斧子砍桩木时叫我，不用斧子时，让我在一旁呆着。隔一会儿就是不用斧子，也必喊我几声，怕我睡着了冻死。每日下午7点出工，朝6点归队，8小时劳动。每人每天供给黑面包600克。三餐都有菜汤和小碗粥。渴了喝凉水。收工时每人扛一根白桦木样子，回来烧炉子取暖。这个收容所除劳动外，概无其他活动。所以讲话只谈劳动，说凭劳动吃饭，不劳动不得食，劳动好的多吃，劳动不好的少吃。阿赞卡这个地方，一般的地图上找不着它的所在，不出名。据说靠近乌拉尔林区。冬季气温非常低，在2月10日就是立春以后，一般的气温为零下42度左右。夏天常有杂疾流行，不宜人类居住。当时，当地苏联一般居民衣食仍不甚充裕，特别是好一点的衣服奇缺。考卡也夫对我说，工厂监工的看中了我那条料子裤子（上衣已被澡堂老者骗去）。他极力劝我卖给他。我懂得他的用意，所以我说不要他的钱，能给我一条别的裤子套棉裤，我就送给他。但他还是给了我一条旧布裤子加180卢布。据说我这条裤子一般值500卢布。当时30卢布能买一公斤黑面包。我要分给考卡也夫100卢布，他高低不要。我分给于作舟90卢布。从那以后考卡也夫对我更好了。有一天早晨下工，在路上遇见上工的日本人告诉我说，明天不出工了，要送我们回国等等。果然，翌日没出工。于第3天即3月18日上了瓦罐（也是上下两层铺），中国人全集中在一辆“瓦罐”上。同行者都是日本人，没有一个白俄。听说阿赞卡这个地方都让给白俄住。借这个机会，我谈谈白俄。

白俄在中国一共有多少？苏联抓回来多少？这个确数我是不知道的。不过，大多数的白俄，都住在北满，所以日本人在哈尔滨设了一个白俄事务局。白俄事务局是扶植和统治在满白俄的办事机构，管理白俄的就业、教育、社会活动；还有一个特殊使命就是一旦有机会，则作为反苏攻苏的工具，从而组织了一支白俄军队。那个考卡也夫就是那个部队中的一名大队长（营长）。白俄事务局属于秘密机关，外边不挂牌子，经费也由日本特务机关支给。据我所知，历来的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如小松原道太郎大佐（后升中将师团长）、安藤麟三少将（后升中将师团长），都是研究苏联问题会说俄语的军人。日本特务机关还配属一、二名通俄语的辅佐军官，专管对苏和有关白俄事务。我于1935年在哈尔滨道里看见一个俱乐部，内中设赌抽红，输赢很大，除牌九宝局外还有些杂七杂八玩艺，花样很多，出人的人络绎不绝。都说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特许的，伪满警察亦无权干涉。俱乐部的这笔收人，就是归白俄事务局支配。

白俄事务局的头头叫谢米诺夫。谢米诺夫原为沙皇的一个将军，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击溃，率残部逃到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为。这批土匪队伍曾侵人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击溃后，想在中蒙边界建立根据地，又遭到中国当地军队的扫

荡。以后实际上就成了一股特殊的土匪。谢米诺夫在这期间则往来于中国、日本、香港等地进行活动。以后日本却利用了这个臭名昭著，沾满了中、苏、蒙三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谢米诺夫曾对溥仪称臣；溥仪也想利用他作为复辟的工具，寄托了无限的希望（请参照溥仪《我的前半生》220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在大连将谢米诺夫捕获，处以死刑（苏联尚未废止死刑）。

自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至第二次大战结束，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而在满蒙一带尚有多数的无国籍俄人（包括波兰、乌克兰、捷克人的无国籍者）即所谓沙皇的遗民，这些全是苏联的化外之民。因为他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和环境支配，对苏联是不友好的。他们人数少，固然成不了大气候，对苏联来说无关轻重，可是一旦被反苏的外国所利用作为反苏的工具，不是心腹之患，也是一种威胁。这次苏联进军中国东北，肃清了障孽，铲除了痈包，不能不说是苏联的一大庆幸。

六、在库斯坦奈战俘营

坐上瓦罐车，越往前走越暖和。谁都知道这不是回国，可是气氛非常活跃。这列“瓦罐”车共载有日本人（包括在中国的朝鲜人）六七百人（以后知道的）。我们这个瓦罐乘坐的全是中国人，有40多人，每人都有睡处，和睦共处，互相关切，俨然是一家人。有个叫于其志的是山东蓬莱人，俄国名字叫密哈由，爱称密夏（和俄国人打交道的都有个俄国名字），年40岁，身强力壮，精明强干，精通俄语，能写会说。从童年时代在哈尔滨马迪尔饭店当茶房，后被提拔为马尔斯吃茶店经理（马尔斯与马迪尔是连号）。前几年在哈尔滨道里十里街经营密斯饭店，还在海拉尔开了一座饭店。光复后他正和别人共商要接管北铁俱乐部（以前叫中东铁路俱乐部）的时候，与其外国妻子同被苏军逮捕，分别拘留起来。他的妻子是无国籍波兰人，曾给哈尔滨税务监督署当过秘书。于其志在我们这辆车上任劳任怨，为大家操劳，还把自己的烟丝拿出与大家分吸。在停车时，上面包，上菜汤，都是于其志和苏军打交道。车行了10多天，一天夜间，到了库斯坦奈。下车后大家以“瓦罐”为单位，分别排队，前后队中间置有相当距离，由卫兵指挥，顺序前进。仰望空中繁星闪耀，鼻嗅路旁野蒿散香，这是半年来未曾得到的享受，顿感心旷神怡，竟忘其所以了。步行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才达到目的地。据说此处原为劳改队。四周有电网，岗楼上设哨兵，大门有守卫站岗。人们在院内可以自由行动。第二天，所长命令实行三星期的检疫隔离，按房号洗澡，浴室即在院内。浴前必须将头发阴毛腋毛全部剃光，将衣服脱下捆好放于干燥炉里消毒。这是为消灭虱子以防传染。我们在苏期间，也常去过公共浴室，他们不设浴池，备有冷热两水管，用盆洗。一般浴室都带有干燥室，强制消毒。这首先可以消灭传染的媒介，作为公共措施，我认为好得很。就这样安闲地度完了三星期的检疫隔离期。

检疫隔离期间很快地过去，要作劳动准备了。前面说过，俘虏指的现役军人；非现役军人叫“抑留者”，给以士兵待遇。这个俘虏营的600多人，两者参半。按规定，士兵是强制劳动，少尉以上军官是根据自愿，不加强制。而一般没有病的将校，差不多都提出自愿劳动申请书。对将校经常让他们负责担任小组长什么的。派劳动是根据体位。

一级二级（指身体强壮者）作重劳动；三级作轻劳动或半日劳动；四级（指残疾或年老失去劳动力者）则免去劳役；奥卡（身体无病，但过瘦者）给一般伙食，令其休养一个时期，体位升级，再令其劳动；奥被（虚弱过度者），给加点营养，待其体位恢复后再派其劳动。OS（兑、埃斯），（有宿疾，需要休养者），给一定的营养伙食，每日进餐5次（劳伤、肺病等属于这种类型）。每月检查二次，由劳动科特约军医进行检查。受检者全身脱光，裸体走到医生面前（医生女的居多，所长、劳动主任在场），医生用手捏捏屁股上肉，按皮肉的松紧以定体位。体位记在其人的名卡上，劳动科据此分配劳动。我们第一期劳动是在院内修建简易住房。因为，原有房屋不足，又在院内建起七所。都是往地下挖两米多深，长方形100多平方米的有四所，小一点的有三所。都是有坡度的带屋脊房子，外面用土抹的，有玻璃窗，进太阳光，很亮，夜间有电灯，还有采暖设备。据说这样房子冬暖夏凉，不用砖瓦，造价极贱。大的住人，小的作办公室及其他用。原有的地上房子作为浴室、洗衣房、理发室、食堂、被服修理厂、娱乐室和仓库等。俘虏劳动都是分配到外面的工厂或工地，所内不设工厂。俘虏营归内务部管理，所长是苏军少校，劳动主任是大尉，政治部主任也是一位少校。除苏联军医外还有一位日本俘虏军医。所长任命日本人太田中将（原日本旅顺要塞司令，后转伪满铁路警护总监）为战俘大队长，又派于其志等人为中队长。在简易住房的修建中所用的材料都是俘虏运来的，不久房子就修成了。

下面是每人一日的食物定量：

面包（96%麦粉制的成品） 350克

干粮（大米、或稷子米、或大麦米、或燕麦米、或96%麦粉）450克

蔬菜（土豆或酸大头菜） 800克

鱼（咸鱼） 100克

肉（牛或羊） 50克

油（葵子油） 10克

盐 15克

白糖 17克

茶或咖啡 2克

烟（士兵供给麻号路卡，用纸卷着吸每月2包） 约100克

将校带纸咀的苏联卷烟每月2包（每包20支）

以上的用品中，食品那部分足有5000—6000卡（热量），对人体营养上有足够的价值。

俘虏营设有大伙房，由俘虏自行调理。食品种类先一星期通知俘虏，于前一天发给第二天的食品。大伙房在头一天就定出菜单子，经苏联军医批准向俘虏公布。每餐作好后，先发军医检查，合格后才能开饭。军医认为有问题时，经化验证实，即行毁弃，其损失由所长负担。有时候，作业延长时间未能及时用饭，致使饭菜因时间过久，凉了，或发酵了，军医就命令立即弃之重做。这个损失由延长作业时间的人负责。这也制约了一些延长俘虏劳动时间的现象。

七、战俘营里的中国人

中国人共有50多人，都集中住在一个屋。于其志是中队长主持劳动，对于中国人的事情共同商量处理。大家有一天向管政治的少校问中国人能否归国的问题。理由是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中苏又是友好的邻邦，过去我们受日本欺负，和日本人自有不同之处，请问我们是否能回中国？少校的答复很干脆，他说肯定能回去。不过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的中国，你们是不能回去的；必须达到完全民主的时候，你们才能回去。我说，现在的蒋介石政权有美国支持，他虽反动，但是很强大。少校说，正因为他反动，美国支持他，所以他一点也不强大，中国会达到完全民主，你们一定能回去云云。我们这一次和政治少校的对话，就是于其志请他来，并作翻译的。我们当时不懂得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考虑问题，又不知道国内的真相，所以也不完全相信少校的话，都忧心忡忡，议论纷纷。一部分人知道我们中间有的会跳神请仙问卜治病，提出可否让他们显两手替咱们试问一下前途如何。我在国内虽听说有跳大神的，但从未见过。于其志、王子衡等则大感兴趣，表示不妨一试，并商讨万一苏军士兵来查房时，就说我们是搞文艺活动。于是我们选了一个星期六的夜间，决定先让丛德山请"五道"。丛德山当年46岁，文盲，右手有残疾，免除劳役，在家时干过木匠活，会说全本《七侠五义》和其他小段故事。早年经师传授能请"五道"（就是请真魂灵如和尚道士、武者的魂灵下界判断是非、预卜吉凶祸福，还能专治男女邪症等）。丛德山在准备"请神"时，紧闭双眼，脸色发青，站起身来，手舞足蹈，雄赳赳气昂昂，颇具英武气概。他自己先报附体的魂灵是谁之后（什么道人），我们选一人与他对话。我们的代言人说，我们50几名中国人远离故国家乡，来到异邦异地，请问何年何月能回到家乡？他说我才疏学浅，实在不知道这些事情。代言人说，我们无力给你上供品，待回国后再报答，请万勿推绝。他说你们不能久住此地但不是回国回家。我们又再三恳求，他说，这个事情咱家确实无能为力，咱家也走。一会儿，丛德山就醒过来了。这一次闹了半夜，谁也没来，平安过去。

第二次，是一名姓范的请"黄仙"，需要有"二大神"，我们这里也有干过"二大神"的。范是农民，年32岁，文盲。苏军以他给日本人当特务有侵犯苏联利益的嫌疑将他逮捕。当"神"附体时，范脸变黄，全身战抖，细声细语地，好像是女性，唱着说：小奴家名叫黄小仙，这个外国门是不好进的，你们有事请赶快说，办完事就送我走。由"二神"代说我们请他的意图，问何年何月何时能回国？他说，我是个小黄皮子，不知道这些大事。我们说在外国无力准备吃喝，等回国再酬谢，请上仙无论如何，指示明白吉凶祸福。他仍然说不知道，"奴家这就走了"。

于喜汀毛遂自荐，作了第三次跳神。于34岁，农民，文盲。苏军由虎林把他带到苏联。"大神"附体时，他全身猛烈战抖，两人都按不住，简直要跳起来，由"二神"引路，自称"胡大神仙"，口中念念有词，仿佛抽暇而来的，先吹嘘一阵，说什么他是这十里八村无人不晓的头号大仙。经"二神"说明我们请他的目的，他说，容我掐算掐算，继而说此事关系重大，外国人也得商议研究决定，一年半载得不出结论。再问时，他说俺是个大老粗不懂得详细情节，再问他，他就打起呼噜睡着了。把他叫醒，重

新询问，他说这些事我说不出子丑酉卯来。我们向他道歉招待得不周，容归国再谢，请他费神打听打听于喜汀的家中平安与否？他说于家里正在托人打听他的信哪。有人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请大神向于喜汀家报报平安吧，大家都乐了，大神也乐了。太有意思了。至今思之，其情其景犹历历如在目前，真耐人寻味！

大家思乡心切，又议论，要设乩坛，以问前程。关奕周会扶乩，王子衡（伪满滨江省长）也懂得。于是准备就绪，说干就干。降坛的是吕祖。我们诉说了目的和希望，请予明示。但字迹不清难以辩认，就胡猜一阵，大意是："暂居勿躁，急求徒劳，珍重身体，切要切要。"以后又请过"五道"和仙神问卜，但都不"灵验"就不再问了。

谁都知道这勾当纯属迷信，无一点可靠价值。但在前途渺茫无计奈何之时，往往寄望于这些迷信上，以期得到解脱。日本人听说我们扶乩问吉凶，也来打听。

苏联人也信看手相。苏联军官听说中国人会看相，特约于其志为翻译来访我。我说，我看过《麻衣神相》，一知半解，不精通，但这都是形而上学不可靠。中国人还有以生辰八字断其一生休咎的，那更是唯心论，没有一点价值。如作为游戏则未尝不可，若作为信条则相差太远了。我姑妄言之，你们也不要信。我按他们每人的手相，分别地说其以往，又推其将来，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斯，来找我看相的人多起来了。

因为我在俘虏营给中国人队办过内务（集体生活室内的日常事务及清洁卫生等），有关一切报表和名簿都归我作，所以对中国人的出身经历比较熟悉。俘虏营最初为俘虏编成号，只呼号不叫名，而我对他们的名、号全背熟了。提起号我就知道是谁，提起名字，我也知道他的号。现在就 50 人的捕前经历作一个简单的分类如下。

（1）属于伪满官吏 15 人，其中有伪大臣（如韦焕章）、伪省长（如王子衡）和伪市长、县长、县警务科长、警察署长、警佐、警尉、警长等；

（2）属于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的专职人员有五人；

（3）属于被日苏双方利用越境的有五人；

（4）属于苏军认为是反苏协会的有五人。这里边有经陈新民委派为伪吉林省长的王惠清和旧吉林长官公署副官长戴恩厚等，这些人被捕后是用麻袋装起来运到拘留所的。

（5）属于苏军认为是给日本送情报的有 20 人。其中，有在国境线内种地的农民，有的是电影院、饭馆、鸦片烟馆的经理和煤矿的矿警，还有 2 人是会说俄语的混血儿。以上这些人，属于黑龙江省的最多，吉林省次之，辽宁省无有。苏联为什么要抓这些人？克格勃大概也用了不少心机，不过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我以为他们是拾草打兔子，当捎带而已。

八、日俘枪杀苏卫兵去杰兹卡兹甘收容所

库斯坦奈地处中央亚细亚，属于温带，气候暖和。当地有铅矿。苏军原拟让我们来开采铅，并作了住处及其它必要准备。我们也听说在铅矿劳动，能得到工资，所以大家也愿意好好劳动，争取在这里平安回国。没有想到，于 8 月中忽然发生一件惊人的事故。本来俘虏营对俘虏很讲人道，有病给治，重的让住医院。就是在住院中的一个日本

人给苏军做特务侦察工作，他报告有个日本人要逃。在搜查被揭发人的物品中发现一张地图（是该人画的）。人证俱在，本人也承认不讳。在送这日本人去军事裁判所途中，日本人伺机夺下卫兵的转盘枪，把卫兵打死了。这个日本人被逮捕送军事法庭了。以一条鱼腥一锅汤的逻辑，苏军决定这批俘虏不去铅矿，到惩罚收容所接受惩罚。

苏军于1946年10月中旬，把老弱病残的转走了。我们在11月中旬的一天，坐上"瓦罐"，走了7天，到了杰兹卡兹甘，进了俘虏营。照样是一个周围有电网、四角设岗楼的所在。这里已有日本人（包括中朝人），据说因为他们在被运往苏联途中，有人从瓦罐底挖洞逃跑了，结果大家受到惩罚，来此已有几个月了。合起来共有700人左右。中国人也不过50人（因走了一部分，又加上这部分人数未变多少）。此地气温较寒，交通不便，属于偏僻地区，只有一条铁路，这是终点。住的仍为半地下的简易房子，砌的砖火墙，烧的劣质煤，室内气温通常在15℃左右，还不太冷。照例有检疫隔离期间，仅休息了10天，发给每人草褥子、褥单、枕头、毛毯（日本军用的）、棉鞋（日本军用大头鞋）、德军用棉袄各一件。经过体检决定体位后，即派往工厂劳动。作业分挖土方、下火锯厂、木工厂等工种。各种劳动都是有"闹路马"（俄语音译，意思是定额），如挖土方、砌砖以立方米、抹灰以平方米为计算单位，按"闹路马"定报酬，超额的递加，达不到的以没有完成任务者论。苏联什么都讲"闹路马"，连吃饭都有"闹路马"。这是他们的优点。他们的劳动以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取其平均数为定额。苏联对劳动定额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值得我们效法学习。苏军对俘虏规定，西洋人（如德、匈、捷、保、波等）俘虏，不计气温高低，都须出工劳动；而对东洋人（如日本人等）冬天气温降到零下26℃以下就不出工（指室外劳动而言）；如果早晨在零下26℃以下，中午气温升上来就出工；太晚了就不出工。在数九寒天，差不多都在零下26℃以下，出工的天数极少。俘虏营和各企业团体都订有合同，凡因自然条件（雨、雪、风、寒等）不能出工时也可以得到较低的基本工资（苏联语叫普路斯托依，如火车送货，回来跑空车也不能算白跑，必须给一定的报酬）。这个惩罚收容所与其他一般俘虏营除夜间上锁不同外，其他如饮食、起居、活动等各方面都相同。在冬季天寒不能出工的情况下，苏军指导我们学习。我参加了"反法西斯小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我在这时期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基础》、《国家与革命》等日文译本。苏军政治部军官向俘虏作过社会发展史和苏联宪法的报告，讲到苏联公民的权利都受到宪法的充分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大家听了都感到非常钦佩和赞赏！开春以后，天气逐渐暖和，开始挖土方、砌砖，搞建筑作业。1947年"五一"节时，苏军当局宣布惩罚终结，另转一般收容所。

九、在卡拉干达战俘营的劳动和生活

由俘虏营到车站不远，列队步行。5月天气晴空万里，身虽在异邦流放，但亦觉心情舒畅。连人带给养竟装了20多个瓦罐车。途中的劳作都分配给俘虏干，伙食除面包外也均由俘虏自炊。途中食粮等供应很及时，缺什么上什么。据说苏联运兵通常也是这样。大家都以为这次转移，好象集体旅行。在途中曾准许俘虏下车一次，在车站附近广

场散步活动约一个多小时；这不能不说是苏联对俘虏、“抑留者”人道主义的具体实现。这时候无一人想逃跑，但也互相作了监视，以防万一。于10天后在卡拉干达下车。卡拉干达是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的一个都市，属煤矿区。不过，没有派我们采煤，而是分配作建筑劳动。到卡拉干达俘虏营后，照例是检疫隔离三星期，沐浴、消毒、更衣、理发。在休息期间，进行特技调查，按瓦工、抹灰工、木工及其他技术等作了登记。照例体检定了体位，按工作编了队。这个俘虏营还有德国、匈牙利、西班牙等国俘虏500多人，连日本俘虏共计1200多人。分别起伙，都在一个院内，虽不禁止交谈，但互相往来者极少。

这个俘虏营分欧亚两个厨房，于其志是亚洲俘虏厨房的主任，于向苏军推荐派我为厨房仓库保管员。原来，俘虏给养于前日发给一日份，周六发给二日份，领取后存于食堂仓库内，每餐按食谱（菜单）定量再分给厨房。军医监督厨房食堂的整洁和伙食卫生，非常认真负责。她责令我按定量分发物品，除厨房主任外一概不准吃小灶，任何人不经厨房主任许可不准拿走星星点点的物品。

炊事员共20人，分早晚两班。由炊事员中派2人充当班长带头干活，另设有俄语翻译1人，给苏联军医和于其志当翻译。于其志对炊事员讲话时用俄语，由日本人小川译成日语。小川的俄语相当好。

按苏联内务部规定，每天发给日本俘虏的食品定量说含有五六千卡路里，具有充足的维持生命和劳动的能量。每日食谱：早餐，菜汤1公斤（原料：土豆或大头菜、肉和少量米或面粉、油、盐），稠粥（稷子米或面粉90克），黑面包（100克）；中餐，稠粥（大米或稷子米120克），黑面包（150克）。晚餐与早餐同。鱼100克，有时煮好分给每人，有时放到汤里。把每日的肉量节约少许，积攒到星期六晚餐，做一个肉馅包子（烙的）分给每人。白糖每7天供应一次，由小队统一领取，均分给队员。

食堂墙上挂着记有当日食品种类数量和食谱的大黑板，并标明了每种食品所含的卡路里数量。在食堂后面舞台上，每周四、六、日晚餐时有乐队奏乐。边吃边听音乐，其乐融融，竟忘其在异国矣！周六晚间，由乐队奏乐开舞会，任意参加，尚有伴舞者（日本女子），当别有一番风趣。

食堂、厨房四壁洁白，是俘虏从外头拿来粉子刷的。只要厨房肯给几次晚餐，愿效劳者则大有人在。厨房制造了一个削土豆皮的小机器，缺个马达，就有人从工厂把马达悄悄地拿回来了，用几次晚餐作报酬即可。俘虏营需要什么，只要工厂里有，就有人能弄来。日本人最擅长这一套。还有的俘虏，偷厨房的土豆吃，就画一张土豆的硬纸画，套在他的脖子上，站舞台示众。两种小偷，两种对待，人们都视为自然。所长常到食堂视察，问俘虏吃得怎样？有人说，好是好，就是不够吃。所长说，好好劳动，得到工资，可以买食物补助。有个白俄叫苏斯林（抑留者），50多岁，常到仓库来要鱼和奶油，于其志不好意思拒绝他；他向我要，我就以现在没有为理由挡过去。还有炊事员有时作小灶吃，我看不惯他们这些行为，他们也嫌我碍眼。3个月后，适值所长让于其志当中队长，我也随于其志到中队劳动。

俘虏营里没有工厂，都派到所外工厂去劳动，每日劳动8小时，星期日休息。苏军说，在所内是俘虏，到工厂就是劳动者，同工同酬。每日早6点出工时，所长、劳动主

任、军医和俘虏大队长都到门口监视。近处步行，远道由工厂出车接送。冬天早6点，天还不亮，由大门口一个队一个队地往外放，每5人一排。经带队卫兵点好数，即领队出发。队排好了军医从旁注视俘虏的服装是否完整，如发现有导致冻伤的破绽时，就把人拽出来不让出工，大队长即时将其姓名记下来。如系手套等简单的东西不合格，就把备用的换上，令其出工；如系无法补备的，只好留下，追究责任，再作处理：如系本人不积极作准备处理本人；如系修理工厂的责任则处理工厂；如系应补发而未发者则追究被服主任的责任。有的俘虏手或脚发生冻疮时，则查明情况，如确系本人怠工企图逃避劳动的则按违法论罪（但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蹲禁闭）。出工的俘虏必须完成任务，如故意怠工则减食罚禁闭（就是减其食物的定量，晚饭后送禁闭，早饭前放出来，食后出工）。如屡教不改者，则编入惩罚小队，派一个很厉害的人当队长，改好了令其归队。我们小组担任建筑煤矿工人宿舍的劳动，工地四角有岗楼由卫兵放哨，但从未发生过逃跑事件。我在现场开卷扬机，午餐由所里带来干粮，在本地自炊分食。收工前，小组长将全天的工作量详细地报告给监工，经监工核对后开给一张清单（苏联话叫斯普拉夫卡），上面记着本日所挣工资的总数。把这张清单回队交给大队部。小组长把每日所挣的钱分别记在组员的名下，据此开工资。

据所长说，每个俘虏每月衣食住生活的实际费用为465卢布。在俘虏营的经济核算如不超支或不出赤字的情况下，从俘虏的每月劳动所得中扣除465卢布，所余部分发给俘虏本人。开工资不采取平均主义，干得好和多的要多得。例如小组共15人，本日总所得为300卢布，而得30卢布的3人，得25卢布的2人，其余10人分得其余的160卢布。劳动主任虽三令五申，要谁得归谁，然而究属同组劳动，亦应同舟共济，分个等级，让大家都沾点实惠，也给大队部送点礼，这既不违章又不犯法，只不过是方法应用的得体而已。冬季在零下20℃气温下，还照样砌砖，不过砂子是烫的，用开水搅拌水泥，到第二年楼房修成了，也没有发生质量问题。在劳动中，严格地认真地执行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特别注意安全。不准消极怠工，不许用体力超过距离搬运过重的物件，不准利用卷扬机上下。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造成人身或其他事故者，按有关劳动法律处罚。

卡拉干达处于哈萨克丘陵地带，在中国天山的大西北，气候不正常。正在炎夏，太阳晒，热得难受，忽然太阳被云彩遮蔽了，马上就觉得凉得起鸡皮疙瘩。所以不管冬夏都离不开棉袄。此地的冬天气温常常降到零下26℃以下。冬春常出现大暴风雪天气。

我们出工在现场，当暴风雪欲来时，卫兵叫赶紧排队回营。风雪一来，对面不见人，卫兵在前头带路，边走边喊，一个跟着一个，决不让掉队。像这样的天气往往持续两三天。有时在工地遇着大暴风雪，所长和劳动主任都及时赶到现场，研究对策，采取应急措施，排除险情。待俘虏如此仁至义尽，使大家感激得无法形容！冬天发给不挂面的羊皮大衣和毡疙瘩，一直穿到翌年开冻。毡疙瘩沾上雪，容易透湿，所以需要每晚送干燥室烘干。这是防寒的最好工具，抗寒力极强，即使在零下20多度的冻地里也不感觉脚冷。

十、成立了战俘民主委员会

1945年，苏联开展了斯达汉诺夫运动，俘虏营也掀起了社会主义竞赛运动。队与队之间、小组与小组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都提出挑战书开展竞赛。涌现出不少的积极分子，一时红满了全营，博得了苏军的赞赏。最后，开了总结大会，对劳动突出者进行表彰，予以记名留存的荣誉。

在惩罚俘虏营已经开始了政治学习，并成立了反法西斯小组，自移到本地后从未间断其活动。于1947年冬天，经政治部许可，我们成立了民主委员会，委员由俘虏大会选举产生，我当选为委员，同时为中国人代表（朝鲜人1人，日本人2人内1人丸茂为委员会主任）。民主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是对俘虏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改造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一个永远不作反人民事业的初步的民主主义者。丸茂原来是伪满军校的教官，年富力强，头脑清楚，思想灵敏，有口才，他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具有较深的造诣，不愧是一个好教师。我们在他的带动下进行工作。他是专职脱产的，而我们三人都不脱产。日本人着即成立了政治学校，每周一、周五下午7时—9时为学习时间。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人会日语的可以参加日本人的政治学校；不懂日语的上中国人的政治学校，学习时间为每周一、三、五的下午7时—9时，教材同上，讲者高丕琨。还成立了一个联共党史研究班，暂先学习讨论党史第四章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丸茂辅导讲。我参加了这个研究班。民主委员会在宣传鼓动、伙食、文娱活动、清洁卫生和劳动等各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在政治学习中也出现了很多积极分子。从1948年开始由学习积极分子中选拔优秀的分期送地区俘虏营本部学习6个星期；再加原俘虏营从事宣传鼓动和教学活动，内中包括两名中国青年人唐玉铭和吕仲华。于1948年以后政治部又陆续发给一些书籍。我看过的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传》、《胜利冲昏头脑》等，都是日译本。另外还看到俘虏办的《日文报》。

通过学习，明白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苏维埃国家一些现实情况。为了发展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思想改造的收获，于1947年末发刊了以《新生》命名的板报，为不定期刊。用十六开大小的白纸写成文章贴在板上，供大家阅览，这就叫板报。除正文外还设有“东鳞西爪”一栏，登些小消息、小故事、笑话、谜语等。因撰稿人不多，每期大约在三千字左右，主编为高丕琨，编辑兼清写为刘国良。由第10期起改名《前进》，到1949年末共20期，约5万多字，因无法保存全部遗失。

分住在其他房屋的中国人，无事时经常集中于中国人居住的房屋来说说唱唱，消遣解闷。有个叫关筱亭的，年50多岁，是陈新民委派的吉林省长王会清的秘书长，苏军以他为反苏协会的成员将他逮捕带到苏联（其实这是误会）。此人精通皮黄，尤工青衣小生，更擅长京胡、舞蹈。在国内常与票友同好粉墨登台。在长春曾与沈瑞麟（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伪满祭祀府副总裁）儿媳沈八奶奶同台表演，名噪一时。梨园界出于

他门下的桃李出名的亦不乏人。在京剧清唱时，他是台柱。刘振武的胡琴一响，李世杰的《辕门斩子》、《武家坡》，刘宝玉的《空城计》，鄢忠本的《法门寺》，关筱亭的《玉堂春》，就陆续地开台了。还有：张国忱能讲全本《水浒》，丛德山会说《七侠五义》，关筱亭会讲全本《说汉》，赵海桥的《时调小唱》，宫振文的《武老二》，应有尽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观者、听者仿佛回到祖国，其喜则洋洋者矣！

于1949年元旦，在新年联欢晚会上，我们演出了《盘丝洞》一剧，轰动了全俘虏营。因观众多为外国人，不懂中国话，故特置重点于形态的表演上，台词不多。编剧高丕琨，导演吕仲华。出场人物：唐玄奘（高丕琨饰）、孙悟空（吕仲华饰）、猪八戒（任宏德饰）、沙僧（宫振文饰）、白龙马（唐玉铭饰）、蜘蛛精（刘庆荣饰），小妖六人由中日小青年分饰。服装、化妆、道具均由吕仲华、刘庆荣二人设计制作，形相逼真，惟妙惟肖，观者莫不拍手叫绝，吕仲华扮的孙悟空，轻巧敏捷，机警灵活，简直神了。任宏德的猪八戒，憨头憨脑，洋相百出，耙子耍得令人捧腹。沙僧和白龙马也有其独到之处。我饰的唐僧不时地念几声梵语的阿弥陀佛，不过是一个愚氓和尚而已，无甚精彩。大小妖精均属女性，几个扮大小妖青年，眉目清秀活泼俏丽，完全像妙龄少女，丝毫也看不出她们是妖精来。特别是刘庆荣扮的蜘蛛精，相貌英俊，不啻姣艳美女，一表非凡的天仙模样，其舞姿窈窕，如燕飞凤舞，体态轻盈，忽而刀光剑影威风凛凛，令人眼花缭乱，恰如厕身于大舞台的观剧席上，博得全场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苏联军官也大为喝彩。从1948年开始演电影，平均每3个月能看到一次。

十一、战俘营以外的所见

苏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人财物损失最重的一个国家。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苏联人民，在一切为保卫祖国，一切为前线的口号下，为了争取胜利，受尽了千辛万苦。我们刚到苏联所经过的地方，虽然离前线较远，而人民的生活仍然不很充裕。幸而社会主义制度有其天然的优越性，又在斯大林元帅的英明领导下，很快就得到了恢复。1946年就取消了食物凭票供应制，旧币又换新币（拾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又连续作了两次生活必需品的降价。又胜利地完成了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回国前到纳霍得卡，看见轰轰烈烈建港的盛况，和我初到阿赞卡相比，真不啻天上地下。当我们夹在市民内排队买面包时，市民发现我们衣服上带有日本战俘的符号，都纷纷让我们先买，丝毫没有歧视的模样。他们排的队整齐，没有加楔的，很文明。

在卡拉干达有机会看到集体农庄，虽未得见其全貌，而一眼就可以看出庄民的生活是富裕的。庄民可以有私宅和家畜家禽。

我还有机会看过他们的自由贸易市场。衣物、食粮、肉类、家畜，家禽和蔬菜等都有价格，自定，但不准低于国营牌价。这是因为怕顶了国营市场，怕公家的东西卖不出去。听起来好像奇怪，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那样。苏联籍的华人也有在自由市场上作生意的，我们遇见了几个，有的还请我们到他家作客。他们和苏联女人结了婚。

苏籍华人在此地作厨行手艺的较多。我们请求卫兵带我们下饭馆（苏联卫兵的津贴不够下馆子喝酒的）。到馆子我们给他买一杯（玻璃杯）伏特加、一个菜、几片面

包，他高兴的不得了。饭馆的酒菜很贵，每人10卢布，只能吃1个菜喝3两伏特加。伏特加每公斤25卢布、牛肉18卢布（公斤）、白糖11卢布（公斤）、苹果5卢布（公斤）、腊肉（用猪肉作的）56卢布（公斤）、灌肠26卢布（公斤）、奶油18卢布（公斤）、黑面包2.8卢布（公斤）、半白面包3.6卢布（公斤）、白面包4.8卢布（公斤）、鸡蛋1卢布（一个）、铅笔（变色的）每支1卢布。市民亦准许饲养家畜、家禽（如牛、羊、鸡）。

我们人当中有人说，苏联人生的孩子都归国家所有，一律进托儿所扶养，个人养多少都不用负责，越多越好，苏联是奖励多子女的。其实，子女也有其父母。

十二、过筛子准许俘虏通信

从到这个俘虏营以后，就开始了审问。主要是对认为有侵犯苏联利益的人进行审问，俗话叫“过筛子”。就是说，把那些嫌疑者都装到筛子里过一遍，漏下去的不算，对剩下的大个儿进一步追查，认为罪证确凿的提起公诉。

担任这种工作的好像是军事检察官，有的常驻在本营，有的随来随走。这些人仪表庄严与众不同，问案有套办法。被审者往往关禁闭。禁闭室是独身房又叫蹲黑屋子，昼夜不见光亮，仅有一个送饭窗口，不用时还是锁着的。饮食限量，饭吃不饱，水也喝不足。几天吃不饱，人就虚弱了。在审问过程中，有时特地准备好吃的，让被审人吃，不拷问，不用刑，就是利用这些人的生理弱点来攻破其禁关。据说无论如何狡猾的也经不起这样的考验，到头来总会漏出破绽或张开嘴巴道出真情来。有的审完即转所，有的审完仍令其照常出工劳动。据我所知，被审人有以下几种：（1）被审人自供不讳；（2）被审人彼此是同事，互相有牵扯；（3）苏联方面掌握了一定的材料；（4）既无证人又无材料，本人也不说，这种类型的最难。审问者根据被审问者的职务性质和工作地点顺藤摸瓜，搜索证据，揪出事实。如果按客观事实，有而不说者，最后也免不了要水落石出；如果真的追不出来，他也不会冤枉好人；有些人原来是属于臆测，望风捕影抓来的，在复查中就会真相大白。如“反苏协会”等组织本属虚构的，有的本来就不犯苏联法，但被抑留几年，那就活该你倒霉。如果把在国境警察队、特务机关和宪兵队作过工作或有牵连的人，都作为侵犯苏联利益者论罪，却简单的很。像中国那句俗话：“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不过，这样做就太不科学了，也让人笑话说苏联检查官无能。说公道话，苏军越想把这个案子弄清楚正确，搜查研究的难度就越大。我认为苏联的搜查方法和解决的途径是煞费苦心了，还是比较合理的。有些人虽然没有犯苏联的法，但对中国人民还是罪不容赦的。苏联本着中苏友好的精神，把这些日本罪犯移交给中国政府，这与蒋介石政权把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放回日本相比，简直胜千万倍。

苏军把为日苏双方当特务的中国人转移到其他营所。把精通俄语的于其志，通俄语为日本宪兵队服务的崔明根等几个朝鲜人和在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供职会俄语的日本人上田小川等人，也转到其他收容所。我在集结地点没有见着他们的形踪，有可能他们已被苏军判刑。我相信他们后来能获得自由，但不见得都能回到各自的祖国。

在1949年初准许俘虏往家通信。每人先准通一次信，用的是双页明信片，一页是往家里通信，另一页是回信用的。回信地址是苏联99地区00号收容所，没有标明地名。明信片不能写太多的字，也不允许写太多的字。因为定有禁条，只准写自己的事情，不许介绍其他情况。经苏军检查后发出。我因为是民主委员会委员，特许多发了几封。以后也得到了我女儿高玫（长春）、族兄高北滨（吉林）、族弟高新华（哈尔滨）的回信。他们都庆幸我还活着，并告诉我家中平安无事和解放后祖国欣欣向荣的大好情景。希望我多保重，一定要回来过解放后的幸福生活云云。我回想起初到苏联的那种艰难的环境，欲生难、欲死易的岁月，不禁感到天将破晓，曙光就在眼前！虽然还没有得到准许中国人回国的消息，但相信总有一天苏联会让回去。当时苏联《真理报》和俘虏出刊的日文报上都屡报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惨败、中国大陆行将全部解放的消息。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以全所中国人的名义向斯大林致了感谢信。大家都跷足以待回国的消息早一日到来。

十三、从哈巴罗夫斯克经纳霍得卡被遣返回国

自1948年末，俘虏营里哄传苏联要遣返俘虏的消息，并说德俘暂缓遣返；德方欲以俘虏的劳动充部分赔偿，既可以帮助苏联的复兴建设，又能使德国减轻赔偿负担，是一举两得的。后不久，所长通知先遣返老弱病残的日本俘虏，陆续再遣返一般俘虏；先送还劳动好的、思想进步的，不好好劳动吊儿郎当白吃饱的，后送或不送云云。然而我们想：岂能把劳动好创造价值多的先送走呢？苏联从中国东北抓来的俘虏（包括“抑留者”），其费用均由日本赔偿。而中国人当然送还中国，朝鲜人送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为这些人之中大部分是犯了背叛祖国的罪行。日本俘虏，单关东军就60万，加上“抑留者”，恐不止此数。扣除死亡者（死亡率至少有20%，在我同车到苏联的21人中，就有8名业已死亡）及其他（如判刑），还有50万左右。对这50万左右人的遣返，需要准备集结安排及运输工具等，并非轻而易举的简单事。苏联是零零星星从每个地区抽表现好的先送，真是怎么说，就怎么办。中国人是和最后一批日本人同时于1950年2月初，从卡拉干达拔营的。在伊尔库次克车站停车时间很长。听说是毛主席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大元帅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已完成使命，归国专车正经过此地。闻言之下，我们乐得简直心都要跳出来了。几天以后，平安无事地到达了哈巴罗夫斯克（中国名字叫伯力）。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和我国黑龙江省抚远县隔江相望。原来日本60多万俘虏，分散于苏联各地，归国前的第一集中地就是伯力，由伯力再到最后集中地纳霍得卡。在伯力候纳霍得卡的消息。他们计划的步骤和实际行动衔接得非常紧凑，一点也不脱节。就是说，纳霍得卡要多少人，伯力就送多少去。因此，俘虏们在伯力没有什么正经劳动，但也不闲着。最初我们小组16人曾被派往粮食仓库去劳动。这个仓库的首长是一个少将，苏联籍的中国人，会说中国话，见到我们亲切地招手致意。一天，我们超额完成了任务，又多干一些零活，管理员给了一些大米，吃了一顿大米干饭（这是到苏联后惟一的一次）。

有一次在江沿劳动，看见江滩堆积不少的江船上写着中国字“哈尔滨号”，这是苏联作为胜利品从哈尔滨运来的，因为派不上用场就成了废品。还看见一些国民党的外交官员尚未退去。我们在此以小组为单位出去劳动，只有一名带工的或卫兵跟随。在4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乘上瓦罐车，由伯力出发，沿乌苏里江东岸，一直向南顺兴凯湖，经双城子过海参崴，两天时间就到了最后集中地纳霍得卡。

纳霍得卡是苏联东南端与海参崴相接临日本海的一个海港。当时正在扩建。日本俘虏在此登轮启航回国，在苏抑留的中国人亦均集合在此。我在此遇见了张绍纪。此人为张景惠之子，当年31岁。他先在哈尔滨上中学，学习俄文，不但能阅读俄文书籍，还会写能说，以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因太平洋战争归国，入王道书院学习。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以后听说的）。经我询问，他讲述了来苏的经过。他说：

5年前10月的一天（1945年），苏军驻长春司令召集我父（指张景惠）等大臣级人员开会。苏军司令说，你们的皇上现在某处，他相信你们，准备就让你们去。因交通工具所限，只能轻装前往。马上派人到你们各家去取东西，请你们写个便条知照一下。看你们有什么意见？吕荣寰首先发言说我是待命大使，不是现任官，并且有病，不能去。苏军司令说需要你去，有病不要紧，苏联有很好的医生给你治。于镜涛接着说，我是长春市长，碍难离开前去。苏军司令说，我们已安排好，你只管去。随后我（张绍纪）说，我是给我父亲当翻译的。我是学生，“皇上”根本不认识我，我不能去。苏军司令说，还要你当翻译，不用时，就送你回来云云。我就是这样来到苏联的。苏联对伪大臣、将官给以特殊待遇，伙食比较优越，每月还发给每人30卢布津贴。我们30多人（指随从而言）分地另住，给以士兵待遇，从事种菜劳动。头几天苏军说要先遣回国，就把我们转到此处来了。吕荣寰和兴安局总裁巴某（蒙古人）2人，因病死亡，其他还都健壮云云。

我在此又望见后宫淳大将（日本驻满洲方面军司令官）和大津（原日本桦太［即库页岛］厅长官、曾任过伪满内务局长）等人。日本将官除未佩带军刀外，是全副武装，本人自己手提大皮包（未有勤务兵），还是肥头大耳，很神气。从他们这些人登轮回国看，仿佛日俘的遣返工作已接近尾声了。

苏联不许携带现款（卢布）出国，但有钱不限制买东西。所以日本俘虏兵下煤矿得到多额工资的人，都买了汽车、摩托及其他贵重物品，差不多每人都置有一只手表。而我们俘虏营的劳动条件差，能买来手表的却也寥寥无几。纳霍得卡收容所归苏联外交部管，与从前那些收容所不同，从前是归内务部管。在这个收容所，俘虏出所劳动，都不附卫兵。我们12人派在俘虏医院，分别在洗衣房、浴室和墓地劳动。我在医院遇见了张联文（伪满新京特别市长）和王庆璋（伪邮政总局长）。还有些我不认识的日本人在这休养。墓地在医院附近的荒地里，约有千名日本人在此候船期间病死葬于此处。呜乎！一夕千古，竟成为异乡之鬼！他们的墓前均立有写着名字和号码的木牌。另有底账记载着死亡者的详细履历和死因。伪满参议、曾当过大同学院院长的井上忠也日军中将也死在这里。人死后进行解剖，取下记录后，经许可，装木匣始准埋葬于2米以下的土坑中（不火化）。我们到医院后也埋葬过几口棺材。

在墓地有看坟者监视，禁止在茔地放牧牲畜或破坏坟墓。昼夜都有看坟者轮流值

班。休息时，我们到海滨帮助苏联渔民拉网，有时一网拉上300多公斤鱼。我们分的鱼吃不了，到街上卖，不巧医院苏联军官遇见了，他说“不体面”。以后我们把吃不了的鱼分给医院食堂及苏联军官、医官，得到他们的好评。休息时也到居民家替他们修理火墙，他们以赠金为谢。

我们到苏联后，初期连月日都记不清了，以后虽知道公历年月日，但不知农历的年月日，何时过春节，一概不知。韦焕章在卡拉干达时，曾作过打油诗云：“抑留在苏联，不知多少年，举头望明月，四十八回圆。”的确是这样。

在纳霍得卡悠闲地住了一个多月，忽然接到归国命令，对此地山水颇有些依恋之情。于1950年6月9日我们由苏军护送从纳霍得卡乘上火车，这回是普通火车不是瓦罐。车窗严闭不见窗外一切。车内闷热，但心情是愉快的。上车后才知道中国人共计是224名。车行至中苏国境停下了。经苏军税关的严密检查后移交给中国。我们以轻便的行装改乘中国火车，登上归程。在车中，5年来头一次吃上了祖国的饭菜，感觉又愧又喜，说不尽各人的复杂心情。车窗是用白纸糊的，外头看不见里面。接收人员说：“你们在车里可以尽兴地谈笑歌唱。”于是我们唱起了《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我们自己谱写的《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歌唱五一国际劳动节》等歌曲。于1950年6月12日回到了沈阳。

十四、被抑留的朝鲜人

朝鲜人在伪满任职时称为“鲜系”，也算日本人，属于日本天皇的臣民。所谓“日满协和”，这个日，也包括朝鲜人在内。那时候，日本把日本人叫内地人，把朝鲜人叫半岛人。其待遇仅次于日本人，比中国人高一级。这样一来，使朝鲜人骄傲起来，而中国人仍然瞧不起朝鲜人。所以，中朝人互相总是不甚和睦。自1943年准许朝鲜人改为日本姓以来，朝鲜人均须改姓（不改姓的要受责问），这就消灭了日、鲜人形式上的差异，姓氏一致了。可是有的朝鲜人虽改了姓，而在新姓里却藏着旧姓。如姓尹的改为伊原或叫仓内，这里边都包含着尹字的意思。日本战败朝鲜独立后，朝鲜人都恢复了原姓。被苏军抑留在我所在的俘虏营内的朝鲜人中，惟有两人未恢复原姓，仍然叫铃木和春川。和我国俘虏营的共有14名朝鲜人，内有11名通俄语，不通俄语者仅3名，但均通日语。他们都是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或伪满国境警察队和警察署的职员。会俄语的得到苏军的重视。崔明根是大队长，崔被调审后由铃木充任大队长。大队长助理、大队的统计、翻译、检察官的翻译、大队被服管理员都是朝鲜人。不会俄语的春川是中队长。铃木、春川二人为什么不恢复原姓呢？谁都知道俘虏终究是要回国的。充日本人可能遣返到日本，那就平安无事；否则，苏联必将朝鲜人遣返给北朝鲜，难免要受审查（如果能到日本就可以避免这一场灾难）。岂知弄巧成拙，在集合收容所里，铃木和春川却遭到了朝鲜人的强烈的批斗。当我们在便所和他们相遇时，他们暗示我们不要和他们交谈。我在集结收容所还见过尹东光（仓内东光，曾充任过伪满四平省民生厅长，后升为伪间岛省长），他表示不敢和我多说话，他也正在挨批斗。听说朝鲜人在集合收容所，临归国前的一个时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而中国人在苏联从来没有单

独地开过批斗会。

这篇回忆录只是就意之所遣，心之所想，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犹未报，时机未到。我早年也是一个因果报应论者。刚到苏联时，总觉得自己所受的报应太过分了。我虽然为日本效劳过，而对中国人的事情还是费了心机的，似乎尚未丧尽天良，尽管对中国人民有罪，但对苏军逮捕我却感到极端不满和忿恨。看他们到底如何处理我？然而我看到的是他们人道主义相待，不歧视不打骂，还善意地加以指导和教育。我们学习了辩证法、唯物主义，以马列主义理论对照苏联的现实事情，使我大大地感动了。要想彻底把自己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改造过来，那多难啊！旧意识时刻冒出来，阻碍接受新事物，经过反复自我的思想斗争，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伟大的，苏联人民是伟大的。我曾向收容所苏军政治部提出请求，希望派我到一个适当的学校去学习深造。这种思想虽然幼稚可笑，但可以说明我当时的心情。由于在俘虏营的后期生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逐渐感到：幸而苏军把我带到苏联，否则被国民党利用，再作了反人民的事情，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言念及此，不但不恨反而感谢。所以我抱着很大希望和决心，回国后要奋勉努力，加强思想改造，作赎罪活动，争取人民的宽大处理。

我在早期的《人民日报》上读过一段新华社记者的访苏报道。他说他在阿塞尔拜疆共和国某地参观过一所公墓，墓碑上写有其人的姓名和年龄，但年龄都不大，记者以为此地人多短命，遂问其故。向导对他说，这不是该人的寿命，是他为人民服务的岁数，例如他的寿命是 90 岁，而他为人民服务只有 10 年，那他就是活了 10 岁。我对此颇受感动，终生难忘。我愿以有生之年，尽力之所能，为人民服务。我揭发了一些不良现象，是以寓褒贬、别善恶、辨是非、与人为善的意思而写的。总而言之，中苏人民是友好的，也应当友好下去。

（1983 年）

苏军在东北发行红军票开始的一段经过

陈 楚 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苏军阔夫托少将司令官率领一部苏联红军进驻沈阳，把当地伪满军队和伪满警察等一律解除武装，同时并命令各公私银行一律关门停止营业。其时我是沈阳志诚银行董事长兼任沈阳商工会副会长（后改为商务会会长），鉴于伪满政权已经消灭，新政府尚未正式成立，地方治安没有当地人出面暂时负责维持，极为可虑，况且银行事业有关经济命脉，长期关门停业不仅妨碍工商业的活动，而且会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我就以商会会长名义代表全市工商界，偕同一位会讲俄语的徐子鸿面见了阔夫托少将，主要是请求发给当地警察武器维持治安；另一方面，也请求准许银行开门复业，舒解人民困难。他当时只允许发给警察一部分枪支，但不准银行开门复业。以后，阔夫托少将又嘱咐我接收几个大工厂筹备开工，另外还要我另成立一个新银行，当时我还不甚明白他的用意所在，只想到既不准各银行开门复业，能够另成立一个新银行，对于地方工商业和人民生活可能有所帮助，所以只答应了筹办一个新银行，并没答应接收工厂。于是就在8月下旬，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找了几位行员在旧南满附属地（俗称日本站）伪满中央银行旧址正式成立了东北实业银行，即刻开门营业，由我负其总责。它的主要业务与一般银行业务相同，其后苏军把新发行的红军票交给我们一些，托我们代替他们兑回苏军进入东北时所使用的卢布纸币。这种卢布纸币是苏军由国内带来的军需用款，不便在国外长期流通，所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他们就自行印制了一种红军票，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种，在沈阳开始发行时，就用以兑回卢布纸币，而这项红军票是苏军用于在东北的军费开支。据悉这项发行，后来由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协商由中国负担其军费了。

东北实业银行开业后，由于没有资本，先由苏联商业公司送去200万元作为存款。重要职员都不领薪，只有经理以下的员工发给薪水，所用煤炭也由苏军无偿供给，保卫工作也由苏军派军人守卫，还另发给我们自用警卫人员的枪支。代兑卢布不付给手续费，而以商业公司200万存款不付利息和给些煤炭作为报酬。

既然有了存款就必须加以运用，借以取点利润，维持开支。因而我们就在沈阳城内和小西关设了两个分行做些存放业务，但这两个分行都不代兑卢布。

10月2日我同徐子鸿乘坐志城银行马车因事去见阔夫托少将，正由大东门里我家的那个胡同口上车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开枪射击，对我连发五枪，但三枪偏偏都射中了徐子鸿，他当时身死，我幸未受伤，即刻跑到小河沿医院刘仲明院长处，刘

---

* 作者时任沈阳志诚银行董事长兼沈阳商工会副会长。

乃用汽车把我送到小南门里我的侄儿陈汝议家暂住，这是第一次遇险。第二次是在林枫、朱其文、白希清诸同志在沈阳原伪满市政府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白希清同志派汽车把我接去开会，会后又把我用小汽车送回家，当行至大西边门时，又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手榴弹暗杀，当时仅炸破了汽车后轮外胎，汽车还能行驶，我未受伤，即刻回到家中。这次暗杀我猜想似系针对当时开会的党内某些同志而进行的，特务们竟未想到在车内的是我而不是什么别的人，他们认错了，但都未伤及，亦云幸矣。

特务们对我进行暗杀是有其一定原因的：一是由于我代苏军发行红军票并代兑卢布纸币；二是由于有一次开会我为解放事业向工商界筹集了150万元款项，特务们认为我是左转，趋向了共产主义，因而遭到他们的仇恨，所以他们用了这种卑鄙手段准备杀我，企图削减人民应尽的力量。其实在解放事业中我何尝发挥过什么力量，又何尝起过什么作用呢？这可能是他们对我估量过高了。

东北实业银行始而做些代苏军兑回卢布纸币，后因兑换业务没有了，这个银行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就在11月间停业结束了。

（韦锡九整理，1963年10月）

我所知道的张景惠

于镜涛

张景惠，辽宁省台安县胡家窝堡人，弟兄三人他行二，出身农家，自幼游手好闲，读过半年书，善于结交地痞流氓。在1900年“庚子之变”起始，与辽西一带匪首冯麟阁、金寿山、洪福忱、张作霖、杜立山等等，都有勾结，他依靠“说票”（“说票”是匪人把人绑架到一个地方，向被绑人家族提出价钱，由“说票”人从中报价讲好，被绑人的家族，可以用钱把被绑人购回不至被匪人杀害）、赌钱为生。台安县八角台地主刘东阁（人称刘五老爷，据说是有功名的人）等为保全家财，将张景惠由胡家窝堡约到八角台街，刘出钱雇佣一些人作所谓“护勇”，由张景惠领着住在刘所开设的烧酒的烧锅院内，保护八角台街的安全。而后刘东阁等为养活张景惠，在八角台街所属境内的农村中，每垧地据张自己说抽三毛钱奉小洋，用这项钱编成一百多人的步兵，在八角台境内“保险”，免得他们对地方骚扰。以后张作霖在北镇县中安堡与匪首金寿山互争地盘，张作霖失败，率17名匪徒到八角台找张景惠。张请求刘东阁等将张作霖留在八角台，添编了一百多人的马队，由张作霖率领，与张在八角台境内共同担任地方“保险”。1908年，八角台地主等为减轻地方人的负担，呈请新民府知府增韫转请奉天将军增祺，批准将张作霖、张景惠收编为奉天省新民府游击马队，张作霖为管带，张景惠为帮带兼前哨哨官。① 从此张景惠随同张作霖逐步地成了东北割据的军阀，最后成为盗卖祖国民族利益的罪魁。

张景惠没有就任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我不认识，只听人说他为人忠厚，性情温和，是一个好交朋友的人，据辽西一带所谓地方上有名望的人，都称赞他大事不胡涂，张叙五（叙五是张的别号）是一个大仁大义、急公好义的好人。相反的，据东北军阀内部人说，1922年直奉战争的奉军失败，是他出卖了张作霖，倒向了曹锟，例如战后奉军全部被逐出关，他反就任了曹锟政府的国道督办②，这是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勾结日本，背叛祖国和人民，毫无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是不可饶恕的恶人。

张景惠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关系

在闲谈中，张景惠说：“张作霖是甲午战的逃勇出身，在辽西一带打劫为生，见事

① 作者记忆有误，张景惠受官府招抚是在1902年，暂编为新民街捕监队，1903年8月，并为游击马队，张作霖为管带（相当营级），张景惠为帮带（相当连级）。

② 1923年10月5日，曹锟当上“贿选总统”，任张景惠为全国国道局督办，月薪高达2000元。

快，为人凶狠好杀，经我介绍在辽宁省台安县（八角台）给地方保险，而后由新民府收编为正式的游击马队。”我问他，一般人传说张作霖的管带是您让给他的。张说，张雨亭的为人，你在他的上头怎么能行，就拿他对老曹（曹锟）来说，我劝他合作先推曹当大总统，他当副总统，过不了几年，我保险他准能当上大总统。张雨亭他不同意，说我，你还作统一的梦，非跟直军作战不可！借着反对吴佩孚（号吴子玉）为直鲁豫巡阅使，两方就决裂了，东三省就是叫他这样弄坏的。现在他儿子（指张学良）又这样胡闹，张辅忱（指张作相）为人太孬，把总司令让出不敢干，就听他摆弄吧。1919年我在北京当奉军总司令时，回奉天有事，他（张作霖）对我说，学良，我让他去带队，出去当团长啦。我劝他说，他正年青何不让他上外国去留学，各处看看，学好了回来干什么也不晚。他很不高兴，反驳说，我就这一点私心，就惹你不同意，上外国留学有什么用么。他们父子因此对我生了疑心，到今天张学良还认为我反对他。

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我和张景惠谈话中看到他的政治态度的片断：

1931年9月初自我到锦县为张作相父亲吊丧，10日与张景惠同乘张作相预备送客的专车回奉天。在途中他对我说，暂时不回哈尔滨，双十节要到南京，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神色之间很不高兴。据我所知，张学良要更换他，并已亲口告诉蔡运升，10月准备接任特别区长官；或者他已得到了这个消息，所以发牢骚，足证他们之间矛盾是很深的。

当谈到中日交涉紧张的情况时，他说，竟瞎扯不办正事，说了不算，小鬼子怎能答应呢。又说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对他说：“应以东北元老资格出头与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商谈，总要解决一些在外交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承认所签订的合同，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权，是不行的。”他是很同情内田的谈话。又继续说：“老将（指张作霖）是怎么死的，还不赶紧地想办法，你（指学良）能躲到哪里去呢？现在把家扔了，连东北政务委员会都没有人敢主持一切，内田把我也看的太高了，我的话谁能听呢？你在张辅忱家不是也看见黄显声（奉天警务处长）吗？他不是吊丧，他是拿着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文件给张辅忱看，而后去北京，他是臧式毅（别号奉九）派他上北京去请示办法。因为给他（指张学良）去信去电报概无回答，可让看家的人怎么替他负责任呢？千里请命，能够不耽误事情吗？这如何能主持东北大局呢？”从这些谈话可见他早已倾向日本并对张学良的不满了。

张景惠任东省特别行政长官是张作相推荐的。1928年6月初张景惠随着张作霖由北京退回奉天，车到山海关有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登车，吴是由沈阳来迎接张作霖，三人坐在一个车厢里，当车行至沈阳皇姑屯的“老道口”被日本轰炸（炸车案），张作霖、吴俊陞先后死去，张景惠受伤没死。在此之前的5月，哈尔滨江镇守使丁超报称东省特别行政长官张焕相有鼓动学潮、图谋政权的阴谋，电请吉林省边防副司令公署司令张作相，据情电请张学良司令长官，撤换张焕相，推荐以张景惠接充。

张景惠到任后的特区情况

特区所属机关的局、处长等也随着更换了，如特区公署政务厅长林斯贤、秘书长陈

浏、市政局长储镇、教育厅长傅闰成、地亩局长张焕相、特区警察管理处长金荣桂、东铁路路警处长鄂双全、市政局副局长孙柏芳、地亩局副局长冯维德等，除特警处副处长英顺、路警处副处长于镜涛、长官公署财务处处长宋义忱三人留任外，都是张景惠从沈阳来时，张学良指派的，如政务厅长葆廉、秘书长梁禹襄、市政局长何玉芳、教育厅长张国权、地亩局长高纪毅、特警处处长米春霖、路警处长张厚畹，特警添设一名副处长贾文琦充任。张自己只有副官和会计、庶务五六人。

随着特区长官和各局长、处长的更换，联带到各局处的科长、科员，以至到下级的杂工等，乃是哈尔滨破天荒的大更动。

张景惠在特区长官任内的糜烂生活

张景惠午后到长官公署所谓上班，听政务厅长的口头报告，后由秘书谢宗夏将例行的公文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替他盖章，有时念给他听听，盖章后他到秘书长室，随时会见所属的各局处长，若有向他作事务的报告，他是一个字的答复“好”，你看着办吧。他从来不作主张，或是闲谈一阵。3点钟后，他即到南岗“道胜银行”（帝俄时的银行）院内住宅（他的第六老婆那里），玩到晚饭前约在6点钟才回南岗花园街的住宅（他第七个老婆住在这里）。晚饭后在8点钟左右，他的副官张书舫等，往各处打电话请人，到他家陪着他打“麻雀”（牌），被约的人有时到晚了，他还很不高兴，每天要玩到深夜两点钟，还要喝盅夜宵酒才能散。被约的人非常的苦痛，他一玩上“麻雀”什么事都不顾了，他打上“麻雀”不见客，这是当时一般人所共知的。他的生活是他老婆或他的管家副官马振太给他安排的。

人们都称哈尔滨是亚洲的小巴黎、北方的上海、华洋杂处的商埠、水陆交通的中枢。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从他到任后暮气沉沉，公署所在地南岗夹树街，临街的楼房，楼下办公室，楼上是大客厅，一进门往左走，经过政务厅长办公室，即到他和他的秘书长办公室和他会客的小客厅。进门的通道两边的屋子是庶务员、会计员和他的副官办公室的屋子，这些办公室里摆满了腐朽生活用具，午后五六点钟后，有的屋子里还摆上吸鸦片的大烟灯、如政务厅长葆廉、秘书长梁禹襄、参议魏绍周、秘书谢宗夏、会计员秦川、庶务钱焕章、副官张书舫等等，都是鸦片嗜好者，将特区的长官公署弄得臭气冲天。他这样昏馈庸愚，怎能说他是大事不胡涂的忠厚人呢。

张景惠对中苏事件的态度

1929年，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为保全自己的地位，以收回中东铁路的权利为名，勾结蒋介石消灭张学良的东北政权，发动中苏战争，遭到可耻的失败。张景惠的态度是暧昧的。如吕荣寰提出接管中东铁路业务并限期苏联的职员撤退时，在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由张景惠、吕荣寰二人出面，召开哈尔滨市军政机关长的会议。吕荣寰宣布使用武力接收东铁路的业务，同时传达南京蒋介石的指示说，据吉林省外交特派员钟毓的来电，大意是对苏联的交涉要坚持到底，就是发生战争，亦所不惜。当吕荣寰宣布后，张

景惠大声地说："有政府的主持，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好好地干吧"。吕荣寰在张景惠支持下，要求护路军和特区警察、东铁的路警，在铁路沿线要负责援助派往沿线接收路务人员，如站长、机务段长、工务段长等等。当时在场会议的人，都认为事情严重，对于准备的内容多半都不详细。散会后我到秘书长梁禹襄的办公室，听到张景惠对政务厅长葆廉等说："咱们没有什么研究的，老吕是有内命的，这是他的事。"葆廉说："你老是行政长官也有责任。"张低着头，在地当中来回地走，说："你们不知道，当常荫槐没被毙时，曾要求司令长官，常要以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的资格，兼任中东铁路督办。老吕听着这个风，为抵制老常，向司令长官上条陈要接收中东铁路的权利。当司令长官把常枪毙了，把老吕的条陈交还给他，告诉他好好地去办吧，老吕利用机会，在司令长官的谅解下跑到南京，据老吕说他到南京后，孔祥熙接待他并见了老蒋，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今天大家不是都见老吕对大家宣布，钟毓传达政府来电吗，咱们可有什么责任呢。"

在张景惠下令帮助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接收东铁业务时，还拘捕了一些苏联籍的俄国人，为设立收容苏联人的收容所，派我到奉天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去领枪械。我到沈阳在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后院，楼下公厅见的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和秘书长王树翰，同时有中东铁路监事会监事张恕、护路军军法处长王树声、特别区地亩局局长应振复。张作相说："你们跑这里来，打算怎么样，可是谁叫张四爷（指张景惠）帮助主张打仗呢！"又说，你们回去要告诉"四爷"，这个事我们看家的主张不了，司令长官在北戴河，电报我们都给转到北戴河去了，现在还没有指示，领点枪是可以，出兵的问题还谈不到。又说，据穆棱站罗团长来电说，张长官（张学良）命令他把吉林的炮兵营开到马桥河，要是把炮弄丢了，谁负责任呢？告诉他，老吉林的军队，是不能随便指挥的。当我回到哈尔滨，关于张景惠指挥吉林军，是吕荣寰的主使，他给护路军赵金麟参谋长下的书面命令。

没有准备的战争

1929年9月初张学良在接收中东路的舆论逼迫下，派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率东北军第四旅长刘翼飞、第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和骑兵师师长郑泽生所属的各部队到哈尔滨，分驻哈绥路线，与吉林军丁超所属十八旅和二十六旅邢占清等协同防城，没有作进攻的准备。派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率韩光第旅与黑龙江军梁忠甲所部防守哈满线直达满洲里，关于军需的物资一无所有，是一种示威的行动。在吕荣寰拒绝苏联外交次长来电所提出的协商建议。在10月末苏军使用飞机和少数的部队攻陷了扎兰诺耳煤矿[1]，炸死了旅长韩光第，全旅溃败；海拉尔街被占，旅长梁忠甲及全旅官兵被俘，哈绥路溃散。在这损兵折将的压迫下，吉林省司令张作相提议停战求和，张学良以东北政务委员会用

---

① 即今内蒙扎赉诺尔，苏军于1929年11月17日，以4万余兵力、飞机30余架、坦克40余辆、大炮三四百门，开始进攻扎赉诺尔和满洲里。11月18日韩光第阵亡，20日梁忠甲及残部在满洲里被俘；23日苏军攻占海拉尔。

会议通过的手续，派滨江道尹兼交涉员蔡运升到苏联伯力求和，得到苏联的同意，结束了这场中苏事件。

张景惠协助日本对东北的扩张侵略的经过

1931年“九一八”当时张景惠在沈阳，于9月22日回到哈尔滨[①]扬言，他在关东军的谅解下，维持东省特别区和北满一带的地方治安，谋求解决中日的外交悬案。他为个人的安全，命令我招募3000人的东省特别区警备队，用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作为他的护卫。

他在招募警备队时，对我说，张学良是不能再回到东北了，这就得自己想办法，只要把北满能够维持好了，就可以存在，还可以收拾东北的大局。这是日本关东军在我从奉天动身回哈时，对我所说的。咱们的“比肩”就是吉林熙洽，他要求日本承认复辟清朝，我是不能同意的。据他（张景惠）的副官张书舫说，他与关东军的勾结，是他老婆徐芷卿的弟弟徐宝斌（号瑞廷）所交往的。奉天日本站开妓馆的新井（名我不知道），在“九一八”当时到张的家，约求张承认他是张的老朋友，他保险张的安全。当天晚上新井将关东军大佐参谋坂垣征四郎领到张的家，谈了两个多钟头欢欢喜喜地散了。只听张说，所说的条件，是承认与日本合作，即时回哈尔滨主要得办到。并且不要牵连上中东铁路，日本声称以南满为中心，决不扩大到北满，如果北满能够安静下去，张就可以作东北的首脑，这是他投降的头一步的情形。

张景惠谋夺东北政权的两面手法

1931年“九一八”在日本的主使下，张景惠从沈阳回到哈尔滨，利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地位，召开哈市所有机关团体和地方人士会议，以对付时局的名义，宣布组成一个东省特别区哈尔滨地方维持会，以负责保护特区境内治安和外侨特别是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开会时他替日本辩解，把日本制造的“柳条沟”事件[②]，说成是东北当局反日排日所挤出来的，要求机关团体军民保持沉静，不要扩大对日外交的纠纷，他说日本关东军决不打算进兵北满。同时他又说，回哈时在南满遇到罗振玉从天津持溥仪的信到吉林去联合熙洽，图谋清朝复辟，警告大家：熙洽与溥仪对东北必有阴谋活动。恐怕张学良难以再回到东北来，促醒大家应特别慎重来拥护他所提出的治安维持会，来与日本谋妥协，将来可能成立一个东北新政权，以继张学良之后。同时为掌握军政首脑的人心，宣布已派梁朝栋（曾当过旅长）到北京去请示张学良和张作相对日本的方针。他主张向张学良要求先派张作相回到东北，与他共同出头，对日交涉，实际他要谋夺张学良的东北军政长官的地位取而代之。

---

① 另一说，张景惠于1931年9月24日午后1时离沈返回哈尔滨。

② 应为“柳条湖”。

张景惠勾结日本的一个情节

张景惠1931年“九一八”后回到哈尔滨，表面上是为维持北满特别区的治安，以免牵连中东路与苏联发生纠纷，实质是他与关东军大佐参谋坂垣征四郎口头约定了一些盗卖东北领土主权的条件：

1. 关东军承认张景惠担任东三省军政长官；
2. 东三省独立自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东北自治，沿用旧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
3. 废除排日反日教育，实行中日亲善共同防共；
4. 东三省铁路在日本南满铁道会社指导下共同经营；
5. 奉、吉、黑三省的森林矿产由日本投资合办；
6. 承认日本在南满地区的附近七县（复县、盖平、海城、辽阳、庄河、岫岩、凤城），杂居和有权购买土地，并在杂居区日本有权设置日本警察、学校、医院、邮局；
7. 东三省军政机关设日本顾问，改编旧东北军队；
8. 东三省军政机关的经费暂由日本贷给，手续另定，日本有购买东北农产物和大豆的特权；
9. 关于上列各项实施时由张景惠与日本顾问协商后，请关东军认可后实行。

以上张景惠与日本勾结的事实，当他由奉天返回哈尔滨特区长官任内时，并未向任何人谈过。我所以知道他这个秘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11月初旬，日本方面与事变有关的主要人物来到哈尔滨地段街日本饭馆“武藏野”，宴请张景惠与他谈判颠覆东北政权的阴谋活动，只有张景惠一人出席，并无其他人参加。

那天夜里两点钟我在家中，突然接到张景惠的第七妾徐芷卿打来电话说：“长官从6点钟到日本饭馆‘武藏野’去宴会，到现在还未回来，你去看看怎样？”我答应她的要求，即到“武藏野”，我问张的副官张书航为什么还没完呢？他说，你到隔壁的房间去听听吧。于是我上了楼，日本下女把我引导到隔壁的屋里，我就听日本翻译松本益雄说你老竟回答不签字，坂垣说你老没有诚意。张说：“我们中国老百姓一听说某人与外国人签了字，就要反对，我答应了，就是说了算。假使就是我签了字，而不能实行有什么用呢，就是放上两把刀，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又听翻译转述坂垣的话：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办事的手续，将来你老就是东三省的头领，如果不把条件规定好，我没法子向日本政府去报告，请你老想想。我又听张说，东三省老百姓反日排日的很少，你们拿出钱来，帮助开发，都有好处，谁能不愿意过太平日子呢。所以我说他们若是听说我定了条件、签了字，倒把他们弄惊了，他们要是起来反对，可怎么办呢？你们信着我张景惠，咱们所说的这些事，我都能办得到。于是听见在坐的日本人互相地谈论起来。就听翻译说，坂垣说我们就谈到这儿吧，你老想想，明天坂垣也可以晚走半天，你老可不要后悔啊！张又说我没有什么后悔的，我这个岁数了，事情都摆着呢，你们诸位看着办吧。于是这场谈判就此中止。

张景惠拉拢马占山等的阴谋活动

1931年11月间他没有在出卖东北领土主权的密约上签字，日方对他非常冷落。当关东军在黑龙江省嫩江桥与马占山作战，他为恢复日本对他的信任，自报奋勇，派人诱降马占山，打算以马占山和奉天臧式毅的实力来抵制熙洽的清朝复辟的阴谋，来谋夺东北政权。

1931年乘丁超、李杜抗击熙洽的于琛澄军，他又约马占山到哈，提议共同抗击伪吉林军方面的进攻。

丁、李失败，他又限制丁、李的部队进入哈市。当日军多门师团侵入哈市，他率领哈市机关团体出迎，并约停留在呼兰境内的马占山到哈市马迭尔饭店共同招待多门师团长。另一方面，在“九一八”后，张作相派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等来哈设立临时吉林省政府，他以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借口，逼使诚允等把政府迁到宾县，而对宾县临时政府人员不加限制，任其自由活动。一方面派他的内务科长杨采章到吉林与熙洽进行联络，认可熙洽伪政权派员接办哈市的吉林省原所属的机关，如哈尔滨电业局、永衡官银分号、滨江县公署、滨江公安局水上公安局等。

对特别区的机关一再声明他为维持东北大局决不卖国。他用这种多面手法，在1932年3月换取伪参议府议长，马占山反正走后，他又兼任伪陆军总长。

张景惠帮助日本诱降旧军阀的一些情节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于1932年制造傀儡政权，组成伪满政府，在1933年日本为扩大侵略范围，关东军派遣大批军队进犯热河省，同时伪满政府任张景惠为讨热军总司令到锦县指挥伪满军，协助日本进犯热河省。在日本主使下，派遣他的旧部王汉相持信到热河去诱降热河省主席汤玉麟。

信的内容据张景惠说，他给汤玉麟的信，劝老汤投降，是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以他的名义拟的稿，由秘书卢元善译成的汉文经张景惠承认，派他与老汤相认的伪军政部军医科长王汉相。当王去热河省临行时，对王汉相说，信是我的名义，可是主意要老汤自己拿。据王汉相回来说，老汤接见他时，并没看信，即说：“张四爷（张景惠）是没有法子，让日本人套上了，你回去告诉他，我是不能再往里插腿的。”说完了这个话，起来就走了。王汉相不得要领，也就赶紧地回伪满复命，张景惠表现出很了解的神气，说老汤可鬼啦，我的信他不会听的，他自己有自己的打算，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虽然遭到汤玉麟的拒绝。而当时热河省，在日伪军的攻击下不能支持，终于陷落，军队溃散，汤玉麟在逃，这就给日本侵略祖国华北的阴谋开辟了道路。

1937年后日本侵入了华北，用分裂手段进行吞并中国的阴谋，急欲谋求一个得力的汉奸，作他的帮凶，关东军特派在九一八当时最活跃的大特务、陆军少将大迫通贞率领汉奸洪维国（伪满退职的财政部次长）、张燕卿（伪满退职的实业部长）等持张景惠的劝降信，到北京勾结旧军阀吴佩孚，进行组织华北的伪政权，给日本推行侵略祖国的

阴谋活动。

据张景惠说，他给吴佩孚的诱降信是伪满政府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向他提出的，信稿是洪维国起草，经张景惠承认。并说这件事，是洪维国鼓动的，洪打算把吴佩孚拉出来成立一个华北伪政权，他好得一个盗卖祖国主权的地位。又说吴佩孚死后，有一个“毕举人”名维垣别号辅廷，到长春同他说，在日本同吴佩孚谈判时，大迫通贞和洪维国等在天津《益时报》发表了吴佩孚与日本勾结的过程和内容，被吴佩孚当面将大迫、洪维国等大骂了一顿。张得意地说，吴子玉那个人可倔强啦，日本鬼子打算玩弄他，可不是容易事。

张景惠与张作相的私交和互相援引来保全个人的政治地位

据张景惠说，张作相在“庚子”后为族兄报仇，杀了人逃到辽河套一带，当了“胡子”，而后到台安县去投靠张景惠，因他无法安置，便将张作相推荐到在北镇县中安堡盘踞的张作霖处。在1904年张作霖与张景惠被奉天将军增祺收降，张作霖编为游击马队管带，张景惠为帮带，张作相为哨长，从此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辛亥革命，张作霖趁机而起，由奉天中前两路巡防管的统领，一跃而为奉天二十七师师长，而后赶走了奉天都督段芝贵，夺取奉天都督的职位，在1918年就任了东三省巡阅使，总揽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政大权；张景惠被任为奉军驻京总司令，张作相接任了二十七师师长，兼任巡阅使署张作霖的总参议。

1922年张作霖与曹锟争夺政权，发生了直奉战，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张景惠有亲曹的嫌疑，被张作霖免去奉天总司令的职务，避居在天津。张作相为保旧日的势力，请求张作霖的谅解，于1924年张景惠得以回到东北，与张作霖恢复了旧好。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张学良继承张作霖的政权，张作相为保持他们元老的势力，推荐张景惠充当东省特别行政长官。

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了东北，张景惠勾结上日本，又极力拉拢张作相，从北京回到东北，共同谋取张学良的政权，来干出卖祖国投降日本的阴谋勾当，由于日本采取利用溥仪的政策，张景惠拉拢张作相投降的阴谋失败了。

1941年张景惠为张作相谋求恢复被日伪夺去的财产，使蔡运升向日本殖民当局提议，要住居在关内京津的东北旧军政人物，回到家乡为伪满“庆祝十周年”，在日本殖民当局认可下，张作相、王树翰、米春霖、佟兆元等得以来到了伪首都长春，张景惠尽心竭力地给张作相在日本方面进行拉拢。张作相走后，日本将张作相的锦县财产土地交还了一部分。同时张景惠又为张作相谋求投降日本来找出路，如1944年日本已走到穷途末路，张景惠谋求日本起用张作相承担华北伪政权的首脑，他派秘书官松本益雄去日本东京找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与日本驻华北的军司令官高桥说项。又通知张作相派他次子张廷枢来伪，由他介绍伪满总务厅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关东军方面进行联络。1945年2月张景惠找我到天津去劝张作相父子，张景惠告诉我说：你到天津去一趟，告诉辅忱（张作相）事情快到根底下了，可不要计较地位高低，只要有个地位，能抓住机会弄一把子人，若是有了武力，将来鬼子倒了，可以弄个地盘才有出路，就是想回

东三省作点事，空着手也不行。我见着张作相把张景惠的意见转达后，张作相说：“四爷（张景惠）说的很对，可是华北的局面日本也是束手无策，咱们怎能也跟着扯呢，就是王荫泰请我当个参议，我都拒绝了，现在情况四爷他老不知道啊!”我回到长春将张作相的话一说，张景惠非常不满，说他这个软弱的人，真叫人没有法子，要不是他这样软弱，大元帅（张作霖）死后，他要肯接着干，不交给张学良，东北还不至弄到这步天地上。

（1962 年）

伪满期间的张景惠

金　名　世[*]

在九一八事变第三天首先叛国投敌

1931年10月我任熙洽所组织的伪吉林长官公署机要秘书，于10月27日我按熙洽的命令，到哈尔滨联络当时的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和代理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两人。我于10月28日在哈尔滨南岗花园街张景惠住宅与他会晤，据张景惠自己所说：在九一八事变那天，他正在沈阳住宅，于事变第二天，就有他认识的在哈尔滨做买卖的日本商人某（当时他已说姓名，我现在忘记）[①] 到他家告诉他，东北的局面变了，让他赶快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处接头。于是他就按照这个日本商人的指点，在第二天，就是事变的第三天就到板垣征四郎处，板垣当时表示很欢迎地说，你来的正好，并希望他对眼下时局谈一谈。而张景惠当时认为事体重大，从何说起？于是他只好奴颜婢膝地说：他愿意即回哈尔滨，担任保护哈尔滨的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绝对不遭受丝毫的损害。板垣征四郎说："那很好，希望你赶快回去。"接着张景惠说：他所管的警察兵力单薄，要求发给军火，以便扩充武装警察，以维持哈尔滨的"治安"。板垣征四郎当即答应批准拨给3000支枪，并告诉在十天后可到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大桥忠一处领取。张景惠叛国投敌与板垣征四郎勾结停当，他于该年9月24日就由沈阳回到哈尔滨。果在十天的左右，他由哈尔滨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手中领取3000支枪并附带弹药。他得到这批军火，当即成立伪东省特别区警察总队约3000人，并派他的亲信、东省铁路路警处副处长于镜涛兼任总队长，而作日本侵略的帮凶、走卒，张景惠就凭借这支汉奸武装警察以维持哈尔滨的所谓"治安"。在1932年3月伪满成立后，这支汉奸部队划归伪民政部警务司直接统辖，改称为哈尔滨游动警察队，仍由于镜涛任总队长，秉承伪总务司的命令，在哈尔滨地带讨伐武装抗日部队。

张景惠叛国投敌之活动

在九一八事变的不久，当时日本人在东北经营的大报，为沈阳的《盛京时报》、大连的《满洲报》，都载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奏议"，是说张景惠昏昏愦愦，为人易与，手下缺乏人才，容易驾御，大有可以利用之资。而当时的张景惠也未尝不认为自己

---

* 作者曾任伪吉林长官公署机要秘书。

① 即日本浪人新井，经营娼妓业。

的资历最深，人缘不坏，后起的东北人物未有出其右者。日本既一再声明只是打倒张学良的统治并无领土野心，张景惠认为将来如果换人，就地取材，则抱有舍我其谁之非想。所以他和板垣征四郎勾结后，为表示彼此的亲密，两人结为盟兄弟，更与日本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当时关东军部附、日本驻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长）也非常要好，并与他也结为盟兄弟。这两名日本人是当时关东军内部说一不二的强劲者，由于张景惠拉拢这两名强有力的日本政要，也就可窥知他愿作将来傀儡政权首领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了。非但此也，张景惠更应日本驻黑龙江陆军特务机关长林义秀所请，曾领他的伪警察总队作卫队，而赴齐齐哈尔一行，在表面上说，是维系当时的黑龙江省人心，但在骨子里究竟还作些什么勾当，则非局外人所能臆测的。不过按当时的情势，抑或为日本指使张海鹏攻取黑龙江省地盘，由于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马占山江桥抗战，致使日军和张海鹏的阴谋遭受挫折未能得逞。在这个时候马占山抗战虽然失败，但退驻海伦，在日本仍希望马如能投降，则黑龙江的局面容易收拾，故有林义秀邀张景惠到齐齐哈尔一行作为缓冲一面作用，拒绝张海鹏进入黑龙江；一面马占山如能投降以示可以归来，其或为此，也未可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只留一个星期就返回哈尔滨。在张景惠回到哈尔滨后，就极力拉拢马占山，劝其投降，他曾派遣马占山相认识的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王宇清往海伦劝降。当经王宇清数次到海伦的结果，则有马占山来到哈尔滨江北松浦镇与张景惠两人会面之事。所以马占山一度投降，固然是由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带领韩云阶来到海伦说降之所致，而实际上事前由于张景惠的勾结劝降大为卖力。至于张景惠之所以极力拉拢马占山劝其投降的原因何在呢？揣度他的心情则是一面对于关东军可以居功，一面为其自己幻想欲作为东北傀儡政权的首领则添一实力派羽翼，对自己说来是太为有利的。

任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长则喜形于色

1932年2月中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召集所谓东北地方实力派首脑在沈阳会议，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东北实力派的首脑，计有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伪黑龙江省长马占山，这就是当年宣传一时的所谓四巨头会议。但实际上参加这个会议的并不止此四人，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伪奉天治安维持会委员长袁金铠以及日本所委的伪奉天市长赵欣伯都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产生殖民地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不过这个伪政权产生的第一步，势必须由当地的实力派宣言独立、脱离祖国。故日本摆布的沈阳会议，第一步议事，就是成立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以便由这个委员会委员长、委员的名义宣布独立，脱离祖国。所以当时主持这个会议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提议由年长的地方长官张景惠任委员长，并仿照旧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惯例，由各省的首脑任委员，当经众无异议一致通过。于是臧式毅、熙洽、马占山都是当然委员，就这样由张景惠任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任委员，宣告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据熙洽开会后回来说，张景惠就任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长很是兴高采烈、喜形于色的，他与熙洽谈话曾说“能够如此维持下去，则东北的局面还是很好

的"，他并主张伪东北政务委员会目前应办的事情很多。殊不知日本的诡计，所要办的只是一件，这就是以委员长、委员的名义宣布独立，脱离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便作它下部文章，成立它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所以这个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即由各首脑汉奸所带随员们起草宣言宣布独立脱离中国。据我所知道熙洽的随员是荣孟枚和张燕卿，张景惠的随员是王宇清，马占山的随员是路之淦、赵仲仁，至于臧式毅方面则不清楚。随员将脱离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独立宣言文稿作成，由伪委员长张景惠取得关东军的同意，就用伪委员长张景惠，伪委员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四人的名义发表和向南京国民政府拍去电报后，则这个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寿命就寿终正寝，自消自灭了。张景惠所希望的由他常任东北政务委员长的幻想，只是一场春梦。当年熙洽在吉林曾谈论过张景惠对他所说的能够如此蝉联下去，则东北的局面也是很好的。张景惠说此话的目的是有两种用意的，就是一方面他表示愿作东北傀儡政权的首脑；而另一方面是他反对熙洽拥戴溥仪来作东北的"元首"。这话虽是当时闲话，但是以后证明果然是不错的。这就是1946年4月间在伯力郊外红河子收容所时，张景惠到我住的房里闲谈，他说要不是熙格民（熙洽别号）硬教老溥（溥仪）回东北作皇帝，苏联绝对不能逮捕咱们这些人的。当年要是由东北的政务委员会的名义蝉连下去，是绝对不会有现在的结果。他说此话时适有在伪满时他的亲信于镜涛也先来我的屋里闲谈，于乃对张景惠直言不讳地说，你老到现在还糊涂呢，谁让你老去当东北政务委员长，那是日本用你老的名义，教你宣言独立脱离祖国！你老说完这句话就算完了。即或教你老去当东北政务委员会长，苏联打倒日本能不逮捕帮凶吗？直说得张景惠默默无言，不欢而散。由此看来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确实有愿作傀儡政权首领的野心，这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

为虎作伥推行鸦片政策

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张景惠就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伪军政部总长，参议府是伪临时"执政"（1934年3月1日以后是伪皇帝）的咨询机关，也就是伪满的最高决策机关。在当时论阶级地位，除了伪国务总理，就是伪参议府议长，是傀儡政权的第二把交椅，所有伪国的法律政策，都是先由伪国务院制定通过伪国务会议（由伪国务总理、伪总务长官、伪各部总长出席），然后提交伪参议府并经伪参议府会议（由伪参议长、副议长和参议出席，政府方面由伪总理、伪总务厅长官和各主管部门出席）通过后，由伪临时执政（1934年3月1日是伪皇帝）裁可，而用"敕令"公布实行。所以在伪参议府未通过的案件是不能够施行的，在伪满洲国所公布的法律、政策都是本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的，所以没有一件不是危害东北人民的。特别是在"满洲国"成立的当时，关东军就认为鸦片是大利所在、无限的财源，一向又是弱种亡身、消灭东北人民的工具。不但广收特税、榨取金钱，并且以榨来的金钱去作镇压东北人民的经费（为伪军警的所谓讨伐费）。于是在伪满一开始，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任关东军参谋长，任内就决定实行这种以鸦片毒害东北人民的政策，遂命令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伪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伪财政部总务

司长星野直树等积极筹备大开烟禁、鸦片由伪政府专卖的工作。于1932年10月30日公布了鸦片法，于11月间又公布了鸦片法施行法，定由1933年1月实行。继之则又公布伪专卖公署、各地方专卖署以及各伪县旗专卖局的伪官制；并由伪财政部部长熙洽的名义指定当时的奉、吉、黑、热四省的鸦片批发人，更由当时伪奉、吉、黑、热四省长指定在该本省的鸦片零卖人。吉林省的鸦片零卖人一开始就指定360多人，每个鸦片零卖人准许开设鸦片零卖处一处。鸦片批发人须具有10万元以上的不动资产，及缴纳保证金5万元始能充当。鸦片零卖人具有5000元以上的不动产、缴纳3000元保证金，才能开所营业。并设置伪专卖公署于伪中央，任命姜恩之为伪专卖公署长，日本人某（姓名已忘记）担任副署长，掌管栽种罂粟、收集鸦片、运毒贩毒的勾当。更由这个伪专卖公署指定成立"大满号"和"大东号"两个大烟土庄，"大满号"是专门搜集伪满西部地区生产的鸦片，以伪热河省为中心；"大东号"专管搜集伪满东部地区生产的鸦片，设置于哈尔滨。更设置伪专卖署于各大都市，伪专卖局于各县、旗掌管鸦片毒害的勾当。

由于鸦片专卖先设其指定鸦片零卖人1800余人，到东北地区无论都市城镇和乡村到处都有鸦片零卖所开灯供客，在各大都市的鸦片零卖所望衡楼宇如同林立，大开以往的烟禁，广阔吸食鸦片之门，致使原来无鸦片烟瘾的而到零卖所抽烟取乐者络绎不绝，因之零卖所之门庭如同闹市，更因政治黑暗，女子无生活出路，有了零卖所，则青年女子为谋生而到鸦片零卖所里充当女招待者不知有若干万人。

从鸦片零卖人开行营业时起，就由伪专卖公署印制鸦片吸食证，发交伪警察机关推销，不论男女老幼、以前有无鸦片瘾的人，都可领取吸食证，每一张吸食证收费五角，三个月更换一次，只要领有吸食证，就可到鸦片零卖所吸食。而不愿到零卖所吸烟，还可买零卖所的鸦片在家吸食。因之使东北人民新染有鸦片烟瘾的人成千累万，逐日增加不已；在另一方面，因大开烟禁、实行毒害政策，则由1933年开始大量栽种罂粟，由伪政府公告，凡愿意栽种罂粟的人须向本管县署请领栽种罂粟执照，同时缴纳许可栽种特税每亩地五元，至于栽种区并无限制，也就是伪满境内到处都可。对于个人栽种的数目起码是一亩地，多则自便。这就是日伪当局为多收特税，多得鸦片，以遂其榨取金钱和毒害东北人民的侵略政策。每年到收割鸦片的时候，则由伪经济部发表本年度的收买价格，而名之为指定价格，这种指定价格是极低的；按照地的等级定出烟多寡，须将所收的鸦片尽数卖给伪专卖署，否则就是私藏私卖，都是有"罪"的。当因收割不足出烟的数量，而被搜翻到刨炕洞子、扒烟筒的被害事件是不知有若干起的。

在这种毒害政策实行数年之后的时候，在伪满境内到处都可看见罂粟花的开放，所以在1937年因之招来当时的国际联盟对日本的责难。这就是因为当时的国际联盟曾经有"拒毒公约"，不许在殖民地栽种大量毒物毒害殖民地的人民，而日本帝国主义竟违背这种公约在伪满栽种大量罂粟毒害人民。于是日本为避世人耳目和国际的责问，则不得不改变主张。这时适由张景惠任伪国务总理大臣，星野直树任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乃制定出鸦片十年断禁政策，以欺骗世人，逃避国际的责难。同时并成立伪禁烟促进委员会，由张景惠任会长、星野直树任委员长，更由星野直树对外广播大吹大擂说什么从1938年起，"满洲国实行鸦片断禁十年政策，逐年减栽种罂粟面积，到第七年的时候就

完全不许栽种了，对于鸦片瘾者则分期戒除，到了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所有鸦片瘾者全部戒除完了。”企图以此迷惑视听，逃避责任。并由当时的伪总务厅次长兼伪禁烟委员会理事长谷次亨到各伪省作欺骗宣传，好像煞有其事，而其实际一面成立伪禁烟总局于伪中央，任命袁庆濂为伪禁烟总局长，日本人某（姓名忘记）[①] 为伪副局长，于各伪省、市、县、旗都置禁烟科掌管鸦片毒害政策。更因伪禁烟总局成立，则收以前鸦片零卖所一律改归官办，由各市、县、旗直接经营管理，并于伪禁烟总局成立的当时就实行鸦片瘾者的登录，更根据“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将栽种罂粟地域化散为整，由伪国务院指令只准伪热河省和兴安西省栽种罂粟，其他地区一律禁止。这一作法，实际是盗用禁烟美名，而加强了栽种毒物、贩卖毒品的工具，也就是强化毒害的密网，打算长久远地毒害东北人民。

总而言之，自伪满成立，日本实行毒害政策 13 年的期间，使东北人民染有鸦片烟瘾者，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就有 270 万人之多（1944 年伪禁烟总局调查鸦片潜伏瘾者），因鸦片、吗啡、白面中毒而死亡的竟达 17 万人。实行毒害政策是与日本当时执行确立治安政策、镇压屠杀我们爱国志士和无辜人民，两者是明枪、暗箭双管齐下，并无轩轾的。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鸦片猖獗，张景惠为伪议长，以后更任伪总理，罪无可恕。

十年傀儡宰相的张景惠

1935 年（伪康德 2 年）5 月 21 日，张景惠由参议府议长继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大臣。他鉴于郑孝胥在长春大和旅馆宴会席上曾说满洲国如同襁褓的小孩，势必需要父母抚育照料，始能长大成人，到了自己能够行走，学了知识，父母就应撒手，使其自己发育壮大的一片话，招致关东军的不满（据说当时的关东军花谷参谋反对最力，由他要求军部最高当局立即命其辞职下台），所以张景惠当了伪国务总理大臣后，鉴于前车之失，则更是缄口不言，遇事伪总务长官怎样说就怎样办，甘作驯顺的羔羊，任凭日本人的摆布。据我所知，张景惠为人平凡，向无主见，纯是人云亦云之流。在伪满时日本所要办的事情，都是振振有词，在张景惠听之易为所动，好似应当这样做的，日本也就是利用他没有骨力主见、易于听命，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所以选择他充当伪国务总理大臣。

郑孝胥因为在宴会席上的一席讲话，丢官罢职，当时大发其牢骚，他作诗说：“今日辞官去，宛似碎玉斗，营营鼠穴中，无论谁与某”。因为他作了这首诗，则更招来曾任溥仪秘书长、时任伪参议院参议胡嗣瑗作诗质问有“撞碎玉斗是何辞”之句，因之胡、郑两人又打起笔墨官司，卒因郑孝胥最后答胡质问有“效惹时流起恶声”之句，认错服输而罢。郑孝胥接到令他自动辞职的知会，还硬着头皮推荐什么后继内阁，举荐伪间岛省长蔡运升为伪国务总理大臣，伪滨江省长吕荣寰为民政部大臣等等，要求尚须

① 1939 年 12 月 27 日成立的伪禁烟总局，局长为袁庆濂，副局长为冈田文雄，日本米泽市人，庆应大学毕业，历任中国海关帮办，1937 年任安东税关长。

相当时间，他就辞职交代，这就表现他驽马恋栈的可鄙了。

张景惠于1935年5月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后，即于该年秋季开始作他的新任初度巡视，先后到各伪省视察。在这个时候伪满已把东北原来的辽、吉、黑、热四省在头年冬即1934年（伪康德元年）12月1日，进行所谓改革地方行政区域，划为奉天、安东、锦州、吉林、三江、间岛、滨江、龙江、热河、黑河十个伪省，并由葆康任伪奉天省长、王兹栋任伪安东省长、徐绍卿任伪锦州省长、李铭书任伪吉林省长、金名世任伪三江省长、蔡运升任伪间岛省长、吕荣寰任伪滨江省长、孙其昌任伪龙江省长、刘梦庚任伪热河省长、钟毓任伪黑河省长。日本在1934年12月所以要改革地方行政区域的主要原因，就是它认为旧省区域太大，省权过重，办事迟缓，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划为小省区，则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各种侵略政策，容易渗透，能以彻底执行，这是它改省的根本目的。在张景惠初度巡视，他认为新设省的伪三江省特别重要，故于10月上旬带领他的简任秘书官吕宜文、日本人秘书官松本益雄和随从副官张书舫以及伪国务院的随行人员等一行，首先来到伪三江省城佳木斯视察一切。这时适我任伪三江省长，伪三江省管辖桦川、依兰、方正、通河、凤山、汤原、富锦、绥滨、同江、萝北、抚远、饶河、宝清、勃利14个县。张景惠以伪国务总理的身份曾召集伪三江省职员以及驻佳木斯的各机关首脑对之讲话，他说：三江省是国境省份，地势重要，与苏联仅一江之隔，对于“防共”十分重要。至于所辖各县土地肥沃，有待开发，是将来开拓的重点地方，希望在此地供职的官吏务要努力建设“乐土”，这是前途最有发展的新省等语。他在佳木斯滞留数日，曾拜访日本军司令官镰田少将，并招待日本军方和驻在领事等人，始返回伪国都“新京”。

在张景惠来视察的时候，伪三江省已有日本武装团移民团三处，就是：依兰县的湖南营、桦川县的永丰镇（日本改称“弥荣”）和饶河县的团山子武装移民团。三处武装移民团都是日本驻佳木斯陆军特务机关长陆军中佐东宫铁男办起的。在日本统治时期日本开拓民都称东宫铁男为开拓之父，而东宫铁男则自称三江渔父。张景惠说“开拓重点的地方”，即系指此。

由于伪满的改省，日本认为伪满的治安已经确立，让张景惠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则更认为殖民统治已上轨道，所以它的侵略政策着着进行。其最大侵略计划，就是实行所谓开拓政策。把日本人由其本国向东北移入，以“主人”身份开发满洲，以实现其拓土野心。自从1932年伪满成立后，日本就成立办理向移民的两个大会社，这就是满鲜拓植会社和满洲拓植会社。满鲜拓殖会社最初设于沈阳办理朝鲜人移入的事务，如在1933年和1934年由该会社强行收买旧东边道区的土地，而移入朝鲜人。在我的家乡新宾县，我所知道的实例，有我亲戚王某当时有地400余垧，半是水田稻地，半是旱田，是既耕多年的好平地。当经满鲜拓殖会社强行收买，给以最低的价格，水田稻地每垧只给40元，而当时市行则是600至700元。关于既耕好平地每垧则只给20元，当时市场则每垧是400元。强行收买后，立即赶走原住农民，而造成破产亡家、流离失所的惨状。

满洲拓植会社设于伪国都“新京”（长春），专管移入日本人的事务。在1935年的夏季，也就在张景惠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后，关东军参谋副长板垣征四郎在日文报纸上

（满洲日日新闻）发表正式谈话，言说日本的开拓政策预定向满洲移入日本开拓民500万人，以20年完成这个“事业”。对于移入满洲的日本人称为“开拓民”，它的用地则称为“开拓用地”。关于开拓用地在原则上是购买原野和池沼地等等。他的谈话不久，满洲拓植会社即由日本拓务省次官坪上贞二任总裁，就更进一步强行收卖土地。在1937年7月伪满中央机构改革成立伪产业部（后改兴农部），继之更设置伪开拓总局，算是伪兴农部的外局，结城清太郎任伪总局长旋又调总督府局长，稻垣征夫继结城为总局长，在伪开拓总局长专管移入日本开拓民的业务和强行收买开拓用地。更于1938年，又合并满鲜拓殖会社和满洲拓植会社，由日、“满”两国双方出资合办，改为满洲拓植公社并由陆军中将二宫重治为满拓公社总裁。

随之更成立实行开拓政策的最高权力机关——日满开拓委员会，是掌管移入开拓民数量，强行收地若干的决策机关。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由历任关东军参谋长兼任的，由伪满历任开拓总局长为干事长，日“满”双方各置同等数的委员，日本方面的委员是历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日本驻伪满全权大使馆首席参事官、日本关东局总长和其他；伪满方面的委员是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伪兴农部大臣、伪经济部大臣、伪外务局长官，临时委员一名由历任伪新京特别市长充当。自从满拓公社和日满开拓委员会成立，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紧移民，每年都有大批日本人移入东北。特别是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买土地，撵去原住人民。当时的名义号称购买原野和池沼地，而其实际强收既耕熟地，最小限度也有500万垧以上。例如当时吉林省的桦甸县全县共有既耕熟地约近20万垧，只桦树林子一村5万垧未被强行收买，其余一概认为开拓用地，都以低价霸占，撵走原住中国人。其结果因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所谓开拓民未能前来，致使土地荒废。当时伪满既耕熟地统共有2000万垧，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强行霸占大量原野、池沼地外，还霸占农耕、熟地约在四分之一以上，而撵走原住人民不下约5万之多，造成破产亡家、流离失所，走上死亡道路的不知有多少人。

这种出卖民族利益、危害东北人民的痛事，都是1932年9月15日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和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首任全权大使武藤信义签定的日满议定书中附件所规定的。关于日满议定书的附件，熙洽曾说只有溥仪和郑孝胥两人曾看见过，和知道其中的内容，此外别人只知道有这个附件，但内容为何，谁也不详细，熙洽说此话时是非常愤慨的。所以在伪满时对于准许日本向东北移民，是由何人签字，谁也说不清楚。有的说吕荣寰在伪产业部大臣位时，1938年曾到日本视察，他在东京广播电台讲话欢迎日本向东北大量移民，因而说是他和日本签定的。其实不然，他仅是趋时的小人，而真正订协定和签字的是溥仪和郑孝胥，这也就说明了溥仪所以任伪满执政皇帝，郑孝胥之所以能够任伪满的首任国务总理是有由来的。

在张景惠任伪国务总理大臣期间，日本为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直接统治，以便实行它的各种侵略政策，曾于1937年7月将伪满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大加改革，把伪中央原先的民政、军政、财政、外交、文教、司法、实业、交通八部，改为民生、治安、产业（后改兴农）、经济、司法、交通六部，取消以前的外交部，而设外务局置长官，取消以前的文教部而置学务司隶属于伪民生部。原先只有民政、军政、财政、文教四部设置的汉奸次长，其余四部原无次长，经过这次的改革，取消以前的汉奸次长，而各部一

律设日本人次长。伪省则取消以前的伪总务厅长而新设日本人省次长，更添设伪省长官房，置四科五科不等，各厅官房、各科除了文书科长外都是日本人，各伪县则改原先的日本人参事官为副县长。因此就加强了日本人的直接统治，尤其对于公事行文原则概用日本文，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直接命令各伪省次长，而各伪省次长就直接下达于各伪县副县长，致使当时各伪县的事情有的业已举办，而伪县长尚不知情。

由于加强了日本人的直接统治，也就加紧实行日本的各种侵略政策，除以上所说的所谓开拓政策外，还有“北边振兴”、“经济统制”、“粮谷出荷”等等。所谓北边振兴政策就是奴役东北人民，强征“劳工”从事修筑北边国境线的军用道路和要塞堡垒，准备对苏联的进攻侵略。被强征的劳工由于劳累过度，加之食宿太坏，感染疾病而死的，约在百分之五以上。特别是修筑要塞和保垒，当年传说有的地方修筑完了，日本为军事保密，曾将强迫劳工集合于山谷和草地用机枪扫射全部杀害，以灭口。这种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痛事，及今追思，犹使人发指不已！

实行经济统制摧毁了当地人所经营的工商业，而肥了日本的商人，当地人所办的工厂和店铺纷纷倒闭，因之造成市面萧条，民生困窘。这种苦不堪言的滋味，是过来东北人所深尝的。因所谓违犯“经济统制”，而被拘捕处罚的人，是如同恒河沙数，无法统计。

特别在张景惠任伪国务总理后，日本从1938年起，就开始掠夺农产物。由伪满政府公布“粮谷管理法”，实行什么“粮谷出荷”制度，规定每年所掠夺的粮谷数量名之为“割当量”。这种割当量系根据日本政府的“物动计划”而定，由伪兴农部执行。在每年春季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召开伪省长会议一次，发表各伪省本年度的粮谷出荷割当量。这种粮谷出荷割当量一经发表，无论如何必须完成，就是不给农民留食粮和下年的种子，也必完成所规定的割当量。当年为完成这种割当量，曾在伪中央设置农产物出荷督励本部，由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日本人）任督励本部长，到了粮谷出荷时期，由他亲到各伪省督催粮谷，省、县、旗都设置各该级的农产物出荷督励本部，省农产物出荷督励本部由伪省长和省次长任部长和副部长。当年各伪省就本省的地域大致都是分为四个地区，由各自厅长任督励班长，担任一个地区的粮谷出荷督励责任。各县旗农产物出荷督励本部，则由伪县长、旗长和副县长、旗参事官任部长和副部长，县旗之科长则任督励班长担任向各村要粮谷的责任。

这种粮谷出荷割当量，逐年增大数量，由1938年一开始的600万吨，增大到1944年的920万吨，当时伪满政府更认为吉林省是谷仓地带，担当粮谷出荷数量最大，也就是一开始的120万吨，而增加到1944年的190万吨，是为粮谷出荷最大的省份。

由于日本将农产物掠夺搜罗殆尽，致使农村经济破产，而造成农民缺衣少吃、啼饥号寒的惨状，致有18岁的姑娘冬季蹲草囤子的惨事！真是东北到处有啼痕！试非后人所能想象的。更特别是1943年因为这年“雨顺时若”就是所谓风调雨顺吧，自然造成年景丰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伪满的代表人物如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认为有机可乘，乃巧立名目，说什么的年茂丰收，应当实行“报恩出荷”，于是由他唆使伪协和会制造“民意”，说年景丰收因有余粮，农民愿意自动“出荷”，张景惠竟顺水推舟不加辩驳，所以在已经完成该年所掠夺的850万吨粮谷外，又追加“报恩出荷”50万吨。

我当时任伪吉林省长，于是伪吉林省又摊了10万吨。

1942年是伪满成立的10周年，日本为欺骗世人，夸耀它的殖民统治，遂使伪满政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在这年的3月1日由伪皇帝溥仪颁发诏书，称日本为“亲邦”，他的诏书中有“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的辞句，表现伪满和日本亲密的关系，从此以后就改了历来称日本为“盟邦”的字样，而称“亲邦”，这就是历史上有称“儿皇帝”的花样翻新。在称“亲邦”的3月，溥仪派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特派谢恩大使，携致裕仁的亲书到东京向裕仁表示谢恩。

这封亲书在溥仪自称“朕”字后系小写的，当时熙洽向我说这是自从秦始皇称朕以来的奇耻大辱。我当时听之解嘲说好，好在还未写儿皇帝。这虽是过去一件小事，但是伪满的掌故，外人鲜有知者，并可说明傀儡政权是如何的卑鄙龌龊了。张景惠是携带这封亲书到东京奉呈裕仁的，不过在伪满和在苏联时他都未向我提说此事。

在这年伪满庆祝所谓建国10周年，而“反共和平建国”的大汉奸汪兆铭（汪精卫）曾以伪国民政府主席带同他的伪参谋长杨揆一、伪外交部长褚民宜等，于5月上旬亲来伪满，向溥仪祝贺，因为这两个人伪政权都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走同一路线，所以“獐子不要笑话狍子没有尾巴”，自然是气味相投的。汪兆铭备受伪满的盛大欢迎和“国宾元首”的款待，在双方谐和尽欢中而完成了他的傀儡任务。

汪兆铭走后，当即发生“答礼”问题。据当时熙洽对我说，关东军曾教伪宫内府御用挂、日本陆军中将吉岗安直秘密征求他的意见，拟由他以宫内府大臣代表溥仪到南京“答礼”，而熙洽当时表示赴南京是可以的，但是到南京后是不能参谒中山陵的。因为这种缘故，遂派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特派“答礼”使节前往南京“答礼”。我当时任伪新京特别市市长，为地方文官的代表，伪陆军上将、第一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为武官的代表，一同派为“答礼大使”随员。

张景惠于6月6日带同我和邢士廉以及伪外交部大臣韦焕章、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结城清太郎，同关东军所派的随行者小尾中佐等，由长春乘火车到大连，第二日改乘飞机到南京，张景惠下榻于汪政权的迎宾馆，我同邢士廉、韦焕章等则住“首都旅馆”。于6月8日上午9时，由伪汪政权接伴员褚民谊等伴同张景惠及其简任以上的随员一同到伪国民政府大礼堂，由伪政权的文官长徐苏中和参谋长唐莽笔两人出席招待，在10点钟举行答礼仪式后，由褚民谊等的伴同往紫金山中山陵参观。正午由汪兆铭在他的伪国民政府设宴款待，所谓答礼完成，在该日的下午4时汪兆铭以伪行政院院长名义，又来到迎宾馆回报张景惠，并作一小时的会谈。6月9日午后2时，汪兆铭又联名在北极阁招待，于10日晚5时褚民谊以伪外交部长名义设宴欢送，11日早8时张景惠带同我等一部分随员由南京乘飞机回到大连。

当6月8日致答礼之辞时，张景惠因为年龄的关系，精神骤然紧张，两手颤动不已，把手中所持的书面答辞堕落于地，被他的简任秘书官松本益雄很快地拾起递给于他接着照念，总算是不差地完成了“答礼”使命。可是天下事无独有偶，当张正念答礼辞时，韦焕章手中所持的礼帽因为一时失慎也堕于地上，由他自己猫腰拣起，不免为出使的小纰而美中不足了。

总之张景惠没有骨力主见，这是他一生短处，而日本也就是利用他的这种短处，易

于听从命令，才选他充傀儡政权总理大臣。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伪满垮台，于该月 30 日在长春我和他一同被苏联红军逮捕转移到赤塔，以后转移于伯力。在 1946 年的夏季苏联内务局曾问他到东京开大东亚会议时，所说都是什么，让他再讲一讲，他说他当年所说的话都是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日本人武部六藏所写的，由他的日本人秘书官松本益雄翻译成中国文，在他往东京去的前夜才翻出来。第二天到东京后他在旅馆练习熟练，开会时照念，现在已不记忆了。苏联内务局认为他不说实话，而把武部六藏找去对质，武部六藏承认是由他代作的，在他临行的前夜才翻出，一点不错，并说，他（张）根本上是没有责任的。苏联内务局才明了伪满的高官纯粹是傀儡牌位，因此才不追问了。所以张景惠在伪满任国务总理大臣十年，对于日本所实行的各种侵略政策，伪总务厅长官怎样说就怎样办，他为了保持其个人的身家性命财产是毫不加以辩诘的，因之才维持了直到伪满垮台，这是他的事实。古人说“庸人误国，甚于奸人误国”。张景惠投敌叛国任伪总理大臣十年，误尽东北人民不浅！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自然有他历史上严重罪恶，那是不用细说了。

（1962 年）

关于张景惠的回忆

高丕琨*

小　　引

笔者从1941年（伪满康德8年）11月起，调充伪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官，至1945年4月，封任伪九台县长止，担任伪总理张景惠（下简称张）秘书，为期将满四年。早在1932年（伪大同元年）冬，以于镜涛介绍，曾与张有一面之识。此后，在官场中，虽时常相见，但几乎都是在我认识他，他不认得我的情况下，一晃而过。

伪满官制规定，关于大臣、省长的秘书官（荐任），可由本人自荐特别任用。而我是由第三者介绍，通过互相同意而调任的。所以我和张的关系，是若有若无，不过泛泛而已。

张还有两个秘书，一个是日本人松本益雄（简任）总揽秘书的一切事务，另一个是一直相随的副官张书舫（字锦涛、荐任），担任张的身边一切事务。松本和张书舫不在的时候，他俩所任的事务，都须我来做。另外，我负有一项专务，那就是：1. 翻译伪总理的讲话、致词、训词稿，原稿是日本人起草的；2. 撰写一些不关重要的致词、讲话、祝词等；3. 关于伪总理的宴会事务及其他，如伪总理所读稿件，事先由我缮清交他过目试读等事。

我这个秘书，不是靠私人关系上来的，正合乎我不善溜须拍马的特性，自然不用低三下四。但我却也尽到了毕恭毕敬、谦虚谨慎、有事必办的责任了。自我当了张的秘书后，在朝夕相处中也逐渐熟悉了。有时，张也和我唠些闲嗑，或让我为他办些私事。他夫人是伪全国妇女会长，也托我写过讲话、广播稿子。长此以往，在不知不觉中，和他公馆的上下人等都很熟了，仿佛有了瓜葛。除他公馆的副官和当差的人多，不暇枚举外，兹须一提的是梁禹襄（字芬如、福建人），他历充旧中国丰润县知事、察哈尔省政务厅长、东省特区长官公署秘书长、伪滨江省教育厅长等职。年老退职后，任伪国务院简任待遇嘱托；充张的私人秘书，文笔超众，有文章司马之称，追随张多年，素为张所器重。他和张书舫二人常与我谈及张的往事，对于我写这个材料帮助良多。有些事情是听于镜涛先生讲述的。

当时张有夫人二人，夫人徐芷卿，原系张的第七夫人，京剧演员出身，生有子女各一，男名张绍纪，当年二十多岁，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擅长俄语。女，小名冬儿，当年六岁。如夫人，原系张之第六夫人，为张之同乡女子，生有男一，名叫张绍兴，当时

---

* 作者曾任张景惠的秘书。

八岁。

我以为关于张景惠之一切，对于了解日本侵略统治我东北时期的历史不无小补。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意，取为殷鉴，反省自遣。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意图。不过，张景惠的事情，涉及面广，错综复杂，扯一牵百，千头万绪。尤其印象模糊，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手下缺乏参考资料，只能凭记忆，东鳞西爪，片断地写出来。老而善忘，何况将近四十年以前的事，更不可能期其完整。好在这些都是我耳闻目睹的，敢说还可以保证有一定真实性。

一、张景惠的出身

有人说张景惠是个大老粗，不识字，是豆腐匠出身，当过胡子。我现在来答复这些问题。据说，张景惠从小没有正式上过学，由于自学，粗识几个字。我听他在估计时间时说过："这时候是歇头气的时候了。"无意中透露出他当年种地干活时的情景来。他家开过豆腐房，他做过豆腐，这是不错的。

青年时代，他在老家辽宁省台安县联系一伙人，为人"保险"，保护豪绅搬粮送款，从中索取保险费。这伙人以后当了地方的自卫团。他是个"要人的"，凡地方上的大事小情、官民之间的联系，都缺不了他。人都称他为张四爷，非常吃得开，是个风际人物。

当时另有个叫张作霖的，为其父报仇杀了人，在海城呆不下去了，来到锦州一带。还有一个叫张作相的，老家锦县，为其兄报仇杀了人逃出来。二人结伙当了胡子，窜到台安县，常和张景惠串连，三人气缘相投，结了把兄弟。以后新民府府尹增韫（字子固，蒙古族）收编了这伙人马，让张景惠当管带（武官，相当于营长），而张不肯干，推张作霖当了管带。张作霖颇有才干，在官场中，施展一切本领，极尽活跃之能事。由清朝经过辛亥革命，步步青云，扶摇直上，当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独霸一方，最后到了北京，作了大元帅，其名烜赫于长城内外，几为一时之雄。张景惠也跟着张作霖出了名，这就是张景惠出身于绿林的由来。张作霖由管带到大元帅，可谓极尽人间之显贵，按理说应当提拔增韫。可是，张作霖因为增韫跟他要过钱，所以极端看不起增韫，一次也没有给他一个官儿做。及至张景惠当了伪满大汉奸，方给增韫一个伪参议之职，每月薪金 1300 元伪币。传说这是张景惠对增韫的报恩。

二、张景惠的一些旧社会关系

张作霖之所以常派张景惠为其代表与其他军阀间办交涉的原因：一则因为他俩的关系密切，二则以张景惠素负东北能言之士的盛名；三则认为他有过人的胆略。旧中国军阀相互间的斗争，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操纵，换言之，军阀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工具。安福系代表人物段祺瑞为开内战，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商妥用西原借款购买大量军火，在运到天津与山海关之间时，被张景惠截夺到奉天（沈阳）。当张景惠谈起这段经过时，眉飞色舞，颇有不可一世之概。在周密森严的戒备下，不费吹灰之力，

如囊中取物，挥手即得，这不能不说是张景惠的杰作，所以张作霖认为他胆略有过人之处。奉直间有过两次战争。关于奉直的交涉，奉方代表也是张景惠，张景惠素仰吴佩孚的为人，用他的话说，“吴帅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汉，不怕死，不爱钱”。他在和吴佩孚的往来中，曾惹起张作霖左右部分势力派的物议。张景惠以为人言可畏，也有戒备，所以在一个时期内谢绝任职（这是跟随张景惠多年的副官张书舫对我说的）。第一次奉直战争，以奉系失败而结束。第二次奉直战争一开始，吴佩孚即以优势的兵力，攻到山海关。在关键时刻，冯玉祥却倒了曹锟的戈，通电与张作霖和平合作，逼得吴佩孚不得不向洛阳一带退却。吴失败后，几经挫折，与孙传芳联合后，才又回到北方。可是，冯玉祥在北京将曹锟软禁。冯奉合作，段祺瑞出来任临时执政。不久段垮台，冯又被奉军驱逐，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会面。于是张作霖与孙传芳、吴佩孚妥协，形成了暂时相安的局面，这与张景惠从中奔走是有关系的。本来军阀间的战争，不是由于彼此有不可解的仇恨，他们的互相勾结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是出于利害关系，互相利用，互相排斥的。所以既可以倒戈，又可以惩杀。如冯玉祥倒戈曹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褚玉璞杀毕庶澄，蒋介石杀韩复榘，这都是同伙、上下级关系的相互排斥和残杀的类型。至于各军阀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奉直战也可以转为奉皖战，蒋介石可以联合张学良灭张宗昌，张作霖、吴佩孚也能联合起来，再打讲和的冯玉祥。这些军阀的混战，涂炭遭殃的都是中国人民。

在 1926 年张作霖到北京，组织军政府作了大元帅，这是张作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代，也是他大崩溃的前夕，张景惠在这个时候的潘复内阁中作了实业部总长。好景不长，1928 年，张作霖不得不退出北京。日本帝国主义在皇姑屯将张作霖炸死，当时张景惠同车离开北京，所以也遭到轰炸，却昏而未死。

三、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景惠

张作霖生前对于杨宇霆言听计从，并畀以重任。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以杨、常（杨宇霆、常荫槐）有谋叛行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加以处死。以后，又迎蒋介石的特使吴铁城，商谈东北全域挂青天白日旗的条件，议成。张景惠对张学良的这两个重大决策，给予了积极支持。南京政府特任张景惠为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兼南京军事参议会议长。这是蒋介石对张景惠的依重，也是小张对其盟叔的崇敬。至九一八事变，张景惠仍任此职。在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曾对其亲近表示，张学良不该将东北弃而不顾，长期住在关内，因此，日本欲接近张学良，老摸不着边，这也是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之一（张景惠自认为是原因之一）。当时，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曾派人见张景惠面谕，要他善自敷衍日本，以图后事等等。适张景惠为苏军逮捕，抑留在伯力收容所，他常对于镜涛等人，骂“蒋介石不讲信义、没有良心，问问蒋介石，他派的宋某人都跟我说什么来?”于镜涛说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临死前，因此事还骂过蒋介石。原来，张景惠与蒋介石也有过密约，搞什么所谓“曲线救国”的勾当。张景惠是风际人物，随波逐浪，模棱两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参加过日本策划的种种活动。现在我们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还可以看到张景惠以东北政界的代表身份，出

迎溥仪来东北的场面。这虽然是日本人的操纵，而张景惠却是一厢情愿了。但有的日本人还嫌他作的不够忠诚老实。我在于镜涛和大桥忠一（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曾任日本外务省次官和伪满的外交部次长）的一次谈话中，就听大桥说过张景惠是老奸巨猾。言外之意，对张景惠不甚信任。

究竟，为什么日本会看中了张景惠，说他是好宰相，夸不绝口，而始终没有撤换他呢?

我先描绘一下张景惠的为人：

（一）表面上温顺、老成、持重，不骄不狂，寡言，不轻举妄动，能逆来顺受。

（二）资格老，阅历多，历任要职，为张作霖的把兄弟，东北的元老，当过陆军上将，封为镇威将军，旧中国形形色色的老人物，他认识的不少。

（三）老奸巨猾，见机行事，既不得罪人，也不亏待自己。对好坏人也能辨别，但不能决然对待。所以当时有人说他是“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除”。这虽是一句讽刺话，却打中了他的要害。

再通过他的所作所为，即通过现象，看他的本质。伪满洲国成立后，马占山毅然归正，张景惠继任为伪军政部长，一人而兼三职，即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伪参议府议长、伪军政部长。迨其专任伪参议府议长后，殷勤谨慎，圆滑不倔，凡事听指挥，处事灵活。因此，颇受日本主子的赏识，所以一跃而为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后又封为将军府将军。

四、伪官吏的分类

伪上层官吏，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在旧东北系中，又可分熙洽派、奉天派、黑龙江派及无所属派等小系别。姑不论其小，兹分其大者如下：

（甲）属于溥仪系派的（包括清朝的遗老）：

溥杰、润麒、荣源、金壁东、金名世、宝熙、郑孝胥、郑垂、郑禹、罗振玉、罗福葆、胡嗣瑗、修济煦、商衍瀛、袁金铠、沈瑞麟、谢介石、齐穆特色恩伯勒（齐王，蒙古族）。

（乙）属于旧东北系派的：

臧式毅、熙洽、张景惠、张海鹏、蔡运升、孙其昌、冯涵清、于琛澄、于芷山、王殿忠、邢士廉、张燕卿、荣厚、阚朝玺、吕荣寰、李绍庚、李铭书、修长余、张文铸、于镜涛、尹祚乾、朱榕、葆康、韦焕章、郭恩霖、姜全我、白铭镇、阮振铎、黄富俊、徐家桓、张焕相、丁超、王贤沣、张联文。

（丙）由日本人关系上来的：

于冲汉、赵欣伯、丁鉴修、韩云阶、阎传绂、卢元善、谷次亨、于静远、吕仪文、马冠标、王子衡、王秉铎、曲秉善、王庆璋。

以上所列的仅仅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伪满洲国各机构中，都任过厅、处长，总局长、银行总裁或司令、警察总监以及省长、大臣、参议级的高官。这一群伪官吏是傀儡。但有生命的木偶，又各具其个性，不一定什么都听从使唤。所以日本人在操

纵上，确实也煞费过苦心。如臧式毅最初不肯甘为亡国奴，在日本宪兵队曾挣扎了一个时期，不管怎样，还是下水了。如熙洽则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交易。也有像张焕相那样的情愿远道归来，向往当汉奸的。据说丁超、谢文东之流，是在山穷水尽进而投降的。惟有张景惠，以无所为而为，不党不群，积极地投靠帮忙（这是日本重视张景惠的一个主要因素），自始至终，日本信之而不疑，张亦当之而无愧。人皆称他为铁杆汉奸，这说的是老一辈的汉奸。至于小一辈的汉奸走卒，更不知道还有祖国，都是可耻而又可怜的了。

五、伪总理的日常行事

1. 批阅公事

（1）国务院总务厅内设有官房（等于总务处）、参事官室，人事、地方、企划、主计、弘报、统计六处，以后又增设一个防空部。关于上述各处的照例公事，伪总理只是盖章而已。

对于重要人事的任免更迭，如省长、大臣、参议的人选，通常由总务长官（伪满自建国以来的总务长官计有驹井德三、远藤柳作、星野直树、武部六藏，武部六藏由关东局总长来任的）提名，事前与张面商成案，送关东军最后决定。关于日本人、朝鲜人的人选，张从未有异。关于汉、满、蒙古族的人选，武部再三请求张考虑决定。张总是根据武部所提的几名人选中指定。偶尔也有都不合乎张的意愿的。这时候，张则委婉慎重地提出意见，让武部重新考虑人选。武部希望张指定人选，而张从不先提候补者。武部说不合乎总理意图的人，是难当重任的。武部认为张总理一贯不徇私情，是为国选贤任能的。岂知张从来不肯把他不喜欢的人拥上重要职位。关于重要职位的人选问题，张的用心是周到的，作法是爽快的。他有一个信念，反正日本人决不会用一个不尊重他的人。而热中于省长、大臣职位的人们，各自通过各种渠道，攀缘奔走。他们都懂得，决定之权在总理，总务长官是关键。张也确实知道经过武部的提名者，总是忠于日本主子的，不会有麻烦。在伪满洲国，也是善于钻营者捷足先登。这些人在官厅会见总理打官话，我是知道的。他们跑伪总理公馆，稿私人活动，也瞒不过我。上面说的是由内部提拔的情形。由外部新任用的，如丁超投降后任伪省长，张焕相归来后任伪大臣，谢文东投降后任伪协和会部员等，都是经伪满政府和关东军协商而决定的，当然，这必须通过张的事前谅解或同意。

张景惠虽是个大老粗，但他对于知人任事方面，却是心中有数的。据我所知，他没有向武部荐过一人作显官要职或荐过任何亲朋做官。他只有两个亲戚当伪满简任以上的官吏，并且都是由旧时候沿袭来的。一个是他夫人徐芷卿的弟弟徐瑞延为伪奉天省参事官（简任），一个是张的族弟张景弼为伪安东航政局长（后退职，任电公司监事）。都不是美差，只拿钱，没有权，张从来未替他们说过话。日本人认为张景惠关于任人方面没有私心，这也是日本人喜欢他的因素之一。就前述三类系派中可以看出，张景惠和他们的关系，都搞的相当好，既无特别亲厚的，也没有过于疏远的。但从汉奸这一角度来看，都是鱼鳖虾蟹，异曲同工，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张景惠说过："日本人看

好了是没有麻烦的。反正这些人，我都知道，比日本人知道的也许还多些”。而日本人认为有问题的那些人，万不得已，他是不表示态度的。在1942年、1943年，伪满高级官吏李叔平等的子弟们在日本留学中，搞爱中国活动，被日本司法机关逮捕。在判刑前，特照会其家长等来日本会见，欲使说明悔过保释。不意在李叔平等去日本会见时，反被其子弟斥骂，遭到他们拒绝保释。提出这事来，张也觉得别扭。

在积极协助日本拉拢吴佩孚出山（在汪精卫未投降前）收拾中国时局的活动中，曾派松本秘书持其亲签的函件，前去接洽。又派人（日本人）持其信件，赴绥远傅作义将军处，劝其“弃暗投明”与日本人合作，以收拾中国之残局。这些事，均未获得圆满结果而告终。又按日本人的意图，欲拉张作相出任华北政局的首脑。张作相之子张毓九，于1944年至1945年之际，到长春活动，因接近日本败战而泡散。诸如此类的事，日本人为能利用则必利用张与那些人的老关系，以期满足其野心。这些无耻勾当，惟张方肯作，而乐作。这也是日本人所依重张原因之一。日本人所以深信张而不疑者，他的松本秘书也起了积极和推进的作用。现在作一段插话，顺便写在这里：

松本益雄，1945年时约50岁，日本九州门司人，九一八事变当时，为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书记官，是个中国通，说一口流畅的北京话。充任日本外交官以来，长期在中国活动，也到过广东，和李济深、陈济棠都打过交道（松本说他驻过广州）。不但对于中国的风俗习惯，就是中国的国民性格，他摸的也挺透。特别是对于张景惠的个性，掌握的尤其无微不至。甚至于能和张同呼吸，共命运，张忧他亦忧，张乐他亦乐。因此，张引为心腹，知心话肯对松本说，松本也能及时尽情地作出反映，传达给日本主子。松本的工作，具有独到之处。如“满州人”与日本人发生了龃龉，松本总是“袒护”“满州人”，似乎有点肝胆相照的样子，遇事则挺身而出真有些侠义感，所以上层伪官吏，对松本都怀有好感，这是其他日本人所望尘莫及的。张对松本是言听计从，凡日本的意图或消息，松本亦能准确地反映给张，从而张的所作所为，多由松本授意。张的态度有的硬中间软，有的软中间硬，硬软的程度，都是松本化出来的。日本人认为张肯说老实话，和他们同心同德，对日本人能表露真情实感。谚云：“一犬吠虚，万犬传实”。[①] 一传十，十传百，连假的也能成真，何况真是这样。所以日本人都异口同声地赞美张是中外难得的好宰相。这难道是一般的事情吗？松本对张，真正作到了“一心一德”、始终不渝。不但能不露声色地介绍张景惠、宣传张景惠，还是他的一个忠实连络员，这是其他秘书所根本做不到的。

（2）伪协和会机构的梗概

根据日满议定书，设立“满州国协和会”。协和会的前身是自治指导部。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早年曾出卖鞍山矿山权给日本的大汉奸于冲汉是自治指导部创立时的最高掌权者。于冲汉当了伪监察院长，自治指导部变成了协和会。协和会长由伪总理大臣兼任，专设中央本部，处理日常事务。本部长由日本人担任，于1945年初又增设一名副本部长，由民间选任（“满洲人”担任）。当时的本部长是三宅光治（原关东军参谋长、陆军中将），第一任的副本部长是于宜之，此人原为张作霖的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

① 此成语应为“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一人传虚，万人传实”。

隐居长春，专办红卍字会，就任后不久，“九三”抗战胜利，被苏军逮捕，下落不明，想不到刚一下水，就惨遭灭顶，宛如贞妇晚年失节，一世辛苦俱休。各省协和会，本部长和副本部长由伪省长、次长分别兼任。省本部有专任事务长一人（日本人），各县协和会的县本部长和副本部长由伪县长、副县长分别兼任，县本部设有专任事务长（日本人或“满洲人”）。协和会职员的待遇，原则上与伪政府各级官吏相同，因而互相间也可以对调。

政府和协和会的关系是表里一体，好比一件衣服，政府是表，协和会是里，又像一个东西的两面。就是说有关伪满政策的渗透，协和会负有主要责任。日本统治中国东北政策的具体行动机关为在关东军指挥下的伪满政府。协和会的使命是阐明这些具体行动是“仁政”是“王道”，必须通过“民族协和”和“一心一德”地去实现。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仁政，不许任何人持有异议。即或有不理解的，也要闵而受之，不能反对。倘有反满抗日言行，就是协和会的使命未能完成，即协和会未尽到责任。协和会的宗旨，是关东军司令官指出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凡伪满的成年男子都可以为协和会员，成年女子都可以为国防妇女会员。协和会每年开一次全国协和会，有各省各县各机关各团体的代表出席。开会时，伪满皇帝临会宣读敕语，极为隆重。审议讨论各方面所提出的议题，也有伪中央提出的议案。各代表有发言权，由伪中央各关系部门负责处理解答。协和会由五族即满、蒙古、汉、日、朝鲜所组成。

中央本部

本部长（日本人）

副本部长（满）
- 总务部长（日本人）
- 指导部长（日本或“满洲人”）
- 文化宣传部长（满人）

各部部长的地位同于政府各部司长。

部长以上的人选，由本部长与总务长官协商提出，呈请总理大臣（协和会长）批示，伪总理总是“准如所请”，从未批驳过。

（3）特殊会社（由伪满政府和日本财阀共同投资、负有经济统制任务的企业公司），如满铁公司、电信电话公司、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鞍钢公司、抚顺炭矿公司、本溪湖煤铁公司、满洲矿业公司、电业公司、满洲人造石油公司、满洲开拓公社、农产公社等等。会社重役（指董事、理事、监事以上的职务）的人选，凡属“满洲人”选为特殊会社的重役者，都是为伪满洲国有功绩或有特殊关系的人，由伪满政府推荐任用。如韩云阶由伪大臣选为电业公司的理事长，丁鉴修（大臣）选为电信电话公司总裁，荣源（溥仪的岳父）选为人造石油的理事长等。其他如当过伪省长、伪厅处长也有被选为重役的，人选的方法，也是由伪总务长官与伪总理商议决定。

特殊会社的“满洲人”重役与伪省长不同，是毫无权利的，只负责往公文上盖章而已。待遇优，薪金高，这一点，使人人向往，乐得轻松悠闲。

2. 参加各种会议和集会

（1）伪国务院会议

伪国务院会议又名水曜会议（水曜是星期三），每周三开一次，是伪国务的最高级会议。会议由伪总理大臣、总务长官、各部大臣和兴安局（管理蒙古族兴安各省的事务机关）总裁组成。列席者有提案伪主管部的次长、总理秘书、总务厅文书科长（日本人）、文书科通事（日本人）

凡属伪法令和有关重要伪国策，都必须经伪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再提交伪参议府会议通过，经“皇帝”裁可，然后公布施行。

这些议案，都是秉承关东军的意旨，由伪主管部立案，先经各伪部次长会议仔细研究讨论后交水曜会议通过。伪次长会议又名火曜会议（火曜是星期二），每周二举行一次。由伪总务长官、总务厅次长、各部（包括兴安局）次长、有关局长等组成。

当时伪国务院会议的成员是：伪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外交部大臣先是李绍庚，后为阮振铎；伪民生部大臣：先是于静远、后为金名世；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伪军事部大臣：先是于芷山、于琛澄，最后为邢士廉；伪经济部大臣：先是阮振铎，后为于静远；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伪兴安局总裁（蒙古族）巴特拉玛布坦；伪国民勤劳部大臣于镜涛（1944年成立）。

首先，由伪总理宣布开会的目的，继而由伪总务长官说明议案的梗概，再经提案部次长补充说明后，伪总理让各大臣提意见。有的询问个别内容，有的简单申述意见，所说的不外是对议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等等，很少提出异议的。经过一番认识讨论以后，伪总理作总结性发言，认为无异议一致通过，宣布散会。会议最长不超过二小时，一般在一小时左右即可结束。在每个人发言时由通事逐段地及时翻译。这是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国务会议的实况，恐怕在当时全世界是一个稀有的类型。

（2）伪参议府会议

伪参议府犹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参议院（上院），参议府会议在伪国务院会议的翌日，通常在周四下午开会。议案就是经伪国务院会议通过的那些东西。在参议府会议上充分讨论或通过或否决。通过后提呈“皇帝”裁决公布施行。因负有“皇帝”依重的使命，所以在参议中有宫内府出身的人，如宝熙、胡嗣瑗等。参议府会议对国务院会议通过的议案，一般在一次会议上即可通过，有的在一次会议上不能通过。据说这不是议案不能通过，而是因为在参议中有的暂时尚不理解或不充分认识的关系，所以经过工作说明后，迟早会理解的。过去，《治河水利法》就是其中之一，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亦通过了。

伪参议府会议由伪议长、副议长、参议组成。出席会议的，政府方面有伪总理大臣、总务长官、提案部次长，伪参议府方面有审计局长（日本人）、伪参议府秘书、通事翻译。

方法方式与国务院会议相同。

当时伪参议府的成员是：

伪议长臧式毅、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兼祭祀府总裁）。伪参议有：宝熙、胡嗣瑗、孙其昌、张焕相、丁超、韦焕章、蔡运升、荣厚、齐王（蒙古族）、井上忠也（日人）、

李某某（朝鲜族，曾任过间岛省长，名忘记）①

伪参议府会议不像伪国务院会议那样顺利，有的参议好发言，喋喋不休，有时甚至长达四五个小时，惹得张景惠不耐烦，嫌他们罗嗦，说他们不了解情况不切实际，劝他们好好体会议案的精神实质，空白浪费时间等等，把好说话的人弄的尴尬难堪，啼笑皆非，下不来台。好说话的有荣厚和胡嗣瑗等人。有一次会议，荣厚说“让说话嘛，就说几句”，逗得大家都乐了。有一次会议比较长，散会时我问张为什么这么晚？他说，竟他妈的瞎说，节外生枝，不达时务，到头还得通过，白费时间，等等。

武部看到这些情况，会后对张景惠莞尔笑着说，总理，不要干扰他们，叫他们充分提意见，把话都说尽了才好。说话就是他们的职责，也是我们所企待于他们的。言下之意好像每月用1300元薪金，每星期只请他们来讲一次话，还嫌他们说的多吗？说完，他二人不禁相视会心地笑了。

（3）特派赴日“谢恩”大使

1942年，伪满洲国在风雨飘摇中十周岁了。据说这都是仰赖“天照大神”的“神麻”和“天皇保佑”的结果。所以特派张景惠捧“亲书”，以特派赴日“谢恩大使”的名义，去日本一次。在“谢恩”同时又负有庆祝日本建国2600年的使命。这次我没有随行。今仅就张景惠回来所透露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张景惠说，这次到日本，除受到日本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外，还破格地受到了天皇裕仁的接见。裕仁详细地询问了溥仪起居健康情况和修建新皇宫的事情。裕仁说：“没有像样的皇宫，就没有适宜锻炼身体的场所，你们为什么不给他（指溥仪）修建新皇宫呢？”张景惠说：“我屡次请旨给他修新皇宫，他总说建国伊始，百业待兴，需款太多。待各部院建成后再给他建宫不迟。我皇帝圣心仁慈，不肯先民而安。迄今未蒙批准，所以未动工。”裕仁说：“你们皇帝越体念你们，你们就越应当早日给他修宫，那样简陋的旧宫，能够使他有运动的地方吗？”张景惠回来以后，选定了在伪国务院北侧，动工建基，开始修建皇宫。据说被溥仪知道后又下令中止了②。解放后，吉林省在此基础上修建了一所富丽堂皇的大楼，就是现在的长春地质学院（长春五座大学合校后，今为吉林大学朝阳学区）。

（4）特命赴“华”（伪南京政府）答礼使节

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汪兆铭（汪精卫）率代表团，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于1942年5月，前来新京（长春）参加庆祝大会，“亲致诚悃”。伪满以“国宾”之礼隆重接待，特编歌曲让中小学生歌唱、夹道欢迎。伪皇帝亦亲设御宴款待，极尽优遇。当时，汪精卫感动地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中满”关系过去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的讲话，博得了伪满汉奸们的同声喝采。张景惠于1942年6月，以特派“答礼使节”的名义，率领代表团回拜了南京的伪汪记政府。伪汪记政府亦以

---

① 李范益，1883年生于朝鲜忠清北道丹阳郡，后任伪官。1937年7月入中国东北，11月被任为伪间岛省省长，1940年任伪满参议府参议，并改日本姓为“清原范益”。

② 早在1932年下半年就选定了新伪皇宫营造地，1935年5月正式成立伪宫廷造营筹备委员会，1940年5月17日动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止。其“建”与“停”均由日本所决定。

“国宾”之礼特设宾馆（原孙科住宅）周到款待，备极优隆。两地汉奸相遇，分外亲热。汪伪与张伪原系熟人，今又以南京重会，二人心照不宣，彼此之意均在脉脉不言之中。这两个都是久经世故，同属老奸巨滑。张到南京后，受到伪汪记政府的热烈欢迎。张按常规“觐见”了伪国府的代主席汪兆铭，宣读了特命“答礼使节”的答谢辞。继而汪以伪行政院长的身份回拜并设盛宴招待了张。张又拜访了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畑俊六亦设宴招待了张景惠。汪擅长讲话，他在欢迎宴的致词中，对张极表敬慕之意，愿以同胞骨肉之情，“两国”亲密相处，始终不渝，互相帮助携手同进。又对皇军的威力表示了敬佩，对日本的“支援”表示了感谢。愿动员一切力量，协助大东亚圣战获得完全胜利。张在汪和畑俊六的招待会上都郑重地作了致词（照原稿念的）。张在离南京前，设答谢宴分别回敬了汪精卫和畑俊六。张在答谢宴上又作了简单的祝酒词。张在南京期间，汪陪张参拜了一次中山陵和在北极阁举行了一次茶会。出席茶会的人比较多，气氛非常“融洽友好”，不拘形式互相交谈。为期五天的访问，来去汪都亲至机场迎送。

答礼使节代表团的名单如下：

代表：张景惠（伪国务总理大臣），随员：韦焕章（伪外交大臣）、吕荣寰（驻伪国民政府大使）、大江（日本人，伪外交部参事官，名忘记）①、王子衡（伪协和会指导部长）、松本益雄（伪总理秘书）、高丕琨（同上）、王蕴珂（伪总务厅总务科长）、庄开永（伪总务厅弘报处参事官）、施肇和（伪外交部交际科长）、伪总务厅会计科长（名姓忘记），还有几名办事员。

代表团的部分随员和伪国民政府指定的官员举行了两次小型的座谈会。一次是关于当前国民生活和政治活动的现实情况；一次是关于经济，特别是对两国民间贸易往来、互通有无的问题等。话题是事先规定的，说话是有范围的。谈的都非常肤浅，谁也不肯节外生枝，拉的太广，究的太深。所以不是因为有隔阂而是有顾虑，怕日本主子怀疑。我记得有人提到南京和重庆、汪和蒋的关系如何的问题，他们只说了一些已经公开的事实，如汪精卫为什么由重庆出走与蒋分离的事情等，一点也未接触到问题的实质，都不过是些表面形式、官样文章而已。

我通过私人的谈话觉察到日本对南京伪国民政府掐的不紧，不像对伪满洲国所有机关都布满了日本人。汪精卫似乎还能自作主张，日本对伪国民政府只安插极少数顾问，搞军事侵略。重点放在抓经济动脉，对于一般行政方面没有深入渗透。仿佛日本所施加于他们的压力和负担没有像伪满洲国那样严重。其实国破人亡的事实最为残酷，当时我感到一种凄凉悲惨的情景：中国人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的了。

（5）大东亚会议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于 1943 年 11 月 5 日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主霸统治亚洲以来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的一出滑稽剧。出席的代表有东道国的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伪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伪

---

① 大江晃，伪外交部参事官（简任），1943 年 11 月 5 日在东条英机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是伪满代表团主持各种议题事务的中心人物。

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缅甸的伪总理巴毛、泰国的伪总理（名忘记）、菲律宾的伪总统劳勒尔。列席代表：伪印度临时政府的首脑钱德拉抱斯。①

会期定为三天。

大会用语：指定为日、汉、英语三种。

各国代表凡欲在大会上发言的稿子，必须先期交到会议办公室，以便将稿件译成与会成员的各种语言。各成员代表的席上都设有耳机，如果不懂当场发言人的语言时，只要拿起耳机一听就懂了，因为耳机里的发言是他懂得的语言。譬如张景惠在听东条发言不懂日语时，可用耳机听，耳机里是用汉语在说话。这是将准备好的稿子用各国语言译好，由广播室播送出来的。如果是临时发言，没有准备发言稿时，在大会上只能同时译成指定的三种语言。

开会的第一天，东道国东条英机致开会词，继而，由与会代表推选东条英机为大会主席。

东条英机首先在大会上发言，他说："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使亚洲各国能得到共存共荣，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但是，美英两国制霸世界，侵略世界各地，特别是卑视有色人种，奴役多数的亚洲人，掠夺亚洲的资源，欺侮亚洲人，提起来令人发指，他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所以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把他们撵出去，夺回我们的土地和资源，我们为的要生存。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膺惩这些强霸，我们的行动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目的是光明磊落的，所以叫圣战。日本不惜牺牲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这一次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开战以来虽然已经取得了赫赫战果，然而行百里者，常以九十里为半，前途障碍尚多。过去，各位阁下已经克服了种种困难，同时协力襄助了大东亚圣战，我由衷地感谢各友邦，向各位阁下谨表满腔的敬意和谢忱。希望今后更进一步，彼此和衷共济，互相策励。我们提出问题，开诚布公，尽情讨论，集思广益，使此次大会获得预期效果圆满成功，尽最大的努力为完成大东亚圣战共同奋斗"。这是大意。继续汪精卫和张景惠在大会上都作了长篇的讲话。第二天，缅甸和泰国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菲律宾总统劳勒尔在会上用流畅的英语发表了演说。印度临时政府的代表钱德拉抱斯也讲了话。大致都不外乎将其本国已作的援助"大东亚圣战"的贡献，全面地用数字作了汇报，并对今后如何动员人力物力的计划和决心作了誓言。各代表对大会作了全面的肯定，对于所提出的问题经过讨论，意见完全一致。如：如何宣传大东亚圣战的伟大意义；巩固各国内政的方策；大东亚圣战决非我们的对岸之火，要以实力去襄助，在可能范围内对美英外其他国家要维持友好或现状等问题都作了较为具体的决定。第二天继续开会，与会代表提出一些临时建议，我记得张景惠提出的建议是："希望在今后适当时期再召开这样的会议。"大会都通过了这些建议。

最后发表了"大东亚会议"的共同宣言，宣言的大意是：通过这次会议，我们更加清楚地明确了大东亚战争的伟大意义。不把这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则"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和东亚各国的"共存共荣"是不可能的。所以愈益巩固坚定了我们的

---

① 东条英机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泰国参加的是汪瓦塔雅根，菲律宾是罗慕洛，印度是鲍斯。

信念，誓必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各尽所能，和衷共济，集中人力物力为实现大东亚各国的“共存共荣”，把大东亚战争打到最后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这样，紧紧地都被拴在东条的战车上了。

这次会议的特点，东条慎重地考虑对苏的关系，对苏联一句坏话也没有说。所谓对美英以外的国家保持友好或现状，就是考虑到对苏关系的暗示。在开会中屡次传来“捷报”，由作战参谋报告了在索罗门群岛作战中所获得的“赫赫战果”，以炫其胜利，大家都鼓了掌。仿佛最后胜利就在眼前，附庸们也在虚假的狂欢气氛中陶醉了。

当时的东京在战时战备灯火管制体制之下，防空森严，夜晚漆黑一片，街市不见一线光亮，曾任伪满治安部次长的薄田美朝是当时东京都的警视总监，来拜望张景惠，谈了一些关于东京防卫的情形。我看出他已没有当年在伪满时那种不可一世的气概，却露出了颇为惨淡的气氛。

日本原来就不生产煤铁和石油，煤铁可以从中国抢，但中东的石油，美英掐它的脖子弄不来，所以东条发动太平洋战争急于抢夺占领油田，所谓为的大东亚“共存共荣”，那才是弥天大谎。它给日本人民也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搞军用第一，一切为军事，一切为前线。这是军国主义的特点，也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就以伪满洲国而论，逼得中国人民缺衣少食欲生不得，难道这是因为没有粮食和物资吗？请看日本战败当时的关东军仓库吧：苏军说这是他们的战利品，成年累月地大批运搬还没有运完。这都是东北人民的血汗，言之令人痛心！

当时的东京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票制配给，物资非常缺乏。就是在这样艰难情况下，东条对外宾的招待却异乎寻常的隆重。为各代表特设宾馆派专人侍候，准备的伙食、烟酒茶点都是最优等的，应有尽有。特别是东条的招宴，筵席非常丰盛，用的尽是山珍海馐和世界的名贵，极尽圈套拉拢之能事。

伪满洲国的代表宾馆设在精工社（钟表公司）总经理的别墅。东条访问了张景惠，张也回拜了东条。张对东条说：阁下对我不要客气，贵国是我们的亲邦（即父子之邦之意），实如一家，幸勿见外，阁下国事多忙，费尽了心机，又开这样的盛会，要注意休息。对其他国家的来宾多分点心，我就感同身受了。东条对张的诚恳、富于有情感的寒暄极表满意。张在东京受到日本朝野和知名人士的欢迎。鲇川义介（日本大财阀，曾任伪满重工业总裁，为东条金融的后盾）在他的别墅庭院里，特设日本风味的寿司（掺菜的米饭）、料理（纯海产物的菜饭）招待伪满洲国代表团。张又在伪满大使馆用中国酒席招待了与伪满有关系的日本朝野知名人士。这两次都是“促膝谈心”、开怀畅饮、“无话不说”的宴会。

伪满洲国的代表团名单如下：

代表：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随员：伪外交部大臣李绍庚、伪驻日大使王允卿、伪外交部大江参事官，伪总理秘书松本益雄、高丕琨，还有随代表团办事的人员。

来去乘飞机，中途在日本九州福冈县降陆，加油，当时福冈县的知事为吉田茂，他曾在战后组过内阁。他招待了两次午宴。

六、有关张景惠的几个轶事

1. 张景惠和民间的请愿者

在1942年某日晌午下班，张景惠的汽车驰至般若寺附近时，忽然有五六名农民跪在车前，拦住去路。张知道他们是请愿的，我立即下车把他们招呼到路旁，张回公馆了。我接过人们已准备的请愿书，并询问了事情的详细经过。

他们原系伪滨江省五常县的农民（按现在的土地法衡量属于中、富农），他们说我们的自耕地相对河套较远，土质很好，年年向国家出荷交税，以此为生。现在硬把我们的土地划为水没地，不许耕作，实属不公。所陈如有一毫虚伪，甘愿受罚。请"总理"派员调查，给小民们作主。我说你们应当向滨江省申诉。他们说省里迄今不予处理，所以才来"中央"恳请。我说必须经过调查，弄清真相，果如你们所诉的那样，"总理"一定给你们作主，否则你们要负无理取闹之咎。他们再三恳求请"总理"从"中央"派人调查，万勿专靠地方官员等情。最后我请他们回家听候消息。我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张作了汇报以后，我说，以前曾因向"总理"请愿事惹过麻烦，"总理"是知道的。张说："还不让老百姓诉苦吗？若是无理取闹就办他们，他们说的属实就应当准予所请。不是在《治河水利法》上有明文规定吗！你告诉松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不算多管闲事吧？"我说："这不是多管闲事，这不是总理主动去找的，而是请到总理身边的，难道能置之不理吗？总理交下去责成合理处理是理所当然的。"以后我向松本秘书传达了张的意思，松本说，应当这样办。他即将请愿书交给了武部总务长官。他对我说，长官已将请愿书收下，允为妥善处理。从这件事发生以后，凡属收买土地的事，必请伪总理派秘书亲赴现地监视。因此在我参与伪四平省梨树县收买开拓地的事时，我传达了伪总理意思。让大家说老实话，遵守"国法"。根据自愿原则，"政府"绝不强迫，办事的人必能秉公处理。大家可以放心，愿意与否，只管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要有所顾虑。其实老百姓也知道伪政府的意图，就是怕办事人从中刁难。我也完全了解个中的关系，认为不能在民意已经难堪的情况下，再给他们增加额外不应有的负担。这个动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划地相当慎重。听说在这一次收买土地中，没有发生其他的纠纷。

2. 张景惠的演说

1930年张景惠在东省特区当长官时，有一次参加了警官高等学校（哈尔滨）的毕业典礼。当时于镜涛是该校的提调兼教务长，请长官向学生训词。他登上讲坛后看看外边在下雪，他说："今天下雪了，训词没带来。"说完这两句话就下来了。以后大家把这一段事情传为笑谈。张景惠在和众人随便交谈时，总是滔滔不绝，最健谈。可是，不用稿子作训词或祝词，他是不习惯的。没有稿子让他训词，他能对景生情，居然地说出这么两句话来，也算难能可贵的了。可是日子长了，也习惯了。以后不用稿子，在宴会上致祝酒词或在集会上作简单致词，都能说得很得体。如在国务院的封印式和开厅式上，向几百名职员连翻译在内作三四十分钟的有系统的讲话是常事。讲的通俗，不引经

据典，大家都听得懂。大家说大老粗不粗，讲的不错。我听张书舫说，他在旧时代的宴会上往往还唱《黛玉葬花》或《武松打虎》等鼓词。有一次在宴会上，有人敬他烤鸭子的鸭头（菜），他风趣地说："这鸭头不是那鸦头，头上哪有桂花油?"（这原是《红楼梦》里贾母在家宴上说的诙谐话），真没想到大老粗还会说这样的俏皮话，使我惊讶。在会议上，四五千字的致词，都能照原稿读的抑、扬、顿、挫，一字不误。

有人请他写条幅时，他经常写的是"一德一心"或"坚韧不拔"几个字。求字的人希望他亲笔，但求的人多了就让梁禹襄代笔。

3. 张景惠对时局的态度和接见新闻记者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正式向美英宣战。斯大林于1942年十月革命25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著名的"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是世界大战的两个策源地，这两个法西斯侵略者必定灭亡"的论断的长篇演说，在日本朝日新闻译载出来。我见了之后，向张作了概略的介绍。平素，伪弘报处参事官庄开永也时向张作关于国际形势特别是日本国情的讲述。张用心听，但从不表示内心的反应。希特勒德国驻伪满公使（德国人，会说中国话）有时请见张，用地图向张汇报德苏战争的情况。当希特勒军队快攻到莫斯科时，德国公使眉开眼笑，适德国节节败退时，德国公使则心灰意冷。张听了也感到希特勒的末日行将到来。1944年末，汉奸们在报纸上看到法奸被惩罚的消息，也感同身受，忧心忡忡，当时伪总务厅次长王贤沣说，我们也将脱逃不了应有的惩处。惟张景惠却声色不动，依然如故，形同无事。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张景惠与蒋介石有密约，心中有恃无恐。没料想到头来，他的一切全成泡影了。

张景惠有时接见新闻记者，通常有伪满国通、日本共同社记者，有时其他外国的新闻通讯员也参加。记者提出什么问题，事前不作联络，追问伪弘报处时，则曰只请"总理"谈个人意向，不用先定。所以我们也只好向张说明记者请见"总理"随便谈谈。可是，张对记者们所提出的问题，能临机应变，答的都恰如其分合乎日本的要求、希望和伪满的"国是"，毫不走题也不漏馅，御用记者们也谄媚地说，真是一位有卓见的名副其实的宰相。

接见记者时的汉日语翻译是松本益雄、高丕琨，英语翻译是庄开永。

4. 张景惠和溥仪及其患病有关事情

张曾对我说："旧时我在天津见过皇上，现在他对我有好感。在我患病中，皇上亲自打电话慰问我的病况，并派他的御医来看病开方。病愈后我晋宫谢恩是用跪拜礼。在春节和万寿节非正式的朝贺时我也是跪拜叩首。"

张景惠见溥仪不用事先请示，除照例的政务上奏（每周一次）和每年终各大臣政务上奏时侍立外，任何时，随到随见，用旧话说，张景惠是溥仪的宠臣。凡伪皇帝所谓行幸、巡幸时，张景惠必须随行保驾。新旧的关系使他俩搞得很密切，很融洽。①

① 关于溥仪与张景惠的关系，可参考《我的前半生》中第六章第六节"幻想的破灭"中，溥仪对张景惠的具体评价。

就在张景惠这一次患病中（时间是1943年秋、冬，时间较长），国际间却传出了谣言，说张景惠因为农产物出荷量大和给满洲人吃橡子面、豆饼的问题向关东军提意见表示不满，被关东军参谋长当场开枪击毙云云。这是由伪驻南京大使吕荣寰用日文写的一份国际情报。在呈伪总理阅的文件中我读了之后感到，惟关东军之命是听的头号驯服的大汉奸，为什么在国际间却传出这样的舆论来了呢？

5. 张景惠的信仰与其人生观

张景惠在办公室无事时，经常静坐背诵佛经，或墨写《般若密多心经》。他念经是有目的的，是祷告菩萨“保佑”的。据说他和张作霖同车幸免于祸是托佛爷的“福”，从此就皈依了佛。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更笃信佛。好像他觉得在外国人的卵翼下求高官厚禄的荣华富贵，光靠人力是不够的，必须另寻门径，从空虚中得到慰藉，于是就更信起佛来了。不但在无事时念佛，即在乘飞机、轮船、火车和汽车也念诵。简直到了朝夕如斯，颠沛必如斯的程度。别人见面有的颂扬他说：“总理念佛念的脑门都放红光了。”B29型轰炸机飞来长春，大家感觉惊慌。而张景惠边笑边说：“福地长春”（此长春二字本非地名，张故意解为长春），没有事。的确，他把安全完全寄托于信佛上了。他平素乘车通过“造福观音像”（在护国般若寺前，现在南关区园林管理所院内，早被拆除了）和日本神社（即斯大林大街市机关幼儿园现场）前时，必脱帽致敬。

有一天（1944年）日本把一些青年飞行员指定为肉弹去冲击美机（偏说是他们自愿的），这一群被认为是以身许国的壮士来见张景惠，张以最尊敬的口吻颂扬他们为天皇献身，甘愿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大可宝贵，是最上的光荣，并为他们的飞机起名叫“金刚”。连说“金刚不破”、“金刚不破”！他把这一类人力无可奈何的事情，也寄托于佛光。这就是张景惠的信仰，也是他人生观的最终体现。

6. 张景惠和吉井清春

我记得有个叫吉井清春的日本人。这个人交游广、人情味浓厚，有点侠义感。他能说流利的中国话，早和张认识。1943年某日，他忽然来了，他和张是旧交，二人挺投缘。吉井说：“我这次到中国辗转走了很多地方，也听了许多趣谈，听人说：蒋介石有一天对白崇禧说，我不幸死去，你替代我。白崇禧说自己难负众望。蒋介石说你不干，难道叫我把中国交给毛泽东吗？毛泽东先生是蒋介石的政敌，在中国人心中有声望，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最受人爱戴（吉井当时是说“最有人气”，“最受人爱戴”这句话是笔者译的）。您知道吗？”张景惠听到此，抬起头来看了吉井一眼，表示很惊讶，半晌没再说话。

回忆张景惠

木田清*

编者按：本篇及以下《我所知张景惠二三事》、《张景惠和伪满洲国》，日本作者的不少观点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但从侧面反映出日本殖民统治者操纵使用汉奸的手法及张景惠如何卖力效忠侵略者。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伎俩，原文部分称谓未作改动。

张景惠就任国务总理大臣，我记得是康德2年（昭和10年、1935年）5月。当时，我恰好任总务厅人事科长。那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指张景惠），仅举二三例，以见其为人之一斑。

第一件事发生在刚刚就任总理时。半年之前板垣征四郎将军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曾问当时的总务长官远藤柳作说："我这次回到阔别多时的满洲，发现满洲事变当时曾做了许多工作的韩云阶正赋闲在家，我知道其中有种种原因。不过，需要时尽情地使用，用过后就不管不问，这种作法也涉及到日本的信誉。所以希望你能为他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于是，长官便命令我为他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韩云阶在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省长，当时曾设有弹劾机关监察院，据说由于有违法行为而受到弹劾被免去省长职务。总理就任当时，适逢省长调动，新京特别市市长出现空缺，有人提出是否可以起用韩云阶，远藤长官和板垣副参谋长也都表示赞成，又同张总理商量，征求意见。然而，张总理的内心是不赞成的，当时韩某在一般满人中名声不好，而且又曾受到弹劾，一度被罢免。我想，总理虽然不同意，但由于受到板垣的委托，又无法拒绝。所以，我说这件事必须奏请皇帝批准。我去找总理请求作出决定，总理说和皇帝研究后再定。但是，迟迟不见他去宫内府，我便和松木侠秘书处长一同去见总理，总理说："我现在就去！"说着便离开了机关。我们等了两三个小时，也不见总理回来，往宫内府打电话询问，对方说总理今天根本不曾来过。我们正在纳闷，总理回来了，并说，那件事可以了。我想他大约根本就没有和皇帝商量，只不过他身为总理，要安排一个在满人中声名狼藉的人，如果自己作出决定，怕是别人不会接受，所以采取了要同皇帝商量的形式。

另一件事发生在康德4年（昭和12年、即1937年），当时，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撤销了监察院。当时的监察院长就是有名的罗振玉。在机构撤消前，曾委托总理要求罗振玉提出辞呈。但是，总理却迟迟不见行动，直到预定发布命令的前一天，我

---

* 作者系伪满总务厅人事处长，回日本后曾任山形县新庄市长。

通过松本秘书官前去催促，他立即去了罗振玉家。直到夜里才接到松本秘书官的电话，他说：“事情不好办了！今天我陪总理去拜访罗振玉，在闲聊中顺便提起机构改革的事，罗说，如果是那样，像我这种老朽怕是应该引退了。总理说，这是什么话，像你这样卓越的人物提出辞职，岂不让我为难。说罢便回来了。”我也感到事情很棘手，只好明天去和星野直树长官商量了。第二天一早又接到松本秘书官的电话，他说：“今天早上收到了罗振玉的辞呈，请你放心吧！”当时我犹如坠入五里雾中，见到松本后，得知事情的经过。原来罗振玉在总理走后，便同儿子罗福邦说：“我想总理是来取辞呈的，你替我送去吧！”于是便交来了辞呈。我想竟然还有这样交涉的方法，不禁佩服之至。

我所知张景惠二三事

古海忠之

昭和10年（1935年）满洲国实施帝制，执政溥仪即帝位。不久，溥仪的旧臣郑孝胥便辞去国务总理大臣职务。作为其后任，任命军政部大臣兼参议府副议长张景惠为国务总理大臣。

由于我长期在总务厅工作，接触张景惠的机会颇多，因而深知他的为人。

据说，从前张景惠同张作霖之间曾有兄弟之谊，是地方军阀的实力派，而如今却全然没这样的风格。他基本上是文盲，但自从当上国务总理后，总是抽空写字认字。当我到总务厅任总务厅次长时（昭和16年，1941年），他的读写能力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当总务厅组织各种活动或举行典礼时，经常要由国务总理发表训示或致贺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书面的发言稿，他便极其认真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极不生动。而当自由地进行口头发言时，连所有的日籍官吏都被他的发言所吸引，大家都听得出神。

他无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都不惊慌失措。曾有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新京有一座忠灵塔，是祭祀关东军阵亡者的雄伟的慰灵碑，关东军每年都要举行慰灵祭。有一次张也参加了这一祭典，并致悼词。轮到他致词时，他慢步登上石阶，站在碑前，开始读悼词。过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张景惠从高高的石阶上慢慢走下来，从容不迫地从列队站立的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等众人面前走过，一直走到总理秘书官松本的身边，问了一个悼词中他不认识的字，然后又慢慢悠悠地登上石阶，把悼词读完，带着一付若无其事的沉着表情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聚集在会场的众人，当张在慰灵典礼的中途，走下台阶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免大吃一惊。当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才恍然大悟。

昭和16年（1941年）的11月，我被任命为总务厅次长。从那时起，凡属需要总理批准的法律、要纲及其它议案，都需由我向他说明内容，接受批准。我带着文件到他那里，通过松本秘书的翻译开始说明文件内容。过了一会儿，抬头一看，他居然在打瞌睡，而且似乎睡得又舒服又香甜。我不管这些继续说明，当我说完时，他眼睛睁得大大地，声音洪亮地说“好啊！”这就算是批准了。

我曾多次经历过这种事，但也不能说全部如此。当他有意见时，尤其是关于农业方面的议案，他从始至终认真地听取说明，提出意见。关于日本开拓团的用地问题，他不太同意历来采取的收买熟地的作法，主张开拓用地原则上必须开垦荒地、森林和原野，在万不得已须收买熟地时，也要为之斡旋，采取换地的措施。

当他代表满洲国访问南京政府时，我也曾作为随员，随侍在他的身边。满洲国崩溃后，被强行带往苏联时，在四十五号战俘收容所内我曾同张总理共同度过日日夜夜。后

来，我们被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关进抚顺监狱时，命运又决定我同他共同起居。因此，关于张景惠的回忆颇多，暂时从略，我只想说的是，张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不幸，总是从容不迫，态度超然。

在抚顺监狱里，我经常看到在晒太阳的张景惠，但不久却突然不见了。当时可能已是八十六七岁的高龄，我想肯定是在狱中悠然逝去了。

张景惠和伪满洲国

松本益雄

要想以有限的篇幅汇集有关张景惠的故事，就是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十四五年的我，也很难做到。于是，我决定写一些鲜为人知的类似逸闻的东西。

一、同日本的关系

大约在“满洲事变”后的两个多月，边见勇彦志（边见十郎太的儿子）带着一位和他同年辈的老勇士橘某，前来拜访张景惠。张似乎略加踌躇，立即说：“啊！你不是当年的假大辫子吗?”说罢，二人握手言欢。张景惠和橘某在日俄战争时期，曾共同参加以青木将军为首的日本军特别行动队，作为同志，曾为扰乱俄军后方和运送武器而大肆活动。

日俄战争爆发一两年前的一个冬天，张作霖在俄军治安工作队的追赶下，带着怀抱正在哺乳张学良的夫人，和30支步枪，投奔张景惠。张景惠比张作霖年长四岁，比张作相长九岁，是三人中的老大哥。他们义结金兰，是生死之交。昭和3年（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时，张和张作霖、吴俊陞曾同乘一辆列车，只有他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张作霖死后，张景惠名副其实地成为满洲年纪最长的元老。

张的诞辰是旧历五月初四，“满洲事变”当年又适逢六十大寿。当时，他虽然兼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但在寿诞前夕，还是回到了他的根据地哈尔滨。与此不相前后，大桥忠一从驻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调任驻哈尔滨总领事；6月，内田伯爵也就任“满铁”总裁。这一切都是币原外相为了和平解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满洲问题，而煞费苦心布下的阵势。当张景惠回到哈尔滨后，大桥总领事立即要求会见，倾诉日本的苦衷，请求张景惠为之同张学良进行斡旋，并得到他的慨允。

张学良当时已经是国民政府的陆海军副司令，根据蒋介石的要求率十余万大军驻北京，与阎、冯等反蒋军相对峙，他对于日本方面的热心要求，甚至张景惠的“忠告”，都一概充耳不闻。

二、建国的前夜

9月18日，火山终于爆发了。当夜，张景惠正在位于奉天五经路的家里。9月22日回到哈尔滨任地，但在此之前似乎同板桓进行了简单的会谈。然而，板桓提出“满洲事变”最后的处理方案已是11月了。参加上述会谈的除驹井之外，还有关东军幕僚

和数名在满的日本青年。板垣提出了大约八九项确定未来日满关系的基本条件，要求张同意。由于事隔多年，内容已记忆不清，大体包括日本人的居住权、驻兵、机场设置、铁路、产业开发等。根据张景惠的要求，我来到会场时，已是夜间11点过后。会场气氛充满着一种异样的紧张，血气方刚的幕僚和青年拉扯甚至有粗暴的举止。当我充当翻译之后，其他人全部退席，只留下张景惠、板垣和驹井三人进行会谈。张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他说："作为日本向满洲提出这种程度的要求，我个人也认为不无道理，能够理解。但是，我没有任何合法的地位，没有理由对这些要求表示承诺，而且即使我勉强接受，将来它反而有可能对日本不利?"他的发言理路清楚，令人没有反驳的余地。双方的应酬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5时多，最后虽然没有形成文字，但双方在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会谈。

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十余年间张景惠一直作为"满洲"当局的柱石，同日本之间进行交涉，而他关于日满关系的信念，始终一贯，从未改变。

三、伪国务总理在任期间发生的事情

国务院每周举行一次例会，参加人员有各部大臣、总务长官和次长等，会议决议再提交参议府讨论，再由总理集中起来，每周一次定期呈交皇帝请求裁可。此外，还要每周一次定期访问关东军司令官官邸，进行会谈。实际上这些议案基本上都是由日本当面提议制定的，所谓决议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走过场而已。当然，无论是关东军司令官，还是总务长官，也经常通过张景惠积极了解满籍国民的民意。

张景惠自昭和10年（1935年）就任第二任总理，直至昭和20年（1945年）战争结束，在这十余年间，他对于通过决议或对于关东军都是顺从的，几乎从不提出异议。他忙里偷闲，进行坐禅或写经，过着净身慎心的生活。不过，在此期间，只发生过二三次例外的事情。

1. 开拓民的土地问题

所谓日籍开拓民的百万户移民计划，在关东军和有关机关的强而有力的支持下付诸实施。这一方案原来是在小矶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以北满的未开垦荒地为对象制定的。然而，一旦具体执行时，由于有关下属的急功近利思想，多次出现强制收买附近农民熟地的现象，为此，爆发了满籍农民强烈的反抗运动。政府当局也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出于万不得已，采取默认的态度。而总理却以空前的断然决心力图阻止收买熟地，他一方面向有关负责人下达指示，一方面秘密派我去东京，请求小矶总理予以协助。小矶总理也大为惊讶，他指出：移民方案原来的宗旨是在北满约1700万町步的未开垦土地上，以每户10町步的比例移入100万户日籍开拓民。小矶总理极力阻止有关人员的失误，幸而未曾酿成大患。

2. 痛斥"满籍"市民的不满情绪

每年在新京召开二至三次全国省长会议。随着大战的发展，消费配给物资缺乏，对

此难免出现不满情绪。在一次省长会议上，有一二位省长非常固执地提出这一问题。在此之前，总理几乎一言未发，只是委托工作人员进行应酬。当听到上述省长发言后，他突然站起来，以震惊四座的声音大喊："肚子饿了就紧起裤带！现在盟邦拼上国家命运打一场大战。日本战胜了，满洲国便可以蒙受余荫。这种不满坚决不能容忍！"我虽然在他身边工作了十余年，这种亢奋的声调我也从未听到过，就连在座的关东军猛将们也都不禁哑然，问题当场消失了。

3. 反对溥仪去通化避难

由于苏联的突然宣战，"满洲"的形势也为之一变。早在13日关东军就已将司令部迁往通化，并要求溥仪和"满洲国"政府也必须立即迁往该地。对此，"满洲"当局以张景惠为首的高官们几乎全部都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国元首放弃首都去外地避难，就意味着国家的失败，会立即导致民心的动摇。张景惠带领臧式毅议长和熙洽宫内府大臣等直接会见山田关东军司令官，声泪俱下地提出忠告，但关东军以作战的需要为理由拒不接受。最后，溥仪和各部大臣不得不迁往通化，其后未出三天，战争便宣告终结了。

四、"满洲国"的消亡

武部总务长官于17日乘小型飞机飞往通化（16日虽曾起飞，但因气候恶劣而中途返回），去溥仪身边。当时，溥仪带领张景惠、臧式毅议长和各部大臣正在鸭绿江边山中的大栗子矿山工地建筑物中避难。随着日本的战败，就溥仪的去留问题举行了重臣会议。我也随长官一同从新京前往该地，担任会议翻译。溥仪住在另外一栋建筑物里，会议在一个狭小的食堂里召开。张景惠坐在中间，在右边就坐的是臧式毅、熙洽和满籍大臣，坐在左边的有武部长官、鹿儿岛参议、荒井宫内府次官，还有吉冈中将和山田参谋等。

张景惠从会议开始便似乎是受到了强烈的打击，痛惜日本的战败，泣不成声，会议只好交武部长官主持。讨论的结果认为既然日本天皇已经宣布全面投降，时至今日，只有奏请溥仪痛下决心。于是张景惠、臧式毅等人到住在另一栋房屋的溥仪那里，不久，传来"皇帝"退位的消息，大官们一个个去向溥仪作最后的诀别。

在这次会上，我发现了两个奇怪的现象。一个是熙洽在会上的狂态，他居然大声嘲笑张景惠不耻高龄，为日本战败而恸哭，熙洽受到邻坐的臧式毅的责备。另一个是，当溥仪退位后，溥仪身边的宫内府官员们四散奔逃，立即卷起行李在黑暗中消失了身影。

张海鹏概略

傅铭勋

一

张海鹏，号仙涛，原名张莲溪，系辽宁省海城县热河台村（现归盘山县所属）人。因为颜面多麻，人多呼他为张大麻子。出身农家，魁武有力，凶悍绝伦。他从小在族叔张某家中做雇工，张某外号叫铁公鸡，专以剥削穷人为能事，倚仗张海鹏来保镖。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帝光绪出走西安；关外僻处东北，胡匪蜂起。张海鹏即纠合亡命徒约三四十人，拉起大帮，当了“大当家的”，报字“大莲字”，流窜于辽西和辽东一带，烧杀抢掳，肆无忌惮。不惟各地联庄会怕他，即其他匪帮，也多避让。

张海鹏探悉小北屯富户李某家中有钱，便率匪众前往绑票。李某当时越墙逃走，张海鹏反复在李家各处搜找，见柴火垛内藏着一个小脚大辫子姑娘约十八九岁，便将这个姑娘抢走，就作了他的二姨太太。

张海鹏自当匪首后，作案累累，妇孺皆知。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他被海城县下令通缉，凡拿获到案的赏银五百两，知情报信的赏百两，知而不报或藏匿者罪当连坐。时当青纱帐起，胡匪利用高粱地，到处可以隐藏，正是他们最活跃、最猖狂的时期。有一日，张海鹏率领匪众到九台村，夜间住在他的姑妈家中，张海鹏走后，他姑母恐受株连，便向海城县衙门报信。海城县知县王立堂带队赶到，张海鹏早已远走。王立堂在盛怒之下，将张海鹏的胞弟张莲山砍头示众。事后张海鹏得悉，连夜到他姑母家中为他弟弟报仇。他手持大铡刀，不分老少，见人就砍，他姑母家中七口人，被他一连砍死五口。只剩下他姑母在炕上和一个吃奶的婴儿，他略一迟疑，未忍下手。他姑母大骂道：“张莲溪，我全家大小均惨死你手，我母子也不愿活着了，你快将我母子也砍死了吧！”张海鹏闻言冷笑道：“好，好，你活着确也没有什么意思，待我成全你吧。”遂将他姑母和婴儿一并砍死在炕上。笔者在童年时代，常听老辈和街坊们谈及此事，无不痛恨！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朝派张勋、朱庆澜等率领大兵开到东北，清剿胡匪。辽西各帮胡匪遭到严重打击，有的远走躲避，有的由大帮变成零星小股，四处流窜。张海鹏解散了伙伴，只身逃到吉林东山里，隐姓埋名住了两年多。但他与内地伙伴们从未失掉联络。适日、俄两军作战开始，沿南满铁道两侧，争夺战最为激烈。日本收买辽西各帮胡匪编为“东亚义勇军”，张海鹏得信便重回家乡，纠合旧日伙伴，和冯德麟、汲金纯等合成一股，由日本供给大量枪弹和金钱，编为“东亚义勇军”一个支队，他们便为日军效力。利用道路熟、消息灵通，避重就轻地打击俄军，首山战役俄军遭到决定

性战败，受到他们影响很大。

日、俄战争结束后，奉天当局徇辽西著名士绅刘春朗等之请求，收抚辽西各帮胡匪，编为巡防队，即由新民府知府增韫委托刘春朗、张程九等办理招抚事宜。刘春朗等在八角台（今辽宁省台安县）、西佛牛录（距台安县正北约30里），成立了两个招抚委员会，在八角台收抚了张作霖、张景惠等各帮胡匪，编为一个巡防营，由张作霖充任管带；在西佛牛录收抚了冯德麟、张海鹏等各帮胡匪，由冯德麟充任管带，张海鹏充任骑兵哨的哨官。不久他们开到彰武县一带驻防，张海鹏率领全哨驻在养息木门镇（距彰武县东南约80里）。过了一年多，冯德麟升为三营统领，张海鹏随着升任为骑兵管带。

二

1912年，张作霖升任第二十七师师长，驻沈阳，冯德麟升任第二十八师师长，驻北镇县。张海鹏任第二十八师所属第五十三旅旅长，驻黑山新立屯镇。张作霖拥兵沈阳，近水楼台，久蓄谋取军政大权，苦无机会。适于1914年，段芝贵继张锡銮后任，督理奉天省军务；以后张作霖见他莅任年余，庸庸懦懦是个无能之辈，认为时机已到了，正好乘此下手。张作霖趁冯德麟到沈阳之便，向他说："段芝贵来到沈阳一年多，只图贪财肥己，于咱东北人未办什么好事。莫若将他撵走，我情愿捧凌阁（冯德麟的号）大哥上台"。冯德麟本是个头脑不清楚的人，他哪里知道张作霖要弄他，便信以为真，当即首肯。张作霖又秘约张海鹏到他私宅中说："仙涛大哥你如能出头将段芝贵撵走，捧我出来，阻止二十八师不来反对我，我情愿将二十七师师长位置让你。"张海鹏贪图师长位置，当时慷慨地答应一切由他负责去办。不到几天，二十八师在沈阳小南关头道街驻沈阳办事处，召开营长以上官长会议，讨论撵段和继任位置问题。多数主张将段撵走后，奉天将军兼督理必须推冯德麟充任，否则二十七师如若撵段，二十八师就要拥段，绝不相让。独张海鹏力排众议，他说道："撵段是因为他来了一年多，对我们奉天军民没有一点好处，难道我们东北人，就没有一个配当将军吗？咱们二十七、八师，就为的是争这一口气。今饭未作熟，便要争嘴，叫旁人瞧着，耻笑咱们，说咱们没有血性，没有义气。为今之计，只有将'将军'让给雨亭，推咱们师长来帮办军务，地方官吏（指县长、警察局长、税捐局长等）也得让咱们二十八师位置一半。这样双方和衷共济，团结一起来治理奉天，叫外人瞧着，也得高看啦。"冯德麟原本烟瘾很重，终日卧榻横陈，身体非常衰弱，哪里还会有精神去争强斗胜呢？就是二十八师主要军务他也多不愿过问，常常由张海鹏主持。张海鹏是他的灵魂，只要张说出什么事情，他是百依百从，没有驳回的，听了张海鹏说出这套言辞，便向众人说道："这事由仙涛同雨亭商议去办吧。"至是由张海鹏包办会议，决定了撵段拥张。张海鹏又与张作霖往返磋商了几次，约定如下：（一）由张海鹏出头作黑脸，代表二十八师作为撵段主角，汤玉麟代表二十七师作为配角；（二）由冯德麟领头用二十七、八两师全体名义电请北京政府推张作霖为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三）由张作霖保举冯德麟帮办奉天军务；（四）地方官吏半数由二十八师推荐充任；（五）二十七师师长由张海鹏升任。末后这一项是主要的，张海鹏肯为张作霖卖这样大力气，就是为此，但这一项，是他俩密约，不公开的。

他俩约定后，张海鹏即同汤玉麟往见段芝贵，勒索增加军饷，逼他离开沈阳，并由张备专车把他送到锦州。这样，张作霖就在1916年4月当上了盛武将军，暂署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他保举冯德麟帮办奉天军务，但对张海鹏升为二十七师师长只字不提。张海鹏这才有悟，张作霖是在耍他，背地里气恨张作霖过河拆桥，说自己是个大傻瓜，被人当小孩耍了。

张海鹏向来主张尊重君主，不赞成民主，他常常叨念："自从有民国以来，弄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如果宣统重回北京当上皇帝，我就干死，也是甘心的。"就在这个时候，张勋派人到东北来联络张作霖、冯德麟、张海鹏等，进行复辟活动。他们自是一肯百肯地答应，而更对张海鹏的口味，主张快速进行。这时张作霖已改任奉天督军，他示意张海鹏、冯德麟到北京，参加张勋集团，扶溥仪再登宝座。岂知未到几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带兵直捣北京郊外，"辫子军"节节败退。张海鹏曾多次飞电向张作霖告急，岂知张作霖既不发兵救援，也无只字回复。最后段军逼近内城，张海鹏、冯德麟知道大势已去，说通了段军旅长张九卿，溜出东直门，在黄村登火车到天津。冯德麟在车站被段军稽查队拿获，张海鹏乘隙逃走。

张海鹏回到北镇县还想动员向天津进兵，攻击段军，但张作霖早已得知消息，便邀鲍贵卿前来，劝阻张海鹏作罢。不久冯德麟虽被释放回来，而第二十八师师长位置早被张作霖委任汲金纯了。冯德麟自然怨恨张作霖和汲金纯，而张海鹏素日小视汲金纯，今见汲位居己上，更使他愤懑不平，处处予以掣肘。汲金纯屡向张作霖诉苦，张作霖乃将张海鹏调到吉林当混成旅长，驻防依兰。第二十八师分编两个混成旅，由汲金纯、杨德新分任旅长；第二十八师的番号从此取消。

吉林督军孙烈臣（号赞尧）和张海鹏交情很厚，张未能取得师长位置，他也深替张失望，当面应许添编一个步兵师，任张为师长。孙烈臣曾与参谋长丁超商量几次，均遭丁的反对。后被张海鹏闻知，恨丁入骨，见着面，老是指桑骂槐，给丁难堪。丁感到惹他不得，只好忍气吞声。这事搁置了半年，张海鹏等得不耐烦，便由防地到吉林，在孙烈臣私宅中大发脾气。逼得孙烈臣曾跪在地下，给他磕头求饶，方算了事。事为张作霖闻知，乃将张海鹏调往黑龙江，充任哈满护路司令。

黑龙江督军吴俊陞，是有名的大滑头，表面上装憨卖傻，骨子里却是奸诈百出，看人下菜碟。他很知道张海鹏吃软不吃硬，喜戴高帽子，便抓住这一点，事事恭维他、奉承他，陪他吃喝嫖赌，花钱买出一个妓女马秋帆，作他的四姨太太。张海鹏果被吴俊陞弄得心花怒放，乐意为他效劳，如缴获逃入中国境内的白俄谢米诺夫军队大批枪炮和军用物品，以及在哈满地区肃清了多起匪帮等等。

呼伦贝尔镇守使耿玉田，原是清朝老行伍出身，吴俊陞早前是耿部下，和耿嫌怨甚深，心存报复。1921年耿玉田缴白俄军队武器时，吴便想趁此机会捏造事实，予以陷害。但他觉着空口向张作霖去说，未必相信，非利用张海鹏作证不行。于是他向张海鹏泣诉说，他和耿玉田仇深似海，现在耿缴白俄军队武器，另外得了很多珍贵物品，匿不上报，窃为己有；他向巡阅使（张作霖已任东三省巡阅使）去说未便相信，全靠张海鹏作证，方能成功。张海鹏当下慷慨答应。吴俊陞立即前往沈阳，向张作霖告密，说耿玉田缴获白俄狐、貂、白熊皮数万张，还有很多的金银珠宝，隐匿不报。当时张果认为

是吴一面之词，后经张海鹏作了证明，便将耿玉田拿解到沈阳，押在第一监狱，未经审讯，即用铅水灌耳朵处死。

1921 年张海鹏因哈满护路司令部撤消，曾回到黑山县新立屯私宅，闲居年余。到 1922 年春季，奉直第一次战争，奉军失败后，张作霖又任他为奉天省骑兵游击队统领官，所属四个骑兵营，系收抚蒙边一带胡匪编成的，驻防洮南、瞻榆、洮安、镇东、开通、安广、突泉各县，张海鹏的统领部驻在洮南城内。

1924 年，奉直第二次战争，奉军胜利，洮辽镇守使阚朝玺升任热河都统，张海鹏继阚的后任，升为洮辽镇守使，仍驻在洮南。这时他的所属部队，已扩编为三个团。到 1927 年，又添编一个团，共计三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部队番号改为东北陆军第三十二师，张任师长仍兼洮辽镇守使，彼时东北军整军经武，加紧训练，正是全盛时期。张海鹏自觉相形见绌，对所属部队也打算整理一下，好改换面貌。我于 1927 年来就任他的参谋长，那时很想帮助他好好整理整理这个腐败不堪的军队。但他用人办事朝令夕改，视同儿戏；至于滥赏滥罚，尤其余事。我只好徒唤奈何而已。

张海鹏每逢他的生辰，大事铺张，尤以 1926 年农历十月初三，是他六十岁整寿，更是炫赫一时。从沈阳约来京剧、曲艺等名角多人，在他洮南家内搭台演出。凡洮南城内的大旅馆、大商号，均作他的临时招待所。除洮南等七县地方官吏、商农代表和蒙古王公应有尽有前来祝贺外，凡东北各省军政首脑，或亲自前来，或派代表携礼前来，为他祝寿。寿堂中间悬挂一幅丈余高的湘绣大寿星，两侧配列五彩鲜艳的寿瓶，高等香供摆列满桌，桌帘椅帘均是湘绣。张海鹏身着长袍短褂，缎帽缎靴，俨如清朝达官。他的四姨太太马秋帆，也是全身华艳旗装，打扮得等于王公贵妇。张海鹏和马秋帆分坐寿堂两侧，对拜寿的人，叩头的，他笑逐颜开，离座手扶回谢；鞠躬的，则仅点头示谢而已。

张海鹏迷信神佛，他家里设有佛堂。另外他还募集了很多的钱，在洮南城里建一座很壮丽的庙宇。每逢初一、十五，他必亲到庙拈香。遇有不能决断的事，常常在他的佛堂拈香问卜。张海鹏不信吃药，有病就问佛。1927 年夏季，他患伤寒病甚重，家人医生均劝他用药，均被他拒绝。他的老友马腾溪（号龙潭，曾当过东边镇守使）住在四平街，闻信赶到洮南，在佛堂拈香，请“济颠”（即济公）降坛赐赏药方，好给张海鹏治病。他的家人便以医生所开的药方，伪说系“济颠”降坛乩语所开。张海鹏闻言大喜，跪在床上叩谢佛爷恩典，恭恭敬敬地将药服下。他与尼姑道士常相往来，他家中经常住着吃斋念佛的人。并且这些人为讨张海鹏的欢喜，时常给张海鹏设坛扶乩，伪说张海鹏是张飞托生，溥仪是刘备托生，将来溥仪还有当皇帝的命，必须张海鹏去扶保他。张闻言眉飞色舞，非常高兴。

1928 年 6 月，张作霖同吴俊陞均被日本人炸死时，张海鹏得着电话以后，躺在地上大哭，连连喊道：“吴大哥你死的好惨，痛死吾了！”对张作霖的死，则毫不在意，只字不提。

三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以后，张学良任东北保安总司令。这时东北将领分新旧两派，

旧派是属于张作霖的老人，新派属于张学良，两派形成对立，暗斗甚烈。张学良深知张海鹏在蒙边多年与蒙古王公往还密切，深为注意。1928 年，班禅额尔德尼到洮南转道王爷庙去唪经，张学良派蒙旗处处长许赫奕、副处长王宗乐，前往洮南代表他招待班禅。临行，张学良秘嘱许、王，表面为招待班禅，暗中要注意张海鹏的行动，看看他和蒙古王公，有无联合图谋不轨情事。许、王奉命后，即往洮南，住洮辽镇守使署中，张海鹏对他们倒是殷勤招待。而许、王最初对张海鹏也是维恭维敬，未露任何形迹。有一天，因张海鹏的副官长张为东，对许赫奕招待不周，惹许大不痛快，乘醉便向张为东怒斥道："你们当我们来招待班禅，我们主要任务是来看看张老头，是不是对总司令有捣乱的活动。"张为东随将许赫奕所说的话，向张海鹏学说了一遍。张海鹏闻听大怒，待班禅离开洮南后，即去沈阳见张学良说道："汉卿，你若是信不着我呀，赶快派人前去接替。我偌大年岁，不犯再恋栈啦。"张学良连忙陪了一阵不是，又取出他父亲留下的貂皮大马褂一件，另外开了一张两万元支票，送给张海鹏，他才欢欢喜喜地返回洮南。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了沈阳城。第二日早晨，张海鹏在洮南得知消息，连忙电请北京张学良指示办法。但张学良的回电，仅说已转呈南京蒋介石。这时张海鹏日夜考虑的是怎样能够保全生命财产，怎样不和日军冲突，能长期保住他的地盘和地位。不久，日本关东军派来吉田少佐和日本浪人镰田（和张海鹏在"东亚义勇军"时相识）来与张海鹏联络，表示日军决不侵犯张海鹏军队的防区，仅借用铁道线攻击齐齐哈尔，要求张海鹏与日军合作，待占领了齐齐哈尔后，便将黑龙江军务督办给他。另外还补助张海鹏步枪 3000 支、子弹 30 万粒、服装 3000 套，金票 20 万元，作为张海鹏扩军之用。张海鹏利欲熏心，甘心作汉奸，便投降日本了。这时我已任他的第四支队长（等于旅长），张海鹏将军队扩充为七个骑兵支队，所有支队长都是他的嫡派人物。第一支队长徐景隆，更是他的心腹，亲如手足，无论何事，只要经徐景隆一说，张海鹏没有不答应的。有一次，张海鹏召开军事会议，我怂恿徐景隆劝阻张海鹏，不要去进攻黑龙江。徐赞同我的意见，向张海鹏委婉苦劝了半天，张海鹏闻言大怒，拍桌指向众人道："你们大伙不愿意帮我干吗？这是撂我的台呀！别人不帮我干倒可以，你徐景隆不帮我干倒没有想到。好，好！看我张海鹏一个人也要去干！"徐景隆见张海鹏这样的盛怒，便俯伏在地叩头道："我徐景隆随您三十多年，亲如手足，不用说别的了，您叫我投河跳井决不皱眉，赴汤投火我去就是啦。"

兴安区屯垦督办公署，设在洮安县（即今之白城县），屯垦部队分驻索伦山及洮儿河两岸，土地肥沃，矿产丰富，早为日本所垂涎①。1929 年春，日本派遣中村大尉前往索伦，被驻军杀死②。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占沈阳后，鉴于日本如乘势北犯进攻齐齐哈尔，路经洮昂铁道线，屯垦军必首当其冲，便先撤退到突泉县一带，观看形势。在突泉驻了半个多月，见日军北进尚无消息，仍将军队撤回王爷庙一带。这时屯垦督办邹作华早于前一年奉张学良之命，出国视查，所属部队由炮兵旅长金镜清、步兵统带苑崇谷等率领，屯垦军干部多系青年将校，他们决心抗日到底。旅长金镜清和行政处处长高仁绂

① 兴安屯垦区沿洮儿河至白城，北至绰尔河，南到交流河，总长约 450 华里，宽约 300 余里。

② 处死日本间谍中村为 1931 年 5 月 25 日。

前来洮南，面见张海鹏，打算联合一起来抵抗日军，阻止日军北上，并拥戴张海鹏为总指挥。金镜清等到洮南后，我曾与他们接谈几次，交换抗日计划，他们表示很诚恳，盼望张海鹏赶快举起抗日旗帜，他们全体官兵甘愿担任第一线，服从张海鹏的指挥。我认为这是劝诤张海鹏的好机会，便向他说道："日本占领沈阳，他的兵力也不过仅仅几个守备联队，并未调动大军。我想日本还是看风使船，走一步看一步，估计目下还不能发兵北犯。您位居上将（张海鹏已得上将衔）坐镇蒙边，中外共瞩。我们洮辽军已扩充了七个骑兵支队、一个步兵团（约计1.3万人）。此次屯垦军愿隶属您的部下，听从指挥来抵抗日本。屯垦军拥有步兵六千多人，重炮数十门，另外还有很多的特种武器。像这样庞大的实力，和我们联合一起，推进到辽源县以南，沿辽河北岸配备起来，以屯垦军作主力，咱们一万多大骑兵，分成左右两翼，东进梨树，西进康平，一面掩护主力，一面利用速力和冲力，发挥游击战术，可以威胁四平街。如是能够保持打通、洮昂两条铁路线，往西可以联络热河，往北可以联络黑龙江，进可战退可守，没有后顾之忧，不受半点拘束。"我说完了这些话后，张海鹏冷笑道："他们愿抗日由他们去抗吧，人各有志，我干我的。"我见他说了这个话，只好作罢，回复了金镜清等，他们赶快返回王爷庙，率队投奔黑龙江去了。

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万福麟，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即率军进驻关内，督办公署军务由参谋长谢珂代行职权。谢得知张海鹏将要协同日军进犯齐齐哈尔消息以后，即电告万福麟，万电令驻在黑河的骑兵旅长马占山率队星夜兼程到齐齐哈尔抵抗。但黑河距齐齐哈尔遥远，非旦夕所能到达。谢珂为应付延缓张海鹏入犯，乃派王静修协同齐齐哈尔商农两界代表前来洮南，假意欢迎张海鹏，张海鹏信以为真。谁知未经几日，马占山已由黑河率队到达齐齐哈尔，立即协同新归附的屯垦军为主力，担任第一线，马占山的骑兵及其他江省军队，分担左右两翼及后方预备队，这时张海鹏才知中了缓兵之计。

张海鹏自投降日本后，未到一个月，日本就派来一个主田大尉为他的军事顾问。主田到洮南先将张海鹏无线电台撤消，从此张海鹏就与内地断绝联络，所有一切军政事务，非经过主田准许，不能去办，张海鹏等于傀儡。不久，日本又派来前清肃亲王的两个留学日本的儿子—宪元、宪吉[①]，充当张海鹏的参谋。

张学良在北京得着消息，知道张海鹏去齐齐哈尔，目的是为了争夺黑龙江军务督办的位置，为满足他的愿望，便任他为蒙边督办；并派张的老友王恕（号裕宽，曾充彰武县长）携带任命状，送到洮南，婉劝张以国难为重，停止前去齐齐哈尔。张海鹏对这个任命，不敢叫日本知道，遂授意地方各团体及蒙古王公，假借民意，拥他为蒙边督办。这是张海鹏一只脚踏两个船的把戏。自此对所属七县地方官吏随意任免，捐税随意征收。这时他倒是心满意足，不急求去黑龙江了。但此时日本多门师团已开始进犯齐齐哈尔，迫使张海鹏率队随同日军进攻江桥。张海鹏因接受了日本大批武器和金钱，只有履行条件，听从日本指挥。他带了嫡派的第一支队徐景隆部、第二支队鹏飞部、第三支队刘茂义部，向前推进。张海鹏本人驻在泰来县，一、二两支队推进到景星县（在江桥北边），第三支队推进到大赉县（江桥南边）。这时日本在江桥西岸配备着一个混成

① 应为宪原、宪基。

旅团，步炮兵约四五千人。江桥东岸马占山军，以屯垦军为主力，早就配备好了。双方激战甚烈，初时屯垦军以坚强的抵抗，屡获胜利，日军伤亡甚重。日本又令张海鹏部在景星的一、二两支队，由鹏飞指挥，迅速渡江，抄袭马占山军右翼，向昂昂溪迂回，以断绝马占山军队的退路。但官兵们早就反对张海鹏的亲日，一致认为枪杆应该向外，抱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已和马占山军联络好了，约定决不过江一步，彼此不放一枪，不开一炮。虽经张海鹏再三催促，鹏飞等则以时正严冬，江冰太滑，马无掌铁，不能渡过等为借口来应付。急得张海鹏焦躁万分，无法应付日本，只好认罪道歉。后来日本又调来大批援军和坦克飞机，参加作战。双方对峙多日，马占山军伤亡惨重，弹尽援绝，节节败退，日本就侵占了齐齐哈尔。

四

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后，张海鹏由于军队不听使用，未达到和日军协同作战的要求，致使日本对他大为不满，他自己也觉扫兴。正当这个时候，溥仪被日本劫到长春，成立伪满政府，当了傀儡皇帝。张海鹏素为保皇派健将，当然乐于推戴，愿为臣子了。不久，他奉伪政府之命，率领三个支队进驻长春（改为伪新京）一带，拱卫伪新京。张海鹏由伪政府任命为洮辽警备司令官，兼伪皇帝的侍从武官长。

1932 年秋，抗日救国军胡宝山、李芳廷等率骑兵千余名，由热河境内进入瞻榆县，又占领了开通县，很受当地商民欢迎。洮南城内正值没有驻兵（伪满兵），洮南商务会会长靖某及地方著名士绅等，纷纷表示欢迎抗日救国军人洮南城，并筹备了很多物品来慰劳救国军。张海鹏在长春得知消息，赶快到辽源县，由康平县调来第三支队刘茂义部，先攻占了瞻榆、开通两县，继而又到洮南，将靖会长及地方著名士绅三人枪毙了。

1933 年 2 月间，日本出动了第六、第八两个师团侵略热河，伪满政府任命张景惠为“讨热总司令”，张海鹏为“讨热前敌总司令”，并加派佐久间少佐为他的军事顾问。张海鹏领五个骑兵支队约 1.3 万人，随同日军第六师团，由开鲁经过赤峰进犯承德，以迄古北口。汤玉麟闻知消息，并未抵抗，老早退出热河，经丰宁、大阁镇、大滩逃往沽源县，于是张海鹏不放一枪，很快地占领了热河。

日本占领热河以后，张海鹏便任了热河伪省长兼警备司令官，仍兼溥仪的侍从武官长。到热未及两个月，日本便将他的部队缩编，裁去二分之一，所有部队各级层均有日本教官作为指导。在行政方面，各县政府有日本参事官，警察局、税捐局有日本指导官。总的说来，军政大权均操在日本人之手，张海鹏等于牌位一样。他在伪任二年多，有时在热河，有时在长春。到 1934 年春季，敌伪撤掉他的伪省长兼警备司令官，将他调任伪将军府将军，仍兼伪侍从武官长。伪满的将军府将军，地位高、薪俸多，每届年末，另外有赏金数万元（按级而定）。于是他在长春修建了一座大楼，由他亲自监造，作为他的住宅。在八一五日本投降、伪满垮台的时候，他因事正留在沈阳，所以侥幸地未被苏军俘获。

八一五光复后，张海鹏即同他的四姨太马秋帆逃到北京，在新街口航空署胡同，买了一座大住宅，另外在西郊买了一处约有 200 亩的大果木园子。北京市解放后，他的住

宅和果木园子被人民没收，他同他的长子张俊哲迁到北新桥小四条居住。直到1951年春季，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终于被镇压了，时年85岁，从此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1963年）

张海鹏的一生

富璇善*

一、土匪起家

张海鹏原名叫张连溪，原籍盘山县热合台（这个地名或者不十分确实，在清光绪年间属于海城县）。幼年家里很穷，而他又好吃懒作，在给人家扛活时，常中途要把戏就不干了。充当光棍出入赌场，找点油水，混每天的生活，一般人，尤其是以礼教相标榜的绅士都不以正眼看。同族哥哥张小渠认为他这种行为玷辱张家门楣，曾当面讽劝他："我看你起码是一个二八月庄稼人（东北旧时代的俗话，指不务正业的庄稼人而言），这辈子没有什么出息。"张海鹏受到这些冷遇，并且当二流子不能维持他的生活，怎么办呢？觉得惟一途径就是当强盗好，既能任意横行，又是没有本钱的买卖。于是他勾结同类就拉起帮来，他报字（东北胡子的黑话，报字就是绰号）"大连字"。他们这伙强盗就在海城境内打家劫舍、绑票勒赎、挟嫌仇杀，把那一带老百姓作践得日子都不能过了。最残酷令人不忍卒听的一件事，就是他把族中一个姑母刘家抢了，刘家报案后，海城县拿捕不到他，就把与他有勾连的他的二胞弟抓到县里杀了。张海鹏在愤恨之下闯进刘家，把27口人根株尽绝，他姑母百般哀求也没有被他饶恕，连她一同杀了。那时海城县知县王顺存为除灭这伙强盗，亲率乡团督剿，终以官军势盛胜了几仗，"张大连字帮"被打垮了。

张海鹏在海城县无处隐藏，由别人的介绍逃到素以结交江湖朋友出名的哈尔套街土豪徐子扬处"扒风"（东北胡子的黑话，找个地方伏藏起来的意思）。徐子扬知道"张大连字"是海城有名的匪首，借机会交他个朋友互相结纳，将来彼此都有好处的，所以对张海鹏特别款待，把他奉为上宾。直到王顺存由海城转走，对他缉捕弛缓下来，他在徐子扬的资助之下，潜回海城集聚他旧日的喽罗，"大连字帮"在海城境内又死灰复燃起来。

二、在日俄战争中铺就升官途径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东北南满地区开始了，那时候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特务花田大

---

* 作者是张海鹏的中校副官。

尉（后来升到大佐）等人①到东北各地活动，首先到辽西招致仇恨帝俄最深的关东大盗冯德麟（辛丑条约后帝俄侵入东北修建铁路，冯德麟曾率部众进行扰乱为俄军击溃，将冯德麟捉住流放到库页岛，后来冯被中国一民船营救出来得返回中国②），组成一支所谓“东亚义勇军”充作日本满洲作战军的别动队，专门扰乱俄军后方的任务。冯德麟为组成这支“东亚义勇军”，乃搜罗辽西各地匪帮进行编制，乘着这种风云，张海鹏、汲金纯、郭瀛洲等“飞黄腾达”，由满洲胡子头一变为东洋人的爪牙——“东亚义勇军”大队长。

“东亚义勇军”在花田③的指导下，烧毁了俄军后方的粮台（即兵站，当时中国人的俗称），破坏了俄军后方的交通，袭击过俄军独立小部队，对日本满洲作战军的作战起了相当的作用。所以当日俄停战后，日本政府为酬谢它的这帮爪牙，就强要清廷把它们收容编为正式军队。为顺应日本要求，慈禧太后下了道圣旨，把“东亚义勇军”改编为奉天左路巡防。冯德麟由那时当了统官，张海鹏、汲金纯、郭瀛洲等都升为管带（相当于营长），这个部队编制完了，分驻在辽西一带。

1911 年辛亥革命起义，驻沈阳中央陆军混成第二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蓝天蔚要响应举事，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张作霖（当时是奉天中前两路巡防统领官）的支持下，把蓝的起义镇压下去了。赵尔巽为酬功，更要扶植一种势力，于是在 1912 年给张作霖编为第二十七师，给冯麟阁编为第二十八师。张海鹏逢着这种机会，大走官运由管带就越级提升为第五十五旅旅长。可以说是“直上青云”，这是他平生很得意的事，所以他常津津有味地谈论“东亚义勇军”当年打俄国快洟心意的事情。自己由日本人身上得到了好处，自然还想从它们身上寻觅好处。“九一八”事变后，他抓住机会进一步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还由于受到封建皇帝溥仪的托付，他就成为最开始出卖东北、出卖民族利益的一个叛国元凶。

三、剥夺人民的土地，榨取人民的血汗，成为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

冯德麟、张海鹏都是胡子出身，当了师长、旅长以后，凭着势力更是任意妄为，他们霸占农民的土地或者用贱价强制收买。如冯德麟把黑山县杏山一带若干屯子的土地夺归己有，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张海鹏在彰武县石头人、盘山县热合台、黑山县冯家窝棚、新立屯等处，用各种手段从农民手里夺取近千垧的土地，设立地窝棚。失掉了土地的农民陷于赤贫，只有给他的窝棚扛活，在他的剥削下过着贫乏的生活。冯家窝棚有一

---

① 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赵尔巽档》中附“冯麟阁简历”中记载：冯“统带东亚义勇军随乔铁木将军差遣”。乔铁木即是日军少佐桥口勇马，直接操纵冯麟阁等人。而最初招募冯麟阁为日军山崎良三郎大尉。

② 冯德麟即冯麟阁，另名冯德邻。冯麟阁 1901 年 2 月被驻辽阳俄军诱捕，4 月转解旅顺，被送库页岛“安置”，1902 年夏逃回。一说是由日本间谍“王小辫子”收买俄方汉语通事（即翻译）刁义廷从监狱中营救出来。

③ 应为青木宣纯大佐和桥口勇马少佐。

青年农民背地里说几句反抗的话，张海鹏竟毫无人性地唆使他窝棚上管事的张席珍投匿名信，捏造他当强盗，随后就把那个朴实的农民抓到旅部枪杀了。他就是这样无法无天地很快暴发成为吃一千石粮租的一个大地主。

张海鹏另一条发财致富的道路：在黑山县新立屯用部下士兵搬石运土给他修建公馆，修建市房开了一个广集钱、一个广集粮栈，在彰武县城建了广集当、广集烧锅，在打虎山车站开个同盛和粮栈带油房。他没拿出多少本钱，全靠用这些商号的字号出帖子（就是票子，一般有权势人家作生意，由当地官宪认可，没有准备兑现金也能出票子在市面流通），拿它收买粮石向外贩运并作烧酒打油的原料。这一着，实际是用由农民那骗取来的东西作了他的本钱，他白手起家转眼就成了巨万富翁。

四、附随张勋搞复辟事败后的失势蹉跎

民国初年驻在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拥有定武军六七十营，势力强大①。他是那时军阀的巨擘，可以左右政局，各省督军惟他的马首是瞻。他久已包藏祸心——要推戴清廷逊帝溥仪复辟，终在1917年在徐州召开了各省督军会议，把复辟提上了议程，在当时各省督军都一致赞成签了字，张勋率领十营辫子兵（那时张勋部下的兵都带着发辫，故名辫子兵）就到了北京。

在这另叙说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在张作霖驱逐段芝贵接代了奉天督军以后，他不甘居于张的属下，总打算另求一个与他权势相当的地位。当张勋到北京要策定大事，正好是他风雨际会、乘机而出一个良好机会，他与张海鹏、汲金纯谋商，张海鹏也是见机思逞、极端赞成。于是冯德麟就携张海鹏来了北京，在张勋侧近伺机行事，留汲金纯指挥集结在锦州的部队听候调遣。冯、张二人在面张勋后，张勋对于他们两个很为倚重，以外还有康有为、张敬尧、江朝宗、雷震春、张镇芳、汤玉麟等人环绕于他的左右。

据张海鹏亲口叙述复辟的经过，概况如下：张定武（张勋在民国时授定武将军②在旧历五月十二日晚间，在江西会馆把在北京的有名的京剧演员集到一起演堂会戏，请好多的人去观剧，到深夜才散场。想不到第二天极早派副官把冯师长和我找去，很简捷地告诉我们他要复辟，我觉得事情来的很突然，虽然我很愿意这样做。我当时问：关于这么大的事，不知道大帅对于国内和国际都安排好了吗？当时张定武很有把握地回答说："你们放心吧！国内方面在徐州会议桌上各省督军都签字了；在国际方面由康南海先生（康有为）和各国外交使官个别商谈，已经得到他们的认可了。"我们都确信没有差错，在他的引率下进了皇宫，把隆裕皇太后和宣统皇帝请出来到太和殿登了宝座，由张定武领班向皇太后、皇帝行了大礼后，隆裕皇太后对张定武和我们温语相加，并勉励我们要善佐皇帝治理国事。以后由张定武把我们逐一地介绍给皇太后。由于我对于太后、皇帝奏对时声音洪大、又爽快，所以对于我印象较深，每次朝见时皇帝常常召我谈话。在那

---

① 1916年，张勋掌握"辫子兵"57营，2万余人。

② 1915年，张勋将所率"武卫前军"改称"定武军"，袁世凯授他"定武上将军"。

几天，我们是随班上朝，主要大事由张定武、康有为、万绳栻（张勋的参谋长）和皇室内有关系的要人来计议，先下了几道圣旨。最糟的是由万绳栻等主持的把张定武本人封为王爵，总揽国家大权，而对当时握各省大权的督军兼省长的则授予二品巡抚的职位，就等于降级。由于这种原因各省督军都不满意，所以当段祺瑞率第八师在马厂起义，各省一致响应，反对清朝复辟。就连张定武自己定武军内部的统领官张文生、陈调元等也都看风使船按兵不动。结果仅是原带去的十营步兵在北京内外城抵抗了两天，终以寡不敌众，最后逼在南池子（张勋公馆在南池子），张定武看大势已去，逃到荷兰公使馆。辫子兵放下了武器，复辟的事竟告失败了。我与师长是分途而逃，他到东车站就被逮捕关押起来了，我是乘运河船到天津改乘火车，幸没被人发觉直到山海关，我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在冯德麟、张海鹏参加复辟失败后，在奉天军的方面，有一场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从原因上说张作霖与冯德麟、张海鹏之间，因为争权夺势都有很深的矛盾存在。张作霖每欲把冯德麟、张海鹏排出去，但苦无机会，可是他暗中却勾通汲金纯从第二十八师内部来分裂，使他们彼此互相猜疑，发生对立以坐收渔人之利。在冯、张参与复辟失败后，张作霖正好乘这个机会，不但对冯德麟没有营救，反而把第二十八师师长一职向中央政府保荐汲金纯接充，这样一来一方面既杜绝了冯德麟的复辟希望，另一方面作为排挤张海鹏的步骤。果然张海鹏因为汲金纯素日对于张作霖的趋承态度就瞧不起他，况且与张作霖合谋，接了第二十八师冯德麟的师长，又当了他的上司，对于公事上还处处挑剔，心中忿懑已极，因而决意离开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五旅旅长的职务。正好在孙烈臣任黑龙江省督军的时候，由于平日的相契，给他找台阶，就把他调充黑龙江混成第四旅旅长。

五、黑龙江军阀对俄国白匪谢米诺夫的受贿事件——张海鹏与同僚间的倾轧

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来尼古拉二世沙皇的侍从武官谢米诺夫率领几万白匪，在西伯利亚方面图谋与各方面的白匪军及外国干涉军联合一起，把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推翻，重建沙皇制的政权。红军在被解放的农奴援助下，跟这支白匪军在冰雪、荒凉的西伯利亚经过若干次的苦战，终于把它压迫到赤塔以东地域。中国北京政府与东三省巡阅使为防止这一支白匪军窜入国境内，乃命第二十九师长吴俊陞为边防司令，把他所部第二十九师布置于中长铁路的哈满沿线（哈尔滨到满洲里），以满洲里为重点命第五十七旅旅长耿玉田为哈满护路司令驻在满洲里。

谢米诺夫已感到末路即将来临，为预作将来到日本当寓公的打算，不能不把他的金银珠宝、珍贵的兽皮、各种精美的物品运送到大连。但这样做头一个难关是：需用的车厢及满洲里发送站的装载及铁路的运行，是非经过黑龙江省军署与现地的护路军司令部的认可不行。谢米诺夫派遣一个军官到哈满护路军司令部，秘密见耿玉田恳求他按要求帮助把事情办好，谢米诺夫将军愿以白狐皮几百张、金子若干磅作为报酬。耿玉田为做这笔买卖，就用一部分白狐皮、金磅，对督军署参谋长丁超、督军孙烈臣贿赂买通关

节。由于这样谢米诺夫就把他从俄国人民那里夺到手的说不尽的财物，就由哈满线畅行无阻地经过长春而运行大连，就靠这些财物东西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干着对于苏联进行破坏颠覆活动，在大连生活二十多年。

在1920年夏季黑龙江撤消了边防司令，吴俊陞率第二十九师返洮南，遗下哈满护路司令由张海鹏接代。在这年冬，谢米诺夫白匪军在苏联红军压迫下逐渐退到中国国境附近，已到穷途末路的谢米诺夫承认已无挽复的能力。他最后一着是请求中国政府的东三省巡阅使按照他的要求予以援助，经过折冲，中国方面答应按以下条件处理他的问题：

（一）白俄军残部完全退到指定地点满洲里，由中国军队解除武装。

（二）被解除武装的白俄军官兵由中国政府用铁路输送到哈尔滨。

（三）谢米诺夫将军及其家族由中国政府保护经铁路备专车送到大连。

作出这个决定后通告谢米诺夫，并指定哈满护路军司令张海鹏负责执行这一切任务。同时给苏联红军照会，要求他们对不能退入中国境内被解除武器的白俄军停止战斗行动以求谅解。张海鹏在受命后就把第四旅兵力调集到满洲里布置到周围，与谢米诺夫协定所有白俄军在满洲里西方18里小村集结后，由那进入满洲里市街内解除武装。在谢米诺夫承诺下按照协定的办法，把约两万白俄军的武装在满洲里尽数解除了。之后，把他们用铁路输送运到哈尔滨，谢米诺夫的夫人及其本身则用专备的车辆由张海鹏派一个马弁头目寇兰亭带几个马弁直接送到大连。关于耿玉田受贿的事情是张海鹏由谢米诺夫那方面听到的。

就由这个事件惹起奉吉黑三省军内部主要人物发生了嫉妒忿恨、报复、倾轧诸种丑恶的现象，把它的经过简述如下：耿玉田素与吴俊陞有隙，当耿把谢米诺夫的白狐皮、金磅遍贿孙督军及丁参谋长，使吴俊陞由嫉妒更增加了对于耿的忿恨。张海鹏随着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也转到吉林混成第七旅旅长。在转任时孙曾许张兼任吉长镇守使，及到吉林以后没想到孙烈臣就把吉长镇守使给耿玉田了。张海鹏在嫉妒之下，誓与耿不共戴天，他知道吴俊陞恨耿，乃与其谋，正趁吴的心情，就唆使张海鹏向张作霖给耿玉田揭发并愿作后盾，从侧方吹风进言。但由于不愿意投鼠忌器，不愿牵涉到孙烈臣和丁超的关系，竟决然去沈阳见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把耿玉田受谢米诺夫贿赂隐瞒大帅，不经过外交上的正式认可，竟私下里把俄国政治犯人的金钱物品，尚含有禁运出境的东西运到大连的事全盘托出。张作霖闻听之下，大发雷霆，当时把耿玉田调到沈阳下狱，听说没过几天就被处死刑了，并把吉林省督军署参谋长丁超免职，对于孙烈臣也大加申斥。张海鹏虽然泄了愤，但因为陷害了耿玉田牵连到孙烈臣、丁超身上，遭到孙之不满及全军的非议，觉得再在吉林军里干没有意思，他接着就向吉林督军提出辞职的辞呈，被照准了。他就携着新由哈尔滨侍仙班妓馆领出来的、作他四姨太太的马秋帆回到辽宁黑山县新立屯过隐居生活。

六、两次奉直战役中的张海鹏

张海鹏是个利欲熏心的人，他怎肯做田舍翁呢？回到新立屯一度退隐不过是等待时

机。果然1922年春第一次奉直战开火了，他看见机会已到，急忙跑到沈阳见张作霖，张作霖正在用兵的时候，当时就令他编制四营骑兵。他回到新立屯就纠集旧部军官，着他们分头招募，实际是收降胡匪，这样，在黑山、彰武、阜新、康平各地的惯匪、土棍、流氓、无业游民……乘机起来当了胡子，抢劫马匹财物，绑票勒赎，闹得暗无天日，使当地人民遭到意想不到的损害。

张海鹏把这支匪军编成后，正当奉军西线大败，从长辛店、固安、永清之线溃退一直出喜峰口，往奉天老家跑，东线作战部队受到影响，也自动地向滦洲方面撤退。在滦洲的张作霖，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非常焦急，由杨宇霆策划下决定在古冶线上防御，收容撤退的部队。正在这时张海鹏率领新编的四营骑兵到了滦洲，张作霖非常高兴，当时叫他增加到古冶方面构筑阵地。

奉军全部退到山海关外，到绥中一带作了一度休整后，又重整旗鼓对直军施行攻势，转移作战，使敌方遭到了相当的损害，才进行了议和，第一次奉直战至此告终。张海鹏在这次战争中出来支持危局有功，张作霖任命他为第一游击队统领官，令率所部驻在洮南和附近几县，担任“剿匪”及维持那一带治安。

张海鹏到洮南后，藉吴俊陞的力量在洮南县七十户与吴合办一个1000垧地的庄园，附设一个双义泉烧锅，在洮南街内又开了一个双义泰百货店、同盛和粮栈；在突泉县学用地开了一个烧锅，并经营几百垧地。他在洮南城西门里旷地修建一个西市场，修了很多的市房出租，着人开了不少家娼窑，并向这些地方放高利贷。

1924年秋，第二次奉直战开始了，奉天编成六个军。第一、三联军使用于山海关主攻方面；第四军由绥中向干沟方面攻击前进；第二军由义县向朝阳、建昌、冷口方面攻击前进；第六军由北镇向建平、赤峰方面攻击前进；第五军由通辽向开鲁、乌丹升林西方面攻击前进。这些部队于8月中旬集中完了开始行动。

张海鹏所率的第一游击队编入第五军归吴俊陞指挥。第五军到通辽集中后，由于开鲁的热河军张协堂部团长崔兴武的疏通，自动地把开鲁让出，退到赤峰，第五军就推进到开鲁，吴俊陞随即派张殿九独立骑兵团去攻取林西，为支援他刑（译音）方面，派张海鹏部西进到八旗楼子喇嘛庙（在开鲁西方约200多华里），当时热河北部的热河军完全都撤到赤峰。在这个地区内的各蒙古王公受直方政治宣传的影响，对于奉军多怀疑惧，有的揭起反抗奉军的旗帜，如奈曼旗奈曼王。张海鹏率部队到八旗楼子庙，他的司令部驻在喇嘛庙里，与主持喇嘛结为兄弟，通过主持喇嘛对各王旗用宣抚的手段，使热河北部各王旗完全归服，惟有奈曼王逃避出走。

第六军许兰洲部在指向赤峰途中到黑水与张建桐部遭遇，吃了败仗，总司令部令第五军往援。第五军于11月初到达建平，吴俊陞与许兰洲会面后商谈决定，一方利用吴俊陞、张海鹏与张建桐、张协堂有旧交的关系，联名写信向他们劝降；一方面派梁忠甲部准备支援许兰洲部进军（如果不降则行攻击）。几天后张建桐、张协堂派军使见吴俊陞表示甘愿投降，第六军即占领了赤峰。之后，第五军转进到朝阳。这时张宗昌、李景林第二军出冷口奇袭占领了滦州，张学良、姜登选一、三联军由九门口间道而入，攻下了山海关。这时，冯玉祥与奉军妥协变为中立，在承德指挥作战的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受到张九卿的劝说，也无条件地举全军投降。直系前方作战军已陷于四分五裂，形成了

战败的局势，曹锟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宣布下野。

张作霖以得胜将军的姿态进关了。当即发表命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阚朝玺为热河都统。吴俊陞因为战事结束，就由朝阳去北京见张作霖报告军状。张海鹏部暂驻在朝阳。

阚朝玺率第一旅赴热，以势孤请准张作霖着张海鹏率所部协助他到承德上任。张海鹏把阚护送到承德，阚意欲把张海鹏留在热河，许以军务帮办职务，但是张海鹏别有意图：一则他舍不得费尽心血经营的洮南的一切财产；二则是垂涎已久的洮辽镇守使，由阚朝玺的出缺，于是自己满有到手的希望，因而坚辞不就，带领部队回到洮南。

论功行赏，果然在1925年张作霖就把洮辽镇守使给了张海鹏。张海鹏借着这次出动，伪造了十几万元的报销，当然要拿出一部分贿赂各权要，首先是杨宇霆，上下买通，一切事都好办了。

张海鹏当洮辽镇守使后，掌握洮辽地区13县（康平、辽源、双山、梨树、怀德、瞻榆、开通、洮南、突泉、洮安、安广、镇东、通辽）军政大权，骄奢淫逸，为所欲为。有触犯则抓起来就监禁枪杀，成为一个专制魔王。

七、张学良掌政，老派新派间的矛盾和危机

1928年张学良继他父亲张作霖掌握东北政权以后，由于张学良的影响，在军内发生了老的和新的两个派别，凡是年岁老大的、腐朽、学术落后的则划为老派；凡是有新锐气氛、学术进步的青壮年军官则划为新派。张学良对于老派军官抱着排斥与不信任态度。比如他对于张海鹏，他认为洮辽毗连蒙古形成重要，而张海鹏由于资格老，性情骄傲横暴，恐怕遇事不听使用，更因为他是老牌军队那一套“作战不行，扰民则有余”，在必要时是难令人信服的，对于他要取提防态度。因而就把邹作华部移驻在洮安、东索一带，进行屯垦，实际就是防范蒙古与洮辽联结起来捣乱，把黄显声步兵第二十旅派驻到洮南、镇东、开通一带以监视张海鹏。这两支部队到洮南地区以后，对于张海鹏本身及洮辽军遇事常加以干涉限制。如张海鹏任由他的第四子张俊武无故枪杀马车夫事件，二十旅就支持公安局司法机关，要依法惩办。张俊武虽未就范，但是，他总是偷着跑出洮南而远遁了。张海鹏也自觉得难堪，随着登报声明，脱离父子关系。洮南蒙旗天恩地局执事人孟善章在屯垦军第二十旅的支持下，曾向张学良揭发了张海鹏对于蒙古旗的种种压迫行为。辽宁步兵第四团长鹏飞因为品行不端、行为散漫，常遭到第二十旅军官当面的讽刺，并借故到他团里寻隙以打击之。

张海鹏在这种情势下，心里非常忿懑，但自度自己力量不能与他们抗衡，无可奈何只得忍耐，因而不能不把过去的一切横行霸道的行为加以收敛。又同邹作华结为盟兄盟弟，他侄子张俊卿与黄显声是讲武堂同学，借着这个也拉上了关系，由此以来倒相安无事。

1931年夏初，为打石友三把第二十旅调进关内。张海鹏坐在客厅里开声了：“这些东西欺负到老前辈上来了，没死到洮南都滚蛋了，把我怎样啦？”他的大骂虽消了消他心中的闷气。但他对张学良却生出了憎恶愤恨之心，对于新派生出了忌恨与誓不两立的

心。由于有了这种心迹，他就走到了反对张学良方面。这一点被日本干特务的日本浪人摸着了，说不上在什么时候他被沈阳温泉旅馆经理宫川隆搭上了。他每次到沈阳必到那里去，过从是非常密切的，也不知他们搞些什么？惟有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宫川隆派他旅馆使用人李香洲领着日本特务大矢见张海鹏，给他拉纤向关东军投降，才揭开了这个谜。这么说来张海鹏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东北的狼子野心，并不是始于“九一八”以后，乃是履霜为坚冰之渐有由来也。

于此我独怪张学良对于张海鹏所以采取之手段是不相宜的，如果认为张海鹏腐朽、违法乱纪种种不当的行为，就应当机立断把他撤掉了。可是，不那么作还姑息养奸留用，既然留用，而不敢相信，又着人监视，越发使他心怀疑惑，最后走到敌人方面，尤其是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方面，这也许是张学良将军没有深思熟虑吧？

八、张海鹏叛国投敌，充当侵略的前驱

1931年日本蓄谋已久的“田中奏折”为积极实现征服“满蒙”的第一步，它在东北加紧制造万宝山事件、临江设领、中村大尉事件等等。在六七月间，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借视察“满铁”全线及“满铁”权益范围内的各地为名，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兵侵略东北，对“满铁”全线日本人采取行动作一个总体精神动员，另外兼做地方情形考察。他为视察四洮铁路（四洮路是借“满铁”的款建筑的，要由“满铁”管理）及洮南“满铁”公所，所以日程预定上也要到洮南。张海鹏由于亲日崇日，另外还抱着某种希望，他认为乘这个机会要把居于日本政界重要地位的内田康哉能攀上，对于他尔后的活动是大有帮助的。因而他对于洮南教育会针对内田康哉来洮南而特地召开的洮南市民、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大会的行动，竭力加以取缔，把洮南市民学生的排日浪潮抑压下去。此举很得洮南“满铁”公所的欢心，当内田康哉到了洮南，在洮南“满铁”公所所长河野正直替张极力吹嘘，张海鹏尽力谄媚，隆重招待，使内田康哉对他发生了极端的好感，认为他是帮助日本侵略东北的很好的一个帮手，成为后来关东军对东北侵略步骤上早已拟定利用的人物。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海鹏接到张学良的指示电报，他现出惊讶，但又像预感这个事件必然发生，他对于日本强盗的行为没有义愤心，却指责张学良的外交误国误民。最后却在与李盛唐参谋长密商下，以妥协的办法求洮南“满铁”所所长河野正直，由“满铁”方面对关东军从中斡旋，希望保全洮辽军、保全洮辽地方，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最初的动态，实际就是投降的苗子。

在9月下旬某天，由洮南“满铁”公所通知说“日本军就要到洮南来”。张海鹏当天拂晓时分，就指挥洮南、洮安部队（连垦屯军也在内）向突泉县方面退避，当日午后3时日本军羽山支队由铁路输送到了洮南。李盛唐参谋长由河野公所长引率与日军羽山少佐作了一回商洽谈话，日本军在“满铁”公所住了一宿，次日又返回郑家屯。这次日本军到洮南的目的，似乎是示警，也似乎是侦察。张海鹏于日本军走后，他率部又回到原防，他认为他过去所持的亲日态度是深为得计，所以日本军还给他留有地步。

在9月末，关东军派一个特务大矢带翻译李香洲由宫川隆的介绍见张海鹏说，关东

军给3000支步枪、借给钞票20万元，但要洮索路抵押的条件，要求张海鹏承诺与关东军合作。张海鹏原是借着日本势力起来的，很想有这种机会，再借助日本的势力给自己造成一种特殊有力的地位，竟冒天下大不韪，在用洮索路抵押借款的契约上签字盖章了，那个特务大矢很高兴这个交易做得顺利的成功，慨然答应了3000支步枪于三天后运到洮南。张海鹏算是承诺与关东军合作了。

接着张海鹏接到张学良一电令，任命张海鹏为蒙边督办，总管洮辽及蒙边一带军政事宜。张海鹏对于这个官职也欣然接受了，欲借此兼并内蒙古，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同他的心腹李盛唐参谋长、李延龄军需处长计议下就组成了一个包括军事、政治和财务各部门的机构庞大的蒙边督办公署。同时他把洮安的屯垦督办公署、二十旅留守处等机关都给解除了，所有的东西、被服装具统由督办公署、军械处、军需处接收过来。在关东军3000支步枪运到后，他就积极地扩张军队，一边改编警甲，一边收降胡匪，不出一个月就由原来的四个骑兵团竟突然膨胀到十五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因为收降的关系，致使洮辽一带胡匪蜂起，抢掠财物马匹、杀猪宰羊，所到之处，十室九空。

张海鹏既从关东军方面接枪接钱扩张了军队，又从张学良那里接官，当了蒙边督办，他的理念是，两方面给我什么我都要，我对两方面都先敷衍，借着这个机会造成一种特殊势力，拿它作资本，取得一个最高的政治地位。可是他玩这个巧着，关东军是不容许的，由前次进入洮南的羽山支队长羽山少佐突然到了他的公馆，拿出武士道的本事威逼他派遣参谋长李盛唐到关东军司令部出头。李盛唐与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商谈后，带了三个条件回到洮南。张海鹏即时召集蒙边督办公署主要人员及各支队长，把关东军要求的三个条件向大家宣布：一正式表明和关东军合作，与张学良的断绝关系；二许可日本军队进驻洮南一带；三关东军支援洮辽军攻取黑龙江，把军政大权交给张海鹏。接着张海鹏向大家表示“为洮辽军的存在及前途发展必须按这个条件去做!”他询问大家的意见，经过一阵的沉默，除了李盛唐、李延龄、张俊哲（张海鹏的长子）外，在第一支队长徐景隆的带动下，全部反对。理由是：怕担上了卖国的罪名，其次不愿意夺取黑龙江万福麟的政权。由这激起张海鹏的大怒，竟跳起来骂：“你们这些人都经我手提拔当了大官，到现在用你们的时候，竟来反对我，拆我的台，况且这个事也与你们大家有好处的。他妈的，不用你们看，姓张的小子自己干一场，你们都请出去！我谁也不用。”李盛唐也跟着帮腔说：“我们受了张家父子（指张作霖、张学良）十几年的气，还没受够吗？到今天不干还等什么时候干!”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李延龄、张俊哲忙从旁劝解。徐景隆这帮人都在旧军阀时代的思想支配下，为全私谊只得顺从地向他表示：“我们既然沐你老的恩，你老说怎样干，我们就跟着怎么干呗。”

由于这个会议的决定，使洮辽军发生了叛国投敌一个重大转变，更影响洮辽地区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平日吃着国家的粮饷，偏遇外寇侵入的时候，反而把国家人民出卖掉了，投降敌人。张海鹏是作俑其始者，是首渠。但这也不能不归咎于参加会议的洮辽军几个首脑人物，他们“受惠公庭、谢恩私室”，把与张海鹏的私人关系看得比国家人民还重，他们徇着私人的情谊竟把国家民族利益当作私人的馈赠而断送了，这就是旧时代军阀的“私兵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张海鹏投降日本固然是他想“投靠日本”，但多少还含点投机性，要说他真能矢忠不二地跟着日本侵略者，建立伪满以至拥护它到最后，却由于溥仪被日本拿到“满洲”当“皇帝”，也就因为他与清廷尤其是溥仪的历史上关系的浓厚封建思想，把他牢牢地捆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却抓着这个根源，乃因势利导地派一个森纠少佐对他进行利诱。为伪满建国，把他与溥仪双方面联系，最后溥仪派原肃亲王十一子宪原、十七子宪基持密旨，着张海鹏在他俩个辅佐下规划洮辽军政事宜，略取黑龙江匡助建立基业。张海鹏认为“忠于清室，忠于皇帝”，我要这样去作。他否认投降日本，就是这种封建思想把他固定下来，做到了“死生存亡，断弗分携”的地步，所以他一直到最后。这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于张海鹏进行工作的成功。

张海鹏在接到溥仪的密旨后，正好日本特务大矢由沈阳回来，就着手作侵攻黑龙江的出动计划，接着集结兵力。在调兵遣将的时候，黑龙江省方面已得到消息，在万福麟没在任上、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就由各方面组成以国防筹备处参谋长王静修为首的代表团到洮南，见张海鹏表示不抵抗，欢迎他到黑龙江去，张疑信参半，留王静修作质，就于10月下旬某日开始了狂悖地进犯黑龙江的行动。先两天派伪第一支队徐景隆率所部以陆路行军到江桥右岸构筑阵地，掩护伪洮辽军主力集中；伪第二支队、第五支队以骑兵独立团用铁路输送到泰来集结；伪第三支队以陆路行军到安广集结；伪第四支队（一个团）步兵团为洮南留守部队。这时张海鹏是利欲熏心，他唯一的就是热中于黑龙江的督军和省主席（他的四姨太太马秋帆由于羡慕吴俊陞夫人李助君拥有千万财富，她很愿意当督军太太，她也竭力怂恿），他站在洮南东车站站台上疯狂地吼叫，亲自指挥部队搭载的兵车，一列一列往泰来开去，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黑龙江当了前驱。

当伪洮辽军主力进犯黑龙江，由洮南一带出动后，日本军铁道守备队第六大队在日军上田大队长引率下以铁道输送，由郑家屯到洮南南站下车进驻洮南，把洮南东门外洮昂路局划出一部作为它的宿营区域。同时派出宪兵及特务深入到伪蒙边督办公署及其他地方行政机关以达到控制的目的。伪洮辽军留守部队要受它的驱处，尤其是伪警察要受日本宪兵队的直接指挥，日本人的旅馆、料理、杂货商业者也都跟踪而至，由那时起洮南就进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变为它的殖民地，洮南人民也就从那时起当了它的奴隶，历尽饥饿、鞭打、监狱……种种非人的生活一直长达14年。

张海鹏在到泰来的途中突然发生他意想以外的情况：第一，伪第一支队长徐景隆在侦察阵地中被地雷炸死，失掉他一个膀臂，使他精神非常沮丧；第二，马占山受张学良命令指挥黑龙江军屯垦军，在嫩江左岸构筑阵地，破坏了江桥，拒止洮辽军进犯。张海鹏原想由于黑龙江各界的欢迎，满可以顺顺当当就进了齐齐哈尔，由于情况这一变，马占山指挥那些部队进行抵抗，他自度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及，竟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得不求助于关东军。实际上这正是关东军的圈套：使用伪洮辽军进犯黑龙江，是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如果洮辽军不济事，请求援助，乘伪洮辽军主力都到第一线，后方空虚时日本进驻，接着派多门师团经过洮辽一下子就进到江桥线上，不费吹灰之力，一路就把洮辽及蒙边完全收到手里，并进而夺取黑龙江。这就是日本常说的“一石二鸟”。

1931年11月中旬，日军多门师团攻击江桥作战的同时，命伪洮辽军第三支队、第

五支队侵攻大赉；第二支队攻景星，威胁黑龙江军的两翼，支援多门师团对于江桥的正面攻击作战。马占山将军指挥的抗日部队在不利的情况下，经由齐齐哈尔向海伦方面退去，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被多门师团侵占后，由关东军指派的伪黑龙江省主席是谁呢？却不是张海鹏，而是被不声不响的张景惠悄悄地弄到手里。原因是：张景惠早就是“田中奏折”，满蒙政策中的夹带人物，资格比张海鹏更为合适。张海鹏大吵大嚷闹了一场，结果落场空，他很败兴地率领洮辽军返还洮南。由于他引狼入室，使黑龙江全省沦陷到日军手里，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九、张海鹏在关东军操纵下帮助建立殖民地秩序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用突然袭击手段占领了沈阳、长春及南满、安奉线上各城市。继而勾结在东北具有实力地位的张景惠、熙洽、张海鹏、于芷山、于琛澄这帮汉奸作为它侵略东北的工具，不出数月就把洮辽地区、东边道、黑龙江半部、吉长沿线、哈长沿线地域中各主要城镇完全归入它的掌中，在它的控制下。但是，除了这些主要城镇以外的农村的农民抗日组织及抗日义勇军，却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生长出来，尤其是认为心脏部的沈阳到长春、到吉林这个地域中的抗日势力更为强大，关东军所在地的沈阳都遭到打击。关东军为急于建立伪满统治政权，第一步必须把这心脏部的“反抗势力”消除干净，使“治安”巩固下来，这是它当务之急。然而凭它的兵力是无暇作到的，它就不能不利用投降的伪满军来充当它的爪牙，根本就是它原来所抱的“用中国人打中国人”毒辣的方针政策，以下就是日本关东军使用张海鹏指挥伪洮辽军在各地削平抗日势力的概述：

（一）

1932 年 1 月末，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令张海鹏速率所部洮辽军到法库、铁岭、彰武、康平各县“讨伐”，务期把这个地域内“土匪”彻底消灭！

张海鹏接到这个命令是非常高兴，他想前次打黑龙江没有成功，这回关东军又给了这个任务，“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借着这个机会“立功”也能得到好处，并且乘这个机会能向关东军要钱、要服装、弹药。为此，他一方面派参谋长、军需处长到关东军去联络；一方面把部队集结完了，向任务地出动。张海鹏率伪第一支队前往法库；令伪第四支队担任彰武境内“讨伐”；伪第三支队担任康平“讨伐”。

张海鹏原来在法库驻防过，因而他刚下马，法库所有的老亲故友当时就把他围上了，这些人有的是官僚，有的是地主，或者是资本家。县长梁维新、维持会长陈丹林、教育局长王智、商务会长张茂亭、原省议员韩项臣等人，他们急忙地报告“匪情”：法库南境有“长江好”部五六百人；法库西境有侯三家子有天缘好部约三百人，是法库心腹之患，他们盘踞在陈区长的窑子内，假抗日为名捐钱、捐款，攻打各村并要进窥县城，虽报过日本守备队但也没有来援救。接着他们对张海鹏极力奉承地说：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想不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来给我们解围。我们法库虽三尺童子也要竹马相迎。张海鹏在他们这一路恭维之下高兴地说：这点毛贼子算不了什么，包在我的身上！当天

的夜里他把伪第一支队长王之安找到，面授机宜："乘敌人不知道，要在拂晓前把他们围到陈区长窑子里尽数歼灭"。

在这里要说明陈区长"天缘好"的抗日组织与法库地主阶级的矛盾情形：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沉痛地看到东北沦陷，民族苦难临头，很多爱国人士奔走呼号，毁家纾难，揭起抗日旗帜进行英勇斗争。陈区长兄弟和他的侄子就是这样的爱国人士，同"天缘好"把当地二三百名农民组织起一支武装抗日农民军，他们对于抗日的行动步骤是：先联合法库各处的抗日农民军到一起夺取法库县城，尔后再与铁岭刘海泉等义勇军联合到一起攻打日本守备队并夺据铁岭城。这支抗日农民军的粮秣服装是由地方征用，可是在一些大村屯如五台子、双台子、登什堡子、丁家房……有些地主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把本村农民组织起来，成"自卫团"、"连庄会"与抗日农民军对抗，拒绝一切征发。因为这个原因，"天缘好"就领着抗日农民军攻打过这些村子，但都没有攻破。这些村子的地主"自卫团"，请求铁岭守备队火速派兵来讨伐。这也是关东军要伪洮辽军火速到铁、法、彰、康讨伐的主要原因。

伪洮辽军第一支队在张海鹏的指令之下，乘"天缘好"部抗日农民军没有防备的状况下，猛扑到陈区长窑子，从四周包围了。虽然在不利情况下，"天缘好"和陈区长还是指挥那些农民军竭力抵抗，持续到第二天，在实在不能支持下而放下了武器。可是残忍无比的王之安进到院中竟令他的爪牙把"天缘好"及生还的七八十名抗日农民军都一齐枪杀了。张海鹏更认为陈区长弟兄是有土地房产的人家，还成立大帮"匪团""祸乱乡里"，是大逆不道，他叫把陈家全家族捕来一律处死。后经法库人民推出代表要求对陈区长全族人予以免刑释放。张海鹏迫于群众压力只得仅把陈区长二弟枪杀。

伪洮辽第一支队在侯三家子战斗结束后，就转到伊索牛录堡子方面，但"长江好"部已先期向沈阳境内转进，他的后尾被追及牺牲了二十多人。

张海鹏在法库"讨伐"结束时，他特别责成法库西、法库南当地的地主豪绅杨梦白、马春田、苏庄头等，叫他们着手把地方自卫团办好，把"治安"巩固下来。

1932年2月下旬，法库境内的农民抗日力基本上都被摧毁了，张海鹏就把伪洮辽第一支队及在彰武的伪第四支队一同调到铁岭县，日本铁道守备队田所大队长极表欢迎，因为刘海泉部义勇军"金山好"部农民抗日军一千多人驻在上下石碑山一带，正威胁着铁岭城。田所举行一个盛大宴会招待张海鹏，席间他对于张海鹏在法库"讨伐"，把抗日势力消灭取得的"胜利"极为奉扬，并要他去消灭铁岭义勇军、抗日军。张海鹏受到主子这样的鼓励慨然应允。接着他对法库地方治安问题向田所献策，田所很同意，责成当地地主们出头办"自卫团"，维持"治安"，并答应由守备队方面给予援助。

1932年3月上旬，伪洮辽第一支队、第四支队到大小凡河一带对上下石碑山刘海泉、"金山好"两部抗日军开始进攻。那两支义勇军刚一接触就经由山岔子分向大甸子、清河川方向退去。两支兽性般的伪洮辽军在后面追击，就在这场战斗中把素日没有训练的、没有战斗经验的农民抗日军、义勇军完全被他们打垮了，使日本守备队最为震悸的、很出名的"金山好"首领和三百多名的抗日农民都英勇牺牲了。而在关东军认为最棘手、遍地皆是、纷乱如麻、无法弄清的抗日势力竟由张海鹏伪洮辽军摧残殆尽，

除去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地区的大患，使南满心脏都得到“稳定”，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所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特别给张海鹏一封贺信，奖励备至。也由这，张海鹏在伪满换得最高地位——伪上将侍从武官长、洮辽警备司令官，获得了20万元“建国功劳金”。他陶醉于他的事业的成就，曾高兴地对我说：“当初我主张跟关东军一起干的时候，你们都不同意，我们把‘皇上’（指溥仪）保出来，今天大家都好了，我做的就算对了！”所以他在伪满建国后，在关东军驱使下更加卖力地从事“讨伐”活动与镇压人民。

（二）

在伪满建国后，长春地区四围抗日势力骤然活跃起来，关东军为巩固伪新京和傀儡政权，把在铁岭“讨伐”终结的伪洮辽军迅速地调到长春担负守卫。溥仪任了伪满执政，因为他与张海鹏历史上的关系，对于张特别倚重，所以任他侍从武官长。这时又把他所属的伪洮辽军调到长春作为近卫军。这部伪军军纪不好，被张的政敌在关东军处告了一状，最后把这两支伪支队撵出去，命驻在哈长线三岔河附近。

1932年5月间，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号称万人，由黑龙江进入吉林，占据扶余镇到长春岭一带。伪军政部令张海鹏部伪洮辽军与吉兴部伪吉林军联合“讨伐”，张海鹏亲自指挥伪洮辽军一、四两个支队，由三岔河向扶余镇方面，吉兴指挥伪吉林军向长春岭方面前发。在这两支伪军出动后，在扶余镇的李部撤到长春岭与主力合在一起，当伪吉林军进攻时，李海青部刚一接触稍遭到损害，即放弃长春岭而返回黑龙江境内，扶余境内抗日势力基本上没有了。

1932年7月，冯占海、宫长海吉林抗日义勇军在榆树、德惠、舒兰一带活动，关东军及伪军政部看成是“肘腋之患”，乃组织一个日满军“联合讨伐”，由日本军舟桥联队长指挥吉林刘宝林旅及伪洮辽第四支队由榆树向舒兰方面进击，冯、宫两部受到压迫，为回避作战由舒兰撤出，这次“讨伐”就是这样告了结束。后来关东军、伪满军政部为彻底消灭冯、宫两部，厚集兵力把伪洮辽军第四、五支队都归吉林吉兴指挥，由8月间开始“讨伐”，这两部吉林抗日勇军在受强敌压迫的不利情况下，不得已于11月初由吉林撤出向关内转进。

张海鹏在伪满建国以后，因为侍从武官长职务，驻在伪满“新京”，而伪洮辽军又把两个支队调归吉林，一个支队留在法库。在所谓“无人坐镇”及防务空虚的情况下，张学良方面有计划地组织的抗日势力乘机渗入洮南及四洮线西侧地区。在洮南城内潜人的赵万里，对伪洮辽军步兵团中校团附冯秉忱（他在李景林部队里曾与赵万里同事过）进行工作，利用他鼓动伪步兵团内部起义；对地方工作则秘密连络慈善学校（张海鹏主持，由红卍字会出款办的）校长，联络地方开明绅士姜希九，通过他们取得与洮南教育界和地方的联系，与步兵团的起义相配合。在瞻榆方面派遣原来热河军的团长胡宝山及原二十旅屯垦军将校组成的武装抗日义勇军占据了瞻榆，以之为根据，逐渐扩展势力，与洮南方面抗日行动相呼应。

张海鹏于8月由长春回到洮南，冯秉忱为献功出卖了赵万里，向张海鹏告密，张海鹏当即派出他的爪牙逮捕了赵万里及慈普学校的校长等若干人。只姜锡九一人逃出，张

海鹏把这些爱国志士不分首从，全部绑在车上经过六街示众，拉到刑场枪杀了，洮南人民的抗日活动被镇压下去。张海鹏把洮南城内的抗日势力扑灭后，就把视线转移到瞻榆方面，他认为那是北平方面策划反满抗日一个前进基地，是洮辽一带抗日势力的根据地，非得把它拔掉不可，不然，洮南方面是得不到“安宁”的。于是在10月间，把驻在洮南的伪洮辽第一支队独立骑兵团、驻在法库的伪第三支队都集结在开通，11月间在张海鹏亲自指挥下，对瞻榆胡宝山部抗日义勇军发动进攻。胡部因兵力装备处于弱势，物资缺乏，在不能抵抗的情况下，乃把瞻榆放弃，退到热河境内，从那时起洮辽方面抗日势力基本被消灭了。

十、张海鹏窃据伪满热河省军政大权

日本帝国主义在建立伪满洲国、侵占了辽吉黑三省后，不以为满足，还要扩展到热河。最初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引诱汤玉麟自动归附伪满，曾几度派人去游说都遭到汤玉麟的拒绝。

1933年初，关东军乃决定用武力夺取，它在辽热边境上集结了第六师团、第八师团、茂林骑兵旅团，而假名为伪满“讨伐”热河以掩盖它的侵略行为。因为这样它临时编了许多伪“讨热军”以虚张声势，并由伪满政府命张景惠为伪讨伐热河作战总司令，张海鹏为伪讨伐热河作战前敌总司令。张景惠到锦州给几支伪讨伐军下达一个出动命令，就返回了长春。实际日本军国主义者主要是利用张海鹏及其所部的伪洮辽军作它的鹰犬，这是在侵热作战以前早已制定的方针，夺取热河后，把掌热河省军政大权的傀儡即由张海鹏充之。因为他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忠实奴仆，在侵略黑龙江曾做过前驱，又扑灭了各地武装抗日势力，为酬佣他的“功劳”，并且也为鼓励他再一次帮助它们去侵占热河。至于张海鹏本人，是早已蓄意要谋得一个总揽一省军政大权的地位。因而在他受命后兴致勃勃地跟日本顾问佐久间亮三少佐一同办理编成伪讨热作战军，及一切动员、输送直到集中。

张海鹏率伪讨热作战军王永清第一支队、鹏飞第二支队、刘茂义第三支队、索景清暂编第三支队、两个炮兵大队，于1933年2月初到通辽集中（傅铭勋第四支队由吉林出发尚在途中），这时热军李守信部投降，日军第六师团则由开鲁、库伦旗之线向赤峰方面推进。关东军指命张海鹏伪部进至开鲁，开鲁城内就一种骚乱恐怖气氛，满街充斥伪军人马车辆，各处不断发生枪声，居民纷纷逃避。匪一样的大兵，随便用枪打猪、打鸡或是恐吓老百姓，逼索财物。

在关东军的指令下，张海鹏派出素以勇悍善战的王永清率伪第一支队夺取林西，协助日军茂木骑兵旅团，把乌丹以西到围场这个地区中的热河军势力完全扫荡干净，归于日本军控制下，这是张海鹏在讨热期间报效日本主子第一功。

日军第六师团侵占赤峰后，日军第八师团由朝阳组成一个快速部队，连下凌源、平泉。在汤玉麟部撤向古北口的次日，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即进入承德，日本军当即准备第二期作战。为把兵力尽量投入到第一线，遗留的后方就使张海鹏部伪“讨热作战军”来填补，以建立占领地的统治，也就是构成伪满政权一个架子。关东军命令张海鹏率伪

“讨热作战军”前进到赤峰，他见了第六师团长坂本中将，坂本为羁縻他，当面极为赞扬他协同作战上的“功绩”，张海鹏受到主子这样垂青真是“受宠若惊”、“感沁心脾”，时时不忘坂本中将，他常说“板本阁下”对人“推心置腹”。

当侵热日本军第二期作战开始前，关东军要尽快组成伪热河省的军事政治机构，完成它第一期作战那个阶段的任务，同时也为转入第二期作战，为接代日本军留下的后方警备，及在伪政权的控制下使后方对于作战上能给以充分的支援。因而关东军第一个命令是令“张海鹏速将所部‘讨热作战军’分进到热河西部各地，担负警备及作战的任务，细部由顾问指导之”。张海鹏接到这个命令在佐久间顾问“指导”下，命王永清支队由林西转进到围场，担任热河西境警备，防御刘桂棠部之进出；索景清支队由赤峰前进到大阁镇，“扫荡”该地域内的汤玉麟残兵；傅铭勋支队由开鲁前进到丰宁小黄旗一带担任热河西境的警备及防御在大滩汤玉麟军的反攻；刘茂义支队由赤峰向隆化前进，担任该地的警备。关东军第二个命令是命张海鹏急速进至承德，组成伪军政两署。张海鹏在接到命令后，乃令鹏飞率骑兵1200名为挺进队，三日间途程600里到达承德，掩护张海鹏进入了伪热河省公署，接见了跟随日本第八师团先期到达的伪满政府派遣的以中野琥逸（伪民政部总务司长）为首的一行日本官吏。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把这一起人先带到承德，作为构成伪热河省公署的基干，只是到相当时期（日军第一期作战终了，热河省基本上达到可能控制的地步），才叫张海鹏到承德挂起伪热河省公署的牌子，建立殖民地的统治权，以使日本军国主义继续侵略作战的后方得到可靠的保障，并施行奴役和掠夺。

张海鹏在日本主子的安排下，掌握了伪热河省军政大权。当时伪省公署及各县的人员任用是有如下的情形：由第八师团指定，民政厅长采用了当地有力者张翼廷（原热河省厅长），警务厅长采用了日本人小林宪兵中佐，其他人员的任用权，都握在新任的伪热河省公署总务厅长中野琥逸的手里。因而张海鹏不能畅所欲为，只是推荐了恩麟为伪实业厅长、申振先为伪教育厅长、广轮为伪省参事官，至于科长级则几乎全是中野带来的人补上了。关于县长方面张海鹏推荐出丰宁县长冯子敬、滦平县长赵桂馨、平泉县长王冷佛、隆化县长祖怡、青龙县长王槐三、阜新县长张遇春，以外有县科长几个人，就这些最初也多遭到中野的拒绝，以至发生龃龉，后来经过伪省人事科长庞凤书的折冲，才勉强做到的。这些官吏们多是通过向他的四姨太太马秋帆贿赂，以金钱、珍贵物品所买到的。

这个傀儡政权不能像旧政权吴俊陞当黑龙江省军兼省长时代，自己掌握着生杀大权，奔走运动的人拥挤得户限为穿，馈赠的金银财宝、珍贵的物品争相赌奇斗胜，这使张海鹏深感不足。在这点上他才有点不满于当牌位，对于日本人“说了算”暗地里不断咒骂。

1933年5月，伪热河省公署举行开厅式，从那时起，张海鹏正式就伪热河省长职。他每天上午一定到省公署上班。出于“为满洲国好”、“为日本国好”，经过深思熟虑，向中野琥逸提出两项建议：第一热河省没有别的物产，专靠种大烟来维持，今后还必须要大种植鸦片；第二热河省民风刁野，并且他们手里都藏有许多武器，过去奉军很吃过亏，防患于未然，必须彻底地把民间武器回收。这两个建议深得中野琥逸的赏识，要他

一定把这两项放于主要地位。这两种政策的后果：第一，买收鸦片时，对老百姓的逼索、敲诈，甚至翻箱倒箧进行掠夺，最后给百姓留下的是：没有粮食吃树叶，到冬天没有衣服、赤条精光，而且增加了鸦片吸食者，连跟随张海鹏到热河的官兵和家属，有很多的都染上了大烟瘾。第二，武器回收时，对于老百姓逼索拷问，各处搜翻等同抄家，遭到各种损失，就政治上说是把群众的武装完全解除了，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得到加强，达到它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和掠夺的目的。

至于伪热河省按照伪满政府本着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所制定的政策——伪满“国策”，强化警察权，压制人民推行一切伪满政策，强化地方“治安”及镇压人民反抗，在民政方面：强化地方街村组织，以加强所谓末梢神经；在实业方面：重点地进行各地矿藏的探查；在教育方面：施行奴化教育。张海鹏积极“指导”各厅推行这些政策，伪热河省各个方面涂炭人民，给他们带来数不清的灾难。

伪热河警备司令部在同年5月下旬成立，它的成员是以伪洮辽警备司令部的成员充当，不过在部外设有日本顾问部，主任顾问佐久间亮三少佐，另外还有大尉顾问二名，专任对于伪热河警备司令部及全军指挥。

张海鹏在任伪热河警备司令官后，为尽忠于伪“皇帝陛下”，比日本顾问的要求做得还要积极。他与第八师团长西义一密切的联系，为支援第八师团在长城线上作战，曾命令伪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张俊哲支队后调到承德）对承德、滦平、丰宁地区内的抗日义勇军和汤玉麟的“败残兵”施行扫荡，并对在窄岭（丰宁境内）附近的黄显声旅，在大滩一带的汤玉麟部令加戒备防止其反攻，这就使得日军谷旅团在热河西南部对于宋哲元作战容易，把张自忠部队压迫到西部长城线上，原属于察哈尔的黑河川一带被日军夺到手中（后划入伪热河省内归丰宁管辖），就达到日军第二期作战的目的，它的势力发展到西起独石口，东迄山海关的长城线上。后来与中国停战的《塘沽协定》，它则称为长城协定，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另有用心，使中国这些国土丧失到日本强盗的手里，实际张海鹏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守信投降伪满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侵略野心，指命李守信夺取多伦，作为将来进犯察北的立足点，张海鹏与李素有连络，并借此要进一步和他勾结，就派王永清支队协助李守信攻占多伦，并对于李部的后方一切，尽力加以援助，帮助日本军国主义养成了一支侵攻察北及开辟伪蒙疆政权的一种邪恶势力。

汤玉麟把由热河撤退的热军大部集结在大滩一带，意图再举，成功与否不说，不过还能影响热河西部人民反抗日本强盗的意图，多少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道路上一个障碍。可是张海鹏为消除威胁起见，假与汤玉麟友谊上的关系，为汤找下台，曾在承德日本特务机关及日本第八师团方面从中斡旋，汤玉麟派董福廷旅长到承德接头，后来究竟是拿什么条件解决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但是经过这次的交涉，汤玉麟把他的部队解散了，从那完全解除了西部的抗日势力，使伪满对热河省能得到确实的控制。

日军第八师团作战完了，在佐久间顾问的“指导”下，张海鹏把所率伪部队配置于各地区担任警备及“讨伐”，并置重兵对承德地区的孙永勤部队义勇军、朝阳县羊山地区“老耗子”、阜新一带的“老梯子”、“苑九台”等部农民抗日军施行“讨伐”。热河省境内的抗日势力孙永勤部被消灭，“老耗子”、“苑九占”都被压缩到阜新方面，使

伪热河省“治安”渐次得到巩固，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殖民地秩序。

到1934年秋，伪满基于关东军的方针，对于伪满军施行编制改正，伪满省行政区也重行区划，伴随着的是对于人事的更换异动。伪热河警备司令部改为第五军管区司令部，伪热河省缩小，把朝阳县、阜新划归伪锦州省。在伪热河省军政机构改革时，日本顾问关原六大佐乘张海鹏在伪新京的时候，赶紧找参谋长李盛唐到一起进行编制改正，关原首行提示：张海鹏阁下因武官长职务离不开皇帝近旁，为此要免除他的热河警备司令官及热河省长职务，以专任侍从武官长。接着在改编的人事更换上，又把张海鹏宠爱的亲信的人给免了若干，团长中有他最宠爱的儿子张俊武、最素亲信的团长王永升、苏德臣，司令部内有军法处长孔谏石、军械处长任荣九、中校卫队长苏承武、少校卫士杨清泉等……这个事件激起了张海鹏极大的愤怒，竟当面把关原六大骂。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对于主人这样的放肆，是因为关切到他本身利害的问题，触到他心里的痛处，而不能克制所发出来的。

张海鹏帮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热河，使祖国大好山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热河300多万人民沦为的奴隶。尤其在以后十二年中，日本帝国主义从这块土地上掠夺去无数的物资，在这块土地上施行了“三光”政策，使多少村镇变为废墟，使多少中华儿女血染黄沙；由于热河沦陷到敌手里，就使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逼近平津，就成为他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一个阶梯，接着出现了伪冀东政府、冀察自治委员会。推演到七七事变竟大举进攻华北……遗患无穷，论起张海鹏的罪恶是擢发难数。

十一、任伪侍从武官长的一段生活

张海鹏既有“臣事”君以忠的封建思想，也有封建宗教迷信思想，他对于溥仪的关系是历史上的关系，从大清宣统皇帝到伪满康德皇帝，他一直视为“正统”，他谨遵溥仪的敕谕，对于“皇帝陛下”要“竭其股肱之力”。另外，他是由一种荒谬奇诡的迷信上出发的，就是由他最迷信的红卍字会、老祖降坛的乩语中说“皇帝（指溥仪）是刘备转世，张慈普（张海鹏的道号）是张飞”转世，彼此的关系是“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情”，应当善为辅弼！他得到神的指示，把他与溥仪的关系形成桃园结义的关系，更把他与溥仪深深地连在一起，为此张海鹏对于溥仪具有“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忠心赤胆。的确，他从任侍从武官长那天起直到最后，十四年如一日，对溥仪唯恭唯谨，尤其他扈从溥仪两次访日时期里，随侍在溥仪的身傍跟前跑后，处处表现得更为恭谨，不辞劳苦。由于这样也使得溥仪对张海鹏是更加倚重，“君臣之间”更加契合。他在谈到溥仪事迹时极口称赞“圣德”。溥仪第一次访日，回答“大正皇后”的“我又多一个儿子”的话时说：“我每天对着出来太阳的东方，就想起您这个母亲来！”对此，张海鹏大为赞赏，说“陛下是多么聪明睿智，真是天生圣人！”就这一点也看出，他对溥仪是如何的崇敬。

张海鹏既为溥仪所倚重，而又是伪满建国有功者，他能攀得上日本“皇族”、“华族”、“元老”、“重臣”、军部和政界有力的人物交结，借机会又馈赠些珍贵的东西，因而他能得到这些人事的援助，所以他在伪满军中是首批得到将军称号的三人中之一

（其他二人是张景惠、于芷山），终身受上将的待遇（等于元帅）。并且他任伪侍从武官长职务一直到1941年，成为伪满的“元老”、“重臣”，而又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始终不渝的忠实奴仆。

（1963年）

土匪　军阀　汉奸——张海鹏

黄显升*　文建章

张海鹏在民国十三年（1924 年）到洮南任洮辽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他投降了日本，任伪满洲国的侍从武官长，1951 年镇压反革命，被处决于北京。

一、"赳赳武夫"的历史管窥

张海鹏好讲自己的历史，常自诩"赳赳武夫"。每当谈起经历来，"赳赳武夫"总不离口。"赳赳者"，威武雄壮也；"赳赳武夫"者，即所谓大英雄也。要翻开张海鹏的全部历史，他原来却是一个称霸一地的土匪头，贪婪的军阀，出卖祖国和人民的汉奸。

杀姑母投身绿林

张海鹏，原名张连锡，奉天海城人①，清同治六年十月初五（1867 年 10 月 31 日）生，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患天花，脸上落下一些疤痕，当地人称他镇守使，背地里都叫他"张大麻子"。他亲哥俩，他是老大。他长得高大魁武，干起活来很有力气。他年纪轻轻就与其弟给地主干活。

张海鹏的青壮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时代。由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对人民的荼毒，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和黑暗腐败，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促使受害最重的辽南一带，土匪尤多。

辽南一带的贫苦人民，由于地方糜烂，兵灾不断，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社会上动荡不安，很多青壮年便铤而走险，啸聚徒众，竖起了绿林旗号，吸引一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辈。

张海鹏哥俩不堪受生活煎熬，明着给地主做工，暗地里都与绿林来往。有时在黑夜里，还干过"棒子手"（用棍棒进行拦路抢劫）勾当。有一天，张海鹏的弟弟与人出外抢劫，被人认出，报告了官府，遭到清兵的追捕和通缉。其弟无处安身，便逃到他的亲姑母家中，想隐匿一段时间，躲过追缉，再寻出路。

张海鹏的姑母是个有钱的地主人家，早已知道官府的通缉。她侄儿的到来，使得她惴惴不安。按大清刑律，藏匪不举与匪同罪。如不举报自己的侄子，家要被抄，人也要被杀头。他姑母怕遭"连坐"，祸及满门，便不顾自己侄儿生死，径向官府，自首举

---

* 作者黄显升曾任洮辽镇守使署军法官。

① 张海鹏，辽宁省盘山县沙岭热合台人。

发。张海鹏之弟不知其姑密告官府，毫无准备，等清兵拥进院内，已无路可逃，遂束手被擒。清时律例，如抓获土匪归案，不经审讯，旋即枭首示众。

张海鹏听说其弟被斩是其姑母首告，极其气愤，便找到他搭过帮的几个土匪，趁一天黑夜，张海鹏带领十余名匪徒，进了他姑家的大院，张海鹏带领三四个膀大腰圆的匪徒闯进了上屋，其姑跪在地下不断向张海鹏叩头，请求宽恕。张海鹏不容其姑母申辩，挥枪立毙其姑母于地下，将其姑家的钱财细软洗劫一空，旋即扬长而去。从此，张海鹏便走上了飘泊不定的绿林之路。

由于张海鹏亲手杀其姑母，又抢来不少财物，办事有胆量，又有计谋，便推举他当了这个小绺子的头目。张海鹏当了土匪之后，再不能报其真名实姓了，他叫张连锡，便取名字里的“连”字，匪号报“大连子”，这个绺子也叫“大连字”绺子了。最初，这个绺子只有十数个人，拉起旗号之后，就有人参加，很快他们就发展到几十人。由于他们人少，枪又少，势力很弱，不能拉帮抢劫，只好活动于海城以西、盘山以南一带的南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南荒”。那里是海退河淤之地，遍地芦苇丛生，便于隐蔽，不易被人发现，特别是青纱帐起时候，更不怕清兵的围剿。

辽河以西大小股匪有上百伙，三千余众。其中称霸一方的主要有：广宁（北镇）南部的冯麟阁；占据姜家屯一带的洪辅臣；辽中一带的杜立山；占据海城田庄一带的金寿山；占据江家屯、红罗岘山一带号称“五大哨”的江显真、江显泰和苑四、苑五等人；在八角台（台安县内）的是张作霖和张景惠等。这些绿林势力不怕官府（官兵不敢去剿），相互之间相抗衡，谁也吃不掉谁。只有张作霖等因人少势弱，占据的地盘不大，勉强与其他各大帮周旋。张海鹏的绺子更小，势力更单，不得不依附于当时势力最大的冯麟阁帮，以避全伙覆灭的危险。

后来，各绿林匪帮都占据一定地面，对百姓则称其“为此地保险”，要当地出钱出粮供养他们，成为地方上公开割据的武装集团。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有的地方官还接受贿赂，同意他们成立的“保险队”为地方武装组织。

各股匪（“保险队”）恣意在境内收取费用，有的还设卡收费。张海鹏就曾在海城北的辽河岸边一个叫“黄地”的地方设卡，拦截过往船只，强行收费。凡路过此地的船只必须靠岸交上一银元，否则不准通过。对不交银元，要强行通过的船只，他们就要“打水鸭子”（对船射击）。对进行反抗的船只，他们则把船夫或客商打死打伤。当时没有铁路和公路，外运出海必走辽河水路。特别在春秋之际，辽河上过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张海鹏帮就这项“过路钱”，一年也能“收入”近万元。

助倭寇获日方垂青

张海鹏常讲，“我发迹全靠借日俄战争的光”。光绪三十年（1905年）日本天皇下诏向沙俄宣战。这场战争是在东北境内打起来的，我国历史上称之为“日俄战争”。

清廷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只哀求交战双方不要把战场越过辽河以西。辽河以东划为战场，沙俄军队依仗自己的强势，无视清廷的“中立”条件，恣意在辽河两岸抓民夫，抢车船，掠粮食，宰杀耕牛，杀人放火，拆毁房屋，奸淫妇女，无所不为。清廷对此却不敢提出抗议。

沙俄军队的强盗行径，激起了辽南广大地区人民的愤慨，纷纷要求“保险队”打击来犯的俄军，严惩“俄大鼻子”（当时叫日本人为“小鼻子”），保境安民。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汲金纯，他是奉天海城县牛庄镇金家湾子人，与张海鹏是年青时的好朋友，都给一家地主做过工，又一同参加绿林。后自己立了旗，当了匪首，但人员和武器都与张海鹏一样，他们只能打击到村屯抢掠奸淫的零散俄军，因为使用的都是些土枪，还有的使用刀矛，遇有大股抢劫的，则不得不避其锋芒了。形势逼得一些小股投靠大股，后张海鹏和汲金纯都率众投靠多次与他们“会哨”的大帮首领冯麟阁麾下。

冯麟阁，又名德麟，字阁忱，奉天海城县西北龚字地人，清同治七年（1869 年）生，与张海鹏、汲金纯都是一个县的人。冯麟阁 17 岁就当胡子，日俄战争前，他只有百把十人。由于冯麟阁打击俄寇，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赞誉。在张海鹏与汲金纯等小股与他合并后，人员猛增到数百人。他们经常歼灭小股作恶的沙俄军队，使俄军不敢随意到乡间胡作非为。人们就把抗击俄寇的这些绿林武装称为“义勇军”，很多具有爱国心的青壮年也纷纷来投。自张海鹏、汲金纯投靠冯麟阁的大帮后，势力发展很快，手下皆统领二三百人。只是缺乏枪支弹药，还没有对俄军构成更大威胁。

在日本对沙俄的战争中，日军谍报人员发现了“义勇军”的作为对日军有利，遂于光绪三十年六月招募他们，组成“东亚义勇军”（全称为“大日本帝国讨露军满洲义勇兵”）。同年夏，在日俄双方会战辽阳前，日军大山岩元帅先后派日人林宾宜、川崎等与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等联系，冯麟阁立即派李子阳去接头。此后，日军资助他们金票，供给枪支弹药（冯得日军提供的枪支弹药二十几大车）。令其骚扰、破坏俄军的后方供应线，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谍报人员还常向他们提供俄军方面的有关情报，更加强了他们的战斗力。他们利用熟悉地形、了解群众等有利条件，灵活机动地出击，前后参加战斗二十余次，消灭击溃若干小股俄军。他们曾于铁岭附近袭击俄军的辎重队，击毙俄军数百人；他们炸毁了新民府巨流河上俄军的军用浮桥，使前方作战的俄军所需作战物资得不到及时供应，缺额的兵员也得不到及时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军的战斗力。特别是日俄双方在首山一战，当日军遭到俄军的顽抗，屡攻不下，伤亡惨重的时候，日军便利用冯麟阁等抄袭首山的右侧背，俄军以为被围，遂放弃了首山，使日军转败为胜。冯麟阁等皆为马队，乘势袭击俄军，使俄军惶惶不安，向北逃窜。从此，日军乘胜长驱北进。俄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直退至长春一线。

日俄战争是以日军胜利、俄军失败而告终。沙俄军队退守北满，而日军也无力北进，遂霸占了南满。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日俄和约在美国朴茨茅斯签字，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割库页岛南半部给日本，旅顺、大连“转租”给日本，南满铁路及其地方附属一切权益均无条件“让”与日本。此后，日本便成了中国东北南部的“太上皇”。

在日俄战争中，冯麟阁等对日军有功，日本当局奏明天皇，特奖冯麟阁“宝星勋章”一枚，张海鹏等也在日本天皇御前留了名，并得到了赏赐，成了他 27 年后投降日本的一笔政治资本。

张海鹏在日俄战争中，身先士卒，拼死打击俄军，缴获很多战利品，深受冯麟阁的青睐。他认为张海鹏不但“英勇善战”，还是一个“知己”，离不开的左右手。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为安定地方社会秩序，曾谕令各地招抚大小股匪和民团武装。因冯麟阁、张海鹏等在日俄战争中有功于日本，在日本军国主义干预下，光绪三十一年被盛京将军“招抚”。新民知府增韫还给张海鹏改了名，将张连锡改为张海鹏，起号为仙涛。后来张海鹏常念增子固（增韫的字）好处，认为自给他改了这个好名字，才步上青云。张海鹏在就任伪满洲国的侍从武官长后曾说过：“人的一生就像在赌博场中一样，押对了能获万贯钱财；押不对就会连本输光。”

搞投机左右逢迎

冯麟阁等被清廷招抚后，先招抚的张作霖被委任为巡防队的统领，冯麟阁被委任为帮统，张海鹏、汲金纯皆被委任为管带（相当营长职），从此，张海鹏结束了绿林生涯，当上了清朝的武将。冯麟阁、张海鹏等奉盛京将军密令，一方面追剿辽西各地的股匪，另方面分化瓦解未被“招抚”的小股绿林武装。

宣统元年（1909 年）春，奉天巡防队按奉省地势划分为中、前、左、右、后五路，每路 9 营，共计步队 21 营，马队 24 营。张作霖为前路巡防营统领，因其部兵强马壮，主缉捕盗；中路统领为朱庆澜，驻省城；右路统领马龙潭（腾溪），驻凤城；后路统领吴俊陞，驻洮南；左路统领冯麟阁，驻锦州。张海鹏和汲金纯皆为左路的营管带，在辽西一带驻防。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在奉天以赵尔巽为首的顽固派，联合地方军阀镇压以革命党人兰天蔚、张榕等人为首的革命活动。冯麟阁、张作霖在这历史转变关键时刻，完全站在了赵尔巽一边。张作霖率中前路巡防营开进奉天省城；冯麟阁则率左路巡防营，死守辽西，卡住山海关这一要道。冯麟阁在辽中、彰武、绕阳河一带围剿革命党人，张海鹏为“报知遇（受抚）之恩”，将屠刀砍向革命党人头上，深得赵尔巽的赏识。

民国元年（1912 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北京政府令张作霖为第二十七师师长，驻沈阳；令冯麟阁为第二十八师师长，驻锦州和广宁（现北镇）一带，其所辖编为两个旅，即第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驻法库（家在新立屯），第五十六旅旅长为汲金纯。昔日镇压革命的先锋，如今成了民国的将领，不能不说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嘲弄。

张作霖和冯麟阁都是绿林出身，恶习不改，虽然已是民国，仍然不停地明争暗斗。民国四年（1915 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其亲信段芝贵为奉天督军。在段芝贵督理东北三省军务时，他自觉手中没有武装，难以掌握和控制东三省的各派实力，自己更难在奉天立住脚跟，便把主意放在分化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上。他拉拢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又拉拢二十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段芝贵的所作所为，对于一个日益想扩大势力和实力的张作霖来说，岂能容忍，但迫于形势，不好发作。不久各省纷纷起来护法反袁称帝，宣布独立。张作霖立即联合冯麟阁，打起“奉天人治奉天”的旗号，并向段芝贵透露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市面上风言风语，说城内要打大仗了。不是我张作霖不保你，而是冯麟阁、张海鹏等一些人要带兵进奉天撵你了！”张作霖的一番话和市面上所听到的流言蜚语，使段芝贵几天内心神不宁。接着张作霖和冯麟阁便派张海鹏和汤玉麟去面见段芝贵，说奉天人不欢迎段芝贵在此督理。由于汤玉麟在行前有

张作霖特别密嘱，在段芝贵面前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有张海鹏一个人说话。张海鹏斥责段芝贵说："你原来拉拢我，为的是拆散二十八师弟兄，离间二十八师和二十七师的关系，这是不行的。奉天人要治理奉天，奉天事自有奉天人处理。请你赶快回北京去，否则，我们是不保证你的安全的。"段芝贵听到张海鹏的一番话，更加相信张作霖说的全是真话，再继续在奉天呆下去，必为冯麟阁和张海鹏等人所害。次日，便在自己的一营卫队保护下，离开奉天，驶向了北京。途中在沟帮子段芝贵所乘的火车又遭到二十八师五十六旅汲金纯部的拦截，不但所携带的大批军火均被扣留，而且连在奉天所提的200万元官款也洗劫一空。

段芝贵跑回北京后，认为自己被逐出奉天，全是冯麟阁的阴谋，张作霖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便向袁世凯保荐张作霖督理奉天军务（即督军）兼省长。后经张作霖"力保"，才给冯麟阁一个军务帮办，仍然驻守广宁。冯麟阁对张作霖任奉天督军非常不满，愤愤不平，不和趋于表面化，后还被免除了帮办职务。

自驱走段芝贵之后，在奉天督军张作霖的干预下，凡地方上县长出了空缺，拒绝关内人来上任，都换成了东北人。县长在一地任职不能超过三年，任满即离任。几年时间，关内人在东北当县长的一个也没有了。如法库县几年间就有11人出任县长。张作霖从此独霸关外，经略吉林、黑龙江，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

遭通缉委身蛰伏

民国六年（1917年），两江巡阅使张勋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参谋次官田中义一（后任日本总理大臣）等人的支持和怂恿下，阴谋复辟帝制。张勋当时坐镇徐州，民国已改，但他的兵一律留辫子、穿号坎，人称"辫子兵"。张勋曾任"定武将军"，人们也称他的军队为"定武军"。因他资格老，又自恃"兵强将勇"，以"诸侯大盟主"的地位，先后在徐州召开了四次督军团会议。他表面上要以武力进京调停府院之争，解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的矛盾，实际他要借机搞复辟活动。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同是"北洋军阀"，相互间矛盾重重，互不妥协退让，更在参加对德国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意见不一。黎元洪总统不主张对德作战，借此机会，他利用国会和总统的权威，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不甘心居在野地位，便怂恿和利用张勋带兵进京，为自己重返政坛开辟道路。

参加第四次徐州"督军团会议"的有奉、吉、黑、直、皖、豫、晋等十三个省区的代表，声势可谓大矣，但各省督军心怀不一。张作霖看到国内形势复杂，各派林立，矛盾重重，张勋此举是冒有风险的。如直接参与，好了能获得进取，搞不好还会丢掉一切。为了保险，便派二十八师师长冯麟阁前往。冯麟阁派张海鹏领200人做先遣队先往，随后冯麟阁在30名卫士的护卫下，也到了徐州。

来徐州参加"督军团会议"的人，有的是来搞政治投机的，也有借机来此相互勾结搞某种政治交易的，还有的是来观察形势的。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政客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麇集在这里。一心想报皇恩、复清室的张勋，被这些人公推为"领袖"和"总指挥"。掌握的"辫子兵"有57个营，2万余人，又有十三个省的军阀支持，所以气焰十分嚣张，整个会议都听他的高谈阔论。段祺瑞派他的参谋长徐树铮参加

会议，一方面公开唆使张勋进兵北京，用武力推倒黎元洪，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又在背地里拉拢一些人，策动拥段复位，整个“督军团会议”却操纵在没有到会的段祺瑞手里。张勋见各省督军鼓噪，便拉在徐州表现积极的代表搞个签名，表示誓死效忠清室。他叫二太太邵夫人找来一块给小孩镇邪用的黄绫子，要各省代表在上面签字。张海鹏见师长冯麟阁在黄绫子上郑重地签了字，他也在黄绫子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张勋复辟失败后，这块黄绫子却叫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以 20 万元的高价卖给了后来任大总统的冯国璋，签了名字的黄绫子后来竟成了抓捕复辟分子的证据，这当然是后话了。

张勋在第四次“督军团会议”后，立即抢先进了北京，用武力解散了国会，逼走了总统黎元洪，拥立废帝宣统（溥仪）复辟皇位。冯麟阁进宫拜见了溥仪，行了三拜九叩大礼。张海鹏等进京“赞复辟，保皇室”有功，也得到了“皇上”的恩赐。

张勋自恃“兵强将勇”，复辟一举还得到一些军阀的支持，虽带进北京的兵力只有 6 个营，3000 人，足可以赶走黎元洪，何况还有自己的后续部队。没料到他赶走了黎元洪，段祺瑞却联合参加了督军团会议的一些人谴责他复辟，并调动军队对北京形成了包围，使张勋的后续部队不能及时跟进。同时又组织两路人马进逼北京，与张勋的部队形成武装对峙局面，形势对张勋不利。

张勋进京前，曾与手下将领约会：如军事上需要支援就往徐州发电报，电文中如写需要几盆花，徐州方面就派几营兵来支援北京，段祺瑞为阻止徐州的“辫子兵”北上，不但拦截了各种军车的通行，在济南设兵堵截；还令在安徽蚌埠的驻军作进攻徐州的态势，牵制徐州的“辫子兵”北援。段祺瑞指挥的两路人马攻进了北京，张勋的“辫子兵”龟缩在天坛一带顽抗。由于张勋的倒行逆施，违背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就是他在徐州部下，此时也不愿冒死去北京支援他搞复辟了。张勋的“辫子兵”在北京被打得焦头烂额，求援的电报频频发往徐州，却始终不见徐州方面来一兵一卒，寄来的却是一盆盆各色各样名贵的鲜花。

冯麟阁初到北京还踌躇满志，此时见形势越来越不妙，再在北京呆下去，就有被俘的危险，便在张海鹏的护卫下，着便装率领二百多人的卫队东逃天津。冯麟阁等人在北京上了火车后，已有人把他开车时间，密传到了天津，段祺瑞在天津车站做了部署，这列火车在天津站一停，就有士兵围了上来，着便装的冯麟阁立刻被人认出，遭到逮捕，押回北京，接受审判。所带的二百多人也全被缴械、关押起来。

当火车快到天津站时，张海鹏看站台上站满了荷枪的士兵，感到有些不妙，便借故离开了冯麟阁，走向另一个车厢。当火车在天津站一停，火车头便把这列车厢全给甩了下来，荷枪的士兵围了过来。他便跑进旅客车厢，和普通旅客一样躲过了审查。后在街上弄来一套油腻衣服和一个提篮，装扮成卖油条的小贩，躲过追捕人员的注意力，混进了天津港，上了轮船，跑回了奉天。张海鹏到大帅府向张作霖述说了北京的情形后，张作霖对他一再安慰，并仍让他担任五十五旅旅长职务。就在冯麟阁离开广宁（北镇）后，张作霖把手已伸向了二十八师，他把汲金纯等二十八师的一些将领，全拉到自己一边来了，冯麟阁已成了光杆司令。

张勋在民国六年 7 月 1 日进京搞复辟，到 12 日天坛之战全军溃散，前后只有十二天。张勋不得已跑进荷兰大使馆躲藏起来，他的“辫子兵”也树倒猢狲散，纷纷投降。

段祺瑞又回到了北京，当上了国务总理。一个军阀被赶下去了，又一个军阀登上了政治舞台。

冯麟阁因参与复辟活动，被北京政府褫夺了一切官职。张作霖便趁机将二十八师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推荐五十六旅旅长汲金纯充任二十八师师长。后在东北各高级将领努力疏通下，由张作霖出面，冯麟阁才被保释出狱，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守护三陵（永陵、福陵、昭陵）的副都统，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得病死去。

张海鹏与汲金纯虽是同乡，又一同参加绿林，可汲金纯提升为师长之后，因张海鹏参加过复辟，遭冷眼看待，汲金纯对张海鹏没有说过一句好话。因此，张海鹏在汲金纯手下当旅长心情很是不舒畅。张海鹏慑于张作霖的权威，不敢发一句牢骚，却把一切愤懑全发泄在汲金纯身上。后来，张海鹏常对部下讲，“汲金纯吊毛不是，他只会溜大帅的须，是他蒙住了大帅的眼睛，才混上师长的。他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什么战功。”汲金纯与张海鹏过去很要好，是换过谱的“金兰”弟兄，张海鹏对汲金纯如此憎恨，可见分裂已达到很深程度了。后汲金纯任绥远都统时，张海鹏曾给汲金纯写过一封信，里面全是讥讽挖苦之辞，末了还画一个老驴，对汲金纯进行辱骂。

民国九年（1920 年），张海鹏调离二十八师，被任命为东省特别行政区铁路护路军哈满副司令（相当副旅长职务），职务降了一级，只得服从军令。日俄战争后，划长春站以北的铁路为俄国势力范围，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于 1919 年发表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侵略中国的全部领土和所有权益，随后黑龙江省设立东省护路军总司令部，下设哈长（哈尔滨—长春）、哈满（哈尔滨—满洲里）、哈绥（哈尔滨—绥化）三个司令部。主要职责是保卫北满铁路的安全营运。哈满司令部设在哈尔滨，所辖只有 6 营军队，地面只是一条铁路线。比起五十五旅旅长，不但降了级，地盘小了，空饷还少了，且部队分驻于全路各要害处，更增加了旅途之劳。

哈尔滨是个大城市，是东省特别行政区的首府。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7 年），沙俄帝国逼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密约》后，获得了东清铁路的修筑权，之后，哈尔滨就成了沙俄侵略东北的中心。十月革命后，苏俄虽放弃了这里的所有权益，但哈尔滨仍为沙俄的残余势力所盘踞。哈尔滨是水旱码头，中东铁路在这里呈十字交叉状，松花江水路有各种船只通航，交通十分方便。

张海鹏自到哈尔滨任哈满副司令之后，并没有把军旅之事放在心上，他自投入官府之后，多在县城居住。虽曾到过奉天、徐州、北京等地，也是来去匆匆。哈尔滨是外国人和冒险家的乐园，是恶势力云集的地方，军阀、官僚、政客、土豪、恶霸、巨商等各种势力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这里也是流氓、恶棍、土匪猖獗的地方。赌场处处都有，烟花女子如云，妓院充塞了各个角落。这偌大的哈尔滨比起新立屯来，要大千百倍，与法库相比，繁华得更不好比拟，张海鹏全陶醉在这里了。

张海鹏在法库驻防时，曾娶了一个年青的三太太。后来三太太嫌他老朽，有了外遇，对他感情也淡薄下来了。张海鹏虽对三太太打骂几次，但这女人仍不改悔，此时没有带在身边。为消除心中的烦闷，张海鹏就去烟花巷里狂嫖滥赌。在妓院一次邂逅中，遇见了一个姓马的妓女。此女子不但年青、漂亮、口齿伶俐，而且还有点文化。张海鹏见到后一心想把她搞到手做小老婆，可这女子说啥也不干。后张海鹏答应明媒正娶做四

房，掌家务，此女子才答应下来。

此女子名叫马秋帆，自嫁给张海鹏之后，不离张海鹏身边。马秋帆虽是烟花女子，可对当时的官场谙识。她深知后来任黑龙江省督军的吴俊陞不但爱钱财，还喜欢好马、美女。她劝张海鹏利用自己哈满副司令的职权，给吴俊陞送礼。东荒有好马，张海鹏在路过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时，就给送去几匹；吴俊陞路过哈尔滨时，张海鹏都事先找好了下处，以供吴督军淫乐；吴俊陞在哈尔滨有房产，张海鹏都代为照料。因此，张海鹏深得吴俊陞的欢心。

民国九年（1920 年）奉天督军府明令哈满司令之职由奉天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万福麟来兼任，这对张海鹏又是一次打击。原来万福麟在民国五年才从营长提拔为团长，那时张海鹏在万福麟之上，这回万福麟的职位却排在自己之上，如何不对张作霖有怨恨心情呢。但张海鹏却不敢流露出半点埋怨情绪。为防守中东路，民国十年万福麟被调到满洲里一带布防，屈居副司令二年多的张海鹏才提升为哈满司令之职。

无功升任镇守使

民国十年（1921 年）3 月，吴俊陞离开洮南，升任黑龙江省督军。一年后，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俊陞任东三省保安副司令，更无暇顾及辽洮一带军务，辽洮镇守使一职，便由骑兵第二旅旅长张荣代理。民国十三年，又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张荣调离，许多将领都去参加战事，无人可任洮辽镇守使一职，空缺时间很长。后经吴俊陞在张作霖面前一力保荐，民国十三年张海鹏从哈满司令接任洮辽镇守使，并兼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统领部的统领官。

洮辽镇守使统辖的兵力也是 6 营人，管辖的地面辽阔，物产虽不丰富，可各县送的“贡品”甚多。当时奉天省有两个镇守使署，一个是东边道镇守使署，管辖奉天东部地区；另一个就是洮辽镇守使署，管辖奉天北部地区。洮辽镇守使署直辖有洮南、洮安（今白城）、镇东、安广、突泉、开通、瞻榆七县；另有通辽、辽源（今双辽一部）、双山（今双辽一部）、乾安、昌图、梨树、法库、康平、怀德等九县是其绥靖区。张海鹏能当这样广阔地区的军事长官，也感到一些欣慰，自然要感激黑龙江督军吴俊陞的提拔了。

张海鹏这个人虽是军人，但懒于治军，在行伍中并没有什么政绩和军功，但总好和别人比，特别是和万福麟比。就在张海鹏任洮辽镇守使的时候，万福麟已升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的师长了。到了民国十五年，万福麟已是奉军第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而张海鹏到了民国十七年冬，统领部改编为第三十二师，张海鹏才兼任师长。

民国十七年（1928 年）6 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炸车案，张作霖和吴俊陞同时遇难。消息传来，使张海鹏极度感伤，如丧考妣。曾带四太太亲去齐齐哈尔，面见吴俊陞之子吴泰来，表示慰问。

不几日，消息传来，张学良主宰东北。张海鹏向部下讲：“现在冯麟阁（冯德麟）故去了，张作霖和吴俊陞两位老帅也遇难了，只有张作相、张景惠和我是老人了。”意思是他当黑龙江省督军有望了。很快消息传来，万福麟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办，张海鹏大发牢骚。他说：“万福麟算什么？不就是大帅手下一个团长吗！他有什么功绩？不就

是靠裙带关系吗?”张海鹏所指万福麟的裙带关系，据张海鹏讲，万福麟的长子万国宾之妻是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亲侄女，论起来，万福麟与张学良是儿女亲家。

张海鹏为什么垂涎黑龙江督军一职？因为民国年间的督军，不但有军权，还掌握一省的政权和财权。一个省督军（或督办）和上将一样，每月薪俸都是大洋1000元。省督军（或督办）公署和省府都有办公费若干，省督军可以提取一部分，作为己用。所辖地面的捐税款也相当可观，他可以截留一部分。当了省督军或省长可以到银行提款，不受限制；省督军下辖军队多，空饷也多，那时的军队没有满额的，一般缺额五分之一左右，那些空额军饷，都归长官所有。一个士兵每月军饷是8—10元现大洋，一省军队每月都有空饷几万元，团长、旅长、师长以及省军务督办就可将这些空饷揣进自己的腰包。第二十旅的参谋熊飞曾说过：“吴俊陞任统领和督军二十余年，光军饷一项就搂了不少钱。他在沈阳、辽源（今双辽）、洮南府都有公馆，在通辽、洮南还有电灯厂，在沈阳、哈尔滨等地还有房地产。他的钱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至于土地那就更无法统计了。反正吴俊陞在科尔沁草原，到处都有他的地。”熊飞曾估计过，吴俊陞的家财有十七个7000万（江贴），“就是不开矿山，不办工厂。”

而张海鹏只是一个镇守使，每月薪俸只有800元。他的下属部队少，空饷当然也少，镇守使衙门的办公费也不多，特别是无权截留所辖地面的税收款项，更不能随意去银行提公款。所以，张海鹏对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一职很眼馋。

自万福麟走马上任为黑龙江省督办后，张海鹏常发牢骚。他曾说：“奉天有两个大门，一个是东边道镇守使署，把守鸭绿江；另一个是洮辽镇守使署，扼守蒙疆。我和汤玉麟两位老将把守这东西两个大门，‘小六子’（指张学良）可以尽情吃喝玩乐了。”张学良每有电报打来，他都以长辈自居，对电文指手划脚，评头品足。他好借机发挥，说“小六子”的不是，说“小六子”忘恩负义，并且说：“过去讲，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是年青的当政，提了一帮年青人，我们这些老人说的话，人家也不听了，不吃香了。”但自从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之后，这些不满言语立即没了，简直判若两人。

尽管张海鹏对万福麟不服气，但从表面上看对万福麟还是很尊重的。这主要是四太太马秋帆想的周到，对万福麟的家事处理得好。自万福麟在洮辽镇守使署任骑兵团长之后，他的家就从农安的小坝山（现长岭县内）搬到了洮南。后来虽当了师长、军长和省督办之职，但他的母亲和兄弟等人仍留在洮南和白城子两地，这里有万家的买卖，万福麟由于军务繁忙，很少回来。四太太马秋帆是个混事的女人，年年她主动为万福麟之母操办寿辰，并且说，万督办公务繁忙，无暇为其母办寿。我们做地方官的，为万老太太办寿是责无旁贷的。在民国十八年以后，连续三年为万母大办寿辰，不仅场面隆重，而且连万老太太都很感动，这当然没花张家一文钱。张海鹏夫妇送的寿幅、寿联，撰写的寿文，很有文采，摆在显要地方，礼品也很丰厚。不但洮南各界送了贺礼，就是邻县也都派来了代表参加。伪满以后，万福麟在关内抗战，万福麟之母在洮南的家产被日伪政府没收，被逼来到白城子，晚景凄凉，张海鹏来过白城子却没有过问一句话；万福麟之母死时，张海鹏家虽有人住白城子，也没送一幅挽联，还是当地商界敛钱安葬的。

毙谢保董　杀纪耕夫

民国十一年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军费开支庞大，人民负担沉重，很多人又拉起了“杆子”，当起土匪来。小的土匪绺子三五十人，大的土匪绺子有百八十人，各处流窜抢劫，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张海鹏调到洮南府，棘手的就是“剿匪”问题。不但当兵的成分复杂，有的还与土匪相勾结，通风报信，提供枪支弹药；就是地方上的一些地主、官吏也是半阴半阳。每次剿匪，大兵来到，土匪早已得信撤走了。洮南城东有个大地主谢某，因有钱有势又有枪马，当上了当地的大团团长，也叫保董，人称“谢保董”。此人虽然充任保董之职，却暗地里干资匪的勾当，他常给股匪补充枪支弹药，并向打散的残匪提供掩护场所，被人举发，押于洮南监狱，由镇守使署军法处审讯。谢保董被捕之后，他家人四处托人说情，张海鹏便罚他家出钱修洮南的城墙。洮南城呈方形，城垣全长24华里，自光绪三十一年动工建成之后，虽后来几次修补，但都没有这次维修的彻底，完工后的城垣如同新筑的一般。张海鹏得到谢家的巨款后，本想找个机会放了谢保董，没想谢家见城墙已修完还没放人，就托人说情到黑龙江督军吴俊陞那里去了。民国时为肃清匪患，在法律条文上对资匪、藏匪的处罚和土匪一样，都要处以死刑。张海鹏听说吴督军都知道了此事，怕把事情闹大了，牵连了自己，便在一天早晨命军法处去提审犯人谢保董。当谢保董被带到镇守使署衙门前的影壁处，就叫一营长给毙了。事后并发了布告。知情的人都知道这是张海鹏想逃避罪责；不知情的还说张镇守使秉公执法，“为了不叫土匪劫法场，就在镇使署门前把谢保董给枪毙了！”全城军民为此对这新来的镇守使无不“肃然起敬”。

张海鹏常自我吹嘘：“民国五年的‘郑家屯事件’，是日本军人买菜，仗势打伤中国人，我们五十五旅驻郑家屯那个团就是不怕日本人，到底还是把日本兵打回四平去了。”他还说：“我来洮南是镇守这一地方的，我张某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不管他是大鬼子还是小鬼子，都不在乎。我要求我的部下，也要敢于碰硬。”

民国十六年日本政府向张作霖提出要求扩大日本在满洲权益的《满蒙备忘录》，并以武力相威胁，激起了东北各地人民的反对，相继掀起了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浪潮。9月14日奉天省洮南县有一万数千人举行反日集会，抵制日货。当游行队伍走到日本在洮南的南满公所时，学生们高呼口号，这时，南满公所有一个高级职员叫纪耕夫的，组织一批流氓出来捣乱，冲散游行队伍，污辱女学生，激起商界、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此事叫当时的教育所所长王克明告到镇守使署。后又有人揭发说，洮南西门外有一块土地没经官府同意，叫南满公所给买去了，契约上经办人是“静观”。后探查到纪耕夫的一个手戳上刻有“静观”二字，与契约上的字迹一样，张海鹏就下令将纪耕夫给抓起来。审问纪耕夫时，纪耕夫很傲，他向军法处的审讯人员讲，他的事只有日本领事馆才能管，中国的军法和刑法都管不着他。纪耕夫在押时，南满公所的日本人多次到镇守使署来交涉，要把纪耕夫带回去。洮南的学生继续游行，要求严惩纪耕夫，市民和商界支持学生，抵制日货已成全城的一致行动。张海鹏慑于民意，纪耕夫的行为实属卖国行为，就命令军法处给处决了。

枪毙了谢保董和纪耕夫之后，辽洮地区不少人都认为张海鹏是一位秉公执法、忠于

祖国、保境安民的镇守使。其实是看错了。

二、九一八事变后的卖国嘴脸

张海鹏一到洮南府当起镇守使便向部下训话说，“军人的职责就是守土卫国。”并要每个军人把他的话记住，做为座右铭，天天背诵。可事隔七年之后，张海鹏自己却干出了出卖祖国的勾当。

投降日本欲谋高官

1928年12月29日，在张学良的主持下，东三省易帜，改旗服从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委员。1930年6月蒋介石又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副总司令行营后设在北平办公。1931年9月，北平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任命张海鹏为蒙边公署上将督办。早在1928年冬，统领部已改编为第三十二师，所辖的各营均改为团。这次，张海鹏把原有的团都扩编为旅（也称支队），即骑兵第一旅驻白城子，旅长徐景隆；骑兵第二旅驻洮南，旅长鹏飞；骑兵第三旅驻瞻榆，旅长刘茂义；骑兵第四旅驻突泉，旅长傅铭勋。步兵第五团没有扩编，也驻洮南，团长是常鼎彝（张学良所毙原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之侄）。蒙边督办公署是在东北形势日趋紧张情况下设立的，是加强辽宁西北部的一项战略措施。而张海鹏却没有把防务的重要性放在心上，虽然扩编进一大批新兵，而没有对他们进行训练，却把注意力放在观察形势发展变化上，放在确保他的官位上。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行营的电文传到洮南，张海鹏召开旅、团长军事会议。督办公署的参谋长李盛唐（又名彦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任伪满洲国陆军次长）、军械处长赵立田（张海鹏的表弟）、军需处长李与九（又名延龄）、军法处长李玉宣（又名石璞，后任泰来县伪县长）、军医处长王颐山、秘书处长李香圃、兽医处长高义山等也参加了会议。整个镇守使署都有士兵站岗，没进大厅前，所有武器都交卫兵拿走，会议气氛与平时不同。大厅内的各位处长都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只有那驻守在外地的将领们，互相小声探问会议的内容，可对方只是摇头而已。

会议由蒙边督办张海鹏上将主持，他坐在太师椅上，看人员到齐了，首先环顾一下，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现在沈阳已经失陷于日本，驻守在北大营的官兵已向辽西撤退。日本兵正向北沿着中东路前进。不久也要到洮南了。现在，诸位谈谈看法。”参谋长李盛唐紧挨着张海鹏，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般会议都是参谋长首先发表意见，司令官点头，大家随声附和。可今天参谋长不发言，其他人也不敢随便发言。会议沉默了好长时间，张海鹏见大家不发言，便说，“只是谈自己的看法，说错了也不要紧”。二旅旅长鹏飞站起来说：“既然副总司令把蒙边地面交给我们，军人守土有责。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给他打回去，绝不能让他们占领我们一寸土地，坚决御敌。”步兵团团长常鼎彝见张海鹏坐在那里没啥反应，就站起来接着说：“我们在南边用重兵扼住四洮铁路这个咽喉要道，东用强兵镇守各路要地。当年张督办在日俄战争时，不是破坏俄国人后方供应线，而取得很多胜利的吗？这回我们也破坏日本人的后方供应线，给他来个

‘寸断战术’，在他们后边扒铁路，破坏交通线，叫他们在四洮铁路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再在后边骚扰小鬼子，叫他们顾头顾不了腚。”军械处长赵立田看了看张海鹏，还是没啥反应，立即站起来说：“据库内清点，还有子弹200多万粒，每人可分261粒子弹。如果再从乡间收集一些弹药，还是可以打几仗的。”会上大家七言八语，都没有离开一个“打”字。最后，张海鹏说话了：“你们个人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打仗光凭一腔热血是不行的，也是打不好的。日本人有大炮，我们有几门？日本人有飞机，我们有吗？”他又环顾了一下，下边人没言语，都在听他讲话，便接着说：“日本兵确实强大。沈阳有多少兵，为什么北大营没有一晚上就给占了呢？那么多的兵为什么顶不住？我们这有几个旅，实际上还不就是几个团。就凭我们这一万来人，就能顶住吗？”他又把话停下来，逐一看了看刚才发言的那几个将领，他们谁也没吭声，都在看着他。他接着话题往下说：“如果我们一打，被打死了，是为国阵亡。那人民呢？我们打，日本人不要用大炮轰，用飞机炸，我们可以跑了，那人民不是死的死，伤的伤吗？老百姓不是受害吗？”他接着又引经据典地说：“康有为是个学者，他教给他弟子梁启超安邦治国八个字。这八个字是‘以群为本，以变为用’。什么时候人民是根本，没有人民，要一空国家有什么用？形势是变化的，随着形势变化，我们的思想也要跟着变，不跟着变是不行的。‘以群为本，以变为用’这八个字说的太好了。”他接着便把话题一转，说：“不是我张海鹏不愿打，而这是上边的意思。为了保境安民，免除人民遭受涂炭，还是退让的好。”接着他便叫参谋长李盛唐读北平陆海空军副总公司令行营电令，大意是：为了避免冲害，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各部队长应严约所部不得擅自抗击，使事件扩大，着驻省各部队，即时一律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张海鹏向大家讲：“我们要遵循北平行营的命令，怎样部署，会后督办公署要发电给你们，要按命令行事，绝不可自行其事。”半天的军事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会后，张海鹏拿出一份报纸叫李盛唐等人看，他指着上面一首打油诗说：“你看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这回叫赵君武把他的皮都扒光了。”李盛唐一看是云南大学（最近看文史资料说是广西大学）赵君武写的诗。① 这诗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一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张海鹏用手指头点着那首诗说：“赵四打腰，在人们面前总要高出半截，背地里还吹枕头风，全靠那厚脸皮。朱光沐靠什么上去的，还当少帅公署的秘书长呢，不就是靠他五妹妹的大腿能缠住少帅吗？她整天陪张学良跳舞，不但在沈阳城里横逛，到北平还盛气凌人。张学良天天和赵四、朱五、蝴蝶（当时电影名星）等人鬼混，沈阳如何不丢？”接着他又小声地说，“你看张学良身边都是一些什么人，我们还能吃香吗？靠他能行吗？我们也得想想自己的前程了？”李盛唐听了张海鹏这番话，不住地点头。

实际在九一八事变没发生之前，日本在洮南的南满公所所长河野正直就秘密派人到张公馆与张海鹏接触上了。之后张海鹏便派人去南满公所见了河野，双方来来往往。9

① 作者记忆有误，此诗为马君武所作，李敖先生在《蒋介石研究》一书中，称其为“谤诗”，因与事实不符，评述为：当时“诗虽然为全国传诵，内容却是造谣”。

月21日，日本在齐齐哈尔特务机关的林义秀少佐根据河野的报告，又来洮南见张海鹏，张托林义秀帮助联络，林义秀自然答应。日本关东军在摸清张海鹏的思想底细后，又派日本在通辽领事馆的领事友三和大佐大石来洮南，进一步诱降张海鹏，并由河野正直出面与张海鹏秘密谈判。河野对张陈说利害，软硬兼施，迫张就范；张海鹏则要求扩充军队，增拨武器弹药。最后，河野以张海鹏军队为日本关东军进攻黑龙江省打前锋做条件，而满足了张海鹏提出的要求。张海鹏所召开的旅、团长军事会议，就是在他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频繁接触中间进行的。

恪守密约皆照行

就在张海鹏与日本人讨价还价准备投降的时候，北平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几次来电，要他将所属部队撤往辽西，向长城一线靠拢，而张海鹏投敌之心已定，对这些电文全置于案头而不顾。

此时，黑龙江省督办万福麟在北平，暂代黑省军政大权的是其子万国宾。为了支撑这严峻局面，特派省政府委员马景桂（字志丹，曾任洮安县议会议长）到洮南，佯称黑省有欢迎张海鹏去支撑局面的意思。张海鹏回答说："本人年迈古稀，毫无野心，惟日人压迫太甚，部下主张分歧，暂赴黑省躲避亦无不可。"表明他无意作黑省督军之职，且举抗日大旗也有困难。后黑省又派警务处处长窦联芳、民政厅长刘廷选携张学良和万福麟电报来洮南，劝张海鹏"坐镇洮南，防敌北犯，勿为日人利用，致贻后世之讥。"张海鹏虽然内心不高兴，为在表面上敷衍黑省万国宾等人，遂派其侄张冠军到黑省，接洽军饷及给养问题。黑省军署当即委任张冠军为上校参事，并极力与张海鹏周旋。

张海鹏对日本侵略者的暧昧态度，引起黑龙江省军署的警觉。为了预防不测，黑省军署于9月下旬调中东路驻小蒿子站的程志远（骑兵第二旅长兼哈满副司令）旅的朱凤阳团进驻泰来，对洮南方向警戒，又派工兵一连驻守嫩江桥并构筑北岸阵地的据点工事。后得知张海鹏已投降日军，洮南距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又不远，一旦日军援助张海鹏北犯，形势就非常危险了。为防张海鹏协同日军北犯，洮昂铁路局长万国宾令将全路车辆都陆续调到昂昂溪，以防为敌所用。同时在军事上也做了进一步的部署，严阵以待。

兴安屯垦军原驻扎在洮索铁路沿线。它的督办公署就设在洮安县（白城子）城内。九一八事变前，督办邹作华去南京向中央政府汇报农垦事宜未归。事变后，日军侵占了辽吉且步步北侵，屯垦军统带苑崇谷本欲与张海鹏联袂阻敌北犯，眼见张海鹏已投降了日军，一切打算俱灰，不得不率领屯垦军的步兵三个团、骑兵一个团、炮兵一个营，由景星绕道去齐齐哈尔，参加抗日。后马占山将该部编为暂编步兵第一旅，江桥抗战中在大兴以西布防；该部骑兵在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面警戒。

日本关东军在与张海鹏达成协议后，于9月24日，派一支120余人的小部队，携带两门野炮，从四平乘三列铁甲车沿四洮铁路向洮南进犯。沿途都是蒙边督办（也是洮辽镇守使）的辖区，一路上毫无抵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防止发生意外，又派参谋今村新太郎大尉到洮南与张海鹏密谈，要确保日本军队"进驻"洮辽各地。

张海鹏按照主子的要求，命其所属部队，凡驻守在城镇的旅团官兵，一律撤出城外

待命，在没有接到下步命令前，不许返城；各城镇警察的枪支一律集中保管，没有得到公安局长的批准，不得动用，严防“寻衅滋事”。他命令驻守在洮南城内的第五步兵团撤到洮南城北60余里的瓦房待命；并命令督办公署的手枪连、机枪连和迫击炮连也撤到城外待命；并命令警卫人员一律呆在营房里，不准携带武器上街，否则军法从事，从严惩办。

9月25日凌晨，沿着四洮铁路从南方飞来一架飞机，在洮南城上空盘旋一阵子，又低飞到第五步兵团的营地上空，向兵营院子内扔下一颗炸弹。这颗炸弹爆炸之后，既没有伤着人，更没有破坏兵营的建筑物，只在院当中炸了一个大坑。这架飞机见地面没有还击，就向南方飞回去了。

此时，洮南城内的军队都已连夜撤到城外，步兵团营房里没有一个军人了，哪还有人还击呢。日本飞机的爆炸声震破了洮南市民的美梦，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相互询问也没有结果。只有在公馆里等待消息的张海鹏清楚，这声爆炸使他脸上浮出了喜悦。日本军队要进洮南城了，赶快组织人去迎接。前一天晚上，张海鹏已授意洮南各界成立治安维持会，维持城内秩序，并做好准备，接待日本侵略军。

9月25日上午，日本侵略军的一个中队在洮南各界的“夹道欢迎”下，侵占了洮南。接着日本侵略军向洮辽地区各县也都派出了部分兵力“驻守”（洮安县城是一个班，只有十几个日本兵）。由于张海鹏卖国求荣，洮辽地区人民从此当了14年亡国奴，任日本侵略者蹂躏，过上了牛马不如的生活。

张家父子皆为官

日本侵略军进了洮南后，今田新太郎大尉又督促张海鹏作协助日军进犯黑龙江省的准备，张海鹏便提出在原有四个旅的基础上，再增编五个旅的要求，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同意。新扩编的五个旅的旅长，全是他的子侄和亲信。

张海鹏任命他大儿子张俊哲为第五旅旅长（《伪满洲国人名鉴》载：张俊哲任洮辽警备第六支队长，1932年出任伪吉林警备骑兵第四旅旅长），驻防在三岔河。派懂军事的潘忠涛、王乾山做他的参谋长和军事方面的副官。

任命他侄子张冠军（人称“二少爷”）为第九旅旅长，驻防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和索伦一带。

任命唐怡云为第七旅旅长，驻防在开通一带。唐怡云是张海鹏二女儿的丈夫，在成立蒙边督办公署时扩编升为团长，这次又擢为旅长。

任命彭金山为第六旅旅长，驻防在白城子。彭金山曾在吴俊陞手下任省防军第三路统领官兼“东荒”剿匪总司令官。民国十七年张作霖与吴俊陞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万福麟接任黑龙江省督办。彭金山因事被万福麟免职，且押了一些时日，释放后回到白城子家中闲居。彭金山与张海鹏是换过谱的金兰兄弟，这回张把彭请出来，任命他为少将支队长（旅长）。

任命王永清为第八旅旅长，驻防在长岭、乾安一带。此人原系绿林出身，曾报字“天下好”，是个土匪头子，后被招抚。他原在东北军第十四师师长穆春手下任过团长。民国十六年郭松龄反奉张失败，他曾率骑兵团袭击郭松龄的卫队，并在新民县老达子房

将郭松龄及其夫人韩淑秀逮捕，并奉命将其二人枪决于当地。按理他是张作霖的有功之人，后来职务不但没有提升，张学良易帜后，还把他免了职，他的队伍也被遣散，在长岭闲居。王永清对张学良很不满，被张海鹏看中了。因王永清很有战斗经验，又有影响和号召力，张海鹏也任命他为支队长。

还任命他三儿子张俊武（即“四少爷”，人称“四虎子”）为独立团团长，驻防在白城子的南门里。

新扩编五个旅的兵员，多是各乡村的自卫团（大团）。一个村的自卫团都有百把十人，扩编进来后，就编为一个连。马都是自己带，每月给十几元的“马乾”钱。关于枪支弹药各自卫团都有，只是陈旧些。在张海鹏与日军谈投降条件时，就提出了枪弹问题，日本人答应弹药可随时接济，有关事宜由今田新太郎大尉一手承办。

当时中国有七个大的兵工厂。辽宁（1929 年改奉天省为辽宁省）有沈阳兵工厂，山东省有德州兵工厂，山西有太原兵工厂，广东有番禺兵工厂，湖北有汉阳兵工厂，江苏有上海兵工厂（在南京有金陵分厂），四川有成都兵工厂。在张作霖主政东北时，预感到日本人有侵犯辽东的意图，曾计划把沈阳兵工厂迁到北镇（原广宁）附近的医巫闾山区，由于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而未迁成。张学良主东北后，又忙于应付各种事务，搬迁的事也未实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不仅占领了沈阳的北大营，也抢先占领了这个全国规模最大的沈阳兵工厂。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答应解决张海鹏扩编五个旅的枪支弹药，来源就在这里。

几天后，日军从沈阳兵工厂运来四火车皮军火到洮南。不仅运来了二万多支步枪，还运来了一批机关枪、迫击炮、山炮，还有一大批炮弹和子弹。张海鹏收到这批枪炮后，首先装备了徐景隆的第一旅和张俊哲的第五旅，还有张四虎子的独立团，他们都换上了崭新的武器，余下的分拨给各支队一些。

自兴安屯垦军统带苑崇谷率部撤离白城子投奔黑龙江省后，兴安屯垦公署所遗的军需、枪械、给养，特别是一些运输车辆，完全被张海鹏攫为己有。原洮南的洮辽镇守使署只张海鹏有一台专用小汽车，没有其他载重车辆。而此时，车马炮兵全有了，管辖范围也远远超过洮辽镇守使和蒙边督办。经其子侄、亲信、部下推举，并经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同意，张海鹏任保安边防总司令，坐镇洮南，遥控指挥东到中东路，西到突泉，南到长岭，北至泰来、王爷庙的各路军马，镇压、分化瓦解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准备进犯黑龙江省，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当黑龙江督军的愿望。

甘当汉奸北犯损兵折将

1931 年 10 月 1 日，张海鹏在洮南正式发表伪独立宣言，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要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谋求建立一个新国家。随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今田新太郎大尉又督促张海鹏出兵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督军一职是张海鹏觊觎已久的。如能打进齐齐哈尔，在日军的主持下，黑省督军（省长或主席）非他莫属。而要打进齐齐哈尔，必首先突破江桥防线，必得挑选武器精良、战斗力强的部队去打头阵才行。新扩编的五个旅都不行。如彭金山的第六旅，彭虽是行伍出身，富有战斗经验，但他的旅两个团，一个团是自卫团拼凑起来的，

没有战斗力；另一个团是个团架子，只有那么几个人，临时招了一些兵，也没有经过训练。挑来挑去，就选到徐景隆第一旅来了。徐旅原有的兵一分为三，编了三个团，比其他旅战斗力强得多，都配备一色的新武器。

当时黑省军队王永盛的第二十九旅、于兆麟第三十旅等两个国防旅早已调赴关内讨伐石友三去了，所剩部队多为省防部队，有三万余人，即步兵三个旅，骑兵两个旅，外有卫队团、炮兵团、工兵营、辎重兵营及两个保安大队。在省城附近的只有步兵一个旅，旅长为张殿九，还担任繁重的扩路任务。还有卫队团、工兵营、辎重兵营在龙江。只靠朱凤阳团在泰来和一个工兵连守江桥，恐难以抵御日军和张伪军队的合力进犯。黑省边防军参谋长谢珂得知张海鹏要调动军队北犯，急调卫队团在徐宝珍团长的指挥下，赴泰来一线，并派工兵营两个连、辎重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归卫队团团长徐宝珍指挥，开赴嫩江桥北岸构筑阵地，加强嫩江桥北岸的防守。为巩固省城防线，又调驻拜泉的吴松林旅开到龙江附近待命。

此时日本领事清水带日军步兵少佐林义秀向黑龙江省军署提出要求，要日军派一个中队经洮昂昂溪驻扎。由于黑龙江省军署以军事时期不能保证安全为由，断然拒绝了日军的要求，后来日本军队也未敢贸然尝试。

10 月 8 日，北平副总司令行营来电，任命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三旅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黑省军署推马占山为总指挥，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张海鹏听说马占山已任黑龙江省主席，极为恼火。他本想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以军事逼黑龙江省让出政权，不想又来了一个马占山。如果再拖下去，进攻黑龙江省就要增加困难了，他想趁马占山立足未稳就给来个突然袭击，逼马占山下野，因而加速作北侵的准备。

10 月 13 日，张海鹏在日本关东军指示下，派骑兵第一旅向黑龙江省进犯。15 日开到泰来，并有两架日军飞机到龙江上空助威。黑省军队全在嫩江桥一带布防，在张海鹏图黑的空气日益紧张时，谢珂曾向北平副总司令行营请示方略。复电大意有“如张逆海鹏进军图黑，应予以讨伐，但对于日军务须避免直接冲突”等话。16 日拂晓，徐景隆少将旅长率三个骑兵团向江桥奔来，先头部队抵达嫩江南，见江桥北端有兵阻截，就开了火。黑龙江省抗日部队原以为开来的是日本军队，并未还击，后隔桥看清了原来是张海鹏的汉奸队伍，向徐宝珍团长报告之后，徐团长立刻下令：“打!”士兵们无所顾忌，立刻还击，桥上双方枪弹互射，北岸的大炮这时也响起来了，打得张伪军后续部队不敢前进。徐景隆几次下令要不惜伤亡冲过江桥，可江桥北岸猛烈的炮火，使张伪军不能近桥上一步。徐景隆旅长任军官多年，富有战斗经验，在张海鹏手下几名将领中，他也是一名佼佼者，深得张海鹏的信任，在这次北犯黑龙江省，对这位徐旅长也抱着很大期望。徐景隆得知先头部队已造成很大伤亡，为了扭转战局，他想要到前沿看个究竟。就在他观察前沿形势，寻找突破环节的时候，在走动中，误触黑省工兵埋在南岸的一颗地雷，炸掉了一条腿，当时死亡。徐景隆一死，张伪军一时乱了起来。黑省抗日军队趁乱冲出阵地，齐向南岸袭击。徐宝珍指挥的卫队团是由精悍士兵组成的，又有战斗素养。而徐旅的三个团，只有一个团的战斗力，且第一团在战斗中伤亡很大，抵挡不住北岸的反攻，其他两个团多数是由自卫团组成的，在黑省军队打击下，前头一乱，后续部

队立时溃散，四处逃窜。刚开到的第三支队的迫击炮连，在前面溃军的冲击下，没放一发炮弹，也随同溃军四散逃走。在打过江桥，击退张伪军的徐旅后，黑省军队又退回北岸固守。为防敌伪军再来侵犯，把江桥破坏了三孔，并在桥北构筑更坚固的工事。

10 月 24 日，马占山正式就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职务。马占山就职后，即致电前方激励将士，并发出悬赏购买张海鹏首级的布告，张贴各处，黑省各界皆唾骂张逆海鹏的叛国之举。

10 月 26 日，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九联队借口“匪患”，侵占了四洮铁路全线，为日军全面侵略洮辽地区、进犯黑龙江省开辟了道路。马占山为刺探张海鹏伪军的动静，曾派国防处参谋长王静修前往洮南，已于 28 日回省。报告说，张海鹏虽损兵折将，但仍作再犯黑省的准备，黑省在军事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10 月 27 日，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九步兵联队长浜本派步兵少佐林义秀以关东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限黑省政府于 11 月 3 日前，将洮昂路嫩江桥修峻，否则日方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29 日，日本驻龙江领事清水八百一向黑省政府送致代修江桥的通谍，称“洮昂系满铁借款铁路，且于交通运输经济上有重大关系，如长此放任，华方的自行修理桥梁认为绝对不可能。故与有密切关系的满铁决即派人着手修理，希望黑省军队断勿妨碍，并予以适当的保护。倘妨碍修理，则日本方面将予以适当的措施”等语。这都是日本关东军援张伪军进犯黑省的具体步骤。张海鹏伪军上次侵黑失败是因为有嫩江桥之阻，这次日军借口修桥，想以武力帮助张海鹏达到侵黑的目的。黑省主席马占山当即答复：“南满铁路对于洮昂路仅有借款关系，债权者不能代债务者修理，且洮昂路并非黑省所属，亦不能代为承认满铁兴修，可由黑省代为通知洮昂路自行修理。”马占山的答复不软不硬，柔中有刚，既拒绝了日军修桥的要求，也戳穿了其中的阴谋，使林义秀悻悻而去。

走狗不力遭斥责

在日本关东军的示意下，10 月 30 日，张海鹏在洮南召集了军事会议，各旅的团长都参加了会议，并有日本军官 11 人列席，讨论再次向黑省进犯的军事计划。自徐景隆死后，张海鹏任命原一旅一团团长王子安为骑兵第一旅旅长，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海鹏说：“前次我们骑兵第一旅打过江桥，他们表现得很勇敢，这种英雄行为，其他旅要学习……”还没等他讲完，列席会议的日本军官立即插话，指出“江桥没有打好，简直是失败”，“这哪里是战斗，枪声一响就往后跑”。并指责在泰来的后续部队，没有见到敌人就往洮南撤退了。参加会议的日军头目山本等还当着旅团长的面斥责张海鹏，说张海鹏“整饬军队不力”。多大的奴才见了主子都是小的，一个上将在校官面前只得诺诺称是。在会上，日本军官还向众降将训示：如果再在战斗中撤退，就“死了死了的”。日本关东军为早日侵占黑龙江省，会后立逼张海鹏亲自到泰来前线指挥，并派日本军官须本、加藤、大矢、吉村等四人与张海鹏同往泰来，名为“襄助军务”，实则监视张伪军的行动。

11 月 3 日，日军派铁甲车两列，士兵三十余名，开到江桥，并有飞机五架在天空盘旋，实行以武力掩护，强行修桥。在黑省军队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将少数防守江桥的

部队撤退到本阵地的情况下，日军又进行挑衅。日本飞机向桥北阵地投掷炸弹，百余名日军渡过江桥，对黑省军队阵地施行射击，伤守军士兵十余名，守军仍坚守阵地。

11月4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用铁甲车猛攻守军阵地。处于正面防御的徐宝珍卫队团官兵激于义愤，奋勇杀敌，日军不得不撤退下去。

11月5日，日军因连日苦战，也未攻过江桥，乃变更阵容，驱使张海鹏的军队在前，由日军督饬向守军猛攻。守卫江桥北岸的卫队团士兵见是张伪军打头阵，炮火异常猛烈，直打得张伪军留在黑省军队阵地前一批批尸体，任后边督战的日军枪挑刀刺，仍抱头鼠窜，溃不成军，败下阵去。

日本侵略者向来藐视中国军队，认为素质低、装备差，但黑省军队人人都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敌忾同仇，寸土不让。特别是卫队团补充了捷克式轻机枪之后，更发挥了极大的战斗力，这是出乎日军意料的。

5日，战斗异常激烈，终日枪炮轰鸣。许多敌伪军被打死打伤。据日方发表，为攻占江桥，日军死亡了167名，伤600余名；张伪军也死伤了700余名。但黑省守军也死伤了百余名。大批勇士为祖国尊严而流了鲜血，还有不少人长眠在这英雄的嫩江桥北岸，滚滚的嫩江水年年在歌唱着他们的英雄业绩，嫩江桥保卫战永留在抗日史册上。

11月6日，日本侵略军更以两个联队的兵力，野炮40余门、重炮8门、飞机8架、铁甲车4列，从早到晚，疯狂地向北岸进犯。终日激战，黑省守军伤亡太重，后因运输断绝，枪弹给养供应不上，为保存兵力，守卫江桥部队奉命乘夜黑撤到大兴车站以北整顿补充。

后来，日军以张伪军质量太差，且无斗志，再没有安排正面作战。攻过江桥的士兵，也没有一名是张伪士兵。

梦想督黑成泡影

在嫩江保卫战之后，黑省军署又在三间房集结兵力，为保卫国土，为保卫人民，为保卫黑龙江省城，准备给日本侵略军再进行一次阻击。

日本侵略军在江桥激战中，伤亡很大，浜本步兵联队、高波骑兵队全部被歼。这是日军从"九一八"侵略我东北以来，第一次遭到这样猛烈抵抗，伤亡这么多人。虽北岸中国守军撤离，但也无力追击了。只在这时间，抢修江桥，处理死伤的日伪军，等待援军的到来。

日本侵略军在军事上没有从黑省捞到什么好处，就在政治上积极活动。日本驻黑领事清水和驻哈领事大桥，暗中与黑省中一些汉奸来往，欲说服马占山让出省垣，由张海鹏来黑主政，因马占山与黑省各将领一致抗敌，阴谋没有得逞。

11月8日，日军少佐林义秀又向马占山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强迫马占山下野的通告，本庄繁通告是：马主席如欲避免日军之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试意，希速于八日夜十二时以前提出回答。

同时，林义秀并以个人的名义写短扎一纸。林义秀短扎内容是：现在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为唯一之方法，即马主席于此时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无他良策。

马占山阅后置之不理，日本侵略者这一着又失败。

11 月 12 日，林义秀又送来本庄繁的通告，提出三点要求：一要马占山下野；二要黑省抗日军由省垣撤退；三是为保证洮昂路的“安全”，日军将向洮昂路的昂昂溪行动。并要在 12 小时之内答复。马占山当即电告北平张学良将军，得复电“饬死守，勿退却。”马即对日人斩钉截铁地答复：“下野本无不可，但须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代，如张海鹏之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权；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自有权，非日本所能干涉；昂昂溪车站为中国与苏联合营的铁路站，贵军要求进兵，殊与芳泽代表在国联所声明的日本无领土野心一语自相矛盾。且余奉令保守疆土，在未奉到明令让渡与日本前，碍难照办，同时在法律、事实两方面，亦非贵国所应要求。”

日本军国主义是强权政治，哪讲什么信誉、公理、法律和事实。9 日，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已由长春来到洮南，策划着进一步侵黑的一切准备。旅顺日本驻屯军的重炮队于 10 日晚沿四洮铁路已抵洮南。在洮南近郊又辟有飞机场，洮南敌兵大增。大批日伪军集结在洮南至泰来一线。就在马占山未答复林义秀之前，日军就已在前线采取行动了。

12 日到 18 日黑龙江守军在省主席马占山指挥下与日伪军在三间房展开激战。日军有骑兵、步兵轮番进攻，天上又有飞机投弹助战，形成步、骑、空，还有坦克全线、立体的猛攻。守军仅依靠简易的工事，常规武器，奋勇抵抗。双方鏖战，极为激烈。15 日马占山亲赴前线督战，勉励将士。整个战线在三间房至大兴一线展开。黑省大部分兵力投入战斗。如骑兵第一旅吴松林率三个团，程志远率骑兵第二旅两个团（其旅三个团），卫队团的两个营，步兵第三旅（只两个团，原旅长是马占山）的李青山团，从绥化调来的王克镇保安大队（编为独立团）全部参加了战斗。原兴安屯垦军苑崇谷旅（暂编步兵第 1 旅）担任三间房的正面作战。日军也加强了力量，有长谷旅团、森连满铁守备队及浜本联队、张海鹏伪军一部。后来日军还从长春调来了多门师团增援。虽敌我力量悬殊，但守军斗志不减。

张海鹏伪军在 12 日前，因蒙边四旗七县发现了救国军，3000 余人在东屏、镇东起义，将张伪军打得焦头烂额，日军拨以炮兵助战，才扭转了战争形势。而这参加三间房战斗的张海鹏伪军，虽没有担任正面作战，但也被黑龙江守军打得落花流水。除被击毙者外，多数潜逃。

张海鹏随着大批日军开向齐齐哈尔，他认为此次进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主席非他莫属，还特意对家小、心腹作了安排。黑省守军因伤亡过重不得不于 19 日 4 时退出省垣，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率日伪军大部侵入了齐齐哈尔，并建立了伪政权。即委任张景惠（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长）兼任黑龙江省省长，张海鹏督黑美梦又成了一场空。

热河回“京”身无一卒

1932 年张海鹏被日本关东军任命为伪洮辽警备司令。他所辖地面，抗日烽火风起云涌，不愿被奴役的人们纷纷拿枪来抗日，打击日伪军。

1932 年 3 月，李海青抗日义勇军攻入扶余县城，几日后又围攻农安县城。

4 月，吉林义勇军冯占海部袭击长春附近的二道沟。

7 月，吉林抗日军攻入榆树县城，又收复五常县城。

8 月，驻洮安县的洮辽警备军第六旅（旅长彭金山）白永盛团长率部与八区自卫团举行武装起义。攻下了白城子，升起了青天白日旗，与日本守备队在城内激战一天，在伪洮辽警备军后院点起了大火。

9 月，吉林抗日义勇军团结十万义军，在冯占海、宫长海、姚秉乾的指挥下，围攻吉林省城吉林。张海鹏的骑兵第五旅奉日本关东军的命令前往解围，结果被打败。骑兵第五旅旅长张俊哲是吸食鸦片的人，有名的大烟鬼。他的部下也多有这方面嗜好，是有名的“双枪兵”（步枪和烟枪），缺乏战斗力。他率部从三岔河出发，刚离开铁路线奔吉林，就在大青嘴（德惠县内）被义勇军打援的部队给截住了。激战一昼夜，被义勇军打死打伤 100 余人，被追击得狼狈逃窜，有些兵被打得不知去向。几日后，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将张海鹏和熙洽（伪吉林警备司令）召去，大加训斥。特别对张海鹏训斥：“你辜负了日本天皇陛下对你的信任，对义勇军督剿不力，你的部下没有接触义勇军主力，就被打退了，对新国家缺少献身精神，这怎向天皇陛下交代，皇军在北满剿匪怎能放心！”张海鹏只得唯唯诺诺，表示一定严督部下，把仗打好。

不久，张海鹏又抽调一个旅兵力去援第五旅，并有日本兵督战，吉林警备军也加强了兵力，共同向吉林方面猖狂进攻。而吉林抗日义勇军却改变了围城打援的战略，除留一部在吉林原地坚持抗敌外，其余兵力组成抗日救国军，穷追猛打张海鹏这股日伪联军，直追过中东路，并强渡伊通河，转移到农安西部丘陵地带。等张海鹏伪军在日本兵督饬下，汇在一起奔向吉林的时候，抗日救国军却在冯占海的指挥下，冲出了日伪军的包围圈，向西挺进了。抗日救国军路过长岭，张海鹏急令骑兵第八旅旅长王永清进行堵截。王永清是绿林出身，又任东北军官多年，能征惯战。但他所辖 2000 多名士兵是由乡村大团刚刚组建的，被抗日救国军一打即散，不少士兵还毅然反正参加了抗日的队伍，冯占海乘势攻克了长岭县城。

根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张海鹏急令骑兵第二旅旅长刘茂义在开通、瞻榆一线阻截，又调洮南、洮安（白城子）、突泉的三个旅增援。而冯占海却用精兵夜潜至四洮铁路的丰库车站，拆除了几段路轨，击毁了一列企图截击抗日军西进的军车，打死打伤日本士兵数十名，进入了瞻榆县城。

张海鹏正在集中兵力追击在科尔沁草原上缓慢西行的冯占海抗日救国军时，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一部在李海青等人的率领下，又在肇源渡过了嫩江向南打来。张海鹏眼看着冯占海抗日救国军奔向热河，而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阻截李海青义勇军向热河、辽西靠拢。

1933 年（伪满大同 2 年）春，伪满政府任命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为进犯热河的总司令，任命洮辽警备司令张海鹏为前敌总司令，配合日军分三路向通辽、鲁北、绥中方面进犯。张海鹏就带了鹏飞的第二旅、刘茂义的第三旅、傅明勋的第四旅前往热河。南京国民政府虽被迫成立由张学良、张作相的两个集团军，保卫热河，但把希望仍放在国联上。而日本代表声明退出国联，遂以强大的兵力，侵占了北票、开鲁、朝阳、平泉等

县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弃承德，孙殿英因粮绝无援，撤退多伦，日军侵占了承德、赤峰。后蒋介石免去了张学良的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职务，命何应钦“负责缩编调遣”关内外义勇军，以压制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又下令严禁将士请求抗日，“侈言抗日者，杀勿赦”。日本侵略军遂全部侵占了热河，并突破长城一线，继续向关内进犯。

1933年5月，张海鹏被任命为热河省的伪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伪省长。任职刚过一年，在1934年（伪康德元年）7月，日本侵略者为加强军事控制，进行了军制改革，新设立五个军管区，使军事和政治分开了。管辖热河和锦州一带的是第五军管区，司令官为王静修。同年10月，伪满政府又改革了行政区划，把东北辽吉黑热四省划为十省，另设兴安东西南北四个内蒙省，实行分而治之。刘梦庚被伪满政府任命为热河省伪省长。张海鹏在热河没有了军政职务，只得留下了鹏飞等三个旅，回长春（伪新京）去任他的侍从武官长一职了。

张海鹏自从被任命为进犯热河的前敌总司令带走鹏飞等三个旅后，日军对在洮辽地区张海鹏部的其余六个旅也进行改编和调遣。第五旅旅长张俊哲出任伪满洲国吉林警备骑兵第四旅旅长，他的那个旅调到吉林一带。骑兵第六旅旅长彭金山调到郑家屯，只带走少许兵力。留在白城子的两个团，白团起义，另一由自卫团组成的骑兵团也叫日本人给解散了。只有骑兵第一旅旅长王子安仍在洮南任职，却由日本人所控制。江桥一战，这个旅被黑龙江省抗日部队打得落流水，兵员也未得到补充。其余各旅在围剿抗日义勇军中也损失很大，特别是士兵大量逃亡，后来也给编遣了。

张海鹏以侍从武官长身份恭维伪皇帝溥仪的时候，已是无有一兵一卒的上将了。

三、龌龊的一家

人们常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海鹏的官欲，四太太马秋帆的贪婪，四虎子张俊武的兽行，构成了这个龌龊家庭的主旋律。

大办“两寿”增财路

马秋帆主持张府家务除过问管事的张家所经营的各商号收入情况外，主要是操办一年的“两寿”、“三节”。这是旧中国一切军阀敛财的招法。“两寿”是张海鹏的寿辰和马秋帆的寿辰；“三节”是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那时的春节一般人都叫“新年”。每逢这“两寿”、“三节”之前，马秋帆都以张海鹏和马秋帆两人的名义大发请帖。拟稿是军法处长李玉宣的事，拟好后，由军法处人员缮写，由秘书处发往各处，有些还要派专人去送，这当然是一件美差。到了各地，他们都要按上宾被招待，回来还能得到自己一份礼品。操办“两寿”、“三节”既是张府搜刮钱财的好途径，也是下属官员讨得张海鹏欢心，获得升迁的一次机遇。洮辽镇守使署所辖的16个县的县知事、社会名流（如商会会长等）及驻扎在各地的团长（后来是旅长）接到请帖和祝辞后，都派人带各种礼品前来祝贺；没接到请帖的也在此期间想方设法托人把财物送到张府。

民国年间，上自督军下至团营长，地方的省长、县长等都办“三节”、“两寿”，但张海鹏操办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各地在未接到请帖前，都已准备好了“礼品”。如草原

上的牛、羊，北山里的黄羊、野雉、飞龙，一般送的都是生猪、肉桦，当然还有现大洋。礼品比较丰厚，且相互间暗有攀比之势。

民国十五年旧历十月初五是张海鹏的六十大寿，提前一个月就发出了请帖，办的特别隆重。在九月二十九日就开始接待宾客，直到十月初六，大办七天。参谋长李盛唐任秘书长，负责全面。洮辽镇守使署的一切公务都已停下，各处的人都分配了角色。参谋处负责警卫；军需处安排每日食谱，采购各种需用，接收送来的礼物；副官处负责招待，供给烟、茶、水果，那真是烟成箱，茶成盒，水果成车；秘书处负责接待，送往迎来，安排食宿。此时张作霖率奉军与直鲁联军已打败了国民军，占领了北平。奉军的总参议杨宇霆和京奉铁路局局长常荫槐共同送来了北平的戏班子，中有全国名角言菊朋和王幼卿。言菊朋的拿手戏是《汾河湾》（薛平贵与柳迎春的故事）。王幼卿的拿手戏是《彩楼配》，都到洮南演出。洮南当地还有两拨戏，几拨戏在镇守使署和东戏园子轮流演。参谋长李盛唐还兼戏班子的总调度，每日白天、晚上的戏都由他来安排演出。北平来的京戏班子到洮南唱了四天，一饱这里军政人员的眼。

黑龙江督军吴俊陞与张海鹏交情深厚，因军务繁忙，派来代表祝寿；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时在北平，派来的副官；京奉铁路局长、沈海铁路局督办常荫槐也派来了代表；刚任署理奉天省长的刘尚清（字海泉），他在洮南开有东昌当等买卖，与张海鹏也有交情，派专人也来到洮南；曾任吉林省公署参谋长的臧式毅和沈阳粮秣场总办王大忠等高级官员亲来祝寿。每天都是翅子筵席，桌子上摆的多是山珍海味，筵席是一拨接一拨。光厨房内的名厨师就有几十人。从早到晚，宾客不断，有的玩到半夜还有小餐。

送来的寿礼有：寿幛、寿幅、寿联、寿桃、寿酒；万民伞、万民衣等等。镇守使署的军官家属和士兵都在酒席宴上吃喝。就连洮南周围的叫化子也赶来祝寿，在临时搭起的席棚内喝酒、吃肉。用精粉做成的寿桃成筐成筐地分给各军官家，有的吃不了，就倒在猪圈里喂猪。

张海鹏操办的六十大寿，场面大，人员来的多，据有人估算，光现大洋就纯收进十余万元，其他礼品则无法统计了。

而此时，军阀混战，灾害连年，民不聊生。一般老百姓连过日子都难熬，哪有心思过生日呢。

请看《东北大事记》在民国十五年所载的史实，现摘几条，按时间排列如下（括号内为作者所加）。

2 月 12 日　奉省令东边道、洮昌道（洮辽镇守使所署及绥靖区）各县，设法安插灾民垦荒。

3 月 6 日　《盛京时报》载：因奉票跌价，奉天陷在罢工风潮中，三月初罢工的工厂有本溪湖煤铁公司、满蒙毛织公司、大连机械制作所奉天分厂等等。

3 月　奉天纺纱厂两千五百人罢工。

4 月 15 日　国民军（在山海关之郭松龄余部组成国民军第四军，魏益三为总司令，即东北国民军）自北京退往南口。是日，奉军与直鲁联军开入北京。

4 月 18 日　自是日起，哈大洋（哈尔滨出的纸币）明显跌价。

4 月　奉张（作霖）为挽救东三省财政，密令吉、黑两省开禁栽种鸦片，设局专

卖，征收烟税，悉归军用。

5月6日 张作霖在东三省发行金融公债现大洋五千万元。

5月19日 奉省北票屠宰商罢市，反对增捐。

5月21日 奉天设立东三省公债局。

5月25日 奉天奉票连日跌价，物价持续高涨，交易所闭市，金融陷于混乱。

6月1日 奉天当局为发行五千万元公债，令各县知事，从是日起，商民每百元资本负担九元；从9月1日起，农民每田一亩，负担一元。

6月4日 奉票市价仅值二折。

6月17日 东三省旱情严重，农作物枯死甚多。据日人调查报告，以是时苗情推测，南满只可得常年收成之半。

6月 四平因旱荒，农民群起“吃大户”。

7月15日 洮昂铁路竣工通车（关内大批难民为了生存，扒车向北逃荒）。

张海鹏操办六十大寿的时候，正是东三省老天降灾，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当张海鹏把一布袋一布袋银元装入自己腰包的时候，东北人民因公债和各种捐税以及负担被榨得已没有多少油水了。

在民国十七年张海鹏办六十二寿辰时，兴安屯垦公署邹作华督办曾亲来祝寿，除送寿幛外，还送来了野雉、飞龙等野味。这年只办三天，没有六十大寿那样隆重。

四太太张马秋帆的寿辰虽不如张海鹏办的规模大，但和张海鹏的往年寿辰一样，都由洮南的商会主办。只是参加的女客多，收受的礼物并不少。

张海鹏和马秋帆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个节日，都向所属各县、所辖各部、洮南城内各界名流送祝辞，接到祝辞的都要到张府送礼、送钱，表示祝贺。

“三节”属春节最隆重。每进腊月门，各县、各团营都早早地把“礼物”送到张府。腊月三十晚上，镇守使署的文武官员都到张府“辞岁”，向张海鹏、马秋帆行大礼。桌上摆着茶点、水果。此时，张海鹏表现非常高兴，马秋帆还拿出一些钱来，分给大家，拉上一些年青人，推上几圈牌九，大家高声唱喝，看谁“抢”的多。对赢了钱的，张海鹏则大加赞赏说，明年财运一定亨通；对输了钱的，则说你“明年财运不好，再待后年。”玩到10点来钟，大家把钱都堆放在桌上，尽管马秋帆还往各人的腰里揣，但谁也不要，逐一离去。

正月初一早9点，张海鹏要在镇守使署院内举行团拜。镇守使署的文武官员在院内围站半圆形，齐向张氏夫妇敬礼，张马二人亦答礼，然后张氏夫妇在院中坐定，其余人按官级排在后边，新年伊始，照一张照片，以为纪念，年年如此，其余假日，则自行活动。

张海鹏常讲，“我最烦恶送礼。”实际上张海鹏手下人官运的沉浮，靠的全是“运动金钱”。就连地方官的任用，镇守使在推荐上都有一定影响。所以走张海鹏“门径”的人很多。四太太马秋帆是从烟花巷中出来的，善于应付官场，懂得金钱的魅力，也善于拢钱。她还好干预政事，一些会混事的人，多走她的“门径”，获得升迁。

从民国十三年张海鹏任洮辽镇守使起，几年间就达到巨富。张海鹏在洮南开有双义泰丝房、东门里的同兴和粮栈，都是洮南城的上等买卖，每年收入各近100万元；白城

子开有义增兴丝房，也是一流商号；在平安镇还建有缸窑一处，专烧民用大缸；与吴俊陞在索格营子（今洮南市镇西镇）合开的双义泰烧锅，在十家子开广义泉烧锅，在六十户学田地开的广聚泉烧锅。还有索格营子2000多垧地（40多方，每方45垧），也是吴俊陞与张海鹏的共同地产。

清末和民国初年，地方上都讲送礼。白城这个地方也没啥重要物产，一般都送土地。特别是平定乌泰叛乱，粉碎陶克陶武装之后，许多蒙古贵族、汉族的地主，都向得胜的将领们“赠送”土地，一送就是几十方地。如白城北的三畲堂是张学良的地窝棚，就是一个蒙古人送给张作霖的，是45方。吴俊陞在索格营子的40多方地，也是那时蒙古人“赠送”给他的。在索格营子的地开垦之后，张海鹏帮助经营各得一半。

原双义泰丝房有个李掌柜的，因他善于交际，后来做了张府管事的。此人当时已有四十余岁，很会逢迎，并认四太太为“干妈”，经常出入张公馆，由他料理张家的各家商号。

吴俊陞任黑龙江督军后，每次上奉天不走中东路，都走旱路经洮南、郑家屯，为的是自身安全，防备日本人对他暗算。在洮昂铁路通车之后，更是如此。自民国十三年张海鹏任洮辽镇守使后，吴俊陞都是每年来洮南二次。因洮南是吴俊陞升官起步之地，又在这里任过镇守使，来洮南是旧地重游。

每当吴俊陞去奉天或从奉天回来，张海鹏都是多方打听消息，带领镇守使署的高级官员，去迎送提拔自己的“恩公”吴俊陞。

洮昂铁路（洮南至昂昂溪）在民国十五年7月15日竣工通车，当年9月和第二年秋吴俊陞曾两次到洮南，张海鹏都做了隆重接待。

民国十五年9月，吴俊陞在奉天参加军事会议，商讨援吴（吴佩孚）、“讨赤”（国民军）及入关奉军驻防分布等事项，开会回来，到了洮南。张海鹏率文武官员到火车站迎接，全城商贾士绅及军队列队两旁，夹道欢迎，并有军乐队奏欢迎曲。在张海鹏的陪同下，吴俊陞在军乐声中走出车站，坐上了张海鹏刚用3000元现大洋买来的小汽车。因当时张公馆还未落成，张海鹏便直接把吴俊陞迎入东戏园子，接风洗尘。

为保证这位吴帅的安全，张海鹏在东戏园子外用一个团兵力来警卫，在戏园子外有一个手枪连，门口还有十数名年青的军官把守。戏园子周围的窗户都换上了新窗帘，里面的木板凳都已撤出，摆上了三十多桌酒席。整个宴会由参谋长李盛唐主持，吴俊陞在张海鹏的陪同下，步入宴会场坐定后，秘书处的官员也把吴俊陞带来的官员和陪宴的也领到各桌按次序坐了下来。参谋长一摆手，军需处和官员就将已做好的盘菜，送到各桌。这些盘菜都是在城内有名的饭馆做好了的，全用食盒盛着。各桌上还有火锅，桌上放着切好的羊肉、酸菜、粉丝等物，随吃随添。吴俊陞由张海鹏及军政要员陪同靠于戏台一侧。台下各处要员不断前来敬酒，觥筹交错；台上由戏班子演出的折子戏。台下劝酒、应酬，声声入耳；台上管弦、歌喉，乐声阵阵。“自古将军爱粉黛”。张海鹏素知吴俊陞的三大嗜好：名枪、好马、俏美人。为讨好吴督军的欢心，又从各妓院选来上等妓女四五十名，充做女招待，到各桌劝酒。洮南在当时不仅是奉天北部的重镇，也是商贾云集的地方。光妓馆就有几十个，妓女有数百人。各妓馆选送做这次女招待的，都是些年青貌美的女子。不说这一次还要给十元赏钱（比一个士兵一个月饷钱还多），就是

不给钱，在这样出头露面的场合，也要大卖力气的。这些“女招待”在各酒桌旁执壶劝酒，莺声细语，卖尽风骚，很讨这些食客的欢心；台上最后演的是《天女散花》，更使吴督军格外高兴。他不住称赞张镇守使想的周全，直喝得酩酊大醉，才离开酒桌。由张海鹏陪着，坐汽车到镇守使衙门内休息。

民国十六年秋天，吴俊陞从齐齐哈尔去奉天，又到了洮南。同前次一样，张海鹏率员列队到车站欢迎。这次接风洗尘没有安排在东戏园子，而是直接到刚修好的张海鹏公馆内。吴俊陞与张海鹏端坐车内，车门外各站着一名佩戴武装的士兵，前有马队开道，左右与后边皆用马队警卫，整个队伍足足排有一华里长。因洮南发生一万数千人的反日集会不久，为防止发生意外，街上全用巡警警戒，不让行人通行，人们只能远远看着这一队伍通过。

上次在东戏园子喝酒，虽然博得了吴督军的高兴，但做为张府的主人马秋帆因病没有出席。特别是张海鹏在摆脱了四太太的监控下，不加检点，喝酒时与劝酒的“女招待”（妓女）过于亲昵，动手动脚，此事传到了马秋帆的耳里，醋心大发。为此事，老夫少妻很长时间不睦，张海鹏请了好多说合人调解，才算罢休。自此，马秋帆对张海鹏管束更严格。

这次吴督军来洮南，马秋帆特意提出，要在张公馆内设宴招待吴督军，不能用妓女劝酒，否则有损镇守使的威严，日后传出去也不好听。张海鹏既有过去的短处，所以听了夫人的话，一律用年青的军官劝酒。张海鹏夫妇与吴俊陞同坐一席，在酒桌上，张马秋帆亲自劝酒。虽然她已有二十七八岁，但昔日风韵犹存，何况四太太是见过世面的。吴督军见过不知多少风流女子，但很少接触像马秋帆这样的人。加之吴督军说话有毛病，被马秋帆抓住要害，没等他怎么细看四太太的容貌，便已被“劝”进十数杯酒，不能不使这位“草莽英雄”的神魂颠倒，兴奋异常。四太太马秋帆也很有酒量，使吴俊陞当日喝得烂醉，连点的好戏都未看成，便倒在张公馆里。次日临走前，还不断夸奖四太太“胜于久经疆场的将军。不但是个人才，而且还是个将才”呢。

吴俊陞来洮南这两次，是重游旧地，张府并没有从腰包中掏一文钱，完全是商界出钱招待的，马秋帆又从中捞了一把。

正当吴俊陞准备在民国17年秋再游旧地，张海鹏筹划迎接这位督军的时候，在6月4日晨，吴俊陞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使张海鹏痛楚不已。吴俊陞的身死，使张海鹏失去了靠山和知己，踌躇满志的心情，准备擢升的欲望，全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当时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吴泰来身上，不想吴泰来只任十数天的黑省护理督办，就被万福麟取代了，使张海鹏万念俱灰。

我所知道的于冲汉的卖国行为

袁 庆 清*

于冲汉字云章，系辽宁省辽阳县与本溪县交界的大高岭人，所以一般人就称彼为辽阳县人。于冲汉在1890年和1891年之交，因其父（名不详）在河北省省城保定候补（系佐杂缺），所以于冲汉与其二弟翰章均在保定的莲池书院读书（当时系的官学性质）。该院是我国北方的最大书院，师资也为一时著名学者，所以在国内的各书院中它的地位很高。当时日本尚有在华留学生，有日人锅岛者（名不详）曾在该院读书研究汉学。当时我国在院学生多有大国优越感，很鄙视锅岛，锅岛处境很苦，惟于冲汉与他相交独厚。他学成归国临别时，对于冲汉说：中国虽是个大国，但一切腐朽落后，不足有为。你如果在国内不得意时，可到日本东京找我，我一定能帮你忙。于尚以为锅岛不过是临别表示友谊，并未在意。后于冲汉之父署热河凌源通判，因该地农民起义被杀，于冲汉不得已回归原籍。于冲汉在少年时品格不好，抽大烟和挑词架讼，不齿于乡里。在辽阳城内有其姐丈韩家和岳父花家，所以他就常在辽阳闲居，经济困难遭到亲友的白眼。比到1897年困顿更甚，在国内乃至不能谋生，才想起当年日友锅岛之言，遂措川资航海前往东京寻求锅岛。但对锅岛住址不详，当困居下宿（即日本的小旅馆性质），几两三个月积欠店费无法支持。而锅岛其人遍寻并无一人知者，于绝望之余决心自缢身死，为店东之女（即下女）所救问其苦，于具道寻友无望不如自裁。女怜其遇而商诸母，又知其通汉学，嘱安心访友可供食宿费不必为难。一日有日本军官中佐某到下宿见于，询之（时华人到东京者很少），于道其详。其人惊叹说：锅岛系我好友，通汉学，住东京郊外，所以东京人鲜知之。我可告锅岛来看你。于大喜，锅岛果来请于至其家，待之甚厚。不久，于冲汉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读书，兼任士官学校汉语教官。及1903年日俄战争起①，时日本陆军省急欲招募华人能在中国东北进行间谍工作者，于背锅岛前往应募。该省以于很合条件选中之，于归告锅岛，锅岛以为有学问、有品格的人，不应当作这下流工作，令婉辞之，但于冲汉终于充任日军在我国东北对俄军进行作战时的间谍。于冲汉1904年在辽阳城东南吉峒峪一带伪装农民进行活动，为俄军所获几遭不测。于急令人至吉峒峪办理地方团练事务的徐珍处（徐当时在地方很有影响，俄军很重视之）请求营救，徐以与于有同乡关系，急设法，将于保出始免于死。于冲汉后任日军沈阳军政署署长小山（名不详）的翻译官，他作了不少的谍报工作，日人很信任

---

* 作者曾任吉林省公署官员、舒兰县长。伪满时任伪安东省民生厅长、伪宫祭祀府奉祀官，1942年后历任伪林野局副局长、马政局副局长，1944年末升伪哈尔滨市长。

① 1903年日本准备对俄战争，1904年2月10日，日俄正式开战。

之。1905年日俄两军媾和停战，小山将回国时问于意愿，于表示愿留东北工作，小山也愿意他与日军保持永久的紧密联系，对日本日后侵略东北有利，允其请。当向当时的奉天将军赵尔巽推荐于冲汉予以相当安插。以于系辽阳人，赵当即告袁金铠为其设法时，袁在辽阳东北路创办警察，即与于以辽阳东路半拉山子警察区官之职。这就是于冲汉的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和事后又藉日军之力得以回国开始卖国工作之始，也就是于冲汉得有根基可以往上爬，更可以为其主子作秘密工作当汉奸卖国奴之始，也就是于冲汉开始卖国的时候就与袁金铠开始结合之始。

于冲汉在东北的卖国活动

于冲汉因通日语，于1906年充辽阳州交涉局局长。后保准县缺，又代理过辽阳州知州。1912年充奉天省交涉署署长。1915年张作霖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时，日本帝国主义者阴谋要控制张作霖以为己用，就必须在他一上台时，即在各方面与以最重打击。遂大批收买奉票，令人到奉天省官银号兑换奉小银元以相挤兑，予当时的奉天钱法以致命伤。张作霖恐被日人暗算不利于他的军阀割据，急谋之袁金铠（时袁任张的秘书长），袁告以可利用于冲汉向日人疏解。张即用袁计求于帮忙（时于任张的参议）向日人交涉。究竟张作霖当时又对日人答应了什么丧权辱国的条件是不知道的，但日人挤兑奉票之事竟由此作罢。这也可见于冲汉对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之深，所以才能在中国作引线人，作卖国奴的勾当。事后张作霖为酬于对此事之劳，遂予以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一差（系当时所谓的优缺），每年可以分得花红十余万元。于冲汉在奉天省交涉署长任内时，又奉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帮同掠夺我国东北最可宝贵的鞍山铁矿资源。他以自己的名义报领鞍山一带如樱桃园、大孤山等八处铁矿，并在其奉天住宅内成立安奉铁矿公司以掩人耳目，而暗中则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将祖国的最可宝贵的资源竟这样奉献与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之手。该矿完全由日人开采冶炼，而由他只担任出卖铁矿石于日本以从中谋利。像这种改头换面、抽梁换柱的阴谋诡计，他是绝对瞒不住祖国人民雪亮的眼睛的。当时有辽阳开明士绅宾雅轩（满族）者，出面反对于的卖国行为，向奉天高检厅和高审厅控告于冲汉盗卖祖国资源的严重罪行。以于势大，讼不得直，又上诉于中央大理院，作长期不懈的斗争，当时大快人心。后于冲汉以事情扩大与自己名誉大有妨碍，乃设法托人向宾调解，始作罢。但是一个汉奸通敌盗卖国土的丑恶行为已闹得举国皆知了。后在伪满时经过日本所经营的昭和制钢所的买收，以100万元的代价，于终将该矿在名义上也整个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再日本侵占我国安奉铁路的历史经过，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时在我国强行修筑仄轨（即窄轨）军用铁路，战后即据为己有所扩建而成。在当时的条件下日本又得寸进尺地向我国要求扩展该路两侧铁路用地，乃一再交涉终未办到，后又因于冲汉充任交涉署长的机会，终由于帮助日本得以实现。后日人为酬于之劳，由满铁无偿地向于提供树苗，令于在安奉沿线铁路用地内栽植落叶松数千万株，成材后由日本人收买。于冲汉在1924年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当时东铁路局苏联籍的上层职员，即纷纷相告说：日本的代表人于冲汉来了，大家应特别注意啊！也可以见他的卖国声名是如何地彰明昭著了。

于冲汉和张作霖的关系

张作霖自任二十七师长时即与于冲汉有旧，及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时，更与于密切勾结，如日本挤兑奉票由张求于向日本交涉才得和解等事。在1924年郭松龄起兵反张时，张作霖又暗中求于向日本帝国主义请求帮忙，不准郭军通过南满铁道作战，所以郭军终于失败。这是勾结的一方面，同时又有其矛盾的一方面。就是当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严重的矛盾的时候，而于冲汉就撕掉假面具，专心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例如1928年炸张一案，以于冲汉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历史之深，他事先是不会不参与这个阴谋的，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则更是昭然若揭，他完全与日本帝国主义走一条道路，参与阴谋侵略祖国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

于冲汉和袁金铠的关系

于冲汉自1905年因经过日本人小山向赵尔巽推荐出任袁金铠所筹办的辽阳东路警察区官，此为于与袁相识之始，也是于卖国的第一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开端。回想于冲汉与袁金铠的结合经过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袁金铠一向以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自诩，从表面上看不同于冲汉的明目张胆卖国求荣，简直是两条道路的人。但是他们的私人来往却是密切的，尤其是每当东北发生重大事变的时候，袁金铠每每与于冲汉聚首商谈，极似志同道合的人。我久作外官不在奉天作事，所以真相不大明白，但是对他们二人结合的迹象，则从来有不解处。也就是不应结合的人，为什么又有这样的密切结合呢？与其说袁金铠愿意通过于冲汉去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与阴谋，以为自己应付时局的参政资料，不如说袁金铠是一个伪君子，他是崇日、畏日，惧怕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而不愿意触及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所谓权益，以维持自己在东北的官场地位和对封建军阀出谋划策的权宜之计。更谈不到他对东北有什么特别关心，对祖国有什么特别帮助，反过来他也是揣摸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以为自己谋求功名富贵之计。于冲汉的卖国行为尽人皆知，而袁金铠的对日关系是通过于冲汉也受到日本的牵制。

于冲汉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卖国活动

于冲汉的为人阴险狠毒，他作为日本在我国东北进行侵略的代理人。九一八事变起，他受关东军部的命令，阴谋使用两面手法，即一方面要使东北重地辽宁省的行政主权向与祖国相分离的方面发展。除由于自行负责进行外，他又自知其臭名昭著不足以号召一切，所以他又与关东军密谋，认为必须利用袁金铠原来的政治地位和所谓声名，以便号召东北和麻痹东北人士。因袁在东北从政多年，在东北的行政、士绅和工商各界很有号召能力。日本乃通过于冲汉施用手法，而袁当此重大事变既不出来，又不抗日，明明是要利用机会进行卖国行为，也就是他的内心是愿意参加事变以后的东北反动政治局面。于为人老狯，早知袁的隐衷，所以他向日本献计，利用袁的为人。至于袁、于私自

商讨，于令袁出任伪奉天地方治安维持会正委员长，于任委员。最后于连委员也不愿担任，而是把全部责任完全推在袁的身上。袁金铠的为人历来一当事变就不愿意出头露面，而愿意私自活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得渔人之利，而不愿意授人以口实。但是在伪地方治安维持会这种局面下他竟改变作法，而结果又怕国人对自己责骂，不敢变本加厉，又不肯上关东军的圈套，和于冲汉的百般劝诱，再进一步的改组辽宁省政府，以彻底担当了背叛祖国的责任，这完全是与袁的夙行相吻合的。所以于冲汉又秉承日本意旨改用威逼利诱方法劝臧式毅以原来省主席地位取消了伪奉天地方治安维持会，而改组了省政府，这都是于冲汉替他的日本主子所一手包办的勾当，遂为成立伪满反动政府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于冲汉出卖东北、媚敌求荣的一个最阴险阶段。而经他手自办的奉天自治指导部则宣传鼓动，宣传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如何的仗义出师铲除军阀，救东北人民于水火。并鼓动东北人民“自治”以脱离祖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这就是伪满协和会的前身，真是贻祸无穷。

1932 年伪满政府成立，于冲汉伪任监察院院长，并受到伪满建国赐金 50 万元。是年病故，年 62 岁。

（1963 年）

我所知道的于冲汉

王　贤　沛*

关于我所知道的于冲汉，是听人说的，特别是他到日本去的一段，是他刚回国后，亲口对他的朋友（即袁金铠、王永江，三人曾同在辽阳共事）说的。我（王贤沛系王永江之子）就记忆的概略，写出供作参考资料。

于冲汉字云章，辽阳县人。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保定候补知县，在保定候补时期，携带他到保定，送他入保定书院里读书。

在保定书院里，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姓锅岛。当时在书院里读书的中国学生，都看他是倭奴，瞧不起，不屑与他接谈。唯有于冲汉与他接近，二人很投缘，结成亲密的朋友。

在清光绪年间，他父亲当了通判，带兵在热河凌源一带，镇压当时的所谓“捻匪”的农民起义，被农民杀死。

其父死后，于冲汉不能再继续读书，回到辽阳原籍。他回原籍后，不务正业，吸食鸦片烟，在当地挑唆架讼，为家乡人所不齿。

1897 年，他在家乡无法生活，想起他在保定书院时，结交的日本朋友锅岛，于是，他就拼凑了旅费，到日本去找锅岛。

于冲汉到日本以后，人生地不熟，哪里去找锅岛？他住在日本东京的一个旅馆里，每天早出夜归，各处去探寻锅岛这个人。约有一个月的光阴，锅岛未找着，旅费也已花光，回国无力，走投无路，他想在旅馆里上吊自杀，被旅馆的下女发现，告诉了旅馆主人，于冲汉才得救未死。

当时的日本人，看中国人是大国人，还尊敬。所以旅馆主人因为他是中国人，对他很照顾，当时告诉他，你不要寻死，没有钱也没有关系，你只管在这住，我不要店饭钱，慢慢寻找锅岛，多咱找着多咱算。因此，他很感激旅馆主人，就留在旅馆里，继续寻找锅岛。

有一天，旅馆里住了一个日本陆军大佐，看见有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很奇怪，就问他是谁？旅馆的人就把他从中国到日本，来找一个姓锅岛的朋友的经过情况，告诉了这个日本军人。这个军人听了后说，我认识一个汉学很好的锅岛先生，曾在中国留过学，大概他就找这个人吧，现在东京找不到他，他不住在东京，他住在东京郊外，等我告诉他，让他来看看，是不是他的中国朋友。

---

* 作者是原奉系元老王永江次子。曾任伪奉天警察厅长、奉天市长，后被提为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

过了几天，有个姓锅岛的日本人，到旅馆来找于冲汉，一见面，正是他要找的那个锅岛，锅岛就约于到他的家里去住。以后，由锅岛介绍于入了日本东京的外国语学校读书。同时，还介绍他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汉文教员。所以，日本军人有很多是于冲汉的学生。

1903年，日本为了与沙俄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地旅大市，准备同帝俄开战。日本陆军省在东京招考随军翻译，于冲汉就报了名，回家告诉锅岛，锅岛劝他不要去当翻译。锅岛说："你是个念书的人，你哪能去作那样事呢？你应该辞退。"他说："我已经报了名，没有法辞退"。锅岛说："我去给你辞退"。

锅岛到陆军省，给于冲汉取消报名从军当翻译的事，被日本陆军省把锅岛申叱了一顿，日本陆军省说，锅岛是一个道学先生，但讲学也不能不关心国家大事，外国人都愿意当翻译，你为什么不爱国呢！锅岛无言以答。

于冲汉在日本陆军省受训一年，在1904年日俄开战，他就随日本军回到了东北。总计他在日本共住了约有六年或七年的时间。

在日俄战时期，日本在沈阳设有军政总署，办理军事、政治、特务等事务。军政总署长日本人姓小山，于冲汉就给小山当翻译，并召募当地一些流氓、坏蛋到前线调查帝俄的军事情况等。由于他的努力，工作很有成绩，小山军政总署长很重视他、信任他。

约在1906年，日俄和约成立，战事停止，日本在沈阳设立的军政总署撤消，军政总署长小山问于冲汉，你是愿意回日本去，还是留在中国？于冲汉表示愿意留在中国，并求小山给他想办法，找点事作。小山同意他的意见，就把他介绍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小山对赵尔巽说："于冲汉这个人很好，日本话也好，为日本军作了不少的事。现在我要回国，请阁下多关照，给他安置人事。"赵尔巽答应了小山的请求。

赵尔巽因为他是辽阳人，就把他交给了辽阳团总袁金铠，袁金铠派他当了辽阳东路半拉山子警察区官。

因为日本继承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利，经营由大连到长春这段南满铁路，及安东（今丹东）到奉天（今沈阳）的安奉线铁路。所以中日双方时常有交涉事件，因为当时中国人会日语的人很少，于冲汉为当道所重视。约在1906年冬，委他当了辽阳外交署长。东三省总督因为他办理外交事务有功，保荐他为候补知县。1908年，他又代理辽阳知州。

1913年，他当了奉天外交署长，凡是中日双方的交涉事件，一经他的手，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于冲汉的名，渐为东北人所瞩目，在政治舞台上，也略有名声，而他和日本方面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

日本夺取了俄国在中国的殖民地，进一步推行经济掠夺政策，在中国土地上实行掠夺大量的廉价矿藏。日本垂涎鞍山铁矿，但因中国政府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没有土地买卖权，于是日本人就商得于冲汉的同意，允许给他利益，由他出名报领矿权，由日本人经营。于就利用自己的地位，把鞍山铁矿报领下来，出卖给日本。

这时，日本经营的安奉铁路线，是窄轨，为了和它的殖民地朝鲜铁路联轨，便利它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必须改为宽轨，但改宽轨占用土地要多，需要中国政府的许可，割让给它一部分土地。否则，没有土地，就无法改轨。日本所以能取得展宽铁路用地，

这也是通过于冲汉的手办理成功的。据人们所知道的，在安奉铁路一带的山地上，所有栽植的落叶松，绝大部分都是于家的。这是日本人为了酬谢他，取得展宽铁路用地的功劳，特由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无价供给他树苗，将来由日本收买成材，作枕木、坑木等等使用。

约在1913年，东北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聘请他为二十七师顾问。据说，他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并和日本方面联络，秘密进行倒东三省都督段芝贵的活动。在1916年，张作霖以武力驱逐了东三省都督段芝贵，自任东三省巡阅使，于冲汉被聘为巡阅使署的参议。

约在1917年，日本对张作霖政权表示不满，据说是，因为张作霖统治东北后，并未达到日本预期的好处，因而日本在经济上施行压力，用大量的奉票向东三省官银号兑换现大洋，进行挤兑，扰乱东北的金融。张作霖委任于冲汉，以巡阅使署参议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由他和日方协商兑现的问题。结果，约在日本银行借了几千万元的外债，日方得到好处，兑现的问题，也就不解自解了。

约在1923年，他任哈尔滨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督办。据说，因为他向张作霖秘报，说铁路监事会监事杨卓是共产党，故张作霖派他的副官单玉龙到哈，逮捕杨卓，并执行枪毙。

约在1929年，东北政权和国民党合作，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他任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军东北，占领了沈阳。因为他曾当过日本士官学校教员，所以有些日本关东军的军人，和他有来往，并计划成立东北自治指导部，他担任部长，帮助日本人蒙蔽世界舆论和东北人民，把日本侵略东北的事实说成是东北人民要进行自治。继而伪满政权成立，他当了伪监察院长，直到病死。

据说，因为他和日本方面有说不出来的秘密关系，所以日本方面每年给他日币一万元。又说：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人中的浪人甘粕正彦，曾经住在他家里，阴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行动。在自治指导部成立时，即由甘粕和他协商，通过日本关东军的同意而组织的。

（1963年）

于冲汉及其弟龙章、长子静远

何 东 林

南满矿产准与日本合办开采，此为载入两国条约中的条文，鞍山开铁矿系于冲汉在交涉署长任内，请向中央准许开办的。1916年开始测量，约分三部：1. 振兴公司，任务是开采矿石，为中日官方合办；2. 制铁所，任务是炼钢炼铁，为南满株式会社所属铁道院出资设立（按：制铁所当地人称为熔矿炉，于1917年旧历十月初六日点火，1922年暂停，后改称昭和制钢所）①；3. 鞍山地皮公司，此系中日商会联合并当地的私人成立的，除以收买土地供给公司使用外，并出卖土地、出租房号与商民人等，以为修建房屋开发市场之用。

于冲汉以弟龙章为振兴公司中国方面代表人，被任为督办，设办事处于樱桃园，剥削工人，任用走狗作威作福。鞍山人民呼龙章为“于三大人”，办事处为“大衙门”。于龙章自己放高利贷，至期不还，则假名公款先使恶仆，继以日本浪人，逼勒催讨。东喻家沟喻德吉（字迪全）曾借其债，因种边地被涝，哀求缓期，未邀允许又使日人捆打，踢肿肾囊，疼痛昏晕，使人抬送还其家，甫至家门，竟敛气绝而死。其子欲请律师代写呈状控告，无敢应答者，而催债狗腿逼勒更甚，喻家无奈由其女韩姓家卖地偿还，缓交日期，按日计利分毫不让。此仅一例，此外为欠债遭凌辱、殴打的人不知凡几。

沙河村有叫温庭（字筠生）的，能言谈善交际，多识流氓地痞，援引见于，颇为器重，温又结交日人镰田，因得允许代办收买地皮的事务，经办地皮可以从中收佣钱，仅一年间，积至中人之产，在沙河出资修一木桥，又在城内买房两处，共二十多间。如此可见于家势力，真好像顺之者发财不难，不顺者死无告诉处的。

于冲汉长子静远，留学瑞士陆军大学炮兵科毕业，归国后在哈尔滨参与督办和长官两署政务。当时有人谓冲汉的官是名誉职，有实权者乃是其子静远。后曾出任吉黑两省木石税会办，伪满时任民政部次长升任大臣，1945年东北光复，苏军进到长春，伪政权瓦解，被苏军逮捕，押在抚顺监狱，迄今尚在。

于冲汉出身式微宦家，一生事业全赖日人，数十年来升官发财，除在辽阳买地600多垧，及与人合股营商外，在大连、长春、沈阳、辽阳、哈尔滨均有壮丽的楼房，辽阳住宅后为花园，中建有楼房一所，里边装饰富丽堂皇，特备欧式和日式房间，为接待外宾之用。伙食亦分中国式与西餐、东餐三种。其家男女仆人，至年关分劈赏钱，每人可得千元以上。龙章另有住处，规模虽不大，亦颇壮丽，有良田约百余垧。

（1964年11月）

---

① 鞍山制铁所，1918年5月15日正式成立，1919年4月29日一号高炉点火。

袁金铠与王永江、溥仪

袁 庆 清*

一、袁金铠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开始

袁金铠自1909年任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1911年辛亥革命他又勾结了赵尔巽与张作霖，参加计划镇压奉天省人民革命的罪恶活动。袁早在1904年即勾结了当时的权贵奉天省将军赵尔巽，并得到赵的信任。而他识赵的根本原因，则又因袁在辽阳县东路地方首先创办了地方警察，以及袁对赵的条陈时局对策正迎合了赵尔巽当时想要在奉天试行新法，以苟延清室寿命的反动企图。而恰恰就在袁创办地方警察一事中，也蕴育着他开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为。自1901年起，袁金铠以一个前清的岁贡身份起家，借口辽沈一带连遭沙皇俄国的军事侵略影响以致地方不靖，创办了辽沈交界七十二屯的团练和保甲。1904年日俄两军开战，日军胜利进军沈阳，并在沈阳设有军政署，专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以镇压我东北人民。袁金铠因其所保护的地面村长邹朋显被日军军政署逮捕，诬以通匪。袁因保邹确系好人，致触日军沈阳军政署署长日军大佐小山（名不详）之怒，认为袁袒护坏人也一定不是好人，所以袁金铠就被押在该署监狱有数月之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阴谋毒计每每借口逮捕地方人士，设法迫害使其屈服，然后再令其人为它服务。我与袁金铠是父子关系，自年幼时就知道他因事被日本逮捕监押几遭不测。袁金铠被押开释不久，于1904年冬被在辽阳东路吕方寺村驻守的日本军政分署署长、军法中佐渡边贤太郎找去，令袁创办辽阳东路吕方寺地方警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地方人民有极不满意日俄军队的行为，就纷纷起来以妨碍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所以袁金铠受日军命令创办为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政策服务的警察，他的警察直接受到日本军官的军事训练，这就表明袁金铠已经在被押之后受到日军的控制。一方面袁金铠惯于投机，他说办警察也是最好的一种新政，对于战后的维持地方治安有利。所以袁金铠就以能替日军创办警察所取得的所谓成绩而就受到赵尔巽的信任，认为他能办新政。同时正值于冲汉为日军作间谍工作得到日人的信任，又经日军政署署长小山的推荐令赵尔巽为于安插位置，赵以于系辽阳人，又令袁设法在袁所办的警察中妥为安置，令于冲汉充任辽阳东路半拉山子警察分区区官。

---

* 作者系袁庆清之子。

二、我所知道的袁金铠和王永江的关系

王永江字岷源，辽宁省金县人，前清岁贡，与其弟王永潮（系拔贡）均有才名，时称金州二王。袁金铠也是岁贡，时与二王兄弟在沈阳考书院，三人常名列前茅，因相契合，1895 年互相订交。1904 年袁金铠以替日本创办地方警察，遂乘机勾结了当时的奉天将军赵尔巽。1907 年袁金铠办理辽阳全境警察兼办地方自治期成会。他认为王永江办事有才干，当即向其时的辽阳州知州洪汝冲保荐王永江可胜办理警政之职。洪即委王永江为辽阳州警察所长，而袁金铠则自任为该所主计。

1910 年袁金铠得到了原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的地位，并得到了赵尔巽的信任。时赵已升东三省总督，袁兼任赵的参议，袁金铠向赵力保王永江才堪大用，当由赵委王为督署咨议。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奉天各县的革命志士纷纷起义，赵尔巽听信袁金铠的密谋，保护清室，反对共和，决心镇压革命党人。当由赵派王永江赴开原、铁岭两县破坏革命行动。不出一周，即将该两县城恢复照常。赵以王办事手段老辣对自己有所帮助，遂保荐王永江为兴凤通道尹（即后来的东边道）。1912 年初赵尔巽离奉，1913 年赵尔巽电邀袁金铠和王永江二人晋京。赵尔巽向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保荐袁金铠和王永江，见面之后，即任袁金铠为总统府政治咨议，令王以道尹记名任用。1914 年王永江充牛海税捐局长，办征收税务有名。时袁金铠与张作霖密切勾结，充任张的第二十七师师部顾问，并与张订交。时张作霖有意扩张自己的势力，时向袁金铠访问地方能办事之人，袁则首推王永江是一个有用人才。从此张、王开始结合。

1916 年张作霖逐段芝贵自为将军兼省长，任袁金铠为奉天省军民两署的秘书长，任王永江为奉天全省警务处长。王以整顿警政致与第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有衅，汤率部出走新民，张作霖积极支持王永江，这是张、王的进一步的结合。1917 年张作霖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长，1918 年又令王永江代理省长职务，张、王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在张作霖初任督军时很信任袁金铠，并时以秘书长地位代拆代行省长职务。其后张、袁发生矛盾，张、王关系密切，因之王永江与袁金铠之间也就发生了矛盾。王永江得到张作霖重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王永江善于搜刮民财，能为张作霖积攒军费数千万元，使张作霖如虎添翼，野心得逞，遂致大举入关参加内战。时军费浩繁，奉票见毛，人言啧啧，均批评王永江聚敛民财，助纣为虐。王也感觉到自身责任的重大，遂主张建立纺纱厂和东北大学与修建沈海铁路，以表示自己也欲兴建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张作霖变本加厉更行扩军备战，建立当时全国有名、规模巨大的奉天兵工厂和被服厂、粮食厂。所以奉天省的金融财政状况也就日益恶化，直至 1923 年第一次直奉战结束时，遂至库款空虚、奉票毛荒，竟至以旧奉票 60 元才能换得 1 元的新纸币。这就是说奉票已毛了 60 倍，张作霖的穷兵黩武花尽了奉天省广大劳动人民的膏血，陷奉天省的财政于绝地。追究祸首张作霖固应负一切责任，但王永江的聚敛民财，供封建军阀的割据战争，以巩固其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袁金铠的屡次推荐，竟将王永江推上政治舞台，令其发展其反动行为，他们二人也应对奉天全局担负着极大责任。虽其后王永江借口张作霖不听其言，

任意扩军，以致影响其所谓财政计划，辞职家居，但这乃是一种借口，聚敛民财，纵容张作霖大举进关，耗尽了奉天人民的财富，王永江不得辞其责。

三、袁金铠与溥仪的反动关系

我的父亲袁金铠自少年好读经史，其后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即以当时的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与督署参议的地位，纠集一些反动分子，热心帮助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镇压当时的革命运动，并向赵力保当时的前路巡防统领张作霖人极可靠、才堪大用。赵并假张作霖之手血腥杀害了许多革命烈士，例如张荣、恒六、田亚斌、石磊等人，阴谋消灭了混成第二协革命武装实力和各处起义部队，致使东北地区的革命事业终败于垂成。而袁的用心帮赵，也就是表现了他是反对革命，拥护帝制。其后由于大势所趋，共和奠定，他的野心未能如愿实现，但是他的反动意图，仍未稍挫，且认为民国政局长期不稳，溥仪有再起的可能，所以他更投机取巧，愿与溥仪接近。在1913年由于赵尔巽的推荐，终于晋见溥仪，此为袁金铠与溥仪直接结识之始。1917年袁在奉天省署秘书长任内，又关心清室经费支出，当即首先倡仪捐献钱款共计十余万元，所以溥仪就对他有了相当印象。等到1920年溥仪的内务府大臣金梁在向溥仪奏保人才摺内，又提到袁金铠不忘清室、才堪大用，所以溥仪对袁更加注意。1923年袁金铠又赴京参加大婚典礼，溥仪特赏紫禁城骑马，赐匾额“金石贯诚”和衣料、瓷器、端砚、福寿字等等，足见溥仪认为袁金铠是他的老根据地，即在东北的政治界上有相当力量的人，所以他才尽量拉拢。1927年袁金铠又特别热心帮助赵尔巽刊成了130册的清史稿，溥仪对袁更加重视，认为对自己是一个有用人才，故特予召见，并赐额语“彝命攸叙”，对清史稿予以很高评价，又特赐以衣料、瓷器等等。这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袁金铠与溥仪的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阴谋要将东北与祖国完全割断联系，特勾结溥仪到旅顺作为未来傀儡皇帝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溥仪的来东北执政虽由于熙洽等的参加勾结，但是袁金铠也决不例外，他对溥仪有深厚的感情，也衷心欢迎溥仪在东北复辟，以偿其多年的宿愿。又见于他屡次参加了关东军部所召开的时局重要会议，他热心拥戴溥仪，就可知了。自从1932年袁任伪满参议府参议后，更与溥仪密切接近。尤其1935年袁金铠被任为伪满尚书府大臣时，据闻当时的候补人选有数人，但是溥仪力主任袁，终于实现，而且久于其任（时日本在溥仪的宫内主要官吏的任免上尚有时尊重溥仪意见），袁就任未久，即于1935年4月随同溥仪访日。他在日本内地所发表的各项感想，虽也不过是宣传鼓动所谓王道政治与日“满”两国间的同德同心通力合作的必要性，但因袁在旧东北政治界上有过相当地位，所以他的反动言论更为日本新闻界之所注意，从而对于日本尤其对溥仪有利。

袁任伪大臣后，溥仪又不时地令袁晋讲古经史，袁平生著有《中庸讲义》、《诵诗随笔》，以及所著的《日记语存》、《佣庐诗文集》、《王道梗概臆说》诸书，均进呈溥仪，特赏嘉许。1939年袁70岁生日时，溥仪特遣派内官赐给匾、联、福寿字，及衣料、如意等物，极为优厚。袁金铠感到莫大光荣。及1942年袁因患病特向溥仪请求辞

职，溥仪当时曾对袁挽留说宋朝文彦博年90岁尚在朝为相，你年岁不到，应勉为其难去供职，不准辞职。最后终由于患病太重（1944年）才准予辞职，仍委为伪宫内府顾问官，并给前官礼遇。

（1962年）

赵欣伯的略历

傅文郁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华民国产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结束了。但是不满一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一面借革命胁迫清朝皇帝退位，一面以赞成共和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是明松暗紧，表面给予言论、集会自由，暗中则采屠杀、破坏手段。当时的革命活动虽然一时并未绝迹，但是，由于一部分人被袁收买，而有一部分特务、投机分子混入，更是“鱼龙混杂”了。

登场演戏

在1912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同志举行的一次庆祝革命的纪念会上（地址在现在和平门外琉璃厂电话局外的空场上），陈列死难同志的遗物等纪念品，并由“徐光华新戏团”（即现在的话剧）演出《秋瑾》一戏，徐光华饰恩铭，便有一位自称拥护革命的白面书生赵嵇泪（即赵欣伯）扮演了这一剧中的主人公秋瑾。赵某身体羸弱，举止温柔，又善表情，虽说这样一个人扮演秋瑾这样一位英雄形象本不合适，可是在当时却不甚讲究这些的。我是作为《秋瑾》戏中秋瑾女士举办的“大同女学”的一名女学生参加演出的，从此就认识了赵某。赵确有些演戏天才，在演秋瑾临刑时的一场，“罗曼罗兰有言，不自由勿宁死，我是为了自由而死，死而何憾……”气质昂扬，道白铿锵，颇博得一些革命同志和观众的好评，也因而骗取了一些人的信任。

私奔姘居

赵某一方借参加革命活动接近了革命党人，一方又假革命人士的名义和新戏演员的身分极力去接近官僚、政客和社会名流，陪酒做乐，献媚取宠。渐渐革命党人识破其两面派的态度和奴才的丑相，而有权势者又对其出身卑贱有所看不起。因此赵某未能如心所欲，得官进禄，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是，他的年青秀俊和富于表情，却招来了不少官僚名士们的妻妾女子的爱慕和同情。

清朝末年，江苏南通有一善绣女士余沈寿，因绣意大利女皇像在欧洲博览会上获奖。慈禧太后认为这是大清朝的光荣，便令余沈寿成立“北京农工商部女子绣工科”学校（地址在现在西四南丰盛胡同地质部）。余沈寿的丈夫（姓名遗忘）在清朝为官，是个日本留学生，家庭富足，有钱有势，曾在当时的“北京济良所”买得一貌美而又

略有学识的妓女名“雅仙”，以后送她到日本去学美术。雅仙去日本留学时即更名为余铭盘。余铭盘去日本学习一年后回国，常梳日本“东洋头”出人学校，因为年轻貌美，饱含风情，颇为人所注意。这时赵嵇泪曾先后演出《茶花女》等新戏，余铭盘作为往常的观众，逐渐与赵相识，生爱慕之情，赵见余姿色出众而又富有，便百般引诱，最后赵诱骗了余铭盘并携带金银首饰，二人私奔，脱离了余家，从此隐名改姓，无人知晓。

我因为曾在“北京农工商部女子绣工科”学习过，因此认识了余铭盘并对此女子有较深的印象，亦闻其与人私逃，但却不知道余与何人私奔，下落亦不明。

1913年夏，我因为反对袁世凯而在天津被捕人狱。以后经革命同志保释出狱，暂居友人家里。一日，见天津街头的号外登载一条新闻，称一美女子因婚姻不自由，由京来津在金钢桥投河自杀……我对这类妇女问题当时很关心，深感旧社会女子受压迫之深。当时，天津《新春秋报》主笔傅立鱼来访我时，曾和我谈起此事，告诉我一卖报人了解详情，约我同去访问，以明真相。于是，我和傅立鱼先生来到了天津旭街里的一所破烂民房前，不想出来迎接我们的屋主人便是当年演秋瑾的赵嵇泪。当我们被引进屋去时，另见到一位貌色出众的美女子，亦是我所知道的余铭盘女士。经谈话始了解他二人相爱私奔，逃出余家，余铭盘诉说了不愿为人之妾的苦衷，又恐余家有官有势追究此事，故赵巧生计谋制造了一女子投河自杀的新闻。新闻中虽未说明死者姓名，但却有意地用了“貌美出众”、“相传系北京之名妓”等词句写出余铭盘的特点，估计余家会知悉此事，也会恐有碍于名声地位不再追究，这样就可以免去他们共同生活的后顾之忧。

从此，赵虽然得到为数不多的一笔现金，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一位美貌的佳人，不但对他忠心，而且有一定的学识，并且会操日语，这是赵以后投靠日本升官发财的重要媒介。因之在以后余铭盘死后，他又纳妾，但在堂前供奉着余的照片，上面写着“恩师贤妻余铭盘像”。

冒名孙中山先生堂弟

1913年秋末，赵携余铭盘离津来大连居住。当时，大连是在日本的统治下，日本警察署对于来往的中国人特别注意，赵觉得在日人的管辖地区而且远离了余家，比生活在天津安定得多，只是现金用尽，生活无着落。这时赵便更名为刘凤池，并对日本警察署说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堂弟，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袁政府注意，故逃来大连避难。赵这样冒名伪造历史，也是对他既有名又有利。因为当时逃来大连避难的革命党人不少，日本当局对革命党人虽然实际是监视利用，以为他们进一步侵华作准备，但表面上却声言“保护国事犯”，并在物质生活上给予方便。赵租到一间小房住下来，由余铭盘教授日本人中国话赚些钱维持生活。

同年冬初，我因反袁被通缉逃来大连，天津《新春秋报》亦因反对袁世凯遭停办，该报主笔傅立鱼先生亦逃来大连，并创办了《泰东日报》，联络革命党人继续反袁，因而我们常在一起。一天，日本警察的警官“新坂狂也”来访我，正巧傅立鱼先生也在，他向我们打听，说有位孙中山先生的堂弟刘凤池住在当地，问我们是否晓得。我们二人不知道此事，当时未予答复。为了明白真相，以后我和傅立鱼便按照警察官新坂狂也说

的地址找了去。到了一小房前，门上挂着一个木牌写着“专门教授日人支那语”。我们在一间不满四张日本席的小屋见到了这位化名刘凤池、自称是中山先生堂弟的人，原来就是诱骗余铭盘私奔姘居的赵稔泪，出面教授日人中国话的正是余铭盘。

投靠日本　接受豢养

赵、余二人在大连居住的时间比较久，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准备以便扩大侵华的时期。因为余铭盘日语熟练，而且又操标准的北京话，因此向余铭盘来学中国话的日本人日益多起来，其中就有以后侵华日本大战犯土肥原、本庄繁等人。这时赵便得机会接近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投靠他们；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也看中了赵，也似乎认定这一狡猾奸诈、极端贪图名利又有些流氓特色的人可以为他们所利用，以帮助他们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大约在1921年赵便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特别赏识，被推荐由日本政府资助去日本东京留学。余铭盘随赵赴日，后来因患子宫瘤病在东京顺天堂医院动手术不治身死。赵失去余悲痛万分，对他来说余的死真像是失去了发家致富的财宝一样。因此，赵便向日本法院起诉，控告顺天堂医院的大夫“误失杀人”。日本地方法院的检察官不予起诉。赵不服又控检察官，结果胜诉，得到一笔赔偿费。此时，加以他又结束了在日本大学的学习，得到了日本东京大学授予的日本“法学博士”的学位，赵欣伯便在东京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中国人了。此外在日本还流传着“赵欣伯是‘祸星’的说法”。“祸星”这个绰号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掌握了赵为人能说会道、狡猾奸诈又好诉控的特点，给他的外号，认为他到哪里，哪里便会有灾祸；但这绝不是说赵给日本带去了什么灾祸，而是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很早已蓄意利用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

为日本出谋献策卖国求荣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选中了赵欣伯特别加以培养，造就他的名誉，实是为了他们的侵略中国作准备的。

约1929年赵欣伯名义上是从日本留学回国了，暗中则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派遣，负重要使命来到东北，趁东北军阀张作霖正要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控制东北、抵制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时候，立刻取得张作霖的重视，当上了为张出谋献策的顾问。从此，赵便依照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意图，一面利用职权帮助张作霖以兵力加强控制东北、抵制革命，另一面又和日本暗中计谋入侵中国的步骤。首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除后患，然后便在蒋介石、汪精卫中搞分裂活动，汪在北京召开国民党扩大会议，而蒋介石却命令张学良开兵进关，解散汪召开的扩大会议，赵见东北兵力薄弱又无领导，和日本共谋策动了九一八事变。当时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驻沈阳和东北各地的军队便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撤退到山海关以南，竟使日军在短短的三个月间便占领了东北全境。因此，九一八事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大汉奸赵欣伯蓄意的卖国罪行的不谋而合。

从此，赵欣伯更获得了日本的重视和信赖，升官进禄，成了日本军的高级顾问官，出入有日本兵护卫，就连伺候他的仆役也是日本人。在事变里赵接收并侵吞了巨量的张作霖的财产，饱入私囊，金条珠宝无以计数。在这件事情上，日本对他是有所不满的。以后，日本曾以征求他在日本投资为名，对他施加压力，赵也迫不得已在日本投了些资，例如在东京建筑了“青年会馆”等。赵欣伯从此在伪满洲国不但是第一流的官僚政客，而且是巨富之一了。以后日本扩大侵华制造的一·二八、七七事件等，可以说无一件不无赵欣伯的“功劳”。赵欣伯可以算得是近代的大汉奸之一了。

我曾因反袁被悬奖通缉捉拿，在大连活动了一个时期以后便亡命到日本。因此，对于赵在日本的“起家立业”是耳闻目睹，对于他回国后“升官进禄”的经过，除了由一些革命同志如傅立鱼等人侧面听到以外，也有赵欣伯的自白流露，因为他对于我们这些知道他的底细的老人，不但有时来访，而且谈话也比较坦白。记得在他任王克敏政府高级顾问时，他曾来访我，我曾忠言劝告他：“做个中国人总该有些良心的……”，他则笑而回答：“人生在世几十年，不图名利又图何?”在谈到时局时，他则说：“日人还是很要强的，很有发展前途的一个民族，中国要富强，还真应该和他们亲善，多听听他们的话……”这又是多么典型的帝国主义奴才的论调。

大汉奸的下场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赵欣伯这样的大汉奸本应依法处决。但是国民党政府却以伪满汉奸为“外事犯”，对于赵欣伯（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洪维国（伪满洲国大臣）等汉奸不予处理。赵欣伯后虽曾一度被监禁，但不久被释放。以后他是在名义上受管制，实际是逍遥法外，极受优待。这也说明了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汉奸在反对共产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此，赵欣伯曾对他的妾说过：“国民党不会伤害我，只要共产党不来就不要紧……”看来这点他倒想得很符实情。

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逮捕了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他也自觉末日已到，在拘捕他上汽车之前，他便自己向静脉注射了一空气针，死在汽车上。

（1962 年 11 月）

熙洽的一夕谈

赵朴谦

1934年熙洽抵东京，我在东京办理留日学生事务，应他的请求，经分别洽商，在4月上旬，以促膝谈心的形式，先后与日本财、外、陆三相作了会谈。详见《熙洽与高桥是清会谈的回忆录》、《熙洽与广田弘毅会谈的纪要》、《摘记熙洽与林铣十郎的会谈》等专题中。会谈后，他感到异常的满意，认为从本庄繁、武藤、菱刈隆等（按：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口中向未听到的。同时他又情绪不安，认为是越往前越不好办。

一夕在黄昏微雨中，他突如其来地造访我寓，并提携大量的食品酒类和罐头，欲作一夕谈。

他说：此次到东（即日本）和我留学的时期大不相同（按：他是日本陆军士官毕业）。从发展上看，是一日千里，从社会里看，是一团乱丝，令人摸不着头脑。连年出现大暗杀案，是不是共产主义抬头呢？

我讲：不是！从几件大案件来看，例如1929年暗杀劳农党代议士山本宣治的凶手是黑田久保二，1930年暗杀滨口首相的凶手是佐乡屋留雄，1932年2月暗杀井上藏相的凶手是小沼正，3月暗杀团琢磨男爵的凶手是菱沼五郎，5月刺杀犬养首相的凶手是现役军人，在本年一个月前暗杀武藤社长的凶手是福岛新吉。这些凶手都属于右翼或极右翼分子。

他问：日本的右翼团体也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吗？

我讲：右翼所痛恨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政党、财阀勾结发横财，使农民市民小工商业者受穷，想着改良它。

他问：日本共产党的势力不也是很大吗？曾出过不少次的事件，但我不清楚近年如何？

我讲：日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于共产党施行白色的恐怖镇压。十年来对于共产党的大检举事件，我记得1925年被判刑的约30名，1928年的“三一五”和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被判刑的达到825名，可见它增长的迅速。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员、律师、记者、商人、作家等，可见它阶层的广泛。

他问：日本是政党内阁制，共产党组阁还早呢？

我讲：直到目前，日本共产党还属于秘密结社的性质，政府以“治安维持法”作武器来镇压它。在普选后，在狱的共产党员曾有过当选的，但立时被取消当选的资格，议席还得不到，能谈到组阁吗？

他说：这样的话，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能维持。不瞒着你说，手头多少有几个浮钱，存在何处呢？

我讲：不是有“满洲中央银行”吗？

他说：那是纸票公司，日本比较殷实和提款便利的银行有几家？

我讲：家数是很多的。你要从伦敦、纽约等地提款，最便利的是正金银行，它是日本国际贸易汇兑清算的枢纽，往来转账，有时不用大藏大臣的许可，即可提款；其他，如日本银行、三井银行、安田银行等都是资本雄厚，信用昭著的。“新京”的正隆银行就是安田银行的分行。但汇往海外，必须得到大藏省的许可。

他问：日币金票，随时可以兑现吧？

我讲：这是梦想。金票已成了不兑现的纸币。我为了研究货币，希望兑换 5 元的、10 元的、20 元的硬货各一枚，还是找高桥藏相给开了学术研究的介绍信，才换到手。

他问：自拿黄金，兑换日本金元没有问题吧？

我讲：自拿黄金，加上手续费，自由到大阪造币局请铸金元的条例，未见变更；但近来添上了须经大藏大臣许可的一条。

他脸发红了，搔两下稀疏的短发说：假设从香港或海参崴提款，哪个银行方便？

我讲：当然还是正金方便。只要是世界上有人烟、有市场的地方，它直接的间接的都能办事。“新京”有正金分行。但是“满洲国”对于国外汇兑，以如何的法令形式来加管理？你是财政部大臣，比谁都明白。

他转了话题说：此次东来，如隔百年，一切一切地都在剧变着。目前政情混沌，斋藤首相八旬了吧？公宴时无精打采的。你看前途如何？

我讲：他在“五一五”事件以后登台，以举国一致的内阁为口号。现在快满两年了，破绽百出，最近在第 65 届议会中形势不妙，恐怕斋藤内阁的寿命不久了。

他问：后任是谁？

我讲：日本还是议会政治，但不是政党政治了。满天飞地抓总理，殊难预料。现在能知道的继任者，不出退役的大将级海陆军人、元老、重臣等三个类型的十余人，决不是政友、民政两党的总裁。只得等待坐渔庄叟（指西园寺公爵）的推荐吧！

接着我说：还有些想问的事情，前年张叙五总长东来观操，晤谈“满洲建国”、巨头会议的内幕，他说是“双簧”，是“编好了的曲子叫人唱”（见《我接触的张景惠》专题中）。究竟是怎样的经过？

他谈：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一个事实，还能谈出两样来吗？

我问：“满洲国”这个名称是谁想出来的？

他谈：本庄繁。

我问：“民本主义”、“王道政治”、“大同年号”是谁想出来的？

他谈：事前板垣等与郑孝胥商定的。

我问：称“元首”为“执政”，拟溥仪为“执政”是谁的主意？

他谈：土肥原、本庄繁。

我问：为什么舍奉天而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

他谈：这一点颇有议论，有人主张都洮南以联控内蒙；有人主张都哈尔滨以固北疆；有人主张都奉天沿袭统治的成规，我主张都吉林以应吉利的名称。最后还是以本庄等预定的长春为决定。本来从建筑物上说奉天有皇宫、有帅府、有别墅、有高楼，是清

代陵寝所在地，最有条件，但本庄等认为奉天是旧势力的窝巢，是潜势力的渊薮，奉山铁路直通，日夜受反动派的威胁。因此舍奉天而取长春。

我问：赵欣伯在巨头会议的场中起着什么作用？

他谈：起着“里外和泥”的作用。

我问：在当时除了“建国”外，别无其他的想法吗？

他谈：曾有不少的人想过，如果张汉卿（张学良）、张辅忱（张作相）等冒险回来，指挥东北四省的军队，从事抵抗，事尚可为。但他们仅派代表出关，本人一个也没有回来。

我问：在当时抵抗的将领中以吉林为最多，如李杜、丁超两镇守使，邢占清、张振邦、赵毅三旅长，冯占海团长、王德林营长等，你如果以旧吉林军参谋长的地位代行吉林军总司令的事宜，南联辽锦，北结马、苏（马占山、苏炳文），不也是事尚可为吗？

他谈：你不知道，军以帅为主。在当时未走的人中以张叙五（张景惠）资格为最老，但对汤阁臣（玉麟）、于澜波（芷山）、张仙涛（海鹏）尚难指挥，吉、江两省问题较小。但张叙五年老，也够过活，自己又无直辖的队伍，困难重重，他不能出来挂帅。除了他外，谁还有资格来挂帅？我资望尚浅，各镇守使、各旅长都不能听我的指挥，还能指挥吉林全军吗？所以说就是在关内的两张，回来一张，事尚可为。群龙无首，越多越乱，越是敌人的好机会。

我问：军以气为主。在当时这股气是为敌所“夺”了吧？

他反驳地说：不是！是为南京政府所“泄”了。不抵抗、外交解决的电报，雪片般地飞来，就把要鼓还恐怕鼓不起来的气给泄了，仗还能打吗？

我问：李顿等国联调查团到“新京”、哈尔滨等处，不是也给打了气吗？

他谈：来晚了！正赶在“再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所以北满的马、苏，虽曾有过一跃，接着就一蹶不振了。

我问：谈一下你到东京后的感想？

他谈：很简单，感到越往前越不好办。

我问：曾听说过，你为日系官吏问题，曾与驹井争执过？

他谈：在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时，只有大迫幸男、三桥政明、花田孙平、滨田有一、饭泽重一等为公署顾问，并无日系官吏。后来驹井从“中央”到地方都安设了日系官吏，这都是沈阳会议时未曾涉及的问题。驹井刚愎自用，谈论未通，因而争执起来，但也未能挽回。

他问：在事变后此间（指东京）的舆论和国策如何？

我讲：干脆说三条道：（1）解决外交上（东北方面的）悬案；（2）吞并；（3）建今天这样的国。

他谈：这是走了第三条的道路（他站起来边走边说）。这是注定的作民族罪人！小孩子呢？还得念书。将来我侄儿来入“士官”，我小儿子体质弱，你给选个文途学校，请你关照一切吧！

他接着说：你在这研究些学问，办理着留学生事务很好。还想下水吗？

我讲：只要不下逐客令的话，我是决不想回去的。

他谈：自己白活了一生，终局作个信陵君吗？

我讲：你还有醇酒妇人的条件。

他听罢握手告辞，昂首走出。时已深宵二时半，唤一台营业车乘向旅馆驰去。

（1962 年 9 月）

我所知道的于芷山

赫慕侠*

张作霖任二十七师长时期，于芷山（以下简称于）任二十七师炮兵团二营排长。因不得志，转到河防营当教官。适值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汤玉麟叛张，河防营的宋营长是汤的旧部，随汤叛走。在这种情况下，于芷山出来，纠集了残部下二三百人，并携带武器弹药等，向东投奔张作霖去了。张嘉其功，即委派他为河防营长。河防营直属于奉天省公署管辖，是个独立营。张作霖在历年中都要回高山子老家去看望一次，经过巨流河车站时，于必整队迎送，因此张对于的印象益深。当1920年张扩编第四混成旅时，张提升于为步一团长。于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负伤，后任骑兵第五旅长又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改任第八旅长。1925年当郭松龄反奉时，于旅驻三河县，知道情况后，迅即集结各连，绕道热河返奉，通电骂郭拥张，并参加巨流河击败郭松龄战役。从此益为张家父子所深信。结束郭军倒戈战役后，于升任第八师长，继任第三十军长，第二十九师长孙旭昌部编入三十军内。在1927年秋，对山西阎锡山军作战，于指挥主力由下花园进至繁峙县大营镇，其一部三十三旅长田德胜和第一旅五十四团长赫慕侠由军参谋长廖弼宸指挥由门头沟经蔚县，出松子口，进平型关到大营镇与军的主力会合。山西军固守山地，相持不下。1928年奉令撤退，出平型关，经紫荆关、京西，到热河，尔后回到东北，待命改编。

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于老道口，张学良将军继承父业，把原有东北军改编为国防军与省防军。原三十军所属第二十九师编为国防军，于所兼任的第八师改编为辽宁省省防军，即东边镇守使所属的各部队，其编制如下：

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参谋长傅布彦，卫队营长刘连玉，均住山城镇。步一团长姜全我驻凤城县。步二团长廖弼宸驻通化县，所属第一营长马养贤驻临江县，第二营长赫慕侠驻长白县，第三营长袁文彩驻辑安县（今集安市）。步三团长田德胜驻朝阳镇（属海龙县）。骑兵团长曹秉森驻东丰县。

因连年战祸不息，盗匪横行，民不聊生，省防军的任务，主要为剿匪。

我于1929年冬到长白县驻防，1930年回沈阳，受于芷山的指示，叫我见张学良将军报告防务情况，我第一件报告的是，境内“平街匪帮”被彻底剿灭，因此地方安靖；第二件是，我驻的防地仅与朝鲜一江之隔，华侨经常过来和我说，朝鲜内地反华排华的暴行很厉害，焚毁商店，殴打华人，都是由日本人从中挑拨起来的，不然朝鲜人不敢像

* 作者原属奉军于芷山第八师，九一八事变后，随于芷山投敌，先后任伪治安部参谋司长、伪第七军管区司令官、第五军管区（热河）司令官。

这样地胡作非为。我回沈阳时，因国内交通不便，是经过朝鲜境内回来的，我住在华侨旅馆内，华侨和我表示很亲近，还告诉我说，有一个时期，日本人在夜里搬运东西，不让中国人看，我问他们搬运什么东西呢？他们说，虽然没有看见，大约总是军用物品吧！我报告到这里时，张将军问我，它这是什么目的呢？我说，还不是为了侵略我国作准备吗？张将军点点头，又问我，长白山有没有飞机场，我说没有，如果您要去的话，事先告诉我，我可以准备；第三件是，惠山镇附近种了许多的大烟，张将军说，能有照片吗？我说现在是冬天，不能照，等到来春的时候，我可以照，给您寄来。我等到1931年的春天，正当罂粟花盛开的时候，我叫翻译宋海源过江，拍照了几张，又买了几张长白山天池的照片，一并给张将军寄去了，哪想到，因为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张将军没有收到，退回，以后我把这些照片送给廖弼宸团长了。

在“九一八”的当时，驻凤城县步一团长姜全我，被驻在连山关的日本第四守备大队长板津中佐俘虏，并将机迫连缴械。中校团附唐聚五到山城镇见于报告经过情况，于又派唐到北平向张学良将军报告，张即委唐任步一团长派驻桓仁县。

驻北大营的王以哲部旅被日军袭击，向东溃退。王以哲旅长曾穿着便衣，到山城镇与于接过头，并令溃退的部队整顿后，越过南满铁路向西奔走，还残留了一部，被于收编。向东溃退的不只是王以哲旅，还有不少讲武堂的学员们，也有留在东边的，被于留用。

于为防止日军的进攻，曾派袁子休指挥兵力一部，在清原车站构筑阵地，防御日军东进。

派参谋李玉清往北平与张学良将军联络，在张学良将军的同意下，于就任保安总司令，增添步兵第四团，团长董国华。又将由北大营溃退下未走的收编了两个营，第二营长杨春煜，第三营长于宗谦，再加上原有的卫队营为第一营，营长王学阳，这就是后来于的卫队团三个营。

我是步二团第二营长，驻长白县，在“九一八”的第二天早上，由对岸惠山镇传过来的消息说，沈阳被日军占领。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因为对岸惠山镇驻有一个日本军的守备大队，对它要防备，此时驻在长白县的有第七、第八两个连，遂召集连长会议，把情况说明后，立即在沿渡口和徒涉点，派兵戒备，官兵不准离营，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袭。同时通知驻八道沟的第五连和驻十三道沟的第六连，做好同样的战斗准备。

事隔多日，接到通化廖团长的电令：“避免与日军冲突，国事由外交解决，必要时向松树镇集结待命”。我又进一步详细指示各连的经路和联络的地点，以便不失于掌握。

就这样的戒备到1932年的春天，接到廖团长的电令：“情况紧急，速到八道江集结”。我因为早有准备，即在接到电报那天夜里，就集合了驻在长白县的七、八两连出发，经十三道沟又将第六连、到八道又将第五连掌握起来，在自己的防地内行军只顾虑日军的袭击，到了八道沟后的行军，就不是自己驻军的防地，情况复杂，顾虑较多。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地方的武装团体和红枪会，为了扩充自己势力范围，掠夺枪支，因此，又增添一层戒备。为了迅速达到目的地，避免在行军途中被人堵截，由八道沟乘帆

船，顺流而下，直达临江县与第一营马营长会合，马因势孤，意欲留我暂驻临江，给他增加声势，我没有同意。第二天越过老爷岭在林子头宿营，次日到达八道江目的地。

廖团长知道我已到达了八道江，遂即由通化带步兵一个连，机、迫各一连到达八道江与我会合。

廖团长对我说，步一团长唐聚五因受救国会的鼓动就任义勇军总司令，收编各县的武装警察队和红枪会等地方团体，作为抗日的武装力量，同时张贴布告，宣布唐聚五为总司令，于芷山为总指挥，廖弼宸为副总指挥。次委我为第廿五路司令兼第廿五旅长，马养贤为第廿六路司令兼第廿六旅长。

廖团长还和我说，于芷山不同意唐聚五就任义勇军总司令，说他破坏团结，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唐没有征求于的意见，是强加给他的总指挥名义，无非是假借他的名义骗人而已。于还问廖说，总司令大？总指挥大？这不但大势分裂，不可调和，即些许小事，也弄的难解，如于子于宗谦的妻孟氏之父安排在桓仁县当公安局长，与唐处的不好，从中也传了一些闲话，对两个人的感情影响也不小，这也是分裂起因之一，增添顾虑，使人无所适从。张学良将军远在北平，鞭长莫及。

于、唐分裂后，当然原有的军队都是于的旧部，是倾向于这方面的，就使唐所属的步一团也都跑到于的这方面来了，仅剩下李春润营三个连。

廖团长在通化就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后，于对廖产生了怀疑。当廖团长到八道江后，令驻辑安县的第三营长袁文彩到大荒沟集结，袁就不服从，想把全营带到山城镇投于去。因为其他的连长不同意，只带走了一个连。廖知道情况后，急到大荒沟把其他的各连收容回来到八道江集结。

廖对我说，于的亲日，他已有所闻，但对唐的作法，他也不同意，只是闹个名声好听而已，不会成功的。于虽亲日，但还没有脱离同张学良将军的联系，因此他感到进退两难。还说在通化就任义勇军副总指挥，是迫于不得已，因为第十六路义勇军司令孙秀岩进驻通化，在表面上很恭敬他，但在实际上天天扩充实力，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因此放弃通化，到八道江集结，再图后策。

孙秀岩原是步二团的一个少校团附，因为退职了，住在红土崖，红土崖有红枪会，孙就把红枪会扩大起来，组成第十六路义勇军。

我们驻在八道江时期，救国会的王、魏两委员曾劝告廖、唐合作。这时于派张参谋来，并带于的信，劝廖回到他那边去，于并表示他始终是服从张学良将军命令的。另外于的军需处长周秉衡也给我带来一封信，他证明于的一切行动，都是得到张学良将军同意的，劝我们仍要归还原建制。还说于没有忘记了我，添编第四团，没有叫我来当团长，是因为驻在边远要地的关系，不要因此而起误会，弃旧投新，那是严重违犯军纪的。直到现在还给你留着一个卫队团长职，希望我早日归来。我看完后，我懂得这是利诱。但我还是依附他了，这能怪谁呢？还不是怪自己吗？

投奔于去

由廖团长的决定，在1932年夏，投奔于去，我为后卫。大荒沟是通向山城镇的要

道，在这里驻的义勇军是赵营长，廖团长和一、三两营已经通过了。这时日暮，后卫的大行李车，被驻在八道江的义勇军追击上来了，损失了许多的迫击炮弹，前有堵击，后有追兵，我就把全营的兵力集结起来，准备战斗，这一夜间，虽无大冲突，但枪声不绝。次日拂晓，廖团长同着赵营长来接我这个营，安全通过大荒沟。赵营长为什么让我们通过了呢？还当我们是义勇军，因此没有阻止。

按照团原来行军的计划，通过打牛沟，经三源浦到山城镇。现在的情况是义勇军在打牛沟堵击我们这个团。打牛沟的地形是两山夹着一条长沟，形势险要，不易通过。因此把大行李车改为驮载，走小路，到五家。

到五家后，于令我们这个团进占三源浦，走到四道沟门，就和义勇军冲突，这是在国难当头，强敌压境，我们就自相残杀起来了。这天的行军布署是第三营长姜伯伸为前卫，我为本队，由廖团长亲自指挥作战的。当第三营向前攻击时，董连长负了伤，义勇军用步兵射击掩护，红枪会用密集队形冲上来。第三营被冲散了，廖团长和我就退到村庄，依据土墙反击，击退后，廖团长亲自把第三营收容起来，时天色已暮，退回五家宿营。我所属的第八连有一个士兵被红枪会刺死，兵心发生了恐怖，以为是红枪会吃了符念了咒，就可以枪刀不入。第五连长侯治廷，是一个战斗有经验的军官，他在这天的晚上，找了些女人用的月经布发给士兵，叫他们擦枪擦子弹，还对士兵说，这东西可以破邪，吃符念咒没有用，用这个法子给兵仗胆子。我问他，你由哪里找了这么多的月经布，他笑了，哪能找到呢！谁给？我是用些破布头子，沾上猪血，就当月经布，发给他们，他们就当真了。我说，这是一时权宜之计，究竟不顶用，还是研究怎样对付红枪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士兵心里害怕，射击不准，要叫士兵们知道，吃符念咒是迷信。听说符里有闹红花，是一种刺激性的药物，喝上就兴奋起来，过后就没劲了。我们对红枪会的战斗法子，就是利用地物，依据围墙，不让他们冲上来，待其力竭反击。战斗布署时，要用密集队形为有利，使用骑兵更为有利。我们忘记了真正的敌人，戈操同室，就这样地研究起来对付红枪会的战斗。

于芷山又来命令了，令骑兵团长傅布彦接替我们驻五家，令我们这个团移驻柳河县。到了柳河县，于命令我带着第二营到梅河口车站待命。我到了梅河口车站见着于，于命令我听周参谋指挥，协同步四团第一营长董芳五，骑兵一个连、轻迫击炮一个连，进占圣水河子。在这天的晚上，我们在梅河西岸宿营。次日拂晓渡过梅河，向东进，骑兵连先过梅河搜索，说是没有敌情，董营继我之后，就渡过梅河。我向一个五家村庄搜索，发现了义勇军，步兵在房上射击，红枪会冲击上来，我这个营没有被冲散，董营和骑兵连、迫击炮连被冲散，退到梅河西岸去了，轻迫击炮也扔在梅河东岸。我这个营拒止住了义勇军的进攻，董营得以收容，所以迫击炮没有失掉，我叫营附冯玉绅找周参谋来，商议尔后的办法，周来了，说不要进攻，撤回西岸，因此我也回到西岸宿营，次日回到柳河。

于令我当他的卫队团长，虽然升官，但因为形势不好，不愿意离开这个第二营，因为这个营是由原来的五十四团改编的。我在五十四团初成立时期，就当中校团附，后来又当团长，对官兵深有感情的，也经过了几次的战斗，是相互依赖的。况且卫队团的人事安排，都是出自于的一手编制的，没有我一个私人，不说旁的，就拿三个营长来说，

第一营长王学阳，是于的勤务兵出身，目中只有于，他不会听我的，第二营长是杨春煜，这个营的官兵，是由北大营溃退下来收编的，第三营长于宗谦，是于的儿子，不好弄。我当这个团长，无非是牌位而已。我是在这种心情下来当卫队团长的。

我由柳河带着第五连长姚文远到山城镇，刚住了两天，孙秀岩的十六路义勇军就围攻山城镇，因为山城镇是土围子，防守山城镇的任务是步四团长董国华，这次义勇军的攻击，没有攻进来。于芷山带着手枪连亲自督战，我因为有第五连在我手中，在当夜战斗开始时，我没有心慌，在拂晓时，我也到土围子上观望了一回，义勇军退却了，于也没有下令追击，说是怕中埋伏。

于日协定

我在山城镇住的期间，与军需处长周秉衡常见面，他与于的关系很深，于的底细他是知道的。他告诉我说，在山城镇住有一个日本居留民会长，由这个会长的串通，于与日本人拉上关系，双方立了个“协定”，日本军不向于所驻的地区内进兵，但于必须负有保护日本居留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这是一个秘密协定，没有公布。其实，日军不是不向沈东进兵，因为这是一个偏僻地区，不暇顾及，这时日军正是向吉林、黑龙江进占，因此于能苟安一时。以后日军进入他的管境地区内，他还说，这是唐聚五闹义勇军惹进来的，日本军进来了，他不打，他专打咱们。

1932 年秋日军的秋波骑兵旅团长由吉林经梅河口到了柳河，见到伪鸭江地区警备司令廖弼宸就斥责他说，你们这些队伍，驻在这里，为什么不打仗，让义勇军横行呢?在柳河住了一宿，第二天协同廖弼宸向通化进军，一枪没放，一路无阻地侵占了通化。通化是唐聚五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听说唐化装跑回北平去了，李春润和他的弟弟李子荣都是抗日的，带着部下回到他的老家凤城大李家堡子，把部下解散，枪支弹药掩埋起来，坐船回到山东，从此义勇军瓦解，只剩下杨靖宇将军在长白山地区艰苦奋战抗日。

于与张（景惠）的关系

于是辽宁省台安县人，与张景惠同乡，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两人的交情就很好，由张景惠的拉拢，于叛国参加伪满组织，初任伪满奉天第一警备司令官，驻沈阳。但于不愿意住沈阳，愿意住山城镇对他本人来说，住山城镇比住沈阳安全，在山城镇住，还可以避免与日本人打交道，因此他在山城镇住了很长的时间才移驻沈阳的。

于为了应付日本人，把骑兵团长曹秉森调充伪司令部的参谋长，因为曹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又由姜全我推荐阎家梅充伪司令部的副官处长。这两个人，都是精通日语的。

随着于的叛国投敌，参加伪满组织，其旧属步二团长廖弼宸被任为伪满鸭江地区警备司令，驻柳河县，后移驻通化县。

步三团长田德胜任伪满沈海地区警备司令驻朝阳镇，后移驻山城镇。

卫队团长赫慕侠任伪满奉天第一教导队长驻沈阳北大营。伪教导队的编制：步兵一

个团，团长于宗谦；骑兵一个团，团长张化南；炮兵一个队，队长陈赞祖。

伪奉天第一警备司令部所属的还有伪安东地区警备司令李寿山驻安东县，伪辽河地区警备司令王殿忠，驻营口。

以上两部伪军，不是于的旧属，而是张宗昌的旧部，由日本人在“九一八”后直接招编的，伪奉天第一警备司令部成立后，拨归于指挥。

另外还有日本人直接招募编成的伪靖安军，伪司令是日本退役军官藤井，其他团营连长以下的伪军官也都是日系的，仅有少数的伪满系军官，在伪军中，这是一个特殊的编制。

于在山城镇被袭击

1933 年春于由沈阳回山城镇。在此期间，驻山城镇的日本守备大队长小川中佐，其中队长照井大尉，在夜间率兵袭击于的住所，于越墙逃出。这时，于和我说，要到通化找廖，反抗日寇。以后用电话向沈阳连络，探询沈阳方面的情况，回电话说，没有什么举动，这是局部的暴行，不是整个的，并把山城镇被袭击的事件通知了日本顾问部，顾问菅野少佐和阎家梅副官处长来到山城镇与小川大队长当面交涉被袭击的事件。小川推说他事先不知道，因为照井喝醉了干的。因为什么要干呢？说是伪军“通匪”不打仗，就举出迫击炮连长袁文彩在东丰县猴石被义勇军俘虏后又放回来等等，结果是关东军训令照井大尉不应当有这种粗暴的行为。于随着菅野顾问、小川送行回到沈阳，于也就消极下去，再没有说反日的事情，仅仅是有时对日本人暴怒而已。

调虎离山（拆帮）

伪奉天第一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军官，除了辽河、安东两地区外，都是于的旧部，日本侵略者想要整顿人事，于坚持自己的主见，不让调动。日本侵略当局没法子，就得敷衍一时。

1935 年把于调任伪军政部大臣后，趁着这个机会，日本把原有于系伪军官大行整顿，一部裁汰，一部调动，使原有关系不复存在。

1938 年于被免去伪军政部大臣职务，转任伪军事参议院的参议官。

1945 年解放东北，于被俘，后死于哈尔滨。

话再说回来，1930 年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为一方，阎锡山、冯玉祥为一方，双方大战于陇海路线上。在这胜负难分之际，东北军帮助谁，谁就胜。因此阎锡山派代表南桂馨来沈阳进行活动，但没有成功。蒋介石派代表吴铁城来沈阳游说，许给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因此张学良出倾城之兵援蒋，所以阎、冯遭惨败。内战是胜利了，但老家陷落了，日本乘东北空虚之际，发动侵略战争，如入无人之地，残留下来的省防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大部叛国投敌，我写这一段的惨痛历史，就是在“九一八”当时，在辽宁省旧东北军中省防军的具体情况的概述。

（1980 年）

于芷山的一生

曹秉森*

于芷山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时，他是第一三联军骑兵旅长，我调该旅少校参谋，才相认识。经过这次战争，1925年郭军倒戈，于芷山于事后得任第八师师长，1928年任奉天东边镇守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又经过伪满，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这二十余年中，前前后后我在他的部下当过参谋、团附、团长、参谋长、教导队长等等职务，和他直接在一起的期间约有四五年之久。因此对他的为人性格以及言行等等，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到的于芷山是一个非常机警、神经锐敏、警戒心大，并且唯心主义迷信思想很深，恶习很多，总的来说，机警变诈、阴险猜嫉、寡廉鲜耻、唯利是图的典型，旧军阀的代表人物。

于芷山的概略经历

于芷山，奉天台安县人，别名兰坡①，讲武堂毕业，初年在商家学徒，后至辽西著名匪首杜天义帮内作亲随，那时正是反帝运动义和团事件之后，帝国主义兴风作浪，干涉我国内政，地方糜乱，胡匪四起，各踞一方，互相残杀，掠夺财富，无恶不作。杜天义也是其中之一，他经常出没于辽西一带，为非作恶，当时的新民府知府增韫，和驻在新民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②因杜骚扰地方，民不聊生，使杜的密友张景惠（和杜是把兄弟）作为说客，设计诱杜来新，乘机处死了杜天义③。这时随杜前来的就有于芷山，杜被处死后，张作霖将他们当作自己的部下，编入巡防营当兵。以后于芷山还升为什长（相当中士阶级）。

1913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巡防营统领张作霖被任为第二十七师师长，于芷山被提升为该师炮兵团排长，后因保举连长未准，负气辞职，去找当年杜天义的旧伙伴、营口河防营营长宋显一，宋即委于河防营区官，以后升为营副官。

1917年张勋复辟运动事起，素有复辟思想的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霖和他的旅

---

* 作者伪满时先后任伪奉天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教导队少将队长、伪军政部部附和首任驻日本大使馆武官。1937年任伪治安部参谋司副司长，1942年任新组建的伪满飞行队中将司令官，1944年3月任伪江上军中将司令官。

① 又谓：澜波。

② 当时张作霖为步兵营管带。

③ 文中所提“杜天义”，即为杜立山，1907年被张作霖利用其叔父杜泮林，邀杜立山至新民，设计捕杀。事后，张作霖升为统领。

长张海鹏并勾结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旅长汤玉麟，叛张去参加复辟运动。因段祺瑞的马厂起义，反对张勋的复辟，并纠集军民讨伐张勋，因此复辟运动只经过几天，就宣告失败，冯、汤、张等有的被捕，有的躲藏起来。素与汤玉麟关系密切的宋显一，因靠山汤玉麟去参加复辟运动，一者恐张作霖对他不利，二者也想乘机混水摸鱼，找个升官发财的道路，因此也随汤之后，离开营口。河防营营副官于芷山在宋走后，维持了河防营的防务，保持了河防营的实力，到奉天向张作霖报告宋走后的情况以及河防营平安无事的情况，张作霖听后，甚为嘉奖，当即任命于芷山为河防营营长。

1919 年奉军扩充军队，张作霖将河防营长于芷山提升为少将团长，参加 1922 年第一次奉直战争，1924 年调为第二十七师旅长，是年秋第二次奉直战时，调为第一三联军骑兵旅长，1925 年春骑兵旅改编为骑兵第八旅，于芷山仍任第八旅旅长。

1925 年郭松龄倒戈反张时，因于芷山带队回奉并参加抗郭的战争，因此被提升为第八师师长。1927 年奉晋失和，于芷山编为第三十军军长出兵山西。1928 年张作霖失势被炸身亡，奉军撤出关外，于芷山转任奉天东边镇守使。1931 年九一八事变，于芷山投降日本，1932 年伪满政权成立，被任为奉天伪警备司令官升上将转伪军政部大臣，升将军府将军、军事咨议官等等职务，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忠实走狗，最终身亡名裂，对人民犯下万载不能泯灭的滔天罪行，这就是于芷山一生概略经历情况。

现将在二十余年间我所看到的和我所感到的对于芷山的几件事，述说如下。

九一八事变于芷山的奸诈和阴谋诡计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当时，于芷山是奉天东边镇守使，驻在山城镇，拥有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卫队一个连，分驻在东边各县，驻凤城的第一团团长姜全我，在事变当时即被俘，军队一部被缴械，中校团附唐聚五率残部会合第二三两营转移通化。

事变当天，于芷山正在省城，预备过中秋节，闻知有变，在第二天一早化装出城，由沈海路回到山城镇，即以电话通知各部队长，日军在省城的残暴情况，令各部队严加警备。在他回到城镇的不久，奉天治安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袁金铠、吉林熙洽、洮南张海鹏等相继给于芷山来了劝降信。他接到这些信件之当时，没有什么表示，但他心中已有了阴谋诡计。这时唐聚五率领的第一团残部抵达通化，当将情况报告于芷山，于芷山令唐聚五即速将缺额补充起来编制成团并令唐聚五为团长，但不久唐聚五即对于芷山的暧昧不明的态度，表示不满，认为于芷山无意抗日，因此未听于芷山的命令，扩编了军队，想独树一帜进行抗日。因此于芷山虽一再以会议为名召唐来山城镇共议大事，但唐心中有数，始终未敢前来，这使于芷山更为恼怒。这时唐对于态度也很明显，而日本方面又利用被俘的团长姜全我，让他派人说降于芷山。由于各方面的来信和来人，而姜全我所派的汉奸阎家梅（日语很好）在未来之先，已预受日军之意和于芷山说“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日本关东军连络”等语。于芷山本来就有投降之心，只是看条件如何，阎家梅既说有问题可以直接连络，他认为这是机会到了，所以派镇署军法处长王冠英和阎家梅（翻译）为代表去奉天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这是事变后不久的事。

1931年10月于芷山在山城镇召开第一次部队长会议，但在会议上对以上的情况只字未说，只是说日本占领省城，我们和省政府的联系已断绝，今后应如何处理等语，各部队长因不知内情在会上议论纷纷，有主张抗日的，有主张妥协的，但以主张抗日者为多数，于芷山也只好表示同意抗日。他既已派人与日军勾结，为什么又同意抗日呢？这是他实行他阴谋诡计的手段。

于芷山在会上不发表各方面的劝降信，不发表来人说降，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也不发表已派人与日本勾结，只是听取各部队长等与会者的意见。他看主张抗日者为多数，他也就同意了抗日。这是他以抗日为名，要扩充军队以巩固自己地位，并为迎合部队的心情，打出来抗日的旗帜，在这个旗帜掩护下，好为他的扩军投降准备条件。

会后不久，即以抗日为名大行招募，当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很快招集了很多壮丁，编制了四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扩大了编制，充实了兵力，但这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作为投降的资本。

对唐聚五的起义，各部队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各干各的，但多数主张国难当头，不应发生内部分歧，还应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于芷山是假抗日真投降。他的投降工作还没有准备妥当以前，他还是表面抗日，待投降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就要变为投降。况且他已与日本有了勾结，哪里还能协调这种意见。并且于芷山在没有表明投降之前，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派队“讨伐”过唐聚五，也派队到清河沟“讨伐”过抗日义勇军，这已表明于芷山的投降行为。在第一次会议时，因诸多投降工作尚未完成，所以在会上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谈与张学良联系情况。在他完成了投降工作之后又召开第二次部队长会议。这时他首先发表张学良的来信和中央不抵抗主义，他在这个理由之下表示不得已而投降。其实如上所述，就是没有张学良的信和中央不抵抗主义，他也是要投降的，只是时机未成熟而没有表面化。现在军队业已扩充，军费也有了着落，他的一切阴谋诡计全都实现。张学良的信也有了，中央不抵抗主义也表明了，自己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决心，而张学良在信中还说让他和日本敷衍，这就有了充分投降的借口，对部下也有说的。时机已到无须隐瞒，再不明确表示态度，也要受日本的怀疑，所以在第二次议时就表明了投降的态度。

于芷山派王冠英、阎家梅为代表去奉天与日本勾结是在第一次会议以前，在这以后不久，就说有日本人去西安（辽源市）视察煤矿，实际是王、阎二人到奉与日勾结之后，关东军即派满铁理事河本大作（日本退役大佐、原关东军高级参谋、炸张作霖的元凶）在王阎二人陪同下前来山城镇，一者看看于芷山的态度，二者讲讲投降条件，至于说去西安是借口。于芷山和河本大作见面讲好了条件，由日本供应军需物资，由于芷山出兵力负责东边治安，于芷山既有了镇压人民的资本，从此开始更大规模的疯狂镇压抗日力量。

于芷山投降后经常住在山城镇，而不愿回省城，他说是匪情严重不得脱身，其实他想在山城镇没有日本的监视，好和各方面连络方便。在以前，日本军队未来，自己说了算，为所欲为是可以的，而现在日本已来到，当然就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并且日本有日本的作法，不能尽如于芷山的意图。他们在地方招抚胡匪，硬说是抗日军出入镇内，使镇内发生抢案。因此于芷山对日军不满。1932年春，在镇住的日本小川守备大队长

招抚的所谓抗日军在镇内为非作恶，因此镇内秩序紊乱，地方治安也难以维持。因此于芷山逮捕了肇事者，惹起日方的不满，包围于芷山的住宅（自己置买的楼上），于芷山看事不妙，即由走廊的一头越墙到邻居院内躲藏起来，日本守备队没有找到，即在越墙的地方，投掷了几枚手榴弹而去，于芷山险些丧了性命。

于芷山的性情也很粗暴野蛮，曾有一次在奉天伪警备司令部时，由伪军政部来一顾问要看看兵器仓库。于芷山陪同前往，管库员正回家吃午饭未在，于芷山令人去找，管库员匆忙回来，急忙去开库门。这时于芷山深恐日本顾问见怪，骂不绝声，并在管库员身后，抽刀砍在管库员的小腿上，门也开了，管库员也被砍倒了，血流满地。于芷山见此光景还毫不在意，仍然陪同日本顾问去看仓库，而受伤的管库员却成了残废，于芷山在日本主子面前，就是这样卑躬折节，维恭维敬，唯恐触怒日本主子对己不利。因此由奉天的伪警备司令官一跃而为伪军政部大臣，在他的任内对东边实行集家并村的政策，造成无居住地带，截断人民和抗日军的联系，同时对抗日军实行所谓大讨伐，给抗日联军以很大损失。

总之于芷山虽不是封疆大吏，但也有守土之责，当日本侵略东北时，他的基本队伍就有三四个团，加上以往招集的四五千人，兵力相当雄厚，以此抗日当发挥相当威力。但是他不顾国家兴亡、民族的气节、人民的痛苦，只追求个人的安全与利益，终于背叛祖国投降日本，给东北人民带来不可估计的严重灾难，犯下了滔天罪行。

（1962 年）

伪经济部大臣——韩云阶

王 稔 五*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代替了帝俄占据我国辽东半岛的南端——旅顺、大连和金县（其中包括皮子窝、普兰店），实行殖民统治，把这里作为统治、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跳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南满铁路这条经济输血管，大量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运走宝贵资源。它在东北设立学校，宣传“日中亲善”，灌输崇日亲日恐日思想，大量培植汉奸。仅就伪满十四年而言，大小汉奸足够成千累万，这其中最典型的要算是韩云阶，我和他有同乡关系，而且在伪满末期又有一段直接交往。对于他的经历，根据我的所闻所见和所能记忆的点点滴滴，写在下面。

一、受“满铁”会社的资助留学日本

韩云阶学名韩东升，1894 年出生于金州城小手工业者的家庭。其父弟兄二人合力在城内北街开设人力小磨房一所，既是东家又是伙计，专门做拿手的烧饼，维持家庭生活情况，还算不错。伯父无儿，他继承也算是一子两不绝。

韩云阶少年时在金州城东北公学堂南金书院读书，每次考试的成绩都不坏，很受老师们的喜爱。这所学校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占据旅大地区之后，最早成立的第一所文化侵略机构，当时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头一任校长聘请地方绅士王永江担当，日本岩间德也①担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三四年后王永江辞去，岩间德也就继任这个校长的职务。岩间德也在上海同文书院毕业，是有名的中国通，他不但说一口流利中国话，而且对中国的文学、四书五经之类，又能说上一套，因此很受到封建残余士绅们所尊敬。在岩间德也的所谓“日本明治维新大和民族精神”等宣扬影响下，有些地主阶级和中上层资本家的子孙们，由他介绍到日本国内去留学。当时介绍留学的目的，不过是培养出为将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效力的人材。

当时正在这所学校读书的韩云阶，每当他看到年年有些富裕人家子弟喜形于色地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羡慕，无奈韩家的经济情况不能允许他实现这种愿望。但是这种一心要去日本留学的愿望，很受岩间德也的赏识，决心要对他加以培养，经过岩

* 作者曾任大连泰东日报驻长春分社社长兼记者，伪满时历任伪省长、大臣孙其昌的秘书官，德惠县税捐局长、伪文教部教育科长、伪通化县县长等职。

① 岩间德也：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任金州南金书院院长兼金州公学堂堂长，学生遍布伪满，伪大臣卢元善、阎传绂等皆为弟子，简任、荐任官则多不胜数。

间和“满铁”会社的洽商，同意资助，使韩云阶终于实现了他去日本留学的愿望，其后虽然也有些人陆续受到“满铁”的资助，但是韩云阶算其中最早的。

二、创办“亚洲火磨公司”说是实业救国

1919年春，我从乡间的初小转到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的高小来上学，因为距家较远，就住在学校宿舍里，共三四十人住在一起，我们都是隔几个星期才回家一次。记得在这一年五六月间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同学们在操场上闲玩，忽然看到有几十辆马车向学校飞奔而来，马车上的乘客一个个洋服革履，昂首挺胸，神气十足，但见岩间校长和一个满面春风、身穿燕尾服的青年一同出迎在学校正门前。这种场面，是我们十几岁的孩子素所罕见，都不知道学校里今天有什么事情，大家就去找值班老师细问究竟。据孙清源、尹继日两位老师对我们谈：今天是亚洲火磨公司借用学校礼堂召开股东大会，坐马车来的那些人都是亚洲火磨公司的股东，同岩间校长一起出迎的那个身穿礼服的青年，就是新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韩云阶。老师还说，我们虽然都是同样在日本留过学，但是他和我们的志向不一样，他回来不愿当教员，一心一意要开办工厂，说是要实业救国。岩间校长对他这样的抱负很支持，所以在他今年毕业回国之际，替他各处奔走，结果得到“满铁”会社和其他日本财阀的赞助并且还有部分的中国士绅加入，成立了亚洲火磨公司，地点选定在开原，韩云阶就是这个火磨公司的总经理。岩间有这一个得意的门生，自然是要全力以赴去成全他的。两位老师的言外之意，有不胜相形见绌之感。当时我这不满十三岁的乡村孩子，听罢这些话，也感到韩云阶确是了不起。孰不知他的所谓实业救国正是符合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岩间德也之所以大力成全他，也无非是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典型的亲日派的买办阶层人物而已。

开原站是南满铁路线上的粮谷集中地，有许多大粮商在这里经营特产，周围各县的大豆和高粱，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关内外各个地方。韩云阶来到这里原本想用当地的小麦作原料，制出物美价廉的面粉，很可以抵制外国进口面粉，尤其是美国面粉。既有日本财阀作股东为后盾，何愁不一帆风顺呢？在他这种崇日亲日，有了日本人什么也不怕的思想支配下，丝毫不把中国人放在他的眼里。他这种趾高气扬、唯我独尊、瞧不起任何人的作风自然要受到当地原有商人们的嫉恨。当时在开原城有一个著名的劣绅王致中，此人在开原城里和开原车站对中国官方和“满铁”当局都走的很红，可以说是财势双全、手眼通天。他看到韩云阶来到开原，感觉到自己在“满铁”方面的威信和地位很可能被他压倒，心中很是气忿，但是又无可奈何。直接对韩云阶恐怕斗不得，于是他采用两面三刀的办法，抓住韩的虚荣好胜的弱点，表面上对韩云阶尽量恭维，给他高帽戴，背地里离间破坏，拆他的台，还引诱韩云阶讲排场，摆阔气，陪伴打麻将，吸鸦片，挥金如土，终日里花天酒地，贪玩享乐，韩云阶哪还有时间去顾及到他的火磨公司呢。就这样既不能细心经营，又受到外力排挤，不到几年的光景，股金全部赔净，周转不灵，不得不宣告废业。

三、穷困来到哈尔滨　中向是他的救命人

亚洲火磨公司倒闭，韩云阶无处安身，在开原既没交下一个真正的朋友，当地自然是不能久留，又没脸回大连去和众股东以及家乡父老相见，特别是想起他的“恩师”岩间德也更感觉没有颜面回去，思考再三，最后决定先到哈尔滨找找朋友。金昶东是韩云阶在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的同窗好友，两人的感情很厚，他在哈尔滨开设一个金龙煤厂，专门给“满铁”会社的煤矿卖煤，因为他很会勾结日本商人，所以营业情形不坏。韩云阶找到金昶东，多年不见的好友，谈得格外亲热，并且留他住在自己的金龙煤厂，从此韩云阶总算是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中向①是日本最大纺织会社钟纺的代理人，和“满铁”会社也有关系，同时也是韩云阶早在开原创办亚洲火磨公司的股东。他经常来往于哈尔滨、大连之间，给钟纺和“满铁”搞商情工作，对韩云阶穷困在哈尔滨表示非常怜悯和同情，他总想对韩云阶再一次帮忙，使其东山再起，以为他日之用。

由于中向的成全，韩云阶在哈尔滨开设了一所托运公司，凡是中东铁路线向南满铁路线运出的货物，都要由他这公司托运，替货主办理托运手续，每车货物净收手续费十元。每天平均要有十几车的货物从这里托运，算起来收入不算不多，因此，不过两三年的光景，获利不下十万元左右。这时的韩云阶和初到哈尔滨的时期相比，大大的不同了。初时是囊空如洗，生活困难，现在是腰缠累累，挥霍无度，更因有钱装饰门面。他先回到原籍金县，在金州车站前修建一座楼房住宅，并在哈尔滨道外小六道街租了一所三层楼房，开设致中和钱粮业代理店，另在交易所挂牌，大肆买空卖空，从事投机倒把，南起沈阳、大连，北到黑龙江各县，凡是大钱庄、大粮栈的老客们长期住在他的代理店，最盛时期达一百多人，比大旅馆还热闹。中向看到他这几年生意兴隆，扶摇直上的情况，感到非常喜欢，认为自己对韩云阶的成全是有眼光的，后来曾劝韩云阶说：好花不常开、美景不常在，投机倒把不是正常方针，应当适可而止，最好再次创办火磨以雪开原失败之耻，并许他钟纺会社还可以投资。这话正合韩云阶心意，其本身既有余裕，另外募股自然也就容易，所以很快地得到实现。首先结束了致中和代理店，继而开设义祥火磨于克山县，自己留在哈尔滨聘请宋钧衡担任经理，中向另派范某去协助，实际是监督一切。韩云阶偶尔到克山望望，但是他仍回到哈尔滨清闲自在，整天的喷云吐雾吸大烟，吸得满脸灰气。一般人提起他在哈尔滨这段经过时，都说中向是他的救命恩人，然而又有谁能真正地认识到岩间、中向之流的日本人其所以极力成全韩云阶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

四、结识马占山是高锡九作的引线

1931 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使辽、吉两省被日军一举而得，我东北人民生灵涂炭，汉奸们依照日本的意旨组织了亲日政权，惟

① 也有译为“宗像金吾”。

有马占山将军从黑河来到齐齐哈尔，领导军政各界准备抗日。此时以最熟习日本情况自居的韩云阶辗转思索也猜不透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向，但他最担心的是义祥火磨的全部财产，惟恐战火燃到克山县，不免要受到摧残。因此他对马占山的坚决抗战总是感觉到惶惶不安，想前往海伦看望朋友高锡九。高是海伦县广信公司系统的广信涌油房经理（广信油房有万福麟的股份），又在安达县小蒿子站开设福和昌粮栈。两年前韩云阶在哈尔滨开设致中和代理店时，高锡九经常住在店里，作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生意。韩高二人一个是外国财团的买办，一个是官僚资本的亲信，整天一起对吸鸦片，互相吹嘘，倒也显得亲密。久而久之韩知道高和马占山很有关系，当时马占山正掌握黑龙江省军政大权，韩云阶想利用高锡九作个引线结识马占山，借以保全自己在克山县义祥火磨的财产。当马占山就职不久，韩云阶由高锡九陪同到齐齐哈尔晋见马占山。在初次见面的时候，韩云阶以地方绅商的资格，向马主席表示欢迎之意，更以热爱祖国虚情假意地对马主席坚决抗战表示敬佩。并且一再声述如用到他的时候，他本人和义祥火磨都当尽力报效，决不辞劳，希望主席有事尽管吩咐等语。当时马占山对他这一种虚伪的恭维礼貌并未识破，反而感到欢喜，孰不知他是别有用心。江桥抗战后马占山退到海伦，住在广信涌油房，这时韩云阶又特地来到高锡九的柜上，对马主席又作第二次的访问。他对马主席的抗战极力恭维，继对马主席说，我由于日本朋友的介绍，会见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谈到江桥会战情形时，板垣参谋一再表示对主席指挥有力感到钦佩，并且说将军在事前既有严阵的布防，给日军以很大的伤亡；在事后又能保全实力，进行有计划的撤退，这都体现出马将军英明果断。经过此次战役，本庄司令官对马将军也有重新的估计，认为黑龙江省的问题，应取和谈的方式，避免双方对敌。所以由板垣这些话中看出日本军人对主席的尊敬。韩又说，据我看来在短期内关东军将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决不会进行军事行动的。韩云阶这一段似是而非的谈述，使马占山将信将疑，究竟应和应战？一时主意不定。其后，韩云阶又几次奔走海伦，这给马占山在抗战思想上造成很大的动摇，这期间加以在哈尔滨的张景惠对马占山一再劝和；在齐齐哈尔的赵仲仁、李维周等对马占山大举包围，尤其是板垣征四郎亲自到海伦会见马占山，代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致以“诚恳的心愿”，终于促使马占山一时抛弃抗战，回到黑龙江省组织了亲日政权，韩云阶则以黑龙江省省公署参议职衔活跃于日本侵略者和马占山之间。

五、听命岩间、板垣　经济买办变汉奸

当韩云阶见过马占山之后，日本关东军正在准备沿洮昂路向北进犯，而马占山则把黑龙江所有军队都调到前线，誓与决一死战。这时齐齐哈尔的商民争相逃往哈尔滨避难，新从黑龙江省回到哈尔滨的韩云阶为探听关东军的真实动静，一路南下到大连，他往公学堂南金书院会见了岩间德也，想要在岩间口中探得些关东军的行动计划，而岩间是对韩云阶抱有莫大希望的。师生这次谈话时间很长，岩间对韩讲了中日应如何“亲善”的大道理，同时替关东军作辩护，硬说日本对中国领土不是有野心。目前的行动，仅是为了保全日本在东北的既有权益而已，日本希望在满洲能够建立一个和日本保持亲密关系的政权，共同协力开发满蒙的丰富资源。并说于冲汉已在奉天成立地方自治指导

部，过去没有出路的留日学生纷纷投到那里，你的后辈张汉仁、王士香、曹永寿多人都已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些人将成为东北政权的中坚骨干。你是他们的前辈，论经验能力都在他们以上，同时北满的情形又是你最熟的，你应该不失时机地露出头角，谋求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你的天才，这是我一向对你抱的最大的希望。韩云阶在“恩师”岩间的鼓励下，不仅是心花怒放，好像是已经看到了前途的光芒，于是向岩间表示决不辜负老师的期待，回到北满地区，随着时局的进展，按着关东军的意旨积极地在政治上谋出路。岩间当时很欢喜地说：我陪同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把你的情况详细介绍，对你今后的活动是会方便有利的。

岩间领着韩云阶见了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岩间替韩吹嘘了一番，板垣得知韩云阶在哈尔滨熟悉北满情况，认为有可利用之处，于是有意地问韩云阶对龙江省的局势如何展望？韩云阶当时回答说：张海鹏是黑龙江省人民所不欢迎的，马占山虽然对日军表示抗战，但是若受到严重的打击，再加上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得不到关内的接应，自然会心灰意冷，不会坚持到底，趁机对他威胁利诱、进行拉拢或可成功。总之北满地区是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因为黑龙江省地广人稀，山林茂密，败退之后易于隐避，要想彻底消灭实属非易。最好能从多方面找出得力的人去对马占山劝降，是比较妥当的。韩云阶并说他自己和马占山有一面之识，如有必要时，也必从这方面下工夫。当时板垣对韩的回答，虽然未置可否，但是表露出很满意，对他有了初步的认识，当辞别之时，板垣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韩云阶，去齐齐哈尔见黑龙江省军署顾问、关东军代表林义秀少佐，并一再嘱咐韩云阶，要他和林少佐之间搞好亲密关系，帮助林少佐作一些事情，韩云阶满口应承欣然而返。江桥抗战，从11月初开始，仅十几天，马占山败退海伦，韩云阶即在林义秀策划下以商人身份多次往海伦去见马占山，进行欺骗和拉拢。并且得意忘形地说，这是他在板垣面前进言谈过的办法，从此开始，韩云阶便由以往的经济买办变成政治汉奸。

六、在龙江省当省长一年半因受贿赂被罢免

1932年3月“满洲国”宣告成立，为整理以往三省各自为政的税收，首先撤消了奉、吉、黑三省的财政厅，另设奉、吉、黑和滨江四署“税务监督署”，实行“中央集权”，直接归伪财政部管辖，第一任各税务监督署署长由各省伪省长推荐报伪财政部任命，当时奉天推荐王家鼎，吉林推荐启彬，黑龙江推荐韩云阶，滨江则为袁庆濂。这四人简历报到伪财政部后经代理部务次长孙其昌审核，查王家鼎、启彬、袁庆濂三人曾充税捐局长多年具有税政经验，惟韩云阶出身商人，无任何行政经历，资历不符，因而主张驳回。此时总务司长星野直树（日人）说，韩云阶虽无税务经验，但是他很有办事能力，黑龙江省推荐他也是尊重当地日本军部的意见，不便驳回。孙其昌默然通过。由此可以看出，韩云阶是如何得到日本人的信任，又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当时的专横。韩云阶虽说无行政经验，但在任用私人这一点，并不外行。他派克山义祥火磨经理宋钧衡为讷河税捐局长，派哈尔滨托运公司伙友杨赓锡为依安税捐局长，另外还有几名是他的私人，不久都经伪财政部撤换。

马占山走后程志远继任伪龙江省长，后来程志远受赵仲仁的唆使用斧子砍伤了秘书李义顺（专事勾结日本侵略当局），此事日本军部极为不满，程志远见事不利，不得不辞卸省长①。此时日本军方支持韩云阶继任伪省长，最初在伪国务院总理以至各部部长都不同意，但在提交审议时无人敢反对日本军部的主张，于是韩云阶在中国人不喜爱、日本人来成全的情况下遂由龙江税务监督署长调为龙江省伪省长。他对于日本人有其相当勾结的手眼，以及日本人对于他的充分培植，很为所有旧官吏出身的汉奸所嫌忌。而他心目中只有关东军和日本人，其他一切不顾，他这种情况正和他在开原时期一样。他作伪省长总要总揽全省军政大权，事事要管。当时龙江省的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以下各级军官都对他马首是瞻，极力周旋，他借机会就在伪军政两署位置私人、林立势力，大力提拔家乡人（金州），其中主要的有民政厅长刘德权、实业厅长卢元善、龙江县长李义顺、外交科长张汉仁、参事王贤桐、参谋处长于治功、军需处长金昶东（在哈尔滨开金龙煤厂韩云阶贫困时，曾住在金处）、军区秘书王士湖，尚有各县伪县长、科长、股长等多人。有些他的同乡利用职权贪赃枉法、勒索横行，地方居民敢怒而不敢言。1932 年龙江省遭受灾荒，人民饥苦无力去耕，翌年春，韩云阶偕外交科长张汉仁到"新京"向伪财政部请求春耕贷款接济地方，由于他的奔走，终于得到伪财政部的同意，但贷款拨到各县多被伪县署人员和地方劣绅所盗用，真正农民很少得到贷用。

1933 年春，伪财政部颁布《鸦片专卖法》，表面禁烟实际公卖。按照"法令"，各地设立鸦片零卖所，领有许可证皆可以公开贩卖。因此地方一般劣绅以为有机可趁，乃争先恐后纷请许可，甚至不惜巨资行贿、运动。齐齐哈尔市长金星利因和韩云阶争发许可的权利，发生了利害冲突，演变出彼此攻击、互相揭底的丑剧，韩云阶恼羞成怒，以省长的职权撤换了金星利的市长，因此仇恨益深，金星利告到伪中央"监察院"，经查属实。

杨乃时、路子涂（路之淦）是旧政权的两个残渣，全凭多年的政治经验狼狈为奸，他们体会到韩云阶是一个虚荣好胜、喜爱恭维的政治流氓，乃尽量吹嘘，投其所好，杨乃时终于充当韩的秘书长，路之淦充当韩的参事。然而他俩终不满足，当金星利和韩云阶互争发放鸦片零卖证时，他二人就从中大施手段挑拨离间，在韩的面前对金星利进谗，其用心在望韩撤掉金，他俩能各得升转的机会。结果韩竟派杨乃时接替金的市长，路之淦接替杨的秘书长。从此他们对韩云阶就无微不至地一意奉迎。金星利是清朝肃亲王的"王子"，多年来住在旅顺受日本人的保护，东北事变后随从溥仪参加了"满洲国"。有乃兄二人，其一金壁东②任当时伪新京特别市长，其一宪真任伪监察院监察官，都是凭借关东军势力而任伪职。金星利职位被罢免，自然是不甘心。由于乃兄宪真在监

---

① 作者记述有误。1932 年 8 月 25 日，日本殖民当局罢免程志远省长之职，改任伪参议府参议，其因主要为认为他不得力，且有私吞军费，已引起伪满军中的兵变和反正，所以将其免职。程志远举家迁居长春，一次赴宴前，他枪杀了同行的赵仲仁。后不久，又在家中宴客，用斧子将李义顺面部砍伤。尽管程志远连续行凶，日本主子念他在"讨伐"马占山中"有功"，均未追究，仅以"精神病"为由，将其免职，按月照付生活费。

② 肃亲王第七子，又名宪奎，伪满初曾任伪铁道守备队中将司令、新京特别市市长，1935 年 5 月任龙江省省长，1937 年告退。

察院的地位，接受金的指控以后，监察部长日本人品川[1]于是带领大小监察官到齐齐哈尔市调查，结果，韩云阶卖出鸦片许可证十多份，受贿数万元，另有动用春耕贷款和任用私人等不当事件多起属实。品川初意商酌韩云阶转还金星利的情面，求得和平解决。不料韩云阶竟而拒绝，因此怒恼了品川，坚决撤查，在现地取了证据，回到伪国务院建议罢免韩云阶省长职位。原不同意特任韩云阶为省长的郑孝胥等重要伪官吏，既有监察院的建议又兼赃证属实，就在“廉洁政风”的名义下一致通过罢免龙江省长韩云阶，由伪财政次长孙其昌继充。当时虽有一部分日本人对韩同情但不肯出头反对，而韩本人既无颜求人疏通，只好接受罢免命令。

从1931年底到1933年6月，仅是一年半的时间，韩云阶在龙江既出风头又丢丑。在他离开龙江回到金州包了一辆车皮运走他所有的物品，最引人注目的有骠肥体壮的军用大马6匹，据说是伪司令官张文铸和各旅长送别的纪念赠品。从这不难看出韩云阶和原属马占山部下的军官们是有如何的亲密关系。7月初我随孙其昌到齐齐哈尔接任遇见很多金州同乡，都是韩云阶旧属，久之渐从同乡们口中听到有关韩云阶在龙江时一切情况，特别是每逢在孙其昌宅遇到张文铸、杨乃时、路之淦、刘允升、刘世忠、王贤桐、高乃济等人打牌时，他们总是要把韩云阶在位一些事情作谈话资料，他们为何对韩前恭后倨呢？这是要讨好孙其昌，以图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都知道孙最反对韩云阶。孙到任不久，遂将韩任内委派的人员逐渐整理淘汰，大量地换上自己的私人。

七、依靠日本主子　出任“新京”特别市长

韩云阶丢官之后回到金州闲居寡欢，忿忿不平，认为这次被免，完全由于旧官吏们挟嫌攻击，并非关东军本意，因此他又决心和日本军部拉拢关系以图东山再起。当时有权有位结交日本殖民当局本不困难，由于他的老师岩间德也的周旋，他和旅大地区日本官厅走动很频繁。同时由于他的日本朋友中向的援引，他和钟纺共同出资在长春创办义大制粉厂，用魏梅五作经理，在西朝阳路修建一所很辉煌的三层楼房住宅。当时关东军司令部主持“满洲国”事务的第三课（后改第四课）课长原田大佐和其他参谋等，常和他会面，认为他政治有远见，办企业有经验，对他很称赞。于是他就进一步施展手段，最后又将从黑龙江省带回金州的大马6匹运到长春送给关东军。

1934年12月伪满各省行政区划变更，将奉、吉、黑、热四省分划为十省，表面上说便于各省对于属县指导监督，而实际上是借机撤掉臧式毅和熙洽的省长的兼职，也就是削除他二人在地方政权的权力。发表后，臧、熙失意不欢，但都默然置之。1935年5月各伪部“大臣”有变动。事前，消息透露，臧式毅转参议，熙洽转宫内府，都将离开“国务院”，其他各大臣都感到惶惶不安。未几，伪国务院总务厅正式发表：伪滨江省长吕荣寰调升民政部大臣，遗缺由伪奉天市长阎传绂接任；伪龙江省长孙其昌调升财

---

① 品川主计：自1932年9月任伪监察院的监察部长，首任伪监察院议长于冲汉死后，一度代理议长，1933年7月，罗振玉继任伪议长，品川仍实权在握，1935年5月关东军出于殖民统治考虑，劝其辞职，品川先拒绝，后不得不上辞呈。

政部大臣，遗缺由伪新京特别市市长金壁东升转；遗伪特别市长一缺起用韩云阶。命令发表后，一般人对韩云阶的起用都感到意外，但知是出于关东军的意旨，无人敢于反对。韩云阶在关东军的卵翼下很称心出任“特别市长”，他因二年前在龙江的失败和此次成功这两种不同的教训，使他充分认识到一面要密切联系关东军，一面要作好和旧官吏的来往。因此他寻找各种机会，接近各部大臣，殷勤应酬勤于走动，事无大小有求必应，从此就有些人物对他的看法和从前不同了。

记得在1937年春节前一天，我在“财政部大臣室”听到姜恩之（伪专卖总局局长）和孙其昌谈叙下面一段事情，姜说：昨夜在熙宅（熙洽家）玩牌九，刘新秋（伪中央银行理事）耍无赖，我当时气忿不过，打了他两个耳光，刘要“熙二爷”给他出气，熙没有理他，遂恼羞成怒，大吵大闹，非要向日本宪兵队挂电话不可，让宪兵队来抓人等。当时差役恐生意外，切断电话机，这小子看挂不通电话，于是在地板上打滚，大哭大叫，骂个不休。闹得熙二爷没办法，差役把刘的日本老婆找来劝，不但没劝好反而挨了他一顿打。我（姜）一看这事不易善自完了，就请韩云阶来。半夜间韩听说熙二爷有急事请他，立刻赶来，看到刘新秋正在哭闹，韩云阶没客气地排斥他一阵，并且说你真要向日本宪兵队挂电话，没关系，我可以用车送你到那里去，你真要告状，我还可以作证人，你意如何？这一来倒把刘吓住了，站在那里一声不响。韩云阶说：算了吧，你也该回去休息休息，我用车送你回去。就这样，刘新秋这小子就跟韩云阶走了，正好闹了一夜，若不是韩云阶来恐不了事，看来治这种人，非韩云阶不可。孙其昌听了姜恩之一席话，微笑不语。我不禁在想，刘新秋要挂电话向日本宪兵队告状，看来日本宪兵队是可以制服这些高官的，而熙洽等不敢让他挂电话，也说明这些高官是如何怕日本宪兵队。韩云阶到场之后，刘新秋老实了，这又说明刘新秋自知没有韩云阶在宪兵队的力量大，而韩云阶又毫无忌惮地开罪刘新秋，这又说明他诚意地袒护熙洽等人，同时也在熙洽等面前显露自己的力量，这是韩云阶求之不得的机会。熙洽和姜恩之等深感韩之情谊，不然，事会扩大，或许丢失体面也未可知。另外韩云阶对当时的“新京市”商民团体也肯下些工夫，从事周旋，如大连帮的天兴福是同乡，福顺厚是亲戚（他大女儿的婆家）经常来往，就是对发字号，昌、滦、乐帮和裕昌源等山东帮，他也积极应酬。后来他将义大火磨合并裕昌源，使日本财阀钟纺成为裕昌源的股份，都是他从中起的作用。在民间团体方面他很注意和“道德会”的关系，在会里造成势力，积极拉拢理事岳兴华替他作些事。

八、伪经济部“众星捧月”　又“荣任”访欧使节

1937年7月伪国务院机构改革，原有的民政部改为民生部，实业部改为产业部，财政部改为经济部，同时伪大臣的人事也有所调动，吕荣寰由原伪民政部转伪产业部，孙其昌由原伪财政部转伪民生部，韩云阶则由“新京特别市长”升调伪经济部大臣，伪经济部除原有的总务、税务、理财三司外，另由原伪实业部划入工商、矿务两司，因此伪经济部的机构显得扩大，而大臣人选，又特起用韩云阶，人们自然知道，这完全是关东军的主张，同时，也更能意识到关东军对韩云阶是如何的信赖，所以无怪乎当时有

些人对他羡慕、恭维、吹嘘，包围在他的左右，有如“众星捧月”一样。处在这种情况下的韩云阶感到“自命不凡”、“前途无量”。他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不论是谁，只要来接近他，他都极力周旋，显露本领，不论何事，有求必应，仅就下面几个例子，就可见一般。在旧官吏中他推荐姜恩之为伪锦州省长，调杨乃时为伪吉林税务监督署署长，并对杨乃时讲，税务监督署署长的地位不次于省长，因为全满18个省只有5个税务监督，管辖的范围面大，可见它的职位是如何重要了。在伪经济部他提拔事务官姜文涛为银行科科长，林泉清为沈阳商业银行常务理事，左少庞为安东银行常务理事，王骏庆为滨江省哈尔滨银行常务理事，孟庆恩为满洲汉庄会社常务理事等等。他极力在银行界布置势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商人刘骏峰营业失败，穷极无聊竟而异想天开，在长春二道河子区创办一所商业“国高”（中学），聘请韩云阶为名誉校长，专门收纳无学历的富家子弟，借以征收高额学费，不到几年刘骏峰名利双收，发了一笔横财。

“开拓政策”是伪开拓总局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东北移民的侵略政策，廉价强购东北人民大量土地。当时韩云阶在伪国务会议上曾表示反对，他主张应该直接向北满移民开拓荒地，不宜强购南满农民的熟地，更不宜使安居已久的南满农民背井离乡，另到北满去。“粮谷出荷”是伪兴农合作社执行日本在我东北掠夺食粮的政策，廉价收购农民血汗的收获。当时韩云阶在伪国务会议上主张应给农民留有足够的食粮，以公道的价格收购，不应置民食于不顾而强制收买。

韩云阶对于上述两项政策的意见，不过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起码的应有的最低的主张而已，他内心并非反对移民，也并非不同意收购粮谷，他在会议上故意表现有胆有识，而当时有些伪大臣级的人不明底细，即说韩云阶乱放炮、瞎胡闹，不懂明哲保身是自寻苦恼。然而韩云阶本人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不是的，人们只要从他以往的经历成长和生活来看，就知道他无时无地不是受到日本人的提携，岂能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和祖国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呢？他对中国人民采取的是“零吸血、慢抽筋”的办法，在当时没能被许多人体会透罢了。

当时伪产业部大臣吕荣寰的政治野心很大，对张景惠的“国务总理”职位欲取而代之。他虽无韩云阶勾结上层日本人的力量，但却有拉拢中下层日本人的手段，如在伪民政部和产业部每月必对所属（日系股长级以上、中国人科长以上）宴会一次，经常利用自己的秘书官日本人原田作为代表常往关东军走动。他知道韩云阶是他谋求伪国务总理的劲敌，于是不遗余力地给韩云阶造谣破坏，每当韩云阶在国务会议上发言，他都在背后作不利宣传。吕荣寰这种作法，有时惹起“老好”的张景惠不满，而张不满吕的真正原因，并非替韩云阶不平，乃是洞查吕有夺自己地位的图谋。由此不难看出，伪满高级官吏之间的勾心斗角。

韩云阶在伪经济部大臣任内，原配女人死去，遗有子女各二人，长子明道，由日本仙台帝大毕业后，在克山办义祥火磨（1945年祖国光复被斗而死），长女配给福顺厚少东家郭秀海（1945年病死长春），二女明兰同其次子在北京读书。因中馈乏人，经杨赓锡介绍与长春市乔姓女（日本留学生）续婚，当时多人评论不顾“大臣”身份和烟土大王的女儿成亲（乔女之父乔云溪是长春最大的鸦片走私商）。婚后半年女方精神病发作而离婚后，由秘书王文选（号伯超）介绍与榆树县某世家女结婚，后难产，母女死

于长春。继而王克镇介绍克山县倪姓女结婚，1945 年春生一子。

1938 年秋，德国纳粹青年团借访日本之便，来“满洲国”访问，翌年春由于日本政府的策划，伪满组成使节团访欧，到德意两国去参观、访问，一面显示伪满洲国在日本扶植中逐渐成长；一面考察德意两国的建设，进一步认识“枢轴”国家的力量，这是真正用心。关于使节团的成员人选，由伪国务院征得关东军同意而决定团长派伪经济部大臣韩云阶，副团长三人，由“满映”理事长甘粕、伪大连税关长福本、伪外务局长官韦焕章分担，团员为伪满和日本的官吏十余名，中国人有伪经济部参事官郭宝森、伪民生部社会司长王秉铎、伪事务局参事官聂某、伪道德总会理事岳兴华等，被选定的成员们都非常高兴。特别是韩云阶本人感到自己能荣任“满洲国”初次的访欧“使节团长”，兴致勃勃认为日本人对他如此的重视，衷心感激！但自己有一难言之隐，即尚有二十年未戒除的大烟瘾，急中无法戒掉，只好硬着头皮冒险准备烟药随身携带，料想外国海关对“使节团”不致检验。因此，他有意带二女儿明兰同去，借便为自己烧烟侍候，但遭到甘粕的坚决反对，无奈只好带随他多年烧烟老手栾某同行，据说他在白天吞服烟药顶瘾，夜间则关门闭户燃灯过瘾，吸毕则开窗放烟，不使他人有所嗅闻，可以说费尽苦心。

“使节团”出行之前，伪满政府为他们制定一种临时服装，利用“协和服”的衣领挂上一条黄系五色垂穗带，头戴协和帽，足蹬高筒皮靴，名之为“协和礼装”，极不雅观。出行先到日本，“团员”们留在下关，韩云阶和甘粕前往东京访问陆军、大藏、外务三省，由外务省领取护照（伪满尚未经欧洲许多国家承认，故使用日本护照），回到下关一周搭乘日本商船起行，先在意大利上陆，“使节团”只在意、德两国作公开的正式访问，在这两国受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招待。两国对“使节团”也分别举行了群众欢迎大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各在大会上致词，赞扬伪满洲国，欢迎“使节团”并合影纪念，表示亲热。进入法国和英国仅能以私人名义作单纯的旅游，谈不到国际关系的访问，尤其副团长甘粕，因为他是曾经杀害大杉荣全家三口的刽子手，英国人对待他非常憎恨，说他是没有人性的动物，不许他沾染英国的国土，他只好留在德国小住。甘粕为人性情极为凶恶，在伪满初期他曾任伪治安部警务司长统辖全满，他不论对任何中国人，都是一付凶恶神气。在这次旅行中，他看到韩云阶不受他的摆布，讲话时不念他起草的稿，内心非常恼恨。回到“满洲”，甘粕在关东军和伪国务院对韩大进谗言，韩由伪经济部下台，主要是受他的影响，但在当时韩是丝毫没有料到。

韩云阶访欧归来以后，一些捧场的人更争相包围，一味恭维，杨乃时、路之淦二人在韩面前一唱一和互相奉承，一个说你老这次归来不久，将有出任总理可能；一个接着说你老访欧，就是这个用意，一个又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现代杰出人物，能和这两个人会谈的确是不简单，一个又接着说，不但在“满洲国”，就是在日本又有谁和他们晤谈呢。这韩云阶是器小易盈、虚荣心盛的人，听到这些话，能不欢喜吗？经过访欧，有如镀上一层金，他自己认为身份经历出人头地，鹤立鸡群，好像是伪满洲国唯一的政治家。

1940 年秋，伪满大臣级人事又有调动，张景惠仍旧留位总理，原因很简单，张有“老好”之称，凡事都顺从日本人的摆布，因此张的伪总理宝座稳如泰山。这次调动的

主要对象有韩云阶、孙其昌等人。据说韩、孙二人在伪国务会议上唱双簧，有些问题如开拓政策、粮谷出荷等等，孙其昌装药让韩云阶放炮，因而星野总务长官心烦，张景惠总理难办。

原来在伪国务院总务厅有个“火曜会”（星期二次长会），它是由伪总务长官和伪各部次长组成，全是日本人。“火曜会”是伪国务会议的准备会，凡伪各部提交国务会议的方案，事先必须由“火曜会”通过，才能交由伪国务会议讨论公布施行，所谓“国务会议”仅是一种形式，倘有人在会上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是捣乱，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有些案件不用大臣们到会讨论，分别送至伪各大臣家里要他们签字，这叫作“传阅阁议”。

记得在这次伪大臣调动不久，张文铸、张承元二人到孙其昌家要打麻将，三缺一找我（王稔五）去配手。孙谈起：这次调动，事前毫无消息，不过先一天下午从伪民生部回来，总务厅次长谷次亨由电话通知我（孙）转任参议府参议，问答还有谁？答还有韩云阶转电业理事长，听到之后心想外间久传韩云阶要升国务总理之说，突然转入特殊会社，这一次有些原因，据我（孙）个人推测，可能是受了星野、甘粕和吕维东（即吕荣寰）等人的影响，一因韩云阶在国务会议上好发表意见，有时候使星野难堪，其实我（孙）也经常犯这个毛病，有时对星野不加顾忌，有话就要说，难免不招星野的不满，特别是在开拓政策、粮谷出荷两个问题，韩云阶提出意见之后，不但星野不满，就是吕荣寰也不高兴，因为都属产业部主管，吕当然认为捣乱，是和他为难，所以吕荣寰经常在背后挑拨，散布谣言，使日本人对韩不满；其次则是韩在访欧期间和甘粕处的不睦，甘粕在关东军和国务院两方面不免进言，诸如此类，韩云阶都能受到一定的影响，任你韩云阶在关东军方面有怎样的宠信，岂奈星野是东条英机的红人，而中下级日本军官又多是甘粕的同学，你（韩）多大本领和多大的交情，还能比上他们本国人的亲密吗？我听到孙其昌这些话，觉得很有道理，星野这个人可以说是谙练事务，但不够一个政治家，由他的政治修养，担当国务长官根本不妥当，但他在职又久又红，能说不是东条英机的关系？我知道他是东条的亲信，他和东条有裙带关系，即星野之妇和东条之妇密切相好如一人，因而有东条对他大力支持，任何问题都能解决。这些情况，难道韩云阶不知道？不是的，我认为韩云阶并非捣乱，或对星野为难，而只是在这些人面前大出风头，显示自己有胆有识，无所顾忌，借以创造个人的威信，希望人们拥护，但他万没想到竟因此而遭到星野等人的暗算。

九、一场电业千五年　特命监察五十天

伪满的特殊会社很多，包括工厂、企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商业金融、主副食品、生活物资等等。这些会社的实权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虽然有几个中国人参加，只是尸位素餐，凡是退休的高级伪官吏（所谓简任以上）多转入这些社里作理事，所以当时人们说特殊会社是中国人大官退休的养老所。韩云阶从经济部下台转至特殊会社，最初不欢不愉，忿忿不平，但一转念电业理事长比任何高级待遇都高，又感到很大安慰。他知道总理大臣全年收入，薪俸、赏金其和仅只四万元，各部大臣全年

收入不过三万元，并且其它较大的会社，没有中国人作首脑，至于一般会社更不能与电业相比，最多收入也不过三万元，少的才一两万元，自己的全年收入是五万元，可以说在“政府机关”和特殊会社当中，自己的收入是最高的，想到此处又感到日本人对他并不薄情，因而也就消逝了怨气。每天到会社二三小时，平时也往各处走走，其余时间在家中吸鸦片、打麻将，倒也清闲自在。同时又兼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央会理事长”，借便和全“满”工商业都能拉关系，就这样一直到1945年祖国光复后，他在电业会社一任将近五年。

当世界大战（第二次）末期，德、意法西斯已近彻底消灭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已感到它的失败命运即将来临，由它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在中国大陆和太平洋海域的两个战场上都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时它在“满洲”的主力——关东军为了加紧掠夺我东北的丰富资源，指使伪国务院在1945年6月组织一次特命监察，对部分地区工厂、矿山的生产劳动和生活福利各方面，作全面的监察。其用意藉此“鼓舞”东北人民的劳动“热情”，使人们感受“政府”的“关怀温暖”，以便能更多更好地创造出更多生产代价，供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特命监察使”人选经“国务院”和关东军决定任命电业会社理事长韩云阶担当，认为韩遇事好发表意见，肯反映真实情况，起用他最为适当。于是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四年前接替星野直树）亲自召韩商量同意，并说明“政府”“特命监察”的用意，韩云阶受宠若惊，十分高兴表示决不负“政府”的期待，于是通过傀儡溥仪在伪皇宫内举行特命式，然后由韩向国务院指名任命以下这些人为特命监察使的辅佐官：

王贤玮（伪总务厅次长）　王子常（伪总务厅参事官）
阎德润（伪禁烟总局长）　安集云（伪勤劳奉公局副司令）
萧正儒（伪文教部司长）　林喜泰（伪勤劳部司长）
曹肇元（勤奉局处长）　王稔五（伪文教部科长）
赵万宾（伪警察总局科长）　雍善耆（伪勤劳部科长）
刘志格（伪勤劳部科长）　赵祥云（伪勤奉局科长）
王克镇（特殊会社理事）　岳兴华（道德总会理事）

这些人除王克镇、岳兴华二人外，其余全是伪职官吏，就各自担当的事务参与本次监察。王克镇原是龙江省旅长，韩云阶之妻倪氏即王所介绍；岳兴华曾随韩访欧相当亲密，另外派日本人三名充事务员，关东军又派日本宪兵二名随行保护，沿途备有专车。预定由1945年6月下旬起，8月中旬归来，期间定为50天。

当出发前一天韩云阶在他家里治备酒饭，招待辅佐官员们。席间韩说：我们此次的监察有两个特点：一是由特使到辅佐官，全是满洲人，在过去是没有的；二是被监察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工厂、矿山，实际经营管理等全是日本人，满洲人对日本监察，这也是未曾有过的，况且关东军又派出宪兵两名来协助我们，如果有不服从或遇有妨碍我们监察的人，自有日本宪兵出来干涉，所以大家只管放心大胆去作，不必有什么顾忌，出现问题要彻底追究，一切由我韩某负责。于是全体一致表示一定按照监察使的指示，认真执行监察。

7月上旬在沈阳市的部分工厂，7月中旬在通化地区东边道对会社所辖的部分矿山，

7月下旬在锦州地区阜新煤矿区内各个矿场，特命监察使一行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省、市的热情招待，尤其是各工厂矿山的上层首脑，唯恭唯谨地奉迎。

在监察当中首先注意劳动力的分配。关于劳动组织大体可分四种类型：（一）自由募集，由三级或两级的“把头制”招募而来，大多数是山东人，其中把头有大小之分：大把头手下有好多二把头，二把头有好多小把头，小把头每人掌握100名到200名的劳动力，把头们手眼通天，勾结主管人员，特别勾结日本人，对于劳工任意剥削，贪而无厌。（二）市县供出，由各市县按照上级（伪中央、省）分配名额，向区村摊派，编队供出，富者可以出钱雇用，贫者则是长期作劳工。（三）“勤劳奉公队”，凡是当“国兵”不合格的青年，在三年内，每年要出四个月的劳动参加“勤劳奉公队”。在伪中央有勤劳奉公队司令部，各省市县分别设立指挥部，按人数编成大、中、小分队组成集体劳动。（四）“学生奉公队”，凡是国高（初中）三年级以上的男女学生，每年都要参加三个月的实习劳动，由学校教师率领按照“文教部”勤劳奉公司统一安排，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组织劳动实习，原则上不参加矿山的井下作业。

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对于安全生产不重视，疏忽安全设施，经常发生伤亡事故。（二）不注意劳动保护，对工人不按时发给劳动保护用具，对轻伤事故熟视无睹。（三）不充实医疗设备，经常藉口设备不全，拒绝对一般劳工的医疗，而只给上级职员们的享用，置工人们的疾苦于不顾。（四）居住卫生条件恶劣，经常发生传染病，事前既不防范，事后又不采取有效措施。（五）食粮的按期配给：食粮保管不良，经常发生缺粮、霉粮的现象。以上各项问题既因上层首脑漠不关心、知而不问，又有下级职员互相勾结、彼此蒙蔽，所有的这些情况在关东军和“国务院”平素何尝不知？正如阜新岩矿会社的劳务处长某日本人曾向我（王稔五）说：解决问题贵有决心，而日本人对“满洲人”贵有诚意吗？当时感到这个日本人说的这两句话或许是他的内心发现？

在阜新太平矿粮谷配给店遇见许多矿工家属排列领粮，当场有一个山东口音的老太太向店里人质问，你们好多天不卖，可是到今天开卖了，怎么净是些湿粮？发霉的湿苞米面能吃吗？店里一个青年职员态度很蛮横地回答说：爱买不买，不买回去，别在这里捣乱。韩云阶在场嗅得苞米面霉气很重，立时对青年职员说：老太太说的对，你应该好好的解释，为什么蛮横？这个青年不知韩云阶是作什么的，就横眉立目地说：你管得着吗？韩大怒，伸手打了他一耳光，并骂说你这小子可恶，有这些客人在场，你都这样蛮横，平素不定怎么欺压老百姓呢！当时会社的理事长日本人急来向韩赔礼道歉，韩云阶要这日本理事长今后多注意这些问题，他俯首鞠躬满口答应是是，而矿工家属们纷纷耳语，不知在说些啥。每在一处监察完毕时都举行一次总结会，由监察使就所见所闻作总结发言，有时也提出一些质疑和询问，这时如同三堂会审一样，监察使高高坐在上面，两旁分坐辅佐官，受监察的企业高级职员日本人坐在下面默默不语，就如静候法官宣判的场面。确为韩云阶所说，这是伪满洲国从来所没有过的，这就是日本人在东北统治行将垮台的前景。

8月初监察结束回到兴城温泉，托言整理材料，编写监察报告书，其实是中途休息。兴城县为我们送来肥猪两口，有肉有酒，乐以忘忧。10号傍晚，兴城伪副县长日本人来向韩云阶报告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空袭长春，韩云阶惊问之下立向全体商谈

提前回长（原定15日归任），因为都挂念自己家门，所以全同意，并立命兴城伪副县长向铁路准备专车，次日上午车过锦州，当地伪省次长（日本人）、各厅长及市、县长等到站迎送，下午1时车到沈阳，原定即换“亚细亚”快车北上，但由沈阳往长春的北行客车已全调为军用，由长春向沈阳南行客车则全部用作疏散日本人眷属，因而听候日本宪兵向沈阳车站日本军兵站司令部交涉，此时全体同往南市场馨德新饭店，电邀伪沈阳市长范培忠亲谈。席间据范说窃得重庆广播：日内日本政府即将投降，“满洲”也得随之消灭。韩云阶接着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将来不知如何对全国人民请罪，大家默然。这时我真不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移时有电话来说车已交涉妥当，当晚9时左右专车挂在日本军用车尾，一路北上，12日早6时车过南长春站，不能前进，车停兴安桥外道线，因为路线全部被疏散日本人家属南行列车占满，于是在兴安桥外下车各回各家，至此伪满的首次特命监察也就宣告解散。

十、投靠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

当天下午（8月12日），我往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宅访问，方悉由于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使伪满政府慌作一团，呈现一种不可形容的状态。从先一天11日起，伪国务院通令各部停止办公，所有职员不必到班，“大臣”们将于当晚随同“皇帝”迁往通化避难等等。此时看到卢元善心惶意乱，情绪颓靡。移时陪卢访问韩云阶，从特命监察谈到长春被炸，又谈到日本人疏散妇孺和伪政府向通化迁“都”。他们彼此间虽然没有谈出来目的归结和将来的出路，但是对于可怕的前途似乎都有所觉悟。正谈叙间，韩云阶接谷次亨由“国务院”来电话，韩向卢说，总理知会我和各大臣一同去通化，我不是现职官员，没有随往通化必要，如此求谷次亨转达总理可以吧？卢元善没答可否，卢因当晚10时出发，须从事准备，声言特来辞行，于是互道保重而别。我陪卢在归途中谈到不去通化是对的，卢未答。到卢家停而归。约在9月底某日曹肇元会我去看韩云阶（苏军进驻长春后曹代理长春市长，我代理市政科长），途中曹对我讲起韩云阶搬家一段经过。原来8月18日当苏联红军进驻长春时，有位苏联军官住韩的楼下，韩夫妇住在楼上。过些时，这位苏联军官到楼上和韩闲谈，无意中看见墙上挂一张照片，是韩云阶作访欧“使节团长”时和希特勒的合影，苏联军官很好奇，在不言中认为这家主人和希特勒合影，是不简单的。当时韩云阶也看出了这位军官的神情，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于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即在天夜里，收拾了细软财物，夫妇从后门逃走，避居在西三道街王克镇家（王即韩婚事介绍人，也是前随韩访欧辅佐官）。我听罢这事笑对曹说，他在失意时还不忘得意时，已到这样地步，他还挂着照片不忘访欧“使节”的光荣。这天下午我和曹同到西三道街亚洲染厂看韩云阶，没头没脑地胡乱谈了一阵。最后韩说此处也非久居之地，将来看情形或者往关内去。过了些时，曹肇元因话提起说韩云阶已由亚洲染厂不知又躲避何处去了。这时不禁暗想苏军在8月末一网打尽了长春一批头号汉奸战犯，独有韩云阶漏网，难道那张照片对韩的身份起了什么作用？在长春解放不久，我遇见韩的烧烟手栾某和商业银行长春支店李世雨二人，从他们口中知道韩云阶在亚洲染厂住了些时，因厂内人多口杂怕走漏消息，又搬往二道河子刘骏峰那里

（刘曾创办国高曾聘请韩当名誉校长）住了不久，仍觉不安，第三次就搬到东二马路消防队附近陈某家中，躲了一个时期，第二年即1946年春节前，夫妇两个逃到北京。在长春三迁脱逃缉捕，到北京投见马占山，当时马占山任国民党东北副司令，对韩不忘当初友情，多方护庇予以收容，并在陈诚、何应钦面前极力吹嘘韩的精神及与日本军人的关系，因而打动了陈诚、何应钦的心弦，想利用韩作勾结日本的引线。在东北解放之前，韩云阶经常奔走于北平、沈阳之间，全国解放携眷投往台湾①。

（1962年）

① 韩云阶又由台湾去日本，在岸信介等人帮助下，转赴美国，1982年于加利福尼亚病故，终年88岁。

我所知道的张焕相

路履仁

一、与张焕相结识

我于1921年4月8日因外蒙古恰克图、库伦相继沦陷，绕苏回国抵哈尔滨，适遇友人江寿祺奉徐大总统（徐世昌）的命令赴苏答谢苏联救库、恰中国难民之美意，并宣抚库、恰军民及调查外蒙库、恰失守的真相，在哈尔滨因江专使的关系与张焕相结识。张焕相字召棠，辽宁抚顺县千金寨人①，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家庭是地主且富有财资，东北人通称“二皇上”，寓意就是财产在东北居第二位的意思②。其兄张榕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被张作霖杀害，故张焕相由日回国后，张作霖由于杀过张榕的关系不愿录用张焕相，后来因鲍贵卿担保才委派了军职③。我于1921年4月8日与张焕相认识，他已是陆军第十九混成旅的旅长兼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及哈尔滨到长春铁路线的护路军司令，不久又改为长春至绥芬河的长绥护路军司令又兼滨江镇守使。张焕相为人在当时说来算是一个廉洁的军人，且办事相当谨慎，平时生活俭朴，不像富有资产的军人。后张作霖聘请朱庆澜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④，我又随朱庆澜重到哈尔滨。张焕相仍兼护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原陆军第十九混成旅改为陆军第十八旅，“混成”两字取消，张焕相仍为十八旅长，因以我与张的认识又加多了一些。

二、收回东省铁路管理局内的地亩处

关于帝俄建筑原东清铁路（东清铁路就是东三省清帝的铁路）的目的及东清铁路的权限之大相当于帝俄的“东方第二政府”的详情，我曾撰写过我在东省特别区近十年见、闻、知、行作等概述，文内已经详细说明帝俄侵略东三省的野心，本资料不再复说。朱庆澜接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后，为了东铁沿线地区不再为俄侵略土地，首先成

---

① 张焕相，抚顺营村新屯人。

② 张焕相之父张钦元，绰号“二朝廷”。在抚顺五乡二十一屯有权势，尚谈不上在全东北居第二位。

③ 张焕相系长子，但其伯父之子张榕确是辛亥革命时著名革命党人，为张作霖等杀害。张焕相1911年从日本毕业回国，1912年结识袁金铠、王永江，1913年由杨宇霆推荐，任奉天省督军署上校参谋，不存在张作霖因张榕关系而不录用张焕相。

④ 1922年朱庆澜接任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同年11月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立了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派张焕相兼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局长，这个缺本是个能发财的机关，因为张焕相廉洁自爱，[1] 所以才派他担任此要职，向东省铁路管理局收回东铁沿线的土地。当时东省铁路的经营尚未与苏联成立中苏协定以及奉俄协定，东省铁路管理局局长尚是帝俄时所派的白俄沃斯特洛莫乌夫，掌握东铁地亩的处长是原来庚子义和团起义时帝俄所派的坐镇阿穆尔省的将军关达基，当时把黑河沿江一带的中国人赶到黑龙江淹死的同胞很多。关达基借东铁地处每月金卢布1000元的薪金加上各种优待，并以高价出租东铁沿线地亩营私，大发其财，自己在哈尔滨建设了一个关达基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仅知照东铁督办王景春派张焕相接收东省铁路管理局内的地亩处，原处长关达基应即停职，并没有惩办关达基的罪行[2]。张焕相接收东铁地亩处，成立了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直至到1928年离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同时才离开地亩局。

三、在行政长官任内的几件事

朱庆澜于1923年春季接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兼护路军总司令，于1925年初向张作霖咨请辞职，离开哈尔滨不再为政，专办了慈善事业。东省特别行政长官特派了王树翰，王任不久，又改派了于冲汉，而于冲汉也没有任久，就特派了张焕相，陆军第十八旅旅长改派了丁超，东特地亩局局长仍由张焕相兼任。张焕相在东特行政长官任内作了不少的收回国家主持事业，例如：甲：东省特别区域内房屋地皮一概不准卖给非中华国籍的居民。过去各国侨民均可置买楼及或购买地亩，自己建筑，而张接任后对此绝对禁止，当时日本总领事首先反对，但张也没有在乎；乙：成立了三个中学。过去东省特别区的首府哈尔滨没有中学，仅东铁中国职员办了一个普育学校，因为东特区域内居民俄人占十分之七，华人占十分之二，其他各国人占十分之一。日本人不在内，因地段在头道街一带，差不多完全是日本居民。故特区境内俄人的各级学校很多，而华人学校很少。张焕相接任后，首先成立了东省特别区教育管理局，把东省铁路管理局学务处，由东特教育局接收，不久改为东省特别区教育厅，又加办了法政大学。朱庆澜夫人徐雅志在哈尔滨曾创办了一处崇德女子中学校，在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楼房后、帝俄时代的军官学校旧址开办，成绩相当好的。徐雅志随朱庆澜离哈后由孔姓女子（名字回忆不起来了）任校长，孔校长一直任到“九一八”后，我离哈尔滨时仍是孔任校长。张焕相任内又新成立了一个女子中学校，徐雅志创办的崇德女子中学校改为第一女子中学校，新成立的是第二女子中学。东省特别区的首府才算有了中国的三个完整男中、两个女中，其他属于东省铁路的有中俄工业大学，后改为中苏工业大学。东铁在大直所办的

[1] 作者所述有误，张焕相自1919年至1928年，在哈尔滨身兼数职，常曰：“男儿当有三种宝：美人、宝刀、骏马”。他此时有一妻二妾；接受白俄将军阿拉伯马四匹，据传也曾收受白俄要人关达基大批金卢布和一尊金佛；十年中几次卸职交接，亏空公款高达十万元，故“廉洁自爱”谈不上。

[2] 1924年10月2日，苏联政府接管中东路，原中东路管理局长及地亩处长关达基等沙俄残余分子于10月3日被撤职关押。1925年9月8日，由张作霖具保，关达基等人被释放。

商业学校，似乎比中学高些。其他苏联人与白俄人的中学校共有八处，小学一类的很多，所有学校的领导概归东省特别区教育厅。初成立的东省特别区教育管理局长是李绍庚，后来当了伪满洲国的大汉奸。改为东省特区教育厅，厅长是傅斯年，以后是张国忱，我弃职离哈尔滨，特别区教育厅长是魏绍州，原海关监督。丙：整理哈尔滨的金融，原来哈尔滨的金融可说是其乱无比，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完全通用俄币，中国的纸币完全没有。伟大十月革命以后，东铁、东特路权、行政权渐次收回，才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东三省银行、吉林永衡银行、黑龙江官银号发行一种印有哈尔滨字样的币制，但东特境内的中外商店贸易方面有以美金为本位核算者，有以金卢布为本位核算者，有以日本金票为本位核算者，这类商店进出货物、账目，完全记的是各个本位的币制。因有这种纸币不统一的现象，自 1917 年以后印哈尔滨字样的中国银元票子涨落不定，一般中外投机的商人，及类似上海交易所的钱粮业做此投机的生意人，以及在东省特别区域内的工作人员，以及劳动人民生活不大稳定，且当时哈尔滨这个地方的待遇，分为三等：（一）支领东路局的员工是以金卢布计算，每领金卢布一百元者，最高时合哈尔滨大洋 400 元。（二）支领哈大洋者，每 100 元可合永衡票 150 元。（三）在东特的员工与劳动人民领的是哈大洋，在滨江区的工作员工、劳动人民领的是永衡纸票。这样的一个地方三种待遇，一遇哈大洋价格低落，凡领哈大洋与领永衡纸票的员工，就发生不安，货物售价也是随涨随落。张焕相为了收回金融统一权，规定不论中外商人货物进出帐目上一律务用哈大洋字样，违者必罚，当时虽有一部商人有所谓有约国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者，表示不满但亦次第遂守，如英、美、法、荷、比、意、日、瑞士、瑞典、葡、西等国是也。同时售货必收用哈大洋，不准以其他货币交易，而把哈大洋定为总额为 5000 万元，发行中国银行 1000 万元，交通银行 1000 万元，东三省银行 1000 万元，吉林永衡官银号 1000 万元，黑龙江官银号 1000 万元，由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上立各银行的监理官，所有发行的 5000 万元均须盖有银行监理官的印才能生效。当时虽因有约国商人反对，结果仍是克服了困难。丁：向东铁督办于冲汉商议，自中、苏北京协定与中俄奉天协定以后，把帝俄特东省铁路管理局内的白俄员工取消，路权改由中苏合办，根据协定路局工人中苏各半，东特区域首府哈尔滨人增加到十分之三强。戊：对地方建设也施行了不少的工作，如普遍改修原石头子的马路完全改为方块石子的马路，行人便道也全市均铺成洋灰砖或花砖的便道，市容改观。并在大直街的中心开阔一处广大的庆祝场（就是广场）。

四、因群众运动改调职务

到了 1928 年秋季，因暗中支持群众对吉、敦路事件示威运动，致遭张作相的不满。情形是这样：当群众示威游行时，在东特区域内秩序井然，受到特区警察的维护，群众游行至滨江区被军警殴打虽无死亡，但受轻伤的徒工、学生也不少，因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把张焕相调任司令长官公署的军务厅长，同时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特派了

张景惠，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长简派了臧启芳[1]，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长金荣桂停职，简派了米春霖，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长储镇停职，简派了何玉芳，东省特别区教育厅傅厅长停职，简派了张国忱，东省特别区路警处长鄂双全停职，简派了张厚畹，其他各机关主管大多更动。九一八后张焕相任东北军的航空司令[2]，随张学良在北京。1932 年 11 月 8 日在我由哈尔滨弃职逃回后，在北平府右街椅子胡同四号曾与张焕相见面，相谈之下，对暴日侵占东北大为愤慨，且说张副司令学良与其在北平、华北的人民很不满意东北军的行为，且不抵抗的作风，莫如把全部东北军向关外一拼，何苦受人民的懑怨之状语。但 1933 年张学良下野，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主任后，自己（张焕相）变节投日做了汉奸。

五、张焕相变节的经过

张焕相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官迷，只能作官为政为军。一生“清廉”也是因他自己的资财够用。在椅子胡同与我所谈的话何等光明，但不久东北军抗日失利，张学良下野，他的东北军航空司令没有下文，他就通款大汉奸张景惠表示愿为“满洲国”服务。当时张景惠与日方谈好：张焕相回来后可派他为“满洲国”驻意大利大使，往返密信约定，他就暗中到塘沽乘日船回“满”。他刚离北平，何应钦就请当时的南京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张焕相为军事委员会上将委员，各地报纸登载时，他已上船投敌。船抵大连，日方因中国各地报载南京政府已发表张焕相为军事委员上将委员，他回“满洲国”必有任务，因此下船后被日本军警将张焕相全家逮捕押解长春。事经张景惠以生命担保释放以后，在满洲国任何职务我就不知道了。但知道的张焕相的女儿经东省特别区政务厅长林斯贤介绍与朱庆澜的第九子订婚，张焕相做了汉奸，朱庆澜提出离婚。张焕相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就是说明他没有祖国的观念，没有民族立场。

（1964 年 5 月）

---

① 臧启芳于 1931 年 3 月 17 日接应振复地亩管理局长。

② 九一八事变前，张焕相任东北军代理航空军司令。

我走上了背叛祖国的道路

谷 次 亨*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任本溪湖煤铁公司首席秘书。事变发生后，被任命为代理总办，为了保证我个人的身家性命，于是把本溪湖矿产及一切附属设备均让给日本人，而后我于10月份退出本溪湖矿。

由于我在南满铁路做过事，因职务关系与该铁路株式会社的一些高级职员如地方部长田边敏行、铁道部次长宇佐美莞尔、总务部庶务科长石本贯太郎、营口地方事物所长太田雅夫等人来往较密切。九一八事变后，宇佐美莞尔任奉天地方事物所长，石本贯太郎任该所次长，太田雅夫任奉天日本的教育专门学校校长，由于这些人认为我可靠，可以利用，便促使驻奉天的日本宪兵队长二宫少将于伪政权成立后，荐我任了伪总务厅人事处事务调查科长。

事务调查科的任务是负责供给伪政府制定计划、政策时用的各部局的事务数字。同年（1932年）8月我又转任伪文教部事务嘱托，后来又几次转任，但都是科长，直到1937年任伪安东省教育厅长。

记得那是2月，当时安东省正处于教育界大屠杀后的第三个月，由于1936年11月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商务会长孙某和各县的中、小学校长及教员共58人被日军杀害，教职员和工商业者300余名被判刑，因此全省人心恐慌已达极点。我到任时，全省9000余名教职员中辞职者过半数，经济方面也十分萧条，安东市资产在五万元以上的和外县各城市资产在二万元以上的工商业者都暗暗迁走或分散，多数只剩招牌还挂着，仅留下几个看门人而已。市内人口骤减，税收困难，民生凋敝。当时安东省是抗日军的根据地，又是伪满洲国东南的门户，它的兴衰对于伪满洲国有莫大的影响，因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对此十分关心，特来安东视察地方情况，我出席陪视，此间，我向植田谈了我的振兴安东策划，很得植田的赏识。

1937年7月，我调任伪总务厅次长。七七事变后，日军向华北地区开始了大举进攻，为了保证其侵略步骤的顺利进行，在伪满实行《军机保密法》，以期保护做为后方基地的伪满人力、物力以及军事设施的秘密。此法一实行，东北的老百姓如雪上加霜，在一些厂矿做劳工的老百姓，失踪之事经常发生。1942年春，我到奉天“视察”时，奉天四先建筑公司经理张保先私下对我说，奉天飞机制造厂工人，因与工友私谈每天的生产率而失踪了十五六个。1943年秋，我去大连“视察”，大连车辆制造厂的工头于芳年晚上和我谈起该厂工人时常被鬼子扯走，而再也不见回来的已有二三十名，也不知什

---

* 作者曾任伪安东省教育厅长、伪交通部大臣等职。

么原因。后来还听说在国境地带建筑军事工程的劳工，工事完成后竟被全部枪杀。

伪满建国大学，是伪满时设立的一所特殊学校，它的宗旨是为巩固伪满政权培养人才。但是，“建大”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具有爱国抗日热情的年轻人，他们不断开展一些活动，批评伪政府的施政不公平，并经常和校内的日本学生发生冲突。为此，“建大”副总长尾高中将于1938年秋要求我对学生进行训话，于是我做了如下意思的讲话：日本是万世一系的国体，它从建国以来，始终是一个血统出身的天皇统治着，它有好几个民族，文化高的、文化低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很多，但是由于他们的统治者对他们实行的是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所以哪一个民族也不反对他，他才能得到万世一系的统治。这是日本的对内政策。当然，他们对外方针也是如此，实行的是一视同仁、自由平等的政策，对异民族是极力提高他们的生活，不惜牺牲本国的一切利益，特别是对“满洲国”是很关怀的。“满洲国”是民族协和的国家，日本民族是站在指导地位的，特别是本大学的日本学生是以天皇的一视同仁、自由平等的思想来和“满系”学生相处的，希望各位“满系”学生对日系学生顺以友爱的态度与之相处，两系学生要互相钻研学问，这是政府所期待的事情。现在“日满两国”的当局者（包括一切官吏）都是一心一德的，为增进“两国”的利益而努力着，特别是建国以来，由于交通的发展，各地的产品得以互相交流，因而人民生活逐渐提高起来，希望诸位勿需挂念一切，专心求学为盼。

我虽然冠冕堂皇地讲了许多，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日本对内政策是：各民族所受的待遇是极不平等的，例如日本历代政府对于“秽多民族”采取消灭主义的政策，用以极力压迫的手段，因而引起所谓不断的“水平政治运动”。日本对外政策是侵略的、不顾人道的，特别是他们制造的所谓“满洲国”是侵略扩张的产物，是榨取中国人血汗的政策，这是东北人民所体验过的事实。但这样的话做为一个傀儡官吏是不敢讲的。

1937年，由于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华中地区，乃至向全中国推进，做为供给日军军需一切物资的后方基地——伪满洲国，为此召开了伪总务厅次长会议，决定以同年7月25日的一切物价的指数为标准（事后价格永不许变更）①，以该标准的价格收买东北人民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供给了日军，仅在伪满洲国内就有日陆军大仓库500多处，其中全是掠夺东北人民的物资，因而造成了中国工商业者纷纷破产，到1944年底，长春市仅400余户工商业中，就倒闭了一成五，奉天市1.4万余户的工商业只剩了4000余户，物价高涨到平均120倍以上，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日益走向衰败。

1938年伪总务厅次长会议决定发布文官考试令，即“采用考试”、“适格考试”、“登格考试”三种方式。所谓“采用考试”是在伪满洲国内和在日本国内专门高等、大学毕业的日“满”学生，希望做伪满官吏者必须经过的考试，参加考试的人如果及格了方可采用。其实当时能通过这个考试的十分之七是日本人；“适格考试”是由股长晋

① 关于在7月25日起物价永不变更，当时称“七二五物价停止令”，时间在1941年。但日本殖民当局早在1937年就加紧对东北物资的更疯狂的垄断掠夺，进行所谓的“经济统制”，所以作者错将时间写成1937年。

升科长时要进行的考试，“登格考试”是由科员提升为股长时的考试，后两种考试的及格情况也是日人为十分之七八。这倒不是因为日本人水平高，而是因为考试答卷要求一律用日文，我想这也是一个为加强日本人对伪满的直接统治而采取的一个措施。据当时伪总务厅人事处人事科长木田清（日人）对我说，当时全伪满所有的官吏数目约四万余人，仅委任官以上者“日系”约占八九千人。此外，委任官待遇的吏员“日系”占五千多人，可见在当时的伪官吏中，日本人占的比重是很大的。

1938春，我在召开的全伪满县长会议上，向伪县长一再强调：对“政府”已经公布的“国策”和“法令”必须竭力推行，以期达到“国策”实现的目的。由于上边的不断强调督促，伪县长们执行“国策”和“法令”时，不顾地方人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如何，而不断地压榨掠夺百姓。如1939年实行“粮谷出荷”时，伪县长们本知道农民的收获不多，而过量的“出荷”百姓是承担不起的，应向上司说明实收的情况，以免民不聊生，但为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各级官吏不但不替农民说话，反为强行征收“出荷粮”的人撑腰。如龙江省林甸县征收“出荷粮”的人以农民有粮隐藏不交为借口，打死人，放火烧房子、烧柴草，闹得家家不得安宁，此种暴虐行为没受过任何官方的阻止，只是在事情过了很久以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敷衍处理了一下。

1938年度的伪满“全国联合协议大会”上，我被任命为“副议长”，当时我很高兴，于是在会上发言时，向出席会议的“人民代表”们反复强调了对伪满政府所提出的各种“法令”、“政策”，要以协力的态度表示赞成，并对已通过的各种“法令”以忠实的态度去履行。从我这番强调中，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感受到其中的威慑，等到向大会报告情况时，没有一个人敢提百姓生活真正困苦不堪的情形，会后他们回去也都按照会议通过的“法令”和“政策”而极力去搜刮，此种情况使日人愈发地任意施行其各种压制政策。例如1939年春，伪安东省决定由安东市到岫岩县之间修筑一条汽车路，规定在农闲期利用农民力量来修建，但该县的“代表”协议员们，率先要求农民在农忙时就开始动工，使农民对农作物耽误了莳弄，因而农作物的收成照正常收获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这种情景当时当地的农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1938年“总动员法”公布后，在全满开展特殊技能等的登记和一切物资的检查、保管，以备日军对东北人力物力的随时征用。“总动员法”的实行，使本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百姓更加困苦。如1944年在铁岭县龙首山附近修建日陆军地下仓库时，征用了农民的大车6000辆，而人马的死亡率约为十分之一点五。1945年春在通化县第二区为修建日本陆军山洞仓库，又征用了约7000辆大车，而人马的死亡率在五分之一以上。可见“总动员法”给同胞造成的灾难。

为长期霸占中国领土，日本侵略者采取了一系列的统治手段，用唯神论统治奴化百姓也是其中的一种。1939年春，伪总务厅次长会议通过了“建国神庙法”，该法要求东北人民供奉日本“天照大神”为伪满的“建国元神”，并为此建设所谓“建国神庙”，用此使东北人民相信日本的“神佑”，来麻痹、毒化东北人民，消灭其爱国意识，去顺从、附和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为达到这个目的，特命令全伪满公私机关特别是各种学校都设置了供奉“天照大神”的神龛，每年施行春秋两季的祭祀，并定每月15日朗诵“奉祀文”。

为了全力支持的日本的侵略战争，伪总务厅次长会议通过了“粮谷统制法”。依据该法，1939 年规定的“出荷粮”为 500 万吨，从 1940 年起，供给日军粮谷增至 220 万吨，而且此后每年都有增加，到 1945 年增至 900 万吨“出荷粮”、700 万吨“供给粮”，造成饿殍遍地的后果。可见日本侵略者为实现他们的侵略扩张政策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

“重要产业统治法”公布以后，日伪统治者借口资金不足 200 万元以上的重要产业者一律统制，因而煤矿、盐厂等产业遭受了摧残。从 1940 年起，日本侵略者每年掠夺 60 万吨煤以及大量的工业用盐，用于军事。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钢铁的需用量也越来越大，于是 1940 年又公布了“钢铁类统制法”，此法使民用钢铁转入军需，以致农民用的犁铧锄锹等生产工具用高价都买不到。从 1941 年起，每年供给日军钢铁 30 万吨，铁矿石 100 万吨。

1937 年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与日本驻满关东军司令官兼“大使”植田谦吉，在长春签订了“满拓公社协定”，其后伪产业部就在部内成立“开拓总局”，专办日本向伪满移民事务。据该局长结城清太郎所报告：依据本协定预定以 20 年为期向东北移民 20 万户（100 万人口）。伪产业部于 1939 年以部令公布了“日本移民用地收买要纲”，该“要纲”中虽原规定购买用地为沙碱、二荒等地，但在收买的 1700 万垧土地中仅有二荒地 500 万垧，1200 万垧是以时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强迫剥夺的中国人民的良田，因而造成了 1935 年—1943 年年底 6 万余人流离失所，其中有 2 万人死亡。

1939 年，伪满政府以“服兵役”是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要提高伪军“素质”为名，颁布了“国兵法”。自此法颁布开始到 1945 年止，计入伍兵不及 10 万，但从不合格的“国兵漏”中得到的劳工则不下四五十万，“国兵法”的实质，一方面是使东北青年充为炮灰，另一方面是以剥削青年的劳力为主要目的。

1940 年春，为实行“北边振兴计划”在大和旅馆召开了创办会议。我当时是伪总务厅次长。这次会议通过了为由珲春到漠河间长 240 余公里、宽平均 80 余公里的所谓“北边国境地带”内居住的日本人建设各种文化设备的计划，这个计划预算为 2 亿元，预计三年完成，当年冬季开工。而住在这个地带里的中国人被日军用残暴的手段从这里驱逐出去了。如仅珲春至绥阳之间地带内所居住的约有 4000 余户的中国人，就是在三九严寒中被驱逐的，因此，在途中被冻死的老、幼者约 600 余名，冻伤者有 6000 余人，在其它地方也有此类事发生。

1940 年，日本侵略者对于东北和关内的人民因商贸等各种原因常有些往来深为担心，认为这会增强人们的反日情绪，于是该年设置了“临时国事调查时事局”，我被任命为局长，规定当年的 10 月 1 日夜 12 点整为开始调查的时间，每个人以当时所处地点为原籍地，不许变更，如属“满洲国籍”，今后不许与关内有任何往来。

1940 年伪满政府公布了“兴农合作社法”，该法的表面是以农民为会员组织团体机关，以便对于农事有所“改良”，但其贷款既不及时，且以高利对不管是否需要贷款者强行贷款。合作社的主要干部多是无赖出身的日本人，利用合作社的资金，低价从日本输入大批橡胶袜子等物资，强迫老百姓以高价购买。不断地勒索使农民感到：加入合作社不但不能获得利益，反而受着意想不到的损害，纷纷想退社。我得知此情后很伤脑

筋。为使农民不退社，我曾到延吉和吉林两省“联合协议大会”上对农民代表讲过话，我当时非常干脆地告诉大家，退社是不允许的，要他们好自为之。那些农民虽然极端不满，但慑于伪满政府的淫威，只好默默忍受。

1941年初，我被任为伪民生部大臣。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魔爪已伸入全中国，而且窥视着全世界。由于战事不断升级，对物资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劳工的数量也就相应要求增加，可是再像以前一样在关内骗劳工已不灵了，于是关东军在关内开始动手抓劳工送到东北，在东北仍是派劳工。我记得根据伪民生部指令，1941年安东、通化两省共出劳工18万余人，吉林、间岛二省又出劳工约20余万人。第二年春，奉天、锦州、四平等地也出劳工20余万人。当时的摊派，不管你家是否有劳动力，有人出人，没有人出钱雇人，由于老百姓耳闻目睹出劳工者是九死一生，所以每每听到又要派劳工了，真是家家哀泣、人人自危。面对这种不利于“圣战”的情况，伪满政府哪敢坐视，于是我们想出一个欺骗百姓的新主意：1941年秋颁布了“劳务管理新体制实行纲要”，这个“纲要”大意是劳工雇佣者在使用劳工时，如因其保安设施不良或劳役过苦造成劳工伤亡或重伤，劳工使用者将受到刑罚。

可是该“纲要”发表后仅半年，本溪湖煤矿因安全设施不良，仅两个小时，就有千人窒息死亡。同年秋天西安炭矿（今辽源煤矿）也是因安全问题，导致数百名劳工死亡。对于这样大的事件，无论矿长还是把头，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1942年初，为了对日满军警的“劳苦”表示感谢，我以伪民生部大臣资格，率领伪民生部的技正松冈、伪总务厅经理科长平田、伪交通部资料科长宫学曾、伪司法部参事官高田四人到牡丹江、绥芬河、东宁一带慰问。所到之处，对日满军警不顾昼夜严阵以待，为“满洲国”的安全苛尽职守的精神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尽管我心里明白远不是如此，但是还是极虔诚地表达了我的敬意。

1942年10月，我转任伪交通部大臣。初任伊始，为烧好第一把“火”，我颇费了一番心思。考虑到统治的需要，决定要修补扩大国境国道，这不仅使日伪政府掠夺方便，有利于军需物资的运输，也有利于对抗日力量的剿灭。于是我下令将珲春到漠河间宽2丈5尺，长2400余公里的所谓“国境国道”修补并加宽到3丈多，并将其中大部改为仅供应日军军用的“特殊道路”。修这段路，由开始到1944年底，每年用劳工8万—10万，日常死亡率为10%—15%。

伪满时期的统治触角随处伸延，对信件的检查和对电话的窃听就是其中一项。检查信件在伪满初期就已经暗中进行了，而对电话的大范围窃听则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目的是掌握人民的思想动向，扼杀不利于“圣战”的任何行为，到后来发展到将居民收音机没收的地步。但是尽管侵略者绞尽脑汁，想维护其殖民统治，但侵略者最终还是要失败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东北人民挣开了捆在身上十四年的枷锁。而一批卖国求荣的汉奸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62年）

我弃工从政当了汉奸

王贤沛*

我于1928年7月从奉天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毕业，被分配在东北交通委员会考工科练习。1930年春调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工务处委员，同年秋转同局机务处练习工程师。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该局扎赉诺尔煤矿任副矿长，在该局内几次调动，后因与代理理事长李绍庚闹翻而于1933年秋辞职。

1934年1月，在日本人岩间德也的“动员”下，我正式参加了伪组织，当了伪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岩间说我父亲是有名的政治家，我是他的后人，应当为“满洲国”作事。我当时正无事做，所以想先作个小事看看再说。

我父亲王永江1925年以前当过奉天省长，岩间德也是奉天省公署顾问，和我父亲很熟。伪满成立后，岩间德也当了伪文教部督学官。1933年11月他把我介绍给伪民政部的理事官日本人甲斐政治，他们全是“满铁”出身，甲斐政治担当伪安东省公署的筹备事宜。他们二人的意思是要给我一个厅长，我表示愿意当一个科长，因为我那时还有“中国能有收复东北的那一天，我先混混再说”的意思，所以我就当了伪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甲斐政治是总务科长。

行政科的组织机构是：行政科长下有日人事务官，有庶务股、行政股、社会股，行政科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地方行政和社会事业的事务。

1935年的伪民政部颁布“村政大纲”，实行“街村制度”、“保甲制度”。伪安东省公署本着伪民政部的命令，由行政科立案，经伪民政厅长、伪省长的裁决，用伪省长名义通令各伪县，健全街村公所，实行“街村制度”；健全保甲自卫队，实行“保甲制度”；实行并村、集团部落，达到民“匪”分离、坚壁清野的目的。当时采取的这一行动，对巩固伪满对下层的统治，支持日伪军警的“讨伐”工作，摧残抗日武装力量，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

保甲制度是为民间自治制定的一种制度，日本侵略者利用它来控制地方，使之负起治安警戒责任，这个制度的大意是十户为一甲，有甲长；十甲为一保，有保长，若不满十甲也可以成一个保。保甲制度规定的组织则是屯属于村，村属于区，区属于县。自卫团的组织是一个屯约有自卫团员十余人，一个村有自卫团员二三十人，一个街有自卫团员四五十人，团员是由民间住户或店铺摊派出人，是义务职，有事则聚，无事则散。自卫团有团董，全是地方的土豪劣绅，由团董担任队长，自卫团没有枪，只作打更下夜、跑道送信的事或苛捐杂税摊派征收的事情。自卫团和街村公所是平等的，它直接隶属于

* 作者曾任哈尔滨伪警察厅长、伪奉天市长、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等职。

县的警察部门。

集团部落。在1936年以前，是在日伪军“讨伐”时认为某一地区对于抗日部队有利，当时就命令伪县公署实行并村，并村后由县报省公署行政科备案。约在1936年以后，由日伪军警组成的治安维持会（名记的不确）计划好后，交伪省公署有组织按步骤实行：伪省公署本着这个计划，由伪行政科立案，用伪省长的名义通令各县，按照计划实行集团部落。

我在伪行政科长任内时，曾于1935年和1936年先后到过长白、临江、宽甸、凤城、庄河、岫岩等县视察过街村公所，看一二个离县近的街村公所，由伪县行政科长陪同，以督励各伪县公署，促起伪县公署对健全伪街村公所的重视。

1937年4月我转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参事官，人事处有日人处长一人，下有人事科专管荐任官以上人事的升迁调转，有调查科专管伪文官的考试事务，有规划科专管义务储金、官舍等事务。人事处参事官无有职责的规定，名义上是辅助人事处长的，如同副处长，但实质也不过是看看一般的公事。如有人事调转时，由人事科立案，也有时人事处长在立案前叫我去，问我意见。例如有一次派伪驻意大利公使，日人人事处长拿出三个人的名单，问我哪一个去合适，我说最好先问问本人愿不愿意到外国去，再决定那一个合适才好，后来决定了三个人中的罗振邦。还有一次人事调转，我认为有的伪县长在北满多年，可以调到南满，但人事科长说，这是省的意见，得和省联络，我们不能决定，就这样完了。伪满的人事，凡是中国人简任官以上、日人荐任官以上的升迁调转，先用伪总务长官的名义拟文请示关东军参谋长，这个公事只有日人人事科长、人事处长和伪总务长官盖章，人事处参事官（中国人）根本看不见这个公事，只有在请示的公文回来后，有时附在正式裁决的公事后面，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手续。伪满特任官的升迁调转，我在事前向例不知，只在发表时才知道，至于怎么个手续我就根本不知道了。

1938年春，由伪人事处规划科起草制定“文官令”，调整了官等俸级，实行高等文官考试制度。我曾于1938年、1939年两次被派为高等文官“考试委员”，到各地进行高等文官采用考试的口头试用，记得每次有五个委员，历时一个多月，每次采用百余名，日籍人员为70%，中国人为30%。由于伪满这一个文官令的实行，使中国人的伪官吏日日减少，使日人官吏日日增多，原因是日语是文官考试的主要项目，这是日本侵略者为奴化、统治中国人而采取的步骤之一种。由于文官令的实行，中国人只要想当伪官吏就必须学日本语，侵略者妄想以此手段剥夺中国人的民族权利。

1938年我作为伪禁烟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制定挂羊头卖狗肉的“禁烟政策”，起草者是企划处参事官雍善耆，委员长是谷次亨。日本侵略者假借禁烟的名义，掩护它违反国际公法的鸦片专卖，结果造成东北150余万中毒者。我听罗振邦说，对于热河种植鸦片地区的农民，为了低价收买鸦片，好多烟农遭到伪缉私人员的毒打，甚至孕妇被打流产。一个大都市中每年春冬两季“路倒”的死亡人数就有百名之多。鸦片专卖的纯利年收入约5000万元伪币，日伪政府为了巩固伪满的财政基础，不惜拿东北人民的生命作赌注。而我作为这一法令的贯彻者，竭尽全力地推行，由于我的表现，这一年我获勋四位景云章。

1940年7月我转任伪哈尔滨市警察厅长，伪警察厅有日人副厅长一人，有警务科，专管人事、会计、庶务、文书等事务。有卫生科，专管公共卫生、防疫等事务。有司法科，专管刑事、搜查等事务。有特务科，专管特务、检阅等事务。有保安科，专管交通、建筑许可等事务。有警察警备队人员约300名。下设有警署七个：松江署、道里署、道外署、顾乡署、南岗署、香坊署、消防署。伪警察厅管下约有伪警察3000余人。

1940年11月的一天，伪省公署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伪省长、伪次长、伪省警务厅长、伪警察厅副厅长和我。伪省警务厅长秋吉说，在三肇地区有一个姓徐的，把肇东县日人指导官杀死，起义抗日，省公署已组织讨伐队，要求哈尔滨警察厅出20个人参加搜查班。我和副厅长回来后，命令司法科长由司法科和外署调集20个人，由司法科搜查股长叶永年带领，参加伪滨江省的"讨伐队"。12月1日伪满市警合并，我转伪奉天市警察局长，就没过问此事的结果。1941年春，伪哈尔滨市警察局松江警察署长胡友邦转任伪奉天市警察局城内警察署任署长，我提起此事，他说，到三肇地方去的20人，年底要过年啦才回来，此次在当地逮捕了170余人，判处死刑者有徐某以下10余人，有的甚至被塞进松花江冰窟窿里活活冻死。

我在伪哈尔滨警察厅任职四个月的时间，共处理思想案件约有五六件，内有二三件的三四人送伪检查厅。有一次曾举行全市大检举，共逮捕市民约200余人。那时"思想肃正"活动搞得人心慌慌，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捕入狱，甚至丢掉性命。

我到奉天时正是经济统制日益加深的时期，为了踢好上任新官的头三脚，我一到职，立即抓紧执行了经济违反事件的取缔，在我指挥下，1941年间，共检举经济违反案件约5000件，其中约有1200余件约1300余人，送伪检查厅处理。在经济统制的同时，也加紧了思想统治，仅此一年共实行了四次全市大检举，在各主要路口逮捕市民约2000余人，送伪检查厅处理，其中有的被送去服劳役了。

由于我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使日伪政府很满意，所以在1941年秋，伪警务司召集"首都"警察总监齐知政、哈尔滨市警察局长单作善和我共三个中国人的伪警察头目会议，伪警务司长谷口训示后，我们三人报告地方情况，又由伪警务局长指示，大意是今后加强警察纪律，加强都市防护警备，加强经济取缔。随后伪警务司长给每人赏金300元，作为慰劳。

1942年3月我当上了伪奉天市长，当时伪奉天市公署有日人副市长一人。有官方庶务科、官房文书科、行政处、实业处、卫生处、财务处、工务处，下设13个区公署：沈阳区、东关区、大西区、小西区、大和区、铁西区、北陵区、皇姑区、于洪区、北关区、沈海区、浑河区、永信区。市公署每月召开一次市政会议，不外乎讨论经济统制配给、警护警备等等事项。

到职后我极力推行了伪政府颁发的各种"法令"。根据"粮谷出荷法"，伪奉天市郊区耕种地，每年征收出荷粮2000石。根据"经济统制配给法"，加强对都市经济的统制，使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使之无法经营，只好由大范围缩至小范围，以至歇业。所用的日用生活必需品全在统制配给之中。只有少许品类的商品未在统制之中，

但在1943年7月25日，又实行了“七二五”停价令[1]，限定价格出卖，就更促使中国商业的凋弊和歇业，就是不歇业也不过是空架子，也没有什么货可卖，只有少数的商业兼配给店还可以支持。经济统制配给政策，就是日本侵略者要残酷地掠夺中国人民财富，作为它侵略战争的原动力。再者，所谓的配给也不过是这么说说而已，其实市民一年也配给不到一件衣料。配给物资，我记得是由伪满的物资调配委员会负责任分配，各市县再将所得的数量分配给配给店。配给粮食的量少质也恶，每月大人配给约13公斤，16岁以下约8公斤，12岁以下的约4公斤，不够吃就只有走向私买私卖“犯法”的路途。燃料的配给质量也不够，建筑材料的配给大部被日本侵略者掠去，中国人所得甚微。总之，伪满对中国人的“配给”，只有配给之名而无配给之实，所以人民的生活是吃不饱、穿不暖，身体受到损害，小孩的死亡率日益增加。

“劳工法”的实施使伪奉天市每年征收劳工四次，约在2000余人，因为中国人不愿意给侵略者奴役，因此就发生摊派雇佣甚至抓捕等事情，这些被逼当劳工者，被送往矿山、国防工业等工地劳动，由于现场的恶劣待遇，所以劳工死亡率在10%以上。

“思想矫正法”是日伪政府残害东北人民的又一个手段。为了彻底消灭抗日意识，强化其殖民统治，制定了“思想矫正法”，凡是他们认为思想不纯之人，都要受到此法的制裁，轻则关押、出苦役，重则致于死地。如1943年奉天共检举了约5000余人，送给伪检查厅，伪检查厅按照“思想矫正法”再送给辅导院，再送给矿山、国防工程工地，以补助劳工的不足。

随着“大东亚圣战”的不断走向低谷，伪满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各种“运动”也越来越多，如“勤奉法”、“总动员法”、“钢铁献纳运动”、“储蓄运动”等等，真是不胜枚举。每个“法令”颁布后，我不但极力推行，而且身体力行，如在“金属献纳运动”中，曾带头献铁百余斤。

按照伪满协和会的组织原则，伪市长是协和会本部长、伪副市长是副本部长，平素不去，在召开市本部委员会时出席。委员由各机关首长或地方士绅充任，委员会讨论关于“宣德达情”事项，促进日“满”协和的宣传事项，帮助“政府法令”施行的宣传和民意上达事项，是一个名义上的民意机关。官厅有协和分会，区有协和分会，每年市本部召集一次奉天市协和会联合协议会，各机关派代表出席，民间要提出什么问题时，当场给解答，也有事后书面给解答的。这些议案也全是由协和会分会提交市本部委员会，审核后提出的。但当时一般人叫协和会为“蝎虎会”，就是厉害的意思。

“协和义勇奉公队”，是协和会市本部的附属组织，伪市长是固定的总队长，伪副市长是副总队长，另外有一个日人副总队长兼主事，总管一切事务。“义勇奉公队”除平素协助警察维持“秩序”外，必要时也要强制各种“法令”的实施，是日伪强化其法西斯统治的工具之一。

“伪满勤奉法”公布后，设立了伪民生部勤奉局，凡是征兵不合格的适龄壮丁，叫“国兵漏”，由伪民生部勤奉局统一分配，进行“勤劳奉仕”，伪康德10年（1943年），奉天市的适龄壮丁约有5000余人，检查合格的约有700余名，余下的“国兵漏”，再

[1] 日伪实行“七二五”价格停止令的日期应为1941年7月25日。

除去十分之一多的残废疾病的，约能有3500多人，归勤奉局统一训练劳动，“劳动奉仕”的期限记得是一年。

本着“勤劳奉仕法”，奉天市协和会也组织了学生的“勤劳奉仕队”，在日本神社前举行仪式，我在这个仪式上讲了话，大讲“勤劳奉仕”的意义，要求学生积极参加等。

1944年9月间，伪奉天省长于镜涛由长春回来，打电话找我去，告诉我说，张景惠叫我上总务厅当次长，我说日本话不行，干不了。于镜涛说张景惠因为你老人的关系，是好意，你去吧，也许过些日子我也去新京。果不然，过了几天调任我为伪总务厅次长。

伪总务厅共有两个次长，日人古海忠之分担企划局、法制处、主计处、弘报处的事务，我分担人事处、地方处、统计处、官房的事务。

我到任后对一些必要部门和人员进行了拜访，如伪满的各机关，日本的关东军参谋长和第四课参谋等，还有日军防卫司令部参谋长、宪兵司令部司令官和参谋。我对他们说：以往诸多关照，今后仍请指教等等。

1945年1月的一次定例次长会议上，通过了伪勤劳部的“组织法”，我约略记得伪勤劳俸公局局长伴田说，初步计划动员“勤奉”人员约30万左右，又计划征出劳工数约百万左右，在3月成立了伪勤劳部。

2月，在伪国务院临时召开的省长会议上，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和总务长官作了关于时局的“指示”，要求加强警防，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大东亚圣战”，当时局势已十分紧张。

1945年4月，为了表示慰问日本被空袭的破坏，伪满特派“赴日慰问使节团”，张景惠为使节，阮振铎为首席随员，一行共7人，我也是随员之一。到日本后，由张景惠向裕仁呈递溥仪的亲书，“慰问品”是大米30万吨、食盐70万担。并访问了陆军省和海军省，为日本的侵略加油打气。

日伪政府对伪满各厂矿工人的待遇恶劣，因此各厂矿工人多消极怠工对抗，生产降低，所以在1945年6月特派“厂矿监察宣抚使”，利用中国人来作伪宣传。由伪满电业会社长韩云阶任监察宣抚使，我是随员，一行共十余人到各厂矿，名义上是对各厂矿实行监察，改善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实质上是利用召开工人座谈会等，作伪宣传，麻痹工人，使之甘心地被侵略者奴役。此次我到过奉天各工厂和抚顺、阜新等地。

直到1945年光复，我才卸掉了伪总务厅次长这副傀儡担子，1946年夏搬到北京去住，改名王维固。这期间我当过磨粉厂职员、铁工厂技师、厂长，直到1951年5月4日被捕。

我耳闻目睹伪满巨奸实况

王贤沛

一

汉奸张焕相，是东北军阀政权、张学良时代的东北航空副司令。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率领奉军进关，讨伐石友三军，他随同去北京。九一八事变后，他本可以不趟到伪满洲国组织的混水里。但是，由于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和他的家庭关系，终于在1935年，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四年多的时间，他特从北京跑回了东北，参加到伪满洲国组织里，当了伪司法部大臣、伪参议府参议，帮凶日本侵略者镇压屠杀东北人民。

张焕相是辽宁省抚顺县新立屯的人。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土豪劣绅，当保甲长，鱼肉乡民，私设公堂，包揽诉讼，好地有3000余垧，是当地一霸。因此，当地人送了个绰号，叫他“张二朝廷”。意思就是，北京有清朝廷，新立屯也有一个朝廷，是“二朝廷”。

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司令官鲛岛中将驻在新立屯张的家里，他父亲热情招待，为日军办粮秣军需，探听俄军的军事情报，帮了日本很大的忙。因此，鲛岛很表示感谢，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张焕相就拜在鲛岛膝下，做了鲛岛的干儿子，鲛岛就成了张焕相的义父。由于义父子的关系，鲛岛劝张焕相去日本留学，张焕相的父亲很愿意，拜托鲛岛多为帮忙。

这时，正值东三省总督府考送赴日本留学生，鲛岛亲见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把张焕相推荐给赵尔巽，请赵尔巽想法，送张焕相去日本留学。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于“洋人”十分畏惧，赵尔巽也不例外，对于鲛岛推荐的张焕相，以不用考试的命令，就列入了留学生名单之中。

这次送去日本留学的学生，都入了日本士官学校（当时名为振武学堂）。张焕相留学回国后，在东北军阀政权时代，混上了将官阶级，人们送他的绰号，叫“张大下巴”。

在1935年，伪满洲国已经有四年多的历史了，对于从山海关里外出入的人，检查很严，对于海路从天津到旅大的船只，也检查很严。张焕相以现任的东北军航空副司令，怎么敢冒险回东北呢？据说，因为他是日本留学生，很多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同期生，都当了大官。当时日本驻朝鲜的总督南次郎就是他的同学之一。张焕相在回东北之前，曾经和南次郎通过信，南次郎表示欢迎他回东北，保证他的安全，并写信给关东军司令官，介绍了张焕相的一切，说明他是亲日家，决不能有“反满抗日”的不当行为等。张焕相得到了保证之后，从关里回到东北，平安无事地在新立屯家里住了有一年时

间，日本察看其确实可靠，就叫他当了伪国务院嘱托、伪协和会中央本部的委员。

到了这个时候，张焕相要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示一下他是忠实于日本、拥护伪满洲国政权的亲日家。他给日本提出了四十余件“条陈”，都是有利于日本，不利于东北人民的“条陈”。根据人们所知道的，他曾给日本建议，伪满洲国应增加捐税，以充实“国库”。就是伪协和会会员，也应该强迫东北人民，全部加入伪协和会当会员。这样，每个会员每月交纳5角伪币的会费，东北3000余万人，可有相当数目的会费收入。他曾给日本建议，所有的伪官吏，每天要步行上班，节省汽油，把节省下的汽油供给“皇军圣战”使用。他曾给日本建议，应该加强奴化教育，所有的东北人都应当学日本话，不采用不会日本话的伪官吏。东北人应当学日本人的风俗习惯，这样，东北人才能逐渐和日本人一样，达到“日满一心一德”、民族协和”的要求。他曾给日本建议，东北北满地多人稀，应当把在南满居住的中国人，移到北满去，把日本人从日本移到南满居住，以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过多的困难。他曾给日本建议，伪满洲国应实行禁止吸食鸦片烟，但不禁止种植，这样把鸦片烟卖给中国内地，可获相当的收入。他曾给日本建议，东北接近苏联，应当加强防止“赤化”，宣扬“孔教”，各地“文庙”应按时祭祀。他曾给日本建议，在东北各地多修建“日本神社”，让中国“和尚”去日本留学，让中国人参拜“日本神社”，等等。

由于张焕相的忠诚积极表现，在1937年他当了伪司法部大臣。在伪司法部里，对日本官吏，无论职位大小，“一视同仁”毕恭毕敬地对待。但对汉奸伪官吏，则神气十足地高傲卑视。有一次，在伪司法部走廊里，张焕相看见一个伪官吏，在他面前无礼貌地跑过去了，这是对于大臣毫无尊敬的表示，不由得大怒，当即大喊一声“站住”。这个伪官吏听到喊声回头一看，是大臣，马上九十度鞠躬，说了一声“失礼”。张焕相一听说日本话，是日本人，马上消气，笑着说：“没有什么，你忙，你快去吧！”当时传为笑话，伪司法部里的汉奸伪官吏都在背地里骂他。

张焕相当了伪司法部大臣以后，总觉得自已是旧东北军阀时代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急欲想爬上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地位，才算称心如意。要想称心如意，就得让说了算数的主子信任他，看他确是一个可用的人物，才能达到目的。那就是日本殖民者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日本殖民者喜欢作什么，就作什么。

伪满当时，在各官场里，每天早晨上班后，要作一次早操，在做早操前，站好队，要向“东方遥拜”，因为从伪满洲国看日本，是在东方。或在举行什么仪式、会议等聚会场所，都要向“东方遥拜”，就是念念不忘日本的表示。张焕相则在他自已家里，每天早起，率领老婆孩子，在楼上平台，或在院里，向东方恭恭敬敬地行所谓“最敬礼”。

伪满当时，“日本神社”每年有定例日期的“神社祭”，每月有定例日期的“神社祭”。日本人对于神社非常崇敬，路过神社时也要向神社行“最敬礼”。张焕相不仅要参加“神社祭”，还要经常领着老婆孩子特意到日本神社前行“最敬礼”，以表示他对日本神的崇敬和信仰。

伪满当时，日本在各地修建有“忠灵塔”，在塔内供奉着侵略中国、残杀中国人的日本士兵的骨灰、牌位。每年有定期举行的“慰灵祭”。举行慰灵祭时，仪式很隆重，

有各界人士参加致祭。日本对于这些“尽忠于国家的灵魂”，非常尊敬，每逢路过忠灵塔时，都要向塔行“最敬礼”。张焕相不仅要参加定例举行的“慰灵祭”，还经常携带老婆孩子到“忠灵塔”前“参拜”。不仅参拜，还要带着老婆孩子扫忠灵塔的台阶，打扫清洁。

1939年，张焕相在其家乡新立屯修了一个日本神社，里面供着日本“天照大神”。修好以后，他到日本去亲自背回来“天照大神”的“原神”，供在小庙里。并请伪满的日伪官吏参加神社开幕祭，有伪国务总理大臣的代表、伪总务长官的代表出席参加，就像办红白事一样的，大摆宴席，十分热闹。由于张焕相的这一十分特殊的行动，因此，引起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注意，认为奴化东北人民，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从“神道设教”上开始，特别是“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老祖先”，若把老祖先请到伪满洲国来，作为伪满洲国的开国元神，这样伪满洲国的人民就成为日本的子孙，岂不绝妙吗？遂决定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大兴土木，修了一个相当大的“建国神庙”。在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亲自到日本去迎请“天照大神”的“原神”，由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阮振铎捧着“原神”，随着伪皇帝一同回到伪满洲国，把“原神”供奉在“建国神庙”里，并在伪组织里，增添一个“祭祀府”，专为按时上祭念经等。伪满洲国把日本祖先请到家以后，汉奸们都“歌颂”张焕相的“功劳”，如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说：“他妈个巴子，尽叫‘张大下巴’闹的，修什么神社，修出一个建国神庙来。”

这个时候的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是星野直树，张焕相为了爬上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职位，想尽方法巴结星野直树。起始是张焕相叫他老婆结交星野直树的老婆，由拜访、送礼、请吃饭，到十分熟了以后，进一步就是“老爷、太太”拜访“老爷、太太”。有一次张焕相夫妇请星野直树夫妇在家里吃饭，星野夫妇吃中国饺子好吃，星野老婆要学做饺子，第二天，张焕相老婆带着白面和肉，去星野家教星野老婆包饺子。这样一来，两家来往得很热闹，星野直树认为张焕相是一个忠实于日本的“好人”。如果有人问星野直树，叫张焕相当伪国务总理大臣怎么样？星野一定说好。

不幸的是，有一天，张焕相的秘书官日本人木村告诉张焕相说：“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都同意大臣当国务总理大臣，惟有少壮派的参谋不同意大臣当国务总理大臣。”张焕相费了不少心计，结果，关东军的几个参谋不同意，闹了个瞎子点灯白费蜡，没有当上伪国务总理大臣。据说，关东军的少壮参谋们认为张焕相做的太过，有些不近人情，令人不敢相信。不但伪国务总理大臣的职位不敢叫他干，就是现在的伪司法部大臣也不敢叫他干了。因此，在1941年，就把张焕相转到伪参议府里，当一名参议。张焕相也因此受到了教训，他的那些特殊行动，也改正了一些，但他想当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心，仍然未死。他对他的同乡、有旧部下关系的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参事官陈万铠说：“过去我不低于张景惠，今天我也不低于他，只是我没有他那样胡涂，大伙都忌妒我，怕我当总理大臣。”虽然张焕相当了参议，但是仍在想方法往上爬，不过直到1945年伪满垮台，他也未爬上去。

二

汉奸于琛澄，是吉林省双城县人，他是东北军阀时代的一个将官。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他是吉林省军署的参议，正在锦州为吉林省督军张作相的母亲办白事，因为日本侵占了沈阳，他就从锦州到北京去了。熙洽投敌后，当吉林省长官，于琛澄就回到吉林，熙洽就派他当了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这时，哈尔滨还没有被日本侵占，日本侵略者就命令于琛澄组织伪军，打进哈尔滨去。于琛澄率伪军到哈尔滨，被哈尔滨镇守使丁超的部下打得四散而逃。于琛澄回到双城堡车站，收集散兵，在日军配合下，第二次进军，丁超因为力薄，退到松花江北，于琛澄和日军进了哈尔滨。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投降日本侵略者，于琛澄当了护路军总司令。以后，伪满划分警备区，于琛澄当了哈尔滨警备司令部司令官。1934 年，伪满废除警备区，扩大组织，改为军管区，他又当了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1935 年，日本殖民统治者认为他帮凶“有功”，调升为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1937 年，日军对三江、佳木斯等地所谓下江一带地区，进行“治安肃正”，又把这一得力的忠实帮手调回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部，当伪司令官兼任伪三江省长，掌握军政大权。

于琛澄在这次“治安肃正”中，卖了不小的力气，达到了日本所谓的“以华制华”的目的。他的日本顾问，是日本陆军中佐东宫铁男，东宫铁男会几句中国话，对于中国的风俗人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和于琛澄处的很好，可谓交称莫逆。在两个人的残暴镇压屠杀下的下江一带，实现“三光”，几乎变成了无人居住区。东宫铁男向关东军建议，趁此机会，实行开拓移民，抢夺中国人的土地，作为日本移民之用，既解决日本国内人口稠密问题，又可以把移民作为隔离线，使东北人民和苏联国境线分开，断绝来往，这样，下江一带可以“治安确保”。关东军同意此举，马上命令伪满公布实施开拓移民政策。因此，日本称东宫铁男为“开拓之父”，并印出小册子宣传。于琛澄也随着获得关东军的表扬，成为日本重视的人物。

东宫铁男所以获得盛赞，是和于琛澄的帮凶分不开的。所以东宫铁男对于琛澄，就像“亲兄弟”一样的亲近。于琛澄对东宫铁男也是尽其力地巴结，称其为“东宫老头”，一见面便说“老头来啦”。喝酒吃饭，像在家一样，再就是东宫铁男喜欢什么，于琛澄就干什么。

东宫铁男也确有一套办法，每逢到现地所谓“讨伐”时，他总是穿一套中国大棉裤、棉袄，打扮得和中国人一样，并自报“东宫老头”。在于琛澄的宣传之下，下江一带的土豪劣神地主等和东宫铁男都有来往。东宫铁男抱着“杀贫济富”的方针，对于一般农民，他毫不留情地摧残；对于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们，尽其力地保护，给这些人种种方便。当时下江一带的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们，都称东宫铁男为“东宫老头”，有事找“东宫老头”，差不多都能给点“面子”。在那个时候，一般的大户人家每到夜晚谁去叫门也不开，只有东宫铁男，自报“东宫老头”来啦，一定开门迎接。

在东宫铁男的吹嘘下，关东军认为于琛澄是一个忠实可靠的走狗。在 1939 年，于琛澄当了伪治安部大臣。同时，预定他是将来的伪国务总理大臣候补人。这个预定，是

要在伪满洲国建国10周年时把现任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调到伪将军府里，当一名将军，伪国务总理大臣后任就由于琛澄担任。这一预定的消息东宫铁男暗中告诉了于琛澄，于琛澄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事情。

在伪满时期，每逢新年元旦，伪大臣们先到伪宫内府给伪皇帝“朝拜”，然后到关东军司令官官邸给关东军司令官祝贺新年。

1942年的新年元旦，于琛澄在关东军司令官官邸，当着军司令官和各伪大臣的面，毫无忌惮地放量大饮，并高声歌唱，得意忘形地拉着关东军司令官和他一起跳舞，他把这种形式的新年祝贺酒，当作普通的宴会场所，以致惹得关东军司令官大怒。参谋们一看，这太不像话啦，一个伪汉奸大臣，竟敢在伪满洲国皇帝的“后见人”（“后见人”翻译汉语为“监督人”之意）面前，表示了不尊敬的态度，真是岂有此理。参谋们上前说：“大臣喝多啦，回去休息吧。”不容分说，驾出去，送上汽车，打发他回家去了。

于琛澄这样一来，在关东军司令面前显了原形，关东军司令官认为他不适于当伪大臣，更不适于当伪国务总理大臣。于是，决定取消预定计划，就是伪治安部大臣，也不叫他干了，考虑他在下江一带的“汗马功劳”，把他调到伪将军府里，当一名将军。

三

汉奸熙洽，在九一八事变当时是旧东北吉林督军署的参谋长，因为督军张作相回原籍锦州为母亲办白事，由他代行督军职权。由于他是清朝爱新觉罗的后裔，有着清朝复辟的封建思想，所以在发生九一八事变后，他就想借此机会，实现他的清朝复辟梦想。他想假借日军的势力，恢复封建王朝。他和旧东北吉林督军署的日本顾问大通通员①合谋，命令驻在吉林省城的东北军撤出省城，到郊外待命，迎接日本侵略军多门师团，进吉林省城，投降日本，发电报声明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自任吉林省专官；并派人和驻在天津的清逊帝溥仪取联络，请溥仪到东北来。他对日本侵略军说：“东北是清朝发祥地的满洲，如果溥仪来，东北人一定有好印象，都能欢迎，将来贵军帮助我军进关，清朝天下可以复兴了”。日本为了暂时稳定、拢络人心，认为熙洽的意见，暂时可以采取，就派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去天津，和溥仪取联络。结果把溥仪由天津偷运到东北来，先当伪满洲国执政，继而当了伪满洲国皇帝。在熙洽的心理，不仅是在东北，而是在北京。在日本方面，认为殖民东北的侵略计划，已经完成，侵略整个中国，还需要看机行事，不敢贸然。熙洽认为打铁趁热，急于要到北京去，完成清朝复辟的迷梦。

1934年，溥仪就伪皇帝位，为了答谢日本援助成立伪满洲国之恩，决定派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和伪财政部总长熙洽，作为“谢恩使节”到日本国去。

郑孝胥和熙洽这两个保皇派的代表到日本后，怀着到北京复辟清朝的幻想，向日本军政各界人士乞援。熙洽说话的大意是：“我们感谢贵国给予援助，成立了满洲国，清

① 应为大迫通贞，熙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当时任关东军部附兼日本驻吉林省陆军特务机关长。

朝复兴，还希望贵国给予进一步的援助，帮助我们夺取北京，把满洲国政府迁到北京去。中国整个即将是清朝的天下了。我们两国将永久和好，成为兄弟之邦，爱新觉罗氏将永世不忘贵国给予的援助之恩”等等。日本军政各界人士听了熙洽的话，都没有作明白的答复，只含糊其辞地敷衍了事，熙洽很失望地回到了伪满洲国。直到1937年伪满洲国政府组织机构改革时，他才明白了伪满洲国就是伪满洲国，并不是为爱新觉罗氏恢复清封建王朝。

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刚成立的时候，日本利用熙洽等人，是为了完成它的侵略计划，还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还可以像旧政权时代为所欲为。以后步步扣紧，日本把持一切，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了，也就是说，伪满洲国的基础，逐渐稳定下来，从日本自身利益出发，在利用汉奸的程度上，自然和起始时就有所不同。1937年伪满洲国组织机构改革时，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的熙洽转到伪宫内府，当了伪宫内府大臣。这时熙洽才完全明白了：日本成立伪满洲国，并不是为了清朝复辟，而是实行殖民统治。这时，他的幻想、迷梦，都成泡影，用他的话说，就是“已就干了，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四

汉奸张景惠，在九一八事变时是旧东北政权的哈尔滨特区长官，刚刚在锦州给吉林督军张作相母亲吊白回来，住在沈阳的家中，还没有回哈尔滨，正好赶上九一八事变。关东军认为他是旧东北政权的老人物，想听听他的意见，看看他打算怎么办？这时，张景惠也是毫无主意，因为事出突然，究竟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于这一侵略事件如何处理？也不知道。他心里想，我暂时维持由我负责的哈尔滨的治安，听听再说。所以，关东军参谋坂垣去和他见面时，张景惠没有作具体答复，坚持要回哈尔滨去，维持特区的治安，对于日本的入侵，表示不抵抗，听候中国中央政府的解决和命令。日军并未强迫要挟，并考虑他回哈后，没有可靠武装力量，怎么办！张景惠向关东军要求拨给武器，成立警备队，在日军未进哈市前，作为维持地方“治安”和保护日侨安全的临时性的武器力量。关东军允其要求，拨给他3000支枪和一部分钱款。

张景惠回哈市，组织了警备队，以自己的亲信于镜涛为队长。

张景惠和日本方面的事务联络，起始是利用他早就相识的一个“日本浪人”新井某。以后，日本对于新井，由于他的身份，不叫他给张景惠办事，把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书记官松本益雄，派来作张景惠的秘书。松本益雄在中国广东多年，说一口好中国话，特别是广东话说的更好。张景惠和日本方面，一切事务联络，都由松本益雄作翻译。

日本侵占了沈阳，又进军吉林。这时，日本急于找一个相当的旧东北政权的人物出头组织伪政府，由这个人与它签订一个出卖东北的条约。关东军参谋坂垣曾到哈尔滨，再一次明白地说出这一计划，要求张景惠签订一个出卖东北的条约，就是以后汉奸郑孝胥代表溥仪签订的“日满议定书”。张景惠没有签订这个条约，他答应帮助日本侵占整个东北，如果有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进军时，他将尽其力地说服，投降日本。所以，

起来抗日的丁超、李杜、马占山、苏炳文等，张景惠都派人和书信、电报，劝他们勿轻举妄动，交出武力投降。

伪满洲国成立后，张景惠当了伪参议府议长兼军政部总长，以后又当了伪国务总理大臣。给他作翻译及与日本方面进行接洽事务等，都是由他的秘书官松本益雄出头办理。松本益雄本着日军的指挥命令，支配着张景惠。张景惠也十分信赖松本益雄，事无巨细，甚至家庭问题，也由松本益雄参加意见，代为处理。松本益雄成为张景惠的灵魂，张景惠的话，就是松本益雄的话，松本益雄的话，就是张景惠的话，成了二位一体。伪满当时，人们都知道，想通过张景惠办什么事，必须先通过松本益雄，只要松本益雄同意了，他就可以用张景惠的名义，向各方面联络，特别是日本方面。如果你找张景惠办什么事的话，张景惠一定要说："你去和松本说去，让他给办。"或者说："你和松本说了吗?"

据说，有一次伪省长会议，有人提出"出荷量"太大，东北人吃粮不够。松本益雄告诉张景惠："总理可以告诉他们，日本国内和前方'圣战'需要粮食，我们在后方，紧紧裤腰带，少吃点，支援大东亚圣战要紧。"张景惠就对人们说："粮食不够吃，紧紧裤腰带，皇军打仗，不能饿着"。当时，人们都传说"紧紧裤腰带"这一句话。

张景惠由于松本益雄的帮衬，日本方面确认他的忠实，因此，干了十余年伪国务总理大臣，直到伪满垮台。

五

甘珠尔扎布，蒙古族人，他父亲叫巴布扎布，在东北军阀政权张作霖时代，勾结日本闹蒙古独立，被东北军所杀。他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正珠尔扎布，就被煽动他父亲叛乱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留，带到日本豢养，进行民族离间仇视的挑拨，以备将来作为日本扰乱中国东北的帮手。他弟兄二人，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川岛浪速，是一个所谓的日本浪人，和清朝的肃亲王交称莫逆。肃亲王和川岛浪速二人，是互相利用。肃亲王想利用他，取得日本的帮助，进行清朝复辟的阴谋。川岛浪速想利用肃亲王的名誉地位，作为日本扰乱中国，进行侵略的借口。巴布扎布的反东北军阀政权，就是肃亲王和川岛浪速二人的阴谋活动之一。所以甘珠尔扎布弟兄二人去日本，甘珠尔扎布的母亲和姐姐，就被潜居在日本租借地旅顺的肃亲王收养。肃亲王并把他的一个女儿送给川岛浪速作义女，取名川岛芳子。

约在1929年，甘珠尔扎布回到他旅顺家里，开始和日本驻在旅顺的关东军有了来往，幻想将来有一天，假借日本的势力，回到内蒙去，继承他父亲的事业。

九一八事变开始，甘珠尔扎布认为时不可失，他要求关东军帮助他回内蒙去，领导蒙古"独立"。日本对于甘珠尔扎布是绝对的信赖，答应给他3000支枪。甘珠尔扎布回内蒙后，组织了"蒙古独立军"，自己当了"独立军"司令。因此，日本不费吹灰之力，侵占了内蒙地区。伪满洲国成立，甘珠尔扎布的"独立军"改编，他当了伪兴安省的警务厅长，以后又当了伪兴安军管区司令等职。

约在1943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冀东一带受到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打击，伤亡很重，想利用伪满军作第一线的牺牲。日本就利用为其信赖可靠的甘珠尔扎布，组织了蒙古军队，名为“甘支队”，约有3000余人，甘珠尔扎布为司令官，运送到华北，在冀东一带配合日军，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甘珠尔扎布进行了罪恶滔天的奸淫抢掠烧杀，轰动一时，深得日本主子的夸赞。当时伪满报纸称甘支队是伪满军的“火花”。言其在伪满军中，是最有“功绩”的部队，所以甘支队“凯旋”时，伪满皇帝派代表到车站，表示欢迎、慰劳。

六

汉奸韩云阶，是旅大市金州人，日本高工专门学校毕业。回国后，在哈尔滨经营商业，除了投机倒把以外，还给日本在哈市设立的一个商号（名忘了）①，套购北满的农产品，运往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韩云阶通过这一商号的经理日本人宗像金吾的介绍，和关东军勾结上，为关东军跑腿。

在外表看，宗像金吾是一个普通商号经理人，实际是日本抢夺东北农产品的代理人，与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军都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日本掠夺调查东北经济的情报员。

这时马占山在黑龙江一带，率领旧部竖起抗日旗帜，在江桥一带和日军对峙起来。日本侵占整个东北只有两个师团的兵力，它不了解马占山的抗日力量如何，害怕如果打得不利，将影响它已经侵占的地区。因此通过张景惠劝降马占山放下武器，张景惠给马占山的书信、电报，都没有得到回音。正在这个时候，韩云阶自报奋勇，要亲去面见马占山，劝他放弃抗日。关东军认为这是没有损害的事情，可以试试看，韩云阶在哈尔滨找了一个曾经给马占山作过买卖的商人姓高的②，一同作为去黑龙江营商的买卖人，通过封锁线，到达了马占山驻在地海伦县城。他们会见了马占山，并以保证马占山将来的地位不动等利诱马占山，以长敌人的士气、灭自己威风的话，威胁马占山。马占山被他们说服了，撤退江桥一带的军队，让日军进驻黑龙江省城。实际是马占山的力量薄弱，又无援兵的情况下，是两头害怕。伪满洲国成立前，马占山被邀请为“四巨头会议”之一，伪满洲国成立，马占山当了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日本侵略者认为韩云阶大大有功，使日军避免了流血伤亡。为了酬谢功劳，韩云阶当伪黑龙江省公署的实业厅长。说实在的，这是日本叫他监视马占山行动的一个布置。韩云阶喜出望外，更忠实地为日本效力。以后，当伪龙江省长、伪首都特别市长、伪经济部大臣等职。由于他是商人，所以在伪满经济统制实行时期，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姑爷、福顺厚面粉厂经理郭秀海，囤积大批面粉，被日本统治当局所知，撤了他的伪经济部大臣，转到电业会社当社长。

① 此商号为“满铁”出资的“成发东”粮栈，老板是日本人宗像金吾。

② 高锡九，时为海伦县广信涌油坊经理，万福麟入股其中，故与马黑龙江省军政要员熟识。

七

汉奸修长余，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他是长春的警察厅长，随同吉林熙洽投敌后，他就协助日军解决了抵抗日军接收的长春南岭兵营的旧东北军。

当时日本侵略者为了利用他，看他很卖力气，就夸赞他，许诺将来给他更高的地位等，修长余信以为真。但在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日本没有实现诺言，仍叫他当警察厅改的伪首都警察厅总监。因此，他心中不愤，时常借题发挥，说些牢骚话，对于参加到伪首都警察厅内的日本官吏，也很不尊重，自己以有功之臣自居，为日本殖民统治者不满。就计划着想法收拾收拾他。

突然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伪首都警察厅总监修长余的消息，传到全伪满首都市内，日本宪兵队宣称：修长余有“反满抗日”的嫌疑。经日本宪兵关押了一个多月，又突然日本宪兵队释放伪首都警察厅总监修长余的消息，传到全伪首都市。不仅释放，而且官复原职，仍当首都伪警察厅总监。

修长余觉得，我对你们“有功”，你们不给我“大官干”，还把我关押折腾了一个多月，放出来，叫我还干这个总监，面子上太不好看了。不过，主子的命令，不敢违抗，怕再关押起来，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干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气死了。

（1964 年）

丁鉴修访日

安国政

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由于它策动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实现了。1932年3月1日成立了伪满洲国，改号大同元年，“奠都”长春改称“新京”。这时，伪满洲国的外貌大致具备，设有执政府、立法院、监察院、军政、民政、司法、财政、外交、交通、实业、文教八部；最高法院、最高检查厅等机关，外设省、县、公署及其他行政机关。

当时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在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上，国际联盟也派以英国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到东北视察。当然在这时期，世界上没有一国承认伪满洲国，国际空气非常紧张，而且日本也假作冷静，故意不承认“满洲国”，并说“满洲国”还没有发展到日本对它承认的程度。

日本制造了伪满洲国，忐忑不安，怕世界的舆论，硬说是东北“民众独立自治运动的产物”，装模作样地表面不承认它，但实际又处心积虑地要承认它，谋划好久，搞了一个掩耳盗铃、欺骗世人的鬼把戏，在伪满各地区掀起假“民众支持运动”，即要东北“广大民众”向伪满中央呼吁：怂恿“友邦”日本承认“满洲国”。伪政府乃藉口东北民众的呼声，立即组织“满洲国访日国民代表团”，当时任伪交通部总长丁鉴修为访日特使，伪最高法院院长林棨为副使，伪交通部铁路司司长森田成之为首席随员，伪交通铁路司座务科长万泽正敏、伪交通部总务司调查科长金振民、伪实业部林政科长林丙炎及其他数人为随员，我记得代表团一共13人，丁鉴修家属5人（两个姨太太，三个小孩）亦同时随行。

丁鉴修是伪满大汉奸中突出的亲日人物，访日“特使”角色的人选，经过伪满政府一再考虑，认为他最合适。首席随员森田成之是东京帝大毕业，伪满“建国”时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转入伪交通部，任铁路司司长，是伪交通部各司长（均为日人）中最骄矜专横的人。他是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亲妹夫，访日期间，一切活动均由他与日本当局接洽决定。访日使命有二，这使命完全是秉承关东军的旨意：一是代表“满洲国国民”向日本朝野致谢：因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推翻了张学良政权，解除东北民众的疾苦，帮助东北民众建立“满洲国”，实现民众的“理想乐土”。二是基于“满洲国国民”总意唤起日本朝野承认“满洲国”独立的舆论。

丁鉴修率领代表团于1932年（伪大同元年）6月下旬在日“满”要人的欢送下由“新京”（长春）出发往朝鲜赴日，7月1日（大概是一天左右）到达东京，沿途在朝鲜和日本各大车站（如朝鲜平壤、汉城、大田、大邱、釜山，日本广岛、冈山、大阪、京都、名古屋、静冈、横滨）都受到政府首脑和一些平民的“欢迎”。列车通过广岛、

大阪时，丁鉴修曾在车站向迎接的官民发表了谈话。丁鉴修赴日途中在广岛停车30分钟，向来迎群众讲演，内中有几句话激动了一个不明真相的日本老太太，使之痛哭流涕。这几句话是："满洲国之千万民众久陷于张政权暴政统治中，遍地胡匪，民不聊生。日本仗义推翻了张政权，拯救三千万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牺牲了许多青年军人，换来了满洲乐土，现在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我谨代表满洲国国民向日本致谢，并祝这些牺牲者冥福，尤其今天来欢迎我的有许多老年妇人，你们就是满洲国国民的母亲一样，我看到你们感到异常亲热……"到达东京车站时，日本朝野名士数百人前来迎接，东京宪兵司令官陆军中将秦真次也来迎接。秦真次和丁鉴修有密交，"九一八"前，曾在丁鉴修奉天私宅生活过半年之久，当时成了丁鉴修家族的一员。那时秦是陆军少将，历游欧洲各国考查风习，归国途中到奉天，专为考查中国风习，在丁宅住了半年，学会了一般中国家庭用语。所以，秦真次亲率500名宪兵护卫在月台上，戒备森严，数十名记者电光闪闪地在拍照，丁鉴修在站台上通过麦克风用日语发表了关于访日"使命"的谈话。在军警的严密护卫中由贵宾室走出车站，分乘十数辆汽车开往日本首都第一流的帝国旅馆，由车站到旅馆的沿途站满了手持日"满"国旗"欢迎"的东京市民。在旅馆少憩后，先到皇宫外围参拜，办了记帐（即登记）手续，然后参拜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次日到日本内阁访问了斋藤首相，按日程逐一访陆、海军，内务、外交、司法、大藏等各省大臣，对各财团首脑以及东京《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各主要新闻社也作了访问。丁鉴修在访问各部门首脑时都申述了访问使命是：代表"满洲国"3000万民众的"总意"，深深感谢日本推翻了张学良政权，解除民众疾苦，从而才建立了"独立自治"的"乐土新国家"，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现在民众宿望已久的新国家已经诞生，友邦日本仗义援助，尽了"产婆"的义务。新国家今后的成长，还待日本协助。现在国际方面不理解新国家成立的因素，发生了些误解，信口污蔑，不承认"满洲国"，但是我们决不在意它们对"满洲国"所采取的任何敌视态度。我们只有期待在日本的仗义"援助"下阔步前进。而现在主要问题是：满洲国3000万民众"期待"友邦日本尽快地、毫不犹豫地承认"满洲国"，且新国家成立已经数月之久，有了长足的发展，具备了独立国家的面貌，日、"满"两国是同文同种的国家，有"亲如手足"之谊，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希望日本朝野对"满洲国"应当有正确的认识，急速予以承认，这是本特使带着"满洲"3000万民众的热望，访日的唯一使命。我想贵国朝野上下决不能辜负敝国民众的热烈愿望，早日予以承认，使新国家基础日益稳固，贵我两国共存共荣，奠定东洋永久和平，幸甚。

丁鉴修访日代表团在东京逗留约十天，除访问首脑外，还对东京市民作了大规模的讲演，同样强调了访日"使命"。在东京期间还出席了日本政府首脑、财团、新闻界的招待会、茶会、恳谈会。在旅馆休息时间，每日也总是席不暇暖地接待来访客人。从声势来说，帝国旅馆门前高悬伪满国旗，门前树立一个高达5尺长的招牌，墨笔写着："访问丁鉴修特使阁下者，须在来访簿上登记，会面资格：文官限敕任官（简任）以上，武官限少将以上，会谈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因时间及资格所限，得不到面会的许多人，竟有专送名片以表敬意辞去的。每天在旅馆传达处名片箱里总是收到数百张来访名片，上面写着"向丁鉴修阁下致意"。另外，代表团每日出访所经过的大街，在

两侧电竿上都贴有事前己经准备好的石印水彩“丁鉴修像”，上有“欢迎丁鉴修阁下来朝”字样，在飞驰的汽车上一看就很醒目。当然在报纸上都以头号铅字在第一版上刊载丁鉴修访日，无线电也在广播，丁鉴修墨迹扇子也大量出现在东京街头，售价一把50钱（五角），每天售出数万把。帝国旅馆的丁鉴修房间日夜总有武装警察侍立在外侧。同时整个旅馆也是戒备严密，便衣警察不断在巡视。

值得注意的是，丁鉴修到达东京日期的前后，正值国际联盟东北调查团李顿卿（英国）也到达东京，并也住在帝国旅馆，这是日本故意安排的日期。不难理解，让李顿卿看看，“满洲国国民代表团，来日纵恿日本承认‘满洲国’，‘满洲国’是基于东北之千万民众的自主愿望，因日本尚不承认，所以由‘满洲国国民代表’来日请愿要求承认。”以显示“满洲”建国不是日本主动的。

丁鉴修在东京共接见了日本朝野各界首脑、著名人士数百人，现在记忆的有秦真次（东京宪兵司令官）、菊池武夫（陆军中将，曾任张作霖顾问）、秋月少将、内田康哉（伯爵，曾任“满铁”总裁、外相）、辻十嘉六（众议院议员）、藤原银次郎（财界巨头）、中野正刚（政客），其他都忘记了。最后东京铁道局特为丁鉴修挂了一辆皇族专用车厢开往名胜区“日光”游玩了两天。回东京后，立即到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广岛、福冈等地方，各逗留3—5天。一路由土肥原贤二、菊池武夫等陪同随行。在这些大城市也和在东京一样进行了访问，向市民讲演，出席了各界招待会、茶会，在大阪市的讲演会上，听众最多。丁鉴修出席市民大会讲演时，均穿中国衣服（黑褂白衫），表示代表“满洲国国民”，但在访问日本首脑时则穿大礼服，连应付某种场合时的服装都由首席随员森田决定。丁鉴修在讲演时概不用翻译，均亲自用日语讲演。在广岛访问期间，一次丁鉴修和其随员们出旅馆房时，突然有一青年日人手持短刀闯到面前，意欲行刺，并怒声高喊：“满洲国是什么东西！”当场即被护卫丁鉴修的警察绑走，这青年还回头遥向旅馆门前悬挂的“满洲国旗”大骂，丁鉴修等饱吃一惊，受到广岛当局慰问，但这事件付诸了秘密，并没在新闻上发表。代表团由广岛直赴北九州的福冈市，然后乘船赴大连，在大连休息了两三天，返回伪满首都新京，完成了访日谢恩、敦请承认伪满洲国的任务，受到了伪满政府深厚的嘉奖和慰劳。据说丁鉴修这次赴日带去13万元日币，归来后还剩三四万元，伪政府并没收回这笔巨款，用以赏赐丁鉴修作为慰劳。

丁鉴修这次访日，在日本的举动很大，在东京时期各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载他的活动、生活，他的二位夫人时常出现在东京繁华街头，或百货商店，总是人山人海拥满她们的周围，拍照了许多像片，有的登在新闻上，有的杂志（忘其刊名）在第一页竟把丁鉴修的肖像印在日本天皇和皇后的下端，并获得日本勋一等的奖章。东京以及其他都市赠与他的礼品一共装了13个柳条包之多，明治神宫特赠予他“神树”一盆。一路上光在列车上赏给列车服务员的钱，竟有2000多元。日本对他的欢迎真是举国若腾，盛极一时，唤起了日本朝野承认伪满洲国的舆论，随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于同年（1932年）9月15日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当日在伪宫廷由伪满洲国务总理郑孝胥和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煞费心机承认伪满洲国的鬼把戏终于落幕了。

伪满洲国驻“华”大使吕荣寰事略

曹 子 峻*

我是汉医。1920年由盖平原籍迁到抚顺县马郡村居住。这里是伪满洲国特命驻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全权大使”吕荣寰的老家，每因治病和吕的家属常有来往。

1930年吕的大少爷洪凯患病，久治无效，不得已请我这山沟里的大夫试试。凑巧得很，我到沈阳三经路吕公馆诊治十几天就基本病除。吕感佩交萦，待为上宾，坚请我住沈直到伊子完全痊愈为止，这样我在公馆住了59天。此后凡是吕公馆家人、亲属、仆役患病时常找我治疗。其原籍土地二百多亩也委我代为管理。因此在伪满十几年中，每年必须到长春吕的公馆几次，因而对吕的一生经历也比较熟知。但事隔数十年，记忆难免失实，其中有些事件是吕对我讲述的，真相容易有出入。尚望详知内幕的同志予以订正和补充，以保持全面真实的史料。

家世和童年情况

吕荣寰字维东，抚顺县马郡村人。父名汇川，自其曾祖以下均染有鸦片嗜好，游手好闲，以赌博为业。由于不事生产劳动，因而生活比较困难。母赵氏尚能勤俭持家，勉强度日。

吕自幼因生计所迫，在八九岁时就不得不从事牧牛砍柴等生产活动，聊以补助家用，度其艰苦贫困的生活。

吕自幼聪明伶俐，面目较好。尽管读书时断时续，然而博闻强识，同辈莫与伦比。乡间每演地方戏剧，吕看后即可脱口唱出，且能弹琴演曲，其才思敏捷，已有视见。乡里以其多才多艺，交口称赞，认为幼年虽然贫困，日后定有“出息”。

钻营致富的青年时代

1904年日俄战起。日军某部（系后勤运粮小队）进驻马郡村。日军军官松某向乡人强行征购粮草物资，非打即骂，气势汹汹。百姓不得不当面奉承，称之为“松大人”、“大太君”。然而“敬鬼神而远之”，多半不敢与之接近。

这时吕荣寰年仅16岁，仪容修伟，能言善辩，绰号“吕大话匣子”。且善于逢迎，四面玲珑。因此独能出入日营，与其厮混，逐渐学会几句半通的日语，见风使舵，殷勤

* 作者为医生，曾在伪抚顺县公署行政科任科员。

溜拍，赢得“松大人”的赏识，叫他在营当杂役。吕见有机可乘，乃进一步认“松大人”为义父，一变而为“皇太子殿下”了。此时大家只好以“少太君”呼之。于是吕藉揽权纳贿，真是炙手可热了。

自此以后，日军征购粮草物资，均由吕一人经办。“水过地皮湿”，他当然要从中抽头榨取。不久日军由马郡村移驻八家子（现在的清原县街），吕“随龙”而去，气焰更盛。日军仍旧强征粮草物资，使吕有财可发。当时该地有八大明局（即公开设赌营利场所），“少太君”驾到无不争先献贡，百般拉拢，以期博得权贵的关照。不到一年，吕腰缠累累，统值四五千之巨。吕恐日久泄露，以致前功尽弃，乃激流勇退，“衣锦还乡”。

吕归乡后，乃分金半数作为家用，当即购置土地二百亩左右，顿时成为殷实之家。其父藉此再加以结营，竟一度充当地方区长。以一贯无正业、游手好闲的烟鬼赌棍，凭藉儿子之力，升官发财，改换门庭。无怪其父莞尔一笑，认为荣寰是吕家的“千里驹”呢。

其剥夺来的另一半，吕则作为学费，去到抚顺城的高小就读。在校时成绩优异，每试辄名列前茅，因而吕目空一切，日益骄纵。不久因带头罢课，与学校当局对立，乃被开除学籍。

由抚顺高小被开除后，吕即投入奉天（沈阳）中学堂读书，未待毕业，又因罢课原故，经学校呈准奉天教育厅以其器张跋扈，不堪造就，通令全省各县中学，一律不准收容。这时全省虽大，竟无吕就读之地了。

虽经过这次挫折，而吕毫不灰心。他认为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大丈夫志在四方，正可藉此闯闯江湖，开开眼界。于是遨游京津、江南，最后竟投入南京法政学校，一变而为大学生了。四年后毕业，取得高等学校毕业证书①，以法学士资格作为日后官场活动的资本。

旧中国时期的飞黄腾达

1920年前后，吕在南京法政学校毕业，由于没有门径，以致无官可做，乃先到北京挂上了律师牌子。正当北洋军阀时期，京华一隅为官僚政客蝇聚之所，所谓法学前辈，指不胜屈，吕初出茅庐，黄望不足，当然门可罗雀，无人问津。潦倒故都，罗掘无术，大有长安居不易之感。不得已乃返回本省省城，仍挂上了大律师吕荣寰事务所的牌匾。

当时奉天省议长李友兰的“太太”，因案诉讼，几至被押。吕以为有机可乘，乃挺身而出，毛遂自荐，以代理人身份，包揽此案，直至胜诉。由于有恩于李，再加上对李阿谀奉承，因而深得李的器重，竟成为莫逆之交。

1922年奉直战后，张作霖撤回关外，宣布东三省独立自治。为制造民意，粉饰法制，乃布置改造奉天省议会。吕熟知“代议士”是官僚政客进身的阶梯，千载良机，

---

① 吕荣寰就读江苏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据金名世回忆吕在此校念了三年。

岂容交臂失之，乃谋之于李友兰，李慨然应允。李嘱咐吕说，你必须设法取得本县选票，在省一切，均由我帮忙。吕乃回抚顺大肆活动，选举时在“阁老沟”杀猪备酒，大设筵席，用尽胁肩谄笑、卑躬屈膝的能事，终于在抚顺县取得当选省议员资格。在省选举时，李果为大力支持，因此吕竟一跃而登上了奉天省议会议长的宝座（这时李已卸去奉天省议长之职转任“洮昌道尹”和本溪湖煤铁公司总经理），于是得以置身于东北军政要人之间，一登龙门，身价十倍，顿时成为旧政权内的风云人物了。

1924年北洋政府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订立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时当军阀割据局面，中东铁路既在东北，这里又已宣布独立自治，政令岂能统一。于是吕乃以议长资格，被张作霖派遣为首席代表赴苏联签订了奉俄协定七条。事后张作霖以吕有功，曾颁给一等嘉禾奖章。

在地位声望似夙愿克遂，本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但以宦囊羞涩，外强中干。只以贿选一事竟负债达几万元之巨。实际应酬，更觉捉襟见肘。因而忧心忡忡，时时觊觎中东铁路的美差肥缺，几至梦寝难忘。曾经再请李友兰在张作霖面前说项，由于张对吕也有较好的印象，乃派吕充中东铁路理事。不久就继于冲汉之后升为督办（理事长），坐在中东铁路有决议权的第一把金交椅上，更显得声势赫赫了。

1929年中国方面撤换中东铁路苏籍局长、副局长，驱逐苏籍员工，以武力接收中东铁路。吕在这个高潮里是积极策动分子，充当了反动派的马前卒。10月，东北军向绥芬河、满洲里进攻，经苏军反击，第十五旅长梁忠甲被俘，第十七旅长韩光第阵亡，全军覆灭，一败涂地。事后中俄事件谈判开始，吕因此被撤去督办职务。吕事后曾谈：我为防止“赤化”，争回路权，致有此事件的发生，岂知军令不能统一，有人坐观不前（按指吉军和驻哈部队），以致功败垂成，不胜遗憾之至云云。

伪满时代的傀儡升沉情况

吕被撤职后，以沈阳三经路陶厂长旧宅作寓所，待机再起。当时与张景惠（旧军阀、伪满国务总理大臣）过往甚密。经张介绍结识当时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日本甲级战犯、大间谍，为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积极策划划者）。吕为向日方献媚，对土肥原时有往还，多方拉拢。某次赠给土肥原名马两匹，深得“国际友人”的嘉许，认为是“孺子可教”，他日定有“重任”。吕不禁受宠若惊，恭候驱乘之日。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土肥原组织傀儡政权，大显身手，乃任吕为伪哈尔滨市市长。由于吕效忠日本侵略者，甘心为虎作伥，在伪满十几年中由伪市长而提升为伪滨江省长，速升伪民生部大臣，转任伪产业部大臣，最后直至特任为伪满驻“华”（汪精卫傀儡政府）“特命全权大使”。吕一经爬上岗位，同张景惠转眼成仇，极力排张，意欲取伪国务总理大臣而代之。但以日本殖民统治者袒张而抑吕，故张之伪总理宝座始终蝉联，而吕则只好抱恨终天了。

1944年吕在驻“华”大使任内，因故招致日本不满，调回后命令退职。日本曾发给退职金25万元。这时吕住长春市朝阳路自宅（为两层西式洋楼），日伪派有警察常

川驻在公馆保护，实际是监视其行动，他已丝毫不得自由了①。

贪婪和糜烂的生活

吕为出名的理财家，在中东铁路任职仅仅几年时间，以一个素无盖戴的穷措大，竟一变为脑满肠肥的百万富翁（其实何止百万），治得家成业就，可谓手段非凡。据我所知，其不动产仅在黑龙江省的计有：哈尔滨市炮队街洋楼数座，马家沟市房若干处，另外置有肥沃土地：讷河县有500多垧，朱家坎有1000多垧，富锦县500多垧，北安县500多垧，合计2500多垧（每垧合10亩计有2.5万多亩）。其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古玩、洋马等还不在内。

随着财势的增长，其荒淫糜烂的生活，也必然与之成为正比。吕的大太太为白氏，系原配夫人。二太太为陈氏，是沈阳市说大鼓书的旧艺人，系律师时代所纳的如意夫人。三太太为李多文，是个旧知识分子（李父为哈市某粮厂资本家），系督办时代的夫人。其中当然以三太太最为得宠，人们戏呼谓“三娘教子”。

吕一向嗜赌，“竹战”几成日课。又多年吸食鸦片（在伪满后才戒除），每天需烟泡百个之多。其太太和妻妾中的父母兄妹等，也多半是瘾君子，均由吕供之。群居终日，无所事事，朝夕间短榻横陈，过着喷云吐雾的生活。

铺张浪费、竞当豪华为吕的又一习性。仅在长春朝阳路公馆，为修饰电灯就用2000多元，岂仅平民一年之粮。客厅铺以白熊地毯，陈列着珍奇古董，琳琅满目，富丽堂皇。他身着锦绣，食用珍膳，更司空见惯，勿须赘述了。

吕好胡琴，尤嗜京剧。往往在饭后茶余一时兴起，即电召男女票友前来，丝竹齐奏，边饮边唱，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吕爱唱“探阴山”等黑头戏，自诩为洪钟大吕，人莫能及。在此酒绿灯红、金迷纸醉的气氛中，过着腐朽糜烂、荒淫无耻的生活。

吝啬、刻薄和沽名钓誉

吕自奢侈无度，挥金如土，对人则吝啬刻薄，一毛不拔，然而往往矫情饰非，惯弄沽名钓誉的伎俩。

他在抚顺县马郡村有土地二百亩左右，由我代为经营，年可收租粮六七十石。我每年向他报账结算时，锱铢必较，毫不宽假。但十几年来先后有两次拨出粗粮五石（不到一年粗粮十分之一），嘱我代为周济当村贫苦乡里，并曾救济过其同族吕殿伟等人。又曾经应乡绅张鹤龄等多次吁请，先后捐助伪币3000千元，兴建马郡村小学。此皆意在用点微不足道的小恩，博取关心桑梓的美名。

我十几年来经常为吕宅家人包括亲属、随从等治病，都由我给开方配药。除开始为吕的大少爷治病曾给我药费外，以后他嫌我药费昂贵，有烦言，我又不敢开罪权贵，还

① 吕荣寰始终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所重用，调回原因据金名世回忆，主要是张景惠对其不满；“丝毫不得自由”也不是事实。

要有求必应，乃改为只开药方，由其自行买药。这样长期的义务医药顾问，从未接受他任何分厘酬劳。

又按笔者于1935年，在伪抚顺县公署行政科充当科员的时候，因地方遭受水灾，伪县公署曾发起募捐运动。凡籍属抚顺、在外任县长以上职务的，均发去捐启一份，请为代募。其他人事后均将捐款和捐启一并寄回，惟吕毫无音讯。年终结束之际，例应追回捐启归档，方合手续。经再三去信查询，始接吕复函。大意谓，捐启并未收见，但关心桑梓灾情，梦寝难忘，希见告，用慰远怀云云。其实捐启均系挂号发出，按理不会遗失，而吕何竟独异？且当时吕正任伪民生部大臣，为上级主管机关，对地方灾情何竟不闻不问？更主要的是救灾贵乎及时和实惠，今事过境迁，又何劳轸念？其满口官腔，一味诡辩，适足以显示他矫情饰非，欲盖弥彰。

（刘汉宗整理）

孙其昌与熙洽狼狈为奸

曾　有　训*

熙洽的大老婆和辽阳人孙祖昌的老婆是亲姐妹，而孙祖昌又是孙其昌的堂叔兄弟，因此熙洽与孙其昌相处比较亲密些。他俩经常开玩笑，遇事互相帮助，尤其是孙其昌能说善辩，遇事多谋，这是熙洽素所赞许的。因熙洽好色且重赌，孙时常劝他戒赌，并不谈及嫖。据孙其昌的马弁黄永奎说，熙参谋长见着咱厅长就骂着玩，说什么“孙大格子”你真是个好朋友啊，劝赌不劝嫖。孙回答说，寡人有疾，寡人也好色。他俩一笑了之。在平素和年节以及喜丧事时，礼物频繁且极优厚，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孙其昌每天必往熙洽处去，也就是每天要接头的。据黄永奎说，熙、孙在谈话时不准别人在侧，直到把日本拉到吉林之日起，他俩才公开谈话，有时还是不愿外人听闻。在这时就有吉林交涉署外交科长兼任秘书刘燏棻，字馨秋，由日本留学回来，娶得日本女人为室，他既然精通日本语文，又和日本领事馆员们相处甚洽。孙其昌曾经一度任吉林交涉署长，颇得他的帮助。他俩感情甚笃。我记得孙其昌当财政厅长时，给刘燏棻一个调查员名额，每月由财政厅支给他薪俸100元。在这个时候财政厅长公厅要安暖气，派刘燏棻偕同我到长春头道沟关口商店托日本人给买锅炉，刘住妓馆抽大烟以及吃用共花一百数十元，完全由财政厅公款给报销了。在奉天北大营被攻击后，刘燏棻也参加他二人座谈会了。可以说三人同盟会，凡关事变事件，他三人经常相聚研究。据黄永奎说，每天他三人少一个不散。在他们谈话时别人不准听闻。他是听到熙的亲信差弁说长春二道沟也被鬼子给打破啦，稽查处长孙仁轩因当向导也受伤了。鬼子还要打吉林，云云，同时他又听说熙和孙计议为避免冲突，先把吉林军队调到城的四郊待命云云。次日黄永奎回来对我说，今天通过各机关长开会表决，中国军队已经调到城外去了，就等派人去到长春迎接日本军队啦。我给孙其昌当走狗，虽然间断多少次，但经过十几年深知他鸦片之累甚深，疏懒成性，从来不好外出，可是在事变前后，他居然就精勤起来了，无一天不到熙处去。在把日本军队接进城之后，才对建设厅职员们发表事变情况，并说明日本军司令白川大将是熙参谋长的老师，教参谋长当吉林省行政长官，经过各机关长民选，也都欢迎和赞成云云。此后他每天早起晚睡地要到长官公署去。据黄永奎对我说，咱厅长推荐于大头当“剿匪”司令，住榆树县一带进攻佳木斯。同时他又说，咱厅长又推荐吉林税局长翟景儒字伯军到城外收复散在四郊的吉林军队云云。在这个当中刘燏棻就不时到建设厅和孙其昌低言耳语的说话。据孙的听差曾广富和崔崇谦二人说，刘秘书把财政厅荣厅长给吓唬跑了，他向日军保举咱厅长（孙其昌）当吉林省财

---

* 作者曾任伪吉林省财政厅第一科科员等职。

政厅长。咱厅长允许在他接厅长以后，推荐刘秘书当官银钱号的总办云云。相继他两人都达到目的啦。我就随着孙其昌到财政厅，派我为第一科科员，专办庶务事宜。厅长家住在厅内西跨院，我在公厅办事，所以很少与厅长见面，因有科长领导，就无求见之必要。有一次我到他家的前客厅找崔崇谦，我见到孙其昌听电话呢，就听他说你好大胆子，你敢放啦。随后他笑着说，我也是放他走啊，再见。就把耳机放下，回到后室去了。我和曾广富、崔崇谦说方才谁和厅长说电话呢？他俩说于大头"剿匪"打到榆树县啦，把张旅长抓住又放啦，求厅长代向熙长官报告云云。此外关于翟局长到市郊收复军队，听黄永奎说翟局长未办好，仅仅收回几十支坏枪破刀，所有军人军物都被冯占海给带去了。熙长官对他很不满意呢。嗣后咱厅长又推荐他到依兰去说降李杜云云。此后孙其昌携眷到长春和熙洽们组织伪政府迎接溥仪，选完各部部长，孙先推荐熙洽为财政部长，他当次长办理全部权事。在这时就把各省财政厅改为税务监督署。吉林税务监督署长他派启彬，哈尔滨他派袁庆廉，奉天税务监督署长他派张承元字星伯，其余各县驻在的税捐局长多半派他的人接替，我也是其中之一。在伪大同元年8月我到佳木斯当桦川税捐局长后，孙其昌就当黑龙江省长，转到经济部大臣、民政部大臣，最后转到参议府当参议。听说当到参议之后，始终不参加会议，埋头烟雾中，在光复后他到北京去了。

（1964年12月）

孙其昌其人

曾 有 训*

孙其昌，字仲舞，辽阳县人，清光绪元年（1875年）生，1912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物理科毕业。历任辽阳师范校长、奉天师范和商业学校校长、黑龙江省教育厅长、永衡官银号会办、吉长道尹兼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吉林省财政厅长、吉林省建设厅长；伪满黑龙江省省长、伪满财政部次长，伪财政部大臣、伪民生部大臣、伪参议府参议。

任用私人 生财有道

宣统三年（1911年）春，我因生活所迫到辽阳县立师范学校当堂役。第二年正月开学时我去上班，拜见了新任校长孙其昌。见面寒暄过后，他十分热情地对我说："你虽然不是辽阳人，但因是农村人，挺老实、守规矩，所以我在这次人员变动中没辞退你，其余的堂役、斋夫手脚不老实，都换了。你可要好好干啊！别让我失望。"后来我才知道，不仅堂役、斋夫换了，就连几个不是辽阳籍的教员也都被辞掉了，只有我除外。为此，我十分感激他，对他十分忠心。

孙其昌在这个学校只呆了三个月，就通过关系调到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任物理教员。当时该校正闹学潮，经孙其昌从中斡旋而事息。因此，校长莫贵恒认为他很能干，就把他提升为斋务长。当时该校教务长正缺一名听差，他就把我介绍去。1914年春，莫校长升任奉天省教育司使，此时奉天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正闹学潮，校长杨陆宾被学生驱逐，莫贵恒就把孙其昌派到该校任校长。他到任后，首先进行的又是人事变动，把庶务主任和会计主任都换上了他所信任的辽阳人。这时我已经在省立两级师范校长室当听差了。一天，孙其昌给我打电话说："曾有训，我给你找个当雇员的地方，你同意不?"我当即表示愿意。这样，我又到孙其昌的手下当了书记长。次年春天，学生们对孙其昌任人唯亲反映十分强烈，因此他对我说："学生们都说你是我的私人，如不躲一躲，恐怕闹学潮，所以我把你荐到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当书记长。"同时，他把也在该校任书记长的族弟孙锡昌荐到工业学校当书记长。

1919年春天，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改为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孙其昌被派为校长。该校设有教务、斋务、庶务三课，每课设课长一人。他到校后，派其亲信李友松代理庶务课长、商室绪为会计主任，不久又把李友松荐到奉天纺纱厂当庶务主任，把我要到高师代理庶务课长。

---

* 作者曾在伪吉林省财政厅任庶务员。

1921年，孙其昌任吉长道尹兼外交官。8月份，道尹公署庶务员张竹铭死去，这时我在奉天省立第三高级中学当会计，孙其昌给我们校长汪其云来信，希望我到那里补这个遗缺。汪校长因情面难却，就允其所求，于是我很快就到吉长道尹公署上班了。到任后孙其昌对我说："会计李连义是我的妻侄，初出学门，不熟悉会计业务，你虽然担任庶务员，但要帮助他办理会计事务，让他管理现金。"过了几天，李连义把道尹公署、外交署、秘密调查、苗圃等四个单位的账簿拿给我说，道尹让你在这屋编造缮写，把一年的预算搞出来，这里较僻静，以免外人知道。

后来孙其昌转任伪吉林省财政厅厅长，他到任后，总务科长、征榷科长、秘书、监印、译电、收发、票照、会计、庶务等职又都换上他所信任的人了。我仍然办庶务事宜。当时厅里设立公、私两本账，私账记的是孙其昌通过各种名目得来的钱款。例如在"和兴隆"购物和永衡印书局印刷票照都有回扣（回扣金额为交易金额的10%），还有其它一些收入。这段时间，仅庶务方面就给孙其昌积累了二万多元。会计仍由他的妻侄李连义担任，因此可以随便报销，并用公款联合永衡各商套购、捣把、囤存，得款甚巨。

由于他身居要职，向他引贿的人也不少，荒务局总办给他送荒照，其他局的一些局长也都给他送礼。孙其昌在人事安排上也绞尽了脑汁，在些有利可图的位置上都安插上自己的亲信，如派辽阳劝学所所长齐国栋为哈尔滨木石税捐局长、派于冲汉的长子为副局长，派袁金铠的侄子袁庆濂为哈尔滨道外税捐局长，派沈阳高师斋务长刘越青为富锦税捐局长，派沈阳高师会计为长春硝磺总局局长，派奉天甲种工业学校校长梁成柏为五常县税捐局长，派前省议会议员高步孔为乌拉街税捐局长，派莫贵恒为九台税捐局长，魏鉴为桦川税捐局长，汪其云为石城税捐局长。县长和财务局长由他提拔的也不少，这些被他提拔的人，瞻其马首，唯命是从，孙其昌当然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不少好处。

贪污受贿使孙其昌发了横财，因此，在洮南、通辽、辽源、磐石等许多地方开荒买地，并用开埠局的薪金雇了二个人专为他经营土地，收租收账，并在家乡辽阳用巨款盖了两座华丽的住宅。

孙其昌虽然财大，但买东西却总是赊账，只是赊欠有期，归还无期，惹人憎恨。

溜须拍马　声名显赫

孙其昌任省立两级师范校长时，每天不停地东奔西走拉关系，送礼物。给他拉人力车的老邓对我说："咱校长可会来事了，省里的大官都被他拉拢上了。每天到省长公馆玩，厅长以上的文官、旅长以上的武官都是他的朋友。""王省长公馆被焚时，孙校长给送去许多器具。每逢年节或各大官们的诞辰寿日、红白喜事咱校长都前后张罗，并送厚礼。"

由于孙其昌能体察"官意"，因此在孙烈臣督黑时，被提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长，孙烈臣督吉他又任吉林永衡官银号会办、吉长道尹兼交涉员，并很快转任吉林省财政厅长，这是个肥缺，尤其对精于计算的孙其昌来说更是如此。

孙任财政厅长时，很少在厅里办公，所有的公文稿件都由秘书长穆允植负责，其他

各科事务由各科科长负责。他则经常是夜晚到各官邸应酬，有时通宵达旦，而白天在公馆睡觉，晚上接见一次外客及听听有关方面的汇报。

孙其昌奉迎巴结，使他一再升迁，名声渐为显赫。旧社会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孙其昌的父亲本是开小铺出身，这时摆起了太老爷的架子。而孙的二弟则更是有恃无恐，他自己备了一辆双马车，用了两个马弁，每逢他出门都是大呼小叫喊开道，行路人一旦躲闪不及，便非打即骂。当时辽阳城里有三只"虎"，孙其昌的二弟为"二虎"。这三只虎不但令商民畏惧，就是军警也奈何不了他们。因为据说辽阳县的首脑人物大多是三只"虎"的后台们提拔的。因此，他们可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甚至乡村谁想卖地，也得先问问他们，只有他们不要才敢另找受主。

认贼作父　甘当汉奸

九一八事变那年春天，我经常看到孙其昌往东市场张卦馆跑，和张先生谈他的"八字"。听孙其昌的马弁老黄说：张先生说咱厅长要当宰相了。当时孙其昌任建设厅长，建设厅的路南住着一户日本人，孙其昌常去他那里交谈。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触的次数更多了。

这期间，省公署经常召开会议，孙其昌开会回来，从不对厅里职员讲什么。我暗中询问老黄，他说：厅长和熙洽等开会，为的是不抵抗，避免和日军冲突。熙洽令各部队都开到城外听候调遣。后来又听黄说：他们开会研究好了，派人到长春迎接日本军来吉林。

为了保护孙其昌，我搬到厅里住，并在厅的西侧菜园内挖了一个地窖，准备给他避难。可孙其昌倒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每天开会回来仍是面带喜色。有一天，我听说日本军已经从长春上火车了，就对他说："地窖已安排好了，请厅长去避一避。"但当时他很生气地斥责我说："我不去，你去吧！何苦的大惊小怪的呢，谁好谁坏日本军都知道。"话是这么说，可我总不放心，所以暗中找了一个会日语的姓娄的，以便应急。

这天晚7、8点钟，厅里当差的回来说：车站上人可多了，日本军队都开到九棵树这个道口了，由咱厅门前经过的。当时我慌了神，立即跑到内宅去报告，他的佣人报告后出来说："厅长和太太抽大烟呢。他们知道了。"事已至此，他们还这样安逸，我急得不知所措，但又无可奈何。当晚9点钟左右，数十个日本兵从大门冲进院，我和娄翻译迎上去，日本兵问这是什么地方，娄说是建设厅，厅长在里院住。日本兵回答说：我们是保护厅长来了。便径直往里走，直到看见门已上锁，才到大门旁边的厨房住下。次日早，孙其昌又出去了，中午回来时，各科科长都去打探消息，但他只说去开会，别的什么也没讲。老黄告诉我："熙洽参谋长说，日军大将白川是他的老师，叫他当吉林省长官，今天开会取得大家认可，这就代表民意了，就算市民推选的。"打这以后，孙其昌经常围着熙洽转，又过几天委任发表了，孙其昌任财政政厅长。当天晚上，交涉署外交科秘书刘燏棻来找孙其昌，他俩在谈话中露出：刘在日本人面前保荐孙其昌当了财政厅长，孙让刘当永衡官银钱号总办。

孙到财政厅后，日本宪兵队的队长、伍长常到他内宅。有一天我去内宅清理物品，

见到宪兵从他屋里出来，就问他的佣人，这些日本兵来干什么？佣人说："这些鬼子尽早、晚来和厅长唠。"我问谈什么？她说："不准我们进里屋，谈啥我也不知道。"

不久听到消息，说宣统已经接到长春，又当上皇上了（其实当时是执政）。国号是"大满洲帝国"，年号"大同"，"定都"长春。这时孙其昌往来吉、长不停，孙的贴身听差曾广富对我说："厅长当财政部次长，熙洽是总长兼吉林省长。让熙洽担名，他办事，实际他说了就算，他还兼吉林省财政厅长，这是个发财的门道。"

不久，孙其昌又任伪黑龙江省省长，此时我已被孙派为伪桦川税捐局长。一天，我收到孙其昌的来信，让我给他买鸦片，我用税捐局的经费给他买了一百两烟土，四个大猞猁皮，一百张灰鼠皮。

后来孙由黑龙江转任伪满洲国财政部大臣、伪民生部大臣、伪参议府参议等职。光复后的第二年正月，我在长春遇到了他的长子孙孝思，他对我说，他的父亲在西四道街潘雨青家隐居呢。此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了。

丁士源琐记

赵朴谦*

1933年5月间，国民党政府为缓和华北外交的紧张局势，特设北平政务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黄郛派遣代表赴日与有关方面接洽，并拟在东京中华青年会的讲堂报告华北的形势。那天听报告的人很多，我也参加了。三十余年不曾回国的闽、苏、浙、蜀等省的老先生们也出席了。但是时间到了，而报告人不到，于是大家左一群、右一伙地闲谈起来了，谈前几天到达东京的伪满洲国首任驻日“公使”丁士源的趣闻，最为起劲。

有的说，廖化作先锋，可见西蜀无人了。有的说，他是十全的、典型的破烂货，还露面在外交的场面上，叫各国的大公使一看，还能够承认“满洲国”吗？有的说，他比吾闽的郑孝胥还恶劣。立即有人作反驳的论调说：你所比的不伦不类，郑是无用的废物，徒餔啜也。丁是有毒的烈菌，伤害万物。

最后有位年过六旬的人作了归纳的谈话，说是丁士源有三多：

第一是爸爸多。他在清季末叶，亲贵当国的时候，夤缘贿赂，拜了肃亲王耆善为干爸爸；民国以后，段祺瑞执政炙手可热的时候，他拜了段祺瑞为干爸爸。因此，人都以三姓家奴称之。

第二是绰号多。他年轻的时候在乡里拜了刀笔师爷的门，学了些架讼，用辩乱是非、颠倒黑白的伎俩，图财害命、拆散婚姻等类的缺德事件做了不少，那时候人都叫他为“贴骨丁”。他跑了一趟英国，时间虽然不长，却娶了一个外国女人，回国后生了个男孩。他在北京欺骗那些未去过外国的人们，每天带着洋妇，说她是某爵士的小姐、某大臣的亲戚，通过她可走亲英的路线，经营中国的西北以制强俄，他还真就把京绥铁路局长骗到了手。他伴同着洋妇，携着洋孩子，穿着洋服，说着洋话，各处乱窜炫耀夸示；不过最为遗憾的是，他发不黄、肤不白，他的眼珠不蓝，所以人们称他为“假洋丁”。他是无赖出身，一旦钞票在手，寻洋花、问土柳，沾染上了华洋俱全的花柳剧毒。很早地脱了发，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不少的疤痕，因是人们又称他为“百毒丁”。他也逃不出生物的自然规律，五旬以后机能减退了，梅毒入骨了，两条腿不听他使唤，行动起来须架双拐，“双拐丁”的绰号又喧腾人口了。

第三是坏水多。他看段祺瑞左右，就是徐树铮有势力，他借着段所直辖的边防军和西北筹边使徐树铮所领的西北军的问题，离间了段徐之间的感情。后来使徐树铮转了锋芒，北折入了外蒙的库伦。丁趁势提出来经营西北的计划，接着东绥铁路向西，设车

---

* 作者曾在伪满洲国负责办理留日学生事务。

站、通汽车、招工修路、募队护车，直达新疆。无西北军的掣肘，分权、分肥，他从中独自捞了一大把。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在段的左右说话有力量，还不时地揭露丁的丑恶行为，丁心恨之；遂向段祺瑞进言，东北林矿之富甲天下，日人知之而国人不知，殊为可惜。莫若急派宏业弟亲往经营，可富埒国家，传之万代。段信之，立派段宏业在中东路东部线的一面坡地方，设立段记林矿公司办事处。以干父子离间了亲父子，可说是尽了“坏水”的能事。此外飞短流长，陷人利己的事情，属于家常便饭，不在话下了。

但是丁士源有一种特长，所得来的赃物，谁有权势，就往谁家门口送，并且遍贿其左右。尽管天下人切齿，安福系人切齿，而段祺瑞却认为他是称心如意的“干殿下”。

我讲道，只见过丁士源的两次面，他不会记忆了。有人插言，他果真把谁忘记了，就是谁的造化！

我接着讲，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1918年，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里，名器冒滥，他也带着中将的肩章，挂着参战督办处参议的头衔，以福建省产的旗枪牌茶砖来奉命犒军（吉、黑护路军），并犒驻从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起，东到海参崴的美、英、法、日等外国的军队；和驻双城子的魏宗瀚中央第九师、驻海参崴海军部直辖的林代将所率的海军舰队。第二次见面是1928年，他随中华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来到东北，就在我们现在谈话的这个讲堂里，马报告国内形势后，丁士源也走上了讲坛，自鸣得意地介绍了他身旁站立的西洋女人，说“这是丁太太”。她到中国很久了，不会说中国话，但是很关心中国事，例如她看见了中俄合办的中东路沿线车站的站牌名称，就感觉奇怪，为什么不用中国地名？而仅用俄语译名？即可证实了关心的一斑。接着又走上去一个西洋人像貌、说中国话的青年男子，作了自我介绍是“丁太太的儿子，是开滦煤矿的工程师，希望留学生多学工矿，促进中国富强”……云云。我说完了，大家笑着说真是一幕怪剧。

这日的报告会，变成了大家以丁士源为话题的座谈会。夕阳西下时，青年会干事说，报告人临时遇见了重要事件，不能抽身前来，报告只可延期了于是大家散去。

我等待丁士源投递国书，办完了手续后，即访伪满公使馆，看看它的班底。见着了参事官原武（伪吉林省公署总务厅长）、武官曹秉森（伪陆军少将），最后会见了丁士源。他六十余岁了，而且枯槁地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故作笑容露出牙齿来，握了手说，你办理留日学生事务很辛苦，学生的思想情况如何？对此问题，稍停几天彼此须商谈一下。

5月末，我接到他的请柬，宴于东京会馆。外客散后，他留我在客所吃茶。闲谈起来，他问，电保鲍代表升公使的时候，知道不知道驻日公使已内定了我？我答不知。他接着说，这还不是迎鲍而拒我。但是，电文漏叙了一层，不知是哪位的大手笔？我说，电稿是我集合众意草创的。他着重地说，应该添上“驻在国非公式的表示同意”几个字，就成功了。说罢，哈哈大笑。最后他说，我摆弄公牍文字38年了，抽出时间大家来研究一下。

过了很久，有一个雨天里，他亲挂电话，邀我即到。我到使馆，他说，我们谈谈天，请你把留学生在这里分类一下，例如文科、理科、医科、法科等类，我想分科分类地、一批一批地和他们谈谈。

过了一个月后，他谈完了。据留学生的总结，他的谈话是在38年中，用文字为武器不知道杀过了多少人，做为示威的表示。此后人们又赠给他一个绰号“三八式”。另一面丁士源对我谈，留学生思想不一致，须做一个思想调查表，每人一张，由他们自己填家乡居住、年龄性别、学校学科、官费自费，你填成绩如何？思想如何？我填复核如何？加具考语。我日长无事，藉此消遣一下吧！我漫应了而未照办。

他带来个南菜厨师，不断地在使馆做菜宴客，我作为食客已不记次数了。一日席间遇川岛芳子，国服长衫，谈吐风生，呼丁为大哥，善于劝酒。又一日席间遇板垣征四郎，丁谈金融、货币，泛论英镑、美元，归结到伪满中央银行的业务上，大有染指之势。板垣说，你可以向“满洲国”建议，也可以向日本大藏省交换意见。丁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板垣笑而不答。后来丁调为伪满中央银行的监事。他百骸不全，只剩一条舌头，还起了最后的钻营作用。可见他全体中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都证实了中华青年会群众座谈中所指出的特征。

从伪使馆参事官等的谈话中，得知他或每隔多日不见一面，或每见面坐数小时不发一言，忽而疾首蹙额，忽而喜笑颜开，装疯卖傻，使人莫测其浅深。遇事听其任意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日系、“满系”，不加辩解，也不过问。在一个无拘无束的环境中，表演他“三八式”入墓前的伎俩。与他合作共事的人，共同的给他预拟了一个谥号——“疯子”。

伪满十七名大臣高官琐闻

杨 冰 石

1. 于冲汉（伪监察院院长）。清末在日本的外国语学校当教中国话的先生，很得日本人的信任。日俄战时，日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把他编为日军总司令部部员，[①]不离左右，辽阳会战于起了间谍的作用，日军获胜后，赠给过他奖章。后来于担任过奉天官银行总办和交涉署长，就在这个时候[②]，把钢都鞍山许给日本开发了。历史上的渊源如此深远，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和阴谋团就请他出山，担任准备东北脱离中国的过渡组织——伪自治指导部的领导。伪满建国后，为了酬庸就把其抬到高与伪总理相等的地位——伪监察院院长。他的儿子于静远（伪民生部大臣）从奔走指导部后而入了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当了部长，从协和会转伪满驻日使馆参事官，经过不久时间，当了伪大臣[③]。人只见到子因父贵、竖子登台，而不知奖一勤百，正是日本侵略者阴险心计所在。

2. 郑孝胥（伪国务总理大臣）。他是清末进士，因是科甲出身[④]，而认识了张之洞，曾一度在湖广总督衙门为入幕之宾。他是福建人，侨闽日人很多，而闽人侨日者也不少，因此他以熟悉日情见称于时，曾于清末作了一次神户领事[⑤]，后得同乡同年的援引，曾受办理广西龙州事务之命，所以为他吹捧的人以“郑龙州”呼之，但不久卸任，在上海赁屋一角命名为海藏楼，自称为海藏居士。抱膝苦吟，吟不出柴米来，为商务印书馆题写书签以维生活。诗吟多了，出刊《海藏楼诗集》。后依溥仪患难相从，陪伴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从使馆到天津日租界，从日租界到旅大，从旅大到新京（长春），随龙东西，遂当上了伪总理大臣。他以八股文章来对付八纮主义，双方感觉着格格不入。为了宣传他的王道主义，他创办了“王道书院”，招收生徒，分班教授“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的理论，三年毕业，等于大学程度。另外利用暑假设立夏期王道

---

①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正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任教习的于冲汉，随日军回到东北，在日本“满洲军”司令部任部附，担当翻译及汉文文牍工作。

② 即1917年2月23日，日本“满铁”获北洋政府批准的鞍山采矿许可证。

③ 1932年7月25日伪协和会成立，于静远任中央事务局总务处长。1933年11月派驻日本任伪满驻日公使馆首席参事官，1935年一度代理为公使。1937年4月回东北专任“协和会”中央本部长，1938年2月任伪新京特别市市长，1940年6月任伪产业部大臣，同年8月继任伪兴农部大臣，1942年调任伪民生部大臣，1944年又任伪经济部大臣。

④ 郑孝胥并非清末进士，而是21岁时在福建乡试中考取第一名（解元），其父郑仲濂是进士出身。

⑤ 1891年，郑孝胥曾任清政府驻东京领事，驻神户、大阪总领事等职。

大学，收容中学教师，推广王道主义。他为固位计，采取了两条路线：（一）请溥仪的二妹妹（二格格）配了他的长孙（伪外交部科长）①，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二）安置他大儿子郑垂为伪国务院简任秘书（等于秘书长），安置他二儿子郑禹为伪国都建设局长，又招来他的叶姓门婿父子三人，他的姑表陈姓叔侄十人和有瓜葛的闽人，都给要职，结成了闽系宗派路线。他一生寒苦，晚年枯树逢春，认为时不可失，除去长春市柳条路自建巍巍洋式住宅外，复在平阳街建筑了八栋二层的红砖楼。他的政治理论和固位路线，触怒了日本统治者。当时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因事借端，把郑垂打骂了一顿，郑垂因愤成病而死②。过了两年多，郑孝胥也被迫离位，给以伪总理大臣前官的礼遇，索居闲处，忿懑不平，又经年余也死了。但是郑禹是能承父志的好儿子，从伪国都建设局局长而恩赏局长，而邮政总局长（都是优缺）。他为实现第一次北款南调的计划，于1942年11月谋得了驻泰国公使的位置。到1945年夏期，眼看着战局对日本不利，以归国汇款为名，出两万元运动费，把八栋红楼卖给伪禁烟协会得价款数十万元，为时不到十天，把价款汇东京，转香港，带同眷属归任（曼谷），实现了第二次北款南调的计划，可称之为脑活手快。

3. 张景惠（伪国务总理大臣）。他本是东北马贼转化为军阀中的长老之一，人们对他都不陌生。九一八事变的当时，他在哈尔滨任东省特别区长官，事变后板垣征四郎大佐和关东军的智囊驹井德三乘飞机到吉林说服熙洽毕，立飞哈埠，会见他要求发出独立宣言③，他就立时组织了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并对板垣等表示以说服马占山作为独立的献礼，板垣等大喜而归。后来他参加了翌年2月16日的四巨头（另外有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三人）在奉天举行的“建国会议”，他又被举为东三省政务委员的委员长，这俨然是未来的伪国务总理候补者。伪满建国揭晓后，伪总理大臣一席，为郑孝胥所攫取，他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伪北满特别区长官，后来形势演变，他继马占山之后而任伪军政部大臣，又继郑孝胥之后而任伪国务总理大臣，直到伪满垮台。

郑孝胥有一套迂腐的王道理论，他却是一块没字碑，十年伪宰相得力却在此处。给他向日方办事的人是松本秘书，会说中国话。据松本说，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都说他听话，可大用。尽管关东州系的大臣和奉天省系的大臣怎么样的红，谁也挤不掉他的位置。又据他的满文（中文）秘书说，每把公文送到他的面前，打算给他说明案由时，他就摆手止之，并说凡事都是军（关东军）叫办的，我是军人出身，以服从为天职，都盖上我的名戳拿回去吧。他的为人虽属庸愚粗鲁，根据他一系列的事实，张作霖时期不容杜立山、冯麟阁，他能安全下去；张学良万不得已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他也能安全下去；关东军时期不容郑孝胥，他又能持续下去，足证他的世故阅历也很深了。伪满设有将军府（元帅府），府中只有三个将军，他和张海鹏、于芷山。他年轻的时候

① 名郑广渊（郑广元）。

② 郑孝胥与驹井德三冲突是史实，而“打骂一顿”无史料记载。另外郑垂1933年2月患猩红热病殁。

③ 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正在沈阳，第二天，板垣征四郎率新井与之密谈，并将他送回哈尔滨。

扛着豆腐盘子窜胡同卖过豆腐，晚年时他不掩盖地说：人老了，军礼服的肩章压在肩上比豆腐盘子还要沉重。言罢自鸣得意，人们遂称他为豆腐盘子将军。从一般的观点去看，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从他的观点去看，一般人也不过是一帮跑龙套的蝗螂子。他或者已与世长辞了，他是一个到死也不能觉悟的家伙①。

4. 张海鹏（伪侍从武官长）。土匪出身，几十年间剥削和掠夺的积累，达数百万元，对社会公益事业和亲友求帮助，向来是一毛不拔，惟迷信宗教，对“道院”与“红卍字会”是不惜倾破脏囊的。院会的人们敲他的钱方法是：“扶乩请仙佛”降坛，振笔疾书说他是“张飞的转身”，每当关羽临坛，常以“三弟呼之”，张喜不自胜。“新京红卍字会”（吉林大学东邻，做了长春市图书馆，现为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分行）规模最大，当建筑时都是信徒们布施之款，张出款最多，“乩盘”笔动，写出几万元或十几万元，令张布施，张是奉命惟谨，从来就没有驳回过。该会以打坐为主，因他们的信徒不认识字，或是认识字不多，就以念“道德真经”为事。张的西朝阳路住宅，也设有“座坛”，每晨他必从家走到红卍字会，行虔敬礼，礼毕，徒步还家进行“打坐”，虽在隆冬，往返光头，冻得光头通红，该会执事还赞他为“元气透顶，满面红光”。光复时，他又在该会“扶乩”请老祖、关公“降坛”，磕头如捣蒜地请问“前途休咎”，不料“乩坛”上忽现出“就义”两字。他立刻勃然大怒，踢倒乩坛后返回家，撕了老祖的像，踢翻了坐功方凳，夹着尾巴如丧家的狗般逃亡了。后来听说他在北京被镇压了。如果用他本人的迷信观点来讲，可算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

5. 于芷山（伪军政部大臣）。土匪出身，积攒的造孽钱很不少，他有一贯的主意，就是对于贫苦的人民，加以仇视，丝毫也不同情。跟着他鬼混吃饭的幕僚，都知道他这个脾气，谁也不敢劝他。他在路上散步时，遇见花子乞丐向他讨钱，他必回答说“腰中没带钱，可到我家去取，可以多给点。”并指出某街某号，乞丐照他指示地方去找，都不是于家，而是某特务家，或某抓劳工的头目家，这个乞丐的遭遇，不是挨一顿臭骂痛打，就是被抓做劳工，运往寒苦的边疆地方去了。因此，乞丐讨饭讨钱讨到他家的时候，都是由他家当差的人悄悄地自掏腰包给打发走了，偶而他送客看见了这种情形，必对这个掏腰包的当差人拳脚加交，泼口大骂，说“破坏了他家的规矩”。但是于芷山果然是个爱财如命、分文不舍的人吗？不是的，他同张海鹏是“一丘之貉”，红卍字会的捐款，一而再、再而三，听说是达到十几万元，还捐出一个“守真”的道号来，罪大恶极却妄想用“真”来“守”着他的身体。

6. 于琛澄。东北人都称日本侵略者为“小鬼子”，器量小而残暴，逆着它立得惨祸，顺着它也不保险。就像于琛澄（伪军政部大臣）的死是由于他去职的郁愤，而去职的原因，是由于他想讨日本人的欢心。有一次在日“满”军政大宴会上，兴高采烈地直到夜半，都带着醉意化装跳舞，于想起日本人以从军为荣，每当新兵入营的时候亲友都送行，并以竹竿挑着上写“御入营光荣入营”的长幅白布，于是就把白色苫单折

① 张景惠于1950年7月21日由苏联押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因其年迈多病，受到优厚人道待遇。对此，张景惠深受感动，由人代笔，完成“笔供自述”。1959年5月5日，因心脏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成了一个白高帽戴上了，手拿着别人的手杖挑着一条长幅的蒙桌白布，在场跳跃，乱叫乱号。日本军官认为戴孝帽子，又打着领魂幡，大不吉利，勃然大怒，骂了几声“混蛋”恨恨而去，会说日语的大臣，也没有给他解释和缓颊，因此下台了。因给日本人“上顺”而垮了自己的台，也感觉到势孤，遂因病而死了。伪满的大臣，受过“皇化”的大臣最红（如关东州的阎传绂、谷次亨、韩云阶、卢元善等四大臣），其次辽阳的四大臣（袁金铠、孙其昌、于静远、韦焕章）也“得烟抽”，此外奉天省籍的大臣熙洽、臧式毅、阮振铎、丁鉴修、于芷山、张焕相，李绍庚、邢士廉、冯涵清、张景惠、吕荣寰等也得些互相照应。惟独蒙古族的大臣仅有齐默特色木丕勒一个人，吉林省籍的大臣仅有蔡运升、于琛澄两个人，关里籍的大臣河北省的张燕卿、福建省的郑孝胥，出于台湾的谢介石那时候是日本籍不算在数，所以他们感到势孤，其实一骨坠地，群犬争之，又有什么分别呢？

7. 韩云阶（伪经济部大臣）。是“满铁”培养的日本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的，毕业后由“满铁”资助，在哈尔滨等处从事商业，所以一般人都以商人目之。当伪满建国之初因说服马占山的功劳作了黑龙江省省长，但不久就垮台了。垮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齐齐哈尔市长金某，是走熙洽门路的，他卖一张赌局票，就得贿一万元，韩令省公署秘书长杨某去查，杨早有心作市长，就夸大地反映了金某受贿的情形。金听了着急，向熙洽求救，熙复电说，不要理他，但是电到时已被韩免职，杨某坐上市长的椅子，熙听着怒找关东军将韩搞垮。韩离省后有一次日本驻军司令官宴市长杨某和军区司令官张某（韩提拔的人）时说，韩离职实实可惜，杨和张都回答说应该，商人不可搞行政，日本人听后起身，走人别室，席未终而主人不见了；韩的身手毕竟不弱，而且韩的手头也宽绰，拐弯抹角，几经曲折，又坐上伪大臣的椅子了，还当了一次“访欧使节团”的“团长”，会见了法西斯的头子，当时的空气有代替张景惠作伪国务总理的声势。以后因另一种势力的膨胀，又把他挤下台去，当了电业公司理事长，还他商人的本来面目了。他在新京（长春）二道河子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中央国民高等学校——收容学生千余人，这又是他野心未死的象征。

8. 吕荣寰（伪民政部大臣）。他在建立伪满时无赫赫的功劳，所以没有当上第一批伪大臣，也不是当时话题中的中心人物。但是他巴结权势者的确有一套功夫，还有一个由大多数海城人组织起来的小集团，作他经济的基地和靠近辽阳系的桥梁。他本是律师出身而团团地像个大肚皮的商人，每当国际和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时，他都是买空卖空地想从中捞一把。当 1924 年 5 月 31 日苏联代表加拉罕和顾维钧在北京签订中俄协定解决中东路的问题时，他就大鼓律师之舌，论得论失的。不久北京政变，东三省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张作霖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名义掌握东三省的政权，苏联眼看中俄协定无法执行，终于和张作霖缔结了中俄协定，张作霖派郑谦作首席代表，第二名就选上吕荣寰了，以后因郑是江苏人怕冷不愿意去哈尔滨，吕就补了中东路理事会的理事，且代理事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求财揽权办事操切，遂激成了 1929 年中苏断绝国交，干戈相见的历史事件。伪满时他复用故智想坐张景惠的椅子（伪总理大臣），他的秘书官原田（日人）给他各处串通拉拢，他本人常宴伪民政部的职员（办事员以上全请），联络感情制造人望，不料想遇见了一个共同逐鹿的韩云阶，勾心斗角的结果，韩回到商人的

队里去，吕也外调为驻汪伪政权“大使”了。

9. 谷次亨（伪民生部大臣）。生于关东州，正是一块在伪满时期飞黄腾达的土壤，从一个科长出发升了一个小省的厅长，从厅长升了第一任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从次长一跃而升为伪大臣，在伪满的升官者中没有比他再快的，所以一般人称他为神行太保[①]。他的腰包比较空些，但是钻营的心计比较妙些，他是看得准，钻得稳，一发一中，再发再中，人不注意间；他都玩弄了些手法，到人注意时，他已经成了一局了。他学过教育，他很重视教育，得了地盘后，他就在教育上结了一个大网。在他的部里，用和他同土壤、同行道的以王某为首的核心爪牙，先从各市的教育行政入手，建立他的地方爪牙网，在伪满的21个城市（哈尔滨、奉天、齐齐哈尔、吉林、牡丹江、锦州、佳木斯、安东、抚顺、营口、四平、鞍山、辽阳、铁岭、本溪湖、安东、海拉尔、满洲里、通化、公主岭）中，到伪满垮台时，南满业已结成清一色网，再假以时日，北满和边疆地区也就归于一统了，这一手是韩云阶、吕荣寰等梦想不到的。他自己说，肺部有病，不能多讲话，结网的活动，他本人总是藏头缩尾的，王某紧握着网为他效命。

10. 孙其昌（伪民生部大臣）。他久宦吉林，在旧政权张作霖父子统治东三省时代，吉林省有三个肥缺——吉林财政厅长、吉林道尹、滨江道尹（这两个道尹都兼特派交涉员），他和蔡运升、荣厚三个人像打麻雀轮庄般地轮流着做，因而宦囊充满，超过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数目，成了辽阳四大地主之一。辽阳的土地比它的邻县价高，就是袁、于、孙、韦辽阳籍的四伪大臣先后争买，给高抬起来的。伪满时他又用游资购买了很多甲种地号，在现在的长春市五百附近的冲要通衢间盖了些多层的新式楼房，梦想像上海和广州大坝寸土寸金的时期来到，就真的五世其昌了。这是他经济方面的如意账。至于政治方面，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吉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本有当伪大臣的资格，又以熙洽为靠山，更有实现的可能。谁知道僧多粥少，限于分配，竟名落他的宗兄“孙山”之外了，孙的情绪是懊丧欲绝，熙也觉得对不起他。熙却以“建国之勋”，博得两个特任官头衔——伪吉林省长、财政部总长（当时仅奉、吉、黑、热四省省长是特任）。于无可如何中，把孙安置在伪财政部当次长，作个路傍歇脚石，后来熙拆了韩云阶黑龙江伪省长的台，才把孙继其后任，抬上特任的椅子，从伪省长到伪大臣，孙毕竟如愿以偿了。

11. 蔡运升（伪经济部大臣）。他从清末就在黑龙江省巡抚衙门当参事，当时的巡抚是程德全，后来程调任江苏巡抚，又把他带往江苏。入民国后，历任道尹、厅长。所以蔡的官僚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每当时局转变，他都是左顾右盼地观看风向。伪满时期，起初他是骑着墙看，看得眼热了，他才甘心小就了伪间岛省长，从省长而伪中央银行副总裁，从副总裁而伪外务局长官，从外务局长官而伪大臣，虽然加入了这个滑稽剧团是比较在后，却是后来居上了。他是搞官来作的能手，也是搞钱入囊的能手。他凭借着掌握金融管理经济的地位，常常地向私立银行出据借钱，一张借据起码是一万元，到

---

① 1936年冬，日本殖民者制造“安东教育事件”后，谷次亨受到特别推荐，由伪民政部警务司保安科长，出任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处理善后而得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赏识，很快调任伪总务厅次长。

期换券另立新券，川流不息，只流入而不流出。他还傲然自负地对他关系较深的人说，人只愁没有脑筋，不用愁没有钱花。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也久成了个小问题，据一般的人说，他是双城县的旧吉林省人，但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证据，他的兄弟蔡运辰、蔡运衡都是辽宁省凤城县人，那么蔡运升想是客籍双城年久，人们就以客籍当作他的原籍，也在情理之中，最后下个结论，算作一个准吉林人吧。

12. 张燕卿（伪外交部大臣）。他是清末探花、大官僚张之洞的小儿子，到吉林入了张作相的军幕，作秘书，虽然常常摆弄着巾箱本的宋版诗集装斯文，实质上是一个性情轻佻的纨绔子弟，招猫斗狗，寻花问柳，是他的日常生活。伪满洲国成立时，他最初是伪实业部总长，帝制后，改为伪外交部大臣。有人会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不良少年提到外交场面上来呢？答案很简单，是用作幌子，以广招徕。日本侵略东北，它的目的远不止限于东北，河北省毗连东北，张燕卿是河北省南皮县的望族，用活的宣传物，胜过死的宣传文，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个为人所卑弃的浪子燕卿，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张燕卿果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做了一件大事，就是依照伪满"协和会"的蓝本，在华北建立起伪新民会来，并以曾经现身外交舞台的自己，当了伪新民会会长，对日本统治华北起了很大作用。

13. 阮振铎（伪文教部大臣）。人们都称他为金井牌的大臣。金井是指日本人金井章次，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社员，又是制造"满蒙独立"和"民族协和"阴谋集团的团头。阮是医生，金井也是医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俩结成了业同道合的深交①。九一八事变后，为伪满建国过渡桥梁的伪自治指导部在奉天出现了，金井为该部核心指导者之一，遂把阮吸收进去了。伪满的招牌挂出来，阮就弃医而当上了伪国都建设局长，随后郑孝胥辞了伪文教部大臣兼职，金井就把阮从楼下抬到楼上，继郑的后任（当时一栋楼房，伪文教部在楼上，伪国都建设局在楼下，即现在的人民广场的长春市委）。金井创办了伪协和会，又当了北满繁冲地带的伪滨江省总务厅长（就是后来的省次长），复从他起，打破了满正、日副的向例，当上了间岛省的伪省长。日帝在华北获得特殊的地位后，又用金井为开路的先锋从伪满蒙疆自治政府、察南政府、晋北政府等的最高政府顾问，到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政治顾问，成了名牌子货。而张口金井，闭口金井的阮振铎，挂上这个牌子，也就从伪文教部大臣而驻日大使，从伪驻日大使而转任伪交通部大臣、伪经济部大臣、伪外交部大臣，应该垮台，而却没有垮，一帆风顺地渡到孽海的深处去了。

14. 李绍庚（伪交通部大臣）。他出身于哈尔滨俄文商业学校，因娴俄语，就在哈尔滨扎根了。自苏联十月革命起，到北铁买收止，中东路问题成为国际纠纷问题之一，需要翻译，他就混入中东路的结构中去了。伪满成立，他又爬到中东路结构的上层，因勾搭上了日本驻哈领事大桥忠一，寅缘辗转地坐上了伪大臣的椅子，后出为伪驻汪伪政权"大使"。"九三"胜利，他怀念着剥削投机来的巨产（哈尔滨、长春，层楼连栋），想回东北而交通梗阻，其时蒋政权正在还都的时际，他见了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请假

① 1928年，任奉天公立医院院长的袁振铎因通辽一带发生鼠疫，前去办理防疫，结识"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金井章次。

飞机一架送到青岛或其它可以联航的地点，该部伪应其请，令他速集同伴，携带细软，翌晨抵到，即时起飞，李欢然照办。翌晨赴该部，只见武装卫士数人，按单点名，伪简任以上者，当场都被捆绑起来，伪荐任以下者挥之使去。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据逃回东北的一个科员身份的人说，大概凶多吉少。

15. 丁鉴修（伪满交通部大臣）。性喜渔色，妻妾五人外还勾搭貌美的女职员、安置为“大臣”的秘书，另外还不时地带“野鸡”在旅馆开房间，恣意淫欲。有一天在长春头道沟亚洲旅馆某号房间内正在云雨的时候，忽然听见了砰砰的敲门声，忽着衣裤还未穿好，门已从外面钥入锁孔突然敞开，走人身着便服的一个人，拿出“手扣子”将锁手腕，竟把这一双男女带走，丁问“你是什么人”，那人掏出身份证给丁一看，是“日本宪兵队便衣特务”，丁当时窘迫万分，随手把一支带金链的怀表递给那个特务并说：“出来时很忙，没有带别的东西，拿这表作个纪念，改天再补付吧！”不料特务不接表，只催快走，这时旅馆执事人走进房间做了“和事老”，才结束了这一幕风流讹诈。丁在市内秘密地立“小公馆”，他死的时候，“小公馆”的女人告了状，法院把这个案件分到一个马检查官办理，马施展了两面手法，一面对丁的长子说“万万不可叫这个女人进门”，另一面对这个女人说：“你是亡人的妾，小孩是亡人的子女，应该提出平分家产的诉状”，两方都依着马的话办了，“小公馆”的女人分得了一份家产，不久的几天后，这个小公馆换上马公馆的门标了，马一箭双雕，心满意足。

16. 袁金铠（伪满尚书府大臣）。是张作霖手下的文治派首领，与金州派王永江争夺政权时，他又是辽海派的头子，在东北旧政权时代曾作过奉天省长，广置田产，为辽阳四大地主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巴结了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9 月 24 日就成立了“奉天地方自治委员会”，他为“委员长”，到9 月 29 日，改为“奉天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过了不久，与四民“维持会”合流，为奉天省“建国独立政府”的雏形，为“东北独立”的先声。因此，伪满建国后，除他本人是伪特任官外，他的子侄作为简任官的就有七人之多，伪荐任官的更不计其数。他贪心不足，他的老婆贪心更大，常拿着笤帚疙瘩对他边打边骂着说：“你不也是咱辽阳人吗？为啥不睁开眼睛看看辽阳的于家父子?”（注：指的是伪监察院长于冲汉和他的儿子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父子都作了伪特任官）袁怕老婆由来已久，年轻的时候，他老婆有些体已钱，怕袁讨小老婆，就立下打他骂他的基础了。袁很爱念诵“平生喜读游侠传，抵死未闻绮罗香”的诗句（这诗句是杨士骧惧内又蓄美女，但到死未得圆房的断肠绝命句），可以推想出他的情绪。到了晚年他老婆的妒意又化作贪心，还是打他骂他。他下班就到新京的各大银行吃点心开便饭，直等夜静暗里算计老婆睡了，才敢回家。有一次他在新京做寿很多人送了寿礼和寿屏，事后有人问他谁作的寿屏最好？袁答荣疯子（指的是荣孟枚）做的最好，又问怎样好法，袁答搔着痒处（荣撰四六，罗列些惧内的典故），于是有人还赞他是雅量，而他也洋洋自得。

17. 熙洽（伪宫内府大臣）。狡兔有三窟，伪满有权势的人公馆里也有三窟，就是云雾窟（清水鸦片烟喷云吐雾）、赌博窟（麻雀牌九、押宝、扑克，色色俱全）、交易窟（谋位置、求升职、讲盘子、献殷勤）。熙洽的公馆里最热闹，夕阳西下，瘾者赌棍，捷足的、头尖的、腰粗的男人、女人，络绎不绝，门限为穿，万元、几万元，倾刻

净手。荐任或简任几级，片言成交，恶谑狂笑，喧传户外。一夜吉黑榷运署长魏某当庄，他老婆点筹，还在赌博间男女角起口来，输了几万元，熙洽作鲁仲连[①]也没有奏效，荣疯子到了，自告奋勇地说："一句诗可立解纠纷"，遂咏出"何如降了黄巢罢"，大家都不明白，荣作解释道："唐朝高骈为节度使奉命讨黄巢，在军纳宠，其妻忽至，万分急迫，幕僚献策，如投降黄巢，可免妻的责难"。众人大笑，魏的老婆以折扇打荣疯子。这时正因魏讨小老婆而夫妻反目，也正当黄郛在北京得势，有电叫魏去，在打情骂俏中解决了问题。荣疯子自以为荣，逢人辄道（一度载《新京日报》），一团龌龊的气氛，言之令人作呕。

以上记忆所及的，也就是当年众口流传的事情，年久境迁，春易湮灭，现在把它拾起来，可以看出这群伪满大臣高官们的丑形，也可以补史料素材的参考。

（1962年）

① 鲁仲连，战国时期齐国人，为人清高不肯作官，却喜好为人排解纠纷。后世以其名意指排难解纷之人。

九一八事变时伪吉林省公署六人始末

谷 连 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参谋长兼吉林省政府委员熙洽，利用机会附合敌人，掌握了吉林省政权，以原来军、省两署改组变成吉林省长官公署，由于日本侵略当局同意和支持，自任伪吉林省长官。这个伪长官公署机构内容，初步可称“萧规曹随”。未几，很突出地设了个顾问部和招待处。

顾问部有日本人顾问四名，它们事事必“顾”，而所谓长官的发号施令，则件件须“问”，这顾问部的权威，也就不言而喻了！在顾问部有一个中国人型的顾问，面团团的头戴红珊瑚帽结的青缎瓜皮小帽，身着蓝缎长袍，青绸马褂，足登粉底皂鞋，他采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在礼制上规定的便礼服，服装上与中国人一样，意态昂扬，有不可一世之概。每天乘坐玻璃窗马车出入公署，门上卫兵举枪致敬，他坐在车里洋洋不睬，傲慢已极。还有时随从他同来一人，鹰眼猴腮，身着海军呢料服装，上身双排铜扣，下身玫瑰紫色裤子，头顶不伦不类的鸭蛋形军帽，脚下高鞠青皮靴，神色深沉，盛气凌人，经常和日本人并肩而行，密切来往，公署内旧有人员都侧目而视，并说这是风云际会、应时而生的孽障！

公署在局变纷扰中，人员们都关心时事的推移和人事的变迁。当时我的职务仍留在秘书处旗蒙科，专办国内分派旗生（满族）学费补助事宜，是个科员兼代课长（股）。一天到吉长日报社向顾冰一社长有所谈询（顾冰一是公署第三科科长，即分交科，久历科务，兼办吉长日报），谈到时局的时人，关于顾问谢介石，顾说“他具有中国人型，谢自己表示原籍福建省漳州县，实际他是“日本国籍”台湾人，早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出身，很早就为日本人供奔走，在京、津、沪、汉、闽、粤各地像是政客实是奸细。民国初年也曾来到吉林活动了一个时期，当时日本驻吉林总领事林久治郎是他的同学知好①。他携眷住在粮米行中国银行西胡同和一个日本浪人儿玉多一创办‘边声报’作影身，一面为日本的侵略作欺人的宣传，一面潜行为日本领事馆作密探，以后林久治郎调走，他在吉林的营生也随之停息，地方官绅都对他敬而远之，他于是走出吉林。总之，虽离了吉林，但是不离开日本人，二十年来久久无闻，今又化身出现，由关东军派来的，他自己也说旧地重游，担任吉林交涉署署长。”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他就一跃而为伪外交部总长，后又调升伪驻日“大使”，之后又调回伪满任参议

---

* 作者曾任伪吉林省公署秘书处科员。

① 林久治郎，190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从1907年至1923年先后在中国吉林、天津、济南等地任外交官。1928年至1932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

府参议，他虽具中国人“型”，实是日本人“质”，两重国籍的日本帝国主义特务，又是一大变形汉奸。

另外谈到跟谢介石出人公署、身着海军式服装的一人：“姓孙名辅忱，是日本军部介绍给谢作临时秘书兼交涉署第一科科长，营口人，日本公学堂出身，长于日语，日本关东军的翻译，看来一向依靠日本人，为日本帝国主义作伥的，这次来吉，专为日军作舌人。”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孙辅忱就当上了吉林省伪实业厅长，在得意忘形之下，经常领着两个小老婆，都穿着短装，头戴着赛马小帽，鼻架墨镜，下身则马裤马靴，骑着大洋马，在各街驰骋。其中一个少妇分外妖冶，知之者说名叫紫玉，是吉林旧日瀛仙书馆的名妓，嫁孙作了三房宠妾。每当骑马行列，还有马夫一名，孙在头前带领，马蹄得得成一纵列，招摇过市，颇为市民所不齿，说是“新国家的怪产物”。他的父亲由营口接来，也循地方风情，借生日大作寿，出帖收礼演戏宴客，声势颇宏。他更不自检束，常时在下午5时后，往省立女子中学访毛校长（女），每次晚9时以后方归。由于他不学无术，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地放肆不检，颇为地方人以及当时的伪官们不满，因而大招舆论不洽。当时伪省公署总务厅长三浦碌郎大为震怒（三浦由旅顺关东厅内务局长转来），把他撤职。他于是泄了气，发财回籍，在长春治了房产，紫玉留在长春，作了私门头，以后流入北京。这是他可耻的下场。

伪长官公署当时在纷纷扰扰，日本人来往频繁，应付紧张中又设了个招待处，最初调吉林交涉署职员刘燏棻负责处务，因送往迎来，翻译繁忙，又招致了留学日本出身的数人，协助整理。这刘燏棻号馨秋，留日出身，嗜鸦片好赌博，老婆是日本人。事变当时的招待、翻译很出些力，颇得熙洽垂青，后熙任伪财政部大臣，推荐他为伪满洲中央银行吉林分行行长（原吉林永衡官银号改组）。经常出入熙宅，善耍牌九，在分行长的时期，更结识了不少日本人。荣厚（旧民国吉林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在伪满政府成立后，任伪中央银行总裁，又调派他上伪中银理事会任“满方”理事，直到光复，不知去向。

同时由沈阳来了个罗振邦，说是“奉天自治指导部”于冲汉介绍来的，也是留日出身。在沈阳很纨绔的，一次在戏院观剧，对同楼包厢中邻座女人有非礼行为，被袁六奶奶（袁金铠老婆）大教训（当时袁金铠是居于奉天军、省两署元老地位），远近传开大闹不休，经奉天总商会会长（忘记姓名）出头调解，方得了结。罗在沈阳无出路，借机来到吉林，他对熙长官很恭顺，后因公署招待处改为交际处，便派他为处长，不久裁交际处，转新设的秘书处任处长，以后他又升迁，接了被撤职的孙辅忱伪实业厅长的后任。伪满末期，据说他还作了韩云阶“访欧使节团”的一员，光复后，逃避何方，不明。

伪长官公署的招待处改交际处时期，于吉林局变中从日本东京驰归一人，何春魁，号子勤（子芹），吉林满族，十旗中学（后改称满蒙中学）毕业，最初自费赴日留学，后由吉林省公署留日学生经理员证明，准旗族费补助，留学日本东京（早大？明大?），回吉在交际处办事。伪满政府成立，九台镇设县治任伪县长，后调伪外交部文化司长（宣化司?），于伪满末期调充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文化部长。“八一五”光复前不多日期，何春魁一度在“新京电电会社放送局电台”向重庆广播有利于日伪的大篇广播词，听

到的人说词意非常反动。他为日伪突出地效了力，诬蔑抗战，毁谤祖国，识之者当时都窃窃不以为然。他见了熟人的时候，总是腼腆地说受了耍弄，听之者但笑而不言。光复后，他遇见由重庆飞来的熟人，他很赧然地觉得自惭行秽，以后藏藏躲躲，自知不利，无处安身，于是逃避北京，再不知去向。

交际处正需要日文日语人材时，伪教育厅长荣孟枚邀出徐家桓，聘为伪教育厅“咨议”，分在伪长官公署交际处，给伪长官作舌人作笔译，在交际处很为得力。徐是吉林省永吉县人，号纯熙，隶水师营旗籍。说到他的家世，半耕半读，氏族一代在封建清朝堪称书香，他长兄徐家鲁是岁贡生，又一兄徐家骥是清末秀才，都先后在吉林官立义学教书，当年满门桃李，早已作了古人。徐家桓由吉林省立第一中学丁班毕业名列前茅，考中省费留学日本，初入“京都高师”研习教育，中途改转进“京都帝大”专攻政治，前后连续留日十年，造诣很深。帝大毕业归国，不回吉林，投入张学良幕中，经过一个时期，派为昌黎县知事，奉军于民国十六年（1927 年）退出关后，他也随之卸任。不久，在张学良掌握全东北政权时期，因本溪县有煤铁生产和日本的复杂关系，又调派他为本溪县县长。九一八事变后交卸归来，乡里会面，表示无心问世，但一遇官饵，又慨然而出。伪满大同元年 3 月 1 日伪新京政府成立，吉林伪长官公署也随之改组，新设伪总务厅，调派徐家桓为总务科长，以他的经历、学识折冲于“日满”两面，活动于上下各方，堪足称述的。他在市政设计改变江沿面貌、修筑吉林市南面江堤时，收买沿江百余年来鳞次栉比民地民房、棚栅墙垣等等，他力主“评价收进，不强买”，故而居民受惠顺利进行。以后，他由此而调升了伪吉林市政筹备处处长。江堤工程完成，调升为伪国务院统计处长，后四平设省，又迁任了伪省长，伪满末期，又特任伪吉林省长。

当年徐家桓在敌伪 14 年期间，一帆风顺地爬到特任伪省长，有人说：他主要的特点，对日、“满”上层不抗、不离，对一般不躁、不骄；其次是他出身资格、涉世经历应时适当。再就是他在这父母之邦的家乡，没有作威作福，这是比较差强人意。当年伪满政府的人事有两个原则，即“提得出，过得去”，“提得出”是由于“人物考察”合乎“人事法规内则”（大概是指留日、亲日的基本点，其他……）；“过得去”是在人事会议权衡时，日、“满”双方上层首脑皆曰“可”、“无间言”。因而徐家桓作了 14 年的“二臣”伪高官。他的头脑于是安于常，最得安乐地依附日本侵略者，失去了民族气节，光复后不知所之。

以上几个应时而出者，都看眼前，没有远见，起身虽各有不同，结果则同趋于毁灭。

（1962 年 6 月）

孙辅忱和孙仁轩在吉丑恶状态

戴 华 勋

我认识孙辅忱是在吉林交涉署的时期，孙是随同日军土肥原部队来到吉林的，他和多门中将也很相契，可称是头等红人。彼时“满洲建国”的角色都集聚在吉林。孙辅忱暂充交涉署参事官，早来晚走，“办公”很积极锋利，有一口流利日本话，连熙洽也极力奉承他，说是“新兴国家”的骨干、不可多得的人材，遇事皆同他商量，会议皆邀其出席协商。孙身穿黄呢军服，足登长筒皮鞋，不知者以“日本太君”视之。他自以功高，连日本人都敢谩骂，我看见他的威严很了不起，在日方必有特殊功劳，才能取得特殊宠信。以后由他的亲信方面透露，始晓得济南惨杀案件是由他一手造成的，山东交涉特派员蔡公时烈士是由他亲手杀害的，同时遇害者有三四十人之多。因他具有这些突出“事绩”，才取得了日本人这样宠爱。

事变后吉林长官公署为日伪“建国”大本营，吉林交涉署为日伪外交部的前身，早就经日本关东军拟定这般伪官吏的角色。谢介石充伪外交部总长（后当大臣），孙辅忱充次长，参事官施履本充伪黑龙江省长兼中东铁路局督办。果然在伪满建国大同元年的时候，就分别任命。但是孙辅忱留意吉林山水风光秀美，不愿赴长就任。关东军有意派他当伪吉林省长官，他说熙二爷对待他好，不肯在熙任内取而代之，最后表示情愿屈尊当伪实业厅长，将张燕卿调到伪新京任实业部部长，将我留在实业厅当秘书。伪吉林省署花田顾问和丰岛平事务官都很豪横，丰岛平甚是凶暴。将他二人派来伪实业厅办公，照例办公桌应设在厅长办公室里面，此时正值孙同熙赴伪新京会议去了，及其回来时候一见大怒。将花田、丰岛两人痛骂一番，说我孙某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受你们监视，这是对我不信任和污辱我的表现，我是你们关东军请出来的。孙辅忱口操流利的日语，花田等鞠躬弯腰，连连称是不辍、承认过错，随将他们办公桌放在工商科内。花、丰二人经此这番教训以后特别老实，见了“满系”职员也特别客气，不像其他各厅日员飞扬跋扈样子。遇有棘手的事件，孙就分派他们俩人去处置执行，他们唯唯称命。孙常向日本人说：“我给你们卖命的干，你再不相信我是太难堪了。”他是头号刽子手，又是日本通，出谋献策阵阵少不了他。

孙辅忱是色中饿鬼，公馆寓在本厅东跨院不到一年，就纳妾有六人之多，他家规很严，少见这些妻妾外出游玩，其实恐怕被外人勾引，所以失去自由。惟鼓妓（充其名）最为得宠，形影不离。每晨骑洋马带手枪，率领从众七八名飞驰在北山一带，风雨从未间断。有时或赴隶属机关巡视，考查颇为严厉。当伪满新京国都建设局成立时，由伪国务院内定他为局长，征求他意见时，因他要求过高，首先提出副局长不用日人，以免掣肘，用人行政直接受国务院领导，不受本局内日系人员干预等等的要求，惹起了日本主

子的震怒，免职回家。因他家住在营口通惠门，将家修筑一新，美轮美奂，俨然官邸并设有卫队护院。生活奢侈并由关东军始终支持充营口商会理事长，垄断粮食大豆出口，发了很大一笔横财。终因罪大恶极遭到人民镇压。

孙仁轩，他和孙辅忱同是营口县人，从小在日本小学校上学。九一八事变时，他在长春头道沟当黑帽子（日本侦探），无恶不作，欺压人民。事变后提升长春稽查处长，越发骄盈自傲、气焰冲天。听说有一次，熙洽长官邀请孙辅忱赴长春会议终了，于归途时偶在新京车站和孙仁轩面晤，交谈之下，孙仁轩向孙辅忱说乘此难遇机会，何不一显身手创立功名，谋求富贵。孙辅忱苦无门路徒唤奈何，孙仁轩当即向其表示傲慢得意态度，允容设法，代为推荐，但好坏不要挑。孙辅忱再三称谢而别。未几日二孙晤面旧话重提，孙仁轩盛气凌人毫无表示，孙辅忱当场将其大骂一番，孙仁轩始知其地位宠信均超过他本人很多，惊惶失色拱手赔情，此事一时传为笑柄。他们同是卖国求荣、寡廉鲜耻的日本奴才，可谓一丘之貉，互相争宠调笑引为光荣，实不知人间羞耻。孙辅沈滚出吉林后，孙仁轩当伪警察厅长，一心一意残杀同胞，甘为日本忠实走狗，注意侦察爱国人士以表示功劳。他和日系股长小山田等密谋逮捕师范教育主任娄德墉、毓文校长李光汉和高小校长魏辅周和崇佩文等许多人，皆遭受到严刑审讯致死，生者实无几人。闻娄德墉鼻子被日人用战刀割掉，可谓残暴亦极。这类案件很多不胜枚举，因忘却姓名不能一一叙述，姑且从略。孙仁轩在伪厅长任内，每天单人独骑赴各街道警察分驻所寻视，每在大街碰见女学生，就下马盘查问长问短，任意调笑。闻曾在河南街将某女学生的长发剪掉致其挥泪而去。如遇见衣冠不整齐的市民再三刁难、盘询，有时被拘禁在分驻所几小时，当时有一句谚语“要是倒霉蛋，碰着孙仁轩，说错一句话，就得蹲半天”，市民畏之如虎。惟见日本人驯顺和蔼、表现忠实。后调转赴伪间岛省，民皆以手加额称庆。

（1963年5月）

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马锡麟

王 稔 五

1929年5月到同年的10月，大约有六个月的时间，我曾经充当过驻长春陆军第七十八团的副官，没有事的时候，经常地听到中校团附韦彩章、少校团附玉铎（熙洽的亲戚）和团书记官周成汉等在闲谈，对于团长马锡麟是非常的称赞，说什么他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称得起文武全才、精明能干，在目前吉林省的军队中，数他很受辅师（张作相）的器重，可以说他这个团长干的最红，将来有机会，恐怕这个旅长兼吉长镇守使的差缺，一定是要由他就地接充等等。而马锡麟团长本人，也处处地表现出自己的气度不凡，决不同其他军人一般，因此就很惹起同寅们的物议，背地里送他个绰号“马大牛皮”。

在长春东六马路，他的团部跟前，驻有一个营的兵力，共为四个连，其他两个营则分别地驻防在乌拉街等地，不在团部一起。一营的营长郭连璧，人小精明，善于奉迎，很得马团长的意，大家都半开玩笑地叫他“郭溜须”，他听着也并不生气，好像是：我不在乎，你说你的。

1931年9月18日，驻公主岭的日军当天下午急行军赶到长春，配合驻长春的日军第四联队（大岛联队），对我南岭和二道沟两地的驻军，进行偷袭包围。由于事前毫无提防准备，事后“勿抵抗、撤退”的情况下，一夜的光景就埋葬了我吉林省号称精华的南岭炮兵和二道沟一个营，死伤惨重。而当时日军对驻在六马路的马锡麟团所部的一营步兵，并未分兵进攻，马团也就按兵未动。次日（19日）下午，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周斗钦，召集当地的文武官员和商民代表等在市政筹备处开会，长春县长、地方法院长、镇守使署参谋长（李桂林镇守使不在）、马团长、商会会长等关系人员全都出席，会上周斗钦处长传达吉林省熙洽的命令、“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主张”，要求各界人士隐忍持重，不可轻举妄动。随之由长春市公安局长修长余，向大家报告了他会晤田代领事和日军大岛联队长的经过。事后，据修长余对我说（我当时是大连泰东日报社长春特派员兼分社长），马锡麟团长在当场的会议席上表示，军人守土有责，不能应日军的要求而自动后撤，如果日军攻进长春城内，则不惜把六马路一带划为战场，坚决予以抵抗。看样子意志是非常的坚强。无奈当时的绅商各界人士，为了顾及自己的财产不遭受损失，群起主张希望马团长能够保全实力，暂时地撤出长春市，使市民不受惊慌、安于现状。马团长在大家的劝说下，为了顾及市民的安全，乃不得不顺从大家的希望，忍着悲愤的心情，在当天（19日）的夜里，带领着全营的部队撤出长春城，向乌拉街王营长驻地集中。这期间，长春市的人民对于马锡麟团长不惜与日本军一战的坚决主张，无不点头赞扬其爱国的心肠，无不衷心地对他抱着万分的期待和希望。然而后来的事实不

是这样。

吉林熙洽首先投降日本，组成了伪吉林省政府，收买利诱原有的吉林军，改编为伪政府的警备军，马锡麟欣然地加入了熙洽的汉奸群，由原来的团长升为伪军警备第三旅的旅长，不久就随着于琛澄这个伪司令（熙洽委派的吉林省伪军司令）向双城的抗日救国军进攻。乌合之众出师无名，到处不受欢迎，马锡麟的伪三旅在德惠、榆树等地不断地遭到地方的武装团体阻击，残兵败将在双城没等到正式见仗，就溃不成军四散逃亡，最后他这个光杆旅长仅以身免地跑回了吉林。熙洽不高兴也没办法，只得又委他为挂名的伪军令厅副厅长。

伪满建国，吉林省的伪军令厅撤消，熙洽改派马锡麟为长春硝磺局长。当时伪财政部次长孙其昌仍兼任伪吉林省财政厅长，这时期我正在伪财政部给孙其昌做秘书。由于他平素对马锡麟不喜欢，所以最初是坚决不同意，无奈熙洽给马锡麟一再地说人情，弄得孙其昌没办法只得暂时答应，然而两个人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疏通。

伪满洲国为了推行其鸦片政策，在伪财政部外设立专卖总署，下设十个专卖署，这时期马锡麟又随着长春硝磺局的撤销，而转任为伪新京专卖署的署长。记得在一段的人事安排上，日本人天野专卖科长，为了马锡麟的问题，和孙其昌曾经有过很多的商量。日本人当时讲，马锡麟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做过团长、旅长，经历资格最为相当。孙其昌只好原案通过，但是他心里头实在是不快乐。

1936 年春间，马锡麟在伪新京专卖署长已将近四个年头，孙其昌也终是抱有成见，在他回到伪财政部的第二年（1936 年），伪财政部管辖地方人士春季调动的时期，孙其昌借口“官久须动”，极力地主张把马锡麟调出伪新京专卖署，当时的人事科长伊藤博也同意照办，难波精一这个副署长却不同意，可能他是知道孙其昌、马锡麟间的不睦关系，因而也就没有按照孙其昌的原意，把马锡麟转到哈尔滨去，孙其昌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的窝火。事情不仅如此，就在这年的秋季，伪国务院组织“日本行政视察团”，在各部派出的二十几名人员中，伪财政部关系的人员占有六名，这六名中，有专卖署长二名、税捐局长二名、大连税关一名和部里的秘书官一名，而两名专卖署长之中就有马锡麟，孙其昌在这六名的人选中，惟独对于马锡麟有意见，但是经过人事科和专卖总署几次商谈的结果，也只有按照原案通过。难波对于马锡麟的极力帮忙，不仅在上面这两件事上，据说在 1938 年把马锡麟提升为简任的伪热河税务监督署署长，也是难波的力量，后来他又调充伪哈尔滨税务监督署署长。

（1963 年 1 月）

我所知道的荣孟枚

于 跃 东*

荣孟枚本姓胡，字叔右，满族，原吉林省阿城（今黑龙江省）县人，旧私塾出身，听说去过日本留学，曾在黑龙江省充差。于民国时代来到吉林，充任吉林军政两署秘书。在吉林充差多年，仅随历任长官办点笔墨工作，并没有得到什么显著地位。在九一八事变当时，他认为是大好时机，不可错过，遂联合保皇党赵厚田（原名隆福，满族，政闻社社员）等一些满族人，迎合吉林省长官熙洽意旨。等到伪满洲国“建国”，熙以荣为满族，大可利用，遂在1931年11月初委以伪吉林省教育厅厅长之职。

荣在伪教育厅任内，我在伪省教育厅任省视学职务。我记得他接任那天，携同伪省民政厅长王惕一齐到厅，因为伪满初期，没有规定就任仪式，只在厅长室内召集全厅职员共四十多人训话，荣在前面训话，王惕在屏风后听声，话虽不多，说得还算体面。在这场训话以后，厅里人都说荣厅长外号“荣疯子”，他能说出这几句体面话，真不容易，可能是王惕在幕后教给的。果然不错，以后他就不说体面话了，在厅内和任何职员办事，总是信口开河，连说带笑，也说正事，也说闲事，甚至说到吃喝嫖赌事。他最高兴的是谈古玩，无论金石书画，都能讲说一通，而尤喜好玩弄印章。他在任内，卖古玩的老板们，肩扛着古画，手托着古瓶，每天不离教育厅之门，这些古玩商来去自如，不用门号传引，即可直达厅长室内。他接任以后，将教育厅内存款握在手里，坐着汽车到处购买古玩，因而引得古玩商你来我去，交称莫逆买到手后，均陈列在公馆客厅里，有时还领着厅里的职员到里边看看，我们是外行，不懂真假，只说样样都好，这也是迎合长官的一种作风。

荣有一妻二妾，分住在南北两公馆，南公馆在财神庙胡同，北公馆在教育厅后院，大老婆二老婆住在南公馆，三老婆住在北公馆。荣任厅长后，以北公馆只有三老婆一人，未免不够风流，遂托人在长春头道沟旅馆内（忘记字号）又买来一个小老婆，带回吉林，藏娇在北公馆里。据说这位女人为郑某之妻，和郑离散，而被荣买到手里，其中详情，不得而知。可是自此以后，荣即称该旅馆经理王某为岳父，他们交往甚密，感情很好。荣常对人说，我的四个老婆，各有职务，大的经理家务，二的生育孩子，三的迎接宾客，四的是个玩物。他的四个老婆，都抽大烟，荣本人可能不抽，因为他满面风光，没有烟色。但他倒有官瘾，认为自己不止于作到教育厅长，还有可能作到文教部长，因而他预先在长春西三道街，仿照北京王府的样式修建住宅一所，前有正房配房，后有花园假山，由东西月亮门将全院分成两部，形式颇为别致。在修建当时，曾经领我

---

* 作者曾任伪吉林省教育厅视学。

看过两次，确实建筑雅致，够上一个大官的公馆形式。

荣在1932年（伪大同元年）一年之内办了两次寿日，第一次是在春季，席设吉林岭南饭店，公馆里设寿堂，剧场设在俱乐部，所属教育局长和学校校长，以及全厅职员和亲友等都来祝贺。第二次是在秋季，酒席设在长春头道沟一家饭店里（忘记字号），伪吉林教育厅职员去了二十多人，我也随同前往，再加上各伪县教育局长和校长，足有四五十人，我们在长春大吃大喝，足足热闹一天一夜，荣还领全员到新建公馆里参观。在这个寿日，荣是一种夸耀高兴，并不在于礼份之多少，总计荣在1931年11月初接任，他在一年之内，买古玩、娶老婆、修住宅、办生日，他从哪里来的这些钱呢？原来教育厅内有教育存款，他动用公款置备这些东西（可能还有别的收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厅里总务科长是深知底蕴的，后来他让总务科给他设法报销，科里感到困难，因此他对聂科长深为不满。

荣到任厅长后，除忙于上述事项外，对于教育则置之不顾。彼时吉林省立学校设在外县的，有四个师范、五个中学，因为事变，均在停课，学生散去回家，教员苦守校内。荣认为如果晚开学一日，即可晚发一日经费，与己颇为有利，遂拖延推迟，使各校不能迅速开学。后来经各县地方人士请求督促，而始着手筹备，在发放开办费和教职员工薪上，也是三七、二八的折扣，外县各校校长对荣的作法纵有不满，但不敢作声。在事变当时，吉林市内学校并未停课，荣为迎合日本人的心理，首先请求省署日本顾问向市内学校派遣日本教员，不久，遂由“满铁”派来日本人数十名，分发在各校担任日语教员，无异是学校里的监视者，也是学校行政上的主持者。荣又请求向厅内派遣日本事务官和属官等五七人，但他没想到，所派来的日本人，首先把持厅内经费，这倒束缚了他的手脚，自认后悔，不应早请。但是他想一不作二不休，遂又请求向各校派遣日本教务主任和事务主任等，伪满向各处派遣日本职员这是决定的，但是荣竟能先自请求。

荣在教育厅长任内，对于教员学生，不但不加爱护，反而加以迫害。师范教员周雪堂，品学都不坏，他查出周在课堂里对学生讲述三民主义，遂在教育厅里开会，当场将周逮捕，周之爱人吴乐之（音乐教员）在场，对荣跪求未蒙饶恕。又省立一中学生郭连郊和金景二人，因散发反满抗日传单，于伪大同2年5月间在车站被伪警逮捕。翌日清晨，荣亲率军警，将学校包围，指名捕去学生常家春、吕文、于克等二十多人，还亲自到日本宪兵队报功。

在伪大同元年、2年间，伪新京文教部有时召集厅长会议，多半我也跟去参加，荣在会上几次的发言，不谈教育，而谈他的感想。大意是说，我从前不愿意作官，因为时代不好，人位不对。我此次出来，是看到亲邦日本帮助满洲建国，有前清皇帝执政，我认为这是我应该作官的时候到来了。伪大同2年春季，荣率领各县教育长和省立校长共19人，去日本参观，在日本参观了一个多月，荣本人是满腹高兴，到处高谈阔论，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的声调不绝于口。可是在归国途中，路过朝鲜平壤，在旅馆中手拿裸体画，正在和同仁们谈论，忽由楼下送上电报一通，说是他和张书翰参事官对调，他接到电报以后，骤然面形于色。回到厅后办理交代，可能是因为亏款太多，将长春的新建住宅，没住过一天，竟卖给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住用。

我在臧式毅家当保姆

李淑范

我现在是长春市朝阳区重庆人民公社第十一委的卫生主任。过去在敌伪统治时期，我是个家庭妇女，一个大字不识；直到解放后，我才得到翻身，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也脱了文盲，具有初小的文化程度。回忆我的过去，有一段做过女仆的历史。现在把做保姆期间的身受与所见，谈出两件事。

一、敌伪时期的保姆是雇佣的奴婢

东北沦陷时代，我在臧式毅家里做女仆，据当时的人们说，臧公家里，对下人的待遇还不算坏，可是我亲身的感受，我确是他们雇佣的奴婢，受到牛马的待遇。

臧式毅的家，除有粉黛艳装的姨太太外，还有一些少爷、少奶奶和小少爷们。这些除了吃饭不用喂，睡着了不用人伺候外，其余的时间，都要随着他们的眼珠转。我当时还年轻，没有受到什么无理的责骂，但是我得多多出力。白天伺候三顿饭，是毕恭毕敬的。一有余暇，不是收拾这，就是整理那，需要忙好一阵的。夜间公馆的牌会，一打就是半夜。这里的牌会，有时集聚一些所谓大臣的高官们。他们抽足了鸦片烟，一个八圈又一个八圈也不感到疲倦，却苦了我们伺候茶烟的佣人们，我们白天劳累一天，夜间到半夜也不能就寝，体力怎能支持下去，后半夜困得要命，也要强打精神。若遇到太太请人打牌，来的都是阔奶奶，时间虽不太长，但是她们一会儿要烟，一会儿要茶，有时玩得饿了，还得捧上点心来伺候。这群娇里娇气的人们，贱毛病真不少，说道也多。我们更得陪着笑脸，不这样就显得臧公馆不够气派，太太脸上也无光，在我们来说不这样也怕被解雇，无处找饭吃。提到吃饭，在臧公馆做保姆的，会吃的好些吧？其实不然，人家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吃的是山珍海味，到我们名下，也只能略尝其剩余，过去有财有势的人家，还不都是一样的刻薄，东西给人家吃，他们是感到心疼的。

在臧公馆比较不太累的活儿，要算是哄孩子了。不过这里的孩子，都得称之谓少爷或小姐，他们“八字”好，“前生注定”，生下来就得有专人伺候。小少爷们都是娇生惯养的，看人不大，脾气可不小，他们玩得乐了，要打保姆的嘴巴玩，生气哭了，小巴掌更得在保姆的脸上来出气，打得虽不疼，心里常感到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在旧社会里穷人谋生，竟是这样的不容易。挨了几下打，不惹小少爷哭闹，倒算是幸事。有一天小少爷要骑着我们玩，这是玩惯了的，他硬要我们趴在地下当马骑，因为太太不在眼前，没有立刻听从小少爷的命令，惹得小少爷哭起来，不巧被太太在隔房听见了，便追问少爷哭什么？当她知道我们这次没有让小少爷骑马玩，她就气冲冲地说：“骑就骑呗！趴

在地上还费什么事么？雇你们来作什么？”几年来在公馆里吃苦耐劳，却落得牛马不如，在旧社会里的穷人，就是低人一等，不是作奴婢，就得当牛马，这是我在臧公馆里亲身体验到的。他们为什么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这样作威作福，还不是依靠封建势力作靠山么。也难怪在旧社会里总有一些人们，一心想要升官发财，如果不是臧式毅高官在身，臧公馆还能这样威风与阔气么？他们的恶势力又将何处来呢？

二、战犯临监前还不忘重温官梦

“八一五”光复了，臧公馆的上上下下全都愁眉苦脸，不似往日那威风与神气了，就像末日来临似的。这时我还在伺候他们，同时我也感到太太、少奶奶不像从前那样气派了，在我们身上，也表示客气些。可是当他们听到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通过广播，叫他们这群汉奸战犯成立治安维持会，以维持临时的社会秩序的命令后，便又喜形于色，立刻又神气起来了，在他们那群大汉奸、大战犯看来，“蒋主席”真是他们宦门阶层里的“万家生佛”了。

在臧公馆常常出入的都是伪满的大臣一级，所以我也认识几个，像所谓“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就是我常见到的。这时他想借着组织长春特别市的治安维持会的机会再爬上去，甚至想统辖全东北，有东山再起的妄想。他在长春搜罗一群过去的“大臣”级高官，来组织治安维持会，设官派差，闹得乌烟瘴气。解放长春的苏联红军，也看出他们不得人心，闹的也不像话，就决意要把他们拘禁起来，限制他们的行动，以安定长春的民心。在9、10月间的某一天，红军汽车来“接”他们来了，张景惠认为这是苏联红军召集治安维持会的人们开会，所以在他们指引下，重要的伪满官员差不多都登上了汽车，当汽车开到臧公馆的门外时，张景惠先下车，进屋见到了臧式毅，就急忙地说：“今天有重要会议，快走吧！外面苏联红军的汽车在等着呢。”臧式毅几天来身体不大舒服，有点踌躇不愿去，张景惠却着了急，拉着臧式毅的手说：“你不出席能行吗？今天是重要会议，是关系全局的问题，你不参加，你的官级将来怎么安排？”臧让张这一劝，整整衣装也登车跟着走了。他们坐在车上还不知道到了红军驻地，不是当座上客，而是作阶下囚了。且说一行人走后不提，不多时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乘自己的小卧车，气冲冲地赶到臧公馆，进屋就问：臧兄在不在？太太回说：“他坐红军的汽车，随着张景惠总理的一行人走了好多时间了。”黄富俊一时感到大失所望，这个重要会议没有捞着参加，这该是何等的损失。所以他在离开臧公馆时，忍耐不住说出一句气愤话来：“怎么单单会把我忘了！这是关系到我将来官级的问题啊！”最后没有好气地登上了车，叫司机把车开到红军的驻地去。原来他是当时的漏网鱼，当然以后也不会遗漏，这回他却自己送上前去。当时我们作保姆的知道什么？在旁边眼着这种情况，也替黄着急，替他抱不平。几天过去，我们才知道这群官迷，当天就被监禁了，在解放了的长春，再没有他们可作的官了。这群汉奸在临监前还不忘重温旧梦，说来可笑，也会令人可恨。臧公馆的“运气”败了，我们作保姆的都得到了新生。

（陶庸根据作者口述记录整理，1963年7月）

我所知道的李寿山

李 保 德*

李寿山原名李保仁，曾用名李兴、李可英、李玉祥、李奕坤，绰号李大刀。原籍山东省即墨县城阳村，后迁居庄河县大孤山镇（今属东沟县）于家沟。我曾在其部下做过军需官，现就我所知的几件事回忆如下：

哥 俩 打 邮 差

李寿山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下学后在大孤山镇卖鱼、菜，后经人介绍到山东省青岛市一个交通汽车行做工。后从青岛买了一台汽车到大孤山拉运输。一次，在运输中，李寿山把托运的邮包丢了，邮局索赔，李寿山不给，吵起来，李寿山和其弟把邮局人员打了。事后，李寿山怕有关方面追究，就离开了大孤山，一跑了事。

当 兵 及 升 迁

李寿山在山东青岛汽车行期间，于交易中结识了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军需官毕庶澄。1922 年李寿山打了邮差后，就去沈阳找毕庶澄，要想当兵。毕庶澄把李寿山介绍到绥芬河军事讲习所当了一年小兵。1923 年，毕庶澄任奉军第二十三旅旅长，李寿山在毕部下任中尉排长，随毕参加了直奉战争。奉军打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军，毕庶澄被提升为胶东护军使、第八军军长，李寿山在毕军第二师（师长张昆普）第八团任团长。1926 年，革命军北伐期间，毕庶澄在上海接受了革命军第四十四军军长的委任，被张宗昌查知，把毕调回青岛枪毙了，其队伍也被改编了，李寿山无事可做，就离开了军界，到金州西北坊买了些房子、土地，在家闲居。

卖身投靠 认贼作父

1929 年，李寿山与一个叫于景福的在沈阳南站开了一个旅馆，叫第一旅馆。房子是租日本人渡边的，渡边常和一个叫张宗援的日本人去第一旅馆收房租，李寿山就认识了张宗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1932 年初，张宗援和营口的汉奸王殿忠

---

* 作者曾在李寿山部下任军需官。

在沈阳一带招募伪军，住在李寿山旅馆内，招一个兵给旅馆一角钱。在此期间，李寿山与张宗援的联系就多起来了，二人越来往越熟了。原来张宗援也在张宗昌的队伍里干过事，当过张宗昌的日本顾问的护兵，他的日本名字叫伊达顺之助。在直奉战争时，伊达顺之助见张宗昌很有势力，要认张为干老子。张宗昌不好意思收一个日本人做干儿子，叫伊达顺之助认张的母亲为干妈。张老太太认了日本这个干儿子后，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张宗援。李寿山和张宗援熟了后，张宗援就拉李寿山当兵，给他个官儿干，李就答应了。张宗援、王殿忠在沈阳一带招募伪军两千多人，成立了奉天警备军第一旅，王殿忠任旅长，李寿山任副旅长。后因李寿山与王殿忠合不来，1932 年 1 月，两人就分开，各领一千多人。李寿山就当上了安凤地区少将警备司令，张宗援为副司令。

黄土坎受挫

1932 年 9 月，李寿山率其部下五百多人去大孤山，行至黄土坎，遇到了邓铁梅部下朱锡久团近二百人的堵击。李寿山骑兵队发动了两三次冲击，都被扼守在黄土坎南山嘴一带的抗日军打回去。一直打到晚上，李寿山和他的人马未能过黄土坎。夜里只好在附近村屯住下。第二天，李寿山又攻打，抗日军见李的队伍越来越多，就从康家屯退往大黄旗、龙王庙。李寿山过了黄土坎去大孤山，其二弟、二营长李保锡带两个随从查岗碰上大刀队，被大刀队几刀就给砍死了，吓得机枪手郑世昌大叫："不好了，大刀队上来了！"掉头就往后跑。第二天，李寿山调集了些船只，把其二弟的尸首及部下全部运过了大洋河，跑到大孤山。为了报复，李寿山下令往黄土坎打炮三百发，还去了一架飞机，在黄土坎投了四、五枚炸弹，炸死了一个姓高的老头。

据守大孤山

李寿山带队到大孤山后，为了占据这块地盘，强迫商民及附近村民募款为其修围壕。建起了一条约 12 华里的坝墙，东起高丽城，西至二道沟，北至山牙口。为修炮台，李寿山下令把大孤山六景之一的魁星阁拆掉。

李寿山盘踞大孤山后，多次窜到庄河、岫岩、安东等地"围剿"抗日军，抓捕抗日家属，杀害无辜百姓。1932 年 11 月，邓铁梅、刘景文、刘同先等人组织抗日军把大孤山包围起来。旧历十月二十七日早晨，大雾。刘景文部的刘福祥团从二道沟往镇里摸，摸到铁丝网时，用刀砍。李寿山听到报告后急眼了，把小洋钱摆在桌子上，五元钱一堆，问其部下："谁敢去？谁去就拿去一堆。"有人就拿了钱，带人往外射击。双方打到上午 10 点多，雾散了，李部从魁星楼打的炮有了威力。到后半晌，刘景文部撤回原地。大孤山被抗日军围困了一个多月，李寿山人吃马喂的都快光了，他着了慌，派大孤山的商会会长王龙德去请龙王庙的商会会长潘子旭。潘到大孤山后，李寿山要潘子旭转告驻在龙王庙街的邓铁梅，要邓军不要围攻他。说如有机会，他也要抗日等一些谎话。邓铁梅听了潘子旭去大孤山的情况后，考虑到进攻大孤山也无进展，日军又从岫岩镇调五百多守备队来大孤山，就撤掉了对大孤山的包围。

杀人如麻

李寿山在投靠日本后，杀人很多。老百姓送他绰号“李大刀”。他除了枪杀外，还用大刀砍，铡刀铡，有时把人杀了，头割下，挂在树上。他说，这样杀十人，可以收到杀百人的威力。有一次，他当着日本人的面，砍杀中国人，博得了日本鬼子一阵哈哈大笑。据不完全统计，李寿山在当汉奸期间，杀死抗日军战士和无辜百姓达三百多人。杀牛村副就是一例。牛村副叫牛春荣，是龙王庙村副村长。1932 年，邓铁梅的抗日军通过牛春荣牵线，从李寿山部下一个营长手中买了一些子弹，每粒两三角钱。情况被一个叫杨子坤的报告给李寿山，李寿山就把那个营长枪毙了，也把牛春荣抓起来用铡刀铡死了。在龙王庙同时还铡死了马家堡子的马广宪、镶白旗的温学阳、沈××。

与张宗援的分裂

李寿山和他的大刀队在屠杀中国人民方面血债累累。到 1938 年，辽南一带的抗日武装在日寇和汉奸的残酷“讨伐”下遭到严重摧残。李寿山和他的大同队也不被其主子器重了，日军准备缴消这支汉奸队伍。在缴消前的一次检阅中，日军一上司看到李寿山的队伍还有点训练，就把他们打发到山东省，和山东省诸城一个叫张步云的队伍联合起来，名叫“山东自治联军”，军饷是就地自筹，日军不再拨给。

李寿山到山东后，很不得志，他过去认识一个日军校阅顾问，就托他帮忙调到北平。此事被张宗援知道了，就对李寿山存有疑心，在军事上多重用张步云，李寿山就越发不干了。他的队伍住在平度、胶县，他却长期待在青岛。

李寿山手下有一个团长叫赵宝元，是李的亲信。赵宝元有次得罪了张步云，被张打了耳光。为此，李寿山、赵宝元与张步云之间的磨擦就越来越大了。

有次，赵宝元乘车去青岛看望李寿山。赵问李应该怎么办？李寿山说：“我不干了，我不管了。”赵宝元说：“你把我拉巴起来，你不干了，我怎么办。我听你的，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干。”李寿山说：“你拉出行不行？”赵宝元问：“往哪拉？”李寿山说：“过了胶东不是有队伍吗？”赵宝元回去后，就把队伍拉走了一千多人，带到八路军活动的胶东，过了一年又投到国民党中央军了。

赵宝元把队伍拉走以后，张宗援气坏了。他把没随赵宝元走的李寿山的亲信都列出名单贴在墙上，一个个地传讯，不来的就照墙上的名单开一枪，来的都一个个枪毙了。李寿山的叔伯兄弟李保贤、李保君、李保奎、李保富、李保丰，还有李仁寿、马渔夫、小胡、姜大彪共五十多人，都被张宗援枪杀了。李寿山知道不好，就躲到高密县日军守备队，因该守备队一头目和李寿山关系密切。张宗援要李寿山，守备队不给。张宗援指责李寿山授意赵宝元把队伍拉走了，李寿山一口咬定不知道，与己无关。与李寿山关系密切的几个日军头头，都帮助李寿山说话，都说李寿山在东北挺卖力气，后经日军上司裁判，判了李寿山徒刑，缓刑五年，把他打发到东北金州住下了。

与蒋介石特务组织的勾结

李寿山在山东时，与国民党已有联系。1938 年国民党中央任命李寿山为中央暂编十二师师长，中将衔。1944 年，李寿山被国民党任命为吉林警察局长。因光复后我军解放了吉林，李寿山无法上任。

1947 年，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给李寿山去一电报，要其找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接头。李与文见面后，给了李一个国民党设计委员的头衔，主要任务是调查接收日伪在东北的物资。由于人民解放军很快解放了东北，李无法执行文交给的任务，只能一步步地往南方退，在北京开正大银行，在天津开酒馆，1951 年到广州开小吃部，后又在广州市西湾路奇香园饭店当店员，镇反中被我公安人员逮捕，1954 年处决于大孤山。

（田孝昌根据作者口述记录整理）

川岛浪速与肃亲王一家

宪 均*

1912年清政府灭亡，我父亲（肃亲王善耆）① 跑到天津。日本派川岛浪速到天津跟我父亲交涉，接我父亲由天津乘火车经过秦皇岛坐日本军舰“千代田”（当时旅顺口日本海军镇守府属下的一条军舰）到了旅顺口。当时的关东军都督（就是关东军司令官）福岛安正大将对我父亲说，日本能够援助我父亲复辟清朝。1914年前后，大隈重信组阁当了日本首相，经过川岛浪速的介绍与我父亲发生了关系，在大隈重信的主谋下，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拿出100万元资本借给我父亲，又把我父亲和巴布扎布联系起来，搞起了在表面上是清朝复辟，而实质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代表我父亲直接参加行动的是金壁东②（本名宪奎，我的七哥），他跟随一些日本人（我记得有川岛浪速的五弟川岛量平、关东军的西岗大元炮兵大尉、松井大佐）到了巴布扎布那里，军火当然由关东军供给。他们最后进入到郭家店，这时大隈重信倒阁，巴布扎布被杀（他死在郭家店，在郭家店车站上日本人给他立了一个纪念的木牌，到“八一五”还存在），这个“运动”瓦解了。日本对东北不死心又变了花样，在“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把我们的弟兄全体和巴布扎布的儿子，都送入日本学校念书。将近二十年日本教育我们，“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蒙古是蒙古人的蒙古，汉民族在历史上并没有统制过“满蒙”。川岛还无代价地借给了我们大连露天市场，使我们吃这块地皮租生活。③ 于是我们弟兄在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在二十年间没有离开旅大和满铁沿线附属地一步，这就使我们弟兄脱离了中国社会，忘掉了祖国，失去民族观念，依靠日本，完完全全陷人日本的离间民族政策里面。在九一八事变前，宪真（我的八哥）为日本侵略打基础，率领满铁调查课人员，调查了图什业图一带的一切情况。正珠尔扎布（我的姻弟）同样领导满铁社员调查了蒙古某处（九一八前一二年）。在九一八事变当中，金壁东由于日本人的介绍联络了熙洽，把吉长、吉敦两条铁路活生生地送给了日本。宪原（我的十一哥）由日本陆军骑兵少佐森（森，在九一八当时是日本参谋本部参谋，伪装来到东北暗中活动，郭文林的后台也是他）的介绍，到天津取得溥仪的“圣旨”，命令

---

* 作者曾任伪满军医处长。

① 肃亲王善耆共有儿女38人，男21人，宪均为第12子，曾任伪满恩赐病院少将院长。1964年12月28日第五批特赦。

② 金壁东，史料多错写成“璧”，此名为肃亲王善耆所起，“壁东”意为“东方的一堵大墙”

③ 1918年前后，因肃亲王生活所需发生困难，经川岛与日本殖民当局商请，批给肃亲王一大块地皮，并向日商东洋拓殖会社贷款30万元，开办了大连露天市场，经营权完全由川岛一人控制，历年盈余颇丰。

张海鹏叫他进入黑龙江，大肆活动。同时甘珠尔扎布、正珠尔扎布弟兄在松井大佐（与前面说的同一人）的推动下，在通辽一带集合了巴布扎布的旧部下也活动起来。川岛芳子更大肆活动。随着九一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伪满成立，我们弟兄一齐由旅大和附属地露出头来：金壁东做了伪龙江省长，宪真做满洲矿山副理事长，宪原做了伪江上军司令官，我做军医处长，宪云做了农科大学教授，宪基做了军医上尉，侄子连组做了少将部长①。我们弟兄叔侄九人，为日本的侵略，在伪满忠实地效劳了十四年之久，给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灾害。

① 金连祖（组），又名金志东，是善耆长子宪章的长子，曾任溥仪的侍从武官。

·华北伪政权·

日军指使汉奸组织冀西政府的阴谋被扑灭的经过

王右文*

沈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审核意见：这篇材料写得相当具体，对过去反动政府未敢公布过的情况有详尽的叙述，有相当价值。系第一手资料，文字也写得很简洁。

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者继香河事件之后，又企图在华北地区利用汉奸，假借地方自治名义，搞分化中国的阴谋。蒋介石对这种阴谋不敢公开揭露，只用一纸空文命令，要华北各地方政府注意防范。

当时，我正任河北省涿县公安局局长，接到几次河北省政府转令各县注意防范日军阴谋活动的例行电报，最后一次电文上指出日军企图在涿县制造事件，组织冀西政府，以隔断北平与南京之联系。我当时感到事件关系之大，与自己职责之重，决心把日军这一阴谋活动彻底粉碎。但是这些汉奸们行动非常诡密，尽管人心惶惶，谣诼纷纷，苦于摸不清确实线索。当时所谓地方士绅者，有的明知底蕴，但他们只计个人利害，不肯吐露分毫；有的还跑到北平去躲避。在风声越来越紧之际，为了摸清真实情况，我就选派得力干警，诡称是被我开除，怀恨在心，参加到这些汉奸们的组织里去。

有个警探（姓名已忘记）由公安局背着行李先到一个来往复杂的旅店，一进门即骂不绝口，自道他是本县人，当警察好几年了，向来没犯过错误，今天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他开除，这仇非报不可。隔时不久，就有人出来搭话，说都是同乡，大家想办法，不愁没有事做。说来说去，那人就提有人正在招军队，只要肯去，还怕弄不到一官半职。两人越说越入港，后来那警探就跟着那人打进汉奸群，而且很快就探明了真相。

原来这些汉奸们的头子叫褚明远，涿县松林店东沙庄人，是旧军阀吴佩孚的旧部。褚明远当众宣称：这次吴佩孚为了挽救华北危机，出手组织自卫力量，进行华北地方自治。并说这事已经取得华北负责当局宋哲元的同意，他本人是“华北人民自治军”第三路总司令，上级指定他在涿县招兵，组织军队。褚明远委派了一批军官，某人是团长，某人是营长，那警探也被派为营长。褚明远还大肆宣传：参加这次事件的人，以后可以永远不纳田赋。

当时我们分析警探这个报告，认为褚明远所标榜的吴佩孚出来组织自卫力量和已取

---

* 作者时任河北省涿县公安局长。

得宋哲元的同意的说法是骗人的，他不过是拿吴佩孚的名义作幌子欺骗一般群众，好人他的彀中。他说他本人是“华北人民自治军”第三路总司令，正说明他是汉奸头子。因此我们就进行布置，把这个汉奸组织破获了。

在破获此案的前夕，记得是农历十一月十三日（1935 年 12 月 8 日）晚 5 时左右，警探仓皇跑回，报告说：“大事不好了！我在沙庄褚明远家开完会。褚明远所委派的所有军官们都来参加了这个会，满满地坐了一屋子人。褚明远当场宣称：天津华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派来军事联络员郭某来传达命令，约定明晨在县城东旧校场上集合，一齐进城，到县政府请愿免去田赋，参加去的人县商会还每人发两元赏钱。他还说参加这次事件的共五千多人，届时天津日军将派飞机来，只要地面上人多，用大旗一摇晃，飞机就降落地面，把带来的枪械子弹发给大家。当场他把华北人民自治军第三路总司令的任命状和关防、旗帜、传单、标语摆在炕上，给大家看了。”

我得到这个紧急报告后，马上和县长孙维善商量。他正在患病，不能起床，但神智还清。我们决定在当天夜间，倾全县警团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进行剿捕，以期一鼓荡平，免得日军乘机插手，造成不好收拾的局面。

这时县城内万寿堂饭馆（兼营旅店业）住客中，发现有形迹可疑之人，料定是汉奸们的暗探。我有意识地邀同朋友到万寿堂饭馆，占一单间，猜拳饮酒，大肆喧哗。事前布置便衣，观察住客中每人的行动。住客中果有由门隙偷窥，鬼鬼祟祟，交头接耳的。有一住客到柜房要浆糊封信，收信的地址是天津日租界。随后走出去了二人，大概是向褚明远报告去了。

我们已经知道汉奸出没的地点，除褚明远的家乡沙庄外，还有 5 个地点比较重要。为了一网打尽，必须同时进剿。当时困难的是：涿县地方武力，计有警察 150 多人，保卫团 300 多人，均分驻县境各村镇，并非集中一处。若调集过早，恐被他们觉察，乃先期转移隐蔽，在当夜 11 时才开始照预定计划行动。首先派警察把住电话局，禁止旁人挂电话；随后用电话命令各公安分局、分驻所、保卫团各大队和各分队即时全体动员，统限于当夜 12 时前赶到县城待命。

我又恐警团全体出发进剿后，县城空虚，当即到县城驻军一一零师缪澂流的司令部去联系，请师部协助并负责城防。适逢缪澂流已先一日去北平，他的参谋长陈某当时用长途电话向缪报告，得到指示，师部应以全力协助，但因华北情势特殊，不便出名，可由师部特务排，担任城防，在各城门口驻守，不许行人出入，以免城内消息外泄，并派师部骑兵连听我指挥调遣。

这夜月明如昼，在 12 时左右，各分局、所警察和保卫团各队，先后赶到县城。来的这样及时，是因为当时涿县警察和保卫团每人有一部自行车。当我把这事件发展情况和汉奸们居住地点以及剿办计划向各分局长、大队长等交代清楚后，他们分六路即刻出发。重点的沙庄，除多派警团外，另由一一零师骑兵连在村外包围。

警团刚刚出发不久，缪澂流即由北平乘汽车赶回涿县，先到县政府，同县长孙维善和我会面。当他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之后激动地说：“我属军人，本应出手。但目前政府对日政策一直是不抵抗，如果出头露面，一定要遭到违反国策处分。好吧，我一定全力协助你们，你们要放手去作，有天大责任，我缪某替你们承担。”

次日天尚未破晓时，出剿警团已有五路先后回县，把这批汉奸们次要的头目等捕获带来。惟去重点沙庄的警团杳无消息。当时我焦灼万状，深恐首恶漏网。还好，相差时间不久，汉奸头子褚明远和由天津派来的军事联络员郭某一并被警团擒获解回。

那褚明远十分狡猾，经常转移住处。当夜他不在家，警察队长郭指南就扑了空。正在焦急之际，忽见退职的警长褚海楼背筐拾粪迎面走来。郭心想他们是同宗，一定知道褚明远的住处，忙叫警士把褚海楼绑上，认定他就是“褚明远”。褚海楼恐受连累，急忙带路去抓褚明远，果然在另外一个小村里，擒获了褚明远和军事联络员郭某，另外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道，据说是他们的“军师”。当场缴获的有上黄下红两色的旗帜两面、“华北人民自治军”第三路总司令关防一颗，黄缎子制的“华北人民自治军”第三路总司令任状一件和宣传传单、标语各一大捆。

当捕获褚明远等的警团刚刚回到县城时，果有日机一架，由北方飞临县城上空，盘旋侦察许久才向南飞去，约半点钟左右，又飞返县城上空盘旋多时，向北飞去。这就是日军配合汉奸行动的证明。

日机去后，由我会同一一〇师军法处长于某和县保卫团周副总团长对褚明远等进行侦讯，再三究诘，他才供认这伙汉奸们的总机构叫作“中华民主同盟会”，总头子叫刘大同；“华北人民自治军”总头子是彭竹友，原名彭寿莘，是吴佩孚的旧部。所谓“中华民主同盟会”和“华北人民自治军”的“总司令部”，均设在天津日租界。褚明远本人以“华北人民自治军”第三路总司令的名义在涿县招兵5000多人。同时被捕的郭某供认是天津总司令部派来的军事联络员，传达总部命令，定于当日早晨召集所有报名参加的人，都在县城东旧校场集合，由日军派飞机来送枪弹，只要地面人多，用旗帜一摇晃，飞机就能降落，随后各持枪支蜂拥进城，组织“冀西政府”。所有旗帜、传单、标语等件，也都是郭某由天津“总司令部”带来的。

根据以上侦讯情况，我们立即电报河北省政府。当日下午3时左右，接到回电，说：“既称证据确凿，应将首恶褚明远和郭某就地枪决，以资震慑。”于是在5时左右，即将褚、郭二犯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执行褚、郭二犯死刑时，还有一段插曲：郭犯一枪毙命，而对褚犯连发三弹不响。正在紧张之际，谁知褚犯素精武术，当时虽背有绑绳，脚有重镣，他一蹦二尺多高，连蹦带跳，就靠近人丛。一时人闪不开，不能开枪，有个警士谢世恒，几步跑至褚犯面前，用力拽住脚镣，褚犯才跌倒在地，另一警士连发两枪，褚才毙命。

事后传闻，当褚明远等被捕后，驻天津日军头子企图向当时华北负责当局提出交涉，索回褚、郭二犯。后知首恶就歼，盲从遣散，始行罢休。

当时国民党政权对于日军和汉奸的罪恶活动，事前既不敢揭露，破案之后，更不敢把案情公开宣布。更可笑的是，在破案数日后，驻北平的国民政府监察院河北监察使周利生偷偷地溜到涿县，进行了所谓“慰问”。在涿县商会住了一宿，次日又偷偷地溜回北平，临走还拿去几张传单和标语，并告诉我们说，他到涿县进行慰问的消息，千万不要发表。

这案件因未公开宣布，所以外面都不知道。记得当时仅有一家报纸上登载着几行小字，说近日河北省涿县有事。可是邻近各县都知道这事的真相，本来涿县出产大白菜，

每年春节前人们多到涿县去买，特别是固安县的人民。这年因知涿县有事，均未敢来，以致大白菜跌到三四角钱100斤还无人过问。苦了涿县菜农，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

（1963年）

冀东事变鳞爪

王六也

编者按：殷汝耕与日本关东军勾结远在1925年。郭松龄反奉失败被杀，殷任郭之机要秘书，仓皇逃匿新民县日领事馆，张作霖虽欲得而甘心，但不敢入内搜捕，殷得以在日本庇护下逃走大连。《塘沽协定》后，日军侵入华北，殷则利用时机，夤缘国民党当道，攫得蓟密行政专员，其后更兼任临榆专员。蒋介石思欲利用殷与日本之关系以缓冲，孰知引狼入室，殷甘冒全国人民之大不韪，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卖身降敌。冀东变色，日人顾问、特务机构，大烟毒品，日韩妓女亦随之涌至。卢沟桥事变，张庆余率部反正，战斗失败，日军经此重创，因将伪机构迁往唐山，撤免殷，以池宗墨继任。

冀东事变，系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连锁，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主要过程，笔者所选材料系由当时见闻回忆和采访汇集而成。

殷汝耕和日本关东军的勾结

冀东反动组织，祸首为殷汝耕，而发动嗾使者为日本关东军军部。殷和关东军的关系，远在1925年奉系郭松龄对张作霖倒戈之时。郭战败被俘而处死，殷任郭之机要秘书（专理外交事宜），仓皇逃匿於奉天省（辽宁省旧称）新民县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视为奇货可居，乃横加庇护。张作霖以殷参与背叛阴谋，必欲得之而甘心，遂派大批军警秘探包围馆外，经数月之久，不敢人内搜捕，实则仅一矮垣之隔。一日，军警忽发现殷汝耕乘汽车自领事馆急驰而出，当经迅速予以逮捕，及送至某军部，始知所捕者系日本人，其面貌和殷相似而出以伪装者，虽立即释放，而日本领事向张作霖提出极严厉之抗议。张作霖除派新民县县长亲临日领事馆道歉外，并予“肇事”军警以相当处分。不久，复见殷汝耕乘汽车驰出，军警相顾不敢动，听其逃往大连而去。殷遂自视为鹰犬，甘受日人之豢养，思相机以报效。于此可见日本侵华用心之深。

冀东反动组织之成立

1933年5月中日《塘沽协定》，非法划冀东为禁设军备区域，日军势力遂由伪满渐侵人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殷汝耕则利用时机，夤缘国民党当道，攫得蓟密区行政专员职位，专员公署设于通县文庙。其后更兼任临榆区行政专员。国民党想利用殷和日本之

关系以缓冲，孰知引狼入室，殷和国民党政权貌合而神离，和日本关东军暗通款曲，携日本以自重。终于在关东军嗾使下于1935年11月25日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全国骇然大哗，据当时通县邮、电两局业务人员称：殷在当时接到全国各地反对、劝告、唾骂等各类文件不下千余件，殷概悍然不顾，置若罔闻。又据当时伪组织内部人员称殷之初意，欲用部院名号组成“政府”，以“国家”的姿态出现，后考虑到面积过小，人口过少，乃降为省的规模，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设长官公署，署内设秘书、保安、外交三处，署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殷之头衔为“政务长官”，任池宗墨为“秘书长兼外交处长”，张仁蠡为“民政厅长”，赵从懿为“财政厅长”，王厦材为“建设厅长兼教育厅长”，1936年春王辞“教育厅长”，以刘云笙继任，后又增设“实业厅”，殷体新（殷汝耕之侄）为厅长。利用冀东区域原驻防之保安队为反动武装，分为四大队，总数官兵一万五千人，以张庆余为第一大队队长，韩则信为第二大队队长，李允声为第三大队队长，张砚田为第四大队队长。一队队部设于通县（东街老衙门旧址），二队队部设于密云县，三队队部设于唐山，四队队部设于山海关。于县城鼓楼前大街开设冀东银行，赵从懿兼任行长，劣绅宁夔扬任监理。发行冀东伪钞，和国民党之法币等价交换。综计当时圈入伪组织之下者凡二十二县——通县、三河、宝坻、蓟县、香河、宁河、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平谷、丰润、玉田、遵化、临榆、抚宁、乐亭、滦县、昌黎、卢龙、迁安、兴隆，总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更于每县推出一人为“建设委员”，成立“建设委员会”，藉以勾结地方的豪绅和地主。此外于伪长官署内设“顾问”、“谘议”两闲散名位，任职者为来自各地的失意的流氓政客，皆优其薪给，“顾问”月薪多至300元，“谘议”亦多至200元。“顾问”只是伪长官的高等清客，“谘议”为数最多，大部远住平、津，形成挂名支薪的食客。

殷汝耕和宋哲元的关系

殷汝耕在冀东伪电台上，曾经一再向全国宣称“冀东自治”是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成立协定而产生的，约定同时发动自治。并将宋之代表萧振瀛（当时任天津市长）在天津会议席上的谈话，全部揭出。所以自天津返通后，为了实践协订，毫不迟疑地即行宣布自治云云。揣其发言意旨，一方面似谴责宋之失信，我殷某系因受骗而登台，另一方面又似是揭宋之反动阴谋，使其不安于其位，以促其实践密约，从而扩大反动势力。其一，通县城南城外，原驻有宋哲元二十九军约一营，和城内伪组织相安无事，且每日派士兵二名和伪组织之警察共同岗位南门，令一般人莫名其妙。其二，伪组织在北平、天津两地各设有冀东办事处，宋则听其自由活动，毫不加以干涉。其三，殷汝耕、池宗墨、王厚材等在北平均有私人住宅，诸人朝来暮往，自由出入，宋若无闻见也者。其四，1936年伪组织成立一周年，举行纪念，由北平约来许多戏剧、曲艺名演员，前一日出京者安抵通县，翌日出京者，全部被扣留于朝阳门，使纪念日大刹风景。总之殷宋之关系，迄未十分明确。

日本关东军部对伪组织统治的概况

当伪组织成立后，甫半月，即有日军陆军一小队进驻通县城内新城北街之西仓（当时河北省立女师范分校），称日本守备队，并随来日本宪兵两名，住于大关庙胡同，租赁民宅居住。为时未久，日本特务机关复出现于东仓，机关长为陆军少佐桑原，庚子事变后，太阳旗再度出现于通县。此后在22县逐渐派遣有日本顾问，同时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城内日渐增多，韩人尤占大多数，大部皆携有眷属，经营各种企业，最惹人注意者，为韩人开设之妓馆与白面房（贩卖海洛因毒品），因此粉妆黛抹、花枝招展的韩籍妓女招摇过市，与鸠形鹄立、面容憔悴的吸毒者接踵街头，大为通县市容“生色”，而毒品遂由秘密渐变为公开。渤海沿岸之秦皇岛，冬季不冻，为冀东地区惟一之出海港口，殷汝耕辟之为低税口岸，以是货物之由天津输出和输入者，均改道于秦皇岛出入口，大批日本货物源源入境，其中以人造丝最为充斥市场。同时通县城市人口激增，房价高涨，由于生活消费量激增，商业一时形成庞大臃肿现象，表现出虚伪的繁荣。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部又使伪满洲国和冀东伪组织建立戏剧式的“国际关系”，伪满派伪专使李垣（前曾任京兆尹）来冀东“祝贺”，李之扈从众多，声势煊赫，殷汝耕除举行盛大之欢送外，旋亦派池宗墨为“专使”，往伪满致谢，当时人民讥之曰“黄鼠狼访耗子”。日军部此举意在使伪组织脱离祖国在本质上益加强化。

伪组织的反动设施

“建设厅”于1936年春季首先建立广播电台于西仓广场。同时在西门里大红牌楼附近成立“冀东日报社”，池宗墨兼任“社长”。电台报社是当时实行反动宣传的两个主要机构。通县城关“市政公所”亦同时宣告成立，“所长”由通县伪县长王季章兼任，首先整顿市容，除自西门至文庙街修筑渣马路以利要人汽车通行外，更出官工为马路两旁居民住宅修正墙壁，以夸耀于“外宾”，并“市惠”于市民。殷在城南郊老四营地区，强购民田，强移坟墓，建筑飞机场一处，实则殷只有飞机一架，但所费殊不赀。又将西海子地区辟为公园，架桥建亭，藉以粉饰太平。在西海之东岸，建立冀东礼堂，以为一切集会场所。

曹桢与李宣钺的动态

伪组织发轫于通县，通县县长曹桢首当其冲，曹始则虚与周旋，旋即乘隙逃避而归于河北省政府。宝坻县县长李宣钺以殷之契友关系而获伪职，极贪污之能事，县民为之切齿。李宣钺于1936年春携某月应上缴款8万元潜逃，“冀东日报”据实登载其事，殷竟老羞成怒，大发雷霆，斥责报社总编辑不为守密。

冥寿与建筑私宅

1936年春季，殷为其父母举办冥寿，寿堂设于伏魔宫（庙名），收到伪属下官吏尤其是22县的伪县长各类的礼品，不可胜计，最惹人注意者为金、银质之冥器若干件。其对伪职僚属，明敲而暗剥。殷自以为百年大业，于以完成，乃选择万寿宫地区建筑长官私邸，强购民宅50余家，限期拆房迁居。工料费为伪钞70万万元，遂着手兴工，式样中西合璧，称曰“殷府”。当时通县人民皆窃称之曰“阴曹地府”。乃工事进行一年，工程仅成一半，其壮丽可知。1937年保安队事变起，随“御座”之倾倒而停工。

伪组织之内讧

殷自建名号以来，发号施令，一切进行无阻，大有踌躇满志、顾盼自雄之概。保安队第一大队队长张庆余因之亦有垂涎思逞之意，同时更有因攀附不满所欲之辈，联合起来，盛倡军政分权之说，于“政务长官”之外，再设“军事长官”一席，开始向“建设委员会”和日本特务机关分别接洽，作初步酝酿。殷闻讯大惊，乃使池宗墨出面向张庆余作大力疏解，在池宅（城内老仓胡同）欢宴，折冲于樽俎之间者，经旬日之久，其洽商之条件，外界虽不得而知，然军与政分权之说，自此竟告平息，殷张之间，貌合神离，不问可知矣。

保安队之反正

（1）反正之前奏曲

自七七事变爆发于卢沟桥，通县形成日军之后方基地，殷调张庆余部集中于通县县城，以备万一，凡城关、路口、邮、电等局以及各伪机关，均派有保安队武装岗位，局势骤然紧张。日本特务机关长陆军大佐细木繁决计消灭原驻南门外高悬青天白日旗的那一营二十九军，希望得到保安队的协助，但张庆余袖手按兵不动。7月25号细木繁往自强社（在南门内北二条胡同系俱乐部性质）打球，和张庆余相遇于该社，细木责问张庆余为何按兵不动？张庆余说：“保安队的责任是保卫地方治安，管不着作战，而且中国人也不能打中国人。”细木怒形于色地说：“我免你的职。”张亦怒，唾之曰：“你也配。”并掏出手枪欲向细木射击，经众人劝罢而散去。7月26号拂晓日军在城内潞河公园地区向城外二十九军营地发炮，城外还击。同时上空飞来日机数架，不向新城南门外二十九军营地轰炸，直向旧城南门外老四营地区保安队教练所内投弹，保安队急将五色旗展铺地面以制止之，日机不顾，投弹自若，官兵伤亡百余人，士兵不得已向城内奔窜，且行且骂日军。事后特务机关向保安队道歉说，由于电报误拍新城为旧城，以致发生不幸事件云云。虽经道歉解释，而保安队怒终不解，认为日军有意而为之，据称第一大队参谋长沈××（腿有残疾，绰号沈瘸子）主张反正最力。日军最后于7月28日对二十九军实行夜袭伎俩，于是日夜半由西仓营地出发，潜出新城南门，将二十九军营地

宝通寺包围，始发现寺内空无一人，方惊愕间，二十九军忽从铁道南侧青纱帐内冲出，越铁路，直逼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大败，退守城内。二十九军乘战胜之势，全部退出通县境。日军方面弹冠相庆，而保安队反正之轩然大波，乃继之而起。

（2）反正之经过

张庆余与沈决计反正，计划极为秘密，殷与细木繁毫无知觉，于7月29日夜12时布置部队向三方面出动。第一方面包围伪长官署及各机关，当出动之前，先用电话将殷之卫队长李××骗至队部（东街老衙门），甫入门即自后狙击之。以此第一方面部队很迅速地攻入伪署。殷闻警，亟藏匿于贮藏金银冥器（冥寿所收）厨柜之顶上，保安队搜殷不获，乃威吓殷之差人，逼其指出殷之所在，差人乃佯言："长官！请出来罢，张大队长迎接您来啦。"殷信之，自厨柜顶一跃而下，立被拘捕。至此殷始知保安队已反正。细木繁的公馆在北门内北大街，距伪署仅一巷之隔。细木闻枪声，自公馆急驰往伪署，经通县县政府门前，与保安队相遇，连遭狙击，就地殒命。其攻入各伪机关者，遇日本人一律就地枪决，遇中国人一律予以拘捕。第二方面出动部队围攻日本侵略军大本营西仓，日军主力部队已开往前线，仅有少数守营底，全部集合，伏处于红楼（用红色砖筑成，通称为红楼）之内，作困兽之斗。但保安队不知底细，颇有恐日心理，且明暗相悬，攻守异势，激战半夜，迄未攻下，加以红楼西侧部队向红楼发炮，误落东侧自己阵地，因之造成混乱。相持至30日上午10时，飞来日机两架，且侦察，且投弹，保安队乃解围，退出城外，全城秩序遂陷于混乱。下午2时飞来日机十余架，大肆轰炸，声震屋瓦，北关外吕祖祠一带投弹尤多，保安队伤亡颇重，时殷已自伪署移出，拘押于吕祖祠，伏匿于供桌之下，幸免于死。第三方面部队向街巷出动，协同警察按户口册搜查日本人和韩国人，时正在人们深夜熟睡之际，不论老幼男女，都驱出户外，一律执行枪决，一时枪声四起，全城哭喊连天，尸体满街，血腥刺鼻。当时亦有南方人初到通县不按北京语而被误杀者。韩人死亡数字，传说颇有出入，有两个数字可为征信：一为静安寺西配房日人设立之灵牌计之约230名；一为新城南门里三官庙胡同日人设立之慰灵碑计之则为500余名。或谓静安寺所祀者，均系有一定之地位者，其信然欤？综计当时保安队三方面出动，虽一时获得大部胜利，终由于日本之野蛮轰炸，且无后援支持，结果全面崩溃，官兵星散，张庆余仅以身免，殷当保安队溃散纷乱之际，只身徒步逃往北平。通县市民且惊，且喜，且惧，惊事变爆发之突然，喜局面得自此反正，惧日军之势必复仇，相率弃家逃于城外，新城南门外潞河中学，形成惟一之避难所，因该校悬有美国国旗之故。同时奔北平者，下乡投亲者，络绎于途，全城十室九空。时正当炎暑，尸体横陈，满城腐臭，家畜失主，饥饿奔窜，庚子事变而后，实为通城最大之动乱。

（3）日军之凶恶态度

当保安队撤出通城之翌日（7月31日），大批日军自西门源源入城，据称日军原抱屠城之决心而来，以图报复，赖有漏网的通县日本顾问长友夫妇（当保安队搜索县署时，长友夫妇藏匿于大堂后之廊厦上，长友曾亲手缢杀怀抱中之幼子，以是得免于死）

和日籍少妇藤原莲子（住监斋庙胡同，由房东掩护，得免于死），为之证明一切都是保安队所为，与老百姓毫无干系，始撤销全面屠城之意。虽则如此，日军把守城关，极为凶恶，有胡氏兄弟二人在北平经商，闻通县警报，回家探视，被挑杀于西门外，刳腹流肠，抛尸体于护城河。各城关类似事实不胜枚举。又有女子师范青年女工友唐静赴北平，路经西门，被剥下全身衣服，赤裸受检查，唐静羞愤情急，放声大哭。各城关此类事实，亦不胜枚举。以此流亡之市民，无敢入城者。一城墙之隔，内外如隔重山。经两月之久，日军渐悟其非计，乃和留城未去之商民联系，设法招集流亡，城中秩序，才渐渐恢复。

（4）事变之结果

日军经此重创，对通县地区在心理上非常恐惧，因将伪机构迁往京山铁路要站唐山市。撤免殷之伪长官职位，而以池宗墨继任。由池宗墨出面向日本道歉，并赔偿死亡者之家属抚恤金 160 万元而结束此事。

（1963 年）

王揖唐汉奸案

曹增祥*

大汉奸王揖唐，早年依附段祺瑞，为安福派巨子。抗日军兴后，投降日本，通谋敌国，干尽卖国勾当。"八一五"日本投降，国土重光，王被逮捕归案。在侦讯过程中，王耍尽花招，几乎使国民党法院无法进行工作。笔者当时正在《华北日报》充当记者，直接参与采访这一重大事件。今将记忆中侦讯此案的过程记后，俾做为汉奸丑史之一，留供研究、参考。

死鱼不开口的战术

王揖唐，安徽合肥人。1877年生，原名赓，早年在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混迹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手下任职。后又依附袁世凯、段祺瑞。曾任北洋军阀内务总长，安福国会议长，南北议和总代表等职，成为安福派巨头。

北伐之后，直皖军阀均告失势，王在宦海中也宣告失意。1933年《塘沽协定》之后，日军侵华日急，到处搜寻走狗、鹰犬，为其侵华政策效劳。这个北洋军阀余孽王揖唐自然被看中。"冀察政委会"成立后，由日军把他安插在会内任委员，做为日军的内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平津同时沦陷。"八一三"后，日军占上海，大军直追南京。12月中旬南京陷入敌手。此时，大汉奸王克敏纠集一些军阀余孽、卖国分子，在北平组织伪"临时政府"，发表宣言称："……敝同仁等久甘淡泊，何所企图……不忍神圣河山断送于倭人之手，……因树立临时政府于北平。"王揖唐自列于"久甘淡泊"的"同仁"之中，附署于这一宣言，参加伪汉奸组织，任"司法总长"等伪职。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逃离重庆投降日本，发表了"艳电"，接着，于1940年3月30日组织了伪政府，冒充"国民政府"，并宣称"还都南京"。南京有了汪伪政府，成为所谓的中央政权，北平二王—王克敏、王揖唐的"临时政府"自应设法处理，以示"民无二王"。在日军的精心策划下，"临时政府"这一伪组织只有从名义上降等级。于是撤销了"临时政府"，另组"华北政务委员会"，仍管理华北五省二市的政事，实际上两伪组织是一码事，换汤不换药。"政务委员会"最高的头子称"委员长"，此职原由王克敏担任，不久改为王揖唐担任。"委员长"下设有各省、各部。伪河北省长为吴赞周，伪山西省长为苏体仁，伪山东省长为马良，天津伪市长为温

---

* 作者时任《华北日报》记者。

世珍、张仁蠡，北平伪市长为余晋和。周作人为伪教育总署督办，汪时璟为伪财务总署督办，殷同为伪建设总署督办，齐燮元为伪治安总署督办……等。

在汉奸中，王揖唐最为人民所痛恨。他一生奴颜媚骨，坏事干尽。1939 年，日军在中国成立“大陆派遣军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田骏六为参谋长，统一指挥侵华军事。不久田骏六奉调离职，王揖唐代表伪组织为敌酋送行。酒宴间，王出呈“感谢信”，歌颂日军的“丰功伟绩”。王在致谢词中，曾称：田骏六将离华回国，令人有离别慈父之感。真是认贼作父，寡廉鲜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事已登在当时的伪《庸报》和伪《新民报》上，引起人民切齿痛恨。

抗战胜利后，人民迫切要求逮捕大小汉奸归案绳之以法，以整饬国家纪纲，振奋人心，鼓舞爱国斗志。但国民党政权迟迟未办此事。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45 年 12 月中，军统局北方负责人毛人凤才奉命逮捕汉奸。军统在西城兵马司胡同汪时璟家宴请华北汉奸。王揖唐即在此宴会上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殷汝耕、齐燮元、周作人、缪斌、王克敏、余晋和、管翼贤、林文龙、游伯麓……等二百余人。经军统侦讯后，1946 年 3 月开始把全部汉奸移法院审理。

负责审理王揖唐一案的是河北高等法院刑二庭庭长何承焯。王揖唐也聘请大律师赵毅、刘璜等为他辩护。

在侦讯调查期间，王装疯卖傻，不好好回答问题。在侦讯中，他是十问九不应。正式开调查庭，法官问他姓名、年龄、籍贯等，均装聋作哑，不回答一句。他想如此拖下去，使得法院无法处理。当时旁听席上的群众及记者都非常气愤。消息传出，各报对他这种无耻拖延的态度同声谴责。

炮轰法院 舆论大哗

正在全国关注王揖唐死鱼不开口的态度时，王委托的律师赵毅等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声明。

王声明大意说：日本投降，国土重光，举国欢庆，揖唐参加伪组织，理应受到国法惩处。几次被调查、提审，均应据实供诉。但一直未能开口，这不是与法庭为难，而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什么苦衷呢？原来主审王揖唐汉奸案的刑二庭庭长何承焯，曾在伪华北政委会司法总署内，任过荐任级的伪职，系王当伪委员长时，手下的一名走卒，属于王的“旧部”。因此，王在声明中有两句警句，原文称：“（揖唐连日不开口者）盖小汉奸高居堂上审大汉奸，将何以杜悠悠之口……”不答话的原因，原来如此。

王揖唐声明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均称王揖唐固然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政府也太不像话，用小汉奸审大汉奸，真的将成为千古笑柄。平、津、沪各报，纷纷发表评论，批评、谴责国民党政权。国民党司法部下令，彻察此事。无可奈何，政府不敢申辩，恐怕愈描愈黑，只好下令撤掉何承焯职务，另委派吴盛涵为刑二庭庭长，继续审理王揖唐汉奸一案。

罪行累累 无法抵赖

新任的刑二庭庭长吴盛涵到任后，即着手对此案重新调查。经过一个阶段的准备，1947 年夏工作完成，于 1947 年 6 月 5 日公审王揖唐。

王揖唐汉奸案是轰动当时社会的重大新闻，其引人注意的程度，不亚于金壁辉汉奸案。公审之日虽在盛夏，但司法部街冀高法院大礼堂，仍挤满人群。

开庭后，推事官询问王姓名、年龄、籍贯、所任伪职，王都一一应答。对于他在汪伪职期间帮助日军举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屠杀无辜百姓，掠夺人民财物等罪，他虽上推下卸，诡辩一切是日军出谋，手下人经办。但罪证十分确凿，虽百口莫辩，他只有用“嗯”、“啊”等话，半推半就，支支吾吾地承认下来。

在审讯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王访日的一段。大约 1943 年，王亲率代表团访问日本，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王访日期间，曾受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召见。王到日本春风得意，到处吟诗表志。有一首汉奸奴才相十足的歪诗被法庭提出，作为卖国媚外的罪证。此诗由书记官向王宣读两遍，问他听清了没有。受审时王在担架上，着灰色囚衣，两眼紧闭。当时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出席旁听，坐于最前排。对王的一举一动看得很清楚。法官问他听清楚了没有，他连连点头，表示听清楚了。接着，法官叫他逐字逐句对这首四句话的七言绝句加以解释，并说明其主题思想，写作意图。王听到此，连连摇头，喃喃地说：“这是文人的游戏笔墨，写着玩的，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这诗是典型的用卖国贼语言写成的，是古今卖国贼作品中，一篇充满奴才相的作品。现据记忆抄录于后。诗的原文是：

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谢此心同。

从这首诗看王揖唐的奴才嘴脸，是何等清楚！“八纮一宇”是日本侵略中国，独霸世界的“最高理想”，也是日本的国策。“浴仁风”是说在“觐见”日本天皇时，在来日本访问时，有如沐浴于仁义道德的“春风”之中。“旭日萦辉”是颂扬敌寇有如旭日之东升，说明敌人的侵略事业是正在开端，前程无限。“递藐躬”是自卑、自贱，汉奸向主子叩头时的用语。“春殿从容温语慰”是感谢天皇的召见，把天皇对他们汉奸丑类祸国殃民行径的表扬，说成对他们的“温语慰藉”。最后一句“外臣感谢此心同”，自称“外臣”，简直是明目张胆的“纳表称臣”，是不折不扣的认贼作父行动。全诗固然未直接称敌寇为“慈父”，实际诗的主旨就在于认敌人为“慈父”。

这样无耻透顶的诗，王自然无法解释，也不敢解释。虽然王对此百般搪塞，支吾不讲真情，但是国人心明眼亮，王罪责难逃。

被处极刑 遗臭万年

大汉奸王揖唐，于 1948 年春，经冀高法院判决，被处死刑。在姚家井第一监执行。被提出时，王身着灰囚衣，面色惨白，当时他已步履艰难，无力前行。由法警硬拖着，拖到执行官面前，验明正身后执行枪决。 （1981 年）

日军包庇下的大规模海洛英制造厂

王　龙*

1940年，日军盘踞在天津市海光寺大兵营的“北支派遣”第二九〇四部队，收编了河北省大城县境内的一部伪军，号称大城治安军，委北洋时期毅军米振标旧部军官刘勋臣为司令。我曾在伪司令部先后充任副官、参谋，因懂日语，专理外事交际事宜。该部以筹措军饷为由，在日军包庇下，设置海洛英制造厂，我则被派办理与日军间的一部分联系工作，并曾是一个厂的股东之一。嗣后，我又曾充伪天津市禁烟局委员，故对海洛英制造厂内幕知之较多。

设立海洛英制造厂的由来

在1937年至1939年间，日军盘踞在天津市海光寺的“北支派遣”本间部队所属宫崎部队（1940年由松井接任部队长并改称二九〇四部队）勾结伪军张宝正部，以筹措粮秣军饷为由，在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设立海洛英制造厂。日军森冈部队（水路警备队），也勾结伪军河防队刘勋臣部，在大城县台头镇设厂制造海洛英。1940年间，日军指令大城县境的各路游杂部队待命改编，以致海洛英的制造曾在很短期间内中断。同年夏初，日军二九〇四部队将改编后的伪军统一称为“大城治安军”，并以刘勋臣改任“治安军司令”。改编完毕后又继续设厂制毒。日军既得坐收豢养鹰犬作为侵华帮凶之效，又达到了毒害中华民族之目的。这就是日军包庇伪军设立海洛英制造厂的由来。

厂区即“禁区”

伪大城治安军司令部驻在王口镇。日军为了包庇伪军大规模的秘密制造海洛英，总队长张兰亭、第一大队长张荫亭弟兄二人带兵进驻东滩、西滩、当滩（通称三滩）和张家营四个村庄，随即把这个地区划为海洛英制造厂区。四个村庄的位置，处于阡陌纵横的稻田中央，地势较高，居高远眺，四周原野，一览无遗。村内灰色高大的砖瓦建筑，沿街两侧排列成行，围绕村边有一条东通大清河、西贯子牙河、宽达六米左右的水渠，既能利用水源灌溉稻田，又可驾船捕鱼，堪称是渔米之乡。这四个村庄只有一条咽喉要路，通往15华里之遥的王口镇，经过整修的道路，大小汽车可以畅通无阻。在仅有的进出口处，刘部设有岗楼，派兵警卫。这个厂区的选定，为海洛英制造厂提供了厂

* 作者曾任伪大城治安军副官、参谋，办理外事交际，并为海洛英厂第五厂的股东。

房、水源和安全上的种种便利条件。但是这个寂静富饶的农村，骤然间变成了奇装异服的中外籍人熙来攘往，大小汽车络绎不绝的热闹场所，最后，竟被宣布为外界人难以进入的“禁区”了。

在这个所谓“禁区”先后共开设了五个制毒厂。现分述如下。

陈昆元及其第一厂

陈昆元，浙江宁波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是一个多年的制毒贩子。他由于长年累月地制毒贩毒、牟取非法暴利而成巨富，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均置有产业，一向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当时伪“蒙疆自治政府”为销售鸦片计，聘陈为伪实业部嘱托。陈则如虎添翼，因纠合其旧股东徐树浦、黄金声、周庆兆、刘某（忘记名字）等人，集资伪币500万元左右，并以开设在天津的“庆通银号”作为后盾，重操制造海洛英的罪恶勾当。于1940年5月，由其股东黄金声与刘部几度接洽后，遂在东滩里村占用了一所民房，即行开始筹备。在北房五间内，安装了全套蒸气排管，作为烘干车间。东房三间，作为泡制车间；西房三间，作为成品车间；南房三间，作为仓库。在同年6月筹备就绪，正式开工生产。按规模大小排列，这个厂就叫作海洛英制造一厂。“一厂”开工生产伊始，即在天津市镇南道（现在的睦南道一三三号）陈昆元私宅设立办事处，以计划指导全厂业务。除陈昆元本人统筹办理全厂事务外，以黄金声专理对外交际事宜，周庆兆配一副手朱金鼎专司会计，以蔡荣贵为技师，兼理厂内一切业务。蔡荣贵带领熟练工人二十余名进厂后，就地雇用了十人左右的临时工，预备生产。陈昆元借着伪蒙疆“嘱托”的便利条件，特为伪蒙疆政府出谋划策，在产地将“鸦片”制成坯子（又称一号），以便于运输，在原料方面，打开了方便的门路。故“一厂”自开工日起，即施行了昼夜两班的生产制度。在第一个月内，就用了原料600件左右（每件重量为一千瓦），成品达到880件上下（每件重量为700瓦），总计出了61.6万千瓦左右的海洛英。嗣后，每月均有所递增，月出成品达一千件左右。按当时坯子的进价，每件为13000元到14000元之间，而海洛英的行市，每件为25000元。平均核算，月出成品一千件，每月赚取不下2500万元之巨。况且“一厂”是由产地直接采购原料，成本既低，获利更大。

海洛英系属于化学范畴的一种产品。由原料到成品，必须经过溶化、过滤、抽出空气、烘干等种种比较复杂的操作过程。尤其需用多种药物、附料相配合。因而“一厂”特与开设在天津的日商昌荣洋行（西药商）签有长年供应合同，各种药物、附料由日本运抵天津以后，特在南开南华路（现在的南开公安局旁大院内）设仓库专代“一厂”储存备用。由于原料、附料质量优良，故成品货色非一般小厂所能比拟。

在运输销售上，也有他的门路。陈昆元在天津派其多年伙伴、日籍浪人高桥贤二担任运输任务。高桥与敌伪军警宪各方面的头面人物都有勾结，同时与一些日籍军用、民航飞机驾驶员和火车司机也有拉拢。他并豢养着一群走卒。其寓所（现在的多伦道一八八号）俨然像一个秘密机关。大批的海洛英一经出厂运抵天津，即行交付高桥收存，再根据成交数字，利用飞机或火车辗转运往上海、南洋等地销售。陈昆元原在上海混过

一个时期，他的旧伙伴钱阿毛、庄汉章等人是大流氓张啸林的老搭当，在上海市一隅的流氓地盘是吃得开、叫得响的人物。陈昆元曾在香港、澳门混过几个年头，在那里的富商巨贾中也有他的同类。陈昆元运销上海、香港、澳门和南洋的毒品，都是通过这些关系经销的。还有股东徐树浦，曾先后充任天津日本警察署的副探长和“特别行政区”（英租界被日军接收后的改称）警务处的监督。徐的胞弟徐树强，当时又是天津市伪警察局的特务科长。股东黄金声，与天津日军一四二〇部队的清水队长（特务队）、宪兵三野等人时常混在一起，尤其与北平宪兵司令部的大特务头子三谷更是早有勾结。1941年夏季，担当运输的高桥贤二到黄金声处相告说，起飞于北平西郊机场的民航班机，发现宪兵检查较严，暂缓运货去沪。黄则大包大揽地说，此事由我去办。果得借助三谷之力，以宪兵司令部专用汽车送入机场装机运沪。约在1943年夏季，日军宪兵准尉柳泽突然接到命令，调赴南洋战区新加坡工作，因他与陈昆元是最好的朋友，遂托陈照顾居住在天津的妻儿。陈认为有机可乘，一面答应了柳泽的托付，一面托柳泽顺便带十件货（海洛英）去。相约乘上火车后，派高桥的助手小林送去。不料被日军驻车站宪兵查获，遂将小林及带送给柳泽的海洛英一并带往日军宪兵队。可是当陈昆元去日寇宪兵队一说，马上把毒品取回，小林也被放出来了。

二　厂

海洛英制造二厂，位于“厂区”的东滩里村北端一所民房里，于1940年7月开工生产。这个厂的股东是清一色的朝鲜籍浪人。以大股东宋玉良为首，还有崔荣吉、张千寿、孔林等人。有伪币400万元的资金，宋一人占有50%。宋玉良办理进料、销售和掌握会计，崔荣吉住厂总管一切，孔林任技师，张千寿亲自驾驶汽车担任运输。并设厂办事处于天津宋之寓所（现在的营口道十八号楼上）。“二厂”制造的海洛英，是一种特大号颗料状的估轻产品。一个货的重量，虽然与估重产品同样为七百克，但是一经包装起来，则比估重产品大4倍到5倍，因有“大包子”、“小包子”之称。“二厂”虽然人手较少，但是产量大，成品月出800件上下，产品运抵天津后，多由同国籍人经营的商号或人个收购。如金魁一经营的行址设在海大道（现在的大沽路四四六号）的“利津洋行”，国本荣治（借用日人姓名）、柳太太等等这些设庄收购的贩子，再零星地转手卖给一些小贩子，然后贩运到各个角落去销售。犹忆宋玉良曾邀笔者至其家中吃饭，由其俄籍老婆亲自下厨，并偕两个混血女儿作陪。他的室内摆设，概为欧化，而且犹太籍的商人往来不断。后来听说多系隐名投资和经销毒品方面的人物，说明“二厂”还有另外的来头。

三　厂

海洛英三厂，设立在“厂区”的西端张家营村，于1940年9月初开工生产。“三厂”是一个中、朝籍人组成的制毒公司，以韩子秀为首，李西山、康少山、张克栋（后来退出另设第四厂）、白井（朝鲜籍）、姜某（朝鲜籍）、陈晓峰等股东组成。后来

把刘部伪大队长郭金暄也拉进他们这个厂当股东。拥有资金200万元（伪币）。资金实力虽然较逊于一、二两厂，但由于韩子秀能取得天津宝生、裕昌厚、肇兴等银号的支持，随时可以透支巨款。朝鲜籍人白井担任销售，因其本人兼营白井洋行（行址在今长城影剧院对过），设庄收购；故能货到款回，很少积压。月出产品最高达到500件以上。

四　厂

四厂系由张克栋纠合朝鲜籍人申大东、崔文华等人所组成。张、申原为“三厂”股东，因股东之间发生矛盾而退出，集资200万元，另起炉灶。并就申大东经营的大日洋行（现在的哈密道四十一号天津市制胶厂供销办事处）作为办事处。厂址则设立在位于“厂区”中央的西滩里村。于1940年12月开工生产。采用“基本”制造方法，即用鸦片直接制成海洛英的操作方法。由鸦片到坯子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鸦片进价低，损耗小，质量纯，获利大。每月成品达300件以上。由申大东联系尹仁仲、木村、金井等同国籍人设庄收购代销。而张克栋背后有日军宪兵德岗作为靠山。

五　厂

海洛英制造五厂，由周景山、张明三、朱鸿儒、黄雨亭、刘健才、刘惠民、王龙（笔者）等人组成，资金初为150万元（伪币），开工后增至200万元。厂址位于张家营村北首，于1941年7月初开工生产，月出产品300至400件。组织规模与三、四厂相同。全厂业务由周景山主持，朱鸿儒掌管会计，笔者则担任对外交际。张明三、刘惠民长期住在北平采办原料。并设厂临时办事处于帝国饭店内（现在的华北合作总社）。采办原料系在北平散购，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由大同人张子英供应数量较多；二是购于山西省人刘景山之手，刘当时与日籍人合资，在北平前门外廊坊头条开设“东华贸易社”作为掩护，实际代理伪军王兰部军官兜售鸦片、坯子。刘曾纳娶日军天津陆军特务机关警政班长诹访部之外甥女水村惠子为妾，凭借敌势，扬言购买他们的货可护送出境，不会出事。另外“五厂”股东张明三，则在南口至北平段铁道护路司令张宝正北平住所，制造坯子卖给厂内，并且借周景山之把兄弟、日军宪兵准尉上田的势力，随时由平运津，故“五厂”从来没有停工待料之虞。

敌伪军警宪的包庇和分赃

敌伪军队、警察和宪兵，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一向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在包庇制毒方面也是如此。伪军刘勋臣部在统筹办理的名义下，分向各个海洛英制造厂索取“保险”和交际费用，平均每厂六万元左右。当然，他的顶头上司日军二九〇四部队是有份儿的。刘勋臣每月都要邀请联队副官富泽大尉、参谋长木原永夫中佐，在天津最著名的敷岛、神户馆或天津会馆等日本大酒家摆酒设筵相聚。一桌上等酒

席不下四五百元之多。每次在分手时，刘总是把预备好的大卷钞票（300 元左右）塞进他们的腰包。在互相勾结利用的情况下，他们还替刘勋臣拉买卖。一次，刘勋臣派人通知我，说军部（指二九〇四部队）介绍几个日本人去看地设厂，要我好好招待。三天以后，果然来了三个日本人，我陪同他们围绕“厂区”转了一圈，其中一个叫野村的说：“的确是一个‘吗啡’村庄呢!”嗣后据说，这个厂由于出资最大的股东回国而致搁浅。一些小股东则隐名出资加入“四厂”。

1940 年冬季，刘勋臣去大城县宫村一带视察防地时，日军王口镇驻屯队长保科武雄偕往。到达宫村后，遂至日军队部拜访。一个分队长宫下准尉一见面，即对刘说：“王口镇有一个赚钱的买卖，你一个人发财不行啊。这个事王口镇的驻屯队长是知道的。”保科在侧只是哈哈大笑，接着宫下、保科二人又互相耳语，随后保科又对我说：“他（指宫下）对刘司令很不满意，认为缺少联络，是看不起他。”当时我把这些话翻译给刘听后，他当然也就明白了这番意思。辞行时，我与保科故意先走，刘最后退出坐上汽车后，才说送了宫下 1000 元，以后每月如数照送。

1941 年 6 月，日军发起所谓夏季“讨伐”。霸县日军驻屯队长武石带兵窜入东滩里村。因其未能参与分赃，将海洛英制造一厂封闭，并把全厂工人和产品 50 余件一并解往静海县多多良部队处理（因系多多良部队的“防区”）。刘勋臣得知后，就派参谋长秦铁英和我前往交涉，始将工人领回，产品发还，后刘勋臣送了 3000 余元了事。

各厂的大小汽车往来于天津制造厂之间，必须由二九〇四部队的“防区”驶过。因此盘踞在静海县的中村大尉、山内中尉，王口镇的保科准尉，独流镇的大野班长，以及于 1941 年夏初换防后的多多良部队长，铃木少尉等等，每月都要分肥。单此一项开支，月计达 15000 元左右。这种包庇分赃事例，在日军宪兵中尤多，“吃”钱的胃口也大，还往往使用一些谋钱的手段。1940 年冬季，“三厂”股东康少山（刘部的伪军官），同静海县日军宪兵分遣长三野在静海县通往王口镇的公路上相遇，借词伪军军风纪不好，将康逮捕扣押（其实明知是海洛英厂股东），为此笔者和秦铁英向三野进行说项，一次就送了他 3000 元，始将康释放出来。嗣后经秦铁英手，每月送他 2000 元。

此外，如天津市伪警察局督察长周琨，分的赃款更多，每月 2 万元。管辖西营门进口的警察九分局长屠作梅月分赃款 15000 元。1940 年春季，张明三的汽车（时张还未加入五厂）至南开南华路博信堂仓库装载药水、附料，被该管警察二分局扣车检查，因车之底层另装有坯子 80 余件，张一时慌了手脚，遂找笔者代为说项。我因与警察二分局外事局员张文举系旧识，并言明以 1 万元酬谢，遂得放回。嗣后遂引以为例，由刘部月付 3000 元。沿途静海县伪县长王德春、独流镇伪警察所长郭有珍，每月共为 3 万元左右。又由土匪改编为地方保卫团的赵锡堂、李树田二部，虽然不曾规定数字，每次均经伪副司令潘九龄手送交万元，以酬“保护”之劳。

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海洛英的制造，在日军势力包庇下猖獗一时。本文所述只不过是大城县境内一个真实的写照而已。

（1965 年）

驻朝鲜各地领事参加王克敏政权的经过

杨　绍　权*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国民党政权驻朝鲜的外交机构，有汉城、釜山、元山、新义州四个领事馆和仁川、镇南浦两个办事处。设在汉城的，称为“驻京城总领事馆”，与其他三馆平行不相隶属；两个办事处则由其管辖（过去曾有一个时期称为驻朝鲜总领事馆，对全朝鲜各领事馆有指挥监督之责）。抗战开始，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仍抱“和平”幻想，认为“中日邦交”尚未裂决，故此南京外交部训令驻日本、朝鲜各使、领馆“照常办公”，没有依照国际惯例“撤使下旗”和派船接取华侨。日本军部早已声明“不以蒋政权为对手”，在华北酝酿傀儡政权。旅鲜华侨有鉴于1931年日本特务制造的平壤“七五”排华暴动的悲惨情景，深感身居异国生命财产得不到保护的痛苦，人人自危，便结集于仁川港，候船回国。日本统治者已掌握了国民党政权“暂不派船接取华侨，如愿回国者可以自由搭乘商船，个人行动”的情报，故意将航行于烟台——仁川之间的“共同丸”商船停航征用，并组成“国境守备队”封锁鸭绿江、图们江边境，使华侨不得回国，以便强迫他们参加华北伪政权。

一、驻汉城总领事馆“易帜”的前前后后

当时国民政府驻汉城总领事馆共有官员九名，他们是：总领事范汉生（安徽黟县人）、副领事苏驭群（江苏人）、主事叶俊恺（广东东莞人）、叶永青（浙江宁波人）、甲种学习员王建功（河北深县人）、委任办事员王永晋（山东荣成人）、书记袁毓棠（江苏扬州人）、译员李相殷（朝鲜咸兴人）、雇员金佑行（朝鲜汉城人）。另有随习领事张义信（广东中山人）、书记张秉伦（吉林人），驻于镇南浦办事处；随习领事杨啸鹤（贵州贵阳人）、书记王孝泉（安徽歙县人），驻于仁川办事处。

当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在朝鲜的统治者，即以汉城日本特务分子广江泽次郎等组成“朝鲜大亚细亚协会”，作为策动驻汉城总领事馆参加伪政权的拉线人，包围着范汉生。范汉生原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商司第五科科长，这是掌理对日通商事务的一个科，在南京和日本特务在一起，包庇走私，早就有了汉奸的背称，为人民所唾弃，只有国民政府才益加重用，派为驻汉城总领事，四年以来，和日本驻汉城宪兵队队长中村通则打成一片，几乎一日不见就一日不欢。他和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又是中学时期的校友，旧友相逢，政治上就更为亲密。宇垣离开朝鲜，新总督南次郎受宇垣所托，对范汉

* 作者本来是教育工作者，后来投入伪组织为驻朝鲜副领事。

生仍然关照殷切。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员，在彼时能够驾凌于伪满洲国驻汉城名誉总领事朴荣诘（朝鲜人，殖产银行总裁）之上，被尊为驻朝各国外交使节团团长，则其受宠于南次郎由此可见（使节团长虽由各国使节推选，但仍以和总督密切联系为条件）。

1937年10月，范汉生已得到华北产生伪政权消息，弹冠相庆，准备到北平面见王克敏，就和南次郎“请示”机宜。南次郎允许保荐他当上一个“督办”，并由朝鲜大亚细亚协会打电报呼吁，朝鲜总领事一职，则以驻元山领事马永发升任。南次郎的介绍信已经写好，马永发亦自元山到汉城送行。不想范汉生于出发前一小时突然脑溢血晕倒，立即送入京城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抢救，经岩井教授诊治后，范汉生保住了性命，但已半身不遂，不能执笔，而且语无伦次。12月上旬，范汉生由仆人张文登扶持，自汉城赶到北平，王克敏伪政权已组织就绪，范汉生到北平已误了“时机”。王克敏因南次郎的情面难拒，决定加衔为“公使”，仍叫范汉生回到汉城，“率领华侨”改换五色旗响应华北伪政权。范汉生返汉城召集驻朝各地领事联席会议（12月中旬于汉城），宣布他已决定参加伪政权，并要求各地领事参加，遭到驻釜山领事陈祖仙等的反对，被陈祖仙及驻汉城总领事馆副领事苏驭群大骂为汉奸，会议遂停。

1938年1月4日，正是元旦假期后开始办公之晨，有建筑工人八名到汉城总领事馆修缮房屋，其实是日本宪兵化装的。范汉生早已与总督府、宪兵司令部密谋停妥，准备于是日实行“易帜”。范等估计必会遭到阻挠，故先布置这批人马，守在旗杆附近。且国际惯例，武装警宪不得进入使领馆，易帜后才可以派武装人员进入。上午9时左右，范汉生取出新制成的五色旗一面，交与仆人张文登，命令他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卸下，悬挂五色旗。张文登从总领事办公室走到旗杆，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卸至一半，即被苏驭群从大办公室望见，追赶出来扭着张文登，其他馆员也赶来帮助苏驭群，纠着张文登，五色旗掉落在地。那些化装为建筑工人的日本宪兵，急将五色旗升上，并围着旗杆不让苏驭群等靠近，苏等遂到总领事办公室，指着范汉生大骂。及至五色旗一起，埋伏在总领事馆围墙外的武装宪兵，拥进总领事馆把苏驭群等八名馆员加以逮捕，扣押于汉城宪兵司令部。而汉城“中华商会全鲜联合会”亦遭到搜查。

和这同时，釜山、元山、新义州三个领事馆，受到当地宪兵队搜查，取去密码电本及重要文件，并将领事馆铜质官印封闭，但是没有拉人。釜山领事陈祖仙及新义州领事金祖惠打电报到外交部报告，接到外交部从汉口拍来复电说：“范汉生既已投敌，应予通缉，改派陈祖仙为驻京城总领事，办理善后”。陈祖仙从釜山出发到汉城，行至大邱，被大邱宪兵队拦截，谓汉城总领事馆已正式脱离蒋介石政权，如果陈祖仙追随范汉生参加新政府，可以护送他到汉城签字，否则请回釜山，不准到汉城。陈祖仙遂下车遄返釜山。

1月6日中午，驻元山领事马永发（个人历史详后）接范汉生电报招至汉城。这时，扣押于日本驻汉城宪兵司令部的苏驭群等八人，已经分别于受审时表示了个人的态度：只有苏驭群一人坚持立场，始终不渝地反对参加伪政权，其余叶永青、叶俊恺、王建功、王永晋、袁毓棠、李相殷、金佑行七名都已签字投降。1月7日上午，范汉生、马永发到宪兵司令部接出了他们七人，并由中村通则、广江泽次郎等陪同回到总领事

馆。苏驭群则由朝鲜总督府外事局转解至长崎，会同驻日本各地使、领人员，一齐遣送归国。在这里，应当补充说明一下驻日本各地使、领人员的情况：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在“七七”抗战开始不久，即已自行请假回国，大使职务由参事杨云竹代理。及至范汉生宣布参加伪政权，杨云竹通电到外交部请求立即停办驻日本、朝鲜各使、领馆，193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才以电报批准所有各馆“暂行停办”，全部官员回国到上海集合，仍以原职支薪五成，听候解决。于是在长崎会齐乘船回上海去了。朝鲜方面，除苏驭群保持气节，抗拒参加伪政权外，愿意回国的有驻釜山领事馆全体馆员包括领事陈祖仙共计五名（名单不详），驻新义州领事馆领事金祖惠、随习领事张镜微、主事张荷屏，甲种学习员李松侠，驻元山领事馆随习领事胡济川、主事缪文彝。这些人回到上海，仍然接受国民政府“留职半薪”待遇直至1943年伪汪政权接收上海租界后才中止，除中途变节参加汪伪政权为实业部参事的金祖惠、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李松侠外，到抗战胜利后又为国民政府外交部起用。

在汉城，甘愿投敌参加伪政权的范汉生等，演出了“易帜”丑剧后，得到王克敏伪政权的新任命，其名单如下：

（甲）驻汉城“总领事馆”：“公使衔总领事”范汉生、“副领事”杨啸鹤，“主事”叶俊恺、叶永青、译员李相殷、雇员金佑行、张文登、书记张东宸。（但叶俊恺在1938年5月回到香港，国民政府外交部又派他为驻香港领事签证货单办事处主任）。

（乙）驻新义州“领事馆”：“领事”马永发、“主事”冯文雄（原驻元山领事馆译员）、书记马继常、雇员张文英。

（丙）驻元山“领事馆”：“副领事”张义信、“主事”杨绍权。

（丁）驻仁川“办事处”：“主事”王建功、雇员王孝泉。

（戊）驻镇南浦“办事处”：“主事”王永晋、雇员张秉伦。

1937年1月10日，由朝鲜大亚细亚协会主办了一个“欢迎范总领事参加新政权招待大会”，除汉城伪总领事馆全体人员及各地领事到会外，朝鲜总督南次郎及总督府各个局的局长和汉城日本军政各界首要头子到来参加，首先参拜了“京城神社”，汉奸范汉生于“天照大神”之前，宣誓为日本及“新政权”效忠，然后发出由大亚细亚协会理事长广江泽次郎以日文起草、范汉生署名的《告朝鲜十万侨民书》，命令全朝鲜各地华侨，迅速成立“新民会”响应华北。是日参拜神社及开会时的情形，均由“京城日报社”电影工作队拍成《京日新闻》纪录片一辑。结集在仁川候船回国的华侨，被日本警宪人员驱逐回居住地点，多数遭到警署的拘讯，签字参加伪政权后释放。

二、四朝元老马永发

新任驻新义州“领事”马永发，当年已64岁。按照他的经历来说，那是一个“四朝元老”了。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当上驻元山领事以后，一直在元山港，多年没有调动过。他由清朝的黄龙旗开始，经过北洋军阀的五色旗和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到这次又改换为五色旗，一共四次“易帜”了（如果加上袁世凯建立帝制的洪宪旗，那还多一种）。无论国内政权怎样变化，他便自动易帜响应，元

山“领事”这个职位，就成为马永发“终身”的职业，恰如那些军阀盘踞一定的地区一般。华侨的资产阶级老板们，是欢迎这样一个“与友邦官绅打成一片”“轻车熟道”的职业外交官，以便于互相勾结、上下其手的。这样，马永发就一直在元山达45年之久，成了个不倒翁。

马永发本人的历史，因为他和我是“翁婿”关系，知道比较详细。他是清末驻日本出使大臣杨枢、驻德国出使大臣杨晟兄弟的外甥，又是驻朝鲜总领事马廷亮的表弟。光绪二十四年在广州黄埔水师学堂毕业之后，就跟着杨晟到柏林去，为使馆留学生，参加德国皇家测绘学校的学习，这是德国贵族们培养新兴资产阶级的温室。回国以后，恰好马廷亮当了驻朝鲜总领事，同时杨枢也适在日本出使的任内，便以亲戚关系当了驻朝鲜仁川领事，旋调元山领事。其时，在朝鲜境内清廷的外交官员还享有“领事裁判权”，汉城全市及仁川、釜山、元山、镇南浦四个港口划出专区，作为“租界”，华侨得在租界内自由购买土地，开设商店及工场，受到领事馆的“保护”，领事馆设有警察，有权逮捕涉及华侨民、刑案件的朝鲜人，由领事予以裁判。马永发在这时是以“朝廷命官”的姿态，威风凛凛地打朝鲜人的屁股板子，直接发挥着统治者的权势。虽然这种“领事裁判权”在日本并吞朝鲜的时候被撤消了，但是日本统治者还是“尊重”领事馆的意见，遇有朝鲜人和华侨之间的民、刑诉讼，领事馆有权参加旁听、辩护和提出不服上诉，所以朝鲜各地领事在传统上的特权超过一般的驻外领事。而“租界”在行政权的行使上虽已“撤销”，但仍然保留土地所有权至“无期限”的“继承”。元山春日町（原“租界”）除已有土地所有权人的地段以外，余下无主的5000多坪土地（每坪6日尺见方），于1911年以“华致和”的名义登记，保留永久“继承”所有权。从“华致和”这个伪造的名义人姓名，可以看见马永发历来主张“和为贵”的思想，因此不惜背离祖国、出卖人民的利益。

历代统治者对于这个老牌领事，都因为他和日本统治者“能于共处”而把他放置在这个元山领事位置上，一团和气“与邻善睦”，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政府开办了驻清津领事馆以后，又派他为驻清津领事兼任驻元山领事。这所驻清津领事馆的开设，蒋政府外交部的目的在于以之为驻海参崴总领事馆对苏联情报工作的中继站。但是，搞起情报工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暴行，自然必须兼顾一番。投鼠忌器，驻清津领事馆的情况岌岌可危。马永发是个善于“明哲保身”的人，他到清津不久，即迁回元山，遥领着清津领事的职务，以为“避凶趋吉”之计。果然在他去后不久，驻清津领事馆因甲种学习员倪某（蒋介石军统特务）收集对日本的军事情报，遭到日本统治者清津宪兵队的封锁，随习领事孙秉乾等全部被捕，清津法院以间谍论罪，判决徒刑，提前驱逐出境，造成史无前例的“裁判领事”的清津事件。但是，马永发这个一馆之长的负责人，却与案情毫无牵连。日本统治者认为他在朝鲜年久，一贯“亲日”，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而蒋介石政权又因他确实在元山，也难以责他失职。马永发就是这样“善于做官”的。假如是一个具有刚强气质的人，从“领事裁判”到“裁判领事”，也会感到“每况日下”，应离开这个岗位了，可是马永发照旧“怡然自得”地干下去，抱定“好官我自为之”的宗旨，企图终身“蝉联”到底。

七七事变发生不久，元山日本宪兵分队长木村澄，根据朝鲜日本军宪兵司令部的指

示，把范汉生策划参加王克敏伪政权的计划通知了马永发。45年来，马永发视元山领事这个职位为个人的终身事业，当然一拍即合，便于1937年11月到汉城会见了范汉生，和他秘密会谈停妥。马永发除本人参加王克敏伪政权外，并且从香港首先调我到元山充任领事馆书记，一同参加伪政权升任为主事，作为他的助手，以便更有力地统治朝鲜华侨。

三、我怎样从香港往朝鲜投敌

1937年春，我以“杨准”的名字担任香港梅芳中学高二班的主任教师，有时也为《探海灯日报》写稿，夫妇二人生活原是维持得来的。当然作官会比教学“威风”，这种权势观念支配着我的思想，就把民族节气抛弃无遗了。当我在报章上看到了《范逆汉生助纣为虐，参加王克敏傀儡政权》和《华北傀儡政权宣告成立》的新闻报道以后，我受特约在1938年1月2日的《探海灯日报》上发表了《居仁堂内群奸丑态》和《饭桶领事的臭史》两篇文章来大骂他们丧心病狂，无耻投敌，但经过了几天以后，我就推翻了自己的立场，悄悄地离开香港，投入敌人的怀抱。

马永发等降敌计划迫不及待，他们将我虚报为驻元山领事馆书记，将名单送到北平伪行政委员会，王克敏批准了委任我为驻元山领事馆主事。其实，1938年1月我还在香港。当接到马永发从朝鲜寄来的信和驻京城“总领事馆”的证明书（证明书另附贴宪兵队的附带证明）时，我既高兴又顾虑，思想极为矛盾。我有一位表叔，名叫马长亮，是马廷亮的族弟，曾于马廷亮任驻朝鲜总领事时，在釜山领事馆当随习领事，后来调部在亚洲司服务，这次因外交部的精简，停薪留职在香港居住。我便向他请教，他非常赞成。原来他是高宗武的助手，秘密接受了汪精卫的命令，正和日本进行“和平谈判”。他对我表示：“和平”（指汪精卫的投降）一定会实现，问题在于迟早，大家都将会在“亲日”的道路上碰头。在他的鼓动之下，我去朝鲜的念头便决定了。（后来马长亮曾经成为陈璧君的随从秘书，伪汪政权外交部参事，伪驻台湾公使待遇总领事）同时，我又写信到重庆，向我的父亲杨殿镳请示，他是蒋政权外交部电报科荐任科员，随迁都刚到重庆。在我的信里，我只说“随岳父经商，将赴海外”，所以他也赞成。

香港的同胞正在热烈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街街巷巷都张贴着抗日宣传标语，使我感到震惊。我跑到大阪邮船株式会社香港支店去打探有没有开往长崎的船只，当我问明暂时停航以后，刚跨出门口，就有一个壮汉从海皮那边走过来，他以粗暴而威胁的神态质问我：“为什么到那里？是不是要去日本？去日本干什么？”我编造一番假话支吾地回答道：“我有个亲戚在日本经商，打算回国，因年纪老了，要我去接他，到这里看看有无船只，并没有什么事情联系。”虽然被我抵挡过去，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也不知那是什么人和他的用意何在？在香港，“抗日锄奸团”的活动已然展开，我曾签名申请加入以立法委员叶夏声为首的“锄奸”组织。知法犯法，使我心里更是忐忑不安的。由于这个缘故，我决定搭乘“亚细亚皇后”到长崎。“亚细亚皇后”是英国邮船，到那里购票是不会“启人疑窦”的。这船先经上海，再到长崎，我先买了两张到上海的船票，打算上船之后再补票，上船后又被船长拒绝，要日本人才准到长崎。

上海群众抗日的气氛不亚于香港，许多商业性报刊也宣传“国共二次合作”，我经常投稿的《宇宙风》亦以首要篇幅刊登着歌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特写》，我深虑又遇到大阪邮船会社门前那样的壮汉，在大东旅店开了一间备有电话的房间，以便探询到日本的船期。一般答复都是“暂时没有船只到日本”。最近航程只有一艘“太古”轮船到烟台，过去烟台有船只到仁川的。我又仓皇离开了这个还是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上海。

我的估计：烟台已经沦陷了。可是船到烟台之后，却出乎意料之外。码头上还是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本军还没有“进驻”。时逢春节休息，许多商店都关门闭户，市面上很冷清。住在姜同泰旅馆，工友许某告诉我：“日本军已进入福山县，离烟台很近，曾派人来接头和平接收烟台的问题，市长早就跑了，由市商会主席负责维持，日本军这两天就会来到，现在市面上流通的钞票，是商会临时发行的，灯下不用，以防假造”。将近傍晚，有一个国民党警察保安大队的人，全副武装，来我的房间巡逻，我以为将对我有所不利，准备一番话应付他的盘问。后来来了一个女人，和他双双走入对面的房间，乃知是在这旅店幽会的，使我虚惊一场。翌日，日本军进驻烟台，没有响过一枪，就“接收”了这个都市。我拿着伪驻汉城总领事馆的证明书去访问日本军的部队长，因为有着汉城宪兵队长中村通则的副署签章，他立即派人到轮船公司联系，查得中午12时有太古轮船“夔州”号入港，停4小时开往天津，便决定由天津乘火车通过伪满到朝鲜。这个日军的部队长在我们上船的时候，用小电船（江兔子）护送到“夔州”船。

到天津，市面上已换了五色旗。我的“惊魂”才安定下来。以阴历计，于“祭灶日”离开香港，在上海到烟台旅途中度春节，到了新义州恰巧是“人日”（农历正月初七）。马永发这时已自元山转任到新义州，他介绍我和新义州宪兵队长伊藤长三郎相见，伊藤当晚在安东“鸭江春”设宴招待，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外交宴会”，在座的有伪满洲国安东省长丁超，伪满驻新义州领事谷中山和安东、新义州的巨商匡景超、宋寿山、毕心之、林炳炎等。

四、元山领事张义信

新任伪政权驻元山领事的张义信，虽是广东中山县人，但足迹却从来没有踏回祖国，更谈不到回乡。他父张衡是一个从小就到日本长崎经商的华侨，和日本女人结婚，生下了张义信就迁到朝鲜仁川来。张义信在日本学习时，又和日本女人荒井登美结婚，作为荒井氏的继承人，他又叫作“荒井义信”，其子女惠美、惠芳、文辉都是冠着荒井的姓，一家三代都用日语谈话。由于张义信精通日语，充当了驻汉城“总领事馆”译员，进而为主事、随习领事。张义信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即加入了浪人组织“黑龙会”（类似旧时的“青、红帮”，入会者于身上刺黑龙为记号），是头山满的徒孙。他在朝鲜领事馆参加工作之后，和汉城宪兵司令部发生了外交上的关系，便受到宪兵司令部的收买，每月接受津贴200日元。他参加王克敏伪政权后，宪兵司令部便停止发给这项津贴，因为他监视华侨的任务已经完成，日本人直接掌握这项工作了。他曾对

我说：当了元山领事，名义上是晋了级、增了薪，但实际收入却减少了。我才知道他历来是个日本特务。

张义信在参加了王克敏伪政权之后，刚刚准备到元山就职，却被镇南浦领事馆后园的一株枯树折断时打伤了右肩，骨骼撞断而入院治疗。我到元山时，他还在汉城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留医。这时马永发已到新义州，馆务是由驻仁川办事处主事王建功暂代。要等张义信到后，方能正式开馆。1938 年 2 月 15 日，张义信来到元山就职。是日，在元山神社前举行了仪式。发出《告管内侨民书》，具体指出：1. 所有“管内”咸镜南、北、江原三个道各群“侨民”，应即追随领事馆，参加“新政权”，与“友邦”提携合作，实现“和平”。2. 成立“新民会”，所有侨民除妇孺外，一律要在“决议书”上签字，交领事馆保存一份。3. 所有华侨学校，一律采用“新政府”审定的教科书，学校及学生旧有书籍，必须焚毁。高小以上，要增加日语课程。4. 重新进行华侨登记，以便“领事馆”掌握侨民居住情况。这四条是经过张义信和宪兵队长木村澄、警察署长藤田乙治郎讨论后决定的。驻元山领事馆的一切措施，虽然表面上没有日本人参与，但一切听命于宪兵队和警察署，并且由日本特务北鲜日日新闻社元山支店长中岛光一郎以“建议”的方式加以策划。所有驻朝鲜各地“领事馆”，一般都有这样一个类似“顾问”的日本特务来支配，这些人都是“黑龙会”的徒子徒孙。这种方式，表示保持“领事馆”在国际事务上的独立性，“中日关系”还是以友相处，日本不予干涉。

“领事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从官等上来说，并不甚高（自随习领事至总领事，均为荐任，主事为委任，办事员、书记、译员、雇员均为雇佣人员），但因是所谓“国家代表”，声势便比较显赫。又加上除本俸以外，还有勤俸和各项特别办公费等等，一个委任一级的“主事”，其实际收入已超过国内的简任官，真正是“名利双收”的优差肥缺。

（1963 年）

关于王克敏的几件事

张 炳 如[*]

“早就知道要出这么一回事”

1938年3月28日下午6时，华北巨奸王克敏，由北平东城煤渣胡同日本驻军寺内部队返回外交部街，所乘汽车在煤渣胡同东口向南拐弯时，突有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刺客数人，迎面向王汽车开枪猛击，给王保镖的日本宪兵山本荣治用自己的身子将王遮住，司机佟忠原开足汽车马力，直向外交部街驰去，车抵外交大楼院内，王发现山本已身受重伤，立嘱司机将车开去同仁医院，给山本诊治，王则因为山本的遮护未被击伤。他回到“政委会”对向他慰问的人员大声嚷着说：“我早就知道要出这么一回子事”。山本因为伤势严重，诊治无效，到4月11日给王当了替死鬼。事后王奖给司机佟忠原准备票50元，并把他哥哥佟华章派为行政部的雇员。

“我不怕日本人”

王克敏虽然以华北四省三市的土地人民，向日本换取了华北最高的统治地位，但他与日本驻华北的中下层官吏接触时，却还要故作张致地保持着他所谓的“政府首长”的尊严，对他们很少假以辞色，有时还以嘻笑怒骂的言词，形之案牍，或者在口头上给他们以种种的难堪。日本驻在北平的中下层分子，因为他是日本政府扶持起来的高等傀儡，表面上虽不得不表示敬畏，但在实际上却因为王不能作他们的忠实鹰犬，而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

（1）1938年3月初，日本政府给王克敏派来四个顾问（名字不记得了），分掌政治、军事、经济、财政等项事务，在他们到职的那天，王召集全体伪职员，作了一个到职的介绍，散会后，紧接着给各局室下了一道手谕，上面写着：

> 日本顾问是帮助本委员长处理有关政治、经济等项外交事宜人员，各局科不准与他们接头，如他们到科室调阅卷宗，须经过委员长批准。克敏3月×日

这些顾问也唯听这位“委员长”的话，始终未与局科接洽过任何工作，伪职员们在思想上也不认为伪政权中还有这一群顾问。

（2）1940年南京伪国民政府边疆委员会召集“蒙藏会议”，电召北平雍和宫札萨克喇嘛丹巴达札出席，丹呈请伪内务总署批给公假，这事以常理论，自应照准。但丹巴

---

[*] 作者曾任伪滦县公安局分所雇员等职。

达札以为开会日期迫近希望早日批准，就在去日本宪兵队请领旅行证的时候，顺便请求某大尉转向伪内署催促，某大尉当时即来伪内署与蒙藏事务处联系，蒙藏事务处把丹巴达札原呈加具意见，并说明某大尉前来联系请提前给假情形，王阅后，在原呈上批示“请假不准，日本宪兵队无权过问此事”。

（3）在齐燮元任伪内务总署督办时，为了便于统治华北人民，曾聘任日本宪兵队长某大佐为警政局顾问。1943 年齐燮元去职，由王克敏兼任伪内署督办，派刘宗纪为局长。刘到任后，正是更换警官制服的季节，刘遂与副局长窦以锐商议呈请王克敏拨款制做，这时日本顾问来了，在旁边插了一句：“应该做了，我去大使馆联络材料，给委员长写报告时，把我写上。”刘、窦两人知道这事一经加入日本人，一定要遭到驳斥，但又不好当面说明，只在文中叙述了做制服诸款之后，附带声明一句“本局顾问××大佐亦同意此案”，由刘宗纪签名发出。王克敏阅了之后，提笔批了“不准做，我不怕日本人”几个字即把原呈退回。第二天早晨，日本顾问到了警政局看见王的批示，气愤地说，我找他去，拿着报告去到王的寓所给王递了上去，王阅后立时把脸一沉说，你还是为这件事，我另有办法。就头也没抬回了他的办公室。日本顾问在那里僵了一会，垂头丧气地回到警政局，对刘宗纪还自我解嘲地说，他不愿作，我也没办法。从这以后，警政局就很少见到这位顾问的踪迹。后来王克敏又通知伪财政署给伪警政局拨款作了制服。

清洗齐燮元

1941 年 2 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下台，由朱深继任。朱把王兼任的伪内务总署督办改派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兼任。齐出身于北洋军阀，自视甚高，素以儒将自命，在就伪内务总署督办兼职的那天，于大礼堂把王揖唐的卑鄙行为和对事务拖泥带水的作风，痛加揭露和漫骂。由于朱深生性弱懦，碌碌无所表现，齐燮元更跋扈飞扬而得行专断。将与王揖唐有私人关系的伪内署职员如署长吴瓯、礼俗局王潜刚和所有的秘书、视察等一律更换为他自己的人，跟着又把他私人势力向外扩展。于 1943 年 2 月，在“政委会”提出，除去伪河北省长吴赞周、伪河南省长陈静斋的职务，任命先后曾在伪治安总署担任署长的杜锡钧为伪河北省长、田文炳为伪河南省长。

齐燮元掌握着华北最高的内政、军务大权的同时，还亲自统帅着华北军队，在外部又有两省地盘由他自己的下属掌握，遂把他的政见，向伪内务、治安两总署、冀豫两伪省府、伪治安各部队尽量地推行。同时还干涉到各伪员的生活细节，如对私人使用的名片，也由他的秘书室画一尺寸式样，通函他所能控制的伪机关和冀豫两伪政府照样印制。至此齐燮元感到踌躇志满而睥睨一切，重复地走着民初北洋军阀胁制北京政府的道路，事事强迫伪“政委会”为他发号施令。所谓的“委员长”朱深在这盛气凌人的军阀威势之下，成为他的政治傀儡。

1943 年 7 月朱深因病死亡，汪精卫又派王克敏继任伪政委会委员长。齐燮元因为他个人过去嚣张作风，感到极度的恐慌，嘱告他的高级部属伪民政局局长孙荣彬等逐级向下传达：“王委员长返任了，事事要注意，不要专断，特别关于公款的动用，须要缜

密地审核用途是否正当。"可是王克敏对齐在他去职期间的一切行为早已了解清楚，暗地里和王荫泰、汪时璟等计议，要乘着改组"政委会"机构的机会把齐燮元清除出去。经过较长时间的策划，将原有的伪内务财务两总署裁撤，改为内务财务两所，作为"政委会"内部机构，在征得汪精卫同意之后，于1943年11月10日召集全体"委员"开会，宣布改组方案，并把备好的总辞职呈文让"委员"们签署向伪府提出总辞职，齐燮元当时还借口改组机构方案，事前未征得他的同意，拒绝签署，后来见到各"委员"都纷纷签署，也就为大势所趋，于无可奈何中，提起笔来，签了"齐燮"两个字，而故意把"元"字脱落，就气昂昂地离开了"政委会"。

俞家骥是和事老

伪临时政府在每年年终都加发简任职以下的公务人员"年功加俸"一个月。1938年年终，伪行政委员会秘书所审核伪司法委员会报送的"年功加俸"名册，发现该会把"委员长"董康的名字和请支加俸2000元（特任官月薪为2000元）一项列入册内，与常会议决的办法不符，请示王克敏可否破例支付。王因董康年迈昏庸，窃据高位，对他早存有鄙视的成见，现在董又要请领"年功加俸"，更使他震怒，在原函上把董痛加申斥，最后说他"视国币如无人过问之物"。伪人事科长孙松龄见到这样批示，感到左右为难，因为"行政"、"司法"两会本是平行机关，对他们送来的名册，只能审查是否与原议办法相符，而不能对董加以申斥，如确有必要，也须提请伪临时政府决定后以明令行之，但把这事提到伪府，又觉得有些小题大作，经过几度推敲，苦无两全的办法，随带原函找伪行政部秘书长俞家骥商议，俞也认为如照王的批示处理，将更增加王董之间的矛盾，特避开诘责语句而就事论事的代为拟出这样一份复函稿：

> ……经核贵会函送年功加俸名册，系将特任官一并列入，依照原颁年功加俸办法，计应删除2000元，其余各项，核无不合，已饬财政部拨付……

函稿拟定后，孙松龄感到如释重负，常对人说俞家骥不但是办公文的老手，还是政府的一位和事老人。

五色旗与华北特殊化

1940年3月底，日本驻北平的军事当局通知伪北平市政府通告市民，于4月1日悬挂五色旗，庆祝汪精卫的"国民政府""还都"。伪市长余晋龢以汪伪政权已决定用青天白日旗为他的"国旗"，若再通知悬挂五色旗明是一种反对汪伪政权建立的表现，可是对于日本的命令又不敢公然违抗，在两难之下，向王克敏请示办法，王嘱余晋龢可以悬挂，随着通令华北省市，说明"国民政府"决定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原临时政府使用的五色旗，改为"新民会"会旗，现在"国府"已决定于4月1日还都，市民应一律悬旗庆祝，惟在"国旗"尚未普遍制妥以前，暂悬"新民会"会旗，以示庆祝。从这时起华北地方遇到节日，市民都把日本的太阳旗、汪精卫政府带有"防共"标帜的青天白日旗、"新民会"的五色旗并列悬挂在一起，五色缤纷，使人心摇目眩。

当时曾有不少人称赞王克敏善能通权达变，周旋在北平驻军与南京伪府之间。实际上王克敏知道这是日本军事当局对华北特殊化而发出的当头第一炮。

驻在华北的日本陆军，原不同意汪精卫成立中央傀儡政权，因而把王克敏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特殊性”尽量扩大，以便他们通过这个伪组织对实行华北的防共、治安、经济各方面的控制。从悬挂五色旗这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驻在华北的日本陆军与日本政府的步调不能协调一致和对驻在华中的日本海军当局矛盾的激化。

“盐”被溶解了

1943年11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把伪内务总署裁撤，以原内署的民政、警政两局组成内务所作为“政委会”的内部机构，把原伪内务总署的总务、秘书、视察、编审等职裁掉。

被裁人员因为“政委会”曾颁布有“公务员退职金条例”，呈请“依法”发给退职金，“政委会”根据他们的呈请，发给每人退职金一个月，被裁人员以为条例中有“因事务必要而退职时得发给退职金两个月”的规定，认为他们系因变更机构而被裁，是属于事务上的，还要再请加发一个月，但为“政委会”给批驳。在被裁人员不满的情绪中，编审张之兴尤为激愤，自动召集各员在他私宅中集议，坚持要为这批灾官一抒胸中不平之气。

张之兴具有文采，在伪组织中素有抗直之声。他写了一篇语含辛辣、讥讽的长文，首先叙述“当日军初据平津，地方亟需组织政务机构，以为国家政权中断之续，顾一般人士因当时玄黄未判，弱懦者卷伏而莫动，疑虞者静待以观变，独有洞明世界大局，有猷有守之士，始能追随委员长挺身而起，共筹国是”。接着又说他们拥护伪政权变更组织机构，但对伪组织于数年来辛苦效忠于“兴亚大业”的公务人员的“曲终不闻雅奏，交绝复出恶声”的措置是有极大“不平之憾”的。张为了加壮他们的声势，又另抄原稿，函送日本大使馆，请他们转达王克敏批准他们的请求。张之兴因为日本大使名为盐泽清宣，对大家幽默地说，我用盐的咸味来刺激委员长头脑清醒。

王克敏接到灾官们送来的这一件檄文式的申请，曾反复诵读，认为可以考虑他们的请求。第二天日本大使馆又把张的呈文转来，王阅后当时批了“不理”两个字，随着又把张的原呈给予驳回。并在批文中说明“以后不准再行渎请。”张之兴探讯明白王对他的呈文批驳原因之后，常对人说，“盐被水溶解了。”

（1962年）

回 忆"新 民 会"

张 子 钧*

一、"新民会"的成立及其性质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短期内侵占华北重要城市和各交通线，"新民会"是伴随华北伪政权而产生的一个企图分化沦陷区人民的组织，是在各地国民党党部仓皇撤走，为了破坏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日伪合作的团体。

抗战的八年间，"新民会"先后凑集了失意官僚、无耻文人、帮会流氓、一部分留日学生、国民党分子和伪满（特别是以旅大为中心的南满区域）多年培训的"二鬼子"等，对日伪的"统一"华北，起了许多"为虎作伥"的作用。

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全面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成立了殖民政权"满洲国"后，即组成一个"协和会"。这个组织，配合日本关东军来统治伪满各民族，从日本三岛以及朝鲜向中国东北移民。"协和会"的头头，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本庄繁的参谋长三宅中将（退役）。

"新民会"正是依照"协和会"而略加改造的组织。日军还在华中沦陷区搞过一个"大民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由日本的一个退役中将酒井发起了一个"东亚联盟"，在南京也设了中国本部，但由于汪精卫的投降，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这两个组织都逐渐消失，没造成多大影响。

二、初期的"新民会"

"新民会"成立于七七事变次年，即1938年，发起人是张燕卿和缪斌。张燕卿是清末南洋大臣张之洞的第十一子，是从伪满"文教大臣"任上来北平的。缪斌是蒋介石长黄埔军校时的亲信弟子之一，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张燕卿担任会长，缪斌任该会中央指导部长，缪斌发表了《新民主义》的小册子，以阴阳鱼太极图为图案的杏黄旗作为"新民会"旗，这时虽也集合了一部分失业国民党员如刘家骧、张君衡、赵济武等，领份日军津贴，却经过一年有余，未成气候。

（一个附带后果，是日军退役的佐藤中将利用"新民"二字，成立"新民学院"，专管培训伪政府机关的中下级官吏，一直维持到1945年，但始终与"新民会"是两个系统，并无关系。）

---

* 作者是当时伪新民会的成员。

1940年3月1日，日军鉴于张燕卿、缪斌的“无能”，乃对“新民会”进行改组：所谓“中央总会”除掉张、缪的领导，留用了原班的中日人员，把附属于“北支派遣军”的“宣抚班”和随军入关的原“协和会”分子都并入“新民会”，并且随着侵略军的足迹，把“新民会”的地方组织，伸入到各城市和沦陷各县，成立了各地的“事务局”。

“中央总会”（在北平）下设机构是：文书室、庶务室、弘报室、资料研究室、人事局、主计局、联络局、全联事务局、组织部（部下设三科）、厚生部（下设三科）、中央训练处。

改组后的“新民会”总领导人是日本的一个军人政客安藤纪三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调回国当了东条内阁的文部相，不久又改为不管部大臣，又叫无任所相，实际等于副首相。在日军席卷南洋时，又成为“日本大政翼赞会总裁”，亦即日本在野军政高官的头目。

这一阶段的“新民会”，废弃了缪斌设计的杏黄旗，而重新拾起了旧民国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由于全部5000多名职员中，日人占了2900多，会中公文全用日文和日本格式，日语也成为通用语言。在一般群众心目中，这时的“新民会”完全是一个日本机关。为了“改头换面”，逐渐收揽了一些文化教育界的华人，请中国大学教授任“组织部长”，另一个黄某（教授）任“全联事务局长”，天津青帮头子张英绪任“厚生部长”，并成立“专门委员会”，请柯政和、王长清、朱华等任“委员”，请王森然（又名王大曼，解放后曾参加南下工作团）任“资料研究室主任”。

三、“新民会”的变形与扩大

1941年5月1日，“新民会”进行了“政会一体”的大改组。这时汉奸政权，由最初的“维持会”经历“临时政府”而配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原“临时政府”的各部改为各“总署”，各部长例称为总署“督办”，另设副职叫“署长”，“华北政委会”的“委员长”先后有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王荫泰等，这些“委员长”在就任之日同时也在名义上兼任了“新民会”的“会长”和“中央总会会长”。主持人实际是“副会长”，由伪“建设总署督”办殷同兼任。那时“华北政委会”的统治范围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个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在省、县之间添设地区行政机构称作“道”，即省长、县长之间又有“道尹”级的官吏，因而这些伪省长、市长、道尹、县长也都在就任之初即兼任各省、市、道、县的“新民会”同级“会长”，省会所在地的保定、开封、济南、太原属“省辖市”，与道平级，也设有“新民会”的“市总会”。

与此同时，“新民会”最高层还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华北政委会”的“委员”以及四省三市的伪省市长官和所谓“社会名流”都是“委员”。

以上情况即所谓“政会一体”，实际都是虚名，“中央委员会”从来不记得开过一次会。

这次大改组的主要变化是：

（1）废弃“新民主义”，而标榜“新国民运动”。

（2）废弃五色旧国旗另制会旗——红地白光中有黑纹（由于汪伪政权成立，华北各地也挂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但却在旗上方加了个黄色三角上写“和平、反共、救中国”黑字，仍有意地凑足了红黄蓝白黑）。

（3）日系职员大批调出，仅各部门设日人参事，表面上的主持者都是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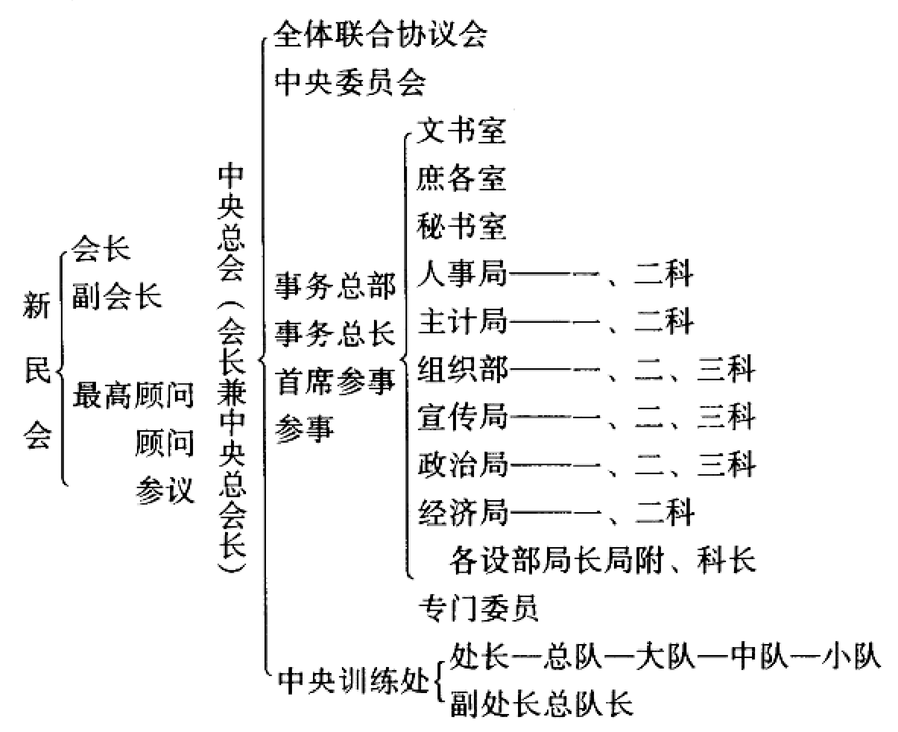
（4）一切公文恢复中文和中文格式，日语也不再是通用语言。

（5）合并“全联事务局”与“联络局”为“政治局”，1942年添设“经济局”。

（6）将原直属于日本特务机关的国家主义派组织“华北新青年党”并入“新民会”，作为“中央总会”的一部分叫作“调查部”，归“新民会”与日本宪特双线领导。

“新民会”原最高领导人安藤纪三郎改称“最高顾问”，安藤回国后，由另一个日本退役中将铃木美通继任。铃木是七七事变前谷正之任日本驻华大使时的陆军武官，原来是日本关东军驻北满的司令，是一个通汉语的“中国通”。

现将“新民会”大改组后组织系统表列如下：



在东京、南京设“办事处”。（调查部也在事务总部下）

各省、市、道、县都设立“事务部”，下分处、科，部长、处长、科长均由华人担任，但各级“总会”均配备着几个日人参事。

四、“新民会”里的一些主要成员

“新民会”大改组后重要阶段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副会长殷同，是一个老牌的亲日派。殷同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七七事变前是北宁铁路局长，他和蒋介石颇有渊源，北伐战争中，国民政府由武汉迁往南京时，蒋介石一度“下野”去日本。当时担任蒋的

翻译的就是殷同。他和冈村宁次也有一定关系，民国初年，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时有一个日本顾问团，团长是坂西利八郎，团员中、日各三人，日人是冈村宁次，土肥原和喜多；华人是余晋禾，汪时璟和殷同。

殷同于1942年病死，继殷任“副会长”是喻熙杰，直至日本投降。喻是殷带来的“事务总长”，殷死喻乃升任为最高领导人。喻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是四川的一位名人之后，在冯玉祥经营大西北时，曾主管西北军的财务工作。

喻熙杰到“新民会”后，吸收了很多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充当“干部”。原宋哲元二十九军驻南苑的教导团团长彭黎民因病留京未走，被喻拉来任“中央训练处处长”，在喻升任“副会长”后，彭即继喻任“事务总长”，彭黎民（又名彭道卫）是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的内弟，曾任冯玉祥的卫士队长，所以也是半个基督徒。冯玉祥丢权后曾资助几个青年军官出国留学，彭去德国（张岚峰去日本，郝鹏举去苏联）。1945年春，彭黎民脱离了“新民会”到河南商邱，任汪精卫所属第四方面军张岚峰部的参谋长（汪属伪军第一方面军是庞炳勋；第二孙殿英；第三孙良诚；第五吴化文；第六郝鹏举，都是原来的“西北军”）。日军投降后，彭仍回到二十九军发展而成为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少将高参，淮海战役时随何基沣、张克侠起义，解放后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

彭黎民就任“新民会”事务总长后，仍兼该会“中央训练处”处长（有一个日军退役的小泉中将当顾问），但这时添了个姓杜的担任副处长。杜是国民党上校，曾任吕正操部的团参谋长。张荫梧在冀中平原向吕正操部发动突然袭击时，杜开小差来北平。天津“训练处”的处长是佟麟阁的长子佟英华。

“中央总会”各部局科室中重要成员有：

陈宰平（宣传局长），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的机要秘书，号称“新民会”的第一大手笔；

杨大荒（组织部长），原属农工民主党；

黄复生（人事局长），留日学生，原任平绥铁路副局长；

程子容（主计局长），原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所属纪念济南五卅惨案的五三油厂经理；

丁志方（经济局长），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兼精英俄文，是伪满一个大臣的孙子；

“政治局”先后由赵济武、张子钧、叶季甫担任，三人均来自国民党。

“专门委员”中增加了张腾霄（《北京晨报》总编辑）、钱端壮和陈绍裴（均系当时北平教授）。另一个名义职，隶属各部局，称作“部附”或“局附”，其中包括谭邦杰（当时的名记者，专管大战的论述。日军投降后，任美国驻华大使馆职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北平动物园主任，曾出国多次购换外国动物）。还有“政治局”第一科长杨文源、“政治局”局附向慕纯，都是中统分子，日本投降后，杨任北平十一区区长，向则在中南海内办通讯社。当过天津国民党整理委员会委员的周仁斋，一度是“新民会”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

在各省市“事务部长”中有胡汉翔、徐冽、邢幼杰、张晓珊、周敦信、朱经古、

江济和。

至于“新民会”所属各团体的头头们，和从1941年起每年一度的“全体联合协议”的各省市“代表”中，人员就更杂了。早期留德而又是“青帮前辈”的魏大可是华北“安清道义总会”的会长、冯玉祥的前师长程希贤和天津“闻人”张璧的小女儿张洁清都是1944年度“全联”的代表。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日系成员，除铃木美通外，是一个姓森的首席参事，后离去。来了个著名浪人、“中国通”小山贞知在铃木下任顾问。参事中的桑原寿二是中国北京大学旁听生，日本投降后是北平日侨归国团副团长，1976年还作为日本参议会议长滩尾的代表到台湾活动。另一个出田政夫是七七事变前伪内蒙古自治军李守信部的顾问，傅作义攻克百灵庙时的“漏网之鱼”。伊藤博文的孙子伊藤顺也是参事之一。

五、关于“调查部”和“华北新青年党”

随着日人职员的大批调出，原来完全由日本人主持的“中央监察部”由缩小而逐渐取消，“调查部”则逐渐扩大，终形成“新民会”专司反共特务的部门。它是在大改组时把解散了的“华北新青年党”的主要成员并入“新民会”而成立的。“青年党”是曾琦、李璜、余家菊等一部分右倾留法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组成的政团，标榜“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流落重庆，成为国民党疯狂反共摇旗呐喊的人。北平这个“青年党”为了异于重庆的老牌字号，连国民党也反，所以冠上了“华北新”三个字，这是日军情报参谋汤胁中佐由大连弄来一个叫刘绍琨的特务搞的。初期主要成员有胡汉生、邹树大、朱崇信、安建谟、关立之、顾齐单、王敏哲和袁某、郑某、吴某等人。1941年初，日本宪兵队以“暗藏抗日分子”的罪名，将胡、关、安、袁、郑五人逮捕，汤胁回国，刘绍琨回大连，朱崇信、邹树大等人则在继任日军参谋茂川秀和支持下成了“华北新青年党”的头头。并入“新民会”后，朱崇信任“调查部长”，(邹树大成为伪北平市政府的宣传处长。其后，安、袁、郑被日本宪兵队释放，胡、关判刑入狱，安建谟就任伪教育总署总务局长兼中等教育局长，成为周作人督办的红人。)

朱崇信任“调查部长”时间不长，即调天津伪市府作官。“调查部长”的人选，经过徐某、李某各干了一个时期，最后是庞定远，一直干到“新民会”结束，“调查部”被军统接收为止。庞定远原是西北军的一个团长，是彭黎民拉来的。这后一段不仅搞反共情报，编印反共书刊（负责人黄华光），同时还搞破坏迫害活动。在会外赁了多所房舍，公然私立公堂，拘押人，同时在各地均设有办事处，组织扩大，人员众多。因为“新民会”内部人员也是“调查部”的监察对象，它的工作严格保密，除少数上层人士外，一般职员包括部局长和专门委员是无从了解它的具体情况的。

六、“新民会”的几项主要活动

(1) 自1941年起，由宣传局每年一次连续主办了三次“兴亚美术展览会”，均在

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由中日双方提供作品。中国方面的主干是周肇祥领导的中国画学会和北京美术学院，除周肇祥外，黄宾虹、溥伒、蒋兆和、王青芳等均被征集过作品。

（2）宣传局第三科接收清华大学杂志10万册，接收天津杂志3万册，接收清华所谓“禁书”1000册还附有铁书架30个。1941年应伪教育总署之聘，检查国立北京图书馆“禁书”40天。

（3）陈宰平撰写了《新世界观》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批判》，由调查部大量印刷发行，同时配合日侵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作颠倒是非的宣传（包括广播和在各地巡回放映电影幻灯）。

（4）组织部的任务主要是“招兵买马”，培植群众基础。几年来，除在华北四省三市各道县组成分会一万多个，总计人数200多万外，还备案了二十几个封建迷信会道门和宗教团体。1943年成立“青年团”，在故宫太和门前广场举行成立仪式，其后连续两年的暑假，与“中央训练处”合作，分别在先农坛和颐和园举办多次“夏令营”和“营火会”。1944年，由陈宰平率领一部分人去南京，参加了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发起的所谓“全国青年夏令营”。

（5）从1941年起，每年举行县、道、市、省以及全华北的各级联合协议会，最后包括四省三市的“联协”称为“全体联合协议会”，简称“全联”。

“全联”每年一次，连续举行到1944年，共四次，这是“新民会”的中心工作。除“政治局”掌管前后的事务工作外，全会上下每年都大张旗鼓地全力以赴，而地方上的各级“联协”正是“全联”的准备，参加“全联”的代表，是各级联协代表层层“递选”上来的。

“全联”的意义，引用日伪宣传的原文，是“集官民于一堂，政情下宣，民意上达，共商华北兴华大计。”会址固定设在当时最堂皇的怀仁堂，每当开幕，“华北政委会”各大员和日军司令部的头头们都来出席，汪精卫也参加过一次，还讲过话。

各级联协举行的期限：县级四五月间，道市六七月间，省及特别市八九月间，“全联”在每年的十月里。

“全联”会后，到次年准备工作开始，这一段时间里，由“政治局”联系各有关机关，组成各类分科委员会，共同商定“全联”决议案的处理问题。

由于“全联”的表现，一个议长成为山西伪省长；工作人员中，则出了伪教育厅长、伪社会局长、伪粮食局长；代表中的程希贤则成为华北禁烟总局长。

（6）日本“大政翼赞会”成立后，为了配合“大东亚共荣圈”的呼号，1943年秋，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中日满蒙兴亚团体联合会”。东道国的代表包括林铣十郎、坂西利八郎、松井石根和高桥三吉等日本显官。南京由林柏生等代表“东亚联盟”，“新民会”由黄复生等代表华北，还有一个几里各郎代表内蒙。1944年又在长春（当时叫作伪满“新京”）举行第二次，“新民会”的张子钧、丁志芳、吴秋尘、徐冽、曲传正、褚孝双等均参加。原定1945年还在中国北平或南京举行第三次，时间定在初秋，但8月15日日本全面投降，便一切都破灭了。

七、结　局

1945年末，国民党随孙连仲部队进入北平，军统局和中统局也马上在北平“安营扎寨”。军统局首先接收了“调查部”，其他部门则由北平国民党市党部接收。戴笠的“肃奸会”抵北平后，“新民会”“中央总会”的主要成员绝大部分都与伪政府的汉奸官僚被捕入狱，一部分早日离开北平或躲入军队。

日本现役军人的末精三，始终是“新民会”的主要后台，回日本后任“大本营”作战部长，日本投降后是欢迎美军登陆的代表，是战后日本防卫厅的第一任副长官。

（1980年）

记抗日时期汉奸机构新民总会

郄 武*

一、传播奴化思想，傀儡戏开锣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以陆军入侵华北，以海陆军入侵华中，想要一举并吞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他们每占一个地区，都扶植一班失掉民族气节的汉奸，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用来帮助他们政令所不达，屠刀所不及，以便麻痹人民思想，压榨人民，搜刮物资。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大将，占领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海军方面也占领了上海、南京之后，就使出汉奸王克敏于当年的 12 月 14 日，在北平成立了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日本军国主义者深深知道，中国人民是具有爱祖国、爱和平的传统的。对于抗拒外侮打击侵略的勇气更是非常强烈的。必须在每一个伪政权成立的同时建立起一个介于该政权与人民之间，相当于政党或团体的“群众组织”，作为他们破坏中国固有文化道德，瓦解人民的斗志，麻痹人民爱祖国、爱和平的崇高思想的御用机构，才好顺利进行他们侵略中国的行为。因此他们在扶持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同时建成“协和会”，在占领了南京扶持伪维新政府成立之后，同时建成“大民会”，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也同样地于伪临时政府大汉奸们粉墨登场之后，紧接着引导预先装扮好了的丑末角色、汉奸张燕卿、缪斌等，成立于 12 月 24 日在北平成立“新民会中央总会”。

这个所谓群众组织的“新民会”，是由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的根本博大佐和过去曾在伪满“协和会”工作，时任北平特务机关组长的小泽开策，纠合一班在日本国内被警视厅认为不忠贞而加以整肃、后来派往侵华部队作为随军工作的特务分子矢部、大岛、清尾、伊藤顺、盐月学等，从中国古书上剽窃了一些明德、新民、至善的词句，作为欺骗华北人民的理论基础组成的。

这些人除去根本博外，也都参加了“新民会中央总会”，与那些汉奸互为表里，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清除入侵中国道路上的层层障碍，进而帮助手握屠刀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建立其所谓的“王道乐土”。

“新民会中央总会”的组织是以“会长”、“副会长”领导的“委员会”作为最高管理机构，下设“中央指导部”，由部长一人，领导各部局处负责执行会务。因为他们标榜着“政会一体”，就以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兼任“会长”。“副会长”张燕卿负实际领导委员会的责任。该会规定委员会只是一个决策的组织，对外行

---

* 作者曾在伪新民会工作。

文都是由“中央指导部”部长署名，各部局处的工作人员也是由指导部长来指挥监督。委员会倒成了一个空中楼阁。这是当时日本人挖空心思研究出来的一套“职位越高，给的权限越小”的鬼把戏。也就是使副会长和指导部长二人在职权上互相牵掣，谁也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们才好从中操纵任使。

在成立那天，由伪兼会长王克敏在“训辞”中宣布，该会的宗旨是“奉行新民主义，为与政府一体之团体，而显现中日满之共荣，以彻底灭共灭党，贡献世界和平”。接着公布了由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预先给制订的大纲五条：

1. 拥护新政权，以备畅达民意；2. 开发产业，以安民生；3. 发扬东方文化道德；4. 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反共阵线；5. 促进友邦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之和平。

这五条大纲，是以1936年日本外务相广田宏毅颁布的对华三原则为蓝本制定的，它与后来近卫内阁颁布的对华“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的侵略原则实质完全相同。如第一条是为迷惑华北人民对于傀儡政权的认识，第二条是要在所谓“经济提携”原则下，允许日本开发华北资源，独占华北市场。第三条更露骨地揭示破坏中国固有文化道德，而向华北人民竭力灌输日本的奴化思想，第四条把近卫的“共同防共”的抽象规定，明确表示出“参加反共阵线”，而第五条更以“善邻友好”进一步促使华北人民对日缔结投降盟约。

从他们所揭示的宗旨和大纲中，我们就可以意识到新民会中央总会出卖祖国、出卖人民的精神实质。

“新民会”原来制定的会旗是绿地中间印有太极图。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权，用带有标志“和平反共建国”尾巴的青天白日旗作为他的“国旗”。王克敏的伪临时政府在名义上改为汪伪政权领导下的一个高级地方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因为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要明白地显示出“华北的特殊性”，遂由王克敏将原印有太极图的“新民会”旗帜取消，以曾经作为他原临时政府的“国旗”——五色旗改为“新民会”的“会旗”。

新民会中央总会在成立时的组织机构是这样的：兼会长王克敏，副会长张燕卿，顾问安藤纪三郎，秘书主任索越平，中央指导部部长缪斌，秘书厅长卢定远（后来设立的），总务部长小泽开策（日人）下设三科，总务科长矢部，调查科长清尾，余不详。教化部长宋介，顾问大岛，专门委员盐月学，宣传科长樊有实，组织科长陶国贤，社会科长胡俊，厚生部长张英绪，调查部长庞声远，企划部长朱枕薪（即朱华），政治局长赵济武（以上各部局科长不详）。

“新民会”是以部员作为他的骨干分子，参加他的组织的人，必须取得部员身份，才有被任为各级职员的资格。他们发表的人事命令都是用的“派×××为××”的形式。未取得部员身份的人，只能在该会任雇员，作些普通工作。

兼会长王克敏鉴于“新民会”是同他分权的机构，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因为反对“新民会”的经费由他的伪政府开支的问题，曾与日本军部发生过摩擦，也曾在伪政权中大嚷大叫地说：我不知道“新民会”是什么东西。因此他终年不到那里工作。

副会长张燕卿名义上是委员会的实际领导者，不断在各项集会中发表演说，或以书面谈话，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他因为不能执行会务，内心难免

存在着架空之感。

会长、副会长的情况在“中央”说是这样，在省（市）道县也是这样，因此各级“新民会”所实行的破坏中国固有文化、抑制人民的革命斗志、协助敌人搜刮物资等一切活动，都集中于各级“指导部”。

“中央指导部”是“新民会”的执行机构，会内的总务部、教化部、厚生部及后来增设的宣传局、调查局等等，作为“新民总会”细胞的组织机构，都归他领导。而这些组织细胞中因为总务部长小泽、总务科长矢部、调查科长清尾都是日本人，他们又都是“新民总会”的创造者，并且掌握着经费的出纳、情报的搜集、职员的训练和任免，不但大权独揽，还是整个“新民总会”的神经中枢，各部门的职员都以他们几个人的动态马首是瞻。

当时的教化部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抑制人民爱国思想方面，首先组织若干个以略懂中文的日本人为首的书报检查小组，深入图书馆及各中级学校检查书报，凡是七七事变以前出刊的有关历史、经济、政治书刊及左翼作家的作品一律没收。他们把这些东西汇集在一起，存放设在丰盛胡同一个中学的大楼上，后来在这里成立了一个资料室。

在“新民总会”成立初期，教化部本来企图把有关奴化人民思想的资料，渗入到学校课程中去，伪政府的教育部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教育行政，没有答应。于是就改变方式，把学校的教员组织起来，分别给成立了“新民会”基层分会，向教员们灌输日本奴化中国人民的方针政策，再通过他们向学生传播奴化思想。教化部长宋介，极端重视这些分会，所以各个分会名义上虽是属于北平市指导部领导，可是实际上一切活动都是由“中央总会”直接策动。在基层中最给日本卖力的是北方中学校长罗庆山。他以文教界学者自居，到处钻营，为了创造他的社会地位，时常奔走女特务金壁辉之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以华北宣抚使名义在北平市党部召集各校院负责人讲话时，罗为了放高论，故作警人之语，得罪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后来被逮捕，按汉奸行为判处徒刑。

这时教化部还组织起粪夫、国医等各种“行业协会”，一方面维护这些行业原有的封建制度，一方面向他们作亲日的宣传。当时上演京剧《串龙珠》和《抗金兵》两剧，宋介以为容易引起人民抗日的思想，禁止演出。

“新民会”成立之后，有不少的党派人员都打了进去，陶国贤、樊友实二人是青年党打进来的地工，陶在西单开设了一个北方书店作为他在平活动机关，出版过《朔风》杂志，该党党魁曾琦在那时曾秘密来平视察。

另有一个女职员王倩又名宾孙，是民初山东省议会王鸿一的侄女，在日本长大，能操极流利的日语，过去一度任第三党负责人邓演达的秘书，在新民会任职时主编《新民妇女》，有时在文章中透漏出一些爱国思想，当时和她的弟弟王大路都加入了民盟。当民盟成员张云川（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参事）北来活动时，她们曾给予掩护。

厚生部的职员万子青不明原因地被日本宪兵队捕去，不知下落。另一职员徐志超也被他们捕去，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这两个人的政治面貌“新民会”都不清楚，只有潜入新民会里面的中共人员始终没有暴露出他们的身份。

二、几名元凶的丑恶面目

张燕卿，原名仁乐，河北省南皮县人，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第十一子，早年留学日本，伪满洲国成立，任伪外交大臣，也曾给“协和会”出过很大力量。1937年伪满洲国将外交部范围缩小，改为外务局。张忽而离职，这时华北事变已起，遂绕道日本，特来北平，企图在华北日军卵翼之下成立敌伪政权。喜多因他过去任天津县长时，因公开标卖天津城郊义地，搞得声名狼藉，华北人民恨之入骨，不愿用他作一个侵华的工具。张遂通过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根本大佐与缪斌组织“新民总会”，自任副会长。后来他因感到有职无权，经常与缪斌、小泽等互相摩擦而离职。张燕卿在当时曾与国民党中统分子发生联系，在他的东四六条家中设有电台，曾被日本宪兵队检查，但未破获。日本投降后，军统局把他逮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因其过去曾在日特机关保释过燕京教授、学生，向国民党当局以他的“人格”保释出狱，因为全国舆论反对，又被羁押，不久他的家属又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他保出。

缪斌，江苏无锡人，留美学生，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在孙文主义学会任职时，大肆发表拥蒋反共言论，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他在华北印行的《新民精神》一书，原是给蒋介石为向国民党人“注射新血液”而写的一篇论文，蒋因其内容腐朽，未惬所心，没加采用。因此他在任“新民会中央总会”中央指导部长时，曾发言论，对蒋大肆攻击。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后，他前往投靠，看风使舵，又不断向蒋介石密报新四军的调动实况，便利了蒋介石曲线“救国”和进攻新四军的活动。日本投降后缪斌被捕，起初军统局对他还很优待，后来因为美国在东京日本政府的档案中发现缪曾携带重庆的和平条件与日本商洽和平，违反了开罗会谈时“任何一个盟国，不得单独对日议和”的决定，向重庆提出质问，重庆当局为消灭这一可耻行动的人证，将缪解往苏州法院，用速战速决的方式，将缪判处死刑，并不准上诉，随着执行枪决。

缪斌在北京“新民会”时，国民党特务曾乘他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观看坤伶新艳秋演出时，向他行刺，适在半小时之前，缪的母亲由家中给他来电话，他才离开座位，恰有一个姓关的买办坐上他的位子，当场关作了替死鬼。

“教化部长”宋介，字维明，山东人，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七七事变前，在北平某大学任教授，北平沦陷汉奸江朝宗在平组织“维持会”，以宋为文化组长。他在“新民会”任职时，政治野心极大，与顾问安藤纪三郎掀起倒缪活动，他以未来的中央指导部部长自居，在暗地里封官许爵、布置人事。安藤对这一投机分子，并不信任，在会内设了一个秘书厅，以卢宗远为厅长，与他对抗，宋只好忍气吞声，在那里鬼混。后来殷同、喻熙杰进人新民会，把他一脚踢开。因为他与汉奸王揖唐有些渊源，王即派宋为“防共委员会”处长，最后改任山东省济南道道尹。解放后仍不肯向人民低头认罪，伙同原山东“新民会”事务部长朱经古和北平白云观道士门某设坛扶乩，假借乩语，造谣惑众，被人民政府逮捕，将三人同时处死。

“企划部长”朱华，字枕薪，江苏人，早年曾在苏联留学，长于英、日语和俄文，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基础。过去曾在南方办报，七七事变后，就来华北活动，最初任伪

新民学院教授，兼“新民总会”专门委员，最后任“企划部长”。朱经常以“苏联通”自命，写过一篇“共产党员秘用术语”在新民周刊上发表。日本投降后被捕，羁押于河北第一监狱，1947年经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通过北平行营将他提出，派到特务王芃生主持的国际调查所，专搞反苏工作。

三、一篇腐朽荒谬的《新民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各地建立的所谓“群众组织”，用中国古代经典书籍中的片断学说加以曲解，来麻醉人民的思想意识，如伪满“协和会”的主旨是取义《尚书》的“协和万邦”，“新民会”则是用《大学》，“明德、新民、至善”的学说来推演而成所谓的“新民主义”，作为该会一种纲领式的口号。

缪斌在筹备“新民会”时，曾对他的党羽们高谈阔论地说，日本根本博大佐意见，现在的“新民会”将来可以扩展为新民党。并命他们本着大学上“苟日新、日日新，作新民”一节为中心，多写一些文章，演义成“新民主义”的姊妹篇。但这些党羽们因限于才华，没有完成他所赋予的使命。结果由他自己写了一篇提纲式的东西，内容是发扬德治主义、礼治主义、法治主义，还拼凑一些什么实现农村电气化、社会工业化不着边际的建设计划。“新民总会”成立后，陆续印发了二三十万册。同时还以高额报酬，征集有关“新民主义”的论文，可是社会上无人对这篇荒谬绝伦的东西加以理睬。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中国公论社主编陈世昌（陈宰平）作为他的应声虫，抄袭一些梁启超写的《新民论》一文中的大意，獭祭写成了两篇文稿。缪斌见了，认为是“空谷足音，新民同调”，在欣赏之余，马上派人把他找来，派在教化部工作。

接着缪斌又把过去给蒋介石写的用来向国民党人输入新血液而被蒋弃置了的题为《武德论》的一本书，拿出来交由陈宰平修改演绎一番，标题换成“新民精神”。据说这本书的“精神”是为了给他自己写的“新民主义”作注释和补充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看了之后，指定由一个略懂中国古典文学的日本人川村宗嗣译为日文，“新民会”并派陈连森等通晓日文的二人从旁帮助，他们经过三个多月时间，才译述完成，大量印刷，作为宣传材料。其实这本东西，极其支离破碎，根本没有中心内容。尽管这样，缪斌还是对它自我陶醉，命人不断在电台上向华北人民广播。

四、对“新民会”持着不同态度的两个汉奸组织

日本军国主义者向中国进行侵略时，每一军事单位，都搜罗一些日本浪人、退役军官和高丽的白面贩及中国的地痞流氓，组成随军“宣抚班”，由一名宣抚官领导。这一群人挂着宣抚战后人民的幌子，实行着向无辜人民剥削压迫、敲诈勒索的勾当。日本每侵入一个地方，这些人就立时召集当地居民，向他们宣传“皇军圣战”的“德意”，紧接着入手训练保甲，调查户口，建立伪政权，充作日本的帮凶。

当时伪临时政府管辖地方是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市，行政区划是省以下设道、县两级，市以下设区。1938年春，“新民会中央总会”顾

问，安藤纪三郎强调建立基层组织，通知伪临时政府令行各省成立首、道、县各级地方“新民会”。他根据所谓“政会一体”原则，以省长、道尹、县知事分任省道县各级“新民会”会长，省、道、县公署的日籍顾问，分任各同级“新民会”顾问。安藤乘着这个机会，命各县“宣抚班”组成分子，一律参加县“新民会”，作为骨干，许多县“新民会”是由宣抚班摇身一变，换上一块招牌，就继续作他的危害人民的活动。

“新民会”地方组织，以县一级成立最早，以后才由省“新民会”指导组织“道新民会”。一些由“宣抚班”蜕变的“新民会”职员，都自负是追随“皇军”入侵中国的主干，背后都有日本驻军作为他们的靠山，更有的县知事是由维持会长蜕变而来的。因此他们的嚣张之气，都凌驾于县知事之上。而日籍顾问，尽管他们对于伪县公署的一些汉奸渣子颐指气使，可是遇到这些具有来历的“宣抚班”，也感到束手无策。因此这些人的行动，就更加恶劣，奸淫抢掠，无所不做。当时人民群众把“新民会”、特务、翻译、合作社、警察称为“警特翻合新，谁见谁遭瘟”。可见这群家伙，在善良的群众心目中是无可宽恕的罪人。以后省道两级“新民会”虽相继成立，不但未能挽回这种积重之势，而当时的头轻脚重的风气竟影响到省县两级，各地方的权限既不平衡，编制也不统一。于是县不服从道，道不服从省，而省也不服从中央，形成了人自为政的割据局面。给后来的殷同、喻熙杰的“机构政策”造成有利的因素。

在日本侵入华北时期，北平还有两个在性质上是与“新民会”相同，但他们并没有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的组织，一个是《新民报》，另一个是“新民学院”。这两个组织虽都在他们的招牌上嵌入“新民”的标记，也都是“本着中日亲善，剿共灭党”的主旨，“努力于民意之畅达，东方文化之宣畅”，而“新民学院”更标出以“基于新民主义，以涵养祛私奉公之道义心”，从而“养成堪能翼赞兴亚大业之中坚官吏”为目的。但他们都不承认缪斌所标榜的“新民主义”和“新民精神”。

《新民报》是日本侵入北平后，就在原设在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原地经营的。社长是日人武田南阳，编辑部长是吴菊痴，总编辑是蔡天梅，他们每天都在社论中高唱亲日、反共、反蒋的调子，但对阐述有关“新民主义精神”的稿件，却拒绝披露，“新民总会”与他几度疏通，才每周一次给辟出版面，发表一些这类稿件，但在报头上标出“新民”字样，表示这是“新民会”包办的来稿。

新民学院是一个用造就各县知事人才作为钓饵，教育青年如何充当汉奸的养成所。名义上“直隶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高机关”，由汉奸王克敏担任院长，以日籍副院长佐藤负实际责任。王在开课之初，曾为该院讲过《大学》，学员每三个月即毕业一批，再派赴日本作一个短时期的“见学”，即分发各部门及伪省市任职，也有少数人被派为伪县知事。当时有一个日本特务茂川少佐，在该院也担任着教授名义，他在那里集合了一部分青年，为他的特务组织——茂川机关服务，加入他的组织的，要经常给他搜集情报，以后不论分发到哪里工作，都须与他保持联系，他还不断在他的东四六条“茂川公馆”召集这些人集会，指导他们如何“忠贞”活动的问题。

五、殷同出卖民族的药方——“新民会机构改革案”

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因为“新民会”成立的日子很久，没有给他们起到侵

略中国的理想帮凶的作用，同时原“副会长”张燕卿已离职，“中央指导部部长”缪斌又去南京参加了汪伪政权，遂乘机要把他的组织加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麻醉人民的组织，就以殷同继任该会副会长。

殷同早年曾在日本经理学校读书，与后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官岗村宁次一度同学。靳云鹏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时，曾任军务局长，靳下台后，在山东与日本人经营鲁大煤矿公司时，又以殷任经理，他在这时结识了不少日本财阀在华的代理人。在他出任北宁铁路局局长时，华北局势已趋紧张，殷同帮助当时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贾德耀、黄郛、许世英等办理对日交涉，作了不少的丧权辱国的勾当，他为了取悦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北宁铁路沿途各站用日文标出站名。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临时政府，于“行政委员会”内设立了建设总署，以殷为署长。因为它主管华北整个建设，近水楼台，经济颇为充裕。殷不断用金钱收买日籍职员听他的调遣。在当时各总署中殷是一个比较善于驾驭日籍职员的督办。由于他搞得比较活跃，曾引起汉奸王克敏对他的怀疑。约在1938年下半年，借着伪内政部参事卫燕平过去学过陆地测量的关系，命卫兼任伪建设总署技正，暗地里窥伺殷的行径，不料卫竟对旁人大发牢骚，说他是个搞技术的，不能给别人当坐地探。殷的左右听到，向殷告密，殷遂向王追问是否确有此事，王当时说这是卫燕平信口开河，但为减轻摩擦，仍把卫调回内政部，去参事，降为技正职务。

汪精卫在南京筹备伪中央政权，华北汉奸王克敏和日本特务喜多诚一因讨论“华北特殊化”的问题，与汪发生了极深的矛盾。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军部恐喜多不能与汪合作，将其调回日本，汉奸王克敏也因这种关系，提出辞职。当时的各伪总署督办都企图继王的后任，其中以殷同和齐燮元二人活动的最为积极。没想到华北驻屯军总指挥部与汪协商结果，竟以原伪临时政府内政部总长王揖唐，继任了王克敏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殷在失望之下，遂人手培植个人势力，以等待时机。

殷同当时以为“新民会”这个组织，机构庞大，经费充裕，正可利用他培植私人，作为夺取伪政权的根据地，就在1941年春与喻熙杰到“新民会中央总会”就任，殷是副会长，喻是事务总长，会长仍是按照所谓“政会合一”的旧制，由当时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兼任。

喻熙杰号伯椿，四川内江人，日本帝大政经系毕业。曾任平绥铁路局总务处长。北平沦陷后，在北平办了一个中国评论社，另外还在中日实业公司有一有职无权的理事名义。通过原在新民总会任职、后来给殷同当机要秘书的同乡陈宰平的介绍，与殷相识，正赶上殷招兵买马，组织班底，经过几度往还，一拍即合，殷就把他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主要羽翼。他们到了“新民总会”放出的第一炮，是要实行他们酝酿已久的所谓“机构改革”，据说这是殷按照当时“新民总会”的病状，通过他的深思熟虑开出来的一剂良方。

首先他们撤消原来的中央指导部，改设事务部，由事务总长负责领导各部局处。把教化部改为组织部，原属于教化部的宣传科扩大为宣传局，裁撤了秘书厅、总务部、厚生部、企划部；另设人事局、主计局，扩大原中央训练处的组织。政治局则仍照旧设置。

这次改革的特点是撤销了原来的中央指导部，使副会长成为既能决策又可执行的实际责任者。事务总长是在副会长直接领导下的会务推动者。从"改革"后的职能部门来看，殷、喻是要把他们的亡国工作中心，放在组织群众和训练青年方面。

殷同在事前搜集的班底，连同喻熙杰在内，共有二十余人，他们都在"新民会"任职，其中最主要的是：喻熙杰，原任中国评论社负责人；陈宰平，原任中国公论社主编；彭黎民，法国留学生，曾任西北军旅长；杨大荒，原任中国公论编委；胡小石，即胡汉翔中国公论的关系者；钱瑞壮，原北大工学院教授；郑建白，中国公论关系者；张腾霄，北京晨报主笔；张筱珊，原任山东乡村建设旬刊主编；黄曦峰，原北京师大家政系主任；杨子榆，原师大教务长；肖哲君，原师大教授；褚孝双，日本留学生；范凯，北大毕业生；徐灏传，英国留学生北京外语学校教授；陈绍裴，原任大学教授中国公论关系者；赵坚白，中国公论关系者；庞声远，原任某大学教授；李侠青（经历不详）；黄复生（经历不详）。

这些人的来历不同，殷、喻对他们信任的程度也不同，而他们对于殷、喻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如杨子榆是坐领干薪，终年不到会工作，黄曦峰参加汉奸集团是为"一登龙门"便可"声价十倍"而来的，而张筱珊、张腾霄起初都是原作交际花，不甘娟家妇的，经过半推半就，才一同落水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中最被殷、喻信任的是陈宰平、彭黎民、胡小石、杨大荒，当时"新民会"内部称其为"四大金刚"。

陈宰平原名世昌，东南大学毕业，对国学较有研究，能写一些有关政治性的文章。为了在社会上博取直言敢谏的"声誉"，写了一篇以《要求救救人民，澄清华北吏治》为题的小评，说出了一些汉奸们不愿听也更不能接受的话。果然触怒了王克敏，他拍案大骂，闹得不可开交，经过几度疏通，最后还由他向王陪礼谢罪，才了却这场风波。在缪斌去后，陈任殷的机要秘书，他以揭露"新民会"过去的内幕，博得殷对他的信任。也可以说他是因为善写麻痹人民思想、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的文章而得到日本军侵略头子的赏识的。因为"新民会"自始至终有关日伪强化治安的宣传文字，都是出于他的手笔。

彭黎民，早年在法国留学，学习军事，曾在西北军任骑兵旅长，在"新民会"任中央训练处长时，经手办过二十多期训练班，大力向一些青年灌输奴化思想。殷同死后，继喻熙杰任事务部长。因他与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过往密切，喻对他曾发生疑忌。彭黎民在日寇行将溃灭的时候，为寻觅自己将来的出路，投向当时汪伪政权的军队张岚峰部当总参议去了。

胡小石（汉翔），留美学生，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七七事变后，不断在中国公论发表文章。入"新民会"时，被任为"新民会"北平市总会事务部长。抗战胜利前夕投入伪军张岚峰部队，解放以后投黄浦江自杀。

杨大荒，江苏人，是邓演达的旧部，七七事变后任中国公论编委。加入新民会后，由科长升任组织部长。因为他在科内掩护着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曾被日本特务长期盯梢，后来发现他染有极深的鸦片嗜好，又经常出入于远东、长安两饭店，私生活极为腐化，认为不是猎取的对象，取消对他的监视。

当时"新民会"的编制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级职员，一种是"专门委员"，属于

客卿性质，不必经常上班，也没有固定职务，只是备副会长的咨询。另一种是“参事”，他们属于各部、局、处，作为部局处长的助手，因为过去的参事都是日人的关系，他们承袭了日本人的余威，职权有时凌驾于部、局、处长之上。

当时，日本人因为殷同拼凑来的新班底业务还不熟悉，也不了解现地情况，必须先用一个时间到各地去见习，才能派他们在中央和地方任职，起初大家对“见习”两字反对，经过几度疏通动员，并讨价还价地将见习二字改为视察，除了褚孝双因为工作需要，不能外出，陈宰平和另外几个人表示宁愿开除也不去见习以外，剩下的张筱珊等一班人于1941年秋天都分别到各地“视察”了一次。

这些人见习完后，殷、喻就作了人事更动，首先免去反对机构改革的人事局长程涛的职务，以黄曦峰继任，派鼓黎民为中央训练处副处长，（鼓后来升为处长）在这以前胡小石已被任“新民会”北平市总会事务部长，彭、胡都在殷、喻支持之下，调整了他们部处的人事，并充实了组织。

“新民会中央总会”机构改革后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如下：兼会长王揖唐，副会长殷同，最高顾问铃木、顾问小山。事务总部事务总长喻熙杰，组织部部长喻熙杰兼（后改杨大荒），宣传局长陈宰平，人事局长黄曦峰（后改黄浚生），主计局长程宽（字子容），中央训练处处长喻熙杰兼，副处长彭黎民。专门委员张筱珊、张腾霄、钱瑞壮、陈绍裴。参事郑建白、徐灏传、褚孝双、赵坚白。

随着机构改革以后是修改大纲。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后，“新民会”已降为地方性的汉奸团体，不能与他分庭抗礼。同时汪精卫还召集了一班失去政治灵魂的国民党人，在华中组织了国民党各级“党部”，用“只有和平才能反共，也只有反共才能和平”的口号欺骗人民。“新民会”不能在大纲中暗示出“灭党”字样。因此喻熙杰、陈宰平首先提出修改“新民会大纲”，以符合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制造傀儡的变革。几经讨论，把原来的第一条“拥护新政权，以备畅达民意”的话，改为“发扬新民精神”，把第四条的“剿共灭党”改为“和平反共”，全条改成“于和平反共的旗帜之下，参加反共阵线”，其余的二、三、五等各条，因与汪精卫的卖国主张并没什么抵触，未加改动。不过应在这里说明的是，喻、陈所谓的“发扬新民精神”并不是指的缪斌所发表的“新民主义”和“新民精神”二文中的涵义，它只不过是要勉强符合它那招牌上的“新民”两字而已。

六、调整地方组织，竞现卖国“经论”

殷同、喻熙杰把“新民会中央总会”的组织机构基本上改革完成后，就进而调整各省市的人事，任命事务部长。

当时各省市的情况是这样的：日本驻在各省市的军队司令和特务机关长，都是各省市伪组织的太上皇，他们控制着各伪省市机关团体的行政和一般活动，不但伪省市当局事事须仰承他们的鼻息，即日本华北最高指挥官发布的有关他们占领区事件的指示，也有时借口不符合现地情形而搁在一旁，不加理睬。这样就给殷、喻对于省市“新民会”的“机构改革”增加了一层障碍。

在改革华北四省三市“新民会”的组织机构过程中，最使殷同感到不易实现的是青岛市，因为青岛是日本海军的驻在地，日本侵华的陆海两个兵种一向存在着极深的矛盾，他们内部的分歧，常常影响到汉奸集团的人事任免。日本海军方面保荐他们认为满意的人，“中央总会”不同意，“中央”派去的人海军虽不能公然拒绝，但他可以施用各种手段，把他压迫离职。殷、喻经过几度疏通，以“中央总会”参事徐灏传为青岛市新民总会组织处长，代理事务部长职务。徐在就职的当天摄影时，就与日本人因为争座位的问题闹翻了脸。虽然勉强隐忍干了下去，但也没等到华北这场傀儡戏演到终场就被排挤下台。

殷、喻二人在任用事务部长费去周折最多的地方是山东，因为那里的日本特务机关极为跋扈，伪组织的省、市、道公署的首脑唐仰社、朱桂山、王子丰在地方都有他们的潜在势力。派去与这些人没有渊源的人，无法与他们合作，如用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又恐怕和他沆瀣一气。在山东特务机关向日本军部推荐朱桂山的儿子朱经古为山东“新民会”事务部长时，殷、喻就因为朱在山东地方根深蒂固，既与敌伪两方有深切的关系，他自己还拥有一班人马和整套亡国的主张，派他当了事务部长，就无异是把山东置于“中央总会”的管辖之外，考虑结果，决定任用张筱珊。

张筱珊，是山东人，在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有年，曾主编山东乡村建设旬刊，是当时乡村建设派领袖梁漱溟的下属。1942年春，“新民会中央总会”发表以张筱珊为山东“新民会”事务部长，张随即派人前往济南与该会接洽接收手续。就在他兴高采烈的时候，山东日本特务机关表示：“对其来鲁，不甚欢迎”。殷同、喻熙杰得到这一消息，立即慌了手脚，找铃木与日本驻军交涉，不料日本军部对山东特务机关也没办法，只是告诉殷同、喻熙杰等着“疏解疏解再说”。后几经许周折，保证其效忠“皇军圣战”，张才于1942年3月到济南登上了山东“新民会”事务部长的位子。

天津“新民会”事务部长派的是张世炎。张世炎原任济南市财政局长，与喻熙杰原有一些私人关系。因为喻熙杰事前在日本军部给他作了很多的联络工作，天津驻军没对他施加什么压力，比较顺利的任了职。但有一个条件，就是须把天津市“新民会”组织处长吴秋尘调为“中央总会”的组织部长。

山西省“新民会”事务部长周敦信是由伪省长冯司直向“中央总会”推荐的。因为日本侵华军队始终要用山西作为钓饵，劝诱军阀阎锡山向他们投降，对山西伪政权不作过分的干涉。而山西省政府一般汉奸也还是本着他们过去向各方讨好的传统作风，一直与“中央总会”保持着相当联系。因此他们推荐周为事务部长，日本驻军既没横加阻止，殷、喻二人也不敢提出什么异议。

河南省也是归华北伪政权管辖的地方，只有19县，地方情形极复杂，华北伪政权对其不甚重视。殷、喻在机构改革时，派庞声远为河南省“新民会”事务部长，庞虽勉强就了职，但处处受到日军威协，干了几个月即辞职回北平，殷、喻衡量当时的形势，软磨硬求全不适宜，所以隔了好久时间，才派原任组织部第一科科长的陈连森继任。

庞声远原是当时的伪军吴化文部的一个团长，喻熙杰给吴写信把他调到“新民会中央总会”派为调查局长，负责给殷、喻、铃木三人搜集情报。因为他搞的是极端密

秘的工作，殷、喻发给该局的经费很充裕，并且是包干制，不必报销。他搜集情报对象是共产党的活动，刺探新消息还与国民党军统驻在沦陷地区的组织互相交流，军统豫北站站长马警晨就是庞的亲戚，他的公开职务是新乡道“新民会”事务部长。

最使殷、喻重视的是河北省“新民会”事务部长一职。他们认为河北地方复杂，派一个与当地素无关系的人去担任，不易作通，伪省政府推荐的人，又怕因地方色彩太浓，不容易指挥。空了很多的日子，最后才以该会组织处处长叶济辅代行事务部长职务。据说叶自朝阳大学毕业后，就在冀东伪政府当汉奸，熟悉侵华日军心理，在保定与日伪各方都处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叶对“新民会”总表示忠心，不久，就任他当了河北事务部长。

北平因为是华北敌伪政权的首府，也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直接控制的地方，“新民会”北平市总会的指导部长的任用，情形比较单纯。因此殷、喻在改革“中央总会”组织机构的同时，即以他预先组成的班底中的胡小石（汉翔）担任了这一职务。但指导部的原来主要负责的中日人员，如刘家骧、久保铁夫等，都给他来了个辞职，弄得殷、喻颇为尴尬，不得不托张燕卿、宋介来说和，恰巧这时日本特务川本大佐去南京工作，把这批人带走，才算了事。

到了1942年上半年，殷同、喻熙杰将华北四省三市的“新民总会”事务部长完全派完，“中央总会”的各部局处人事也早调正就绪，认为他们的机构改革方案胜利成功。在踌躇满志之余，就展开他们的“经论”，积极的配合日本军国主义者向“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亡国途径上“迈进”。

七、所谓的宣达民意的“联合协议会”

“新民会中央总会”的头目们为了更进一步地欺骗人，向各阶层人民灌输奴化思想，前后召开过三次他们所谓的旨在“下情上达，上意下宣”的“联合协议会”。

“联合协议会”是由“中央总会”统一布置的一种自下而上逐级召开的会议，首先由各县“新民会”在当地伪政府、机关、团体、学校和一般群众里面拼凑一些热心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汉奸为代表，预先指定某人提某案，某人对某案提出质问，某人代表某机关解答某问题，定期开会。“县联协”闭会后，即开省（市）道会议，最后“中央总会”也照样把它导演的这出傀儡戏正式扮演一场。

第一次联合协议会是在张燕卿、缪斌时代召开的，当时出演的角色，因事前排演的不够熟练，精彩的节目不多。

1942年秋季，“新民会中央总会”又在省（市）道、县“联协”相继开过之后，接着召开“中央联合协议会”。那时殷同、喻熙杰的机构改革已在形式上完成，一些想协力“大东亚战争之完遂”的人，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大会。这些人有的为在会上大出风头，尽情揭露伪政权中的汉奸们在地方上的横征暴敛；有的因为自己要往上爬而没爬上去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受了屈抑，就借揭露伪政权的汉奸们的贪污腐化的机会，来宣泄自己胸中的积愤。他们都煞有介事地向伪政权攻讦或者提出质问，一时神灵活现。其实他们内心都有个人见不得天日的阴私和企图。其中表演最精采的一个节目，是汉奸程

希贤提出的“华北禁毒”问题，程希贤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刚直人士，在大会上发言时，用十分激昂痛切的表情，把鸦片烟的卖者、吸者骂得体无完肤，出席“联协”的人们被他言论给吸引得不断地以掌声打断他的讲话。当时的新闻报也用显著的版面发表赞扬的文章。

“新民会”明明知道鸦片公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毒化中国人民的政策，而伪政权却更依赖鸦片税收作为他们卖国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他们只是为了争取社会对他们称赞，就使出几个敢骂人的泥腿在大会上以卖者和吸者为对象来一场指责。他们既不敢对公开制订法规批准商人发售、公开收税的伪政权作正面的揭露，也没有敢提出如何禁止出卖、如何停止征税等等具体问题。更妨碍不了伪政权的“寓禁于征”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毒化中国人民政策的推行。

大会进行了几天之后，代表们要出风头的风头出足了，要泄愤的也通过他自己的发言而心平气和了。会场上立时又出现了另一种气氛，代表们在这时都争先恐后地向日本军国主义者表示他们对“大东亚战争之完遂”的信心和协力具体行动。当主席台上提出号召华北人民向“皇军”捐献出他们所有的铜铁，以供他们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的议案时，都纷纷发言，在热烈的拥护“皇军圣战成功”的欢呼声中将原案通过。

“联合协议会”对议案的处理，有的是由被质问的机关派人向大家解释一番，说明代表们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处在当时环境中，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所致，或者是把原案转知有关机关“查核办理”。大会闭幕后，这些代表回到他们的省市作一次所谓的“上意下宣”，就万事大吉。各级伪政权并没因为他们提出意见而改变他们出卖人民的罪恶活动。只是汉奸程希贤因为高喊“禁烟”问题，却当上了华北禁烟总局局长，亲自用鸦片烟毒害华北人民。

1943 年 3 月，日本首相东条颁布了一项“大东亚新施策”，对各敌伪政权、机关、团体的控制比以前“放松”了一步，对各级“新民会”也由原来事事归日本人具体掌握，改为由少数的日本人在政策上的主持。于是汉奸们就忘了他们自己的身价，得意忘形地东奔西撞，妄言“国家”大事，结果碰了不少的钉子。

这年 10 月“新民会中央总会”又召开了一次“联协会议”，这时殷同已死，由喻熙杰以副会长主持这次会议。

大会开幕那天，汉奸汪精卫适在北平，所以他曾来参加，在“训话”中说他到北平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接着他用拳头击了一下讲桌大声地说：“我立时告诉他，如果中国人心不死，中国绝不会亡”。在博得满堂的彩声中，一些神精萎弱的代表竟被他这种装腔作势的话吓得目瞪口呆。汪精卫在讲到中国人民需要“团结”时，还用法国理发馆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在几天之内，聚集了一百多吨剪下的短发上缴国家的故事，说明“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就能不受外人欺侮。这些话更使代表们飘飘然的不知所措。

几年来铁路上的警察、工作人员，对于旅客时常加以殴打，旅客托运的行李更不断地被盗和整件遗失。当时北平、青岛两地代表都详举事实，要求整理交通。这一提案宣读了之后，由一个日本人出面解答说“在大东亚战争期间，不应该提出这类事件”。接着就对原提案人讥讽漫骂，原提案的青岛代表是一个教日语的教员，因听过汪精卫的讲

话，在政治上产生了一个错觉，没等日本人把话说完，就以日语报以恶声，其他会日本话的代表也纷纷起立，向该日本人吵骂，一时秩序大乱。隔了一会，虽由伪政府交通局和铁路上的两个日本人说了一些道歉的话，才平息下去。但不久听说青岛代表于大会闭幕后，怀着胜利心情回他的原籍，不料在下火车的时候，竟被日本宪兵问明白了他是代表之后，给重重地打了两记耳光，并借检查为名，把他羁留半天。

这次会议最精彩的节目，还是关于“华北禁毒”问题，大会选举的临时议长冯司直在发言时，装得比上次程希贤更为深刻，话还没有讲完，就“泣不成声”，因为他是议长，各代表们都给他作了应声虫，会场空气也更比上次紧张。果然闭会不久，冯司直就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为伪山西省长，冯就为了把山西全省建成一片“王道乐土”，贡献出他自己的一切力量。

这时“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程希贤仍照旧用他们从西北地方以廉价购来的烟土配售给土药店，作为帮助敌人毒化华北人民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八、殷同之死与喻熙杰首鼠两端

1942 年末殷同去徐州参加汪伪政权召开的粮食会议，他发言很激烈。会后即染了病，回到北平，日本军部派军医给他多次诊治无效，随即死去。社会上因为他死得突然，都疑惑是日本人给下的毒手。不知何人主意，经在西单南大街挂牌行医的蒲伯杨，也是殷的私人医生，在报上“辟谣”，说殷之死“确是患病，并无其他原因”。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愚蠢作法，适是给人更增加一层怀疑而已。

事务总长喻熙杰在华北汉奸群中，本来是个不见经传的龙套--流脚色，这时猝遭殷同死亡的大故，立时慌了手脚。急急忙忙地邀请殷在机构改革前拼凑的班底，计议应付办法。这些人以为殷同这棵大树已倒，他们就很容易流离失所。因为利害趋于一致，决定拥护喻熙杰继殷之后为“新民会中央总会”副会长。请出最高顾问铃木、顾问小山到日军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部给他关说，给殷举办一个盛大的追悼会，由“中央”到“基层组织”都印制追悼会的专刊。过了一个时期“中央总会”又发布了一篇殷同的“遗嘱”，命各级“新民会”在开会时宣读。这些举动，都是为了向社会上表示他们内部的“团结”，杜绝旁人觊觎这个汉奸位子或拆散他们的班底。喻熙杰就在这个时候，以事务总长代行副会长职权。到了 1943 年夏正式当了“副会长”。以彭黎民为“中央总会”事务总长，仍兼中央训练处长。

喻熙杰当上“新民会中央总会”副会长之后，就用他的地位和职权，作政治活动。首先在华北伪组织中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以为将来谋夺政治地位的“人才”储备。乘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颁布“对华新施策”的机会，撤去了在日本直接控制下的主计局局长黄复生的职务，派他自己的同学、当时在北平经商的程子容继任。主计局是“中央总会”会计出纳的机构，这样一来，无异是由他自己直接掌握财政大权，给他自己政治活动建立了经济基础。接着支持他会内的亲信出任伪组织中的行政官吏：原河北省“新民会”事务部长叶济辅由兼伪河北省经济局长，继而专任伪河北省政府秘书长“中央总会”政治局长赵济武出任伪山西省教育所长，后又改任伪天津市社会局长；科长

陈治安出任伪保定道道尹，也有不少的县事务部长出任伪县长等等。喻自己也由日本人支持，兼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因此不少的汉奸把“新民会”看成是一座升官发财的桥梁，纷纷加入喻的“新民会”。

日本军国主义者掀起太平洋战争之后，因战线拉得太长，后备力量贫乏，呈现出一片颓势。喻熙杰在这时很想抓住一部分伪军树立所谓的“第三势力”，以备日军覆灭时，与国民党政府合流。所以他借着去南京时，不断与徐州特区伪军司令张岚峰大肆拉拢，后来他们过往日密，“中央总会”事务总长彭黎民遂到张部任总参议。在这时内蒙伪军司令王英和其他一些伪军头子都不断与喻往来。因此引起日本宪兵队对他注意，不断找他的麻烦。有一天喻熙杰同他老婆坐汽车经过西单，被日本宪兵拦住检查了一番，并无什么发现，就对他说不办公不许坐公家汽车，竟把他老婆给拉了下来。

九、生存于内外矛盾交织的时期

华北伪政权的汉奸，以为他们是日本侵占地区惟一的政权管理和政权执行的最高机关，不承认另外还有什么能和他们分庭抗礼的机构。“新民会”的汉奸又以他们是一个介于政党与团体之间和伪政权对恃的“高级群众”性组织。双方在作风上都千方百计地对支持他们的日本主子献媚，在工作上不但不能配合，而是互相排斥。而从中制造分裂，以便容易控制驾驭，又是日本人经常施用的惯技。遂使这两个汉奸集团，遇到利益互相争夺，遇到责任又互相推诿。矛盾越演越深，所谓的“政会一体”只不过当时装点门面的一个口号。后来日本人鉴于战争情势紧张，又把伪政委会和“新民会”的顾问施行了“一元化”，并支持喻熙杰兼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虽使两个汉奸集团的关系稍为密切，但“新民会”内部仍然矛盾重重。

自日本战犯头子东条英机的“大东亚新施策”公布后，就对他们占领地区的伪政权控制放松了一步，对新民会也把原来由日本人任处长、科长执行具体工作的，改为在政策上的指导监督。可是一些自以为是“新民会”的“开国元勋”的日本人，绝不甘心自己处在闲散地位，遇事横加指责，各部门的负责人为了对他们说明事情的经过，费去了无限的心机，这是表现于汉奸与日本人的一方面。

其次喻熙杰因为原是“中央总会”事务总长的关系，升任副会长后，事无巨细仍都亲自处理，各省市的事务部长到京，也就由他亲自接待，因此事务总长彭黎民因处于有职无权的闲散地位，郁郁不乐，喻熙杰察觉了这种情况，在暗地里授意各省市事务部长遇事多向彭黎民请示，日子长了喻又因事权下移，兴起架空之感，于是他们内部又因私人利益关系，产生了新的矛盾。

此外“新民会中央总会”与地方组织及日本的各省驻军，也都有深刻的矛盾。

前面说过，殷同实行机构改革后，“新民会”的工作，除了侧重于组织群众外，同时还注重训练青年，彭黎民以事务总长兼中央训练处长后，更加强了这一工作。中训处的学生共分两种，一种是各道、县抽调职员来北平集训，另一种是由该处直接考取的青年，施行训练。1943 年 4 月以后，日本当局把派在“新民会”的大部分日籍职员调走，工作集中于中国职员身上，因此他们向“中训处”保送集训的，多是工作能力不强和

作风恶劣的分子。中训处施以短期训练就通过“中央总会”人事局命令各基层组织把一批批集训结业的人，各照原来职务，提升一级，各基层科股长出缺，又都以这些人递补。致使那些忠心于“建设东亚新秩序”并且具有“工作能力”的职员悲观失望，各基层组织遂对“中央总会”发生了很深的矛盾。

“中央训练处”直接考取的学生毕业后，也都分配到道、县“新民会”的各部门任职，彭黎民把这些人看成是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还是他自己的情报员，须与他保持直接联系，经常向他报告工作情况和当地一切情况。各“基层组织”认为黎这种作法，是有益造成私人派系，妨害了他们的权利，纷纷到喻熙杰那里告状。

山东“新民会”事务部长张筱珊，因贪污腐化，被日本人和地方汉奸排挤，在山东无法立足，向喻熙杰表示辞职。喻熙杰当时拟派“中央总会”组织部部长吴秋尘继任，但遭到了日本驻军和地方伪政府的反对，后来经过考虑再三，结果派了一个日军山东驻军早就保荐过的伪曹州道尹朱经古继任。朱的父亲朱桂山是伪济南市长，汉奸世家，向来认贼作父，且在山东有很大的潜在势力，从此山东“新民会”就等于直接交由山东日本驻军管辖。对中央总会的领导指示，视若弁髦了。

十、日军投降，群奸就逮

1945 年 8 月上旬的一天，“新民会中央总会”顾问部的日本人围着收音机哭泣。汉奸们听到日本政府宣布他们天皇颁布的投降诏书，顿时感到六神无主。

“事务总长”喻熙杰慌慌张张地黑天白日不停地到处乱窜。当时一群汉奸很像没头的苍蝇，东奔西跑乱扑乱撞。有的说要投往八路军的，有的说要投往张岚峰、庞炳勋、孙殿英伪军的，也有的说要上山参加红帮的，更有自吹是地下工作的，也有的寄幻想于蒋政权军委会驻平代表何其巩的，更有鞋底擦油溜之大吉的，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蒋介石有一次在电台中讲话中说到国民党对汉奸的政策是“只问行为，不问职守”，汉奸们听到之后，都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危害人民的行为，把心放宽了很多，对国民党标榜“还政于民”的欺骗人民的口号起了幻想。喻熙杰就打了等待国民党把政权交还人民之后，从选举方面找出路的如意算盘。

10 月初喻熙杰接到军统局特务头子一封请帖，约他吃饭，他立时觉得自己的前途已出现了光明，得意洋洋地自认蒋政权要对他有所借重，内心中也颇为高兴。到了晚间传出消息，凡往参加宴会的大号汉奸全都被捕。这时群奸们“我没问题好交代”的幻想才完全破灭。之后，“新民会”的部局长一级汉奸，除了胡小石、陈宰平、赵继武等数人先期逃于外地以外，其余都被陆续逮捕，分别判处了徒刑。

（孟繁第整理，1965 年）

曹汝霖对参加伪组织的态度

胡 延 极*

人生安分即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
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
一心似水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
王谢功名有遗恨，争如刘阮醉陶陶。

此宋人戴石屏“述怀”诗，为曹汝霖氏所常吟咏者，有乞书者也喜写此诗以赠人。表面观之，曹似已淡泊名利，恬然自安矣。殊不知其言行相违并不能一致。七七事变以后，曹住天津日租界洪德里，小楼一所，建筑极精，琳琅满壁足以自娱。顾曹对人虽以“在野”自鸣，实则无时忘却“名利”二字。惟以自签字“二十一条”后，为全国爱国人士所唾骂，曹对人犹云“当国家危难时，政治家不能不为爱国所牺牲”，欲以此自解，求见谅于国人。

曹机警过人，蛰伏津门租界很少出门，北京虽有住宅，自下野后，一年中来京时甚少，即来也不过逗留数日即去，亦不回上海。实则对各派系，依然接近，尤其日方军阀财阀特务浪人来华者，无不登曹之门，故曹的潜势力依然存在。段祺瑞、张作霖当政时莫不重视之，顾以其声名为全国所共弃，不敢延揽入阁，致召纠纷，而有时借重从旁襄赞，幕后设计，起桥梁作用仍多。蒋介石迎段祺瑞南下时，曹亦厕身段氏旧部之间，曾在庐山召见，商谈中日问题，名重一时。曹为蒋所重视者，以得吴鼎昌、钱永铭之介绍之力为多。

在我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由墨西哥回国时，在南京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中，曾闻委员长王广圻（前驻荷兰公使）、委员嵇镜（前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等谈及当年签订“二十一条”屈辱条约时，曹亦多所尽力，主持者乃项城，原稿眉批全为袁氏亲笔，曹不过奉行袁之意旨，约成而曹徒供袁的牺牲，亦可哀也，惜当时未能得阅原稿真本，不敢相信。

曹在屡次政潮中，华北凡有组织，莫不加以罗致，如“军分会”、“政整会”、“冀察政委会”，或任以委员，或聘为高等顾问，从无一次落空。

七七事变后，日军喜多组织华北伪政权，最初属意者为靳云鹏、吴佩孚等军人，未能达成又商之曹氏，曹最初心亦为动，颇有跃跃欲试之意，其子曹权、曹朴环跪床前，尽力谏阻继之以哭，谓“二十一条”事已为天下所共弃，今若任伪府，是证实前此卖国为有意，再无法求谅于天下，年来尽力涤洗之功夫，前功尽弃矣。曹感悟，深然其子

---

* 作者从曹之旧“部下”和其“仆从”处听集而来。

之言，于是对喜多之请力却之，而坚持其老调“愿以在野之身，从旁尽力，随时帮忙力予促成”。适是时王克敏贱价求售，喜多等乃转而向王氏议价矣。曹氏为双方取巧计，对蒋氏采取不参加伪组织之方针，对日方采取幕后实际合作之方式。在伪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反移家北平赁屋于贡院西街，对于伪组织更多举荐“人才”，各部门均有曹旧部。外交大楼宴会，曹时为最高之“陪客”参与其间，同时王克敏亦聘曹为最高顾问，王揖唐、王荫泰、汤尔和、殷同、汪时璟等，日夕奔走其家，踵门求救，而此时曹氏之身价，殆有“薄委员长而不为”之盛也。此曹两面手法之最初步成功也。

厥后南京汪伪成立，两王交恶，王克敏被挤下台，王揖唐接任“委员长”，对曹氏事之益谨，遇事无不请教“润老”，王揖唐以一身孤立于玉党之上，无事不遭受“五人团”（即朱深、殷同、汪时璟、王荫泰等五人）之反对，公然对抗不留余地，王揖唐忍气吞声以受之，在不可遏止时，得曹氏一二言排解之，故王揖唐能满足其“领袖欲”年余之久，曹氏之赐也。其后，朱深、王克敏、王荫泰等依次各任华北伪政委会委员长，对曹氏推崇有加无减，而曹氏始终不参加表面领导。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投降，曹又为蒋介石上客矣。解放前夕，曹氏知为人民所不容，乃走台湾，依蒋介石以居。

（1963 年）

殷汝耕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始末

纪 文 白*

殷 政 权

日军于九一八事变后，拉出溥仪当伪执政和伪皇帝，成立伪满政权。日军看到国民党不抵抗，又进关侵略冀东22县，各县人民，遭受蹂躏，四散奔逃者众，仅天津市河北区大经路一带，难民之多，无法估计。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其条件是：既不在冀东驻扎中国军队，日军也不能在此地驻扎，为了缓和双方冲突，可酌派些保安队维持秩序。因此，把22县划为两个专区——蓟密区、滦榆区，蓟密区是蓟县、密云、通县、三河、香河、平谷、昌平、顺义、怀柔、宝坻、兴隆，专署设在通州，殷汝耕充专员；滦榆区是滦县、临榆、玉田、卢龙、迁安、遵化、抚宁、昌黎、乐亭、宁河、丰润，专署设在××，陶尚铭充专员。

两区的保安布置：一、滦榆区有两个保安队，是由土匪改编的，总头子刘佐周，也是土匪。二、蓟密区，是由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五十一军中选出一部分官长兵士，整训后，改易服装，编组成两个保安总队，以张庆余、张砚田分任两总队队长。日军闻讯提出异议，张庆余、张砚田硬把两个总队开进区内，日军反噤若寒蝉，一声不响。

两个专区虽已成立，日军又策划把冀东地区制造成第二个伪满，进而侵略华北全区，甚至妄想吞并全中国，使中国人民变成它的奴隶。1935年初，日军首先进扰天津市，市内的省政教机关遭到严重的侮辱和蹂躏。例如他们闯入女师学院，在教室任意作践（便溺）。路过省政府门前，侮辱站岗兵士更甚（罚跪）。于学忠以久驻天津。无法推行政令，南京方面对此情形亦深明了，因此，国府命令“河北省政府移治保定”（河北省政府设治保定，1928年南京总枢有议决案，这次移治或是根据前项议决案而来）。其时正是农历端阳节，何应钦忽飞北平，于学忠与何谈话，意见相左，被命“另候任用，河北主席一职，着民政厅长张厚琬代理。”于学忠当夜返保，进省府时，天刚发亮，坐在椅子上，把茶碗打得粉碎，次日离开省府。临行前，在院内召集职员讲话说：“他们（指蒋、何）秘密叫我放弃两个战区（指冀东两专区）。我不能奉命干这种事，两战区纵然情形特殊，我决不能把它放弃”。语言简短，意态悲愤。

同时，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奉令停止活动。新生活标语亦刷洗干净。

张厚琬代理不久，新主席商震就职，日军跟踪追至，搅得商震任何事情不能干。记得有一次轮到我这个当科员的夜晚值班，天已曛黑，忽有日军大桥××等三人从天津坐

---

* 作者时任伪冀东自治政府秘书。

军用汽车来保定，津保公路坎坷不平，半路上碰得头破血流，到保定进了医院，省府方面怕枝节横生，派人前去照料。商震得病人斯罗医院疗养，斯罗医院是美国人开的，商震是想假借美国人逃避日军，不料日军又到医院，要求见商震，医师宣告禁止患者接见来客，因而作罢。同时，各县出现了大批汉奸，扰乱地方。各县县长的行动有两类：胆子小的，到职即与汉奸合流，如庆云县长李荫棠就是这类人物。省政府把他撤换了。胆子大的，不怕汉奸捣乱，敢于捉拿送省，如汉奸缪继珊在三河活动，就被县长这样办的。商震在河北实在呆不住了，才被调往河南，由宋哲元继充河北主席。

在1935年8月间，滦榆区保安部队头子刘佐周由滦县赴唐山，在滦县车站被炸身死，日军硬说是陶尚铭干的，把陶拘去囚禁，专署失去首脑，派殷汝耕兼理署内事务。这是殷汝耕与日军勾结阴谋。伪政权之建立，也是他们预定步骤。没有几天，炸刘凶犯李振华，在农村被农民捕获，送至县政府，日军得知，又把李犯要去，不准中国过问，李犯从此没有踪影。

“滦县县长陈曾×应予调者”，是在炸刘案后，河北省政府通过决议的命令。殷汝耕竟电民政厅长李培基说：“某方（日军）反对这种措置，请收回成命”。

“殷汝耕撤职拿办”，是国民党政府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下简称伪政府）成立时的命令。殷有日军在后台当老板，国民党只空喊捉贼，而不真去捉贼。1936年夏，由南京跑来的张维（号四夷），娴于英文，自云与蒋意见不和，愤而来通，帮助工作，七七事变他跑了。有人说他是蒋派驻通县代表，合谋出卖冀东，此说确否，无法揣知。但殷写了一本痛骂国民党的小册子，已经印刷成功，最后全行作废。盖为将来失败，希图免死，则是事实。

殷政权的骨干分子：一、殷汝耕（伪政务长官）；二、池宗墨（伪秘书长）；三、陈曾×（伪秘书处长伪政务处长）；四、王润贞（伪外交处长）；五、刘宗纪（伪保安处长）；六、张仁蠡（伪民政厅长）；七、赵从懿（伪财政厅长）；八、王厦材（伪建设厅长）；九、刘云笙（伪教育厅长）；十、殷体新（伪实业厅长）。上层机构，大略如斯。

以上伪组织，除伪政务处外，全有私刻的印信。

殷政权的保安总队共有四个：第一第二两总队，比第三第四两总队根基较好，全配备给机关枪、大炮，并把第一总队扩大编制，改为教导总队，队长仍是二张分任。三、四总队，系土匪出身，怕它叛变，仅施羁縻而已，三总队四总队的队长全是亲日派。

殷政权既建，日军派来大批顾问，实行监视和控制。暗中有大批特务（日本人中国人全有），实行侦察和捕拿。有时日军官长也亲自调查。据陈曾×私自告诉我：“这里的特务太多，你要小心少说话，不要惹出麻烦来。”这群恶魔，不但盘踞伪政府，还把持着伪银行——“冀东银行”。行内工作人员，没有中国人，即有也很少。发行的伪钞有1元、5元、10元不等，系纸币，辅币1分系铜币，皆由日本印制和铸造。伪新闻纸——《冀东日报》也是这时发行的。另有一个处所，是特别会计管理处，设于天津日本租界内，地址及工作人员皆不详。1936年夏，日军设立了通州特务机关。

伪政府成立之后，发表了三项事务：1. 挂五色国旗；2. 采用阴阳合历；3. 恢复上

丁祭孔，行跪拜礼。同时，派刘宗纪赴伪满访问，伪满也派高崇禄前来答礼。

冀东钨矿公司，是殷汝耕出卖祖国金属资源的罪恶活动的结果。经理叶某（忘其名）是个亲日分子。电电（电信电话）公司之设立，是殷汝耕擅自允许日军在内地经营的企业。半年之间，建成一所大楼，对外接好路线，实行发报接话，电源是用通县发电厂的。通县发电厂系中国经营电气企业之一，他竟听从日军唆使，派傀儡史通，董理其事，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归日军来经营，幸因七二七张庆余等反正而停止。

冀东司法，属于河北高等法院管辖。伪政府成立，各县刑事案件，令县径送伪政府处理；民事案件，老百姓怕出麻烦，无人告诉。为自建伪司法系统，在倪家胡同设有筹备处，以叶尧丞为处长，在清凉庵附近修了一所房屋，以备设立伪法院之用。通县设有冀东参议会，豢养着一群土劣，替他宣传，伪造民意。通县有一小型兵工厂，中日工人全有，专门制造弹药，修理枪械。海关查验所，专门包庇日货走私。

最重要的罪恶活动是捕杀共产党员。七二七事变后，伪政府档案内，发现共产党党旗一面，足见逮捕共产党员，则是铁的事实。我曾为此事，讯问典狱长曹雨帆，据他说，“共产党员，是特等犯人，不在监狱关押，另有优待处所。”问及如何优待？他不知道，其被杀害则是当然结果。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至于其他被杀害的共产党员，或受牵连而被杀害的青年学生，不知道有多少。

1936年春季的一天，是殷汝耕50岁生日，他打算给自己祝寿，派人携巨款去北平邀请著名演员杨小楼、余叔岩到伪政府为他捧场，二人皆以患病谢绝。他不得已，请了几个票友，和不甚出名的演员，还有几个说书的，要杂技的，凑合着闹了一天，这天大摆筵席，大开赌局。

斯年秋季，又在大关庙内为其父祝冥寿。第二年春季，在豆腐池一带，选好地点，为他自己修长官府，光拆除民房，和砸地基，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直到七二七，新房只有两间，仅砌墙壁，正待铺顶，因事变而停工。

当初，日军进关侵略冀东二十九军有一部分官兵驻在通县，准备开往前线，事情平静，仍留下少数官长兵士（约两排多人），以张连长（名子不详）为领导，驻在新城南关宝通寺内，伪政府成立，他们并未撤走。卢沟桥风云既起，他们提高戒备，每日派兵士四五人，荷枪实弹，在灌输门（即新城南门）外与保安队兵士，夹道巡逻，双方从此拉上关系。这些官长兵士，扬言愿意伪政府把他们收编为正式军队，托保安队代为介绍，保安队也出面透漏消息。日军闻知，极其高兴，殷汝耕更为喜欢，打算择日点编，经过多日，才侦知不是归服，而是另有计策，殷汝耕派人到宝通寺，向张连长说明来意，请求择日离开通县，被张连长大骂：“殷汝耕是日寇的孝子贤孙，我们非杀他不可”。把来人逐出门外。日军又派了十几个兵士，拿着大枪出来驱逐，不料方出城门，即见宝通寺的全部军人，正拿着大枪等候，一见踪影，飞步赶来，要用刺刀把日军兵士挑死，这些日军，吓得回头飞跑，入城把门紧闭。

7月27日的下午，张庆余、张砚田在伪政府向殷汝耕歌功颂德，打了半天麻将，直到天黑方散，吃罢晚饭方走出伪政府。反正之初会同重要官佐到北郊孚佑帝君祠内，讨论实施反正步骤，卫队长杜宪周迟迟不表示态度，被推出庙外枪决（未死）。回到城内立即布岗置哨，先将一切电源掐断，电电公司的电话机、发报机，以及一切用具全行

砸烂，扔在街上，堆积如山。全部官佐兵士一齐动手，把日韩侨民全杀死；把料理馆（日本式饭铺）捣毁；把日军的奴隶部队（日籍官佐韩籍兵士），一个不留，彻底歼灭；把日军的特务机关捣毁，机关长细木繁被刺刀挑死；把日军派的顾问杀死，只岛田勇不知藏在何处，没被杀死；把日军储藏的三千多箱汽油击中起火。黑烟蔽天，直到次日黄昏未熄。最后捣毁伪银行，把中国银行的法币数万元拿走，把冀东伪币丢在大街上踩烂；打开监狱，释放全部囚徒。反正之夜，枪声赶走寂静，歌声上干云霄，若断若续的是："日本矮子欺侮我，枪子儿底下，让你没处躲"。"要杀蛮横日本兵，先杀卖国贼殷汝耕"。情绪昂扬，令人激动。

殷汝耕闻变，不知所措，最后爬上衣柜，被捉下来砸上镣铐，押赴东仓司令部，随即张贴布告，将殷汝耕拉上汽车，押向北平。此事原与二十九军商妥，在半路上彼此把殷交接。此夜行至中途，不见军方来人，知道事已中变，他俩把殷汝耕扔下，走上抗战路线，到陕西去了。殷汝耕哀求司机送至朝阳门外，由环城铁路站长，御下镣铐，叫开城门，跑回南池子寓所。

池 政 权

殷政权被摧毁，通县城内，只有居民平安肃静，俨然是理想的华胥之国。两天之后，萱岛联队进入城内，其实，他们只有 18 个人，蹲了两天就走。随又有酒井部队开来，军纪风纪坏到极点，白昼横行街巷，砸门抢夺财物，时而调戏妇女，城门岗兵，对妇女亦有调戏侮辱之事。据胡光（伪通县县长）说：城北各乡村居民，被日军用无声枪击杀的，足有一万多人，丢入河内，听其随波逐流、沉于海底。日军有时向青苗地扫射，理由是"肃清贼匪"。

池宗墨伪政府，是在唐山交通大学内成立的。主要人物：一、池宗墨；二、姚国桢（号幼孜旧安福系）陶景唐（原名坚，号叔仁）；他俩帮助池，定计决策，发号施令。三、王季章（伪民政厅长）；四、李景明（伪财政厅长）；五、任国梁（伪建设厅长）；六、武学易（伪教育厅长）；七、海关查验所（仍然存在，包庇日货走私，直到年终才结束）。殷政权的印信被保安队在反正时砸烂了，池宗墨又派张慰慈仿照前清的样子，把印文描成图案，在北平招来工匠多人，拨给房舍，刻出各种印信。

这个伪政府 1937 年底宣布解散，造册分赃，到次年 3 月终了。唐山交通大学的仪器，全被日军掠走，图书由保管员郑鸿斌送交省图书馆。

（1963 年）

日本侵华时期一个重要阶段的回忆

李 培 基*

谁都记得，卢沟桥事变是在1937年的7月7日，但这是武装侵略的开始，事实上早已有了具体的安排了。

冀东二十余县，由殷汝耕出面成立了伪自治政府，不但拥兵自重，而且控制了京奉路的一段。日本特务机关公然执行任务，浪人遍地，距北平不过咫尺（伪自治政府设在通县文庙）。这时，北平“政分会”的会务由王克敏代理，但已成尾声，几乎不负责任了。

1935年的春天，国民党政府任命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我任民政厅长。不过，这个主席是很难作的，因为国民党政府希望他来对付日本，平津两市的市长也由他来推荐。为了统一步伐，便于应付日本，商就保程克作了天津市长。程是日本留学生，作过司法总长，也作过驻乌里雅苏台的大员，有些法律和外交常识，更通日语。商之保他，用意在此。同时商还希望余晋和出任北平市长，但余不应允，所以仍由袁良继续维持局面。

国民党政府既然倚重商震，日本当然就以他为对象，因此，省政府虽然已经迁到保定，而商还不得不常常在津，和日方的特务头子如土肥原贤二等有所接洽，省政只由我们共同维持而已。日本对商的第一步要求是让他渐渐脱离中央，依附日本。第二步是希望通过他联络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察省的宋哲元和绥远的傅作义，另在华北成立一个依附日本的傀儡政权。商对这些，只是敷衍。日本人也看出来了，就在商与宋哲元之间加以种种离间。商知此情，请李忻向宋解释，并谓三十二军（商部）和二十九军，不但同是“中央军队，而且在历史上也有过深厚的友谊。经过这番解释，宋哲元已经了解，因而日本诡计并未生效。

但日本侵略华北，原有既定计划，商震既不可靠，又不好斗，所以不得不另找别人。然山东、山西、绥远距津较远，况且各该省的当局也不愿为日本人利用，所以，最后又找到了宋哲元。至于日宋之间有过什么条件，那就非我所知了。宋到北平，先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后来他又推荐了秦德纯、萧振瀛分长平津两市。

在1935年冬季的一天，商忽急电我立即赴津。我到津后，与《大公报》张季鸾及商震共进午餐，席间，商把日本人的要求说了一遍，并谓宋哲元主持华北，是因为商不愿为，希望商仍留河北主席原任，不必引退。

我和商是多年患难的知交，因而无话不说，有时甚至还开玩笑。这时我说：“你能

---

* 作者曾任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

作石敬瑭吗?”他说:“不能。”我又说:“你能作石敬瑭的臣下吗?”他说:“更不能。”我说:“那事实就很明了,除了河北省主席也辞去,恐怕没有别的路了。”商说:“好吧,就这样办!”商又说:“下午,土肥原还约我谈话,我不去了。”我说:“去去何妨。”但他决定不去。我们当日同车转道北平,第二日约同李小沧所长一同赴保,即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全体省委向中央辞职。商即时入了保定斯罗医院,以示坚决;省主席任务,暂由我代,维持例行公事。不日,中央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到了北平,商议结果,商震调河南省政府主席,所部军队也调河南境内驻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由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统辖。这时,我代表商震到平见了宋哲元,把河北的政务作一交代,以便他有所安排。他慷慨激昂地对我说:“将来我宋某如作汉奸,你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手。”我说:“是否汉奸,不在一时;最后算总账时,才能论定。”

后来抗战时期,宋哲元到了后方长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请他吃饭,我也在座。他说:“涵础,这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你看我怎样?”我说:“不含糊!”说毕,相与大笑。

我认为商去宋来,是日军侵略华北更进一步的表现,也就是七七事变的前奏曲。他们希望商震和宋哲元作汉奸,但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企图奴役中国人民,但是今天中国人民无比地强大了;而遭到毁灭的正是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者——他们自己。

(李泰棻整理,1960年)

我所知道的日军策划华北“独立”的阴谋

王仕任*

从1936年1月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期，我在日军华北驻屯军军部第三课当特工人员，并在军部所办的“救国半月刊社”担任翻译和编辑。日军出版这个刊物，目的是宣传倒蒋、反共、亲日，其内容极尽其造谣诬蔑、挑拨离间之能事。由于我受到日军的宠信，日军不但有时叫我充当他们阴谋活动的翻译，而且还常常把一些内部资料交给社长和我参考。后来我随日军特务头子柴山当随从翻译，也接触了一些内幕。现将我所了解的这段时期日军策划华北“独立”等阴谋活动的内幕，就回忆所及叙述如下。

一、策划“冀察独立”

1935年11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军的支持下宣告成立。日军原来的企图是：唆使以宋哲元为首的二十九军完全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冀察独立”，按照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办法，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同日军签订“共同防共，中日合作”的协定，使冀察政权成为一个完全的傀儡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日军的要求，但是并没有满足它的侵略欲望，所以它还要进一步策划“冀察独立”。当时直接策划这个阴谋的是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陆军少将松室孝良，其下还有高桥武官和冀察绥靖主任公署顾问樱井、松岛等。

大约是在1936年初冬，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于某日应日军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邀请，由北平来天津日军驻军司令官邸会谈，陪同宋哲元一起来的有松室孝良和陈觉生等人，时间是下午3点钟。当日上午我得到了通知，叫我下午一时到日军司令官邸副官处，我按时到了。高级参谋长岭对我说：“今天宋哲元来看司令官，叫你当翻译，除去翻话之外，一句话也不要多说，最要紧的是你不要表现出是个中国人。在翻译当中千万不要大意。”

大约两点多钟，宋哲元由松室孝良、陈觉生陪同到来，与田代会谈。根据我现在的回忆，会谈的内容大致是：

首先田代和宋都表示了相见恨晚之意，接着交换对国际局势的看法。田代列举了英美经济侵略，蒋介石投靠英美的事实，并对苏联、中共大肆诬蔑，然后问宋的看法。宋

---

* 作者时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军部第三课特工人员，并在军部所办“救国半月刊社”任翻译和编辑。

表示同意田代的看法，并说："我们中国好像是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之下，若再不起来救亡图存，中国的前途休矣。"田代请宋谈一谈救亡图存的办法，宋面有难色，他对田代说："我若有办法早就办了，正因为没有办法，才感到为难。司令官有什么高见，可以见教吗?"田代说："我认为现在救中国的办法，一是倒蒋，二是反共。如果委员长以及二十九军的官兵上下一致，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冀察独立，组成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同我们日本签订共同防共、日中合作的条约，我们日本就可以大力支持你们救亡图存，这不但是可以保持委员长以及二十九军的原有势力，还可以进而扩大势力范围。中国有句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认为委员长一定能够顺应时势，决不致背道而驰逆流而行的。"

宋哲元听了田代的这些话，只是点头微笑，没有马上作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司令官所谈的，在我个人没有多大问题，不过我得同二十九军的其他负责人商量，我一个人作不了这个主，我相信司令官一定会理解到这一点的。"田代虽也承认此事要同二十九军部属商量，但强调宋有先拿定主意的必要，否则其他的人更不能有所主张了。宋哲元在田代逼问之下，想了一想才说：'刚才我已经向司令官说过，我本人没有多大问题，今后就是如何说服二十九军其他负责人的问题了。我回到北平之后，一定在这方面多下工夫。"田代就进一步提出宋要多用事实和利害对部下进行说服，并列举了甲午之役、庚子之役、长城战役和淞沪战役作为例子，威胁宋哲元说，过去中国政府遇事不能当机立断，所以造成恶果。并且说，现在局势已经到了爆发战争的前夕，如果仍然像过去一样，一味敷衍，不能当机立断，过去的旧事就会重演。

宋哲元听了田代这番威胁性的长篇大论之后，竟然以卑逊的态度回答说："司令官谈得很好，等我回北平之后，把司令官谈话对高级将领们讲清楚，经过研究，有了结果再向司令官回答。"田代说："这不是一件小事，的确有研究的必要；可是事已急矣，决不可再摇摆不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请抓住时机，越快越好，我敬待委员长的好音。"至此，这一次秘密会谈就告结束了。

田代虽然用了利诱和威胁双管齐下的方法同宋哲元举行了这次会谈，又经松室孝良多方策动，但始终没有得到宋哲元的具体答复。据说原因有二：一是宋哲元部各将领不同意；一是蒋介石通过孔祥熙拨给宋50万元，蒋宋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又想出通过中日两国军官接触的机会以软化宋哲元及其部下的办法。他们倡议举办所谓"联欢会"，使中日军官会集一堂，用以"联络感情"，减少阻力。这次"联欢会"是在1937年6月举行的，地点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联欢会"的，中国方面有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以及旅长四五人，日军方面有松室孝良、樱井、松岛以及日军驻军联队长以上的军官，主持"联欢会"的是宋哲元和松室孝良。宋哲元、松室先后讲话，讲话的内容都不外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中日亲善"，"中日合作"一类的话。通过酒宴、联欢交谈，最后仍由宋和松室相继讲话，又说了一些今后两国应该亲近友好，共同抵御危害两国共同利益的敌人。事后松室向日军驻屯军司令部的报告中说："这次联欢会的成绩很好，今后还要多举行几次。"但经时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二、策划“山东独立”

据我所知道的，日军勾结韩复榘策划“山东独立”的活动，有过两次。一次大约是在1935年年底，另一次是在1936年4月。后一次，日军原定叫我担任翻译，到了济南，因韩复榘不愿意中国人在场，所以没能够亲身参加这次活动。还是事后日军叫我把密谈经过的报告带回天津，才在途中看到了密谈的详细内容。至于前一次日军同韩复榘的密谈经过，则是在预定由我担任第二次密谈的翻译时，为了使我明了以前密谈的情况，将那次的资料也给我看了。

第一次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日军为了促成所谓“山东独立”，早在1935年初就由其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开始进行策划，当他认为火候已到的时候，就在这年11月底（或12月初）同韩复榘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事先花谷在天津物色了两名年轻貌美的日本艺妓，安置在济南商埠一家日本妓院（御料理）里，花谷就在这个地方招待韩复榘吃花酒，并且给韩准备了大量珍贵礼物，说是日本驻屯军司令官赠送的。花谷的计划是，乘着韩复榘酒酣耳热、坐拥美人的时刻，诱韩在早已备好的秘密条约上签字。不料在韩还未大醉的时候，突然有韩的部下闯进屋中，将韩扶拥上车而去。这次策划的“美人计”就完全落了空。

花谷在这次阴谋活动失败之后，仍然时常到韩的住宅或省政府办公室找韩秘密谈话。通过多次密谈，韩复榘对于“山东独立”已表示完全同意。但因韩的师长孙桐萱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日军的阴谋没有得逞。据济南日军的情报，说孙桐萱接受了蒋介石给的监视韩复榘的5万元。

大约是在12月中旬，花谷再次催促韩宣布“山东独立”，可是韩还是不敢干。于是花谷就翻了脸，采取了胁迫的手段。他指责韩遇事犹疑不决，对于有碍“独立”的分子不敢采取断然处置的手段，并且以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中国战败等事例来吓唬韩复榘。韩虽然表示尊重花谷的意思，要赶紧妥善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仍无结果。不久，花谷就被调回天津日军驻屯军司令部任参谋去了。

第二次策划“山东独立”活动的，是花谷的后任武官石野，时间约在1936年4月中旬。事前我被派去作翻译，除了由天津带去两名艺妓之外，还带去大批洋酒、呢绒、金表之类的东西。在我到济南的第二天，就在济南市东南约20余里的龙洞进行秘密会谈。这次会谈是以韩复榘出名请客作掩护举行的。事前韩问石野：“今天的会谈都有谁在座？”石野说：“有我和西田领事，还有一位翻译，另有两名艺妓，再没有别人了。”韩问翻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石野说不是日本人，是天津驻屯军派来的中国人。韩踌躇了一下说：“就请西田领事作翻译好了。何必另请别人。再说西田领事对过去的经过都很了解，翻译也方便。”石野意会到韩不愿意叫中国人知道他的事，所以就同意了韩的要求。

他们秘密会谈的第二天，我乘晚车返回天津，石野把书面报告交我带回，我在火车上就把这份报告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得知这次秘密会谈的内容是这样的：

首先石野向韩说明：过去的计划没能实现，是韩受了部下牵制的缘故，对韩是谅解

的，今后继续努力就可以了。接着又问韩对于“山东独立”的问题有什么新的办法。韩说：“我还是以往的意见，没有丝毫动摇。我认为山东独立之后，既可以摆脱掉蒋介石对我的束缚，又可以同贵国合作。这对我姓韩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是因为时机不到，又没有布置妥当，如果操之过急，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前功尽弃了。”石野一方面表示同意韩的意见，一方面又催促韩掌握时机，创造条件，不能守株待兔，一味等待。韩说他正在设法创造条件，消灭障碍，时机一到，马上就脱离南京，宣布独立。石野又进一步对韩逼迫说，最重要的还是肯做不肯做的问题，如果决心去做，就应该对妨碍合作的绊脚石调查清楚，把他们消灭掉，否则一切问题都谈不到。他并追问韩，这个最大的障碍是谁。韩说，孙桐萱就是最大的障碍，只是一时还没有好的办法把他除掉，并且问计于石野。但是石野也拿不出具体办法，只是说既然认清了这个心腹之患，就应该早日除掉，只要除掉这个大障碍，其余的就不成问题了。韩又表示决心说：“我决计设法把他消灭掉，叫他死无葬身之地，管保我们所进行的山东独立得到成功。”石野最后说：“主席只有下这样的决心，才能除掉心腹大患，主席的地位才能稳如泰山。现在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宣布独立，就是一条生路，否则就是一条死路。”谈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秘密会谈。

三、策划“山西独立”

日军在策划“冀察独立”和“山东独立”的同时，还进行了“山西独立”的策划，负责策划的是日军派驻太原的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和知去太原之前，曾经利用蒋介石扣留胡汉民的时机，在两广策划过反蒋和独立。大约在1935年末或1936年初，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偕日军华北驻屯军参谋中井飞往太原，还策划过阎锡山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合流，组织“华北新政府”的阴谋活动。阎锡山为了迎合日军的要求，协助日军在太原、绥远、大同等地公开设立了特务机关。太原的特务机关长是臼井，绥远是羽山，大同是铃木。阎锡山还派他的参谋长朱绶光（日本士官毕业）专负与日军联系之责。此外，还有赵承绶、南桂馨、梁上椿等人也都是亲日的。太原有一家日本大仓洋行的分行，就是掩护日军特务活动的所在。日军驻太原特务机关人员可以随时同阎锡山及其以下的军政负责人员会谈，尤其是阎的亲信苏体仁等与日军特务机关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曾看到日军驻太原特务机关给驻屯军的一些关于策划“山西独立”的报告。其中对山西的情况作了如下的分析：（1）阎锡山向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在全省各地设立“公道团”，以保持其山西地盘。但是另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军人主张打开山西省的大门，加强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和其它各省的联系，振兴实业，发展生产。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派遣人员潜入山西，暗中进行反阎的活动，并且收买青年军人作为内应。阎对此深具戒心。这是对阎进行工作的有利条件之一。（2）红军到了陕北，而且近已发现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进入山西与抗日势力挂钩的事实，因此阎锡山更为坐卧不安，就进一步扩大并加强“公道团”的组织，监视并破坏一切反阎的活动。阎在谈话中表示：“蒋介石固然不是我的可靠的合作者，而共产党更是我的水火不相容的敌

人。”这是对阎进行工作的有利条件之二。(3)阎锡山对日本方面的信赖。阎于1930年失势逃到大连的时候，曾受到日方的保护和优待。1931年日方又用飞机送他回到山西。因此他每逢谈到中日问题的时候就说：“我这一生最可靠的朋友是贵国人，在我极危险的时候，不但保护了我的全家，还格外优待，这还不算，在我认为永远回不了山西一定死为异乡之鬼的时候，在贵国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竟把我平安地送还故乡，可以说贵国是我的再生父母，这是事实，决非故甚其词，我只有终身感激不忘。关于中日合作和中日亲善，是我应尽的责无旁贷的天职。”这又是对阎锡山进行工作的有利条件之三。

在太原特务机关的报告中，报告了和知鹰二根据上述分析向阎锡山进行游说的情况。记得和知曾对阎说：蒋介石一贯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他派出大批人员从各省内部进行挑拨离间，牵制收买，以达到他消灭异己的目的。共产党在陕北扩军后对外扩展，晋绥势必首当其冲。为阎之计，为要真正做到保境安民，只有宣布“独立”，并同日本结成同盟。现在，山西省既有保境安民的基础，宋哲元、韩复榘不久也要“独立”，两广正在进行倒蒋，南京方面就以汪精卫、唐有壬被暗杀而言，也可看出内部矛盾很多，特别是又有日本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援，这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宣布“独立”的好时机。阎既是各方面所敬佩的老辈军人，将来事成，何愁不会被推为“国家元首”？等等。

从文件中看到，阎锡山对和知的分析表示十分同意，对“独立”、“倒蒋”、“反共”三个问题积极准备，待机而行。但阎锡山又说，“山西不为倡义之省，也不甘落人后”，“山西现在保境安民的政策，也与独立差不多，服从蒋介石的中央只是表面文章”等等，仍有观望之意。

(1965年)

·伪蒙疆政权·

有关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一些补充

爱新觉罗·溥杰*

在1922年我16岁时，忽然有个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的蒙古王爷特来见我，进来的一个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一个是补英达赖（以下简称其汉名赵福海）。那时德王约二十三四岁，尚不能用汉语谈话，赵福海约40岁上下，汉语很流畅。赵不但给德王作翻译，简直是在整个操纵着他。德王拖着很长的辫发，穿着蓝袍青马褂，一见就知道是一个初到北京的蒙古“王爷”。赵则是服装打扮与当时北京的小官僚政客不相上下。我那时尚不知赵是德王的姨夫，只认为他是德王的秘书或随员之类。德王是个“整脸子”，很难看到他的笑容，说话时声音极小又极不健谈。我当时也是一个经常不出府门的小孩子，平日很少见生客，也不会作应酬客套语，只仗着赵福海一人的活跃：一方面向我吹捧德王如何青年有为，也向德王夸赞我怎样等等。这次初对面共谈了约两三个钟头，虽然所谈不外乎介绍一些蒙古的情况和表示德王怎样“敬仰”我和愿与我结交之类的话，但是终于拉上了我和德王的关系。

为什么德王不找我的父亲而要和我结交？过后我才明白：因为我的父亲载沣平素为人极其古板，尤其不好接见生客。固然当时每当东、西蒙的王公到北京来，照例都要带些汤羊、乳制品之类登门造访一次，不过依我家当时的习惯，对礼物是来者不拒，来访也必接见，但有来无往，既不回拜也不饯送，所以德王就想从我身上找出接近“清宫”的捷径。

第二年又偕赵福海访我一次。因为知道我喜欢骑马，尔后特派专人由旗下给我送来一匹青马。这次德王虽能讲些汉语，但主要仍是在赵的翻译之下同我交谈，从这以后和我建立了通信的关系。

在我17岁结婚时，德王又派一名官员送来不少贺礼，我父亲因在当时的“小朝廷”里尚总揽着全盘事务，便以溥仪的名义“赏”送礼专员以二品红顶，还用“醇亲王而不名”的大名片作为回谢。

次年德王不带赵福海又到北京访我一次，用汉语和我谈了约两三个钟头。虽然也谈了一些对北洋政府的不平不满，因为他在当时究竟还是初出社会的蒙古青年王爷，我更是除了家事别不挂心的王府“世子”，除在二人之间得出“满蒙一家”的共同结论外，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不过这次因为我已“成人”（结了婚），破例到他的寓所——我

---

* 作者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之胞弟，曾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中校侍从武官。

家附近什刹后海北河沿广化寺回拜了一次。

1926年溥仪由北京迁到天津日本“租界”张园之后，赵福海又偕德王到北京来看我，并邀我到什刹前海的会贤堂饭庄吃饭。席间他们慷慨激昂地向我表示了对溥仪的无限同情，且对冯玉祥之驱逐溥仪出宫深表不满，最后说出打算到天津去见溥仪，亲“献”一万元以表寸心的企图，并嘱我为其写信，我遂写了一封介绍信交其带去，这就是他得识溥仪的由来。

总之，赵福海之所以操纵德王竭力和我套关系，主要就是他们在政治上早抱有一种野心。但因为当时北洋政府处在军阀割据、威令不出都门的情况下，德王很难从它那里捞到好处，同时当时的有关军阀也都志在逐鹿中原，无暇顾及边陲，也钻不进适当的门路，就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心情下，想借“满蒙一家”的老招牌和溥仪接近。不过在那时，“清宫”还具有“小朝廷”之虚名；蒙古王公在京者如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人还在“小朝廷”身居“枢要”地位，德王断难“以疏间亲”；况且德王又是袁世凯晋封之“新王爵”，当然不为老牌的满蒙王公所重视；加上我的父亲又难于随便接近，所以才想抓住我。等溥仪到了天津之后，虽然关门自称“行在”，但较在北京时的局面又大见缩小，爵传资格亦不那样严限，所以德王就借这个机会假我的介绍而去见溥仪。

以后因为我忙于和张学良拉关系，忙于“投笔从戎”，忙于到日本留学，就和德王中断了联系。伪满成立后，我更不能随便和“满洲国”外搞关系。一直到了1942年4月，德王以伪“蒙疆政府主席”的资格，到伪满庆祝所谓“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到长春来为止，我们一直无函电往来。

至于德王见溥仪的经过情形在此从略，只记述他那次和我相见的情况：

在他到溥仪处的次日，特通过伪外交部到我的寓所来访。我因为他是我多年未见的老友，便很高兴地接待他。他依然是长辫后垂，和我晤谈甚欢。既倾诉日本军阀的蛮横，还问我在伪满有无接见外人的自由，也打听溥仪是不是也和他一样处在关东军的严密控制之下。我很安慰他，还对他作了一些不关痛痒的“鼓励”。他当时曾愤慨地对我说：“不到蒙古真正独立那一天，决不剪掉辫子，尽管不少人希望我能剪掉它。”我赠送他刀一口及照片一张，他也送我一幅他的近影。在他临行的前一天，还约我在一家饭馆吃了饭，有阻仓扎布夫妻等在座作陪。这天他倒对我没有说什么，只感慨无量地对我说：“没见面时觉得有好多话要对你说，见了面反倒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确是如此，我在当时对他也同有此感。

到他临走的那天，我到车站去送他，他介绍了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这时日寇关东军的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妻子也穿着伪“国防妇女会”的白色制服来送他。她一眼看到我，还特地意味深长地给我道了一声“辛苦”。到了那个时候，送一趟自己的幼年朋友，也还要外国人给道辛苦，不管她说此话的意味如何，我当时听了很觉得不够滋味。

后来德王又给我来过一封装模作样的自我吹嘘的长信，我也复过一次，从此便和他断了联系。我揣度大约是因为他既见了溥仪，也亲眼看到伪满的情况，对于我们已再不抱有什么幻想了。后来据操纵溥仪达11年之久的关东军大特务吉冈对我讲：“德王刚愎自用野心很大，根本没有把日本天皇放在眼里。只是对于‘满洲国皇帝’还表示相当的尊重，今后真得对他多加小心！”吉冈所以对我说这番话，不外乎一方面“鼓瑟而

歌"，警告我不要和德王继续老朋友的交谊，一方面也可看出日寇军部和德王之间有相当的矛盾磨擦。据我所知，有不少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对于德王在访问日本天皇裕仁时穿着蓝袍青坎肩，而在访溥仪时却穿着蓝袍青马褂一事，就极表不满，说他看不起裕仁而看得起溥仪。记得当绥远傅作义的军队捣破德王的老巢百灵庙时，德王曾对日本军部表示：如果日本军不能积极援助他，便要到“满洲国”来亡命。看来，日本军部已对德王发生了疑忌。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德王的始终一贯的大蒙族主义的野心，不论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抑或在日寇侵略时期甚至到了解放的前夕，都是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的。因此，在当时的一班蒙族上层反动分子中，不论是“东蒙”和“西蒙"，都对于德王抱有相当的期待，甚至在伪满统治的区域内如伪兴安省各处，都广泛挂有德王和其家属的宣传画，特别是他还能不时地对日寇耍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脾气，例如他和日本军部的闹磨擦，称病不到车站去迎接汪精卫终于迫使汪不得不“屈尊降贵”到德王的卧榻去问安……等等，都有意无意地抬高了他在汉奸——蒙奸中的声价。

在这里附带着记述一下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蒙族的阴谋政策之一端：

日本对于蒙古地区，一贯未忘“分而治之”的政策。在伪满政权成立以前，曾极力挖深蒙古、汉族之间的鸿沟，唆使蒙古族加深民族地域的观念，甚至伪兴安军曾悬过所谓成吉思汗时代的旗帜，但由于伪蒙古军等不能给它的主子争脸——伪内蒙古自治军既以一塌糊涂而告终，伪兴安军又在“哈桑湖”事件中弃甲曳兵而走，致日本不得不缩小蒙古族特殊化的范围。固然在敌伪末期，日本曾大力利用伪蒙古军作攻击热河、长城线八路军的主要工具，还公然叫嚣过“蒙古族最可靠，满族次之，汉族最危险”之类的话，但始终不愿使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蒙”和“西蒙”联结在一起，在离间汉蒙的一贯政策之外，对于所谓“东、西蒙”也不敢不采取使之“分家”的手段。

事隔多年，难免有记忆错误之处，希望对于这一补充，更加以补充和订正。

（1963 年 12 月）

何应钦派我北来联系四个人的始末

郭殿丞*

1936年秋，我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任内，并兼城防委员会委员。武汉城防东面葛店、田家镇，西面大小军山，北面河南省之信阳，为在各该方面构筑武汉城防防御工事，正在积极构筑。南京军事委员会有电给武汉警备司令陈继承："速令该部参谋长郭殿丞来京另有任用"。此电未经我看，陈继承当即复电称"该员在此负武汉城防重要责任一时未能前往"。南京旋又来电称"此间任务比武汉更较重要速令前来勿误"等语。在这时候陈继承乃将前后电交与我看，随即收拾行装乘轮船前往。到南京即去见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及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朱、何二人告我："现在华北局势异常混乱，中日关系自'九一八'后日趋恶化。日本近又勾结德王组织蒙疆政府，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又制造我华北特殊化，分裂我国国势。现在考虑要知道北方的四个人的真实态度，并对他们致以希望。（一）宋哲元——自成立冀察政委会直接与日本周旋，宋哲元终日为汉奸所包围，是否与日本妥协，政府甚为怀疑。又未便轻易派人前往与其联系，很愿知道他的真实态度。（二）王英——本是一纨袴子弟，毫无知识，现在或者迫于环境，已为日本所束缚，听其摆布、利用。又令其收集孙殿英旧部不少，并使其以百灵庙为根据希图扰乱晋绥边境。希望不为日本长期利用与国人为敌，伺机反正，政府一定给以任用。（三）孙殿英——闲居北平，而座上客常满，并有多人长期下榻，究竟都是何许人，在搞什么事均闹不清。并且他的旧部好多在王英和李守信部队内，他常与王、李二人信使往还。北平环境至为复杂，倘如孙与日本勾结影响最大，颇值得注意。希望勉以大义为中国保持国格，为个人保持人格，千万别当汉奸随着日本走。如果不与日本勾搭，政府定给以名义，将来必有所任用。（四）李守信——原为热河军队中级官，靠拢日本，收集孙殿英旧部不少，自伪蒙政府成立与德王分任正副首长，兼蒙古军总司令，军队不少。如能使他相机反正，政府必定重用，于抗日前途关系至大。以上这四个人虽不能说举足轻重，但是如果他们一心一意的为日本利用，对于抗战影响甚大，就是对于目前华北局势的演变也影响不小。你在华北军方多年，这四个人我们想你直接间接都能取得联系。希望你即日北去分别运用，再给你配合两个人，以便遇事商量共策进行。"

在此时间南京有一李芳亭者到国民政府军委会，自称为李守信老友，奉李派来南京为代表，秘密向政府有所报告并取得联系。当经朱培德派人接待，见其言语行动间颇多可疑，但根据接触以后可以断定确与李守信有关。而南京正在急想与李守信通声气拉上

---

* 作者1936年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线索，即利用李某弄假成真。遂嘱接待人虚与委蛇。

至于派遣同我北来的两个人，一为参谋部高级参谋黎明（此人经历详后），一为上尉参谋某人（姓名已忘）。并给以文件略称“兹派本会高级参谋郭殿丞等北上到察、绥、青、宁、蒙、新等各地视察，仰各地方官妥为保护……”。

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作寿。朱培德、何应钦即命黎明陪同李守信之代表李芳亭同去洛阳见蒋，以后再来北平与我会面取得联系。蒋见李芳亭颇为礼遇，勉其切实传达政府对李守信的希望与将来的借重。到北平随时与郭、黎和高参随时联系。并送李芳亭路费1000元。由此可见南京对李守信之重视。黎明与李又回南京向朱培德、何应钦报告到洛阳见蒋的经过，后又回来北平。

当黎明与李芳亭同去洛阳之后，朱、何即催我北来，我偕上尉参谋同到北平。适值宋哲元回山东乐陵原籍，由河北省主席冯治安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我与冯是陆大同学，即往见冯。晤面后，稍事寒暄即说明我北来任务，并用笑谈言语说：“南京一班人都说你们是有点灰尘路的（北方土语就是颜色不纯，形容站在两方面），以致中央有些怀疑，又不便派人前来联系。究竟这里是怎样啦？是不是随着日本走呢？朱、何同我说如果他们随着日本走就以日本来对待，如果随着中央走就以中央队伍来对待。”当出示了文件，又说明希望他们表明态度，免得南京猜疑。冯当时脸红说：“我们已经开过几次重要会议，早已决定，到任何时期、处任何环境，绝对随着中央走，听中央一切指示。绝不与日本妥协去当汉奸，一定保持着长城抗战的荣誉，不能降低了抗日的心情。我们的口号，以北平为我们二十九军的坟墓，请中央放心，更希望中央准备抗日，这是我们二十九军的态度和决心。”

我又笑着说：“老弟你能代表的起来？”冯说：“这是什么话呢，我代表不起来就不能说这坚决的话，我们内部如果不一致也不敢说，说了就算。”我即叫来南京电话请冯与何应钦直接说话，我在旁听着冯与何所说的话和向我所说不两样。至此我对于联系宋哲元的任务就算终了。

我即日又去访孙殿英。他住在北城帽儿胡同（冯国璋的旧居）。好在我与孙乃是多年老友，不分彼此，什么话都能说。我与他见了面就说明我的来意，也出示了文件，并将与冯治安所谈的结果及冯与何直接说话的经过学说一遍，又说南京知道他宾客满门，他的部下多在王英和李守信两处，并与王英、李守信时有往来，北京接近日本环境不好，政府有些不放心，派我来首先致以慰问，并希望将对政府的态度表示一下。总而言之，咱们要为中国保持国格、给个人保持人格，千万别当汉奸。政府一定给以名义将来有所任用。孙说：“免不了朋友糟践我，说我要当汉奸。并且北平的处境也不好，也难怪政府不放心。请你向政府保证，我绝对不当汉奸，如果政府决心抗日，孙殿英一定扛着枪杆子上前线去打日本。你放心吧。你如没地方住就住在我这里，政府嫌我这里宾客多，再加上一个。孙殿英好交朋友谁不知道，离开朋友吃不上饭。至于我的旧部跑到王杰臣（王英字杰臣）和李守信那里，还不是为了一伙人吃饭吗。也未必真心随日本，如果政府抗日，说不定哪一天就许过来。政府看我接近的人杂乱，怕我当了汉奸，其实每天朋友们在一起所谈所议还都是关于如何抗日的事。”当日孙还留我吃饭。我就把我和孙谈的情况报告给何应钦。后来南京给孙殿英送来一个“察北游击总司令”的委任

状，也不过是当时的一纸空文吧。

我与王英有过一段渊源，故我找他联系不费周折。我即日到前门外永增军衣庄，见其经理田沛然即问“王杰臣是否在平”。田说“昨晚才回去”。我就赶往绥远，到达的当夜傅作义即奉命向百灵庙王英伪军进攻，战事颇为激烈，到天明即有两个师同时向傅投降交械。一个师长名石玉山，一个师长名金宪章，全是孙殿英旧部。战事结果王英惨败，随即离军他往。我往见傅作义，傅派汽车送我到百灵庙视察一周，至晚仍返绥远。当晚即发生“西安事变”。在此时又有王英驻兴和县部队两个旅反正归来，一个旅长名王自修、一个旅长名吕存义。傅当即派其副军长曾延毅同我到兴和进行点名，对该两旅点验毕并讲话嘉奖，事毕我仍回绥远。

按百灵庙作战情况，当时晋绥军总司令是阎锡山，傅作义在绥远就近指挥。所参加的军队计，骑兵军长赵承绶派孙长胜骑兵一师、傅作义派孙兰峰步兵一旅、王靖国派步兵两团、张潜炮兵团派炮兵一连。孙兰峰之步兵一旅、炮兵一连由正面向百灵庙施以猛攻，孙长胜骑兵一师由西面进军，到百灵庙即将王英子弹库点着，此一点在作战的精神、物质两方面都成王英队伍致败因素。王靖国之两团驻包头，防止王英溃兵西窜。

黎明与李守信的代表李芳亭由洛阳转南京，又一同来平。在黎明的意思是，李芳亭既为李守信的代表，又是多年老友，今既到平一定偕同到张北往见李守信，首先要把他到南京又去洛阳详细经过及南京与蒋的意图向李守信报告，再介绍我二人如何与李守信作紧密的联系，以至到具体李守信如何反正抗日。不料李芳亭到平以后忽然隐避不见，黎非常焦躁。事后始知李确为李守信老友，去南京充代表则为自告奋勇，成功回来自然可以向李守信秘密报功。但李芳亭原住北平一个时期才到南京活动，未走时已为日本特务注意，忽然又回到北平，就更被注意。与他相熟的人向他警告，于是他即避而不与黎明见面，黎不得已遂到绥远找我叙述一切经过。我二人计议一下，留他在绥远接续一切，我即回平。一方面寻找李芳亭下落，一方面再从热河在平老友中找线索，设法与李守信取得联系。既到平，有热河不少熟人请我在东来顺吃饭，其中有一前热河县长孙姓在座，此人与我岳父有关系。他告我说：“你内弟喻德馨来平找你有事，来了好久一直找不到你家，他家眷亦在平住某处”。我饭后即往探望。

我的家眷一向住在北平，我原配喻氏故去以后，我又常在外省，遂与喻家失掉联系，并时常搬家，所以我内弟来平数月找不到我家。既与德馨相见，即告我李守信派他来平找我的住址与我联系，如何与南京早日拉上线索。德馨来平好久竟找不到，曾被李守信数次责骂，他遂不敢回去。

过去李守信在热河平泉当营长的时候，我岳父喻静山当税务局长，二人感情甚厚，还是换谱弟兄，在李守信投在日伪以后，总想与南京拉上联系。偶尔与喻静山商谈此事，喻说：“我的小婿郭殿丞现在南京参谋部任职，与高级人可以接谈。此事他可能为力，现任何职我说不清。他的家眷在平，可以叫小儿德馨去平找到他家问明通信地址再想法接洽。”那时我内弟喻德馨在李守信军部当军需，李即派他来平找我。但我岳父与李守信的关系我并不晓得。

自李守信代表隐匿不见，正苦于无路可走，巧遇一孙姓，乃知李守信也在急于想与南京拉线，自然事不宜迟。于是我与喻德馨当日晚乘车一同去张家口，下车先到花园饭

店落脚，因彼时日本特务甚多，为了避免日本耳目，半天挪了三个房间号。入晚一同坐汽车到张北，先进一饭铺稍停。遂又到李之兽医处稍坐，旋又到兽医处长家里。那天适值日本指导官要回国，李守信请他们吃晚饭表示饯行。到夜里12点席罢才回到家里与我见面。稍事寒暄，我即将朱培德、何应钦派我北来任务述说一遍。李即说："首先说我绝不甘心当汉奸，所以叫德馨到北平去找你，希望由你向南京打通这条路线，即可表明我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表明我的心迹。德馨真是个废物，一直去了几个月找不到你家住址。幸而有机会今天见了面，我将参加伪组织的经过与你略说一说：原来我在热河平泉当团长，我的旅长叫崔星五，他与我说咱们受日本压迫，环境如此恶劣，就得想个委曲求全的办法，暂时与其虚与周旋，可以保全实力。我将旅长职务交给你，我到长春伪满政府去活动，再看南京政府是否抗日。我当时同意，但崔旅长去后即留在长春，等于'作质'。由此我旅得到日本信任，也就得到日本接济。一直由一个旅的基础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如果中央真是抗日，我这几万人愿作前驱。设法骗上日本几十门大炮、几十架飞机，后再反正抗日，消灭敌人。我的全军上下如反正攻打日本心理是一致的。"我当即与李说："我曾假想一个对日作战方案，大概与你说说，交换一下意见。"他听罢颇为赞成。他又说将来与日本作战，给我派援军时请中央派中央队伍，不要其他杂牌军。李与我一直谈到天明，颇像是"慷慨陈词、句句由衷"。

我随便又问他："有一个李芳亭到南京，自称是你的代表?"他笑了笑说："倒是我的老朋友，但并未派他代表。"

彼时张北俨然是日本世界，遍地皆是日本耳目。李守信所乘的飞机、汽车司机全是日本人。所以我与李晤谈一幕，当时极端保密。

我回平后，即将与李所谈结果先用简单电文报告南京（朱培德、何应钦）。又将详细情形写成书面交由上尉参谋送往南京。及其回平即携回中央任命李守信为"五十八军军长"的委任，经喻德馨秘密送给李守信。据德馨回平说将委任送给李，他即装入一木盒又放到缸内埋藏地下。我由张北返平，急电在绥远的黎明告其见李经过。并请他来平面商一切。

黎明回平后，即向我商量，他想与李守信见面取得联系，意思是如有一人回南京哪一个人都可与李联系。我很同意，即由喻德馨陪同黎明去张北。李、黎二人见面，也秘密长谈了一夜。关于我假拟的李反正后华北对日作战计划，二人也讨论一番，仍无变化。即一路由北宁路线进出山海关由中央军担任，二路进出喜峰口向东进攻，由二十九军及晋军担任，三路由李守信之挺进军进出多伦向热河进攻。李并向黎再度说明将来援军不要晋军和二十九军，指明要汤恩伯第十三军。

黎第二日匆匆回平，向我叙述见李情况及作战计划无变更与援军问题。我和黎商量请他把草拟作战计划去绥远送给傅作义和汤恩伯一阅，问他们是否可行，二人均同意。随将此计划又送往南京。

嗣后汤恩伯派一秘书来平找我，请我到平地泉有所洽谈。我随同其秘书偕往见汤。所谈侧重我与李守信晤谈经过及所谈内容。并对作战计划又作研讨，但无变更。对于李守信反正后请他十三军作援军一层，表示欣然接受。汤又说愿和李守信见面一谈，我说"接洽成熟我来请你"。不久事变未成事实（即汤的军队事变后李守信既未反正，乃由

平地泉通过蔚州转进河南彰德）。

关于李守信如何反正及何时反正，由我与黎明随时联系、策应。我由平地泉返平，李守信即派他的副官长李维辰、军法处长某（姓名忘记）一同来平住在我家，便于传达和联系。迨七七事变，李仍无动静，我很焦躁。当即催李维辰速回张北催李动作，去了数日丝毫无消息。旋李维辰回平向我说："李司令说战事已起，就得实行抗战，而察哈尔主席刘汝明队伍是能打的，为什么不向张北进攻，反而向南撤退，弄一些破烂队伍到关公岭来应付。李司令正在考虑，举棋未定，这时日本空运两个联队到张北降落，遂不敢轻动。李司令认为南京想把华北割舍，我如率然反正，是孤军陷入强敌，无法存在"。总之当时中央想放弃华北冀察各地，李如轻举妄动，必被日军消灭。难怪其犹豫观望不践前言。

七七事变发生后，南京派林蔚、熊斌、徐永昌三人北来，协助宋哲元计划抗战，一起住在保定。他们三个人预料日本在津驻屯军分驻张家口、塘沽及北宁路沿线，一时未能集中。当时我华北军力量可以一鼓而给以分别歼灭。日本虽依靠空运、海运及火车运三条运输线，若由日本运兵到我国至快亦需要两周以上。我们可以不待其大军集中华北，以迅雷不及掩耳方式先发制人给以个个击灭。（时宋在原籍）宋哲元由原籍回到天津，林蔚等三人即命保定公安局长李忻前往天津请宋到保定共商华北抗战步骤。李到津见宋而宋拒不前往，并高唱"东亚和平"谬论，还说"绝无他事发生"。李忻回保复命，宋旋回平。林等又命李忻来平找宋仍请他去保，并传达林等的话：抗战队伍不够，你想要哪个部队协助，中央就拨给哪个部队。宋要孙连仲军、商震军、高桂滋师等，国民党中央即据林等电请，命这三部分军队迅速北上，协助二十九军共同抗战。但孙连仲先遣部队刚到保定，宋又拒绝入境。因他到平以后，仍受汉奸包围，误听"东亚和平"谎言，对日作战毫无准备。迨日军集中完了，猛攻南苑，数小时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均被炸死。二十九军已失掉战斗中心，宋即出城由平汉线向天津市南转进。当时北平十分混乱，我与黎明计议，北平局势如此，我们二人不要全困在此间，请你先回南京报告，我暂留此间以通声息，并最后看看李守信有无举动。黎即回南京，去后交通即断。

是时日本松井部队首先进据北平，人心惶惶不安。尤其是与反日、抗日有关人员更为忐忑自危，俱想早日离平他往，因当时汉奸特务耳目甚多。我在此间已无可为，亦想回南京。在此时马占山的前财政厅长郎官普（现奉天文史研究馆馆员）、秘书处长段中潘、顾问宋云桐（现黑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三人也找我计划离平办法，并约定以后在津如何见面。我候通车，化装商人到天津，先住法租界，当时逃人人过多，法国人检查亦甚严。翌日迁入英租界一个朋友家里。马占山在英"租界"有住宅（马未在津），郎官普等均住马家，我去与他们晤谈离津南去问题。第二日我乘小火轮先到塘沽，再坐轮船到青岛，往见青岛防空司令廖安邦（现任河北省政府秘书），他告我上海局势甚为紧张。我遂变更南去计划，乘火车到济南，当时友人告我上海陷落、南京不保，山东省府要向邹县迁移，其紧张情况可知。济南以北火车不通，往南仅通徐州。我遂坐火车到徐州，既到已知南京政府纷纷向汉口迁移。我由徐州又转开封，下车后往见河南主席刘峙，请他代为电询太原阎锡山东北挺进军现在何处，回电说挺进军队伍在包头、后套之

间。当时贺耀祖任甘肃主席，我又直接电询贺，回电称马占山现在后套、黎明刻在兰州云云。

先是卢沟桥事变既起，事态日益扩大。南京召开国务会议，蒋介石与钱大钧说："你把我的意思向大家说说，现在中日战争已起，马占山在九一八抗日战争打过头一炮，现在如使用马占山三个字还有好的影响，但非国际战争人员。可以组织一个番号，另外由政府再派妥员前往帮助抗日"。钱大钧即在会场传达蒋的所说情形。何应钦即提出可派郭殿丞、黎明配合马占山组织"东北挺进军"。马任总司令、黎任副司令、郭任参谋长。并指定何柱国骑二军之刘桂五一师为挺进军基轮。熊斌提出郭殿丞尚在北平怎么办，何应钦说郭殿丞未到以前可暂由黎明以副司令兼任参谋长。

黎明此时已在南京，关于上述这段经过他从正面、侧面完全详悉。即详告来南京开军事会议之孙殿英，请他设法转告于我。孙到山西即派其副官来平秘密告我，并催我速回南京。

黎明奉令北上与马占山共组东北挺进军，两人率刘桂五之骑兵第六师进驻包头。而马、黎二人意见不投不能水乳，形成分道扬镳。黎即离开挺进军，急电国民党军委会"李守信既未反正，我可否以五十八军番号就地号召旧部（黎曾在绥远任商震骑兵师长，后以裁减去职，旧部散在绥、包不少），军委会回电且准。遂即收容一二万人。黎为向政府请饷，即取道兰州转往汉口，到兰州知我在开封有电给贺耀组，黎即电约我在郑州五洲旅馆会面，既见，各把别后经过叙述一遍。黎遂去汉口，但未再返回绥远。所谓五十八军，即由参谋长孙麟率领由榆林开往白水。

按：黎明安徽广德人，前清贵胄学堂毕业。陆建章督陕时，他任陆承武（建章之子）旅部上尉副官，商震时任该旅团长。在陈树藩、胡景翼驱逐陆建章离陕时，商震即率其一团由陕北绕道风凌渡过河入晋，受到阎锡山欢迎，并为增编成一旅，仍由商任旅长。民国十四年冬，国民一军攻击在天津之李景林，绥远都统李鸣钟参加杨村战役，商震继任绥远都统。黎明往报，商即任以都统署中校副官，又令其为驻包头办事处主任。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阎锡山令商震整编绥远各部队，即将王英之四个骑兵旅编成两个骑兵独立团、一个步兵团，将满泰之两个骑兵旅编成一个骑兵旅。王、满两部编余之官兵选其精壮者，另编两个骑兵团，一团由黎明任团长，一团由满泰旧部徐某任团长。其余给资遣散。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阎锡山又令商震对绥远各部队均重新编制。即将王英之两个骑兵独立团编为一个骑兵第八师，其步兵团改编为山西陆军骑兵独立第一旅，旅长以原来步兵团长郭殿丞任之。给满泰编成一个骑兵第五师，另成一个骑兵第一师，师长由绥远都署参谋长李竞容任之。

蒋、冯、阎联合北伐，晋绥军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分两路进攻奉军。左路总指挥商震，前敌总指挥为第六军副军长张荫梧，即由晋北直攻奉军，进至下花园奉军反攻，商震率两部转进雁门关固守广武。总指挥部进驻代县。右路总指挥为第一军军长杨爱源，前敌总指挥徐永昌，军队进出娘子关，进攻石家庄。奉军反攻，右路即转进娘子关固守。杨爱源回太原，徐永昌继任总指挥。

1927年9月底阎锡山又令傅作义率其所部第四师路经蔚州由山区小道进据涿州，

炮兵指挥兼卫戍司令白濡青、前敌指挥兼城防司令袁庆曾，任务是横断京绥、京汉两铁路敌军的联络，相机进据天津北京，奉军以涿州密迩北京，恐其一旦突出北京被扰。是以围攻军队多至五万以上，固守三个月。后以城内食粮贻尽，经教会斡旋和平解围。在固守期间牵制奉军很大兵力，影响不小。

在此时期奉军骑兵旅长郭希鹏率军进占绥远，即代理绥远都统，当将王英、满泰两部收编。至李竟容之一师、黎明之一团亦先后被奉军收编，李去北京，黎潜伏绥西，仍与王、满二人联系。民国十七年（1928 年）春全线反攻，奉军退出绥远，阎锡山令李培基代理绥远都统，商震任河北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黎明遂任绥远骑兵第一师师长。旋北伐告成，各集团部队酌量裁减，黎即呈请将他的一师给资遣散，结束后到京见商，商即任以剿匪司令部副官长。旋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曾任三十五军参谋处长，后到南京任参谋部高级参谋。

（徐存甫根据作者口述记录整理，1965 年 3 月）

军统特务与汉奸伪军勾结的一些情况

宗 化 民*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与日寇的前哨—伪军秘密的勾结。特别是军统特务机关，高级特务拿着蒋介石给汉奸的委任令出进伪军“司令部”，特务们又经大汉奸加委“高参”“嘱托”“咨议”一类职务。我所知道的日寇侵略华北阶段至1945年日寇投降期间，平绥路沿线及河南汉奸伪军与军统勾结情况如下：

一、军统与汉奸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的关系

远在1934年，军统高级特务马汉三奉戴笠之命与汉奸李守信勾结。马汉三拿着蒋介石的密令，派李守信为“先遣军骑兵司令”。李守信既是日寇的伪“蒙古军司令”，又是蒋介石的“司令”。马汉三充任伪军的“高参”，在察北一带作特务工作。1937年日军侵占华北，李守信部驻平绥路沿线，日寇将察（晋北也包括在内）绥两省划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充“主席”，李守信充“副主席”兼“蒙古军总司令”并叙“上将”，蒋介石为李守信汉奸部队留“中央军五十八军”的番号并派李守信为“军长”，由马汉三转达，马汉三又充伪军“嘱托”。我于1939年和其他15个同学由北平去兰州受军统特务训练（“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训班”），由李振宗持马汉三介绍信找伪蒙军“师长”兼“包头市长”。汉奸刘继广早知有学生要通过，他拨车一辆、伪官兵各一人，护送我们出包头城，通过日军防地到达傅作义防地转往兰州。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召集德穆楚克栋鲁普及李守信到重庆，委派李守信为“热河人民自卫军总指挥”。在北平，李守信与马汉三行影不离（马汉三充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对外以“北平行营”督察处长出名），李守信赠送马汉三大批财物及最新式的汽车。戴笠到北平乘坐的车就是李守信的。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史泓，每次由归绥到北平住在伪蒙军师长朱恩波家，朱恩波的儿子由史泓委派校级军官。

汉奸李守信摇身一变为“中央军的总指挥”，他以后以别号李自忠出名。他到热河大批收罗留散的伪蒙军伪警察，企图帮助蒋介石建立反动军队，进攻解放军。热河朝阳的军统组长龙超协助李守信建立反动军队，曾一度兼充“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司令”。保密局在承德建立热河特务站时，龙超充站长，马汉三介绍李自忠的参谋长刘继广充少

* 作者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派驻天津站上校督察。

将通讯员，该站副站长宗化民刚到热河李自忠就赠给指挥部上校参议名义。

1947年秋蒋介石又将李自忠的“热河人民自卫军”改编为“骑兵第三军”，李自忠充“军长”，直到1948年李部在东北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消灭。

二、汉奸王英与军统

王英是绥西后套的恶霸大地主，投降日寇认贼作父出卖祖国当了大汉奸。日寇委派王英充“绥西联军总司令”，驻在包头以西，军统委派绥远籍特务史宜亭充王英匪部的“参谋长”。史宜亭曾企图夺取王英军权，二人发生摩擦才分开。但是军统与王英在抗战时期关系始终未断。1943年军统五原办事处包头组长龙宗信在包头活动，王英给以参议名义，王英对经过他地区的军统特务表示欢迎拉拢。王英虽作汉奸，在五原临河一带有数百顷水田，蒋介石却暗示该地地方当局保护他的财产。

三、汉奸白凤翔与军统

白凤翔又名白三阎王，是热河的著名土匪，曾由张学良收编为东北军的骑兵师长，以后又充蒋介石的“热河先遣军总指挥”。“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占华北，白凤翔投降日寇。日寇委派白凤翔为“东西同盟军上将总司令”。他领着伪军驻在绥远的固阳黑教堂一带，经常与军统特务勾勾搭搭。军统五原办事处派遣特务冯兰亭，带着蒋介石委派白凤翔为“骑兵司令”的电报住在黑教堂。白凤翔的副官长徐宗尧任军统高级通讯员，白凤翔的家眷妻妾三人住在西安，由胡宗南派人保护。三个女人经常往返于西安及沦陷区黑教堂。白凤翔因吸食鸦片、白面，毒瘾太深，于1942年春中毒死去，他的汉奸部属姜兴周充任军统的组长，吕瑞祥充译电员，徐宗尧一跃而为军统高级特务华北站站长及日寇投降后的河北省会警察局长、解放前夕保密局北平站站长。

四、汉奸李英与军统

李英也是土匪头子出身。起初他和他的叔父李福和共同集结土匪五六千人投降日军，日军委派李福和任伪皇协军“总司令”，李英充第一路“司令”，驻在河南彰德一带。李福和死后，李英执领乃叔汉奸军队，日军改派李英为“剿共军总司令”。李英出卖祖国屠杀人民更凶恶，他与军统特务机关又在勾搭，由汉奸变为特务的徐宗尧成为李英的座上客。李英的部下康亚夫（又名康健东）兼军统华北站通讯员，李英的下属“旅长”李文伯（又名李墨林）兼充军统华北站通讯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汉奸李英逍遥法外，在北平作寓公，他的部下康亚夫充军统“长春策反专员”。李英于1947年南京一行，特务头子毛人凤（保密局长）亲自接待，并派李英为保密局热察特别站站长，康亚夫由“专员”改调热察特别站副站长，李英的汉奸旧部分别充任特务内外勤的站员、组长通讯员等。

（1965年4月）

日本侵略华北时期的伪蒙古军政府

李泰棻

日本侵略华北时，制造了两个伪组织，即察北的伪蒙古军政府和冀东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两个伪组织虽然都作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先驱，但在发展过程中还是有所不同，这里只将伪蒙古军政府部分作一记述。

伪蒙古军政府

伪蒙古军政府发生与发展，应当分作三个阶段：

一、“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时期。这个委员会成立的中心人物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他原来是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西苏旗的札萨克，清朝时期，受爵亲王。幼年曾经在北京的贵胄学堂读书；历任第二届国会参议院议员，段祺瑞执政时参政院参政，北伐以后又任察哈尔省政府委员。他是一个性格顽固、不甘寂寞的人，在内蒙“王公”中，最为突出。1929 年，他曾亲自到沈阳，见过张学良。张赠送他一小批军械。回旗下后，他成立了“乌滂守备队”。虽然只有一二百人，但已经有了军队的初步组织。随着，他又到了南京，蒋介石派了受过特务训练的热河青年丁若愚、陈绍武、陶立滨等多人随他于 1932 年到了旗下，名为帮助他，实际上是监视他。不久，又发展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以示优遇。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每见生客，总是穿着清朝那一套王公的礼服，脑后垂着从来没有剃过的发辫。这种亲王的头衔，民国早已否认，但在旗下，被他们奴役多年的蒙古族人民，还是不敢不承认的。所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仍想利用它作为统治内蒙古的凭藉。在他对我的谈话中，曾经郑重地说：“无论哪一族，凡是住在中国疆域以内的，都是中国人；也自然都有统治全中国的权力。历史上，我们蒙古建立过元朝；满洲人建立过清朝，汉人统治过若干朝，这是事实。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谁有能力把中国搞好，谁就可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就应该拥护他。反之就应当打倒他。但是大汉族主义者，往往鄙视元朝清朝，认为是外族人主，这是不公平的。不过，在今天说，蒙古人没有这种人才，也没有这种野心，但是，言语、风俗、习惯、生活种种的不同，理应自治，这是有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我回答他说：“自治固然可以，但自治和独立是有分别的，如您的逻辑所言，各族人都有领导全国的权利；那么，各族人也自然都有服从全国政府的义务。”他并没有反驳我的话。不过从他的谈话中，是可以看出他的野心的。

蒋介石派来的丁若愚没有照着蒋介石的宗旨监视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行动，相反，他们鼓动联络内蒙古“王公”，要求自治。

东三省和热河省境的内蒙古各旗已在伪满的统治之下，无从下手。此外绥远省境有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共辖13个旗；宁夏省境，还有阿拉善独立旗。“德王”联系结果，除阿拉善旗的达理札雅外，都赞成这一主张。1934年，他们联合发表宣言，向南京政府要求“高度自治”。这时，华北已受日寇重压，蒋介石只顾“剿共”无暇顾及边疆，于是派内政部长黄绍竑亲到百灵庙，发表六项原则。同时，根据原则，成立了“内蒙自治政务委员会”。其组织内容要点如下：

（一）察绥各旗旗长（即各旗原有“王公”）均为该会委员；

（二）以年岁最长、资历较深的云端旺楚克（简称“云王”）为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为秘书长；

（三）该委员会的经费每月定为五万元，由南京政府按月拨付。

但云端旺楚克老朽无能，一切会务多由“德王”主持，会址设于百灵庙。“德王”常驻会，“云王”只间一到会而已。

与此同时，对该委员会又设了一个监督机关，定名为“内蒙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并特派何应钦兼任长官。因为何这时正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长，所以，长官公署也就设在北平。对内蒙古情况毫无所知，想找一个熟悉内蒙古的人替他跑跑。

二、两个“蒙政会”时期。阎锡山继任长官后，和何应钦大不相同。他统治绥远已经有了将近十年的经验；“王公”中如云端旺楚克和沙克都尔札布等都到过太原和阎见过面，他们对阎，比对蒋介石自然亲切得多，所以绥境十三旗长是可以听他“指导”的。但“德王”和他毫无关系，而且别具野心，万难由他指使；而“蒙政会”的实权又旁落在他的手里，所以阎非去掉他不可！

蒙政会的经费，在阎任长官后，就改由阎筹措拨付。阎就指定从青甘烟土过境（指绥远）税中，划出2%作为“蒙政会”的经费；其实际数目，比原来的五万元还多。但为了排除“德王”，迄不按月拨款，甚至一文不予；“德王”派代表敖云章到太原坐索，数月也没结果，“德王”大愤，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阎就想法把“蒙政会”分裂为二：一为“绥境蒙政会”，一为“察境蒙政会”，并以“德王”为察境蒙政会的委员长。这样，“德王”就必须离开百灵庙，自然对于原来的会务就不能过问，从而，也无法操纵绥境的“王公”了。

“德王”对这一措施非常不满，但又无能抵抗，只得离开百灵庙，回察组织察境蒙政会。偏偏阎又指定化德县为“察境蒙政会”的所在地。化德是宋哲元主察后才设治的新县，地广人稀。宋从他的原籍山东乐陵移民若干，拨付土地，资助农具等等，让他们在此成家立业。宋的用意如何，姑且不论，但“德王”认为县名“化德”，那就是取义在“同化德王”，因而使他非常恼恨。而阎又指定以此为蒙政会的所在地，他认为这是有意开他的玩笑，甚至是故意侮辱他。所以，他没有到化德，而是在他的王府组织了察境蒙政会。察境的“王公”不多，自然由他操纵是不成问题的。

由此，他始而对蒋介石不满，继而对宋哲元、对阎锡山都不满，居恒怏怏，因此日本鬼子就乘隙而入，和他挂上了钩。

三、伪“蒙古军政府时期”。日本自从在张家口设立了日本领事馆以后，便积极对内蒙古各地进行调查。这些调查人员，有的伪装商贾，有的伪装僧道，他们都娴熟汉、

蒙语言，且有混入中国籍的。直到七七事变以后，这些人们都变成侵略中国的官吏或译员。伪满成立后，东盟已经归到日寇统治之下，只有察哈尔以西各盟旗，还未入他们的虎狼之口。因此，便多方寻找可以为他们服务的内蒙古“王公”。日本人不止一次地到过“德王府”，但在德去百灵庙以前，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条件。德从百灵庙回到王府，懊恼非常，察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就到了他的府下。“德王”想利用日本的势力，扩充军队；日本想利用“德王”的力量统一西盟。当然他们就渐渐接近。1935 年，“德王府”已经有了伪组织的雏形。

在宋哲元被免去察省主席之后，日寇就调了李守信部驻在多伦。这年冬，察北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又指挥李守信部占领了察北九县的大部。那时察省主席兼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明知李部只有骑兵，脆弱不堪一击；但为顾全宋哲元在冀察的活动只能退让。不久他也调充天津市长；刘汝明接任察主席后，也就不谈此事了。

1936 年，田中让“德王”和李守信部合起来，因为李守信是热河的蒙古族。同时给了他们 50 万日金作为扩充费。“德王”在日本支配之下，组织了伪“蒙古军政府”，自为“军政府”的“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乌古廷为“总参谋长”。共编八个师，除李守信原有军队扩编为四师，以刘继广、王振华等任师长外，“德王”又编了四个蒙古师。其中三个师兵源系从东北招募；其余一师，则自本盟召集。四个师的士兵全属蒙人，计：第五师师长依恒额（朝阳人），第六师师长宝音乌勒吉（朝阳人），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锡盟人），第八师师长包悦卿（通辽人）。又在“军政府”下设立了“办公所”（主任补英达赖）和两部，计：参谋部，部长乌古廷（兼任）；参议部，部长吴鹤龄（热河蒙古人）。又设立了六个署，计：内务署，署长陈绍武（代理）；外交署，署长陶克陶；财政署，署长德古来；司法署，署长（未派人）；军事署，署长王永贵；实业署，署长昌都冷（代理）。

伪组织成立以后，把化德县的县城改名“德化市”，定为“军政府”的所在地。“德王”系直接归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以贯彻他们的“满蒙政策”。但对中国政府和察省，仍用“察境蒙政会”的名义。因为不如此，他们的人员和物资，不能通过张家口和平津。其驻平“办事处”，也同样挂着“察境蒙政会”的招牌以资掩饰。宋哲元明知内幕，然碍于日寇，不敢过问。

七七事变以后，傅作义退出绥包，“德王”进到绥省，改组伪军政府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改绥远为巴颜塔拉盟。该伪政府共辖五盟，计：巴颜塔拉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以大马群总管们的辖境合改）。推云端旺楚克为该伪政府的“主席”，“德王”退为“政务院长”，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但这是华北沦陷以后的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1960 年 8 月 8 日）

继伪满洲国后的“蒙古自治邦”本末

楚明善*

余滥竽南京政权的蒙藏委员会，垂二十年，虽后半期担任委员，职司政务决策，因我仍兼管蒙务，故事务亦必躬亲。尤其若蒙古自治邦的重大问题，更系我分内事，责无旁贷。因而对于该问题的经过、处理等一切实际情形，均系亲身所历，记忆犹新。兹愿将这一事件的本末据实写出，以备留心民族问题者之参考。间有疏漏处，还望阅者补正。

一、蒙古族要求自治的经过

原来“蒙古自治邦”之产生，是基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是蒙古官民要求高度自治运动所得到的一种不满意的成果。故一并叙及，以明原委。

1913 年，北洋政府把内蒙古东西六盟改成热、察、绥三特别区；1928 年，南京政府又进一步把三特别区改为热、察、绥三省，三省人民不分蒙汉均归省府统辖；1930 年蒙古会议决议，经转请核准，又承认“蒙古盟旗管辖治理权一切照旧”。于是省县与盟旗重复设置，蒙汉人地双层管辖，这是蒙与汉冲突、省县与盟旗纠纷的根源。也是蒙民所日夜不安，急欲摆脱省县羁勒，于 1933 年 8 月内蒙古两盟发动的自治要求通电之所由来。

按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外蒙古独立，内蒙古自易受感染；东蒙沦陷，西蒙亦难免动摇；王公则慄慄自危，青年则走投无路，再加上日本浪人军阀的威胁利诱，自然会惹起全蒙官民自救的打算；因而很容易首先把久已厌恶的省县枷锁来设法摆脱。所以蒙古的自治要求最突出的一项，即摆脱省县的管辖。不过客观形势，虽然这样复杂，而一种重大的运动还须有人适当的领导，方容易成为事实。但具这种愿望的人虽多，而实际发动的人，也可以说别有用心利用这种形势的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以“王公派”出头的吴鹤龄。这个人颇具聪明，手段敏捷，因痛恨省治，而地方民族主义特别显露，但他也不赞成王公制度。所以他愿保存盟旗制度以反对省治，而又要在盟旗内设置各种民选的代表会议，以限制王公的滥用职权。结果他在当时对于新旧两方面，均得不到好感。然就当时说，他自蒙古会议一直至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成立，始终是坚持蒙古自治，很像是一个热爱民族、觉醒较早的人。谁知他是别有怀

---

* 作者曾在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工作。

抱，利用大众要求自治愿望的客观形势，发纵指使，助纣为虐，终酿成拍卖祖国与民族的勾当呢?

一个是锡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他凭借霍硕都因楞亲王的爵位，很为一般蒙民所尊重，而他又有一种接近和利用青年的手段，故东西盟之一般青年多归之。所以到了百灵庙一声号召，群王景从，即与他素不和谐的白云梯亦愿合作，久相反对的吴鹤龄且依为心腹。不过野心甚大，气量欠宏，且不识大体。后来竟中了日人诱惑，而成了出卖祖国和民族的罪人。

吴鹤龄与德王这两个人，虽地位不同，性情各别，惟对于利用形势出卖祖国的勾当，则沆瀣一气。吴在1930年蒙古会议结束后，时时酝酿提倡“蒙古自治”；德王自1932年冬向南京贡献意见，未蒙采纳，愤而离京后，因而决心提倡“蒙人治蒙”。他两人意见原不相合，惟主张“自治”一端大体相同，所以吴在内部鼓吹，德王在外边响应，一拍即合。这一主张也迎合一般蒙古人的口味，故大家也跟着摇旗呐喊，于是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大会”于1933年8月14日开幕。

南京政权对于蒙古情形，除了蒙委会尚略知梗概外，其他机构不是忽视，便是隔膜。平时既少留心，临时难免张皇。又以蒙藏会委员长石青阳系蒋政权之敌对人物，不肯委心任事，而临时把内政部长黄绍竑来应急。又以职掌关系，加派蒙藏会副委员长赵丕廉襄同办理，已是安排不当，难免处理乖张。当时我虽职兼蒙务，而适卧病在床，石青阳屡差秘书徵询意见，我虽粗陈省旗分治方案，然因石的关系，亦未能及时提出。终于在10月17日派黄绍竑赴蒙古巡视的命令发表。经黄、赵于11月10日到百灵庙与云王、德王等几经商谈，最后于1934年2月18日核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于3月7日随任命云端旺楚克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索诺木喇布坦、沙克多尔扎布为副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等21人为委员，德王兼该会秘书长，隐操该会实权。一场民族自治斗争的风波总算暂时告一段落。然其以后以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为基础，由德王及吴鹤龄的操纵，而竟出乎民族自治斗争的范围，演为出卖民族甘作日寇傀儡——“蒙古自治邦”的勾当。这是出乎蒙古官民一般之所料，也不是蒙古官民当初要求地方自治之本心。

二、“蒙古自治邦”的产生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从正式批准成立后，这一年中除了盟旗与省县因疆域重复而涉及税收问题稍有磨擦外，主要的就是应付日本金井章二屡次的诱惑与威胁，教它脱离南京而投靠日本成立蒙古自治邦。这时云王、索王及沙王正副委员长等，以年老且对自治无兴趣，均未到会办公，只有具有野心的德王以秘书长代行委员长职务。然以日军西侵已及锡盟东部，德王又惧其蒙旗不保，而又对省方及南京抗日力量无信心，故心中彷徨，十分动摇。在他决定东下投敌之前，蒙委会已派处长巴文竣到绥远，商同省方对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王公，加意联络，使不要盲从德王。后来听说中国共产党方面亦由乌兰夫对德王左右的爱国青年及卫队做工作，极力劝他们脱离德王，以减少他卖身投靠的资本。果然德王到了1936年春随金井章二毅然东去，到加卜寺则宣告降日。于是

南京就把乌、伊两盟成立乌伊两盟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青年成立蒙古保安大队，以孤立德王。

德王随金井到察南加卜寺后，即筹备降日，改加卜寺为德化，废中历实行成历（成吉思汗纪元），于1936年5月12日宣告成立“蒙古军政府”，自为“总司令”。9月4日日寇又催促成立“察南自治政府”于张家口，汉奸于品卿为“主席”。10月15日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于大同，汉奸夏恭为“主席”。10月27日“蒙古军政府”改“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于归绥。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实际上云王只是一名义主席，并未亲身参加。11月22日经金井章二、前岛昇、高太一也之纵恿，联合三“自治政府”合组为“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一般人通称为“蒙古自治邦”，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于是乌、伊、锡、察及新改之巴彦塔拉五盟，连察南十县、晋北十三县均为“蒙疆”区域。其内部组织，最高为“主席”，次为“总司令部”、“参议府”与“政务院”。院下为各部，可是最高顾问与主席平等，其实主席的职权，完全为最高顾问所支配。日寇对于中国境内地的伪组织，如“满洲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都是这种办法，不过对蒙古尤为显著。

三、德王等降敌后的动摇

德王于1936年降日的一年中，从“蒙古军政府总司令”，而为“蒙疆联盟政府”的实际“主席”，再进而为察南晋北和蒙古五盟部广大区域的傀儡皇帝，总算是野心得逞，如愿以偿了。其实他降日后受日寇的侮辱压迫所受的痛苦，并不是外人可以知道的。在受日本浪人一切玩弄的中间，他亦感到十分不耐。在1936年的秋天，他已经派人到南京诉苦，愿归依祖国怀抱。我当即奉派赴察绥考察情形，并征询省府意见。绥远省府完全同意他的归来，傅作义先生说：“我的反对德王，不是反对他本人，是反对他投敌；他如若肯回归祖国，我愿把绥远主席让他，甚至为他牵马坠镫也甘心。”

察省府呢？宋哲元说：“中央有无抗战决心，如有，我一个电报德王就可回来；如无，回来有什么保障。”

这察绥两省府的意见，绥方比较表示切实；察方认识未免浮夸。我认为其反正，总是与国家有益，当电准南京，会同北平军分会留守严庄，与德王的代表丁我愚等，商妥来归办法：

（一）中央派兵两师到贝子庙作他的声援；

（二）他通电撤消自治；

（三）成立察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德王为委员长，自1934年起经费照发；

（四）所有已编军队暂免调遣，俟胜利后再酌编。

以上各种办法，已商有成议，忽接南京电，“以军事整个计划无进展时，暂勿令来归。”这事遂一时作罢。德王当时作傀儡的苦境，已可想见。

四、傀儡政权的瓦解

1945 年 8 月间，日本失败退却，把一些傀儡当然遗弃不顾，德王也不例外。在苏联出军东北解决日本关东军时，蒙古人民共和国亦出兵南下直抵察境。德王一班人走投无路，只有仍然回到祖国或者尚有生路。于是他同他的“总司令”李守信，“政务院长”吴鹤龄，“参谋长”乌古廷等同来到北平雍和宫暂避。那时北平市长熊斌据报转电重庆，当令他们到重庆悔过。到重庆后，由蒙藏委员会拟定安置办法：令德王仍回北平，公家拨房屋居住，并按月发给生活费；其随行重要人员组织一个蒙古宣导团，给资回蒙宣抚；令北平市长就近察看。这就是德王附逆的下场，也就是“蒙古自治邦”的结束。

五、死灰欲燃的尾声

德王及其重要干部被安置在北平后，迨 1948 年 10 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接连解放长春、锦州及沈阳，威震关内，北平亦岌岌不保。德王等作贼心虚，深惧人民难以见容，相率潜逃，利用其巴林骑兵残部，集中阿拉善和硕特旗，并一面向逃往广州的国民政府求救，以求死灰复燃。但当时广州的行政院长为夙不满意德王的阎锡山，故他们向广州跑了一趟，只得到一毫无实际的虚名义。待彼等自广州回，正解放军进兵察绥，西北渐归统一。德王等看情势危急，其内部意见极不一致：以德王为首的顽固派，主张反人民到底，如势力不敌时则暂逃沙漠躲避，静待时机；以达王为首的先进派，主张与解放军联络，以求地方安定。结果两派分立，德王等北走蒙古共和国与内蒙古交界处，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包围缴械，德王及其“总司令”李守信等作了俘虏。达王等派代表向中央投诚起义，被中央特别优待。此即德王等在“蒙古自治邦”失败后不甘雌伏又一次铤而走险的失败余波。

（1962 年 6 月 22 日）

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

库 益 菴

迨至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占据我华北后，把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雁北13县，划为“蒙疆地区”。各地成立伪自治政府，并在张家口成立伪蒙疆政府，利用汉奸德王为主席，汉奸蒙人李守信为副主席。它的组织机构，什么财政部呀，什么行政部呀……简直和一个国家组织一样，如大同商人马永魁汉奸任伪蒙疆政府“财政部部长”即其一例。在大同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由汉奸夏恭（大同人，清举人，刀笔吏）任委员长，并有日人最高顾问前岛主持政权。内设各厅，如：伪财政厅厅长由汉奸崔学闵（大同人）担任，伪民政厅厅长由汉奸吕登瀛（阳高县人）担任，伪警察厅厅长由日人担任，伪文教厅厅长由日人担任，文教官由汉奸古典（大同人）担任。各厅均有日人顾问若干人，“指导”办事。此外，还设立伪大同经济监视署、伪大同清查署、伪大同警察署，各署长均为日人担任。除警察署由当地警察厅管辖外，经、清两署均直接归张家口伪蒙疆政府管辖。伪工作人员，分日系“满系”和本地人。各厅内部组织，分科分股。凡设科长的，日系居多，“满系”次之。凡任股长的，“满系”居多，本地人次之。各县均成立伪县政府，县长由汉奸担任，日方并派参事官一名，主持政权。县辖的伪警察所、伪街公所、伪乡公所，都是它们的基层组织。发号施令者名义上虽为中国人，而实际则为日人所操纵，汉奸不过傀儡而已。在沦陷八年当中，其政策法令，简而言之，不是欺骗，便是利用；不是压榨，便是统治；不是伪亲善，便是伪提携；不是强迫，便是掠夺；不是奴化，便是毒化等。

1937年冬季太原失守时，我正在太原东山附近一带，同眷属一块儿逃难。迫不得已，始由太原回到原籍大同。我虽未亲历其境，内幕不详，然在它们的铁蹄统治下，观其苛政实施的面貌，亦如见其肺肝然。他且不谈，只就其毒化政策而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华北后，把军队分布在沿铁路线和各县城及重要村镇。凡政权所及的地方，任意迫害和蹂躏广大人民。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伪政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每年收割多少，都要卖给它们的伪清查署所成立的“土药组合”。按质量的高低，实价收买，不准农民卖给别人和走私。在种植前，由伪清查署规定每村按土地亩数多少，按比例种植，并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三等，确定每亩应卖给它们的两数。例如大同乡村每亩好地，须卖给鸦片70两，中地50两、下地30两。各村下种后，伪大同清查署又派人员丈量种植鸦片的亩数，以便核定收买的标准。在丈量地亩当中，它们的翻译以及所用的工作人员，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农民苦不堪言，不种不行，种也活不下去。及到收割后，农民把货晒好，送到各县所成立的“土药组合”或分庄，任它们鉴定质量的好坏，任它们决定两数和价格，层层剥削，处处损失，弄得农民高兴而来，扫

兴而去。还有的农民，因卖不足应卖的两数，往往受到伪清查署人员拷问毒打，甚至灌凉水等等的非刑。

各村农民因种植鸦片，吸食者亦日益增加。县城居民因吸食公开，几乎家家有灯，人人作为应酬品，好像一般人吸纸烟一样，毫无顾忌。人们在这醉生梦死中，面色憔悴，精神萎靡，倾家破产，卖妻卖子的事屡见不鲜。在这沦陷八年当中，伪蒙疆区内所收的鸦片数量，虽不知其详，然以大同伪晋北自治政府所辖的13县估计而言，每年约在100万两以上。如果以全伪蒙疆来估计，则约在500万两以上。这样的惊人数字，它们究竟运到何处？作何用途？据当时人说："各地组合所收的鸦片，交在各地的清查署，又都运到张家口清查总署，再由日人运往北平和占领区销售了。"有的说："每年种植的鸦片，它们运到日本，做成'吗啡'卖给德意轴心国在军事医药上使用。"还有的说："运到北平制成'坯子'再做成料面卖给中国人吸食。"传说虽不一，但可断言，日本帝国主义者决不会把这些毒品运到它们本国，让它们的人民吸食。

伪清查署所成立的"土药组合"，是委托鸦片收买人代收之机构。这种收买是发国难财的好机会。逐鹿的人，不是汉奸，便是富商，不是当过翻译的，便是和有权的日人有联系的。每年在发表鸦片收买人前，这些逐鹿的人，都云集在伪蒙疆张家口清查总署，奔走权门，贿赂运动，特别各地日本宪兵队的门径，独占上游。如大同13县的鸦片收买人剧中兴（山阴县人，汉奸，日本大同宪兵队大狗腿，当时人称之为剧司令），历年都是大同日本宪兵队所介绍。鸦片收买人得到委托许可证书后，分赴各地组织"土药组合"。其内部分设经理、副经理、会计、总务、鉴定、保管等各股，这种"组合"全依剥削农民、欺瞒日人而从中牟利，混水捞鱼。如：该组合收买鸦片时，明明称得是一两，而他们硬说是七钱，明明是上等质量，而他们偏说是下等货，七折八扣，左剥右削，不卖给它们不行，卖给它们要受这样的剥削，可怜的农民只好任它们宰割。其对伪清查署交鸦片时，按原收价，发给他们三成物资（布匹、糖类等）。这些物资均以低价卖给。七成伪币，以原收鸦片最高价发给。这种办法，他们有利可图。然其最大的利润，则在舞弊，就是把各地的分庄和其组合直接所收的鸦片，收集在一处。收买人串通他所用的内部人员，按偷换鸦片计划，在夜间一齐动手，把所收的鸦片，由库拿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原鸦片每百两掺入沙土或底膏三四十两，然后把抽梁换柱的鸦片，按股分肥、利益均沾。

伪清查署规定"组合"收买期为三个月，农民逾期不交者，查出以私货论，没收充公，处以罚金和拘留。并一面严禁走私，在沿铁道线对上下火车旅客实行盘问和检查；一面还派伪工作人员下乡检查农民谁存私货，凡种植鸦片的农民，挨门逐户地均受其搜查。他们并扬言说："我们空手而来，哪能空手而回。"弦外之音，暗示你们没有鸦片，有钱也行。农民不堪其骚扰。

日本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还不算，更进一步，变本加厉地把鸦片制成"坯子"做成"料面"加快速度的灭亡中国，使中国人民一倒不复翻身，永远做他们的奴役、任它们宰割，这种阴谋的企图，手段的毒辣，越来越看得明显了。在伪蒙疆区内各地，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强迫农民种的鸦片，由"土药组合"收买，送交伪张家口清查总署后，它们用化学原料"醋酸"，秘密制成"坯子"然后又做成"料面"，在各地

公开或密卖。大同城内有个王姓院内就是一个集中卖“料面”的地方，每天每到出卖前，人山人海地聚在该院门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贩小卖，穷的富的，以及各色人等，都去那儿购买。一个夏季的早晨，我因事走过该门前，以为该院内发生事故，不料从旁打听细情，才知是出卖料面的场所。进院一看，全院有二三十间空房，却当时是人满满的，有的正在购买，有的正在吸食，有的蹲着站着，有的坐着躺着，有的欢天喜地，指东划西，有的内心忧虑，愁眉苦脸。卖料面的朝鲜浪人们，因生意兴隆，忙得马不停蹄，形形色色的现象，不一而足。

在当时，各地吸食毒品的人太多了。以大同一地而言，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吸食料面，比吸食鸦片的人还多。而且不少吸食鸦片的人逐渐改吸“料面”，因为料面吸食方便，省时间、过瘾快，因此有毒品嗜好的人常说：“宁吸‘料面’，不吸‘鸦片’”。岂知料面的毒害强烈性更大呢！凡吸料面的人，几乎时刻离不开它，瘾大者日挥百元，瘾小者也得一元。积日累月，年复一年，身体骨瘦如柴，吹灰无力，不吸它宛如临死的病夫，气息奄奄。吸之则立时精神振奋，自觉有劲，好像健康无病的人心身爽快。久而久之，家产为之一荡，初则妻子离散，乞讨偷盗，继则被唾弃，死于路旁。如大同城内西南隅北粑籽巷，有富商之女名古秀珍者，少年时代生得俊美，人才出奇，父母爱之如掌上珠，当时人称之为“云中西施”。父死，因母溺爱，染鸦片嗜好，后改吸料面，没有几年竟把万贯家产付诸一吸，最后流落街头，乞讨偷盗，身肿头破，死于路旁。

日本帝国主义者“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它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也好，暗制料面也好，坏事也得由它独揽。当它在京包线和北同蒲线严禁走私的时候，禁网严密，苛刑峻法，无所不用其极。可是百密之中，难免一疏。我在1940年的冬季，因事正在北平旅馆寄住，常听说“蒙疆‘棒儿队’发财容易命难保”。我以为这些“棒儿队”是日伪机关所组织的一些小汉奸给它们做爪牙的。不料，事出稀奇，言之伤心。有一天和留平的同乡谈起“棒儿队”，他们说，“棒儿队”是指偷运毒品的人。他们因为日人对火车旅客稽查过严，没法偷运，运贩毒品的人，或被人用金钱雇用的，或自行运贩的。他们把毒品——“坯子”“鸦片”装入卫生袋（又名保险套）内，外用线捆好，一个袋内，可装毒品二两，把它塞入肛门里，一个袋和一个袋连接起来，好像一个棒儿一样。偷运的人，三五成群，为了互相招呼，住店要住熟栈，卖货要找熟人，故人称为“棒儿队”。在伪蒙疆沿京包线和附近，用这方法偷运毒品者，每天不下几千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种鸦片卖料面的政策，不仅毒害了我们中国人民，侵占了我们的土地，而且还要灭亡我们的种族。这种罪行史实，谈起来真是切齿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豺狼成性，惨无人道，独霸的野心赤裸裸的原形毕露。它们称王道霸，倒行逆施，欺压人民，使我们天天处于愁云惨雾之中，感到到处都是残破败落，到处都是灾难痛苦，疮痍满目。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63年8月28日）

敌伪蒙疆政府时期亲历记

孟 锦 章*

“蒙疆政府”用鸦片毒害人民

“蒙疆政府”（张家口）在1937年以前，为旧中国察哈尔省政府，委有主席统治一切事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还不满足，又有“七七”卢沟桥事变。在这次战斗中，华北将领赵登禹、佟麟阁两位爱国英雄为国牺牲。故在北京西城区有赵登禹路、佟麟阁路，为永久纪念，这两位将军历史垂名，千古不朽。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不但放弃守土之责，仍调遣东北军“围剿”红军。他以卖国求安，不抵抗主义，签订了梅津协定。华北不准驻守军队，只许成立治安军和保安队维持地方。

在这个时候，蒙古德王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张家口成立蒙疆傀儡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均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之下。

他们为了侵吞经济、毒害中华民族，命“蒙疆政府”制订种植鸦片条例。“蒙疆”地区平原肥沃土地的40%以上，迫令农民种植害人的鸦片烟。因此不顾民生而想发横财者，云集“蒙疆”，和伪政府签订收购手续，自出资本，甘愿上缴政府30%，其余仍归政府统一收购。这样，人民就倍受摧残。

在张家口堡子里成立“土药组合”，公推贺秉温为董事长，其他收买人为董事，内设若干科，所用办事人员，非亲即友，不用外人。由张家口至绥远烟区一带，共成立15个“土药公司”。每个公司经营两个县份，由“土药组合”各董事分担各“土药公司”经理、副理、协理、监理等重要职务。下设总监定一人，会计、出纳、庶务各股，办事员、晒烟夫若干人。

每年自七月份起，由各“土药公司”在他们经营之县，选适地点设立收买处若干个，派主任、保管、会计各一人，办事员及晒烟夫若干人。收买处成立后，即函请该烟区的县政府酌派干警四名，以便保卫和弹压卖烟者“捣乱”。

烟户在炎热之天，手提烟罐，经过十里、八里之路，到了收买处累得满脸通红，浑身是汗，心想公平交易，卖钱回家，哪想该收买处昧了良心，不是公平合理的。假如烟户携去有100两水分之货，确实能以晒出80两干来，经鉴定顺口一喊40水，就等于净60两干了。内中剥削的20两，除与公司留半数外，其余就归他们按大小份分肥，烟户

* 作者曾任兴蒙面粉厂经理。

敢怒而不敢言，怨声载道，无人敢诉。

收买处收烟，仅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所剥削之数，实在惊人。

每个“土药公司”，差不多都设有十几个收买处，每个收买处都能给公司剩余一二万两干货，统计起来足够二三十万两之多。除提出2/10上缴“组合”外，剩余之数，则偿总鉴定、会计、出纳、庶务等各一万元红利，再偿办事员、晒烟夫等各500元。净余之数，则该公司经理、副理、协理、监理等几人平均分肥，计每人都能分得一等货四万多两干。

他们把收买之烟，经烟夫晒干，用油纸包装起来，100两一包，除应缴“政府”及统一收购办理完毕外，私自剩余之数多半用保险方法，运到平津两市出售，每人都能卖几十万元。因此他们都在北平置了房产，并把自己住宅修饰得非常华丽，大多数都要一个和两个小老婆，每日花天酒地，捧坤角、说大鼓书的姑娘、娼妓等，每场非千即万。均好巨赌，一动就有过几万元的码子。

他们还在张家口桥东大街开一个中央饭店（现在解放饭店），新建三层楼房一所，计房一百二十余间。公推荐礼县土药公司协理阎景尧为董事长。由土药组合派李百川为经理，下设会计、出纳、庶务各一人。茶房（服务员）若干人，都是他们的亲友，未有外人。称名是个饭店，实际等于保险公司，无有一位是善良客人，除贩卖毒品，就是活动贪污差事的。因柜上与当地公安机关、日本宪兵队、领事馆等，皆有行贿情事，每次查店到房间时很少，然后即到经理室内，招待香烟、茶水、瓜子、糖等，还不断零花钱，因此每天差不多都客满。

该饭店内，设有中西餐，每楼都备有大烟枪十几棵，茶房每班都准备若干个大烟泡，以供客人之用，大有利润。总有人不分昼夜打麻雀。

贩毒品客人，经常买土药组合的鸦片。

“伪蒙疆政府”还成立了清查署，专为缉私鸦片，如查获私藏和偷运者，除没收其原货外，还一倍罚十倍，不交者送法院。

每到烟秋时，清查署即派人到烟区各县协助收买处催烟户卖烟。如查有私藏的，有照章处罚的，也有互相贿赂的。一般烟户都好吸鸦片，因此自己均愿多少留一点，私藏起来。一看见清查署人到家时，未待问他，而自己就心惊胆跳，再加上对他们蛮横的威胁，话不投机，举手就打。有很多烟户将私藏的拿出来，则他们有人腰包，有稍数处罚而受贿的，积少成多，他们每人都发了横财。

由张家口开往北平各次车，自宣化开始检查客人，从客人身上由上至下摸了一遍，然后再检查行李和包袱。还有女检查员，看着女客人形迹可疑，就叫到厕所内检查。凡是检查出来的鸦片，并不完全上缴，自己都留一部分。还有由北平去张家口、大同等地的穷苦人，回来带些粮食、土豆、鸡子等，他们也百般的刁难，多少给点好处，才能无事，不然就要被没收。

伪“蒙疆政府”控制了鸦片的买卖，拟订收售鸦片价格，规定收买时除去水分，照干货计算。一等烟每两八元，二等烟每两七元，三等烟每两六元，次等烟每两四元五角。但照一等货出价的很少，二三等的最多，而他们出售时，则又提高上去，这又是剥削烟户的一个手法。伪政府在张家口出售时，每两都超过买价一倍。

“蒙疆政府”每年所得的上缴和自己统一收购土药公司的鸦片烟，除外埠土药店和大烟贩子亲自到蒙疆政府购买外，他们借着日本宪兵队和军队的势力，运往平津两市和上海各地出售，价格比原地高出一倍和两倍。平津两市，土药店、大烟馆比比皆是，陷害了不知有多少男女青年同胞。

更有发横财者，大伸其手腕活动，勾结当地公安机关和日本宪兵队、日本部队、治安军大官僚等，制造坯子和吗啡。所以那个时候，吸上瘾的人家产荡尽而流落在街头巷尾，身披破麻袋片，以维残生者，笔难胜举。

日本宪兵、汉奸残害欺诈，张家口市内民不安生

张家口市内，凡是巨商、稍富之家，每天都过着心惊胆战的生活，因日本宪兵队中国翻译和公安机关人员勾结日人，千方百计的各处诈财分肥，都以与八路军有联系为罪名，敲诈金钱，举不胜举，今例一二如下。

（1）1939 年 10 月间，张家口上堡、恒兴公粮栈被日本宪兵队敲诈 2000 元。原因是由乡下卖粮的大车跟来二人，想买货就大车回去。晚间住在粮店内，被宪兵队罗姓翻译知道了，就同队内操长去盘查，然后又检查，把自己手枪暗放在粮垛中，转了一个弯就把手枪拿出来，找掌柜的问这枪哪来的，掌柜吓得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后带到队内，严刑拷打，花了 2000 元才保出来。

（2）1939 年 12 月，张家口桥东商务街武家，在上堡开一布店，家中有一个 19 岁上高中的女儿，长的美貌。日本宪兵队罗姓翻译看见后就起邪念，同该队军操晚间去武家，问前几天你由口外回来跟你同来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武掌柜说是我们主顾，来办点货回去。罗说：你别胡说啦，那两人是八路军探子，已抓进队里，他俩已把你说出来啦。随后就把武掌柜带到队里、打了一顿。但第二天，罗叫鲍翻译去武家装好人，想法把姑娘说到手。鲍就去武家对老太太进行威胁，想把那高中女生给罗。武太太说这事不能啊，孩子早就有人家喽。鲍一听又说，那么就得花钱我给办一下，也就答应了。过了两天，罗同鲍到武家去，就说罗和队内副官哀求有一天，好歹答应放出，但是须送他 1000 元才行。老太太就请他俩下午再来，到柜上取钱去。以后他俩把钱拿走，人就回来了。

（3）张家口上堡清真寺街一号杨家，老头七十多岁，家中有个孙子在北平朝阳大学上学。暑假回家，到张家口火车站下车刚出站外，就叫日本宪兵队带到队内，说他是共产党，严刑拷打，也未问出口供。在日人未在眼前时候，罗翻译问他家住处，随后往杨家送信。老头听见后就理直气壮的对罗说，哪有这么一回事，我同你到队里讲讲道理。到了队里，日本操长就把老头骂了一顿。老头就问，你们据什么证明说我孙子是共产党？这句话把日本人气坏了，就把老头狠狠地打了一顿。以后听说他当过县长，家中有钱，罗翻译私自和老头说，我给你想法活动吧，如是老头就求他给办，共花了 2000 元才将俩人保出来。

（4）我有一位朋友张步印，住桥西武城街山东馆巷 17 号，自己开帽铺，经常去北平办货。1941 年 7 月被察南政厅庄警佐的特务抓去，硬说是临去北平时，到怀来县下

车进堡子里暗与八路军送情报，结果花了500元放出。

日本宪兵队、地方保安队无恶不作，凡是他们出去回来时，每人都掠百姓钱财和金银首饰，并将百姓好牲畜和大车赶回来出卖，还有的把善良百姓有钱的人抓来，先打后要钱，扣个通八路军“罪名”，花了钱才能放回去。

保安队走到哪里，不是征粮，就是要草，从中变钱使用，百姓稍有不愿意，马上就以通敌罪带走，以后花钱才能放回。

张家口兴蒙制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及被骗

本人（孟锦章）于1939年5月，应张家口崇礼县土药公司经理王大鹏函邀担任该公司庶务股长，月薪120元，吃公司伙食。转年7月20以后，曾随经理等到外县收买处视察收买情况。我亲眼看见烟户卖的烟很糯。而经谢监定随便一喊30水，则就净干70两啦，旁边正有一位警察看着，而烟户也不和监定争多论少。我认为他们真昧着良心，剥削的太厉害。

1941年6月，王经理拟派我担任万安县安家堡收买处主任，我未愿就，7月1日辞职，共在该公司连红利在内得有一万五千多元。在这个时候，中央饭店董事长闫景尧和我商量，把他接办的面粉厂兑给我，共合伪蒙币15万元。我说经济无办法，他叫我找王大鹏给想法必成。如是晚间我到王大鹏家里将兑面粉厂事向他一说，他满口答应找各收买人共凑十几万元，愿入股也可，不然算借用。过了几天，连他自己2万元在内，共凑有11万元，加我自己手中1.5万元，还差2万多元，我又向东北老家亲戚等借有3万元，这才把面粉厂兑过来。

面粉厂楼上下共房一百二十余间，院内自来水井两面，中岛式面粉机28台，附动力石磨14面，500匹马力总电动机一台。洗麦大锅四口，周围砌有洋灰大池子，每口一次能洗小麦500斤，以及其他应用的工具俱全。

面粉厂重新组织实行董事制，更名为张家口兴蒙制粉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长兼经理一人（孟锦章），董事七人，均是本人亲友。聘请“蒙疆银行”业务经理李长义、业务主任姬克明两人为名誉董事，每月各给车马费30元，并送给面粉两袋。

本人外甥李德绪为庶务股长，友人之子刘思惠为会计股长，亲戚李金明为出纳股长，友人于长仁为业务股长，又经厂内旧友洛河（日人）介绍他哥哥洛河佑吉为监理。以上几人均聘为董事。因张家口有面粉组合，每周开两次会，我不懂日语，故才用洛河佑吉为监理，代表我出席开会。他们五人均给报上2万元资金。共有职工三百多人。

因无钱购买小麦，遂将厂子不动产和设备等，托银行业务经理李长义抵押十万元，统共为25万元资金。

据情呈请“蒙疆政府”转呈日本大东亚省，于1941年11月才批下来，在同年12月下旬正式生产，每昼夜生产1000袋面粉，每袋20元，有利润一元五角多。

公司成立后，我鉴于那时的当地公安机关和日本宪兵队对各工商业敲诈情形很多，为了业务顺利计，在生产头一天，就邀请“蒙疆政府”经济部察南政厅、警察局、蒙疆日报、日本宪兵队等，在桥东万福春饭庄吃酒。开办以后，为联络感情起见，每月至

少也得请日本宪兵队副官、警察局特务科长（日人）在日本料理馆吃几次酒。就这样，我公司始终免受他们敲诈。

1942年3月份起，增加生产，每月生产面粉四万五千袋。至同年6月提出十万元将“蒙疆银行”押款付清，撤回不动产。同年11月又提出11万元付土药公司经理经手代借之款。1943年5月又提出3.5万元汇回东北还账。

1944年1月，我想提出5万元回北京买一所住宅，在这次本厂监理洛河佑吉就不同意，我俩吵了两次架，结果让我提出3万元，才在北平前外打磨厂里买十几间小房。自此以后，洛河佑吉就和我有了意见，他勾结于长仁要想法算计我。对于我的行动，他俩均注意。

因我的亲友李德绪、刘思惠、李金明等三人，差不多每天晚间都聚在柜房里间小屋内开小会，据说是共产党搞地下工作的，可是我不知道。以后被洛河佑吉及业务股长于长仁知道了，就报告伪察南政厅警佐庄某派人去抓。这事被我的友人周乃东知道了。他是察南政厅一等警佐，亲自到家告诉我，当晚七点多钟他雇一辆轿车，叫他们三人坐在车里，他自己骑自行车送到沙岭子车站，然后坐火车跑回北平。

因他们三人跑了，庄警佐未抓着，洛河佑吉又说我公司是专为掩护八路军地下工作的，以后又报告宪兵队、伪警察局等，当时就说已跑了三人，这是一个铁证。

在1943年6月间，由东北跑来两学生，怕伪满洲国抓他们当兵，走到延庆县遇见八路军劝他俩参加，以后被宪兵队“围剿”时，就把他俩抓住带回队里严刑拷打，打的浑身无一处好地方。这俩人一位姓商，一个姓侯，本想去张家口中央饭店找闫董事长的。以后老闫听说，就商量我同他去宪兵队保这两人。我当时顾全朋友面子，又知他俩被打的死去活来，很是可怜，并未考虑到后来有嫌疑的事，当即同他去见宪兵队渡边副官，说这两人确是来找老闫谋事情的，走到延庆县被八路军掳去了，请把他俩放出来。副官说是我们好好了解一下吧。第二天我就和老闫在日本料理馆，找一位同副官相好的姑娘，托她给副官打电话来喝酒，当晚就去了。我们几人大喝半夜，由姑娘帮助讲情，渡边答应明天由中央饭店写保条就释放他俩。很顺利的就将这两个青年保出来了。

我受“土药公司”王经理所托，还由警察局特务科长手先后保出来两个“嫌疑犯”。

因为有以上几件事情，洛河佑吉就到日本宪兵队、伪察南政厅、伪警察局等机关报告我“私通八路军”，并把公司作为掩护工作地。

在1945年4月30日晚间我正在中央饭店打牌，约八点多钟，宪兵队翻译清水龙男（朝鲜人），就到中央饭店告诉我，可能有人来抓你，赶快收拾跟我上车站坐九点急行车去北平吧。如是我坐九点车跑回北平。临走时我和清水龙男说，如知道有人去北平抓我，请你到武城街山东馆巷17号找张步印，叫他往北京西单西长安饭店打电话找孔焕章即可。第二天我到长安饭店开一个房间，报的孔焕章名字。在当天十一点多，张步印打来电话，我接过来一听，他说今天有两位“朋友”去北平，请招待招待。我放下电话算完店饭钱就马上到前门车站去天津友人刘思惠家中，住有两个多月，病在那里约二十多天。

记得在7月12日我又回张家口去。当晚6点多钟，先到友人张步印家中。他正躺

在炕上吸鸦片烟呢，一看见我进屋，就坐起来对我说，自你走那天夜间十一点多钟，察南政厅庄警佐就同白鸟指导官去中央饭店抓你，知道你回北平啦，他们第二天就去北平找你，以后你由天津来信我才放心。又说，可惜你交的那于长仁，这个小子太坏了，听你公司“么先生”对我说，这完全是他勾结洛河佑吉使的坏，自你走后，他俩很高兴，每天下饭馆。在本月初他们把公司卖给蒙疆政府啦，共5800万元，据于说先交洛河佑吉500万元，他分送给日本宪兵队长、察南政厅老庄、警察局特务科长，大概还送给经济部某人，共花有三百多万元，并给于长仁25万元，还送他面粉机两台，石磨四面，在边路街11号租了一个门面房二十多间，自己开个小面粉厂，他不在我西屋住了，家都搬到厂子里去了。

我听了这些话后，气得好久未说出话来，那时我脑子都乱了。正在这时于长仁来了，一看见我坐在屋里，他脸就红了。我问于，听说洛河佑吉把公司卖蒙疆政府啦，于就说我当时劝他不要卖，他说听他太太、哥哥说时局情况不好，所以才卖了，先付他500万元，他送给有关系的人好几百万，还给我25万，电机两台，石磨四面，我在边路街十一号租一处门面房开一小面粉厂，明天你去看看吧。

以后于长仁说咱俩去洛河佑吉家里去一趟，当面和谈一下。我就和他到洛河家去。一进屋，洛河佑吉和他太太很客气的给鞠个躬，就笑着说，孟先生你可回来了，这两个多月真把我和于都想坏了。他满口中国话，把我的气都说散了。随后就叫太太做菜烫酒，三个人坐在炕上一面喝酒，一面说话。他把公司出售的情况向我道一遍，又说先付500万，我请客用了三四百万，给于25万元，其余的款在八月二十号如数付清，还有不多日子啦，那时领下来，还希望偿我几百万，以便做点别的买卖。接着于就和他说了一大套日本话，然后又对我说，咱们是朋友，不要打架，不要听别人的闲话，并叫他太太拿出2万元交我，说先拿去用，过几天用时再来取。又问太太来未来，我说跟来了，他就说于你明天送孟五袋面先用。

我当时把钱装起来，心里也就没有别的主意。在那时候我就不应该听他们一面之辞，本应当去伪政府经济部了解一下，究竟卖多少钱，已付多少，其余何时付就对了。赶到“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解放军到了，我托人到“蒙疆政府”一问，才知道款在八月初旬如数拨到张家口正金银行，由洛河佑吉完全调回北平去了。

这时有一友人姜惠民同晋察绥军区总务处招待所长于大中到我家去，给我一介绍，说是老乡，沈阳大东关的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并说，我把你公司受骗情形对老于说了一下，他说介绍你去见总务处佟铮处长，他是沈阳小南关的人，请他向政府了解一下，要是能把未付之款付给你那不就好了吗。我对他俩说，我已托人给问了一下，据说款早被洛河佑吉调回北平啦。他俩就对我说，别听一面话，你写份材料给佟处长，请他给好好打听一下。我就写了一份材料同他俩人去见佟处长。佟处长很客气的说，老孟同志，你把这份材料放在这里，过几天我给你了解一下，叫咱们老于通知你吧。

过有半个多月，姜惠民同于大中找我去，说公司款真在八月五日如数付给日本人了。又对我说，老于他们想托你给租几处房子开买卖，听说你在市内很有信用，人缘很好，才来找你给办一办。以后我在桥东租了三层楼房一所，他们开一个正大商店，聘请姜惠民为经理，又在武城街中间租有二十多间门面房，开一个西北电料行，想请我当经

理。我当时由于公司马马虎虎就叫人家给骗卖了，心中总是不痛快，所以就未干。

过了些日子，姜惠民又同于大中找我说，据佟处长说老孟同志人很老诚，他对开面粉厂有经验，咱们请他给作一份预算，若是相当，请他当经理。我当时如回北平交通还不十分方便，就答应了。我给作了一份1.5亿边区票子的预算，后经他们生产科长李沂说是预算太大，未愿做。

1946年元月，西北电料行为谢客，在万福春饭庄请客。因开市时我送给一面大玻璃砖镜子，也就给我一份请帖。那天我和姜惠民、于大中、佟处长坐在一桌上，姜惠民对老佟说，去冬你不信孟老弟话，面粉厂未办了，今年想办你拿3亿也办不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刚解放物价都便宜，人心未稳的原因，佟处长就说机会过去，以后再说吧。

我在1946年旧历五月初四回到北平，当时托于大中在西北电料行开一份去北平办货的路引（通行证），走到康庄车站以后就用不着了。

我回到北平后，就到西城大乘巷胡同内小乘巷胡同四号找洛河佑吉，我一进院就有人对我说，洛河佑吉已回国有半年啦。他住的房子是租东北人何毓芳的。此人是日本留学，在张学良时期当过河北省实业厅长，听说洛河佑吉回国时，不准带太多的钱，把钱都存何毓芳名下，因我无有凭证也未便找人家。

以后听张家口来朋友说，在傅作义所部占张家口时，于长仁被征兵累吐血死了。

（1964年1月6日）

内蒙古伪自治军前身崔兴武旅与乌古廷总队简述

唐 精 武*

在抗日战争中，蒙伪军李守信部盘据内蒙古地区，为敌作伥，臭名远扬，人所唾骂。这部伪军，是日寇和伪满部队进攻热河时，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汤玉麟部放弃热河时所遗留下的变节的一部分余孽——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崔兴武部，与后来加入的热河陆军蒙古骑兵教导总队乌古廷部等辗转扩大而成的。当他们尚未降敌前，都属于汤部，笔者时充汤军参谋，以担任点验，曾有机会与之接触，现将他们以前的情形，就我个人见闻所知，尽回忆所及的举以叙述，借供史料研究的参考。其遗漏错误之处，以及降敌后的蒙伪军的情形，则希望知者加以修正和补充。

一

崔兴武是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的创始人，是这个旅第一任也是末一任的旅长。他同这个旅的历史是分不开的，所以就由他开始叙述。

崔兴武，也以“星五”、“新五”等作为名号互用，奉天（辽宁）省彰武县人。据他说，是幼因家贫，即跟随贩卖马匹的马贩子做小伙计，借以谋生，遂得学会养马、骑马、选马、套马及调教走马的一些技能，所以后来成了有名的骑手。因为贩马往来于内蒙古各旗的荒漠草地日久，又结识了不少的绿林朋友，后来他便不给人家当伙计了，已经成为一个空手倒把的马贩光棍，于是也就习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终以债务口角，殴伤人命，遂逃而为匪，又得练习射击，枪法很准。在清朝末年，清政府派昆源（叔泉，满族）为马政大臣，驻北口察绥一带，改良马政。崔又投在昆源标下为骑师，颇为昆源所喜。后昆源调任热河都统，崔也随至热河，在游击马队为官，从此即在热河军中，历充哨官、管带、营长、团长等职。约在 1925 年间，率队往东北投归张作霖，辗转编为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任崔为旅长。又于 1926 年春，张作霖命该旅编入镇威第十二军，归军长汤玉麟统率，随军西进，攻略热河，汤就任热河都统后，该旅很长一段时间，驻防在赤峰、乌丹一带。

崔兴武旅虽也是热河旧部队，但是已经编为东北正规军，后拨归汤部。崔本东三省籍，又是与汤物类相投的光棍土匪出身，一般习性也多有与汤相同之处。崔对外也比较活动，肯用面子钱，会作人情，尤其是对于枪马，崔更能投其所好，不但是不吝馈赠，还能陪同赏玩。论射击的精确，可以与汤列为伯仲；若论骑控快马，却是崔的拿手，转

---

* 作者系汤玉麟旧部。

较汤要多好几招。每逢崔到省城，汤的一些上选好马，汤必要逐一经崔骑过，加以规整，故往来颇不冷淡。而崔的驻省办事的该旅军需主任李伟臣，也会看风使舵，择要应酬，因此在最初一个相当久的时间，崔与汤及汤部要人之间，却也相处尚好。只不过是猜嫉成性的汤玉麟，对于崔兴武这样的人，他内心中是总有些顾虑的。

笔者与崔兴武的参谋长陈宝泉相处颇好，由陈的闲谈中，也常听到一些有关崔的性格与轶事。崔也是个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他同汤玉麟一样，骄妄自恃，刚愎自用。他虽仅是个独立旅的旅长，可是野心极大。他很崇拜张作霖，认为张是个知人善任。推诚相见的最理想的长官。他也自命不凡以为是未逢知遇，所以不得其时，只有投靠张作霖，才可以大展怀抱。果然在投张之后，即得编为旅长，满想直接受张指挥，遇机出力报效，何愁功名富贵。不料又编入汤玉麟属下，实非所愿，但又不能违抗，因而转思汤是张的嫡系亲信，若能在汤处干出功绩，借汤之力，仍然可以扶摇直上，际会风云。于是他又将升大官、掌大权的一半希望寄托在汤玉麟的身上，其余的一半的希望当然还是指望张作霖。因此，他在随汤入热后的一个很长时期，极力与汤周旋。这时崔也居官很久，搜刮的资财已不在少数，又善于经营马匹，故早已拥有许多庄田马群，更因擅长选教马匹，他也饲有相当多的骏良快马，颇为豪富。他虽然仍是贪婪无厌，但在必要时，他却肯以适当的余资用作政治本钱。他把这种以小饵钓大鱼的有利可图的交易早就盘算好了，所以他对于汤及汤部要人，都能做到必需而适可的应酬，保持了相安的局面。

崔的性情古怪，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更是作威作福，惟我独尊。他在汤玉麟的挟制下，虽然还不敢干涉行政，但是在他防区内的县长、局长们，都慑于他的淫威，无不诚恐诚惶地去趋承他，全怕吃到眼前亏。打麻将牌本是消遣取乐，他却非常认真，只要三把不和牌便会使性发恼，摔牌骂骰子，闹得全座不安，所以他部下的高级人员，都怕同他打牌。在他牌兴发作时，副官们只有去找县长局长们，或是当地的耆绅巨商们来陪同作耍。他们是拒之不敢，只有自认倒霉，输钱忍气。但也有些人，却是甘心乐意，求之不得，正要借此接近他，讨好他，花几个有限的金钱，让他赢，叫他乐，哄得他欢天喜地，情感融洽，就得以从而利用，遇机会，仗他的势力，借他的一言，或是寅缘升官晋级，或是赖以巩固地位，或是便利办事。

崔又是个猜疑而又凶狠毒辣的人。笔者曾以崔未带家小，在闲话时问询陈宝泉。据陈谈，崔性喜骑猎，日与狗马为伍，故并不爱好女色。他原曾有妻有女，平日夫妻感情本就不太好，后来不知怎样他发觉了他的女儿同他的亲随某副官很有感情，就疑心他们是私相恋爱，以为这是败坏他的门风，丢他的脸面，就盛气逼问其妻。其妻本来就怕他，一经怒急逼问，竟自张口结舌，不知所答。某副官闻风畏惧而逃，崔更认为这是母女通同一气，甚至以为他妻也不自贞。当时他却未动声色，故为镇静。不久，他就佯言要率队出发，将家眷送往庄园暂住，他又密派亲信，追至中途荒郊，将他妻女一并枪杀，就地掩埋。从此崔即独身，更无子女。凡在崔部稍久者，多知此事。举此即可以说明崔的猜疑狠毒，对于自己妻女尚且如此，别人更不足论了。

骑马打猎，是崔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课程，因此他不但拥有许多的好马，还养着一二十只蒙古猎犬，平常关在圈里，有三五名专人饲养，打猎时才放出来。据崔谈，他如果两三天不去骑马打猎，不但他自己觉着不舒服，马也急得咆哮，狗也闷得乱叫。他打

猎，不但可以用得来的山珍野味供他享受，而且还积存了不少高贵的皮毛，这无形中又是个生财之道。笔者原曾在林西驻过防，有一家很熟识的做皮货土产生意的商店。某次余率领一个组点验崔旅，又到林西，一日下午无事，偶然在住所附近散步，顺便到这商店询购土产蘑菇，被他们让在里边待茶。正在闲谈，有人说崔司令又打猎回来了。过了一会，果然崔带着二三十人马，蜂拥过市。等他过去之后，笔者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预先知道崔打猎回来，而又是必然从这经过呢？不觉地就要问问他们。原来，是崔的一群猎犬看见吃食尤其是肉类就会当做猎物，争着叼走，或是吃掉，剩下的也会弄脏，无法再卖，有时还会碰坏摔破家俱，甚至还会咬伤人，既没人敢来轰打猎犬，也不敢去讨赔偿，他们就只有早作提防，看到崔出去打猎，或是回来，卖小零吃食的挑担子的赶快挑到别处去躲，摆摊或是开小铺的就赶紧收拾。因此只要这种情形，在早晨就可以知道是他去打猎，在下午就知道是打猎回来。这仅是一件极通常的事，却给商民们带来一阵小灾害的恐怖和惊扰。而他毫不在意。联系到其他方面，如军队对于百姓的滋扰，更将是不堪设想。

崔的野心极大，自命不凡，所以在无事时，就从幕僚们学习读书写字，久而久之，就有些人恭维他，不是说他“得天独厚”，就是说他宿有慧眼，所以书读得极快，字写得很好。他自认为真是“了不起”了，从此又时常喜欢写字送人。他曾给笔者写过一副对联，此物虽早遗失，辞句却还记得是“英雄事业三尺剑，大将功名十万蹄”。除掉充满了杀气腾腾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意味而外，实在谈不到什么书法笔姿。这却可以说明他穷兵黩武的思想。

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小军阀，其野心又大，当然是惟恐天下不乱，好利用战乱来扩充势力，提高地位。他在汤玉麟入热后，第一次进军沽源与西北军作战时没有使用他的部队，已经感觉有些不耐烦。不久战事结束，谁也没有发展，并且看到汤将刘山胜的部队一再缩编，对他却毫无挑剔，也就平静下来。第二次汤玉麟进军北平，转战晋北时，原编在镇威第十二军的部队，单独将他这一旅划为留守部队，归代理热河都统孟昭田节制调遣，他又非常不满，以为这样好的机会，却使他向隅，这是阻塞他升官发财的道路。后来汤有电报给他，说是省防空虚，后方重要，嘱他协助孟昭田，竭力维护地方治安。经这一来，他又以为汤是异倚方殷，反而转怒为喜，生出许多幻想来。听说他与刘山胜虽是多年热军同事，不但无甚情感，且曾因权利地位冲突颇有成见。他这次留守热河，驻防赤峰一带，与刘山胜部驻地林西等处，正是洽接；由于汤的电嘱，他更伺机邀功，对于刘部动态，尤为注意。故当刘山胜之侄刘汉杰，因恨汤之屡加宰割，开始准备倒汤反汤之初，即被崔侦知，随时密电告汤，汤遂电令崔率队就近讨平。崔以为这是他既可扩充实力、又得升高官位的绝好机会，所以不顾一切，举其全力，孤注一掷地猛扑刘部。事后据陈宝泉谈，当时若不是刘汉杰利令智昏，又加之众叛亲离，倘抽派精锐骑兵一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间道急袭乌丹，猛击崔旅之后背，则崔部必至崩溃而一败涂地。崔既击破刘部，自以为立下莫大之功，必得升赏，最低限也可以坐升刘山胜所遗的赤林镇守使职，而再编充其部队。此时汤已撤军回至承德，崔遂先将刘汉杰解送省城。献俘报捷之后，他又满怀着希望亲来见汤，颇为活跃，结果汤仅以刘部秦旅尹宝山团拨归崔部。并收容刘汉杰团的残余用以补充，而扩充为三团制的甲种旅，即接驻刘部

防地，并以一团驻防开鲁，赤峰则另由石文华旅驻防，赤林镇守使职撤消。在汤认为对崔的酬庸懋赏已很不薄，而崔则大失所望，败兴而归。

时值1928年春夏之间，崔开始对汤发生怨尤，起了离心。随后张作霖又被炸身死，使他更感到前途毫无保障，内心非常苦闷，对汤也就不像以前那样肯于应酬，于是就借口驻地窎远，防务重要为由，自此时起，以至汤放弃热河为止，从未亲来省城再与汤晤。他驻省办事的军需主任李伟臣，也不常在省活动，对汤及汤部要人，仅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

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汤以崔旅守备开鲁，崔遂进驻开鲁县。在他的文电中看到，对于抗敌备战，表示得非常坚决，大概他又幻想要借守土抗战的幌子，来达到他升官扩军的心愿，企图名利双收，再看势做事。那时抗敌后援会对他颇为期望和鼓励，曾不断派人前去慰劳。他也时常有些真假莫辨的与敌寇发生小战的情报。当时曾传说张学良曾嘱汤玉麟，将崔旅扩升为一个骑兵军，但迟迟终不发表，想是汤玉麟嫉而不与。后在1932年2月间，日寇大举进攻热河时，他竟背叛祖国民族，首先率部觍颜降敌，反戈自残。

崔旅降敌后，即已不知其情况，及至汤军放弃热河撤到察省沽源县时，方知多伦方面的伪军即系降敌的崔旅，但它的伪司令已是李守信，而不是崔兴武。当时这部伪军，还是属于热河伪军大汉奸张海鹏指挥下的一个纵队。至于怎样由李守信代替了崔兴武，崔的结局如何，以及这部伪军的编制实力等等，却都无从得知了。

崔旅在未降敌前的部队情形，概略叙述如下：

旅参谋长陈宝泉，号蕴山，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分发热河军队见习，辗转在游击马队中服役，遂与崔兴武共事，由下级军官、团附参谋、参谋主任以至参谋长。此人书生气很深，爱读古典文字，喜诵词曲，对于《西厢记》尤其烂熟，信口念来，绝无一误。这是由于在军中无可作为，借此排遣苦闷，非真有闲情逸致。跟随崔作幕僚，实无异“高等文书马弁”。因他还诚恳，遇事无所争执，而又谈笑自若，颇能同流合污，故不为崔等所嫉。日久也不免溶为一体，被环境所屈服，作利禄的俘虏，丧失本性，成为小军阀的工具。

旅副官长刘润齐，对其历史不详。闻他是在崔旅投归张作霖后，改编时编余的团长转任副官长。他与崔及团长孙凤阁是结盟兄弟，称为崔的死党，故系崔的得力助手。

该旅原只两个骑兵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

团长孙凤阁，名号一致，奉天（辽宁人），系土匪出身，右目失明，用左眼瞄准，左手射击，而枪法精确（有人称他是热军中第三神枪手，盖指汤为第一，崔为第二）。因他性情粗暴，为人鲁莽，被呼为孙二虎，遂成为绰号。早年投降毅军，辗转在热河游击马队为官，由哨官、管带、营长以至团长，与崔为结盟弟兄，拥有相当资产，吃喝嫖赌，无所不好，鸦片烟瘾很深。

团长李守信，号子忠，热河内蒙古人，也是土匪出身，体格高大，生性强悍，实一典型的亡命徒，好胜斗狠，粗鲁而喜阿谀，最易受人利用。外貌颇纯厚，对财物似不甚吝惜，故在匪伙或军中，有好交之称，实则正其欺世盗名之术。据尹宝山谈，在李为匪时，尹还充下级军官，两人即相交好。经尹力劝，李遂投降毅军，辗转在热河游击马队

为官，由哨官、营长以至团长，已亦颇有资产。为官后，尤好女色，慕虚荣，爱浮华。对于所谓汽车洋楼姨太太，特感兴趣，只是那时还受制于崔，不能畅遂所欲。故在当时，他除仅有妻妾数人，并在外间暗嫖外，至于洋楼汽车，暂时还只是一种希望。但并非财力不足，乃是对崔有所顾忌。即此足以说明，他也是个贪婪腐化，而又极端热衷功名富贵的昏庸分子，谈不上什么思想，更讲不到什么气节。陈宝泉曾充他的团附，故私交很厚，后来刘部秦旅的团长尹宝山又增拨到崔旅，他三人遂互相声援，结成一气。陈又是个谋士，这对于崔旅投降敌寇后的以李代崔，恐有很大作用。

该旅在1928年秋击破刘山胜部之后，得扩充为三团制的甲种旅，拨来尹宝山团。团长尹宝山，号宗五，热河平泉县人，热河增编常备军时即入伍当兵，由头目而排长、连长。1925年春，由热河陆军第一混成旅刘山胜部步兵第一团冯志珂部营长，改编为东北陆军第三师阚朝玺部步兵第四十旅刘山胜部第九十四团冯志珂部营长，是年冬阚军回师援奉（郭松龄事变），刘山胜及原混成旅部队多自动留热未随。刘又扩编时，尹改编为热河陆军第一路总司令刘山胜部、热河陆军第一混成旅冯志珂部第二混成团刘汉杰部步兵营长，后又拨编为第一混成旅冯志珂部步兵团窦连玺部第三营营长。约在1927年夏，随步兵团调归镇威第十二军汤玉麟部直接指挥，开往晋北作战。因作战出力，约在1928年夏，经汤玉麟派升，接任赤林镇守使刘山胜部东北陆军暂编骑兵第一旅秦耀奎部第五团张凤葆所遗的团长缺，不久，秦旅团长刘汉杰护刘山胜举兵反汤，崔兴武旅受命征讨时，尹即暗与崔旅默契，刘部失败后，汤即以尹团拨归崔旅。尹是个营混子出身，习于事故，老奸巨猾，虽是不学无术，却善于应付环境。外貌非常拘谨服从，实则内藏城府，尤其入伍以来，人事变迁极大，遂也习于投机取巧。当团长后，更极力搜刮，故也颇有资产，其性既贪得又严刻，也更亟亟于升官发财，只图个人现实富贵，其他并非所问。在许多同事中，他与李守信最好。他可以为李划策，也能代作主张，故终于狼狈为奸。

二

热河陆军蒙古骑兵教导总队，它的历史很短，所以这个番号，不但在热河人的耳目中，就是在汤玉麟所部的热河驻军的部队里，都是很陌生的。这个部队的总队长，始终是乌古廷。乌也就是这个总队的创始人和结束者。提到乌古廷，也就说清了这个总队的历史，现在就从乌古廷开始叙述。

乌古廷与笔者在汤部同事多年，也很接近，故知之较详。他本名乌珍泰，在1928年间，改为乌臻泰，号锻庭。乌古廷是他最后改用之名。系热河平泉内蒙古喀尔沁旗人。他家原是世袭固山贝子，以后降袭一等镇国公，清光绪末年出生，幼在北京读书至中学。兄弟五人，乌居长，其余当时均年幼都在上学。约在1925年间，因其父病故，乌即承袭蒙古镇国公职，时阚朝玺任热河都统，曾召开蒙古王公会议，乌来参加，阚见乌年青，更欲借以拉拢蒙古王公，愿予培养。乌也很想另求发展，遂经阚暂委为热河都统公署少校副官，准备送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受训，然后再加重用。尚未及讲武堂召集，阚即撤走，乌随至东北。不久，汤玉麟又入热任都统，遂仍回原职。当时因讲武堂第六

期已经召集过去，故又拖延下来，但是随时都在准备去受军训。此人虽系蒙族，且属王公世子，又极年轻，却是非常活跃，善于交际，更能卑躬折节，趋承权贵，所以汤部上自汤玉麟，下至卫士马卒，无人不知乌副官，也都对他有好感。那时汤部当权的有名的二李，即参谋李赞连、军务处长兼副官处长李树春，都很喜爱他。尤其是李树春，已将他看作心腹一样。所有政治方面的所长处长局长等，以及有力的士绅们，他也都很熟识，很相得。这可以说明，他年纪虽小，野心很大。他看清楚了，他那个过时的王公富贵，已经不足过瘾，要想做高官、发大财，必须另起炉灶，走军阀的道路。所以他处处都在创造有利的条件。生在那时的社会，他又是个贵族王孙，家境富裕，更爱交际，当然是过着腐化浮华的生活。由于其母持家很严，故他对于酒色烟癖等，还不敢公然染指，但在应酬场合，却无不适洽人意。后又因随军至晋北作战，致将讲武堂第七期以至第十期的召集机会，全都错过，只好等待。

约在 1930 年秋，经汤玉麟以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部副官，保送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十一期受训。遭受 1931 年九一八事变，逃回热河，算是提前毕业。大家以他年富力强，主张要他准备功课，打算设法保送他考进陆军大学正科，或是特别班，再求深造。他却冠冕堂皇地说，国家多事之秋，民族存亡的关头，已不容置身事外，再去读书升学，应该执戈杀敌，效命疆场，守土御侮，等等。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是正义，更博得人们的嘉许，也就越觉得其人可爱，都愿支持。其实，他早有成竹在胸，认为既已混到军校出身，就有了带兵的资格，又并不想深通三韬六略，去做个空头的军事学家。惟一的希望，就是要当一个拥有现实的、高牙大纛的、越大越好的统兵将帅（军阀），何必把有用的光阴消磨在讲堂里。况且日寇开始侵华，大战已就在眼前，正是千载难逢、混水摸鱼的好机会，并已具有许多的有利条件，岂肯轻易放过。他就打着上述的一本正经的大道理做幌子，去奔走搞队伍。那时当权的大幕僚们，也愿意将他扶持起来，作个有力的外援，同时对他帮忙的人也不少，都在替他设法。

1932 年间，汤玉麟被迫从事备战抗敌时，有人向汤建议，以蒙古人秉性强悍、生活方式简单，又多习于骑射，备有枪马，只要召集起来、稍加编训，很快的就能练成一支劲旅。它的补给容易，行军轻快，长于超越山岭，驰逐草原，最适用与日寇打运动战，并可借以羁縻蒙旗王公，控制运用王府武装，从而编成一部强大的蒙古骑兵部队。经汤同意，遂派乌古廷主持其事。先训练一批基本作为扩展的骨干，并为了不拘束它的编制，留有可多可少和可大可小的伸缩性，也为了使它很自然地逐次发展壮大，更为了要它在蒙古军中起着中坚表率作用，遂即定名为热河陆军（蒙古）骑兵教导总队，任乌为总队长，容他先在他的王旗辖地平泉赤峰一带，开始编练，并不限制期间和地域。这可算是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此，他就回到王旗去着手进行。

在 1933 年初，汤玉麟被任为华北对日作战军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军团军团长，兼陆军第五十五军军长。开始对日作战时，因乌尚未报告编练完成，故未将该部队编入战斗序列，当然也未赋予作战任务。及至汤放弃承德，退至丰宁县时，乌即率领已经编成号称两团的蒙古骑兵，追到丰宁。汤在困境得此，颇为感动，立即集合乌部全体官兵，亲自训话，当场宣布改编为旅，事后亦未另下笔记命令，也未确定番号，即称之为蒙古骑兵旅，或仍称之为教导总队。

不久，又随汤军撤至察省沽源县一带。乌部驻地，恰与汤的四弟汤玉铭所部炮兵部队的驻地，毗连邻接。那时正何应钦派员点验汤部，故不得不临阵磨枪的来讲求军风纪等。当有人报汤炮兵部队在驻地滋扰，后闻也确是事实，汤即召汤玉铭当面指责。汤玉铭在无可狡辩中，却公然地说，这是小蒙古（指乌）的部队所为。汤虽并未再责问乌古廷，而乌虽也未加争执，却认为炮兵附近也还驻有其他各部骑兵，汤四竟单单推在他的身上，这是对他侮辱和歧视，背地很表示不满。

那时接升汤军副官处长的孙化久，原是副官处主管人事的第一科科长。孙同当时接升汤军参谋长的崔广森，均系由汤军原始小干部爬起，又是多年同事的最好朋友，孙且可以左右崔。这时原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由汤军去往东北组织义勇军的李佩声（芳庭），又率队投回汤军。李同崔、孙都是好友，与孙最近。乌虽也与崔、孙很好，尤其是在孙化久方面，终较比李稍差。因正准备调整编制，而惟独李佩声的部队较少，孙乃习于过去拆编热河省防部队的经验，在他们几人闲谈时，孙却以应讲私交为名，主张建议，将来即以乌、李两部，合编为一个加强的甲种大旅，由李担任旅长，而以乌古廷副之。当以他们中其余的人，未加可否，遂成悬案。这时汤军的各级参谋间已多传闻此事，都看到当时乌的极为忧虑不安的情绪，可知他的内心，已越加不满，但是谁也无法加以劝慰。由于乌的为人，既重视名利，又极机巧，很可能从此时起，他就开始暗中另找途径。因这时已确知距离并不很远的察省多伦县一带，已被属于热河伪军的李守信部所盘踞，乌李都是蒙古族人，在汤军时既已交好，此时互通声息，自是意料中的事。

又不久，何遂来当副军长，又被汤玉麟拘走，他更感到前途渺茫。随着汤军又遭到孙殿英的分化收买和袭击，汤、孙两部遂在沽源附近火并，他认为是大势已去，故未参加战斗，即率队离开，从此与汤军断绝关系。

汤、孙两部战罢，才确知乌古廷部已投归多伦李守信部，仍属于大汉奸热河伪军头目张海鹏部所辖。乌古廷终于背叛祖国民族，丧心降敌，为虎作伥，自然是早已决定于他的恶劣的本质，而上述的一些客观的原因，也不能不多少有些影响。

乌部编成不久，嗣又离去，对其团长等的姓名历史都不清楚，仅知全是蒙古族人。

三

以后先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内蒙古伪自治军李守信部的报道，这时他们又做了内蒙古的大汉奸德王的统治工具。这当然是在乌古廷部与李守信部合流后，由于他们都是蒙古族人，而又有着蒙古族的部队，已具备了这种条件而形成的。至于他们是何时如何改变，以及改变后的情形，都不是笔者所知，故此也就不属于这段叙述的范围了。

（1960 年 10 月 29 日）

伪察南自治政府的始末

左 宝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由南口溃退。8月27日，日寇占领张家口市，9月底，张家口地区各县均沦人敌手。原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国民党二十九军一四三师师长）和他的军政要员均逃之夭夭。当时张家口市商会执行委员于品卿以商界“代表”的名义，带领一小撮所谓“地方绅士”之流，手持自制的日本国的膏药旗，前往张家口郊区迎接日军进人张家口市。日军进城后，由于品卿带头组织有11人参加的“察哈尔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8月30日在张家口市正式成立。于品卿因迎接日军进城“有功”，让他担任“维持会长”。

一

日寇占领张家口后，推行了“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扶植汉奸于品卿于1937年9月4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以红、白、蓝三色星条旗为“察南自治政府”的表证。于品卿当上了主席，杜运宇当上了副主席，最高顾问是日本人金井章二。机构有：官房、民生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警务厅、保安厅、总务厅、民政厅，各厅下设处，如总务处处长陈玉铭。“首府”设在宣化，把宣化变为“蒙疆”地区的反动统治中心。将原察哈尔省所属的宣化、万全、怀安、涿鹿、蔚县、阳原、赤城、龙关、延庆、怀来十个县均归于“察南自治政府”管辖之下，人口200万。

随后“晋北、蒙古自治政府”也先后出笼。1937年9月13日成立“晋北、蒙古自治政府”，“首府”设在大同，统治的地区有大同、阳高、天镇、左云、右玉、平鲁、山阴、浑源、广灵、灵邱、怀仁、应县、朔县等13个县，夏恭当上了“主席”。内蒙古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于10月27日组织起“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下辖巴彦塔拉、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察哈尔五个盟的36个旗、20个县和归绥、包头二市。“察南自治政府”是日寇侵华的忠实工具，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政府，它的统治期虽然很短，但其罪恶却是极大的。“察南自治政府”成立之后，提出四项施政纲领：（一）日察可一；（二）铲除共党；（三）民族协和；（四）民生向上。在这四项施政纲领的实施中，察南的经济资源如煤炭、铁矿、油料、粮食、牲畜，均成为日寇侵华的战略资源，支援了日寇的侵华战争和以后的太平洋战争。而察南地区人民生活逐日下降，完全沉沦为日寇的殖民地。

察、晋、蒙三个伪政权出现后，在察、绥、晋三省相连地域形成了三个“自治政权”。日本人为便于控制这三个伪政权，于1937年11月22日，召集察南、晋北、蒙古

三个所谓政府的“代表会议”。“察南自治政府”代表于品卿、杜运宇到会。会上达成了“为促进蒙古、察南、晋北三政权的相互善邻关系，加强相互关系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事项的联络，达成这三个自治政府的政权紧密联合共同防共，民族协和与民生向上的协议”。并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于1937年11月23日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原察南、晋北政府主席于品卿、杜运宇、夏恭当上了“总务委员会”委员，日本关东军大特务头子金井章二任最高顾问，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当上了“总务委员长”。

二

日本帝国主义强使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政权合流，除了谋取掠夺资源的便利条件外，还为了便于统治。统一这三个伪政权是金井章二的阴谋。

日本人金井章二是日本派遣到中国的特务。他认为，察南、晋北、内蒙古三个地区的风俗、民情、文化基本相同，在经济上和地理上都与其它中国地区不同。在经济上内蒙古是它们的伙伴，况且，平绥铁路已经使这个地区联结在一起，这一地区就是后来被日本称为“蒙疆”的地区。金井章二向其主子汇报中说，“蒙疆”的地域北接外蒙古，南达陕西、宁夏，人口约250万，其中蒙古族20万。同时商品运输量的80%是通过大同作东西走向流通的（指察南和内蒙古），所以切实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对于日本帝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还有蕴藏量丰富的大同煤矿、龙烟铁矿以及冶炼厂，是日本重要的战略物资来源。为此，日本关东军总部同意了金井章二将察南、晋北、内蒙古三个伪政权合并为一的建议。

三

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政权合一后，日寇以为这样可以使三个伪政权服服贴贴地服从“蒙疆委员会”的领导，但由于原三个伪政权各自为政，相互矛盾，虽然在名义上建立了“蒙疆委员会”，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各行其是。1938年6月份，三个伪政权头目德王、于品卿、夏恭访问了日本国。他们回国后，日本人对三个“巨头”还是放心不下，又将察南、晋北、蒙古“自治政府”并成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取消了“蒙疆联合委员会”。以张家口市为首府，以黄、蓝、白、赤四色七条旗为蒙疆政权的表证。下辖36个旗、20个县和归绥、包头二市，并采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1939年为成纪734年）。到1941年6月1日，根据日本人的旨意，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大汉奸、原“察南自治政府”“主席”于品卿又当上了“蒙古自治邦”“副主席”。这个伪政权建立后，日本人规定，只允许对内称“邦”，对外称“联合自治政府”。

1943年秋，将伪察南政厅改为宣化省，伪省长刘继广担任，次长由日本人泽田贞一担任（次长相当副省长，但掌握大权），“省会”由张家口移到宣化。而伪察南政厅的办公地址（今张家口市委党校院）做了德王“主席”的王府。同时把伪察南政厅长

官陈玉铭调任为“蒙古自治政府”参议，并将张家口市改为“蒙古自治邦政府”“政务院”直辖的“特别市”，伪市长崔景岚。伪察南政厅所辖一市十县（相当“察南自治政府”地盘），伪察哈尔盟公署所辖张家口的县有：张北、康保、尚义、沽源、崇礼五县。

四

1942年8月31日，“蒙古自治邦政府”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施“蒙、汉、回分治”的政策，便于他们从中驱使利用，特设立了“回教委员会”、“兴蒙委员会”和“兴亚院”。

“回教委员会”内设总务班、指导班，下设调查、宗教、文教、卫生四个股，各伪盟公署亦设“回教班”，利用回教为他们的殖民统治服务。早在回教委员会成立前，就成立了“西北回教委员会”，在张家口等地均设分会。

“兴蒙委员会”，是日本人利用所谓“复兴蒙古民族”，为了进一步笼络伪蒙政权和蒙古军等傀儡组织的官吏继续充当其侵略帮凶而设立的。然而当时伪蒙政权中一些汉人官吏却啧有烦言，他们认为，“蒙古自治邦政府”内不应再设什么“兴蒙委员会”，既有“兴蒙委员会”，就应有“兴汉委员会”，才算公平合理。

另外，在日本侵略者统治期间，于1938年1月建立日本对中国侵略计划的指导和决策机构——对华院。它的任务是用集中统一的专门机构来全权处理日常事务和统一各项政策。后来因这个机构“对华”这一称谓对中国人的侮辱太明显了，为了掩人耳目，于1938年12月16日，又将“对华院”改为“兴亚院”。并在各地设“联络部”，负责“指导”当地伪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以及处理“日本与中国”方面必要的行政事务。实际上这个机构是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是一个大特务机关。

五

“察南自治政府”成立之后，日本侵略者除在政治上压迫，还在经济上大肆掠夺。他们把察南地盘作为政治上是“防共第一线”，经济上是“羊毛、煤铁、兽皮等物资的宝库”。日本官方人士说：“若能尽量开发，将来不难成为东亚的宝库。”

日寇从1938年至1945年投降以前，在近八年时间内，从察南、晋北、内蒙古（统称蒙疆）地区掠夺了大批物资运回日本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八年当中从“蒙疆地区”运回国去的主要物资有：

（一）铁矿。1937年上半年运回日本国的铁矿有7万多吨。从龙烟铁矿运回日本国的铁矿石300万吨以上。

（二）煤炭。从1938年到194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在“北支那”的“开发株式会社”设在张家口长清路，指挥开发一切资源。日寇每天从大同、下花园拉走至少有三列火车煤炭一列火车为50个车皮，每个车皮50吨，一列火车可拉2500吨，每天就是7500吨，这样一年可拉走煤炭270多万吨，八年内共拉走煤炭2000万吨以上。其中

1938 年大同、下花园、大青山煤田产煤约 100 多万吨，日本运回国去的就有 35 万多吨。

（三）兽皮。“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1944 年 5 月 1 日至 1945 年 4 月 30 日的“年度决算报告”所载数字表明：仅一年间掠夺牛羊皮 321532 张。此外，还有骆驼皮、牛头皮、牛腿皮等共 31 种，270640 张。按当时公家的价格计算，价值 2.96 亿元（伪蒙疆币），按市价计算合 29.6 亿元。

（四）兽骨。仅 1944 年 5 月 1 日至 1945 年度内，就收买牛骨、胶骨、材料骨合计 806384 公斤。

（五）兽血。从 1944 年 5 月 1 日至 1945 年 4 月 30 日，共收购各种兽血 49634 公斤；还有兽脂 34431 公斤。

（六）牲畜。据 1945 年 8 月统计：日寇掠夺“蒙疆地区”牲畜 113 万多头；畜皮 378 万多张。

（七）畜毛。日本侵略者在投降前共掠夺到畜毛 4450 多万公斤。

（八）食盐。日寇每年运往日本国的食盐达 80 多万担。

（九）农产品。日本侵略者将“蒙疆地区”的小麦、黍子、豆类等总产为 164568039 石，1/3 以上运往日本。

资料来源：《蒙疆年鉴》、《北支·蒙疆现势》、《蒙疆特殊会社概况》、《察南自治政府史》、《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选编》。

有关“善邻协会”的材料

巴达荣嘎*

“善邻协会”是做什么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其魔爪又从热河伸向察哈尔、绥远的同时，在西部蒙古地区出现了一个“善邻协会”。这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内蒙古地区搜集情报、打急先锋的反动机构。

伪蒙疆政府成立以后，这一机构更以“大日本善邻协会”的名义出现在伪蒙疆的各盟、旗、市。“善邻协会”的本部设在日本东京淀桥区四丁目170番地，全称是“财团法人善邻协会”。它是以日本陆军退伍军人井上璞中将为首组织起来的，其成员主要是日本财阀、浪人、退伍军人。他们是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一派的人，也就是以林铣十郎为后盾，并通过他和日本陆军省挂钩，为他们搜集有关内蒙古各方面的情报。他们又把这些情报材料编写成《蒙疆年鉴》介绍给日本国内的财阀、资本家们，便于他们到内蒙古各地投资，进一步从经济上掠夺内蒙古。他们的野心不止内蒙古，而是以研究蒙古民族的名义，连青海、外蒙古的情报也没放过。他们编写年鉴或翻译外国人所著的有关蒙古的著作，也都是为搜罗蒙古的情报。所有这些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我国东北，进而还要侵占整个中国以及外蒙古和苏联的野心。“善邻协会”编写的《蒙疆年鉴》后来改为《蒙古大观》，“善邻协会”的理事长井上璞给这本书写的序言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野心。他在序言里写道：“自去冬在蒙疆地方成立了三个自治政府以来，我国上下对蒙疆的关心则忽然高涨，不仅在新闻杂志上的报道更加活跃，而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有关蒙古的各种展览会或讲演会，居住蒙古地方的我邦人数也日益增多。这种现象从实现我国大陆政策的角度来看，真是使人无限地欣快。我们从1934年开始着眼于蒙古，为当地蒙古人开设病院，设立学校，指导畜牧业生产，从事提高他们的文化工作已经五年，但仍感到进行得很缓慢。蒙古的地理条件具有很复杂的国际关系，处在微妙的地位。因而，如以浮浅的认识去对待蒙古问题，就可能给我国政策带来百年大患。对蒙古进行工作的人，必须对蒙古有深刻的认识，温暖的同情心，洋溢的热情……”井上璞的所谓要有“深刻的认识”是真，“温暖的同情心”和“洋溢的热情”，则是要以伪善的面孔掩饰它豺狼的面目。

“善邻协会”在西部蒙古地区设立的一些医院，究竟给蒙古人治了多少病，减少了多少痛苦呢？实际上还不是搜刮老百姓，还不是拿蒙古老百姓的生命做医学试验吗？经

* 作者系私费留日学生。

他们治疗的结果，蒙古人的疾病毫未见少，反而增加，以致人口逐渐减少。经他们指导的畜牧业生产毫未进展，反而减产。他们伪装指导畜牧业生产，实际上是一群一群地赶走了蒙古人的牛马羊。

“善邻协会”除了从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资本家们提供大量详尽的材料，以便他们进一步掠夺以外，还培养出不少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忠实走狗。“善邻协会”在日本开设了一所善邻高等商业学校，容有二百名学生。该校所讲授的课程，除了传授商业贸易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外，就是积极地学习中国话、蒙古话，并详尽地介绍内蒙古的产业。除此以外，对学生加强军事和武士道精神的训练，其中特别着重剑术、柔道的锻炼。

善邻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伪蒙疆和华北各地。该学校刚开办的时候，学生来源并不多，报考的人很少，但经“善邻协会”不断地大肆宣传到中国华北和“蒙疆”的好处，报考的学生数字逐渐增多，学校的收入也大有可观了。

所谓对蒙古族学生的培养

“善邻协会”不仅培养了不少为日本帝国主义忠实服务的日本学生，同时还以“提高蒙古人的文化”、“培养蒙古青年”为名，从伪蒙疆搜罗去不少蒙古族留学生。一开始，他们把从伪满洲国去的蒙古族留学生也都集中到一个善邻高等商业学校附设的善邻学堂。善邻高等商业学校又附设了一个特设预科，专门为那些蒙古族学生补习日文及其它数理化等课程，为考入其它学校打基础。在善邻学堂集中的蒙古族学生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伪满洲国的留学生，大部分是私费。虽然说是私费留学生，但都是由“蒙民厚生会”或者其他什么“协助会”等资助的留学生，经费都出于蒙古各旗人民。其中家里有钱的是私费，后来都变成了伪满洲国官费留学生，只有入私立大学的一部分仍是私费。一类是，伪蒙疆派去的官费留学生。另一种，比较少数，这是“善邻协会”从内蒙古西部地区搜罗去的，从外蒙古跑出来的活佛、大喇嘛们带来的小喇嘛，这些小喇嘛年龄小，没有什么文化，学两年日语以后，就上日本小学。他们的一切费用完全由善邻学堂供给，也就是完全由“善邻协会”负担。据说这些人后来都当了日本的特务或宪兵，在伪蒙疆横行霸道，祸害百姓，有的可能潜入了外蒙古。这些人上了日本小学以后，满脑子被灌输了日本“大和魂”思想、“武士道精神”。“善邻协会”平时对他们严加管束，很少叫他们和其他蒙古族学生接触。

对其他蒙古族学生的训练、教育也都是不外乎灌输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思想的。概括起来，笼统地说是法西斯教育，但达到这一教育目的的教育方法是各式各样的。在善邻高等商业学校特设预科学习的蒙古族学生必须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首先从形式上，不准留发，一律剃光头。不管是教日文、教数理化或英语的教师，都在我们这些蒙古族学生面前大肆宣传“日本民族是优秀民族”，“日本的皇室、日本的国体、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日本人民都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因而“不同于凡人”，“最优秀的民族”等等。尤其修身课的教员讲起课来就讲神道、国体，简直讲得津津有味，满嘴冒沫，讲得那种肉麻劲儿，叫你觉得都难受。这种情况，不仅在善邻高等商业学校特设预科是这

样，各类、各级学校都是这样。从小学都这样进行教育是他们坚定不移的教育方针。

除了通过课程灌输“神道”，大讲特讲“君臣之道”外，还要利用一定的时间，进行集体训练。我记得，我到日本的第二年夏天，“善邻协会”利用暑假把所有的蒙古族学生都带到静岗县的海岸兴津镇，住在那里的一个大庙兴津寺里。名义上是避暑，实际上是集训。领队的是善邻学堂的长官（也叫舍监）内藤五郎，是退伍的陆军大佐。我们到海岸住在庙里以后，他把我们完全交给了那里的和尚指挥。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起床，跟着和尚们去坐禅念经，光着脚坐在硬板子上，闭上眼睛合掌念经。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像弥勒佛那样盘腿坐禅，大家都感到很苦恼，后来，老和尚算是可怜了我们，叫我们用普通的盘腿方式坐禅。念的经是把日本的历代天皇的名字都念下来，一直念到他们的“今上”天皇—昭和天皇为止。然后闭目养神，庙堂里鸦雀无声，除了黑色花肚子的蚊子嗡嗡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活活地挨蚊子叮也不能动一动。地下有一个值班和尚扛着一根像军用棍似的二米来长的棍子，来回踱来踱去地巡走。他看到谁要不专心致志地静坐，或者在那里打盹，换句话说，谁若不顺他眼的话，就用他那根棍子在你背上啪啪打下去。被打的人还得更加挺起腰板，不皱眉头，“心情舒畅”，要感到被“神棍”打几下是无限的“光荣”和“荣幸”，要以“感恩”的心情，就像蒙古人见到活佛、格根叩头叫他们摸一下脑袋时的心情来接受这些棍子，这才“真正体会”了“日本精神”。我们怕挨打就尽量克制自己打瞌睡。我们当中也有个别溜须不顾命的人，表现自己“体会”了“日本精神”，忠实于日本而挺腰板特意挨那几根棍子的。我们里面会说俏皮话的人，对这样的人下了个评语说这是“耗子舔猫屁股，溜须不顾命”。一连坐好几个钟头，念经这一关好容易熬过去了。第二道关是吃早饭。吃早饭时，要跟庙里的老和尚一起吃。早饭都摆在桌上，盛在碗里以后，老和尚敲木鱼，大家又异口同音念起般若经，还要念些别的“感谢神恩”的经，不外乎要表达吃的每顿饭都是“神恩赐”的。念完经敲第二次木鱼时，双手合十说声“领受”才开始吃饭。老和尚吃得少，没等我们吃饱，他吃完了就敲木鱼。我们也就赶紧把碗里剩下的饭扒拉完撂下碗筷子，说声“领受了”。洗完碗筷以后，还得听老和尚讲道。快吃午饭的时候，才能到海里去游泳。每天吃完午饭以后，才感到有点自由，因为午餐和晚饭老和尚是不跟我们一起吃的。吃完午饭睡午觉起来以后，整个一个午后，可以自由地在海里游泳。除了游泳，我们就在长官的率领下，参观附近的名胜古迹。但不论到哪里首先要参拜“神社”或寺庙，还得要听“神道”、“武士道精神”的宣传。然后，由长官大吹、大宣扬他们怎样培养教育蒙古族学生。这样，取得当地豪绅们的招待，小者茶话会，大者招待会。会上必须有一个蒙古族学生代表全体留学生致感谢词，要表示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而努力的决心。

在那些宣传鼓动、灌输“武士道精神”的方法之中，最离奇古怪、最使人气愤的是，竟有人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成吉思汗是日本人”。当时我们听着实在气愤，我们私下说，我们蒙古人只有这么一个成吉思汗又叫他们给抢走了。他们荒谬的根据是：日本历史上镰仓幕府时代，其头头源赖朝有一个弟弟是武将叫源义经。源赖朝掌握大权以后，怕他弟弟篡位，要杀他弟弟。他弟弟发觉后，就逃跑到北海道投靠藤原麾下。源赖朝知道后要讨伐藤原，源义经出于无奈渡过日本海逃跑，后经西伯利亚到蒙古，随即统

一蒙古而即位，称成吉思汗。当时我们既缺乏历史知识，更不知道日本历史，只得瞪着眼睛，敢怒而不敢言地听那些日本人的信口开河。但内心还是很不痛快。可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这种不满、气愤是太奇怪了。成吉思汗如果是日本人的话，蒙古人和日本人的关系不就更密切了吗？还有比当上日本人更光荣的事吗？可是，偏偏我们这些蒙古族学生不识抬举，还要反驳人家，那就更无知了。后来，我学了一些日本历史才知道源义经根本就没有横渡日本海逃到哪里去，而是他投靠的藤原怕源赖朝讨伐他，就把他杀掉，把首级献给源赖朝而了事。但在日本却有不少被上述荒谬言论迷惑住、信以为真的人。为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服务而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所谓历史学家，也大有人在。这些厚颜无耻的老爷们可笑，又可恨。他们就是指着这种满口胡说或撒谎来讨好于日本帝国主义主子而混饭吃的。但捏造出来的、不符史实的东西毕竟没有说服力，反而引起蒙古族学生的怀疑和反感。日本人也可能考虑到了这一点，以后的调子就变了。他们开始大肆宣传成吉思汗的伟业，不再说“成吉思汗是日本人”了。他们赞扬成吉思汗，说他是横跨欧亚两洲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说世界史上虽然有过亚力山大和拿破仑也不能和成吉思汗媲美。这是我们亚洲人的“光荣”，“我们应该发扬成吉思汗精神，成吉思汗精神是完全符合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他们又说：“蒙古民族是英勇善战的民族，如果深刻地领会日本武士道精神，再发扬英勇的民族特点，加上友邦大日本的帮助，那么就会所向披靡，一定会争取独立，对大东亚共荣圈就会做出不可估价的贡献。那时，亚洲就是亚洲人的亚洲了，世界大同就必定实现。”经日本人这样宣传，很多蒙古族学生的的确确被迷惑住了，也真出现了“领会武士道精神”、“发扬成吉思汗精神”的人。我记得那是1943年的事情了，那时我在广岛学习，有一天在日本朝日新闻第二版上看到以“成吉思汗的后裔”为题，报道一个伪蒙疆德王派去的蒙古留学生的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个蒙古族学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有一次野外演习时，把战刀鞘给弄丢了，他回来报告了队长。在战场上丢掉刀鞘是等于丢掉武器，这是“玷污了武士道精神”，也“不符合成吉思汗精神”。日本队长申斥了他一顿，然后叫他去找刀鞘。这个学生看样子由于“领会武士道精神相当深刻”，所以他当时就表示找不到刀鞘就誓死不归。他在深山密林里瞎摸索一夜也没找见刀鞘，看样子是不敢回去见队长了。于是他就下了决心，实现了他的誓言，真正体现了“武士道”的切腹自尽的精神，也“尽忠”于祖先成吉思汗。他把演习用的纸弹头的子弹推上了三八式枪的枪膛，脱了鞋袜，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一闭眼，一咬牙，下了狠心就用脚拇指一蹬，就听“啪”一声，自杀了。他的日本队长见他一夜未回，就打发人四处寻找这个“成吉思汗的后裔”，结果离营地不远的一个山坡上发现了他，一看左肋部渗流出的血已被太阳晒干糊住了伤口，人还有呼吸，解开衣服一看，纸弹头未能打穿骨头，仅仅是皮肤伤。经过几天的治疗人完全好了。可是日本人却如获珍宝，在这个“成吉思汗的后裔”身上却大作起文章来了。说他具体“体现了武士道切腹成仁的精神”，“是成吉思汗的优秀后代”。不仅登报嘉奖，还赏了不少东西给他。他简直成了个“英雄人物”。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他们想把所有的蒙古族学生都要变成那样的“英雄人物”，听他们驱使。

日本人大肆宣传成吉思汗的同时，还鼓动支持蒙古学生祭祀成吉思汗、印发成吉思

汗像，叫蒙古族学生佩带成吉思汗纪念章，灌制“成吉思汗歌”叫蒙古族学生唱。不知是哪一个才子编的“成吉思汗歌”，歌词极其反动，充满了侵略和屠杀。除了这些以外，日本学者们，主要是历史学者以矢野仁一为首的一帮家伙又抛出了“满蒙非中国”论，主张“蒙古独立”是理所当然的事。“善邻协会”又把伪满洲国派去的蒙古学生也都集中在一起，经常宣传“满蒙非中国”论，主张“蒙古独立”，然后再把外蒙古也“合并过来”等等。同时，平常不叫我们接触汉族留学生，尽量找些借口制造蒙、汉留学生之间的矛盾，其结果使得蒙古族学生的头脑里就消失了祖国——中国的观念。

争夺蒙古族学生

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东京建筑了一所四层楼的留日学生会馆。在此以前所有的蒙古族学生都集中在“善邻协会”开设的善邻学堂，伪满洲国派去的留学生也住在那里。“善邻协会”以蒙古族学生的名义作招牌也成功地创出了善邻高等商业学校的牌子，报考该校的日本学生越来越多了，收入也逐渐增多。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把蒙古族学生保送到各类学校。伪满洲国大使馆眼看这部分权利被“善邻协会”夺过去是不甘心的。因而就来一个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所有伪满洲国籍的、尚未入学正在补习日文的留学生进行甄别考试，合格者保送到日本各地的官立大学，不合格者送到私立大学，或者送回国，而“善邻协会”保送的学校一般都是私立的。因此，伪满大使馆的这一决定既有吸引力也挺吓人。考试合格可以被保送到官立大学，还得补助费，不合格的话就人私立大学，很有可能被送回国。这种情况下，“善邻协会”只得答应伪满籍的蒙古族学生都到大使馆去参加甄别考试。结果合格者不问本人志愿如何，都被保送到日本各地大学或高等学校，不合格者一般都安插在东京市内各个私立大学。并且留学生会馆成立后，把伪满洲国的蒙古族留学生都收容到留学生会馆。从那时起，伪满洲国大使馆管理我们了。学生会馆的一些日本人就大讲特讲“日满一德一心”，伪满洲国也就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友邦逐渐升级到亲邦。伪满大使馆虽然夺过去一部分蒙古族学生，但大部分从伪蒙疆派去的蒙古族学生仍然被掌握在“善邻协会”手里。因此，伪满的蒙古族学生也未断过来往，不仅这样，还组织了留日蒙古族学生同乡会。祭祀成吉思汗或其他纪念节日的活动时，也都集合在一起。对此伪满大使馆也是欣然答应的，因为他们在总的灌输法西斯教育方面是没有矛盾的。不论“善邻协会”、伪满大使馆，对留学生的训练、讲道都是一样的。所差者对蒙古族留学生是用成吉思汗作招牌，而对汉族学生则以孔子、孟子作招牌大讲特讲“王道乐土”。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又扯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同文同种”的谬论。更可笑的是，所谓大学教授们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公然唱出类似“成吉思汗是源义经——日本人”的口号，说“孔子是日本人”。说“孔子是日本人”的“理由”是：孔子人虽为中国人，但其学说却在日本大有生气地被传播，因此可以说他是日本人。当时我们亲耳听到这些话，真是有点气愤，感到日本人的所谓教授们也太恬不知耻。我们留学生当中议论说，日本人眼睛里有名望的人，不管你是哪一国，哪一朝代，反正都是日本人。在日本各大学里都要讲四书五经，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义灭亲之类的东西，尤其日本人的汉学家不论到哪

里讲话，三句话不离孔孟学说。除了四书五经以外，各大学里还有一门必修科目，就是“国体学”（修身、国民道德）。别的课程都考满分，但“国体学”如果不及格，那么你就休想毕业，可能还要被扣上一顶“思想不良”的帽子。通过讲课灌输“日本精神”、“神道”以外，在他们的大学和高等学校里还设有学生课，专门管理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直接与警察骑兵有密切联系。

“善邻协会”在伪蒙疆横行跋扈

“善邻协会”的理事长井上璞在《蒙古大观》的序言里恬不知耻地说什么，为了发展蒙古民族的文化、经济，在蒙古各地建立学校、开设医院，指导蒙古人的畜牧业生产。但实际上侵略成性的、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究竟在蒙古地方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假借指导畜牧业生产，赶走了蒙古人的牛马羊群，建立学校给蒙古人灌输日本法西斯教育，开设医院也就是便于他们拿蒙古人的肉体做试验品而已。他们开设医院、建立学校的经费还不是出于蒙古族劳动人民的身上吗？通过他们的各种设备是便于剥削压榨蒙古人民，也便于他们安插自己的人。他们从日本国内带来很多不三不四的浪人、流氓，安插在他们在蒙古地方开设的一些机构。这些家伙到了蒙古地方就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日本人看来本是一个无名小卒，在自己日本人面前是低声下气的家伙们，到了蒙古地方便耀武扬威起来。日本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在学校里上级生可以随便打下级生。被打的人直立不动，这叫做“阶级服从”。另一方面，日本人对被压迫民族的人民是惨无人道的，抱着极大的民族优越感，处处表现他们弱肉强食的强盗本性、豺狼本质。对他们越害怕、越软弱，他们越欺侮你。你跟他们硬了，他们就怕你，只不过换个方式，将来暗中陷害你。这就是他们的外强中干，纸老虎的本性。但如不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他们的专横跋扈是断不了根的。

我记得那是我到日本的第二年，1937 年，就是在前面所介绍那样，“善邻协会”利用暑期训练的名义到静冈县兴津寺坐禅念经的时候，“善邻协会”从东京带着自己的炊事人员去给我们做饭、烧澡塘。其中的头子是“善邻学堂”长官内藤五郎大佐的亲信，过去在他手下当过兵，名叫石仓。他也是毫无例外，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对蒙古族学生是根本瞧不起的。那时我们轮流摊值日帮他们挑水烧澡塘。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刚从“蒙疆”去的同学哭着回来了。我们问他，他说他到澡塘去洗脚，叫石仓给打了个嘴巴。当时我们有三四个同学在屋，听到以后，实在气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跑进澡塘一看，石仓那个家伙正在那里擦地，我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按倒在地上，没头没脑地揍了一顿，揍得他嗷嗷叫着求饶才放手。当天晚上内藤就召集我们训话，说我们打人不对，我们里面也有人顶他几句，他就开始骂我们，就这样不欢而散。会后我们一致提出石仓做的饭就是不吃。第二天没有人去吃饭，老和尚也奇怪，内藤着了慌，很快答应叫石仓回东京去。石仓走了以后，我们都以胜利的心情去吃饭。但几天后，等训练结束回到东京一看，石仓老家伙还在，对我们很傲慢的样子。于是我们又提出同一个问题，石仓如果在一天，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善邻协会”没有办法，每天给我们买面包吃。那时我们几十个同学倒挺齐心。团结的主要动力，就是蒙古

人不能丢人，不能受侮辱，不能示弱，不论成年小孩都很团结，谁也不去吃饭。我们的条件也简单，就是不吃石仓做的饭，别的面包还是可以吃，或者换掉石仓我们就吃饭。结果事情闹大了，内藤五郎软硬兼施也无济于事，“善邻协会”的理事、能说善辩的法学士、律师大岛丰亲自出马跟我们谈判。主要目的要把石仓留下，我们的条件是要石仓滚蛋。大岛讲了一天话，他抽了三盒烟，嘴都冒白沫也没说服我们。最后，理事长井上璞亲自出马，一个一个地叫我们，连威胁带利诱。我记得井上璞把我叫去说：“你是私费留学生，将来可以把你保送到任何一个大学，你不要跟着别的学生捣乱，打石仓时还有你，那不要紧，我们不追究这个。你如果跟别人这样干下去对你是不利的，你说一说，你们里面谁是主谋？谁先提出不吃饭？”我那时刚到日本，日本话说得还不大好，我只回答，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我就怎样。不吃饭的问题是大家一致提出来的，对我不利也好，叫我回国也好，我是不能给石仓低头示弱。我是伪满的留学生，实际上他们也管不了。别的同学也一个一个被叫去。还有十几岁的小孩子也被叫去，但他们也都按我们的说法说了。最后，“善邻协会”实在无法，只得把石仓赶走了。可是第二年暑假回伪蒙疆的同学回来说，石仓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旗“善邻协会”当上了小官，在那里可跋扈了。我们听了以后，都很泄气，从东京把他撵走了，到了我们自己的故乡反而高升了。当时我们哪知道其中的道理呢？现在才明白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走狗，如不把它连根拔掉，单独打他们几个人，就是宰掉他们几个，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善邻协会”所以能够那样横行霸道是因为他们有帝国主义做后盾，还有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们组织的伪政府给他们做帮凶。

我在善邻学堂只呆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后就到了广岛。至于“善邻协会”的内幕详细情况知道得很少。写这个材料时，时间比较紧迫，因此没能够达到系统地介绍，只是把一些自己记忆里的片断的事实罗列出来。文字方面，更有很多词不达意之处，更没有什么系统的批判。这个材料仅供专门写这方面的材料的人参考之用。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2000年5月16日）

忆“陆军幼年学校”的学习生活

和 希 克*

一、幼年学校的概况

德王为了培养伪蒙古军的年轻军官的后备力量，1940年7月，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德王府西营盘设立了伪“蒙古陆军幼年学校”。该校的人员编制和课程设置以及教育训练的方法，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幼年学校的模式设计的，直接归伪蒙古军总司令部领导。第一任校长是中佐博彦们都，日本主任教官是柳下，生徒队长是少佐哈丹巴特尔。每期招生60名，编为两个区队，各设一名少尉区队长，直接负责区队的教学与训练工作。校内设有无线电台和医院，担任学校的通讯联络和卫生保健工作。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所谓学科是主要学习中学的蒙文、日语、数学、物理、历史和地理等课程；所谓术科是主要学习基础军事理论、基本的军事技能、军事体操、剑术和刺枪等科目。师生与同学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都严格地实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下期生见着上期生要行军礼并服从他的命令，稍有反抗的表现或行动，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除了日常的军事训练外，还经常进行昼夜间的非常军事演习，为了培养学生的“武士道精神”，这种军事演习往往是有意地选择极端恶劣的气候进行。经常召开“武道大会”进行剑术和刺枪的比赛，优胜者获奖。早晚点名之际，点名完毕后，边唱军歌边跑步一小时。集合或紧急集合时都有一定的时间，超过时间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同一区队的几名学生违犯了校规，集体也要受到打骂。吃饭、睡觉、走路和坐卧姿态都有规定，稍有违犯就打骂。学生进办公室必须严格按照军人礼节，不得稍有差错，甚至挨打时也得采取规定的挨打姿势。挨打时不准哭，你如果哭了，打得越厉害，并且骂你是缺乏“武士道精神”，一直打到不哭为止。吃饭时，也按照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必须先用日语喊一声“我要吃了”。学生的衣食住行的费用完全由校方负担，每月还有伪蒙疆币13.75元的津贴费。寒暑假归乡时，全是免费乘车。

每周末检查一次各区队的内务整顿情况，也就是检查室内外及个人卫生。每月由校军医官检查一次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记入卡片，并向上级汇报，如果发现学生患有花柳病等传染病时，立即给予开除处分。每周设有轮流的值星军官和值周生，负责检查督促全校的日常学习和工作的任务。每周有两节劳动课，搞校院内的清洁卫生和校田的种植收割等农活。学生患轻微的病，由校军医官负责给予治疗，病重者转送呼和浩特“蒙古军”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病愈后立即返校学习。每招收一期学生，由上期生选

---

* 作者曾在“陆军幼年学校”学习。

派学习成绩优秀和组织能力较强的两名学生，去担任该期生的指导生，协助区队长搞工作，力求成为他的有力助手。夜间在每区队学生宿舍内设四名不寝番（夜值日生），分前后夜两班，担任宿舍内外的警卫。学校东边驻扎着伪蒙古军第五师二十六团，担负德王府和幼年学校的安全保卫。每周末检查一次学生武器保养情况，不合格者受到严厉惩罚，尤其在演习中遗失武器、弹药或者皮带等物，立即交给军法处法办。每周还有学生轮流到教官家里当勤务兵。

为了加强法西斯思想教育，每周由校长讲一节精神训话课。日本主任教官讲数学课和生徒心得（类似现在的中学生守则）。每学期末由区队长针对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的具体表现进行一次严格的考核，并把核定材料报送生徒队长审查后归档存案。此档案材料，秘密地跟随你一生，但你一生也看不到你的档案，是绝密文件。期末考试中前五名优秀生发给奖品。每个学生发一支樱式步枪，除了实弹演习之外，平时不发给子弹，以防学生中发生叛变等意外事件，而且这种樱式步枪是粗制的训练武器，实战中不能使用，打三四发子弹后就要爆炸。在日常的教育与教学中特别强调军风军纪，衣冠必须整洁端庄，风姿伟武，要表现出军人的气概，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不得有丝毫的违抗行为和表现。在星期日或假日经常组织小型军事技术比赛和野游打猎等活动。每日的朝会和晚点名时，必须先向日本天皇进行“东方遥拜”，向他表示无限的忠诚。每教室内都悬挂着成吉思汗和韩凤林遗像以及德王的“忠诚正直”等亲笔题词。

考试制度非常严格，学年考试两门课程不及格者，留级学习；毕业考试两门课程不及格者，不发给毕业证书，留级或分配到部队当班长。

每期学生毕业时，邀请军政要人、社会名流来校参加毕业典礼。在庄严肃穆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和主任教官讲话后，就请贵宾进行讲演。进行最后一次的武士道精神的教育，灌输为德王和日本天皇“捐躯效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在军乐声中，由校长给前五名优秀毕业生发给奖品，再给全体毕业生发毕业证书和毕业纪念像册。

二、日本教官嘴里喷射出来的毒气和黑雾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阴险狡猾的柳下主任教官，在 1942 年调到伪蒙古陆军军官学校当主任教官去了。他的接任者是井上主任教官，据井上自我介绍，他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毕业前夕，曾参加过日本军的政变事件，政变失败后，被捕入狱，监禁许多年。后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事当局迫切需要有指挥才能的年轻军官，因此，把他提前释放，派他到前线当中级指挥官。临释放前，日本陆军监狱长给他吃了一副绝种药，因此他已四十多岁尚无后代。日本关东军完全侵占我国东三省后，认为他在政治上不可靠，令其退伍，让他当在乡退役军官，并将他派到幼年学校当主任教官。他确实是个学识比较渊博的家伙，既能教日本文学，也能教高等数学，军事知识和技能那就更不用提了。他能言善辩，口才也比较好，是一个典型的法西斯军官。

他在朝会上，经常给学生讲“国内外形势”，藉此鼓吹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王道乐土”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每逢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国的大城市或重镇时，通过举行“庆祝会”之机，大肆吹嘘日本的“丰功伟绩”，以此来

向学生灌输亲日和军国主义思想。只准学生唱法西斯军歌，不准唱流行歌曲。他说唱流行歌曲，会使人沉浸在爱情生活中，心变得软绵绵的，不能锻炼成为“真正的武士”。讲历史课时，他说：“成吉思汗和天照大神是亲兄弟，成吉思汗派他弟弟天照大神去治理日本的，日本大和民族和蒙古民族是同种同族的民族。因此，我们日本大帝国的天皇陛下，派我们来中国帮助蒙古人，复兴蒙古的。”他用这些荒唐的甜言蜜语给学生灌输亲日思想，以期达到其同化蒙古民族的罪恶目的。在他面前学生讲日本话，他就高兴得得意忘形，如果学生讲蒙古语，他就暴跳如雷，大骂一顿。他讲数学或军事课时，结合课文大肆宣扬日本的科学技术和武器如何如何先进，比苏联和英美都发达，以此来向学生灌输崇日恐日思想。

德王和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乌古廷经常来校“视察”。每逢他们来校时，学校都要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他们在学校吃饱喝足以后，给学生作报告。每次都是讲些日本是我们的“善邻友邦”、“救星”，“日本天皇的光照下，复兴蒙古”等陈词滥调，别无其他新鲜玩艺儿。有时，还邀请一些日本高级将领来校给学生讲日军的战史与目前时局等问题，给学生灌输崇日思想。日本教官是通过这些阴险卑鄙的教育手段，向学生施放军国主义思想的毒气和黑雾的。

三、第一期学生的抗日歌声

第一期的布力格德、棍仓敖力布、苏达那木等同学，用蒙文编写了第一期学生歌。歌词中有这么几句话：“从四面八方飞到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小鹰啊！等到翅膀长硬，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之际，一定把大草原上的一切害人虫吃光，把辽阔无边的草原建设成人间乐园……”他们编出这支歌后，我们第一期学生很快就都会唱了。在课余时间，都不约而同地唱起这支歌来，抒发自己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不知什么原因，井上主任教官知道了这歌词的大意，有一天，他把布力格德等编歌的同学叫到办公室，气色恼怒地问：“‘一定把大草原上的一切害人虫吃光’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这些同学回答说：“害人虫指的是大草原上的天然害虫，别无他意。”井上睁大两只狗眼睛恶狠狠地说：“你们对我们的日本天皇不忠诚，不说实话，用花言巧语欺骗我。我命令你们今后决不准唱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抱有敌意的歌曲。今后，我再听到此歌声，一定要严惩不怠。”这些同学回来后，把井上的这些话原原本本地给全班同学传达了。从此，同学们不敢在校内唱了，假日郊游或寒暑假回家后，再尽情地欢唱这支心爱的歌。

四、日本法西斯劣根性的大暴露

教剑术的饭家日本教官，在剑术比赛中，有时，被我们第一期的剑术练得好的萨音巴雅尔、孟和巴特尔、宝音图和阿民勿力图等同学打败。他就怀恨在心，以后一定要寻找时机，找碴儿对这些同学进行打击报复。有一次，塔青布同学把来校进行比赛的日本角力能手摔倒了，这个所谓的日本“大力士”很不服气，再三地和这位同学较量，结果皆失败而终，第二天，他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他走后，井上主任教官把这位同学

叫到他的办公室大骂了一顿，指责他是损害了大和民族的“尊严”，犯了“怒其主”之罪。通过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日本法西斯的野蛮兽性和狭隘劣根性。

五、第四期学生成立抗日政党，积极开展抗日除奸活动

第四期学生入学后不久，学生中形成了主张抗日的激进派和主张教育救国的消极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1944年春季，第四期学生卓力格图（现住锡盟正蓝旗，是解放军离休干部），阿拉坦阿古拉、（又名梁永富原任内蒙古话剧团干部，前年因公伤逝世）、拉喜敖力布（现任锡盟民委主任）、色旺扎布（现任内蒙古大学副教授）、阿勒德拉图、纳庆、勿力吉等同学和西苏尼特旗女校教师布仁色音、纳色音朝克楚、德力格尔朝克图等人，成立了一个以抗日除奸为宗旨的内蒙古青年党。

有一次，轮到卓力格图同学担任值周班长，在他值周期间，同班的一位同学在宿舍里丢了东西，向他报案。他听完遗失物品的经过后，深入宿舍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断定为教育救国派的一位同学是盗物者，命令他把赃物交出来。这位同学坚决不承认，并向教育救国派的领导人汇报了这件事。该派的领导人立即找卓力格图据理驳斥，极力推翻他的判决。双方各叙自理，互不相让，在班内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了班集体的友谊与团结。过了数日后，遗失物品，在宿舍的某一角落里找到了，或者从另一位同学身上发现了，这我就记不清了。卓力格图听到此消息后，心里感到很难为情，立即跑到厨房拿菜刀剁掉自己的一个手指，把鲜血淋淋的手指交给被冤枉的同学，以表示赔礼道歉。

卓力格图同学是一位勇敢倔强富有正义感的爱国蒙古族青年。他于1946年，在锡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他有较好的指挥才能，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晋升为营教导员。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坏人陷害，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党籍、军籍，交给锡盟正蓝旗管制改造到万恶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倒台为止。前几年，内蒙古军区给卓力格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军籍，定为十六级军队干部之职。现已离休，在锡盟正蓝旗从事牧业生产，度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六、杀日寇报国仇，奔向革命前程

到了1945年，“幼年学校”的第一、二、三期学生，都升入呼和浩特的伪蒙古陆军军官学校。“幼年学校”的在校班级只有第四、五、六期学生和补习班。这时的校长是色德达力玛中校，生徒队长是都古楞仓少校。另外，还有日本教官三名，中少尉区队长有：那顺巴图、巴图敖其尔（现任锡盟畜牧局长）、额尔敦陶克陶、特木勒、仓杰扎布、宝音和布格、敖特根、那顺达来等人以及三名军医官和两名文职教员。还设有附属医院和电台。每期学生有五十多名，共有三百余名。

幼年学校的内蒙古青年党，在1942年春天，派出两名同学，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联络。他俩走后，一直杳无音信，可能牺牲在途中了。在1944年秋天，继续派遣

阿地亚（现任锡盟蓝旗旗委书记）和旺楚克（现任锡盟蓝旗民委主任）两位同学前往蒙古进行联系。他俩离校后，仍未归来。后来才知道，他俩到达乌兰巴托后，因无组织关系，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被捕入狱了。

1945 年 7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根据日本中尉特务主任教官稻永的指示，色校长发布了前往张家口进行野营训练的命令。事先卓力格图等同学，窃听了从驻西苏尼特旗日本特务机关打来的电话，已知其以野营训练为名，往呼和浩特转移的秘密。

知其秘密后，立即召开卓力格图、阿勒德拉图、拉喜敖力布、纳庆和色旺扎布等同学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由卓力格图同学首先介绍了窃听特务机关电话得知的实际情况。他说："往张家口进行野营训练是假的，实际上是往呼和浩特转移。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快要打进来啦，我们应该做好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德王的大儿子指挥的二十六团，驻扎在我校附近，严密地监视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对他严加防范。我们用的樱式步枪无实战之用，并且没有子弹。以后要设法搞到学校的三八式步枪和子弹。在行军过程中，掌握有利时机，杀死日本教官，缴械蒙古教官的武器，举行起义迎接红军。"与会者热烈地讨论了他拟定的起义计划，最后统一了观点，兴高采烈地散会了。

当晚，在色校长的带领下，全校师生员工共三百余人，在朦胧的夜色中，把武器弹药放在牛车、骆驼车上，给炊事员和杂勤工每人发给一支三八式步枪，令其保护日本教官安全。给第四期学生，配两挺轻机枪，每人发了四发子弹，仍背着樱式步枪，担任途中的警戒任务，浩浩荡荡往张家口出发了。在途中数次想干掉日本教官，因有炊事员和杂勤工的保护，并且日本人不在一起走，未搞成。夜间五六点钟时，行抵毕喜勒图庙，一查点人数，才知道行军途中掉队两名同学。校长立即派两名第四期学生沿着原路查寻其下落，在早饭前好容易才找回来。因为行军过分劳累，大家吃完中午饭，都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卓力格图又召开了阿勒德拉图、拉喜敖力布、纳庆、勿力吉、色旺扎布等二十多人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了杀死日本教官的行动计划。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卓力格图担任总指挥，并且，他和阿勒德拉图负责突击日本教官。勿力吉负责指挥轻机枪，肩负全校师生的安全保卫任务。拉喜敖力布和纳庆等同学，指挥各期的同学，夺取蒙古教官和炊事员等人的武器，并监视这些人的行动。还派色旺扎布去联系驻庙的三十多名伪蒙古军。他会见其连长后，立即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互不干涉、互不侵犯，"幼年学校"师生走后，绝对给予保密等协约，返回后，将谈判情况汇报给卓力格图。

在毕喜勒图庙宿营后，生徒队长都古楞仓和三个日本教官住在庙内的一个蒙古包内，等他们睡熟后，卓力格图悄悄地爬进蒙古包内偷出三支手枪，只有稻永主任教官把手枪放在枕头下边睡着了，未能盗出来。

卓力格图先在庙的周围山上布置了望哨，然后在主任教官等住的蒙古包附近设了四名警戒兵，再独自一人端着三八式步枪闯进包内。稻永主任教官一听见脚步声就惊醒了，他一看见闯进一个端枪的人，赶紧往枕头底下摸他的手枪，准备反抗。卓力格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开枪击毙了要作最后挣扎的稻永。生徒队长和两个日本教官听见枪声后，像惊醒的兔子一样往外逃窜。生徒队长都古楞仓和左滕教官肩并肩地向前奔跑。卓力格图迅速端起三八步枪，瞄准左滕射击，枪声响后，都古楞仓队长应声倒于血

泊中了。他还在嘴里断断续续地喊着："同学们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呀？你们为什么这样干呀？日本军方面知道这事件后，你们都活不成的。你们赶紧离开此地，往北跑吧！"卓力格图怀着内疚和沉痛的悲哀心情，迅速跑至都队长跟前说："队长，我打的是左滕，因我的射击技术不高明，误伤您了，我实在对不起您啊！我有罪啊，请饶恕我吧！我一定杀死那两个鬼子，替您报仇，为国报仇。请您在九泉之下瞑目安息吧！"都队长听完他这几句话后说："我决不怪罪你们，只感到遗憾的是，今后不能和大家一起干复兴蒙古的伟大事业，来世再见！"我们敬爱的队长，说完这几句遗言后，面带笑容离开了这动乱的世界。周围站着的同学，看见队长死了，都掉下了同情的眼泪，脱下军帽，向他敬礼。卓力格图也向队长的遗体行军礼告别后，举目一看，左滕光着两只脚，正向南山拼命地奔跑。他和阿勒德拉图，选乘两匹骏马，每人手提一支三八式步枪，很快地追上了左滕。鬼子立即跪倒在地上，苦苦哀求饶命，并且贼眼死盯着他俩的枪。这时，阿勒德拉图扣动扳机，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然后他俩调转马头驰回庙内。同学们向他俩报告说："堀口日本教官跑进庙库羊毛堆里藏起来了。叫他出来，怎也不出来，你们收拾他吧！"卓力格图咔喳一声，把刺刀安在枪上，飞步跑进庙库里，把堀口刺死于羊毛堆之下。然后叫同学们把稻永和堀口的尸体，拉到山沟里，把都队长的遗体埋在庙附近的地里。圆满完成杀死日本教官的行动计划，并处理完善后事宜，卓力格图同学立即召集蒙古教官和杂勤人员训话。先命令同学们，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然后说明了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闹革命的意图。并宣布愿意跟着学生去蒙古的留下来，一起去蒙古，不愿意者也不强留，请自便。他们听完训话后，都表示愿意跟着学生走。

卓力格图决定：从第四期学生中挑选精明强干的26名同学，先乘马回"幼年学校"，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之后，穿过锡林郭勒大草原，越过国境线，去乌兰巴托。第五、六期学生，年龄小，忍受不住途中的艰难险苦，因此，决不能去张家口干"飞蛾奔火"的蠢事，暂回学校待命，由第四期学生包凤林负责管理这些同学。

全校师生在庙里共进晚餐后，由包凤林（现任内蒙古体育技术学校的讲师）带领第五、第六期学生往学校进发。走出三十多里时，额尔敦特古斯同学回来报告说："日本特务机关的部队，已经闻讯赶来为日本教官复仇。"这些年幼无知并无实践经验的小同学们，听了这个消息后，都沉不住气了，哭喊着向四处逃命。到天亮时，包凤林从附近的山谷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五六十名同学，领着他们往图牧尔台方向前进。早晨八时许到达图牧尔台城外，包凤林派一名同学进城，向伪蒙古军第五师师长报告"幼年学校"学生杀死日本教官来到此地。不久，从城里跑出来一个乘马的少尉军官，他下马后，立即命令学生放下武器。他缴完械后说："不准学生回幼年学校，送回呼和浩特蒙古军总司令部进行处理。"学生坚决不同意他这种把羔羊送给狼口的恶毒作法，他就脑羞成怒，拔出手枪把乌克图同学腿部打伤了。额尔敦陶克陶区队长，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产生了共鸣之感，拔出手枪，缴了他的枪，把他赶回城里去了。他率领学生转移到离图牧尔台二十多里的伪蒙古军牧场宿营，让师生们吃饭休息。不一会儿，宝音图少尉带领三名护兵，奉五师师长之命，叫幼年学校师生进城见师长，并保证来去自由。于是，包凤林带领师生进城。五师师长和参谋长都亲自在师部门前热烈欢迎师生的到来，并和蒙古教官们亲切地握手，表示欢迎。

第二天，五师官兵和学生开往商都，抵达商都后，先与八路军部队接洽，后去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领导机关会晤。最后三方代表，把学生安排在粮站住宿，行动自由，把五师官兵当作战俘，圈在兵营里，让他们与世隔绝了。不久，八路军改编了第五师。“幼年学校”的学生，有一部分人参加革命部队，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另一部分人，由蒙古人民军护送到乌兰巴托，进入各类大中专院校学习深造。

再说，第五、六期学生出发后，卓力格图等四十余名师生，学生都身背三八式步枪和250发子弹，还带两挺轻机枪，骑着马或骆驼向幼年学校挺进。天亮后，大家都下马就地休息。卓力格图查点人数后，大吃一惊，原来，在夜间行军中，教官们利用天幕黑暗之机，都溜走了。现在只剩下刚嘎莫仁和敖特根文职教员了。同学们痛骂这些无耻的叛徒们一阵之后，继续往前急驰，下午6时抵达“幼年学校”牧羊场。吃完晚饭后，卓力格图和敖特根老师召集大家开会。会上他俩给大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现在苏联红军尚未解放西苏尼特旗，驻德王府西营盘的德王大儿子指挥的二十六团，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如果不改变行军路线，就有陷人虎口全体被歼灭的危险。因此，决定绕过巴仁那木，从德王府北边的白音敖包后头穿过去直奔国境。闯过白音敖包后，为了避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和暴露目标，遇到村落也不敢进去，忍饥挨渴向前急进。突然听到后边人喊马叫之声，回头观察时，才发现他们的后边尘土飞扬，二十六团的一连骑兵跟踪追来。师生27人立即下马，把两挺轻机枪都捆在骆驼背上，各自占据有利射击地势，做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卓力格图身带手枪独自去见连长进行谈判。临走之前，告诉大家说：“以枪声作为谈判破裂的信号，你们一听到枪声，就立即做好冲杀的准备。同学们静候我的胜利佳音，再见吧！”他微笑着迈着从容镇定的步伐，走向敌方的连指挥所。他走到连指挥所前时，连长手里提着一把盒子枪，以敌对的凶狠目光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的来临。卓力格图先向连长行了个军礼接着说：“连长别来无恙，近来军务很忙把？我是受同学们的委托，特来和您谈判的。”连长冷冰冰地说：“你有话就快讲吧，少啰嗦！”卓力格图不慌不忙地笑着回答说：“请连长耐心点，我把心里话，详细地讲给您听听。我们幼年学校学生杀死日本教官是为国家、为蒙古民族报仇雪恨，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神圣权力和天职。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吧！现在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很快就来解放我们锡盟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长啦。我们是去外蒙干复兴蒙古的伟大事业的。您作为一个连的指挥官，头脑要冷静些，并且要有政治远见。不要再作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啊！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为什么替即将遭灭顶之灾的日寇，自相残杀呢？我们现有五十多人，还配有两挺轻机枪，你们才三十来个人。我们在兵力、武器和士气方面是占绝对优势的。希望连长仔细考虑一下目前的形势，请最后定夺吧！”连长若有所悟地回答说：“你刚才说的这一番话，对我这个大老粗，很有启发。我现在决定不和自家人打，你们赶紧往北走吧！并祝你们成功，再见！”卓力格图又说：“我们撤出阵地二十分钟后，请连长瞄准蓝天射击，以空枪表示送客吧！”学生走出一里多地之后，后边果然响起了一阵排子枪声。同学们高声喊着：“谢谢，谢谢……”跃马扬鞭向北奔驰，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又开始了艰难的新的远征，肚子饿了吃草充饥，喉咙干了喝马尿，这样艰苦行军五六天。第六天的下午五时许，到达塔布琴塔拉。塔拉（草原的意思）的北边，有个孤

独而寂静的小村落，村内只有两座蒙古包。大家走到村边时，卓力格图下令，叫大家下马就地休息待命。他独自走进蒙古包内，先向老牧民问好。然后说明我们是杀死日本教官投奔外蒙的“蒙古陆军幼年学校”的学生，我们四五天没吃没喝，想讨点吃的，还想打听点近来的消息。

老牧民细听他说的话后，满脸笑容地说：“我们欢迎勇敢的小英雄们的到来！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们安心地休息一夜，明晨我领你们去国境。”当时，拿出来炒米、牛肉和奶豆腐等食品，热情地款待。学生们饱餐一顿美味的炒米和奶食品后，院内布置两名哨兵，看护马匹并进行警戒，其余的师生全进入了梦乡，都做着进入蒙古以后的甜蜜的梦。

翌晨5时许，卓力格图把色旺扎布叫醒后说：“你睡得像死猪一样，一睡着天塌下来也不知道了。半夜时分，在这附近蒙古人民军和德王部队激战了好几个小时。我现在马上就去找蒙古人民军，我未归来之前，你替我操点心吧！”他嘱咐完色旺扎布之后，带上手枪，独自一人去寻找蒙古人民军去了。上午11时左右，他才返回驻地。他立即集合部队说：“我已见到蒙古人民军的指挥官，他们很快就要来。我们把各种武器都架在院内，空手等待他们的来临。”不一会儿，就听见蒙古人民军的十几辆装甲车和许多卡车，发出隆隆地吼声，尘土飞扬，从远处急驰而来。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列，热烈欢迎蒙古人民军官兵。一位蒙古人民军上尉下车后，命令其士兵搜查师生的全身，并缴了他们的武器，然后用汽车把他们拉到野营兵营。让师生住在临时兵营，并设两名哨兵进行监视，不准离开此地走远。再把卓力格图、阿勒德拉图、色旺扎布等同学叫去，上尉亲自进行审讯。问色旺扎布，你们为何而来？他答：“我们在1942年和1944年，两次分别派遣四名同学，来您贵国进行联络，他们迄今尚无音信。我们不是和你们打仗来的，而是投奔你们搞革命来的”。审讯结束后，上尉可能打电报报告其上级，关于1942年和1944年两度派人去蒙古进行联络的事宜，其上级肯定了这一事实。因此，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了，哨兵已撤，但不准走远。让师生们住在兵营的里边，他们住在外边。生活上按上宾对待，学生也可以随意参观其武器和坦克。

第二天下午，上尉把卓力格图叫去说：“我们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暂时没有时间送你们去我国。我已委托附近的苏联红军，送你们回学校。德王府也驻着我们的部队，你们可作些保卫工作，帮助我们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你和阿勒德拉图同学，给我们部队作去张家口和呼和浩特的随军向导。”卓力格图向上尉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回来后，将上尉的意见原原本本地给师生们传达了。

翌晨，卓力格图、阿勒德拉图和刚嘎莫仁等三位同学，徒步回学校。在途中实在渴得不行啦，让刚嘎莫仁去找水，他俩在原地等候。寻水者走了半天，不见回来，他俩就无可奈何地忍着饥渴走回学校，给蒙古人民军当向导去了。刚嘎莫仁一直杳无音信，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和一位布力亚特人一起归校了。

师生们回到学校之后，各处布置流动哨兵，严密地监视二十六团的活动。执行完哨兵任务后，去大庙里游玩，或者在校院内畅谈各自的未来的理想和志愿等，生活得很愉快。

回校六七天后，色旺扎布步行三十多里，去西苏尼特旗女子学校的忽和格日勒图老

师家作客，在他家快活地玩了四天。第五天早晨，突然从学校来了两名同学叫他返校。临走时，忽老师送给他两件军用毛毯，作为临别纪念。

色旺扎布返校后的第二天，蒙古人民军派来汽车，拉上二十六名师生和两名蒙古人民军的叛徒，抵达斯力宾古勒桥后，用布蒙上汽车，驶进一个高墙院内住下。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楼台上还站着两个哨兵。一看这戒备森严的情景就知道它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对我们一开始按战俘待遇，生活不太好。从第三天开始，就对卓力格图、阿勒德拉图、色旺扎布等同学进行审问。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是伪蒙古陆军幼年学校的学生，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派四名同学来贵国进行联络，他们至今下落不明。我们最近杀死日本教官，历尽千辛万苦投奔你们来搞革命的。我们是真心诚意的，请谅解我们的赤子之心吧！"这次审讯结束后，学生们的生活有所改善，睡的是板床，仍按居留所待遇。后来才听说，这次审讯后，把1944年派来的阿地亚和旺楚克两位同学，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送往疗养院休养去了。再过数天之后，把师生们迁至内务部第二招待所住。从此，过上了较高级的生活，睡的是钢丝床，也可以随意逛乌兰巴托市。到了三月份，卓力格图又寻其领导人进行谈判。领导人在会上说："你们是幼年学校的学生，以前还派来同学来此联系过，并有杀死日本教官的功劳。因此，你们与乌力吉敖斯尔的伪蒙古军部队，在待遇上有极大的差异，我们应该优待你们。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我们今年无法解决你们的升学问题。今后你们就劳动去吧！我党的领袖们，在莫斯科学习前，也都曾经受过艰苦的劳动锻炼的教育，劳动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机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谈判后的翌日，卓力格图去十万日本侵略军战俘营当翻译。色旺扎布、阿斯根和白乙斯古楞等14名同学，去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到达农场后，大家推举色旺扎布为劳动组组长。农场的生活条件极差，白天做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农活，晚上睡土炕，大家都累得面黄肌瘦，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还病倒了好几个。色旺扎布目睹此种艰难的生活情形，实在忍耐不住了。他代表大家找农场场长说："你们对我们不是按学生身份优待，而是仍按战俘对待。我代表大家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事后不久，场长请来乌力吉敖斯尔部队和蒙古人民军的代表，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色旺扎布不服，又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两位代表就用逮捕色旺扎布坐牢的口气来威胁。色旺扎布毫不畏惧地说："我们是为革命而来的，无罪的，而是有功的。你们凭什么逮捕我？你们这是背信弃义的卑鄙行为。逮捕我也是可以的，因为，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中，我们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的学生。我们的枪被你们都缴回去了，我们现在只好束手就擒啊！我坐牢一点儿不怕。我死在牢中后，给我立个石碑，上面刻上：'内蒙古青年色旺扎布来蒙古人民共和国搞革命，无罪坐牢而死。'这样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但是，我还要提醒你们几句话，害死无辜的革命青年是有罪的，将来的历史会严惩你们的，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的。你们还要仔细地考虑考虑，此事件的后果与对国内外的政治影响。"代表们听完他这一番演讲后，默默无语地低着头走了。

第二天，蒙古人民军代表又来农场，举行宴会热情款待学生劳动队。酒过三巡后，代表问色旺扎布，你们今后想干点什么？他斩钉截铁般地回答说："我们想学点技术或者给农场当更夫。"代表说："我国目前劳动力少，因此，让你们来农场劳动，这不是

劳动惩罚，而是在受光荣而艰巨的劳动教育，请你们不要误解我们的好意。明年一定让你们升学。”即将散席前，军代表站起来，庄严地向全体学生公布：“今后学生不搞农场的一般性的劳动了，当更夫，开拖拉机，搞机磨面粉等工作。”

色旺扎布当了拖拉机驾驶员，开了数月车后，被评为三等拖拉机手。突然患肺结核病，吐血不止。农场将其病情报告乌兰巴托。经农场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后，持两级介绍信，赴乌兰巴托内务部第二招待所。内务部再派人送往疗养院治疗。住院后不久，卓力格图来院看望他。卓力格图亲切地对他说：“我现在搞翻译工作。我们幼年学校的学生，今年都能入学，请您安心养病。”

色旺扎布在此疗养了两个多月后，调回乌兰巴托入学。他先入医校，后又转入师范学校的一年三班学习。“幼年学校”学生三十多人和一些锡、察两盟的其他学校的学生，分别送入商业、工业和畜牧业等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只是党校不收我们这类学生。学校对我们内蒙古的学生，一视同仁，比本国生每月额外发给我们三元钱津贴费。虽然如此的照顾，但是，生活仍不习惯，吃不饱。实在没办法就得伸手向当翻译的同学要钱花。或者在假期内做些木排作业劳动，挣点儿钱改善自己的生活。内蒙古的学生两年去疗养院一次，本国生就没有这种待遇。色旺扎布就疗养过两次。1944 年寒假派来蒙古的阿地亚和旺楚克二位同学到此后，就对他俩进行审问，怀疑他俩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派来的特务。阿地亚同学态度非常坚决，矢口否认特嫌之事。旺楚克同学说了些含糊不清的言词，立场有些动摇，态度不够明朗。因此，他俩被送进监狱，受长时期的折磨。去年，蒙古人民军指挥官与卓力格图等同学谈判后，才搞清他俩的特嫌问题，放出监狱。将体弱多病的这两位同学，送往疗养院医治。1946 年春季，才回乌兰巴托，和久别的亲密战友们见面。

1949 年 6 月，色旺扎布等 25 名同学，从各自的学校毕业后，满怀喜悦和革命激情返回祖国，投入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去了。中国共产党在 1955 年又把色旺扎布送往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大学深造当研究生。他学习四年毕业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学委会授予他蒙古语言学博士学位。他在 1956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内蒙古大学的副教授，为培养四化建设的人才辛勤地劳动着。

（1984 年 8 月 3 日）

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李 守 信*

从多伦逼走刘桂堂

1933年夏初，日寇完全占领热河后，派往多伦准备侵犯察北的伪军，计有刘桂堂部七八千人，张海鹏部一千七八百人和我部六千五百人，共一万六千多人。张海鹏部来自辽宁，已编为伪满的正规军，张本人出任了伪热河省长，关东军对该部比较信任。我部来自热河北部，正式投敌还不到两个月，除了我是蒙古族人这一点而外，其他都待“考验”。刘桂堂部来源于山东的流寇，在热河沦陷以前被北平军分会收编，这年三月由鲁北（热河省的县名）经天山、林东、林西退到围场一带才投敌，所以关东军对该部最不相信。张海鹏有好几旅骑兵，由其长子张子明和王永清、傅景峰、索华岑等分别带领，开到多伦的一千七八百人，是王永清旅。因此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令王永清监视刘桂堂和我，并令林西特务机关长浅田兼我的伪“游击师”顾问，他转告我，注意刘桂堂。这就是日寇对伪军分别对待，相互牵制的做法。除刘桂堂部没有派遣顾问和教官外，我和张海鹏部都有日本人紧紧跟着。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采取的是蚕食政策，逐步侵犯华北。从侵犯察北开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除了张海鹏和我的伪军中派有顾问教官和由日本组成的“特设队”外，日本的正规军始终没有在察北露面。日寇最初在察北，是想令刘桂堂的山东流寇进行捣乱，使察省主席宋哲元不能安心在喜峰口一带抗战。怕刘桂堂不听话，又把我带的那帮热河胡匪调了过去，以威胁二十九军的后方。当宋哲元离开察哈尔，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时，日本人又把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开到多伦，一方面提防刘桂堂和我这两部分新投敌的伪军，一方面阻止汤玉麟反攻热河和冯玉祥由张家口出击。等到我把刘桂堂从多伦赶跑，张海鹏部王永清旅调到沽源以东，在察哈尔北部便由我唱独角傀儡戏。

1933年3月5日夜晚，刘桂堂部在林西东北的二十家子打了一整夜内讧，翌晨他的井得泉团长投归了崔兴武的刘继广团，他本人率领主力撤至围场以北，曾盘踞了一个多月，派副军长夏子明前往承德接洽投敌成功。由于宋哲元把二十九军大部带到河北，察北一带没有驻军，多伦于四月下旬被刘占领，队伍完全驻在街内。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后来才到，因不能进街故驻在庙上的东西两仓。我是3月5日在林西代理崔兴武交给我的旅长职务。7日将日本的小柳匀部队和伪满的“兴安军”欢迎入城，25日崔兴武把

---

* 作者曾任伪多伦警备军司令官、伪察东警备军司令官。

兵权交我，4月初，赤峰特务机关机关长田中玖发表我担任“游击师”司令伪职，把队伍整顿了二十多天，即向多伦开拔，在1933年5月初旬到达多伦。由于多伦的街市被刘桂堂占领，多伦的庙仓被王永清驻扎，我只好在多伦城东20里的善丹河沿岸驻扎。

多伦是先有了蒙古喇嘛教的庙宇，后来才在庙南二里的高地上出现了蒙汉贸易的街市，故多伦又称为喇嘛庙。刘桂堂与我有天山作战（被我毙伤一千余人）及收编井得泉的仇恨，对于张海鹏部王永清旅也严加戒备，把多伦街封锁起来，使我和王永清两部都不能向商务会征要给养。多伦寺庙东西两仓很大，可以驻一万多队伍，但喇嘛的粮食有限，仅能勉强养活王永清一旅骑兵，我在白沙黄草的善丹河边，必须派人到一二百里以外搜刮粮食。好在由林西开拔时多准备了半个多月的米面，所以初来到多伦的十几天内没有断炊。王永清也是胡匪出身，外号“天下好”，我当胡匪时就跟他磕头结拜，热河沦陷时他在开鲁和我见过一面，到了多伦我们便联合起来对付刘桂堂。这时曾在开鲁当过兽医的日本浪人仓林，也跟我从林西跑到多伦，他和我部的浅田顾问，看见我的官兵给养困难，恐怕发生变化，遂把此种情况，报告了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松室于5月26日由承德飞到多伦，想调和我与刘桂堂之间的矛盾，用电话把我从善丹河叫往庙仓，想使我俩言归于好，套在一根缰绳上供他驱使。

松室孝良在庙仓南的天然飞机场下了飞机．住在东仓的一个大喇嘛的院子里，叫我和刘桂堂在那里见面。他说：“你们再不要敌对了，我来给你们调解。”我说：“刘桂堂反复无常，毫不讲信义，他要在这里当场打死我，我的队伍岂不是垮了。”正说话之间，听见外边报告刘桂堂到了。松室出去迎接，我便带着我的随从副官由正房躲到西房。刘桂堂进门以前，先跑进四个卫士，各扛着一挺机关枪，枪口朝着正房放倒，爬下作预备射击的姿势，然后他才跟着一个副官，被松室迎接到正房里边。松室打发人叫我过去，我没有答应，以后刘的副官过来请我，见我和我的副官都扪着手枪，一看我有准备，扭头便走。不大一会外边的人跑进来说，王永清的人将重机枪架在四周，刘便匆匆辞去，松室孝良把他送出庙仓。他从正房出来，我爬在西房的窗上看了一眼，是个短粗的胖子，脸上长满发黑的横肉，怪不得人们叫他刘黑七。松室把刘桂堂送走，回来对我说：“真不是东西，我太冒失了。”并说：“你的困难我完全知道，我给关东军去电报，要求给你解决。”当天，他飞回承德。

我在林西投敌以后，队伍由崔兴武时的不到2000人，很快就发展成8000多人，田中玖叫我把汉族官兵6500人编为两个支队，蒙古族官兵1700人编为一个支队。从林西往多伦开拔时，日寇不仅没有补充械弹和饷项，并且把那个蒙古族人组成的支队，留在林西和经棚驻防。田中玖对我说，是怕到多伦把队伍输光，留下这1700蒙古族人作为我的另一笔赌注，所以叫我兼任伪“经、林留守司令”。

我知道天下没有便宜的事情，当汉奸也得有一定的表现，才能逐步得到主子的信任。日本军阀的武器和金钱并不随便给人，对他们有利可图才肯破费。那时我既然披上贼皮，总得摸捞到一些实惠。

松室孝良走后，因为再过两天便是端阳节，王永清留下我跟他在一起过节。他又拿出200块银币，向喇嘛买了一些大米和牛羊。我打发随从副官把大米牛羊送给我驻善丹的队伍，并叫刘继广和尹宝山于过节期间要更加戒备。就在端阳节这天拂晓，刘桂堂派

出2000多人，跑到善丹河去摸我的营垒，结果被我部打得狼狈而退。我在仓上看得清清楚楚，丢盔撂甲的回来1000多人，被打死300多人，伤兵约有500多人，抬到中午才停止。这时冯玉祥正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永清恐怕刘桂堂反正夺取庙仓，决定把东仓腾出，让我部当天到里边驻扎，他和我的日本顾问，也同意两部分人集中到一起，等得到松室孝良的指示后，好联合从多伦街上驱逐刘桂堂。我部便完全进驻到庙仓，刘桂堂的兵整整打了一下午枪，到天黑以后才停止射击。

5月29日，刘桂堂派他的副军长夏子明跟我见面。夏还带着一个姓黄的参谋长，他们说此次事件是刘桂堂部一个在天山县被我打伤的师长，瞒着刘袭击的，希望我不要误会。夏子明曾与我磕头为结拜兄弟，所以我对他们说：“刘黑七打我，你这个把兄弟也不给捎个信，并且是你这位参谋长运筹帷幄给定的计。”弄得他们两个面红耳赤，只说：“我们哪里知道。”我说：“我这次进多伦，是你们昨天拂晓去善丹河把我请来的。”夏子明看见我的态度很强硬，向我说：“你容许我们五天时间，等我们把开拔准备完成，将多伦街腾清后让给你。”我说：“只要你们讲信用，一礼拜以后也行，咱们不服气离开多伦打，不要在街上祸害老百姓。”

夏子明走后的第二天上午，多伦商务会派来代表欢迎我们进街，说是刘桂堂的人已经连夜向张家口退去。我和王永清向承德日本特务机关报告了此事，回电叫我完全占领多伦，让王永清当天开回热河。听说刘桂堂从那天开始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我于5月30日留尹宝山支队驻守寺庙的东西两仓，带刘继广支队进街，将司令部设在街内，委热河阜新的一个老秀才蒋正清为伪多伦县长。不久乌古廷从汤玉麟那里跑到多伦，还带过来五百多蒙古骑兵。他说汤部在沽源北面的狼尾巴山，被从赤峰退过去的孙殿英解决了大半，孙已领着人进驻到关里沙城一带，汤带着残部困居在独石口外，已到了日暮穷途的境地，所以他来投我。乌古廷（原名乌臻泰，字椒庭，投日后，改为乌古廷）是喀喇沁右旗的蒙古贵族，曾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因乌出身于军事学校，又是我的磕头兄弟，以为他可以作我的左右手，于是把他打发到林西，代理我的伪“经林留守司令”，去整训胡宝山的第三支队。我恐怕胡宝山在那里给我生事惹祸。不料这乌古廷竟想拆我的台，叫他四弟乌臻瑞，向第三支队的官兵宣传，说我是朝阳七区的汉人，是一个“假蒙古”，这个部队应当由“真蒙古”带领。胡宝山和团长达理扎布（敖汉旗人）等把这话告诉了我，我这时正忙于营救松室孝良，并且我是依靠汉人捧我，蒙古的小头子们既然排挤我，他们有真本事，就交给他们带领好了，所以对此事没有注意。

松室孝良在调解刘桂堂和我的矛盾失败后，第二次又来多伦，听说给我带来六万块“天津字”交通银行钞票军饷，不料飞机在隆化县境内的一百家子山附近失事，落地后被一个外号叫“二寡妇”的女人所带的胡匪，将他和飞机上所有日本人完全捕捉。此次飞机失事是我把乌古廷派到林西以后发生的。消息传来那天，我即派连长张国治带了四十多个人，到一百家子山一带寻找松室的下落，我叫张连长无论如何要保护住松室。我企图以此向日本人献媚。后来伪热河省长张海鹏比我许的愿大，用大量金钱将此部胡匪收编，松室安全回到承德，我嘱顾问浅田向他说，我也曾派人前去营救，从此松室对我的印象更好，开始给我发军饷。不过没有给我补充武器，只是派来一个日本人组成的

"特设队"，附有三辆装甲汽车并配备六挺重机枪，二十多个日本人，还有四五挺轻机枪，没有配备炮。吉鸿昌率部由张家口北进时，我就是凭这点力量，认贼做父，在多伦对抗"抗日同盟军"。

和"抗日同盟军"作战经过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日本帝国主义为使冯、蒋火并，收渔人之利，除了派飞机在长城内外侦察"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并没有派出正规部队向察北六县发动进攻。在六月中旬张家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多伦西南各县，只由张砺生指挥的曹凯和白凤山等部民团驻守，所以多伦到张北之间，可以说阻力不大。

我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素无来往，但我刘继广支队的团长陈景春（名陈生，字景春）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军队，并和"抗日同盟军"姚景川（字云章）是亲戚，所以他们派姚景川来找陈景春，企图瓦解我的部队。陈景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他的财产都在沦陷区，不敢跟姚景川轻举妄动。当"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以前，我曾和参谋长陈宝泉瞒过日本人，召集两个支队长和团长们秘密开会。我说："谁是真投敌？谁是真抗日？只有盖棺才能论定。我们已跟日本人拉上线，现在八字没见一撇，绝不能放弃多伦，必须死守几天，看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究竟如何，瞧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怎样，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参谋长陈宝泉暗中和何清明有联系，一贯主张所谓"曲线救国"，所以同意我的主张。

我叫尹宝山支队防守庙仓，在西边西仓的小孤山上构筑工事，让日本人"特设队"抽出一部分轻重机枪放在上面，以保护小孤山下的飞机场。我带着刘继广支队防守街市，并控制南边的沙岗地带，把日本人的三辆装甲汽车作为机动部队。日本人听说"抗日同盟军"号称两万之众，前来夺取多伦，浅田等都吓得失去了主张，完全听我调度。7月初旬，日寇由飞机给我运来子弹六万发。"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时，大约来了一万多人，7月7日夜晚发动攻击时，我一听没有炮声，机关枪声也很疏落，更有了坚守的把握。多伦虽无城墙，但在房屋上可以放沙袋据守，庙仓本身就是堡垒，没有大炮很难打开，街和庙中间以及其周围是开阔地带，"抗日同盟军"很不容易隐蔽。初攻击时，来势相当猛烈，争夺街南的沙岗，打伤了我的团长郭焕章。但由于我们居高临下，又由于他们的攻打不能协同一致，虽然进入庙和街的周围，未能集中力量进街或者占庙。

多伦被围以后，日本飞机在8日白天来过一次，来时正值"抗日同盟军"的五百多骑兵企图夺取庙仓西边的那个小孤山，飞机扔了四颗炸弹，把这部分骑兵和步兵赶跑，除了日本人的三辆装甲汽车在召庙和街市中间以及飞机场周围，用机关枪向"抗日同盟军"扫射外，我的兵都没打枪。日本飞机降落时，被"抗日同盟军"的步枪子弹射入油槽，把接济我的六万发子弹和一些慰问品卸下，修理了半个钟头，才起飞回到承德。这次以后，因大雨连续四五天昼夜不停，日本顾问浅田急的老打电报，但飞机找不见多伦的目标，无法接济。"抗日同盟军"因后方运不上给养，加之连攻数夜没有奏效，士气逐渐低落，尽找地方避雨，战事遂成了胶着状态。我在坚守多伦期间，日夜不

眠，我知道我个人的命运全看能否守住多伦来决定，所以老到最吃紧地方亲自指挥。因此“抗日同盟军”虽然把多伦装在口袋里边，造成三面包围，但无法往里渗透。由于这时全国都注视“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冯玉祥一听攻不进去，便叫姚景川出面跟我谈判，想让我把多伦腾出。我的团长陈景春大概是7月10日那天到司令部来见我，他说：“姚景川前几天跑来拉我，我没有理他，因为怕你多心，也未向你报告，今天他到了我的团部，想跟你直接谈判，可否让他和你见面。”我说：“咱们在多伦如同闷在鼓里，不知道国内外形势，可以让他来跟我谈谈，以便了解一些外边情况。”

姚景川劝我弃暗投明，我说：“咱们日久见人心，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点。”他又说苏联已经决定援助冯玉祥一百万支步枪，不久即可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给运来。我心里说：“这是给冯玉祥，冯到手以后不一定就给我李守信。”后来他说：“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全国各方面的爱国人士拥护，如果连多伦也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现在你要把多伦让出，便可以振奋振奋人心，这就是你对抗日的最大贡献，冯先生以后必然重用你。”他并说：“咱们是热河同乡，我知道你两头为难，说实在的话，同盟军已经没力量打开多伦，冯先生派我来，是想向你借一借多伦。冯先生真有办法，你不成问题会和我们合作在一起，冯先生要是没有办法，我负责把多伦归还给你。”我因为孤军据守多伦三天三夜，蛮对得起日本人的六万发子弹，冯玉祥既然派代表来，我不能把这条路线切断，现在正到了两面都能讨好的时候。于是我问姚景川：“你们打算借多长时间?”他说：“借两三个月。”我说：“两三个月时间过长，一个月我能应付日本人，到期你们没有办法，那我就要进行反攻，咱们一言为定，都要对得起朋友。”我叫姚景川转告给“抗日同盟军”，在最近一两天以内，要虚张声势地猛烈攻击，等我把日本人吓唬住，退却命令出于他们口中，我再通知“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的日期和时间。

我的兵都是胡匪和民团出身，他们都暗藏着不少的“保命子弹”，轻易不肯外露。八日飞机走后给每人发了十几粒，到九日白天都背着空子弹袋子，日本人看见着了慌。仓林曾悄悄问过我：“子弹没了该如何办?”我说：“没子弹拼刺刀。”因而他们用十万火急的电报，向承德特务机关要求接济，可是大雨滂沱，飞机不能来。我即去找浅田顾问，我说：“关东军给我的20万发子弹，已在天山和善丹河两次打刘桂堂消耗殆尽，飞机运六万发，每兵平均发了不到十粒，8日夜晚和9日夜晚，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我已剩下赤手空拳，你得给我想办法。”日本人一样怕死，浅田便把此种情况又用急电报告到承德，并且为了急于逃跑，把战况描绘得特别猛烈。松室孝良怕把我这六千多经得起“考验”的伪军，被“抗日同盟军”拉走或者吃掉，三十多个日本人跟着丧命，从热河再派出伪军，远水救不了近渴，在11日夜晚决定叫我们向锥子山（即围场县）撤退。12日拂晓，“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

因为事前双方约好，我出多伦的时候，还表演了一番突围战斗，“抗日同盟军”亦派人追击了十几里。我便在善丹河停了下来，做出掩护退却的各种姿态，其实我八九天没有得到休息，在善丹河的公积淖尔附近睡了大觉。多伦距锥子山280里，走了六天，日本人认为我退得井然有序。7月20日左右，松室孝良派汽车把我由锥子山接到承德，派日本医生把我的痢疾治好，共耽误了七天，临走给我补充了20万发子弹，五百支步枪和九万元军饷，叫我赶快回去反攻多伦。我因往来承德又磨蹭了四天，距离8月11

日的限期还有十天，承德的电报直催我开拔，我以准备没有齐全推诿。到了8月四五日，看了看推不过去，便把队伍从锥子山开出，当天走了70里停下。日本人发现我迟疑不前，第二天便派来两架飞机在我的队伍周围扔炸弹，我知道这是对我提出警告，只好加快行军速度，于8日到达距离多伦70里的峪道口。浅田顾问叫我在九日拂晓攻城，我说对敌情还没有侦察明白，在峪道口住了一天，10日傍晚才到了善丹河沿岸。

这时蒋介石调派军队在平绥路东段加紧威胁“抗日同盟军”，并令宋哲元回察哈尔劝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多伦街、庙两处只有张凌云的两千多步兵和几百察北民团防守。10日夜晚，张凌云派出代表三人到公积淖尔见我，痛哭流涕地请我不要夺回多伦。我说：“我不前进，日本人给我扔炸弹，现在你们借用多伦的一个月的期限已到，冯先生并没有办法，回去告诉张旅长，我明天上午12点钟非进多伦街不可，今晚明晨你们很可以腾清，我保证不追击。”我对三个代表各送了一匹马，把他们打发回多伦。第二天，张凌云未曾开走，反而派出骑兵向我军警戒，我决定采用“跟上敌人马尾巴进城”的胡匪战术，把队伍兜成一个大圈，一齐上马，由善丹河向多伦直冲，使“抗日同盟军”无法招架。尹宝山不同意我的办法，按兵不动，我带着刘继广的那个支队，跟在“抗日同盟军”的骑兵后边一拥而冲进多伦街上，因为张凌云的步兵看见自己的骑兵退下，不能开枪射击，等到把自己的骑兵让过，我的兵便跟了上来，以致步兵都措手不及，纷纷退出多伦向南奔跑。尹宝山掌握不住部队，他的所部也朝街上冲过，被我指给去占领庙仓，那里有二三百民团，见尹支队上去，均落荒而走。日本人对我这套胡匪战术，感到非常惊奇，其实我离多伦以前就把几个做小买卖的，收买成我的义务谍报，他们早跑来告给我张凌云进入多伦以后的各种情况。

我进了大街，看见刘继广堵住一个商号的大门洞，墙上爬满了我们的兵，刘说：“这是张凌云的旅部，张和旅部的人全被咱们包围在里边，你看如何处理。”我说：“放走！叫他们带上武器，找莜麦地隐藏，等到日本飞机走过后再行动。你向张凌云致意，我因避嫌疑不能和他见面，他需要什么东西，你给他准备好。”我怕日本人发觉，派人通知他们暂不要进街，说是敌人还未肃清，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便在城外架起电台告捷。不大功夫承德方面就派来一架飞机，我们把对空联络符号摆出，飞机朝南侦察了一阵，没有发现“抗日同盟军”便返回承德。等到张凌云的人退净，日本人才进了大街。张凌云走时非常狼狈，连乘马都被我的兵给牵走，刘继广给弄了些烧饼并雇了一头毛驴，将他打发回张家口。

在我让出多伦期间，内部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乌古廷听见我退到锥子山，以为我完蛋了，便把我留在经棚和林西一带的第三支队，归附了伪满的“兴安军”。伪蒙疆的大小头子们，一开始和我共事，就把我当成外派，他们离不开我而又随时想拆我的台和夺我的权。日本人和蒋介石还好对付，就是伪蒙疆的一帮人难斗，使我伤透了脑筋。

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

我二次占领多伦以后，得到日本人的信任，1933年9月间，将我的部队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任我为司令官，两个支队改称为师，由以前的支队长刘继广和尹宝山担任

师长。拨来野炮八门和山炮两门，充实了丁其昌的炮兵大队。另外还成立起一个通信队和一个宪兵队。这时浅田专任多伦的特务机关长，赤峰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把他的一个朋友退役大佐下永，介绍给我担任顾问，底下的小顾问和教官，增加到二十多人，“特设队”除了那三辆装甲汽车，还添了三十多辆运输卡车。轻重机枪也不断给我补充起来，一共有一百多挺，战斗力较前增加许多。同时察哈尔镶黄旗的营长高乐明山，带五百多骑兵投我。不久胡宝山从林西乌古廷部队中，也给我策动回来七百多人，加上另外扩充的人，我的人数增加到八九千。

队伍编制就绪以后，我即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谢委。这次是由西苏尼特旗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宍浦领我飞到长春见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宍浦说一口北京话，给我任翻译。小矶给我戴高帽子，誉我为“蒙古的英雄”，希望我为“民族复兴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近和松室孝良接洽，已经电告他大力支持你的部队。”我为了表示衷心拥护“满蒙政策”，就便提起乌古廷在林西带的那一千七百多蒙古骑兵，我说：“听说兴安军收编了他们，就让乌古廷带了去吧，都是在关东军领导下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而效忠嘛。”小矶说：“多伦如果占不住，你把人打光，还得用这部分人扩充，得给你留下。”我说：“我一个人分不开两头，最好让乌古廷带领。”他说：“你的心很好，关东军自有办法。”从由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宍浦领我前去以及从小矶和我谈的话看来，日本人一方面培养我为汉奸，一方面还培养我为蒙奸，因此我以后由侵犯察北的罪魁变成“蒙疆”小朝廷的“兵马元帅”。

从1933年8月重占多伦，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国内报纸上称我为“李逆”，我心情特别苦恼。从1933年冬天开始到1935年春天，我学会吸食鸦片，娶了一个小姨太太，更加腐化堕落了。这时多伦成立起日本的“善邻协会”，由中岛万藏负责，街上开设了好几家日本料理馆（妓院兼卖小吃的商店），从承德弄来十几个日本姑娘。特务机关的人和我的那些大小顾问教官，完全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浅田管不了下永，把拨给我的大部分经费和一部分军饷，都挥霍在花天酒地上面。我终日陪着日本鬼子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可是我的士兵却吃不上洋面大米，除了两套单棉军服外连衬衣都没有，兵血全叫他们喝了，但我不敢过问，虽松室孝良曾几次问过我有无困难，我只能说是一切很好。我的参谋长陈宝泉思想搞不通很苦闷，有一次在郊外打雁，心不在焉地将猎枪装火药过多，猎枪炸掉左手上三个手指。

我和德王携手以前，也有不少小的政治活动，曾在1934年春天，到承德给张海鹏拜过寿。张海鹏因为我在1922年到库伦旗清剿“蒙匪”时给他递过门生帖子，他的旅长王永清和傅景峰又都跟我结拜，张想把我拉到伪满，所以对李树声（李是崔兴武的驻省办事处长，也兼任我的驻承德的办事处长）按我的代表来看待，对李曾不只一次表示过这种意图。我去承德给他拜寿时，张的大儿子张子明任旅长，称我为“世兄”。宴会时把松室孝良和我都让到主席的正面。过完寿我去辞行，张又留下我吃饭，他说：“多伦占不住，回热河来，我老了，把兵交给你和子明，你们弟兄两个好好地干。”我这时的队伍，比张海鹏的四五个旅还要人强马壮，争名夺利的资本怎能轻易让人。

因为我把多伦占住，日寇为了统治察哈尔的十二旗群[①]，为下一步占领绥东做借口，早在1934年夏天，关东军便派金永昌和于兰泽两个蒙古族留日学生，由长春来多伦酝酿成立伪“察哈尔盟”。他们来到多伦，住在日本特务机关。他们先编造了一本察哈尔人物调查资料，呈给关东军司令部审核，据说只有镶黄旗总管卓世海（即卓都巴扎布）够上担任伪盟长的资格。卓世海这时参加了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蒙政会”），并且在张家口有好多财产，不敢回来担任此一伪职，别的人也都不敢出头，所以后来决定让我兼任这个傀儡盟长。我对蒙古事不感兴趣，要抓枪杆子，坚不担任，临时遂由多伦特务机关在金永昌和于兰泽这两个蒙奸协助下，代行了伪盟公署的职权，向察北各旗群征发皮毛牲畜和粮食，并选拔四十多个少年儿童，编为一队童子军，附属在我的伪军里边，由日本教官实施军国民的奴化教育和训练。金永昌和于兰泽直到1936年春天伪“察哈尔盟”正式成立以前，都断断续续地住在多伦，除了做其他特务工作外，专门进行这件分裂活动。

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陶克陶和韩风林跟关东军拉的关系，直到1934年冬天，我才发现这一秘密。有一天多伦机场上降落下一架从百灵庙来的日本飞机，上边坐着两个蒙古人和一个印度人，印度人和一个蒙古人住到特务机关，另一个蒙古人叫陶克陶到我这里找金永昌，经过介绍得知他们都是关东军司令部“嘱托”（特务），因为金住在我的司令部，陶也一同住下。陶克陶对我说，他们是到百灵庙去见德王，因为德王回了苏尼特旗，关东军不叫他们到苏尼特旗去，并且那个印度人急于回国，所以路过多伦休息一夜。据我现在判断，那时德王还不敢公开和日寇勾结，他的身边有蒋介石给派过去的特务，如“蒙政会”的保安处长兼保安大队长韩风林，就是给关东军和蒋介石都做特务工作。在多伦停下，利用两地特务机关的电台，和德王联络。

陶克陶因为没有见上德王，感到非常扫兴，不过一谈起蒙古问题，却洋洋得意起来，表示他在关东军方面比金永昌和于兰泽还要吃得开，想叫我买他的账，他好右手抓德王，左手抓我。我向他表示：“我是一个蒙古人，对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愿意自告奋勇。”并且恭维他：“你必定有更大的贡献。”他说：“那自然啦。”我问他：“蒙古民族真能复兴吗？”他问我：“你看怎样？”我说：“现在我对满蒙政策怀疑，究竟是满洲复兴蒙古，还是蒙古复兴满洲，我没有见过德王，如果见到他以后，请他好好想一想。”我知道陶克陶和金永昌都是关东军的大特务，便拿满洲来指日本，因为这是我对蒙古问题的一贯看法，不过很后悔对他们两个人说出，于是扯起为什么把伪“蒙古自治军”改编为伪满“兴安军”以及乌古廷把我的人编归伪满“兴安军”的闲话。可是陶克陶经我一问，却吐露出他的一部分真实思想，他说：“你们如果对关东军有所怀疑，咱们还有外蒙这一条路，我要是再见了德王，就以此向他打气。”这时金永昌正躺在炕上抽鸦片，猛然坐起来说：“陶克陶你说这话叫关东军听见，有没有危险？”陶克陶脸色大变，和金永昌说：“我跟子忠（我的字）随便闲扯，现在关东军毫无疑问支持我们，万一关东军不理我们以后，就得走这条路。”陶克陶因为失言，没再对我和金永昌谈其它事情，假装乘坐飞机疲劳，就蒙头睡了觉。我也躺下闭住眼睛思想心事，只金

① 旗群——清末民初年间，内蒙古地方的一种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旗或县。

永昌抽足鸦片才睡。第二天上午，陶克陶便带着那个印度人和另一个蒙古人回了长春。后来金永昌把陶克陶的话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经我向田中玖代陶克陶解释，才没有深究。

我和陶克陶与金永昌，在这天晚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根据乌古廷把我的队伍带到伪满，德王在百灵庙走着两条路线，陶克陶还有投奔外蒙古的意图以及金永昌警告陶克陶等等，使我越发认识到内蒙古的这些王公、贵族和接受了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很滑头滑脑，在政治上乱拉关系，并且互相排斥猜忌。所以从此以后，我对他们更加提防，尽量避免卷入。那时已经清楚地看出有三个蒙古组织，一是百灵庙的“蒙政会”，一是伪满的兴安军，另一个便是我的伪察东警备军。伪兴安军和我有矛盾，“蒙政会”也会错打我的主意，我决定了以后要紧紧靠拢关东军，牢牢抓住自己的队伍，少和人谈论政治，少与蒙古的上层接触。不久，金永昌告诉我韩凤林在北平遇害，更使我感到脚踏两只船的危险和骑墙派的可怕。关于韩凤林的死，据我以后了解，蒋介石曾于1934年责问德王勾结日本，德王可能把一切都推在韩凤林身上，所以韩凤林回北平探家时，由军统特务刘建华（曾任伪厚和市警察局长，因和马汉三联络暴露，从呼和浩特跑到准噶尔旗，担任了马占山部慕新亚骑五师的副师长），半夜叫门架走，据说按军统叛徒制裁杀害。这话是伪“蒙古军”成立以后我的师长韩凤楼对我说的（韩凤楼是韩凤林的哥哥）。

德王在百灵庙外受傅作义的威胁，内部分成东西两派，还有白海风和朱实夫等主张抗日派，使他感到自己孤单和“蒙政会”的环境复杂，早就想到了我的这部分武装力量，但没有关系深厚的人给他联络。继韩凤林给他担任保安队长的宝贵廷，拉扯起来算是我的一个内弟。他听到德王老念叨我，便说：“李守信是我的姐夫。”德王遂派他为代表，来和我联络。宝贵廷原从土默特右旗出来先给我当文书上士，当时我是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二团赵国增部的营长，我把他介绍到团部，赵国增又将他保送至“东北讲武堂”深造，和乌古廷同期同学。毕业后回到热河，汤玉麟正利用蒙古族人，所以他们连一天兵都没有带过，便成了陆军少校，担任参谋和副官一类的角色。热河沦陷和汤玉鳞失败后，宝贵廷跑到北平住闲，生活没有办法，听见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便跑到百灵庙投效德王。韩凤林死后，他因代理队长爬在德王身边。

宝贵廷在韩凤林死后疑神疑鬼，没敢从百灵庙经草地前来多伦，而是由归绥，经平绥路和北宁路，进入伪满境内，由通辽绕到林西，先住到乌古廷那里。他从百灵庙出发以前，德王通过日本人，给我寄到多伦特务机关一封介绍宝贵廷的信。这时多伦的特务机关长由浅田换成了浅海，有一天浅海突然问我：“宝音德力格尔是谁?”我忘了宝贵廷的蒙古名字，我说：“认不得。”浅海便没有叫我看德王的来信，也没有再说什么，使我非常纳闷。半个月以后，乌古廷从林西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宝音德力格尔已经到了我这里，他要到你那里去。”我问：“谁叫宝音德力格尔?”他说：“就是宝贵廷。”我又问他：“宝见我干啥?”乌说：“他给德王当代表，可否我代表你跟他接谈，叫他不要去多伦，恐怕引起日本人误会。”这时乌古廷在伪满“兴安军”里，因为一半人被胡宝山拉走，伪满对他已不重视，呆在林西并不得意，很想巴结德王。我一听乌古廷的口气，知道他有自己的打算，便对他说：“此事日本人早就知道了，我得请示特务机关。”

我到特务机关向浅海说："宝音德力格尔汉名宝贵廷，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是德王的代表，已由百灵庙来到林西，是不是让他到多伦来。"浅海说："叫他来吧！"我给乌古廷又去电话，说是："特务机关叫他来多伦。"乌古廷派了四个兵把宝贵廷保护到多伦。

伪"蒙疆"的大小头子们，都不把我当蒙古人来看待，连宝贵廷也认为我是老粗，不懂政治。他走进德王的门墙，很看不起我这个姐夫，所以对于德王的内幕跟我只字不提。我问他："你为什么绕道而来？"他说："直接走路上有危险。"我又问他："德王为什么要联络我？"他说："德王力量单薄，恐怕傅作义打他，希望和你联合起来，复兴咱们的民族。"后来我刺探他："德王是否已经和关东军勾结？为什么把信寄到多伦特务机关？是德王自己想联络我？还是关东军叫德王这么办？"宝贵廷说不知道。我一看这个小政客的鬼祟样子，便不再跟他深谈，只对他表示："你回去告给德王，我很佩服他，至于两人今后如何合作，我得听关东军的命令。"我因处处小心，说完话即领上宝贵廷去见浅海机关长。浅海要留我们吃饭，我托故回了司令部，他被留在特务机关，深夜才回我家中休息。不知他要了些什么手段，引起日本人对他的重视，第二天即由于兰泽领上飞往长春，后来飞回苏尼特，从那里回了百灵庙。

德王到了这年冬天，才在多伦飞机场上和我初次见面。因为这时百灵庙"蒙政会"快要分裂，由于德王以云王名义免去西公旗石王的扎萨克职，引起绥远乌、伊两盟王公的反对，傅作义策划成立察绥两个蒙政会，于是德王的反心日益暴露。他是到长春见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回苏尼特路过多伦降落，停飞机半小时，匆匆和我会谈。我虽然不愿当汉奸的崽子，但是和德王还没有共过事，心里以为他是个不平凡的王公，所以带着参谋长和两个师长，并令副参谋长刘正中率领着二百兵组成仪仗队，到飞机场表示隆重欢迎。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海，"善邻协会"会长中岛和我的顾问下永，以及来到多伦的西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宍浦，也到了机场。德王乘坐一架四引擎飞机，里边除了司机还有五个带校级肩章的日本人。他拖着长辫子，在军号中走下飞机和日本人握手寒暄后，跟我开始了简短的谈话，因为我的顾问下永跟在我身后四五步地方偷听，使我们不能畅所欲言。

他首先问我"你的军队有多少人？"我不愿告给他真实数目，只对他说"有五六千人，没有好武器。"他又问我"有多少蒙古人？"我说："留在林西有一千七，带到多伦是少数，并且不是草地的蒙古人。"他希望我给他成立一团蒙古骑兵，做为他的警卫和建军的基干，他要派一个国民党军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前来训练这个部队。并且叫我越快越好，他等着急用，因为百灵庙没多少兵，怕傅作义前去袭击。他还问我"百灵庙吃紧时，你从多伦支援，几天可到？"我说："急行军三天可到。"他喜形于色地说："这可好了，我有了底了。"又说："关东军给我拨下五十万交通票，我已汇到天津。"我说："我不需要钱。你还有什么事？"他说："见到你以后，我放了心，我们今后要加强联络，这里有电台，我那里也有电台。"我说："电台是日本人的，咱们要直接联络。"他说："对的很，只是如何联络？"我说："你用'传箭'（蒙古王公有了紧急事，拿上令箭和公文叫牧民日夜传送），我用快骑。"因为飞机上的日本人催着叫他赶快走，我们的初次会见，就如此结束。

德王飞走以后，我和日本人一齐回到特务机关，浅海问我德王和我谈了一些什么

话，我把前半段告诉他，至于我和德王直接联络的事，当然不对他说。这天多伦特务机关为我和德王会见举行了宴会，日本人都因我和德王联合在一起而祝酒。可见德王路过多伦会见我是关东军的指示，我对此很感不安，恐怕在中间插进一个蒙古上司。

我答应给德王成立一个骑兵团，舍不得贴本，耍了一个手段，再让胡宝山从乌古廷那里往出拉兵，于是从林西跑来枪马齐全的六百多人，给德王凑了一个警卫团。乌古廷因部队跑的所剩无几，最后被伪满的“兴安军”踢出，在1936年春天，不得不离开林西到嘉卜寺投靠德王。德王派南京军校毕业的喀喇沁左旗人乌云飞，悄悄地从百灵庙来到多伦，训练了一个时期，带往嘉卜寺，后来由“蒙政会”的代理保安队长宝贵廷充任了这个警卫团的团长。我给德王成立起一团人，不但一文钱未给，而且自从见面以后，迄未按照我告给他的办法直接和我联络过。他以为我已经成了他的仆从，有事可以发号施令，根本用不着和我商量，使我很后悔。从此我把德王看成一个志大眼小的人，决定不依附他，未来的前途和出路还得指望自己的枪杆子去打。

占领察北六县经过

1933年8月，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宋哲元重主察政，察哈尔北部又恢复了7月间“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以前的那种状态。1935年，情况有所转变，先是一月间日寇派飞机轰炸赤城、龙关。二月间中日双方在大滩开会，决定二十九军的部队撤至长城底下驻防。在张家口外，也发生了年前的“第一次张北事件”和六月间的“第二次张北事件”，结果由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和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订立了中日双方驻军以长城为界的协定。因为我的伪军还没奉令南犯，二十九军对此不曾履行，这是由于《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人已把东北军于学忠部从河北逼走，想叫宋哲元暂时维持冀察两省局面，故在察北方面不好意思过于压迫二十九军。

我于1933年4月投敌，到1935年，和日本人相处了二年多，渐渐习惯了当汉奸的那种生活。后来，看到北平的何应钦向日本人屈膝，宋哲元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便产生了“老子是挂牌的娼妓，你们是半开门的婊子，咱们谁也不要笑话谁，都是些孬种”的想法。特别是1935年冬天和德王在多伦机场上会了一面，拿上“复兴民族”的大幌子，更给我的投敌做了遮羞布。所以在1935年12月，由多伦进犯察北六县的时候，我野心大增，想把察北完全占领以后，下一步去夺张家口，幻想如同我的汉奸老师张海鹏那样，过一过伪察哈尔省长的老瘾。

察北的战事于12月开始，在11月间就做了准备，我看见子弹不断由承德运来，便和人们说：“快打仗了。”因为多伦特务机关和我的日本顾问，只是在出发的时候给我下达命令，事前并不跟我商量，我也不敢打听，所以只好揣测。最初我认为是进驻百灵庙，因而我给官兵们买了好多毛鞋，把多伦街上的毛鞋完全买光。由于日本顾问掌握着经费，我是用卖了自己从热河带出的十几辆马车和一百多头骆驼的钱给官兵买的毛鞋。还有三百多兵出发以后因无毛鞋而把腿冻肿，都由前方抬回多伦，被特务机关长浅海看见。浅海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派田中隆吉参谋前来查办。经过调查，下永贪污了好几十万，进入张北以前即把他撤换，以后经费由我掌握，到了张北我开始有了钱。

当时察北六县，只张北驻有二十九军刘汝明的部队，其他各县只有警察和民团维持秩序。12 月中旬某日，多伦特务机关向我发布了南犯的命令，宝昌因为没有防守的价值，我们未到以前，当地警察民团即弃城逃走。根据便衣侦察，沽源城内有白风山所带的三四百民团据守，我为了夸功，诓报日本人说是有二十九军的一旅骑兵。独石口外最大的商镇平定堡，内有天主教堂，察北的地主富户都逃到那里，上边飘扬着比利时国旗，日本人怕引起国际纠纷，禁止我们攻打该地，所以决定只攻沽源县城。由宝昌出发时，下永顾问除了把八门野炮留下，保护二十多个日本人和四十多个蒙古童子军，并且叫我也不要上前线，指定参谋长陈宝泉，指挥刘继广和尹宝山带着两门山炮，掩护骑兵去攻城。我撇过下永顾问，和参谋长、师长及副参谋长刘正中说："下永支配我，小顾问支配你们，你们要听他们，有时也不要听他们，攻城时先用山炮打开豁口，骑兵再往里冲，把敌人轰跑以后，即不要追击。"参谋长陈宝泉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愁苦，我怕他们路上寒冷，给了他们一打威士忌酒，陈宝泉当时拿过一瓶就喝了大半，我把那半瓶酒抢过，他才勉强上了马，去追赶队伍。

防守沽源的白风山，在察北与曹凯齐名，虽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很热爱祖国，他把三门紧闭，将沙袋堆在土城墙上固守。沽源离宝昌九十里路，我的六千多骑兵，当天就到达城外，里边的三四百人毫不恐惧。我军于第二天拂晓发动攻击，陈宝泉没按我的指示指挥队伍，而是将沽源四面包围，两门山炮架在城西的小土山上，朝着城里的县政府乱打，结果把所带的 70 发炮弹打的剩下两发，也没有将城攻开。刘继广的兵在城墙底下喊话，叫里边缴枪投降，白风山的人当然不听这一套，我的兵一露头就被打。从多伦派来两架飞机助战，白的人亦不动摇。飞机往城内扔完炸弹，在城北扔下一个通信筒，松井顾问派兵把通信筒拣起，坐上卧车开到北门外边，到刘继广的指挥所进行研究，陈宝泉本来在西门外掌握部队，见有人拣起通信筒开上汽车到达北门外，他也骑着马跑到刘继广那里。刘的指挥所是三间土房，距北门有一箭之地，刘站在房檐底下，陈和松井竟在汽车跟前拆看信筒，遂被白风山防守北门的民团发现，朝着他们放了一排枪，子弹从陈宝泉的脑部穿过将松井的肩章打成粉碎。刘继广用火力压制住北门，才和松井把陈宝泉的尸体抬上汽车，后半晌运回宝昌。

我一见参谋长阵亡，当时就发了毛，将八门野炮全装上汽车，下永顾问没敢阻拦，两个钟头就开到沽源城外。因为天已昏黑，我叫把八门野炮摆在城北，决定翌日拂晓攻城，下令不许放走一个民团。夜里又想，不能在沽源充好汉，还是少杀中国人为妙，因此又叫刘继广放开东门，好让白风山撤走，能把沽源占领，就算交代了日本人的公事。第二天攻击时，八门野炮集中只打一点，各发了两炮，就将北城墙轰开，看见白风山的骑兵从东门跑出，才叫我的兵冲入。他们捉住十几个没有跑脱的民团，主张都弄到宝昌给参谋长祭灵，我不忍完全杀害，又怕日本人知道我故意放脱白风山，只把一个俘虏弄到宝昌，被二十多个日本人在陈宝泉的灵棚前用刺刀活活戳死。我占领沽源以后，康保、尚义和商都，都没有遇到抵抗，尹宝山部就开入。尹宝山并把一团人开进绥东陶林县城。陶林是绥远主席傅作义的地盘，因为兵力不够分配，集中队伍去防守集宁，才临时把陶林放弃。我不愿意两面作战，腹背受敌，认为占领察北是履行秦德纯和土肥原的协定，占领绥东五县还找不到借口。宋哲元已经和日本人勾搭，他弃守察北不会成为多

大的问题；傅作义抗日，我进犯绥东一定要惹麻烦。我通知尹宝山，叫他千万不要继续前进，建议下永顾问要趁势占领张北。大概是关东军叫我们看一看能否在绥东立足，让我和下永由沽源飞陶林视察。我们上午飞到陶林，午饭后，我趁出去解手时向那进入陶林的团长使了一个眼色，在厕所中和他说："傅军一来，你就往出撤。"我们回去和下永没有抽完一支烟，突然又来了一架飞机，叫我们两人赶快坐上，说到多伦有要紧事情研究。回到多伦特务机关，里边坐着关东军的参谋田中隆吉，他问我："李司令官！你对战局有何看法？关东军相信你，并且特别尊重你的意见。"我说："现在先要占领张北，把察北攻下再图绥东。"他说："这很对，我们也是这样打算。"当天浅海叫我把队伍都抽回来去占领张北。

我占领张北的时候，没有遭到二十九军的抵抗，他们事先就撤回张家口，连张北和张家口中间的大坝上，也没有布置队伍，所以我的骑兵一直冲到大境门外。我进张北是1935年12月31日白天，第二天是1936年的元旦。田中玖是元月初旬到的张北。

张北距张家口120里，中间有一道大坝，从张北往南走50里上了梁顶，再往南70里全是下坡。我在这个梁顶布置了一团人，警戒张家口的二十九军，并派便衣侦察其他情况。因为田中玖是我最初接触的日本人，我看成知己朋友，所以用不着等我要求，他便向关东军司令部替我说了好话。占领张北没有多久，便对我的部队真给装备起来，一次拨来1.2万支"韩林春"式步枪，三十多门野炮，三十多门重迫击炮，三十多挺重机关枪，一百多挺轻机关枪，还有日造的"拐把子轻机枪"四五十挺。

当这批武器在二月间由沈阳运来以前，田中玖曾开上自己的卧车去了大坝梁顶上好几次，他把汽车停下，张家口也开出一辆小卧车，我的兵以为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的，不敢制止，不敢盘问，只站在老远的地方保护他们的安全。我接到类似这样的几次报告，感到里边有重大秘密，便托在张家口经商的一个朋友王子玉替我了解从张家口开出的汽车里边坐着谁。原来，王开设着一个"东鲁汽车公司"，往来通辽和林西搞运输。我占领多伦后，"东鲁"的汽车也跟到那里，我占领张北后，又在张北和张家口之间开行。王是山东人，二十九军里有他的熟朋友。调查结果，知道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的秘书杜运宇和田中玖会谈，其他情况没有打听出来。杜也是山东人，在日本留学时娶了一个日本老婆，由于他很早就当了汉奸，所以张家口沦陷时曾代理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伪"蒙疆政府"成立以后，他一直担任司法部长。

由于刘汝明和日寇暗中勾结，关东军拨给我的武器，不是由沈阳经承德用汽车运来张北，而是用火车运到张家口，我派日本人驾驶的汽车接运。七七事变以前的弹药服装，都是如此的运法。所以给我拨的1.2万支步枪被刘汝明留下2000支，运到张北的30门野炮，也给刘汝明运回张家口八门。这时我的8000多人，一律都换上新枪，子弹堆满仓库，大概拨来2000万发。我叫尹宝山师驻在商都向绥东警戒，刘继广师布置在外围，保护张北县城。《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华北各重要城市都有了日本特务机关，张家口是由领事馆代替特务机关，归绥的特务机关长是羽山少佐，张家口的领事和归绥的羽山，均受张北的田中玖指挥。田中玖有时对我也吐露一些真情实况，在1936年3月间，就叫我准备进犯绥东。他说："德王已被傅作义从绥远撵出，对于察哈尔长城以南的地方，咱们暂不攻打，但是对于绥东则必须占领，这样你们复兴蒙古就有了地盘。

日本军队还不能出面参加，需要德王和你以及王英与冀东方面共同出兵，他们都没力量，进攻绥东以你为主力，关东军所以装备你就是为此，你要做出贡献。”

田中玖和我说了这话不久，有一天上午七八点，突然叫我跟上他和羽山少佐坐飞机到归绥上空侦察。这时傅作义以建筑环城马路为名，在归绥旧城构筑了国防工事，我们飞到旧城上空，飞机盘旋很低，我都能用肉眼看见碉堡，田中玖和羽山少佐均拿出照像机把底下的一切都拍入镜头。飞机飞到西河沿时，见一个女人在院子里挥动日本国旗，羽山笑着和我说：“这是我的老婆。”我们侦察完毕，往武川飞的时候，飞机发生了故障，便在归绥北面红山口以东的小尖山前面的平滩上落下。附近的老乡有好多人正在耕地，谁也不敢过去观看。傅作义因为标榜着“有事不怕事”和“无事不惹事”的对日主张，亦未派出骑兵来盘查。我们都很着急，田中玖和羽山跳了下去，寻找飞机的毛病，叫我坐在机仓中不要露面。好在飞机是丢了一个螺丝，修了半个多钟头，即继续发动，飞向张北县。

乌珠穆沁会议以前

我于1935年底进入张北后，到翌年4月24日“乌珠穆沁会议”决定将我的队伍改编为伪“蒙古军”前这一阶段，由于我把察北完全控制，日本人又给了那么多的武器，比在多伦时，渐渐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宋哲元想拉我过去，曾托我的团长陈景春向我试探，我怕宋哲元把陈拉走，占领张北后，即由刘继广部将他拨归尹宝山指挥，调到商都南壕堑驻防。因为宁得罪远亲，不得罪近邻，听见宋哲元在北平给他母亲过寿，我主动叫陈景春代表我前去祝寿，送了一架我亲手在围场打住的15两重的梅花鹿茸，宋赠了我一块价值400元的怀表。后来宋哲元说他子弹困难，我叫陈景春送到柴沟堡车站30万发，宋以为我倾向于他，故最后托陈景春对我劝降。

陈景春对我说：“宋主席对你非常钦佩，特地派代表来跟我接头，希望咱们和他们合作在一起抗日，故来向你报告。”陈景春比我年长，我说：“大哥！咱们暂不谈别的，我先问你，宋哲元能给我二十九军的军长吗？能给你扩充枪马齐全的一师骑兵吗？”陈说：“我头脑简单，没有想到这个。”我说：“宋哲元并不比我大，我也不见得比宋哲元小，他虽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在日本人跟前还不如我吃香，咱们要直接找老蒋，我不拐宋哲元这个弯。”陈景春问我：“难道咱们不抗日吗？”我说：“我叫你送给他子弹难道是叫他杀中国人吗？”我并说：“现在日本人正给咱们扩充，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到了一定程度和适当时机，我自有办法。你不要以为我和德王已经联合，这完全是扯淡，他们把我按汉人看待，我也以汉人自居。”我还说：“咱们现在是带着假面具，没有揭破就尽量装着，多装一天能多得到补给，到了装不住以后，再反正也不迟。有这一万枪支人马，谁也欢迎咱们，不要愁拿上一颗肥猪头找不见庙门。”陈景春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以后便不跟我谈论此事。

继宋哲元之后，傅作义也派代表来跟我接洽。因为察北沦陷和冀察两省“特殊化”以后，张家口成了一个策动侵犯绥东的地方，故傅把绥远省政府的交际处长刘云峰调到张家口担任办事处长。这个人很能钻营，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东鲁汽车公司”的经理

王子玉拉上关系。一天刘继广叫我到他的公馆中去吃饭，说是顺便谈一件要紧事情。我到了以后，看见王子玉和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也在刘继广那里。刘继广向我说："这是子玉的朋友，绥远傅主席的代表刘云峰处长。"刘指着地上堆的成箱整篓的糕点水果对我说："傅先生知道李司令官在察北非常艰苦，特派我来代表他向您问候。"寒暄过后谈到正题，我一听是傅作义闻听我和刘汝明弄了日本人很多武器，他因受阎锡山压制克扣，也想诓骗一些武器弹药，以扩充自己的力量，故打发刘云峰来向我"问道儿"。我说："羽山不是在归绥吗，你们可以和他直接去谈。"刘说："羽山是少佐，不如田中玖大佐在关东军说话有力量。"我说："你想和田中玖接谈，恕我不能给当介绍人，要找其他关系拉线，谈的时候应该张大口，数目越多越好，傅主席为了爱国走这条路，我对他很表同情。"刘云峰只见过我一次，我叫王子玉在张家口买了一些回敬傅作义的礼物。

由于我刚愎自用，除了主要依靠汉人给我扛着八九千枝枪，在政治上可以说非常孤立，故只好认贼作父。德王因1936年1月2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两个"蒙政会"的组织大纲，指定绥境"蒙政会"设于伊盟的伊金霍洛，察境"蒙政会"设于锡盟的嘉卜寺。并且因傅作义支持西公旗的石王，派兵占了乌拉山里边的梅力更庙，将倾向德王的依喜达克登尔大喇嘛击毙，给他很大的难堪。他因"蒙政会"分裂，不能在绥远立足，曾在我占领张北不久，在苏尼特举行一次所谓"滂江会议"。因为德王本人和其左右，从我和他开始合作以后，许多大事都对我回避，老瞒着我去搞，所以这次会议既没有让我前去参加，也未告诉我开会的内容。据我判断不外是更进一步投靠日本，撕破脸充当汉奸，企图坐伪蒙的傀儡儿皇帝。为了首先对傅作义进行报复，把已策划组织的伪"察哈尔盟"变成事实，好为进犯绥东做借口。他在召开"乌珠穆沁会议"以前，突然坐汽车跑到了张北。

在1934年金永昌和于兰泽到多伦策划组织伪"察哈尔盟"时，卓世海未敢担任伪盟长，现在他在百灵庙已经呆不下去，当我占领张北不久，卓就主动派人向我联系，说是想回家看看，试探我是否对他支持。由于我不是察哈尔人，他回来和我利害不冲突，故叫他放心回来。他于二月间到了张北，住在熟惯的商号里边，没有回镶黄旗，一直要等到德王到来。我不愿意替德王领导的这一帮蒙古人卖命，对于他们演的丑剧，只作旁观者。卓世海和我没谈别的，我也不对他打听一切，我们维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

蒋介石为了叫德王悬崖勒马，服从他的察绥分治主张，除了以救济察北和锡盟的雪灾为名，给察境"蒙政会"拨了八万元赈款，并派白云梯由南京来苏尼特劝止。因为伪"察哈尔盟"一旦成立，绥东五县就会发生问题。继派吴鹤龄和尼冠洲前来张北，阻止卓世海就任伪职。吴是喀喇沁人，尼是察哈尔人，白是跟着德王由苏尼特来到张北，吴和尼两人相随着由张家口来到张北，等到德王来到以后，他们两人才露了面。随德王来到张北的，除了白云梯，还有东苏尼特旗的郭王，布里亚特的迪鲁瓦喇嘛和"蒙政会"的包悦卿。德王住在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那里，他没有过来看我，也没叫我去看他，和他同住的还有由长春刚从飞机下来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白、包和郭王以及迪鲁瓦，都下榻到我的司令部，白和包是内蒙古的知名人士，郭王是个笃信喇嘛教的人，迪鲁瓦带领的布里亚特人那时正流浪在宝昌一带。

第二天伪“察哈尔盟”就要成立，晚上卓世海带着尼冠洲来见众人，尼的仪表和谈吐相当文雅，他说他不同意这个盟的成立，我才知众人这次来张北是专搞此事。尼说出此话，卓世海没有答理，郭王和迪鲁瓦因为听不懂汉话，都闭着眼睛念佛，白云梯和包悦卿亦不表示意见，我当然更不好意思打听。客室中沉默了一阵，我叫厨房给开饭，饭后卓世海和尼冠洲辞走，金永昌从特务机关来到，我问：“尼冠洲是何许人?”金说：“他是跑到南京的察哈尔部的一个总管。”来我这里的人都各怀着心事，郭王和迪鲁瓦打坐养神，包悦卿不住气地抽鸦片，我见白云梯躺在炕上无聊，便和他闲扯起从外蒙古往内蒙古运枪的往事，我并且很冒失地问他为什么由左向右转，他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我提起伪“蒙古自治军”的白云航，他说是他的弟弟。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众人叫我也去参加伪“察哈尔盟”的成立典礼。举行典礼的地方，在一个有三间土房的小院里边。这三间土房两明一暗，是特务机关叫我放的刘县长派人把住户撵走，做了未来的伪盟公署。我们走进外间，已经先到了二十多人，打开里间的门一看，德王和两个田中在说话，德王这才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不久卓世海来到，也走进去和他们嘀咕，我知趣地走出那三间土房，众人亦跟着我到院子里边散步。我发现二十多个人里边，有一个长着鹰鼻子的人，跑到墙拐角望着天上的白云沉思，我看见他的相貌长得非常阴险，由不得对他上下打量，金永昌走到我的跟前对我悄悄地说：“这就是吴鹤龄。”不久卓世海出来，叫众人进去开会，卓站在桌子后边，我们都站在桌子前边，卓宣誓完毕，两个田中和德王都来致词，伪“察哈尔盟”就这样成立，出来时门口已挂上了牌子。

这天德王的气色很不好看。我们送他和田中隆吉到北门外飞机场坐飞机回苏尼特时，他神经紧张地把我拉过一旁，对我说：“你给吴鹤龄弄五箱汽油，叫他赶快坐上我从苏尼特开来的汽车走，上边有15个兵保护，越快越好。”我知道这里边有问题，因为机场上的人很多。故未向德王打听，只说了一声“好吧”。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都没有走，我领上他们回司令部去吃午饭。饭还没有摆好，外边的卫士便来报告，说是有一个姓吴的人坐着一辆卡车前来，要五箱子汽油，我叫副官给搬去五箱，因为事情紧急，没有留下他和众人在一起吃饭。我们正吃饭时，西门的卫兵给副官处打来电话，问有一辆汽车要出城，允许不允许出去，副官处向我请示，我说：“不许拦阻。”原来日本的小顾问们给四门下了命令，不准随便放汽车出城，吴鹤龄因西门走不出去，改走北门，北门外是飞机场，汽车来往很多，才跟着好多汽车混出张北县城。

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以及尼冠洲，都于饭后乘商车回张家口，白云梯等都是在我司令部门口上车，尼冠洲因住在卓世海那里，是从街上上的车。我要出城送他们，白云梯等在门口拦住，都很沮丧地说：“你事忙用不着了。”他们这部汽车是包的商车，于下午一点多钟离开张北，到了三点多钟的时候，田中玖叫我和刘继广以及驻在张北的两个团长去特务机关开会。他说：“刚才开出张北的一部汽车，走在离城18里的地方被胡匪给抢了，还打死一个蒙古人，你们赶快派队伍去追。”我一听非常吃惊，不知被打死的是白云梯还是尼冠洲，总是他们因为阻挠伪“察哈尔盟”成立，遭了日本人的毒手。我们从特务机关出来，刘继广和两个团长问我：“追到什么程度为止?”我说：“追什么！出去绕一个圈就回来。”队伍开出去不久，我回到家里躺在炕上抽鸦

片烟，盘算当天下午发生的一些事情。突然田中玖的卧车开到，他亲自从车上扛下一捆日本的“将校呢”，气喘喘地走进我的卧室。他说：“这个给你，你给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做一套，这是关东军的赏赐，你收下吧。”我知道他是杀了一个蒙古人以警告其他蒙古人，又怕我带的大小汉奸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故拿上“将校呢”安慰我们。他再没提汽车被劫的事，我也装糊涂，扯了一些闲话，他抽了一支烟便辞走。

我对内蒙古这些所谓知识分子，虽然越接触越感觉他们滑头，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又关心起吴鹤龄的安全。便赶快给嘉卜寺的宝贵廷打电话，我知道田中玖的表弟草野谷在德王的警卫团当顾问，我怕吴鹤龄去苏尼特走进嘉卜寺遇害，叫宝贵廷派出人拦阻汽车，让吴鹤龄直赴苏尼特。宝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你们王爷叫我传达的命令。”果不出我所料，我刚吃过晚饭，便被田中玖叫到特务机关闲扯，直扯到三更天才叫我回家。因为嘉卜寺距张北县400多里，他怕我夜深人静给打电话，哪知道我在晚饭以前就通知了宝贵廷。我为此事一夜未曾睡觉，第二天就叫胡宝山给我调查汽车被劫的真相。原来张北的特务机关由我派出一排蒙古兵守卫，据守卫的兵向胡吐露，在伪“察哈尔盟”成立的那天下午，特务机关的日本人大杉，从他们排里挑出十个人，都带上武器上了汽车，外边用帆布盖着开出张北南门，去追赶那辆商车，追到小孤山附近叫商车停下，大杉问：“谁姓尼？卓盟长请你回张北去。”尼冠洲下了商车走到大杉跟前，当即被大杉掏出手枪击毙，让那辆商车继续开往张家口。尼冠洲是否也像韩风林那样脚踏两只船，我不很清楚，只是知道因为伪“察哈尔盟”的成立，他是最先流了血。

大杉带着十个兵打死尼返回张北，没停留多久，便继续开出西门去追吴鹤龄。吴鹤龄的车开得很快，大杉望见吴鹤龄的车距离嘉卜寺不远，才连夜折回张北。因为时在半夜三更，宝贵廷没有重视这事，根本没打发人拦车，所以吴鹤龄的车开入嘉卜寺。草野谷接到田中玖的电话，看见吴带着15个苏尼特兵，自己不敢下手，叫宝贵廷下手，弄得宝左右为难，直撵吴鹤龄赶快走。吴因疲劳不堪，又受了惊怕，知道在嘉卜寺相当保险，所以赖在宝贵廷的团部不走，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坐上汽车到了苏尼特。以后吴鹤龄任了伪“蒙疆政府”的政务院长，宝贵廷也升了伪“蒙古军”的师长。吴曾被人们目为伪蒙疆的宰相，但是他肚子里撑不开船，由于宝给他下过逐客令，故对宝始终怀恨在心。对我暗中搭救他也没有表示过谢意，认为我是德王的部下，应该对他进行保护。我就是在日本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和类似吴鹤龄的这一帮人共事，于1936年4月24日“乌珠穆沁会议”以后，参加了德王在嘉卜寺成立的伪“蒙古军政府”，在我的个人历史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罪恶阶段。

（1966年）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前后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

亲赴长春与关东军勾结

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蒙疆政权的正式开始。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蒙政会”，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并且蒋介石杀了我的得力干部韩凤林，令我非常不满，又加在西公旗事件和特税问题上，我与绥远当局的斗争也着着失败，使我更为气愤。因此，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我就和日本方面暗行拉拢，企图凭借日本的力量，扩充实力，以达成建立“蒙古国”的妄想。到了1935年冬，我便亲自出马，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这时我由百灵庙返锡盟苏尼特右旗，日本关东军特来电报邀我前往伪满新京（即长春）商谈要事，我即偕同迪力瓦、陶克陶和驻在我旗（苏尼特右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宍浦、中岛万藏等乘飞机前往，面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西尾参谋长。旋即和坂垣副参谋长、田中隆吉参谋等商谈，结果商定：日本帮助西部蒙旗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50万元和5000支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

我由长春返旗后，就和宍浦商量关于搞“独立局面”，成立统一机构问题。宍浦建议说：“现在日、蒙既经合作，统一机构必须从速建立，我看最好是进一步强化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因为这样做是承认已成事实，易于发挥统一指挥的作用。”当时我认为这事有和蒙政会委员长云端旺楚克（云王）研究的必要，就带了10万元前往百灵庙交到“蒙政会”上，作为扩编保安队之用，并向云王报告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云王说：“既然这样做了，就应本着‘怕就不做，做就不怕’的精神继续进行，但必须慎重从事，力求稳妥为宜。”接着我又说：“现在亟需成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一个办法是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一个办法是强化蒙政会，你看哪一个办法好？”云王说：“在你盟（锡盟）那边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联络上较为方便；在百灵庙这边强化蒙政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不大方便。”意思是怕傅作义反对。

我由百灵庙返旗后，适田中隆吉来和我商谈这一问题，我提出要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强调这是我和云王商洽所得出的意见。田中隆吉主张成立“蒙古军政府”，

---

* 作者曾任伪蒙古军政府总裁。

强调这个名称响亮，包括政治和军事，可以指挥行政和部队。讨论结果意见还没有统一起来，他就急于要走，说是主持进攻察东之事。我就着手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日寇策划进攻察东经过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军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进犯察东的借口，故意挑起了张北事件。扮演张北事件的主要角色的本信亲说："张北事件是多伦特务机关故意制造的，根据张家口领事馆与察哈尔省政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但在 1935 年夏，我和日本商人三名，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政府的护照，强要进城，守城士兵阻挡，不令通行，因而发生口角，被守城卫兵把我等押解到察省部队中看守。张家口领事馆得讯后，强调这是对日本人的侮辱，提出强硬的交涉。"经中、日双方进行谈判的结果，在缔结协定条款中规定宋哲元的正规军从张北、宝昌、康保、商都、沽源等县撤出，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一来，察东便成了"特殊化"地带。日本关东军就乘此机会，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促使李守信率队于 1935 年冬进犯察东。当进犯沽源时，当地保安队曾奋勇抵抗，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程云山击毙。李守信又加强兵力进攻，并有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助威，投弹轰炸，当地保安队终因兵力单薄，陆续撤退，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六县，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进驻张北县城。此时需要建立行政机构，统辖所属旗县，当由我以"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扎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并定于 1936 年 1 月 1 日举行"察盟公署"成立典礼。

白云梯、吴鹤龄之来

这时国民党中委白云梯落选，政场失意，潜住天津，想来蒙地活动。住在我旗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宍浦，特派中岛万藏乘坐飞机，前往天津把白云梯接到我旗，意在拉他下水，以资号召。吴鹤龄也因活动国民党中委未成，欲来蒙地活动。但吴鹤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好脚踏两只船，特去面见参谋总长朱培德说："听说德王已和日本拉上关系，蒙政会那边情况可能有变动，我想去一趟，劝说他不要胡闹，别上日本人的当。"朱培德当时将他这一套活动转达了蒋介石，蒋即召见吴鹤龄说："你要去蒙地走一趟是可以的，但务要随机应变，能够设法制止日本西进更好，如不能制止时，能够设法使其缓向西进就行。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完成了你此行的使命，也算你的一项功劳。"（这段话是吴鹤龄在日本投降后，才告知我的。）于是吴鹤龄便与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委尼玛鄂特索尔（尼冠洲）衔着蒋介石赋予的使命，离南京北上。他们到达北平时，我正在百灵庙，曾接到吴鹤龄要来的电报，我复电欢迎他速来，就返归我旗。

陶克陶特向我报告说："曾说吴鹤龄来，要从中破坏蒙、日合作，日本方面决定要处置他。"我听到陶克陶报告后，就去特务机关找宍浦说："我听说你们有处置吴鹤龄的计划，千万不可这样做，因为吴鹤龄是我叫他来的，希望他帮助我们工作，你们要处

置他，对于以后蒙古人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影响不好。”宍浦答复我说：“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们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决不处置他。如果蒋介石的蓝衣社派人把他杀了，可与我们无关。”我觉得宍浦的话仍有杀害吴鹤龄之意，遂将此事告知迪力瓦，希望他出些主意。迪力瓦很郑重地提醒我说：“吴鹤龄曾与你意见不和，发生过冲突，如果这次被日本人所杀，外界可能怀疑是你所为，你就有口难辩，怎也洗刷不清了。务要从速电知吴鹤龄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张北，你好从中保护。”我很以迪力瓦之言为是，即给吴鹤龄去电报，约定务于一日正午12时即“察盟公署”举行典礼时到达张北，万勿有误。迪力瓦旋又向我叮咛嘱咐说：“你仅约定时间在张北与吴鹤龄见面，以便从中保护，我认为还不够周密，应该派可靠的人率同卫队前去保护，接他来王府才妥当。”我遂又派李秀山率同卫队乘坐大汽车一辆，前往张北保护吴鹤龄，并接他来我旗。我即偕同达密林苏龙，乘坐飞机到达张北，这时尼冠洲已先期到达，吴鹤龄果也如约前来。见面之后，我很想把日本人方面预谋杀他的消息告知他，但这时李守信、卓特巴扎普和田中玖（日本人）等都来和我周旋，我又去李守信的部队中送去劳军费一万元，紧接着又参加了“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总未得到机会和吴鹤龄个别密谈。举行典礼后，我又催促吴鹤龄速赴我旗，吴还强调说：“你知道我是一向素食的人，虽然带有厨子来，还得整理一下用具，忙什么要走呢?”我很着急地触动他的衣襟说：“现在你要听我的，我叫你走，你就快走，万勿延误!”尼冠洲在旁也劝吴鹤龄说：“德王爷很诚意地劝你走，你就走吧，不要固执啦。”谈至此，我即赴飞机场乘飞机返旗。

吴鹤龄也在李秀山率队保护下，偕同张绍庭、于宝恒等乘坐汽车起程，到达城门时，因未持出城许可证，守城警兵拦车不准通行。吴鹤龄当即派员到“察盟公署”托请尼冠洲取到出城许可证，守城警兵始验证放行。车开出张北几个小时，天又傍晚，快到化德时，见后边有汽车灯亮，似在追赶，因吴鹤龄所乘汽车速度较快，后边汽车灯光不久就看不见了，当晚宿于化德。

这时宝贵廷正率一团士兵驻守化德，他的日本顾问烟草谷，接到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扣留吴鹤龄的密令，即催促宝贵廷执行。宝贵廷婉言拒绝说：“吴鹤龄不是到别处去，而是到德王府去，德王并派有卫队保护，我不能下手扣捕，如果非要扣捕他不行，可以迳向德王交涉。”烟草谷见宝贵廷不执行，急得直跺脚说：“这是特务机关长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要受到处分，非执行不可。”宝贵廷说：“我如执行这个命令，无法向德王交代。并且吴鹤龄跑不了，要抓他很容易，何必急于在此地扣捕。”烟草谷见宝贵廷坚不执行，虽然十分着急，但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才伸入西蒙，尚须尊重蒙系军官的职权，迁就宝贵廷的意见，不能以顾问资格直接指挥士兵，他手下虽有几个亲信随从，也不能把拥有几十个卫队的吴鹤龄扣捕，遂即作罢。吴鹤龄却得在化德安全渡过一宵，翌晨乘车到达我旗。我当即安排他住下。

吴鹤龄到我旗第二天，我把接到尼冠洲被杀的电报转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特来见我说：“我在南京已给蒙政会要下十万元的建设费，本想领到后再来，但是接到你的电报，嘱我不要候领十万元，务要从速前来，这次又这样地保护我，你把我看得比十万元还重要。”他这样来表达他对我感谢的心情。我当即安慰他说：“这是我很需要你帮助的，所以希望你从速前来。这次对你略尽保护之责也是应当的，何必感谢，今后希望

你安心居住，不要顾虑。”

尼冠洲被杀事件经过

尼冠洲是明安旗的佐领，为卓特巴札普的得力助手，时常代表察哈尔盟到外边进行联络。尼为人擅长辞令，善于交际，好作政治活动，因此名望逐渐提高，成了察盟中头角峥嵘的知名人士，在国民党政治场合中，都视他为蒙旗地方上有力人物。吴鹤龄一向同他过从甚密，引为知交。他当选国民党中委后，吴鹤龄当然更和他拉近，以资互相支援。吴鹤龄衔蒋介石使命，前来蒙地活动之事，可能是与他共同商量后所作的，所以，他们二人一同离南京北上。到达北平时，尼冠洲还以新当选国民党中委资格，对来访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此次来蒙，是为了宣抚蒙旗归向中央，因此，就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当他来到张北后，卓特巴扎普倚为自己的惟一臂助，委以“察盟公署”总务厅长之职。日本方面也知尼冠洲是“察盟”的有名人物，拉他下水参加“察盟”工作，在政治上可能引起一定的作用，也同意他任此职。尼冠洲因新当选国民党中委，当然倾向国民党中央，表示推托不就，却劝说卓特巴扎普勿受日本人愚弄，要有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参加“察盟”会议上，提出很多为日本方面所不愿接受的问题，更引起日本人的嫉恨。

据吴鹤龄对我说：在参加“察盟公署”成立典礼时，尼冠洲指着成吉思汗遗像前所供的九只羊说：“我们蒙古人所能决定的就是这九只羊供品，其他一切都是日本人所做的，都受日本人操纵把持，我看你跟我回到张家口过年去吧。在此地能够干什么。”假如这话为日本方面侦知，当更对尼冠洲嫉恨在怀，定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我从陶克陶的报告中，仅知日本特务机关要处置吴鹤龄的消息，不知有杀害尼冠洲的阴谋。同时我更认为，尼冠洲有卓特巴札普的保护，不致发生意外，所以只顾保护吴鹤龄的生命，没有注意尼冠洲的安全。在我返旗后不几日中，白云梯借故要去张家口，尼冠洲也要返回张家口渡春节。白云梯之走，虽未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尼冠洲返张，却招致日本方面的怀疑。认为他从中破坏“日蒙合作”，会泄露机密。日本特务机关遂决心暗下毒手杀害他，预先派出警兵，换穿便衣，冒充土匪，在万全坝上埋伏等候。当白云梯和尼冠洲分乘汽车先后到达万全坝上时，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持枪拦住走在前面白云梯所乘的汽车，打开车门，略加询问，即行放过。接着又持枪拦住尼冠洲和梁芝祥所乘的汽车问道：“哪位是尼委员?”尼说：“我是尼委员。”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又说：“请尼委员下车，我们有话说。”尼遂下车，当即被一枪打中要害身死。这几个冒充土匪的人，遂弃尸道旁，扬长而去。对梁芝祥却未加追问，仅受一场虚惊。后来梁芝祥对我谈述这个惨案经过时，犹有余悸。

尼冠洲被杀后，外界曾有谣传，说尼冠洲当选国民党中委后，蒋介石曾召见他，告知对日进行妥协计划，叫他北来和日本方面暗中接洽进行，嗣又怀疑这个人不可靠，深恐泄露机密，遂又派蓝衣社人员将尼冠洲刺杀，以资灭口。据我推测，这个谣传是日本特务机关故意散布的烟幕，掩盖他们暗杀尼冠洲的阴谋。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不但用阴谋毒辣手段，把尼冠洲置之于死地，而且散布阴险欺诈的烟幕，以欺骗、愚弄蒙古人。

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察盟公署”虽经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不能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为了成立统一的指挥机构，我从张北返旗后，就从百灵庙“蒙政会”调来中坚干部超克巴图尔（陈绍武）、赛吉尔胡（丁我愚）、玛哈希力（赵文儒）、乌勒吉图（张秉智）、札拉嘎木吉（白景畲）和原在我旗的陶克陶、金永昌、于兰泽、补英达赖、郭尔卓尔札布等，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工作。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经查对《王公表传》，这年正是成吉思汗七百三十一年），制定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象征的“蒙古旗”，表明脱离了中国的辖属，走上“独立自治”的道路。实则是走上背叛国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

经过积极筹备就绪后，即定于1936年旧历正月十八日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典礼是在我的王府大蒙古包中举行的，一切都仿照成吉思汗大祭的仪式，在大蒙古包中正面悬挂起成吉思汗遗像，遗像上面挂着很长的哈达，遗像下面供桌上摆着九只整羊及其他供品等物，蒙古包门上交叉竖起两面“蒙古旗”。典礼开始时，规定一律实行叩拜礼。我率领蒙古职员向成吉思汗遗像行了叩拜礼后，参与典礼的日本人宍浦、前川等也跟着行了叩拜礼。我看到这种情形，真是得意忘形、欣然自得，便向坐在我旁边的郭尔卓尔札布说：“你看日本人都向我们祖先磕头了！”行礼后，我就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孙的资格宣读“誓辞”，“誓辞”的主要内容是：“我誓愿能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我宣读誓辞后，本来预定由关东军西尾参谋长代表日本方面致“祝词”，只因这天降雪甚大，天气不佳，他没有及时赶到，暂行宣布散会后，西尾才乘飞机来到我旗，乃再召集职员开会，西尾遂当众宣读“祝词”。祝辞大意无非是“日蒙携手，亲密合作”等语。但他“祝词”中所提到的是祝贺成立“蒙古军政府”，不是祝贺“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这又说明在名称上还没有统一起来，仍然“各行其是”。西尾致“祝辞”后，就摆上全羊席招待他，宴会后，他就乘飞机走了。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我就责成陈绍武等制定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和安排主要人事。因甚感人手不足，特从伪满约来仓都仍（包海明）、瑙门达赉（高庆春）、图木勒巴特尔（刘定一）、恩和阿木尔（包崇新）等，由北平约来特克希卜彦（王宗洛）、莎彦毕勒格图（陈靖寰）、那苏图（王庆三）、忽克金（陈化新）等。在组织大纲中，规定“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首领为总司令，大家推举我担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下设军务、政务两部和一个秘书处，另外还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负“指导”军事、政治之责。军务部长派李守信兼任，其下设一、二、三课。第一课课长敖云章（未到任），第二课课长王宗洛，第三课课长于兰泽，分管军政、军令、军法、军械、军需、参谋、作战等事项。政务部长由我自兼，其下设内务、财政、文教三处。内务处长金永和，财政处长包悦卿，文教处长郭尔卓尔札布，分管民政、礼俗、宗教、文化、教育、财政、交通、实业等事项。秘书处处长补英达赖，下设一个秘书室和文书、人事、会计、经理四科。机要秘书陶克陶，秘书陈绍武、丁我愚，文书科长赵文儒，人事科长张秉智，会计科长旺尔克札布，经理科长孟昭义。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文教顾问崛井德五郎。这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概

况和主要人事阵容。这时吴鹤龄因日本方面还不谅解，没有派他担任重要职务。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首要的工作是招募士兵，扩编军队，除派宝贵廷、乌云飞赴卓、昭两盟继续招兵外，并派包悦卿赴哲盟招兵。其次，因是年锡盟大雪成灾，成立了雪灾救济委员会，以郭尔卓尔札布为主任，发出通电呼吁救灾，募集救灾款。这年冬末春初之际，降雪甚大，天气奇寒，平地积雪尺余，草原多被覆盖，水井为之冻结，牲畜遭受冻饿而致死者甚多，牧民生活受了很大影响。因此，一面派员赴伪满募集赈款，一面通过“善邻协会”在日本国内募捐，并用“雪灾救济委员会”名义，向国内各界呼吁救济。结果从日本和伪满方面募到赈款二十余万元，从国内募到赈款四万多元，由赈济委员会华北方面负责人何绍南，亲自送到百灵庙“蒙政会”者一万余元。关于这项赈款的使用，我采纳了吴鹤龄的建议，决定集中使用，不可分散救济。所以这项救济款并未用在救灾上，以后由吴鹤龄把持，用来作为毫利希亚（蒙语，其意为合作社）的资金，不仅吴鹤龄借此大发其财，就是他的手下人罗厉甫、戴宗元也成富翁。罗厉甫在北京广置房产、大开商店，成了有名的罗二爷。

日本特务机关长浅海

这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换成了浅海少佐。这个人飞扬跋扈，粗暴蛮横，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充分暴露出来，居然以征服者神气出现，对我指挥命令，毫无礼貌，对蒙古族职员更是采取高压手段，见面非打即骂。大家初则避之，不敢挫其锋，继因浅海的蛮横态度，有加无已，均表不满。有一次在冰天雪地中，浅海召集全体职员讲话很久，冻得大家手颤腿战不能支持，接着他又进行考试，就地出题，限时答卷，看见有的人站立姿态不稳，就掴耳光，或用拳头猛捶其胸，简直把蒙古族职员当牛马看待。由于浅海对人的态度蛮横，引起大家的极度愤慨，纷来向我表示不能忍受浅海的侮辱。有人提出：这是复兴蒙古，还是出卖蒙古？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还是裕仁的奴仆！要求离职回家，不愿在此地工作，以免时遭侮辱。有的主张与浅海抗争，不要示弱。我与陈绍武等研究对付浅海的对策，认为浅海的态度蛮横，定有接近他的蒙古族人为之出谋划策。而当时通晓日语接近浅海的蒙古人中只有金永昌和陶克陶二人，并认为陶克陶还在青年，不无一点血性，不致出此下策；而金永昌一向对浅海低声下气，表示恭顺服从，并常为浅海当蒙语翻译，宣扬浅海的好处，他可能对浅海献策：在日“蒙”合作开始时，应当用高压手段和严厉态度，对待王公和青年，以树立威严，便于今后压服、控制。陈绍武向我建议，为了对付浅海的蛮横，安定大家的情绪，一方面在金、陶二人之中，必须拉一个、打一个，陶克陶虽是关东军的“嘱托”（日语原意也为委托办事，但在此是一个职称，指专为日本特务机关搞特工），毕竟还是青年，易供你的驱使，而金永昌老奸巨猾，不易受你的驾驭。为今之计，应当拉陶排金，并向陶克陶说明我们团结起来是反对浅海，不是反对日本，叫他向关东军反映浅海的粗暴蛮横，影响“蒙、日合作”甚大，应当从速调离其职务。另方面，并应召集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号召大家“加强团结，努力民族事业”。我很以陈绍武的意见为是，表示同意这样做。同时我对浅海的做法和金永昌的行为，也是不满的。因为我原来是妄想利用日本的势力，实现我的“统一蒙古”、掌握大权的野心，还以为自己不是日本的傀儡呢。金永昌在浅海面前

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我很看不起他，对于陶克陶却有好感，因他曾向我透露日本特务机关谋杀吴鹤龄的消息。对于浅海的做法和态度我更是不满意的。他任我旗特务机关长后，曾去乌珠穆沁右旗面见索王说："今后蒙古的事情完全由德王负责去做，希你不要从中阻挡。"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对索王的恫吓，对我的支持，但我认为他这种说法很不妥当，因为索王一向对日本没有好感，不愿与日本"合作"。经我采用很多办法，才说动他同意"蒙、日合作"。我认为对他应当迁就和尊重，以资号召，不意浅海竟出以威胁恫吓之意，这会使索王怀疑浅海对他的恫吓是出于我的教唆，会离间我和索王之间的感情。同时我也感到浅海的态度非常蛮横，对我毫无礼貌，动辄指挥、命令。因此，我就同意了陈绍武拉陶排金、反对浅海的建议，由陈绍武拟具一个以"加强团结，拥护领袖（指我），内除奸细（指金永昌），外抗强权（指浅海）"的誓辞，在我王府的西跨院房内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张挂成吉思汗像，备有奶酒。计被邀签名参加者有陶克陶、陈绍武、丁我愚、赵文儒、孟昭义、刘定一、包崇新、白景畲、王庆三、张秉智、包海明、高庆春、吾力吉卜林、陶克托胡（陶布新）等。首先由我发言，大意是"忠心为蒙"，不畏强权等语。继而宣读誓辞，由参加者签名划押后，面对成吉思汗像，举手宣誓，痛饮奶酒，大有歃血为盟之势。会后我切嘱大家，必须严守秘密。

经过这次会议，果然得到了效果。一般干部便由动摇中安定下来，对浅海的蛮横态度，多置之不理，有时也起而抗衡。浅海对人的态度也较为缓和。迁至化德时，日本关东军即将浅海调走，另派田中玖为特务机关长。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很大错误，并有罪恶。我投靠日本，浅海就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当即招致蒙古族青年的不满。我搞的所谓"独立局面"，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这本来已经值得我深思和觉醒，但我为政治野心所驱使，正在陶醉于"蒙日合作"之中，认为浅海既然态度蛮横，换一个态度温和的特务机关长或可好一点。结果赶走了态度蛮横、做法强硬的浅海，换来了一个貌似温和、手段毒辣的田中玖，还是照样执行侵略蒙古的政策。我运用召开中坚干部秘密会议宣读誓词的方式，麻醉了蒙古族青年，使大家从动荡中安定下来，跟我一同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既误了很多蒙古族青年，又断送了西部蒙旗，真是罪莫大焉。

二

在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苏尼特右旗成立后，由于僻处牧区，交通不便，指挥失灵，非常影响工作的进展。并因人口稀少，物资缺乏，房屋不多，在供应和居住上多感困难。而且我曾听到田中隆吉说过：西尾参谋长参加典礼后说，西苏尼特旗这个地方，人口稀少，一片荒凉，怎能成立"蒙古军政府"。这时吴鹤龄也向我建议："既然日本关东军喜欢'蒙古军政府'这个名称，我们就成立'蒙古军政府'吧，何必强调非叫'蒙古军总司令部'不可，弄得在名称上不一致！"同时我感到，关于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之情形、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均有向各盟旗报告和讨论之必要，于是就责成吴鹤龄拟具成立"蒙古军政府"和建立"蒙古国"草案。在

建立“蒙古国”草案中，特别强调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要以原有盟旗（包括东、西盟旗）为领域，以葫芦岛为海口。恰好这时田中隆吉又来我旗，我就将建立“蒙古国”草案交给他，请他转交关东军研究并帮助实现。当时他把这个草案随手放在衣兜里，可能未向关东军反映，后来到了化德，他又把这个草案原封未动地交给我说：“此事以后再说，现在应当集中力量打绥远，只要把绥远拿下来，建国问题就随之解决了。”

我和吴鹤龄等研究，为了讨论“蒙、日合作”及今后如何开展工作问题，急需召开一次有西盟全部盟旗参加的“蒙古大会”，并为了迁就索王能够亲自参加以资号召起见，决定1936年4月24日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这样决定之后，就以“蒙古军总司令部”名义，下令锡、察两盟各旗扎萨克和总管，务要亲自参加；以“蒙政会”名义，通知乌、伊两盟各旗及阿拉善、额济纳、土默特等旗，派主要人员参加。届时到会参加者，计锡盟有我和索王、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林沁旺都特、巴拉贡苏隆、索特那木道尔吉、多布敦、道尔吉、桑都克道尔吉、贡桑等。察盟除察西四旗未派员参加外，察哈尔东部八旗都参加了，计有卓特巴扎普、特穆尔博罗特、哈斯瓦齐尔、色楞那木济勒、穆克登宝、补彦、阿由尔札那、萨穆丕勒诺尔布等。乌盟参加者有沙拉巴多尔济、葛什克达赖等。并把在“蒙政会”秘书厅任科长的伊盟达拉特旗人那逊德勒格尔约为伊盟代表，把在“蒙政会”实业处任科长兼参议的额济纳旗人苏宝丰约为额济纳旗代表，还把阿拉善旗前来“蒙政会”洽领枪械的陈那逊巴图约为阿拉善旗代表。李守信、吴鹤龄、金永昌、于兰泽、陶克陶等以“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军政首脑资格参加。这时吴鹤龄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特利用他的岳父于华亭（是卓盟喀喇沁右旗闲散王公，曾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与索王的旧关系，尽力说劝索王同意和日本“合并”，亲自参加大会。索王非常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但这时看到“蒙日合作”已成事实、就听从了吴鹤龄的劝说，同意了我的做法。我听说索王曾向他旗的协理图桑阿表示说：“现在已做成这个样子了，德副盟长这样做自有他的见地和他的道理吧，今后我们不必干涉他了，任凭他放手去做吧。”

吴鹤龄在大会筹备工作上，出谋划策，审查提案，表现得特别积极活跃。在部分代表到达之时，他曾和我说：“代表已经到了大部分，不能叫他们闲着，闲着就要出问题，应当召集他们开会，招待他们宴会。开会宴会，宴会开会，这是我在南京跟国民党学到的一套办法。”因此，他就和到会的代表们整天开会，讨论问题。迨到代表们到齐举行预备会议时，推选我和索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沙拉巴多尔济为主席团，吴鹤龄在大家推举下担任大会秘书长。他在掌握会场、进行讨论、通过议案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预备会议上，先酝酿协商主要议案，次又有人提出如何筹措军政各费。吴鹤龄主张，可向日本人借款1000万元，作为军政各费。这样协商和安排后，就在索王大蒙古包中举行正式大会，首由索王作简单的发言，说明召开此次大会的意义。继由我报告和日本关东军接洽的经过，“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及改元易帜的情形。接着就讨论议案，最主要的有下列各案：（一）关于建立“蒙古国”和先在嘉卜寺（化德）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案；（二）关于实行征兵，扩编军队，组织“蒙古军”案；（三）关于实行统制经济，开发资源案；（四）关于成立蒙古

生计会，组织救济新村案。因在会前已经酝酿成熟，都顺利通过。嗣由吴鹤龄宣读察盟代表中提出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由察盟划出归由“蒙古军政府”直辖案。卓特巴札普提出异议说：“化德是察盟统辖的一个县，是谁未经我这个盟长同意，竟敢‘张松献地图’，提出这个议案来！我是不同意的。”吴鹤龄看到这种情况，马上把原文又念了一遍说：“这个议案没有人正式签名盖章，应当另议。”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这个议案就暂时搁下了。

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乘飞机赶来参加，我向田中隆吉作了个别谈话说：“索王等最不愿意的是怕你们派来顾问，过问蒙旗行政，希你以来宾资格在大会上讲话时，说明现在派来的日本顾问是帮助蒙古筹备建国，以俟工作就绪，就将派来的日本顾问一律撤回，决不干涉旗政。”田中隆吉果然照我的嘱咐，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将带来的八音子手枪多支，分赠各盟旗有实力的代表，以资拉拢。接着我们又向田中隆吉提出，向日本借款1000万元问题。他答复说：“你们蒙古有石油矿吗？如有石油等矿源时，借款1000万元那是容易办到的。”从他这几句话里，充分透露出，日本帝国主义要把蒙古作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投资赚钱的殖民地的阴谋。

田中隆吉在大会中看到吴鹤龄的活跃情形和所发挥的作用，对他非常重视，很想拉他为日本做些工作，曾向吴鹤龄说：“我们日本人中，曾经有人主持杀了尼冠洲，我认为这件事做错了，希你不要因此有所顾虑，今后应当放手进行‘日、蒙亲善’工作，我想请关东军给你一个‘嘱托’，你的意向如何？”吴鹤龄推托说：“这是你对我的关照，但我对此没有什么意思。”田中隆吉当下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在面部上表现出不甚愉快的神色。

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选举，选出云端旺楚克（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伊盟盟长莎克都尔札布）为副主席，参与大会的代表都在“选任状”上签名盖章，表示郑重，当晚即以全羊席招待田中隆吉、横山顺和参与大会的全体人员。会后由我率领一部分代表到百灵庙把“选任状”送交云王，并请他今后主持指导工作。云王表示：“我是年老力衰，德薄能鲜，深蒙大家推戴，无限感奋，希望大家共同去做，特别希望德秘书长（指我，我是蒙政会秘书长）多负责任。”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准云王辞去“蒙政会”委员长职务，调任国民政府委员，“蒙政会”由副委员长索王执行委员长职务，实际上由我负责。

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第一次的“蒙古大会”召开后，我即派王宗洛率同职员数人前往嘉卜寺接收化德县房屋，进行筹备伪蒙古军政府工作。不意化德县小林顾问拒绝腾房，发生了波折；嗣经与化德县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交涉，才把小林顾问的气焰压下去，开始腾房，进行修理。经筹备就绪后，就于1936年5月12日举行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典礼。参加典礼者除各盟旗代表和前“蒙古军总司令部”职员外，日本方面参加者有日本关东军今村参谋副长，田中隆吉参谋，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举行升旗典礼时，首先由我讲话，说明依据“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成立“蒙古军政府”的意义。继由今村致“祝辞”，祝贺“蒙古军政府”的迁移，强调“日、蒙亲善”，协同一致，

完成“蒙古军政府”所负之使命。礼成后，即大排宴筵，招待日本来宾及各盟旗代表。

伪蒙古军政府人事安排，依照“蒙古军政府”组织法规定，由云王、索王、沙王以正副主席名义，任命我为总裁，负实际责任，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总裁下设一个办公厅，参议、参谋两个部，军事、财政、内务、实业、教育、交通、司法、外交八个署，一个顾问部。办公厅主任补英达赖，军事署长王宗洛，财政署长德古来，实业署长王揖唐，内务署长索特那木道尔吉，交通署长于兰泽，司法署特穆尔博罗特（特大海），外交署长陶克陶，教育署长金永昌，后将金永昌调任驻伪满代表，由郭尔卓尔札布继任教育署长，参谋部长李守信兼，参议部长吴鹤龄，顾问部主任顾问村谷彦治郎，军事顾问山内，财政顾问稻茨，外交顾问山本倍亲，教育顾问崛井德五郎等。嗣因总裁工作繁剧，又设四个帮办，由李守信、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等担任，帮同我处理军政事务。并派陈绍武为内务署帮办，吉致祥为教育署帮办，帮同署长处理署务。后又增设一个侍从处，由丁我愚为少将侍从处长。乌古廷由伪满来蒙后，暂派为参谋部主任参谋。这是伪蒙古军政府的主要人事安排。

组织伪蒙古军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首要的是搞军事工作，就是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由我亲自主持进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际工作。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由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以及在锡、察两盟各旗征到的士兵，重新编为两个军，八个师，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宪兵队。伪第一军军长李守信，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计第一师师长刘继广，第二师师长尹宝山，第三师师长王振华，第四师师长宝贵廷，直属炮兵队长丁其昌。伪第二军军长由我自兼，统率五、六、七、八各师，计第五师师长依恒额（依绍先），第六师师长宝彦图，后由乌云飞（突布格尔勒）继任，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第八师师长包悦卿，后由札青札布继任，警卫师师长雄诺敦都布，后改为第九师由包海明继任师长，炮兵团团长王云五，宪兵队队长刘建华（那木尔），预定全部都是骑兵，总兵力约达一万余人。并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特在我旗东营盘成立伪蒙古军官学校，由我自兼校长，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族青年，进行训练。

为了考验部队训练成果，特于是年九月间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计参加被检阅的军队，除伪第一军派来部分部队外，伪第二军所属各师大部参加。由我亲自检阅部队分列式。日本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也来参加检阅，表示满意。坂垣旋即乘坐飞机分赴伊盟札莎克旗和阿拉善旗定远营，说是去见沙王和达王（达理札雅），做拉拢工作。我检阅部队后，赏给士兵每人银洋一元，以资鼓励。并事先派兵打来黄羊多只，就地野餐，表示慰劳。我参加阅兵典礼后，回想在国民党政府隶属之下，等于讨饭，今天要上几支枪，明天要上几门炮，仅欲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能。这时凭日本的力量，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如再扩而充之，虽不敢妄想恢复成吉思汗伟业，也妄想把“蒙古民族复兴起来”跻于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我自己也作一个“民族英雄”。幻想及此，真是自鸣得意，喜形于色，有些飘飘然了。

但在得意之中，不如意的事情也就随之而来。首先是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以伪

第一军经费不足为借口来威胁我。有一次他带着伪第一军的参谋长刘星寒前来见我，说是军费不足，叫我设法筹措。我知他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就赌气把伪第一军的经费都批准了，并增批了一些军费，反责成他也设法筹措。他看我面有愠色，也带着不耐烦的神气，一声不响地走了。又因伪蒙古军政府成立了公路局，任命张绍庭为局长，负责办理化德至张家口及各旗县之间的运输。一般商人都愿搭乘公路局的汽车，不愿搭乘日本“满铁”的汽车，以致“满铁”汽车公司生意冷淡。田中玖为了使日本人经营的“满铁”汽车公司垄断交通运输，赚取高额利润，曾向我提出不供给公路局汽油，由公路局自行购买，想用这个办法，迫使公路局停办歇业。我当时认为在张家口还能买到汽油，因而置之未理。不久田中玖走了，田中隆吉来了，才又供应汽油。更因我这时比较信任陶克陶，不信任金永昌，金永昌便和田中玖拉得很近，说我和陶克陶的坏话。

记得陶克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田中隆吉有一次把我叫去，正言厉色地向我说：‘田中玖说金永昌曾向他反映过，说你曾向蒙人表示，蒙古为了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合作。现在你说这话可不行。’我当时答复田中隆吉说：‘这话是前在多伦时，和金永昌等研究蒙古问题时说的，是在蒙、日未合作以前的话，不是在蒙、日合作之后说的。’田中隆吉反嗔作喜说：‘那时说的没关系。希你不要顾虑，我是信任你的。’”

陶克陶述说这话之后，又感慨地说：“我们的金永昌先生真厉害，如不是田中隆吉谅解我，我可能就遭田中玖的毒手了。”这又说明，田中玖是想用打击陶克陶的手法，去掉我的助手，给我颜色看，幸亏得到田中隆吉的谅解，才归无事。但这不是田中隆吉比田中玖好，而是因陶克陶这时确实成为田中隆吉忠实的走狗，绝无另走外蒙古路线的意图，所以田中隆吉故意把这套话告知他，叫他感恩图报，进一步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其次，令我不如意的事还有：（一）因为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多是土匪、地痞、流氓、游手好闲之徒，纪律不好，在举行阅兵典礼时，竟在化德街上发生了抢案。士兵打人骂人之事，更是层出不穷，给当地人民造成不良印象。（二）在编制和配备上，各方意见很多，争要军马，争要装备，例如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是察盟人，利用地方上的关系，先购足了军马，第五、六两师的人就表示不满说：“我们师是先编制的，反而军马不足，有的部队仍在徒步。而第七师是后来编成的，却配备了足够的军马，很不公平。”意见纷纭，烦言啧啧，叫我很难处理，至感烦恼。（三）宝贵廷曾一度暂代伪第二军军长，迨发表他为第四师师长后，就解除了他暂代军长职务，因而对我也有怨言，向人发牢骚，我听到后也很恼火，想把他调到伪蒙古军官学校工作。并叫王宗洛暗地调查他有无煽动军心事情。王宗洛接受我的指示后，一方面告知王云五（王宗洛的胞兄）炮兵团长预作准备，以防不测；一方面调查宝贵廷的言谈行动。嗣后向我报告说，宝贵廷并无煽动军心、图谋不轨事情，仅在饭馆酒醉时发过牢骚，我才未调动宝贵廷的职务。（四）在征兵上，锡盟各旗都按照“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把应征士兵按期送来入伍，只有乌珠穆沁右旗，因为保安队官佐都青阿、敖恒等反对征兵，在该旗蒙民中散布怨言说：“现在蒙古军政府向我旗征兵要马，是我旗协理托克托胡勾通德王、吴鹤龄等投靠日本，扩编军队之所致，我们应当反对。”号召被征旗民杀害托克托胡，

因托克托胡事先得讯逃避他处，始得幸免。继而都青阿、敖恒等又率领被征旗民到索王府请愿，要求免除兵役。这时索王正病重，不得已抱病出面苦苦劝说，才将这事平息，不久索王也就病故。（五）乌珠穆沁右旗官员们为了应付差事，于是年冬特在林西一带雇佣些兵痞，代替该旗应征旗民入伍。李守信见着我说："我的林西旧部属都来了。"我对该旗这种应付差事的做法很不满意，严令该旗务要依照"蒙古大会"决议，把应征士兵送来。该旗官员们迫于我的命令，又设法说服了都青阿、敖恒等，率领应征士兵，前来我旗西营盘入伍。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后，在征兵问题上遭到乌珠穆沁右旗反对的一段经过。当时我很不满，现在回想起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征兵要马，招致蒙古人民的反对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和伪满洲国及"冀东"缔结协定

在"外交"工作上，主要是和伪满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协定。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田中隆吉就向我建议，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我即偕同李守信、吴鹤龄、金永昌、陶克陶、卓特巴扎普、雄诺敦都布、索特那木道尔吉等，分乘飞机二架赴长春。

到达后，先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外交部大臣张燕卿、宫内府大臣熙洽、军政部大臣于深澄、蒙政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等，无非是周旋与宴会。继而就和伪满外交部谈判缔结协定问题，计日本关东军方面参加者有田中隆吉，专田参谋；伪满方面参加者有外交部大臣张燕卿，次长大桥忠一；伪蒙古军政府方面参加者有我和陶克陶。谈判开始时，首先由我和张燕卿分别致辞。张燕卿在致辞中，强调应以日本为中心，达成"满蒙合作"。我在致辞中，着重从过去历史和当前局势，说明"蒙满合作"之必要。接着就进行讨论，在政治、经济等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仅在军事问题上有点争论。我提出"蒙古军政府"甫经成立，实力未充，如果受到威胁的时候，请"满洲国"出兵援助，当威胁解除的时候，"满洲国"即应撤兵。大桥忠一争辩说："从外交惯例上说，'满洲国'为了援助蒙古，实行出兵或撤兵，应当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定，不能你们叫我们出兵就出兵，叫我们撤兵就撤兵。"田中隆吉插言说："不必在这个问题上争执吧，本着'满蒙亲密合作'的精神，按照德王的意见办理也无不可，我看就这样办吧。"因为田中隆吉知道，伪满蒙缔结协定，不过是走形式，出兵或撤兵还得由关东军作最后的决定。谈至此就告结束了。

又经分别酝酿协商，结果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蒙满协定"，由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签字，由张燕卿代表伪满洲国签字。这个协定的内容，大致如上所述。因协定原件，在化德退却时丢失，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嗣即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伪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为驻伪满代表，双方开始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发行伪满币，在伪蒙古军政府行政力量所及的地区，流通使用，由此双方也发生了经济关系。这次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外交部，还派员陪同我们到奉天参观兵工厂，在东陵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旋又到大连游览，到王爷庙访问。缔结协定后，我单独一人去见了伪满皇帝溥仪。关于我和溥仪的关系，下面再谈。

我同伪满签定协定后，返回化德不久，田中隆吉又向我建议，应派“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协定，好向他们交涉支援经费。于是我又派陶克陶代表伪蒙古军政府赴“冀东”与汉奸殷汝耕谈商，结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协定。田中隆吉即根据这个协定，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弄到100万元，作为伪蒙古军政府的经费。

我与溥仪的关系

在这里，需要补述我和溥仪的深切关系。

在我年轻时期，因受封建社会遗毒很深，忠君思想至为浓厚。但我承袭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之后，已入民国时代，无君可忠，就把忠君思想寄托在溥仪的身上，非常盼望溥仪复辟。记得我16岁时，我的姐夫穆特贲阿任察哈尔十二旗群的巡防马队统领，掌握数百蒙古骑兵，参加了张勋复辟活动。有一次他和我说：“我不久就到北京保护皇上登极，你有什么奏摺或对皇上有说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奏。”我当时因为年轻，没有做出什么表示，后来张勋复辟失败了，穆特贲阿逃到外蒙古避难，株连他的兄弟六人被杀，我还深以在张勋复辟事件中，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憾事。

迨至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溥仪迁到北京日本公使馆避难时，我曾偕同补英达赖去北京，通过外蒙古驻京王公那彦图的介绍，去见溥仪。因溥仪正准备转赴天津，仅得一面，未得多谈，聊表慰问之意就辞出了。我和补英达赖就急忙返回张家口，向商家筹款一万元又到北京，前往日本公使馆，见到了溥杰，表示愿到天津面见溥仪。恰巧这时溥仪从天津来电话，向溥杰询问他母亲的疾病，溥杰趁便在电话中转达我的意思，溥仪答称：“可以前来相见。”我遂和补英达赖把一万元纸币用布袋缠在腰中，外穿宽大衣服，密赴天津，住在华石斧家。经过接洽联络，在日“租界”张园见到溥仪，当将所带一万元进献，并致慰问之忱。所得到的是数句奖勉之语和赏喝牛奶一杯。但我毫无不满之心，还以为在“皇上”蒙难之时，得尽献款之诚，是为臣属应尽的义务，感觉无上的欣慰。在溥仪当上伪满皇帝后，我特穿上清时的蟒袍和马褂，戴上朝珠与顶戴，拍照叩拜的跪像，派我旗协理钟昆赴伪满送给溥仪，表示尊君的“忠心”。我于1935年冬赴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时，先和溥仪的侍从武官张海鹏见面，谈到张勋复辟失败，不胜感慨，谈到“皇上”又复“登极”，无限欢欣。接着又见了溥仪，行了叩拜礼，于心甚慰。

当我代表伪蒙古军政府到长春来“缔结协定”，本有“两国相交”的意味，应当尊重自己的“身份”。但顾念过去的关系，对溥仪个人仍愿以“君上”事之，以“臣属”之礼相见。因此，当我单独见到溥仪时，还是行了叩拜礼，溥仪也挥手让座，温语相加。我们二人面对面地谈了很多的话，内容我现在记不很清楚了。嗣我看见侍从人员均已退出，只有我们二人在座，又向他说：“日本人对皇帝怎样？在我们那边，日本人气焰嚣张，仅是一个化德县顾问小林，竟敢拒绝腾房，阻挠军政府的筹备，对于往来化德的蒙人，也横加干涉，不予便利，使我非常气愤，曾向田中隆吉提出不要小林顾问。田中隆吉答复我说：‘小林顾问不好，改就行了，何必不要他。’我又反驳说：‘你们日本人不好，改了就行，为什么我们蒙古人凌升有错就杀了呢？’”溥仪说：“你这话太硬

了。”谈至此我即辞出归寓。

接着田中隆吉来和金永昌等商量，说溥仪要封我为“亲王”，征询叫什么亲王好。金永昌说：“封为武德亲王最适宜，因为武是采取成吉思汗圣武皇帝的武字；德是采取德王的德字，把武德二字结合起来，是表示德王继承成吉思汗伟业的意思，一定适合德王的口胃。”于是田中隆吉就采纳了金永昌的建议，转知“宫内府”办理，溥仪又召见我，亲自授予“武德亲王”《钦任状》，我即拜领接受，表示谢恩。我返寓后，仔细看看这个《钦任状》，上面还有溥仪的署名，我很奇怪，怎么皇帝封号还自己署名呢？认为不合前清封王只盖大印，皇帝不署名的惯例，足见这个不伦不类的《钦任状》是出于日本人的指使，不是溥仪近臣的主意。这时吴鹤龄也知此事，带有不满的神气对我说：“这时封你为‘武德亲王’有什么用处？还不如赠给你一枚勋章，表示‘蒙满亲善’，符合国际间的礼节。”我当时对吴鹤龄虽没说什么，而脑子里却在这样想，这个“武德亲王”，必要时也有用处，如对守旧的老年王公杨桑等宣扬一下，很可利用溥仪的“钦封”，提高我的身价，把向以前辈自居的老年王公杨桑等的气焰压下去。我虽有这个想法，但这时我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伪蒙古军政府的军政大权，杨桑等对我也比以前尊重，不再遇事阻挠，我也就没向他们宣扬此事，遂把这个《钦任状》束之高阁了。后来我又去伪满“访问”，拜见溥仪时，对他作了交代说：“现在皇帝在日本帮助之下，已经登极，再也用不着我效力了，我今后把忠于皇帝之心，忠于蒙古事业。”溥仪也以“贵宾”之礼待我，宴会时，口称我为“贵主席”了。

关于“凌升之死”

上面我谈了一些我和溥仪的关系。顺便谈谈关于凌升之死的问题。1936 年旧历正月十八日，在我旗举行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后不久，田中隆吉又来我旗，商洽扩编军队之事。提到所需经费时，他说：“蒙古统一指挥机构已经成立了，亟须筹措经费，现在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因通苏案被捕，听说他的财产很多，可以没收他的财产，作为军政府的军费。”我当即拒绝说：“凌升被捕，对于蒙古人心和西进工作都有影响，最好不要严究，应当从宽发落。至于我们所需经费，满可设法另行筹措，绝不愿把没收凌升的财产充作我们的经费。”田中隆吉见我不但不愿接受这样来路的筹措经费，反有营救凌升之意，立刻转了话锋，向我解释说：“凌升虽然被捕，我想康德皇帝出头一说，也就没事了，希你放心。”谈至此，他即告辞而去。

同年 4 月 24 日，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伪蒙古大会，准备正式改元易帜，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当时我和索王、卓特巴扎普、吴鹤龄等提出以大会全体代表名义，要求释放凌升，预定关东军代表到达后，即提出这一问题。在大会进行中，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横山顺等赶来参加。刚下飞机后，吴鹤龄就将大会准备给关东军打电报、要求释放凌升情形，向田中隆吉等报告。田中隆吉答复说：“时间来不及了，大概今天就把凌升处决了。”接着他到屋里又继续解释说：“对处决凌升，本来我是不同意的，在关东军参谋会议时，曾讨论处理凌升问题，我这主管蒙事的参谋主张不杀，把前次你和我说的‘应当从宽处理凌升，以免影响西进工作和蒙古人心’之言都说了。但是主管关于苏联事情的参谋都主张杀，最后实行表决，我是少数，只有服从多数，结果就决定

把凌升处以死刑。这是我们内部处理凌升的经过情形，我都明白地告诉你们。”我们听他说明以后，认为既已把凌升处决，没有再向大会提出这一问题的必要，仅在会外时间告知了大家。索王、卓特巴扎普等，都和凌升有交情，闻听之后，不胜叹息。嗣后陶克陶向我说：“田中隆吉和横山顺闲谈时说，杀凌升的事，对西蒙人的印象很不好。”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我偕同李守信、吴鹤龄等赴长春，在日本帝国主义导演下与伪满缔结了一个所谓“满蒙协定”之后，即到大连参观，曾和业喜海顺（业王）见面，招待我们参观的日本军官小野寺问业王说：“业王爷对蒙古事情有什么意见?”业王说：“蒙古事情我不知道，我只知有满洲国。”当时使我甚感诧异，一向好谈蒙事的业王，现在也守口如瓶，表示冷淡。这充分说明凌升被杀后，东蒙王公明哲保身、惧怕日本、应付场面的心理。

改化德县为“德化市”

在“内政”上，首先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关于化德县设置问题，我从前就曾表示过不满，因为化德县所在地原叫嘉卜寺，正和我旗接壤，而我的名字汉语译音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人又称我为德王，头一个字都是德字，如果仍称化德，就意味着我为这块地方所化；如果改称德化，就意味着这块地方为我所化。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包悦卿曾将我不满化德二字的意思，向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亲信肖振瀛提过，肖振瀛当向包悦卿解释说，化德县这个名称是从崇礼、尚义等县次第排列下来的，绝无化及德王、侮蔑德王的意思。既然德王对“化德”这个县名有意见，我马上建议宋哲元主席更改，希你转向德王解释，不要误会。果然为时不久，我就接到国民党内政部的通知，说将“化德县”改为“新民县”。但内政部虽有明令更改，因“察东事件”已经发生，没有来得及更改化德县的牌子，当地人仍称化德县。因此，我于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决心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并因卓特巴扎普对此有意见，特派吴鹤龄前往明安旗卓特巴扎普家中，婉言劝说疏解，卓特巴扎普始答应将化德县从察盟划出，改称“德化市”，归由伪蒙古军政府直辖。我遂任命李守信兼任伪市长，张子荣（卜琳弼里格图）为伪副市长，听从伪军政府直接指挥，管理“德化”市政。

成立伪蒙古生计会和伪蒙古学院

其次是正式成立伪蒙古生计会，发表吴鹤龄兼任“会长”，并把募得雪灾救济款悉数拨作该会基金，由吴鹤龄负责主持设置“德化商店”，收购灾民的牲畜皮张，转售部队制做军装，筹划集结灾民组成救济新村和重点植树造林等事。不意因此却引起陶克陶、金永昌的不满。他们向人发牢骚说：“这笔资金，是我们到‘满洲国’募得的救济雪灾款，曾向‘满洲国’各界呼吁救灾奔走募集，并向国务总理大臣鞠躬致谢，尽了很大的努力，受了很多辛苦，费了很多唇舌，为什么现在归由吴鹤龄掌握？究竟如何花用，应当问个明白。”并带有不满的神气前来质问我。我当时不由得也就无名火起，顺手把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摔碎，很生气地说：“仅仅这一点灾款的处理，你们都不信任我，居然提出质问，今后怎样共图大事!”金、陶二人碰了我的硬钉子，也就神色黯然而退。由于我对吴鹤龄的支持，虽把金、陶的气焰压下去，但因此却引起金、陶和吴鹤

龄之间的勾心斗角、争夺权利的矛盾与冲突。

其三是设立伪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尔扎布为“院长”，陈绍武兼教导主任，分设师资、电报、补习各班，招收蒙古族青年施行短期训练，培养急需的干部。同时在张北设立伪察哈尔青年学校，聘任日本人为教官，侧重用日语教学，进行奴化教育。并由伪教育署主持，选送留日学生。计有胡尔钦毕力格、博和温都苏、卓里克图、都固仍仓、赛春阿、都格尔扎布、德勒格仍贵等十名，被送往日本东京，先在“善邻协会”补习日本语文，继即分送日本大专学院深造，培养通晓日语的各项“人才”，促进“日蒙亲善”。还在“德化”设立“蒙日语文讲习所”，鼓励职员学习蒙日语文。

汉奸王道一的下场，日寇以杀人为儿戏

在治安上，“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在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招募当地土匪头子王道一，企图用以扰乱绥东治安，作进犯绥远的前哨。不意王道一率领匪众投归日本后，在扰乱绥东方面未起多大作用，反在尚义一带为非作歹，影响后方治安甚大。田中玖为了收拢当地人心，使对日本有好感起见，特将王道一诱捕枪决。这是王道一做汉奸的下场，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狠毒，汉奸如不为其所用，便置之死地。又据伪军法处长关荫南说，在未挑起绥东战争以前，唯恐在押的军事犯扰乱后方，日本关东军密令指示伪蒙古军的大桥雄熊参谋，亲来通知关荫南，将寄押在张北监狱的91名军事犯，开具名单，宣布罪行，一律执行枪决。关荫南认为其中有的军事犯系属轻微犯罪，仅判六个月徒刑，已经在押三个月，再有三个月就可释放出狱，恢复自由。对这类罪犯如也执行枪决，未免冤屈，引起官兵不服，而致动摇军心，反为不美。大桥强调这是关东军的命令，必须执行，不能变更或拖延。又经商讨一番仍由大桥提出意见说：“为了执行关东军命令，只有将91名军事犯绑赴人烟稀少的张北山下行刑，在行刑前一律松绑，任其散漫乱跑，后边用机枪扫射，跑了的就算跑了，打上的活该命死。这样处理既可使一部分罪犯获得活命，也算执行了关东军的命令，你我严守秘密，不可对外言说。”关荫南认为再强调原来意见，也是无用，只好同意这个办法。这样执行结果，仍然打死了19名，其余72名四散逃逸。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草菅人命。而日、伪执行人员也就视人命为儿戏，任意屠杀。

设俱乐部，公开烟赌

日本帝国主义者虽以“确立后方治安”为名，任意屠杀，但另一方面却在各县城镇设立俱乐部，公开放赌，抽取头钱，名义上是作特殊用途的开支，实际多饱充了经办者的私囊。并公开卖鸦片，毒害人民。由于烟、赌的公开，聚集很多游民，不分昼夜，呼幺喝六，吞云吐雾，一塌糊涂，弄得鸡犬不宁，秩序紊乱。而无辜人民因而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上吊者有之，卖妻鬻子者有之。身体羸弱者更不知凡几，贻害人民，莫此为甚。当时有人出面反对公开聚赌，主张取缔俱乐部，而主管其事的日本人反说中国人天性好赌，设立俱乐部，正是投其所好，满足需要，并可从中抽取头钱，增加税收，作特殊用途的开支，拒绝取缔俱乐部。实际上，日寇是想用烟赌毒害中国人民，使之意志消沉，身体衰弱，不思反抗日寇，不战而亡我中华民族，其用心十分狠毒。

进犯绥远的部署

1936年10月间，“德化”特务机关长换成田中隆吉。他指使王英组织的所谓“大汉义军”已经初步编成，而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便主张并要亲自主持进犯绥远。他和我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可速责成陶克陶组成接收委员会，准备接收吧。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我当时认为他的看法也有可能性，并为了早日占领绥远，实现建立“蒙古国”的妄想，也就赞同田中隆吉进攻绥远的计划。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绥西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承当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便确定下来。接着，田中隆吉就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由我命令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第一军进驻南壕堑，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把伪蒙古军五、六、八、九各师布置在尚义、“德化”一带，守护后方。这时把百灵庙视为后方军事基地，除其他军需器材不计外，仅面粉一项，就运去两万多袋。在派遣驻守百灵庙部队问题上，我曾很费踌躇。先想派战斗力较强、由东北各旗招来的士兵编成的师前去，深恐纪律不好，在乌盟蒙民中造成不良印象。经反复考虑，认为百灵庙虽是后方军事基地，而名义上仍是国民党政府隶属下的“蒙政会”所在地，傅作义不会派兵来打，于是就把甫经编成的伪蒙古军第七师派去。因为这个师的士兵，都是从“察盟”各旗征来的蒙民，虽训练较差，战斗力较低，而纪律好。结果把第七师派去后，并把原派的包俊山所带的一连调回。

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

这样部署之后，我就以我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卓特巴扎普为副司令的名义，于1936年11月5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这个通电是由吴鹤龄起草的，其全文如次：

绥远省政府傅主席勋鉴：自从在蒙古境内设置省、县以来，蒙旗之权力日趋衰微，蒙民之生计日陷贫穷。为了挽救蒙古于危亡，乃于前年要求自治，当承中央之援助，准于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颁布自治原则八项，蒙众欣慰，举国同情，而独贵省始终猜忌，另眼相加，屡次企图破坏自治，其最显著者列举如次：

（一）贵省各项税收，关于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部份，依中央颁布之蒙古自治原则，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当时蒙政会为谋地方之和洽，谅解贵省之困难，仅要求在百灵庙蒙政会统辖地方劈分特别税。中央对这项特别税，曾有分配命令，贵省竟擅自变更划线，夺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等五县税收，借口多端，曲解明令，经议年余，分文未给。当时中央对贵省已分配特别税，举办各种事业，而蒙政会因未得税收，以致经济困难，原定各项事业，不能举办。贵省对蒙古地方自治，如此暗中破坏，早已引起蒙古民众之不满。

（二）前年所发生之西公旗事件，纯粹是蒙古内政问题，蒙政会责成主管盟长和平解决，乃义属当然，而贵省独越权干涉，操纵石王，扩大事态，纠纷

不已，企图分化蒙旗，推翻自治之居心，不问可知。今春蒙政会奉中央明令，撤回驻在西公旗之保安队，以免发生冲突，并请中央转令保护麦力更召活佛尼达克丹大喇嘛。不意数月后，大喇嘛及其家属从众，被贵省派兵袭击，竟致杀害。如此破坏蒙古自治茶毒蒙人惨剧，凡属蒙族，莫不痛心。

（三）蒙政会保安队系呈请中央编成，专负保卫地方之责，何等重要！而贵省今春竟利诱该队中不良分子起而叛乱，收归贵省，更于前月装备叛乱官兵，诡称反正，进攻百灵庙，企图毁我自治发祥地，为各旗驻在百灵庙之保安队击退。当由贵省派兵掩护，酿成叛兵互相仇杀，死伤数百名之多，贵省利用无知蒙人，客留贵省，仇视蒙人，为何如此之甚！

（四）百灵庙蒙政会系全蒙自治机关，深受中央扶植蒙古之至意，全体蒙人视为第二生命，凡属人类，对之莫不寄与同情，不忍加以危害。独贵省阴谋破坏，居心推翻，甚至捏造是非，耸动中央，擅用乌、伊两盟名义，淆惑中央视听，从而产生绥境蒙政会，以致我蒙经营多年之百灵庙蒙政会，归于毁灭，引起蒙民丧失对中央之好感，似此误国殃民之举，令人太息痛恨！

（五）贵省前于破坏我蒙政会之际，我蒙对贵省并未究明是非，因为命令虽然出自中央，主谋系出贵省，我蒙仍本服从中央之意志，终于在锡盟盟长公署所在地，成立察境蒙政会，清理百灵庙蒙政会之债务，隐忍退让，毫无不利贵省之行为。而贵省对我蒙反倒愈加压迫，在察哈尔西部一带，百灵庙以南地方，挖掘战壕，修筑炮台，作种种军事上之设施，给锡、察两盟及百灵庙一带无辜蒙民生活上以严重压迫，贵省实欲置全体蒙民于死地而后快。

总之，蒙古愈退让，贵省欲压迫，迫使蒙古已退无可退之地，蒙古民众均希诉诸武力，争取最后生存。本会同仁始终以和洽地方为重，只有一线和解之可能，绝不能轻启战端，累及民众。特提出下列要求，希贵省谅察，迅作答复。

（一）察哈尔右翼四旗，原由察哈尔部管辖，现在该部依中央颁行之蒙古自治原则改盟。为该盟土地之完整及锡、察两盟民众到绥东五县（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地方，买卖粮食、煤炭、牛马、皮毛等便利计，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哈尔盟，归本会管辖，以资名符其实。

（二）百灵庙蒙政会结束工作，尚未完竣，留有职员及保安队数百人，为安定所留员兵和附近居民之人心，免除其生活上压迫起见，请将百灵庙以南一带地方军事设备、经济封锁，即日取消，恢复原来和平状态。

（三）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原有之步枪、轻机关枪及弹药，均属中央发给。今春贵省煽动该队叛乱时，将武器押收归绥、武川等处保管，应即如数退还百灵庙蒙政会。

（四）现在百灵庙蒙政会整理债务之结果，所欠员兵俸给及商民债款计达20万元，是项巨款蒙地无所从出，中央拨给也有困难，贵省年应劈给蒙古之特税20万元，应速发给。

（五）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各员，蒙政会已发有逮捕令。现在该员等均在

贵省任职，证明当时兵变确属贵省嗾使，希将各叛徒一律遣返百灵庙，以便处分。贵省袭击麦力更召及惨杀大喇嘛之官兵，均属杀人凶犯，应一律撤职查办，以明法纪。对以上两案前后受害之数百蒙人及其家属，一律发给抚恤金，以慰冤魂。

以上五项系蒙古为了生存至不得已之要求，贵省若反省与承认压迫蒙古之错误应即克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做最后之抗争。如演成事变，责任完全应由贵省负担。特此电达。

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
副委员长卓特巴札普歌
（十一月五日）“印”

傅作义的复电

这个电报发出后，旋即接到傅作义的复电如次：

嘉卜寺察境蒙政委员会德委员长勋鉴：歌电阅悉，自来辩论事理，有强辩夺理者，亦有颠倒是非者，接诵大电，深悉尊处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了，兹特分项撮要答复如左，幸详查焉。

（一）绥特税系代中央征发军费之税收，自治八项原则劈分地方税之规定，该税本在不应劈分之列。北平军分会特示优待，派员调查，规定五项办法，贵会迄未实行，是贵会不肯按中央规定而劈分，并非绥方不予劈给。至商驼改道，系因贵会拦路苛征，自断商运，具有事实可指。

（二）西公旗事件，第一阶段由于贵会派兵帮助叛逆曼头围攻王府，并有来历不明之飞机助战，致该旗横受糜烂，中央命令撤兵，贵会均未置理。第二阶段本章大喇嘛等返庙，与石王等已订约相安，不知何故，当王道一扰犯绥东之时，该喇嘛忽勾结非本国国籍人，在梅力更召招兵运械，建筑机场，意图与绥东王匪相呼应，大喇嘛于八月八日攻击王府，而石王十三日始行反攻，当战争结束，确有非本国籍人在内，此事谁违中央，谁肇乱源，社会周知，勿烦曲解。

（三）百灵庙保安队哗变，系在察北改元易帜之后，时间事实，昭昭于社会，该青年等为执事平日所培植，其思想行为度为执事所深晓，中途脱离，当自有故，云等通电对执事在察北行动表示惋惜，而誓不合作，执事更应自省，不尤他人。

（四）绥蒙易制，也在察北变乱之际，尔时乌伊官民既畏丧失国土，贻蒙古之害，又不愿与地域不同者共此多事岁月，中央俯顺多数蒙人之情，始行分治，目下旗众相安，边防无恙，与察蒙相较，自有真正得失。

（五）分治命令既颁，贵会既不遵令迁锡，复在六县易帜改元，组织军政府，接引伪蒙军入察，近又向庙会大批增兵，乃来电云“本其服从中央之素志，以地方和平为重”，且责绥方自卫之不当，似言行不无矛盾。以上就见质敷陈其要，至对来电要求及期待于左右者，即执事是否以国家为前提，察北今

日成何局面？且察该四旗本多年隶察，相安无事。自张北六县脱离察省管辖，该四旗官民始惶然呈请中央，颁定改隶之令。执事对义既有期勉，义敢不以诚反求于执事，倘执事以国家为重，使察北六县仍归察省管理，恢复旧规，则虽中央明令在前，悬想四旗必仍愿还隶旧制，其他要求自更不成问题。盖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义服务国家，只知有公，不知有己，同在中央隶属之下，向不存地方与私人之见。执事如摆脱现状，不受利用，幡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以请，并立解职，以明心志。否则不但四万万同胞对执事怀疑，即执事左右也难保不作爱国之事。刻所馨祝者，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勿义免过而执事有负于国。时迫事急，祈执事熟思而力图之，国家幸甚！边防幸甚！

绥远省政府主席 傅作义 庚（八日）

如意算盘没有打对

这时蒋介石也来电报指责我，电文内容大意是："披阅歌电，不胜诧异，台端在电报中所述各节，多属绥境蒙政会之事，应由该会与绥省商洽解决。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今竟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这时前方军事业已接触，意在拿下绥远再说，对蒋、傅来电再未置复。田中隆吉还从伪满航空株式会社调来几架飞机，盘旋空中，侦察助威。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主谋者和指挥者，我和王英是这次战争的仆从和附合者，特别是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心理对待这次战役的。认为上有飞机盘旋，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伪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地一威吓，傅作义军队就可以撤退，大则可以唾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小则也可以扩大占领区域，而壮声威。不意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绥省方面既有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国民党晋军的支援，总兵力约有三万余人，而伪蒙古军是新经编成的，训练很差，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队又属乌合之众，战斗力更差。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所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至多不过一万五千来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导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相助。从数量上看，是众寡悬殊；从质量上看，是优劣分明。因此，由雷中田率领进攻红格尔图的王英部队，围攻数日，未能得逞，迫至绥方援军到后，进行反攻，王英的部队便败退下来，集结在商都休整，李守信立刻派尹宝山率领伪蒙古军部队进驻商都，和傅作义军对抗。

百灵庙战役

这时我得到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的报告，说是傅军孙兰峰旅，正在百灵庙以南集结，等候炮兵部队一到，就可能进攻百灵庙，伪蒙古军第二军的日本顾问烟草谷下令叫死守百灵庙。我接到报告后，认为烟草谷让死守百灵庙，命令不妥。因为新经编成的伪蒙古骑兵，不能死守百灵庙，应乘绥远军不备之际，进行奇袭截击。我很想乘坐飞机前往百灵庙布置，只以有紧急事务待办，未能及时前往。到了这年 11 月 23 日晚，孙兰峰

旅就进攻百灵庙。“蒙政会”汽车司机张佶带着一架机关枪在南山头上配合部队射击，松秀带着伪蒙古军游击队（系迪克丹大喇嘛死后逃来的士兵编成的）在康熙营盘一带山上守护，其他团队亦准备迎击。不意驻在百灵庙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首先逃跑，遇见松秀下山领取子弹，误认为有变，竟开枪打死，这时四面枪声顿起，百灵庙遂入混乱状态。伪蒙古军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谷和第七师师长首先退却，所属官兵也随之溃退，第七师野崎顾问说他是最后撤退的，并说用刀劈了一人，究竟所劈何人，没有说明。第七师官兵退却后，集结在锡拉木伦庙和希拉图庙两地休整，百灵庙遂为傅军占领。

石玉山金宪章等反正

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又令集结在商都的伪军王英部队，再攻百灵庙。而王英部队的副司令雷中田“自告奋勇”，情愿率队前往，不意这时伪军石玉山、金宪章旅长等，已和傅作义有了联络，待机而动。他们到达锡拉木伦庙时借故未往。雷中田仅率一千多人，再度进犯百灵庙。雷中田虽然“立功”心切，还给我来信，自称“卑职”，以明心迹，但其士兵看到送他们的汽车均已开走，是不管他们的死活，因此都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果然一经接触，即行败退，雷中田当被击毙。败退官兵也到锡拉木伦庙集结。这时我不愿意第七师和王英部队混合驻扎一处，除派伪军事署长王宗洛乘坐飞机前往该庙，慰问部队并查清情形联络部署外，特电令穆克登宝，将该师驻在锡拉木伦庙的所部官兵，调到布拉图庙集结，不料指挥王英部队的日本顾问小滨大佐坚不许可。穆克登宝陈说，这是奉“德总司令”的命令，正在指挥部队开拔之际，第七师野崎顾问竟抽出军刀进行威吓说：“驻守此地的部队，都归小滨大佐统一指挥，必须听从小滨大佐的命令，否则就以军刀相见。”穆克登宝在野崎威吓之下，马上软化了、不敢再力争，只有俯首听命，把我给他的命令抛在脑后。穆克登宝虽然对小滨大佐表示恭顺服从，而小滨大佐对穆克登宝却不信任，当将第七师在山上和要路所布置的岗哨，一律换成王英部队的士兵担任。这时王英部队的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等，既感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屡吃败仗，前途渺茫，又受傅作义的策动，遂乘步哨更换之际，发动所属官兵暴动起义，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二十余人全部枪决，并袭击驻在该庙的第七师官兵，连长李春林、若格尔札布等和数百士兵，均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死亡，石玉山、金宪章遂率领部队投归傅作义。穆克登宝却在兵变中，带着大批未发的军饷偷偷地溜走，不但得了活命，还发了一笔横财。他谎报军饷在战乱中丢失，后来用此款买了一辆全新的贝克牌汽车。第七师在这次变乱中死亡数百官兵，蒙受很大损失，我和穆克登宝受到察盟蒙民的责难，他们编出歌谣来咒骂我们。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绥东战役得的结果。

锡拉木伦庙事件发生后，前方战事既然失利，后方军心也多不稳，田中隆吉正拟弃守“德化”，反来欺骗我说：“我们日本军快来了。”我问：“这是真的吗?”田中隆吉说：“真的！真的！日本军快来了。”田中隆吉不但欺骗我，也用欺骗的手法拉拢李守信。有一次，他对李守信说：“你叫李守信，我叫李守义吧，我们是情同骨肉的亲兄弟呀”。这充分说明，田中隆吉为了拉拢人欺骗人，什么卑劣的伎俩都能使出来，我却甘受田中隆吉的欺骗而不觉醒，反认为田中隆吉比别的日本人强，对蒙古甚为热心，现在

回想起来，真是愚不可及。

西安事变后缩编伪蒙军

正在田中隆吉仓皇失措，对我们欺骗拉拢之际，不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抗日。田中隆吉得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在一天黎明的时候，他仅穿裤衩，披着大衣，到伪军事署向王宗洛说：“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中国从此要发生内乱，对我们作战前途有利。”旋又到了我的住室，报告了这一消息，并征询我对“西安事变”的意见。我即将吴鹤龄请来共同商量，田中隆吉极力主张给张学良打电报，杀了蒋介石。我和吴鹤龄一致主张说：“现在前方战事失败到这个样子，后方军心也有动摇，与其劝张杀蒋，莫如趁此机会呼吁停战言和，作为缓兵之计。”田中隆吉见我俩不同意他的意见，也就转了话锋说：“这样也好。”于是就由吴鹤龄拟具电报稿，记得内容大意是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容共抗日，劫持最高领袖，紊乱国家纪纲，因此，特呼吁全国一致声讨，营救“领袖”。并呼吁在“领袖蒙难”之际，停止蒙绥地方之争。“西安事变”解决后，傅军即停止进攻，伪蒙古军也退守原地，双方进入相持状态。

这时日本关东军把田中隆吉调走，派来第二科科长武藤章主持“德化”特务机关，就和我研究整顿部队问题。他主张把伪蒙古军九个师缩编为六个师，每师配备一个山炮连，以便集中兵力，发扬骑炮兵联合作战的效能，并答应每师拨给四门山炮。当时我也认为武藤章的主张有道理，合乎军事原则，而且蒙古军还可能多得几门炮，用以加强部队的编制装备。但我总想扩编伪蒙古军，不愿缩编，并感缩编各师之后，人事上不好安排，因而同意每师配备炮兵连，不同意缩编为六个师。武藤章见我坚不同意，再未强调缩编，也未配给山炮就回去了。关东军另派森岗大佐继任“德化”特务机关长，为时不久，“德化”特务机关长又换成河崎大佐，这时因为部队中既有金宪章及石玉山等反正，其他部队也有不稳状态。我向人表示：“我们是以蒙古为前提，谁对蒙古有利，就跟谁合作。”这话也许到了河崎耳朵里，因此，河崎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说：“蒙古只能和日本合作，不能和别人合作，假如有人认为蒙古既可跟日本合作，也可和别人合作，甚至与苏联亦可合作，那可不行。”从河崎这几句话里，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已把蒙古视为禁脔，不容他人置喙，特别注意防止苏联的影响。这是对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实际上我当时认为，苏联是可怕的，像我这样封建王公出身的人，当时是决不会走苏联这条道路的。我感觉河崎有点神经过敏，很想上台讲话驳他，但是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

河崎大佐到任后，对于配发伪蒙古军山炮问题，未曾提及，我也再未追问。为了加强军事指挥机构问题，特在伪蒙古军政府之下，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仍由我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任命乌古廷为参谋长，刘星寒为参谋副长，其下设副官、参谋、军需、军械、军法、军医等六处，副官处长张启祥，参谋处长崔守堃，军需处长崔景岚，军械处长纪树勋，军法处长关荫南，军医处长李××。并为了简化层次、便于指挥起见，将伪第一、二两军编制取消，由伪总司令部直接统辖各师，并将部份师长作了调整，因第六师长宝彦图和李明远意见不和，都调任参议，另派乌云飞继任师长，把警

卫师改称第九师，第七师因在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伦庙变乱中损失甚大，师长穆克登宝撤职，另行补充训练。对其他各师也进行调整，准备待机而动。

七七事变以后一度撤出“德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进攻平、津、华北，对内蒙古方面还未派来大批日军，绥远方面傅作义军趁此时期却展开进攻。由董其武率领部队进攻商都，商都伪军尹宝山率队迎击，战斗甚为激烈，双方均有伤亡，终因傅军攻城甚急，尹宝山被迫撤退，商都遂为傅作义军占领。尹宝山在撤退途中，井得泉团长又率队反正投归傅作义，这对伪蒙军事方面又增加了不利影响。这时反正的石玉山率部进攻“德化”，察省主席刘汝明也派部队进驻万全坝上，军事形势顿形紧张。关东军特把田中隆吉（这时任联队长）从朝鲜调回来，主持军事，急忙采取紧急对策。对刘汝明方面，听说田中隆吉秘密进行联络，允给四门大炮，才缓和了刘汝明派队进攻。但石玉山部队却迫近“德化”，而驻守“德化”的伪蒙古军，仅有包海明率领的第九师少数部队。我当命令王宗洛武装军政府职员，帮助第九师防守“德化”。日本特务机关首先焚烧文件，纸灰飞扬，汽车发动隆隆作响，显是作退却准备，因而谣言百出，秩序大乱，无法维持，于是我又下令叫王宗洛带同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向察盟镶黄旗撤退。吴鹤龄掌握着伪蒙古生计会汽车，于兰泽掌握着伪交通署的汽车，纷装物品，争先撤退，各机关职员更为动摇，有的领了枪支争抢汽车撤退，有的顾不上领枪也随着撤退。先于八月十四日晚，向察盟镶黄旗拉白庙撤退，继即撤到多伦。我于大家撤退的翌日上午，曾由包海明陪同视察山上工事，下午我才偕同徐荣侯（时任滂江电报局局长）返回我旗。徐荣侯说：“没有什么动静么，怎么都撤退了呢？还没到最紧急时期，这个也撤退，那个也撤退，成什么样子！”

在大家撤退之后，包海明仍率第九师少数部队防守“德化”，嗣因石玉山部队愈益迫近，已听见枪声，也就率队撤退，“德化”遂为傅作义军占领。这次“德化”撤退是非常仓促的，枪支既未全部带出，弹药亦未焚毁，重要文件更未焚毁或带出。甚至把苦心孤诣训练多日的军乐队，也未令其撤退。后来傅军进占“德化”时，该乐队却装备整齐，奏军乐欢迎。

我返旗后，听说马占山率领军队进至土木尔台，深恐进攻我旗，特派赵文儒前往联络，并让徐荣侯、王石青（专聘教我子侄的汉文教师）主持，在我旗挂上察境蒙政会的牌子，权作应付之计。我这样安排后，即往补英达赖家。途中遇见陶克陶乘坐汽车找我，我遂偕同他一同到补英达赖家中。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达多伦，一下飞机就问河崎大佐：“德王现在何处？”河崎一时答复不出，东条对他痛加斥责，并追问失守“德化”的责任。河崎为了卸责，很可能把失守“德化”之责，推到伪军事署长王宗洛身上。东条旋即派出飞机各处寻我。我乘坐汽车赴多伦，到达哈丹布图庙时，见有飞机盘旋空中，大概就是寻我。但这并不是日本关东军对我特别关心，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初经伸入西蒙之时，极需我这块招牌，作为他们统治内蒙古的工具，一时还不能弃掉。

我到达多伦后，心情是非常恶劣的。认为初和日本“合作”，就遭受惨痛的失败，

对日本关东军所谓对蒙古的帮助，有些失望。这时我忽然想起迪力瓦在“德化”和我说过的话：“你如跟日本人合作不来，不如趁早出走，周游世界各国，宣传蒙古问题，把蒙古问题提到国际政治舞台上。依靠世界各国解决蒙古问题，比靠日本一个国家解决蒙古问题好。”我回味迪力瓦这套话，觉得颇有道理，就转和吴鹤龄商量，表示不愿再和日本“合作”下去，想返我旗另作打算，没有把迪力瓦之言告知他。他认为我仍想和蒋介石拉拢，当即劝我说：“你的动作打算，无非是再想和蒋介石拉拢，据我看来，中国是打不了日本的，并且蒋介石并不想认真的打。在百灵庙蒙政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时，我曾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对日妥协的意图，向你谈过，并且日本人决不会甘心失败，从此善罢干休。现在日军既已占领平津，预料不久就会派兵到蒙古来。与其等到日本打过来，再与日本合作，那就被动了，不如现在主动地和日本合作下去，看看局势演变，再定行止。”经过吴鹤龄这样“痛陈利害”，婉言劝说，我遂将返旗想法打消。仍又收集“蒙古军政府”的旧部，重整旗鼓，借用多伦喇嘛庙恢复办公。

“德化”失守后，傅的部队又向前进攻康保，张北方面也有援绥晋军孙长胜骑兵旅对峙。田中隆吉面对这一情况，甚为焦急，特用客用飞机一架运兵，一次空运六名日本兵到达张北，计运了十余次，才运到六十多名。刘汝明听说日本军一到，便将布置在万全坝上的部队撤走，绥远军亦再未向前进攻，张北方面战局暂时又人稳定状态。田中隆吉听信河崎之言，认为弃守“德化”是王宗洛的责任，表示要加以惩治。嗣经王宗洛亲往张北面见田中隆吉，说明弃守“德化”是奉我之命，并非个人擅自主张，田中隆吉始予谅解。

在日寇指挥下进占绥远

到1937年10月间，大批日本军由多伦正向西开。听说阎锡山因重视山西老家，特把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调往雁门关内，原驻绥的傅、阎军队，即开始准备由察北和绥东撤退。伪蒙军便乘机反攻，我在多伦坐镇，用蒙文编成的密电指挥各师前进。先行集中伪蒙古军的炮兵，把在康保一带的绥军打退，继即占领了“德化”和商都，迫近了陶林。当时率队进攻陶林的刘建华（刘系汉人，蒙名阿木尔，当时任炮兵队长）曾向我说：“我们的炮兵打得很准，在进攻陶林时，一炮打中门炳岳（中央骑兵第七师师长）的司令部，门炳岳着慌即率队撤退，陶林遂为我们占领。”这时李守信率领一部分伪蒙古军进到集宁，我和吴鹤龄、陶克陶亦由多伦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张北。据陶克陶向我报告说：“据田中隆吉表示，他也掌握了绥军撤退的动态，因为他们的译电员能够译出绥军各部队之间的密电，就是你们德王的蒙文密电译不出来，不知是怎么编的。”由此可见，日本关东军不但常听绥军的军事秘密，就是我和蒙古军各师之间的密电也在暗查之列。这充分说明对我仍不放心。后来我为了免除日本方面对我的怀疑，特将蒙文译电本送给了他们，表示坦白。

我到达张北后，将伪蒙古军政府主要人事做了调整，尽量起用少壮人员，任命陶克陶为办公厅主任，陈绍武为内务署署长，张秉智为交通署署长。并由陶克陶率领职员随军前进，做慰问部队和接收工作。我率领数名职员，前往锡盟和百灵庙一带，会同雄诺栋都布等，发动各旗保安队，组织“蒙古各盟旗联合军”，计划从草原南下进占绥远。

很快与伪第九师包海明会合，逼近武川。李守信率领的伪蒙古军，也因傅作义移防山西，地方上仅有“国民兵”等少数部队，乘机向西进攻，仅在集宁、丰镇、旗下营等地发生过一些小的战斗，很快就迫近绥远省城，把日本军抛在后边。这时沿平绥路进犯的日本军，除命令李守信缓向西进外，桑原中佐（驻绥特务机关长）特乘飞机到达百灵庙见我，叫我通知第九师和盟旗联合军缓攻武川，等候日本军从凉城开到，再一致行动。他们的表面理由是，不要孤军深入，以防不虞。实际上是怕伪蒙古军抢先占了绥远城，丢了日本军的面子。因此我只有等候日本军到达，才于是年10月14日占领绥远省城，10月17日占领包头。同时武川亦为日蒙军占领，我即发表徐荣侯为武川县县长，其他各县由随军的政治接收班临时委派县长。我由百灵庙到达绥远省城时，吴鹤龄、陶克陶、王宗洛、德古来等，已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先期到达，遂和日本方面共同商谈，组织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这时派遣和马占山取联络的赵文儒，也由包头返抵绥远，向我报告说，马占山表示，决不向苏尼特右旗进兵，并用白缎写了一封信郑重表示此意。随着我军事的进展，马占山率队西撤，我跟他到了包头。由此可见，马占山颇有拉拢我之意。否则，他若当时进兵，占领我的王府是易如反掌的。

总之，我在这一时期中，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建立伪蒙政权，挑起绥东战役。战事失败后，又在“双十二”西安事变时通电拥蒋，指责张、杨两将军容共抗日，七七事变后公开投日，卖国求荣，复在绥远组成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神圣领土，成为千古罪人，俯今思之，愧恨万分。

（1965年）

伪蒙政权的回忆

李守信*

我在伪蒙政权机构中，曾任“蒙古军”总司令，并兼任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和参议府议长，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等职。因我专负军事责任，从不过问伪蒙的政治，故不知详情，仅就一些表面动态和现象，写成这篇回忆录，以供研究伪蒙史料的参考。

蒙政权内部的派系

从1936年5月12日，在嘉卜寺（化德县）出现的伪蒙古军政府（以下简称伪军政府）开始，它便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收罗了好几种类型的内蒙古反动人物拼凑而成的。其中包括封建王公、贵族或牧主、地主或“马贼”（蒙古土匪）匪首而转化成的文武官僚。从地理上区分，有察蒙、东蒙（东北四省蒙族）和绥远三大派系；从历史上区分，又可以分为亲德（德王）亲日和亲李（李守信）等三大派系。

1937年10月27日，“蒙古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盟政府）。1939年9月1日，这个“联盟政府”在张家口扩大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合政府），又吸收了“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两个伪政权，并安插进好多日寇在东北培养起来的“满系”汉奸。但中央机构的主要成员，仍是“蒙古军政府”时的那个班底，表面上一直由蒙族人当权。截至1945年8月20日，伪蒙政权随着日本投降而解体，根本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更。

在伪蒙政权中，汉奸大部分亲日，以后他们便成了日寇统治蒙疆的忠实爪牙。特别是“满系”汉奸，遍布伪蒙政权的中层和基层，非常贪横，就如同成吉思汗当年征服欧亚大陆时蒙古人所豢养的色目人，比日本人和蒙古人还坏。加之蒙奸里边，以卓索图盟和哲里木盟人最多，他们多半通晓蒙、汉和日本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完全接受了东北汉族人的影响，故察绥两省和山西晋北的蒙汉人民，在日伪时代都有受东北籍汉奸统治的感觉。提起蒙人里的喀喇沁和科尔沁两旗中少数为非作歹者，以及蒙奸和汉族人里的辽、热两省的极少数歹徒、汉奸，均极憎恨和仇视。

这是因为察哈尔省的蒙古族人中，除了德王和少数几个总管，再找不出提笔耍枪的人材，必须延聘和联合东北蒙古族中的知识分子与“马贼”头子；而绥远的蒙古族上层正如绥远、察南和晋北汉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一样，系由于家乡沦陷，被迫参加

* 作者曾任伪蒙古军总司令等职。

了伪蒙政权，一直处于附庸的地位。另外，东北蒙旗在京北和关东的范围以内，大部由牧业社会进化为农业社会，充当帝俄和日本的间谍，在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和呼伦贝尔等盟从事特务活动多年，“东蒙”上层的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比“察蒙”和“绥蒙”上层表现得强烈而突出，其中的一部分人和德王的政治野心相同。当1933年成立百灵庙的“蒙政会”时，就亲密合作到一起，所以他们和察哈尔的总管，形成伪满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德王最初系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又称苏尼特右旗）的亲王。在1933年末到百灵庙筹组“蒙政会”前，便是锡盟的副盟长，并和锡盟盟长诺木喇布坦（西乌珠穆沁旗郡王），察哈尔部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札布（字世海），担任了宋哲元主察时的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所以后来能够继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成为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首领，是因为“东蒙”在1933年春热河沦陷后，完全划归了伪满，王公官僚和知识分子与“马贼”头子大部被吸收到伪满的四个“兴安省”和“兴安军”里，故不能出头露面；“绥蒙”的王公官僚被蒋介石羁縻控制，归化城土默特旗有民族觉悟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走共产党的革命路线，绥远没有蒙古人率领的胡匪部队，无人起来兴风作浪；他便趁此空隙，从西苏尼特旗到北平活动，以“察蒙”作为后盾和本钱，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察蒙”、锡林郭勒盟的十个旗，以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最为殷富，特别是西乌珠穆沁旗因拥有盐湖，可以说有“日进斗金”的收入。1945年日本投降时，西乌珠穆沁旗王府的财富，被苏军抄去好几百辆汽车，未拆箱子的新枪即达一千八百多支。所以锡盟的王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完全以西乌珠穆沁的索王马首是瞻。德王的西苏尼特旗经济条件不及西乌珠穆沁旗，但位于张库公路①的乌得至滂江两旁，交通便利，德王比锡盟的其他王公见的世面多，思想较为复杂。加上他幼年常住北京和张家口，聘请过一个山东省的举人作老师，读过四书五经和汉族的其他史籍，历史知识较多，政治野心较大。且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了政治活动，被人们目为是没落的王公贵族阶级里的翘楚，统治察哈尔省的汉族官员对他非常重视。

德王还有一个倚为心腹的主要帮凶，即他的姨夫补英达赖。此人虽是平民，一因裙带关系，二因比梅林②之流有处事经验和逢迎手段，所以出任了西苏尼特旗“乌滂守备队”的队官和锡盟驻察省办事处处长，执掌了军队并参加了政务。德王于1932年秋，树起“复兴民族”和“抗日救国”两面招牌，便是补英达赖陪他跑到北平，同年冬天德王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时，补英达赖便潜赴大连，代表德王跟日本人进行初步勾结，这些活动的得意之作。因此补英达赖在伪蒙政权中，自居开国功臣。

当时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已经沦陷，溥仪被日本人劫持到长春，组织起伪满政权，通辽也成立起“蒙古自治军”。锡盟的王公看到日本的“满蒙政策”势在必行，既然德王出来跟各方面联络，团结蒙古各阶层应付未来的事变，便从拥护索王转而拥护德王。并且索王以下的锡盟王公以及察哈尔的总管，都很给德王捧场，故德王主使到南京

① 张库公路——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公路。

② 梅林—蒙古旧官制中的职称，相当于现在县（旗）的副县（旗）长。

向蒋介石请愿的“蒙古王公代表团”，是由东苏尼特的郡王郭尔卓尔札布担任团长。索王由“蒙政会”到“军政府”，一直给德王充当傀儡副委员长和副主席。“蒙政会”二十四个委员中，连德王、索王在内，“察蒙”方面就占去了八个委员。1933 年春汤玉麟放弃热河，同年夏我率伪军盘踞了多伦，因为形势逼人，“察蒙”的总管更成了德王的仆从。

察哈尔在内蒙古是一个特殊部落，其祖先林丹汗反抗清朝最力，被征服以后把王公取销，牧民除按照满洲军制编为八旗，另有商都牧群、牛羊群和太仆寺左右两个牧群，共是 12 个旗群，供清廷征调作战和给宫廷放牧牲畜。各旗群由非世袭的总管统治，并由直隶总督、张家口都统、山西巡抚和绥远将军分别管辖。总管都没有爵位，不能集中在一起会盟，清朝时很受歧视，王公称他们为牛倌、马倌。在乾隆年间就开始放垦设厅，早成了蒙汉杂居地区，牧民受汉族地主排挤，生活相当痛苦，因此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称帝时，察哈尔部的人到外蒙古的很多。1914 年北洋政府设立了察哈尔特别行政区，这 12 个旗群和锡林郭勒盟共同受皖、奉、直、晋军阀先后压榨。1928 年察哈尔由区变省，又把西边的正红、镶红、正黄、镶蓝四旗和牛羊群的一部拨归绥远，分成察北和绥东两半。

德王为了统一内蒙古，并以给察哈尔部建盟争取 12 旗群的总管，把他们和扎萨克列同等地位，且把“插花”在各旗群的“台站地”也让他们接管。因此 12 旗群里最出风头的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扎布，一直和德王狼狈为奸，他与补英达赖以及索王死后出任锡盟盟长的东浩济特郡王松津旺楚克，便成了蒙政权里“察蒙”方面的三大巨头。锡盟的王公郭王、雄诺敦都布和察哈尔部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与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等，以后也都成了“蒙疆政府”的军政大员。所以“察蒙”的总管，不论他们本人和外人，都认为他们是德王的嫡系，并且伪蒙政权先在嘉卜寺成立，以后又把“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察蒙”人更以主人翁自居。“蒙疆政权”的五个盟，他们领导着三个，在中央机构中也占有好几个重要职位。

“东蒙”人参加“蒙疆政权”，分为德王招来、日本关东军派来和我给带来三种不同的来历。所以背景非常复杂，不像“察蒙”人和“绥蒙”人那样比较单纯。德王招来的“东蒙”人，王公很少，因为他在百灵庙组织“蒙政会”时，“东蒙”已经完全沦陷，王公都被伪满拴住走不出来，只能让寓居在北平的几个闲散王公担任名义上的委员。伪蒙政权建立以后，他们连名义也不敢担任了。德王的“蒙疆政权”和哲布尊丹巴的那个“蒙古政权”相较，僧侣的色彩也很淡，这是德王看到贵族僧侣阶级已经没落，尽管德王拖着发辫和穿着长袍马褂，不过是用以象征民族特点。他知道蒙古民族的新生力量，则是接受了汉族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对“东蒙”流落在关内的失意政客和失业青年，加意接纳和收容，把其中的不少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由于这些人颇具才干，并且隐蔽了政治面貌，很受德王信任和倚重，实际上比“察蒙”的总管还要吃香。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特务，在伪蒙政权中人数很少，但因后台老板不同，以亲日派的姿态，和亲德王派的“东蒙”人，明争暗斗得非常激烈。后来亲德王派也表现了亲日，原来的亲日派便被战败，最后亲日派的首领陶克陶，叫亲德王的首领吴鹤龄赶出政务院。故“东蒙”的亲德王派在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时期，相

当地飞扬跋扈，和“察蒙”的那些总管，有很大的摩擦与矛盾。

我带给伪蒙政权的人，亦被人们列入“东蒙”的范畴里。其实除了我出身于热河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一个由奴才变为地主的蒙古族家庭，其余全是汉族官兵，所以我和我带来的人，也称为是“汉蒙古”。因为我主要是抓枪，虽由“蒙古军”总司令兼任了伪政府的副主席，并一度兼任过伪参议府的议长，但很少过问政治。以后我的几个汉族部下，也被吸收到伪政府里边担任最高检察厅长、部长、省长和市长一类角色，由于和日寇与德王的关系非常肤浅，正如“绥蒙”的王公与察南晋北的汉奸一样，只是坐官而不弄权，等于摆在那里的几个牌位。

群众的眼睛雪亮，主要替日本人统治“蒙疆”地区的，还是“东蒙”喀喇沁部与科尔沁部的蒙奸，和东北辽宁与热河的汉奸。热河的汉奸里边除了我带来的那些军官，还有和喀喇沁蒙古人有关系的汉族文人。所以伪蒙政权很可以说是“察蒙”总管和“东蒙”喀喇沁部贵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利用日寇侵华的机会，成立起的一家进行政治投机倒把、出卖民族利益的“德记”字号。我和我的喽罗们，一直被“德记”的老板与夥友看成是替他们护院站门的保镖，受他们使用的“炮手”。

由“军政府”到“联盟自治政府”

德王于1933年7月间，和“东蒙”的知识分子及“东蒙”的蒙古特务陶克陶等，在百灵庙叫嚷内蒙自治，筹组“蒙古自治政府”时，我已公开投敌，由热河进入察北，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压迫到长城底下，盘踞了多伦。其时日本关东军派“东蒙”喀喇沁部的蒙古特务金永昌和于兰泽，专做我的军队和察哈尔部的工作，并派科尔沁部的陶克陶，在多伦与百灵庙和西苏尼特旗之间奔跑。由于卓特巴扎布不敢表明态度，他们曾叫我兼任伪“察哈尔盟”的盟长，我怕影响掌握军队，没有答应。德王和我都是彼此闻名，还未发生横的联系。到1935年冬，我和德王才初次在多伦会面；1936年4月“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方合流在一起。

我没有参加过以前在百灵庙成立的“蒙政会”，只是听说委员里就有了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公处主任吴鹤龄，和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扎布，以及白云梯等“东蒙”的知名人士。补英达赖那时还未露头，在德王的背后筹划一切。“蒙政会”底下有秘书、参事两厅，民政、保安、实业、教育四处，和一个财务委员会，差不多都由德王招收的“东蒙”还未出名的青年知识分子把持。“察蒙”的总管在“蒙政会”的委员中，占去三分之一。“绥蒙”的王公和知识分子参加“蒙政会”，原来就非常勉强，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为了破坏德王统一内蒙，应绥远省方面的要求，实行所谓“察绥分治”，把百灵庙的“蒙政会”分成归绥的“绥境蒙政会”和嘉卜寺的“察境蒙政会”。从此，“绥蒙”方面就和德王唱对台戏，成了德王的反对派。

在“察绥分治”以后，日本关东军嗾使我的军队，于1936年元旦前夕，进驻张北县城，把察北完全控制，给德王廓清长城口外的地盘。他因百灵庙不好立足，便回西苏尼特旗，自任“蒙古军总司令”。日寇为了给下一步进犯绥东做借口，于1936年2月

间，怂恿德王到张北成立“察哈尔盟”。当时蒋介石曾派吴鹤龄和察哈尔任过总管的尼冠洲，由南京来张北劝德王悬崖勒马。日寇不知他们是应付公事，故在“盟政府”产生和卓特巴扎布担任盟长以后，尼冠洲在回张家口的路上，被张北特务机关派日本人乔装胡匪杀害。吴鹤龄因德王营救，从张北逃往西苏尼特旗，才得免于死。这一期间，白云梯也出现在张北城中，在我的司令部中住过好几夜。最后我听说，他是因和蒋介石闹别扭，从南京到百灵庙装做投奔德王。难怪他和吴鹤龄与尼冠洲不是一道而来，在张北对建立“察哈尔盟”也未表示自己的意见。日本特务机关对白云梯，还是调查了解得清楚，所以白和尼同车由张北到张家口由，仅将尼杀害而把白放走。

吴鹤龄从那时开始，便不离德王的左右，由“蒙政会”中的活跃委员，变成伪蒙政权里边的头等要角。四月间在西乌珠穆沁索王府召开的第一次“蒙古大会”上，露出他的含蓄的锋芒。那次会议是由索王担任主席和东道主，主要议程是讨论成立“军政府”。这是德王利用索王来团结“察蒙”的总管，并想取得索王在财力和人力方面的支持。所以会议期间，德王每天都按副盟长对盟长的规矩，对索王极有礼貌。但会议的倡议和决定，都是德王问过吴鹤龄又教给索王向众人传达，所以“乌珠穆沁会议”和会议所产生的“军政府”，可以说主要是由吴策划而成。这次会议我亦被邀出席，看见会场上很少“绥蒙”方面的人，除了“察蒙”的总管外，剩下尽是德王从百灵庙带过来的那些“东蒙”的知识分子，还有陶克陶、金永昌、于兰泽这几个“东蒙”的特务。我坐在德王的下首，可以看出伪蒙政权是“东蒙”人捧出德王搞起的一个小朝廷。

“乌珠穆沁会议”产生的“军政府”，于5月12日在嘉卜寺正式成立，虽然是过渡性质，而且是德王自起的国号，可是为了“代表”整个内蒙古，仍以云王、索王和沙王为正副主席，德王为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并由吴鹤龄任参议长，特克希卜彦为参谋长（后由吴的妹夫乌古廷接任）；补英达赖以办公厅主任、卓特巴扎布以“察哈尔盟”盟长，都兼了“蒙古军”的副总司令；我那个副总司令比他们只是多兼着一个第一军的军长；第二军的军长则由德王兼任，不过没有多少队伍。至于“政府”的军事、财政、民政和交通、外交、实业等署署长，由特克希卜彦（汉名王宗洛）、吉尔嘎朗（汉名德古来）、金永昌和于兰泽、陶克陶等分别担任，前两个人是德王在“蒙政会”时招来的“东蒙”人，后三个是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人，并且除了吉尔嘎朗是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人，其余和吴鹤龄与乌古廷全是卓索图盟喀喇沁人。

这时最受日本人信任的是哲里木盟苏鲁克旗蒙古族人陶克陶。他是受关东军的“嘱托”①，协助嘉卜寺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政府”和“蒙古军”的最高顾问田中久，监视德王和其它蒙奸的行动。所以翌年十月“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联盟政府”以后，陶克陶便一跃而出任了以后由日本人担任部长的“总务部”部长，成为吴鹤龄的主要政敌。他在嘉卜寺曾建议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像对待尼冠洲那样，把吴鹤龄也干掉，因德王在关东军政治参谋田中隆吉跟前为吴解释得免，故陶克陶迁怒于德王，由于惧怕我而未敢向德王进行打击和报复。

① 嘱托——意为特务。

1937年10月中旬，日寇的酒井机械化师团把平绥路西段打通，即折返长春附近的公主岭。包头以东和大同以西以及张家口的长城以北，交给我的“蒙古军”防守，日军以后即按机动部队使用，分驻于张家口、大同、归绥和包头等几个据点。包头以西以南的半个绥远，一直控制在傅作义的军队手中，日伪只占了伊盟准格尔旗黄河以北的“河套”和达拉特旗黄河以南包头对岸的几个滩头村庄。伊盟七旗除杭锦旗的郡王阿拉坦瓦齐尔投敌，其余王公都打着抗日的旗帜，乌盟也只是占领了四子王旗、达尔罕旗和茂明安旗。乌拉特三旗成了拉锯的战场，先是西公旗和东公旗的福晋①都把小王爷带人后套，最后连中公旗的王爷兼云王死后的乌盟盟长巴宝多尔济父子，也被傅作义从后山抢救到陕坝。日寇就是先在半个察哈尔和半个绥远的土地上，叫德王把“军政府”改组为“联盟政府”，替他统治压榨此一地带的蒙汉人民。

“联盟政府”于10月27日，在归绥正式组成，仍让云王担任名义上的主席。因索王这时已死，德王便担任了副主席，并兼政务院院长。把“蒙古军”总司令让出叫我担任，以调和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他本来计划叫吴鹤龄出任政务院长，因没有得到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的许可，让吴担任了与政务院平行的参议府议长。政务院下辖三部，由“军政府”时的军事署署长特克希卜彦任保安部部长，财政署署长吉尔嘎朗任财政部长，民政和交通两署的人都归并到总务部内，由陶克陶包办了一切。“军政府”的驻满代表金永昌，调往张家口的“蒙疆联合委员会”，交通署长于兰泽从此没落，充任了参议府的参议，后在张家口忧郁而死。

1938年3月间云王病故，7月1日德王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众人推选他担任主席仍兼政务院长，我被决定为副主席。不久我们到东京进行第一次访日，吴鹤龄坚决要留在日本考察，所以他没有归国，以表示崇日和亲日。吴所遗的参议府议长，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都抢着要兼。德王为了使他们两个人均没有话说，便让我把参议府议长兼起。日伪军进入绥包，“察蒙”和“东蒙”方面对“绥蒙”以征服者自居，云王死了后，伪蒙政权里边再就没有“绥蒙”方面的人了。特别是拼凑底下的五个盟时，德王为了酬谢他的姨夫补英达赖，把土默特旗和绥远中部九个市、县，察哈尔西四旗，绥东五县和固阳县，共是五旗十五个县、市，给补英达赖成立了一个“巴彦塔拉盟”，补英达赖遂由平民变成盟长。

“巴彦塔拉盟”是蒙地精华区域，其中的武川县除了占有土默特旗的土地，还占有乌盟达尔罕旗与四子王旗的土地。这不仅“绥蒙”方面敢怒而不敢言，连“察蒙”的总管也为之侧目而视。尤其是“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因为察哈尔仍被割成两半，更表示反对。德王自知理屈，后来伪蒙机构的大官以及对外出头露面的事，尽让卓去担任。如“联合政府”成立以前，让卓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蒙古代表；“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德把“政务院长”让给卓；吴鹤龄从日本回来“组阁”，把卓调为“参议府议长”，并派卓和“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去南京担任汪精卫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消卓的气愤。

索王、云王相继病故以后，五个盟里除“察盟”和“巴盟”外的盟长，锡盟任命

---

① 福晋——清王公的妻子。

了东浩济特旗的郡王松津旺楚克（以下简称松王），乌盟任命了中公旗的郡王巴宝多尔济（巴王到陕坝，由云王的儿子达尔罕旗贝子沙拉巴多尔济继任为盟长），伊盟任命了该盟七旗王爷中惟一投敌的杭锦旗郡王阿拉坦瓦齐尔。因为伊盟有国民党的好儿万军队防守，"蒙古军"虽曾于1938年春进入东胜和杭锦旗，但没有站住脚步，所以德王统辖下的伊盟公署设立在包头市内，除了有达拉特旗保商团长森盖林沁和准格尔旗贵族奇子祥率领的两部分比较能打仗的军队，行政上只辖有达拉特和准格尔两个旗公署。由于德王想叫伊盟的其他王公归附，故让康王的弟弟章巴拉多尔济代理达旗扎萨克，奇子祥代理准格尔旗扎萨克。

至于归绥和包头两个市长，由于归绥商务会会长贺秉温"维持"地方欢迎日军入城，归绥改称为"厚和"① 市，即由贺秉温担任了市长。包头则是因为我的军队驻防，把守着西边的门户，加之当地的汉奸不敢出任市长伪职，故由驻防包头的"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山东人）兼任了伪包头市市长。1939年9月1日，"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标榜蒙、汉、日、满、回"五个民族协和"。由于厚和新城有好几千户满民，包头有好几百户回民，且跟甘青宁新四省未断绝通商，故伪厚和市市长换成当地的满族旧军官李春秀，伪包头市市长由日本特务机关给派来一个东北回民金朝文担任。

五盟以下的旗仍由原来的王公、总管继任扎萨克和总管，只是土默特旗的总管荣祥参加了抗战，由该旗的知识分子墨尔根巴图尔（汉名亢仁）担任了总管，并兼任了"巴彦塔拉盟"的副盟长。旗以外的县长，初由当地"维持会"的人担任，以后全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德王以及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安插了"满系"汉奸和"东蒙"蒙奸，以及"察盟"蒙奸的朋友。"厚和"市长在贺秉温和李秀春中间，德王还叫他的一个安徽汉族朋友徐荣侯任过一度市长。"联合政府"成立后，五盟两市仍维持着"联盟政府"时的状态，并且我的"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驻在厚和未动，这是日寇要把军政隔开，德王也想叫我协助补英达赖看守"绥蒙"。

---

① 呼和浩特市名称沿革：

1575年 （明万历三年）蒙古俺答汗建成库库初屯城，（今旧城，蒙语呼和浩特异译），明朝"赐"名归化城。

1723年 （清初雍正元年）设归化城厅。

1739年 （清乾隆四年）在归化城东五里建成绥远城，即新城。

1913年 归化、绥远二城合并改称归绥县。

1929年 改为归绥市。

1937年 日本占领后，改称厚和豪特（亦呼和浩特异译）市，简称厚和。

1945年 日本投降后，复称归绥市。

1954年 正式改称呼和浩特市。

蒙绥合并后称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自治政府与绥远省政府合并成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设此，称为呼和浩特市，至今。

张家口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日寇在"联盟政府"建立以前，就随着他们军事上由东向西的进展，先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后在大同又建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察南政府是由张家口商务会会长、河北冀县人于品卿和刘汝明主察时的省政府秘书、山东黄县人杜运宇等组成。晋北政府是由大同前清的拔贡夏恭和大同商务会会长马永魁等组成。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驻蒙军"军部，为了便利管理、摆在平绥路上的三个伪政权，于联盟政府改组还不到一个月，把卓特巴扎布和夏恭叫到张家口，和于品卿一同接受命令，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开始把察南和晋北都划到"蒙疆"的范围内。该委员会下设总务、产业、金融和交通四个委员会，分由卓特巴扎布、陶克陶、金永昌、于品卿、杜运宇、夏恭、马永魁担任"总务委员会"委员，并且分工兼任产业、金融和交通三个委员会的委员，日本人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形成三个政权的上级衙门。

到了1938年7月间，"蒙疆委员会"扩大组织，把总务委员会以外的三个委员会取消，增加总务、产业、保安、财政、民生和交通六个部，由卓特巴扎布兼总务部长，金永昌兼产业部长，陶克陶兼保安部长，马永魁兼财政部长，杜运宇兼民生部长和交通部长。在委员会里，卓特巴扎布、于品卿、夏恭、马永魁，都是虚有其名，而陶克陶与金永昌和杜运宇三个人，才是该会的骨干。因陶克陶与金永昌系日本关东军豢养多年的特务，杜运宇除在日本留学还娶回一个日本老婆的缘故。陶克陶在此一阶段，既是总务部长，又是"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保安部长，可谓红极一时，经常坐着日本的军用飞机，在张家口和厚和之间飞来飞去。故"蒙疆委员会"的一切工作，主要是由金永昌和杜运宇两个人，秉承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意旨，操纵和监督三个伪政权。

"蒙疆联合委员会"设有总务委员长，日寇想叫德王担任，德王因为反对这个太上政府，故一再推诿而不接受。第一次访日便是为此想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并呼吁日本朝野协助他建立"正式国家"。东京方面虽然因金井章二不准吉尔嘎朗直译他的谈话，没有听到他的乞怜哀鸣，但是后来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把"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从厚和搬到张家口，受日本特务机关后来改成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有就近管辖。德王很不满足"自治"这个词，想赖在厚和不走以示抗议。经"驻蒙军"军部派政治参谋大桥熊雄和陶克陶到厚和对德王施加压力，而德王又恐怕日寇从蒙古人中另选"贤能"，因之，于1939年4月间担任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长，同年9月1日，在张家口就任"联合政府"的主席。

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是一个蒙奸和汉奸混合的伪政权，统辖五个盟和"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原属地区。"联合政府"在政务院和参议府之外，增加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政务院由三部扩大成七部，并且添了牧业总局、榷运清查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回教委员会和兴蒙学院等受正副主席领导的附属衙门，以及驻日代表部、驻满代表部和驻华办事处等外交机关。从表面上看，俨然成了一个国家局面。

联合政府比军政府和联盟政府的寿命都长。它从1939年9月1日成立，到1945年8月20日垮台，差十天存在了六年。初由德王和于品卿及夏恭三人，担任正副主席，卓特巴扎布为政务院长，吴鹤龄为参议府议长，我和乌古廷仍分担蒙古军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夏恭死后没叫“晋北”方面出人，由我兼了一个副主席。政务院底下最重要的总务部，完全由日本人把持，由关口保和武内哲夫任部长和次长，将陶克陶调为司法部长。因“联合政府”是由“蒙疆联合委员会”蜕变而来，故由“晋北”的马永魁任财政部长，“察南”的杜运宇任产业部长，蒙古的金永昌任交通部长。原来任“联盟政府”部长的特克希卜彦和吉尔嘎朗，一个任了驻日代表部代表，一个任了榷运清查署署长。“察蒙”卓特巴扎布以外的几个首脑，和我带来的几个“汉蒙古”，也在这个新的机构中出现，这就是巴盟盟长补英达赖兼了最高法院院长，锡盟盟长松王兼了民政部长，东苏尼特旗的郡王郭尔卓尔扎布担任了牧业总局局长，刘继广由包头市长升为最高检察厅长，我和另一个师长热河赤峰县人丁其昌调任治安部部长。

原“察南”“晋北”两个政府在改组为政厅时，由于过去宣化府属十县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日伪时期除了参加抗战外，大部避居北平，“察南政府”是由寓居张家口的几个客籍人组成，现在于品卿和杜运宇参加了蒙疆政府，察南政厅长官一职地方无适当人选，“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由伪满调来曾任次长的陈玉铭充任。晋北政府是夏恭和马永魁到了张家口后，把山西浑源的田汝弼（“安福系”政客田应璜的儿子，曾留学日本）担任“晋北”政厅的长官。

“联合政府”设立在张家口，受“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就近摆弄，内部是由日籍的总务部长关口保把守着主要的关口，各部会局署由顾问变成次长或参予官的日本人主事。从政府的重要人选看，表现了几根骨头众犬争，没给“绥蒙”的蒙古人和绥远的汉奸空出一份，夏恭、马永魁和田汝弼相继死后，晋北的汉奸也不能分尝一杯羹了。除了察南的于品卿始终是个牌位外，杜运宇根子很硬得另眼看待，“联合政府”里的要职，尽被“察蒙”“东蒙”人平分秋色。

我带来的“汉蒙古”能够参加联盟政府和联合政府，以后还领导了“宣化”和“大同”两省与张家口特别市，是因日本人和德王都怕我借水养鱼，而用官爵抽调我军队中的骨干。我的三个汉族师，以第一师较精锐，故他们从第一师下手，先把刘继广调为包头市长，我遂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担任第一师师长，去率领这个最能打仗的部队。在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时，德王既不愿“察南”和“晋北”往出提人，又怕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从伪满调人，特别是日寇和德王要把我的汉族师从蒙古军中拔出另编警备队，削弱我的兵权，使我没话说，提升刘继广为最高检察长，调丁其昌为治安部长。崔兴武和我驻在承德担任过办事处处长的热河阜新人李树声，德王想通过此人拉拢我的其它部下，除把他介绍给军统马汉三外，并继韩广森（河北南宫人，曾任张家口商务会会长）出任张家口“特别市市长”。

“察南”和“晋北”两个政厅，于1943年改为“宣化省”和“大同省”后，以地方人充任省长。大同省的省长由原来的“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继任，宣化省的省长弄出怀安县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李焕瀛担任。原“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充任了汪伪政权的“中政会”委员。因晋北的马永魁病故，田汝弼继任了由财政部改成经济部部

长，便调最高检察厅长刘继广为“大同省”的省长。李焕瀛死后把刘继广又调到宣化，把张家口特别市长李树声升到“大同”，李的遗缺由我的军需处处长（热河朝阳人）崔景岚继任。于是“蒙疆”五盟以外汉族聚居的两省和首都张家口特别市，似乎由我带来的“汉蒙古”进行统治，成了德王分给我的地盘。

“联合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41年2月间，德王率领我们到东京二次“访日”，归国时即把吴鹤龄带回。吴在日本考察期间，学会日文日语，娶个日本老婆，已经得到日本人的谅解。故在这年4月18日德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让吴鹤龄和卓特巴扎布对调工作，叫吴任政务院院长，卓任参议府议长。首先把陶克陶踢出，推到参议府担任参议，将司法部和产业部取销，让原来的产业部部长杜运宇改任了司法部长官；其次是将民政和治安两部改组，合并为内政部，由原治安部长丁其昌担任部长，原民政部长松王调任为兴蒙委员会的委员长，原财政部改为经济部，交通部改为交通总局，由马永魁和金永昌分任经济部长和交通总局局长。此外任蒋辉若为回教委员会委员长，特克希卜彦和恩和布林为驻日、驻满代表部代表，将原总务部改为总务厅，由前总务部的次长日本人武内哲夫充任厅长。从此吴鹤龄成了德王小朝廷的“内阁”总理，专权用事。到1944年年底，他看见日本快要完蛋，才知难而退，躲到北平去“养病”，执政时间约有三年半之久。

吴上台后，和乌古廷把他们家乡热河喀喇沁的不少蒙古人和汉人，都安插到县政府和“蒙古军”的团部里。乌古廷虽然没摆弄了我，吴鹤龄却在德王左右言听计从，将“察盟”方面的人全排挤出“政务院”，安排到冷衙门里，等于闲散王公；将“察南”和“晋北”的汉奸也摒弃于圈外。自从田汝弼死了以后，“部长”之中便没有了“晋北”的人。但吴鹤龄却不敢捋动察南的杜运宇，杜既有靠山又有才干，不仅担任“司法部长官”，还兼任了田汝弼遗留下的“经济部部长”。金永昌看见陶克陶失掉了权势，知道日寇把吴鹤龄视为头面人物，看陶克陶和他是一般的特务，以后也变成了随风倒，在吴鹤龄前不敢表示有恃无恐，直至“联合政府”垮台以前，尚能保全官职。

我因有枪杆子撑腰，吴鹤龄对我和我的人颇为客气，故丁其昌得以蝉联下去，刘继广和李树声也能调出去领导“宣化”和“大同”两个“省”。可是他对副主席于品卿，却两样对待，“部长”以上的人都有专用卧车，于在开会时才派公用卧车接送。于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便回他的商号中去当经理。他像“察蒙”的那几个总管一样，见了吴鹤龄高声话都不说，老是曲腰称“是”，连一个私人也无权举荐到“政府”里担任小官。吴鹤龄任“政务院长”时代，其气焰炙手可热，所谓“蒙疆地区”越发成了“东蒙”的蒙奸和东北的汉奸横行的天下了。

政务院院长吴鹤龄

吴鹤龄出身于喀喇沁右旗的一个蒙古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任过“扎楞”[①]，所以自幼即通晓了蒙、汉两种语言文字。青年时即到北京读书，从北京的法政专门学校毕业

---

① 扎楞——旧蒙古官职，相当县以下的区长。

后，还给蒙藏学校讲过宪法。1925 年到 1927 年的大革命时代，他和白云梯处于对立的地位，白等主张取消王公制，他要维护封建制度。在 1928 年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内蒙自治”的要求，当时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委予“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又受到“东蒙”王公的推荐，当了驻京办事处主任。

德王在未出穹庐以前，就知道要想在政治舞台上高爬，必须延揽人材，求得文人武夫的扶佐。因而 1929 年秋，他从西苏尼特旗到北平，初出风头，便装做求贤若渴的样子，给蒙古族青年的印象是谦恭下士，便有以后被吴鹤龄称为“小鬼们”的“东蒙”青年陈绍武、陈国藩、丁我愚、于宝衡、瑞永和陶立宾等，先后在北平和南京追随他的左右。这时吴已经和白云梯、李永新齐名，德王早有耳闻。在南京见吴后，一睹风采和一听谈吐，两人一拍即合，恨相见之晚，从此德王就把吴鹤龄视为自己未来的“辅弼”。

1933 年德王在百灵庙打起“内蒙自治”的旗帜，国民党中央十月间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前往百灵庙进行巡视，吴鹤龄以两面手法讨好蒋介石和德王。这时他已是内蒙古的驻京代表，当内蒙古要求脱离察、绥两省实行自治时，宋哲元和傅作义主张必须由察、绥两省节制，双方争执各不相让，使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吴鹤龄由南京前往百灵庙，替国民党中央进行斡旋。可是再度谈判开始，他又站在内蒙古方面力争脱离两省实行高度自治，弄得黄绍竑无法接受。后经班禅出面调停，才决定了成立“蒙政会”的折中办法。由于吴鹤龄应付灵活，竟将国民党中央骗过，因而 1936 年春德王在察北建立“军政府”前夕，蒋介石又打发他前来劝阻。吴鹤龄看大利不占小便宜，他担任了“蒙政会”委员和驻京办事处长，对于国民党中央拨给“蒙政会”的经费物资，从没有揩油装腰包，在内蒙古的官僚政客里很少有这样的“操守”，因而更取得了德王的信任和倚重。

在 1936 年 2 月间，吴鹤龄由南京到察北，他在张北阻挠察哈尔建盟没有成功，同行的尼冠洲被日本特务杀害，他被德王营救脱险，护送到西苏尼特旗后再没有回南京。四月间“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我到西苏尼特旗去找德王，见吴被招待在王府东小院的三间静室里。他整天阅读线装古书，不和旁人来往，因为多年茹素，在吃饭时也不出小院，装作道貌岸然，只是德王常去看他，二人谈到深夜才散。当时他很不引人们的注目，在“乌珠穆沁会议”上才显出他的“才干”，被蒙古族人誉为“圣人”，并更加遭到日本特务机关的猜忌。

“军政府”成立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最高顾问田中久，认为吴被蒋介石打发来操纵德王，曾和陶克陶计划派刺客杀他。德王为了他的安全，又把他弄回西苏尼特旗，故吴虽任参议府参议长，但不在嘉卜寺上班办公。日本关东军的政治参谋田中隆吉来到嘉卜寺，德王说吴忠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已经和蒋介石完全断绝关系，他敢以身家性命做为担保。并说：“你们既然承认错杀了尼冠洲，对团结蒙古人建立东亚新秩序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果再把吴也干掉，蒙古的知识分子谁还敢来嘉卜寺为军政府服务。”经德王的再三解释，田中隆吉才叫田中久把吴放过，并且在改组“联盟政府”时，让吴担任了参议府议长，给以后“组阁”创造了条件。

吴鹤龄在归绥的时候，把原配女人从喀喇沁老家中接出，住到新城深居简出，很少

参加社交上的应酬。“政府”开会时，也是打着一般的官腔，没有会议即不上班，回家闭门读书。他因为精神苦闷，偶尔下旧城到我的家里吸鸦片，并和任过绥远通志馆馆长的归绥汉族文人郭象伋，研讨内蒙古的历史沿革。此人不仅小事聪明，而且对大事也有一定见解。他在我家初吸鸦片时，一分钟就把打烟泡学会，以后抽得上了瘾，问我要上药丸毅然戒绝。他从郭象伋那里借到不少古书，把长城内外各县的志书完全看过。他向我说：“元朝所以失败，明朝的鄂尔多斯部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只会焚掠残杀，懂不得用政治收买汉族人心。我们要想在此一区域能够长久呆下去，应该仿照清朝康熙皇帝的做法。”

我在这些方面，对他产生了钦佩的情感，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投降了日寇，未免可惜。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也和我们落水到一起?”他说：“我在南京时，见军政部挂着一张全国地图，把标志军队布防的箭头，都搁在黄河南岸，证明国民党已把华北放弃，将蒙古扔掉。并且听说蒋介石因全国人每人平均只有五颗子弹，故不敢抗战，要进行曲线救国。何应钦主张退守黄河以南，以争取外援，叫他暂缓投降。我感到抗战没有前途，就跑回来了，想协助德王拯救咱们的民族，使得少受一些灾难。”他对别人也是如此说法，让蒙古族人和日本人听见都不刺耳。

“联盟政府”成立时，德王由副主席兼政务院长，让吴鹤龄任参议府议长，就打算叫吴“组阁”。因为当时日本人对吴还很怀疑，同时陶克陶也以“开国功臣”自居，看到自己在哪一方面也比得上吴，所以到处对吴造谣中伤。德王既怕日本人，又不敢得罪陶克陶，他们遂用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在我们第一次“访日”时，把吴鹤龄留到东京进行“考察”，实际上叫日考察他。我们第一次“访日”，大概在1938年年底，吴在日本呆了两年，到1941年2月，我们二次访日时，即把他带回张家口。吴鹤龄走时把参议府议长辞掉，走后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还派宪兵搜查过他的新城的住宅。因为吴不留痕迹，结果一无所获，所以1939年扩大组织“联合政府”时候，他虽然身居国外，但仍给他留下一个参议的位置。

吴鹤龄在东京的两年期间，日本方面按“外宾”对他招待，他很快就学会日文和日语，并娶了日本老婆。他所以要娶日本老婆，完全是为了表示亲日。我们二次“访日”时，他住在一幢很雅致的小楼里。他指着那个日本女人，用汉话和我说：“我半年就学会日本话，她快两年还听不懂中国话。我跟她结婚，是他们的人给介绍的，故她来我这里，负有监视我的使命。经过我对她体贴，她对我很忠实，已经在精神上脱离了日本国籍，成了咱们蒙古的女人了。去年日本的宪兵还不断来我这里，在楼底下问她要关于我的情报。她什么也不说，逼得没办法的时候，只是痛哭，我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听得非常清楚。宪兵走后她跑到楼上，把经过一五一十地都告给了我。”由此看来，吴很会应付环境。他在东京期间，从事社交活动，和日本的一些权贵人物来往，最后终于使日本“兴亚院”由怀疑转变为信任。

在吴出国期间，陶克陶以“联盟政府”总务部长和“蒙疆联合委员会”保安部长的双重身份，大肆贪污。分配的经费节余时，他比德王分得还多，竟达到30万元，数字相当惊人。他改任了司法部长以后，仍然受贿和揩油，并且顾头不顾尾，连日本人也敢吃喝。“联盟政府”的最高顾问宇山兵士托他向我借了两万元，他就从中克扣了5000

元，因此名声狼藉，引起日寇和蒙奸的公愤。吴鹤龄的这个政敌，没有经过吴的打击而自己倒了下去，所以吴从日本回来不久，就由参议府议长调为政务院院长。

吴鹤龄执政以后，先是引用自己的亲信故旧，硬往政府各部门中插人，分布了好多羽翼。他和我的参谋长乌古廷是郎舅关系，乌古廷引用的多是喀喇沁的武人和“东北讲武堂”的汉族同学；吴鹤龄引用的除了老朋友和老同学外，还有他二弟吴椿龄在喀喇沁培养的蒙汉族学生。

在吴鹤龄引用的私人中，有一个蒙古人戴仲元和一个汉族人罗励甫最为吃香。我忘记了他们所担负的职务，人们都称他两个为吴鹤龄的“哼哈二将”，一个给吴在张家口和北平倒卖房产，一个给吴在天津、北平做投机倒把生意。我在张家口上堡的那处院子，就是戴仲元倒卖给我的。戴是以房产做抵押放高利贷，到了业主无力赎回，便以低价卖给他，他再以高价售出获利。吴鹤龄干了一年多政务院院长，看见日寇挑起太平洋战争，感到德王的政权好景不长，趁此不大捞一把尚待何时，便叫罗励甫利用“政府”的公款，大做买卖。由于罗闹得太不像话，遂引起“察蒙”方面的反对，因此吴鹤龄还向德王闹过一次辞职，经过德王给他下了一跪，他舍不下捞钱的机会，才又厚颜无耻地继续干了下去。

原来察绥两省和山西的雁门关外沦陷时期，出口大宗皮毛、牲畜、粮食、煤炭、盐碱和鸦片。这些战略物资和土特产品，除了由日本的“驻蒙军”军部和日本的各种“株式会社”控制，也由“政务院”经管一部，详细的情况我不大了解。我只知伪蒙每年卖给“华北”十五万头羊，按“华北”的伪钞折价，由罗励甫负责此项牲畜交易。罗励甫收到羊款以后，他不马上交给“蒙疆银行”的“北平办事处”，而是将款套购成黄金、布匹，等待“华北”伪钞下跌到一定的程度，才带回张家口结账。这样罗励甫从中获得了暴利，蒙古王公、总管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结果卖出一头羊，用羊价买不回一张羊皮。乌盟在朝中无人，巴盟和察盟产羊很少，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碍于德王的情面，不好意思顶撞吴鹤龄。锡盟不但产羊很多，而且盟长兼“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王从不让人，因而在一次正副主席和盟长们召开的会议上，当众把此事端出。

我比德王爱交际应酬，在归绥和张家口的院子，都较德王的公馆讲究吃喝，雇有山东厨师和备有鸦片烟灯，“政府”的一些首脑们，均爱到我的家中聚谈。那次会议的正题目，是向各盟征兵，以补充“蒙古军”的缺额，在我的客厅中举行。可能是几个盟长事前开过小会，大家坐定未谈正题以前，松王劈头就提出卖羊的事情。吴鹤龄说：“我不知道此事，可以叫罗励甫来给大家交代”。松王的秘书当即给“政务院”打去一个电话，罗还以为是吴对他吩咐别的事情，所以带着一个公事包走来，以致嗫嗫嚅嚅地无话可答，吴便以蒙语替罗解释，使罗好能措辞。松王一看此种情形，手指着吴和罗，用汉话挖苦地说：“噫！叫他交代，你给翻译，哈哈你们两个人……”弄得罗越发呆如木鸡，吴更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德王和补英达赖与卓特巴扎布等都不吭声，我看陷入僵局，便用“不要谈你们的羊了，先说我的兵吧，如果没有兵，狼来吃羊谁给你们打”的逗趣话，才给吴鹤龄解了围，松王也就坐在沙发里面。

不料讨论到兵上，会场又起了风波。德王私心很大，处处偏袒他的西苏尼特旗，给西苏尼特旗拨的款项多，向西苏尼特旗要的差事少，早就引起锡盟九个旗的王公不满。

松王由于怒气未消，便在征兵数额上和德王争执起来。此次向锡盟征兵四百人，本来数字很少，松王偏说锡盟没有如此众多的适龄壮丁，很使德王难堪。德王由于松王奚落了他的宠臣，也老羞成怒，板起主席的面孔，非叫松王答应不可。松王说："你如硬要，我把喇嘛给你送来。"德王说："我保护宗教，不要你的喇嘛。"两人在会场上吵起了嘴。吴鹤龄是想给德王找台阶下，问松王"少出几个行不行?"德王因松王和他发态度是由于吴引起的，所以说吴"你少插嘴"。吴鹤龄一听此话，把满肚怨气都向德王发泄，他对德王说："你是元首，我是院长，元首当众羞辱院长，这成什么体统？我现在向你告退，请你另选贤能。"说完拂袖走出客厅，到我的卧室中吸鸦片。我装作劝解，也跟着他走进去。

吴躺在我的烟榻上，很伤心地和我说："主席给我这样的钉子碰，我这个政务院院长怎能再担任下去?"我只是说："你多抽几口消消气吧。"我们正说话中间，德王亦从客厅中跑了进来，他什么话也没说，便"扑通"一声跪在床前，将手搭在吴的腿上，吴抽了一个烟泡，才跳下床把德王搀起，两个人沉默了十几分钟，我便把德王拉到客厅中重新开会。我将锡盟征兵的名额，由四百核减为三百，松王再没说负气的话，会议草草结束。散会后德王和吴因各怀心事，坐上汽车各自回家，其余的人被我留下吃饭，便在餐桌上纷纷议论起来。

松王首先说："他给吴下跪，等于给所有的王公丢人。"卓特巴扎布也说："他就认得吴是人材，把咱们都当成土包子来看待。"我亦因德王给吴下跪，联想到他削我的兵权，利用日本关东军与"驻蒙军"军部向我施加压力，思想上受上很大的刺激，由于补英达赖在座，没好意思发泄心中的牢骚。这顿饭是用德王和吴下酒，所以每一个人喝得很多，因为均有受德王驱使和被吴利用的精神苦闷。此一场闹剧是吴"组阁"以后第二年上演的，地点在我下堡的院子里，时间在1942年这一年内。吴虽被"察蒙"方面反对，但他被德王视为一刻也不能离开的灵魂，吴也舍不得"院长"这个高官肥缺，在家里呆了几天又去"政务院"上班。

日本投降的前一年冬天，吴的宦囊已经很满，一方面看到日本快要完蛋，恋栈无好下场；另方面日本人怕他留在"蒙疆"给德王和我出主意，也有意把这个危险人物排除出去。他便以养病为名，辞职躲到北平观风。日本投降以后，他除分到很多日本丢给蒙奸的物资外，还把德王和我耍弄到重庆，重新进行政治投机。蒋介石委他军委会蒙古宣导团主任，他的妹夫乌古廷也担任了东北行辕的少将高参。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他俩把北平的财产都变卖成黄金，完全转移到台湾。1949年夏德王和我到阿拉善旗，又搞"内蒙自治"，他俩去阿旗绕了一次，知道凶多吉少，便从兰州坐上飞机逃走。在伪蒙群魔里，吴、乌是两个得了实惠而现在仍然逍遥法外的战争罪犯。

德王对待蒙奸、汉奸的态度和手段

首先德王对汉人怀有成见，除我这个"汉蒙古"外，认为其他的汉奸都不可靠，特别是日本人给安插进的"满系"汉奸和一些留日的汉人，都示意蒙奸要严加防范。跟日本没有历史渊源，由"维持会"冒出的汉奸，如张家口的于品卿、大同的马永魁、

“厚和”的贺秉温等，德王和补英达赖对他们很不客气。贺秉温因为当了“厚和”市市长，到处受气，感到居官不如经商，等到“土药组合”成立以后，他便跑到张家口担任了这个“组合”的理事长，又经营了他原来的烟土生意。德王因读过汉文书，见了大同的夏恭，比对别的汉奸稍稍有些礼貌。此外对于杜运宇这个汉奸，因为杜的根底硬和能力强，德王另眼看待，有时也采纳他的意见。例如张家口最初也有聚赌的“俱乐部”，把“首都”弄得乌烟瘴气，就是经过杜的建议，由德王下令驱逐到崇礼县的。

其次，德王把“察蒙”的蒙奸，当成自己的嫡系，尤其对他的姨父补英达赖，可以说言听计从。政府由厚和移到张家口之后，补在厚和、张家口中间来回奔跑，一方面替德王监视我和“绥蒙”的王公；一方面参加德王的各种机要活动。德王给补英达赖成立“巴彦塔拉盟”，引起“察蒙”总管特别是“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的反对。他为此让补和卓结为儿女亲家，以缓和这种矛盾。不料补英达赖的儿子赵宝纲，把卓特巴扎布的姑娘休弃，两个人弄得更加不和，开会时补出席卓就不出席。以后德王挑大官叫卓特巴扎布去坐，但又引起锡盟盟长松王的醋意。由于松王只兼着一个“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松王后来团结锡盟的其他王公，反对德王和吴鹤龄，把壮丁充实他的“防卫师”，而不愿给“蒙古军”补充缺额。日本人叫各盟成立“防卫师”，我忘记是诺门罕战役以后，还是张鼓峰战役以后，日本人为充实边防，想把蒙古人武装起来防苏。我曾建议德王趁此多向日方要些武器，德王恐怕盟长们有了军队，越发不听他指挥，结果没有积极进行。后来日本人变卦，以致把机会错过，只是盟长们挎起战刀，士兵仍使用着旧枪。

再次，绥蒙的王公只有乌盟达尔罕旗的云王（云端旺楚克）、四子王旗的潘王（潘德恭扎布）和伊盟杭锦旗的阿王（阿拉坦瓦其尔）一直和德王合作。云王虽被德王拥为“蒙政会”的“委员长”和“军政府”与“联盟政府”的主席，但云王死了以后，并未重用他的儿子沙拉巴多尔济，只是叫沙贝子任了乌盟的副盟长，中公旗的巴王（巴云英）到了陕坝才升为盟长。四子王旗的潘王死了以后，也只是让他的儿子索那穆绰克珠尔袭任了该旗的扎萨克。杭锦旗的阿王，一直被德王搁在包头，尽管他的“防卫师”战斗力不弱，亦没有叫他参加德王当副主席、主席的“政府”。

厚和城土默特旗的蒙古知识分子，文化程度和领导才能，并不低于喀喇沁和科尔沁的蒙古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多数是德王的反对派，走着革命路线或参加了抗战阵营，故德王对土默特旗的人民按被征服了的汉人来看待，让补英达赖去进行统治，只把一个参加过百灵庙“蒙政会”的默尔根巴图尔，安排为土默特旗的总管，兼“巴彦塔拉盟”的副盟长。默在日伪时期，从不出头露面，所持的态度和普通的汉奸差不许多。土默特旗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贺云章，因留学日本的关系，被留用为归绥毛织厂的厂长。他虽给德王拉过皮条，但没有被德王重用。贺因和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来往，跟补英达赖手下的梁致祥与萧兆赓一案，被日本特务机关扣捕，梁、萧经德、补保释，贺由于没人给说情，被日寇用凉水灌死。这正如同“厚和”日本特务机关扣捕起一百二十多个教员，每天三三两两地拉到新城东门外活埋，我叫补英达赖出面营救，他说“咱们不管汉人”一样。

最后，德王最重视“东蒙”的蒙奸，根据不同的来历分别对待。在百灵庙“蒙政

会”前后拥戴或投效他的知识分子，大都倚为股肱，如吴鹤龄真有才干，让他“组阁”出任政务院院长；乌古廷和宝贵廷善于投机，先后担任了蒙古军的参谋长；吉尔嘎朗和特克希卜彦为人很正派，故一直让吉经管财政，并兼了兴蒙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特克希卜彦先主持军事，以后出任了驻日代表部代表。还有一个“东蒙”知识分子包悦卿，他在蒙政会任过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军政府时代任过蒙古军第八师师长，以后任蒙疆银行总裁，1937年夏在多伦病故。此人如果活到联盟政府和联合政府时期，地位也不在吉尔嘎朗和特克希卜彦以下。

吴鹤龄称为“小鬼们”的“东蒙”青年，给德担任随员和秘书，每天晚上在德的公馆中办公，和补英达赖在一起，跟德王商讨大事。吴拟出的各种底稿，都经他们修改后才明文规定，故他们和吴时常发生摩擦。其中有陈国藩的内兄丁我愚，则是派到西苏尼特旗给德的小王爷都嘎尔苏龙担任小丞相。因德领导了蒙古伪政权以后，即把他的扎萨克职位，让给他的长子。上述的这几个“小鬼们”很能迎合德王的心思，德王弄下的不少造孽钱，多被他们五鬼分尸。吴鹤龄辞职以后，他们也采取了吴的手段，把日本“会社”用来向蒙旗换取皮毛的物资，都堆到张家口东山坡上的仓库里，不给各旗分发，想从中牟利。我建议德王让运盐骆驼和勒勒车①的回脚向各旗运输，他没有理睬，结果日本投降时，给张家口的地痞流氓和苏联军队做了“好事”。

由日本关东军派到德王政权中的几个“东蒙”特务，除会说日本话外，几乎没有一个有才干的，并且品行极端恶劣。陶克陶是个大流氓，喜怒哀乐完全表现在脸上，他的内心活动，很容易被稍微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看出。金永昌尽占人的小便宜，而不会弄大的钱，把好几十万存在邮局里，结果全变成废纸了。于兰泽在投日以前，曾到南京投奔过蒙藏委员会的乐景涛。德王对于这几个人，在表面上不敢得罪，像对待杜运宇那样，有时也听他们的话，等到他们渐渐不被日本人信任之后，就跟他们疏远。在“厚和”改组“联盟政府”时，便没给于兰泽要职。到张家口扩大成“联合政府”不久，又把陶克陶踢出“政务院”，把他俩都打发到“参议府”。只金永昌能看风使舵，由亲日转为亲德捧吴，保住了一个“交通总”局局长。如同把我的两个卸任师长尹宝山和陈景春，也安排到“参议府”，以示不忘旧人，并且使得他们能在“蒙疆”地区继续鬼混下去。

因为“蒙疆”的武力基本上掌握在我的手中，所以德王对我和我带来的“汉蒙古”，曾使过不少笼络和收买的手段。他知道我是地主出身，很爱土地和牲畜，故表示要从他的西苏尼特旗给我拨地，让我派人前去设立“窝铺”②。我对他说：“领了你的土地，岂不是成了你的奴才”。他见我拒绝接受，又要我买羊到西苏尼特旗放牧，我因盛意难却，托百灵庙驻防的宝道新，从达尔罕旗买了五千多只羊，他叫牧工给放得很好。因为德王在“厚和”纳范玉英（即金娥子）为外室，他的女儿迁怒于我，把我的好羊倌换走，使我的羊群受了很大损失。我只赶到“厚和”二百只，让“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大伙吃掉；剩下六千多只和德王的全部牲畜，都在日本投降以后，被苏军赶到

① 勒勒车——内蒙古民间用的木轮牛车。

② 窝铺——在野外从事农、牧业生产盖搭的临时住所。

了外蒙古。

德王为了收买我的部下，不仅把我的亲信刘继广、丁其昌和李树声等，抽调到政府里担任了部长、省长和市长，并且把他们和几个仍在带兵的汉族师长，都介绍给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委状，给他们另找政治出路，以削弱我的力量。蒙古军除了三个汉族师，还有六个蒙古师。这几个蒙古师长起初分亲德和亲日两派，以后他们多数都倾向了我。德王为此于联盟政府时期，曾在他的西苏尼特旗仿照蒋介石庐山训练团的办法，想把蒙古军师、团长以上的军官，分批弄到王府去受训。因为订出禁止吸食鸦片等纪律，并且让他们和他在一起过住帐幕、吃炒米的艰苦生活，他能坚持下去，大家都感觉吃不消，徒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并没有给蒙古军官灌输进去些什么，并且收到相反的效果，只办了一期再没继续办下去。

（1966 年）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

德穆楚克栋鲁普*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改组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占领平津后，侵华日军就派坂垣师团进攻南口。打开南口后，继续向张家口进兵。日本关东军又派出酒井机械化部队，通过多伦、张北等地进攻张家口。这时，我和李守信也纠合伪蒙古军的主力，先占领了化德，接着即配合日军向西进犯。在两路日军分进合击及伪蒙古军的配合下，于8月29日占领了张家口。先由于品卿、杜运宇等组成"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特来张家口与坂垣征四郎会见，接着又集中两路日军向西进犯，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先由夏恭、马永魁等组织"治安维持会"，继而即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

坂垣师团占领大同后，即南向进攻山西太原，酒井部队则进攻绥远。这时伪蒙古军集中主力在平绥路配合日军作战，并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进攻陶林、武川。伪蒙古军全系骑兵，往往走在日军前面，作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前驱。在日、蒙军配合进攻下，10月14日占领了绥远省城归绥，10月17日占领了包头。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德古来）、特克希卜彦（王宗洛）等，也由张北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旧绥远城。

这时，我正在百灵庙组织伪盟旗联合军进占武川，企图为进占归绥卖力。旋接到吴鹤龄和陶克陶等来电，催我赴绥，商洽"建国"大计等重要问题，并说"万勿因小而失大"，即派飞机来接。我即以"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委派随从人员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并发布了安民布告，然后乘飞机到绥。

经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决定于10月28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讨论建立伪政权问题。确定通知参加的人员是：1. 各市、旗、县民众代表一名；2. 各旗札萨克或总管；3. 各伪市、县长；4. 经许可之地方代表和团体代表；5. 各盟长、副盟长；6. 伪蒙古军总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参谋副长、各师长、各处长；7. 驻外代表；8. 伪蒙古军政府主席、副主席、总裁、主任、部长及各署长。把召集开会通知以伪蒙古军政府名义发出后，一面组织第二次"蒙古大会"筹备会，由特克希卜彦负责进行筹备。一面我和吴鹤龄、陶克陶、吉尔嘎朗等与日本方面商洽成立伪政权问题。迨至锡、察两盟"代表"到达后，我们就提出"蒙古独立建国"问题，请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和伪蒙古军政府顾问部主任顾问部村谷彦治朗，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村谷答

---

* 作者曾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政务院长主席。

复说："蒙古独立建国问题，关系重大，牵涉到国际上《九国公约》问题，需要关东军和日本国内慎重研究，一时不能确定。"我和各盟旗"代表"们又提出："'蒙古建国问题'，既经第一次蒙古大会决议，田中隆吉参谋也早有帮助的诺言，这次田中隆吉到达张北，也曾为此问题，向驻大同的东条参谋长请示，据说俟攻占绥远后，就帮助建立'蒙古自治联盟国'。现在已经攻占绥远省城，而蒙古建国反倒成了问题，我们身为盟旗的代表，还在此地做什么，各自回旗就算了。"村谷急切地答复说："你们这样说，不是连关东军的话都不听了吗？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不要急于回去。"

当时我认为村谷彦治朗和桑原特务机关长职位不高，对于"蒙古建国"这样大问题，自然不敢提出什么主张，因而我曾和日本驻在归绥的部队长酒井隆商量，希望他居中帮助。我向他说："蒙古建国是田中隆吉的诺言，为什么现在又不算数呢？"酒井隆答复我说："田中隆吉这个人非常冒失，他主持进攻绥东时，我正在天津，曾去信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不听，一意孤行，结果遭受失败。至于'蒙古建国"问题"'，关系重大，非经日本帝国政府研究并经御前会议，不能做出决定。田中隆吉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怎能决定这样大的问题？他当时敢于应承你们，是因为非常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实际上是不顶事。"嗣后，我又和吴鹤龄等研究，认为"蒙古独立建国"既然一时不能实现，即可以"蒙古军政府"作为政权机构，不再成立新的政权。理由是：蒙古原有领土还未完全"恢复"（伊盟尚未沦陷），现在仍是军事时期，所以提出仍以"蒙古军政府"为政权机构比较合适。经和日本方面商量，仍然不同意，授意我们成立与察南、晋北相同的伪政权。

我又与吴鹤龄、陶克陶等商量，应该成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吴鹤龄说："我们就组织'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吧，因为我们现有几个盟，是联合各盟实行自治的意思。我总觉得，田中隆吉说的'蒙古自治联盟'很别扭，不如反转过来叫'蒙古联盟自治'较为通顺。"我同意了吴鹤龄的说法，就责成他拟具"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主席、副主席，下设政务院，管理政务，设蒙古军总司令部，管理军事。拟好后交由桑原和村谷等转请日本关东军研究决定。

嗣即接到日本关东军的电报通知，表示同意，但仅列有主席，没有副主席，并指定我为伪政务院长，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吴鹤龄看过之后向我说："日本关东军这种做法，是居心挑拨。人事安排，本来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决定，可是他们却越组代庖，先为指定了。并且在'蒙古军政府'时期，你是总司令，李守信是副司令，这次日本关东军却指定李守信为总司令，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但也不好再变动。假如不照关东军指示行事，必然招致李守信的不满。"接着他又说："主席一职本应由你担任，但必须云王（云端楚克）表示不就，才为妥当。要不我去面见云王，劝他自动让出主席一职，推崇他为元老，你看怎样？"我当答复说："云王年高望重，仍宜推为主席，我当政务院长就行了。"我说这话不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仍以云王任伪主席为宜。因这样既便于号召各盟旗王公，又符合日本关东军的意旨，但实权仍归我掌握，云王不过徒拥虚名。对我个人来说，是有利无害的事情。并为了避免内部发生矛盾，也就依照日本关东军的意见，内定李守信为总司令。

这样商定之后，各地代表均已到齐。计锡盟参加者：伪副盟长林沁旺都特、扎萨克

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布达巴拉、巴拉贡苏隆、多不丹等；察盟参加者有：伪盟长卓特巴札普、总管达密林苏龙、色楞那木济勒、诺尔布札那等；乌盟参加者有：伪副盟长巴宝多尔济、沙拉巴多尔济、德瓦根敦、拉希色楞、额尔克道尔吉朗等；土默特旗代表有：亢仁（默尔根巴图尔）、森额等；伪蒙古军政府参加者有：吴鹤龄、补英达赖、陶克陶、特克希卜彦，吉尔嘎朗、乌勒吉图（张秉智）、超克拨都尔（陈绍武）等；伪蒙古军参加者：李守信、乌古廷、刘星寒、刘继广、尹宝山、王振华、宝贵廷、依恒额（伊给先）、萨音巴雅尔（包悦卿）、仓都固仍（包海明）、札青札布（戴选青）、阿尔弼吉呼（张启祥）、崔宇堃、崔景岚、纪树勋、卓里克图（关荫南）等；地方团体代表参加者计有：贺秉温、李春秀、贺云章等；各伪市、县长参加者计有：刘连升、徐荣侯、亢锦荣等；“蒙古旅平同乡会’则有赵那苏图（赵汇川）、李丹山、桑宝（包维翰）组织代表团前来，祝贺第二次“蒙古大会”的召开并慰问军政人员；“外宾”参加者有：日本驻绥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伪满驻蒙代表玉春、伪察南自治政府最高委员于品卿、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田汝弼等。遂即召开预备会议，推选我和云王、沙王（沙克都尔札布）、李守信、补英达赖、卓特巴札普、林沁旺都特、巴宝多尔济、吴鹤龄等为主席团主席，特克希卜彦为大会秘书长。

当提出沙王为主席团主席时，卓特巴札普还提出异议说：“沙王没有来，为什么还选他为主席团主席呢?”吴鹤龄当即答复说：“已经派飞机接去了，很快就会到来。”卓特巴札普也再未说什么。迨飞机返回后，沙王仅派一个什么事也主不了的代表来了，吴鹤龄带着抱怨口气说：“沙王怎么没来呢？这里正等着他。”尽管沙王没有躬亲参加，仍然选他为主席团主席。意在利用他的名义，拉拢伊盟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主席团虽已选出，大会急待开幕，但伪主席一职还未作最后确定，是否设置副主席一职也未得到解决。经和桑原中佐及村谷彦治朗商量，他们则以官小职微，不敢决定，允向关东军请示。一直到1937年10月28日，开会的那天上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才乘飞机赶来参加。下机后与欢迎人员略作寒暄。桑原、村谷、吴鹤龄、陶克陶等，即迫不及待地向东条征询关于内定谁为主席及是否设置副主席的意见。东条答复说：“内定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就行了吧。”于是酝酿多日颇费踌躇的谁当伪主席、副主席问题，经过东条英机淡淡地一语就解决了。这充分说明，云王的主席和我的副主席是日本关东军一个参谋长加封的，通过大会选举，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我们把东条英机让至大会堂休息室略事休息后，即举行开幕式。先由我致开幕词，说明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的意义。继由“贵宾”东条英机、于品卿、田汝弼、玉春等致祝词。所有“祝词”，无非是“日蒙亲善”、“满蒙合作”、“民族协和”、“共存共荣”等语。接着讨论的议题是：通过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成立宣言。经用蒙、日、汉语宣读后，无异议通过了。下午的议事主要日程是，推选主席和副主席。由李守信提议，推选云王为主席，我为副主席。用一刹那征询大家的意见，与会代表默不作声，也就宣布无异议通过了。接着通过对于日本和伪满发出感谢电，并对来宾和文官科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人员授予纪念章。因云王有病未参加，我即当众宣誓就职，大会就告结束。当日在大观园设宴演戏，表示庆祝。兹将大会通过的两个文件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录后：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

第一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主席及副主席；主席及副主席由蒙古大会就蒙古德高望重、有大勋劳于蒙古复兴运动者选任之。主席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之主权者，主席遇有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主席代行之。

第二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之疆土为领域，暂以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浩特市（按即呼和浩特市）及包头市为统治区域。

第三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防止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

第四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仍旧使用前蒙古军政府之旗章。

第五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应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但使用旧历。

第六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设于厚和浩特。

第七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地方之权限，依均权之原则，另以法律定之。

第八条：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另定之。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蒙古是有土地、有人民、有组织之民族，有创立元朝伟大光荣之历史。迨至明代，虽然退居朔漠，尚且保持均衡之地位。清初更援兵诸部，兄弟封藩，其固有之土地、人民、主权，毫未损失。及至民国成立，标榜五族共和，我蒙民秉性纯厚，相信待遇平等，竭诚拥护，矢志弗渝。但二十余年来，竟视我蒙为外藩，设置省县，土地瓜分净尽，党政专横，主权侵蚀无余，以致蒙民之生计日趋贫穷，盟旗之权限日趋凋零。生存几至无望，尚何平等之有！因而群情激愤，不避水火，一致奋起要求高度自治，延续一线仅存之命脉。几经呼吁奔走，获得百灵庙蒙政会之自治。明虽允准，暗实切恨，阳藉扶助之名，阴运摧惨之机，军阀之暴敛如故，疆吏之挑拨日甚，或则大军压境，张出席卷之威，或则经济封锁，迫近灭亡之路，类此荼毒事实，实属罄竹难书。二十余年之竭诚拥护，只得到歧视与压迫，设如依此推移，蒙古将何以生存！且自中国革命以来，军阀割据，内乱频仍，人民涂炭，百业凋蔽。近更外交失策，国事日非，启衅邻邦，仍复分据疆土，骨肉相残，何暇顾及边疆。我等念祖宗之伟业，为民族之生存，不能垂手待毙，自贻伊戚。因于去春在西乌珠穆沁旗召开蒙古大会，决议成立蒙古军政府并编练蒙古军，外防共产，内安生民，一载以还，规模渐具。今秋中日失和，疆吏乘机谋我，当为防卫计，不得不整军经武，幸赖全体将士之用命，庆得友邦义军之援助，仅及数月，得以收回长城以北之故土，此实天予苏生之良机，言念及此，不胜欢欣。从而奋然兴起，勇往

迈进，力图更生，特召集各盟、旗、市、县长官及军民代表，在绥远城举行第二次蒙古大会。经大会决议：本太祖成吉思汗民族融洽、一致合作之精神，即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蒙古固有疆土为领域，以严防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本互惠互助、共存共荣之精神，敦睦友邦，以期确立东亚和平，实现伟大理想。推选云端旺楚克为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副主席，负责组织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特此宣言，以昭大义。凡我全体官兵及将士，希一致拥护，体现我蒙为国家为民族之至情，贡献人类之和平，不仅蒙古之荣幸，抑亦全世界之光辉，天人共鉴，誓志勿渝。

第二次“蒙古大会”结束后，即派员修葺绥远省政府旧址，作为“政府”厅舍。但因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未经关东军确定，迁延达一月之久，还未组织起来。我曾去找桑原特务机关长，请他催促关东军速为确定，桑原说：“我已催促了，迄今尚未答复。”并把给关东军的电报给我看，证明他已经催促过。我虽然非常着急，但也只好耐心等候，并嘱桑原再行催促。结果还是等候了多日，日本关东军才把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核定下来。规定是：政务院长负责制，下设总务、财政、保安三部。与伪政务院平行机构有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和咨询建议性质的伪参议会。于是我就按照这个组织法着手安排主要人事，除依照日本关东军意旨以主席名义任命李守信为伪蒙古军总司令外，并任命吴鹤龄为伪参议会议长，陶克陶为伪总务部长，下设总务、内务、教育、外交各处，总务处长图木勒巴塔尔（刘定一），内务处长李丹山，教育处长陶克托胡（陶布新），外交处长赵那苏图。发表吉尔嘎朗为伪财政部部长，下设会计、税务两处，会计处长乌勒吉图（张秉智），税务处长巴雅尔（吴相文）。发表特克希卜彦为伪保安部部长，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长昌都冷，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关荫南）。专为主席办事的有秘书处，由赛吉尔胡（丁我愚）任处长。并由日本人组成顾问部，最高顾问是金井章二，因在张家口搞“蒙疆联合委员会”，始终未到任，由次席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负实际责任。总务顾问是中岛万藏，财政顾问是栉部正晖，保安顾问是大园长喜。另外还设有一个伪司法局，任刘永誉为局长。这是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概况和主要人事安排。

1938 年 3 月 24 日，云王因病逝世，搞了一个遗嘱如次：

“余幼时即以民族复兴为职志，虽年老体衰，努力民族自强，不敢稍懈。不幸为病魔所缠，竟自不起。我政府副主席以下文武百官切切铭记，协同全体民众，向敦睦邦交，民族复兴迈进，切望完成建国大业，特此遗嘱。”

这个遗嘱原文是蒙文，我特为云王举行奉安典礼，发动各机关团体备花圈、挽幛，前来祭奠。我亲为执绋，并以“吾将何之”四字为挽，率领文武官员公祭。伪满皇帝溥仪特别题赐“世笃忠诚”四字，青年职员们很不满意，认为这仍是以臣属之礼对待“云故主席”。我为了敦睦“蒙满邦交”，还是主张悬挂起来，表示尊重。

为选举继任伪主席，特于是年 7 月 1 日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推选我为主席，李守信为副主席，我特发表就职宣言如次：“本副主席受大会之推选，继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自知德薄能鲜，深恐不堪胜任，惟有继承太祖成吉思汗之伟大精神，遵奉

历次蒙古大会之使命，依据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之基本方针与生、聚、教、兴、养、卫六大施政纲领，不辞艰苦，努力以赴。冀望友邦各国及各政府，以互惠互让、共存共荣之精神，赐予指导协助。全体官民将士，须一致团结，同心协力，完成复兴大业，实现东亚和平。海枯石烂，宿志不移，天日在上，其共鉴之。"

我继任伪主席后，深感伪政务院的三部组织较小，认为应当扩大和加强，形成具有"国家"组织形态。日本帝国主义则为了适应战时体制，搜刮战略物资，加强控制各项工作，认为更有进行机构改革的必要。因此即于是年8月1日实行机构改革，改革的原则和办法是：1. 废除政务院的总务、财政、保安三部制，实行一厅四部制，即总务厅，民政、财政、保安、畜产四部制。总务厅主管总务、企划、主计、人事、外交等工作，为一切行政机构的中枢，就是采取总务中心主义，以期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加强纵的统治和横的联系。2. 网罗对"蒙古运动有功劳者"及汉族有代表性的人士，组织"政务委员会"，作为伪主席的咨询机关，以资调整蒙汉关系，沟通各方意见。3. 废除盟公署的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四厅制，改设一个官房和民政、畜产、保安三厅制，以明确施政重点，密切"政府"与盟、盟与盟之间的联络。4. 将"巴彦县"（即过去归绥县）合并于"厚和"市，并将"厚和"市升格为特别市，以便逐渐发展为国际都市的"新兴首都"，作为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5. 各县配备以纯蒙古族人编成的保安队，负确保治安的责任，确定军、警责任的区分。根据以上原则，改革后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主要人事阵容如次：我任伪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任伪副主席兼伪总司令；秘书处处长仍为赛吉尔胡。伪政务院下的总务厅长为陶克陶，下设五个处，总务处长仍为图木勒巴塔尔，人事处处长乌勒吉图，主计处处长霍克济胡（霍翰甫），企划处处长金谷勒模（金养浩），外交处处长仍为赵那苏图。伪民政部部长特克希卜彦，下设内务、教育、建设三个处，内务处处长札拉戈穆济（白景奋），教育处处长仍为陶克托胡，建设处处长恩和阿木尔（张绍庭）。伪财政部部长仍为吉尔戈朗，下设两处，理财处处长李丹山，税务处处长仍为巴雅尔。伪保安部部长换了雄诺都布，下设警务、司法两处，警务处处长仍为昌都冷，司法处处长仍为卓里克图。伪畜产部部长郭尔卓尔札布（郭王），下设牧业、畜产两处，牧业处处长哈斯瓦齐尔（肖佩玉），畜产处处长米济道尔吉（黄葆庆）。直属伪政务院的机构还有地政局，没有发表局长，由顾问黑泽隆世代行职务。伪司法局长仍为刘永誉。"驻满代表"金永昌，因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继任代表为恩和布林（吴恩和）。伪参议会议长仍为吴鹤龄，派往日本留学。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反动统治与设施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为了巩固我的统治权，在内政上、军事上、文教上也有些变革和设施。我总觉得取得盟旗王公的拥护和伪蒙古军的支持，是我的政治资本。因此，特别侧重盟旗行政的加强。至于汉人居多的各县，日本人把持得很紧，我想管也管不了，干脆就任凭日本人摆布。我在盟旗内政上的设施，首先是设置伪巴彦塔拉盟（巴彦塔拉是富饶平原的意思），管辖的区域计有土默特、正红、正黄、厢红、厢蓝五旗及"巴彦"（即归绥县）、萨拉齐、清水河、托克托、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

和、凉城等县，包括旧绥远省政府所统辖的大部地区，是五盟中人口和收入最多的一盟。补英达赖自被解除伪蒙古军政府办公厅主任后，本是满腹牢骚，伪巴彦塔拉盟公署成立后，我任命他为盟长，才心满意足，不发牢骚了。伪巴盟的主任顾问开始时是安宅，后为泽井铁马。伪盟署下设总务、民政、财政、教育各厅，发表超克拔都尔（陈绍武）为总务厅长、贺云章为民政厅长、李树声为财政厅长、李春秀为教育厅长。嗣于1938年秋实行机构改革，又改设伪官房和民政、保安、劝业三厅，调任贺云章为官房主任，超克拨都尔为民政厅长，默尔根巴图尔为保安厅长，李树声为劝业厅长，调李春秀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参议会参议。

对于旗县并存、蒙汉杂居的地方，我曾想采用蒙汉分开的办法来统治。具体就是说：以铁道为界，居住在铁道以南的蒙民，移至铁道以北，居住在铁道以北的汉民，移至铁道以南。经和补英达赖、默尔根巴图尔等商量，他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样办理，是叫蒙汉民众大搬家，牵涉面广，困难甚多，不易办到，甚至还可能引起蒙汉人民的反感。因此我才没有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结果还是沿用属人主义的蒙汉分治政策。例如土默特旗和“巴彦”等县所统辖的区域，是蒙汉杂居，其中的蒙民归旗管理汉民归县管理。对于察西四旗和集宁、丰镇等县，也是采取蒙汉分治政策来统治蒙汉人民。至于各县、市伪县、市长，大多数是任用汉人，除了蒙人韩绍祖当过萨县县长外，其他各县均由汉人中的绅士之流充任。如伪“巴彦县”县长亢锦荣、伪集宁县县长张书常就是一例。这是为了拉拢汉族上层人物，调整民族关系，起到巩固伪蒙政权的作用。至于各旗总管，当然都是任用蒙人，例如土默特旗总管先是亢仁，后为森额，察西四旗总管都是留用旧人，为的是驾轻就熟，便于统治。

其次是设立伪厚和、包头两市，由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直辖。自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府后，就把归化和绥远这两个名称取消，改为“厚和豪特”，并建立为市，作为伪蒙政府所在地，发表贺秉温为伪市长，是酬劳他在日蒙军占领绥远时出而“维持治安”的“功劳”，也是想通过他笼络商民，拥护伪蒙政权。奈因他发财心切，仍愿继续做鸦片买卖，把他调任为“土药公司”理事，由李春秀继任伪市长。也是想通过李春秀这个老官僚，拉拢满汉人士，拥护伪蒙政权。嗣因“厚和市”是伪蒙政府所在地，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将其升格为特别市，并把“巴彦县”撤消，将其所属地方归“厚和市”管辖，扩大伪“厚和市”的统治区域。至于包头设市的原因，主要是为适应经济上的需要，不过政治和军事的因素也与设市有关。因为包头是平绥铁路的终点，黄河水运的渡口，为皮毛百货的集散地，而且是军事上的前哨，日蒙军集中驻地。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搜刮战略物资，掌握经济命脉，供应军队所需，更愿加强包头的行政组织。因此，特设包头市，任命刘继广为伪市长。

第三是加强各盟行政机构。盟在清朝时期本是各旗“会盟”的地方，不是一级行政组织。在国民党政府时期，蒙藏委员会虽制定过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也迄未施行。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除伪察盟公署早已设立确定为行政组织外，对于锡、乌两盟也确定为行政单位，在贝子庙（现锡林浩特）设立伪锡盟公署，我仍兼盟长，任命林沁旺都特为副盟长，中村浅吉为主任顾问，下设伪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蒙汉兼通的玛哈希力（赵文

儒）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仍为原来十旗。在百灵庙设立伪乌盟公署，任命巴宝多尔济为盟长，沙拉巴多尔济为副盟长，山本信亲为主任顾问，下亦设伪总务、民政、保安、畜产各厅，除总务、保安、畜产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员为厅长外，并派墨尔根巴图尔（宝道新）为民政厅长，管辖区域除原有六旗外，又增加了一个固阳县。至于伊盟地区虽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上规定为统治领域，但未被日军占领，伪蒙政权的行政力量仅能达到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的河东局部地区。在伪蒙联盟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伊盟副盟长兼杭锦旗札萨克郡王阿拉坦鄂齐尔（阿王）派员前来和我联络，探询他是否可以来，我答复说："请阿王自己考虑吧，这时如来我当然欢迎，如果脱身不便，暂时不来也可以，反正迟早是要收复伊盟的。"当时我固然愿意早日占领伊盟。日军为了向西扩张侵略势力，进犯伊盟更是心切，因此特派伪蒙古军的潘井指导官和团长图们巴雅尔率领一团骑兵，前往杭锦旗迎接阿王。阿王是做官心切的人，为了急于得到伊盟伪盟长的地位，就于1938年春初前来。我当发表他为伊盟副盟长代行盟长职务，黑泽隆世为主任顾问，暂在包头成立伪伊盟公署，下设伪总务、民政、保安各厅，除总务保安各厅尽量任用当地人为厅长外，特派我的得力干部吉尔格朗（吉致祥）为民政厅长。发表奇子祥为准格尔旗西协理代行札萨克职务，章巴多尔吉（章景文）为达拉特旗的札萨克。日本方面又拉拢了达拉特旗的保商团长森盖林庆，发表其为伪鄂尔多斯挺进军司令，企图通过阿王等人，策动伊盟其他各旗归向伪蒙政权。

第四，在内政设施上，我到达绥远城建立伪蒙政府后，曾经幻想，日方既然表示"帮助"蒙古，必然帮助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因此很想把绥远旧毛织厂接收过来，预备叫贺云章为经理，把原有工科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也恢复起来，用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不意占领绥远不久，日本军就把旧绥远毛织厂拨归"满铁"会社经营，并将旧工科学校的机器也都拆卸给了毛织厂，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本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我曾提出交涉，日本方面总是支吾其辞，不作明确答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具体到内蒙古，更是要把内蒙古作为供应原料、销纳商品的殖民地。因而绝不允许恢复工科学校，培养工业人材。至于产业、金融、交通事业，都归"蒙疆联合委员会"直接掌握，分别交由日本企业机构经营。例如平绥铁路就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直接经营。

在文化教育上，我是侧重蒙人教育。为了培养急需"人材"，特就大台什村旧有的农科学校原址，设立"蒙古学院"，任命郭尔卓尔扎布为院长。郭调任伪畜产部长后，由金永昌继任院长，由那苏图（王庆三）任教导主任，吾勒吉卜林任事务主任。在专业设置上计有旗务、师资、师范、电报、补习各班，我特亲笔书写"勤敬忠诚"四字为"院训"，有时还到该院亲临"训话"，希望在院的青年学生们对我有深刻的印象，毕业后供我驱使。并在市内大会堂后边设立"蒙古文化馆"，任命伊德钦为馆长，吸收地方绅士郭象伋等为馆员，分设总务研究、图书、印刷各组，进行编纂小学教科书、课外读物、发行文化专刊等工作。我为了训练王公子弟，又特设一个蒙族学校，由伪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兼校长，调任超克曼度夫（汪文林）为教导主任。由伪保安部筹设中央警察学校一所，任萨彦毕勒格图（陈靖震）为主事，训练警官和警务人员。为了

培养通晓日文的各项“人才”，选送蒙古留日生十名，下令锡、乌两盟各设蒙古青年学校一所，责令各旗一律设立小学一所，卫生所一处，一律设置无线电台，加强通讯联络。

第五，在军事上，我也知道充实武装力量，是加强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对于各旗保安队发给新枪，充实装备，并派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充任教官，从事训练工作，居中掌握官兵，希望对我能起拥护的作用。对于伪蒙古军方面，我虽然放弃了总司令，改由李守信继任，但我认为伪蒙古军还是我的政治资本，故不惜增加蒙民负担，为之征兵买马，总是力图扩充，不愿缩小编制。记得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末期，日本方面主张将“蒙古军”各师一律“蒙古化”，把“蒙古军”由汉族人编成的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驻在各县的警察队，我很不以为然，认为第一、二、三师虽然多数是由汉族人编成的，各师军官均与李守信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绥东战役和占领绥远各县的行动上，曾出过很大的力气，多数都效忠于我，其中背叛我的毕竟是少数，所以我提出反对。但因日方持之甚坚，争执无效，也就只好如此。日方把第一、二、三师改编为靖安警备队，设两个集团，第一集团长为郭光举，第二集团长为门树槐，集团之下设大队、中队和分队。这个警备队，完全部署在后方汉民居多的各县，用以镇压汉族人民，而把由蒙古族人编成的第四、五、六、七、八、九各师，则改称为某某部队，多部署在包头、百灵庙及锡、乌两盟的边境地带，配合日军防止国民党的反攻，并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系。

1938 年春，傅作义率部突然打到一间房一带，距离“厚和市”很近。这时驻在凉城的伪蒙古军第三师团长慕兴亚背叛我归降傅作义，以致谣言纷起，人心恐惶。我为安定社会秩序，收买人心起见，亲在小教场召开的民众大会上讲话，强调在此春夏之交，农作物正在生长时期，傅作义军竟不惜踏毁庄稼，遭害青苗，突来进行扰乱。我是想用这样挑拨性的言辞，引起当地人民对傅作义的反感，转而拥护伪蒙政权。我正在兴高采烈地讲话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把飘扬在讲台前的蒙古旗撕成两半，我当时迷信地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蒙古政权要垮台。幸而为时不久，傅作义军就撤退了，这才又转危为安。

第六，对于汉民居多的各县，日本人虽然抓得很紧，不叫我管，但是对于能够买好人心的事情，还是想过问。例如日本人在各县城镇地方设立的赌博性质的俱乐部，为地方公正人士所反对，因此，我曾下令取缔俱乐部。但是各县日本顾问总是不理会，当然我的命令也不发生作用，不过我却因此博得了一些人的奉承。在 1938 年夏天的时候，久旱不雨，我特到“厚和豪特”舍力图召焚香祈雨，表示关心民疾，用以收买人心。

旧阴谋，新花样——我向日本要权未遂

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内，我向日本要权，也有过几次“冲突”。原因是我虽说当了傀儡，还想掌握伪蒙政府的军政大权，实现我统治蒙古的野心。日本方面自然是把我这个傀儡当做他们侵略蒙古的招牌，要我俯首贴耳地听从他们的指挥。因此，我便和驻在内蒙古的日本军部和当权的日本政客发生过几次“冲突”。首先是在占领绥远

城、武川、陶林等地问题上，引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固然是日本侵略军起了主要作用，但配合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我的伪蒙古军，因全系骑兵，行动迅速，往往走在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前面，假如不是日本军部阻止前进，等候日本部队，很可能先行到达。例如我在百灵庙组织“各盟旗联合军”攻打武川，和当地守军井得泉（原系伪蒙古军的团长，在“七七”事变后投归傅作义军）部队接触时，由伪蒙古军官学校毕业生道毅德尼玛等率队冲锋，当时被击毙，因而后退。我又命令伪蒙古军第九师从陶林进兵，准备再次攻打武川。迨至仓都固仍（包海明）率队到达后，听说井得泉已准备撤退，武川业已垂手可得。我计划拿下武川，即进攻绥远。不意这时桑原特务机关长乘飞机到达百灵庙，让驻在百灵庙的军事顾问山内转告我说：“现在占领凉城的日本军，正向绥远开拔，候日本军到达后，再行攻打绥远，较为稳妥。务要阻止第九师前进，以免孤军深入，而冒危险。”并且说“蒙古军已经作战很累，应当休息”。桑原这些话，虽然说得很好听，似对伪蒙古军关心，不叫受到损失，实际上这时绥远各地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业已调往山西，其他正规部队多已撤离绥远，仅留国民兵等地方团队维持局面，这种情况当为日本军部所侦知。因为绥远城很易拿下，因此日本方面计划叫日本军率先入城，不愿叫伪蒙古军先行到达，所以特来阻止伪蒙古军进攻。当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主力到达平地泉，第八师师长札青札布和第九师师长仓都仍率领伪蒙古军到达陶林时，日本军部也是严令停止前进，让等候日本军到达再行进攻。根据以上情况，我和包海明等曾向人夸说伪蒙古军的“勇敢”，在占领绥远城、武川、陶林等地立功很大。不意这话竟引起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的不满，说我有意抹杀日本“皇军”的“战绩”。记得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外务省官员大桥忠一到北平，嗾使吴佩孚出山，后便窜到“厚和市”视察情况，前来见我时说：“我这次到北平，是专为做吴佩孚的工作，便中前来看看你这老朋友。”我问他：“你工作的怎样！”他答说：“不行！吴佩孚比你还硬，要的条件太高，如果他要出来主持华北局面，要求日本军全部撤退。这个条件怎能接受。”接着他又向我买好说：“我在军部听说，你在占领绥远城等地时，称赞蒙古军的‘功劳’，军部却认为你有意抹杀‘皇军’的‘战绩’，对你很不满意。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劝你，不要和军部起摩擦，因为你和军部摩擦，是对你不利的。你如对军部不满意时，可到日本国内呆一个时期。”由此可见，我指挥伪蒙古军进攻陶林、武川、绥远城等地，固然为了实现我的政治野心，其实本来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力气，做日本帝国主义西犯的马前卒，不想因为夸说伪蒙古军的“功劳”，竟惹起日本军部的不满和猜忌。这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同时也说明，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伪蒙政府主席，只有看日本军部的颜色行事才行。

其他几次“冲突”是：

一、当日“蒙”军联合西犯时，由伪察盟安宅顾问组织“政治接收班”，随军前进，委派伪县长，恢复地方秩序，出安民布告等。例如集宁、丰镇、归绥、包头等伪县、市长，都是由安宅率领的“政治接收班”临时委派的。伪蒙古军政府虽然也组织两个随军工作班，一个是由陶克陶等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到达张家口，沿着平绥路随军前进，做“宣抚”工作。一个是由郭尔卓尔札布率领的一部分职员，由张北出发，经化德、苏尼特右旗、锡拉木伦庙等地到百灵庙，接收武川，做“宣抚”工

作。不想我以伪蒙古各盟旗联合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徐荣侯为武川伪县长，却引起安宅顾问的不满。他说这是他所率领的“政治接收班”的职权，我委派县长不应当。好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没有把徐荣侯更换。

二、在伪蒙古联盟政府成立后，日本宪兵队竟把设在“政府”后院的直属电台的报务员葛孟库、陈寿山二人逮捕。我听后很恼火，认为既未取得我的同意，又未说明原因，竟将“政府”直属电台报务员逮捕，是对我的藐视，是侵犯“政府”职权。我当时就把总务顾问中岛万藏和最高顾问的秘书和佐良之助请来，叫他们立刻去和日本宪兵队江草队长交涉，把葛、陈二人放回。中岛与和佐应付我说：“现在时间已晚，城门业已上锁，恐怕叫不开城门。”我驳他们说：“你们别瞎说了，你们还叫不开城门？显见这是托辞，你们如果不愿去，我就亲身去办交涉。你们如去，我就在办公室这里等着，等把葛、陈二人放回，我才离开这里去休息。”中岛与和佐二人见我持之甚坚，又怕我亲身出马去交涉，惹出更大的麻烦，于是他们二人就答应着去了。两个小时工夫，就把葛、陈二人用汽车送回来，中岛与和佐也坐汽车回来向我复命。我没再问是怎么交涉放回的，为什么把葛、陈二人逮捕，反正放出来就算完事。

三、有一次，因为预算问题和宇山兵士发生了“冲突”。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日本人一律是顾问和辅佐官，不充任正式官吏。我还妄想不叫日本人掌握实权，特别不叫掌握人事权和财政权。人事处长乌勒吉图曾和我说：“人事顾问（忘其名）要求看公文，并说他是人事顾问，连关于人事的公文都看不着，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最高顾问要问他，他如何答复呢?”我说：“还是不叫他看好，他看了就要盖章，无形中便成为制度了，不能开此先例。”我对人事权虽然抓得很紧，但自宇山兵士来任最高顾问后，在一个时期内，虽对人事不加过问，却极力抓财政权。日本顾问部先作出了预算指标，强令各部接受，伪民政部经费要得多，而预算指标列的少，特克希卜彦极力争要，我也坚持非多给不可。宇山兵士却斥责民政顾问岸川兼辅无能，不能掌握民政部事务，责成他非按着预算指标通过不可，因此闹成僵局。我听到后也很生气，就把宇山兵士请到我的办公室里进行谈判。我质问他说：“蒙古联盟政府的事情，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要是我当家，我就有最后决定权；要是你当家，我就回旗去。”宇山兵士说：“你是主席兼政务院长，我是你的顾问，当然是你当家。”我又说：“那么，为什么我主张列入的教育经费就不算数呢?”宇山兵士说：“这件事好办，容我和有关顾问们商量商量。”结果重新列入蒙人教育复兴费十万元，我也再未说什么，这场争执就这样作了结束。从此宇山兵士改变了做法，对我极力敷衍，并要深入各盟视察，表示愿意“辅佐”我好好地干一场。我也给各盟打电报，说宇山兵士是很好的顾问，叫各盟旗准备欢迎他。有一次，我和他及其他顾问在蒙古会馆聚餐，我表示不同意“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和该会的做法。宇山兵士说：“‘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做法我们可以不管它，不是还有联盟政府吗？我们只要把联盟政府的事情做好就行了。”并表示把旧绥远省立第一幼稚园做了日军御用的“厚和旅馆”，把旧绥远省立工科学校的机器拆走做了兵营等等做法是不妥当的，说这对于收揽人心有影响。不意宇山兵士说过这些话之后，没几天就被调走，由伪畜产部顾问泉名英（系日本退役少将）升任最高顾问。据我推测，宇山被调走的原因，是他对我有迁就的倾向，这就不符合日本军部的高压政策。他表示不

应把学校作为兵营或旅馆，显系对日本军部的批评。这些事被日本军部知道了当然对他不满意，所以很快地就把他调走了。

四、在扣捕色林保问题上，我和日本特务机关发生了“冲突”。色林保原系西公旗的协理兼保商团长，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因为西公旗争夺札萨克职位问题，他和石拉布多尔济（石王）结成一党，以绥远当局为靠山，与“蒙政会”对立。迨至日“蒙”军占领绥远，建立伪蒙政权后，色林保又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对我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日本特务机关则因他在西公旗掌握一部分武力，可供利用，对他极力拉拢袒护。色林保每到“厚和”就住在特务机关，简直把我不放在眼里，使我甚为恼火。为此我就命令伪司法处长卓里克图，到日本特务机关去要色林保，想加以制裁。卓里克图前去交涉，不想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岩崎竟为色林保保镖，抗不交出。嗣又经中岛万藏出面，向特务机关说明色林保在西公旗事件中的情况，特务机关方面才了解色林保过去与“蒙政会”搞过对立，并考虑到：为了袒护一个色林保，惹起我这个“主席”的不满，很不适当，于是卓里克图又去交涉时，便提出条件说：“可以将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但要顾全特务机关的面子，不要到特务机关扣捕，要在别的地方设法诱捕。”有一天，色林保为了拉拢日“蒙”军政人员，企图展开政治活动，在凤林阁饭庄请客，中岛万藏和卓里克图均在被邀之列。卓里克图得到这个机会，便预先布置下军警，待到宴会开始后，把岩崎悄悄请出来，说明要进行扣逮色林保的布置，要求岩崎最好把色林保交由“政府”处理，否则就指挥军警进行扣逮。岩崎初则不肯，只管摇头，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卓里克图的要求，亲乘汽车把色林保送来，我即交由卓由克图送到监狱，管押约近二个月。然后由我旗（西苏尼特旗）派来保安人员，将色林保带至我旗监管，后因病死在我旗。

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到伪联合自治政府

我和日本方面最大的“冲突”是关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设立问题。在蒙古（即伪蒙古联盟政府）、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相继成立后，行政上虽不相隶属，但都在平绥铁路线上，交通、金融、产业都有密切的关联。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控制这三个伪政权，掌握经济命脉，搜刮战略物资，就在日本军部操纵下，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特由伪满调来金井章二主持筹备成立事宜。并通知三个伪政权，各派代表“缔结协定”。由“察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于品卿、杜运宇二人，由“晋北自治政府”派出代表夏恭、马永魁二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代表，日本方面内定为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等三人。

这次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指使下，通过三个伪“自治政府”代表“协商”的形式，于1937年11月22日缔结伪协定如次：

一、本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关于各政权有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及其它重大事项。

二、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与必要之职员构成之。

三、总务委员长总理并代表联合委员会。

四、联合委员会置日本顾问一名，参议及顾问若干名。

五、联合委员会之决议，须经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顾问之同意，始为有效。

六、联合委员会发布有关指导统制命令，须以联合委员会名义行之。各政权为了援助易于执行，得分担义务。

七、联合委员会得管理各政权委托之公有财产。

八、非经各政权之同意，委员不得脱会。

九、本协定用日文、蒙文、汉文作条文，如有疑义，依据日文解释之。

缔结协定后，即正式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由日本军部派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任命村谷彦治郎为参议，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杜运宇、马永魁等为委员，分管总务、产业、金融、交通等事项。

到了1938年8月1日，在金井章二的操纵下，通过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会议形式，决定实行机构改革，把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由卓特巴札普任总务部长，派野田武为总务顾问；由金永昌任产业部长，派高津彦次、森田清为产业顾问；由马永魁任财政部长，派寺崎英雄、久间猛为财政顾问；由陶克陶任保安部长，派伊藤 祐为保安顾问；由杜运宇任交通部长兼民生部长，派满尾君祜、赤板亮一分任交通和民生顾问。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其强化的程度，是由协商性质的结构，变成行政组织；其扩大组织的范围，是由代管产业、金融、交通扩大到管理民政和保安，形成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太上机关，公然发号施令。

我对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委员派谁就派谁，来了通知或指示，合乎我心意的就执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在一边。记得陶克陶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后，返回"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我们几个人闲谈时，竟洋洋得意地说："我是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是管你们的。"我都毫未介意，还认为他不敢藐视我，因为他虽是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但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中，他是总务厅长，我是主席兼政务院长，仍是管他的。他说这话不过是对在坐的其他人员表示得意而已。总之，我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态度，不敢积极反对，只有消极抵抗。

1938年秋，日本军部决定，令金井章二陪我和于品卿、夏恭、李守信等"访日"，日程业已作了安排。我这时正在锡盟巡视，没有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到达张家口，日本军部的政治参谋大桥雄熊很着急，就责陶克陶催我火速前来。陶克陶竟发牢骚说："在这紧急的时候，德王却回到锡盟巡视不来，把他杀了算啦。"（这话是李守信告诉我的）这说明陶克陶已经不为我用，完全站在日本军部方面去了。

我到了张家口便起程，经北平、山海关、奉天（即辽宁）、朝鲜等地，渡海到达日本下关车站。我对日本国内欢迎人员"致辞"时，总是说"蒙古"，不说"蒙疆"。我讲完话后，我的随身翻译吉尔嘎朗译成日语。金井章二在旁边，马上向新闻记者和欢迎人员解释说，方才德王所说的"蒙古"就是"蒙疆"，使我很感不快。日本内阁总理大

臣近卫文磨招待我等一行宴会，宴前我和近卫周旋闲谈说："现在蒙古民众都不愿意'蒙疆'这个名称，仍愿意用蒙古代表新的政权。"正在说这话时，招待人员给近卫送来"挨拶子辞"（系应酬致辞之意），近卫看过之后，见上面所有"蒙古"二字都换成了"蒙疆"，因我方才说过反对"蒙疆"之言，近卫似有觉察地踌躇了一下。但近卫致辞，仍是把原稿宣读一遍，可能金井章二又预先做了工作。

这时坂垣征四郎任日本内阁陆军省大臣，东条英机任陆军省次官。当他们约定和我见面时，虽然都是旧相识，因为金井在座，只说些应酬之言，未谈重要问题。见面后，坂垣的亲信人员（忘其名）和正在日本留学的吴鹤龄说：德王和坂垣大臣过去就曾相识，为什么见面时没说心里话，未谈重要问题呢？其中不无原因。"吴鹤龄答复说："会见时因有他人在座（指金井章二）不便谈吧。"这个日本人顿然领悟说："啊！原来如此！那么，我向坂垣大臣说，再约德王单独见面。"吴鹤龄将此情况具以告我，于是我就和吴鹤龄商讨"扩大蒙古政权"和"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当经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向外长城纯蒙旗地带发展，放弃内长城以南汉人居多的察南、晋北地区，进一步扩大"蒙古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第二案，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进一步扩大伪蒙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起初我是主张第一案，吴鹤龄极力主张第二案。并强调说："察南、晋北过去都是蒙古地方，为什么不要呢？我们蒙古现在没有力量，如果有力量的话，连北平、河北都想要呢！"接着他又告诉我说："我来到东京后，为了实现蒙古建国，曾和日本朝野有名人士作过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曾向他们建议，对中国实行'分块统治'的政策。像'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这样的政权，无妨多来几个。有的日本人非常赞成我的说法。"当时我感觉到，吴鹤龄的野心比我还大。但又意识到，吴鹤龄向来主张"拣到筐里就是菜"，他是特别注意现实利益的人。他所说"连河北、北平都想要"之言，不过是强调不要放弃察南、晋北的陪衬语而已。经吴鹤龄反复陈述理由，我也觉得目前吸收察南、晋北，扩大伪蒙古政权，比较接近实际，易于实现，也就再未说什么。吴鹤龄便将第二案定为甲案，第一案定为乙案。当坂垣再次约我见面时，即将这两个方案亲手交给坂垣，并说明这两个方案的内容。坂垣答复说："俟经详密研究，再行答复。"过了几日，坂垣又在陆军大臣官邸召集我们，答复关于"蒙古建国"问题。他说："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俟将外蒙'收复'，实现内外蒙的统一，才能帮助蒙古独立建国，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对蒙古的国策，希望大家相信。"这话虽然是坂垣支吾其词，用以安慰我妄想"蒙古建国"和实现"大蒙古主义"的迷梦，但也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野心。等我访日返蒙后，曾接到吴鹤龄的来信，说是坂垣同意甲案，并由陆军省通知住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实行。

金井章二见我到处仍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当然非常不满。他认为"蒙疆"这个名称，是日本军部和他金井章二主张应用的，非在日本国内展开宣传使人周知不可。当我"访日"行将结束，东京放送局约我向日本全国广播时，金井章二认为这是强制我把"蒙古"改说成"蒙疆"的好机会。他虽未对我直接警告，却派人对吉尔嘎郎恫吓说："德王在日本，不许再说'蒙古'，不许再说'建国'。他如果再这样

说，你也不许给他译成日语，要把‘蒙古’二字一律改称‘蒙疆’。如果你不这样办，要小心你的脑袋!”这时正在东京留学的朝克巴达尔夫（陈国藩）前来看我，听到金井所派人员恫吓吉尔嘎郎之言，也很气忿地说：“日本人真厉害，连‘蒙古’二字都不叫说，还能谈到其它吗!”但我在广播中还是只说“蒙古”，不提“蒙疆”。我在“访日”期间，也曾见过日本天皇，我说的是“感谢日本的援助”，他说的是希望“协力维护东亚和平事业”。都是应酬之语，没有谈到实际问题。

我“访日”回蒙途中，想到金井章二在日本东京控制我只许说“蒙疆”、不许说“蒙古”，不许说“建国”的种种说法，有很大的反感，越想越不是滋味。我总觉得，“蒙古”与“蒙疆”二字，不是微不足道的字义问题，而是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和民族问题。因为“蒙古”二字不仅代表民族，并代表土地、人民。而且一提起“蒙古”二字，世界上是无人不知的。这是历史上早就确定的名称。如果改称“蒙疆”，就意味着仍是中国的边疆，不是“独立”的“蒙古政权”，是隶属中国的地方政权。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时期，我把“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作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块金字招牌。迨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又把“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建国”，作为号召蒙人参加的两个幌子。用这“蒙古”二字，笼络不少的青年为我所用，可以说是我的“得意杰作”，是我在政治舞台上有用的幌子。而在“访日”时期，却连“蒙古”二字都不能说了，今后将何以号召蒙人，言念及此，不胜烦恼。

我等一行回到张家口后，适逢举行“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约我前往参加。我开始托故不去，金井章二很着急。因为这时日本北支（华北）派遣军的参谋长（忘其名）、伪满代表等很多来宾都来参加祝贺，我如不参加，显见其中有了裂痕，对日本方面所宣传的“日蒙亲善、密切合作”是个讽刺。金井特又连次派人前来劝我参加。我在大家一再相劝之下，才勉强地迟迟前往。我到典礼会场时，所有参加人员和来宾均已先行在座等候，我到后才开始举行典礼。我并没有讲话。

我由张家口回到“厚和豪特”后，前来参加“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典礼的各盟盟长、各旗札萨克、总管等，因为等我回来听取“访日”的情形，尚未返任。我就召集他们开会，提出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大家均表同意，并经决定由各盟旗送来盖有印鉴的公文六份，备我使用。各盟旗首脑返回后，即陆续送来，就是尚未归属伪蒙政权的伊盟各旗，也由阿王设法弄到盖有印鉴的空白公文。惟有察盟盟长明安旗总管卓特巴札普送来的印文没有署他自己的名字，仅有总管代理人署名。听说他向人表示说：“我们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反不动嘛！何苦来此一举。”我收到各盟旗送来的印文之后，就责成伪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起草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的理由是：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盟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这个公文拟就后，又译成蒙、日两种文字，并把蒙文的一份，写在盖有各盟旗印鉴的公文纸上，作为主件，把日文的一份作为附件，总共制成六份。我计划寄给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参谋本部、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军部各一份，自留一份。即将付邮时，旋又考虑到直接向日本国内首相等寄送，不大妥当，结果仅寄给在日本留学的吴鹤龄一份，嘱他相机办理。适在此时，日本特务机关派

人向陶克陶的秘书张锦堂密探此事，并表示愿出重资购买该项公文稿件。陶克陶忙来和我说："你联合各盟旗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之事，日本方面已经知道了，曾向张锦堂询问并要出资购买公文稿件，怎么办呢?"我答复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正要把这反对的公文送给日本军部，他们既要出资购买稿件，告诉张锦堂可以卖给他们，赚他们一笔钱。"张锦堂得到我的许可后，就将公文底稿抄了一份交出去，听说仅给报酬50元。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掌握我们内部情况，什么卑劣的手段都能使出来。

待我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送交日本军部后，日本军部便通知我到张家口去商量事情。我到张家口后，大桥雄熊前来看我，我便谈到不同意用"蒙疆"二字作为机关名称问题，并反对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措施。大桥雄熊说："现在预定请你当总务委员长，所有一切事情，你都交给我们吧。"翌日，莲沼兵团司令官又约我相见说："关于'蒙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解决，你何必发动各盟旗联合反对呢?"我把反对"蒙疆"公文的内容，又向他作了说明，并强调这是各盟旗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莲沼也表示请我当"总务委员长"。我和莲沼会谈后，大桥雄熊又约我到另一会客室里，向我解释："'蒙疆'二字，有今昔之不同。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时期，应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压迫你们，今日用'蒙疆'二字，是意味着日本帮助你们建立新的政权。"我仍是坚持我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结果是不欢而散。

我和莲沼、大桥会谈后，经反复考虑，认为日本军部是想用让我当"总务委员长"的方法，封住我的口，不再反对"蒙疆"。我为了不在各盟旗中留下只顾个人升官的口实，于是又调动人马，通知各盟选派代表，到张家口日本军部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田中信一参谋，反对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伪蒙古政权的名称，并说明我不就"总务委员长"的理由，嘱陶克陶作他们的翻译，务要把盟旗代表的意见表达出来。谁想陶克陶自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委员后，早已倒向日本军部方面。并因大桥雄熊政治参谋的态度蛮横，说话强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代表人物，陶克陶只有顺从其意，不敢作丝毫的折冲，不但对于盟旗代表们所说的话，没有完全翻译出来，还有可能从中捣鬼。金井章二也对"蒙疆"二字任意曲解，说"蒙疆是蒙古之疆域"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并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习惯语，你们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因而各盟旗代表林沁旺都特等，到张家口进行反对"蒙疆"问题的活动，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目的。

我虽因为策动各盟旗反对"蒙疆"，招致日本军部的不满，但这时他们还须利用我这块招牌，统治内蒙古地区，因而又授意陶克陶劝我就任"总务委员长"。陶克陶深恐自己劝不动，特把李守信搬出来，一同前来劝我说："现在金井已表示愿意辞去代理总务委员长一职，请你前往就任，如果仍然表示不就，恐怕影响不大好。胳膊还能扭过大腿吗？现在日本军部方面已经说好了，还是到张家口去就任吧。"这时我也考虑到，胳膊怎么也扭不过大腿，既然日本军部已经这样决定，各盟旗代表反对也不行，也只好就任了。因而就向李、陶二人表示说："就任就就任吧。"但我以为，就任仪式可能要通过推选形式，不意我到张家口后，陶克陶早和日本方面作成圈套来捉弄我。

1939年4月29日晨，陶克陶特来请我到日本军部“商量要事”。我到后，大桥雄熊就迎出来和我说：“现在就举行任命式”。金井章二等先已在座，莲沼兵团司令官在几个人当中严肃地站立着，田中信一参谋长陪侍一旁，大桥雄熊就宣布任命式开始。首由金井章二表示，辞卸代理总务委员长职务，继由莲沼宣布，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当时我虽知道受了欺骗和玩弄，心中充满了苦恼，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也只好接受任命，没有表示不就。这就显露了我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奴隶性。任命我为总务委员长后，莲沼又以司令官名义，给我赏金一万元，我也就接过来。我返寓后，认为今天举行任命式，事先既不和我商量，临时又不叫我知道，诓我到了日本军部后，就突然来了一个任命式。把我玩弄到了这个地步，越想越难过，就拿起威士忌酒来喝，一气喝了几碗，喝得东倒西歪，醺醺大醉。这时陶克陶前来见我，我一看见他，不由的无名火起，把怒气完全泄在他的身上，猛然打了他一拳，并严辞责斥说：“今日举行任命式，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说，反和日本军部作成圈套，来欺骗玩弄我！”陶克陶推说事先不知道，就抓个空隙溜走了。

嗣后，我把被任命为总务委员长的经过，写信告诉了吴鹤龄，嘱他向日本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反映。不久，接到吴鹤龄复信，说坂垣表示，日本军部这个做法不对，不应采取任命的方法，惹得德王不愿意。我认为坂垣还“同情”我，因而胆子又壮起来。有一次，在张家口又和大桥雄熊见面，我根据“访日”时给坂垣的甲、乙两案的内容，谈到扩大和强化伪蒙政权及实现“蒙古建国”问题，大桥面带狞笑而用嘲弄的口吻说：“你们蒙古独立得啦”。我猛然听到他的话还很惊讶，怎么他也说出允许“蒙古独立”的话来？紧接着他又说：“干脆你们蒙古独立，我们日本军撤退好了。”结果又是弄的不欢而散。

我返寓后，回味大桥所说的话，是给我软中有硬的钉子碰，是对我的藐视和嘲弄。我这才深深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可恶，再不能“合作”下去，便打算出走。那么究竟向何处去呢？经过左右思维，既不愿走向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想投向中国共产党，而是仍想投靠蒋介石。因而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发生了一段关系。因为这是后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准备在写《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一文中，再作详细的叙述。

我既然打算出走，对于日本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就不过问了，更不争执了，日本方面说啥就是啥。“被休的媳妇，不管牛犊隔奶”这句蒙古族谚语，很能表达我当时的消极心情。例如，这时日本方面提出，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统一的“蒙疆政权”，并主张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原有的旗号，另制新的政权旗号。这本来是我不同意的。我的主张一直是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撤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厚和豪特”成立“统一”的“蒙古政权”。并主张仍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原有旗号，不另制定新的政权旗号。这两个方案是截然不同的，应当争执。只因我这时一心想要出走，不惟没有力争，反顺从日本军部的意旨，于1939年6月11日和于品卿、夏恭等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表示我们三个“自治政府”愿意合流，成立统一的新政权。结果就在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的操纵下，于是年9月1日实行合并，在

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察南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把“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虽然降为地方政权，仍保持原来机构。仅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裁撤，由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直接统辖锡、察、巴、乌、伊五盟，并将“厚和”市划归巴盟管辖，把包头市划归伊盟管辖。至此，不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寿终正寝，连我妄图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蒙古帝国”的迷梦，眼看也将破灭了。

（1965 年）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于1939年9月1日。

在成立之前，我当“主席”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之上设有“蒙疆联合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日本陆军省“兴亚院”驻蒙分支机构“蒙疆联合部”和张家口日本军部。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在前，我又自恃投靠日本在先，日军进犯察、绥地区和西部盟旗时，又卖过力气，并有“蒙古军”和各盟、旗王公为后盾，在军政机关方面虽已采用日本顾问制，但我和蒙古职员尚有一定“权力”，所以有时我就撒娇卖乖地不受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指挥。就是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对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指示”，在执行上也不全都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军部为了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削弱“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的权力，加上这三个伪政权统治的地区毗连、关系密切，张家口的日本军部为了进一步控制产业、交通、金融等重要部门，加强殖民统治，搜刮战略物资，认为应该加以“合并”，在张家口建立统一机构，便于日本军部就近监督指挥。另外，日本和德、意结成“防共”轴心后，本以进攻苏联为目的，在制造张鼓峰和诺门罕两事件中，知道苏联力量的强大，于是由企图进攻改为防御。而“蒙疆”地区北部，正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一地区划成“防共”的“特殊区域”，企图切断共产党的国际联系，特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以资集中力量，发挥“防共回廊”的作用。同时，通过“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个御用工具，更可加强殖民统治，搜刮重要战略物资，建立兵站基地，作为再度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进攻苏联的跳板。

在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上，我和日寇是有过主奴之争的：日寇主张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撤销“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莲沼兵团司令官“任命”我为“蒙疆联合委员会伪总务委员长”时，就是实现这个主张的先声。当时，我想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取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吸收“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呼和浩特（厚和豪特）建立“蒙古自治国”。因此，我与日寇多次发生过主奴之间的争论（详见《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始末》）。由于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失败，感到不能再和日

* 作者曾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

本“合作”下去，一心打算出走，从此我在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上，就不再和日本军部争执了。

1939年6月11日，我邀同“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的首脑于品卿、夏恭二人，依照金井章二之嘱，前往日本军部面见莲沼兵团司令官，表示三个伪政权“愿意合并”。但我对“建国”问题仍不死心，还想趁合并机会谋求实现，密派我的秘书朝克巴达尔夫（陈国藩）和伪满“驻蒙代表”李义顺联络，取得通过伪满进入日本国内的证明，到东京和吴鹤龄进行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活动。朝克巴达尔夫所带的草案是他和吉尔嘎郎（德古来）连夜拟具的。我主张要求建立“蒙古自治国”，吉尔嘎郎恐怕不易实现，主张要求建立“自治国”或“自治邦”，并嘱朝克巴达尔夫到东京后，请吴鹤龄斟酌实际情况进行。吴鹤龄也认为应要求建立“蒙古自治邦”。他们向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处活动之后，适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也返日，向陆军省请示三个伪政权的合并问题。吴鹤龄请大桥帮忙，大桥答复说：“我是代表军部为了要求建立蒙古自治国而来，偏遇你们又来要求建立自治邦，现在‘国’不能成了，‘邦’也不能成了，仅允许成立联合自治政府。这都是你们闹坏了，可别埋怨我们！”于是“建邦”、“建国”问题就又搁起来了。

日本军部和金井章二确实有过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活动的准备，因为三个伪政权合并后，曾使用过印有“蒙疆联合自治国”而又抹掉“国”字改印“政府”二字的公文用纸和封套。根据这一点来看，才知道是有过建“国”的酝酿和筹备的。即从日寇对华政策来说，当时是采取分割统治的办法，事实上已在东北制造了“满洲国”，在华北制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华南制造了“维新政府”，也许有过建立“蒙古联合自治国”的打算。为什么又中途变卦了呢？绝不会如大桥雄熊说的那样简单，可能出于两个企图而变更：一是由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声明，想用政治攻势诱降蒋介石媾和；二是这时汪精卫可能与日寇有了秘密活动，日寇为了政治诱降蒋介石或实现利用汪精卫分割统治中国的阴谋和策略，“蒙疆”也就不能成“国”，所以就变更了。

我派朝克巴达尔夫密赴日本，并向日本陆军省要求允许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讨论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当由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出面答复，表示同意，并向吴鹤龄说：“听说德王老和日本军部摩擦，他们（指日本军部）要杀他呢！希转告德王，今后不要再和日本军部摩擦，以防生命危险。”这不过是田中隆吉恫吓我，叫我俯首贴耳地作日本军部的忠顺傀儡而已。

朝克巴达尔夫返回后，我就草草召开了第四次“蒙古大会”，表示同意三个伪政权“合并”。至于建立什么样的“统一”伪政权，算作大会“授权”我这个“主席”全权办理。我在九月一日前赴张家口商洽“合并”问题时，已决心不再和日寇争执，金井章二提出来早已准备好的三个伪政权合并方案（如“政府组织大纲”、“施政纲领”、“旗帜”等），我连看也不看，就表示同意。他提名卓特巴札普当伪政务院长，我本来不怎么同意，口头上也说：“好！好！好！”表示甘心愿意饰演这幕傀儡剧的主要角色。

我虽然这样恭顺服从，日本军部仍恐我演不好这出傀儡戏，特于“蒙疆政府”成立前一天，由金井章二负责预作排演，把我和于品卿、夏恭召集在一起，说业由日本军

部内定我为“主席”，于、夏为“副主席”。又说“合并”必须强调“基于民意”，明天就举行“推选式”和“合并典礼”，应当事前“演习演习”。于是金井章二指于品卿说：“你应当说，我代表察南170万民众推选德王为主席。”指夏恭说：“你应当说，我代表晋北150万民众推选德王为主席。”指我说：“你应当说，我代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区域内300万民众，推选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最后，又吩咐说：“这是在推选式上你们三位正、副主席应当讲的话。在举行政府成立典礼时，由夏副主席宣读政府成立宣言，由于副主席宣读政府组织大纲和施政纲领，并希德主席先讲话，说明合并的意义和经过。”于、夏当时应承了。我这时的心情，实在不愿意讲话，当表示推托之意，结果就由金井章二担当报告合并的意义和筹备经过这场戏的角色了。接着他又嘱咐一些话，甚至开会的一般常识，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这出傀儡戏中，金井章二真是很负责任的一位“导演”。

到了9月1日，仍由金井章二主持举行仪式，把我和于、夏二人请到“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室，在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大桥雄熊政治参谋等少数人参加下，举行推选式。进行的程序和在会上的发言，一如前一天的预演，一言一动都没有变更，仅是增加照像这最后一幕。从此我就当上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于、夏二人就当上了副主席。接着举行“蒙疆政府”成立典礼。我和于、夏二人就以正、副主席身份出现，在莲沼兵团司令官、“来宾”、地方首脑和“蒙疆联合委员会”全体职员参加下，首由金井章二报告三个伪政权合并成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意义”和筹备经过，由于品卿宣读所谓“政府组织大纲”和“施政纲领”，由夏恭宣读所谓“政府成立宣言”，继由莲沼及“来宾”等致祝词。所有这些，也是按照事先排演的进行，没有什么变更。

“推选式”和“成立典礼”举行后，我就依照金井章二提出来的名单，任命卓特巴札普为伪政务院长和各伪部局长以上官员，及“察南”、“晋北”两个“政府长官”与巴、察、锡、乌、伊各盟盟长。接着就由伪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召开“政务院会议”，通过伪政务院、参议府和地方行政机构官制。确定张家口为“首都”，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规定统治区域，说明政府“旗帜”制定的意义。兹将蒙疆政府组织大纲等件摘录于后：

（一）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大纲：（1）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蒙疆地域为统治区域，团结东亚各民族；（2）新政权称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3）新政权首脑称为主席；（4）新政权以发扬东亚道义，尊重民意，为施政之大本；（5）首都设在张家口。

（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宣扬东亚道义精神，并期其实现；（2）大同协和诸民族，大施经论；（3）振兴民生，确保安宁，保障人民幸福；（4）从共产主义“毒害”中解放诸民族，以资强化“防共”战线；（5）团结友邦，同志相契，以奠定东亚新秩序。

（三）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旗帜：向来蒙疆各政权各自有代表旗帜，现在伴随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诞生，应有代表整个区域统一政权的表徵。因此，特制定从上而下横条黄、蓝、白、赤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黄色象征汉族，蓝色

象征蒙族，白色象征回族，中间赤色象征日本。就是以日本为中心，大同协和汉、蒙、回各族，作为代表政府的表徵。

（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领域：规定依据从来的“蒙疆”的区域为领域，确定地方行政机构为两个政府、五个盟，其中察南政府管辖原属十县和张家口一市；晋北政府管辖原属十二县和大同一市，巴彦塔拉盟管辖原属十一县、五旗和“厚和”、包头二市；察哈尔盟管辖原属八旗、八县；锡林郭勒盟管辖原属十旗；乌兰察布盟管辖原属六旗和固阳一县；伊克昭盟管辖原属七旗和五原、临河、东胜、沃野四县（实际当时伊盟政权的政令仅能达到黄河以北，乌加河以东的准格尔、达拉特二旗部分地区）。

（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宣言：维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四年九月一日，合并蒙古、察南、晋北三治，肇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转移运会，秉济时艰，开大同大顺之宏图，奠长治久安之丕基。为此，特昭示境内各族民众，敬告东西邻邦及世界各国：我蒙疆地域乃历史上著名之故疆，民风朴素，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安于农耕牧业久矣。况且地势挟天险而兼大陆，幅员依长城而跨北海，惟自民国成立以来，军阀割据，残民以逞，凌虐百端，民不堪命，二十年来，委诸虎狼，徒供饲饵而已。

蒋也何人，不择手段，伪定一时，开府南京，以联苏容共为国是，以割据抗日为至计，开罪友邦。进行抗日以来，连遭败北，仅保残喘于岷峨之间。而彼虎狼乘此空隙，时欲吞噬瀚海百旗之野，咆哮跳跃，薄我门墙，窥我堂奥，赤化之祸，行将临头。

我蒙古、察南、晋北三治，夙具同戚同休之心，誓图防共安民之治，必须标本兼治，通力合作，因而肇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期防止共产，协和民族。爰承友邦日本之提携，密切联系日、蒙、满、华达成巩固之一环，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发扬东亚道义之精神，光被世界，增进人类之福祉，功垂金帛。特将政府组织法及其他重要法案公布，通告各族，昭示内外，莫不咸庆是赖，并希东西邻友及世界各国，幸垂鉴察。天日在上，其共鉴之。

二、伪蒙疆自治政府组织和主要人事安排

依照伪蒙疆自治政府组织法规定，主席是最高首脑，由我担任，和我并列的是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其下是于品卿、夏恭两副主席。主席的办事机构是秘书处，由村谷彦治郎任处长。在主席、最高顾问领导下，设有管理政务的伪政务院，由卓特巴札普任院长。与伪政务院平行的机构，有管理军事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由李守信任总司令，还有咨询建议性质的伪参议府，由李守信兼任议长，聘任杨桑为名誉议长，特任吴鹤龄为参议，由村谷延治郎兼任伪参议府秘书处处长。伪政务院设有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七部和一个牧业总局。总务部长关口保；民财部长松律旺楚克、次长大场晨之助；治安部长丁其昌；司法部长陶克陶，次长波多野义雄；财政部长马永魁、次长日比野襄；产业部长杜运宇；交通部长金永昌、次长伊藤祐；牧业总局长郭

尔卓尔札布、次长泉名英，后为柏五郎。由伪院长和各部、局长组织政务院会议，讨论决定有关重要政务事项。实际上，任何事必先经日系伪总务部长和各部、局日系次长的研究决定后，才能提到政务院会议上。对于提出的事项，只能通过，不能否决。至于我这个“主席”的权力，仅是公布法令、教令、教书、大赦、特赦、授勋等，虽然还有“主席统率军队”的规定，实际上是无权过问，真是高高在上的傀儡。至于两个“副主席”更是无事可干。伪政务院还设置了两个咨议，一个是特克希卜彦（王宗洛），一个是雄诺敦都布。因为他两人曾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部长，合并后没有适当的位置，只好给与咨询名义，置诸闲散。

直属伪政务院的机构有“蒙疆学院”，由伪总务部长关口保兼任院长，副院长是日本人田边寿利，专司训练培养效忠日本的中下级职员。有“驻外代表部”和“办事处”，“驻满代表”是恩和布林（吴恩和），后为李丹山；“驻日代表部”的代表是日本人，后为特克希卜彦。驻北京的“外交机构”是办事处，处长是日本人。还有地政局、审计局，局长都是日本人。至于各伪部、局机构的情况是：民政部管辖的直属机构有蒙古学院，院长仍由金永昌兼任；蒙古文化馆，馆长仍是伊德钦；治安部管辖的直属机构有中央警察学校，校长是日本人早根务男。司法部的直属机构有各地法院和检察厅及各地监狱；财政部直辖的机构有蒙疆银行，总裁是萨音巴雅尔（包悦卿），继为巴萨尔，后为寺崎英雄；经济监视署，署长先是巴彦泰，后为于兰泽；税务监督署，署长开始是日本人，后为霍克济呼（霍翰甫）；产业部直属的机构有专管鸦片、盐业的清查榷运总署，署长是吉尔嘎朗。至于大同炭矿、电业、铁道、交通、畜产、食品等名目繁多的会社或公司，有的是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有的是日“蒙”合资经营，理事长多由日本人担任。少数会社的理事长是由蒙人或汉人担任，也是管不了事的，大权都操在日系副理事长的手中。

伪司法机关分为三级，设在中央的有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在“蒙疆政府”成立时，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厅长还未发表，我乘机向金井章二说：“补英达赖是蒙古的元老，现任巴彦塔拉盟盟长，仅是简任级，应当给他一个特任官。”金井说：“现在特任官的缺都没有了，仅有最高法院院长一缺，可以发表他。”我说：“补现任盟长是行政官，按制度上说不能兼任司法官呀。”金井说：“我想个变通办法发表就是了。”果然为时不久，金井特把法院官制中关于行政官不能兼任司法官的规定修改，提到政务院通过后，发表补英达赖为伪最高法院院长。伪最高检察厅长开始是刘继广，后为金永昌。伪巴盟高等法院院长是卓里克图（关荫南），伪巴盟高等检察厅长是那苏图（王庆三）。伪“厚和”地方法院院长是李介庵，伪“厚和”地方检察厅长由那苏图兼任。其他各地伪法院院长和检察厅长的姓名都不记得了。

伪地方行政机构主要人员是：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次长竹内元平；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次长前岛升；巴盟盟长补英达赖兼，副盟长亢仁（默尔根巴图尔），参与官泽井铁马；察盟盟长由卓特巴札普兼，副盟长特穆尔博罗特，参与官简牛耕三郎；锡盟盟长是林沁旺都特，后由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兼任，副盟长是补达巴拉，参与官中村浅吉；乌盟盟长初为巴宝多尔济，后为林庆僧格，参与官是山本信亲；伊盟盟长阿拉坦鄂其尔，参与官黑泽隆世；至于各伪县、旗长的安排，仍是采取蒙汉分治政策，旗

札萨克或总管一律是蒙古人，县、市长是汉人或回民。人数很多，不再列举。

三、我和蒋介石秘密勾结

前面说过，我曾与日寇发生过主奴之争，特别是在“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上的争执以后，我就有了出走的打算。这时，日本驻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酒井隆，因我的态度突然消沉，也引起他的怀疑和注意，我就更不能不谋早日出走了。但是，走向何方呢？反复思考，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更不愿投向中国共产党，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以投靠蒋介石为宜。因为我知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承认蒙古封建制度的存在，还掌握着大量的军队，有统治中国的力量。更认为我和蒋介石还有过一段政治关系，总觉得他还赏识我。总之，是反动的封建阶级本质支配着我要重走这条路。出走的方向决定了，又考虑采取哪条路走向重庆。我计划从我旗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一夜间就可以到达，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认为这样走比较稳妥。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了，就寻找线索进行联络。忽然想起伪“厚和”市警察局长那木尔（刘建华）曾向我说过，蒋介石派来工作人员，劝我与其联络。因为当时日本人还敷衍我，使我过得去，我就对刘建华严辞拒绝，表示绝不搞这一套，以免惹起麻烦和危险。以后刘建华也再未和我提及此事。这时我既然决定出走，觉得刘建华是联络引线。恰巧此时，迪力瓦由张家口要去“厚和”，我就嘱咐他秘密告知刘建华找寻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我不日前往“厚和”与之相见。接着我以视察巴盟为名前往“厚和”，刘建华见我说，有蒋介石派来的高荣少将，现在萨县工作，已经取得联络，近日即来此地。我当即密嘱刘建华，一俟高荣到后，在新城建设厅巷我的官邸相见。俟刘建华陪同高荣见我时，我把打算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告诉高荣，希望我到达苏、蒙时，重庆能照会苏、蒙准许我通过，转赴重庆。高荣当即答复我说：“这个事情很重要，需要我亲自去重庆请示蒋委员长。”我问他说：“什么时候能答复我？”高荣说：“往返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走后，刘建华向我报告说：“高荣见您后，认为得到意外收获，现已返重庆进行联络去了。”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还不见消息，使我甚为焦急，正打算找刘建华问讯时，刘建华特到张家口报告我说：“好险哪，听说高荣返经平津，几乎被捕。但是还好，高荣逃脱了，我们的事情还不至于败露。”嗣后高荣再也未来见我，这一段秘密联络，就暂告中止了。

高荣虽然杳无踪影，联络一时中断，但驻在陕坝的军统负责人员马汉三（当时化名马龙文），潜来“厚和”活动。这时和军统发生关系的有伪巴彦塔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科长梁芝祥、托克托县长肖兆庚、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等。但做我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梁芝祥。约在1939年末，我因事到“厚和”，梁芝祥送来重庆方面给我打来的极密电报，我记得原文大意如次：“佛君（是我的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报尾署名是贺耀组。我嘱咐梁芝祥说：“这是极为秘密而且是关系重要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梁芝祥很郑重地对我说：“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泄露。”我返回张家口不久，梁芝祥又来见我，带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

派我为蒙古自治委员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司令，派李守信为热河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司令的任命状。并对我说："李守信的任命状是李叫我带给主席看的。为了避免检查起见，特由吴君玉穿着军装带到张家口交我的。"我当即把委任状收下，认为可以作为我出走通过外蒙和苏联的凭证。我问梁芝祥："厚和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吗？"他答说："还有一个马龙文。"我当即嘱咐梁芝祥速返"厚和"，通知马龙文密来张家口与我见面。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梁芝祥当场将他的名片取出一张，分为两半，一半交给我，一半由他带回交给马龙文，备作前来见我时的暗号和凭证。不久，马汉三即密来张家口，由赛吉尔胡领来见我。我看暗号凭证相符，就出而相见。我说："前次我和高荣联络，提出取道北路通过外蒙、苏联，转赴重庆；嗣由梁芝祥给我转来复电，叫我取道包头这条路前往。经我详细考虑，认为这条路赴渝，很不妥当。因为这条路必须经过包头，渡过黄河，日本军警岗哨很多，并且我是主席，举止行动，惹人注意，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察觉。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蒋委员长，仍准取道北路赴渝，并请蒋委员长照会苏、蒙，对我不要留难。"马汉三答应转告请示。并说军统在张家口的联络和掩护机关是私立华北医院，今后来往密电或文件，均由该院转递。又说：蒋委员长打听吴鹤龄在这里做何工作？我即指定旺尔克札布秘书负责联络，并编好电报密码交给他使用。马汉三走后不久，即由华北医院给我转来复电，大意如次："德总司令（因为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我为第八路军总司令），取道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因为诺门罕事件业已和平解决，日苏关系已趋和缓，台端如果取道北路南来，通过苏联时，有被日本引渡过去的危险，仍宜另寻别途南来。如果无道路可寻，希勿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报尾署名仍是贺耀组。我接到这个电报后，认为还有和马汉三面谈的必要，就叫旺尔克札布通过华北医院把马汉三找来。我和他说："现在我已接到复电，知道蒋委员长不叫我取道北路赴渝，是对我深切的关怀，我至为感谢。今后只有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办理。并请你再次转请蒋委员长，准许在伊克昭盟也成立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这样一来，那边的自治政府和这边的联合自治政府便形成对立的局面，日本方面为了避免那边的争取，可能放松对我的控制，我就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训练军民，以待将来'的工作。"马汉三说："我一定把你这个意见转报蒋委员长考虑。"

1940年春，日本军部调遣"蒙古军"各师开赴五原，第八师师长札青札布及第九师二十五团团长郭景春路过张家口时，曾来见我，乌古廷亦在座。札青札布向乌古廷说："这次调遣蒙古军各师到五原作战，是帮助王英的绥西联军打天下，将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蒙古军是为谁而死呢！"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五原将有战争发生，又引起我借机出走的念头，于是又叫旺尔克札布把马汉三找来面谈。我对马说："听说傅作义正在五原布置军事，这边日本军部也正在调动兵力迫近五原，战争行将爆发。请你和傅作义联络，把五原作战暂缓一步，我趁此机会以慰问前方军队为名，亲赴前线，找个空隙溜走，你看怎样？"马汉三答应立即同傅联络。可是，他走后，五原战争就发生了，我这个出走计划，又成了泡影。

我通过军统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除了梁芝祥、旺尔克札布外，就是我最亲信人员赛吉尔胡、朝克巴达尔夫、超苦拔都尔也不详细知道，甚至对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也未告知，仅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带回我旗，交由我妻妥为保存。并计划出走时，才临

时通知陈绍武、丁我愚、都嘎尔苏隆等跟着我走。就是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二人，也仅负传递电报文件及进行联络之责，所有来往密电都由我亲自翻译，绝不假手他人。我和马汉三见面谈话时，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丁我愚等都不在场，把马汉三领进我的官邸，他们就躲开了。我认为进行得极为秘密，万无一失，但是这个事情终于败露了。

1940年春天，李守信前来张家口对我说："坏咧！坏咧！日本军警在'厚和'搜查'通敌'事件已经三天了。我们的事，可能都暴露了，你还不知道吗?"他这样一说，我也断定必然败露，但这个事情究竟怎样败露的，日本方面怎样发觉的，我是不知道其中的底细的。据我推断，可能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因为在五原战役中，日本军打了败仗，据说，策划这次战役的桑原特务机关长，在战场上自杀了。指挥这次战役的日本军部，为了泄愤和推卸责任，就在"厚和"、包头一带大肆搜查寻找"通敌"线索，偷听"通敌电台"，驻在"厚和"的日本宪兵队长去找"厚和"市的警察局长刘建华，质问他说："你曾推荐一个人（忘其名）在土默特旗工作，现在发现这个人是'军统'分子，有'通敌'的事情，但是这个人逃跑了。这个人既然是你推荐的，你可能知道逃往何处，希你提供线索，以便进行逮捕归案法办。"刘建华是个狡黠的人，听了这话之后，马上答复说："这还得了，我仅给这个人介绍工作，哪知人心叵测，竟敢干出'通敌'这样重大的事情，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们警宪是一体，搜捕'通敌'要犯，我与你有共同的责任。我一定用尽方法找寻这个人，找到以后，交你处理。"日本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当又嘱令从速寻找归案就走了。刘建华恐怕这事大败露后，株连到他的身上，就与吴君玉同到包头，乘坐"蒙古军"的汽车混出城门岗哨，渡过黄河，经过后套陕坝，投向重庆。日本人发觉刘建华逃脱，追查到吴君玉身上，在吴家中搜查出密藏的小型发报机和参加军统的名单，接着把贺云章、梁芝祥、肖兆庚等也逮捕下狱，供出我和李守信通过军统与蒋介石的勾结关系。这时马汉三正在张家口，但是不知他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李守信就故意放出风声说："军统案件败露了"。马汉三听到这个消息，即从张家口逃脱。

我和李守信知道事已败露，认为与其坐待日本军警追查，莫如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这样商量之后，李守信即去日本军部一趟，他回来时对我说："我已经和岗部司令官说了，你也去说了吧。"我即偕同朝克巴达尔夫赴日本军部对田中信一参谋长说："我今天来是对你谈谈我和蒋介石联络的一段经过，大概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吧。"田中信一说："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我考虑一下认为还从大的方面说较好，便答复他说："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对取道外蒙、苏联南下一节，避而未谈。田中信一进一步追问我说："蒋介石如许可蒙古独立你怎么办呢?"这使我颇为窘迫，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正在筹思之际，朝克巴达尔夫在翻译时，看出我的窘态，即用蒙语向我提醒一下。我当即领会他的意思，便答复田中信一说："蒋介石即便许可蒙古独立，我也不能凭信一句空话，就冒然从事。因为我知道蒋介石说话一向是不兑现的。要看看实际上能否实现，才能解决我的行止。"不意我的这番话正与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据梁芝祥获释后对我说：他在宪兵队供称是蒋介石派人潜来策

动我去重庆，我没有去。关于取道外蒙苏联一节，他因不知，也未供出。因为我的说法和梁芝祥的供词相符，田中信一便转怒为笑说："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也全部知道了。蒋介石叫你走，你没有走，这就好。希望你不要为此担心，我对你完全谅解。"我这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心境平稳下来，便又向他请求说："对于其他人员的处理，能够使我知道才好。"田中信一说："可以。"过了几天，田中信一邀我到日本军部，他拿出一个准备判刑的名单来。记得上面有梁芝祥、肖兆庚、贺云章，还有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察南政府"的财政厅长）等，拟一律处死。我又请求说："这件事情应由我全部负责，其他人员均是从犯。既然对我谅解，希望也宽恕他们。"田中信一说："既然你这样说，对于其中的蒙古人，可以从宽处理。"我就提出贺云章、梁芝祥是蒙古人，肖兆庚虽不是蒙古人，但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等于蒙古人了。田中信一说：这几个人究竟如何处理，俟和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告知你吧。"不几日他又亲到我的官邸，仍拿出那个判刑的名单，对我说："贺云章业已病死（据×××从日本宪兵队翻译探听，说是被用凉水灌死的），梁芝祥、肖兆庚二名从宽发落，各判徒刑八年，其他人员仍处死刑。"我认为再提出要求也是无用，因此我就未再谈什么。日本军部就把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等按"通敌抗日"罪名执行枪决了。这年五月间，我想回旗安排一下，但又恐日本方面阻拦，就故意向村谷彦治郎（"蒙疆"主席府秘书处长）说我要回旗，试探他的口气。他如表示阻拦，我就不去，以免惹起日本方面的怀疑和阻拦。但试探结果，村谷并未表示阻拦，反为我准备车辆。我一看日本方面没有阻拦动向，就返回我旗，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烧了。

这个案件处理以后，"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潘井少佐，曾向第九师师长包海明说，他曾参加过讨论处理这个案件的会议。田中信一参谋长主张对我和李守信不究，大桥雄熊政务参谋主张严办，经田中参谋长说明不究的理由是因为我俩是蒙疆的军政首脑，如果深究下去恐牵涉面广，影响太大。大桥还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可不是玩的，一定要从严处理。"包海明把潘井少佐这番话告知吉尔嘎朗，吉尔嘎朗又转告我。这可能是日本军部有意识地授意潘井通过包海明转告我，无非是希望我死心踏地的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而已。另一方面是警告我不要和苏联、外蒙古联络。其实，这是日本军部的过虑，我当时只愿和蒋介石联络，绝不愿走外蒙古、苏联这条路。后来我为什么又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因为走投无路被迫而去的。记得我曾和吉尔嘎朗谈述过这一段的经过，并表示对蒋介石感激心情。吉尔嘎朗说："据我看蒋介石不叫你取道北路赴渝，不是对你的关怀，而是怕你和外蒙联络起来，给他增加麻烦，所以特用'恐怕被日本引渡过去'这句话来吓唬你。"吉尔嘎朗和我说的这番私房话，是很有道理的，蒋介石在电报中叫我留在原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是期待我借用日本势力，组织蒙古武装，当时作为"防共之用"，将来用以"反共"，是想实现他不可告人的阴谋。可是我在日本投降之后，就离开军队去北平，假如日本投降时我掌握着军队，一定会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进行反共反人民勾当的。这个反动企图，当时虽未如愿以偿，待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已打到浦口，国民党反动集团迁到广州，我还趁此机会，企图东山再起，暗与美帝国主义勾结，收集残部，在阿拉善旗定远营拼凑起来一个"蒙古自治政府"，企图组织武装力

量，再与人民为敌。但为时不久，宁夏便告解放，我和李守信率同残部逃至阿拉善旗西北部，因为缺乏给养，军队四出抢掠，牧民逃避一空，陷入几百里地无人烟的境地。我在重重罪恶之上又加上了纵兵殃民的罪恶。

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时期的“对外关系”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的“对外关系”，首先是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问题以及我的第二次“访日”和第三次访“满”，还有一些伪政权的对日和别的所谓“驻外”活动。

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和其党羽陈公博等逃出重庆，先到越南河内再派人去香港发出通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关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对华政治诱降声明。继即到达上海与日寇“讲和”，缔结卖国协定，并于 1940 年 3 月 30 日实行所谓“还都南京”，标榜中国领域内“分治合作”，“反共和平建国”，参与“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也声明今后对华政策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承认汪精卫伪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随之撤销；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降为特殊的地方政权；关于“蒙疆”政权问题，日汪之间不能没有默契。汪精卫为了扩大他的权力，妄想作统治全国的首领，当然不愿蒙古独立，只承认“蒙疆高度自治”，日寇也不得不暂时迁就汪精卫的意见。

为了确定“蒙疆政权”和“汪精卫政权”的关系问题，“蒙疆”方面派出代表李守信偕同伪总务部长关口保、翻译陈有声等，汪精卫派出代表周佛海，在青岛缔结协定，并履行签字手续。这项协定的要点如次：1.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根据近卫首相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权）是继承中国法统的“正统政府”。认为重庆政权无论在法理上、实质上已降为地方政权。2. “中央政府”承认“蒙疆”是日、满、汉、蒙各族强度结合的地方政权。鉴于历史的、国防的、经济的重要性，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全盘施政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承认“蒙疆”高度自治。

李守信返张后向我详细汇报了他在青岛签字和与汪精卫会见时的情况。他说：签字仪式是在青岛一个宽阔的大厅举行的。当时日本华南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和汪精卫都在青岛，却没有参加签字仪式，是由他和周佛海代表双方签字的。签字以前也未进行谈判，签完协定之后，又签定了一个附件。这个附件载明的事项主要有三点：1. “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年号；2. “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四色七条政权旗帜；3. “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长城各口的驻兵权。签字之后，汪精卫、李守信参加宴会，并限定他一人代表“蒙疆”参加，计参加宴会者还有王克敏、梁鸿志、周佛海等。宴会间只是闲谈漫话，毫未涉及政治问题。

宴会后，汪精卫又邀李守信单独会见。李守信和板垣住在一起，他就和板垣商量说：“汪精卫单独请我谈话，是要谈什么话呢？谈政治我不懂，谈军事我倒知道一些，

并且见面时怎么称呼呢？他如叫我李守信，我就叫他汪精卫、还是称他为汪主席呢？如果称他主席，他是谁的主席呢？"坂垣说："管他是谁的主席，就称他主席吧。"于是李守信同他的随从副官郝贵堂去见汪精卫。见面时，郝贵堂要照像，汪精卫说："这个人进来行吗？"李守信说："他是我的随从副官，靠得住。"照完了像，汪开始谈话说："李总司令，你辛苦了。"李守信说："汪主席，你也辛苦了。"汪说："彼此都一样，没有什么。"李又说："早没见面，久仰大名。你可说是不避危险诋毁，一生为国家大事奋斗。"汪说："实在抱歉得很，我很愧对全国父老。"接着，汪问："你的防地安静不安静？"李说："傅作义前年反攻厚和，去年袭击包头，都被我们蒙古军配合日军打退。"汪又问李："你的部队有无困难，你可以向我说，咱们研究一下，我好替你解决。"李答："咱们亲日，不能叫兵们跟上受罪，没吃的向他们要，没花的也向他们要。蒙古军的补给很好，武器装备也不太差。"汪见李不向他求援，就又问："听说满人和蒙人之间有摩擦，有这个事吗？"李说："满洲人是蒙古人的外甥，你知道不知道？"汪说："我知道。"李接着又对汪说："蒙疆有多少满洲人，恐怕你不明白。蒙疆的满人都住在厚和市的新城，现在剩下不到一千户，就产生了一个满洲人市长李春秀。我们那儿也照顾少数，讲究民族协和，因为汉、满、蒙、回、藏各族，都是中国人，没有摩擦那回事。"汪一听，再不吭声。呆了一阵，汪又问李守信部队有无困难？李再次拒绝地说："主席老问我有无困难，可见对我们蒙古非常关怀。我们的困难，可以就地解决，不愿给主席多添麻烦。"汪见李始终不向他张口求援，便扯了一阵询问关于我的生活起居的闲话，即由周佛海、褚民谊和梅思平等陪同吃午饭，饭后李守信即告辞离去。

这个协定原稿，金井章二曾给我看过。我不但不同意这个协定内容，根本就不愿和汪精卫伪政权打交道。因为当时我认为：1. 如果和他缔结这样的协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汪精卫政权和"蒙疆"政权是隶属关系，仅是互相承认、互相支持的关系，但在协定里却指出，"汪精卫政权"与"蒙疆政权"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蒙疆"是汪精卫伪政府统治下的高度自治区域，与我一向谋求"蒙古建国"、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主张相反。尤其使我不满的是，汪精卫已经承认了"满洲国"，却不承认蒙古的"独立"。因此，我主张对汪精卫政权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不愿缔结这样的协定。2. 当时我还认为我之所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立场"与日本合作，用"为民族复兴"这块遮羞布来掩饰自己的丑恶。可另一方面，我却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国民党中央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居然脱离抗战后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厚颜无耻，实在有点看不起他。3. 当时我还认为：我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先，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后，他却要后来居上，当我的领头上司，把"蒙疆"地区划在他的统辖范围内，真使我有点不服气。不过我这时正与蒋介石秘密勾结，一心打算出走，因而对协定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汪精卫伪政权举行所谓"还都典礼"时，金井章二提出派伪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代表前往致贺，我也表示同意。

1940 年春天，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偕同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等乘坐飞机前来张家口视察访问。前一天，金井章二对我说："明天汪精卫主席来张，主席（指我）应到飞机场迎接并设宴招待，当然也要谈些话，希从早做好准备。"我为遥向蒋介石买好起见，推说有病，明天不能到飞机场欢迎。金井章二知道我的牛脾气又上来了，

就讪讪地对我说："既然有病，应当请医生看看，注意休养。"说完就走了。金井章二走后不久，日本军部就派军医官前来给我看病，我也谢绝了。推说我的病适宜服中药，不宜服西药。翌日汪精卫等一行果然乘飞机来张，我仍称病未去欢迎，仅由卓特巴札普代表我到机场迎接。汪精卫来张视察是事先得到日本军部同意的。我称病不见，既给汪精卫以难堪，更使日本军部下不来台。汪精卫却向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等表示说："既然德王有病，我去看看他。"大桥雄熊政治参谋当即给我秘书朝克巴达尔夫来电话，要我勉支病体，出而相见。我仍坚持不见。这可把大桥激怒了，当用电话对朝克巴达尔夫说："现在汪主席就去看德主席，切望务要出面相见。如果仍然拒见，我们日本军部要用全副的武装力量把汪主席护送到德主席的床前。"这个电话说完之后，大桥雄熊就陪同汪精卫前来我的官邸，我只好勉强出迎至大门口与汪相见，让至客厅座谈。大桥雄熊坐在一边监视着，汪开始慰问我的疾病，嘱要诊治休养。继则说："蒙古过去是我们的同胞，现在是我们的同胞，将来还是我们的同胞。应当加强团结合作，共同致力'反共和平·建国'。"我也淡淡地回答数语，相谈不到20分钟，汪即辞去，由金井章二、卓特巴札普等陪同在远来庄宴会。当日下午即乘飞机返平转宁，我未去欢送。在飞机场上汪还发表谈话说："我这次来张，承军政各界亲切招待，表示感谢。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还亲往慰问德王的病情，看到他满面红光，一望而知是病情好转。"暗示讥讽我称病未去迎接之意。

不久，吴鹤龄由日本回来，我和他谈到拒汪的经过。他说：汪精卫真是个大混蛋，全国军民都在抗战，他却前来投日。他之投日与我们不同，我们是基于"民族立场"与日本"合作"，他之投日是破坏全国抗战。并且我们与日本合作在先，汪之投日在后，现在又叫汪精卫来管辖我们，这等于叫我们随娘改嫁。吴他同我一样，这一套话，也是诵的同一套汉奸经。伪满"驻蒙代表"李义顺有一次和我说："德主席拒见汪精卫的消息，香港报纸亦有登载，标题是'德王拒见，汪逆碰壁'。"我当时听了还很得意呢。嗣后，听说汪精卫伪政府还颁布"蒙古自治法"，下达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人也未拿来给我看。大概这个"蒙古自治法"可能是触犯了日寇直接控制"蒙疆"的权利，所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关于我的第二次访日。这次"访日"是为了参加祝贺日本天皇纪元2600年纪念典礼，报告"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后的"蒙疆政情"及恳请今后的"援助"。陪同我的有金井章二、李守信和随员等二十余人。1941年2月11日由张家口出发经过北平、山海关、汉城等地，2月25日到达东京。日本松岗洋右外相及其他军政首脑人员到车站欢迎。日本外务省次官大桥忠一负责招待，与我接触机会较多，他在口头上表示尊重我的"权力"，因而我对他有好印象。我在日本东京的活动，无非是访问军政首脑，游览名胜，参观学校、工厂，到处受到日本各界的招待，可以说，对我是极尽笼络之能事。当我见到日本天皇裕仁时，他很尊重地接见我，在致辞中希望我致力"东亚和平事业"。我在答辞中表示"感谢日本的支援"。但因见日本天皇时，我是身着蒙古长袍、坎肩便装，听说有的日本人背地议论我未穿马褂，不够隆重。当我参加日本外相招待宴会时，松岗洋右没有照例在宴前致辞，仅举杯说了"祝蒙古万岁"一句话。我在"访问"期间主要的活动，是与吴鹤龄前往陆军省面见陆相东条英机、军务局长

武藤章、兵务局长田中隆吉（都是旧相识）。我和吴鹤龄当时提出改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是：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下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蒙古联盟政务委员会”，专管巴、察、锡、乌、伊等五盟事务，这是为了恢复类似“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机构，我好从中掌握，作为我的政治资本。一个是“蒙疆自治委员会”，专管“察南”、“晋北”两个伪政府的事务。这是因为察南、晋北两个地区日本人抓得更紧，我什么事也不能过问，干脆放弃不管。这个方案提出之后，并抄录一份面交近卫首相，他们当时没有明确答复。田中隆吉当着我和吴鹤龄的面说：“吴先生很能干，叫他当政务院长吧。”本来田中隆吉对吴鹤龄的印象不很好，为什么又主动提出叫他当“政务院长”呢？大概因为吴鹤龄在日本三年期间经常和陆军省联系，并且学会了日文、日语，娶了日本女子作妾，对他的印象已经好转，叫他当“政务院长”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蒙疆”人民又加上一个得力的帮凶。吴鹤龄又去陆军省探问对于我们所提出的改组“政府”方案作何处理，回来报告我说：“武藤章对我说，德王提出这个方案，是因为他愿意专办蒙古事。既然他愿意这样做，给他在德化设立一个专办蒙事的机构，叫他干不好吗？”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后来有“兴蒙委员会”之设，或即种因于此。

我在“访问”期间，还以个人身份访问过吉田骑兵监。因为吉田在包头担任日本驻军部队长时，我曾去包头“慰问”军队，他特开一例，把日本部队集合起来，列队欢迎我讲话，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和其他日本军人不同。当我访问他时，他除了殷勤接待外，并对我说：“我虽然离开了包头，但是对包头那里的事情，还时常打听，因此颇为熟悉。听说我走以后，继任我的中岛部队长做的很不好，逮捕了很多的人，并把为首的通敌人员王文治等杀了。我认为他这个做法太拙、太笨了，捕杀这些人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利用他们的组织和人员，反转来为我们搜集情报，窥探敌情！不是更能知道许多消息，使我们的耳目更灵通吗？”我当时还很佩服他的“见解高明”，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做法不过是更为阴险，更加毒辣罢了。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论在做法上或软或硬，对蒙、汉人民都是不怀好心的。

我在日本“访问”游览一个多月，本拟在归途访“满”，只因东条英机要来“蒙疆”“视察”，就停止了中途访“满”，于当年3月16日返抵张家口。我返回后不久，东条英机就乘日机前来，我和他见面之后，没有谈到什么重要问题，他只是嘱咐我不要灰心，致力“东亚和平”和“蒙日亲善”工作。并说送给我步枪五百支，叫我组织卫队。他走后不久，又派富永中将前来，适我返旗未得见面。我回张家口后，“兴亚院”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转告我说：“富永叫我转告你，一切不要灰心，仍要努力工作。”大概不久，我即把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哈丹布和（暴德彰）从伪蒙古军调来，担任我的卫队队长，并从第七、八两师调来精壮的蒙古士兵，组成了卫队，用东条英机送给我的五百支步枪装备了卫队。

关于我的第三次访“满”。本来预定访日后即行访“满”，不意我偕同金井章二及随员等到达北平时，偶染重感冒病，不能坚持前往，中途折回，以致预定安排的访“满”通知，没有及时传达经过的各地，使伪满在奉天（辽宁的沈阳）迎接的人员扑了空，伪满方面难免啧有烦言。这种情况，传到金井章二的耳朵里，又引起了对我的怀疑

和不满。他曾向陶克陶等说："德主席这次中途停止访满，使满洲国对蒙疆的印象不好。他是真正病重不能坚持前往呢？还是别有用意呢？据我看德主席一向主张吸收外蒙建立大蒙古国，这次中途停止访满，可能不满意所订立的《日苏中立条约》吧？因为他认为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日本默认了外蒙古独立。"实际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也不便向他解释，只好听之任之。

1942年，适逢"满洲建国"十周年，我又偕同李守信等，作第三次访"满"，祝贺"满洲建国"十周年并感谢对"蒙疆"的援助。我等一行于这年4月21日到达"新京"（长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军政大臣于深澄，兴安局总裁札嘎尔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等，均到车站欢迎。当我拜见"满洲国"皇帝溥仪时，他已不以臣属之礼相待，而以"蒙疆""政权首脑"之礼，飨以国宴，隆重招待，在宴前致辞时，称我为"贵主席"了。我在访"满"期间，无非是参加庆祝典礼，访问各部大臣，游览名胜，没有什么重要活动。我访"满"回来不久，伪满洲国特派治安大臣于深澄为团长，兴安局参与官博彦满都为首席代表，带同随员十余名，到达张家口作"回访"了。

此外还有一些"对外"活动是：1. 1942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时，参加的有中国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的傀儡总统洛克菲勒，缅甸的傀儡总理八博莫士，"蒙疆"因为没有"建国"，仅以地区的名义派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为代表，偕同翻译札奇斯钦（于宝衡）前往参加。嗣日本召开"大东亚经济会议"，"蒙疆"派财政部长吉尔嘎朗前去参加。2. 约在1941年8月间，"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要来"蒙疆"访问，吴鹤龄对我说："听说王揖唐最不愿意改称蒙古自治邦和使用成吉思汗年号，我们要做一个大大的蒙古自治邦政府牌子挂上，等他来时叫他看看，刺激、刺激他。"王揖唐到达后，仅是"敦睦友邻"性质，应酬访问一天就返回北平了。嗣后朱深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又派苏体仁来访，亦系拉拢关系应酬性质，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记述。3.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驻外"常设机构，计有"驻日代表部"，过去概由日本人担任代表，仅和日本陆军省发生关系，日本外务省还不以外交机关看待。到了1942年，特派特克希卜彦为代表，经过交涉才由日本外务省取得"外交人员"证明书三份，确定由代表、参事官、秘书官三人使用，其他人员还不发给。每当日本外务省召集各国使节团开会，宣布有关外交重要事情时，不挂"蒙疆政府"旗帜，经特克希卜彦出面交涉，才挂上。"驻日代表部"所办的经常事务，是管理"蒙疆"留日学生和登记审核日本国内入蒙经营工商业的资本家。特克希卜彦秉承我的意旨，常到日本陆军省、外务省联络，探听消息，遇有机会就进行"蒙古独立建国"的活动。但是"驻日代表部"有日本警视厅特派的名为保护实则监视的警察人员时常进入，有关重要的消息，不敢用信件传递，只有托付妥靠人员捎来报告我。此外在伪满"新京"设有"蒙疆驻满代表部"，也算是"外交机关"。在华北设有"驻北平办事处"，是联络性质的机关。

五、"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称"自治邦"与历次机构改革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经过几次行政机构改革和主要人事变动。主要原因

是“蒙疆”地区既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各级伪政权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御用工具，每当日本驻军司令官或参谋长、最高顾问或总务厅长调动时，就有机构改革和人事调动。在历次“改革”机构中，有时也有我和吴鹤龄的意见，但须得到日本军部的承认，才能行得通，否则就遭到碰壁。下面记述几次较大的机构改革和主要人事变动：

（1）伪政务院的变动与成立“蒙古自治邦”

1941年春，吴鹤龄从日本回来，我提出叫他当“政务院长”，但金井章二不愿意，就去鼓动高桥参谋长不要承诺。高桥和我说：“叫吴鹤龄当政务院长合适吗？”我说：“既然叫我当主席，我很需要他帮助，并且这是出于陆军省田中隆吉的意思，大概你也知道吧。”经我这样一说，高桥才无话可说了。金井章二见此计不售，就去策动卓特巴札普不要让出“政务院长”的位置。当我动员卓特巴札普把“政务院长”让给吴鹤龄时，无论如何劝说，卓也不愿放弃。并强调说：“在蒙古政府中，我是年纪最老的人，吴鹤龄是比我年轻的人，为什么要我把政务院长让给他呢。”说了几个钟头也无效果，最后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这个事情和日本方面都说好了，你也说过吴鹤龄能干，你如不让，就是阻碍贤路。”这样吴鹤龄便当了伪“政务院长”，把卓特巴札普调任为伪参议府议长。

吴鹤龄当上伪政务院长以后，就协助我进行“蒙古建国”工作。吴鹤龄既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主张“建国”要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蒙古政治邦”，第二步才是建立“蒙古国”。他在“蒙古军政府”时期，就草拟过“蒙古基本法”（似宪法）和“蒙古建国计划”。他在日本东京时，也秉承我的意旨，到处钻营活动“建国”，甚至不惜破坏祖国的统一，向日本朝野人士做过分割中国的建议。对于“蒙古建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也是做过研究，并且这样说过：“蒙古建国的国体问题，如仿照日本和‘满洲国’，应当采取君主国体或君主立宪政体，比较容易行得通。但如从远大目标说，我们不是还希望吸收外蒙建立大蒙古国吗？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应当采取民主共和国体。”又说：“无论采取共和国体或君主国体，主席（指我）当国家元首是没有问题的。建立蒙古共和国你是终身总统，如建立蒙古帝国，你是民选皇帝。”

关于“建国”的“年号”问题，我也再三考虑过。我认为最好是用“成德”二字。因为“成”是成吉思汗的成字，“德”是我名字的头一个字，合起来就是我“继承成吉思汗之德”。这与伪满皇帝溥仪登极后，应用康德年号表示“继承康熙之德”有同样的意义。我这个幻想和迷梦，简直狂妄已极，反动透顶了。

我们虽然做过这样的研究，吴鹤龄总认为一时不易实现，应当先把“蒙疆自治政府”改为“自治邦”，他就分向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和日本军部高桥参谋长活动。日本方面起初还不同意，至希特勒进攻苏联后，才允许对内改称“自治邦”，对外仍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吴鹤龄把接洽经过告我，我仍坚持建立“蒙古自治国”。吴鹤龄劝我说：“主席别再坚持了，建立蒙古自治邦问题，好容易遇到德国进攻苏联机会，得到高桥参谋长的承诺。设再延搁，深恐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反

而又成了问题。"我再未说什么，表示默许，日本方面也再无异议。即于1941年8月4日挂上"蒙古自治邦"的牌子，算是宣布成立。既未举行典礼，也未展开宣传，一般仅知有"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而不知有"自治邦"，我深感不甚惬意。吴鹤龄解释说："蒙古建国问题事体重大，关系复杂，牵涉更多，必须逐渐实行，以求实现，第一步先成立蒙古自治邦，第二步再谋求建国。并且'国'与'邦'在汉文解释上虽有不同，但用蒙文翻译过来，都叫"敖洛斯"，对蒙人也能说得下去。"他更进一步作试探性地说："蒙古建国不但主席一再坚持，力求实现，就是我也是梦寐以求的。如果蒙古一旦实现建国，主席登了大宝座，我这个政务院长，还不是总理大臣吗?"

（2）最高顾问的调动

1942年元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换成大桥忠一。金井章二的调职，固然在日本人内部有其矛盾原因，但与我之反对他也有一定的关系。金井章二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知道日本在"蒙疆"实行反动统治，一时还找不到另一个适当的傀儡，仍有利用我的必要，因而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对于某些事情也很敷衍我。例如在汪精卫开始投日时，他曾和我说过："蒙古建国之事，在汪精卫未建立政权之前，就应做成事实。"这话很合我的口胃。我提议要在纯蒙地带，建立一个新兴都市，作为"根据地"，他也表示同意，并到各处看过。但我总认为金井章二这个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特别是在制造"蒙疆"问题上，使我最伤脑筋，对他成见已深。因而在访日期间，就向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说他的坏话，表示对大桥忠一有好感，有意请他来当最高顾问。适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后，考虑到需要我调动蒙疆力量支援战争，就把我不愿意的人金井章二调走，把我欢迎的人大桥忠一派来充当最高顾问。大桥忠一到张家口后，没有先到日本军部请示机宜，而是先来见我。他的亲信人员提醒他，这样做会招致军部的不满。他却强调说："我是德王特意聘请的最高顾问，当然要先拜德主席。"甚至连在张家口的日本神社，他都疏忽了，未去参拜，这更招致日本军部的反感。他上任之后，表示尊重我的"权力"，并对日系职员训话说："你们把日本对蒙政策执行错了。在蒙古政府中，你们帮助蒙系人做事，不应对当地人藐视。"这样一来，在蒙疆政府当权的日本人，对他也心怀不满。同时他与驻在张家口的日本公使岩崎民男也发生矛盾。日本陆军省得知这种情况后，特派一个军官前来了解，听说也不赞同大桥的做法。这个人回去不久，陆军省就迫令大桥忠一回国。我听说以后，就去日本军部面见七田司令官表示挽留，七田坚决不肯，一定要撵大桥走。我见大桥后仍表示挽留他，并劝他暂时不要走。大桥对我说："主席不必为我一个人惹了军部和公使馆，我还是走吧"。当大桥走的时候，岩崎公使和日本军部参谋部等均未到车站送行，仅派一二个中下级军官到车站应付一下，大桥理也不理就登上火车走了。大桥走后，吴鹤龄对我说："咱们老蒙古就是心实，总认为大桥忠一好，金井章二不好，一切信任大桥忠一。但是他来了之后，我们什么权力也未得到，还失掉了一些权力。例如蒙疆银行总裁，向由蒙古人担任，大桥来了之后，说由日本人担任吧，结果寺崎英雄当了总裁，特穆尔博罗特任为副总裁。另一方面我们要让蒙古人当总务厅长，可是没办到。当他来的时候，我还问他，你还亲任总务厅长吗？最高顾问是在政务院长之

上的，总务厅长是在政务院长之下的，你如感觉兼任不合适，可以仍由蒙古人担任总务厅长。他立即答复我说‘“我兼，我兼。’由此看来，他是不管制度上是否合适，有权利的就抓，一点也不放弃。据我看来，大桥走了也好。大桥这一走连最高顾问也带走了，有什么不好呢?”的确，日本军部是用高压手段控制我，大桥忠一这个日本政客是用笼络手段软化我，统治蒙古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3）“蒙疆政府”的几次行政机构改革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特在“蒙疆联合政府”内设立一个“总力委员会”，由总务厅长武内哲夫任主任委员，由各部、局、会日系次长分任委员，下设一个“弘报局”，担负宣传动员支援战争之责。1942年6月1日，日寇为了实现“蒙汉分治”政策，便于从中驱使利用，又进行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要点是：1. 撤销伪牧业总局，成立“兴蒙委员会”，专管盟旗属于蒙人的事务。2. 将伪民政部、伪治安部合并为伪内政部，专管政厅、盟、县、市属于汉人的事务。3. 特设“回教委员会”，专管拉拢回族和联络西北回族工作。4. 将伪产业、财政两部合并为经济部，以便统一管理征用战略物资。5. 将伪司法部改称“司法委员会”，将伪交通部改为伪交通总局。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主要首脑人员也有很大变动：调任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为“兴蒙委员会”委员长，调任吉尔嘎郎和察盟劝业厅长穆克登宝为副委员长，调任村谷彦治郎为主任顾问；原财伪政部长马永魁调任伪经济部长；原伪治安部长丁其昌调任伪内政部长；伪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早坂冬男调任内政部次长；原产业部长杜运宇调任伪司法委员会长官，伪司法部次长藤井五一郎仍任伪司法委员会次长；伪交通部长金永昌仍任伪交通总局局长；新任蒋辉若为“回教委员会”委员长，李郁周为副委员长；伪总务厅长关口保离职，暂由金井章二兼，嗣后又调来武内哲夫任伪总务厅厅长；武内哲夫离职，又由次长前岛升署理伪总务厅厅长；原伪司法部长陶克陶，原伪牧业总局长郭尔卓尔札布调任“参议”，伪产业部次长藤公平调任顾问。这次机构改革是高桥参谋长到任后主持进行的。关于伪司法部改称司法委员会，因未设一个委员，所以称司法长官。我实在感觉不合理，提出应当考虑。高桥参谋长说：“这次机构改革，谁都说好，我看就这样吧，不用改了。”对于“兴蒙委员会”的设立，汉人方面啧有烦言，认为“蒙古政府”内不应再有“兴蒙委员会”之设；既设有“兴蒙委员会”，就应有“兴汉委员会”，才算公平合理。

1943年秋，又进行机构改革。因经济部所管业务特繁重，乃补充为经济、产业、财政三部，调任“晋北政府”长官田汝弼为经济部长，任吉尔嘎郎为财政部长，调杜运宇为产业部长，把原经济部长马永魁调任参议。调任“晋北政厅”民生厅长文画君为司法委员会长官，调任金永昌为最高检察厅长，特任穆克登宝为交通总署长。各部、会、局又配了次长，陈有声、陶克托胡（陶布新）为总务厅次长，恩和阿穆尔（张绍庭）为交通总局次长，图木勒巴塔尔（刘定一）为产业部次长，超苦拔都尔为“兴蒙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子荣为经济部次长，赛吉尔胡为内政部次长。同时把“察南政府”改成“宣化省”，由张家口迁至宣化办公，把“察南政府”原址，做了我的“主席府”，调任“察南政府”长官陈玉铭为参议，原最高检察厅长刘继广调任为宣化省

长。将“晋北政府”改称“大同省”，调任巴彦塔拉盟劝业厅长李树声为大同省长，将张家口市升格为“特别市”，归政务院直辖，任命崔景岚为市长。在张家口升格为“特别市”时，吴鹤龄认为张家口这个名称不好听，想改称“怡和浩特”特别市，用蒙文解释是“大都”的意思。而用日文翻译过来，“怡和”二字是很不体面的意思，日、蒙等人都说不好，因而未改。为了在行政上配合日本帝国主义西进的企图，特在包头设置“西部临时行政区”，将包头市、萨拉齐、安北、固阳三县划归“西部临时行政区”管辖，由伊盟盟长阿拉坦鄂其尔兼任该区长官，与伊盟公署合并办公。阿拉坦鄂其尔这个盟长，由仅管准格尔、达拉特二旗河北局部地区，一跃兼上管辖三县、一市的长官，从此有地盘、有收入，有警察队的武力了。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赖，因失掉了包头市和萨拉齐县的管辖权，甚不满意。再把省、盟的官房、民政、畜产、警务各厅的编制一律改为总务、民政、实业、治安等处，并把厅下科的编制也改为股的编制，缩小了行政组织。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已确定张家口为“首都”。按一般常理说，也应把最高军事机构同时迁到“首都”，保持军事和政治的联系，但“蒙古军”总司令部仍在厚和。日本军部把“蒙疆”的军、政最高机构分开是别有用心的：一者是“蒙古军”各师部署在包头、百灵庙一带，把总司令部设在厚和就便于指挥；另一方面，日本军部知道“蒙古军”是我的后盾，把最高军政机构分设两地，就减少我和带兵军官的接触，割断我和军队的联系，不能依据政府组织法“主席”统率军队的规定过问军事。特别是自从我和李守信秘密勾结蒋介石事件败露后，对我和李守信更不放心。因此，让李守信常住张家口执行副“主席”的职务，把我和李守信当做军事、政治上的傀儡，便于日本人一手操纵“蒙古军”的指挥权。我为了把军事和政治联系起来，吴鹤龄也想伸手抓军事、行政权，想在伪政务院下设“军政部”或“军事部”，日本军部仅准设立一个“军事联络部”。结果就这样决定了，“从蒙古军”调来突布格日勒（乌云飞）中将为部长，下边配备几个校级和尉级军官，办理有关军事联络事宜。这等于“蒙古军”总司令部驻张家口的一个办事处，什么实际权力也没有，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机关。

(4)“主席、副主席”的改选和调动

按照“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主席、副主席的产生都要经过推选程序。但在1941年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金井章二提出将夏恭副主席“依愿免官”，给予“前官礼遇”，调任为大同炭矿理事长。

迨至吴鹤龄当上伪政务院长后，看见夏恭“依愿免官”，“副主席”出缺未补，就想向掌握军事实力的李守信买好，就同我商量趁着这个机会，向日本人提出要求由蒙古人当“副主席”，我表示同意后，他就向金井章二提出这个意见。金井章二不客气地答复说：“你们要求蒙古人当副主席，要是晋北民众不向政府纳税怎么办呢?”吴鹤龄又向日本军部说，日本军部认为给李守信一个“副主席”的位置，便可常驻张家口，“蒙古军”司令部的日本人更便于工作。这样金井章二才表示同意。吴鹤龄为了符合“政府组织”法推选的规定，特向“察南”、“晋北”两个“政厅”要求拥护李守信为“副主席”的推选书，于是李守信便算合法当选为“副主席”了。吴鹤龄为了拉拢李守信，

不仅为他奔走“副主席”的位置，还把李守信的亲信旧部刘继广、李树声、崔景惠等安排在伪省、市长的位置。这些人经常在李守信的公馆进出，关系非常密切，引起我的秘书朝克巴达尔夫的怀疑，提醒我说：“近来吴院长和李副主席走得非常密切，不知在搞什么？我是很注意这个事情。”但我认为吴鹤龄和李守信接近，无非是互相利用，还不至于对我有不利的行为，因此，并未介意。

按照“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主席任期三年”。我这个“主席”到了1942年8月底任期已满。因我认为仅由正副主席“互相推选”的形式，既不“体面”又不“隆重”，坚持应当召开第五次“蒙古代表大会”进行推选。日本方面大桥忠一也主张召开。于是这年8月31日在张家口召开第五次“蒙古代表大会”，推选我连任“主席”，于品卿、李守信为“副主席”。我发表了下面的就职讲话：“兹承蒙古大会推戴我为蒙古自治邦政府主席，深感责任重大，如临深渊。惟有不计功过，竭力奋勉，达成历次蒙古大会之使命，而符全体官民一致拥戴之殷情。大东亚战争系东亚解放之战争，我邦夙与大日本帝国及满洲帝国有密切不可分之关系，辐车相依，休戚与共，协力完成兴亚大业，为我全体官民应尽之义务。必须坚定信念，精诚团结，一心一德，努力迈进，以期邦基之安定。”

六、日寇通过“蒙疆政府”对蒙汉人民的血腥统治

“蒙古”、“察南”、“晋北”伪三政权合并后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如从年号、旗帜和组织上看，摒弃中华民国年号，应用成吉思汗纪元；不用中国的国旗，只制四色七条的政府旗帜；保有“政务院“和七部的编制，俨然是“独立”状态，脱离了中国的版图。但实际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严格控制，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随着合并后的伪政权的建立，更进一步加深殖民地化。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蒙疆“各级政权对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了血腥统治，哪里有半点独立的味道！

军事上镇压

日本帝国主义把“蒙疆”作为侵略中国西北的前哨，进攻苏联、外蒙的基地，特派一个兵团的兵力，分驻各地，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包头一带，准备伺机进犯西北；把一部分兵力分驻张家口、大同、厚和（呼和浩特市）及其他重要地点，用以镇压各族人民。在张家口设立“蒙疆派遣军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并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包头、多伦、百灵庙、贝子庙、西苏尼特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设置日本特务机关或日本宪兵队，搜罗地痞流氓充当特务。因而特务遍布城乡，打入机关团体学校中，监视人民的言论行动，刁难商旅，调戏妇女。当时“巴彦塔拉盟”副盟长墨尔根巴图尔曾和我说，有个日本人（忘其名）率领警察特务搜查户口，竟把几个妇女关在屋中，迫令脱去衣服，赤身露体，供其玩耍作乐。我听见这个事情，曾请金井章二追查法办，当时金井章二也答应了。但过了几天，金井章二即对我说：“这个人已经应征入伍，无法追查了。”至于日本人带警察下乡，勒索、奸淫更是层出不穷，也从未听到受过什么处分。但在这一时期，曾发生日本军部逮捕据说是“违反纪律”的“蒙古军”第九师

十几名士兵，处以枪决之事。该师师长包海明认为士兵不守纪律，应当归由本师处理，日军不应越俎代庖。当向“蒙古军”总司令部报告并请转向日本军部交涉，对越权处决该师士兵的部队长，给予应有处分，并且声言如不作公平处理，他就要带领该师士兵拉出去，激愤异常。经李守信转向日本军部交涉，高桥参谋长反说：杀了违反纪律的蒙古兵是应该的，对擅行杀戮的日本部队长竟纵容不究。李守信处在日本军的压力之下，只有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充分说明，在日寇统治下，日本人做出无法无天的事情，可以逍遥法外，所谓“违反纪律”的蒙兵，便要受到极刑。

1939 年冬，傅作义军反攻包头，包头几乎失守。日本南支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特来视察，岗部司令官和金井章二陪同到包头、厚和，我听到后也乘飞机赶到厚和和坂垣会见。当时包头日本驻军小岛部队长，为了推卸防守有欠周密的责任，推说包头内部有“通敌分子”，泄露机密，这是“政府”所管警宪防查不周所致，不是战斗部队日本驻军的责任。金井章二是政府的最高顾问，面对岗部司令官也推卸责任说：“中国军队的反攻，正是日军调动之时，一定有人给敌人供给情报，李总司令（指李守信）可能知道，并且应负一定的责任。”李守信也不相让，说：“带兵官的调动，军队的换防，这是常事，并且都是秘密进行的，敌人何以知道？我听说，敌人反攻时，包头的商务会给敌军驮运烙饼做给养，内部也有‘通敌’人员给敌军送消息，这是政府所管警宪防守不周的责任，与蒙古军无关。”这样推来推去，结果反而是包头地方倒霉。在小岛部队长主持下，逮捕各界人士甚多，计有伪包头市公署职员王文治等。金井当向我说：“在调查‘通敌’案件中，发现包头市长刘继广也有重大嫌疑，可能牵连在内。”我向金井说：“刘继广曾当过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在绥东战役和进占绥远出过力，就是他与是案有关，也应当顾念他过去的功劳，免予深究。并且他当过中将师长，军级很高，现在仍当包头市长，很不适当，应当设法调转职务，可否调他为最高检察厅长，请您考虑。”金井当时表示尊重我的意见。果然，不久，就发表刘继广为“最高检察厅长”。我为刘继广解脱，是从私人情感出发，希望他感恩图报，为我效力。至于其他被捕的爱国人士，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判处徒刑，饱尝铁窗风味，我就置若罔闻了。1940 年春，在我通过军统勾结蒋介石案件中，刘长荣、吴君玉、杨金声被判处死刑，贺云章被非刑拷打死于狱中，梁芝祥、肖兆庚被判处徒刑，前已述及，兹不多赘。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案件中，日伪宪警逮捕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多人，受非刑拷打折磨而死者一百余人，至日本投降，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得庆生还者仅二十余人。对此案件我始终未曾过问。约在 1944 年，张家口日本宪兵队又将曾当过“蒙古军”第二师师长的尹宝山和陈生建逮捕下狱。这时因我勾结蒋介石案件暴露，自知有短处，深恐招致日本人的疑忌，就连要求宽恕也未敢正面进行，只是暗地设法营救，结果由李守信花了六万多元，买通张家口日本宪兵队长，才把尹、陈二人释放。但尹宝山因遭非刑拷打，已成残废，在北平德国医院身死，陈生建也落了个孱弱的病体。还有百灵庙特务机关曾将乌盟茂明安旗札萨克奇默特色楞好若劳，以勾通外蒙的“罪名”逮捕，囚禁在特务机关内拷问取供。奇王被逼不过，自杀身死。以上几个案件，是我所知和所闻的事情，至于被日寇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残害的无辜人民就更多了。

日寇常以“确立治安”为名，抽调日本机动部队，配合“蒙古军”、警察队“扫

荡”八路军，特设置重点于龙关、赤城、延庆和大青山一带山地，到处执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杀害人民，惨绝人寰。八路军为了保护人民，常和日伪军警展开游击战，打死打伤日伪军警很多，就是日本的将级军官和警监也被打死过几个。因为死一个日本将级军官，就得举行一次“慰灵祭”，迫令“蒙疆机关”、团体、学校的职工和市民参加。我这个“主席”或“政务院长”就得前往致祭。记得在1944年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张家口警备司令官某中将（忘其名）被八路军打死，就以“光荣战死”的名义，举行过一次“慰灵祭”。因为连续举行“政务院葬”，“蒙疆政府”的礼堂，一个时期变成了葬礼场。最使人可笑的是日本人弄虚作假，自欺欺人。当时日本军部有一个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北白川宫殿下，在张家口清河桥侧观看空军演习，被一架飞机失事坠落砸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而日本军部却说北白川宫殿下以金枝玉叶之身，“转战蒙疆各地”，“光荣战死”，就举行“慰灵祭”。驻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派遣军的参谋长都来参加，并在张家口为北白川宫殿下建立纪念碑，迫令各界人民经过碑前，都要鞠躬默哀。各界人民在日寇淫威之下，只有绕路而过，表示消极抵抗。

日寇在“蒙疆”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均派有日本军警把守，对来往行人严加搜抢，无理非难。又时常调查户口，黉夜闯入民宅，持枪恫吓，任意搜翻。还强迫实行保甲连坐法，一人有事，全村不安。压迫人民最狠毒最凶恶的是日本宪兵队，假如被当成“国事犯”抓到宪兵队去，便受灌凉水、压滚杠、辣椒面薰、铁条烙、军犬咬、钉子钉穿脚骨等等非刑拷打。当时蒙汉人民称之为阎罗殿，无不畏之如虎。总之，当时蒙汉人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淫威之下，真如日处愁云惨雾之中，人人提心吊胆，昼夜胆战心惊。

政治上控制

日寇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策略，首先是找寻蒙汉败类，作为帮凶。其用人原则，对蒙旗是尽量拉拢封建王公阶级，如我和雄诺敦都布、松津旺楚克、郭尔卓尔札布、卓特巴札普、穆克登宝等，不是王公出身，就是旧时总管。对于地方蒙旗更是沿袭封建制度，任用封建王公担任盟长、札萨克职务。对于汉、回族尽量利用地主豪绅和工商业资本家等上层阶级，如于品卿、贺秉温、马永魁都是。资本家夏恭、田汝弼是晋北一带的地主豪绅，王英是后套的恶霸地主。对于旧时官僚政客和军阀也是网罗利用，如吴鹤龄、李守信、蒋辉若等。至于留学日本的亲日分子，也给予高位，如杜运宇、陶克陶、吉尔嘎郎等。日本统治“蒙疆”将近十年，就是通过这一类人作为帮凶。其次是政治上分化。日寇在表面上标榜“民族协和”，作为欺骗性的宣传，暗地使用挑拨离间伎俩：当着蒙古族人说汉族人不可靠，应由蒙古族人当权；当着汉族人说蒙古族人低能，应由汉族人执政。记得杜运宇就向我说过：“日本人对我说，如果不是我们日本人居中控制蒙古人，蒙古人对汉人的压迫统治更利害呀。”并把当地人划分为蒙系、汉系、回系、满系，分别对待和使用，以期在日本人操纵指使下，达到互相牵制，供其利用。其三是“日本人中心主义”。在各级政权及各会社公司中，日本人自成一个统治的系统，掌握一切权力。凡是重要事情和机密文件，都是由日本军部或“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通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或伪总务厅长，由伪总务厅长通知各伪部局会次长、各

省、盟公署次长或参与官，各公司或会社的日系负责人，再由伪省、盟公署下达各旗、市、县日系参事官或顾问做秘密处理，不使当地人首脑知道。其中有的事情，需要当地首脑讲话时，给他做出文稿，让他当众宣读。所以各级伪政权、机关首脑，大都成了签名划行的傀儡，有时仅起传声筒的作用。就是特别接近日本方面的金永昌、陶克陶、杜运宇之流，也不能参加日本系统的会议。卓特巴札普身为伪政务院长兼察哈尔盟盟长多年，如果问他伪政务院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有时他到伪察哈尔盟公署去，还先给伪盟公署顾问送名片，说是我上班来了。结果博得日本顾问称赞，说："达吉桑是（卓字日文译音）伟大。"

经济上搜刮

日本从经济上把"蒙疆"作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日本国内垄断资本家，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就地廉价采购原料，招雇低价人工，特在"蒙疆"设立株式会社或股份公司，直接操纵经济命脉。据当时日本出版的昭和十七年度《北支蒙疆年鉴》记载，除京包铁路由华北铁道株式会社直接管理经营外，由"蒙疆政府"直接统辖的计有"蒙疆银行"、大同炭矿、龙烟铁矿、电业会社等株式会社九所，准特殊会社十所，普通会社58所，其中"蒙疆政府"出资占总数31%，"蒙疆银行"出资占10%，日本出资占总额57%，现场工地出资占总数2%。并且各会社的理事长或经理，绝大多数由日本人担任，其中虽有少数会社由蒙、汉族人担任理事长，也是由日系副理事长总揽大权。不但金融、电业、交通、煤矿、铁矿、畜牧等重要资源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就是食品、石油、烟草、面粉、洋灰、砖瓦、木材、火柴等也都由日本人掌握。特别是由"蒙疆政府"公布"鸦片管理令"后，设立"清查总署"，组织"土药公司"等机构，公开收购、贩运鸦片，而鸦片组合和烟馆更是普设城乡各地，以搜刮和毒化人民。各伪县市公署还在城镇设立官营赌博场，美其名曰"俱乐部"，公然设赌抽头，聚敛民财，因之倾家荡产者不知凡几，投河上吊者也不乏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军费开支浩繁，日寇更巧立名目，增加税收，把这沉重的负担转嫁在沦陷区人民的身上：特公布"集谷管理令"和"家畜搬出取缔法"，强行粮谷"集荷"，垄断收购农牧产品，用极低的价格收购，残酷掠夺人民财富。而主管其事的伪官和奸商，从中压等压价，饱充私囊。大米、白面等细粮，拨归日军军用和日本人食用，当地人民只配给掺砂掺假、发霉的杂合面。还强行"棉布统制"，收购价格甚低，出售价格甚高，黑市价格更昂，广大劳动人民无力购买，以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牧业地区牲畜头数逐年下降，严重损害了牧民的生活。

文化上麻醉

日寇毒化蒙汉人民的思想、麻醉知识青年的手段，可以下列几方面说明：1. 实行奴化教育。以所谓"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发扬东亚道义精神"为教育方针，在学校中每日清晨举行"升旗典礼"，先向东方遥拜。经过日军岗哨，必须向"皇军"敬礼。通过日本"神社"，必须鞠躬致敬。每逢日本"天长节"等节日到来，各机关、团体、学校必须放假，悬挂日本国旗，举行"纪念仪式"。为了实行"工业日本、农牧业

蒙疆”的侵略政策，仅准设立农牧业中等学校，禁止设立工业中等学校。2. 实行分化和同化教育。在中小学课程设置上，日文每周占七至十小时，而汉文或蒙文仅占三至五小时。专收蒙族学生的学校，限于学习日文和蒙文，不学习汉文。当时有的蒙古族人主张应学汉文，日本人说：“汉人文化不如日本文化高，与其学汉文不如学日文吸收现代知识快。”另一方面在专收汉族学生的学校，限于学习日文和汉文，不准学习蒙文。更尽量设置日语补习学校、日语进修班等来普及日语，就是想用普及日语的方法，达到同化蒙、汉、回各族人民的目的。用限制学习蒙文或汉文的方法，阻止蒙、汉、回各族人民自然融合。3. 在张家口设立“蒙疆学院”，在伪省、盟所在地设立“官吏养成所”或“训练班”等，对现职官吏从政治上灌输奴化思想。为加强亲日教育，并组织“蒙疆兴亚协进会”、“蒙古兴亚协力会”、“蒙疆青年兴亚同盟”等团体，笼络各界人士，麻醉各族青年。更在城乡广泛组织“劳动奉公队”，强迫人民负担修公路、修工事等沉重的义务劳动。4. 利用喇嘛教、佛教、道教、天主教、耶稣教、回教、红十字会、青帮、一贯道、纯一善社等宗教团体和反动会道门，麻醉人民思想，进行特务活动。5. 设立弘报局、放送局，发行“蒙疆新闻”、“蒙疆新报”、“蒙疆通讯”等报章杂志等，经常组织电影宣传班，深入农村牧区巡回上演，大肆进行“亲日防苏、蒙日亲善”等反动宣传。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更尽量宣传所谓“建立东亚共荣圈”、“建立东亚新秩序”等，企图从人种、肤色、地域上来麻醉和欺骗人民，从而支援日本，反对美、英。

以上是日寇通过“蒙疆”各级伪政权对蒙、汉人民的血腥统治。我是“蒙疆政府主席”，当然是不能辞其咎的。

我对于日本强加于蒙、汉人民的统治，做了很多的帮凶事情。择其要者，有如下列各端：

（1）调动人力，支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蒙疆自治邦”政府，为了动员全部人民支援战争，特由伪政务院长吴鹤龄起草，以我这个“主席”的名义，于1942年1月19日颁发“兴亚教书”如次：“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对美、英颁发宣战大诏。鉴于本邦与日本帝国有特殊密切关系，应一致努力，誓共休戚。况大东亚战争之开始，乃大东亚解放之天机，本邦为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翼，须尽共同奋斗之责任。凡我邦官民应愈加巩固团结，发挥总力，内竭奉公之诚，外尽协力之义，迅速完成兴亚大业，是所至望。”随着这个“兴亚教书”的颁布，就借口“确立治安”，加强“剿共”，从而搜刮战略物资。由于战争范围的扩大和战争局势的紧张，对蒙、汉人民的压榨，就愈益残酷。

过了一年，为了响应汪精卫政府参战（对美、英），仍由吴鹤龄起草，以我这个“主席”的名义，于1943年1月19日，颁发第二次“教书”如次：“维我盟邦大日本帝国，为求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以期东亚各民族、各国家共存共荣，业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对美、英宣战。本邦与大日本帝国夙有特殊密切之关系，为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翼。曾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颁发‘兴亚教书’，以期一致协力此次战争，与盟邦大日本帝国，誓共休戚。现在开战一年，大日本帝国业

经取得赫赫之战果，美、英侵略东亚之势力殆将净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亦于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八年一月九日，布告对美、英两国宣战，披沥同生共死之诚，誓协力大日本帝国，由此大东亚战力更进一层强化，增添战争前途之光芒。我邦官民必须遵照兴亚教书之主旨，发挥总力，继续奋斗，各尽其责，确立治安，增强生产，以期本邦之隆昌。更应全力以赴，赞助盟邦，协力战争，排除万难，歼灭东亚之公敌，确立东亚共荣圈，是所至望。”因此，又开展以“确立治安，增加生产”为中心的罪恶活动，使各级伪政权机关整备警察队，编练“靖乡青年队”，加强乡镇街村伪基层组织，实行“保甲连坐法”，进行“剿共”。更加强化粮谷“集荷”，强迫“劳动奉仕”，并由“蒙古兴亚协力会”开展献机、献铜、献铁运动，支援日军作战。

（2）坚决防共

我在防共方面，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例如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就把“防共”定为基本方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又把“防共”定为施政纲领，当众讲话时，更强调蒙古地区“防共”的特殊性。当“蒙古军”配合日本“剿共”时，我总是谆谆嘱咐带兵官努力完成“剿共”任务。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失利时，我为了巩固反动统治，谋求将来的出路，竟依照蒋介石对我“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扩编军队，组织武装，准备向八路军争夺胜利果实。

（3）进行民族分裂

我总认为“蒙疆”原来是蒙古地方，蒙古人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把汉、回人民当作异族看待，蒙族应在其他各族之上。因此，在“联盟政府”时期，凡属伪政府处长以上的官员，都不肯任用汉族人，选送留日学生一律限于蒙族古族人。“联合政府”时期，选送留日学生蒙、汉、回族人数虽然有一定比例，但蒙古族人仍居多数。我曾想把铁道以南的蒙古族人移至铁道以北，把铁道以北的汉族人移至铁道以南，来一个蒙、汉大搬家。“兴蒙委员会”开会时，我又策动亢仁提出我这个意见，并把土默特旗青年分期分批移到纯蒙旗地带，学习蒙文蒙语，免受汉族“同化”。亢仁等认为这样做，很易惹起麻烦，没有按照我的意图提出建议而作罢。在“蒙疆联合政府”时期，察盟参与官简牛耕三郎主持实行旗、县划界，我极力赞成，有的主管人不愿把蒙旗地方划归邻县，我曾力劝他们忍痛割爱，要为“长远”打算，现在宁肯失掉一些地方，可是从此割断汉民的移人，保持蒙旗地带的“纯洁性”。结果这次旗、县划界实行了。由此可见，促使蒙、汉分家，防止民族交流，我是有过于日寇而无不及。

（4）维护封建制度

日本在东北制造伪满洲国以后，特颁布“旗制实行令”，将札萨克制度改为旗长制度，把王公世袭政权逐渐转为地主阶级政权。但在“蒙疆”的做法，却是极力维护封建制度。1940 年 8 月 29 至 30 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召集各盟旗的盟长、副盟长、札萨克、总管等在张家口举行“蒙古会议”时，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在讲话中宣布：“蒙疆特殊区域的社会构成，是纯蒙地带，蒙旗制度，社会制度和历史沿革。因此，维护社会构成的阶级制度，是尊重现行札萨克旗制的存续。”

日本维护封建制度的措施，当然我是同意的。为了延续封建制度，还发表了“宣

言”和“纲领”。

“宣言”原文是：“我们祖先奄有欧亚版图，创立君临世界之大帝国，有光辉之历史。惟自元以后，势力衰微，不如往昔，然仍坚持蒙古民族之传统。近二十年来，更受边吏军阀百般之压制，缅怀太祖，自觉赧颜，不敢再事因循苟安。云王等各位先进，曾在百灵庙发起自治，但议民族复兴，复在友邦大日本协力之下，举‘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之大旗，作复兴蒙古之前驱。我等应继承其衣钵，内则同心和爱，外则敦睦邦交，是我等自觉之使命。进而发展生产，增殖人口，振兴教育，致力厚生事业，拥护政府主席，建立东亚新秩序，发扬东亚道义精神，太祖有灵，当护佑之。”

“纲领”的序文如次：

“①我等缅怀太祖之伟业及发扬其传统精神，谋求民族之复兴。②我等巩固团结与友邦提携，以强化‘防共’战线。③我等力求吸收世界知识，促进文化之发展向上。④我等勤俭自持，励精图治，促进生产之兴隆。⑤我等力求厚生事业之发展，以期民族之繁荣。”

东乌珠穆沁旗札萨克多尔吉横征暴敛，压迫旗民，引起旗民之反对，下令将其免职。但唯恐动摇封建制度，仍令他的很小的儿子继任札萨克，叫多布丹暂时护理札萨克职务。乌盟乌拉特中旗札萨克林庆僧格当了盟长，呈请准由他的儿子雄诺继承札萨克职务。其子年龄尚幼，不合惯例，“兴蒙委员长”吉而成郎向我请示处理办法，朝克巴达尔夫趁机向我建议说：“蒙旗王公世袭的封建制度，应当逐步改革，现在应当把王公爵位和札萨克分开，实行袭爵不袭职。”我婉言拒绝了。吴鹤龄也坚持沿袭旧的封建制度，不应骤然变更，因而林沁僧格的呈请亦被批准了。由于日本当权者宣布尊重蒙旗的封建制度，不仅札萨克旗制一直没有变，还想把察哈尔有的总管也改为世袭。例如卓特巴札普因为自己当伪政务院长兼察盟盟长，呈请准叫他的年龄幼小的儿子任为明安旗总管。我起初还表示不肯，深恐引起该旗人士和青年人的不满，但经不起卓特尔巴札普一再请求，并为了敷衍他的面子及调和我们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默认了。但青年职员啧有烦言，因而又以不到年龄为理由，准许他的儿子为记名总管。

我虽忠于日寇，只因在某些问题上有过意见，反招致日本军部和“公使馆”的不满。记得在召开第五次“蒙古大会”推选主席时，中岛万藏向我透露消息说：“岩崎公使曾对我说过，德王这个人老是不听话，总是嗷嗷不休，换另一个人代替他为主席不行吗?”日本军部政治参谋大桥雄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典型，有时就把本来的狰狞面目暴露出来。有一次，在“远来庄”饭店请他便宴，在谈话中涉及有关蒙古的事情，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不意他却以很不耐烦的样子说：“你老是蒙古蒙古的，蒙古干脆灭亡就得了。”我的秘书胡克金太知道这话不是滋味，不敢翻译给我听。我因与日本人时常接触，也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日语，知道他所说的意思，但我这时却有了“涵养”，装作不知。

七、支持吴鹤龄与“蒙疆”垮台前夕的挣扎

我支持吴鹤龄当上伪政务院长以后，曾做了下列几件事情：

(1) 设立"蒙疆豪利希亚"

日本既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蒙疆"，又从经济上成立"大蒙公司"和"蒙疆畜产公司"，收购牲畜皮毛，运售日用物资，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吴鹤龄为了抓经济权，特把原有的"蒙古生计会"加以整顿，仍由他兼任会长，聘请中岛万藏为顾问，在蒙古生计会之下，设立"豪利希亚部"，在各旗一律组织"豪利希亚"，经营收购牲畜皮毛并运销日用百货业务。这事着手进行以后，察盟参与官简中耕三郎为了维护日商的利益，特提出反对意见说："蒙古王公们现在组织豪利希亚，是想从中获利当资本家。"我和吴鹤龄听到这话以后，便规定蒙民每人入股至少十元，至多三千元，来抵制日本人的反对。"豪利希亚"设立以后，吴鹤龄究竟从中赚了多少钱，我无从知其底细。他的亲信人员罗励甫可是发了大财。听说在北京就买了多处房产，并设立聚义银号。吴鹤龄对罗励甫不仅未加责斥，反尽力庇护和代为遮掩，时常夸说罗励甫如何能干，能办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我支持吴鹤龄，曾引起日本军部的怀疑，冈村参谋就曾问过陶克陶："德王很支持吴鹤龄，是否他们二人有经济关系。"陶克陶答复说："德王支持吴鹤龄是政治关系，还不至于有经济关系。"这话是陶克陶向我说的。

(2) 设立"蒙古留日预备学校"

我支持吴鹤龄设立这个学校的目的，是想培养忠于我们的人材，取得蒙古族知识青年的拥护。先组织一个"蒙古留日学生后援会"，由松津旺楚克为会长，继而设立"蒙古留日预备学校"，由吴鹤龄兼任校长，莎音托布任主事，主持招收蒙古族青年，着重学习日本语文，补习一个时期后，便送往日本留学。这个学校确定是私办官助性质，资金来源大部分是"蒙疆政府"补助，少部分是私人捐献。我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划拨尚未花用的"蒙人教育复兴费"五万元拨作该校基金。这时恰巧日本军部给我五万元，也悉数拨作该校基金。我将此款拨交吴鹤龄后，还向金井章二说明此事，金井说："这是军部给你的钱，你怎么处理都可以。"同时，这个学校计划在十年期间，筹集基金1000万元，保送蒙古族留日学生1000名。我认为计划送这么多的留学生到日本去，是促进"蒙日亲善"的具体表现，必然得到日本方面的好感。不意金井听到以后说："用这些钱，送这么多留学生到日本去，是给日本增加负担，对日本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在日本的留学生多是抗日的。"

(3) 制定"蒙旗十年建设计划"

这个计划是吴鹤龄起草的，预定分期分批建设"蒙古新村"，其中的中心新村预定设在旗公署所在地。中心新村内政治上有旗公署，经济上有豪利希亚，文化上有中心小学，军事上有保安队，形成每个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于1943年组织三个"蒙旗建设队"，分在锡盟苏尼特右旗、察盟镶黄旗、乌盟的四子王旗开始建设。所有建设资金悉由"兴蒙委员会"支给，不叫所在蒙旗负担。我是尽力支持这个工作的。因为我和吴鹤龄及一部分蒙古中上层职员，认为蒙旗是我们的政治资本和根据地。并且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走下坡路，一旦失败，我们在蒙旗建设一些据点，好作东山再起的根据地，继续统治蒙古人民。

吴鹤龄虽然费尽心机，培植个人势力，拉拢晋北人士（如田汝弼、文画君等）和察盟总管（如穆克登宝、包楞那木济勒、阿由尔扎布等），想着巩固伪政务院长地位，但其为人度量狭小，骄傲自大，排除异己，特别是利用罗励甫等亲信，经营“蒙古生计会”和“豪利希亚”，从中赚钱肥己，更招致非议。被其打下擂台的陶克陶，调到伪司法部清水衙门的金永昌，前伪政务院长卓特巴札普等，对他素即不满，便趁机起而攻击。补英达赖认为自己是蒙古“元老”，企图争取伪政务院长的地位。杜运宇为“亲仁会”① 首领，察南一带颇有势力，因调动职务关系，对吴鹤龄已有不满。吴鹤龄的妹夫乌古廷，时任“蒙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依仗吴的势力，把持军权，又使李守信与吴亦不无芥蒂。于是这几个人便联合起来攻击吴鹤龄，揭露“蒙古生计会”和“豪利希亚”的黑幕，由陶克陶出面向日本军部冈村政治参谋告密。冈村对于吴鹤龄把持政权和乌古廷把持军权的所作所为早已不满。恰在这时，乌古廷和其四弟乌臻瑞（伪第七师参谋长）在德化一带私购大批鸦片，乘坐汽车前来张家口，被日本宪兵队扣获。冈村得到这个把柄，便来向我告知。我认为既然冈村参谋长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就转向吴鹤龄商量说：“乌古廷这个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现在又出了私运鸦片的事情，就得撤换他的参谋长。”吴也同意，经我俩研究结果，认为包海明向与潘井顾问关系密切，不会得到李守信的同意，便决定叫宝贵廷继任参谋长。吴鹤龄失掉了掌握军权的乌古廷的支持，陶克陶等便群起攻击，更成了众矢之的。冈村参谋还采用陶克陶的建议，特把补英达赖找到军部，面许叫他当伪政务院长，用这个方法来抵制我支持吴鹤龄。补英达赖这时升官心切，既然得到冈村参谋的默许，就来见我说：“这回吴鹤龄下台，政务院长该轮到我了吧。”我只有默不作答。嗣后我又到日本军部与中川参谋长和冈村参谋商量伪政务院长之事。他们表示要我亲上第一线，主持“政务”。于是吴鹤龄便在各方攻击和日本军部胁迫之下，离开伪政务院长职务，由我兼伪政务院长。我为了维护吴鹤龄颜面，满足补英达赖的政治欲望，特在伪政务院之下，各伪部会局之上设置内务、军事、经济、司法四个长官，由吴鹤龄任内务长官，负责指导兴蒙委员会、内政部、回教委员会的事务；由副主席于品卿兼任经济长官，负责指导经济、财政、产业、交通各部局的事务；由副主席李守信兼任军事长官，负责指导军事、保安等事务；由补英达赖任司法长官，负责指导司法委员会、各级法院及检察厅事务。吴鹤龄因此却一气去了北平。补英达赖颇为满意，向人表示说：“我现在总算和两位副主席平行了。”这一场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争权夺利的内部纠纷，才算结束。

我在未兼伪政务院长以前，日本人麻生达男（蒙名麦德尔札布）、猪口和玛尼巴达拉等从伪满洲国来张家口，募集在王爷庙建筑成吉思汗庙经费，我在官邸宴请他们。宴后麦、猪两个日本人走了，我和玛尼巴达拉、朝克巴达尔夫等密谈关于日本失败后怎样谋求出路的问题。我们认为，日本失败后，国民党的军队必然反攻过来。趁着这个机会，东、西蒙要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出路。至于集中地点，认为王爷庙偏东，张家口偏西，约定以林西、林东、经棚一带为集中地点。日本一失败，我们就把东西蒙的军队力量集中到这一带，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

---

① 亲仁会——日本授意杜运宇组织的亲日团体。

我兼伪政务院长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上着着失利，德国在欧洲战场上也是节节败退，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谁负问题已见分晓。我便依照和玛尼巴达拉的约定，组织力量，企图做最后的挣扎，谋求将来的出路。

（1）组织武装力量

我一向是迷信武力的，便从下列几方面组织武装力量：一是把“蒙古军”以蒙族人编成的第七、八、九各师及直辖骑兵队、炮兵队，加以整备充实，作为基本力量。二是把从“蒙古军”划出、改编为各盟、省伪靖安警备队的一、二、三师归还原建制，并将各市、县的伪警备队改编成十六个旅，作为机动力量。三是把各盟旗所属的保安队，改编为五个警卫师，由盟长兼任师长，作为盟旗地方的防卫力量。我这个计划，因涉及伪内政部警察管理权，招致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的反对。嗣经与日本军部几次交涉，才得到中川参谋长的同意。早坂冬男才无话可说了。并为了统一指挥，在伪政务院之下设立“军事部”，由李守信兼任部长，由崔玉堃和郭勒敏色为次长。这时我有计划地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有两个企图：一是把隶属不同、力量分散的武装集中起来，掌握在我的手里，阻击八路军；二是把分散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易于灵活调动到林西、经棚一带，作为东、西蒙古联合起来建立“蒙古自治国”的支柱。

（2）设立“行政统监部”

为了把伪政府的文职人员集中在纯蒙地带，备作日本失败后另谋出路为我驱使，特在察哈尔盟明安旗设立“行政统监部”。并派出一部分蒙古族职员，着手勘察地址，准备房屋，运送物资，备作第一步退守的根据地，第二步再向林西、经棚一带集中。

（3）处理日伪军警残杀丰镇县九宫道徒事件

1943年9月间，伪丰镇县警察署派员下乡，催交公粮、逼要烟土，迫令连夜送缴，无力缴纳者都被严刑拷打。九宫道的道士李伍仁等起而抗辩，也被欧打，因此激起全村民愤，聚众一千余人，手持斧头镰刀，群起暴动，打死胡姓翻译一人，打跑了警察队，缴枪十余枝。丰镇县又调派伪军警三百余人，将暴动的民众包围，开枪射击，结果打死打伤的民众甚多，焚烧民房数间。这次残酷的镇压，民怨沸腾，我兼理伪政务院长后，认为这是收买人心的最好机会，便提出将伪丰镇县伪县长、日系参事官、警察队长惩戒免官，以平民愤。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还不同意，我是坚持非办不可。这时我因有事回旗，暂由李守信代理伪政务院长，临行前对李守信说：“假如对丰镇县长、参事官、警察队长不实行免职，我就不回来了。”这时日本人由于太平洋战争失利，对我的控制比前松些，早坂冬男也就再不坚持了，结果是按我的意见实行。伪警察队长安恩达被免官后，特到张家口见我诉说委屈。我认为他是李守信的旧部且今后尚有需用之处，便安慰他说：“你的委屈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你主持干的，而是日本人主持干的，但你是参与人之一，不得不把你免官。希你善体我意，暂时忍耐，今后遇有机会还会重用你。”我当面又给他蒙疆伪币一万元。这是我用明惩暗奖的两面手法，阳则示好被害民众，阴则奖励杀人罪犯，希望今后更好为我效忠。

（4）召开县长、绅士会议

我知道日寇强行的粮谷“集荷”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情，因此，开县长、绅士会议，提出整顿粮谷“集荷”问题。我讲话说：“自从实行粮谷‘集荷’以后，把民众血汗换来的粮谷‘集荷’起来以后，不加妥善保管，任令人马践踏、风吹雨打，以致霉烂损失，实在对不起民众。”我说这话的目的，是希望取得与会士绅的同情，并且通过他们为我宣传，博得当地民众的称赞，意图日本失败后，不至于反对我。我讲话之后，与会绅士多表赞同。嗣又谈到处理丰镇县九宫道事件问题，表示惩罚失职官吏，对死伤民众甚为痛心。集宁县绅士张某（系张书常之父）说：“丰镇县九宫道不幸事件的发生，德主席非常痛心。我建议在肇事地点建碑一座，上书‘罪在吾身’四字，这是主席下罪己诏的意思，用以纪念这次不幸的事件。”当时对他这个恭维性的建议，我很感舒服，对他极口称赞，他也自鸣得意。但是参与会议的伪内政部次长早坂冬男，听到我的讲话之后，甚为不满，向伪内政部长丁其昌说：“德主席在绅士会议讲话时，有反对粮谷‘集荷’的意思，是不愿再对大东亚战争协力吧。”虽然他这样疑忌和不满，但还未正式提出反对而惹起大的麻烦。

我正在积极准备退守之际，太平洋战局日趋紧张，联合国军连续轰炸日本本土，欧洲战局更是急转直下，苏联红军很快地解放了柏林。接着就出兵东北，打垮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帮助中国解放了东北人民。日本天皇裕仁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苏队蒙军队很快进至锡、察两盟，张北县城，八路军也迫近张家口周围。这时李守信正在张家口，给宝贵廷拍发急电，叫把“蒙古军”各师调至张家口和阳高县一带。因为铁路已被八路军切断，调动军队确有困难，同时宝贵廷为谋个人出路，打算投靠傅作义，也不愿执行我和李守信调遣军队的命令。驻在锡、察盟的“蒙古军”已被苏蒙联军缴械，张家口仅有少数伪警察队，日本军部对我表示他们业已奉命投降，希望我们自找出路，并由中岛万藏前来向我和李守信等说：“谁如愿去日本避难，日本军部可以为之准备飞机。”嗣由李守信向张家口渡边警备司令官询问可否去日本？他答说：“不行！我们日本已是战败国，对战胜国就得无条件服从。人家如果向我们要人，我国就得交出来。”这时在张家口的各伪机关蒙族职员，纷集我的官邸，有的主张南下投靠国民党政府，有的主张北上投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的主张就地等待八路军解放，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我这时也是徘徊不定，经与一部分蒙族职员商量，决定分向各方面谋求出路。当前最好先派代表向苏蒙联军试探接洽，结果就派定亢仁、朝克巴达尔夫、特木耳都克什为代表前往接洽。但因一时仓促，既未带证明文件，也没有俄语翻译，就连把在押的外蒙政治犯放出来充当俄语翻译和联络人这个事情都未想起来。同时也认为以“蒙疆政府”名义发给证明文件，苏蒙联军是否接受也是问题。亢仁等三人就仓促乘上汽车，和日本军部联络通过军事前线，前往张北与苏蒙联军进行联络。后来听亢仁说，他们到了张北就被当成俘虏拘留起来。原因是他们虽然见到了苏军上校瓦斯列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少将色恩道并说明来意，但斯、色却表示说：“你们过去既与苏蒙没有联系，现在又无具体表现，更未带证明文件说明你们的代表身份，日本虽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前方军队仍在对峙，这简直是把关于国际交涉的事情当成儿戏，无法承认你们是代表，只有把你们当作俘虏对待，暂时拘留起来。”从此，即与我失去通

讯联络。适在此时，苏蒙联军的飞机飞临张家口上空，散发传单，痛骂我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官吏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我认为联络苏蒙这条路已属无望，又不愿迎接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只有走投靠蒋介石这条路。恰在这时军统特务王野人、梁芝祥和国民党绥蒙党部特派员于福赓、杨润霖等前来张家口，拉拢我和李守信等投靠国民党，并由王野人给我和李守信送来军统局的电报，内容大意是："兹经请准派德王为蒙旗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先遣军总司令。希即重整军队，严防共军，如果武器不足，应即收缴日军武器，装备军队。台端训练军民，忍辱负重有年，现在为党国效忠，正是其时，务要保卫绥察蒙旗地方，勿使共军得逞。"这时吴鹤龄也由北平返张，劝我不要和外蒙联络，应即赴平设法与蒋介石接洽。我也认为我曾和蒋介石有过联系，可能得到他的谅解，因此就决定先去北平。并由超苫拔都尔拟具电报，电请蒋介石派来飞机，以便前往重庆，交由王野人派人送到北平拍发。日本人知道我要走，为了"酬劳"，特由中岛万藏给我送来几车大烟板子，共十五万两，让我分一部分给职员，一部分归我花用。我因为野心未死，仍想东山再起，深恐临行时拿上几车大烟土，落一个贩卖大烟土客的名声，对于我的政治前途有影响，并怕分赃不均引起争吵的麻烦，就拒绝未收。但临行时却带了蒙疆伪币三亿元、银洋三万元，到北平后，除分给大家外，给我买了一处住宅。至于三万银元，中岛万藏移交我花用，我听了中岛的建议，恐怕银元贬值，换成法币。结果法币贬值更大，很快就花完了。

我既然决定南下投蒋，于9月19日派人通知伪中上级蒙族职员连夜在车站集合，我和李守信即率同到站职员，乘上备好的专车赴平。

在日寇统治下，成立了六年之久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随着日寇的失败而瓦解了。

（1965年）

说明：

1.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统辖地区是：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全境，察哈尔盟的部分地区和伊克昭盟黄河以北部分地区。首府设在绥远省会归绥市——即今呼和浩特市。

2. 伪察南自治政府统辖地区是现在河北省蔚县、宣化周围各县和张家口市，首府设在张家口市。

3. 伪晋北自治政府统辖地区基本上是现山西省大同专区所属各县，首府设在大同市。

回忆在伪蒙疆政府时期

奇 天 祥*

伪蒙疆政府的产生，同伪满洲国一样，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排演，牵线人自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傀儡的主角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吴鹤龄辈。自命为“成吉思汗继承人”的德王，早有分裂祖国独树一帜的活动。他以内蒙古民族的“自治”、“自决”来标榜，不论在“百灵庙自治”时期，“德化军政府”时期或归绥的“蒙疆政府”以及流亡到阿拉善旗的“自治政府”时期，都是这种罪恶活动的再版。他使内蒙古人民在日寇和反动派的刀光血影里受了十多年的灾难。

德王最得意的时代，莫过于日寇纵横于祖国的大片土地上奴役中国各民族最黑暗的时代。这时伪蒙疆政府拥有：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伊盟仅有准格尔旗一部和达拉特旗一部）以及 1939 年合并晋北和察南两个傀儡政权为大同省、宣化省、张家口市。人口 600 万，其中蒙古族人不足 30 万。这个伪组织是完全靠日本的刺刀来维持的，不仅在外貌上由“皇军”保护，在骨子里也须仰仗“皇军”配备一套人马，才能组织成这个庞大的傀儡机构。

伪蒙疆政府的各个单位和机构内，有数以万计的日本人官吏，他们完全控制着每一个机构的军事、政治、经济、组织、人事等实际大权。伪蒙疆的大小蒙汉官吏，都仰承日寇的鼻息。1941 年春天，我和森盖林庆（当时我是伪伊克昭盟警察第一大队长，森盖是第二大队长）到张家口伪治安部（后改内务部）报告工作时，发现除伪部长丁其昌和几个点缀品似的蒙汉职员外，几乎四百多名职员都是清一色日本人。自然所用的公文都是日文。我吃惊地盘问一个蒙籍职员：“你们怎样做工作？”他笑了笑说：“我们没有什么事可做，这里都是日本规矩！”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日人武内次长向我们解释：“蒙古是个小孩，非有大量日本人帮助不可，等到蒙古成了大人，日本人自然要交给蒙古人的。”一旁坐的丁其昌不住点头哈腰连称：“对！对！对！”

日本人也经常对我宣传说：“我们一定要帮助蒙古人独立，现在首先要培养很多蒙古官吏。”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善于窥测主人心意、奴颜婢膝以适应他们所需要的“才干之士”。

日寇刚侵占绥远，伪蒙疆政府宣布在归绥（日伪改为厚和特别市）成立，迫使各蒙旗王公来庆祝“大典”，那是最热闹的时候。1937 年冬天，在沦陷区的各盟旗王公，都提心吊胆地出席了这个会议。只有伊克昭盟因黄河沙漠的天然条件，日本的势力达不到，因此由各地败溃的国民党军数万人马都相继逃入伊克昭盟地区。伊克昭盟王公也动

---

* 作者曾任伪伊克昭盟警察第一大队长。

摇于两者之间。日伪方面却尽量在伊克昭盟各旗活动，争取上层分子“归顺”。当时准格尔旗负实际责任的是东协理代理扎萨克奇文英和西协理奇凤鸣。他们两个也同来归绥庆贺“大典”。

奇凤鸣是我叔父。他早在德王搞百灵庙自治时期就和德王有联系，同时，他还到百庙灵一次，表示拥护云王、德王的“自治运动”。后因绥省主席傅作义的压制，才没敢妄为。这次他去归绥，我家正好住着由绥远逃亡出来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陈国英，陈对我叔父赴绥投向日伪却表示了谅解。他向我说：“处于你们这个环境，和日本来往是对的。”他似乎还称赞我叔父的投日是英明呢。

那次到归绥庆祝“开国大典”，伊克昭盟七个旗中，仅有准格尔旗两个协理、达拉特旗的森盖林庆、杭锦旗的阿拉坦鄂齐尔（伊克昭盟副盟长、杭锦旗的王爷）。但阿王因为在“百灵庙自治”时期仅得一个实业处长的位置，异常不满，以后他就向傅作义靠拢，同伊克昭盟盟长沙王搞起一个“绥境蒙政会”，这次他投机去归绥，就受到伪官吏的打击，最后甚至禁止他回旗，在包头设立个伪伊克昭盟公署，名义上他是代理盟长，实际上形同软禁。

日伪对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很重视，特地由包头特务机关派了一架专机，由日本特务内田等亲去扎萨克旗迎接。沙王婉言拒绝，只派了奇文卿等几个代表。沙王不去归绥，打破了日伪不战而“收复”伊克昭盟的计划，特别是打击了日伪方面“策士”的预料。吴鹤龄（当时是最高参议）老羞成怒，对沙王的代表们大骂：“你们沙王爷一直想搞垮百灵庙的自治，所以得到蒋介石数十万元的收买，就同几个出卖民族的王爷在绥远又搞了一个绥境蒙政会，打算分裂蒙古民族的团结。今天我们在‘皇军’的帮助下，已成立了蒙古人自己的政府，你们还想看风头，过几天收复了伊克昭盟，看你们王爷往哪里跑!”

伪官吏的下马威，打击了目击当时情景的准格尔旗两个协理奇文英和奇凤鸣。他们又看到日伪处处威吓和傲慢，尤其在大会场外，“皇军”的坦克、大炮示威，更使他们惊心动魄。不久他们就悄然返旗了。但沙王还是派了他旗内章京（加克尔齐）僧格林沁代表自己常住在包头的伪伊克昭盟公署，担任了会计科长，一直到僧格林沁在包头逝世。沙王对日伪藕断丝连的应付，受到了抗日阵营内青年们的反对，沙王不得已宣布撤销了僧格林沁在旗内的章京职务，对大家表示了抗日的决心，但在另一次扎萨克旗会议上，又秘密提升僧格林沁为西协理。我叔父奇凤鸣也同样是阴阳两面，一面让我和驻扎在我们附近的国民党军打交道，一面又密令我们保安第一大队长黄俊德和日伪联系，争取主动。

吴鹤龄吹嘘用武力“收复”伊克昭盟的话，倒不是无的放矢。就在1937年冬末，由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乌古廷指挥第八师等骑兵猛扑东胜县，准备一举攻克伊克昭盟的中心地，以便威胁伊克昭盟各旗“归附”（因伊克昭盟受黄河沙漠的阻隔，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行动，日军未出动）。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不仅东胜军民有抗敌御侮的决心，就是扎萨克、郡王两旗也有敌忾同仇的认识，在敌伪军围攻东胜正紧张时，遭到扎、郡两旗保安队腰击，致使伪蒙古军大败溃折，此役几乎活捉乌古廷。从此，日伪军再没敢深入伊克昭盟腹地。旋吴鹤龄也被他的政敌陶克陶打击，东渡日本学日语去了。

我叔父阴阳两面的应付，给准格尔旗带来很大的灾难。国民党军队在我们统辖地区愈聚愈多，番号也极为复杂。我是和这些抗日“英雄”们打交道的，但是有应酬不暇之势。他们要粮要草要大烟，可以说无所不要，至于抗日不抗日倒与他们无关，甚至他们很直爽地说：“这里不好，到那里去（指归日伪），反正有枪杆子就有办法。”两年后，大汉奸王英东山再起，由天津到包头成立“绥西联军总司令部”，并派人到伊克昭盟作广泛的活动，而这些“抗日军”大多数投入王部（计有乌青云、陈秉义、王拴子等）。

这些抗日“英雄”，都是所谓“国军”。他们蹂躏地方，压迫蒙汉人民，同我们准格尔旗的保安队的摩擦，也日甚一日。别的不说，只说一件“侮辱国旗”事件吧。有一天“国军”忽然要升旗了，并且命令保安队也照样去做。保安队当然不明白弄这些玩艺儿干什么。既然“国军”有命令，为了彼此友好吧，就照章执行，派了个弟兄，看一看国旗的样式和人家升旗的举动。这位鲁莽的年轻士兵，将青天白日国旗的十二个月牙，数成了十四个，回来照样用红布缝制了一个，栽起高杆举行起升旗典礼来。但不会唱国民党的国歌。这些天真的保安队认为反正是唱一下歌，扯起旗来就算，大家站起队来，唱了一阵哥哥妹妹的山歌，将国旗升上去。事被“国军”侦知，就来兴师问罪。保安队也不甘示弱，恶语回复，最后索性将国旗扯下，一火焚之。这种举动，严重地藐视了爱护国旗的“国军”的尊严，指着保安队队长质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但是落后的保安队长，连这种最浅近的知识也没有，他回答：“不是，我是个蒙古人。”“国军”军官又问：“难道蒙古人不是中国人吗？你不知道五族共和吗?”说实话，当时的准格尔旗军民，地处偏僻，落后保守性很大，许多常识确实不知道。

在我叔父被马占山部白三阎王（白凤翔）所执而自杀以后，我借口收容保安队，乘机跑到准格尔旗河北岸地区（是准格尔旗一个区，现划入土默特旗），收罗我叔父统辖下的保安队五百多人（虽然和白打了一仗，但人马武器损失并不大）。通过一次形式上的选举，我由一个挂名的上尉参谋成了保安总队长，继承了我叔父的实际权力（只是缺少一个法定的协理委任），我从此当了日伪的帮凶。

恰巧这时，伪伊克昭盟公署派了一个日本人心亥，代表伪伊克昭盟公署来准格尔旗宣慰。他认为我率士来归，是与他的“宣慰”分不开的，就建议我去包头，由他一力承担我的“要求”。于是我“名正言顺”地成为准格尔旗协理兼保安总队长。

是年夏末，伪蒙疆政府在归绥召集各盟旗县的王公开会，主要商议晋北、察南两个傀儡政府和伪蒙疆政府合并的问题，我算是王公代表，另派第二大队长奇庆林为准格尔旗的“人民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是由德王主持的，他是伪蒙疆政府的主席兼政务院长（这时云王已死）。

德王自从利用日本的刺刀登上主席宝座后，自己尽量扮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救世主”，在三个傀儡政府合并以后，他还向驻蒙疆日军司令官莲沼中将提出要求：希望“皇军”协助，将伪满所属的呼伦贝尔、昭乌达、哲里木等几个盟划入伪蒙疆政府。莲沼很幽默地说：“满洲国是蒙疆政府最亲密的盟邦，目前还不宜有此交涉，‘皇军’赫赫战果，不久就会结束在支那的战役，那时‘皇军’就会替您收复外蒙，您就是全蒙古的大皇帝了。”（此语系日军驻萨拉齐县部队长山崎英次大佐亲自给我说的）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领土虽然增多，可是大批大批的日本人也来了，塞满各个单位，控制得更加严格，将"立国""有功"的蒙古族中下级官吏一下排挤出去，不少人成了领干薪的伴食之官。他们无油水可揩，仅靠工薪是不够挥霍的，虽然当时物价还没有飞涨，可是这些人一般都有打牌、吸大烟的嗜好，在他们手头拮据时，也要对景伤情，发两句牢骚。

但是日本人的权力并不因这些人"抱屈"而有所抑制，反又将李守信的基本部队一、二、三师全改编成"靖安警备军"（武装警察队），伪蒙古军只有第四、五、六、七、八、九师六个师了，而这几个师并非李的嫡系，全是纯蒙古族人编的部队。他的基本人马隶属于伪治安部，但充满日本指导官，控制着组织、人事、财政、指挥大权。李守信虽然是伪蒙政府副主席兼伪蒙古军总司令，但无权统率其嫡系部队。好在这个胡子头儿爱的是玩姑娘、抽大烟，只要满足了他的荒淫享受生活，其他也不计较了。

我带的准格尔旗保安队既然归顺了日伪，日本人当然要进行改编和教育一番，以显示"皇军"恩威并用。1939年10月，伪伊克昭盟公署警务厅派来日人杭锦科长等七八人，准备着手改编我的保安队。几经磋商，确定了保安队的精锐（年轻力壮无不良嗜好者）全改编成伊克昭盟伪警察第一大队，由我担任大队长，分四个中队，共计四百六十人。但这个警察大队不是行政警察，而是武装战斗警察，以警察官的肩章：警正、警佐、警尉补、警长、警士来排列，所负的任务是替日本人打前锋卖命。

警察队全部给养由上面供应，留下一部保安队，算是维持准格尔旗河北岸一隅之地的军队。

傅作义的部队由河曲经过准格尔旗南部开到后套，在陕坝、五原、临河等地整训了一个时期，准备就绪，举全力在这一年冬天进攻包头。但大战在包头揭幕后，不足一千的"皇军"，却阻止了傅部的前进。傅所指挥的国民党嫡系门炳岳的第七骑兵师，配合傅部进攻萨拉齐县、破坏铁路，准备和傅东西呼应，夹击包头，但由于路线错误，在一个寒冬漆黑的夜里，冲入准格尔旗河北地区我的防地内，保安队自然仓促应战，门部也莫明其妙地和我们展开了每一个村屯的争夺战。战争的激烈出乎我们意料，但我们保安队顶住了这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铁帽子军"（门部骑七师都戴铁盔），这主要是保安队痛恨国民党军队蹂躏准格尔旗人民，涂炭其家属，故能努力作战。后来在胡宗南的七分校《王曲月刊》上，曾登过这一战役，称："抗日劲旅，在遭到准格尔旗投敌的军民的袭击，战斗甚为激烈。"这个糊涂仗，牵制了门部攻萨拉齐县，破坏铁路的任务，使日本援军开到包头"转危为安"。在我们保安队几个进行改编工作的日本人，面对此突然而又最激烈的战斗，吓得目瞪口呆。他们估计敌人炮火这样猛，人数又这样众多（当时号称一万人，实际四千多人），而且又是正规化的战术，无论怎样保安队是支持不了的。因此，他们深怕全军覆没，自己也活不了，把他们平日的矜持的面孔，一下变成可怜相，哀求似的向我建议："大队长，突围跑吧，不然通通的死了。"杭锦科长通过翻译向我说："您下命令全部撤退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实我早考虑过突围的事。不过两方已形成犬牙交错，大部已掺杂在一起，敌我已分不清，命令势难下达各队。同时，我很明白，多年来跟我叔父的那些老队长，顽固性强，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个童稚的后辈，万一命令下达后，他们倚老卖老地不服从，我在日本人面前反而

会失去威信，况且家眷都在，也是我顾虑的地方，又仗着我地形熟悉，乘的是骏马，在最严重时期，我想也能冲出去。因此，不理睬日本人的建议。最后，我索性向日本人表示："我不能离开准格尔旗父老们独自偷生，假如你们愿突围的话，请你们先走吧。"日本人自然不敢单独行动，反过来又赞扬我有"从容就义"的精神，与大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样。

战斗两日后，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保安队的弹药恐荒也严重起来。我正在进退两难的当儿，日本援军开到（主要为了在我们部队中的日本人安全）。开来的日军汽车七八辆，还有坦克三辆，人虽不多，但炮火异常猛烈，压住了门部的炮火。我乘机命令保安队反攻。这时，在我们保安队的七八个日本人也活跃起来，居然也"挺身而出"，敢和保安队站在一起，勇敢地冲锋了。门部经过连日的激战（在和我们战斗前，已和日军战斗数次），也疲乏不堪，只好向准格尔旗黄河南岸撤退，伤亡和武器损失很大，甚至把电台也扔掉。我们的力量也只能将骑七师驱逐出我们防地，就算万幸，而日军也任务紧急，匆匆地连夜奔向包头。

门炳岳退到准格尔旗河南岸，整顿好部队后，又发出向我进攻的命令。这时准格尔旗有两人替我"解围"，郝勇功（原准格尔旗保安队营长）、傅存仁（准格尔旗地主）相继访问了门炳岳，并解释了我"被迫"归日的经过。门考虑了一下，大约是感到再和我纠缠会妨碍攻占萨拉齐县的任务，只提出交还他失去的一座电台（实际这座电台扔在百姓家中，我派人找回）。就令郝勇功带路，由我们西面（未经准格尔旗防地）直奔萨拉齐县，但为时已晚，日人的兵车源源由东开到，控制了交通线，包头也开始了反攻，傅部被迫退去，损失伤亡很大。傅部这次进攻包头，事先准备工作是精密的，但在战术方面是有缺点的。转龙藏是包头的制高点，但未抢占（实际没有一个日军守护），铁路也未令各地游击队破坏，让日军大批开到，将山野重炮设在转龙藏，猛轰"国军"阵地，加上安北、固阳返回的日军残部，攻击了傅军的指挥部，使"国军"陷入混乱。伪蒙军原打算反正（驻包头伪蒙军第一师郭大刁部反正未遂，其部下于团长率部反正），但"国军"未很好地争取，日军大部开到后，迅速地控制了伪蒙军（曾架上重机枪在伪蒙军第一师师部，迫令其进攻"国军"），促成了"国军"重大的伤亡和迅速的败溃。

经此一役，日人对我保安队非常重视。日《朝日新闻》大肆鼓吹此次战役，谓："准格尔旗保安队英勇善战，其大队长年轻勇敢，能沉着指挥。"日寇也对我尊重起来。在未战以前，日寇轻藐地问我："你的几岁？噢，漂亮的小孩啊！"战争以后，却伸起大拇指："你的大大能干。"表示佩服，而且从此也不和我正面冲突了。旋即给我发下三八式步枪370支，轻机枪二十多挺，装备子弹大量送来。为了鼓励我的效忠"皇军"的"功绩"，伪蒙疆治安部次长（日本人）特地来嘉奖了我一番，并允许经费和武器弹药保证满足供应。日本人对我的信任，增强了我给他们当走狗的决心。

不久，留在抗日区的准格尔旗代理扎萨克奇文英，派他的亲信持着他的信来见我。内称："国军自从消灭我弟凤鸣官府后，现又集中力量压制我，目前境况恶劣，万难应付，请侄（称我为侄）代求'皇军'出兵援……。"我明白奇文英所说的困难是实情话，因国民党军虐杀我叔父后，又变本加厉地压制他，在准格尔旗河南岸驻重兵，隔断

我们的联系（也许是怕他投日），又用了各种不同的花样欺侮他，剥夺他的权利，他才喊出归日伪的口号。但我对他也是不谅解的，当白凤翔解决我们后，白部张参谋长向我说："你们的事，过错在你们旗的内部，奇文英拍电中央，报告你们投敌，请中央派兵迅速解决。我们才奉命来此。"这话也许是他们的挑拨，不过我们两方是有夙怨的。

日军驻包头的司令官小岛中将特为奇文英请求援助的事召集了伪伊盟公署的参事官、警务厅长、驻包头的特务机关长，以及"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森盖林庆和我开会研究。会上，我和森盖坚决要求"皇军""收复"伊盟。其他日本人是缄默不发一言（也许是怕小岛）。小岛先询问我俩的计划、打算和办法，然后引我们大家走到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前，严肃而又装成很威风的样子说："蒙疆只剩伊盟一块土地未收复，皇军当然有责任帮助来完成这个任务。可是最大的困难是收复后固守的问题，皇军不能用大部军力来守这个交通不便地区，靠蒙古军恐怕力量不济。最近后套的失败，说明蒙古军还是抵抗不了中国军队的（日军侵占后套后，交给伪蒙古军固守，被傅部收复）。假如你们伊盟能团结起来，装备好武器，在那个适宜你们活动的地区上，能否保守你们的家乡呢?"接着他的代参谋长小林中佐反复地问我们在伊盟的驻军番号、人数、装备、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边区的关系。因为我们说的使他很多地方不满意，可见他们早有这方面的细致情报。最后，他估计在伊克昭盟的抗日军最少有三万人，而我们各旗的保安队最多一万人，武器、装备、训练更悬殊很大，加上西面的傅作义军和南面的八路军等，都是主要威胁。他说来说去的意思是：怕八路军占据了这块地方，使各盟旗在国民党挤迫下"赤化"，那样更会糟糕。

小岛在快散会时，向我们做了"收复"伊克昭盟的保证说："这问题很重大，皇军要做进一步的考虑，不过你们要放心，皇军是一定会收复伊克昭盟的，希望你们做好准备，尤其是策动各盟旗的王公们来打'中国军'，因为伊克昭盟各旗都是在困难中挣扎。"小岛做了郑重"保证"，我们自然心喜，同时想到国民党军队欺压伊克昭盟军民，也给我们制造机会，我回复了奇文英的代表，并交给了他"皇军"的指示，让他做好准备，策应"皇军"，"收复"伊克昭盟。

我刚回旗下，傅作义特派王任之由后套来见我，说什么我叔父的死是白凤翔因想侵夺我们家产才造成的，"中央"和傅先生绝没有指示，你的"归日"是被逼迫的，"中央"都能原谅。假如你现在反正，给你很高的地位。同时他又要求我派代表到后套见傅，说你所要求的都能答应。我本来这时已死心塌地给日伪当走狗了，但我的"帮闲客"李仲深、席良、刘士奇等都劝我和傅联系，对我将来的前途一定有好处。再说，向傅要些武器、经费，扩充自己的力量，这不是更好吗? 这个如意算盘是不错的，我采取了他们的意见，请席良、李仲深代表我去后套拉拢一番，主要目的是要东西。

李、席去后套仅给我带回一件"司令"的委任状（我记不清是什么司令名号了）。和"皇军"给我的"恩惠"对照，觉得"皇军"真是对我们太"深厚"了。我自投日伪后，和伪伊克昭盟公署民政厅长（伪伊克昭盟公署的四个厅是警务厅、民政厅、畜产厅、教育厅）吉尔圪朗友谊很深，他是吴鹤龄派，吴和陶克陶（伪蒙疆总务厅长，以后任交通部长）斗争很激烈。在日本人面前争宠，互相诽谤打击很厉害，最后因陶克陶会日本话吃香，吴被挤下台，到日本学日语去了。因此，吴派大受排挤。可能吉感

到这点吧，和我结成友谊，可以对付陶，因我算一个有实力者，又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我刚归日伪时，欲得准格尔旗协理的委任，那时阿王因我未给他送厚礼，坚决不同意，但实际权力不在阿王之手，不过听说阿王还在德王面前进谗，说我年岁太小，不能胜任，怕各旗不服。吉尔圪朗也在德王面前顶他，说我虽然年轻，那是率领军队归顺我们，又经过准格尔旗军民一致推选来的，这与各旗关系不大，我们不应该以个人好恶，否认人家来归顺我们的诚意，况且日本人已同意了，我们不应该无理取闹。这样算决定了我的政治地位。

我曾几次在德王幕中钻营，也浅近地了解到内幕一些事。在表面上看，大家好像很忠心拥护他似的，实际上勾心斗角，内部矛盾倾轧得很厉害，都想利用他做自己升官发财的工具。而德王本人在政治场合上的才能经验不足，且又不能主持公道，处处表现出偏私于王公，尤其对锡林郭勒盟的王公，更是偏袒。在化德成立伪军政府时期，召募来数千蒙旗的流氓、土匪等军队，编为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一军李守信），把锡林郭勒盟那些不学无术的王公都选拔为中、少将师长。国民党军队进攻时，这些胆小如鼠的王爷们，个个心惊胆战，不仅不敢率部应战，反而潜逃回旗（有的借口回旗养病，或请喇嘛念经脱身回旗），影响官兵战斗情绪。当时的日本顾问田中提出撤换这一批无用的师长，代之而起的是所谓“后起之秀”军校学生出身的蒙古族青年（日本士官较多）。

1941 年（或是 1942 年），被排挤在日本学日语的吴鹤龄学成归国，并携带回来一个日本姨太太，在伪政府内大肆活跃，几个回合后，陶克陶已不支，大败下台。吴提出成立“留日学生后援会”，支持和鼓励蒙古族青年留日，多培养帝国主义忠实爪牙。又成立“豪利希亚”（合作社），用蒙旗出产的皮毛牲畜换日军的烟茶布匹等日用品。这自然是有利于日本人的。吴鹤龄此举，也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

另一方面，吴为了取得日本人信任，大肆渲染日本的进步，说日本是“天堂”，是“名符其实”的“东亚领袖”和“亚洲救世主”。我也深受其影响，要求赴日参观或学习。我赴张家口市由吉尔圪朗（时已升伪总务部次长）领着见了一次吴鹤龄。这位久仰的“政客”，这时已将老朽的伪政务院长卓世海挤下台而担任了院长，执行着“内阁总理”的事务。我自己想，可能他也有拉拢我的意思吧，和我表示了亲近。他支持我去日本参观。于是我参加了“蒙疆政府赴日参观团”的行列。去日本参观的有乌兰察布盟盟长林王、巴彦淖尔盟一个总管富贤德、察哈尔盟一个哈斯巴其尔、“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森盖林庆、中公旗协理巴图毕力格、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东协理乌勒济巴雅尔等和我十几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翻译。在日本两个多月，看了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工业表面上的繁荣发展，夸赞日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了不少毒素。

同年秋天，又去参加伪满洲国十周年纪念“国庆”节日，伪蒙疆政府的代表团团长是“兴蒙委员会”的委员长松王，副团长是“绥西保商督办”蒋辉若上将，五十多个代表团员，乘坐专车赴伪满首都“新京”（长春）。

这时“新京”打扮得五颜六色。但“满洲国民”脸上却看不出什么欣喜的样子。最奇妙的是“皇帝”上场：广场上设下整齐的酒宴，穿着整齐的各色各样礼服的“友邦”代表团鸦雀无声地坐在指定的位子上，忽然扩音机里喊了一声“起立”，溥仪佩戴着上将的伪满军服上场了，紧接着一声“敬礼”，大家忙着又低下头来。满天鸽子飞扬

在广场上空，嗡嗡的大编队飞机凌空而过。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张景惠双手端着“大诏”，敬奉在“皇帝”面前，然后鞠躬而退。“皇帝”御音朗朗念诵了一番“诏书”。这幕丑剧，颇折腾了一阵子。

1942年春天，伪伊克昭盟公署警务厅来电话叫我去包头，说有要事相议。应命到后，伪伊克昭盟公署和特务机关负责人，向我和森盖（他也应命从达拉特旗西碾房来此）说：“目前情势有利于我们到敌区活动。皇军的意思是让你们各率领自己的部队出发，这是收复伊克昭盟的好机会。”我当时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认为给日军当个前锋这也是应该的事。于是我应许下来。森盖比我是老奸巨猾得多，他先强调他的防地的困难，然后说回去准备，当然他是想看我以后的发展如何，再做出决定。

回旗后，我不自量力地率领我的主力向准格尔旗河南岸渡河突击。国民党守河军虽有四个连，但很快就被我们全部消灭。准格尔旗召湾一带，很快就被我们掌握。数日后，我因病返回河北党三窑子家住。部队在召湾一带修筑工事待命。想不到我的病转成伤寒，一病数月，急坏了日本人，这时“东北挺进军”五师全部开到，腐败的国民党军队，战斗力非常弱，士气很低，对我们阵地，始终无法攻克。而且在国民党逼迫下的扎萨克旗和乌审旗保安队起义了，这就牵制了他们的力量。

我这次的“胜利”，又得到日本人的奖励，给我发了一枚“警察最高功劳章”，以奖励我叛国的“功劳”。

同年秋天，我去参加“豪利希亚”在张家口的大会（我是准格尔旗“豪利希亚”理事），会上，吴鹤龄用三种不同的语言（蒙、汉、日）滔滔不绝地斥责了各旗王公利用“豪利希亚”贪污中饱的事。有的王爷（各旗“豪利希亚”都是王公们主办）丢失了“豪利希亚”基金，有的将用皮毛换来的布匹等就在张家口市卖了。有的旗借机向牧民加重负担，闹得乌烟瘴气，一片糊涂账，德王也气得不住抱怨。吴鹤龄说：“日本人早已说过，王公们搞‘豪利希亚’肯定闹不好，今日果真如此，我真不明白你们安的什么心。百姓们都不信仰你们，你们还能再当王爷吗?”最后，吴鹤龄有重点地斥责了茂明安旗。另外奖励了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因两旗将得来盈利作为学校经费）。

休息时，我在德王公馆（“豪利希亚”会议一般都在德王公馆开）闲逛，看见一部分人在编写蒙古字典。询之，知在德王亲自主持下编写。我说：“主席日理万机，还有工夫搞这个吗?”一个官吏笑着回答：“主席也只能管一管‘豪利希亚’，编一编字典，别的事日本人全包揽了。”

日本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在军事上打了几个胜仗，多设了几个傀儡国，要表示一下盟主的威风了，东条召集了几个傀儡首脑，开“大东亚会议”，邀请的有六个“国家”。汪精卫代表的“新中国”、张景惠代表的“满洲国”、巴莫代表的缅甸、谷勒尔代表的菲律宾、包鲁斯代表的印度，泰国是一个亲王殿下，东条团团居中而坐，高唱一阵“大东亚共存共荣”（电影宣传当时情形）。不意这个傀儡剧因未邀请德王，把他气坏了。他秘密鼓动“豪利希亚”的王公们选出代表到日本驻蒙军司令官那里请愿。代表中有乌兰察布盟的林庆僧格盟长和伊克昭盟的森盖，但那个老气横秋的日本司令官非常蛮横，向林盟长说：“看你愁的把你那条小辫子还掉了呢（当时许多王公有辫子），

你最好多注意一点你们盟内牲口事吧，早一点打下草，不然牲口就会在大雪天冻死的。”这个啼笑皆非的场面，代表们还要九十度鞠躬，表示感谢。

半年后，日军赠送给德王五百支日造三八式枪，算是回答他未参加“大东亚会议”的歉意。

日寇污辱和欺压伪蒙疆官吏是经常的事。伪人员为了贪图衣食禄位，都忍气吞声，不敢反抗。最有趣的是察哈尔盟一个副盟长，因自己的汽车被属下一个日本人抢坐，发生口角，让这个日本人打了一顿耳光，而且把他的眼镜也打坏了。事后他向人哭诉：“打我几下不要紧，把我二百块钱的眼镜也打坏了！”一时传为笑柄。

日本人内部的争权倾轧也很厉害，尤其在直接抓伪军的权力上。我数次给日本出力，大约得到信任，都认为在我头上能做一次政治买卖吧，包头特务机关和伪伊克昭盟公署警务厅（后改治安处）争起我们这部分力量来。特务机关先后派中岛、石飞、内田来准格尔，名义虽是交换情报，实际劝我归特务机关领导，保证供应比伪伊克昭盟公署强。给我番号是“鄂尔多斯战斗队司令”，和“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森盖一样。这使我左右为难，两头都怕。伪警务厅派来的人，对特务机关的人很注意，经常问我：“他们和你说了什么话？”伪伊克昭盟公署日本人警告我，特务机关不应该干涉准格尔旗，那是“越权”，“你也不应该和特务机关联系，否则会影响你的前途”。后来官司打到驻包头日军司令官那里，决定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两旗军队都应该归入伪伊克昭盟公署，否则会对未“收复”伊克昭盟各旗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怕“皇军”，虽然包头特务机关长是日军的中佐，就让“皇军”一言而定。森盖也由“鄂尔多斯挺进队”少将司令转成“伊盟警察第二大队”队长了。

但包头特务机关权势很大，直接控制的几个“上将”：“东亚同盟军”总司令白凤翔，“绥西联军”总司令王英，“绥西保商督办”蒋辉若。王英和我最熟悉，他约我到包头他的办事处（他的总司令部在西山嘴）殷勤招待我。实际我和他的“友谊”完全建立在彼此利用的基础上，我对他根本没有好印象。在我童年时期（1926年），王英就率他的三十一军，奉张作霖命令进攻山西河曲。但他和准格尔旗当时统治者那森达赖有夙怨，借出兵山西，向准格尔旗挑衅，于是发生了进攻准格尔旗的战争，准格尔旗人民遭受到最严重的兵灾。我家被他洗劫一空，给我幼小心灵中留下了创伤，在今天握手言欢时，那幕惨剧常反映在我脑中。但我今天的目的是对付我最恨的仇人、杀害我叔父的白凤翔。我打算拉拢王英和白对抗，因白和王在扩充军队、霸占地盘问题上矛盾很大。白凤翔投日自称率部一万二千人，这当然是虚张声势，但赢得日本人重视，他驻在固阳洋教堂后，即升官进爵，“招贤纳士”，大事铺张，尽量策动绥西土匪、地痞、流氓，扩张自己部队。他收罗极多极广，弄得团营长不知其数，将校官多如牛毛。这自然损害了王英及王部下土著势力。以后两人磨擦得几乎兵戈相见。我打算利用这种矛盾，报仇雪恨。另一方面我几次组织人打算刺杀白凤翔，因白出入警卫森严，未得下手。王英拉我的目的是扩展未来的权势，他的谈话直爽地表现出来。他乐观地分析时局说：“德、苏是两败俱伤，美国是最后胜利，国民党必然利用日伪来替他们打天下，那时绥远要出现一个‘绥人治绥’的崭新局面。有号召能力的人，必然乘时而起，内可抵制山西人再统治绥远人的局面，外可抗拒共产党的侵入。”说到这里，他得意地哈哈大笑，使劲

拍着我说："老弟，时势造英雄呀。你在地方上很有号召力，可不要错过机会，干一手呀。"又说："你如看得起老哥来，咱们有福同享，患难与共，我王英和谁相处都是永远和好。"这就是说他已物色好我这样有"号召"力的人，完全有资格和他患难相共的。我也少不得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只要您看得起我，在您高升时候，我会给您摇旗呐喊的。"

1944 年以后，日本人已普遍感到他们走下坡路了，对伪蒙疆政府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打算使这些傀儡官员们有些权力来共同支撑这个危局。李守信要求将自己的基本部队第一、二、三师，由"警备部队"再恢复原建制，置于自己管辖之下。德王要求扩编伪蒙古军。这时日本人逐渐已无力控制，且各地游击队闹得很凶，乐得顺水推舟承认，借以博取伪官员们好感，使其为己卖命。这一让步，乐坏了伪官员。不少具有奴才本性的人，居然认为"皇军"实在无领土野心，是诚心诚意地扶助蒙古人。其中最典型的是挨了日本人打，并打坏了他价值二百元眼镜的察哈尔盟副盟长，实际日本人同意增加伪蒙古军，他就有利可图。伪官吏都同样，只要分得日本人的一杯残羹，就会乐得手舞足蹈地不知所以了。

伪军的扩编，成了伪高级官吏争权夺利的机会。最突出的是德王、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的争军权。吴鹤龄是个野心很大的人，自恃有些反动才能，常翻云覆雨，玩弄德王、李守信，他们早有矛盾，不过因都受着日本主子的重压，还不十分显著。自扩编伪蒙古军方案落实后，吴为了攫取兵权，坚持主张在伪政务院长下设立一个军事部，由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乌古廷兼任，这无疑是吴、乌联盟，抢占德王、李守信的"军政大权"。德王、李守信也不愿受愚弄，由暗斗发展成公开冲突。日寇始而冷眼旁观，继而感到有支持德王、李守信的必要，因他俩在伪官员中影响比吴、乌大。结果吴、乌自然被挤下台。吴调成没官署的"内务长官"（因人设事），乌成军事参议。李守信兼军事部长，德王兼政务院长，宝紫宸（宝贵廷）升总参谋长，不甘寂寞的陶克陶看到自己的"政敌"下台，也赶忙出来活动。

1944 年秋，伪蒙古军扩编第一阶段初步就绪，除将伪靖安警备军编成伪蒙古军外，五个盟编五个防卫师。锡林郭勒盟为第一师，盟长松王为师长；察哈尔盟为第二师，盟长卓世海为师长，副盟长为副师长；乌兰察布盟为第六师，林盟长（林被俘后，沙盟长兼师长）为师长；巴彦塔拉盟为第十六师，盟长补英达赖为师长；伊克昭盟为第十二师，阿王为师长；这些对军事莫名其妙的老官僚又穿上军装，挂上军刀，要能文能武地排演一下。此外，特地又派来大批所谓"本科"出身的参谋长、处长之流，分派在各师，扶助师长们组织司令部，军事"正规化"了。

伪伊克昭盟第十二师编成六个团，即：原六师十六团、十八团，森盖部编一个团（森盖是少将旅长），达旗章锦文团，我部编成两个团（我兼任两团团长）。编"蒙古军"，伪官员们一般都同意，因派来的日本人少（每团一个日本教官），控制不严格，军官权利大些。

这时陶克陶突然派其舅父（大商人）来包头，通过伪十二师参谋长满仓介绍，和我拉拢（自然也和森盖拉拢），并以托我收买河南岸黄金为借口，提出要和我们"合作"（当然是政治合作，不是经济合作），并邀我去归绥"总司令部"和他二甥（陶的

二弟）伪蒙古军情报部长都伦仓会晤，协商给我编一个旅的事。当然意在要我支持陶。他帮助我，我乐得应承，反正互相有可利用的机会就利用，谁和谁也没有一定的感情。

1944 年冬天，由于看到日寇日暮途穷，都明白靠山要倒下来，势非再找主人不行。我又和傅作义恢复了几年来隔断的关系。傅派苏伯安到北平，途经我处。据苏说：傅有六个军的实力，准备大举反攻，请我做好准备。苏到天津找齐燮元等伪官员（那时齐燮元已被日本人撤去军权）联络，日本人也没有怎样，仅派人跟随，不令其自由活动。后苏由王英防地返后套。

1945 年春天，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高乐山来我处做开展敌区工作。高在抗战初期和我有一面之识。他来时给我带来第十二战区委我河防司令的委任，并向我要全军名册。他说："国军反攻在即，你要准备好策应工作，绥远万不能让共产党插足，傅长官准备给你绥南专员，将来你的责任重大，你需要立功报效傅长官。"

几天后，我去包头和森盖谈起改弦易帜以应付危局的事，他不胜感叹。他和我合计，我们两人的部队决不东开（当时消息调我们东去），离开家乡，不容易掌握住自己的部队，必要时两个部队靠拢，合起力量来，在政治上可以互相呼应，在军事上做到攻守同盟，彼此要协力同心，保持自己的权力。

这时各伪官们都在惶惶不安，加上游击队的活跃，日伪军力不敷，运用不灵，百灵庙游击队深夜潜入，杀死日寇首席指导官，萨拉齐县游击队里应外合攻入县府，伪蒙古军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剿匪"战死，第七师参谋长被俘放回，这都是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走下坡路的证明。上下都已一筹莫展，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在张家口的伪高级官吏们，也愁眉不展，齐集于李守信的官邸，不是吞云吐雾，就是八圈麻将，再不然就是酒肉征逐，谈古论今地交换情况，一致认定日本已无力再战，失败是意中事。大家只好依靠这个握实际军权的胡子老哥来求生存。因此最后惟一幻想就是依靠这股力量，灵活地做好投机"买卖"，将来好摇身一变成为内战"英雄"。

1945 年 5 月 10 日早晨——是我记得最确切的一天，李守信突然由归绥总部来电话限我当天就去。我不知道什么事这样严重，就忙乘马到萨拉齐县，坐当日晚车抵归绥，下车到都伦仓家，盯着他问发生了什么事，叫我这样急急赶来。他笑着说："明日见总司令吧，大概是军情大事。"次日谒李，他很客气他说："目前时局非常紧张，我们兵力是愈来愈感到不够分配，听说你有一定号召力，可以多编练军队，人越多越好，武器装备不成问题，你最好直接归总司令部。"接着又说："听说准格尔旗河南岸能用大烟换黄金，你给我换几千两，因为我在北平定购下一座德国制枪弹机器，非黄金不能买到。"我也不考虑其言如何，满口应承办理。

接着 6 月中旬，德王又来电叫我去张家口，这时李守信也在张（因李在两头公馆住）。这次见德王，他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孔也变了。他谦虚地问我部队的装备、人的士气，以及扩充的办法。他很郑重地问："你的部队能调到察哈尔盟来吗？"尽管我内心如何打算，我还是满口应承："只要主席有命令，任何地方我也能去！"他颔首微笑，表示满意。

晚间又到李守信公馆，在他烟榻上恳谈。他让我先防守铁路沿线，在必要时可迅速来张集中，又不断询问我他的一个老朋友黎明（国民党国防部某厅长）消息如何，并

又表示今后只要蒙古人有办法必须团结一致，爱护“领袖”（指德王）。他自己和德王是如何“莫逆”交好。我内心明白他俩要互相仰仗、借重，维持自己的地位，才“莫逆”起来，同时谁都看出来，他们内心是多么空虚惊慌。他们的地盘权力也是极不巩固的，万一日寇投降或溃退，他们的有限兵力，决不能控制广大的伪蒙疆区域，何况自己多年来未接近部队，日寇在时，还能互相利用，维持他们傀儡式的统一局面，但已危机四伏，各自为政了，霎时就会分化崩溃。他们现在虽然拚命扩充人，抓军队，打算集中起来运用，但无济于事。

伪政府和伪总司令部人们态度也变了，在我看都有些不大自然似的。和我认识的伪军政官员，尤其是德王、李守信的亲信幕僚们，纷纷询问伊克昭盟的情况、“国军”的企图（当时在我对面的国民党军队），许多人还关心地劝告我“多加小心”，说去年冬天乌兰察布盟的林盟长全家被傅作义的骑四师俘去，主要是“大意”，今天你只有将部队集中到交通线附近，进可以走，退可以守。又有些人向我宣传：几年来日本人在军政方面控制得太严格，使德主席和李总司令这两位军政领袖有才无处施，现时局紧张，日人让步，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军队的扩编，向正规化目标前进（指加紧训练），政治上的集思广益（指德王最近常召开各旗各界士绅座谈会），封闭“俱乐部”（这种“俱乐部”是日本人统治伪政府腐化中国人民的政策之一，在许多城镇内设下“俱乐部”，让中国人民公开赌博，使人民陷入此火坑，自杀和受害者不计其数。有趣的是门上还挂个“日本人禁止入内”的招牌，似乎是在敌寇侵占地，还有中国人特权地方。在日伪崩溃的前夕，德王假仁假义宣布撤销）。又说这两位“领袖”仁厚宽爱，度量很大，更加“礼贤下士”，团结各族各界的人民来共赴“邦难”（这时伪蒙疆政府已冠上一个“自治邦政府”的不伦不类的名称，说是和“国家”一样了）。我听到这些话好像要巩固我对德王、李守信的信仰，又觉得这是“人之将亡”的哀鸣。

这时伪蒙疆政府兵力，大约三万人左右，武器装备都还可以，惟素质很低，加上部队成员大多是兵痞、流氓、惯匪等，官佐极端腐化，军纪更加坏，抢劫已成风气，其中伪蒙古军第八、九两师，奸淫虏掠更加无所不为。日寇的投降，使伪蒙古军政人员手足无措，随即大部力量分化而自灭了。

我这篇回忆，因事隔多年，多半不能详细记录，错误难免，希知者多加指正。

（1965 年）

我和德王由张家口溃逃的狼狈相

李守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夕，我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正在张家口。由于日本封锁消息，对于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和在以前美国向日本广岛扔下原子炸弹这两件大事，我和德王全不知道。迟至14日裕仁天皇下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5日上午十时，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官板本博，才把真相通知给我们。8月10日裕仁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抗战地区的各城市均响了胜利炮，傅作义派孙兰峰率领接收人员，11日从陕坝出发，12日到达王英司令部所在地的公庙子（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13日进入包头，就是这几天，我们还昏头昏脑地在张家口举行会议，研究伪蒙古军的扩军问题。就是：日本人应许伪蒙古军扩编为12个师，另把“蒙疆”境内的伪警察编为8个独立旅，亦归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指挥，以应付蒙疆的紧急状态。究竟因何而紧急，日本人没有向我们说明，我们一听扩充队伍都很高兴，也没有注意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张家口日本驻蒙古军军部不仅对我们封锁消息，对他们的中、下级人员也欺骗隐瞒，不过他们的高级人员都沉不住气了。8月初，他们开始把家眷打发走的很多，11日以后也尽往平津溜跑。伪蒙政府的蒙奸汉奸，特别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中国特务和张家口的警官，睹此情况感到不妙，也纷纷开小差离开张家口。过去我的上堡蒙古营子的家里，每天晚上高朋满座，可是这几天来客一天比一天减少，门庭逐渐冷落起来。

我在日本投降前夕，仍想升官发财，这时他们叫我兼任了“蒙疆政府”新设置的“军政部”部长，好像把“蒙疆”的枪杆子全交给我执掌。另外，在这不久以前，日本驻蒙军给我拨了11万两烟土，叫我打发人去包头换成物资，运到天津套购黄金，再赴上海购买枪械弹药。我派秘书唐成良带了3000两前去包头，向达拉特旗的森盖林沁买了一部分药材，剩下的十万零七千两，还堆在我的家中没有处理。我只顾在这十万多两烟土上打小算盘，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8月10日至15日中间的一天，“蒙疆政府”举行最后一次正副主席和部长会议，讨论把伪警察改编为伪蒙古军的问题。由于’蒙疆政府”的小顾问们这时也对时局摸不清楚，会前据伪民政部长丁其昌和我说，他们很反对日本驻蒙军军部给了我这么大的兵权。开会时众人都出席了，会议上把伪蒙古军12个师的师长的委任状通过后，接着“蒙疆政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提出了把伪警察改编为军队的问题。这时我便怀疑起日本为什么如此碗大汤宽，把伪警察也编给伪蒙古军扩大我的队伍？当然我高兴，但我又怕贪多嚼不烂，于是以军费没有着落为借口，表示负不起这项重任，想将他们一军，再要些烟土。由于大桥忠一没吐口，众人吵了一阵，未做出决议，即行宣布散会。德王的政治嗅觉比我还要迟钝，会后和我说：“日本人把警察交出，为什么你不要？”我说：“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咱们得研

究一下。”“蒙疆政府”的另一副主席于品卿和司法委员会长官兼经济部长杜运宇，以及陶克陶等人，就在会后的当晚，悄悄离开张家口躲往北平。他们所以听到风声不告诉我们，是怕我们把他们留下无法走脱。这几天我如堕入五里雾中胡思乱想，但不往日本投降上面设想，因而15日一听板本博向我们说出那个“噩耗”，真像晴天打了一个闷雷。

15日吃过早饭，我接到日本驻蒙军军部的电话，叫我赶快前去开会，说是有要紧事商谈。当我步入板本博的会客室的时候，德王已坐在那里，不大一会板本博走进来。他的脸色非常阴沉，劈头就和我们说：“天皇昨晚下诏宣布投降，你们怎么办？”板本博见我和德王都不吭声，他接着说：“你们要是跟上我们前去日本，我们可以保护你们。”我说：“你们保护我们，谁保护你们呢？”板本博被我问住，但又说：“蒙古军怎么办？”我说：“军队由你们的顾问掌握，我又被你们弄到张家口，出了错我不负责任。”他随即叫大桥雄熊参谋给归绥的小仓顾问挂电话，让把军队交给我的参谋长宝贵廷，电话回来说小仓已不知去向，日本人慌成一团。板本博对大桥说：“叫堀顾问代理小仓，军队保护机关，侨民往张家口集中。关于蒙古军的行动，听李总司令的电话指挥。”大桥走出去又回来，说是电话已经打通。板本博去他的办公室，取来一张图纸递给我，他说：“这是张家口地下仓库的图纸，里边有装备三个师团的武器弹药，原来是准备防俄用的，现在交给蒙古军。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即往北平撤退，你们把这些武器弄上，投谁也有出路。”板本博把事情安排完毕，德王还痴痴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不走。我对他说：“等啥？走吧！”德王被我提醒辞出，竟不商量大事，而是跑回家中，先去办理自己的善后。

我回家以后看了看手表，是十点多钟。于是就让秘书唐成良指挥众人打包行李，并到车站交涉车皮，尽快装上汽车，往北平疏散和转移家属财产。我赶忙给宝贵廷挂电话，询问厚和（呼和浩特）的情况，宝说：“日本人正准备装车逃走，咱们怎么办？”我说：“张家口有三个师团的东西都交给咱们了，在厚和切勿拣他们的洋捞，先把包头和厚和附近各县的人都集中到一起，叫们在路上遇见谁也不要打，绕开道往厚和开拔，晚上听我的电话，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宝说：“中央的人已经过河到了托县。”我问：“是谁？”宝说：“王匡一。”我说：“赶快派车去接。”打完电话，我也卷起袖子和卫士、勤务兵、大师傅、老妈子们在一起拾掇财物。十万两烟土和其它箱笼，即装满两辆大卡车，两辆小卧车上面也装满了细软东西。还有我在察北宝昌县买了一道三十多里长的山沟，约有十万多亩土地，这年共收了二百五六十石地租，磨了一百麻袋白面，还整装着三百麻袋小麦，以及拆开箱子的七千两烟土，都装不上卡车。每一麻袋粮食都是一百七八十斤，我的那些卫士和勤务兵，被我平日都惯成了少爷，他们都干不了扛麻袋的重活。我一看卡车上的皮箱非常的耀眼，便把一百麻袋面粉，一个一个地从地上扛起，由他们众人舁上卡车，才将皮箱遮盖起来。剩下的三百袋小麦和七千两烟土，我索性解开七十条袋子，把麦子倒出一半，每袋塞入一块烟土板子，将倒出的麦子再装人麻袋缝，准备第二批往车站运送。全家二十余人把东西打点停当，已经下午一点多钟，我的“蒙古军总司令”大将制服上，全挂满了灰尘。

草草吃完午饭，哪能顾上午睡，因为日本驻蒙军恐怕影响张家口的人心，让日伪家

属一律于夜间撤退。我此时无事，便琢磨起心事：苏联对日宣战，出于我的意料，现在张家口北面虽然还听不见炮声，黑龙江那一方面一定已经打起来了。我和玛鸣周前一年所议定的日本投降时，往外蒙边境集中伪蒙、伪满军队的计划已成泡影。当前我在张家口赤手空拳，除了几个卫士再没有一兵一卒，队伍大部留在厚和附近，小部驻在宣化一带；在察北和绥东的几个蒙古师，由德王和达密凌苏龙掌握，到了这个时候，不会跟我一致行动。为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还得依靠日本人。因为他们把散布到平绥路上的一个厚宫师团，都集中到张家口以后，仍有很大的力量，伪军很难扯他们的后腿。和他们把关系弄好，倒能接收不少东西，况且我的家属、财产弄往北平，亦脱离不了日军的保护。至于我的部队到了张家口，下一步该往何处走，那就是依然要脚踏两只船，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联络，和谁也不冲突，绝不防守张家口。打算将日军的地下仓库的武器起出，先上赤城、龙关一带的大山，站在高山顶上看二虎相斗，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最要紧的是，首先须把“蒙古军”集中起来。我一方面盘算，一方面叫卫士们给厚和挂电话，可是叫了好几次，都没有把线接通。

我正在愁思焦虑的时候，看门的人进来向我报告，他说外边来了一个八路军的代表，拿着一封信等待答复。我叫看门的把信要来，封皮写着：“日本驻军司令官、蒙古军司令官亲启”字样，信口没有封着，里边的大意是叫我们准备投降，他们要派员进驻张家口接收一切。信是由现在的陈毅元帅署名，我对此记得非常深刻。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便向看门的人说：“你告诉他，就说我主不了事，可以把信送给日本驻军军部。”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溜到门房的窗前，偷看八路军是个什么样子。原来是化装成张家口市民的一个青年。八路军的送信人走后，我也去了日本驻蒙军军部，向板本博报告了接到了八路军来信的经过，请示对此应当如何对付。他说：“我们投降美国和蒋介石，绝不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现在我们已在张家口北面的坝上布防，掩护机关和侨民撤退。俄国人和外蒙军如果来到，我们就要抵抗；八路军要进张家口，也不允许。我们走了以后，希望你们把张家口交给国民党，千万不要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他们不讲信义。”板本博和我说完，又把他的副官叫来说：“把咱们的那二百支比斯尼步枪，并装一大卡车汽油，送到李总司令公馆，拨给蒙古军用。”说完话我离开日本驻蒙军军部，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日本侨民的女人，都摆开拍卖东西的地摊，男人都缠着臂章，代替了警察的职务，持着枪来回巡逻，秩序维持得还很好。

晚上我把家眷财物，用四辆大小汽车，由唐成良带着四五个卫士，连人带车都打发上车站，即给厚和又挂了电话。这次总算叫通了，宝贵廷向我报告：“日本军民全上了火车，连夜往张家口撤退。厚和至包头的铁路，已被八路军挑了，王匡一已接到了司令部，队伍也从外县撤了回来。”我说：“队伍集中起来后，不要指望坐火车，八路军对厚和以东的铁路一定也要破坏。并且装车费时，要从厚和经过集宁的黄旗海子，直线奔张家口，今晚保护上家眷和炮兵出发，明晚就可赶来。”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电线即被切断，从此和厚和失掉联络，后来听说他们开到旗下营后又折回归绥。我刚打完电话，德王和金永昌与丁其昌先后来找我，德王说：“我从电报局接到蒋委员长来电，叫咱们各守岗位，他决不咎既往。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办？”我说：“蒋固然要应付，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日军一退，咱们便在八路军包围之中。应该派人和八路军联络，双方

互不侵犯，他们不打咱们，咱们可以把张家口让给他们。”德王问我：“叫谁去给联络？”我说：“乌勒吉敖喜尔。”金永昌说：“关于联络八路军的事，可得好好研究。”我说：“金永昌，你少插嘴。”金一听我呛他，便挟着尾巴溜走。丁其昌一看我们俩商量大事，也跟着躲了出去。德王又问我：“乌勒吉敖喜尔怎能和八路军拉上关系？我不清楚。”我说：“乌给外蒙掩护过电台，俄国、外蒙和八路军是一家人。”德说：“对！对！对！”说完即回去给乌勒吉敖喜尔去打电话。乌的“蒙古军”第九师在百灵庙驻防，他本人在厚和住家，德王不知用什么办法把电话叫通，乌坐着日本人撤退机关、侨民的火车到了张家口，和德说完话又坐火车回了厚和。乌回到厚和向宝贵廷、包海明等说我暴露了他的身份，主张把绥远的“蒙古军”投归外蒙，宝贵廷和包海明等主张投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他们分成两派。结果，宝贵廷因为大青山的八路军下来要进入厚和，就替傅作义守了厚和，抗拒了八路军。乌勒吉敖喜尔把他的“蒙古军”第九师和正黄旗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合到一起，也未配合八路军接收厚和与集宁，全投靠了在乌兰察布盟的外蒙古军队。以上这些事当时我全不知道，是逃到北平之后人们告给我的。德王把乌勒吉敖喜尔叫来，没让和我见面。16日他瞒着我派补英达赖、王宗洛和陈国藩到察北欢迎苏蒙军队，他那时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甩下，带着“蒙古军”去投降外蒙古。

苏联虽然8月8日已经对日宣战，但是外蒙古的军队集结到边境，等待观望了一个礼拜，听见日本天皇下诏投降，于16日始南下，当即把西苏尼特旗王府占领，将德王的家属、财产完全弄往乌兰巴托。这天德王接到西苏尼特旗的告急电话，召开了紧急会议，我没有在场，决定派补英达赖、王宗洛、陈国藩、宝建新等四位代表前去和苏蒙军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接回德王家属、财产。补、王等四人于下午三时乘汽车出发。我等到晚上，还不见宝贵廷把队伍带到张家口。这时我的家中仍有三百袋小麦和七千两烟土未曾运走，我期待队伍心急如火，只有绕着这些麻袋直转圈子。转到17日天亮，也听不见队伍到来的音信，我知道出了岔子，便去寻找德王。坐了一辆人力车，竟胡里胡涂地走进“蒙疆政府”，里边鸦雀无声，已经没人前来上班。院中堆着日本驻蒙军军部拨给的三十万两烟土，叫丁其昌散发给所有的人员。丁不敢负这个责任，所以堆在当院没有处理，上边落满日本各机关焚烧文件的纸灰。他们16日烧文件整整烧了一天，17日早晨还未烧完，故纸灰从东山坡一带随风往下堡的街道上直飞。我一看“蒙疆政府”只剩下几个门岗，这才出来去德王公馆。那里的人很多，见我进去都不说话了。正在发怔的时候，来了两架苏联飞机，盘旋在张家口高空，不敢往下低飞，扔下一颗炸弹，炸死一个妇女，撒了一些传单，即向北飞去。德王打发人出去把传单拣回，上边骂他是卖国贼和蒙奸。他说：“这条路看来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们都回避我，我没问他们传单上写些什么话，况且人家在背过我讨论事情，我呆下去很不合适，遂和众人招呼了一下辞去。回家挂电话向日本驻蒙军军部的大桥雄熊参谋和丁其昌等打听外边的消息。

外蒙军队于17日这天，由苏联的一个中将指挥，上午乘汽车到达张北以北的白城子和公会一带，派出两辆摩托车，到张北城外侦察。守城的日本军队开枪打坏一辆以后，旋即放弃张北，往南面的坝上撤退。日军退走不久，该地的伪县长和商务会会长，打着白旗出城欢迎苏蒙军队。苏蒙军硬说刚才的摩托车是伪县长指挥警察打的，故把伪县长商务会会长就地枪毙。从西苏尼特旗连夜乘着快马前来给德王报信的家奴也说：

"苏蒙军在半道上把德王的代表截住，将补英达赖和宝建新放脱，把陈国藩用飞机载往乌兰巴托，把王宗洛和到察北不知去干什么的吉尔嘎朗交给当地活动的八路军，带往阿巴嘎旗看管。"我睹此情况，开始感到走外蒙和八路军的路线都没有希望，认为还是投靠蒋介石比较可以苟延残喘。这时崔兴武的侄儿崔玉昆给我担任副官，他不知听谁说张砺生已经进了张家口。我因和张的代表郑立安有过联系，忙叫崔去调查张住在哪里，崔玉昆出去跑了一趟回来，原来是人们胡扯。到了晚上我对宝贵廷已经绝望，于是产生了两个念头：一个是自己从张家口骑马转山头回厚和；一个是到北平坐飞机回厚和。可是沿途及厚和的真实情况不明，又不敢前去冒险，所以这一夜仍是辗转反侧，终宵没有阖眼。

18日白天，苏蒙军由张北向张家口发动进攻，在北面的坝上展开炮战。同时八路军的接收部队，也从东、南、西三面围上。因为日本人是由军队护路撤退，他们边走、边修、边打，从厚和和大同撤下的列车，不断开进张家口车站。伪大同省省长李树声感到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车过张家口时，他没有下车看我，就到宣化去找伪宣化省省长刘续广。蒙古军的堀顾问和兽医处长杨海轩，这天也从厚和到达，他们是16日白天出走，一共走了两天两夜，下了车即相随着来找我。他们都说："宝贵廷变了心，要把队伍留下给傅作义守城。他们怕被八路军活捉，所以跟队伍脱离，劝我赶快离开张家口，往北平逃跑。"我说："我跟板本博司令官同进退，苏蒙军和八路军马上进不了张家口。"把堀顾问送走，将杨海轩留下，不大一会，丁其昌来跟我告别，他说他要走了，可是扔不下我。我说："你先走吧，我得跟上日本军军部一齐走。因为我们到了北平，还得依靠日本人保护。"丁其昌走了以后，我把那三百袋小麦，叫杨向日本驻蒙军军部要了一辆卡车，都搬到一家熟惯的粮店寄存起来，因为车站上尽往火车上装人，怕被日本宪兵给扔了下来。打落完毕，天已昏黑，突然有驻防察北的"蒙古军"第五师的两个团长郭景春和郭新德跑来，他们说："第五师已在阿巴嘎旗被苏蒙军解决，我们两个今天光身跑到张家口，德主席把他的卫队交给我们，叫我们于他走以后，维持张家口的秩序，等俄国、外蒙军或八路军进来办理交代。我们有人有车，您有带不走的东西，我们可以帮助您往车站上运，我们已替德主席把车装好。"我说："我的东西全走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你们留在张家口，不怕俄国人和共产党吗?"郭景春说："我给外蒙送过电台，我不怕他们。"他们又和我扯了一些闲话。走后，我即给大桥参谋打电话，问询白天坝上的战况，看张家口今晚有无危险。大桥说："外蒙军很孬，已被皇军用大炮顶住。因为西边的侨民还没有完全到达，明天仍要继续抵抗，张家口的城防非常巩固。您安心睡觉吧，多会退却我来电话告您。"大桥叫我安心睡觉，我怎能睡着，又是一夜失眠，嘴干得生满了口疮。

19日天一亮，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低空盘旋，上边的驾驶员高喊"中国人闪开"，扔下一个空汽油桶，射出一排示威性的机关枪子弹，把一辆火车头打穿了几个窟窿，即向东南方向飞去。空汽油桶里可能装着给德王和我的信，我没有派人去拣，因为我没有了部队，一切都是白搭。上午九点多钟，大桥来了电话，说是日军今天撤离，叫我准备马上上车，他们给"蒙疆政府"拨了三个车皮。这时我的几个卫士都保护着家眷去了北平，身边只剩下一个名叫安慕卿的随从，其余全是大师傅和本地的听差。我给

了他们每人一百两烟土，叫他们把我带不走的东西按股均分，赶快搬到各自的家中，尽速离开这里。此时我的副官崔玉昆也不知去向，新来的一个兽医处长杨海轩，算是尚有一官一兵，三个人全换上便衣，每人腰中插了好几支手枪，带了五六百发子弹，乘着日本驻蒙军军部给派来的汽车，由上堡到了火车站。因为下着连阴大雨，街上布满污水泥浆，天空是一付灰暗头脸，越发使人感到糟心异常。商店都关了门，很少老百姓来往，坝上炮声隆隆，日本兵在十字路口站岗。车站月台外边，排着五列车皮，中间夹着十几个冒烟的车头，长达四五华里，两边都有日本兵持枪警戒。这些车皮大都是敞车，里边尽坐着日本的妇孺，全被雨淋成落汤鸡，用帆布或雨衣盖着脑袋。因为流离失所，不知走向哪里，加之饥渴冷冻，故患病死亡的很多，尸体顾不上火化，全舁到道旁的田野扔弃，日本人忍痛不哭泣。我看真是惨不忍睹。

给蒙疆政府拨的是三辆三等客车，两边的椅子当中和过道上，全堆满德王的金条银元和烟土，最少也有两千多箱。我坐的那辆车，叠了好几层箱子，人们头顶着车篷，爬在箱子上从过道上来往。德王比我后到，他的那些秘书们早已逃走，只带着给他开汽车的喇嘛和葛兰芳等三四个听差。他见我坐在车上，许是怕我知道他带了这么多的财产，到达北平以后要耍赖跟他伙分，所以把头脸放下，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要车皮，坐在我的车上？"我说："我一共是三个光杆，要车皮干啥？这又压不坏火车，况且不是叫你背我。"他听我呛他，没和我坐在一起，到一个拐角上，随从给他铺了一块毯子躺下，我亦把眼睛闭起，各怀起心事。这天上午，张家口到北平的铁路还没有被八路军破坏，跑了一个多礼拜的于品卿，返回张家口，又要出来"维持"地方的秩序。他听说德王和我全部上车，跑进车箱寻找我们，板起"人民代表"的面孔，质问我们因何逃跑？他说："你们守土有责，扔下老百姓谁管？"德王被于品卿问住，低头答不出话来。我对于说："给他妈的巴子谁去守土？你能管了老百姓吗？"于知道我很野蛮，便再没说啥退了出去。接着伪张家口市市长崔景岚上来送我，因为他给我当过好多年军需处处长，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行李带来？这是最后的一趟车了。"他说："我有责任，得办理交代。"我说："你的官瘾还没有过足，政府的高级人员早都跑了，我和德王一走，一切就都轮上你了。"他嘴上虽说："我回去安顿安顿。"可是表情仍对张家口恋恋不舍，他和我握手告别后，被于品卿勾引上又当他的张家口市长去了。

崔景岚走后不多一会，我的二太太的父亲也跑了上来。在15日夜晚我送他回家时，他们老俩口还说不怕，可是他是一个居住在北平的满族人，非常胆小，见我一走就沉不住气了，将老伴扔下让我领上他回去。这时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因德王和我坐在那里，都不敢高声说话，各找空隙坐下。车上倒很安静，容许我继续闭目沉思。我想到了北平以后，先化整为零疏散人口和财产。北平的社会非常复杂，短时间内还显露不出。至于我今后怎么办呢？那只有再拉"杆子"（意为当土匪）。到绥远也好，回热河也好，如果国共合作起来惩治汉奸，和我同命运的人很多，我挑起来一干，不愁没有人跟我。如果国共从此分家，只要有人有枪谁也要我，我更有活动空隙，可以左右逢源。我投敌十二年多，总算把命捞住了，虽然在察北扔下30里长的一道山沟、400匹马、5000只羊，在厚和和张家口扔下50万伪币买下的两处房屋；可是北平还有十几处院子，除了运去整整十万两烟土，尚有换成美金两万元的财产，以及其他贵重衣料皮衣和不少值钱的东

西。所以我感到我当蒙奸，非常够本而且有赚头。想到此处，心安了许多，于是万念顿消，便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

睡到黄昏时候，被安慕卿把我叫醒。睁开眼睛一看，仍躺在德王的洋钱箱子上边。安说："日本军队从坝上退下来了，街上也有了枪声。"我从车窗上向北一望，汽车像两条火龙一样，在后边的隆隆炮声中，朝张家口的市区蜿蜒滚下，最后都排到铁道两旁。到了这时，火车响起汽笛，才在汽车掩护下，缓缓向前开动。由于入夜之后，八路军把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路轨挑了，并且炸了好几座桥梁，所以火车随走随修，比牛车还慢，四五十里地，竟走了一夜，于20日早晨，才爬到宣化车站。停车以后，先跑上国民党的一个军统特务找我，他说："我是王野人，热河抗战时咱们在开鲁见过面，前天我从重庆坐飞机首先到达北平，听陶克陶说，你不在厚和，和德王都在张家口。蒋委员长把你和蒙古军已经改编为十路军，让你担任总司令，我特来给你送委。我昨夜就到达宣化，因铁路破坏，不能前去张家口，只好在这里等你。现在你来了，咱们研究研究怎么办?"我见了王野人和接到"十路军"总司令的委状，精神为之一振，对蒋介石撒出的钓我的鱼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弄到一个救身圈。同车的人也都大睁起眼睛，不像在张家口车站停车时那样对我冷淡，均对我笑脸相迎，精神亦兴奋起来。接着伪宣化省长刘继广，伪大同省长李树声，伪蒙古军第三师师长宋鹏九，都上车来接我和德王，并欢迎王野人。"蒙古军"的那个堀顾问，不知他怎知道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也从别的车上跑了过来，向我道喜祝贺。刘说："日本军队在南口和八路军打上了，战斗结束，把路修好车才能开。先下车到城里去吃饭，好好休息休息。"堀顾问亦说："咱们先去吃饭，开车时有人通知咱们。"德王听见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对他没有安排，心里很不高兴，不想下去吃饭，被刘继广上去拉了一把，才随着我们进了宣化城。

刘继广和李树声都是我在崔兴武东北军十七旅的旧同事，后来跟上我任了省长。开饭以前，我把他们和宋鹏九叫到一边，背着德王和王野人，四个人开了一个小会，决定让宋鹏九留下一团人，交给刘继广，收罗察东的警察，带上两团人，护送李树声回大同，收罗晋北各县的警察，弄起人都绕道往厚和集中。我到北平坐飞机回去。他们对我的指示，虽然嘴上没有表示不同意，但是脸上却有忧虑的表情。我说："俄国人和外蒙军队要占张家口，八路军也在接收城镇，乡下全是真空，路上很好走，你们要鼓起当初拉杆子的勇气。"我那时应该带上第三师向西开，但我不放心北平的财产，并且不愿西去冒险和受罪，故而执意去了北平。由于我本身腐化堕落，结果把"蒙古军"弄了个四分五裂，否则，宋鹏九的人不会在南口附近瓦解，宝贵廷的人也不会被傅作义吃掉。所以后来我光杆一人出关给蒋介石去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时，认为在宣化非常失着。

我们计议完毕，便去吃饭，正吃的时候，又是15日给我送信的那个人，走进刘继广的门房，给德王和我送来八路军陈毅司令员的一封信，叫我们派代表跟上此人前去谈判。德王和刘等听见八路军的人来到跟前，都为之一怔。我这时已被蒋介石勾上，不愿跟共产党走，便叫刘继广的勤务兵把那人打发回去，说是"信看完了，等研究考虑以后再答复"。这是共产党再次争取指引我们，可是我们执迷不悟，认为蒋介石能保我们

的大烟土和洋钱箱子，还想跟上蒋介石借尸还魂，继续骑在蒙汉人民头上，兴风作浪和作威作福。一切反动派都是失败以后，仍要捣乱，捣乱失败以后再捣乱，直至最后死亡。我和德王两个人也不例外。

因为众人发现了八路军的人，都心惊胆战，慌忙把饭吃完，连茶都没喝，就匆匆离开刘继广的省公署，在宋鹏九的军队保护下回到车站。上车等了两个多钟头，于中午十二点钟开车，由于也是边走边修边打，到了北平的西直门，已是21日下午一两点钟。北平亦被八路军围上，由日本兵担任防守，下车以后秩序大乱，我与王野人、杨海轩和老丈人等也被挤的互相找不见了。安慕卿好容易跑出去给我找到一辆人力车，由于雨仍下着，街上水深过膝，道路非常难走，洋车夫在前边拉，安慕卿在后边推，穿街涉水走了好几里，才把我拉到什锦花园。德王到平后，没住他在北平买下的房子里，带着东西都到了雍和宫下榻。我和德王就这样结束了蒙奸生涯。

（1966年）

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过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赴蒙前的联络

我于1949年4月间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虽然想通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和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进行所谓“西蒙自治运动”，但面临当时局势的变化和我的“大蒙古主义”思想的支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有试试看的心理。因此，当我赴广州请愿路过银川时，就派我的侄子阿拉坦瓦齐尔前往中蒙交界地方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联络。他到了乌盟中公旗一带就停留下来，一直到了当年八月间才接上头。在阿拉坦瓦齐尔未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取得联络之前，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因为内蒙古西部盟旗尚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之下，很想把我争取过去，就派人（忘其名，可能是巴图吉尔嘎朗）带着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当时在乌兰巴托乔巴山大学学习，我的家属在日本投降后苏蒙军到达锡盟时，即到了乌兰巴托）的亲笔信和我的家属照片以及缎子、银碗、哈达等赠品，由阿旗北部防卡段塔拉登岱队长伴同前来定远营见我。适我当时在广州未回，段塔拉登岱就把信件和赠品等物交阿旗协理罗巴图孟柯代为保管。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的人员还要求说：“既然德王不在，可否见见你们阿旗的达王爷（达理札雅）谈谈。”段队长说：“我可不敢作主，我看不用见了。”这个人就未见到想要见的人而回去了。我从广州回到定远营后，乌盟盟长林庆僧格便对我告知此事，罗巴图孟柯也将信件和赠品等物交给我，我看都嘎尔苏隆来信所云，无非报告他和家属的情况和探询我的工作情况。我因当时的阿旗尚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之下，不仅在定远营有马鸿逵的军队控制着我们，更有中统、军统等国民党的特务人员注视着我们，深恐事机不密，惹出麻烦，就给都嘎尔苏隆复信，嘱他不要给我来信，以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怀疑，影响我搞的所谓“西蒙自治”活动。把信秘密交段塔拉登岱设法送去。

当我在定远营召开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后不久，锡盟阿巴嘎右旗札萨克雄诺敦都布从乌盟的巴彦陕丹来到定远营，带来阿拉坦瓦齐尔对我的书面报告，内容主要是：“在内外蒙交界哈拉而格地方，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负责人员道洛道克和巴雅尔（即敖齐尔巴图）二人，他们说：当日本投降时，我国曾派飞机到张家口上空散发传单，因为当时你是伪蒙政权的首领，在传单上不能不提到你。并且这个传单是早就印好的，准备和日本作战时用的，嗣日本虽然投降，前方仍在相持状态，所以前线部队仍把这个过时的传单散发，竟至引起你的顾虑去了北京。我们衡量一个人的好坏，要看这个人对于人民怎样。据我们了解你在日本强力压迫之下，还能委曲求全，折冲樽俎，与日本方面有所争执。你在北京期间也未做过什么坏事，感觉你还不错。我们不愿逼得一

个人无路可走，就叫阿拉坦瓦齐尔转去你家属的信，谅都收到了吧？最近听说你又与美帝国主义拉拢，我们认为不对，请你想一想，美国对黑人怎样？就可预知对蒙古如何了。我们很希你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如果你肯来的话，乔巴山元帅和全体人民都将亲切诚恳地欢迎你。”来信对我在伪蒙疆时期的罪恶有所隐讳和原谅，这是因为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想争取我，当然不出责斥之言，故做隐讳之语，使我容易接受而往。实际上我在伪蒙疆时期的罪恶是严重的。

当宁夏已经解放，我正准备从定远营出走时，段塔拉登岱特来见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巴图吉尔嘎朗前来见我有要事接洽。我答说在定远营见面不方便，我准备明日出走，希你告知来人在草地等我，他即告辞而去。当我由定远营向北出走约有一天的路程，便在路旁一处洼地中，发现有一顶帐房，即叫图们德勒格尔乘马前去询问，段塔拉登岱和巴图吉尔嘎朗便从帐房中走出来，图们德勒格尔当即引来见我，巴图吉尔嘎朗把蒙古人民共和国赠给我的缎子、哈达等礼品和我儿子都嘎尔苏隆的来信交给我，并说都嘎尔苏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上所派的人员罗布僧等，正在沙尔札以北的察干套老盖地方等候已有一月之久，希我即行前往会晤。我拆视都嘎尔苏隆的来信上说：“爸爸前次来信，我已接到了，本应依照爸爸的嘱咐，不再给你去信，以致影响你的工作。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上很希望你来，你如果肯来时，愿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地方居住都可以。依我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了，希望您赶快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吧。”我看过这信后，巴图吉尔嘎朗和段塔拉登岱又劝我就此前往。但我这时西进心切，急欲到土后木庙转往巴彦陕丹去，用预先布置下的电台，通知集结在中蒙边境上锡察零散部队前来，供我的驱使。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存有戒心，就对巴图吉尔嘎朗说：“我这时不能去沙尔札要到巴彦陕丹去，请你速去沙尔札通知他们，务于8月18日到巴彦陕丹等我。”他即告辞而去。

我向土后木庙行进途中，遇见雄诺敦都布派来的贡布，他即拿出雄的介绍信给我看，记得信上写着：“听说你正在从事蒙古自治工作，我没有什么贡献的，现在我把贡布派去帮助你。贡布这个人很忠实，希你放心使用。”我看过信后，就迫不及待地问贡布说：“你知道布置在土后木庙和巴彦陕丹的几部电台的事吗？”他对我说：“我听说这几部电台，都被阿拉坦瓦齐尔送交蒙古人民共和国了。”听到这个消息，使我大失所望，心中至为不快。待我到达土后木庙后，就派人把阿拉坦瓦齐尔找来，他见了我就劝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我仍狂妄自大地说：“现在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与归！我仍打算西进，从事蒙古工作，设如我现在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家必然说我为了家庭团聚，因私废公，我是有口难辩。”并声色俱厉地严辞责备他，不应该未经我的许可，就把几部电台当成礼物送给蒙古人民共和国，使我不能与各方面通讯联络，更责备他5月间即奉我之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联络，竟在乌盟中公旗一带逗留迟到8月才接上了头，真是误时失事。阿拉坦瓦齐尔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以为你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就把几部电台都送礼了。如果知道你仍要西进，自然把电台给你留下一部就是了。”谈至此，我看再埋怨他也是无济于事，就偕同阿拉坦瓦齐尔、达格瓦敖斯尔、图们德勒格尔等赴乌盟巴彦陕丹，乌盟盟长林庆僧格及其子雄诺和雄诺敦都布等已先到此等候。我到达后，就叫随从人员在巴彦陕丹庙北边搭起一顶帐

房，等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的人员罗布僧和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等前来会晤。到了旧历八月十九日守候帐房的人员前来报告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派巴图吉尔嘎朗等二人到此，我即请他前来见面。巴见我后，即将都嘎尔苏隆的来信交给我，信上说："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从察干套老盖到哈拉而格又已很久，我看人家等候的都不耐烦了，即使爸爸不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来也应来此一次，和等候的人员见面谈谈，我们父子也可以相见。"当日晚上我就和雄诺敦都布、阿拉坦瓦齐尔、图们德勒格尔等商谈是否前往哈拉而格的问题。因为我约定是在乌盟境内巴彦陕丹见面，而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约我在其国境内哈拉而格会晤，雄、图二人都不言语，阿拉坦瓦齐尔因受过我的责备，更不表示意见，让我自己考虑。我本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有戒心的，但业已到此，设如中途折回，恐人耻笑，就强作镇定，自逞英雄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无论吉凶祸福，在所不计，我是决心前去。假如我此去回不来，失去了自由，就请你们自己想你们的办法吧。"

这样决定和安排之后，翌晨我就偕同阿拉坦瓦齐尔、图们德勒格尔等前往。因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卡上有信请林庆僧格前去商量事情，他自己不愿意去，特派其子雄诺代表他与我同往。路上我们住宿二宵，巴图吉尔嘎朗即派其随从人员先去送信，我等将近哈拉而格时，见有一辆汽车朝向我们迎上来，我等也就一齐下马迎上去。从汽车上下来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上校，自我介绍说是名叫却吉拉，与我握手寒暄后，即指挥巴图吉尔嘎朗把我的随从人员和帐房送到哈拉而格去，旋又把我让上汽车开至防卡外边停下，又把我让进一顶蒙古包里，略进茶点后，却吉拉对我说："我们这次没有按照边界上的严格规定派人到巴彦陕丹把你请来，很觉失礼，更对不起的是内务部（实际是内防处）次长巴雅尔、中央派来的罗布僧和你的儿子都嘎尔苏隆等在此等候好久，不见你到来，以为你不来了，所以他们都走了，现在可能走到桑达赖飞机场。我正要收拾东西回去，你也回去吧。你如有什么话，我可以用电报代你转达。"说着就拿出香槟酒和肉类招待我。我听到他叫我回去之言，就解除了怕扣留的戒心，和他攀谈起来。边谈边吃了一会，他就去打电报联络，我在蒙古包内等候，这时阿拉坦瓦齐尔也溜到卡子上，不知捣什么鬼。次日晨阿拉坦瓦齐尔老出去了望，将近中午时，巴雅尔才来与我相见说："乔巴山元帅派来的罗布僧和你的儿子都嘎尔苏隆，在此等候好久，以为你不来都回去了。我因边境上有事未回，听说你来了，我特又赶回来和你谈谈。"我问他说："乔巴山元帅对我有什么话吗?"他答说："他们知道，我不知道。你如有什么话，我可以转达。"接着我就和他交谈起来。记得他在谈话中这样说过："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们蒙古国与中国快要发生外交关系。你如有什么事情，最好转与北京方面请求，我们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说着又以美好的烟类和肉类招待我，并边吃边说："你的大儿子在乔巴山大学学习，二儿子在师范毕业后教书，三、四儿子正在中学就读，你的儿媳和姑娘都当小学教员，总之你的家中人都很好。"我对他说："请你转告我的孩子们，务要用心学习，好为蒙古民族而努力。"谈话之间，天已黄昏，他说："今天已经晚了，你们明天再回吧。"晚间他又拿出很多的酒肉来，我们是尽兴地吃喝和畅谈，不知不觉之间，我竟喝的酩酊大醉，雄诺喝的更多，竟至呕吐起来。

翌日巴雅尔又拿出一封蒙文信对我说："我把你嘱咐你儿子的话都用电报转达了，

现在都嘎尔苏隆业已回来电报，请你看看。”我接过来看到信上说：“爸爸，我坚决向正确方向走，只要心脏还跳动时，绝不变更。爸爸既然前来，关于民族的事情，最好与巴雅尔他们商量解决的办法。”我回味信中的语汇，也像都嘎尔苏隆自己说的话，例如民族二字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用“爱玛克”，而信中仍用“敖克撒嘎登”，因此我更信而不疑。巴雅尔又问我说：“你究竟有什么打算？”我转而问他说：“你看我往哪边去好？”他说：“印度不错。”紧接着他加以解释说：“不过印度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他说出这话以后，我当时认为对我是无话不谈的诚恳表示。现在回想起来，担任内务处次长重要职务的巴雅尔，绝不会无意识地脱口说出“印度不错”的话，可能从阿拉坦瓦齐尔等报告中，知道我有通过青海西藏而去印度的打算，因而故出此言试探我。谈至此，我就起身告辞，巴雅尔指着桌上放着两个半盒纸烟说：“把这个也带上吧。”我顺手把两个半盒纸烟装人一个盒内，并意味深长地说：“把这两个合起来好。”暗示内外蒙合并之意。他笑而未答。接着他就陪同我乘坐汽车到了我初到时的住所，我改换乘马向他告辞说：“我这次来感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能够自主的，把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的想法打消了。”他很郑重地说：“你现在的想法很对，你别认为对巴雅尔说说就完了，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向我们的国父——乔巴山元帅报告。”谈至此，我就率同图们德勒格尔等再向其告辞而归。我归途中听说达格瓦敖斯尔、赵宝纲等已和阿拉坦瓦齐尔约定，一同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我返土后木庙后，不仅从此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解除了戒心，大家也为我安全回来而庆幸。苏和巴图尔特来见我说：“在你未回之前，有人认为你一去多日未回，必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扣留，当了俘虏。曾和我商量，另推李守信为首领，率领部队西进。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力排众议，坚持等你回来再说，不能毫无根据地断定你已被俘。”

我由土后木庙流窜到巴伦沙尔札后，海福泉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我即与阿拉坦瓦齐尔写了一封信，叫他带去。信中记得有“我决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做蒙古民族工作”的辞句。这时我已知道阿拉坦瓦齐尔完全是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因此特给阿拉坦瓦齐尔写信，表示为“蒙古民族工作”的决心，意在使他转交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看过，不致于看不起我。但据我现在推断，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人员看过我这封信后，发现会有狂妄自大、反动到底的情绪，可能联想到我不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洽，仍在内蒙边界上作反人民的扰乱行为，从而招致纵容之嫌，以影响中蒙国交，所以又派人来争取我。记得在海福泉走后不久，便接到段塔拉登岱从阿旗保安队给我来信，信上除了请我约束部队、避免冲突、勿致酿成流血事件外，并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又派巴图吉尔嘎朗前来，被阿旗保安队遇见留在队部，等候与我相见。我即派贡布前往接洽，贡布回来报称，巴图吉尔嘎朗已返回。我又派贡布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上察干套老盖地方联络，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巴雅尔和巴图吉尔（嘎朗早已到此）见贡布到来，至表欢迎。巴雅尔说：“你来了很好，我把阿拉坦瓦齐尔带来，正打算叫他前去联络，可巧他因有事到别的地方去了。你既然前来，他就不必去了。”当派巴图吉尔嘎朗随同贡布来到巴伦沙尔札庙，请我前往察干套老盖与巴雅尔相见，说是有要事相商。我答称需到拐子湖后再行前往。

我由巴伦沙尔嘎到拐子湖后，即召集李守信、宝贵廷、吉致祥、托克托胡、苏和巴

图尔、都固仍仓等开会，提出要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惟恐有人阻拦，强调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工作，便中还治疗我腿肿的疾病。在座人员均表同意，并由吉致祥提出派韩撒嘎拉团长率领队伍护送我到国境上。

我于12月29日偕同策仁道尔吉、图孟德勒格尔等，由巴图吉尔嘎朗、贡布二人带路，前往蒙古国境界上的察干套老盖地方与巴雅尔会晤。当我出发时所有我这一伙所谓军政首脑人员都出来给我送行，我抱着激动的心情和送我的人一一握手，颇有生离死别之感。临行时李守信对我说："你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好好地联络吧，我也打算去，就是栽跟头也栽在蒙古地方，决不栽在八路手里。"我和送行人员道别后，就向目的地进发，当快到察干套老盖时，巴雅尔率同几个随从人员，乘坐一辆大卡车（上边架设着电台）迎上来，把我让上汽车，叫巴图吉尔嘎朗带同我的随行人员步行前往，图们德勒格尔很不愿意离开我，想一同乘车随身保护我，我以目示意，他才没有跟我一同走。到达后，巴雅尔把我让进一个蒙古包里，略进茶点后他对我说："乔巴山元帅有要紧的话和你说，所以又特派我来请你到乌兰巴托去。"我说："现在我接到阿旗保安队转来阿旗政府电报通知，说是驻在肃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派五个代表将要到来和我见面，我想和他们谈谈再去。"他说："那有什么要紧呢？"说着他把我和巴图吉尔嘎朗丢在屋里出去了。刹那间他又进来和我说："你想好了没有？还有什么顾虑吗？"我说："我倒是没有什么顾虑的，但是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与中国发生了外交关系，我如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影响中蒙国交？这倒值得考虑。"他说："那没关系，只要你肯来，一切由我们负责。"这时我想起在哈拉而格和他见面时，记得他曾和我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明文规定："凡是从事民族运动的人，如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避难，均可容留。"同时我又这样猜想："乔巴山究竟对我有什么重要话说呢？或者要和我谈含有民族意义的问题，如果是谈含有民族意义的问题，最重要的莫过于内外蒙合并问题。设如这一问题得到乔巴山的默许和支持，我就可以安全回来，率领部队西进，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周游世界各国，宣传内外蒙合并问题，待至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乔巴山在外蒙、我在内蒙进行这一活动，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将来还是殊途同归，实现内外蒙合并建立统一的'大蒙古国'。"

我更做过这样猜想："作为一个蒙古人的乔巴山，绝不会甘心受俄国人的控制，必有独立自主的想法。有我这样一个人配合他搞内外蒙合并问题，他一定是愿意的，即或不便公开地支持我，也会心领神会地默认。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宣布独立，但人口少，国家穷，对于内蒙不无领土的野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蒙两国都是一类性质的国家，乔巴山恐怕影响中蒙国交，不便进行吸收内蒙人工作，但对纯牧业地带，或者还有拿过去一个是一个的想法，却又不便自己出头这样做，正好利用我这样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由于有这些幻想支配，我破除了一切顾虑对他说："那这就去吧。"他又说："你这次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要绝对保守秘密，你穿这身衣服可不行，必须换装。"说着就给我拿出一件很好的皮袄换上，跟随我的策仁道尔吉、图们德勒格尔、贡布等也都另换服装。临行时，我对巴图吉尔嘎朗说："护送我的队伍，现在还驻在边境上，给养非常缺乏，为了避免发生抢掠扰民事件，请这边接洽给些粮食怎样？"他即转向巴雅尔请示，巴雅尔说："这个事情到乌兰巴托再说

吧。”我就抱着搞“内外蒙合并”的幻想和解决部队给养的暂时目的，随同巴雅尔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二、招待中监视

我到了乌兰巴托后，即被安排在内务部中居住，继而策仁道尔吉、图孟德勒格尔、贡布、札那等亦随后赶到。巴雅尔问我说：“你留谁和你住在一起呢?”我说：“仅留札那给我做饭的人和我一同居住就行了，他们三人到别处居住吧。”不意我等一行分开居住之后，就失去联络的机会。内务部却派来一个名叫旺丹的上校，经常和我联系，派一个名叫罗布僧道尔吉的住在招待我的住所陪伴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个上尉。派一个名叫贡达力的给我做饭，后来知道他是个中尉，还有一个常来往的尉官名叫巴彦托克托胡。招待我的住所颇为舒适，照顾亦甚周到，吃的是小灶饭，吸的是高级烟，我认为是对我的优待，实际上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内务部人员监视之中。招待我的住所备有《列宁全集》，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很多的书籍，我在没事的时候，就随手翻阅，这是我看马列主义书籍的开端，才知社会上还有阶级的说法。

有一次巴雅尔同内务部长都音科尔札布、一个中将苏联顾问（忘其名）和一个少校翻译来访问我，都部长问我究竟作如何打算？我说：“我在此办完公事之后，仍想回去干‘民族事业’。如果中国共产党乘胜利的余威，无理地压迫我，我只要有力量的话，仍要进行反抗。”都部长很惊讶地说：“你还要反抗呀!”苏联顾问接着对我说：“你错了，现在你不应再反抗中国共产党，应当凭你在内蒙过去的声望和现在的职业，发布告示，进行宣传，劝说内蒙古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我这时仍然存在着反动到底的思想，对于苏联顾问的指引明路和诚恳劝告还不愿意接受，就答复他说：“我觉得我这样想和这样做是对的。”苏联顾问听到我答复之后，表示不耐烦的样子，离开座位，在屋中来回踱步。当苏联顾问和我谈话的时候，虽然有一个少校翻译在旁，都部长却自己充当翻译，我认为他有失部长的身份，有点看不起他。就转向巴雅尔说要见乔巴山，巴雅尔推说：“你跟都部长说吧。”但我未向都部长说，而都部长却对我说：“你可以和你的家属见面了，你看看你的儿女们，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教育以后，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你这次来我国首都，是极为秘密的事情，你如见到你的家属的时候，务要切实嘱咐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说，以免消息外漏。”这时我想起我派陶布新赴宁夏带去的信件底稿还在我的身边，因为信件中有“采取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内外蒙合并问题”的建议，我以为一定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就取出来给都部长看。不意他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走了。翌日晚上，都部长和苏联顾问又来向我说：“你不要回拐子湖了。你虽然不能回拐子湖，但从此可以公开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呆下去，能够和家属团聚也是喜事。你如有什么事情，请与巴雅尔商量吧。”

他们走后，我和札那说：“蒙古方面不叫我回拐子湖了。”札那说：“诺颜（对我的尊称）到这里来错了，到宁夏去就对了。从前都札萨克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时也说不久就回来，但是一去未归。”这时我也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既然不叫我回拐子湖了，我再怎么办呢？曾想要求蒙古人民共和国用汽车把我送回北京或兰州，旋又转念到：中国共

产党虽然胜利了，是否能够永久保持这个胜利！并认为把我送回中国以后，难免要栽跟头，与其送回中国栽跟头，莫如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里，就这样呆下去，还未必栽跟头。这时我从广播上听说毛主席到了莫斯科，旋又听说周总理把赛福鼎也领到莫斯科，可能商谈有关新疆问题。因此，我又想要求蒙古人民共和国把我送到莫斯科去见毛主席，不是很有面子吗？还不失我这个所谓“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的身份，旋又转念想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肯送不肯送是一个问题，即使有可能性，这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投降了吗？这时叫我向中国共产党低头，实在有点不甘心。同时还希望蒙古人民共和国把我留下，所以未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谈想去莫斯科的事。继而又想到：我不回拐子湖，留在拐子湖的人员说我扔下他们不管，只顾享受家庭团聚的快乐，而对我不满意呢！旋又转念到：并不是我不愿回拐子湖，而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叫我走，对留在拐子湖的人员也能说得下去。总之，自从都部长不叫我回拐子湖后，心境上老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虽然不再抱有很大的奢望，但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希望能够让我安全地在这里呆下去。

想来想去，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负责人员商量才能解决问题。因此，趁着巴雅尔前来我的住所的时候，便和他商量说：“留在拐子湖的人员和部队怎么安排呢？要不我把他们交给兰州的彭德怀吧！该怎么进行呢？我给彭德怀写信表示这个意思行吗？要不叫部队也到这里来怎样？”巴雅尔说：“武装部队来这里可不行，如来二三十个少数人员还可以，但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仍须向领导上请示。”我又说：“要不我去信叫留在拐子湖的主要人员到察干套老盖和我见面，当面交代这一问题，你看怎样？”接着他便去请示他们的领导。旋即回来转告我说：“领导上说这个办法很好，同意你去信叫留在拐子湖的人员到察干套老盖和你见面，我去把阿拉坦瓦齐尔找来，帮助你写信。”过了一天，他才把阿拉坦瓦齐尔找到我的住所，帮助我写信，记得信中大意是：“我到这里已见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现在在此看病。请转告肃州解放军派来的代表，我暂时不能回拐子湖了。希见信后，务请在蒙古军总司令部负责的李守信或宝贵廷、在第二师负责的都固仍苍或托克托胡，在第一师负责的苏和巴图尔或敖木巴图尔六人中的三人前来边界上察干套老盖和我会面商谈要事。”把信写好交给巴雅尔之后，我又想亲去拐子湖安排工作，深恐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不叫我去，便提出很多的理由，说明我有亲自回去的必要。记得这个请求书是我亲笔写的，大意如次：“留在拐子湖的人员和部队，给养缺乏，无法维持，假如仍然外出抢掠，对于我的责任更大。因此，我想亲自回去一趟，做妥善的安排，把他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辞去我的主席职务。我把这些事办完之后，保证仍然回到这里来。”刚好写完这个请求书草稿，适巴雅尔前来，我就念给他听，他说：“这样办也有道理。”我说：“待誊写清楚再交给你。”他说：“已经写清楚了，不必再行誊清，我拿出去打字交上去好了。”同时他给我出了五个问题，叫我做详细的答复。一是日本对蒙古和苏联的政策怎样？二是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目的和其内部组织情况如何？三是散在各地的蒙古人口有多少？还有两问题我记不很清楚了。大概是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蒙政策怎样两个问题。他仍把阿拉坦瓦齐尔叫来帮助我写。我对于第一个问题，认为既是过去的事，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所知道的，没有详细写的必要，就没有怎样写。对于第二个问题，恰巧阿拉坦瓦齐尔

还带着“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就按其中的各项规定，把组织情况写下来，对于第三个问题，便就我所知把散处各地的蒙古族人口写出来，甚至连道听途说缅甸尚有七八十万蒙古人也写上去了。至于四、五两个问题，我也敷衍了事地写了一些，就交由旺丹递转。旺丹看过之后，很不满意地说：“这样重要的几个问题，你写的很肤浅，连小孩子都欺骗不了，对我们怎能交代下去。”

关于要求亲去拐子湖的请求书交上去以后，竟如石沉大海，没有答复。巴雅尔却把我召唤在拐子湖的人员李守信等前来察干套老盖的信稿交下来说：“信上不能写你见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因为提到领导是指乔巴山元帅而言，仅写已经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达拉嘎’就行了。”我只好按照他的意思改写。我亲笔写好信后，提出想叫图孟德勒格尔送去。他说：“图孟德勒格尔骑骆驼走的慢，不如派贡布去骑骆驼走的快。”我也只好表示同意，于是就由巴雅尔把贡布叫来，把信交给他嘱咐从速把信送到拐子湖。贡布走后札那对我说：“贡布出来曾拆看你的信，我从旁观察贡布看到不叫你回拐子湖的一段时，吓的两只手都发抖了。”后来听说李守信等六人接到我的亲笔信，都到乌兰巴托来了，可是当时没有叫我知道，我还闷在葫芦里，仍等待与留在拐子湖的人员会晤。

贡布走后，我的腿肿病加重，旺丹请来苏联医生给我诊治。接着巴雅尔又陪我看电影，并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和你的家属见面了。”我恐怕他看不起我，还打肿腮帮充胖子，故作矜持说：“我是先公而后私，待把公事办完之后，再和家属见面也不为晚，忙什么呢?”我在这个期间，虽然没有和全部家属见面，巴雅尔曾把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带来见我，并说：“他几次要求要见你，所以我把他带来，促使你们父子见面之事，我算办到了。”我们父子见面时，本来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因有巴雅尔在座，不便谈有关政治的重要问题，仅仅谈些家常。都嘎尔苏隆报告我说：“日本投降后，我由西苏尼特旗到了乌兰巴托，闲居约有一个月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上叫我去信把全家都叫来，俟他们到后，优越照顾，给予安排住所和生活。我先入干部学校，继又转入乔巴山大学，再有一年半就毕业了。我的二弟嘎拉僧吉儒穆德入学校受过训练以后，已经当了教员。我的爱人色尔吉默德克和我妹妹巴图那逊在师范学校毕业后，也都当了教员。我的三弟敖齐尔巴图和我四弟都入了十年制中学。我的母亲和我的孩子也都很好。并且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部长级的待遇照顾我们家庭，逢年过节，还给一二千元花用。”继而又问我说：“听说你带领的军队，不守纪律，疯抢乱夺，把爸爸也连累坏了吧。”接着他又翻阅桌上放的《列宁全集》，指出一段对我说：“这一段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断，爸爸应当好好地看看。”谈至此适巴雅尔入厕，趁此机会我问他说：“你在哈拉尔格什么时候回来的?”他答说：“爸爸还未到达的时候，我就先回来了。”这时巴雅尔也由厕所回来，就偕同都嘎尔苏隆走了。又有一次旺丹又把都嘎尔苏隆带来见我，旺丹在座陪谈，都嘎尔苏隆竟冒然地向我说：“爸爸你不愿和别人谈的话，也不要对我说。”我觉得他这话说得走嘴了。接着他又告我说：“我们家中人由西苏尼特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把我们自己的二三百匹马和牛羊等牲畜都赶来，现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人照管放牧，并规定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准备这几天去看看。”继而又谈些家常琐事就走了。第三次都嘎尔苏隆前来见我，是在旧历大年初一给我拜年，仍是旺丹带来的，他给

我请安问好后就要走，临走时对我说："爸爸，你有工夫叫我来吧。"看样子好像有许多话要向我说，因有旺丹在座，没有再谈什么就走了。

巴雅尔还陪着我乘坐汽车走马观花式地参观乌兰巴托的市景，他边走边指点说，这是乔巴山居住的地方，那是乔巴山大学，你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就在其中学习。继而旺丹又陪着我参观了乌兰巴托工业区的外景。总之，在我初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两个来月的时间，虽然被暗中监视，表面上还是优越招待，吃的是丰美饭菜，吸的是高级香烟，内务部人员还常陪同我看电影，逛大街，请医治疗腿病，使我感觉到如果这样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下去，虽然达不到政治上的欲望，却也悠闲自在。不意对我的招待渐渐地冷淡了，记得有一次札那告诉我说："我听巴彦托克托胡对贡达力说，今后不要再买好纸烟了，用一般的纸烟招待就可以了！"我也感到对我的招待，不如初到时周到。有一次巴雅尔陪我看电影甫经告辞后，我叫罗布僧道尔吉又把他请来，对他说："从前你曾叫我和家属见面，只以公事在身未果，现在派往拐子湖的贡布没有回来，趁此闲暇时间，我和家属见见面吧。"他若有所思的忖度一下说："等一下再说吧。"过了几天，巴雅尔又来向我说："我最近可能到东部去。"我问他说："你走后我有事情和谁联络呢?"他说："可以和旺丹联络，如果是重要的事情可不行，应与我们领导上直接联络。"从此以后巴雅尔就不再到我的住所来。我还以为真的到东部去了，但据阿拉坦瓦齐尔告诉我说："巴雅尔并未到东部去，可能到拐子湖去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地起伏萦回，引起我的怀疑和猜想：为什么从前他们主动叫我和家属见面，现在为什么我要求和家属见面又不允许？为什么过去以宾客之礼相待，现在却降低了招待？为什么巴雅尔托辞东去，避不和我见面？从各种迹象上使我觉得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的态度变了，究竟要变到什么程度，我只有胡猜乱想罢了。

三、逮捕审讯

1950 年 2 月 27 日（旧历正月十一），旺丹前来请我去看曾当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的苏和巴图尔事迹的电影。我说："下次再看吧。"他敦促我说："这个电影很重要，我们先去看，随后罗布僧道尔吉和札那也来看。"我不便再推辞，就同他乘汽车前往。到了一所宫厅式的门前，汽车骤然停止，却不是电影院，我下汽车时不小心被台阶绊了一跤，他还关心地说："怪我没有扶着你。"接着他即去打电话，我在旁边听到他问对方说："那两个人来了没有?"我还以为是问罗布僧道尔吉和札那二人，实际上他是调动事先安排好的人员来逮捕我。倾刻之间却吉尔上校便出现在我的眼前，旺丹便板起面孔严肃地向我宣布说："德穆楚克栋鲁普！我们党政方面，认为你是敌人，应即实行逮捕。"随即叫我举起手来，解开衣带搜查，并严辞追问我有手枪没有？我说没有带在身上，经他们详细检查以后，把我的腰带拿去。我当时本来有很多话要说，质问他们为什么对我的态度前后不一致？凭什么证据逮捕我？但在此情况下，知道说什么也是无用，不是和他们进行争辩的时候，便束手就擒，任其摆布，既未争辩，也未反抗。把我带上楼以后，便将巴雅尔在察干套老盖给我的那件皮袄脱下，换上罪犯穿用的老羊皮袄，登记随身物品，押入监狱监管。第二天一个少校监狱长带我去见旺丹和却吉尔，又登记从

我住所搜查出来的物品、手枪等，并叫我签字，其中有银洋一元，我说这不是我的，是札那的，没有签字。第三天为了正式补行逮捕手续，又把我从监狱提出来。旺丹口述我的罪行是：过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现又勾结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企图颠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犯了蒙古法律上的重要条款，应行逮捕究办等语。却吉尔按照旺丹口述写好之后，迫令我签了字，这时颇有“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之感。

从1950年3月1日开始，便由巴雅尔秘密审讯我说：“现在我奉领导上的指示，负责审讯你。本来我们等待你好些日子，但你毫无悔罪的表示。现在中国方面确认你是罪大恶极的罪犯，要引渡回去处理，可是我们还没有给，答复说正在教育你。”以后便入正式审讯阶段，由3月开始进行到当年9月18日。审讯的期间很长，审讯的问题很多，在审讯的每个重要问题上，我有供词，他们有记录。因为年深日久，我记不清全部的问题了，现在就我记忆所及，把几个主要问题，谈述如次：

（1）关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问题

审问时巴雅尔问我说：“你把你给日本当特务的事情说一说吧。”我答说：“你如把我当成日本的特务看待，就是掉了脑袋也不承认。如果叫我把我和日本勾结的经过谈谈，那倒可以。”他说：“那你就谈谈吧。”于是我将盛岛角芳前来锡盟各地游历；屉目恒雄前来我旗，初则充当喇嘛，继则设立善邻协会，掩护特务工作的进行；日本特务机关派中岛万藏等到百灵庙蒙政会进行特务工作的情形；我派补英达赖前往日本关东军购买枪枝的原委；我亲往伪满洲国新京面见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板恒征四郎的经过；以及组织蒙古军总司令部和在嘉卜寺成立伪蒙古军政府的情形，全部谈述出来。我谈完之后，他特把中岛万藏在百灵庙进行特务工作的供词记录念给我听，并叫我在供词上签了字。

（2）关于内外蒙合并问题

在审问时我反问巴雅尔说：“我总觉得在哈拉而格会面时，你们对我是另有意思的。”他听到我的反问之后，立刻怫然作色，愤怒异常，态度激动地说：“你的居心太坏了，你说这话，不但想把我陷在里头，并想把我们的领导也拉进去。你搞内外蒙合并，是企图破坏中蒙国交。”我又反问他说：“你不是说过想利用我做民族工作吗？”他说：“本来我们曾这样想过，但是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利用你了。你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后，如果早把你的罪过坦白交代，知道你还懂蒙汉满文，打算把你安排在科学院工作，该有多么好呢？但是你总是执迷不悟，一味拖延，拒不交代。就是在甫经逮捕你时，仅仅我们几个少数人知道，如果你有悔罪表现，坦白交代问题，尚不为晚。可是这些机会你都错过了，现在说什么也不行了，只有以罪犯来对待你。”这一段审讯他未叫我签字。

（3）关于勾结美帝国主义问题

当审讯时，他们把许多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名片拿出来问我认识与否？并把郭木布札普联络达格瓦敖斯尔等几个人给拉铁摩尔写的信，请他把“蒙古问题”提到联合

国去的原信稿拿出来，问我知道否？问是不是我的主使？我看这封信确是郭木布扎普亲笔写的，就对他说："这事是郭木布札普等几个人干的，不是我的主使，但是与我当时的想法相同。"接着我又把"蒙古青年同盟"成立的经过及主要人员供述出来，并声明我虽与"蒙古青年同盟"主要人员札奇斯钦、达格瓦敖斯尔、席振铎等有过联络，也与美国外交人员若斯冰、舒勒台斯及特务人员拉铁摩尔、李嘉胜、马滋、萨拉刻、白智仁等有过接触，但未参加"蒙古青年同盟"这个组织。

接着我又供出白智仁向我建议派兵攻打董其武问题。我谈出这个问题之后，他就抓住不放，严词追问好多日子。他追问白智仁叫你派兵打董其武是什么意图？你们谈了一些什么话？都要交代出来。我供说："当时白智仁虽向我作此建议，但当时我认为我既无攻打董其武的武力，更不愿树立政敌，所以漠然置之。"我这样答复之后，巴雅尔很不以为然，仍是严词逼问，决不放松，非叫我说出这事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系不可。而且威胁我说："你如不说，你的皮肉要受苦呀。"并叫我自己写供词。在其严词逼问之下，我曾翻来覆去地想过：他非叫我承认这事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系不可意图何在呢？莫非以此罪名把我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引渡回国了，这种想法又触起我宁在蒙古栽跟头，不回中国栽跟头的念头，于是就迎合他的意思写了一个供词。记得供词的内容大意是："白智仁向我建议派兵攻打董其武，是想以此为理由打埋伏，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乘机活动。"我写完之后交给巴雅尔，他看过之后，就把从前关于此事的审讯记录用笔抹掉，并对我说："你应在这个供词之后，添上这是白智仁给我的使命一句。"我就依照他的话添上了。他马上拿着这个供词上楼请示他们的领导，约有两个小时的工夫才回来对我说："照这个供词来说，你可是美国的特务咧。"我恐怕他在这一问题上又行逼问，就满口应称说："是呀！是呀！"这个案子就这样确定下来。后来我觉得这个供词不妥，又向巴雅尔申说这是逼问之下的假供词，他说："在审问的时候，我是很和平的，没有强迫你承认，是你自己招供的呀。"我又申辩说："当时我说是说了，究竟是真是假，希望你再做调查。"他驳斥我说："当时你说了，现在又想翻供，又叫我调查，看起来你这个人真狡猾呀。那么，你把真实的内容写出来，由内务部人员轮流审问。"经他这样一说，我恐怕又招致轮流逼问，引起很大的麻烦，想到这里，认为再行争辩也是无用，就不再吭声了，只好凭他们摆布吧。

在审讯时期中，记得内务部长都音科尔札布和苏联顾问有一次亲自参加审问我说："你老是不很好的交代，现在准备叫知道你的罪行事实的人出头对质，看你还有什么话说。"说着便叫人把李守信、陶克陶、达格瓦敖斯尔三人唤进来，都部长问我说："你们认识吗?"我说："认识。"他又说："你们有宿怨吗?"我说："没有。"接着便由李守信首先对质说："德穆楚克栋鲁普，在蒙疆时，想把内外蒙合并起来，连同在苏联境内的布里雅特蒙古也包括在内，建立大蒙古国，他想做大皇帝。"后来据李守信对我说：这个证词，是在未审讯前，把他训练了一周，教他这样说的，在审讯前夕还问他说，你记住了没有，他说这可不一定，到时再说吧。继由陶克陶对质说："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伪蒙疆政权，是企图以蒙疆为军事基地，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如果叫我详细说，我都能说出来。"但是审问人员没有叫他再往下说，他就停止发言。最后由达格瓦敖斯尔对质说"德穆楚克栋鲁普是'蒙古青年同盟'的重要

盟员。”我当时因为精神恍惚，没有注意听达格瓦敖斯尔的证词，当审讯人员问我时，我都马马虎虎地承认了。最后巴雅尔说：“现由他们三人作证，如果你再不坦白交代，还要叫十五人出来对质。”可是后来审讯时，我都主动地交代了，再未提出其他人员来作证。

在审讯时，旺丹曾打开一个柜橱说：“这满满的一柜橱文件都是关于你的材料，就连你姨太太像片都收罗在内，你不坦白交代怎能行！”又有陪审的一个少校说：“你在张家口搞伪蒙疆政权时期，我曾扮作牧工的身份，为蒙古生计会赶羊到了张家口探询情况，你的什么事情，我是都知道的，你不谈怎能行。”旺丹又说：“日本投降时，我曾亲到张家口想挽救你，把你争取过来，不意你竟跑到北京去了，你真把我们害苦了。”翌日叫我看这次审讯和对质记录，我发觉达格瓦敖斯尔证词上说我是“蒙古青年同盟”的主要盟员，特向巴雅尔提出争辩说：“我连蒙古青年同盟的章程都未看过，说明我不但不是主要盟员，就连普通盟员也够不上。当时我因为倾听别人的话，没有注意听达格瓦敖斯尔这句话。”巴雅尔说：“这样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注意听呢？今后关于重要的事情，你得注意呀。”过了几天，我又提出这一问题，请求更正。他不耐烦地说：“这事已经过去了，而且你已签了字，再不用提了。”这件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

四、引渡回国

约在8月间，一个少校把我的供词全部清抄一份叫我重新签字，我看头一个案件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中岛万藏和我的勾结关系，我因为一时忘记了，就对这个少校说：“我没有这个供词呀。”他说：“你说没有，我去把原供词拿来你看。”说着就去取来，我一看确有我的签字，就无话可说了。接着我又翻看另一个案件，记得上边写着我是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上被逮捕回来的。对于在哈拉而格和察干套老盖两次的会晤，却只字未提，我觉得与事实不符。但认为提出争辩也是无用，只好随他去吧，就在全部供词上又签了字。根据以上迹象，我就猜想为什么又叫我签字呢？恐怕是要把我引渡回国了。思想上虽然有些波动，但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内蒙的罪犯，也只好等待引渡回国听候处理。

到了1950年9月18日，把我从监狱里提出来，倒剪两臂，戴上黑布蒙眼，什么也看不见，仅听见除了叫我在监狱的号码外，还叫了三个号码，因此，知道和我一同引渡回国的还有三个人。把我拥上汽车后开到飞机场，改乘飞机飞抵北京，这是被引渡回国的经过。后来听我家中人说，我被逮捕后，把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及在伪蒙疆政权当过文武官员的朝克巴达尔夫等多人均行逮捕，并严行搜查我家属的住所，没收我家中人所带来的财物和牲畜。嗣又给我的次子嘎拉僧扣上“唱过反动歌词”的罪名予以逮捕下狱。把我的年仅16岁的三子和年仅14岁的四子及我的家属其他人等，押到最冷的地方阿拉杭盖，等于发配充军。我被引渡回国后，我的家属虽已相继回国，但我的长子没有回来，十几年没有通讯！存亡莫卜。我的次子返国后，经主管人员询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反动活动，即行释放，并给于安排工作。我的四子在被押赴阿拉杭盖时，因年龄幼小，不知事故，惊惧异常，又加时届冬令，天气奇寒，忍受不了冷冻之苦，因而惊冻

成疾，得了严重的心脏病，返国后虽经精心诊治，终成不治之症，病死于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我的三子亦因惊冻得了与四子相同的心脏病，时常犯发。

回忆1950年9月18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国后，被改造的初期，虽对在阿旗纵兵殃民的严重罪行有所认识了，但对于在伪蒙疆时期的滔天罪行还不认识。记得把我从北京移到张家口时，由于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政策不理解，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我这个罪犯不便在北京处决，移到张家口是交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死，才快人心，以平民愤。由于我猜测到张家口必死，因而产生力求速死的思想，我对教育改造我的领导说："如果要杀我，请求不要在张家口这个汉人地方杀，把我送到锡盟等处蒙古地方杀。如果在锡盟等地杀我不方便时，希望把我押解到阿拉善旗去，按照纵兵殃民的罪行明正典刑，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领导上答复说："你等着吧，不要胡思乱想。"我细回味"你等着吧"这句话，认为杀我还不到时候，叫我等待死期的到来。因此更加猜疑不定，从我的住室窗户看见外边有木工做活，我疑惑为我做执行死刑的绞架。到1956年，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我的耐心教育改造和听到看到大量的建设成就，以及在三反、五反中对贪污犯处理等等事实的印证，才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领导的正确，从心里佩服了。并且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要杀我，而是教育改造我。遂又向领导上说："我在阿旗的罪过，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假如我能从监狱出去的话，愿向阿旗被害的人民请罪，任凭阿旗人民处理。"领导上说："那是部队闹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1959年领导上召集我们开会说："据说你们在阿旗造成七百里无人烟的地带，不知抢了多少东西?"我又说："在阿旗率部队抢骆驼、抢粮食、刁东西，罪恶很大。但我的罪恶还不只此，我在伪蒙疆时期，打着'复兴蒙古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招牌，欺骗蒙古族青年追随我，跟我走上了反动的道路，我用杀人不见血的方法贻害了很多有知识、有志气、有作为的蒙古族青年，例如现在改造中的陈绍武、宝贵廷等等，就是跟着我走上了反动的道路而犯罪的人。"经过教育改造，这时我认识到，我在锡盟执政时期，是统治剥削人民的封建王公；在伪蒙疆时期，是投靠日寇血腥统治人民的头号帮凶；在阿拉善旗流窜时期，是纵兵殃民的土匪头子。我的罪恶是严重的，也是罄竹难书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我的长期耐心教育改造，使我深深地认识到，长期以来我自认是"复兴蒙古民族"、"建立蒙古独立国家""舍我其谁与归"的"救世主"，实际上是政治野心家。对于蒙古民族，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罪人、大蒙奸；对于中华民族，我是一个死有余辜的民族败类，大卖国贼。像我这样的人，最终还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特赦恩典，给我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实在是格外恩施。在感激涕零之余，我谨抱着知罪、认罪、悔罪的心情，在重新作人开始的今天，特将我一生各个时期的重大政治罪恶活动，搜索枯肠，陆续如实写出，借以向蒙古族人民，向全国人民，向给我以新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请罪。并供有分裂民族、分裂祖国意念者作鉴戒。

（1974年）

伪蒙疆的军事幼年学校

博彦们都*

七七事变后，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依靠日本人的势力，成为伪蒙疆自治政府的主席。

德王从他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认识到：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就需要有忠实于自己的军队和军事干部。于是一上台，便着手组织整顿伪军，同时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他自己还兼任了军官学校的校长。但是日本人对他并不放心，怕他的权力过大，又管政又管军，不易掌握。同时考虑到占领区的蒙古族青年还没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怕引起麻烦。因此，主张先办幼年学校，等有了毕业生再办军官学校，这样可以使蒙古族青少年彻底奴化。同时不让德王兼任学校的校长职务，这样就可以分散德王的权力。

这样，德王亲手办的隶属于伪蒙疆政府的军官学校，草草毕业了两期学生就宣告结束了。并于 1939 年下半年着手筹建隶属于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幼年学校”。

我原在伪蒙古军第八师二十二团任上校团长，奉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于 1939 年 10 月 25 日就任了军事幼年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是个完全军事性质的少年学校，校址设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德王府（即现在的温都尔庙）。

1940 年 6 月 17 日，学校正式开学。除由我任校长外，哈丹巴特尔为生徒队长（学生队长），喜吉旺森莫、宝音德力格尔、巴图、恩和莽来、巴图敖齐尔、敖秀山等六人为教官，日本人井上为主任教官，还有两个日本教官。嘎日迪和清巴图二人为副官，乌日根仓、乌力吉那仁、孝生嘎为嘱托（此三人是用优厚工资为条件从伪满洲国聘请来的），达来巴雅尔（汉名赵景贤）和阿民巴图为上士，管理总务。

第一期生徒（学员）招了 60 名，候补生徒若干名。生徒的主要来源是伪蒙古军中内蒙东部籍官兵的子弟。他们入学后被编为一个生徒队，称第一区队。由一名蒙族教官任区队长。

学校开学后，进行正式教程。主科除了普通中学的语文、算术、地理、历史外，还进行军事训练。生徒的服装与伪蒙古军的制服一样，只是没有枪支。

每天早晨升旗（伪蒙疆旗）时，生徒在生徒队长和区队长的带领下，整队站在旗下宣誓：“为复兴蒙古民族在元朝时的事业而努力，为日蒙亲善，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而奋斗。”

当时，“幼年学校”从建校时起，就围绕着重视蒙语蒙文教学和彻底实施奴化教育的矛盾，展开了斗争。

---

* 作者曾任伪蒙古军团长、军事幼年学校校长等职。

当时在教学方法上，每天除了两小时自习，日文一节，汉文一节，其余四节和操练均用蒙语。这和日本人当初的意图完全不符，使日方大为不满。认为这种教学法，重视蒙语、蒙文，冷淡日语、日文，对蒙族进行奴化教育大为不利。

在学生和蒙族教职工中也因这一问题引起了风波。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出于民族感情，迫切要求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而蒙族教官清巴图是个亲日分子，则极力主张重视日文，少学蒙语蒙文。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我曾和主任教官井上会谈过几次。我说，作为蒙古人不会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却要致力于外国语言文字，这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是不易被人所接受的。这不仅不会受到蒙古民族的欢迎和拥护，相反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这对日本也不利，请考虑。井上当时在嘴上表示同意，但在背后仍鼓励和支持清巴图。

生徒队长哈丹巴特尔就是因为支持我的观点，而于1941年春调转伪蒙古军总部。

哈丹巴特尔调走以后，我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渐渐地使清巴图的态度和观点有所改变，不再主张重日排蒙了。

1942年春季，总部派来了一位区队长索达那木道尔扎。他一到校便主张把教学方法全部改为日本式的，鼓动学生起来反对对民族语言文字的重用和学习，并大肆宣扬日本如何强大，“日本精神”多么使人敬佩，日本文化是文明，蒙古族青年应该好好地学习日本民族的一切，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日语，否则蒙古民族的复兴永远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等等。我曾对他多次进行说服工作，但毫无效果。索达那木道尔扎的这种宣传，马上引起了学生的激烈反对。

1943年6月，第一期学生毕业了，并升入了厚和市（呼和浩特市）伪蒙古军军官学校，“幼年学校”的第四期学生也入学了（入学后被编为第四区队）。

开学后不久，在9月里的一天，索达那木道尔扎到第二期学生的班里讲课。跨入教室刚要走上讲台时，随着值日生喊“立正”口令的同时，一个学生突然从背后拦腰抱住了他，几个学生上前抓住了他的双手，迅速夺下了他的手枪和军刀，并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学生们一边呼喊着“打死索达那木道尔扎，铲除绊脚石！”一边拥上来，把索达那木道尔扎痛打了一顿。

当我听到消息赶来时，索达那木道尔扎已被打得浑身是血，人事不省地躺倒在地上了，看来伤势很严重。当下我便命令校医赶快进行抢救，并回转身把第二期学生训斥了一番，命令他们全体马上回宿舍反省。

事件发生后，利用学校的电台给伪蒙古军总司令发出电文，把事件的详细经过做了报告，并请求派人前来解决处理。与此同时指派了一部汽车把索达那木道尔扎马上送往厚和进行治疗。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主任教官井上跑来向我报告说，第三期学生也准备闹事，他们截住汽车，要索达那木道尔扎把命留下，同时还扬言要把日本教官一同打死。

听到这一消息，我准备马上把全校学生都集合到礼堂听我作报告，趁学生们听报告的机会，把索达那木道尔扎用汽车偷偷送走。井上认为不如请求上级派飞机接走更为妥当。我说这也好，当下便给伪蒙疆政府发出了电报。下午飞机便来了，当下我便指令几

个人赶快把索达那木道尔扎抬上飞机送走，一面把全校学生集合到礼堂里给他们作报告，指出了事件的严重性及其不良后果。

这时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派来调查这次事件的参谋副长郭勒敏色（现改名为高乐明山）和一名日本顾问，已经来到了学校。当下我便向他们报告了事件的经过和事件发生前的学校情况，接着他们便对第二期的每个学生进行了讯问。学生们都说自己是事件的主谋，校长、队长、各蒙族教官和嘱托都没有鼓动，没有帮助策划。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郭勒敏色和日本顾问从学生嘴里什么也没问出来，就回总部去了。

在总部派人来调查之前，井上曾要求我从第二期学生当中处决15名，以示镇压。我说这绝对不行。首先，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有待于调查其中详细情况。其次，如果总部要追查责任，那么首先应该由我负，因为我没有尽到对他们的教育之责，不能因此而处决学生。同时，我们在事先都没有对学生的情绪予以应有的重视。听到后一句话，井上考虑到这事与他也有牵连，也就不再坚持了。

在事件发生后，学校里的日本人也很惶恐，因为学生们在拦住送索达那木道尔扎的汽车时，曾扬言连日本人一块儿收拾。

1943年9月，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根据事件的后果和调查报告，命令校长博彦们都、主任教官井上“重检束”（禁闭）两个星期，生徒队长喜吉旺森莫“重检束”一个星期，第二期的全体生徒反省一个星期。同时命令校长博彦们都调往伪蒙古军第九师任参谋长，主任教官井上和生徒队长喜吉旺森莫也调往他部重做安排。博彦们都调走后，由胡尔查任校长，柳夏（日本人）代理主任教官。

索达那木道尔扎于几个月后也被调离了学校，到伪蒙古军察哈尔防卫师任新职，后来听说他于1946年在张北县被镇压。

第二期学生打索达那木道尔扎的事件，纯系出于民族情感。这批学生毕业后升入军官学校。1945年日寇投降后，由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引导，于1945年10月25日准备起义，不慎有人告密，为傅作义所镇压。

“幼年学校”的第二期学生于1941年5月入学，名额40多人，入学后被编为第二区队。第三期学生于1942年5月入学，名额50多人，入学后被编为第三区队。第四期学生于1943年5月入学，名额60多人，入学后被编为第四区队。每一区队由一名蒙族教官任区队长。学生来源主要是锡盟、察盟、乌盟、巴盟、伊盟等地的各阶层蒙族青年和少年，也有少部分学生来自内蒙古其他地区。

从“幼年学校”出来的学生，日寇投降后多数参加了革命，少数的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或者回了家。

这些学生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后来听说是这样的：“幼年学校”的在校师生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后，教官们主张往南走。走了一天后，听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出兵对日作战，学生们便主张往北走到蒙古，遭到教官的反对，于是学生们打死了日本教官和几名蒙族教官，全部往北跑到了蒙古。

（潮克记录整理，1966年）

伪蒙疆时期傅增湘修成《绥远通志》经过概述

白 光 远*

北伐以后，热、察、绥三个特别区被改为行省，一切典章制度都与内地无殊。当李培基主持绥远省政的时候，地方士绅纷纷上书，倡议绥远应该修编省志。经过反复研讨，筹划经费，决定创立绥远省通志馆，并以郭象伋为馆长，阎肃为副馆长，荣祥为主任编纂，李泰棻为总纂，白映星、陈志仁、杨令德、张竹卿、王森然、金松伯等担任编撰。赵国鼎、刘继尧、王印、王庆、韩桂等担任采访组采访员。自1931年7月开始筹备，择定大盛魁北院为馆址，购买图书及各种办公用具，至8月20日正式宣告成立，编撰与采访各员均按馆章分别进行工作。1934年6月底，该馆已满三年，原拨经费已经用完，而工作量仅完成一半。当由郭象伋馆长报请省政府核示。省府会议一致认为馆务不可中断，决议续拨经费，并令进行改组。李泰棻遂辞去总纂一职，王森然、金松伯亦随李他去。馆中另聘韩葆忠、王文墀、张树培等数人担任编撰。到1936年初，《志稿》已完成十分之八强，馆中认为可以请省府预觅方志专家进行审核，以期撰稿与审稿同时并进。当由省府傅作义主席以重金聘请傅增湘为总纂。到1937年5月，除省县疆域图尚未制成外，全稿已陆续交傅增湘接收。双方商定编修经费和完成期限。由傅增湘在北平聘专人负责，分类编修。计当时聘定吴延燮、夏仁虎、瞿宣颖、谢国桢等人专修一志或兼纂二门，并请史念祖等三人合撰地理，张寿林、夏纬明、何鸿亮等人分别担任工、商、农、矿产业等类的编修工作。编修地点，就规定在北平西四北石老娘胡同傅增湘的"藏园"。每月共同交换意见三次，其余时间都在自己家中编修整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以后，大举向中国侵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这样退，退，退，一泻就是几千里。1937年10月间，绥远沦陷了。修志的事情，因绥远、北平之间关山阻隔，消息不通，遂告中止。这时阎肃、荣祥等绥远省通志馆大部人员均已出走，只郭象伋还留在归绥。他把通志馆的摊子整顿一下，暂时将一些原始资料搬回家中保存，日伪接收部门并不过问这件事。郭象伋还请求继续开馆，但毫无结果。1938年夏，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最高顾问宇山兵士发现这一问题，立即召见他的高级幕僚黑泽隆世，命其赶快联系，即日复馆，一切人事安排、经费开支，都由日本为侵蒙所设的"文化特别开支费"内全部支付。

黑泽隆世领命以后，即乘车亲赴郭象伋家会晤，并商谈复馆事宜，同时请郭象伋立即向北平傅增湘处写信，探询《绥远通志》保存情况。不久，得到傅的复信，说明《通志》原稿基本上还完全（仅地理志有一部分不完全）。黑泽隆世得信后，如获至宝，

---

* 作者时任伪蒙疆政府总务部总务总处工作。

当即返回复命。日本顾问、参事官等人，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商讨重修《绥远通志》，以便借助于各种资料，便于侵华。但当时伪蒙疆政府首脑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等，大都不同意重修和印行《绥远通志》。他们认为这些旧东西，没有什么保存的必要，况且过去史书之类的资料，其内容总是以汉族为中心，对蒙古民族的种种记述，都是带有侮辱性的，所以不愿意接收，不主张编修。宇山、黑泽见此情势，恐怕形成僵局，遂上告于伪蒙疆“太上皇”金井章二（当时伪蒙疆委员会的最高顾问。伪蒙疆委员会统辖三个伪政府即“察南政府”、“晋北政府”和“内蒙政府”）。后经金井章二和日寇内蒙驻屯军最高司令官几度磋商，终于达成协议，准予立即复修。德王等反对不得，只好同意。他们还在所谓“裁决书”上画押签字。

一切准备就绪，急电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敖云章与傅增湘联络，请其继续编修整理，至于所欠的两万元修志费，完全由“政府”负责，保证不差分文。同时还转告傅增湘，在最短时间内，黑泽隆世要带上书信和礼物，和郭馆长一同前往，代表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赴平慰问。

黑泽隆世为修成《绥远通志》的事，一年之中往返六次。《通志》于1939年3月完成，最后全书修成6志，列36门，统子目70，全志有116册，共约200万字。地图、金石等另附于外。

当书成之日，还举行了隆重的接收仪式。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全体编修人员和伪蒙疆驻京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以外，日寇文化侵略机构“东方文化研究所”的负责人桥川时雄也参加了接收仪式。会后还在北平八面槽最大的东兴饭庄举行了招待会。会上给傅增湘献上酬劳金10000元（不在修志费内）。最后摄影留念，题名“绥志修成图”。

会后将原稿和修成本，分两部装运。原稿交国际运输公司保险邮寄，定本（即修成本）交由日寇军部专门运送，交伪蒙疆政府顾问部。

关于《绥远通志》定本印刷事宜，也是经过慎重研究，先计划由北平京华厂印刷，嫌纸张不好，时间太长（为期二年），改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印刷厂印行，也觉得不十分保险。经过跟日寇军部和日本帝国政府反复研究，最后决定运送日本东京，委托日本全国最大最好的印刷厂，负责承印。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但自1943年到日本印刷以后，便没有下落了。

为什么日寇这样热衷于《绥远通志》，而不惜以十万巨金（印刷费不包括在内）重修呢？这是它在文化侵略上的一种掠夺手段。多年来日寇在对华文化侵略上，成立“善邻协会”、“东亚同文书院”，“满铁”经济调查研究机构等，专门培养大量的“中国通”（需熟悉中国风俗习惯，学会中国语言文字，并研究我国各地的商业行话和方言土语），向中国进行深入细致的侵略活动。他们除了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历史和文物、矿山资源外，还特别注意民间野史和各地习俗，以及当代上层人物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以致当时军阀官僚有几个姨太太、他最喜欢哪一个，也都在日寇调查研究之列。日寇特别重视《绥远通志》的编修，自然也是为其总的侵略目的服务。尤其它把“满蒙”看成它的所谓“生命线”，所以更是要致力于这方面种种资料的搜集与研究。

当《绥远通志》的初稿（原始本）运回归绥之后，日寇各文化机构都派遣一部分

精通中文的日本人前来参阅，并详细地做笔记。特别对于乌、伊两盟十三旗的“恳务”资料，研究的人员更多。平时这部初稿，存放在“顾问室”保险柜内，由黑泽隆世亲自掌管，不能随意借阅。

我当时在伪蒙疆政府总务部总务处工作，亲身参加过接收《绥远通志》这件事，前后搞了两年，知道的比较全面。现在将傅增湘作的《绥远通志序》录出，以作本文的结束。傅增湘这篇序言对《绥远通志》成稿经过叙述甚详，但在序文中对日酋进以阿谀奉承之词，或是其不得已而为之吧？这篇序文曾刊载于日伪时期北平出版的《中国之论》上。

傅增湘：《绥远通志序》

绥远地域，自元明以后，久为蒙古诸部所居。迄于清初崇德，土默特部率众内附，始有驻防设官之制。然其命名也，实自乾隆四年筑城始。嗣是土地日辟，生聚寖繁，遂增设厅治，属诸晋省。故凡关于往古之沿革与今制之推行，咸附见《山西通志》，而专编纪述乃寂无闻焉。清末以防边大计，倡言设省，顾议而未行。民国初元，划为特区，制同专阃，设官行政，与腹裹无殊。逮至己巳，南北混一，始建行省，布制颁章，规模灿备，隐然为北方雄镇矣。盖自秦汉云代设郡以来，历数千年，战伐频仍，废兴靡定，几经毅辟硕臣之谋画，名王贵种之材武，与夫人民吏士之奋厉艰勤，使荒寒广漠之乡，日进于熙洽丰昌之治，斯岂偶然而致也哉。夫以年代之久远，盛衰治乱之循环，其留贻于史迹者至钜且重。设不为之画一整齐，勒诸简册，则往者何所传信，而来者何以取鉴耶？近者兹邦贤士大夫，留情文献，时有撰述，如《归绥识略》、《绥乘》之属，播传于时。然或削稿而待刊，或成书而不备。且以制度频更，当事未遑著述。辛未之岁，李君培基来主省事。以省制既定，修志未容濡缓。爰创立通志馆延郭君象伋主领馆事，阎君肃副之，以荣君祥主任纂修，更聘李君泰棻专任总纂。义例一遵部章。顾以造端宏大，始事艰难，边庭僻远，古事既苦于徵寻，近代军兴，文卷复多经散佚。乃议定古近二者，涂径区分，古代者搜求往籍，参与旧闻，得其大凡，宜可依据。近代者则各地分行，取诸实验，近而县局，远届盟旗，东西首涂，二道齐发，耳目所经，籍记于册，再阅寒暑，巡察始周。从事诸人，沐风露、犯冰雪，毡帐驼城，车尘马足，旅途况瘁，迥非恒人所堪，而采获周祥，亦视传闻为审。惟采访之功甫讫，而编辑之役尚遥，义例之外，所成者只金石二卷，余皆浩博无涯，端待晷理，适以帑金匮乏，而资用浩穰，数逾巨万，长此迁延，杀青无日。甲戌之岁，乃议改弦，仍依郭荣二君，分竞修辑。汰浮节冗，程课精严，期以二年，先完初稿。日有程，月有报，终以二君督励之劳，至二十五年丙子之冬，而志稿一百二十册已编录蒇事矣。先是丙子之春，志稿方成泰半，时主省政者，为傅君作义，锐意兴作，以省志事属创举，不仅为地方文治之渊源，将垂为百代流传之典则，参稽论定，不厌其祥。乃遣使人，奉书币远来旧京，以总纂之任，属诸增湘。窃维齿暮学荒，何足参斯大著。而来札雅意肫勤，兼之申以宗谊，遂靦然承命。旋即命驾出关，躬陈主旨，并小住绥垣，与志馆诸贤，考询端绪，因以备谙频岁搜访之难，与诸人首功之力。故不越数岁，而草创成编，其事为足佩慰者也。未几载稿言旋，

方期息影山中，专事研削。会有家事撄心，俄然中沮。讫于岁莫，全稿赍来，发箧陈书，勤加考览。因拟具重修之法，上书当道，备陈原稿繁富，评瞻可征，而体例宜商，稽寻未备，有门类宜并者，有分目宜增者，有冗复宜芟者，有疏漏宜补者，有伪失宜正者。千条万绪，亟待考求，眇尔孱庸，岂能包举。谓宜博访耆硕通儒，与夫专门英俊，庶得分力课功，完此大业。旋奉来章，悉予嘉纳。逐乃广约胜流，翕集相助，如吴君廷燮、夏君仁虎、瞿君宣颖、谢君国桢，或专修一志，或兼纂二门。又约史君念祖三人，合撰地理，张君寿林、夏君纬明、何君鸿亮分任工商农矿产业诸类。而撰订条纲，商榷事例，则张君国淦翊助为多。结社于藏园，月恒再三集。发舒旨论，辨证异同，得失藉以相资，条理期于共贯。兼迓馆长郭君入京，下榻园中，时有疑难取便商讨。方谓齐心协力，庶几克日观成。无何卢沟变起，人情震惊。郭君既急装北归，余人或仓皇返里，或僻迹乔居，即留滞都门者，亦意趣萧寥，兹事遂尔中辍。独夏君于风鹤告警之中，闭门属草，文献全志，如期撰成。夫惟大雅，卓尔不群，斯足尚矣。惟时京绥千里，兵戈阻绝，邮书往复，悉付浮沈。追维付托之殷，重以散止为惧，乃尽收旧稿，与馆藏故书，同扃秘库。倘兵烽之不息，将敝帚以自珍。顾望徘徊，晌经匝岁。昨秋塞外来人，衔旨慰问，披诚相语，始末具详。已而蒙疆顾问黑泽隆世君，翩然戾止，审知蒙旗诸部，合缔联盟。宇山先生，以东方贤杰，总挈政机，因启新邦，眷怀旧治，既徇舆情，先恢志馆，并驰使命，下访鄙人。重蒙黑泽君，礼意殷拳，雅相契重。喜遗编之尚在，惜新撰之未成。仍属不才，始终其事。并谓边疆创造，百废方新，大而因革损益之故，细而采风问俗之方，咸待是编，综其条贯。前事固可作师资，群情尤殷於企望，幸资众手，早奏全功。因与约定程期，珍重而别。由是再集旧人，仍理前绪。惟世纷初定，人事不常，史君三人，撰辑将竟，携稿远适，不可追寻。何君言旋蜀中，迢遥莫致。乃延张君星烺总阅地志，而以其妹月烺及王君光炜，把君△△，就其原稿，分别增删。其余旧者或须重检，新者多待改编。又别引吴君丰培与及门孙生楷第、韩生敏修，刘生文兴助我裁定。更於校阅之暇，手辑文征，为卷十二，较之旧编，差为赅备。计始自秋初，讫於腊尽，穷搜极览，昕夕靡宁，目力昏眵，手腕欲脱，栗陆半载，缮录始成。然芜类未芟、差讹不免，虽殚尽智能，编排粗了，而才识疏谫，愧负已多。总核全书，分为六志，列三十六门，统子目七十，析卷为次，凡百有十六，而以舆地诸图，金石列品，别为影写，附着于编。呜呼，可谓难矣！溯自志馆倡立，于今七年，鄙人膺命，已三经载。省志既前无所因，县志亦成者无几，幸赖郭君主持馆事，奋凿空之力，肆焠掌之勤，钜细毕赅，辑存文字都上万万。洎鄙人承命以后，删繁节要，方具条流，而忽丁国难，志气销沮，私计当戎马之秋，宁复重雕虫之技，徒工削扎，好等覆瓿。仍图政府群公，创业方殷，未忘前典，宇山先生，中枢赞治，雅意修文。而黑泽君尤能具怀古之深情，引斯文为己任，知志乘为地方之史，古今掌故系焉，失今不图，后将何述？故内参谋议，俯纳舆情，使一线之绪，垂绝而复延，百卷之书，历劫而不泯。从此布在方策，流传万篇，开朔方纪事之元，为行省图经之殿。匪特兹邦士庶同感盛谊而怀欣，即载笔诸人，亦幸钜编之终就。用敢申述源流，重告来者。至於编定旨趣，别载例言，兹不复赘举焉。岁在己卯三月江安傅增湘序。

（1987 年）

回忆伪蒙古军汽车队历史片断

胡·巴吉尔*

一、伪蒙古军建立的概况

1936年，锡盟苏尼特右旗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是国民党政府“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1936年2月在苏尼特右旗德王府，依仗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成立了所谓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5月在化德县（蒙古名嘉卜寺）宣告正式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军政府”成立之后，便由德王亲自招兵买马，扩充军队，把原李守信统率的部队和从东三盟招来的新兵及锡、察两盟征来的新兵，合起来编为八个骑兵师，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宪兵队，但都有缺额，实数六七千人，号称一万余人。从军部至连队都配有日本顾问、指导官、教官等多人来监督、指挥、训练。其军费、武器装备等多由日本关东军从伪满洲国（东北三省）掠夺的物资中供应，极力扶持傀儡政权，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侵华的日本关东军板垣师团攻陷南口，向张家口进犯，东条机械化部队由北路出古北口，经多伦、张北，从背后向张家口进犯，同年8月侵占了张家口。

二、日伪军西侵绥远及建立“特设队”

张家口被占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特来张家口会见板垣征四郎（日军师团长）等人，研究了进攻计划，决定集中两路精锐日军配合德王、李守信部队，以所谓“闪电式作战”顺平绥铁路线西侵。德王、李守信、田中隆吉等迅速纠集伪蒙古军各骑兵师和炮兵团配合日军行动。吴鹤龄等由多伦率领伪蒙古军政府职员到达张北县城。德王为了新形势的需要，将伪蒙古军政府主要部门和部队进行了部分调整，尽量起用他所亲信的少壮人员。任命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乌古廷为参谋长。并在张北县组成了一个由伪蒙古军直辖领导的汽车、装甲车混合的特设队。队长李铁生，日人山本、禄川为主任教官，官兵百余人，装甲车七辆，配有轻重机枪，汽车十余辆，一面训练，一面随军运输武器弹药、给养等。这就是以后的伪“蒙古军自动车队”（即汽车队的前身，以下简称“汽车队”）。同年（1937年）9月，日伪军进攻察北、绥东各旗、县、镇时，该“特设队”承担了重要的运输任务。

---

* 作者曾任伪蒙古军汽车队上士汽车助教等职。

当时驻守在察北、绥东的国民党部队将领指挥失措，节节溃退，使敌军顺利地占领了绥东集宁等地。

1937年10月中旬，日伪军占领了绥远省会归绥市，把归绥改为“厚和”（今呼和浩特），日伪在这里一面西进包头等地，一面调整机构，巩固其统治地位。

三、伪蒙古军汽车队的组成

1938年初，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参谋长乌古廷、日本最高顾问高场等人，对所属机构进行了整编。除原来的各骑兵师外，在厚和豪特（呼和浩特）组成了伪蒙古军炮兵队（原炮兵团）、汽车队（原特设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官学校、军医院、军械修理所等，都直属伪蒙古军总部领导，以上统称直辖部队。总司令部、顾问部设在归绥旧城北门西顺城街，宪兵队、军械所、军医院驻旧城，炮兵队、汽车队、通信队、军官学校都设在旧城北门外小校场。

当时的汽车队是从张北县成立的特设队，又改为汽车训练处而来的。同年初，“总部”下令由各个部队中，抽调20岁以下的青年士兵充实了上述各直辖队。我是从后编第7师20团抽调到汽车队当学生兵的。和我一起抽调来的有一百余人，都是从各师抽来当学生兵。这批新兵主要进行汽车驾驶、检修和必要的军事训练。经过短期训练后，挑选了50名学员（其中有我）派赴伪满洲国奉天（现沈阳市）日人经营的“奉天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培训。6个月后结业，返回厚和豪特小校场汽车队，作为骨干人员，都晋升为上、中、下士司机、班长等。我担任上士汽车助教，训练第二批学兵。这时的汽车队总队长是李铁生，副总队长王守义，日本主任教官天野博，中队长王汉林，副中队长孙均旺和欧宪章，日本教官吉光、山本、尾森等，还有其他蒙汉下级军官多人。他们多数是德王的军官学校毕业生，共有官兵三百余名，汽车40余辆，大都是日产三吨货车和几辆破旧不堪的装甲车，还有少数的美制福特、雪佛兰货车和一台小轿车。这些车辆每年有所更新，交替下来的旧车拨地方使用，使军车保持完好状态。

1939年初，汽车队设两个分队，即平地泉分队，队长胡海，副队长宝庆章，士兵四十余名，汽车十余辆，驻集宁县城；包头分队，队长李德，副队长陈巴图，士兵40余名、汽车十余辆，驻包头市内。总队直辖一个中队（连队），中队长王汉林（连长），副中队长欧宪章（副连长）下设三个小队（排），第一小队长额林沁多尔计，第二小队长是我，第三小队长宝国忠，还有数名管理军佐，有官兵100余名，汽车20余辆，日本教官今平等数人。这个汽车队是支以蒙古族为主（占70%以上）、由日本人严密控制的、武器弹药装备雄厚的部队。

四、伪蒙汽车队的任务与活动

（一）平地泉分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为驻在绥东地区的各伪蒙古军部队运输武器、弹药、被服给养等军需品，为伪蒙军第三师、第七师、第九师的各个团、连队驻地服务，把铁路线运来的物资，由集宁运往土牧尔台、德王府、滂江、二连（额仁达布

素)、东苏旗、贝子庙(现锡林浩特);由集宁运往卓资山、凉城、大土城、陶林、乌兰花、隆盛庄、丰镇、兴和、尚义、张北、张家口、商都、化德、宝昌、多伦等地。当时,道路状况极差,有的地方有简易公路,没有公路的地方就走大车道,给沿途村庄带来很多负担和骚扰。

(二)包头分队:担任绥西地区伪蒙古军第八师各团,及其他部队的军用品运输任务。它的运输路线是:从包头市开始至固阳、百灵庙(现达茂旗所在地)、原乌盟中公旗海流图、却金郭勒等地,包头至东公旗、大佘太,包头至西公旗、公庙子、西山咀,包头至伊盟达拉特旗树林召等地。因为这些地方都有伪军驻守,凡属人员调动、部队换防、拉运军用物资等都由汽车队往返运送。

(三)厚和(今呼和浩特)总队直辖的汽车中队,担任大青山以北地区的伪蒙古军第五师、第六师和绥南地区的伪靖安警备队等部队的运输任务。它的运输路线是:厚和至武川、百灵庙、中公旗,厚和至武川、六合营、乌兰花、王府、锡拉木伦庙(现四子王旗大庙),厚和至萨拉齐、包头,厚和至喇嘛湾、清水河,厚和至和林、凉城。每次运输按班、排轮流调派。若整排以上出发时,有连长或副连长及日本教官跟随,排长只能依他们的意图指挥车辆(旗语指挥)。因为这个中队(连队)的运输路线大都处于八路军游击区,尽管采取各种戒备措施,但也经常受到游击队的阻击,尤其是运送弹药武器,时常被八路军缴获,对于车辆、人员毫不损害,放回原队。这主要是因为伪军内部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当时伪蒙军骑兵五师师长是乌力吉敖喜尔,在其师部做商贩的赵大爷(毕力格巴图)经常坐该队汽车去各地采购商品,和车队官兵们相处得很好,在生活上常给以照顾,所以这个队的士兵们亲切地称呼他“赵大爷”。赵大爷的人员坐车及运输商品,大都通过这个队捎脚而且分文不要,也不受日伪军警的检查。因为这是军车,检查站卡军警无权过问,这就方便了赵大爷的活动。解放后,毕力格巴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长、党委书记,我们才知道他当时是在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这个汽车队在运送各个部队军用物资返回空车时,还可以拉运当地的土特产品进城,如粮食、碱盐、皮毛、肉类等,其运费作为本队的伙食补贴。当时不允许军车参与商业运输,所以只能小规模地偷运一些。

五、伪军政当局对汽车队的重视

德王、李守信等人对汽车队极为重视,经常过问这个队的工作、生活情况,频繁调动军官,安插亲信。每次阅兵都有汽车队的步兵分列式和汽车武装分列式,并授予奖状、奖金,经常给以表彰。因这支部队是由经过挑选和训练的蒙古族青年人组成,有一定技术的机械化运输队伍,是培训汽车、装甲车驾驶员的单位,所以在服装、伙食、粮饷等方面都比其他部队优越。

六、伪蒙古汽车队的结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蒙疆政府随之垮台。德王、李守

信投靠国民党政府，命令所有伪军驻守原地，听候改编。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夺取胜利果实，派兵遣将，勾结伪军，阻止八路军收复失地。伪蒙军总参谋长宝贵廷公然下令所属伪军驻守当地，抗击八路军，迎接“国军”进城。不几日国民党部队进入包头、归绥市，将伪军统一编为所谓“十路军”，派赴各旗县与国民党部队配合向新解放区进攻，准备发动新的内战。这时，伪汽车队的车辆都收归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官兵改为骑兵，归属十路军派往和林攻打八路军。出发前，汽车队的部分官兵不愿再打内战，我乘此机脱掉军装，放下武器，逃回原籍。在该队进军和林时，中途由副连长宝庆章等人率领班长白宝荣、色冷等部分士兵向八路军投诚，走向革命道路。其他一些士兵看到这种情景，也纷纷弃械逃离该部。这时的总队长杨森扎布感到士兵逃亡，众叛亲离，前途渺茫，后果不堪设想，也率领自己的少数亲信官兵向八路军投诚，受到欢迎和优待，有的遣送回东北解放区家乡。剩下的官兵东奔西散，各谋其生。使德王、李守信苦心经营的伪蒙古军汽车队就此告终。

（1987年）

伪蒙疆时期的一大血案

聂 德 俊*

伪蒙疆时期，日寇于1940年、1943年两次在呼和浩特（旧名归绥、归化，伪蒙疆改为“厚和”）大批逮捕无辜人民，特别是文教界人士，毒刑拷打，百般折磨，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屠杀大血案。我就是罹难幸存者之一，身经“厚和”日本宪兵队、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和察南监狱三个不同处所，真是虎口余生。现将亲身经历和见闻写下来，以志这笔永远不能忘记的血债。

为了整理这个资料，笔者曾先后走访了阎继玳、阎培昌、贾学清、岳淮、李香、张宝华、祁维德、卜辰、绫吴山、韩凤岐、王友三、王之云、关和璋、黄昌、张荫廷、王永胜、赵振仑、王贤敏等多人，也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特务的档案中，搜集了一部分材料，并到包头军分区访问了周服礼同志，还特别走访了马南风厅长、田思明局长、张旭主任等，进行了研究。但错误遗漏，仍恐难免，尚请知者批评指正。

一、血案发生经过

1938年冬，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呼和浩特组织“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吸收会员，开展对敌斗争。同时也帮助财神庙老道王性真、阴阳道王永茂和理门公所①郭久城等人，组织“蒙疆道教会”，发展会员二百多人，不少“抗救会”的会员参加了“道教会”，作为掩护。“道教会”会址设在财神庙内，地下工作的负责同志亦居于此。

呼市是当时的伪巴彦塔拉盟的首府。盟师范学校的抗日救国会，逐渐吸收了周服礼、何树声、任希舜、王贤敏、贾秉公、阎勇、富养源、云华、杜思温、阎培昌、武恒年、武恒娴、黄恒娴、卜秉等一百五十多名学生为会员；周服礼、何树声并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2月，周服礼、何树声、任希舜、卜秉、王贤敏、黄媚梅、王林等秘密赴延安学习去了，学校的工作由武恒年负责。周服礼等赴延安学习后，被巴盟师范学校发现，即向家长追问学生去向，家长都推说不知。学校日本顾问安藤、福布、杜边、小仓

---

* 作者曾任小学教员，参加抗日救国会被捕，关押在日本监狱多年，抗战胜利后到华北联大学习。

① 理门公所——旧中国时期，一种群众性社会组织，以戒烟酒作号召，吸引社会下层人参加，派系复杂。这种组织对革命起破坏作用的多，但革命组织有时利用它，也起进步作用。

等，认为问题严重，随向伪巴盟警务厅报告，他们判定归绥城里一定有一个共产党的庞大组织。于是，便派专人在学生中进行侦察，这就是抗救会被侦破的一开端。学生会员中出现了叛徒。燕缦云是巴盟师范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学生，是抗日救国会的会员，对周服礼等赴延安学习的事情，她完全了解。就在这个时候，她被伪警务厅的警尉韩长胜威逼利诱，竟与韩姘居，并将周服礼等赴延安的事情完全泄露。她亲到旧城大什字认出抗救会的负责人刘伟，指给敌人，刘遂被敌人逮捕了。因此，抗救会的秘密，从学校开始暴露了。燕缦云不久和伪巴盟公署顾问静藤以及"蒙古军"连长祁连胜，都相继发生了关系，最后和祁结了婚，现仍跟祁住在包头。

还有一个叛国投敌的败类孔广和。他曾于1938年任东北军骑兵支队的队长，1939年任东北军第一师的师长。他受白凤祥派遣，由河曲绕道来归绥，进行收买土匪的工作，不久就招收了两千余人。孔广和同年冬季被茂林太①伪警察署扣捕，送"厚和"日本宪兵队后，即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宪兵队的"嘱托"（特务）。1940年初，孔某和抗救会负责人刘鸿雄、贾恭认识后，刘、贾二人便将孔广和看作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动员他参加抗日救国的工作。不料，孔却死心投敌，用两面派手法，一面与刘、贾二人联系，一面在日本宪兵队的军曹河野的指挥下，侦察刘鸿雄、贾恭的活动情况，随时向敌人汇报。因此，在1940年7月17日，日寇大搜捕时，孔广和亲自参与了这一大逮捕的罪恶活动。

日伪当局根据巴盟师范学校学生失踪的事情和韩长胜、孔广和的侦察报告，以及叛徒刘伟的出卖，召集日本宪兵队、警察局、伪蒙古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组成"搜查本部"，负责人是日寇河野、杉本、大桥等人。参加这个搜查本部的尚有警尉白玉等。

1940年7月13日清晨，日本宪兵和特务突然把巴盟师范学校包围起来，把学校所有的中国教师和学生整整包围了五昼夜，每天总有两三次汽车开到校门外，每次都根据侦察名单扣捕十几名教师和学生，前后共捕师生二百余人。

日寇根据韩长胜的报告，决定先行扣捕失踪学生的家长。1940年7月13日，先扣捕了王贤敏的父亲王忠诚和他姐姐王惠敏，接着又扣捕了何树声的父亲何奎煜。7月16日夜间，河野、神奇等率领特务扣捕了黄昌、赵文华、黄笑竹、黄瑛（七岁）、黄厉（以上五人系黄媚梅的父母、兄弟、妹妹）。周服礼的父亲周葆久和家人闻风逃脱。卜秉的哥哥卜辰在伪巴盟公署任小职员，敌人用"出张"（即出差）的名义，将卜辰诱至张家口逮捕，日夜加以刑讯，追问卜秉的去向。由于卜辰并不知晓，经两昼夜毒打，亦无结果。第五天即解回"厚和"日本宪兵队。这时日本宪兵队已捕了不少人。卜辰之妻李自祥也被扣捕在宪兵队。

这一惨案从1940年7月至1941年5月22日为止，将近一年的时间，被逮捕者竟达四百余人，仅在"厚和"日本宪兵队被刑讯而遭残害至死者即百余人。下余三百来人，死的死，放的放，最后将我等51人于1941年5月22日解送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复经三个月的监禁，于同年8月22日将我等28名分别判处二至十年有期徒刑，送察南监狱执行。判处死刑的16名，抽血后，活埋在张家口南的万人坑。释放二

---

① 茂林太——旧归绥县第三区政府所在地。

人，被敌人收买利用的四人，病死在军法处的一人。

1940 年以后，抗日救国会通过当时乃莫齐召小学教员谢振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生）开展了工作。谢又和我地下工作人员邹广胜、老黄取得联系，邹、黄二人为给我大青山游击队购买物资，化装成商人，以贩卖药品作掩护，经常来往于大同、天津、北平等地。归化城东北保尔合少村的一个小铺，是物资转运站。这个小铺的王掌柜，在一次运送物资中被敌人扣捕。由此，谢振业及其弟谢振华亦被捕。谢振华被敌人打死在狱中，谢振业与同狱的富养源从新城伪警察署越狱逃出，因受酷刑伤重，未得走脱，复被敌人捕获，谢服毒身死，富被打死。

在敌人这次大逮捕中，巴盟师范的白国华、罗世杰二人亦被捕。这两个贪生怕死的败类，竟将当时在归绥的中、小学教员开列名单，说他们全是抗日救国会的会员。于是，敌人由警佐方田藤吉郎负责，带领日寇田村等，于 1943 年 7 月 12 日午夜又在全市展开了大搜捕。一夜工夫扣捕了一百多人，审讯期竟达一年又十个月之久，直至 1945 年 5 月 5 日才结案。全案共捕了 170 多名，分别押在监狱、宪兵队、伪市公署“留置场”、“搜查本部”、新旧城警察署等六个地方。其间曾组织了九个法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刑讯逼供、百般拷打，在被捕的 170 多名中，被活活打死的占一半，释放者为数寥寥。判刑者 49 名，其中被判徒刑五年以上者 5 名，送张家口察南监狱；其余 44 名送归化市第一监狱。送察南监狱者有：阎继璥、董文平、沙文良、王登魁、毕裕珍。他们被送往察南监狱后，拨到龙烟铁矿厂打石子，敌人怕他们逃跑、不久又送回察南监狱，和抗救会第一次被捕入监的难友相会，至 1945 年 8 月 22 日，同时获得解放。

二、厚和市日寇刑法种种

“厚和”日本宪兵队设在旧城东顺城街东口路北井儿巷的隔壁，豢养着一大群翻译、特务，门口经常守卫着两名鬼子兵。在军曹河野的驱使下，不断地进行灭绝人性的逮捕、刑讯、残杀。里边有八个监牢，每个监牢十六平方米。屋顶、地面、左右隔壁都是木板的，砖做的后墙。前面是高大的大木栅，木栅中间留有八寸见方的小洞口，专为取送碗筷和零星东西使用；右角有一个尺半高的牢门，经常锁着一个大锁。屋内另一角放着盛满屎尿的便桶。牢里跳蚤成群，空气腥臭难闻。大栅栏前是走廊，经常守卫着两个鬼子兵。牢里的“犯人”有增无已，经常圈着满满的中国人。一旦被抓进去，先行登记，然后搜身，帽子、裤带、财物全没收。特务领你到既矮又小的牢门口，打开牢门，让你脱去鞋袜，爬着才能钻进去。牢里无分炕地。本来一间牢房最多住上八九个人就够满了，只因敌人无休止地抓人，人多房少，拥挤不下，除一部分人押往监狱和蒙古宪兵队外，每间房挤住十七八个人。敌人并不管你挤不挤，一股劲地往里塞，白天紧紧地挤坐，不许说话。如发现说话，鬼子便以长竹杆子，伸进栅里，照头上扑打一顿。夜间少铺没盖，和衣倒睡。人多地方小，大家必须面朝一个方向一齐倒睡，两腿弯对弯硬挤着睡。力气小、身体弱的人，挤也是睡不下，只好坐着；鬼子发现又是打骂，不得已还得硬往下挤，只挤得个个人肚皮扁凹，喘不上气来。

这里的饮食简直是不如猪、狗食。每日上午九点、下午五点给喝两顿有限量的稀

粥。味咸苦，吃了舌干口渴，不吃饿得肚子痛。饮水一日给两次，每次每人仅一勺。难友们忍受着饥渴之苦。

有一天，鬼子以消毒为名来折磨我们。在那地冻天寒的时候，敌人突然将我们二百多人放了出来。房上地下站满了持枪的敌人，这些家伙个个怒目监视着我们，让我们排成两行站在院中，强迫我们脱去衣服，个个人脱得精光，寒风吹得电线“呜、呜”地叫，赤裸裸的身体，任凭寒风侵袭，只冻得个个心抖肉颤。隔了一会儿鬼子用喷雾器，喷湿了我们的衣服，之后，又向我们周身大肆喷射，只喷得身上水珠直往下流。这种刑法，我们叫做消毒刑。就这样被折磨了一个多小时后，让我们抱上衣服回牢房。牢房地板上水淋淋地坐不下，只好站着打哆嗦。

这里是鬼子、翻译、特务的世界。对“囚犯”不分昼夜地刑讯手段毒狠残忍。在夜阑人静时，时时可以听到难友们受刑难忍的惨叫声！

日本宪兵队的刑法极为残酷，刑种繁多：（1）烧烤：把铁器烧红，烫肌肤，烙乳房；有时把烧红的炭块放在身上，直将皮肤烧出油来，淹灭炭火。（2）吊打：用绳捆住大拇指，也有从背后捆住双手吊起来打。（3）灌凉水、辣椒水、煤油水：把人仰面朝天捆在梯子上，头上横放一条长凳，水桶放在凳子上，细水长流，直灌口鼻，闭气水四流，吸气喝一口，如此一桶一桶地灌下去。灌过半小时后，肚子涨起来，这时肚子上放一块木板，敌人站在木板上硬踩，只踩得肚里的水夺口而出。这一着使受刑者最痛苦。（4）困：敌分三班人马来拷问，一连三四天不让休息。只要一闭眼，马上就动刑，搞得人精疲力竭。（5）渴：水是人生一日不可缺少的东西。敌特却不给喝水，用渴来折磨人。（6）冻：把衣服剥光，在数九寒天里，站在雪地上、冰滩上挨冻。（7）鞭打：脱去衣服，用皮鞭抽打。（8）狗咬：鬼子喂着许多洋狗，用刑时把狗唤来，只要一打手势，狗就扑上来撕咬，直咬得肉破血流。（9）过电：用两筒干电池，通两根电线，敌特手持电线，在难友们身上一起一落，弄得人痛痒难熬。（10）栽坑：地上挖深坑，头向下吊起来，霎时便会气绝身死。（11）在指甲缝插竹签。（12）压杠子：让人跪在地上，杠子放在腿弯处，两头站上人硬压，只要一压便气绝身亡。（13）穿笔杆：将四个指头捆住，把蘸水钢笔杆插在指头缝里，硬往进挤，疼痛难忍。（14）饿：三四天不给吃东西。（15）图钉扎：把图钉撒在洋灰地上，脱去鞋，推进室内，让狗咬，脚上、身上扎满了图钉。（16）假枪崩、刀砍：把人拉到血迹斑斑的深院，让跪在地上，静等一死。敌人用枪刀作势吓唬人。（17）铺冰、卧雪：脱去衣服，坐在冰滩上、雪堆里。（18）浇冷水、浇开水：在冬天里，敌特用冷水由头到脚泼去，然后又用开水浇在身上，先冻后烫，不几天，身上满是脓血。（19）钻水缸：在冬天，把衣服剥光，让人站在水缸里冻着。（20）杠子打：两人按着，一人双手抡杠，使劲打，死过去，用凉水泼过来再打，有不少人的腿被打断。以上种种，伤重致死者很多。

总之，敌人的刑法，世界罕闻，惨绝人寰。受刑者九死一生，生者受尽折磨，死者状极凄惨。

三、人民英雄和民族败类

这里，略述几位英勇不屈的人和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也略述另外一些人的悲惨遭

遇；最后附带说说一两个民族败类的丑恶行为。

刘鸿雄原名刘瑛，呼市郊区滕家营子村人，生于1907年。1926年在太原国民师范求学时加入共产党。1932年至1933年间，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察哈尔省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活动，并先后担任过支队长、团长等职务。抗日同盟军被解散后，返回故乡任小学教员。1938年潜入归绥，通过抗日同盟军时期老同事的关系，打入日寇心脏——特务机关，以少校参谋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刘鸿雄会同其他同志，组成了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领导归绥人民进行了抗日救国的秘密活动。

1940年7月17日，敌人开始了大搜捕。他奔向财神庙，想把藏在大殿牌匾后面的秘密文件取出，不料进庙即被扣捕。甘心认贼作父的孔广和在日寇河野的直接指使下，参与了扣捕、拷打刘鸿雄同志的罪恶活动。

刘鸿雄被捕后，敌特用了烧、拷、吊、打等残酷刑法来折磨他。但他在敌人面前昂首挺胸，高声大骂不止。鬼子、汉奸、特务被骂得老羞成怒，手持大杠继续打，打得几次死过去，几次用凉水泼过来。他苏醒过来时仍是不住口地骂，敌特又是不住手地打。经过十余天的非刑拷打，直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腿臂骨折，奄奄一息。当他苏醒过来缓过一口气的时候，仍然要骂，并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就这样，直到气绝身亡。

贾恭，汉族，生于1909年。1938年参加革命，抗日救国会领导人之一。当时他任伪农会草料股股长，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购买枪支、子弹、药品、衣物等，秘密运给大青山游击队。1940年9月间，被敌人在城北厂汉脑包村扣捕，解回日本宪兵队，昼夜不停地进行审讯。敌人在审讯中问：“谁组织的救国会?”他说：“贾恭”。敌人又问“谁介绍你参加救国会的?”他说：“贾恭。”他把敌人所质问的问题都承揽在他一人身上。敌人对他用火烧、杠子打，百般刑法，始终得不到任何口供。一天，敌人将他的儿子贾学曾带到关他的牢门外，将小洞口打开喊到：“贾恭过来。”贾恭从小洞口伸出头来，看见儿子站在面前。敌人问贾恭说：“你认识他吗?”贾恭干脆地回答说：“不认识。”又问：“他是你的儿子?”贾随答：“不是”。这时贾学曾看见父亲已经泣不成声。敌人见贾恭连儿子都不肯相认，猛然将小洞口上的插板放下，正好卡住贾恭的脖子，抓住贾恭的头发，这个一拳，那个一掌，打得他头破血流，拔掉许多头发，脖子也被卡破了，卡得出不上气来。几个特务又将他推出门外，按倒在地上，鬼子手持大杠，打得他两腿断成数节。贾恭同志终于1941年阴历正月二十日被鬼子惨杀了。

贾恭被杀害以后，敌人还不准他的家属领尸体，经托人查询，方知已扔到狼神庙[①]附近。家人去狼神庙找到尸体一看，遍体伤痕累累，已无人的模样，其惨状目不忍睹。

杨森，抗日救国会秘密通讯员，是杨业澎（解放后担任过内蒙军区副政委）的父亲，《王若飞在狱中》一书中所称的“革命老人”就是他。当时他在伪厚和电灯公司充司炉工人。1940年7月被捕，敌人用尽各种非刑，打得老人死去活来，他只承认是抗日救国会会员，再不说别的。敌人问：“谁让你参加抗日救国会的?”他说：“中国人民让我参加抗日救国会的。”又说：“你们要侵略，我们就抗日救国，各为其主，理所当

---

① 狼神庙——在呼市公园后街齿轮厂。

然。”他理直气壮，坚贞不屈。鬼子说：“老头，只要你不骂人，就放你回家。”老人的回答是：“鬼子、汉奸净做坏事，怎能不叫人骂！”最后被送到张家口日本军法处判处死刑。

张克敏，汉族，土默特旗五里坡人，共产党员，是抗救会的骨干。当时任乡村小学教员。1940 年 7 月 17 日，听到捕人的消息后急忙骑自行车要到财神庙通知叶茂逃走。行前家里人说：“街上乱哄哄的，自己也该躲一躲，快别去了。”他却说：“救国会的同志们要紧。”乘自行车直奔财神庙，刚走进庙院即被敌人扣捕。被捕后，关进日本宪兵队，饱受敌人的灌水、冻、饿、杠子打等酷刑。他除了承认是救国会的会员外，没有吐露丝毫的秘密。于 1940 年 5 月 22 日送张家口日本莲沼兵团司令部、柑柏部队军法处，监禁三个月后，判处死刑。同年 8 月底被日寇抽血后，拉到万人坑活埋了。

郑化国，汉族，当年约五十多岁，呼市知名人士，抗日救国会的骨干。当时任伪厚和农会会长，也是推荐党的地下工作者叶茂同志任伪教育股督学的介绍人和保证人。叶茂逃脱，他即被捕，敌人对他用尽了种种毒刑。一次在审讯中把他的衣服剥光，皮鞭打，火铲烫，随又把他的胡子、阴毛一齐拔掉，用洋狗咬，撕破肉皮，露出白骨。他一直破口大骂。经过三四天的酷刑拷打，直至被打死，始终未透露出半点真情。死后家人去领尸体，只见半个身子和一条腿上的肉全被狗撕光，全身血肉模糊，毫无人的模样。

魏大贤，汉族，山西阳高人，中国工业大学毕业，抗救会骨干。他以私人资格在小北街三十四号十王庙内开设了一个新华毛织厂。抗救会联络站就设在他家。他被捕后，家产全部被掠夺，在日本宪兵队饱受各种酷刑，不几天即被打死。其妻魏孟氏被判刑三年，其女魏友梅被判刑五年。他厂里的工人王高被处死刑。魏孟氏母女二人入察南监狱后，于 1943 年 6 至 9 月先后死在狱中。

赵新民，是伪厚和税务局职员，因年纪大被革职，家庭生活极为窘迫。富有爱国思想，非常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经助产士李克敏的介绍参加了抗日救国会。赵新民夫妇和儿子赵振仑，女儿赵宝珍（十三岁），一家四人，都被逮捕。敌人在押解途中，赵新民向他儿子赵振仑说：“我要以死来对付日本鬼子，你可别忘记了报仇啊！”

日寇杉本审讯赵新民，首先问：“抗日救国会的头子是谁？有多少会员？”赵新民毫无惧色地说：“抗日救国会的头子是谁，我不知道！救国会的会员多得很哪！”杉本说：“好，你就把救国会的会员的名字说说吧！”赵新民答复得很干脆：“会员确实不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杉本命特务白玉和宪兵将赵新民推出门外，几次灌凉水，死而复苏后痛斥敌人：“你们这伙吃人的野兽，要杀、要剐由你们，想要我招供万万不能。你老子死了，也是光荣的！”敌人无计可施，便把他扔在院子里冻着，灌水后又在板凳捆上了六七个小时。当天晚上六时许，又换河野来审讯，河野采取精神战术，将赵振仑提出，把赵新民从板凳上放下来，装腔作势好言相劝了一番。又让翻译递给赵振仑一张纸和一枝笔，河野说：“你快快写出救国会会员的名单来，马上放你们回家，不然就打你爸爸，让你亲眼看看。”赵新民听了敌人的话愤怒地说：“振仑，你可不能给他们写，如果你写了，就不是姓赵的儿子！”赵振仑拒绝了敌人的要求。河野听了赵新民的话，再次用刑，白玉翻译等像疯狗似地挥起大棒，无情地扑打。16 岁的赵振仑眼巴巴看着自己父亲受苦刑，边哭边叫“爸爸！”并爬在爸爸的身上，替父挨打，可是

敌人越打越凶狠，赵振仑站起来夺去白玉手中的木棒。

赵新民同志愤怒地说："你们这些汉奸、走狗！得不了好死！你老子至死也不会屈服。"白玉和狗头翻译再次毒打赵新民，而赵新民同志也更加使劲地骂。赵振仑边哭边叫"爸爸别骂啦，别骂啦。"赵新民瞪大了眼睛厉声地说："你不让我骂，你就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爸爸。"他边说边用腿踢开赵振仑，更加愤怒地大骂起来。鬼子、走狗手持大棒一齐扑打，直至赵新民的两腿打断，口吐鲜血，才住手。赵新民伤势严重，危在旦夕。敌人虽然使用各种手段拷问了一天和一个晚上，得到只有赵新民的痛骂。

赵新民的腿被打断，不能行动，几个特务将他推到三号牢房。将赵振仑推出门外，剥去身上的衣服冻着，只冻得他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深夜十二时，鬼子们才将赵振仑送回二号牢房。

赵新民被送回三号牢房后，因伤势严重，延至第三天早晨，赵新民光荣地牺牲了。

敌特折磨死赵新民后，对赵振仑也不轻易放过。过了几天又过堂，他年纪虽小而胆量却很大。敌人一再追问抗救会的人员，但他始终没有供出一个人来，敌人打他、吓唬他，他毫不示弱。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让李克敏当面对质，承认自己是会员。于1941年5月22日，送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判徒刑三年。

赵振仑的母亲、妹妹被释放后，家里的财产和所住的房子，全被肖翻译霸占，逼得他们过上了流浪生活。万般无奈，他母亲忍痛将十三岁女儿赵宝珍给了车站工作的何姓做了童养媳，迄今下落不明。赵谢氏卖掉亲生女儿后，回到河北定兴县娘家居住，在辛酸、艰苦的岁月里，忧奋致疾，不久病故在娘家。

赵振仑的右足被敌人打伤，入狱后整整二年，流脓流血。出狱后经医治无效，只好锯掉，成为残废，解放后参加了革命，现在北京市人民银行工作。

马多善，苏虎街小学教员，于1943年7月被捕后，敌人为了逼供而下了毒手。一次过堂，正值严冬，日寇福奇指使特务将马多善的衣服剥光，福奇亲自用皮鞭子抽打。皮鞭梢子上结有一个疙瘩，打中马的后脑勺，沾去一大块肉皮，流血不止。打完后，扔在院子里冻着，继而将他推进雪堆里，当他挣扎爬起来时，又把他推进雪堆，并用雪埋起来。如此反复数次，敌人又提出一桶凉水，由头上浇下去。这时马多善已冻成"冰棍"，失去了知觉，回牢后已经半死不活了，顿时肚脐抽缩在肚子里，疼得他满地打滚，不住口地骂鬼子。两三个小时后即气绝身亡。

路履丰，是音乐教员，被捕后，经历了种种酷刑。一次过堂，鬼子问："谁是共产党？"他说："我不知道。"鬼子立即指使王翻译，将他的衣服剥光，推到院里。几个特务又将他抬起来，头向下栽进水缸里，水缸里直冒水泡。几分钟后，又拉出来，如此反复数次。这种刑法，比灌水还厉害。敌人把他从水缸里拉出来，又用皮鞭和棒子毒打，直打得死去活来。从此他的神经错乱，昼夜大骂敌特，终因受刑惨重不数日死于"厚和"市公署"留置场"。

何麟书，满族，东落凤街小学校长。被捕后，日寇提审，遇着出名的打手贾大棒子作翻译。日寇问什么，他都说不知道。鬼子饬令贾大棒子打，贾拾起大棍，不停地毒打，直打得晕倒在地，还叫来狗咬。第二天鬼子又把他捆起来灌水，一直灌了九桶凉

水，随后又用皮鞭和三棱棒子毒打。直打得血流不止，回牢后不到一天即死亡。

李世奇，伪实业中学的教员，扣捕后关押在新城“搜查本部”。经日寇中菅过堂，令特务把水洒在背阴地，冻成厚厚的冰，将李世奇的衣服剥光，让跪在冰上冻着，然后再用凉水泼在他身上，继而又用一壶开水浇。用刑毕，李已不省人事，随即抬回牢里。经过几天后，遍体肉皮糜烂流脓流血，满身没有一点肉皮颜色。历时22天，于1944年3月3日死亡。

刘匡，伪实业中学的教员。被捕后，经日寇田村、贾大棒子过堂，敌特将他捆起来，手提一壶开水浇在他的头上，头发全部脱落，几天后，流脓流血，头上的蛆直往下跌，经十几天后，于1944年旧历五月初八死亡。

梁福润，南柴火市小学教员，抗日救国会的骨干，系贾恭的女婿，贾学清的丈夫，为抗日救国会做了不少工作。被捕后受尽敌人的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一次，敌人将他吊起来，吊得两臂不能动，在严冬季节里，剥光了衣服，推到院里冻着，并以凉水浇在他的身上，冻得他像冰棍一样。又有一次，敌人用锥子在身上扎，扎得他满身是窟窿，血流不止，继而用棒子乱打。其中有一棒打在他的后脑勺，立即倒地，后脑壳已被打塌，脑浆溢出，当时身亡。

岳浦，汉族，呼市人，当年二十八岁，住九龙湾大北巷，是贾恭的妻姐夫，抗救会的骨干。曾任山村小学教员，后又转入电机厂工作。于1940年12月7日（阴历十一月初九）被捕。敌特在其家翻箱倒箧，挖地三尺，大肆检查后，并将其妻李香带到日本宪兵队。岳浦夫妻被捕，家里留下七个月的婴儿，因无奶吃而饿死。岳浦于1941年8月底在张家口被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判处死刑，抽血后，被活埋在张家口万人坑。

黄素芳，毛织厂的女工，被捕时已怀孕七个月，因受刑惨重而小产在日本宪兵队。于1941年8月底被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判处死刑，被活埋。

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前后两次被捕人员中，在“厚和”日本宪兵队、“搜查本部”审讯期间，被日寇的酷刑惨杀者一百余人。以上只作了个别介绍。下边再写写被敌人残害的其他几个人的遭遇。

一个是章济人，蒙族，土默特旗厂汗秃力亥村人。当时任伪实业中学的校长，于1943年7月11日夜间被捕。在狱中押了四十八天后，转到新城“搜查本部”，由日寇方田审讯，在审讯中，身经吊、烧、灌水、棒子打、冻、饿等刑法。在1943年阳历7月1日那天，从早到晚整整受刑一天，最后将他捆在梯子上灌凉水，突然下了含有冰雹的大雨，敌人跑回屋里，章济人仰面朝天在暴风雨雹的袭击中痛苦挣扎，敌人却以此取乐。大雨经两小时之久，雨过天晴，敌特们用杠子将梯子拉在行道旁，才把绳子解开，两个人把他拖到屋子里，跪在三棱棍上两个多小时。方田又从铁柜里取出一枝大枪，装上子弹，枪口对准章的脑门说：“今天你的不说，死了吧！死了吧！”用枪毙吓唬他。随后又用八人杠压得他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几桶凉水从头浇下去，把他泼醒过来，再用木板子把他身上砍得浑身皮开肉绽，血流不止。这时方田态度突然改变，给他找了块新毛巾蘸上水，擦去身上的血，伤口处涂了些“二百二”（红汞药水），找了一套棉衣让他穿上。方田假惺惺地用温和的语气说：“以后说实话吧，不要受这样的罪啦！”遂即送回牢房。在10月初下雪天又过堂，因无口供，用铁棍乱打，两臂打得肿成碗口粗，

剥去衣服拉到院里冻他，又用两桶凉水从头到脚浇下去，冻得他失去了知觉。敌人又端一碗开水浇在他的脊背上，使活肉皮变成死肉皮，直流黄水，第二天脱衣时，衣服和脊背粘连在一起，待脱下衣服后，脊背上扯下一尺多长的一条肉皮。敌人又一次用烧红的铁钩子烫他的双手，手心和手背烫成焦黑色。最后判刑七年。他虽然生命尚存，但受伤惨重，隐患极深，伤疤满身，眼花耳聋，手足麻木，右手不能写字，造成严重残废。解放后由于党的关怀，参加了工作。

陈翟氏，家庭妇女，伪农会书记员陈凌云之妻。陈逃跑后，敌人将她扣捕，以百般刑法施加于她。有一次敌人剥去她的衣服和裹脚布（她是小脚），剥得赤身露体，用皮鞭打到院里，逼她坐在冰滩上，冰肉冻结在一起，敌人生生地把她拉起来，这样翟氏的臀部和脚外侧的肉皮全被扯破，从此便溃烂成疮。稍见好后，将她送到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坐监三个月后释放，但因受刑惨重，回家不久即病发身死。

贾学卿，女，汉族，呼市人。当年二十八岁。是贾恭之女，贾学曾之妹，梁福润之妻。她的丈夫和父亲都被日寇惨杀，她的哥哥被处死刑。她被捕后，遭到敌特的酷刑拷打，但她意志坚定，毫不屈服。她受了灌水的毒刑，死去活来，又受到电刑，鬼子用烧红的铁棍，烫她的乳房和腿部。鬼子还把两团刺儿铁丝扔在地上硬把她拉上去跪在上面，又把一根粗杠子放在她的腿腕子上，两个敌人站在两头，折磨得时她昏死过去，敌人用凉水把她泼醒，又用狗咬和灌辣椒水来折磨她。敌人又把她拉到宪兵队后院，让她跪在地上，鬼子挥舞着明晃晃的战刀说："现在你的死啦！死啦！不过你现在说实话还不迟。"贾学卿说："你们快些杀了我吧！"敌人用刀背在她脖子上砍了两下。日寇的重刑拷问和死亡威胁都没能使贾学卿屈服。她经受了多种多样的酷刑，坐了四个月的监牢后被释放。迄今她伤疤满身，现住呼市小东街，人称"贾老太太。"

阎继璥，男，汉族，呼市人。当时任伪巴盟师范学校的校长。赴延安学习的学生走后，他负嫌疑最大，因此于 1940 年 7 月 17 日被捕，和我押在一起。他经受了三个多月的不断刑拷，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后，因无口供而释放。1943 年 7 月 11 日，他又第二次被捕。敌人数次提审，受到更加严重的酷刑，灌水、吊、打、压杠子、狗咬、过电、冻、烧、饿等等刑法，应有尽有。每次受刑，都是死去活来。有一次，敌人把他的腿打得皮开肉绽，满身是血，白骨外露，腿肿得很粗，生命难保。敌人见他将要死去的时候，才把他拖入医院，剥去骨头上的坏肉，把肉皮缝好，最后，敌人判处他五年徒刑，送张家口察南监狱。1945 年 8 月 22 日，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出狱。参加了华北联大学习。呼市解放后，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在一中任教员。因受伤惨重，隐患发作，而退职休养。

孟桂香，女，南柴火市小学的教员。被捕后，在一次审讯中，汉奸翻译贾大棒子将她的衣服剥光，仅留下一个裤衩，鬼子上去把她的裤衩也撕烂，扔在一边。孟爬在地上，鬼子端来一盆凉水，用手往她臀部泼，以此取乐。又一次，贾大棒子提她过堂，这时她精神失常，两眼红得像火球一样，一言不发，瞪大眼睛步步逼近贾大棒子，张大嘴要咬他。贾大棒子见她那种疯癫模样，有些害怕，便作揖告饶地说："孟桂香奶奶，饶了我吧！"从此以后再不提她过堂了，不久被释放。她被捕前已怀孕，因受刑而在"搜查本部"小产。

小学教员阎葆昌、阎润昌、阎培昌弟兄三人，于1943年7月间遭逮捕。阎培昌被捕后，在新城警察署得了伤寒病，病愈不久，即将他提到“搜查本部”，过堂三十多天，每天都受刑，打得鲜血淋淋，伤势严重。鬼子遂又将将他二哥阎葆昌提出，让阎葆昌劝说其弟，遭到阎葆昌的拒绝，鬼子便把阎葆昌吊起来拷打，敌人边打边对阎培昌说：“你不说就打他”，阎培昌一言不发，敌特三个人用棒子更加劲地打，直打得阎葆昌昏死过去才作罢。最后他俩各判徒刑二年半。阎润昌因受刑惨重，病死在狱中。

另有一个孙宝山，从日寇的虎口中逃出，却被国民党杀害，这里也略为记述一下：

南柴火市小学校员孙宝山被捕后，受到敌特的严刑拷打，在旧历四月十八日新城东门外奶奶庙会这天，敌人又提审。孙宝山被敌人乱打一阵之后，将他扔在院里不加理睬，孙宝山趁敌特不在意，便撒腿奔跑。由于这里距会场不远，为了逃命急步如飞，奔入庙会场。敌特发现后，立即追赶，此时孙宝山已混入人群，杳无踪影了。孙宝山从庙会人群中逃跑至东村，发现了敌人，马上返回向西逃走，到了后套。他满以为重见天日，谁想到“国军”一口咬定他是敌探，竟被枪决。

最后说一下民族败类白国华和罗世杰。白国华绰号“白毛”，人们一提到“白毛”，无不切齿痛恨。尽管他曾两次被捕，但是这个坏蛋，是坏话说尽，坏事做绝。他第一次被捕时，任伪巴盟师范学校的训育主任，在敌人面前奴颜婢膝，毫无一点民族气节。最后成为忠实于敌人的走狗。周服礼是抗救会在学校的领导人，很多次斗争是在周服礼领导下进行的。因此，“白毛”为献媚敌人，便以“反蒙抗日”的帽子扣在周的头上，引起很多学生强烈的反对和憎恨。他虽然对“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很卖劲，但却始终没有得到鬼子的信任。当学校抗救会组织暴露后，他也遭到逮捕，同样受到严刑拷打。在敌人的严刑下，他供出不少人，断送了很多人的生命。白国华被捕后和阎继璥、王性真、王凯俊、聂德俊等管押在宪兵队五号牢房，由于他的卑鄙出卖行为，不久即被释放。但在1943年6月又被敌人诱在大同予以扣捕。与此同时，巴盟师范学校教员罗世杰也在怀仁被捕，送到大同日本宪兵队。白、罗分别押在牢里。他二人被捕后，因受严刑拷打，各自将伪“厚和”各中、小学校的校长、教职员尽其所知开列了名单，说他们都是救国会的会员。敌人根据白、罗二人开列的名单，于1943年7月13日午夜开始，将市内各中、小学校的教员逮捕了170多人。全市各中、小学校因而陷于停顿状态。他俩献出名单后，敌人继续追问抗救会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他们回答不出，敌人继续多次用刑毒打，直到打死。

四、虎口余生

现在再说我自己的遭遇。我是1941年2月1日被捕的，1945年8月22日八路军解放张家口，我被释放，历时四年半还多。先后经过“厚和”日本宪兵队、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察南监狱三个监牢的苦难生活，经历敌人各种惨酷刑法和三次严重的疾病摧残，真是虎口余生。

在厚和市日本宪兵队

1941年我被捕时，27岁。我是厚和市姑子板人，原籍土默特旗点什气村（在察素

齐东五里），当时任“厚和”市朱尔沟小学的教员。被捕以后，关进日本宪兵队的“留置场”五号房间。一进牢里，臭味扑鼻，看见个个人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在十几个人中，只认识阎继璈一个人。我坐牢一个多月后，即患伤寒，口鼻流血不止，十几天没有吃饭，人事不知。鬼子见我奄奄一息，把我从牢里拖到走廊的砖地上，听任死亡。幸亏有杨文炤大夫（现在呼市玉泉区医院工作）天天给我打针、吃药，约三十多天后，病情见好，但仍不能吃饭，只想喝水。而鬼子每天只给两次水喝，在我渴得无法时，看见旁边放着鬼子洗手用的肥皂水，我乘鬼子走开的机会，迅速用双手捧起盆来连喝几口。这样一连几天，精神终于好转了，随即又把我圈进牢内，不几天就提我过堂。四月初的一个早晨，金翻译唤我到杉本办公室，杉本问一句，金翻译给翻一句。由于我病刚好，耳聋听不见，只是在一边发怔，杉本发怒，将我推出门外，特务们按倒我，杉本亲手用大杠子打，一直打到我昏死过去，然后用一盆凉水泼醒过来。当时我想活不下去了，拿定主意，只求速死。所以，我说：“你打死我也不知道。”敌人听了更加发怒，又继续打，打得我三死三活。敌人认为打不出口供，只好说：“回去想想，明天再说！”我回到牢里，疼得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又审讯，杉本把火炉子里烧红的火钩取出，往我的左脸上烫，听得肉皮吱啦吱啦地响，但我主意已定，想咋就咋罢。敌人见我不招供，将我捆在梯子上灌凉水，灌了三桶水后，肚子涨了起来，敌人站在我肚子上踩，之后，又把我弄回办公室继续审问，我还是不说。敌人见我死不承认，便把岳浦叫来，和我对面坐下，这时杉本指着岳浦问我说：“你认识他吗？”我说：“认识。”岳浦说：“救国会是我介绍你参加的，承认救国会会员并不是丢人的事！”我才承认是救国会会员。

我被捕入宪兵队，举家痛哭不已。为了搭救我，父亲到处求人说情，经人介绍找到特务范广谦，他住井儿巷二号，送给他许多礼物，其实是黑地送暗财，根本无效。但是父亲并不灰心，不久又找到我的叔伯姐夫齐平治认识的翻译，他对我父亲说：“聂德俊正在闹病，借闹病机会可以保出来，不过需要花钱才行。”我父亲为营救儿子，便将赖以为生的两匹骡马变价，交给齐平治。我父亲当时以磨面为生，倾家荡产，汉奸们却借机发财，钱一到手，便无音信了。由于特务勒索，使我家债台高筑，生活无着，我妻因气、吓，得了疯症，父亲日夜愁虑，急得掉了牙齿，母亲卧病不起。一个团聚欢乐的家庭竟陷入了病疯交加、愁苦不堪的境地。

1941年5月22日，日本宪兵队将我押送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三个月后，判刑四年，送察南监狱。入狱不久，即患泄肚，转为痢疾，终日不思饮食，骨瘦如柴，步履艰难。在难友们的照顾与关怀下，逐渐好转起来。我于1944年又得了“黄病”，全身变黄，浑身无力，不思饮食。在神志清醒时，想的是争取活下去。看守主任张国卿一再鼓励我：“聂德俊别害怕，监狱里得黄病的人死不了，我见过好多人得过这种病，都好啦，你放心。”还给我买了“棉茵陈”草药一大包，让我每天泡水喝。喝了半月之久，大见功效，黄色逐渐退去，身子也恢复了健康。

1941年5月21日，鬼子和翻译来到牢里，根据手拿的名册，询问了一部分人的住址，其中也问了我。第二天开完早饭后，鬼子翻译好多人，突然将八个牢门都打开，翻译手拿名册，把昨天询问的51个人（内有妇女9人）都叫了出来，院里堆放着家里送来的夹、单衣服，让个人去寻找并穿起来，分两行站好。这时宪兵、警察等手持机枪、

手枪等武器，在房上地下包围着我们。究竟要干什么，人人捏把冷汗。敌人用手铐把我们两人一铐铐了起来，紧接着三辆大卡车开进院里，让我们一对一对地上了汽车。宪兵、特务手持武器在车的两边押着。汽车驶出门外，门外人山人海等着“看”。当时我心想，人群中一定有我家的人吧！我心情激动着，总想最后看看亲人，看了半天并未看见家里一个人。我想，父亲、母亲、妻子、儿子，你们再也休想见我了。想到这里痛上心来，伤心泪夺眶而出。汽车一直开到火车站，上了军用站台，这时我们才明白，是解送张家口。

1941 年 5 月 22 日下午四时许，我们步上军用客车。上车后，每人发给两个干焙子，给一点点水喝，舌干口渴，实在难活。我们带的洋手铐，不动则已，一动就紧一扣，越动越紧，越疼痛。因此，我们都小心不敢摇动，有的人没有注意，结果手腕红肿起来。

火车快到孤山，时间正当半夜，突然山上响起枪声。监护我们的敌人一时张惶失措，认为这是八路军在劫火车，敌人让我们爬倒在车上，火车顿时停了下来。约二十分钟后，火车又继续前进了。第二天早晨火车到达张家口车站。此时张家口莲沼兵团柑柏部队军法处，早已准备好大卡车在站台旁边等候。我们下了火车上汽车，鬼子兵押在汽车的两边。转眼汽车开到莲沼兵团司令部柑柏部队军法处。从此我们又开始了另一种苦难生活。

在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

我们被带到柑柏部队军法处的一个小院中，到处是紧张而阴森的气氛，听不到一点说话的声音。抬头一望，只见院子的上空笼罩着密如蜘蛛网的铁丝网，连插翅的麻雀也休想飞过去。真可谓“天罗地网”啊！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监狱，是柑柏部队军法处的“留置场”。它的面积约一千平米，东西南北四面的房子毗连在一起，房内有几十间的牢房和四通八达的走廊。走廊的地上铺着长条毛毯，为的是看守巡查时，走起路来没声音。院内设有理发室和洗澡间，靠墙筑有一个长条洋灰水池，供“犯人们”每日洗脸或洗衣服之用。这里经常押着好多中国人和日本兵。

我们来到这里，说话的权利已完全被剥夺了，如果有人说一句，便遭到鬼子的毒打。特别是刚刚来到这里，不知将来究竟如何，人人感到自危。从现象看，只能是凶多吉少了。这时肚子饿得难受，大家不约而同地拿出路上剩下的干焙子吃。由于没有水喝，舌干口渴难咽下，只吃了一小部分。剩下的几十个焙子，正想收起来作干粮，不料鬼子骂道“不许拿”，于是马上全部没收，埋入地下。鬼子取出铐子上的钥匙，一个一个地开了锁，把几个妇女带到另一个地方，然后让我们把身上的衣服全脱光，折叠好，用裤带捆上，写了名字放在一边。鬼子把我们带到洗澡间，三人一班，依次洗澡。看来这是好事，但池中水太热，连手脚都伸不进去，大家都不肯下水。可是鬼子手持板子，逼着我们往里爬，进得慢了就挨打。

洗完澡，就理发。院子里早已放下好多桌子，让理完发的人赤着身子在桌子上仰面朝天在桌子上，原来是要给我们剃阴毛。所有的人都被剃光了，然后每人发给一身白衬衣，一套黄色卡叽布的日本军服，毛毯一块，枕头一个。我们穿好衣服，抱上毯子、枕

头，回到牢房里。看来，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厚和”日本宪兵队要好些，有铺、有盖、有衣穿，每个人身上都是干干净净，室内卫生也很讲究。条件虽好，但也是在坐牢受罪，尤其“坐”的罪和“饿”的罪更是难熬。

这里的监房炕、地不分，铁窗户、木栅门，每间房七个人。我们吃罢饭，彼此正在交谈之际，突然鬼子带着翻译走进来，把我们集合在一起，讲解在牢里应遵守的规则，怎么样吃饭，如何睡觉，如何铺床叠被，如何受检查，如何坐，等等。讲完后鬼子让各自回房演习。睡觉时，不准齐头并摆，主要是防止说话。让我们一行四人，另一行三人，睡成梯形，即第二个人的头，靠第一个人的屁股，以此类推。晚九点就寝的时间到了，但还不能随便睡下，睡觉也有一定的规矩：值班的看守用中国话喊：“休息的预备。”我们一听到这声号令，立刻按照办法，把毛毯打开，叠成一个睡筒，放在规定的位置上，先脱去外衣，站在枕头前，等候第二声口令。鬼子隔一会儿又喊：“休息”。这才允许钻进被筒里，睡的姿势也有规定，必须面朝天，不准蒙头，更不准说话。在那静静地夜晚，屋里寂静无声，电灯照得通明，谁也睡不着。这里离火车站很近，火车开动和汽笛的声音，打破了深夜的沉静，这种声音冲击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就在此刻开始了“甜蜜”的幻想：什么时候能坐上火车回到那可爱的故乡，和父母妻子欢聚一堂，重享那天伦之乐！又想：没有祖国就没有家了。只有抗日战争胜利了，才会实现我们的理想。但转念一想，全案被捕者四百多人，三百多人死的死、放的放了。敌人认定我们51人是“罪大恶极”、坚决抗日的分子，是不会轻饶我们的，看来释放回家是在做梦，很可能判处死刑。愈想愈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如此想了一夜，鬼子在来回地走。

第二天早6点，鬼子大声叫喊：“起嗷!”我们马上起床，穿好衣服，按规定叠好毛毯，按照一定的间隔距离靠墙放整齐。接着就倒便桶，倒罢便桶，看守按牢房次序，一个房一个房地把人放出来。我们出来后穿上鞋，自动站成一列队形，听候鬼子指挥。鬼子用日语喊：“立正！向右转，齐步走!”我们根据鬼子的指挥动作，稍有迟慢就要挨打。走到院里洋灰池旁边，鬼子又喊：“向右转”、“洗面”。我们就手捧凉水洗上二三分钟，鬼子又喊“约西”（好啦）！即行停止，紧接着喊：“向右转！齐步走!”我们走进走廊，鬼子又喊：“立定！向左转！（正好对准挂毛巾的地方）擦面!”我们取下毛巾，擦完脸，把毛巾放回原处，然后鬼子又喊：“东方遥拜。”让我们举起双手，像念弥陀佛式的姿态祝祷“大日本天皇万岁”。但我们心里却祝祷着：“祖国万岁!”“抗日战争胜利!”作罢“东方遥拜”后，听口令回牢房。就在这洗脸的时间里，鬼子兵在牢房里把铺盖全抖开，进行检查毕，又站在牢门口，等候检查身体。先将衣服脱去，把衣服放在地上。这时已成光腚，然后一个一个地检查；一个兵检查衣服有无东西；一个兵检查身体。我们举起双手，腿弯曲，成骑马式，手心向前向后转两次，张大嘴，向左右转两次，并要嘴里喊出：“啊！啊!”的声音，看你手里、嘴里、耳朵里有无东西；然后来一个向后转，又让蹲成骑马式，检查屁股缝里是否夹上东西；然后又让向后抬两足，检查足趾足心有无东西。至此，才算完成一个人的检查程序。这时鬼子喊：“约西!”我们抱上衣服，光着身子往牢里走。有的鬼子拿你开心，就在这走进牢房的时候，在屁股上猛踢一脚。每日早晨都要检查一遍。我们回到牢房，先穿好衣服，再叠好被检查过的毛毯，然后面对自己的铺盖，盘膝打坐，两手放在两腿上，两眼向前看，不

准左顾右盼。七个人端端正正地坐着，活像庙里泥菩萨。腰板挺直，四肢不准乱动，坐得腰疼腿酸。如此天天坐，真叫人痛苦难忍。这样的“坐功”，整整91天。

我们静坐在牢里，消逝着苦难的岁月。在那寂静的牢房里，突然听见炊事员送来碗筷的声音，时间正是八点。炊事员端来菜和汤，大米饭一小碗，一份一份递进牢里。所有牢房饭菜都齐备后，鬼子发出第一声口令“约西”。我们听到这个口令后，都跪起来，眼看着饭不敢动，当鬼子发出第二声口令“嘣”（吃的意思），这才能拿起筷子吃。如果有人不听口令先吃一口，鬼子看见马上就无情地扑打一顿。吃完饭后，自行坐下。炊事员来收拾碗筷时，有一个人站起来，如数递出。我们天天在“坐”，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坐牢”。除大小便的一点自由外，绝不允许移动一下，有的难友本来不大小便，可是为了活动活动，只好起来蹲在便桶上。我因坐得实在腰痛的没有办法了，双手向后托在地板上歇了歇腰，被鬼子看见了，拿根长竹杆，狠命地打了我一顿。中午十二点又开饭，动作程序不改样，吃罢饭又坐下。每日午后四小时有一次“放风”时间，鬼子按时把大家放出，到院子里转圈走动，先慢慢走，后快快走，然后跑步。有的难友因刑伤未愈，不能跑步，鬼子用棍子硬打着跑。这样活动二十分钟后，回到牢里再坐下，直到六点才开饭。九点钟入睡，一切动作如前。如此一成不变地机械生活，渡过91天。

来到军法处后，鬼子都给我们编了号，我被编为“95”号。每天早晨交接班时，呼号点名两次。在点名时大家都站起来，鬼子手持名册，一个房一个房地点名。如喊95号，我即答：“哈伊!”（有、在、到的意思），天天如此。

有一个难友徐凯，因受刑惨重，来到这里不几天即死去了。死了后，给装在一个塔形的棺材里，鬼子很迷信，给焚香点烛、烧纸、念经，第二天埋葬了。

日子久了，鬼子和女监的妇女搞得很熟，她们比我们“自由”得多。她们饭量小，能吃饱。不挨饿也不挨打，我们既挨饿又挨打。到了深夜，鬼子把青年妇女叫到看守屋里去玩弄。如王××、魏××、黄××等就是这样。

这里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记得当快要宣判时，一天夜里，王惠敏（女犯）等穿上看守的衣服，化装成鬼子，从女牢一号到八号牢房。经过我们五号牢房，给他父亲送信说：“最近就要判决!”大家听了都说：“要死要活有盼啦。”隔了几天，果然提审了。天天在叫人复审。在复审中，不动刑了。经过半个月时间，于1941年8月22日吃罢早饭，便将我等28人叫出。这时大家都互相看有谁没谁，并在猜疑，被叫的好呢？不被叫的好呢？究竟是要判刑呢？还是要处死呢？不一会，鬼子将我们28人押解到法庭，让我们整整齐齐站在法庭下面，台上坐下十几名日本军官，其中一个是少将，其余都是校、尉级军官。五六个翻译在台下两侧，好多鬼子兵手持武器，包围着我们。当法庭宣布开庭时，首先由一个翻译宣布“开庭”，接着一个日本军官手拿判决书，宣读我们的“罪状”。大意是：中日是同文同种，大东亚共存共荣兄弟之邦，我大日本皇军，奉天皇之命，协助蒙古民族，打倒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蒙疆政府和蒙古民族，在日本皇军协助下，除暴安民，建立王道乐土，使民众得到安居乐业。因此，大日本皇军，受到各族民众的拥护。惟有共产党盘踞大青山一带，造谣生事，蛊惑群众，企图打走大日本皇军，建立中国人民的中国，推翻新政权，恢复旧政权，组织抗日救国会，在“厚和”展开“反蒙抗日”的破坏活动。经侦察破案，将不肖之徒全部扣捕。经审讯，潘启祥

等28名罪犯，证据确凿，供认不讳。反蒙抗日，罪大恶极，本应处以死刑，惟我皇恩浩大，姑念尔等一时思想糊涂，受了共产党的欺骗，误入歧途。为了挽救你们，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特分别处分有期徒刑如下：潘启祥十年，任全八年，刘明贞、魏友梅五年，聂德俊、胡三娃、郭友诚、蔡青山四年，魏孟氏、李玉山、陈跃光、白素春、陈士英、赵振仑、高太馀、范玉栋八名三年，陈涌智、王永胜、卜辰、梁玉英、王正廷、徐恩元、张锡仁、张荫廷、于清泉、莽兆元、岳淮、杨泽等十二名二年。宣判完毕，将我等28人带到院里，即用两辆大卡车送入察南监狱。从此结束了军法处的苦难生活，步入另一个人间地狱。

我们28人被判决，送入察南监狱，其余22人分别走了不同道路：陈翟氏、王忠诚被释放。魏民、王惠敏、武静汉、鲍麟芝四名叛徒，被释放后，供日寇驱使。

魏民（刘伟）山西代县人，被捕后，叛变了革命，出卖了组织和同志，给敌人写了无数材料，将他所知道的秘密，全部暴露给敌人。因此，他得到鬼子的“优待”，每天给他吃饭馆送来的饭，住在很讲究的宿舍，冬天宪兵队给他做了一套黄色新棉服。在宪兵队大院里，随便出入，俨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送张家口日本柑柏部队军法处后，被释放了。敌人使他和王惠敏结了婚，成了叛徒夫妻。王惠敏以释放其父王忠诚为结婚条件。王忠诚之所以能被释放，就是这个原因。武静汉也是为敌效劳的“有功之臣”。换得伪张家口毛织厂厂长的职位。其妻鲍麟芝亦享同样“厚禄”。

现在让我把坚决抗日的英雄张克敏、革命老人杨森、贾学曾、岳浦、王高、宫傅荫、王性真、王永茂、王永禄、李克敏、杨连桂、吴杰忱、黄素芳等16名的下落介绍如下：除判刑送入察南监狱和被敌人收买释放的以外，牢里只剩下他们16个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28人、4个叛徒和被释放的两个人的下落。对他们如何发落更是难以捉摸。到8月底，鬼子把他们放出来，假借验血为名，每个人都抽了五六百毫升的血。本来他们已经虚弱不堪，再抽那么多的血，怎么能受得了呢！他们被抽血后，身体更加软弱无力，有的竟孱弱得迈不开步。在回牢房途中，摇摇晃晃走不动，只好爬进监牢里。敌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是处决他们，并就便补充血库。第二天早晨，鬼子兵把他们16个人抬出来扔在汽车上，拉到张家口南十余里的地方，在万人坑里活埋了。又一说是被刺刀挑死后埋了。

他们虽然被鬼子惨杀，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与世长存、永垂不朽的！

关于抗日救国会，被敌特破坏搜捕所涉及的地区，不仅归绥一带，京包线沿线各大小城市均被涉及。如包头、萨县、集宁、丰镇、陶林等处，其中以陶林、大同为最。当归绥进行大搜捕之后的七个月，即1941年12月4日，曾在大同扣捕了二百多人。据说，与归绥被捕人员中的曹文英有密切关系。后来判刑者送察南监狱的有任杰等二十余人。

在察南监狱

察南监狱在张家口的西山坡下、河槽两岸。院中心筑有一个六角楼，通往六个号筒，一百几十个监房。另外还有女监、少年监、新监。这所监狱规模很大，单是驱使囚犯做苦役的工厂即有九个。监狱外还有一个砖瓦厂。院内有礼堂、炊场，还有一个杀人

的绞刑场。监房设置完全一样：铁窗户、木板床，便桶放在地上，臭气熏人。囚犯来来往往，经常圈两千多人。环境卫生极为恶劣，加之心情不爽，饭食不佳，患病者甚多，跑肚拉稀极为普遍。疾病流行，春秋尤甚。只要染病在床，患者九死一生。

我们28人坐汽车来到察南监狱，下汽车后，押到六角楼下，看守长手拿名册，点名验收。接着杂役（快要期满出监做零活的犯人）们，抱来很多灰色的单衣服和又脏又破的棉被褥，每人发给一套。让我们抱上这些东西走进监房。狱卒大声说：监狱规定，所有衣服、被褥一律用公家的，个人的东西一律交回保管。随之我们脱去自己的衣服，穿上囚徒的服装。囚衣都是灰色，上身俨若道袍，穿起来好像个和尚。爱说笑的难友说："我们是出家人，可别想家呀！"杂役们给送来碗筷，一笸箩小米干饭，青萝卜菜汤，每人一碗。我们是新客，对监狱的一切规矩全不懂，事事都要从头学起。杂役们和我们是一个立场，有事好商量。当他们送米饭菜的时候，我们便问："这是打份吃呢？还是管饱呢？"他们说："想吃多少吃多少，不打份。"这对挨饿已久的人们来说，是多高兴啊！大家边吃边说："只要能让吃饱饭，苦难的日子就好熬啦，人们常说，吃饱饭不想家。"因此，头一天第一顿饭，每人都吃了三大碗，这是我们被捕以来吃到的第一顿饱饭。吃罢饭，看守把门给打开，让我们到六角楼下，排成一列队形。面前只见铁镣放了一大堆。看守一个一个问："你判了几年？"我说："四年！"杂役给递了一副不轻不重的铁镣，让我坐在铁砧子旁边，杂役将镣环套在脚腕子上，穿上铆钉，"叮叮啱，叮叮啱"地砸起来。无情的铁锤，砸得我心抖肉颤，泪如泉涌。从这时起，这付铁镣整整和我伴随了四年。

每个人所带的铁镣有轻有重，轻者二三斤，重者四五斤、六七斤。轻重按刑期长短决定。我们被钉完铁镣后，站起来都迈不开步，走起路来卡得肉生疼，不得已只好弯着腰，手提镣环慢步往回走。走进监房，上了木床，这时一个个垂头丧气，一语不发了，隔了一会儿，我首先打开沉闷的气氛说："唉！我们还不如牛马自由呢！"接着又有人说："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也有人说："活着就算便宜，好好锻炼身体，等待未来的光明吧！"长期被封闭起来的嘴，得到说话的自由，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起来。谈到受刑经过，案情内容，某人坚贞不屈，某人投敌，一时仿佛在开讨论会。

敌人给我们扣的"罪名"为政治军事犯。凡是政治军事犯，监狱规定三个月内不准下工厂做工。这样我们只好蹲在监房里谈天说地。我和判十年徒刑的潘启祥、八年的任全、四年的郭久诚等住在一个监房里，彼此受刑多，经历多，本案情况了解得也多。

现在让我再谈谈监狱的清规戒律吧。在监房里贴着十要十不要的"犯人须知"，违者按情节轻重给予如下处分：打饭、独居、蹲暗室、带手铐、上好汉床等。这里的看守有两种人：一种是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感的，把我们坐监看作是光荣的，是爱国志士。因此，对我们处处照顾。如看守主任张国卿，低声和我们说："你们都是英雄好汉，虽然坐了监也是光荣的，请你们好好注意身体。"我们有时做些违犯监规的事，遇上他也是视而不管，闻而不问，如有困难，背着鬼子给解决。类似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另一种是甘心效忠于敌人，毫无民族气节的败类，把我们看成是危险的人物。冷酷无情，吹毛求疵，到处寻找毛病，神气十足，经常打人骂人。

监狱里最怕的是犯人炸狱、越狱、烧狱。因此防范极严，每日早晚看守交接班时，

首先要呼号点名，我的编号是“476号”。点罢名还要检查一次铁镣、身体和室内外。日日如此检查，主要是为了防止逃跑、自杀、行凶、纵火、暴动等事件发生。

监狱生活，每天早晨六点打铃起床，起床后打扫炕、地，倒便桶，接着就洗脸。洗脸时走廊下放着一个大木盆，倒水后，把门打开，一个牢房一个牢房地洗。一盆水供六七十个人洗。洗罢脸无事可做，我们就做起柔软体操，锻炼身体。每日在上午九点、下午五点开两次饭，七点就寝。

杂役们对我们很好。他们见我们带上了镣，走不了路，就把出监者留下的“镣磨”送给我们带，带上这种工具，行走就方便了。我们带上镣后，裤子脱不下去，他们亲手教给我们脱的方法。诸如喝水，吃饭等处处关心我们。

监狱生活每况愈下。每天只能吃两顿高粱面、黑豆面的窝头。由此而引起了严重的肠胃病，跑肚拉稀，病人日增，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四十多。全监囚禁着1700多人，每年死亡者，即达七八百人。我们28人即死去了15人。即：刘明贞、魏友梅（被判五年）、郭久诚、蔡青山、胡山娃（被判四年）、魏孟氏、陈耀光、白素春、李玉山（被判刑三年）、王正廷、梁玉英、张锡仁、于清泉、莽兆元、徐恩元（被判刑二年）。

春冬季节死人最多，每日平均十几个人。正如难友们所说“只要一跑，生命难保”（跑即跑肚拉稀）。囚徒死后，抬埋队把死者由后门抬到西山坡，把所穿的衣服剥光，扔到浅沟里，埋上几锹土就算了事，随之成群的野狗将死者拉出吞食。因此，西山坡白骨堆积成山。每当夏季，臭气冲天，路过行人均掩鼻而过。

度日如年的三个月终于蹲够了。我们开始参加了工厂的劳动。劳动项目是：织毯子、纳鞋底、糊火柴盒、织袜子、织布、织毛巾、裁缝、纺线等等；还有砖瓦厂、炊场的劳动。我们开始劳动是糊火柴盒。这个工厂的主管看守是白世雄（回族），外号叫白阎王，为人心狠手辣。第一天上工，他给我们训话：“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也是反蒙抗日的军事犯。不管你过去是龙是虎，现在却是犯人，来到这里，是龙的低头，是虎的卧下。现官不如现管，监狱的规矩你们全知道，如敢违犯，定打不饶。”这个丧心病狂的败类，一时确乎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简直不可一世。自然难友们表面上对他畏惧，实际上对他恨之入骨。他给我们规定每天必须糊700个火柴盒。否则，就定打不饶。

难友郭久诚因病未完成定额，白世雄立即责问：“为什么没有糊够700个?”郭答：“我有病啦!”白又说：“病啦也得完成任务!”郭久诚气愤地说：“官家还不使唤病人呢。”白阎王一听，登时大怒，手持三尺大板，立着板棱使劲地乱打一顿，打得他不能行动，收工回牢不能走，我把他搀回牢里。郭久祥是厚和市大召当家喇嘛，徒弟有好几十人，日常受人尊敬，今天遭到毒打，本来有病，这就气上加气，病上加病，从此卧病不起，日渐加重，不几天就死去。本来他在宪兵队受刑够惨了，但未丧命于日本人之手，而今却被民族败类白世雄打死。

另一个看守主任吴敬芝，对待被监禁的难友略好于白世雄，但也是个坏蛋。我由糊火柴盒工厂转入织布工厂后，他让我给他偷布和毛巾，我虽表面答应，但实际并未给他偷，因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到这个工厂临时值班，故意寻找我的毛病。监狱规定：军事犯根本不许可送吃的东西，但天天是高粱面窝头、黑豆面窝头，吃得人们肠干烧心。到了冬天，人们总想吃些抵抗寒冷的辣椒面。辣椒面成了难友们最爱吃的调味品。这种东

西不仅可以御寒，并且还可以增加食量。这时，我成了工厂里的杂役，搞这样的东西很有条件，于是我找工厂的陶工程师帮助我买。陶工程师给买来一大包，我把它分成小包，给难友们每人一小包，吃饭时，吴敬芝来到工厂，看见难友们菜汤里有红色的辣椒面。他马上追查辣椒面的来源，追来追去自然就追到我的头上。吴敬芝面目狰狞地对我说："今天我要处分你！"我气愤地说："好吧！你别生气，这点小事，难道再判我四年徒刑不成吗？"吴某叫出好多看守，喝了一声："给我把衣服脱下来！"好几个看守剥去我的裤子，按倒在地，吴敬芝手持打狼用的白蜡杆狠命毒打，打断一根又一根，打得我皮青肉肿不能移动才住手。打完后，把我放在六监单独监禁起来，并向日本鬼子报告了我偷买辣椒面的情况。这件事，被张国卿知道了，他亲自到六监安慰我，并向鬼子说了些好话，这才把我放了出来，恢复我回工厂的劳动。

时隔三个月，吴某患伤寒死了。这真是未经人诛，天也不容！难友们无不拍手称快。

张家口的冬天，朔风凛烈，寒气袭人。一般人家中早就生炉取暖了，但我们住的是终年不见火焰的冷冰房，穿着不堪御寒的破棉衣，铺的盖的仅一层，规定军事犯不准用私人被褥，故意让我们受冷冻，再加上我们带着铁镣，棉裤裆里留着一条缝，寒风吹得两腿疼。白天在工厂里劳动，晚间回监房睡觉，脱去破烂的棉衣，咬紧牙关，钻进冰凉的破被里，浑身冻得直发抖，卷起两腿，铁镣冰得两腿疼。第二天打铃起床，卷起铺盖，褥子下面和床板上面，印着湿晶晶的一个人影（这是体温和床板下寒气接触后潮湿的）。看看玻璃窗和铁棍都积有又厚又白的一层霜，监房简直像冰窖一样。为此，我们编了一副对联：

两顿高粱面不饱，

一夜冷冰房足冻。

冬天如此，夏天总该好一些吧？其实不然，冬天受冷冻，夏天更难熬。每届夏令，你一进牢房就可以看见墙上血迹斑斑，白墙简直变成了花墙，这是囚徒们抹杀臭虫的血痕。监狱的臭虫个大，有尾巴，人们真是望而生畏。监狱的臭虫、跳蚤很繁盛，每到夜晚便成群结队出动，咬得我们满身起疙瘩，痛痒难忍。由于臭虫骚扰休想夜间安眠，多数人被臭虫咬得生了疥疮。加上便桶放在房里，室内臭味难闻，苍蝇成群飞舞。白天整日劳动，总是打盹瞌睡，萎靡不振。

监狱里环境卫生恶劣，传染病非常流行，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人们都想尽办法同死亡做斗争。在那恶劣的处境中，除了寻找食物、药品补充营养外，只有加强锻炼身体。为此，我们每天早晨起床后，在那狭窄的牢房里，伸臂、揉腰、弯腿，展开柔软体操运动，直到满身大汗为止。这是保持身体健康惟一的方法。因此，我们一直在坚持着。其次，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公开地和秘密地搞些滋补和预防疾病的药品，如鱼肝油球、阿斯匹林、止泻剂、苏打片、胃舒平等。除此之外，还秘密搞些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办法是通过看守往家里写信要钱和吃的东西。家里寄来后，由看守转交，当然这样做，要给看守一定的报酬。另外，就是采取换的办法，和看守做交易。有时拿自己的衣物换；有时偷上敌人工厂里的产品换。用自己的东西换是有限的，偷敌人的产品换是大量的，经常的。再次是我们在糊火柴盒时，偷喝面粉浆糊，在织布、织毛巾工厂偷浆线

用的白面在工厂烙成烙饼吃。

生活在敌人的监牢里的难友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有着深厚的感情，互相关心照顾，犹如手足兄弟。一人的药品大家用，换来的食物共同吃，没有独自享受的。一人有病，大家想尽办法给治疗，给搞些好东西吃。喝水、吃饭彼此相互照顾，无微不至。

既然是“犯人”，自然一切自由全被剥夺了。我们从被捕起，一直无法见到家人。只凭通信联系，但通信又有规定，每月只准写一次，先写申请，待批准后，发给你一个带信皮的通格信纸，并由看守送来笔和墨，写好后，送给监狱看守长和鬼子检查合格后，才能发送邮局。自然信的内容只能是上天言好事了，否则，即被扣留。

我们入监不久，即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新加坡，对英、美宣战。为此，监狱集合犯人在礼堂召开所谓“庆祝会”，会上由刘逆麟凤典狱长朗读“大日本天皇陛下诏书”，刘读毕静默三分钟。这是让我们默祷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天皇万岁”。从此每月8日举行一次。日寇每得到暂时的胜利，就颁“大赦令”。我们原以为可以得到减刑，提前出狱，不料敌人对军事犯明文规定：“罪大恶极，不予赦免。”而我们大家一致说：“不接受敌人的恩赐，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我们要自求解放！”

1945年美、英转守为攻，日本节节败退，塞班岛被围，日本军队七万全部被歼，塞班岛也被美军攻占。敌人又在监狱里召开追悼会，而我们却由衷高兴。

监狱里虽然被封锁极严，但国际战争的消息总还是听到些的。二次世界大战越来越紧张了，轴心国日渐衰败。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世界形势，我们通过搞到的报纸，并把战争形势略图抄画下来，前后对照，相互分析。

我们在强迫劳动中，对工具、原料故意进行破坏。如我在九工厂时，曾故意将三四个大线轴的线头搞乱，使其不能使用，有时把织布机弄坏。工厂的工具、原料遭到大量的糟蹋。

1945年8月22日，是我们终身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们结束了亡国奴和囚徒的生涯。

这一天的早晨，炮声隆隆，枪声时断时续，难友们高兴得又蹦又跳。正在这兴高采烈的谈笑中，突然来了几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随即将监狱中的“政治犯”、“军事犯”全部释放出来。我们五十多人，由八路军的几个同志陪同，到了张家口警察局（已由公安局接管）。首先由苏奕然局长向我们表示亲切地慰问，并当即交给我们两项任务：第一，协助八路军搜集敌人遗弃的枪支；第二，好好地学习、休养。话虽不多，但说得我们内心暖乎乎的。当时到公安局的难友是：抗救会第一次被捕人员：潘启祥、任全、聂德俊三人。抗救会第二次被捕人员有：阎继璈等五人，大同市抗救会被捕人员任杰等二十余人。此外尚有涞源县被俘的八路军马田利等二十多人。

我们五十多人在公安局的领导帮助下，成立了难友队，聂德俊被选为队长，任杰为副队长。我们到了公安局后，打开了库房，每个人挑选了一套新军装，每天坐上汽车，到原日本驻军兵营里搜集枪支并担任守卫工作。我们本当服从领导安排好好休息，但是我们这一伙出笼之鸟，身心初获解放，在极度欢乐之下，要想安眠怎么可能呢？大家共庆抗日战争的胜利，酒肴俱全，待遇优厚，大家欢聚一堂，吃酒猜拳，欢乐、兴奋的情

绪，确乎是秃笔难书。一连几日，通宵达旦，都是如此。

搜罗枪支工作完毕，就开始了学习、休养。每日吃营养丰富的饭菜，同志们兴致勃勃，无不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经过两月之久的学习、休养，根据每个人的意愿和文化程度，分别分配了工作和保送华北联大学习。个别人愿意回家的，组织上发给路费、自行返家。

我和阎继璥等及大同市的马绩等二十余人，进入华北联大学习。察南监狱在西山坡，华北联大在东山坡，当我们到了华北联大学习，有人诗意颇浓地说：

啊！共产党，毛主席，
你是我们的救命星！
脱离阴森苦难的西山坡，
踏上了民主、自由的东山岭，
幸福、愉快、新生。

五、结束语

伪蒙疆时期这一大血案，从1940年7月起，前后被捕人员约五六百人，现在仅就我个人记忆和调查了解到的有237人（姓名如附表），其中109人惨遭敌人杀害（其中被打死者49人，死在监狱的44人，处死刑的16人）。在237人中，教员101人。从以上数字看出，敌特对教育界的摧残最大。其次是电面厂、毛织厂、铁路等。

被捕人员中有蒙、回、汉、满各族人，其中有工人、教师、农民、商人、医药卫生、宗教、妇女，各族各界都有。从年龄看，有老年、青年、少年、儿童，还有婴儿。其中有不少人，全家被捕，举家惨遭杀害，造成灭门绝户。有四个妇女在怀孕期受刑，小产在监狱里，所生小孩三个死亡。怀孕的妇女是：云华、霍爱珍、孟桂香、袁继璞等4人。云华于1943年9月18日在新城“留置场”分娩，给孩子起名为“念生”，今年21岁，现在呼市毛织厂当工人。他就是出生在监狱里惟一活着的人。

那些甘心认贼作父，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汉奸、蒙奸、走狗、特务等一小撮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垮台后，到处逃躲、隐匿，企图逃避人民的惩罚。但是绝不允许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逍遥法外。所有的刽子手，先后均被逮捕，受到应得的惩罚。如：特务周俊刚，日寇投降后，由贾学清联合了20多名寡妇（丈夫都被杀）向国民党法院控诉，在人民群众压力下，判处周犯死刑。

白玉、孔广和、刘永祥等犯，在解放后，逃匿各地，在我公安部门严密侦察下，分别在兰州、东北鹤岗市等地一一扣捕，于1958年4月25日在呼市执行枪决。

特务张桂芝被判刑20年，赵鹏被判刑15年，戴俊、马荣各判刑10年。韩长胜于1958年在保定扣捕法办，王秉政在太原扣捕法办。

察南监狱的汉奸、走狗，如：刘麟凤，于张家口解放后畏罪自杀，白世雄、那焕璋已被扣捕法办。

还有几个叛徒，如：魏民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王惠敏判处徒刑5年，武静汉判处徒刑15年，燕缦云判处徒刑3年。

附录：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被捕后结果
潘启祥	男	30	女师教员	判刑十年
任　全	男	50	铁路工人	判刑八年
刘明珍	男	25	道人	死在狱中
魏友梅	女	19	学生	死在狱中
聂德俊	男	27	教员	判刑四年
胡三娃	男	27	福义胶房工人	死在狱中
蔡青山	男	24	铁路员工	死在狱中
郭久成	男	42	大召理门公所当家	被打死狱中
魏孟氏	女	38	家庭妇女	死在狱中
李玉山	男	40	农会职员	出狱病死
陈耀光	男	30	毛织厂铁工	死在狱中
白素春	女	25	教员	死在狱中
陈世英	男	28	毛织厂司机	判刑三年
赵振仑	男	16	学生	判刑三年
高太余	男	40	天义毛织厂经理	判刑三年
范玉栋	男	30	车站电工	判刑三年
陈勇智	男	22	税务局	判刑二年
王永胜	男	28	电灯公司收款员	判刑二年
张荫廷	男	35	毛织厂工人	判刑二年
卜　辰	男	24	巴盟公署职员	判刑二年
王正廷	男	40	图书馆职员	死在狱中
梁玉英	女	24	教员	死在狱中
徐恩元	男	50	电灯公司	出狱病死
张锡仁	男	20		死在狱中
于清泉	男	21	铁路职工	死在狱中
莽兆元	男	45	电灯公司	死在狱中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被捕后结果
岳淮	男	30	电机厂	判刑二年
杨泽	男	25	电灯公司锅炉工	判刑二年
王性真	男	50	道人	判处死刑
宫傅荫	男	31	铁路工程师	判处死刑
王永茂	男	29	道人	判处死刑
王永录	男	26	电灯公司工人	判处死刑
王高	男	27	魏大贤工厂工人	判处死刑
张克敏	男	27	教员	判处死刑
李克敏	女	30	助产士	判处死刑
杨连桂	男	28	毛织厂工人	判处死刑
杨森	男	50	电灯公司	判处死刑
贾学曾	男	30		判处死刑
岳浦	男	27	电机厂	判处死刑
吴杰忱	男	30	台阁牧乡长	判处死刑
黄素芳	女	23	毛织厂职员	判处死刑
徐凯德	男	19		病死军法处
魏民	男	24	地下工作者	投敌
武静汉	男	27	毛织厂职员	投敌
鲍麟芝	女	24	毛织厂职员	投敌
王惠敏	女	20	打字员	投敌
王忠诚	男	47	红沙坝站长	释放
陈翟氏	女	30	家庭妇女	释放后病死
刘鸿雄	男	30		被打死
贾恭	男	45	农会草料股股长	被打死
郑化国	男	50	农会会员	被打死
赵新民	男	40	税务局职员	被打死
李树基	男	35	教育股股长	被打死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被捕后结果
成维夏	男	28	回协秘书	被打死
贾秉恭	男	23	教员	被打死
胡德斋	男	35	巴盟师范会计	被打死
阎　勇	男	25	教员	被打死
白国华	男	40	巴盟师范训育主任	被打死
魏大贤	男	40	毯子工厂经理	被打死
顾纯沛	男	30	毛织厂工人	被打死
刘　蔼	男	21	教员	被打死
梁　荣	男	21	电灯公司工人	被打死
罗世杰	男	37	恒昌店小学校长	被打死
何麟书	男	28	东落凤小学校长	被打死
夫子恒	男	50	巴盟师范事务员	被打死
谢振业	男	30	乃莫气小学教员	被打死
闰润昌	男	31	职员	被打死
傅光达	男	47	医生	被打死
韩宝钧	男	27	巴盟职员	被打死
刘　匡	男	49	实业中学教员	被打死
路履丰	男	29	教员	冬天放在大水桶里冻死
王文经	男	40	小学校长	被打死
段履庄	男	50	商会会长	被打死
方思贤	男	35	教育科职员	被打死
王　悌	男	27	教员	被打死
王从顺	男	30	教员	被打死
董老五	男	40	教员	被打死
任　茂	男	26	教员	被打死
梁福润	男	27	教员	被打死
高德贵	男	22	天荣店徒弟	被打死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被捕后结果
渌　　傧	男	26	师范教员	被打死
张殿甲	男	60	地主	死在狱中
张嘉安	男	20	毛织厂工人	死在狱中
郝大忠	男	40	教员	出狱后病死
大国弼	男	25	教员	死在狱中
董文运	男	30	马桥贩子	死在狱中
张昆素	女	35	教员	释放后病死
王秀清	女	28	教员	释放后病死
兆锦昌	男	30	教员	被打死
马多善	男	45	苏虎街小学校长	在宪兵队饿死
李　　德	男	45	教员	死在狱中
吴锡畴	男	40	巴盟师范事务员	死在狱中
李士奇	男		实业中学教员	被打死
张东葢	男	56	市公署股长	死在狱中
丁　　良	男	40	老道	
业恩光	男	25	巴盟教育科	释放后病死
阎德贵	男	22	农民	释放后病死
富养沅	男	21	教员	被打死
王利民	男	30	盟师教员	死在狱中
张　　贤	男	35	盟师教员	死在狱中
张占义	男	31	盟师教员	死在狱中
关方廷	男	40	盟师教员	死在狱中
谢永廉	男	40	市公署总务科长	释放
文　　秀（文都尔护）	男		巴盟教育科宗教系长	出狱病死
董文华	男		马桥	释放
董文瑞	男		马桥	释放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被捕后结果
赵　福	男		大台什农民	释放
李有福	男		一家村农民	释放
李成斋	男		电灯公司	释放
魏　忠	男		电灯公司	释放
曹文英	女	20	教员	释放
韩凤岐	男	40	教员	判刑二年半
张玉山	男		火车司机	释放
王凯俊	男	20	毛织厂工人	释放
松夏林	男	25	毛织厂工人	释放
粟实甫	男		医师	释放
续吴山	男		医师	释放
黄　昌	男		协进会	释放
翟世华	男		土药组合	释放
关国鼎	男	25	教员	释放
阎继璥	男	45	巴盟师范校长	判刑十年
沙文良	男	33	小学校长	判刑五年
董遂平	男	45	盟师教员	判刑十年
王登魁	男	35	教员	判刑五年
毕裕珍	男	35	巴盟职员	判刑五年
章继人	男	32	实业中学校长	判刑七年
谢振华	男	18	学生	被打死
栾锡佩	男	40	教员	判刑二年
吴浚哲	男	28	教员	判刑二年
黄世敏	男	28	市公署	判刑二年
阎保昌	男	24	教员	判刑二年
阎培昌	男	21	教员	判刑二年
张宝华	男	35	税务所	判刑二年半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被捕后结果
云　华	女	20	土小教员	判刑二年半
李自祥	女	24	教员	释放
籍占权	男	35	小学校长	释放
齐维德	男	30	教员	判刑二年半
赵　福	男	25	毫沁营乡助理	释放
王之云	男	24	教员	判刑二年半
李成瑞	男	30	电灯公司	释放
贾允恩	男	37	教员	判刑二年半
巴汉钧	男		教员	释放
亢子和	男	40	巴盟职员	释放
李　计	女	40	家庭妇女	释放
成罗禾	男		教员	释放
穆生秀	男		电灯公司主任	释放
李八斤	男	31	一家村农民	释放
李有发	男	41	一家村农民	释放
贾学卿	女	27	家庭妇女	释放
李　香	女	26	家庭妇女	释放
朱言明	男		行商	释放
庞健勋	男		毛织厂	释放
陈玉山	男			释放
刘永珍	女	20	教员	判刑二年半
白绪生	男	25	教员	判刑二年半
王友三	男	30	教员	判刑二年半
秦化一	男	30	教员	释放
毕力格巴图尔	男	29	职员	判刑二年半
关和璋	男	30	职员	判刑二年半
王振昆	男	25	教员	判刑二年半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被捕后结果
吴秉光	男	25	翻译	
张世英	男	27	教员	判刑二年半
祁廷璧	男	24	教员	判刑二年半
杜思温	男	25	教员	判刑二年半
孟桂香	女	27	教员	判刑二年半
刘炳林	男	26	教员	判刑二年半
赵星培	男	27	教员	判刑二年半
吴恒章	男	19	学生	释放病死
吴恒娴	女	20	学生	释放
吴恒年	男	18	学生	释放
李毅先	男	27	毫沁营乡助理	释放
索晋昌	男	20	学生	释放
张家骥	男	18	学生	释放
郑福臣	男	35	电灯公司	释放
王　禄	男	40	民教科	释放
高兰英	女	25	卫生界	释放
任志远	男	20	学生	释放
刘　钺	男	20	学生	释放
云　瑞	男	35	学生	释放
邹广胜	男	36	铁路	释放
祁承山	女	19	实业中学女生	释放
唐炳元	男	20	实业中学学生	释放
王淑文	女	25	教员	释放后病死
霍爱贞	女	25	教员	死在狱中
路履谦	男	27	教员	判刑二年半
王家鼎	男	22	学生	释放
董文锦	男	27		释放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被捕后结果
何　奎　煜	男	46	地政局职员	释放后病死
吴　尚　文	男	37	电灯公司锅炉工	释放后病死
杜　未　年	男	22	电灯公司锅炉工	释放
刘　维　平	男	17	电灯公司锅炉工	释放后病死
孙　管　贤	男	40	电灯公司线工	释放后病死
何　树　勋	男	28	教员	释放
王　以　应	男	30	市公署职员	释放
翟　义　忠	男	22	教员	释放
白　本　云	女	30	助产士	释放
徐　茂　华	男	25	医生	押四个月后释放
元　继　璞	女	20	小学教员	判刑二年半
胡　耀　庭	男	28	小学教员	判刑五年
黄　英　启	男	28	职员	释放
关　伯　端	男	35	职员	被打死
李　春　华	男	25	小学教员	被打死
王　守　智	男	25	翻译	释放
赵　松　泉	男	32	职员	释放
吴　之　刚	男	30	翻译	释放
王　怀　德	男	24	农村小学教员	被打死
黄　瑞　亭	男	52	税务局职员	被打死
曹　秀　英	女	17	学生	释放
张　永　立	男	14	学生	释放
赵　宝　珍	女	13	学生（赵新民之女）	释放
赵　谢　氏	女	55	家庭妇女（赵新民之妻）	释放后死
云　善　祥	男	27	土旗政府	释放
李　一　健	男	28	市公署股长	被打死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被捕后结果
张　　鑫	男	46	巴盟师范教员	被打死
关瑞亮	男	28	教员	被打死
张为义	男	57	牛桥街小学教员	死在狱中
王云卿	男	56	省二教员	被打死
黄世敏	男	23	市宏报股	判刑二年半
张淑珍	女	18	厚和医院护士	释放
孙宝山	男	25	教员	越狱逃走后被傅作义部队杀害
杨茂春	男	20	电灯公司工人	被打死
夏怀春	男	31	电灯公司工人	被打死
吴贵红	男	21	电灯公司工人	释放
孙立茂	男	40	面厂副主任	释放后病死
曹雨亭	男	20	学生	释放
曹向丰	男	50		释放
相克让	男	21	铁路工人	释放
郗奇铮	男	25	家畜防疫处	病死
马秉哲	男	20	首善医院	释放
祁维新	男	23	教员	判刑二年半
王　　栋	男	60	农民	释放
黄　　励	男	17	巴盟师范学生	释放
黄　　英	男		小学生	释放
赵文华	女	51	家庭妇女	释放
黄笑竹	女	19	高小六年级	释放
魏德忠	男	21	电厂工人	释放
武健英	女		学生	释放
武锦荣	女		扶轮学生	释放
曹淑珍	女			

绥蒙抗日救国会被捕人员名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业	被捕后结果
刘　玉　珍	女			死在狱中
赵　采　云	女			
张　淑　珍	女			被打死
葛　　　禄	男	22	新华毛织厂工人	

（1965 年）

北平三年

德穆楚克栋鲁普

“蒙疆”政权随着日本投降而垮台，我于1945年8月20日离开张家口到了北平。表面上做了闭门谢客、销声匿迹、不问政治的寓公，实际上仍是野心未死，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企图卷土重来。我狂妄自大地认为自己是“蒙古的中心人物”，仍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因此便找寻机会，奔走联络，进行所谓“蒙古高度自治”的活动，实际上仍是作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兹将我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分别叙述于下。

一、我和蒋政权官员们的联络

我到北平不几天，从广播中听到蒋介石讲话，谈到承认外蒙古独立及内蒙古自治问题，就大喜过望。认为趁此机会，仍可谋求“内蒙古高度自治”，便电蒋表示要亲往重庆，面报蒙事，请派飞机来接。蒋复电叫我和军事委员会驻平代表何其巩接洽，安排飞机前往。我即前往与何接洽。何说：“现在飞机正忙于运送接收人员和军队，日本的飞机尚未接收过来，实无飞机可派。”因此，又由乌臻瑞与胡宗南的驻平办事处联络飞机，结果胡宗南派高参刘庆曾乘飞机来接。

我在出发前，想把吴鹤龄留下，办理善后事宜，不意吴鹤龄却佛然作色地对我说：“蒙古事情不是由你一个人包办，大家都有份。我正想乘这个机会，飞往重庆面见蒋委员长，报告我受他的指示在蒙工作的经过，洗刷我的污点，你却不叫我去，我是碍难从命，非去不可。”他既执意要去，我也不好强留。我就偕同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超苦拔都尔（陈绍武）及随员色登道尔吉、郭木布札布、乌臻和等飞往西安，旋又由胡宗南派员送至宝鸡改成民航机飞往重庆。军统局特派马汉三率领数人，拿着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国光的名片到飞机场迎接，当即把我们安排在军统招待所“漱庐”居住。过了两三天，军统局局长戴笠特从南京乘坐飞机前来，为我等一行设宴洗尘。席间戴笠极力吹嘘“国军”力量的强大，说些“打共产党必操胜算”的大话。宴后又谈关于集结伪蒙军队进攻八路军的问题。继而贺国光前来访问，认为我们在“漱庐”居住不便，当由蒙藏委员会派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前来接我们转到蒙藏招待所居住。

到了9月10日左右，蒋介石就分别面见我们。当我前往见蒋时，蒋特从客厅中的座位上站起来，表示很亲切的样子说：“啊！你来咧，来了，快到屋里坐。”接着他就问我说：“你们一同来了几个人？”我当具以实告。继而他说：“吴鹤龄来了，好！我要见见他。”紧接着他就问我：“你还有多少军队？”我说：“现在蒙古军还有几个师，一个直属炮兵队，并又组织五个警卫师，还计划把警察队改编为十六个旅。”他又追问：

"现在你究竟还有多少兵呀?"我答:"李守信当过蒙古军的总司令,俟和他询明情况后,再来报告委员长。"他说:"噢!原来李守信就是你的总司令呀!"接着谈到承认外蒙古独立问题。我想趁此机会,请求许可"内蒙高度自治",刚说了"我这些年来是在委员长的领导下,本着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精神,谋求蒙古民族的独立自主……"几句话,蒋就表示不耐烦的样子,他就扭转话题,问了些生活小事,就叫我和李守信一同吃饭。席间蒋向李守信询问"蒙古军"情况,尚有几个师旅和多少兵?李当据以回答。饭后,我又向蒋说:"现在蒙古虽然仍是沿袭王公制度,但我想向民主进步方面做,以适应时代的精神。"蒋说:"蒙古的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只要有民主精神就行。"谈至此,我们就一齐告辞。

继而蒋又分别接见李守信、吴鹤龄和乌古廷。吴鹤龄见蒋时,也曾要求"内蒙自治",蒋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做了日本的官,现在还没有下文,国民参政会有人对你们反对得很厉害,你们还要求自治呢?内蒙是蒙汉杂居的地方,你们自治,把汉人都撵出去吗?"超苦拔都尔见蒋时,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因和他有同学关系,特别关照他说:"见到委员长时,千万不要说'蒙古独立',因为前次德王见委员长时,曾说过'谋求蒙古独立'之言,我在一旁侍立,看到委员长很不高兴的样子。蒋委员长嘱我转告你,关于德王的处境,他是谅解的,但是现在有人对德王很不谅解,你要好好地劝劝,今后最好保持缄默,忍耐一时,徐图未来。不要老唱高调,喊叫什么'蒙古高度自治',给人以不良印象,自绝政治前途。至于德王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前途问题,蒋说他一定随时照顾,叫他放心。"

我见蒋后又分别到各方活动,曾经拜访过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诚、外交部长王士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委员陈果夫、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程潜等,无非谈些蒙旗情况。记得程潜对我说:"你们不得已留在沦陷区,是可以原谅的。对于从抗战后方跑到敌人那里当汉奸的汪精卫之流,是不能饶恕的。"吴铁城还设宴招待我们,在宴席间他曾说过:"你们对抗战虽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消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鹤龄见蒋后,就忙着组织"蒙古宣导团",请商震转呈蒋介石核示,并征询我的意见,请我担任"宣导团主任"。我无心就任这个职务,就对他说:"你干吧,我不干。"嗣后我去拜访商震,商震对我说:"蒋委员长现去西昌巡视,我曾和张治中商量,给蒋委员长去电报,请示给你蒙旗宣抚的名义,当接来电,答复暂缓。"商将来往电报给我看,我见蒋答复他的电报中,给吴鹤龄和乌古廷各50万法币,并有令我等返平等语。蒋从西昌返后,又叫商震转告我,催促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返平,叫我留下,还有要紧的话说。于是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就相继返平,我暂留重庆等候见蒋。经几次催促商震转蒋约期见我,总是推说有事,一再延缓。嗣楚明善由外蒙古返回,向蒋报告监督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经过,便中向蒋建议,每月给我补助生活费50万元,蒋当即批准,并表示叫我回北平,于是才约我再次见面。这次见蒋时,他突然问我:"你马上就想内蒙独立吗?"接着他又自己改口说:"你马上要想内蒙自治吗?"我委婉地对他说:"现在外蒙已经独立,对于内蒙问题,总要有个办法才好,希望委员长

指示。”他答应我说：“俟把共产党解决了，蒙古的事情好办。”从此我认为要求“内蒙高度自治”问题，已归无望，在重庆不再活动，白天游山逛景，晚间观看电影戏剧，以消磨时光，又在重庆悠闲自在地逗留一个时期，才偕同超苦拔都尔、包登道尔吉、郭木布札布等回北平。

我返平后，约有两个多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立夫给我和李守信、吴鹤龄及北平市长熊斌来电谓：“奉总裁谕，对于在伪蒙疆政府的蒙籍官员，一律不咎既往，并予尽量安置，量才使用。”曾在伪蒙疆政府当过“内政部长”的丁其昌，从李守信处看到这个电报，认为自己是汉人，过去与国民党政府又无联络，当不在既往不咎之列，恐怕治以汉奸之罪，并且看到已把当过伪蒙疆政府“产业部长”的杜运宇（汉族）逮捕，丁其昌即于1946年旧历正月初一，用手枪自击头部身死。丁其昌这个人把国民党政府的法令看得太严重了，假如他不自杀，有我和李守信居中说情，是不会治以汉奸之罪的。

1945年冬，蒋介石到北平视察，我想去见他，派超苦巴都尔先去联络，回来报告我说，蒋介石很忙，无暇接见。但蒋却把李守信找去，面令速到东北，招集旧部，募集新兵，尽量扩充武装，配合“剿共”。对我又不好意思太冷淡，特派他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到我的住所访问。曹对我说：“蒋委员长一向主张内蒙可以实行高度自治，预备将来收复外蒙。”这年10月间，国共进行谈判，缔结双十协定，1946年春又成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听到有马歇尔建议把张家口划归八路军之说。我即电蒋，提出张家口与蒙旗关系密切，为西北重镇交通枢纽，地势重要，不应叫八路“盘据”，应从速收复，值此谈判之际，务请注意及此。蒋复电夸奖我“公忠体国”。我的秘书色登道尔吉看到这个电报，很欢喜地对我说：“你看！蒋委员长对你很奖励哪。”

1947年蒋又来平，我去见他，特为杜运宇求情说：“委员长既然对我原谅，对于在蒙疆工作过的无论蒙汉人，亦请给予不咎既往的宽容。曾在蒙疆政府当过部长的杜运宇，尚在监狱管理之中，希望予以释放。”蒋答复说：“可以，只要他不当共产党，准予释放。”果然为时不久，杜运宇就被释放出狱了。

1948年秋，辽沈解放，蒋介石特来北平布置军事，企图做最后的挣扎。我去见他，试探地谈到’内蒙高度自治”问题，他很颓丧地说：“如果共产党不灭，民族也没有了，国家也没有了。”我也就附和着说：“现在是戡乱要紧。”接着他又问我说：“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困难可尽量向我说，我当设法解决。”他的意思是要给我一些钱。我说：“没有什么困难。”他又问我说：“你想到南京去吗？你想到杭州去玩玩吗？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我说：“没什么话可说。”就告辞而去，这是我在北平期间和蒋最后见的一面。

在这一时期，我和傅作义也有过接触。我初到北平时他曾经来过信，我到重庆后又给我去过电报，希望我督导伪蒙军队和蒙旗地方力量，协助他安定地方。1946年，我听说他到北平，就给他打电话表示要去看他，他说他要来看我。当他来到我的住所时，我谈到在五原战役前夕，想以赴前线慰问军队为名，借机出走的一段经过。他问我说：“五原战役后，我把被俘的刘大光放回去见你，并嘱咐他好些话向你说，他没有见到你吗？”我说：“没有。”接着他又问我说：“听说你在蒙疆政府时期，反对念汉文，有此

事吗?”我说:“那时纯蒙地区的小学念日文或汉文我都反对,因为恐怕年龄幼小的学生,同时学习三种文字负担不了,所以只准念蒙文。”继而我请求他释放尚在管押的胡格金台(曾任伪巴彦塔拉盟总务处长),他说:“这事好办,我回去说说好了。”我又说:“有机会我想去绥远看看。”他说:“欢迎你去。”他回绥远后不久,就来电说已把胡格金台释放了。以后傅还派王任之来请我到张家口去居住,我恐怕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下,身不由己,没有表示意见。傅还派“张垣绥靖公署”驻平办事处处长李腾九给我送来五万元。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后,楚溪春对我说:“傅总司令很忙,没有时间来看你,很以为歉,叫我代他向你致意。”我和傅作义虽然发生多次的矛盾,存有成见,但当时我却希望他“剿共”成功。这说明我反动到了极点,只要傅作义反共,我就可以消除成见,表示赞同。

当北平局势紧张时,华北“剿总”交际处长李腾九由超苦拔都尔领来见我说:“傅总司令早想和你谈谈,总因事忙抽不出时间来,特派我来看看你。北平局势现已日趋紧张,你打算到南方去吗?依我看大局业已如此,往南方去没有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愿意离开蒙古地方和民众到南方去,愿意到蒙旗去活动,但是现在张家口已经去不成,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说:“我把你的意思转达上去。”过了一二天,他又来见我说:“你既然打算到蒙旗去,最好由我们备一架飞机把你先送到绥远去,但明着走还不相当,应当改换衣着或穿军装去。”我说:“容我考虑考虑再说。”这次李腾九和我会谈,是含糊其辞的,究竟是什么用意,我也弄不清楚。

二、我和蒙旗人士的接触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部盟旗在苏、蒙军的支持下,在王爷庙(乌兰浩特)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因苏、蒙有过须向中国政府请求许可的嘱告,特派玛尼巴达拉、桑杰札布等五代表前来北平,向国民党政府请求许可“东蒙自治”,北平行营当优予招待。军统特务梁芝祥见到玛尼巴达拉更是如获至宝,整日不离左右。适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平,当即由梁芝祥介绍玛与戴笠见面。玛和戴笠见面后曾对我说:“我和戴笠会谈结果很好,他说他一定向蒋委员长报告,并说蒋委员长是国际上的伟大人物,只要你们拥护中央,进行反共,我想东蒙自治是好办的,可能获得蒋委员长的许可。”戴笠返回南京时即因飞机失事丧命。后来郑介民来平参与军统执行部工作,又经梁芝祥介绍玛尼巴达拉与郑见面,所谈内容如何我不知其详。但不久听说玛尼巴达拉曾接受梁芝祥的拉拢,军统所派的特务人员携带电台随他前往王爷庙秘密进行特务工作。嗣伍如恭格从王爷庙来平,带来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给玛尼巴达拉的密信,伍如恭格曾在伪蒙政府工作过,所以先把这封密信交给我看,记得内容大意是:“我等已和中国共产党内蒙负责人乌兰夫在赤峰见面了。希不要再和国民党政府方面请求许可东蒙自治,从速返回。”当玛尼巴达拉返回王爷庙的前夕,我曾先往看他,就住在招待他的屋中。次日临行之前,他特别嘱咐他的一行人员说:“那个中医大夫和他所带的必须随同我们一同走。”据我推断,这个中医大夫和所谓他所带的,可能就是军统所派的特务人员和电台。

玛尼巴达拉在北平期间，也曾表示请我到王爷庙去，共同致力蒙古自治事业。我答复他说："我需要观看一下局势变化再说，如果将来我去时，在博彦满都之下当一个部长就行了，不要为我的地位问题费考虑。"玛当即指示他的随从人员说："快把这一段话记下，这一段话很重要。"他和我谈到恢复百灵庙"蒙政会"问题时说："吴鹤龄前来看我，说国民党×中全会上有过许可内蒙自治之议，我们正可趁此机会向中央请求恢复百灵庙蒙政会。可是我们这位德王爷连这个都不愿意做，不知他想干什么。这可不是我传闲话，是提醒你的注意。"的确吴鹤龄对我有过这个建议，但我认为"蒙政会"既是过去的事情，又是地方性质的自治，不能满足我的政治欲望。因我当时一心想进行"高度自治"，对于恢复"蒙政会"工作，已不感兴趣。

1945年冬，国民党察哈尔蒙旗党部主任特派员于绍文，为了报销领到的大宗党费和进行"策反"① 活动，请我介绍锡盟十旗的国民党书记长的人选。我为了安置在我处居住的赋闲人员，以减少我对他们的供应负担，并从中拉拢蒙旗力量以供我的驱使利用，就给他开了一个名单，计介绍丹巴色楞为西阿嘎旗书记长，道尔吉色楞为西苏尼特旗书记长，还有根柱、色登道尔吉等。于绍文令他们深入蒙旗活动，其中有的人怕被八路军抓住，不敢前往，就在北平张家口两地鬼混，按月领薪。例如色登道尔吉和道尔吉色楞二人，不仅连谎报情况虚应故事都不做，与于绍文也不大亲近，后被解除了书记长的职务。惟有丹巴色楞很会应付，有一次说是要深入蒙旗，进行"策反"活动，实际上到大同绕了一个圈子而回，捏报一些情况，骗领国民党党费，居然得到赞许，把他调任为西苏尼特旗的书记长。并因他惯会奔走钻营，捏造情报，自我吹捧，还得到"张垣绥靖公署"的青睐。有一次他到北平见我，说是"张垣绥靖公署"要给他一个上校保安队长，并说只要我表示同意出名保荐就无问题。我因为有我的想法，没有答应，他对我很不满意。

约在1946年春，东阿巴嘎旗札萨克补达巴拉派旺吉勒巴睦到平见我，并找札奇斯钦说："补王已和外蒙取得联系并接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使命，调查国民党这方面的情形。因此，特叫我来报告你，并叫我询问你这方面是否有办法？"我告诉他说："要求内蒙高度自治，或有可能。但现在不宜乱动，应静待时机的到来，务要回去嘱告补王，目前不要盲目行动。"不意在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迁至贝子庙（锡林浩特）时，布里雅特部落总管仁亲多尔济组织反动武装，企图扰乱锡林浩特的安全，东苏尼特旗协理仲乃与仁亲也有勾结。这时补达巴拉不听我的嘱告，竟与仁亲勾结起来，进行反动活动。为时不久，这一股反动武装，就被当地人民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所平定，补达巴拉被捕，仲乃后来畏罪自杀。仁亲率领残部逃至多伦，自居是锡盟代表，经由张家口到达北平，勾结军统特务马汉三，积极进行反动活动，并用剥削布里雅特部落人民的血汗所得来的金钱，买了一辆吉普车。我从张家口带来的亲卫队百余人，因给养无着，就拨归仁亲统带。但这一百多人把枪交给仁亲后，就零星逃散，有的回了乌盟老家，有的流浪在土木尔台一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些人的暴乱，虽然不完全由于我的策动，却受到我投靠国民党走向反动道路的影响，我是不能逃脱罪责

---

① 1945年、苏蒙联军从日本军手内解放了察哈尔各蒙旗，其后即移交给晋察北边区政府统辖。

的。

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西苏尼特旗的梅伦佐领帕克巴在国民党特务人员刘铁夫的指使下，策动旗保安队排长根敦拉出士兵三十多人到了土木尔台，梅伦嘎拉桑端都布也跟着跑出来。帕克巴和嘎拉桑端都布二人经由张家口前往北平见我，述说策动保安队的经过，并说阿拉坦瓦齐尔（我的侄子）对我不忠实，投降八路军，当了西苏尼特旗的旗长。我对他们说："我旗在八路军进入的情况下，阿拉坦瓦齐尔那样做就对了。"接着我又对嘎拉桑端都布说："你不是没有策动根敦拉出保安队吗？那你还可以回到旗里去。"他们二人对我的这番话，惶惑不解，便一同返回张家口，嘎拉桑端都布返回本旗家中，帕克巴不敢回旗，便在土木尔台一带逗留。我当时并不是真的同意阿拉坦瓦齐尔投向共产党，而是不愿蒙族人为察省当局所利用。至于叫嘎拉桑端都布回旗，是希望他告知旗民，策动根敦拉出保安队之事不是我干的，以减少旗民对我的反感。

1947 年察哈尔省的汽车队到达西苏尼特旗所在地达赖隙吉庙，旗长阿拉坦瓦齐尔因为傅作义业已占领张家口，就表现动摇，随着察省汽车队跑出来，经由张家口前往北平见我，看到我毫无办法，大失所望，深感后悔。阿拉坦瓦齐尔一方面受了札奇斯钦和达格瓦齐尔的拉拢，参加"蒙古青年同盟"；另一方面因在锡盟初经解放时，曾和外蒙古有过联络，嗣又转与苏联领事馆和外蒙古联络，做争取我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我曾问过他联络苏、蒙的情形，他对我说："我与达格瓦齐尔曾到苏联领事馆去过，苏联领事馆要给我 50 元美金，我没要。"这时我虽然想投靠美帝国主义，但在人民解放军日趋胜利、国民党军日趋溃败之际，也想留一个退步，就听任阿拉坦瓦齐尔潜入蒙地，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上的工作人员秘密进行联络。后来我从阿拉善旗的拐子湖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就是由于阿拉坦瓦齐尔的引线和拉拢。

约在 1946 年冬，东苏尼特旗珠尔亥其喇嘛贡嘎到平见我和吴鹤龄，表示要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反共。吴鹤龄认为贡嘎"倾心内向"，即向北平行营反映，并领他到北平行营活动，请求发给枪械，返旗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反共。北平行营即转请国民党国防部批发武器。嗣后听说交由"张垣绥靖公署"代领转发，却没有发到贡嘎的手里，贡嘎企图组织地方反动武装之事，也就中途停止进行。

1947 年春，曾当过西乌珠穆沁旗包衣达①的胡图凌阿到平见我，表示要进行反共。军统特务梁芝祥在我处见到了他，认为是奇货可居，就介绍他与军统在北平负责人马汉三见面，又由马汉三准备飞机把他送到开鲁与李守信联络，设法进入西乌珠穆沁旗。但他到开鲁不久，解放军就解放了开鲁，把他俘虏解送到王爷庙（乌兰浩特）去。适在这时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正在王爷庙召开，参与大会的西乌珠穆沁旗的代表等不知他在搞反动勾当，念在乡谊，出名具保，内蒙古自治政府就将他释放。不意他获释后，又在多伦纠集一些民族败类，组织反动武装，准备进入西乌珠穆沁旗。当他到达东浩济特旗②时，该旗地方进步人士就听到了这个消息，惟恐对中共内蒙古党委派在该旗的工作人员补旭等不利，——因补旭等来到该旗后，帮助建立该旗人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

① 包衣达是旗级机关的小官员的职称。

② 东浩济特旗在今锡盟西乌珠穆沁旗西部一带地区。

争取团结各界人士，深得人心，——大家对补旭等安全至为关心，就劝补旭等暂离该旗，免遭不测。补旭等表示坚持工作岗位，不能随便离开。并说："如果胡图凌阿真有为蒙古之心，是可以争取过来，共同合作的。"当胡图凌阿到达该旗后，补旭等还出面与其开诚相见，劝他归向人民。但胡图凌阿在北平时既和马汉三有过联系，到达多伦后，"张垣绥靖公署"又助以枪械，因此一心反共反人民，不为补旭等劝告所动，竟指挥他所率领的反动武装，将补旭等杀害；又搜捕该旗进步人士，加以"蒙古八路"之名，杀害了数人。该旗进步人士桑嘎听说此事，躲到该旗北部，得免于难。胡图凌阿杀害补旭及地方进步人士后，凶象毕露，更加猖狂，倒行逆施，荼毒人民，强迫该旗蒙民参加他的军队，扩充反动武装力量达五百余人。内蒙古自治政府特派军队前来围剿，胡图凌阿自知力不能敌，便协迫该旗年龄尚幼的旗长米济德章楚布逃到张家口。"张垣绥靖公署"对于米济德章楚布这位"小王爷"备极礼遇，对于胡图凌阿又给以司令的头衔，并为之补充武装。于是他更加洋洋得意，又率队伍返旗，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胡图凌阿率领乌合之众到达该旗后，在乌兰哈拉克和喇嘛仓勒两地，一经与内蒙自治政府所派军队接触，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被迫退至中蒙交界地带，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解除了武装，把胡图凌阿送回西乌珠穆沁旗，受到当地人民的惩罚。迨至张家口解放，胡图凌阿之弟和该旗官员托克托胡等，带同米济德章楚布逃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去投奔我，我从托克托胡陈述中才知道这一段事情的经过。这一段事情虽不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但在该旗来说，还是一段重要史料。

三、我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

我在日本投降后就投靠了蒋介石。当时认为他既掌握大量的军队，又操纵着国家的政权，实力雄厚，不可一世，八路军绝非他的对手。同时还想请求蒋介石的恩赐，实现"内蒙高度自治"的迷梦。但又看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贪污腐败，民怨沸腾；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不愿打内战，士气十分低落。认为这样将把战事拖下去，拖来拖去，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发生。美国拥有原子武器和强大的武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有获胜利的可能。我基于以上错误的看法，就想转而投靠美国，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力量，重上政治舞台。认为美国与蒙古远隔重洋，基于"远交近攻"的观点，不会像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那样压迫控制蒙古，我可以借用美国的力量。掌握"蒙古政权"后，就可为所欲为，实现继续统治蒙古的野心。因此，就寻觅和美帝国主义拉拢的引线。

1945年冬，美国特务人员拉铁摩尔来平，因在百灵庙"蒙政会"时期，他和我就已相识，所以他到平后，即到我的住所访问，适我外出未见。后我去六国饭店访问，并对他说："你是知道蒙古事情最清楚的人，希望你在美国宣传蒙古问题。"他说："蒙古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还不知道，得慢慢地来。现在我急于到别处去，调查一宗重要事情，关于宣传蒙古问题，以后再说。"他走后曾给我来过一次英文信，我叫包国义和札奇斯钦代我写了一封英文信回复他，来往信件内容大意，仍是关于宣传蒙古问题。继我复信之后，郭木布札普等几个青年人，曾给拉铁摩尔去信，请他帮助把外蒙古问题，提到联合国去。

到了1946年冬，陶克陶介绍美国新闻处特务人员李嘉胜前来见我，请我介绍两个蒙古放青年当电务人员，到王爷庙去做秘密工作。我曾给他介绍伊国璜和王桂丛二人。伊国璜去后不久，又返回见我说："在王爷庙做破坏民族工作，实感于心有愧，不愿再做这个工作，所以返回，再不想去。"王桂丛嗣亦返回，在平居住。嗣后李嘉胜特在六国饭店请我吃饭，在未进餐前他特赠我白银镯子一只，并给我介绍陪同吃饭的美国人白智仁和司马笑二人（都是美国新闻处的特务人员，白智仁以辅仁大学的学生名义作掩护）。宴席间李嘉胜说他要到日本去，我嘱咐他如见到麦克阿瑟将军时，务要请他把"蒙古问题"提到联合国去。

札奇斯钦曾经邀我在他家中和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若斯冰见面，我向若斯冰说："现在外蒙业已独立建国，你们美国为什么还不承认呢？如果承认时，有美国使节驻在外蒙，不是可以得到一些消息吗？"她答复我说："因为马歇尔将军不愿意多一个倾向俄方的国家。"接着我请她在美国宣传"蒙古问题"，并给她写了一副蒙文对联如次："不因路远而不走，只要走就能走到；不因物重而不搬，只要搬就能搬动。"这是摘自成吉思汗语录，寓有请她注意"蒙古问题"之意。

关于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反动组织——"蒙古青年同盟"，据我所知是席振铎、贾鸿珠（纪贞甫）等组织成立的。听说起初还不愿意吸收喀喇沁人参加，但把札奇斯钦这个喀喇沁右旗人视为例外，特别吸收他参加。札奇斯钦去南京时曾给我来信，说是已和美国人进一步拉上关系。嘱我看过信后立即烧掉，没有谈到组织"蒙古青年同盟"问题。席振铎由南京来平，特给我送来法币200万元。我问这是谁的钱，他说这是我们大家伙的钱，也没有谈到"蒙古青年同盟"问题。实际上这笔款绝不是席振铎对我的慷慨资助，可能是美帝国主义通过席振铎用钱来拉拢我的。我知道"蒙古青年同盟"这个反动组织一些情况，还是道尔吉色楞告知的。道尔吉色楞在平一向就住在我的住宅，有一天晚上他回来得很迟，喝得醺醺大醉。翌晨醒来，我问他说："你昨晚到哪里去了？怎么喝醉了？"他说："昨晚我参加了'蒙古青年同盟'当了盟员，大家聚餐都以酒来向我祝贺，我一时高兴就喝醉了。"我又问他："都有哪些人参加呢？"他说："有札奇斯钦、达格瓦索尔、郭木布札布等参加。"至于其他情况，因为他是甫经参加，又未担任重要职务，不很详细知道。嗣后札奇斯钦由南京返平前来见我，才听他说："'蒙古青年同盟'是以'政治民主，经济合作'为宗旨。对于'政治民主'美国人没意见，对于'经济合作'美国大使馆的女职员若斯冰很不同意，经我详细解说才确定下来。"我虽然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但从此便和他们发生了关系，他们想捧我做招牌，我想把这个反动组织做为拥护我的政治团体，进一步和美帝国主义拉拢关系。

辽沈解放之后，北平局势渐趋紧张，美国新闻处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人员马滋来平，札奇斯钦约我在赵宝纲（补英达赖的儿子）家中与马滋见面。我说："你们美国如果愿意帮助蒙古的话，是否可以抛开蒋介石，我们直接进行联络。"他说："完全可以，我们今后就直接进行"。嗣札奇斯钦请他接洽美国飞机前来接我离开北平，马滋答说可以。他回去以后，特接洽美国飞机一架由兰州起飞到平接我，并催促我马上就走。我因一时准备不及，而这时北平局势还未到非常紧张的局面，所以没有坐这架美国飞机离平。后来吴鹤龄和我说："马滋说，他曾花了120两金子雇了一架飞机请一位空军上尉

驾驶去接德王，德王却未乘坐前来，实在辜负了他的好意"。嗣后我在阿拉善旗进行"西蒙自治"活动时，又和马滋见过面，俟撰写关于"西蒙自治"资料时，再为详细叙述。

四、由北平到南京

由于我一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企图卷土重来，再掌蒙古政权，故尔到了北平解放前夕，还不想归向人民怀抱。当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我电吴鹤龄请其洽派飞机接我。玛哈希力（赵文儒）、札拉嘎穆济（白景畬）、超苦拔都尔等知道我要走，特邀请我在东安市场"森隆"西餐馆聚餐，恳切地劝我不要走。其中以玛哈希力劝说最切，他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军已经节节败退，解放军已经节节胜利，胜败之局，已见分晓，还走干什么？我听到乌勒吉敖喜尔说过，只要你归向人民，他负责保障你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不但不为他们的恳切劝告所动，反狂妄自大地对他们说："我是一定要走的，仍搞民族事业，一定要走。你们都知道我一向是以'民族事业'为己任的人，不是计较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札拉嘎穆济见我拿出'民族事业'做挡箭牌，就说："你既然说到这个地步，我们再无话可说了。"玛哈希力也再不对我劝告。这时迪延其喇嘛也向我说："北平苏联领事馆内，有一个过去在蒙旗从事教会工作的俄国人和我早就认识，他叫我转告你不要走，共产党进城后，苏联领事馆保障你的安全。"我这时虽然一心要去，但面对局势紧张的情况，又恐飞机不来走不了，陷入北平城中，就想一个退步，备作将来回旋的余地，就对迪延其喇嘛说："你去对苏联领事馆这个人说，我是可以不走的，但如果南京派来飞机接我，我可是不能不走的。"后来，迪延其喇嘛把这个俄国人领来在嵩祝寺见我，所谈之话仍如上述。我更进一步拒绝他说："我仍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中，希望你不要到我住宅来。"到了1949年元月1日，南京才把飞机派来，我在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长何兆麟陪同之下，偕同迪延其喇嘛、副官图门德勒格尔等，在临时开辟的南苑飞机场乘上飞机直达南京。吴鹤龄和迪力瓦等特到飞机场接我，吴鹤龄对我说："为了接你来京，我特面见总统府军事局长俞济时，请其速派飞机，他因事忙，总是支吾推托，表示派遣飞机有困难。我对他一再坚请说，听说现在已经派飞机把胡适接来，难道德王还不如胡适重要吗？如果把德王丢在北平不管，为共产党所用，恐怕对于中央不利吧。俞济时听到我这番话后，才答应马上转请蒋总统派飞机赴平接你。"继而我去见蒋介石，蒋对我表示抚慰和关怀之意。

有一天席振铎领我去面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适蒋介石把司徒雷登请去商量重要事情，我仅见到了美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舒勒太斯，由席振铎当翻译，谈些有关蒙古的问题。翌日席振铎又来见我说："舒勒太斯对你的印象很好，说比蒋介石还强。"过了几天又由席振铎领我去会见了司徒雷登，我谈到要进行"蒙古独立建国"，希望美国帮助等语。司徒雷登用汉语答复我说："你的志愿很好，必然有志竟成，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报我国政府。"嗣后我在阿旗定远营搞"西蒙自治"前往广州请愿时，又到美国大使馆见舒勒太斯，他对我说："司徒雷登大使不在南京，他听说你来特用电报通知我，说

把你前次所谈的意见，已经转报我国政府。我国政府答复，承认你能代表蒙古，今后进行蒙古工作要以你为对象。你现在已经搞起自治来，我们正研究要派一个代表，驻到你们那里。”但我回到定远营之后，时局已经紧张，美国大使馆没有来得及派人来。

我在南京时，札力瓦与我常相往来，他曾表示想去印度，后来由于南京局势趋于紧张时，他忽来向我说：“不去印度，改去美国，并且马上乘坐飞机要走。”我和吉力占太即到他的住所（章嘉驻京办事处）送行。吉力占太向我建议说：“现在迪力瓦活佛就要去美国，你可以委托他当你的私人代表，以便与美国各方面进行活动，有机会时还可以晋见杜鲁门总统。”我甚表同意，就请吉力占太执笔写了一个蒙文的委托书，原文是：“兹委托迪力瓦为我的私人代表。”写好后，就盖上了我的章交给了迪力瓦，请他代表我个人与美国各方面联络。我当时想通过迪力瓦这个人，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

蒋介石由于战事失败，被迫“退休”，李宗仁代理总统，孙科组阁当了行政院长，白云梯当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为我安排了与各部首脑会见的日程，计曾见过吴铁城、朱家骅等，无非是一般的应酬联络，没有谈到什么重要问题。惟当我见到社会部谷部长正纲时，他对我说：“因为有人主和，蒋总统走了。”我说：“现在还有人主和，与共产党和得来吗？如果和的话，什么都是共产党的了。”他很赞扬我说：“你的话是非常中肯的，你的见解是至为正确的，假如人们都像你似的就对了。”

我在南京时，曾向吴鹤龄表示想去西部盟旗搞“自治”活动。吴鹤龄向我建议说：“你如果去最好在中央弄一个‘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的头衔，驻在兰州发号施令，才能得到各盟旗的重视，不要贸然就到盟旗去。”我当时没有表示可否。吴鹤龄认为我业已默许，就促动蒙古各盟旗驻京办事处处长乌云鹏去找孙科、吴铁城等活动此事，白云梯更热心帮忙。嗣后孙科设宴招待我，特约白云梯作陪，在宴席未开始前，我和孙科、白云梯在另一屋里谈话，孙科询问白云梯组织“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公署”之事，白云梯答称此事正在进行。宴会完了过后白云梯即责成蒙藏委员会的主管蒙事人员起草此案，并面令起草人员把理由说得要充分，办法要具体。嗣经我详细考虑，在此时局急剧转变时期，出任这个“长官”等于为人作嫁，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并想起在我要离开张家口去北平投靠国民党政府时，陈国潘、霍而义、郭木布札布、伍如恭格等青年职员们劝我说：“你是搞民族事业的人，何苦去当国民党的工具。”在北平居住期间，也有些蒙古族青年对我做过这样的建议。我如出任这个“长官”，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起不了什么作用，反会失掉一些蒙古族青年的信任和拥护，实属得不偿失。想到这个地方，就去面见白云梯婉言说明在此时期，没有出任这个“长官”的必要。白云梯见我如此说法，就对我说“那就算了吧”，就在“组织蒙古各盟旗自治督导长官公署起草计划案”上批以“暂缓”二字搁浅起来。因此反引起蒙藏委员会主管人员的怀疑和议论，说白云梯不同意我当这个“长官”。

我在南京期间，薛兴儒对我说立法委员中有一个刘不同，对于蒙古问题颇感兴趣，他愿介绍前来和我谈谈，我答称可以。薛兴儒就在饭馆约我和刘不同聚餐，边吃边谈。刘不同向我建议说：“你们蒙古不是建立过大元帝国吗？你现在可以进行复国运动呀。你如果愿与美国大使馆或苏联大使馆联络时，我可以为之介绍。”我这时虽然正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但对苏联也有试试看的心理，便和他说：“请你试向苏联罗申大使谈

谈关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经他联络后向我说：“罗申大使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德王想搞蒙古独立建国，殊不相当。”

为时不久，解放大军迫近浦口，南京局势顿时紧张，国民党反动政府各机关准备疏散迁移，呈现动乱状态。蒙藏委员会当局想把我送到青海塔尔寺居住。但我这时认为国民党军队已退守西南一隅，无暇顾及“蒙古问题”，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西部盟旗，正好趁此机会，进行“西蒙自治”，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分庭抗礼，便向蒙藏委员会当局表示不愿到青海去，愿到阿拉善旗居住。经征得阿旗札萨克达理札雅（达王）的同意，就乘坐飞机到了定远营（巴音浩特），纠集我的旧部李守信、德古来、吴鹤龄、乌古廷、札奇斯钦等，联络国民党政府的旧军政人员达王、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进行组织所谓“蒙古自治政府”。这个“政府”甫经成立后，西北局势又趋紧张，札奇斯钦急于要去美国，请我给他一张盖有这个“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以备应用。因为札奇斯钦是我信任的旧部，又知道他与美国关系搞得很好，就毫不犹豫地给他盖有这个“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一张，请他相机行事。这是因为我具有崇美思想，妄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捞一把，实现我的政治野心。

（1965 年）

德王、李守信部队接受解放的经过

陶 布 新*

1949年1月间，我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职，嗣因解放军追临浦口，南京局势顿形紧张，国民政府所属各院部分别迁往广州、桂林等地，我也随同蒙藏委员会一部分职员到了桂林。在初到桂林的几个月期间，因为家属远在北平，只身流落南方，我的心情很是苦闷、不安。仍然追随国民党政府流亡吧，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全国解放在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家属团聚，也许终身要过流亡生活；蹲在桂林等待接受解放吧，又顾虑个人的安全。踌躇徘徊，无所适从。但是为时不久，解放大军胜利渡江，南京、上海一带相继解放，广西、湖南等地也在酝酿和平，国共隔江而治的幻想已成泡影。在这战局急剧变化之时，我从一个湖北籍的同仁（忘其姓名）处，看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两本书，对共产党的政策纲领有了初步了解；同时从广播中听到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这才减轻了我对个人安全的顾虑，作接受解放的打算。

到了当年6月初，忽然接到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给我来的一封电报，邀我速到广州，并附寄银洋24元作旅费。我接到德王电报后，即搭乘飞机赶赴广州，到凤凰大酒店面见德王。德王说："我这次来广州是要求当局许可蒙古自治，很感左右无人，所以特邀你前来，帮我办理文书工作。你是跟我多年的人，想是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吧?"我因与德王有过多年的部属关系，并感蜗居桂林，至为无聊，也就听从他的分派，当即走马上任，作了他的随从秘书。当天晚上，他的随从人员都到街上闲逛，只有德王和我在屋，我就向德王建议说："现在进行蒙古自治，从全国大环境上说，共产党已占领中国大部，正在胜利进军；国民党退处西南一隅，已入垂危之途。我们向国民党要求自治，即使许可了，也是无济于事。从西北小环境上说，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盘踞，统治甚严，是否允许我们进行自治也是问题。依我之见，莫如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路线，派代表前往北平接洽为宜。"德王回答说："现在二马方面业已说通，表示不干涉我们进行自治活动。国民党中央方面，我是尽力要求，无论许可与否，我们决然要搞自治。只要搞起了自治，有了政府组织，就有办法。那时即便共产党来了，我们也可组织流亡政府，等待苏美冲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时美国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我们是为了蒙古民族。谁对蒙古好，我们就跟谁合作。据我所知，美国对蒙古的政策是主张内外蒙古统一，建立大蒙古国，所以我们应当与美国合作。"我又对他说："依您的打算，是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到蒙古地方搞自治；一条路，如果自治搞

---

* 作者时任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秘书。

不成，就周游列国，宣传自治。具体说，也就是把蒙古自治问题，寄托在美国身上，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究竟能否爆发呢？什么时候爆发？就是爆发了究竟谁胜谁负？从实力上讲，美国比苏联较强；从主义上讲，苏联比美国进步，很难预断美国必胜。如果美国败了，您将终身流亡国外不能回到蒙古地方，还谈什么自治呢？我看还是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路线，接洽自治问题，较为合乎现实情况。”德王说：“那样也是一条路，我们回到定远营再考虑吧！”

这时李守信、吴鹤龄等已由台湾来到广州，帮助德王与国民党中央军政当局接洽。我在居所从事办理文书和信件。经他们奔走联络，得到的结果是：行政院长阎锡山严词不许自治，副院长朱家骅默许自治，并允许补助经费1万元，加拿大手枪50支，海军司令桂永清允予发给旧式步枪200支。到了6月中旬，德王托赵雁川留在广州办理请领和押运加拿大手枪，把未了事宜交由吴鹤龄续洽办。德王偕同李守信等20余人携带步枪50支和领到的银洋约1万元，由广州飞经重庆、汉中，抵达兰州，从兰州改乘汽车经由银川来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德、李在汉中、兰州、银川停留时，曾受到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招待，并分别会谈，所谈内容无非是请其支援蒙古自治，增加“戡乱”力量，共同保卫西北等语。

当“蒙古自治政府”在定远营正式成立之后，我被任为“内务署”副署长兼“蒙古议会”秘书长，仍然兼德王秘书。阿拉善旗和平解放之前，德、李又率部属流窜阿旗沙漠腹地改组“政府”时，我又被任为“教育署”署长。嗣又派我充任代表，往返定远营、银川、牧区之间三次，从事接洽和平解放工作。因此，德、李部队流窜阿旗情形，是我亲所目睹；德、李部队投诚经过，也是我亲身经历。为了能把这段经过完整详实地介绍出来，除根据我个人的回忆之外，还访问了当时参与其事的孙鸣海（解放后曾任巴盟公署交通局副局长）、汪亲扎布（解放后曾任阿旗第一中学总务主任）、达希敦都布（解放后曾任阿旗政协驻会委员）、吉致祥（解放后曾在巴音浩特居住）等，加以补充、核实。只是事件经过已久，当时又很少有文字记载，所写的这个回忆资料，难免有不详尽和谬误之处，希望知其事者，予以补充、纠正为盼。

德、李部队流窜阿旗时期，时走时停，到处滋扰。但以在图克木庙、西沙尔札庙、拐子湖三地盘踞时间较长，活动较多。为了叙述方便，特把这段经过，分成为在图克木庙、西沙尔札庙、拐子湖三阶段加以叙述。

一、在图克木一带流窜情形和第一次接洽投诚经过

德王、李守信等由广州来到定远营后，既收罗了一部分旧属和部队，又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资助与默许，于是就联合达理扎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1949年于7月8日召开了“蒙古人民代表大会”，7月15日宣告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在“政府”成立后，我曾敦促德王派遣代表前赴北平接洽，德王也表示要派白海风和我做代表前往。但是为时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向西北进军，很快就解放了兰州和宁夏，局势紧张，日甚一日。这个消息传到定远营后，“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就发生了分裂：以“副主席”达理扎雅为首等一部分人，决定留在定远营接受解放；以“主席”德王为首

的一部分人准备出走。在德王没有出走之前，我曾劝他与达王紧密合作，留在定远营主持军政大计：一方面派人到牧区收拢部队，作为政治资本；一方面派代表赴兰州、北平等地进行和谈，前途尚有可为。如要轻易出走，就会重蹈在日本投降时由张家口盲目出走的覆辙。德王说："我们还是到草地看看情势的变化，共产党对蒙政策如何再说。眼下我们还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经由阿旗草地，通过青海、西藏进入印度，转往台湾，再到国外流亡、宣传蒙古自治运动，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第二条路是和外蒙接洽。对外蒙，我过去曾有过联络，现在还有阿公（德王的侄子，名叫阿拉坦敖其尔）和雄王两个人在进行接洽。外蒙是蒙古人，我们也是蒙古人，遇难相求，是会念在同族，收容或者帮助我们的。"我又对他说："据我看，南进是死路。因为现在西北既然解放，各处要路必然派兵把守。凭我们这一点力量，很难通过。北上外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内蒙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我们是内蒙的人，中国内部问题，应当前往北平接洽解决，和外蒙接洽是解决不了的。并且我们的家属都在北平，无人照顾，扔下一走，也觉于心不忍。我是不打算走的。"德王又说："我看你还是跟我一同走。我们和达副主席等人不同。他们仅和国民党有关系，没有和日本人合作过，是可能得到宽恕的。我们既和日本人合作过，现在又同国民党打交道，深恐得不到饶恕。你跟我 10 余年之久，现在处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更应患难与共，一同出走。你如缺乏骑乘马匹，我可叫图副官（名叫图门德勒格尔）设法解决。"我看他已决心出走，再劝也是无用，遂即辞出。

9 月 20 日晨，德王即带着敖木巴图尔、达格瓦齐尔、赵宝刚等三十余人离开定远营向阿旗西北出走。21 日又派图门德勒格尔副官带着骆驼、马匹来接我和徐实斋。徐因年迈，骑上骆驼被摔下来，只好留下。当时我虽然愿意走和平解放这条路，但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尚不十分清楚，也有到牧区隐蔽一个时期看看局势变化的心理。我还很感激德王殷意拳拳地劝我走，又派图副官带着骑乘来接我，对我个人安全这样关怀！我与德王有过多年的部属关系，在此穷途末路时期，一旦脱离，也觉对不住德王，因此就于 21 日随同图副官一同出走牧区，寻机劝说德王走回头路。记得当天到了库列图，就与德王相遇。22 日晚住到贡胡都克，23 日晚住到那干套里。我和汪亲扎布在帐房内与德王谈话，敖木巴图尔突然进来说："依我的意见，我们暂不必走，在此等候李总司令（指李守信）等带领部队前来会合后，抽调一部分强壮队伍，直驱定远营，夺取电台和装备给养，并把达副主席强制请来，利用他的名义号召阿旗牧区人民供应给养，再向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及世界各国发出通电，呼吁支援蒙古自治运动，要干就大张旗鼓地干一下，比这无声无息地悄悄出走为佳。"德王当时未加可否。待到敖木巴图尔出去后，我向德王说："我们来到阿旗数月，阿旗待如上宾，可谓不薄，临走时还要抢掠定远营，实感对不住人家。并且定远营也驻有阿旗保安队，驻在银川的解放军几小时就能开到。如果我们派兵前往夺取电台、给养等，很可能与阿旗保安队发生冲突，或者有被解放军包围歼灭的危险，应当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德王说："达副主席倒是一个有血性很爽快的人。但是可惜太无政治雄心，愿做顺民。强迫请来参加，也是于事无补。现在我这一出走，可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由他们去说吧，我不计较这些。现在部队尚未到来，等到图克木再说吧。"翌日就继续向前进发，约在 9 月底到了图克木庙，就暂时停留下来。

到达图克木庙以后，德王就偕同达格瓦齐尔、赵宝刚等前往国境线上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会谈，去了三天才回来。我向他询问接洽经过，他对我说："这次到边境上会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少将，谈吐很好，足见外蒙建国后比从前进步了。据这个人说，这次来本打算叫我的儿子都嘎尔苏隆一同前来和我见面。只因飞机仓促起飞，没有来得及一同前来。"一面说着，一面掏出带回来的外蒙纸烟，让我吸食。我又问商谈的情况，他含糊其辞地说："商谈结果甚好。答应帮助我们，对我个人也很尊重。"接着就临时组织了"主席行辕"，派吉利占太为"总务处长"。吉利占太就任总务处长后，就把当地巴格达叫来，令其征用牛羊、粮食等物。为时不久，吉致祥用阿旗政府借给的80峰骆驼，驮运粮食赶到。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图尔、孙鸣海等率同新编骑一旅1000余人，由陶乐县到达磴口渡过黄河，经由阿旗草地前来图克木与德王会合在一处。

德、李等会合后，就着手改组"政府"、编制军队。"政府"改组的结果是，仍由德王任主席，并给达理扎雅保留副主席的位置。因秘书长巴文峻、内务署长何兆麟、实业署长白海风留在定远营未来，教育署长林庆僧格回了中公旗，财务署长吴熙宪逃往广州，乃改任吉致祥为秘书长，阿由尔扎那为内务署长，汪亲扎布为财政署副署长，贺华儒为实业署长，陶布新为教育署长。蒙古议会由议员海福泉代理议长职务，新任张世杰为议会秘书长，军事方面，重新组织"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兼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宝贵廷任总参谋长，都固仍仓（即白广信）为副参谋长，下设副官、参谋、军需、政工、军法等处。把骑一旅和锡察零散部队整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苏和巴图尔，副师长孙鸣海，参谋长赵殿臣，师下分编二个团：第一团团长萨伯音，第二团团长撒嘎拉；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副师长塔拉巴，参谋长拉西那木济勒，师下也分编二个团：第一团团长罗布僧巴克希格根，第二团团长翁盖。两个师共约一千多人。为了表明与国民党政府没有关系，显示蒙古的特征，不用中华民国的旗章和纪年，恢复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期所用的旗章，改用成吉思汗纪年，俨然又把伪蒙疆政府这个死魂灵复活。改组"政府"和整编军队初步就绪之后，就召集文武官员及全体士兵在图克木庙东边开会。德王在台上训话，首先宣布"蒙古自治政府"的改组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以及各师团长的名单；继而强调要继续进行蒙古自治运动，打开民族出路；最后号召大家坚固团结，克服困难。德王训话完毕，会议就告结束。这支部队形同土匪。他们四出争抢当地牧民的骆驼、粮食、牛羊、衣服、器皿等物品。特别是一些官兵强奸妇女和杀戮牲畜，糟害粮物，更引起当地牧民的痛恨！例如：在抢夺骆驼和马匹时，如驼马四散奔跑，就用枪打死；抢掠人民的粮食喂马，任其撒落满地；把驼运所用的草蓆子割破喂马等等。住在这一带的牧民实在不堪其扰，一部分人逃往蒙古族人民共和国境内，大多数逃往沙窝和山区中躲避。但因德、李部队多系蒙古族人，既通晓民族语言，又惯于草地生活，无论牧民躲到哪里，也能追踪赶到，翻箱倒柜，乱行抢掠。稍不随意，非打即骂。我听到这种情形，就向德王说："部队这样乱抢乱夺，不仅会失掉民心，对你的名声也不好，牧民都说这是德王的军队。这样下去，必将引起牧民的反抗，必须设法约束部队。"德王不胜感慨地说："我德某人从事蒙古民族复兴工作多年，虽然在蒙古民众中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但自信也没有什么坏的印象。这次到阿旗来，部队纪律这样坏，恐怕对我就只有坏印象了！"我还将这个意见向李守信说了。李大发牢

骚说："我是拉竿（东北土语，即当土匪）出身。拉竿还讲义气，还有纪律。这个部队真比土匪都难带。到处乱抢，约束也不听这样下去，怎能存在得住！"嗣即由德、李等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征用给养、约束部队、收拢人心的办法。认为在目前缺乏粮食的情况下，也只有向当地人民征用。但是部队出去征用时，必须配属政治人员，向牧民说明部队的艰苦情况，不得已征而用给养的苦衷，以取得牧民的谅解。并且在征用时，要给牧民留下可资糊口的粮食，并且征用多少，要开给借用证，将来照数还清。当即组织统筹给养委员会，由汪亲扎布任主任委员。但因政治工作人员太少，部队居住又极分散，无法统筹解决，部队仍然外出抢掠。这时部队官兵对德王、李守信等人也是怨声载道。有的说，把我们领到这个沙漠草地来，人无粮食，马无草料，怎样维持下去？早知如此，就不跟他们到这里来了。也有的说，我们冒险出外抢，他们坐在家里吃，还说这说那，难道等着饿死吗？德、李等人也只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了。

德、李部队在图克木盘踞期间，有些人认为，此地有新绥公路通向绥远，如果绥远一旦解放，军队很快就能开到，实非安全之地。德王曾对人这样说过："这条路倒不要紧。据我所知，驻在包头的部队有刘万春所部约 3 万人，鄂友三骑兵旅约 7000 人。他们二人未必愿意投降共产党；就是勉强接受解放，也未必派兵来打我们。我们如与刘、鄂等进行联系，还有共同合作，壮大声势的可能。"德王曾有联络刘、鄂的意图，只因摸不清当时绥远包头一带的情况，又无适当的人前往联系，方才作罢。当时德王虽对绥远这一条路不做戒备，却很关心通往乌盟中公旗这一条路。因为当时听说乌勒吉敖喜尔率领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乌盟一带驻防，深恐前来围攻，曾派汪亲扎布代表前往联系做缓冲，只因道路不熟，未能前往。乃又派人联络乌盟盟长兼中公旗札萨克林庆僧格和他合作。林鉴于大势已去，未为所动，只送给德王全副鞍辔的走马一匹和一顶帐房了事。对于图克木通往定远营和银川这条路，德王更是担心，深恐驻在宁夏的解放军和阿旗保安队配合前来围剿。因此，不敢在图克木久停，计划向巴伦沙尔札移动。

适在这个时候，达理扎雅派洛不登、包国栋二人前来图克木送达文件，并说兰州彭德怀司令员和宁夏解放军同意同德王商谈和平解放问题，希速派员前往。但因当时虽有南进找国民党、北上归向外蒙、东去接受解放的三种主张，而以南进一派主张最占上风。深恐洛不登等前来传达商洽和平解放问题，动摇军心，就把洛不登、包国栋二人软禁起来，不叫与部队接触。这事为我所闻，就向德王建议说："两国交兵，尚不斩来使，何况洛、包二人曾是和我们共过事的人。这次冒险前来送信件，传达宁夏方面的意见，竟把人家软禁起来，殊觉不当。依我意见，应当立即解除监禁，恢复自由，并考虑派代表前往商谈和平接受解放的问题。"德王和李守信、宝贵廷等商量后，决定派我为代表，并将洛、包二人解除了软禁，准备和我一起回定远营进行商谈。我即依照德王的意旨，草拟致宁夏省方面的函件，内中首先说明"蒙古自治政府"是蒙古民族选出的自治机关，不是国民党的附属品，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其次是说明德王从事"自治运动"有年，是一个熟悉蒙古情形、体察蒙民愿望的有资望的人，并非国民党政府的官吏。最后提出几点意见：第一，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第二，要求统一东西蒙古。我拟好函件初稿之后，就送请德王核阅，并说："我们在函件中既要求统一东西蒙古，又要求承认统辖西蒙的蒙古自治政府，这是自相矛盾。既是商谈和平，接受解放，当然就

要涉及部队改编问题，不先谈判这个具体问题，仅谈东西蒙古统一和要求承认自治政府的问题，双方距离太远，我这个代表不好当，应当再做修改和补充。”德王说：“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是先决问题。这个承认了，才能谈到其他问题。现在大家主张南进找国民党，反对东去接受解放。你如果主张接受解放，会有生命危险。你还是先去宁夏，看对方如何答复。宁夏方面如果解决不了，你可去兰州见彭德怀。如再解决不了，也可去北京见毛主席。你还是尽快走吧，我们明天就率领部队前往巴伦沙尔扎。”我又向他要求说：“既然派我当代表前往宁夏，你们就应当等候我回来。否则我当代表和人家接洽，你们率队向西转南逃跑，我还代表谁？那我就成为你们缓冲的牺牲品了！”他又对我说：“你去吧。我们到沙尔札庙等你，也许再向西或南移动。你如交涉不成，就随后赶我。”并又嘱咐我只谈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问题，不要谈他个人出路问题。随即召集李守信、宝贵廷、吉致祥等研究讨论商谈函件，他们均表同意。

经过这次和德王谈话之后，我觉察德王并无接受解放的诚意，所以派我当代表去商谈，是怕宁夏方面派兵围剿，把我当做缓兵之计的牺牲品。当时，我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仍欣然接受了商谈任务，是因为我认识到再不能跟德王走死路，就是德王部队不愿和平解放，我个人也要接受解放归向人民。于是就在当年10月下旬，带着我的族侄陶世昌，随同洛不登、包国栋等一同到了定远营，面见达理扎雅。达对我说：“现在彭总司令派张钦武前来，宁夏军政方面也给我有信，嘱我协助争取德王、李守信部队归向人民。你当代表前来很好，赶快去银川商谈吧。”达即派张钦武、戚涛、罗昇平三人陪同我前往银川。张钦武曾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率队起义之后，面见彭总司令和政委张宗逊，嘱咐我到阿旗做争取德王和他的部队的工作。彭、张等领导人还说，德王过去投靠日本，组织伪蒙疆政府，已经成了人民的敌人；只要今后不再与人民为敌，投向人民的怀抱，过去的事可以谅解，不再深究。”我们到了银川以后，由省委统战部长王志强、军管会联络部长甄华等领导人出面接待。翌日，潘自力主席、孙殿才副主席、曹又参副司令员等军政首长在宁夏省人民政府接见了我。我即将带来的函件送上，并在口头上又作了些说明。潘主席答复说：“德先生所要求之事，较为复杂，牵涉面很多。我们希望德先生亲自前来面谈。请你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德先生。”曹玉参副司令员说：“我们对德先生是宽大为怀，特请他前来面谈。如仍执迷不悟，继续扰害阿旗人民，我们即将派兵围剿。”阿旗代表戚涛说：“现在德、李部队扰害阿旗人民甚烈。阿旗政府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准备调动保安队及民兵抵抗。希望省政府从速解决此事，否则难免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谈话之后，把我安置在达理札雅在银川的住宅，招待至为周到。王志强部长时来看望，殷切垂询我还有什么意见，德、李等人还有什么顾虑？我即对王志强部长说：“德王等所考虑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民族的出路；一是个人的安全。关于民族出路问题，我已经在首长们接见时都说了，不必重复再说。关于个人安全问题，无论是德、李等首脑人物，或是部队中的一般员兵，都有一定的顾虑。德王曾和我说：‘像我这个有点名声的蒙族人士在毛主席那里，或者能够得到宽大；但在内蒙就恐怕得不到饶恕。听说已经宣布我为战犯。’”王志强部长当即对我说：“党中央并未宣布德先生为战犯。内蒙公布与否我不详细知道。别说未曾公布，即便公布为战犯，如若不再战，投向人民，就不是战犯。例如傅作义就曾是主要战犯。但自放下武

器，归向人民之后，不但不是战犯，还予以适当的位置。希转告德先生不要以此为虑。”我又谈了部队里的思想情况。我说：“德、李部队是从东北逃到西北来。一路抢掠烧杀，造下很大罪恶，因此顾虑重重。深恐投诚之后，即便党和政府不咎既往，宽大处理，但恐被害人民起而告发，仍然究办。”王志强部长答复说：“德、李部队归向人民以后，如被害人民起而告发，党和政府可以向人民解释。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一经负责解释，人民会宽恕的。”宁夏军管会的联络部长甄华也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初到张家口时期，曾把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这个大汉奸枪决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敌我对垒时期，斗争激烈，当然对敌政策从严。现在全国已经面临解放，需要确立安宁秩序，反动派无论跑到哪里，也逃不出人民之手，所以从宽。”同时我也看到：宁夏解放后，旧政府官员均都妥善安置，待之至为宽大。我深以王、甄二位部长所述为然。在银川住了三天，就带着潘自力主席回复的信件和赠送的礼品，回到定远营。后由阿旗政府发给护照派人带路，备好乘驼，护送我前往巴伦沙尔札庙。

二、在沙尔札一带流窜情况与第二次接洽投诚经过

我由定远营经由图克木到巴伦沙尔札途中，经过几个村落，均是寂无一人，住家门窗多被损坏，食物抛落满地，许多陶瓷器皿砸成碎片。我们一行三人进入图克木山中，才遇到一些牧民。我向他们说明，我是商谈和平的代表，他们才消除敌意，并希望早日和平，把被抢去的骆驼归还他们。大约走了七天的路程，才到了巴伦沙尔札庙。看到庙宇的墙壁上，写有蒙汉两种文字的标语，词句多系“拥护蒙古自治运动”、“复兴蒙古民族”、“蒙古自治政府万岁”等等。见到德王，我即将所带信件和礼品交给了他，报告了接洽经过，并向他建议说：“现在中国大部已经解放，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样一来，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中国当前主要是安定人心，确立社会新秩序。对蒙旗的政策更为宽大，听说还要争取王公。您现在如能亲自前往接受解放，参加新政府，个人安全自无问题，还可得到适当的安置。因为您在蒙旗王公中名声最大，中央对您宽大不究，更能影响其他王公消除顾虑，这对安定蒙旗社会秩序和人心都有积极作用。我觉得您个人的安全定能得到保障，希望您能亲自前往接洽。”德王当时答复我说：“我已发誓，今生不做被人委任的官，要做就做人民选举的官。我到任何时候，也要搞民族复兴工作。固然搞民族复兴工作未必由我而成功，但白云梯之流，腐化堕落，追随国民党这些年，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真是饭桶。他如能够搞出一个蒙古统一的局面来，也好收容我们这些流亡的人。乌兰夫倒是很行，现在已经搞出一个蒙古自治局面，快把东西蒙古统一起来了。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可惜他走的是共产党的路线，所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不是民族复兴工作。当今之世，以蒙古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他就这样妄自尊大地把自己吹嘘了一番，也没有表示去不去宁夏。

接着，德王主持召开了“政府”科员以上、部队排长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由我传达前往宁夏接洽的经过。我即宣读了潘自力主席回复德王的信，并根据宁夏军政首长的指示及所见所闻，谈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关于民族出路问题。我说，在宁夏我曾

看到一些传单标语，提出了扶助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政策。并且在事实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已经成立，业已奠定东西蒙古统一的基础。蒙古民族的出路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我们多年的愿望就快实现了。第二，关于个人安全问题。由于现在全国已经大部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安定人心，确定秩序，所以政策比从前宽大。现在，像傅作义这样的人都给了很重要的职位，宁夏的旧官员也都平安无事，照旧供职。我们的罪恶再大，还能大过傅作义吗？主要战犯傅作义还能够得到宽大，我们也一定能够得到宽大。彭总司令和宁夏军政首长都说过：只要不再与人民为敌，从此归向人民，是可以得到人民的原谅的。我传达之后，第一师参谋长赵殿臣发言说：陶代表的传达和看法，我认为很有见地，大家应当详加考虑。德王就潘主席请他亲去面谈，当众征询大家的意见。有人发言说：主席是军政领袖，不能轻易离开此地前往，仍应派代表继续接洽。会上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就宣告散会。

会后，我又分访其他首脑人员征询意见。李守信表示："东去接受解放，深恐以后无保障；就地进行自治，也不可能；赴外蒙又恐不安全，我还是主张西进。"宝贵廷对我说："老陶，我和你不一样。你在蒙疆政府时期是做教育工作，没有做下什么了不得的事，可以接受解放，我则不行。在过去我是担任部队长，在战场上不知杀伤了多少人，就是共产党容我，恐怕包海明、高庆春等也不容我。所以我仍主张西进。西进不成，北上外蒙也可以。我是不敢前往接受解放的。"我对他说："在战场上杀伤之事，是两军阵前，刀枪无眼，依常理推断，当在不究之列。希你不要顾虑于此。傅作义当过华北几省'剿匪'总司令，在战场上杀的人不知有多少，起义之后依然得到宽大，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他又对我说："傅作义有傅作义的作用，我有我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我知敖木巴图尔是第一师师长苏和巴图尔的灵魂，我和敖木巴图尔的私人感情较好，很想通过他劝说苏和巴图尔接受解放。不想他也反对我的意见，说："我在解放区当过司法厅长，我知道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的。你说现在由于政府新成立，要安定人心，斗争比从前缓和，我是不相信的。我所以背叛共产党跑出来，就是因为不满意激烈斗争。我是仍主张西进。西进不成，甘愿跳海而死，决不投降！"我又对他解释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斗争即便有时激烈，有时也趋于缓和，不能一成不变地去看问题。希望你还是再想一想，并劝苏师长也考虑东去接受解放的问题。"虽然这几个人和撒嘎拉等一部分人还是顾虑多端，不愿接受解放。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愿意东去接受解放。这时，第一师副师长孙鸣海向我表示，愿争取部队走解放这条路；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副参谋长都固仍仓也表示同意接受解放，汪亲扎布、韩聿修等也支持我的意见，并在政府职员和部队中争取同情者。吴天寿、白晶泉等就在这时转向同情接受解放这方面来。总之，在这个时候，北上外蒙古的意见较占上风，东去接受解放的也大有人在，南进意见较在图克木时期低落，仅有少数人在坚持。

德王在这个时候，开口团结，闭口复兴，关于应走哪条路线问题，不做明确表示。有一次，宝贵廷催促他表明态度，明确方向，不要优柔寡断，失掉时机。德王非常气愤，对宝贵廷大发雷霆说："我并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慎重考虑。像你那样，把蒙古军送给傅作义当了炮灰，作了无畏的牺牲，使多年培养、训练的蒙古军，完全葬送到你一人之手，那就叫做当机立断吗？"二人争吵甚烈。在座的人把宝贵廷强拉出去，这场争

吵才告平息。等德王怒气平息之后，我向他进言说："宝参谋长说话对您有不够尊重之处，对他当面予以斥责也是应该的。但在此人心动荡时期，您指出方向，明确态度，让大家有所遵循，也是必要的。"德王对我说："我现在只有号召团结，不明确态度，才能收拢住大家，不致马上散伙。我一表明态度，马上就有分裂的可能。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团体中，有的主张西进找国民党，有的主张北上投向外蒙，有的主张东去接受解放。假如我现在表明东去接受解放，主张西进和北上的人，马上就会分离而去。我们这个团体很快就会垮台。"我对他说："我觉得这样维持下去，也不是办法。既然主张不同，就不会都跟着您走。与其将来难免分家，不如早些明确方向，早些分家，能争取大部分人就行了。这样委曲求全，我看也不是办法。"他不胜感慨地说："我从前处理事情是有些机智的。甚感现在不如从前，遇见复杂困难的事情，不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处理。南进吧？部队纪律很坏，各处要路必有重兵把守，很难通过。东去吧？很多人拦阻，不让前往。要不然我去外蒙吧！因为我过去与外蒙有过联络。在蒙古、察南、晋北三治合并时，很感日本的做法不合我的意见。我当时想经外蒙通过苏联转往重庆后方，曾与外蒙进行过联系。只因重庆方面指示，当时日本和苏联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如果经由外蒙通过苏联，深恐被引渡到日本去。指示叫我经由包头前往重庆，并派白海风率队到黄河岸接我。因为这一条路有日本军警特务密布，封锁甚严，深恐不易通过，乃即作罢。后来又奉重庆蒋介石方面指示，叫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他继续对我说："听说乔巴山（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他随同苏联军到达西苏旗的时候，曾检查我的王府，没有发现金银财宝，检查出来很多的书籍和枪械，当时乔巴山曾说：看来德王这个人，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并且我认为：如按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后而论，苏联最早，是爷爷辈；外蒙其次，是儿子辈；中国较晚，是孙子辈。孙子一定要听爷爷的话。因此，我想通过外蒙去苏联面见斯大林，要求解决蒙古民族问题，你看怎样?"我即对他说："内蒙是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内蒙问题只有向中国共产党接洽才能解决，外蒙恐怕不管。并且外蒙和中国都是共产主义一类性质的国家。不能因为容留你引起外交问题。你如去外蒙，很可能通过外交手续把您引渡到中国来。与其那时让外蒙缚着送来，莫如现在应潘主席之请，自由自在地去接受解放。"他当时表示点头的样子说："可也是呀！你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容我再行考虑考虑。"之后，我又恳切劝他务要趁着潘主席邀请前去的机会，前往宁夏或兰州接洽。他也有点活动的意思，但经主张南进和北上的一些人从中阻挠，又变了卦。后来，我一再催问他，怎样回复潘主席的信？他说："还是你再去一次吧！"我即对他说："人家希望您去面谈。您仍叫我前往，叫我到宁夏说个什么呢?"他答复我说："你这次主要是催促答复上次函件所要求的各事。宁夏方面如不予肯定答复，你就要求去兰州面见彭德怀接洽解决。"我说："仅我一个人不好自圆其说，应再加派一位职位较高的一人同往。"他允准了我的请求，又加派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和我一同前往，我也就准备再赴宁夏。

在这个时候，阿旗政府为了制止德、李部队四出抢掠，保护当地人民生命财产起见，调动保安队布置在德、李部队的外围，把守要路，封锁粮食，监视行动。遇着德、李部队出外抢掠，就派兵暗中袭击，因此，发生过多次冲突。有一次，在巴音诺尔公巴格所属的舍尔木台地方，德、李部队第一师的50余名官兵，正在抢掠人民财产和牲畜

的时候，被阿旗驻守此地的段塔拉登岱带队袭击，打死10余人并得其枪支。同年10月初旬，在树贵巴格所属吉尔格朗台地方，有20多个德、李部队士兵正在抢掠之际，又被阿旗保安队打死4人，夺回被抢的牲畜。当年10月间，在巴伦沙尔札巴格所属的古拉本都拉干地方，阿旗保安队派出几个小队，围击抢掠人民的德、李一股部队，结果击毙2人，夺回骆驼300多峰，蒙古包10余座，阿旗保安队方面仅伤了骆驼10余峰。也是10月间，在沙尔札巴格所属塔本阿拉塔地方，段塔拉登岱队长率队与德、李部队出外抢掠的50余人遭遇，德、李部队被击毙7人，伤10余人，阿旗保安队只伤2人。

总之，在德、李部队由图克木到沙尔札流窜期间，与阿旗保安队发生冲突多次，被打死50多人，使德、李部队的粮食给养遭受很大困难。韩撒嘎拉团长，因为他的部属王连长受了重伤，至为气愤，想全团出动大干一场，围歼阿旗保安队部。但德王、李守信等考虑到，与阿旗保安队发生大冲突、有可能招致解放军前来围剿，仍以缓和冲突，消除敌意、取得谅解为宜。遂派汪亲扎布、图门德勒格尔二人，到沙尔札庙北边巴音高勒地方与阿旗保安队副总队长罗瑞光接洽，请派代表到沙尔札庙与德王面谈。罗瑞光当派左甲木英、段塔拉登岱、达希敖都布三人前往与德、李等会面，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劝说德、李等接受和平解放；第二，约束部队不再抢掠。德王以不属这次谈判内容为由，对于第一项要求未作表示。对于第二项意见表示赞同，但又强调说：部队给养和职员生活无法维持，这个问题应由达副主席负责解决。现在你们既然代表前来，应当尽快为部队确定驻扎地方，并解决给养、乘用骆驼问题。阿旗代表对于德王所提出的问题，采取了有利于监视和作战的原则，指定拐子湖作为德、李部队驻扎地方，答应在部队开到拐子湖以后，就接济粮食。并把拐子湖说成是水草丰盛，人口众多，既有商号，又有农田，交通方便，燃料丰富的地方。实际上拐子湖是三面环沙，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地方。是希望德、李部队离开人烟较多的沙尔扎，进入人烟稀少、三面环沙的地带，为的是便于对其控制和监视，也有利于包围作战。但是，由于德、李等不熟悉阿旗地理情况，却信以为真，就于当年12月下旬率领部队由沙尔扎向拐子湖开发了。关于接济粮食的问题，本是当时会谈中应付的话，而且双方是在对立的情况下说的，当然也是不能兑现的。我和吉利占太也就动身赴宁夏。到达定远营后，达王很关切地对我们说："我已得到报告，听说你们来了。当你们路过图克木红古尔玉林一带时，阿旗民兵听说吉利占太来了（因他在图克木庙时，曾主持征用牛、羊、骆驼，甚为当地民兵所憎恨），就集合民兵，随后追赶。幸亏你们中途未走大路，改走草原，才未被追上。不然可就麻烦了。今后往返，我将派要员护送，以保障你们的安全，你们也应随时注意。"由此可见，阿旗蒙民对德、李部队真是恨入骨髓了。

我和吉利占太由定远营赴银川，面见潘主席等军政首长，报告德王不能亲自前来的原由，要求对前次提出的要求给予答复，并报告了德、李部队的思想动态。当把我们安置到招待所后，潘主席曾亲自前来来照拂垂询一切，并说："已把前次函件中所要求的事项转报兰州请示，正在听候答复。德穆楚克栋鲁普过去依靠日本，出卖祖国，已经成了蒙奸卖国贼。现在党和人民仍在耐心等待他觉悟，回到人民这方面来。希望他不要执迷不悟，自绝于人民。"王志强部长也和我们说："德先生这次没有亲自前来商谈，足见还有顾虑。你们回去以后，应尽量说明党的宽大政策和民族政策。特别是当前距中国

全部解放已为时不远，国民党现在退处西南一隅，已无力再行抗拒了，不久也将解放，请把当前的形势转告德先生，不要再存什么幻想，赶快归向人民方面来。如果德先生仍有顾虑不肯来，争取其他人来也可；部队全体不能来，争取大部前来也可。”并且给我们补助了旅费，派车送回定远营。这时，何兆麟从北京回来，带有乌兰夫主席致德、李等的信件，信中恳切说明只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不再与人民为敌，可以不咎既往，宽大处理。吉利占太因恐途中出事，留在定远营未回。我即带着乌兰夫主席的信件，由阿旗政府派人备驼护送前往拐子湖。

三、在拐子湖盘踞时的情况和第三次接洽投诚经过

我到拐子湖后，才知德王已于1950年元月初（记得是旧历腊月初八）带着秘书色仁道尔吉、副官图门德勒格尔二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后由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官都嘎尔札布送来德王的来信，说有大事相商，叫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图尔、都固仍仓、敖木巴图尔等前往会商。李守信等六人即于当年2月初前往中蒙边境。这时德、李部队主要由孙鸣海、吉致祥、塔拉巴、达力札布、汪亲扎布、赵殿臣、韩聿修等人主持。不久护送李守信等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韩撒嘎拉团长、翁盖团长带着护送队伍从国境线上回来，说：“李等到达国境后，就被带上蒙眼，推人汽车，疾驰而去，看样子结果是不会好的。”因此，北上空气逐形低落。我就和孙鸣海、吉致祥、汪亲扎布商量，召开全体文武官员大会，我当众宣读了乌兰夫主席致德、李等的信件，并说明当前局势变化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和民族政策。继又召集排长以上人员开会讨论出路问题，我们强调西进找国民党是死路，东去接受解放是生路，北上外蒙古这条路现在看起来也不妥当。孙鸣海、吉致祥、汪亲扎布、韩聿修、塔拉巴、达力扎布等大部分人同意接受解放，只有韩撒嘎拉等少数人仍主张西进。也有一些人虽然表示愿意接受解放，但对于到定远营接受解放有顾虑，认为曾掠夺过阿旗人民，如到定远营去接受解放，即使党政方面予以宽大处理，还恐为被害人民所不容。我当时予以解释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宁夏时，王志强部长曾和我说过，如果被害人民告发，党政方面当为之负责解释。并且我们是蒙古人，接受解放后，在阿旗从事工作或安家生产也是方便的。吉致祥也说：“前往定远营接受解放，已经陶布新代表往返接洽二次，宁夏已准不咎既往，可以说已经接洽妥善了。假如再改变其他地点，仍须重新接洽，需要相当时间。”经过这番解释，这一部分人也减轻了顾虑。当时我又看到部队中有个跳大神的×××，当在“神佛附身”的时候，总说西进、北上好，东去不安全，对于接受解放不无影响。乃向孙鸣海建议，应暗示“跳大神”的人，改变说法，果然在他神佛又附身的时候，改说现在情况变了，东去也安全。这对一般士兵消除顾虑、接受解放起了一定作用。

晚间，我和吉致祥到韩撒嘎拉住的蒙古包里，恳切劝他，只要接受解放，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但他仍是执迷不悟。他冷言冷语地对我们说：“你还保证我的头呢？谁能保证你们的头呢？我在八路军那里当过几年区长，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和做法比你们清楚。现在你们去接受解放，也可能暂时无事，但以后还会收拾你们的。今后我们只有各走各的路吧！”我们劝说不听，又请孙鸣海劝说，仍然无效。据孙鸣海说：韩撒嘎拉坚

持西进，绝不投诚的原因是，他在背叛共产党时，曾杀害革命干部，积下累累血债。附和他的一些人，也是因有很多罪恶。就以阿拉木苏而言，就曾打死过 11 人，所以坚决不投诚，劝也无用。据我所知，韩撒嘎拉是喇嘛出身，早已准备下喇嘛穿用的衣服和度牒等证件，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化装成喇嘛逃往青海塔尔寺或西藏隐蔽。我听到孙鸣海这一番话之后，也只好任其自便。但韩撒嘎拉看到愿意接受解放的人愈来愈多，对他的西进企图不利，竟阴谋策划率领他的一团部队，伺机袭击阿旗保安总队部，制造流血事件，并计划把我杀害，以断投诚之路，迫使孙鸣海率领部队跟他一起出走。但由于子弹不足，曾向孙鸣海部属周福成借用。此事被孙鸣海发觉，至为气愤，乃持枪去找韩撒嘎拉说："听说你要集合团队去打阿旗保安队并杀害陶布新代表。你真要这样做，最好先把我打死，或者我把你打死。否则，只要我存在，你绝对办不到!"韩撒嘎拉知道计划业已败露，不能如愿，便向孙鸣海痛哭流涕地说："我所以想这样做，是为了拉你一同走，率领全体部队打通西进的道路，现在你既然不同意我这样做，我也只好罢休。那就请你同意我单独率一部分部队出走吧!"孙鸣海当即答复他说："你既然坚持不肯投诚，也只好听你自便吧!"。从此，韩撒嘎拉就与其亲信筹划出走。在他们出走的那一天晚上，达力扎布把我拉到他的帐房，对我说："有人想谋害你。今晚你就住在我这里。我还有亲信卫兵六七人，叫他们轮流守夜，以策安全。"他又说："自从德王他们走了以后，大家很感群龙无首。因为过去我曾当过他们的司令，现在他们想拥护我当头目，领着他们拉竿。我认为当土匪总有被剿灭的一天，所以没有应允。"他问我："你看怎样?"我当时对他说："乱世出英雄，在时局动荡不定之时，你能拉拢起一部分人来，就会有人来争取收编。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天下已经太平了，就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尚需精简整编，还要那些纪律不整的土匪队伍何用?我认为你不干才对，要干可就错了。"他很同意我的话，表示坚决不干。孙鸣海很担心我的安全，亲自前来把我请到他住的毡包里，打麻将消遣，包外布置士兵守卫，以保安全。这日晚间，韩撒嘎拉一伙人喊驼叫地折腾了一夜。翌日黎明，韩撒嘎拉带着 100 多人出走，先到额济纳旗抢掠一番，后即逃入马鬃山盘踞。听说由于内部互相残杀及解放军围剿，俱归消灭。韩撒嘎拉是否化装喇嘛逃入青海或西藏，我就不得而知了。

德、李部队第一师第二团副团长葛瓦拉西，对前往定远营接受解放仍有顾虑，表示愿到乌盟一带向解放军投诚。我通过他的妹夫吴天寿劝他与我们一同前往定远营，不要单独行动，葛瓦拉西执意不肯，也只好听其自便，因为到那里投诚也是一样，只要不再散而为匪就行了。他们走后，我和吉致祥、孙鸣海等就发起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全体官兵迎接解放委员会"，排长以上人员均为委员，推选吉致祥为主任委员，孙鸣海为副主任委员，负责办理安抚部队、缴纳枪支，准备前往定远营接受解放等事宜。正在这个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官都嘎尔扎布又来拐子湖送来德王的信件，叫吉致祥、陶布新、汪亲扎布等前往乌兰巴托。我们因已决定东去接受解放，当即以主持政府和军队工作要务在身，无法摆脱为由，婉言谢绝前往。这个边官又说："部队如缴纳了枪支，可以以蒙古人民资格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如带武器，因关系国防和国际问题，不能收容。"这样，等于关上了北上这条路的大门，只有走东去接受解放这条路了。待这个边官走后，就派我和赵殿臣为代表，先行前往接洽，由第一批缴械投诚

的塔拉巴率领部队40名护送。当到阿旗保安队附近时，由于事先联络欠妥，阿旗部队开枪向我们射击，子弹纷纷落在乘驼周围。我当即下了乘驼，举起手帕摇晃，以示信号。阿旗部队即停止射击。我即乘驼到了阿旗部队中，与队长乌图那逊见面。他深为歉疚地说："今天由于联络欠妥，几乎发生误会，险些把你这代表打死，甚为抱歉。"我即随同他们到了阿旗保安总队部所在地，面见过总队长罗瑞志、中队长杨福存，告知德王部队业已接受解放，不日前来缴纳武器，务要通知所属各队，避免发生冲突。正在这时，宁夏军区特派曹又参副司令员前来定远营，主持政治争取德、李部队投诚事宜。打来电报说："对德、李部队在磴口县及阿旗扰害行为，一概免于追究，务即就地向阿旗保安队缴纳武器，前来定远营听候安置。"德、李部队听到这个指示，甚感政府宽大为怀，即相率投诚，缴纳武器。阿旗保安队即派扎木苏车林、达希敦都布二人负责点收投诚人员和缴纳的枪支，造册上报阿旗政府。吉致祥、孙鸣海即率缴械投诚的官兵和眷属，约2000余人，前来定远营投诚。

这里应当补述一点：即在德、李部队开到拐子湖之后，额济纳旗党政方面，曾派周国良、汪畸云、苏斐然三人前来争取德、李部队投诚。只因他们到后，德、李等已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未能商谈。周国良和汪畸云回额旗报告情况，苏斐然留在拐子湖等候德王回来。但德王一去再未回来，苏斐然想争取一部分队部到额旗投诚，因已决定东去接受解放，没有愿去额旗的。苏曾对人说：我来此住了这些日子，没有争取到一个人。周国良向来与我不睦，一定会向额旗党政方面说我的坏话。从此心怀忧虑。当德、李部队大部分人表示投诚，韩撒嘎拉小部分人准备西窜的动乱之后，苏斐然也表示即回额旗复命。但一出拐子湖，就用手枪自杀。后被德、李部队的人发现，将从尸体上发现的给其妻子的遗书交给孙鸣海，孙又上交曹又参副司令员。就在这个动乱的时候，额旗代表周国良又来到拐子湖附近，给韩聿修来信邀其前往会谈，并说汪畸云与他同来，因被乘驼摔伤，中途又返回额旗，仅他个人前来。这事被韩撒嘎拉所闻，当即向韩聿修说："苏斐然之死与周国良有一定的关系。看起来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我派人去接他，利用他带队前往额旗，必要时把他收拾了，为苏斐然报仇。"我听到这个消息，即嘱咐韩聿修派人向周国良告知这里动乱的情况，不必前来，速离开拐子湖，免遭不测。我这样安排后，就动身到了阿旗保安队转赴定远营。周国良是否已返回额旗，还是被韩撒嘎拉所获，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赵殿臣到达定远营后，即面见曹又参、曹动之、达理扎雅等领导人，报告德、李部队缴械投诚的经过。到了当年3月，塔拉巴、孙鸣海、吉致祥等也相继率领部队和随同的布里雅特及锡盟一部分蒙民前来投诚。曹副司令员在向投诚人员讲话时，再一次阐明起义投诚不咎既往的政策，并当众宣布安置办法：（一）具有一定才能，愿在阿旗服务者，就地予以安排工作；（二）愿意回家者，资遣回籍；（三）愿意学习者，保送到银川、兰州等地学习；（四）愿意当兵者，先在阿旗保安队入伍当兵；（五）愿意在阿旗落户为民者，帮助安排生产。从此，德、李部队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反动营垒投向人民的怀抱，不但得到不咎既往的宽大待遇，更得到各得其所的安置。同时宁夏省方面，对阿旗遭受德、李部队扰害的人民，发给了大批的粮食、物资，以为救济。

四、结束语

德、李部队流窜阿拉善旗时，经过苏木图、吉兰太、图克木、红古尔玉林、巴彦诺尔泰、巴伦沙尔扎，巴彦乌拉、宗乃、拐子湖等十几个巴格，流窜达数月之久，最后终于缴械投诚，归向人民。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不咎既往的宽大政策感召的结果。

但是德王等首脑人员，开始主张南进找美、蒋，之后又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最终没有接受解放，归向人民，是什么原因呢？据我所知，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德王发起所谓“西蒙自治运动”，是以美帝国主义为背景的，是由追随美帝国主义一些蒙古民族败类居中策划的。因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失败之后，实不甘心，时思卷土重来，企图继续奴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蒙古更具有侵略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由它的新闻处拉拢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知识青年成立所谓“蒙古青年同盟”和“兴蒙会”等组织。这些人士按照美帝的意旨，一方面安置一些蒙族青年接受美特训练，带着电台潜伏在阿拉善旗接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一带，进行间谍活动；另方面拥护德王为“领袖”，做招牌，发起所谓“西蒙自治运动”。成功了则售美帝货色，统治蒙古人民；失败了则逃往国外，组织流亡政府。德王在北平赋闲期间，就与美帝国主义时有往来，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重登政治舞台，也就处处仰照美帝鼻息办事。例如，在定远营举行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时，大家提名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候选人，他曾向我表示说：“在组织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时，我当时为了表示谦逊，把主任委员一席让给阿王（即伊盟盟长，杭锦旗札萨克阿拉坦瓦齐尔），我自己甘愿退居副主任委员。不意由此引起一些美国人士评论说我在蒙古地方的声望低落了，不如阿王声望高。这次大家既然愿意推选我为主席，我也就当仁不让了。”待到宁夏解放，德王率一部分人到达图克木庙时，就想通过美国新闻处布置在此地的美国特务伯音巴图所掌握的电台，向美蒋方面通讯联络，但是伯音巴图和电台都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缴获，以致德王大失所望。后来又让随从电务人员贡森将所带电台修复发报，但因临行时未带电池，不能拍发，德王为此甚为焦急。所以在我充任代表赴宁夏时，德王嘱咐我务要购买些电池带回，如购买不着，向达副主席借用亦可。我到定远营后，曾向达理扎雅提及此事，达则表示拒绝，我也认识到如为其购买电池，任其架起电台与美蒋通讯，对于接受和平解放工作不利，所以也就没有购买。回去之后，我托词向他说明，德王甚表怀疑和不悦。由此可见，德王等所以主张南进找美蒋，是有其原因和企图的。

第二，德王以后又改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因为西北各地相继解放，各处要隘均有重兵把守，很难通过。其次也由于德王对自己评价过高，认为自己是“蒙古民族的领袖”，是中外驰名的政治家，到处都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他夜郎自大，自命不凡，认为不但日本、美国要尊重他，就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得重视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得优待他，帮助他，最次也会容留他，可以隐蔽一时，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此外，德王所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还因为他的眷属和子女都已先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据他

说：他的长子在库伦（乌兰巴托）大学读书，他的儿媳在师范学校读书，他的次子在念中学。德王这个人家庭观念很深。为了谋家庭的团聚，也是促成其北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原因之一。

总之，德王之所以不归向人民，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质所决定。宁夏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和平方式争取他归向人民，耐心等待达半年有余，真是仁至义尽。但是他仍执迷不悟，毫无接受解放的诚意。记得有一次德王曾对我说，在北平即将解放的时候，苏联领事馆曾派人和他联系，劝他不要走。他当时认为，如果不走，留在北平等待解放，今后就不能有所作为了。就诡称国民党派很多人员在他的住地周围监视，劝这个人以后不要再来，嗣即乘机飞往南京了。在图克木流窜时，德王又向我说："苏联对待少数民族比日本强；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要比国民党强，从外蒙的进步和内蒙自治区的成立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口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他总愿意依靠帝国主义，不愿归向人民，这还不是封建阶级本质促使着他吗？狂妄的政治野心支配着他吗？至于李守信、宝贵廷等，远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做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给人民造成很大的损害，顾虑重重，不相信党的宽大政策，不接受和平解放，甘愿与德王一道走反人民的道路。

·汪伪政权和汪伪人物·

汪精卫叛逃之我闻

武　和　轩*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逃的时候，我正在重庆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参事，是个半大不小的官。过去我曾参加过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汪系的一些主要人物如王法勤、王懋功、陈树人及谷正纲、谷正鼎兄弟等都有过从，因此，对于汪精卫及其一伙叛逃的经过和原因，有一些耳闻目睹。

汪精卫是1938年12月18日（另一说19日）由重庆到昆明，19日逃往河内的。随同汪到河内的有他的老婆陈璧君，亲信秘书长曾仲鸣以及周佛海、陶希圣、方君璧等人。对于他们的叛逃，我和王懋功等人事先都不知道。19日（星期一），是国民党举行纪念周会的日子，按照常例汪精卫是要出席的，但这次纪念周会事前已发出通知，将由蒋介石对国民政府各机关简任以上、军队少将以上人员发表训话，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政府主席以及五院院长都不必参加。我记得在前一次纪念周会开始前，汪精卫、林森及孔祥熙等，早就坐在主席台上，而这一次会议即将开始，主席台上却空无一人，正点开会时，才听到军乐齐鸣，只见蒋介石身着戎装，佩戴着特级上将徽章步入会场，登上主席台后，向会场环视一周。当时我站在台下靠前排，在第一排站立着的还有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当蒋介石发现孔祥熙也站在台下时，就用一种疑问的口气对孔说："今天的会没有你呀！"孔答称，他今天是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参加会议的，蒋介石这才没说什么。汪精卫就是利用不出席纪念周会这样一个机会逃往河内的，这样既可躲避特务的监视，又可不致引起蒋介石及各方人士的注意。

纪念周会后的当天下午我去王法勤那里，不一会儿王懋功也到了，他带来了汪精卫已离开重庆的消息，并述说了事件发生的前后情况。原来，王懋功去汪公馆看汪精卫，但除了汪的管家汪屺及仆人外，汪精卫、陈璧君都不在，他很觉惊奇，就问汪屺：汪到哪儿去了？汪屺告诉他汪已去昆明了。那时乘坐飞机要经过有关机关批准，重要人物甚至要有蒋介石本人的许可，不然飞机票是不容易买到的。王就追问汪屺：汪先生的飞机票是从哪儿得到的？汪说是由彭学沛送来的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中国航空公司的董事长是曾仲鸣，彭学沛当时任交通部次长，主管航空事务，彭也是汪派人物，对他来说，汪精卫要预订飞机票，是不会不给的。

汪屺还对王说：汪先生在离重庆前交给他两封信，一封是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

---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参事。

长朱家骅的，另一封是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让他在飞机起飞两小时后再送出。汪精卫在一封信中说他应程天放之邀，去成都大学发表演讲；另一封信则说他去了昆明了。俗话说作贼心虚，汪精卫怕人获知他的真实意图，就要了一个花招，故意说了两个去向，使人不易获知他的真实去向。这也可以看出汪精卫的为人诡诈。汪在离开昆明时还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称他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

汪精卫逃往河内的消息，不久就在重庆私下迅速传开了，汪系人物都为此惴惴不安。蒋介石获悉汪精卫逃走以后，为了安抚和稳住汪系人物，就把陈树人、王法勤等人叫到重庆中山一路官邸，告诉他们说汪精卫已经走了。但汪去哪里了他并没有说明。蒋还要陈等不必惊谎，不要听信谣言，并说汪不久就可回来。

由于私下对汪精卫逃走的说法越来越多，蒋介石只好在26日的纪念周会上公开承认汪精卫已去了河内，但仍称汪是去河内“养病”的。他说：“汪精卫此次赴滇途中，忽又发现旧疾与脉搏不良之症，遂赴河内治疗。”为了表示汪逃往河内之事与他无关，他还特别强调说，汪的行动与党和政府无关，“纯系个人行为，毫无政治意味”，因此，“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等等。

汪精卫之所以叛国投敌，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汪精卫是以亲日反共著称的。九一八事变后，在他任行政院院长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就鼓吹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实他讲抵抗是假，妥协投降是真。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汪精卫虽然也发表过《最后关头》的讲话，但那只不过是慑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压力，不得不作一些表面上的表示而已，实际上是极力主张妥协投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抗战毫无信心，并且怕得要死。他一再宣扬日本是一个工业强国，中国工业发展比日本落后几十年，一个落后的中国和已经发达的日本相对抗，“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所以“战必大败”，甚至“国亡种灭”。他认为“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不过是唱“高调”，只有与日本化敌为友，实现和平，才可共存共荣。在对内政策上，他极力反对国共合作，说共产党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假借抗战的名义获取民心，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等等。

以汪精卫为首的一些投降反共分子自称是唱“低调”的。在南京失陷以前，他们以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私宅为据点，组织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其主要成员除汪派的一些骨干分子如陶希圣、林柏生之外，还有胡适、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胡适与汪精卫素来关系密切，也是一个抗战失败论者。周佛海等人并不属于汪派，而是CC派。周当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宣传部副部长，梅思平原任江宁县实验县县长，与周关系密切，高宗武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一直负责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事宜。他们因观点一致、主张相同而互相结合起来，并以汪精卫为领袖。“低调俱乐部”并不具有一种公开的组织形式，因此，当时不为一般人所知，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策划与日本谋取妥协。当时，日本提出诱降条件，并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一再进行劝降。汪等极力要蒋介石接受陶德曼的调停，汪精卫还亲自主持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接受日本所提条件的决议。

南京失陷以后，国民政府的各主要机构及主管人员都集中到了武汉。战时的武汉，

在共产党抗战救国的号召和组织之下，抗战气氛极为浓厚。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抗日怒潮，国民党尤其是汪精卫一派非常害怕。为了推脱战败罪责和控制舆论，汪精卫一伙组织成立了一个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拉拢收买了各种反动文化人物，妄图建立反动的文化联合战线。艺文研究会总部先设在汉口，后迁重庆，并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其主要负责人为周佛海、陶希圣。他们办刊物，出版丛书，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其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主张，妄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政权，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对日妥协投降扫清障碍。

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6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它表示日本在不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情况下，妄图采取扶植亲日汉奸势力成立“新政权”，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在此形势之下，汪精卫一伙一方面害怕与日本谈判的渠道完全断绝，抗日战争会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又企图乘时而起。于是，他们派遣高宗武、梅思平、林柏生等人往香港，与日本秘密联系。7月，高宗武直接去日本，试探实现“和平”的办法和条件。高在东京与日本当局经过一系列的秘密磋商之后，最后确立了由汪精卫组织反蒋势力，成立“新政权”，以汪与日本谈判“和平”。

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国民党内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他的政治野心很大，领袖欲极强，一直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虽然担任了国民党副总裁，但仍处于蒋介石以次的地位，又没有实际权力，虽耿耿于怀，但也无可奈何。高宗武由日本回香港后，派其翻译周隆庠将东京谈判结果的书面报告交给了周佛海，然后转交汪精卫。当汪看到日本支持他成立政府后，真是喜出望外。不久，日本继占领徐州之后，又相继占领了广州、武汉等地，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在此形势之下，汪精卫、周佛海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遂决心投靠日本。

在周佛海等人的支持下，11月初，汪精卫密派高宗武、梅思平由重庆经香港往上海，与日本军部特务机关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进行卖国降日的秘密谈判，并签订了《上海协议》。《协议》在原则上确认：汪精卫接受日本所提各项条件；日本则支持汪精卫成立反蒋的“新中央政府”。在会谈中，双方还详细拟定了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的时间，以及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具体步骤。这个协议条文，后来由梅思平密藏在他的西服夹层里，由香港到重庆交给了汪精卫，并且得到了汪的完全同意。

在此前后，汪精卫也在重庆公开发表文章和讲话，对日乞和，攻击全面抗战和抗日游击战。他曾先后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声称中国政府绝不关闭“和谈”大门，只要条件适合，就与日本谈判恢复和平。他还利用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对广东的张发奎、四川的刘文辉以及云南的龙云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拉拢活动，妄图以他们为其成立汉奸政权的基础力量。他派陈璧君来往于重庆、昆明、广州、桂林、香港和河内，进行周密的准备，连他们逃往河内后住的朱培德公馆，也都是由陈璧君安排好了的。

12 月初，汪精卫为外逃积极进行部署。他在重庆上清寺私邸分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密商，拟定了最后的逃跑计划。为了逃避蒋介石特务机构的监视和外人注意，他们决定分别往昆明集中。除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直接由重庆出发外，周佛海以视察云南宣传工作为名，先往昆明等候；陶希圣家眷住成都，就取道成都去昆明；陈公博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就在成都等待汪的起程消息后去昆明会合。后来，陈因未及时获知汪飞离重庆消息，而在汪逃走后的第三天直接到了河内。

汪精卫在逃离重庆的前几天，就先派陈春圃去昆明，名义上是让陈送其幼女汪文恂、幼子汪文悌赴香港读书，实际上是担任联络任务。陈春圃在送走了汪文恂姐弟俩后，留在昆明向龙云说明了汪到昆明的时间，并转告汪的意思说：汪先生到昆明时，除龙云外，切勿让其他人到机场去接，也不要悬挂旗帜欢迎。龙云当面答应了陈的要求，说到时只他一个去机场。但是，当汪精卫抵昆明机场时，龙云却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场面，所有省政府的各厅、局、处长都在机场列队迎候，军乐队大吹大擂，市内各街道也都挂满了欢迎旗帜。龙云此举本来是想讨汪的欢喜，但汪却担心因此会引起各方注意，使阴谋暴露，因此大为惊恐，很不高兴，责怪陈春圃不会办事。汪到昆明下榻龙云公馆，伪称心律不好，不能见客，所有厅、局、处长一律拒不接见。只留龙云一人在楼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次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便乘上由龙云包租的欧亚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河内，走上了公开卖国投敌的道路。

12 月 22 日，按照汪精卫与日本预定的步骤，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在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下，与“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近卫的声明实际上是公开号召汪精卫降日和组织卖国政府。29 日，汪精卫即让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将他响应近卫声明的通电携往香港，在香港汪派报纸《南华日报》上发表，即所谓《艳电》。

汪精卫逃往河内后，蒋介石起初对其意图并不怎么清楚。由于有《艳电》的发表，他不得不赶忙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对汪处置问题。会议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于 1939 年 1 月 1 日作出决议：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但是，这次会议并未对汪下令通缉，其目的是为了留有余地。接着，2 月中旬又派谷正鼎去河内对汪说项。谷正鼎原来也是汪派人物，和汪的关系很深，后来被蒋介石收买。谷氏兄弟四人，他是老四，老三谷正纲，我们习惯称他们二人为大谷、小谷。

小谷去河内的使命是很秘密的，事也凑巧，当时任参议员的马乘凤先生从西安乘飞机到重庆，在珊瑚坝机场一下飞机，就碰见了正在候机起飞的谷正鼎，他就问谷去哪儿？谷说他去昆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们都很惊奇，心想他去昆明干什么？我就去问大谷，大谷说，谷正鼎是奉委员长（指蒋介石）之命，去河内见汪精卫。并嘱我事关机密，切不可告诉别人。后来大谷还对我说，谷正鼎这个人真鬼，蒋介石当面对他交待了五条，主要意思是要谷正鼎告诉汪不要和日本勾结，更不要往日本占领地区去，如果有意去欧洲旅行，可以发给旅费和护照。谷正鼎当时把蒋介石的话一一记下，然后读给蒋听，问对不对？他在河内见汪时，照本传达了蒋的话，并把汪的答复一一记下，然后读给汪听，问对不对？回重庆后又照本向蒋转达。大谷说，谷正鼎此举主要是为了

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谷正鼎从河内回重庆后对我说，汪拒绝了蒋的要求，江声称：“我在重庆主张和平运动不允许，难道我在河内主张和平运动也不允许吗?”意思是说，河内是法属殖民地，你蒋介石奈何我不得。汪还一再要小谷留在河内，与他一起进行“和平运动”。小谷怕走不脱，就只好说：“我是委员长派来传达意见的，我总得回去把你的意见转告委员长才好。”汪无奈，只得同意他走。

汪精卫逃往河内后不久，蒋介石就派陈恭澍等军统特务前去进行严密监视。谷正鼎游说失败后，3 月 21 日凌晨，军统特务便翻墙进入汪的住宅，向室内猛烈扫射。只是由于汪精卫的卧室和曾仲鸣的卧室临时进行了调换，汪精卫才侥幸逃脱，而曾仲鸣却成了替死鬼。

（蔡德金整理，1981 年）

汪伪政治部情报局内幕

赵 一 雪*

一、情报局的由来

1943 年 9 月，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汪伪政府特务头子李士群已没有再利用的价值，就叫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勾结特务熊剑东设计毒死了李士群。李士群死后，日军本打算叫熊剑东代替李士群掌握汪伪政府的特务力量，帮助日军血腥镇压中国人民。但因熊不是改组派，在汪伪政府资历又浅，不够当部长，被特务头子丁默邨、彭年、万里浪等反对掉了。日汪协商结果，就派了当时伪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总监黄自强改组特工总部为政治部，叫黄当部长。因为他是台湾人，又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同日本关系很深，是可靠的忠实走狗。

黄自强当部长后，遵照日汪指示，把特工总部撤销，并裁减了很多李士群派特务，同时把伪编练总监公署撤销，该署所有人员除参谋长张恒调升伪军委会参谋次长外，均与特工总部合并，新成立伪政治部。该部主要组成部分为政治保卫局（万里浪为首的李士群派特务组成，担任外勤的行动与情报的收集）、情报局（主要由伪编练总监公署参谋处人员组成，担任内勤工作的情报整理与判断）、研究所（李士群派特务组成，担任监听共产党、蒋方及汪伪党政军等密电，并把密电研究、翻译出来）、保卫学校（专门训练特务）及总务处等。

二、情报局的任务与组成概况

1943 年 10 月，汪伪政治部在南京中山东路历史陈列馆成立之后，情报局就在二楼上开始组建，至 11 月间才大致就绪。该局的任务，根据政治部组织大纲规定，是担任研究、整理与判断保卫局所属各地分支局及直属组等搜集来的关于共产党和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情报，然后报告汪伪政府最高顾问部和汪精卫，同时还要指导保卫局情报人员正确而全面深入地搜集上述各种情报，也要整理该部所属杭州研究所搜集的各种情报。

情报局设局长一人，前为我（后任是瞿正之），副局长一人为瞿正之。局下设四科：第一科管军事情报，科长是刘存一，系编练总监公署参谋处科长调来的，该科人员也主要是从编练总监公署调来的；第二科管政治情报，科长为邓品三，是从次长杨振的

---

* 作者当时系汪伪政治部情报局局长。

如意里五号特务机关调来的，该科的人员也是从那里带来的；第三科管经济情报，科长是武彦卿，原系伪第一方面军任援道总部政工处上校秘书，是赵一雪的小同乡，由赵介绍来当科长。该科人员有的是他找来的，有的是部里委的，我记得周蕙湘等两个女职员，是部长黄自强放下去；第四科管文化教育情报，科长缪某（忘其名），是赵一雪的一个姓顾的朋友介绍的，该科人员有的是科长自己找的，有的是编练总监公署调来的。该局特务请委手续与一般军事机关一样，按有关人事规定办理，没有另外举行参加特务的秘密手续。

三、我是怎样当上情报局长的

我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在日本东京参加日本外务省特务组织——日华学会。1941年在四川绵阳当三十一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兵团团长，认为蒋介石集团抗战屡战屡败，必将导致亡国的下场，又因为自己狂嫖阔赌的腐化生活，公款亏空，怕撤差坐监，就乘机拐款逃到南京投降日本当汉奸，利用同汪伪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过去的长官部属关系，接近了汪精卫，又利用日本士官留学生和“日华学会”的关系，同日本顾问部顾问冈本、中森两中佐拉上关系，因此当上了伪军委会少将高参兼陆军将校训练团的教务组长。当时在伪军委会里，因为得到了杨揆一和日本人的信任，就成了“红人”之一。1942年上半年，被日汪指派为赴日本、伪满洲国“军事教育考察团”团员，同杨揆一、郝鹏举（伪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刘启雄（伪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等一起到东京去见了敌酋东条英机，又到伪满新京见了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我留学士官学校时的校长）和伪满最高顾问竹下义晴（我留学士官学校时的第一任队长）等，表示甘心卖国求荣，所以成了日本侵略者忠实走狗。

1943年10月，当伪政治部成立的时候，由于部长黄自强和我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又是过去在伪军委会一起当高参的较好同事，当时我又是编练总监公署的参谋处长，是黄自强的主要助手（黄是总监），所以黄对我说：“我在汪先生（指汪精卫）面前保你当情报局长的时候，他说过去的李士群和现在的杨揆一都说你不好，不想叫你干的，是我力保你……”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顾问部同意了，汪精卫不同意也不行。虽然如此，由于我的骄气很大，听见汪精卫这样说，就表示不满，本不想干这个情报局长，但因为还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官可以做，又怕得罪了日本顾问部和黄自强，堵塞了以后升官发财的一个好路子，也因为局长毕竟比处长要好听些，可能将来有汽车坐，有特务活动费可以贪污过享乐腐化生活，就答应暂时干，来一个“骑马找马”的作官办法。

四、情报局与保卫局的摩擦

保卫局长万里浪因为掌握了李士群派特务的实力，就对没有特务力量作后盾的黄自强派看不起，不买账。当伪政治部成立之初，万里浪派就向黄自强派提出了苛刻条件：第一，保卫局与所属各省市的分局、支局、组的人事经济完全独立，部长不得过问

(包括情报活动费在内);第二,该部杭州研究所、保卫学校、上海修械所、上海办事处等单位的人事,非经万里浪派同意,不能随便调动,经费也要由万领去转发。黄自强派对此极为不满,情报局属于黄自强派,当然也对保卫局产生了成见。

情报局成立不久,我就对科长刘存一、邓品三、武彦卿等说,对于保卫局送来的情报,要"认真审查",有疑问的情报,要逐条签具意见和理由,呈部次长阅后,原件退回去。约于1943年底,第一科对保卫局送来的新四军副军长是粟裕的情报签具意见说:"粟裕是第一师师长,不是副军长,保卫局根据什么说是副军长?要追究来源。"并通知保卫局照办。它不回答,我叫一科再要保卫局答复,并又叫它去搜集"新四军的政委是谁"的情报,还叫二科签准部长要保卫局马上搜集新四军苏中区行政组织、各级主官姓名(包括县长)及根据地等情报。保卫局同样不答复。我就以此为理由,在部长黄自强、次长杨振面前攻击保卫局,说它根本不懂怎样搜集情报,像这样公开的情报,不是搞错就是不知道。保卫局那么多人和每月开支几十万经费有啥用处呢?一定要追究责任,算一算情报费开支的账。部长黄自强当然同意,利用这个机会给予万里浪派一个打击。保卫局副局长胡均鹤说情报局故意同他们"为难"、"捣乱",要求以后保卫局的情报不给情报局整理。黄自强不同意,情报局更反对。次长杨振很清楚双方矛盾的症结所在,怕闹下去出事情,所以从中调解,力劝双方互相让步。情报局认为自己理由正当而充分(实际上是为了要分赃保卫局的情报费),不肯让步。但是黄自强首先是希望万里浪派能在情报费的分赃方面,多给他个人便利,其次在新开辟地区的特务组织方面,能尊重他的意见就行了。当时万里浪派可能考虑到黄自强在日汪方面都吃得开,得罪了他,对于李士群死后没有靠山的他们来说,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因为汪伪政府的"要人们"都不满意这个特务力量,特别是熊剑东、丁默邨随时准备吃掉他们,日军对他们也不重视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如暂时利用黄自强作自己的靠山。他们认为黄自强的胃口可能不会很大,只要给他一些贪污机会,让他搞一点特务力量,就可以满足了。当然万里浪也担心黄趁机掌握他们的特务力量,所以答应满足黄自强的要求。但是,因为黄独吞了从万里浪派夺来的情报费,没有给我分赃,引起我对黄的不满,同时由于次长杨振的拉拢,万里浪虽同我拉上了湖北同乡关系,还是对我没有实惠——分一点赃给他,所以我仍对万里浪派不满。黄自强知道这种情况后,就对赵不满,使赵决心脱离情报局,乃于1944年2月间,辞去情报局长职务,到苏北兴化去当伪二十二师副师长去了。

五、情报局的罪恶活动

情报局从1943年11月起至1944年2月止所干的罪恶活动如下:

(1)制订了情报搜集与整理计划。搜集计划主要内容是:以保卫局所属苏浙皖鄂赣粤等省(后来增加了"淮海省")的分局、支局、组为主,搜集新四军及蒋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情报,并搜集、监视汪伪政府党政军机关、部队与新四军、蒋方联络等情报。其次是命令伪军参谋处也搜集上述情报。再次是以该部杭州研究所收译的密电作为情报重要来源。此外,还同南京如意里5号日本御用的、由杨振负责的特

务机关交换上述各种情报。

情报局整理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把保卫局各分局、支局、组搜集来的上述各种情报和伪军搜集的情报互相对证，发现矛盾之后，则根据伪军委会办公厅军事司、原特工总部和如意里5号等原先了解的一些比较可靠的情报加以分析研究并修改；命令原来搜集情报的局、组再去复查，搞清楚以后，再按性质编成有系统的情报资料，用文字或图表说明，送日本顾问部，以及送汪精卫和伪参谋总长鲍文樾。

（2）将新四军编制、装备等军事情报送给日军。情报局自1943年11月开始搜集整理新四军的军事情报，到1944年1月止，当时了解的新四军番号有第一、二、三、四、五等师（其余番号记不清了）及一些主官的姓名。编制是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每团三个营，每营四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每个步兵连人数有100至150人。新四军的装备主要是步枪，口径复杂，多为土造，迫击炮、轻机枪也多为土造，手榴弹几乎全部是土造，枪弹缺少。根据地为苏北洪泽湖及鲁南山区，但第五师根据地则在大别山区。还有新四军各旅长、团长姓名，指挥官惯用战法，各部队战斗能力，指挥官特性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1944年1月，情报局把这些情报整理后，附上图表，送日本顾问部，并同时报告给汪精卫和鲍文樾。

（3）派副局长瞿正之到澳门与蒋方特务交换共产党军队的情报。1944年春节前，部长黄自强又派情报局副局长瞿正之到广东去，名义上是视察保卫局广东分局的特务活动，实际上是替黄自强做买卖黄金生意。我建议黄自强派瞿正之到澳门去，与蒋方特务交换关于共产党军队情报（因为据瞿正之说，他过去在蒋的侍从室干过特务工作，同此时在澳门的侍从室特务熟识）。黄自强同意了，据瞿正之春节前回南京后说，他到澳门与蒋的侍从室特务某（忘其姓名）见面谈过，把情报局交他带去的新四军编制、装备等情报交给对方。侍从室特务也告诉他一些陕北八路军的情报。瞿说他们没有书面文件的交换，准备整理后交部长送顾问部。我问瞿正之同侍从室特务还谈过其他什么事情没有？他说没有。赵认为可能黄还叫他代表日军去试谈日蒋和平条件。同时瞿正之究竟去澳门同侍从室特务勾搭过多少次，也不清楚。

（4）黄自强派单独组织特务势力。约在1943年冬，黄自强同伪淮特别区行政长官郝鹏举勾结商妥，在徐州新设政治部保卫局的徐州分局后，同我商量分局长人选，黄提出要叫他的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李某（忘其名）去担任局长，我知道黄早就决定了，于是迎合黄意说："老李为人老实可靠，很合适。"后来就委李去徐州成立了保卫分局特务组织，直属部长指挥。听说后来又在淮阴、海州等地成立了支局，犯下了许多危害人民的罪行。

（1962年）

我所知道的汪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

刘　新*

抗日战争时期，汪伪政权曾在杭州设立过一个极端反动的特务训练机构——中央政治保卫学校。沦陷后期，至少在江浙两省境内的特务分子，有很多就出自该校。我是该校第一期的毕业生，虽然仅接受了初级的训练，但我对于该校全部训练课目与过程，以及受训期内校内、校外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现在，根据我的回忆，将该校情况分述于后。

一、创办的动机与规划

汪伪政权是恬不知耻地以“国民政府”的“正统”自居的。它仍袭用“国民政府”的名义，也仍袭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另在旗顶加一条尖长型小旗，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其内设机构也基本相同。蒋记国民政府有“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汪记伪政权自然也要如法炮制地来搞一套特务组织。只因沦陷前期，已经有所谓的“6号制”的机构（例如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杭州民生路46号，湖州××街96号之类），各省警务处所属的警察机关也设有侦缉队，此外，还有别动队、行动队、特谍队等。派系复杂，各行其是，互相明争暗斗，抢夺地盘，很难统一指挥。于是日伪双方企图通过一次正规化的集体训练，培养出一批骨干分子，把他们分批渗入到各地各个特务机构中去，然后逐步扩大势力，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特务体系，同时有计划地对原有的杂七杂八的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最后取而代之。这就是该校创办的动机。

该校预定计划是设置一个全国性的学校，准备先办初级班，后办高级班。初级班注重普通的军事训练与特工的基本训练，以及各种社会常识，适用于平时地方性的特工；高级班注重技术性的训练，例如电台的装置，炸药与毒药的配制，枪械的装修，各项暗杀方法的实施，适用于战地的特工和特殊场合的特工。初级班的招训对象是中等学校毕业的学生，或相当程度的社会青年，受训期为一年，毕业后即授少尉军衔，分配到各地特务机构里去担任工作，作实习性的服务，再按成绩，升授中尉到上尉军衔。高级班的招训对象是初级班的毕业生升学（由原服务的机构保送），以及大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受训期为一年至三年，毕业后各授少校或上尉军衔，分配到伪中央直属的特务机构中去供职（高级班未及开办，汪伪政权即已垮台）。

---

* 作者当时系汪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第一期毕业生。

原定设校的地点是南京或上海或杭州，最后确定在杭州，并定名为“中央政治保卫学校”。这些情况，我们是在开学和结训两次的“首长”训话中，以及平时几个教官的训授中所听到的。

二、开办情况

1942年9月间，该校宣告成立。校址原在杭州东街路100号，与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分局毗连。后来迁到鼓楼外上仓桥。开学之初，在京沪杭各报刊登第一期招生广告。内容是招收19岁至25岁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男性青年，报名地址是刀茅巷一个小学校里，考试地点是××中学（校名已忘）里。并说明录取之后，来校报到，受训期内，按月发给津贴，供给膳宿及服装、书籍、讲义、文具，毕业后分配工作。这一则广告，吸引了沦陷区里的一批头脑简单、意志薄弱、毫无民族观念和政治立场的失学青年和失业青年。经过体格检查和笔试、口试之后，报纸又宣布了第一期录取学生的名单，共200余名。我即是录取受训的学生之一。

第一期学生，大部分来自上海、杭州两地。其中有刚从学校里出来无力继续求学的学生，有无法生活的失业者，也有不务正业的小流氓，还有原来在汉奸政府混事的小汉奸。他们来校投考的目的，有的是在沦陷区生活困难，既然该校供给膳宿，就来此混口饭吃；有的是汉奸世家，家长是汉奸，叫自己的子弟到这个学校里来谋个“出身”，以便在沦陷区世袭为奸；有些是企图毕业以后，在沦陷区可以腰挂短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三、人事布置与队伍编制

汪伪中央任命黄炳南为校长，黄是汪伪系统的陆军中将，长住南京，第一期训练中，只到过杭州本校一次，当时曾对我们作了一次“训话”。其后校中全部训练事宜，由伪教育长万里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分局长），伪副教育长罗梦芗、陈恭澍负责。关于行政上的科室设置与人事布置，我已记忆不清。我记得对于全体学生采取部队编制，将200余名学生，编成一个大队，设大队长和大队附各一人。第一期大队长更换较频，有胡子翼、胡某某、陈翼之、李应龙、于金鑫（按照前后为序）等人。其中胡、胡、陈均系国民党军官出身，在沦陷区投敌；李应龙原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军官，被俘后投敌，抗战胜利后又摇身一变为忠义救国军杭嘉湖交通站站长；于金鑫原系国民党部队少将军官，被俘投敌。大队下设两个中队，各设中队长一人，第一中队长卓大勋，第二中队长李力军。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区队，第一中队的三个区队长是赵某某、张某、金胤；第二中队的三个区队长是邓某、金雄、娄元凯。每个区队下设三个班，每个班有一个教育班长（都由汪伪特工总部派来的特务充任），教练学生的基本军事动作。每个区队还有一个政治指导员，掌握学生的思想，也由特工总部派来的特务担任。

四、军事训练

第一期受训开始，必须先接受军事训练六个月，每天出操三次，教练军事的基本动作，两次上讲堂，讲授步兵操典和初步战术（正规战与游击战的常识和行动）。完全采用法西斯的日本式训练，教官可以任意打骂学生，学生必须绝对服从，在教“立正”动作时，大队长、中队长时常偷偷地走到正在立正的学生后面，向其腿弯里猛踢一脚，有些学生被他一踢就跪倒在地上，还要受一顿训斥。有的学生向右转、向左转弄不清楚，区队长、班长就拳打腿踢，拉耳朵，打得学生昏头昏脑，越发左右分不清。此外罚立正，在操场上烈日下站个把钟头，更是常事。有一次，教练跑步，步伐老是跑不齐，值星中队长卓大勋大发脾气，下口令叫跑步，一连跑了半个多钟头，有两个学生口吐白沫，昏倒在跑道旁，其余的也都上气不接下气，东倒西歪，越跑越乱。卓大勋却背着手，站在操场中向这些人狞笑。

基本的军事动作教练结束后，又进入持枪教练，每个学生发给步枪一支，步枪少数是三八式的，绝大部分是七九式的，每个学生必须学会步枪的运用技能和零件装卸。第一期的学生还举行了一次实弹打靶，打靶的地点在杭州市郊松木厂，每个学生发给枪弹三发，卧射标靶。这次打靶，伪教育长万里浪带着伪政治保卫局一批大小特务，坐汽车到靶场来视察，万里浪戴着黑边眼镜，个子既瘦又小，而周围的一群卫士和随从，却都是高大的汉子，拥着万里浪走进靶场来，样子很滑稽。那天万里浪也站着打了三枪，又打了两梭子机枪，才带着大小特务一窝蜂回去。持枪教练中，学生动作稍一不对，就被罚举枪立正，甚至“吃”枪柄。

五、特务训练

据伪副教育长罗梦芗向学生说：军事训练是锻炼你们的体格，也是将来做工作时必需的知识，而你们将来做工作的真正本钱还在于用心地学好“学科”。所谓“学科”，也就是各项特务工作的训练，训练的课目包括：侦行术、情报工作、密电码、汽车驾驶、日文、化学、游击战术、帮会常识等。罗梦芗一向吹嘘，这是完全正规化的特务课目。所聘的教官大都是江浙两地伪政治保卫局的老特务。

侦行术教官毕高奎，是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分局的骨干，是校内最有权威的教官，他身材魁梧，肥头大耳，经常随身带着两支手枪，上课第一天就向学生说：“有人打我的话，如果第一枪打不着我，那他就不用想开第二枪。”意思是说他的动作比刺客快，发枪比刺客准，刺客来不及发第二枪，已被他开枪打倒了。

侦行术的内容大体说来，有跟踪（盯梢）、擒拿、狙击（暗杀）、指纹、化妆等。除油印的讲义外，毕高奎还介绍了大量自已的所谓经验。如跟踪时如何进行单人盯梢或两人轮流盯梢，盯梢者距离对象应为多少米，单人盯梢应站在什么角度，两人轮流盯梢时应分别站在什么角度，盯梢前进时应走怎样的路线，在发现自己被别人盯梢时，该怎样利用随身所带的小镜子或商店玻璃橱窗来观察身后盯梢者的动态，如何摆脱别人的盯

梢，等等；擒拿时，要用哪几种手法，如对方抗拒，应用怎样的手法反扭对方的手骨，使对方就范，或使其绊倒就缚，自己被别人擒住时，如何设法解脱；暗杀时应枪击人哪些部位才能致命，在不能使用短枪的情况下，应用何种武器最为妥当便捷。以上种种，在讲义上都有详细说明，并画有图样。讲解时毕高奎还做出各项示范动作，都是非常狠毒的。同时他又说明：这些还不过是知识而已，如果要实行，还得积累经验。将来在高级训练时，还需要经常实地练习。毕高奎又介绍他自己有一次被人双手反扭擒住时，无法解脱。他就用脚后跟猛踢背后人的阴囊，此人痛极，释手蹲地，他才得以解脱。又介绍他的朋友高某，在暗杀国民党要人某某时（名字已忘），因警卫森严，无法用枪，他就设计带两只纸盒，化装送礼，上面纸盒装贵重礼物，下面纸盒装一把利斧。进入内室，当对方欣赏盒内的礼物时，他就用斧头把对方头部劈开致命。对于化装术，他详细说明男人、女人、官僚、军人、文人、商人、工人、农民以及老年人、壮年人的种种特点，以及每一种人的神情、态度、言语、习惯、举动和他们常穿的服装、常带的用具。他还强调并举例说明：要化装哪一种人，就得用心揣摩，一定要做到维妙维肖，不露丝毫马脚。尤其要注意到每一个细节。例如化装一个农民，就应当注意到农民的小腿是紫黄色的，所以要将小腿用荷叶水或黄桔水染过，然后捲起裤脚走路。又如，化装一个乞丐，穿上肮脏的破衣、破帽和破鞋，面孔手脚涂上了泥渣，头发洒过了灰粉，模样儿是可以混过去了，可是你如果忽略了一嘴擦得雪白的牙齿，没有用醋浸药膏涂黑，那么也就露出破绽来了。这些细小地方，普通一般人也许可以瞒过，而比较精细的人，就不免要对你怀疑，如果对方也是一个特工人员，那更是疏忽不得。

情报工作教官李云声，是伪政治保卫局嘉兴支局局长，上海“76号”出身。情报工作是该校重点课目之一，内容从情报员、情报站、情报网的布置设立至情报的分类、编排、分析、判断，其中包括军事情报的搜集重点、情报的刺探和搜集、情报的传递、职业情报员和非职业情报员的掌握和利用、如何利用反间计来搜集情报等。沦陷以后，李云声曾在杭嘉湖地区布置了周密的情报网，用以刺探国民党游击部队与新四军的武器配备和活动情况，颇受伪政治保卫局和日本宪兵队的重视。

密电码教官万德浩，系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分局的电台负责人。他精通电文密码，教学生掌握了许多密码排列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如何通过电台来截获对方的密电码，予以分析并揭破其编排的规律。此外，还介绍设置电台、组织报务译电人员、收报发报的一般常识和特殊技术。

除了上述几门重点课目外，还有汽车驾驶（教官范某某）、化学（教官吴某某，系杭州市某中学教师兼任）、游击战术（教官罗子实，系原国民党部队军官，被俘投敌），帮会常识（教官尚荣周，是杭州红帮大头目，曾任沦陷后的第一任伪省会警察局长），以上这些课目，都是干特务必须学会的勾当。

此外，南京方面和日军也经常派大员来视察训话，谈一些“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言论。这些大员来视察一次，训话以后，就发给学生犒赏，每次都有“储备票”一二千元，供学生大吃一顿，所以大员来校训话，也颇受学生“欢迎”。

六、受训期间所见丑行种种

全体学生在上述这些魑魅魍魉的教育之下，不但学会了一套特务技能，而且也领会了一套阴险狠毒、奸刁虚伪、挑拨离间、诬陷污蔑的种种手段。基层干部如教育班长与政治指导员之间，又拉拢一批学生，搞小集团，互相排挤，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冀在上级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抬高自己的身价，更利用学生希望毕业后分派“肥缺”的思想，而对学生欺骗勒索、强借硬讨。例如上海学生章某，来校时常戴一只欧米茄名牌手表，被政治指导员袁麻子看中了，说是回家探亲，向章借来一用，出出风头，回校后就还章。章某慑于袁的威势，就借给他，不料袁麻子请假一去，一个多月没有音讯，章某看看不对，赶紧去报告区队长，区队长笑咪咪地说：“袁请假不准，开小差逃了，谁叫你把表借给他的？算你倒霉。”又如一中队三区队学生顾某某，家住在杭州艮山门外，为了巴结顶头上司，星期天邀请自己班的教育班长赵某到家里吃饭，一来二往，赵某和顾某某的姐姐勾搭上了，经常到城里来带顾的姐姐去看白戏，就在城里过夜。不料女方通过赵某的关系，又结识了另一个教育班长林某，把赵某丢在一边。赵某气不过，纠集了伪军第一师徐朴诚部的伪兵，把林某打了一顿，打断了林的手臂，事情闹到大队长那边，把两人叫来大骂一顿，不了了之。又如一中队区队长赵某某，家属住老百姓的房子不付房租，房东一再催讨，赵某某恼羞成怒，把三区队学生全部带去，要拆房子，吓得房东连忙请人出来说情赔礼。又如大队长陈翼之，在沦陷前曾与杭州市某丝厂的篮球队比赛，被对方一个队员撞伤胸部，陈到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担任大队长后，就唆使学生球队向丝厂的球队挑战。在球赛中途，学生队借口裁判不公，大批学生冲人球场，把裁判员与从前撞伤陈翼之的球员打了一顿，才耀武扬威地由陈带队回校。

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的学生，在校学得了种种作恶手段之后，虽然尚未毕业，却早已跃跃欲试。在毕业前的二三个月里，学生已经可以穿便衣自由出入了。于是杭州市各种公共场所如电影院、游艺场（大世界）、歌场、舞厅、弹子房等处，便都是这帮人横行之处。大世界内，经常有该校的学生仗势欺人，聚众殴斗。几个歌舞厅经常有该校的学生调戏歌女。例如一中队学生赵靖，在西园歌场为一个歌女与某皮鞋店的小老板争风吃醋，赵靖运用校里学来的擒拿手法，把对方从楼上打翻到楼下。那个小老板的同伴本来想上前相助，一看赵靖腰部凸出一件硬梆梆的东西，疑是手枪，就不敢上前，忍气吞声把小老板扶了回去。其实却是赵靖把一双皮手套叠起来，塞在裤带上伪装内有手枪，藉以吓人。后来这件事被毕高奎知道了，毕就在课堂上对赵靖大加赞扬，认为赵靖利用实物，伪装得很好，很有出息。又如校中警卫队长吴某，与杭州市鼓楼外四美泰菜馆有隙，他与学生商量，要进行报复。当即由二中队三区队的学生高湘圃设计，纠集了本班学生多人，穿便衣到四美泰菜馆，叫了许多菜，大吃大喝。吃到最后一道汤，高湘圃把事先带来的一包食盐，倒入汤里，咸得不能入口，然后把老板与炉台司务叫来质问，炉台司务自己尝了一口汤，也弄得莫明其妙，目瞪口呆，这七八个学生便把碗碟打碎，又打了炉台司务几个耳光，然后分文不付，一哄而出，老板还送到门口，连连赔不是。类如上述事实，是列举不完的。当时在杭州市，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的学生是一个大害。

他们在受训期间，已是如此，毕业以后分布到各地去作恶，广大人民受其荼毒，也可想而知了。

七、毕业之后

第一期学生受训为一年。各课目的学习结束时，都举行考试。在军事方面，要求每个学生能掌握指挥一个班的军事行动为合格。结业前，学校又选出社会关系简单、头脑灵敏、年龄较小的学生30余人，进行专业的译电训练，我也是其中一个。训练结束后，原有伪政治保卫局的电台密码本，全部更换，而将新的密码本交由新的译电员带到各分支局去使用。另有最重要的几种密码本，由分支机构的头目亲自掌握，不让我们使用。除译电员以外，第一期学生，一部分留在校中，作为第二期的教育班长；一部分分派在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分局工作；一部分分派到各地分支机构中去，分别担任情报、侦行、交通等特务工作。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一律给以少尉军衔。分派工作时，由学校发给每人置装费“储备票”200元，作为置办便衣之用，又发给银质圆形纪念章一枚，作为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毕业生的标志。我在毕业后被分派在伪政治保卫局嘉兴支局担任译电员。至于第二期的训练情况，与第一期大同小异。

第二期结束，已经是在1944年的秋季里了。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侵华日军已感到末日将至，一班大小汉奸也都惴惴不安，所以第三期也就没有续办。所谓高级班的训练，也始终没有实现。

八、“终生”制度

我们在受训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首长”的训话，他们说：“你们的事业，是终身事业，从开始受训，一直到参加工作，政府保障你们不失学，不失业，有功则赏，有过则戒，有罪则罚。你们亦应对政府效忠到底。你们应该想想，国家在你们身上花费了多少钱财，我们办校的人，在你们身上耗费了多少心血，你们毕业以后，以及参加了工作之后，就掌握了不同程度的国家机密。你们如果中途变节，开小差，去投敌人，那么不但我们训练出来的人才，去供给敌用，而且那些不同程度的机密也流入敌手，这对国家的损害是多么重大。所以如果有人想半途退学或逃学，以及参加工作之后想开小差，那么这个罪行，比普通逃兵还要严重。老实说，你们就休想活命！”我们听到这种“训话”，大家都有些心惊肉跳，体味特工组织，竟是个“终生”制度，一经陷入其中，就一辈子休想自拔。我本来是一个文化机构的小职员，在沦陷之后，跌进了这个陷坑，心里非常害怕。几次要想逃学，终于不敢冒险。有一天下午，我情不自禁地在废纸本上写了“撞破玉笼飞彩凤，挣开金锁走蛟龙”两句京剧唱词，偶然被大队长看到了，他那一双鹰目盯住了我，好像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半晌之后，他无言而去，我竟吓得吃不下晚饭。

还有一个姓朱的学生，他被认为是“意志不坚定”的。他家住杭州艮山门外。有一天他父亲死了，他母亲来叫他请假奔丧，大队长竟不予批准。后来他母亲哭吵不休，

大队长就恶狠狠他说："好吧，准你两天假，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日，限你到下星期一中午归队，逾限，就当心你的脑袋。"

校方虽然有这个"终生"的制度，但开小差的学生还是有的，基层干部不是奉命调动而私自离职的尤其不在少数。如前面所说的政治指导员袁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事后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九、垮台之后的情况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南京伪政权系统的大小机构一齐土崩瓦解。已在各地服务的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同学，自然是树倒猢狲散。不过也有一部分人寻机向国民党军统靠拢。居然也有人摇身一变成为军统的小走狗了。在沦陷之前有正当职业，一经宣告抗战胜利，仍然恢复本业的，也大有其人。不过对过去这一段丑史，大家都讳莫如深，对旧时的教官和同学，多数断绝了来往，还有一部分人改姓易名，不知去向。

当时的伪教育长万里浪和教官毕高奎，我知道他们在当年的冬季里，还在上海，与军统特务的头子们勾勾搭搭。在国民政府接收了伪上海市警察局之后，毕高奎居然当上了督察长。有几个旧时的伪中央政治保卫学校同学，以为教官既已摇身一变，徒弟们或可忝附骥尾。于是筹到了川资，备好了礼物，专程到上海去拜望教官。想不到狠心辣手的毕高奎对他们面孔一翻，眼珠一瞪，说："我本是国民党派在沦陷区里的地下工作人员，你们都是甘心附逆的小汉奸，谁还是你们的老师？我本来是要逮捕你们，你们来得正好。"马上命督察处警士将第一批去的几个学生，一齐扣押。第二批原准备去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连忙缩回了头，乘当天火车回杭州。后来被押的人也回杭州了，据说被关了两三天，才有一个督察员去把他们释放，同时警告他们说："从此不许再提毕高奎是你们的老师。"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杭州的同学，有人看到毕高奎从火车站出来，衣服褴褛，面容憔悴，自己背着铺盖，后面跟着几个武装警士，坐上一辆铁皮车，离站而去。大概毕高奎恶贯满盈，已在上海被捕，而押解来杭州归案了。几个月后，人们从上海的报纸上，看到万里浪等许多老特务被枪毙的消息。

（1963年）

汪伪政训机构及其内情

方 诚 修*

一、汪伪政训机构的设置及其目的

当华东、华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以后，在日军占领区先后有“维持会”、“维新政府”，而到1940年3月汪伪政府的“还都”，为了维护伪政权而建立的十个军团和保安队等地方武装约有96万人。这些伪军多为收编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溃散之众，加以地方上应时而生的盗匪游勇被陆续改编，有的则是叛变投敌的旧军阀残余。汪伪组织成立后，为巩固其反动统治，首先必需切实掌握这些军队。为此，在伪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政治训练部，在政训部之下，又开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从各部队中保送一部分学员并招收一部分学员集训，灌输反共亲日的荒谬理论，培养一批嫡系势力作为维护和巩固伪政权统治的中心力量。

（一）各层政训机构的编制及其具体任务

伪军委会政治训练部（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由伪立法院长陈公博兼任部长，富双英、刘仰山任次长，掌握各伪军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动态，掌握各军少校以上政训人员的委派，并直辖政训班，调训和招训政工人员，训练期满，直接派往各军、师、团充任政工人员，颁发反共亲日宣传纲领，搜集各军、师的情况动态，总管各军所有政训经费颁发等任务。军设军政训处，置上校处长一人，中校科长二人，少校及上尉科员四到六人，中尉办事员及少尉司书若干人。师设师政训处，置中校处长一人，少校组长二人，上尉科员二至四人，中尉干事及少尉司书若干人。

军、师政训处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协调与部队间关系，使各层政工人员能够顺利安排到各团、营中开展基层活动；奉颁宣传纲领转令实施、拟订宣传标语口号并下达实施；参加地方民间活动，藉便搜集各项情报（包括新四军和游击队的动态、伪军敲诈勒索的行为）；利用节日集会及剧团的演出，进行反共亲日的宣传；组织剧团宣传演出，及其有关事务的处理等。军、师政训处除隶属于伪军委会政训部外，还受所驻军、师部队的领导。除经费的领取和特殊情报直接向政训部领取或汇报外，一般行文，均以军、师部名义呈报或转发各层政训室，但各层政训人员的委派和更易均需呈报伪军委会核准。工作情况以月报形式汇集上报。

---

* 作者当时曾为汪伪政治训练班第三期学员、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上校科长。

团设政训室，置少校政训员一人，上尉干事三人，中尉干事一人，少尉司书一人，勤杂人员一人。团的政训工作是基层的实际工作，上尉干事三人，分担三个营的具体任务，分别轮流下连，进行士兵识字教育（根据伪中央统一颁发的士兵识字课本），教唱所谓的“和平”歌曲，宣传“和平反共建国”思想，进行荒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讲演，张贴标语。进行驻地民间访问，藉便搜集情报，探悉周围国民党军队、新四军和游击队的动态及驻地伪军敲诈勒索的情况，向政训室汇集上报。政训室并需每月将工作汇报一次。上尉干事根据所驻部队的具体情况，或驻团政训室轮流下营连工作，或是驻在营部。如驻浙江嘉兴的伪暂编十三师，团政训室只允设在一个营内，上尉干事则分担三个连的工作。政训人员常为部队所排斥，认为他们是监视自己的特工人员，相互间有一定隔阂。

（二）政治训练班的设置及其训练的内容

1. 训练的建制

1940 年 11 月，伪政训部在原励志社（今南京中山东路钟山宾馆内）设立了一个政治训练班，由伪政训部长陈公博兼任班主任，伪政训部次长富双英、刘仰山分任副班主任和教育长，伪军委会军令司政训司长周正己任教导处长，下分教导组和训导组，置教导员和训导员若干人。另设总队部，总队长鲍文沛系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的兄弟。第一、二期均训练四个月。第一期完全由部队包送，约七八十人；第二期一部分由部队保送，一部分招考录取，分高初二班。由于原励志社改为伪陆军军官学校，政训班第三期（我系该期学员）就迁往伪行政院内，原总队长鲍文沛改任伪军校总队长，改由王震任上校大队长（王在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

2. 训练的对象

政训人员直属伪政训部领导，派往各军层内部，不易为部队所接受，故第一期训练的对象，均是由各部队选送少校以上的人员前来政训班学习，通过训练的学员，便与伪中央产生一定的从属和联系的关系，结业后派回原部队任政训工作，不仅使部队易于接受，同时也为以后各期政训班结业学员的分配打下基础。第二期高初班各均约五六十人，结业后，高班以少校或上尉，初班以上、中尉派往部队担任政工人员，原调训人员保持原有阶级。第三期学员全系招考录取，约 50 人，必须具有大专毕业学历并担任委任官二年以上的资历方得报考，训练期仅一个月，训练期满仍以少校或上尉衔派往各部队担任政训工作，一般提升较快。第四、五期保送、考取各半，训练期半年，结业后仍继续派往各部队担任政工人员。

3. 训练内容

在思想方面，主要是灌输“和平反共建国”和“大东亚共荣圈”等汉奸理论，麻痹学员的思想，销蚀他们的抗日意志。以小组讲座等形式辩论，外表是锻炼各人发言的能力，实际侧重于考察各人的思想情况，看看有无共产党进步思想的渗入。稍有疑问，即个别谈话，同时也借此衡量各人的能力和水平，为结业分配提供参考根据。

业务方面主要有群众训练、地方行政、谍报搜集、日语、陆军礼节、步兵操典等课程，还有教唱“和平”歌曲，及邀请高级伪军政官员讲话，着重为反共亲日作辩解。

基本军事教练主要是陆军礼节、徒手教练的基本动作要领、军事操练的基本知识。

通过政训班训练的学员，即与伪中央产生了嫡系关系，如在谒见部“首长”、班领导时，都能优予接见。分配到部队中的主要任务，首先要搞好与所在部队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部队长官的出身经历、兵源来历、关系背景，以及思想动态，了解部队经费的来源，如何征集，有无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的行为并及时秘密报告。其次，对士兵进行识字教育，教唱所谓“和平”歌曲，并利用晨操及集合的机会，随时作精神讲话，宣传反共亲日的政策。再就是要深入驻地民间搜集情报。

1942 年 2 月，政训班第三期训练期满，结业典礼在伪行政院大礼堂举行，伪院部“首长”应邀参加。结业典礼由陈公博主持，首先报告了政训班第三期训练情况和对学员结业后的具体要求，由伪主席汪精卫亲自“训示”政训工作意义及所负的使命和希望。汪身着军服，佩以金板三粒金星及青天白日环以红圈边“国徽”的特级上将领章。汪亲自向学员一一颁发结业证书，同时颁给各人指挥刀一把，上刻“汪兆铭赠”字样，继又发给 16 英寸放大的汪精卫和陈公博的照片，上书“某某同志”，下衔分别为汪和陈署名盖章。

二、汪伪政训工作的实施

汪伪时期政训机构的具体目的与要求，在实施中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城市的驻军和军事教育单位，尚能在表面上作一些形式上的宣传，至于小城市及偏僻地区和乡镇驻军所在的政工人员，多半是与伪军沆瀣一气，敲诈勒索，花样百出，相互之间勾心斗角。

政工人员接触到的多是在团队的基层人员，搜集情报是其主要任务，而对周围新四军、游击队的动态，既因编制所限，更无情报人员的派用，只有从所在部队情报中窃取一些情况或虚构应付，上层亦明知不究。因此，主要是搜集所在地伪军敲诈勒索的情报。师政训处获得此项情报后，常藉以向所在伪军卖交情，索贿赂，而团队对政训室工作人员则表示愤恨，加以排斥孤立留难，使团政训室不仅例行的活动无法开展，团队官佐更以语言相讥。这就使他们对本身处境，大有安危之虑，对上级政训处产生极度不满，不甘再为其效劳卖命。再是目睹客观环境，团营连长拥妻蓄妾，外出时警卫成班跟随，挥霍阔绰，而政工人员官阶虽高，但仅凭微薄工资，生活也仅勉强应付，孤身出入从无警卫跟随，连一支短枪都没有。在那羡慕虚荣的客观环境下，连士兵也都对政工人员十分轻视，政工人员的训话常被斥为“卖膏药”的。因此，很多团队的基层政工人员，只好卑屈地与所在部队联系，有的甚至向所在的团营长递帖子拜做“老头子”倚为靠山，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有的则消极悲观，抱着混的态度，到月领工资罢了。

（一）军师政训处的工作简况

当时汪伪军队设有政训机构的尚不及半数，很多伪军均无政训机构的建立。因为没有一定的联系关系，各部队对派来的政工人员不愿接受，即使在已建立政训机构的伪军部队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以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为例，其相等于军部的设

置，共辖有四个团，一个特务大队，共建立了五个政训室，由于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保安司令，他又是伪政训部长，所以在各团队的政训室工作实施中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上校政训处长吕琪也具有一定的背景，他有专用汽车，有持枪卫士跟随，每晚逛舞厅，派头十足，与各团也有较好的关系和联系。1943 年浦东实行所谓“清乡”，政训处为配合伪清乡队而建立了一个宣传队，进驻浦东高桥镇。这个宣传队却成了一个特务队，逮捕商民并吊打勒索。浦东只有很少的国民党游击队，平素相互均有联系。有一个名叫张林根的日本密探，与国民党游击队和伪军均有联系，从中调和相处。所谓“清乡”，雷声很大，实无接触。“清乡队”下乡，只是增加了地方受骚扰和敲诈索求的灾难。

由于上海政训工作的特殊条件，村头巷尾书写了“中日合作”、“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共同反共”的大幅标语，在团队中对士兵的识字教育和教唱所谓的“和平”歌曲。基层政工人员由汇报团队的违法情报，而转为相互勾结，营私舞弊，谋求自身奢侈腐化的享受。各政训室对政训处还得烧香献佛送礼联系。

1945 年初，伪军委会以上校科长派我往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该政训处是新成立的，少将政训处长张道生与我同车前往江苏泰州总部驻地，讵料张道生抵达泰州后，他即签由总司令批准由我代理处长，他领了开办费和三个月政训处的经费，前往盐城贩盐。他原是我受训时的训导员，此次是他亲自到我家邀请前来。至于他去盐城贩盐，叫我代理处务，事先并未与我洽商。临行嘱我工作要“有声有色”，要经常在报端鼓吹工作实况，对经费等困难问题，嘱与司令部参谋处杜处长联系。

当时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兼汪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驻扬州，所以方面军副总司令及参谋长，均随驻扬州。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驻在泰州，一切政令由参谋处杜处长全权负责，当时总司令部对外参加会议，均由杜处长嘱我代表司令部出席。时值该方面军投敌三周年，称为“复员三周年纪念”，又责嘱我分撰总司令、副总司令及参谋长的告群众书及总司令部大门楹联等，由此得到杜处长的信任，因此才能商得对政训处办公用具的领取、工作人员伙食的供应（政训处所有经费，原是直接从汪伪中央领取，部队概不供应）。

政训处的人员除我以上校科长代理处长外，仅有一个中校科员，两个少校科员，两个中尉干事，一个少尉司书，一个勤杂人员。其余名额均为处长张道生所侵占。全处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没有一支短枪，更谈不上公用汽车。当时我着西服，不着军装，佩戴伪第二方面军总部白底金字圆形证章（上校以上方可发给佩戴），藉以进出营门。

当时驻泰州的是伪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是孙良诚族弟，伪三十八师中校处长吴贯一经常前来与我联系，告以该师政训处亦系成立不久，团政训室尚未建全，间或进行一些士兵识字教育和晨操训话，但亦未能持之以恒，师政训处工作一般均未开展。他晚上经常邀我上馆子逛窑子，均是他所花费，不知他究有如何额外收入。两个多月我不仅从无额外收入，连工资也分文未得，还得劝慰政训处工作人员静候张道生处长的归来。

政训处经常的行文，除了对发布的宣传纲领拟以“转令各军政训处转饬所属，切实遵照宣传”，以及对一些人事调动情况转达存查，所有工作人员几无所事事。

1945 年 4 月新四军解放了盐城，伪四十一师被解决。孙良诚带了日军 300 人前往阻击，但途中即返回。不久，时值任伪湖北省秘书长兼武昌县长的蒋镇东来电，以适有

专轮在南京，嘱我即时搭轮西上，允荐为伪湖北省会警察局长。权衡时势处境，我即自动离职前往武昌，结束了三年多汪伪政训一幕。

（二）团政训室基层政训工作的简况

团是基层的政训单位，也是政训工作实施的实际工作面。由于政训经费直接由汪伪中央颁发，所以政工人员常以独立姿态，不甘接受团队的约束，诸如集合、出发等，不去参加，自由散漫，团队又多对政工人员视为内在的特工人员，时加警惕防范，倘不能联系得当，不仅工作难以开展，且本身处境尤多安危之感。所以团队的政训工作能否顺利实施，不仅应视所在团队长官对待政训工作的态度，同时也决定于政工人员与团队联系的情况和本身工作的能力及工作的方法。

再是团政训室对上报的有关团队违法的情况，政训处是否藉此向团队有所索求，这是一个关键。团队的一些非法收入，是否对政工人员稍能有所补贴，也是能否相互处好关系的一个实际问题。以上这些情况，在大城市及军事教育机关的政训室不在此例。特别是很多政工人员为了谋求自身的奢侈享受和追求，对待工作只是表面应付，未能达到汪伪中央预定的要求。

1942 年 2 月，我以上尉干事派往上海驻嘉定的伪保安第二团政训室。该政训室少校政训员傅匡时是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卢英的干儿子。伪保安第二团团长陈伟民原名陈复祥，系由游击队收编，他与副司令卢英具有帮会组织的联系，这是极其有利的条件。傅匡时并非政训班毕业，年纪不大，上海人，十分油滑，点子很多。有一次，陈伟民的九姨太与他的警卫通奸被陈发现，陈不动声色，未隔几日的夜晚，假以发现游击队，集合出发，距城数里即将该警卫员击毙，谎称被游击队所击毙。事后相互流传，尽人皆知，少校政训员傅匡时就出了一个鬼点子，假造了一封匿名信，向政训室秘告，列举上项前后事实。他却持了此信见陈，出示此信，陈阅悉后面色顿变，傅即当面将此信撕毁，并表示今后一切工作与团长一条心，站在一条船板上，从此获得了陈的信任，并即以 2000 元插入其袋中。此后不久，首先是政训室工作人员与团部官佐共同就餐，随后团长又按月津贴政训室 2000 元，3 个营长每月各自津贴政训室 500 元，10 个连各津贴 200 元，当时一个上尉干事月薪仅 370 元，总计每月政训室共获得津贴 5500 元。这些津贴是少校政训员出面联系，所以他独分 2000 元，上尉干事各得 800 元，中尉干事一人分 600 元，准尉司书一人分 500 元。其它地方收入均由团队收取，政训室不再索求。工作上有时教士兵识字和教唱“和平”歌曲及训话宣传，聊以应付外表，月报虚饰应付。上尉干事 3 人有时分别到各营连的所谓视察，除招待酒食外，例赠路费一二百元。

其他各个部队的政工人员很多进行贩毒、贩私营运，也由团队予以支持。当地赌台烟窟，按月亦给予补助。有的由团队供应伙食，有的团队每月也予以不同的津贴资助，有的团队对政训室并无资助，各自寻求本身利益，但绝少反映团队违法行为，因其本身也在进行非法活动，与团队“和睦”相处，“政训”只是表面应付。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汪伪军队实施政训的一般情况。

（1990 年）

记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

金 湛 庐*

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是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南京汪伪政权承日方之命组织起来的一个物资掠夺机构。它的下面还有两个专业性的执行机构：一个是米粮统制委员会（简称“米统会”）；一个是油粮统制委员会（简称“油统会”）。本人当时先充“米统会”的秘书，后充“油统会”的秘书，对于它们的内幕情况知道一些。今就回忆所及，记述如下。

一、所谓统制物资的“南京会议”

1942年，汪伪政府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统制物资”之命后，就于这年夏季，在南京召开一个有日军首脑监临的会议，南北各省伪组织都有人参加。不过这时的南京伪政权，名义上虽说是“中央政府”，而实际上只能控制苏、浙、皖三省的部分地区和南京、上海两市。此外华北、华南各省伪组织，各有日方的陆海军做靠山，与汪精卫貌合神离。因物资统制的实施，势必影响本身的经济利益，在自己割据的地区之内，不愿接受统制的拘束；况且事属初办，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统制的戏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所以在会上，大都冷冰冰地无所表示。在听过了日伪首脑的一番“大道理”之后，也都唯唯诺诺，没有积极明朗的表示，只因事在必行，当时就通过了一些原则性的决议，而由日伪双方指定一批所谓经济专家研究具体的方案。后来又在日本东京请来一个德籍统制专家古德奥（据说此人在希特勒手下办过统制业务）担任中国物资统制的专门顾问。这批“专家”在这位“客卿”的协同之下，足足研究了几个月，总算订出了一套办法。

按照南京会议的决议，统制先从汪精卫直接控制的三省两市办起，然后准备推行“全国”。统制的物资，先从米麦杂粮和食油办起，然后准备推行到其它物资。又决定先设总机构于上海（就是后来的“商统会”），后在总机构之下，按照各项物资的传统类别，分设专业性的执行机构（就是后来的“米统会”和“油统会”等）。专业机构之下，再按物资的集散情况，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就是各地办事处）。又规定总机构与各专业机构的领导人，直属汪伪中央，采用委员制，其名称与人选由汪伪中央决定公布。

此外，关于物资统制的门类，以及统制进行的办法，还有比较具体的方案。只因日伪当局恐怕物资逃避，绝对保密，外面很少有人了解。不过我后来知道“商统会”之

* 作者当时系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下设米粮统制委员会和油粮统制委员会秘书。

下，要分设米粮、油粮、纱布、五金、日用品等五个“统委会”，从中可以看出它所准备统制的物品包括吃的、穿的、用的，不论是农产品还是工业品，也不论是中国货还是外国货，都在统制之列。关于统制办法，后来在实施中可以看出：凡是某项物资一经宣布统制，就由“统委会”核定一个极低价格，向生产者分头收购，使物资集中；然后让日军先来提购军需品，再把余剩物资另定高价，向民间的消费者分头销售。这个办法，可以使日军方面不费多大的人力财力而优先尽量获得军需品，又使汪伪方面的统制机构，可以在老百姓身上狠狠地捞一票。

关于统制机构的名称问题，伪方首脑也曾经过一番讨论。最初拟定名为“全国物资统制委员会”或“全国物资管理委员会”，后因“管理”不及“统制”来得具有约束力，于是决定用“统制”。又因“物资统制”这个名称，容易使人感觉物资享用的不自由，引起民众的反感，于是，决定采用“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的名称。从字面上讲，它是对商人统制，不是对民众统制，可以不使民众发生情绪上的刺激。至于后来几个专业性的“统委会”，虽然没有加上“商业”两字，可是讲起来，仍然可以说：它们是在“商统会”领导之下，对各该本业商人的统制，对民众的物资享有方面并没有多大关系。这一种文字方面的花招，多是汉奸们想出来的欺骗手段。日军只要达到掠夺物资的目的，就听凭他们去挂羊头卖狗肉。

总机构的名称既定，其所属的几个专业机构，只要加上一个专业名称就行。最初的计划，要分设粮食（包括米、麦和各种杂粮）、油脂（包括食用油、工业油和照明用油）、纱布、五金、日用品五个“统委会”。后来因为稻米关系最为重大，决定先成立“米粮统制委员会”专搞稻米，而将麦、豆等杂粮划入“油脂统委会”，称为“油粮统制委员会”。作者对“米统会”和“油统会”都曾亲身参与其事，资料比较多一些。对“商统会”，就只知道一个概况。至于其它几个“统委会”，是否曾经成立，是否正式展开工作，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混乱，迄今事隔20年，已有些记忆不清。现在专谈“米统会”与“油统会”，而在隶属关系上，顺便谈谈“商统会”。

二、统制机构的建立

在南京伪政权订完了统制规划，决定了统制机构的名称之后，就于1943年的上半年，明令发表，并特任唐寿民为“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闻兰亭为监事长（1944年6月闻兰亭改任理事长，唐寿民任监事长），特任袁履登为“米统会”主任委员，陈国权为副主任委员，任命林康侯、陈子彝、陈光中、姜可生、戴蔼庐、奚则文等人为委员。之后，又发表特任陈子彝为“油统会”主任委员，任命杨河清、凌养和、苻前耕等人为委员，后来陈子彝辞职，改以杨河清为主任委员。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本来是上海“商界闻人”，向有“海上三老”之称。陈国权是广东人，日本留学出身，曾充日商洋行的买办。陈子彝原是上海大粮商顾馨一家里的教书先生，向来也做杂粮生意。陈光中是浙江温州人，在他任伪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时就奉令免除“米统会”委员兼职，改派奚则文接替。姜可生是芜湖大米商。戴蔼庐是杭州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曾任上海银行周报编辑，后又任日本人办的华兴银行经理。杨河清是上海固本油厂

经理。凌养和、苻前耕都是上海有名的杂粮商。

南京伪政权发表命令，就在上海成立机构。“商统会”设在环龙路，“米统会”在泥城桥伪市商会内（后迁跑马厅），“油统会”在外滩南京路口之处前中央银行大厦五楼。

（一）“米统会”的内部组织和职员

秘书长周纯裕，上海人，日本留学生，与陈光中同学，入“米统会”是陈光中所荐。秘书陈泽远，山东人，兼机要课长，原与袁履登素不相识，但入会后，很得袁信任，在一般秘书中，权势最大；秘书陈听潮，原上海《社会日报》编辑；秘书潘孟翘，上海人，与银行家张公权有关系；秘书邹梦禅，温州人，与陈光中同乡同学，后充总务处长；秘书狄柔，常熟人，原上海律师；秘书狄华，常熟人，原上海律师；秘书吕白华，绍兴人，原上海新闻记者；秘书金湛庐，杭州人，原上海新闻记者。

总务处长吴桓如，前教育局科长，后辞职，改派邹梦禅。机要课长陈泽远兼，文书课长邹梦禅兼，会计课长、事务课长的姓名已忘。采运处处长严际云，上海一家米行的小老板；副处长顾辑人，原上海杂粮商。储配处处长陈子彝兼，后辞职，处亦撤销。财务处长戴蔼庐兼，副处长平仁斋。

“米统会”后半期，内部改组为总务处（处长邹梦禅兼）、业务处（处长顾辑人）、财务处（处长仍为戴蔼庐，副处长仍为平仁斋）。

此外，日军方面派宪兵大佐冈田到会坐镇，做“米统会”的“太上委员”。又派植田贤二郎做副主任委员驻会办公。还有几个“嘱托”（日本职名）时来时去。

（二）“油统会”的内部组织和职员

秘书长周景贤，日本帝大经济系毕业，与周佛海有关系。后与陈子彝同时辞职，由陆庆誉接充，陆是湖州人。机要秘书火雪明，上海人，原是小报记者；机要秘书狄柔、金湛庐，原为“米统会”秘书，后同时辞职，入“油统会”；秘书王文津，上海人，秘书陆景介，苏州人，国民党特务；秘书章某某（名已忘），前杭州浙江兴业银行秘书；秘书郭令之，原上海中医师，是闻兰亭的老友。

“油统会”内设总务、业务两大处，处以下分科。处长、科长多数是油粮业商人，职别和姓名均已记不起。

此外，日籍职员，男女老少都有，人数比“米统会”多，约占全会三分之一，各处科差不多是日伪人员的混合组织。还有日本陆军和海军方面所派的“嘱托”，驻会办公。

“商统会”在成立之后，闻兰亭等粉墨登场。其首要任务是设几个专业“统委会”。于是天天开会，拟订规划，安排人事。闻兰亭、袁履登等往来于京沪道上，着实忙了几个月。可是后来“米统会”、“油统会”相继成立，实际工作有这两个机构去具体执行，其它纱布、五金、日用品等三个“统委会”一时又不易组织，“商统会”就只存着一个领导统制的空名义。有时碰到几个综合性的统制问题，也只要召开一个会，做出一个决议，向南京伪中央做一个汇报，向米、油两会发一个通知，就算完事。会里职员除写写

例行公文、编编统制会刊，就无公可办。闻兰亭年迈体衰，每日在家享乐。不过“商统会”办公费每月有大量节余，自有他的驻会职员开好支票送去。米、油两会，每月也有一张支票送去。每遇到米、油两会或其它机关宴会，总有他的一份请帖，会里一大群男女职员，整天谑浪笑乐，醉生梦死地搞了两年，与日本投降同时垮台。

三、“米粮统制”黑幕

“米统会”自成立之前由南京汪伪政府拨到一大笔办米资金后，袁履登等十几个委员，与秘书长周纯裕就带一大群秘书和处长、课长等走马上任。自然由日方冈田大佐所领导的日籍人员领先押队。“米统会”宣告成立，所谓全国性的米粮统制就此开场了。

上海本会成立之后，又在江苏省所属的无锡、常州、常熟、镇江、扬州、高邮，浙江省所属的嘉兴、平湖、硖石，安徽省所属的芜湖等产米地区设立办事处，建立统制点，布成统制网。芜湖是皖省米粮的主要集散地，“商统会”推派委员姜可生前往主持。其它各地也都由会指派主任分头开办。

米粮统制，基本上是按照汪伪中央所订的原则和由“商统会”所订具体办法和手续展开的。它招致各米业中人来做该会特许的“采办商”。每一“采办商”预缴保证金十万元（永久存会，不给利息），就取得一本储备银行的“承兑汇票”。其后，由采运处指使他们到产区去采办米粮。“米统会”向“采办商”收购稻米的价格，一律由“米统会”核完定价，据该会估计，是可以包括“采办商”的利润和运费在内的。“采办商”到地方办米，先与当地办事处取得联系。办到了米，就用“承兑汇票”通过办事处的保证，向当地或附近的储备银行支款，付给米价。每次办米的总值，以不超过保证金额为限。办到的米，由该会储配处指定仓库存储。“采办商”在取得了仓库的收据之后，向该会结账。然后再进行下一次采办。这个办法就是叫“采办商”先将办米的资金以保证金形式缴存于会，等到米采办到了，才把米款付给他，设想也很为“周密”。

这个办法，实行了一个很短的时期，那时米粮市价逐步上涨，而“米统会”的核定价，只作了几次少许的调整。“采办商”替“米统会”办米，不但无利可图，而且有亏本的危险。比较老实些的只得停手不办。还有一批米商，就施展其投机倒把手法，连续发生“飞过海”、“拔短梯”、“推开鱼盘吃豆腐”等等弊病。所谓“飞过海”，是将办到的米不向“米统会”缴售，而全部向市场销售；“拔短梯”是将办到的米，一部分向会缴售，隐匿一部分向市场销售；“推开鱼盘吃豆腐”是将办到的米向市场售出，将售得之款另作其它物资的贩卖。对此种种现象，“米统会”无法控制，只得相应地改变办法，规定“采办商”每次办米以半数缴售于会，按规定价计算，名之曰“征购米”；其余半数，准许“采办商”自由出售，利润即归“采办商”所有。“采办商”领用承兑按核定汇款，亦以半数为限。这个办法，就是“采办商”向该会亏本卖米，而放任他们在自由销售中去捞回来。自从这个办法实行之后，核定价的调整较前更为缓慢微小。同时，“米统会”的征购额也随时有所调整，但提高的时候多，而减低的时候少。这样在“采办商”的算盘上，还是打不通。上面所说的种种现象，仍然不断发生。

这时，“采办商”与“米统会”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对立的状态，相互勾心斗角。

"米统会"终于想出一个签发"采办证"（俗称"派司"）的办法。它规定凡是该会的"采办商"办米，先向该会请发采办证，证上注明采办的数量；办到米后，由"米统会"按核定价收购五成，而另发20%的物资券。这种物资券，可以向指定的日商洋行按市价购买"洋烛、洋火、洋皂、洋油、洋烟"等外国产的日用品（当时的黑市价比市场价要高几倍），作为奖励；废止承兑汇票，保证金也不发还。这样一来，"采办商"有优先采办之权，无证就不许采运。可是，非"采办商"也可以通过"采办商"领证去办米。这个办法，在"米统会"想来，既可以扣紧资金又可以扩大米源，对该会是有利的。可是事态的发展并不符合"米统会"的如意算盘。因为那时的米价每日飞涨，"米统会"的核定价，无论怎样增加，总跟不上市价上涨的速度。"采办商"运用自己的资金，上午进货，下午销货就可以获利，何必来受"米统会"的拘束。况且地区很大，办米的人数又多，不要说"米统会"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汉奸没法应付，就是凶恶的日本侵略军也无法控制。所以无证办米，以及领证而不照规定向该会缴售征购米的情况，仍然很多。这种事件固然多少要受"米统会"和当地办事处的干涉，可是钱可通神，"采办商"只要与有权的关系方面讲妥了"互惠条件"（详见下文），何愁办不到货呢？起初，"米统会"以为抓住了"采办商"十万元保证金这条辫子，便不怕他们调皮捣蛋。可是那时的币值，连续猛跌，这十万元即使"米统会"予以没收，也是所值无几。况且这一班"采办商"，多次投机倒把，早已获利百倍，区区十万元哪里还摆在心上。

那时"米统会"已有尾大不掉之势，收购米粮每次不能足额。冈田大佐说，贻误军粮要"死拉死拉"的。这批大汉奸害怕断送头颅，于是再动脑筋，另想别法，又规定：除"采办商"办米依旧征购外，凡是非"采办商"贩运稻米满一石以上一概按核定价征收二成。那时，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因粮店存米不敷供应，多向近郊农民高价收购。农民将自食的米运进城市沿街叫卖，多到一二石，少到二三斗，城市居民的粮食相当一部分即依靠他们来接济。自从上述办法一宣布，这一批零星小贩也要缴售征购米了。

米业奸商有在米袋里掺杂泥沙的恶习。这次统制开始，奸商们在民食米的袋里，每一石至少要掺入五升到一斗的泥沙。这一种泥沙，苏北地方叫做"并肩泥"，意思是说它和米粒同样大小也同样颜色。制造这一种"并肩泥"，另有一种手法，沿江沿河的地方，有专做"并肩泥"的人，"米统会"的"采办商"多是他们的老主顾。会中人与"采办商"订立"互惠条件"时，有些也讲到"并肩泥九五"或九折，就是说每石掺入五升或一斗。

以上种种，说明了"采办商"营私舞弊的手段。可是"米统会"中的大小汉奸们的营私舞弊，尤其搞得厉害。"采办商"有一部分劣迹，就出于会中人的勾结和策动。他们戴着汉奸帽子做粮官，也就依官托势搜刮钞票。现在再把详情补叙于下：

"米统会"开出门来，就对"采办商"采取每一"采办商"至少要付五万元的运动费，才能挂得上一个名字的手法。名字挂上后再讲条件：一种是"开头炮"，在出发之前先送一张支票；一种是"拔回佣"，每石提供多少钱；一种是"搭干股"，讲定几股，事后分赢不分亏；一种是"抢帽子"，在征购价中削低几成，提作孝敬……这些作

法，还不过是中下级奸员的“小刀子”，大进大出的“采办商”有时也得对他们行贿。至于有财有势的大汉奸，他们搞起来，作风又是不同。

秘书长周纯裕，拉拢会外几个资本家，组织了一个银团，用假姓假名假牌号，在会里挂一个“采办商”的名义，同样缴存保证金，同样领用承兑汇票。可是“飞过海”、“拔短梯”、“推开鱼盘吃豆腐”之类的花样，他玩得最早，做得最狠。在“米统会”对城市小贩实施征购的时候，有一次，他那银团贩米一万石，到上海销售。在货到的前两三天，他就以秘书长名义下一个通知给城郊交通路口的检查站，说“从明日起，商人贩米入市，每五斗按征购价征二斗”。原来的征购额，是每石二斗，这一来，就加上了一倍，并且不满一石的，原先不予征购，后来也要征购了。这就使当时的米价，受到极大的刺激，突然提高了不少。过了一二天，他那银团所运的米到上海，就在这次涨风里卖出，平空地多捞到一大票。至于他这一万石，“米统会”到底征购了多少，那就只有天晓得。后来，这件事招摇得太厉害，会里几个中级日籍职员未得分润看了眼红，就向军部方面泄了底，军部方面就把周纯裕逮捕，关进监狱里。

“米统会”里一部分高级职员，原是米业中人，他们也另立牌号做“采办商”。他们楼台近水，关于米业中的经济情报，多半是他们先得到。有几次涨风就是他们制造的。他们采运一次至少要在一千石以上，如果不到一千石，就称为是“小儿科”。有的市场上米源枯竭，而与“米统会”高级人员有关系的粮行或粮店却有大量屯积。还有几个高级人员，原来不是米业中人，也多化名开出米行或米店来了。同行中有时给他们算算进货账与销货账，往往销货多而进货少。他们究竟有哪儿处秘密来源，只有鬼知道。

在签发采办证的时候，“采办商”如果不走通某委员、某处长的门路也是领不到证的。有一个时期，全部采办证就由几个委员包办，后来索性有一定价格公开出卖。

以上这一些鬼把戏，后来会中的日籍职员搞得更厉害。甚至提供军用的米，他们也敢运销于市场。

四、“油统会”统制不了日商

所谓“油粮”按照原定计划是包括食用油、工业用油和照明用油，以及豆、黍等各项杂粮在内。后来因为工业用油和照明用油多数是外国货，于国际贸易有关，一时不易加以统制，于是缩小统制圈，先办食用油和一切杂粮。它的统制地区是津浦铁路线上的徐州、蚌埠一带，以及苏皖两省境内的长江和淮河沿岸。

“油统会”里的日本籍、中国籍大小人员，多数是商人，所以一踏进“油统会”的门，就觉得官气淡而商气浓，甚至就在办公桌上讲“盘子”，做生意。很像油粮交易所。

“油统会”的作法与“米统会”有所不同。它只规定凡是油粮商人，要到产区去办货，必须请领“采办证”（俗称“派司”）。只要按照货的数量缴纳一定的征费，不需要什么保证。办到的货，也不要提成征购，商人盈亏自理，与会无涉。这样做法，要比“米统会”自由得多。不过它对签发采办证这一关，抓得很紧。它在油粮主要产区，都

设有办事处。中国商人没有采办证，就休想办货，可是日本军队或军事机关，通过日商洋行到地办货，那就用不着什么“派司”。换句话就是“油统会”可以统制中国商人，而不能统制日本商人。

“油统会”办了几个月之后，日本商人就与军部中人内外勾结。办去的货并不是悉数供应军用，至少有一部分是假冒军部的牌头“搭便船”，运到消费地区去卖给油粮商店供应民用的，并且某一产区经过日商剃头式的采办，剩量已少，后到的中国商人，捧着“派司”去办货，却做不着大生意了。

物以稀为贵，存量越少，价格越高，并且日商是假借军部势力向生产者强迫收购的，价格压得很低。生产者在日商手里吃了亏，势必要对中国商人抬价捞回来。中国商人因为消费地区需要迫切，价格日涨夜增，高价收货可以更高价卖货，仍属有利可图。所以商人还是拼命地抢购，外滩“油统会”每日领“派司”的人如过江之鲫。

不久，“油统会”的统制形势出现恶化。连续发生采办证作价买卖，以及“拔回佣”、“搭干股”等。会里的日本人，也在中国商人身上捞“外快”。

还有一批中国商人，因为“油统会”的“派司”抓得很紧，即使领到，而那一笔额外需索实在觉得吃不消，于是，聘请一个日本人做名义上的经理，钻进了“军用油粮”的圈子，干脆不向“油统会”领“派司”，而搭日军的“便船”做生意，反正同样“拔回佣”、“搭干股”，“油统会”中人，只有冲着他们瞪眼吹须干生气的份，毫无办法。

货少价高，价高利厚，这就自然而然地发生囤积居奇垄断操纵的情况。所以那时的油粮市价，也是一日数跳，与米价赛跑。

“油统会”办了不到两年，也跟着日本投降垮了台。

五、“物资统制”的恶果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来看，日伪时期的所谓物资统制，着重在米粮和油粮两个部门。实施的期限，不过两年左右，时期并不很长。可是，这两大类物资，都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它所强加于沦陷区人民身上的苦难，是非常严重的。

日伪实施统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沦陷区里榨取军用粮食（包括稻米杂粮及食油）。在将要实施统制之前，上海《中华日报》（汪精卫所办的机关报）也曾登过几篇宣传性的文章。它那一套鬼话，我现在也用不着提它。单说其中“军用民食并顾兼筹”这句话，就无法兑现。自从统制之后，人们只看到几条铁路线上的军用粮车和江河水道里的军用粮船，一批又一批地飞刍挽粟，而各地粮底却日见稀薄。民食米粮的市价本已逐步上涨，统制之后尤其涨得猛而且快。“米统会”本来设有一个储配处，原说是专办米粮的储藏与民食米的分配的。可是各地“采办商”办到的米粮，往往来不及进仓，就有一大部分被日军军部中人捆载而去。剩下来的民食米，为数少得可怜，而且早有米店的职工在码头上等候，等到分配到手，就急匆匆地装运而去，也用不着入仓待配了。后来，日军军情紧急，催粮急于星火，民食米索性颗粒不留。储配处无米可储，无米可配，就干脆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就压根儿谈不到什么“军用民食并顾兼

筹”了。我记得1944年在上海日文《新申报》上见过一条消息，说：“支那展开粮食统制，可以使在华‘皇军’获得3/4的给养（译意）”。这就说明了那时几百万日军，绝大多数是靠从中国沦陷区人民的嘴里夺取粮食去养活的。他们吃饱了中国人种的米来打中国人。

沦陷区劫后农村，粮食所产不丰，至多只能维持民众自己的食用，经过“米统会”千方百计地榨取，普遍出现粮荒。穷乡僻壤的农民或靠树皮草根活命，或外出逃荒。

城市人民多是出钞票买粮吃的，粮食的存底愈薄，粮价的上涨愈速，加上伪币贬值，米价更贵，米业奸商们还要兴风作浪，更造成恐慌。“米统会”中人，一方面要供应军需，一方面还要舞弊营私，就千方百计地在“采办商”身上，甚至在零星小贩身上想尽办法，进行敲诈盘剥；那批唯利是图的商人，就将损失加倍地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所以“米统会”一步抓紧一步，市场粮价就一浪推一浪。日伪当局有时假装慈悲，将仓存霉米、粗粞、蚌豆、烂黍削价发售。可是几个月难得一次，每次为数甚少，僧多粥薄，远不能普遍供应。并且老百姓事先不知道都是些霉粮烂粟，届时蜂拥排队，于是杭州、嘉兴、扬州、芜湖等地，都发生过轧米死伤的惨事。

固然，那时百物齐涨，不仅仅限于粮价，可是每次涨风都是从粮价开头。并且那时用米粮的开斗数，作为各项物价的单位，已经普遍形成。一旦米粮涨价，其余物价就按米粮的升斗算钞票，沦陷区人民，无不挣扎于物价涨风之下。日伪的“统制”成为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几个“统制”机构的祸国殃民，是百喙难辞的事实。

六、一丘之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沦陷区里大小敌伪机关一下子冰消瓦解。上海几个伪统制机构，以及它们设立在各地的办事处，也都由重庆来员一一接收。“商统会”、“米统会”、“油统会”这三个机关的中上级奸员，在国民党政府尚未对他们作出处理之前，情绪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也知道自己个个是彻头彻尾的经济汉奸，尤其是运粮资敌、剥削人民，罪恶深重，势不能悻逃法网。究竟本人的未来命运如何，谁也不敢设想。好在这时重庆来员忙于物资劫收，一时无暇及此。于是一部分人离家逃亡或躲藏起来，一部分人妄想摇身再变重上舞台，拼命与重庆来员拉关系，献殷勤，知道重庆来员注目的是物资，他们自以为办过物资统制，门路比较熟悉，就向重庆来员交底献策。重庆来员中不少人与他们是狼狈为奸的，我对这些情况，虽然知道的不多，但也晓得了下面两件：

重庆接收大员中有一个陈行，据说此人从前是银行界的权威人士。“米统会”的机要课长陈泽远，与陈行是旧友，陈行一到上海，就与陈泽远取得了联系。陈泽远就带着他在上海进行黄金买卖的勾当。

有个叫姜公美的，原来是上海流氓头子杨虎（啸天）的门徒。他受重庆宪兵司令张镇指派在上海组织宪兵队。“米统会”的常熟办事处主任王组善，就钻到姜公美的部下做少尉，帮着姜公美接收上海沙利文饼干厂的物资及封存冷藏仓库的物资，又帮着姜公美对“米统会”的财务处副处长平仁斋，进行恐吓诈财。

重庆国民党官员对汉奸们是惺惺相惜的，只不过对“商统会”几个逆迹昭彰的汉奸头目，由于民愤太大，才将其逮捕判刑。我所知道的如下：

闻兰亭被判八年徒刑，袁履登无期徒刑，陈子彝七年徒刑。此外戴蔼庐、陈国权、付前耕都分别被判刑。而更多汉奸逍遥法外，甚至不少人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接收要员。

（1963 年）

日军卵翼下的伪湖北省政府

程 华*

日军侵占武汉后，曾企图在武汉建立一个类似伪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那样的伪政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并在伪武汉参议府内设置了一个“政权树立准备委员会”，以为筹备之用。但由于日军在湘鄂赣三省仅占领了有限的部分地区，建立三省伪政权的条件尚不具备，加上汪伪中央政权正加紧筹备，武汉日军的计划落空。于是就退而求其次，先行成立伪湖北省政府。兹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回忆如下。

匆匆成立的伪湖北省政府

伪武汉特别市政府虽于1939年4月在日军的汉口军特务部指使下建立，但日军并没有忘情于建立湘鄂赣三省伪政权，以遂其分而治之的初愿。然而这时日军在湘鄂赣所占领的县市仍然只有二三十个，拼凑不起来，因而统辖三省的伪政权一再推迟建立。1939年9月5日，汪记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中央党部”，21日伪维新、临时两政府“联合委员会”在南京举行第六次会议并发表声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这时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已是紧锣密鼓，呼之欲出了。汉口军特务部深知，一旦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伪湘鄂赣三省政权的建立必然要受阻，于是策划抢先在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前建立伪湘鄂赣三省政权。

为此，在军特务部的指使下，原属于伪参议府的“政权树立准备委员会”被划出独立并更名为“政权树立委员会”，去掉“准备”二字，以表示伪政权的树立工作，已不再是准备阶段。“政权树立委员会”以何佩瑢为委员长，张仁蠡为副委员长。

伪武汉政权树立委员会组成后，因此时伪中国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已成定局，乃仿效拟议中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模式，拟了个“湘鄂赣政务委员会”的计划。但是这个伪湘鄂赣政务委员会的计划因为规模和权限太大，日军梅机关和汉口军特务部认为对即将成立的汪伪国民政府是个刺激，没有同意。于是伪政权树立委员会另拟了个“武汉政务委员会”的计划，并将原拟“委员会”下设的署改为处，但这个计划仍得不到梅机关的同意。

最后，伪政权树立委员会在军特务部的指使下，将目标改为建立伪湖北省政府。军特务部其所以抢着要把伪湖北省政府先成立起来，就是想要在日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时，造成既成事实。伪湖北省政府不设省主席而设省长。由于那时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尚

---

* 作者当时曾任汉口《大楚报》（由汉奸所办）社论委员。

未成立，伪湖北省政府又不属于伪维新政府，没有上报，伪省长也就没有任命，于是便搞了一次所谓“推戴”。

1939年11月4日，由伪武汉政权树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仁蠡代表伪政权树立委员会，向何佩瑢呈递了“推戴书”。次日，何佩瑢即穿上长袍马褂，到设在原武昌金城银行的伪湖北省政府，就任伪省长。

伪省府设六厅，人事安排：是秘书厅长张若柏、民政厅长汪沄、财政厅长刘泥清、教育厅长徐慎五、建设厅长宋怀远、警务厅长王寿山；厅以下人事，照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办法，官职分开，厅设秘书主任一人，签判三至五人（派充科长），佥事三至五人（派充股长），主事数十人（派充股长或科员）。六厅成立不久，伪省府又增设一保安处，名义上统辖各县伪保安队，保安处设处长一人，由伪省长何佩瑢兼，下设司长三人、课长九人、课员数十人。

伪省府设首席联络官，由军特务部第一课长浅见大佐兼任，各厅设联络官、联络官辅佐官各一人，“嘱托”若干人，由军特务部派日籍文职人员担任，均在伪省府支薪，受军特务部指挥。

初成立的伪湖北省府，其管辖范围虽名义上包括北至信阳（属河南由湖北代管），西至宜昌、沙市，南至岳阳、临湘（属湖南临时划归湖北），东至九江、湖口、南昌（此时江西尚未成立伪省府，临时划归湖北代管），但实际上连伪省府大门外的事都管不了。因沦陷区各县有当地警备部队派的日籍指导官，哪里还听伪省府的。就是武汉也有与伪省府平行的伪武汉特别市政府，自然也不听伪省府的。到后来伪武汉特别市改为伪汉口特别市，才把武昌、汉阳划归伪省府。

随着伪省府的成立，原伪湘鄂赣地方“维持会”随即撤销。各县“维持会”也逐渐改为某某县“县政筹备处”，下设秘书室及内政、财政、建设、教育四科以及警察局和保安队。

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着手筹备成立伪国民政府。据当时任伪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的陈春圃事后回忆，这一伪中央政治会议，事前本没有邀请何佩瑢参加，可是就在会议前夕，何佩瑢却被汉口军特务部安排日本军用飞机送到南京，要求参加会议。不用说何这一举动事前已得到梅机关影佐祯昭的默许，汪伪只得把何佩瑢作为列席代表补进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名单中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汪对何的冷落，以及何受到日本军方的支持，有恃无恐。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原属伪维新政府的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伪省长、伪厅长都已先后得到汪伪的加委，可就是何佩瑢的伪湖北省政府，却迟迟未见南京发表，直到当年10月3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22次会议，才发表何佩瑢为伪湖北省政府主席，以下厅长也一人未动。

与此同时，各县的伪县政筹备处也先后改为伪县政府，伪县长也一一由伪省府加委。当然这些伪县长都与当地日军警备部队有密切关系，伪省府只能加委，并无权更动。伪县府组织则统一按南京汪伪政府内政部规定的伪县政府组织法改编。其编制是一、二等县设秘书室，一、二、三科及警察局，其中一科管民政，二科管财政，三科管建设及教育。三等县则仅设一、二两科，其三科主管并入一科办理。改伪县政府后，原

日籍指导官改为联络官，并由文职人员担任。

“十八星旗”背后的秘密

1940年5月，武汉沦陷已经一年多，汪记国民党中央以及伪国民政府已在南京成立。就在这时，汉口兰陵路转角处一座小红楼门前，却挂出了“共和党总部”的大字招牌，门口交叉悬挂着两面大旗，却又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上写有“和平反共建国”黄飘带的汪记“国旗”，而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鄂军大都督府挂的那种“铁血十八星旗”。在伪共和党所出《共和周刊》上有两条醒目的口号：“拥护汪先生的新中央政权”和“拥护汪先生实行三民主义”。这就有些蹊跷了。既拥护汪精卫的所谓新中央政权，为什么党的总部不设在南京却设在武汉？且公开不用汪记“国旗”，而用早已过时的“十八星旗”？既然声明拥护汪精卫实行“三民主义”，为什么又在汪记国民党之外另立一个伪共和党？这个“共和党”又算是什么主义？

《共和周刊》上还刊载了伪共和党的组织章程和副部长以上人选。从组织章程看，总部设秘书厅和总务、财务、组织、宣传、社会、农工、妇女等七部，部下有处，处下有科，一共有近三十个处，七八十个科。其实兰陵路转角那个单栋二层楼的总部，总共也没有几个房间，即使挤作一团也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处和科，实际在那个小楼里办公的，只有稀稀落落的少数人，是个空架子。至于党员，就在那年八九月间，伪共和党总部曾在当时的《大楚报》上发表了个消息，说正准备在各县筹备成立支部，并登记党员，然而没多久伪共和党就宣布解散了，其间一个支部也没成立，也没有一个党员登记，换句话说，伪共和党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办过手续的“党员”，同时除了空架子的总部外，也再没有过任何下层组织。伪共和党的空招牌，日子也不长，就在成立的当年——1940年12月23日，伪共和党总裁何佩瑢发表通电和宣言，宣布解散“共和党”，全体党员加入汪记国民党。其实，“共和党”还没有开始吸收党员，就已自行宣布解散，所谓“全体党员”加入汪记国民党只是一句空话。那么当初这个买空卖空的“共和党”又为什么会成立的呢？

据当时与何佩瑢极为接近的人暗中透露，这里面大有文章。原来自武汉沦陷以来，日军在武汉先后策划建立了“维持会”、“市政府”、“省政府”、“参议府”，这些伪组织倘专靠所谓地方税，是无法维持的，因为地方税指的是营业税、田赋、牌照税、房地捐等，在战火之后，百业凋零，所收有限，入不敷出。这就使伪组织必须依靠所谓国税。当时“国税”以食盐专卖和鸦片公卖收入为大宗，其次是货物税、印花税等所谓统税。然而在伪维持会以及伪省市政府成立的早期，这些伪组织既不属于北方的伪临时政府，又不属于南方的伪维新政府，这些“国税”只有由武汉伪组织就地征收，就地使用。后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然垂涎武汉的“国税”收入。那时武汉的伪组织既没有多少伪军，又无需进行什么“建设”，开支不大，虽然要按月向“皇军”缴纳“军协款”，但每月都有节余，到1940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一笔节余款。

1940年5月12日，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匆匆飞来汉口，就所谓统一政府财政问题与汉口军特务部长柴山少将及第一课长浅见大佐举行会谈。谈判结果，柴山同意将武汉

“国税”的税收权交伪国民政府，但对起始日期及上缴数额，意见不一，未达成协议。

就在这个协议尚未达成时，在柴山与伪省长何佩瑢的精心策划下，一个不伦不类的“共和党”成立了，并当即从节余款中划出近百万元，作为对“共和党”的补助费。因为补助费是无需办报销手续的。同时在“共和党”内部又划出数十万元作为总裁机密费，因为机密费是无需说明用途的。据何佩瑢的亲信后来透露，这笔总裁机密费是由何佩瑢与柴山暗中平分的。就这样，武汉包括湖北沦陷区各县人民的血汗，轻易地进入了柴山和何佩瑢的腰包，而且不露痕迹。这就是在“十八星旗”掩盖下的秘密。

分润残羹的汪记国民党省党部

自汪记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成立后，即在沦陷区各地纷纷建立汪记国民党组织，同年汪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武昌旧督署成立。设常务委员三人，由谢伯进、李藩昌等担任，委员若干人，下有书记长、组织科长、宣传科长、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等职员。伪省党部成立后，汉口军特务部虽然同意由伪省政府拨付少量经费，但却认为武汉地区处在战争的前线地带，这个和重庆同样打着“三民主义”旗号的汪记国民党能否配合日军实为疑问。因此伪省党部的工作除了吸收部分党员外，对各县党务工作并没有展开。甚至伪省府以及所属单位的职员参加汪记国民党的也寥寥可数。一般人认为，归根到底还是日本人说了算，参加汪记国民党好处谈不上，如果引起误会，反而得不偿失。

1941 年汪记国民党中央党部又指定王锦霞为伪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伪市党部地址设在扬子街口。下面有区党部、区分部和四个社会服务处。

1943 年初，伪湖北省党部也改为主任委员制，常务委员撤销，由伪中央党部指派伪中央执行委员黄大中为主任委员。下设书记长、组织及宣传处长以及部干事、干事等职员。这时汉口军特务部还派来宫城宇平担任伪省党部顾问。宫城宇平是汉口出名的日本特务，曾担任过军特务部第二课的情报班长。那时汉口军特务部的一些日本人，包括宫城宇平，对于三民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完全不理解的。特别是抗战初，国民党把三民主义解释为民族主义，是抗日的；这时汪记国民党又把三民主义解释为大亚洲主义，是亲日的。像这样可以随心所欲，变来变去，日本人感到大为困惑。于是，宫城宇平提出由伪湖北省党部出资雇人将三民主义的某些部分译成日文，然后印出送给军特务部及有关人员参考。

本来，伪主任委员黄大中对钱财是看得很重的，但是在南京时虽然地位不低，却并没有做过有油水的差事，这时他来到湖北，身兼伪省府教育厅长及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武汉分校主任，都是主管，很想捞上几笔。伪省党部的经费是能省就省，职员缺了也不补，办公费、事业费被省得似有若无。虽然如此，黄大中对宫城宇平提出雇人翻译三民主义某些部分并付诸印刷，仍只好屈从照办，以免得罪。

在黄大中任期内，伪湖北省党部冷冷清清，剩下的几个工作人员坐在那里喝茶看报，办公室外的蒿草长了半人高，也无人去铲。至于各县伪县党部，有的还有块牌子，有的甚至连牌子也没挂。那时汪记国民党的党证，表面上和国民党的党证也没有什么区

别，也是蓝色封面并有青天白日党徽，里页有孙中山像。这在日军宪兵队以及警备部队的一些士兵来看，是无法分辨的。当时沦陷区的人民随时都会被日军搜查，如果在搜查时发现有青天白日党徽的党证，从而误认是重庆派来的，那就百口莫辩，甚至有生命之虞，因此在沦陷区各县，曾经参加过汪记国民党的人是极为有限的。抗战胜利时黄大中被锄奸人员逮捕下狱，死于狱中。

树倒猢狲散

日军进入武汉后，原拟待机建立湘鄂赣伪政权。后因汪伪政权极力反对，三省伪政权遂告流产。三省之中，江西日军所占县市始终仅十个左右，本不足建立伪省府。因此这些县市一直由伪湖北省府代管。直到 1943 年 5 月 6 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 123 次会议决定设置江西省，并特任邓祖禹为伪江西省长，以后高冠吾、黄自强也曾被任为伪江西省长。

至于湖南，虽然日军也占了一些县，但始终未建立伪湖南省政府。同时日军也一直未将所占地方的行政权在名义上交予南京汪伪政府。因此直到日本投降，南京汪伪政府也未能过问湖南沦陷区的事。

在湖北，自何佩瑢任伪省长后，对南京汪伪政权一直若即若离，不敢过分靠拢，以免开罪于军特务部。何鸦片烟瘾较大，平时脸色发青，倦容满面。1942 年 6 月初，何在赴大冶一带巡视中突然患病，当即赶回武汉延医诊治，6 月 6 日不治身亡。

何之后是杨揆一，杨系湖北人，又为日士官生，且在汪伪政府军委会任参谋本部部长。汪伪政府如此安排，系恐当地军特务部藉词挡驾。杨到任不久，就向南京汪伪政府建议将汉口特别市改为省辖市，以节开支。当时不论伪省府或伪市府，地方税收都极为有限，全靠伪中央从当地烟、盐等“国税”收入中拨款补助。伪市府改为省辖市市府，机构缩小，开支减少，也就是减少了伪中央补助，无形中伪中央就增加了收入。伪中央当然同意。于是汉口被宣布为省辖市，并以石星川为伪市长。原伪汉口特别市长张仁蠡则通过他与日军华北军特务部长森冈皋的关系，被汪伪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离开汉口到天津去了。张仁蠡到天津做伪特别市长一直到 1945 年 1 月卸职，以后回北平做寓公。抗战胜利后被逮捕，1951 年镇反时被判死刑，在北京处决。

就在杨揆一任伪省长、石星川任伪市长时，1944 年 12 月 18 日武汉遭到一次空前的大轰炸。近半个汉口陷入烧夷弹的火海之中，到处是断壁颓垣。事情的缘起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大陆的制空权已转入美空军之手。当武汉周边日军还在使用两引擎旧式战斗轰炸机时，美空军已使用 B－29 型四引擎战斗轰炸机了。因此，每当美机进入武汉上空时，日机已完全没有应战能力。一次，一架美机在汉阳郊外因引擎发生故障被迫降落，美驾驶员被日军俘获后，先是脱光了游街，在游街时，由日人装扮之中国人将美驾驶员殴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在美驾驶员尚活着的时候，送往火葬场活活烧死。这一消息为美空军得知后，于是在 12 月 18 日那天中午派来近 200 架 B－29 型战斗轰炸机飞临武汉上空，大量投掷烧夷弹，于是武汉到处一片火海，焚烧过后，市民

躲避一空，烧夷弹中的硫磺黄色过了三四天尚未褪掉。一些烧焦的尸体，过了四五天以后才有人抬走掩埋。然而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组成军事法庭审讯那次活活烧死美驾驶员一案，主犯汉口宪兵队特高课小阪中尉最后仅被判了一年零六个月徒刑。

经过那次轰炸，武汉市面更加萧条。1945年3月汪伪最高国防会议议决，调杨揆一为伪军事参议院院长，这是一个不起任何作用的闲缺。于是杨回到南京，日军投降后，杨被捕枪决。杨的继任者为伪陆军部长叶蓬。叶到任后，知道那时日伪已到了日暮途穷，以后自己如果没有枪杆子是生存不下去的。于是叶首先从内蒙古运来大批鸦片烟土，想变成现金，以此扩充军队，用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他曾在汉口召开伪县长会议，与各伪县长个别谈话，了解各县伪保安队情况，计划把各县伪保安队整编成几个省属保安师，然而日本军方不同意。叶又退而求其次，想编几个省属保安团，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也没有成功。7月底叶因事去南京，不意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府无形瓦解，这时叶尚在南京。待到叶赶回武汉时，伪十四军军长邹平凡已抢先一步，将他所辖伪军全部集中武汉市区，抢劫一些仓库，收编了一切可能收编的伪杂牌部队以及保安警察。叶虽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奉蒋令委为新编第七路军司令，可是实际上已成了光杆司令。最后被来接收的六战区长官部逮捕，送往南京，经军法会审，执行枪决。

至此，伪湖北省政权树倒猢狲散，彻底覆灭。

（1988年）

沦陷时期的湖北伪政权

张 世 模*

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七年之中，在日本侵略军的直接指使之下，以武汉为中心的汉奸政府前后换了三班人马。兹就这一时期的情况分作几个部分，叙述如下：

“武汉治安维持会”

1938年10月武汉陷于敌手，11月初，一个所谓“武汉治安维持会”的汉奸机构就在原来的汉口商业银行里（现在的胜利街武汉图书馆）开始办公了，当时为日本的军特务部拼凑出这一副班子来的是两个汉奸，一个是特务土匪金安仁（湖北大冶人），另一个是长期潜伏在武汉，在1931年水灾时以伪装慈善家出名的武昌长春观道人侯永德。这个“维持会”的会长是计国桢，他下面的财政局长李鼎安、社会局长杨辉廷都是汉口的商人。在武昌有一个“维持会”分会，会长是辛亥革命时一度在新疆省自称都督的杨缵绪。

当时在武汉的日本侵略军的机关也是异常复杂的，每一个部门都想找一个直接受它指挥的走狗。关于傀儡政权的“提线”任务是由军特务部掌管着，此外如宪兵队就搞一个宪佐队，海军特务部就把特二区（旧俄“租界”）的地盘抓在手里，报道部就抓住报纸，彼此之间都不时展开着明争暗斗。

“维持会”的任务只是过渡一下，让更高层汉奸有从容筹划的时间。

武汉的何佩瑢和石星川都极力争夺傀儡地位，这两个人都是早期的日本士官生，都是曾经投靠在北洋军阀门下的余孽。何是湖北建始人，1919年曾在王占元做督军时任过幕僚式的省长。石是湖北阳新人，是黎元洪时期的将军府将军，以后就凭藉着这一头衔在湖北插手一些地方企业，安富尊荣了好多年，直到北伐以后才销声匿迹。武汉刚沦陷，这两个人就跃跃欲试，可是当时他们顾虑到国民党政府有订立城下之盟的可能，还不敢贸然做牺牲品，因此何就支持刘泥清充当“维持会”的税捐总署署长，又由石出面向计国桢推荐张若柏，作为他们这一系派出的耳目。到了1939年初，武汉组织伪政府的形势渐渐明显，他们就积极活动起来，他们两人虽是儿女亲家（这时何的儿子言良还未与石的女儿采琴解除婚约），但两个人在争夺权利方面却毫不相让。两个人比较起来，何又比石狡猾得多。

---

* 作者当时系汪伪湖北省财政厅财务人员讲习所讲师、制用科长。

可是日本的特务部长森冈皋和负责汉奸政权组织工作的第一课长浅见，对于这两个久已脱离实际政治的老奸巨猾，还不能立刻相信他们的号召能力，而宁愿在华北伪政权去找一个曾在冀东伪政府里充当县长和厅长的张仁蠡来担任在武汉的汉奸头目——伪武汉特别市市长。

为虎作伥的伪武汉特别市政府

1939 年 4 月，“武汉治安维持会”撤销，伪武汉特别市政府产生，地址仍然是“维持会”原址，只是招牌换了。伪市府成立的这一天，还雇有一些地痞流氓在“府”门前集合表示拥戴，伪市长张仁蠡还在阳台上含笑向这些“市民”们招手。

张仁蠡是张之洞的第十三个儿子，他的哥哥张燕卿在伪满洲国曾任大臣，日本军人看上了他，很可能是想利用一下张之洞在湖北的声望，对其他的“簪缨世族”起一点鼓舞作用。张仁蠡到任后的作法：

一、伪职分配

财政局长索樾平、盐政局长孔楚材、秘书长杨恩霨都是张从北方带来的嫡系，而警察总监张学骞，据说还是辛亥革命时清军方面的标统张彪（张之洞的丫姑老爷）的儿子。戒烟局长沈竹痕是由金安仁介绍和日本军人发生关系而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一个地痞（在沈以前，曾由马行素任过戒烟局长，由于他开展业务的办法不及沈，不为日本人所满意，不久就换了）。教育局长高伯勋、建设局长高凌美（方本仁之子方达智在初期当过建设局长，不久去职）弟兄两人都是由“维持会”留下来的，因为他们是留日生而没有更换，卫生局长王大德也是留日生。此外，还设了一个“交涉员”，由李绍汉（湖北沔阳人）充任，李是留法生，他及其父亲李芳（伪参议府参议）、兄弟李炎汉（留日士官生，在何佩瑢的伪省府曾任保安处副处长，后来继孔楚材任盐政局长，贪污特别厉害，被日本宪兵队眼红将他枪毙）都因他另一兄弟在抗战初期搞汉奸活动被杀而受到优待。

作为湖北派头目的何佩瑢和石星川没有得到任何实权，只设了一个不明隶属也无职权的“参议府”来安置他们，何是议长，石是副议长，张若柏担任秘书长，还搜罗了十几个昏庸老朽算是参议。何系的刘泥清虽然在伪市政府里留任税捐总署署长，然而受张仁蠡一系的排挤，不但管不着大家眼红的盐、烟两局，就连归他管辖的几个市税稽征所也都越级直接由伪市政府指挥。

伪市政府名义上拥有一切权力，可以管理辖区内——甚至超出武汉市的辖区的“中央税”和“地方税”，又有前面所提到的没有立法权的“参议府”，还由伪市政府直接管辖着两级法院和检察署，甚至还在伪法院以上设了一个司法行政机关，叫做“临时司法部”，这个“部”就意味着这个伪市政府有升格成为“中央”一级政权的可能。

“临时司法部”部长凌其鸿，是日、美留学生，特地由上海赶到汉口来，想在华中伪政权里大显身手。至于伪法院和伪检察署的配备却主要由国民党法院里留汉未走的人

员担任，伪高等法院院长周鸿俊（国民党法院推事，后被刺死），伪高等检察署首席检察官鲍光荣（国民党法院推事，抗战胜利后以中统特务身份出现，解放后被镇压），伪地方法院院长胡旭莽（后病故，由鲁参继任），伪地方检察署首席检察官鲁参（国民党法院书记官，调伪地方法院院长后，由石星川之侄石支矶任首席检察官）。

二、财政来源

伪武汉特别市政府藉以支付它的开支的财政来源是所谓盐、烟、统三项收入和市税（包括营业税和其他各种杂税）。

食盐和鸦片的来源，当时主要是在日军占领下的苏北部分地区，日本人很容易加以控制，对这两项性质不同的专卖品，他们都采用近似的推销办法，由伪盐政局和伪戒烟局经手。在武汉鼓励奸商登记设置大中小三等的运销、整售、零售的商店，领取牌照，按等分配，在外县各地就由当地的傀儡组织领回转销。这两项之中，食盐当然是最大的收入，而鸦片由于他们在毒化人民方面大下工夫，也一天一天增加了销售量，成为仅次于食盐的第二收入来源。

在伪市政府成立以后，日本军部就逐月由盐、烟两税收入中拨出一笔款，存在当时新设的“中日合办”的中江银行里（中江银行的总裁名义上是石星川兼，总务处长袁范宇，业务处长周焕章，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五十岚翠手里）。这一笔款用一个暧昧的科目记在伪市府的账上，内幕却是作为敌伪新“中央”政权的建立费，到1939年底数额已经达到500万元“军票”。当时日军在占领区使用所谓“军用手票”为惟一的通货，1939年底“军票”的贬值情况还不厉害，因此这一笔钱颇为可观。在伪湖北省政府成立后不久，张仁蠡就向日本特务部建议把这笔款子处理了，据说是半数交军特务部，半数由张等自行处理，当然这当中免不了又要暗中献出一份，从伪市政府财政局的账上看，这科目是全数一次消灭，一个没有任何单据的分录，500万元就不翼而飞了。

张仁蠡到汉半年以后，何佩瑢等认为局势已经稳定，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他拉上了日本当时的红人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同学关系，向汉口特务部长森冈大献殷勤。原来极力支持张仁蠡的特务部第一课长浅见，也看到张的号召能力不够把伪特别市政府升格为“中央政权”，这时他们就决定设置一个伪湖北省政府，让省市并立。

从1939年底起，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就和伪湖北省政府并存。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建立户口制度，把“维持会”时期的“良民证”改为“居民证”，并且普发了“居民证”。这工作由日本宪兵队直接领导的伪市警察局科长翁愚民负责（翁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曾任汉口警察局长），当时全市的“居民证”都盖有翁的图章。

当时汉口四郊由日本警备队驻守，市内是日本宪兵队的天下，汉口宪兵队驻在江汉路中国银行内，下面还有一个分队驻在原大孚银行内（现在的南京路口武汉图书馆外借处内），一般人称之为大孚宪兵队。这两处都是令汉口人谈虎色变的人间地狱。宪兵队再以翻译为耳目，以所豢养的宪佐队为爪牙，对市民实行血腥的统治。伪市警察局又是第二级的爪牙，后来又由汪伪搜罗来一批特务（其中大部分是原国民党人员）成立了一个对外不公开的所谓“政治保卫局”，汉口的负责人是张孟青，积极地配合日本宪兵队镇压爱国人士。

沦陷后期（1943年以后）伪“中储券”急剧贬值，物价飞涨，伪市府曾在日本人的决定下设立一个“经济分会”，想用行政命令压低物价，后来又由宪兵队“提线”设立一个“经济警察”的组织（负责人是宪兵队派来的台湾人柯大树），这些经济警察利用他们的淫威，对人民进行各色各样的敲诈勒索。

伪湖北省政府的成立

何佩瑢在担任着伪参议府议长时，就进行两步工作，首先由他提名网罗了一批地方上的老政客和土豪劣绅充当伪参议府的参议。这批人大部分是湖北人，也有少数湖南人和江西人，如谭道南等。这时，江西方面九江和南昌已经沦陷，南浔铁路沿线有几个县的县城也被占了，湖南方面临湘、华容、南县也成为日军出出进进之地。何在伪参议府里收容了这两省的土劣，就是投合日本军方的意向，表示他收拾华中三省局势的“能力”。

其次，何还看中了这一点：日军占领汉口以后，一方面固然还在继续和蒋介石作和谈的试探，但另一方面在沦陷区内却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为了抵消国民党的势力，日本军人曾经想尽方法，搞一些党会组织，武汉地区也曾搞一个小型的“东亚青年联盟”，可是号召力太小，在政治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要想另起炉灶，像华北一样搞一个“新民会”，一时还凑不起这一副班子。何佩瑢于是向日军献策，要重建“共和党”。原来袁世凯任大总统初期，两湖方面曾经以当时湖北省议会议长汤化龙等人为核心，拥戴所谓首义元勋副总统黎元洪为首领建立了一个名叫“共和党”的政党，尽管“共和党”并不反袁，但在袁世凯的治下不久就瓦解了。何佩瑢当时在“共和党”里只不过是二流人物，可是此时他却想借尸还魂。这计划也得到华中方面日军的赞许。当时华中方面日军听命于南京方面的司令部，这计划送到南京以后，南京日军考虑到对国民党的和谈关系，主张慎重，因此只允许何佩瑢秘密地进行筹备工作。“共和党”的内幕，我是从我叔父张若柏那里听来的。何曾向他讲，因为他是老国民党员，将来万一汪精卫坚持要国民党插足湖北，何准备把他抬出来算作国民党的一个名额，因此何暂时不要他参加“共和党”的活动。张若柏还说何在“共和党”问题上向特务部要了一笔筹备费，但何怕人分肥，所以无人知道详情。

就因何佩瑢拿出了这几手“绝招”，汉口日军就决定了省市分治计划，在伪特别市政府之外，另设一个伪湖北省政府，让何佩瑢一试身手。

这样，在1939年末何佩瑢就把伪参议府议长让给他的儿女亲家石星川，自己就到武昌上任。旧式官场通例，主官上任之日，一定要出一张红色告示说明“奉……令”或“经……推选”，这样才能表明权力从哪里得来。他这个伪省长既没有上一级的“中央”政权“特任”一下，又不便明说由日本人委派，也不好像张仁蠡一样找一些流氓地痞当场“拥戴”一番，这红告上如何才能“奉天承运”呢？何想到这一问题很费踌躇，幸而内定伪省政府秘书处秘书主任贺遐昌替他解决了这个难题，贺建议采用辛亥革命时某些地方宣布独立时，都督所出红告的办法，直接用“本省长于某月某日就任”。

伪湖北省政府就这样产生了①。

何的伪省府的全班人马是：秘书长张若柏（原参议府秘书长）、民政厅长汪沄（老官僚）、财政厅长刘泥清（原伪特别市政府税捐总署署长）、建设厅长宋怀远（何的日文翻译，原来是平汉路局职员）、教育厅长徐慎五（某日本洋行的职员）、警务处长王寿山（抗战前汉口特二区警察署署长）、保安处长孙基昌，汪伪政府改组伪湖北省政府以后又添置宣传处、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湖北分会。伪省政府设在武昌，因此武昌就从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的范围划归伪省府管辖，因而武昌警察局（局长陈守方）和水上警察局（局长姜质生，姜因是张仁蠡一派，不久去职，由船舶管理局局长李志三接任，船管局也合并于水警局），也都移转管辖了。伪法院系统以后也改归省辖。

上面这一班人马的伪职还几经变动，秘书长张若柏在1940年5月调财政厅长，由贺遐昌接任秘书长，财政厅刘泥清因与何在税局问题上发生利害冲突去职，由张若柏接任。张在接任的次日遇刺身死，由教育厅长徐慎五接任，后来又由陈维政（云南大理人，留日师范生，日军汉口特务部长落合甚九郎少将的秘书）继任，教育厅在徐慎五调走后由黄实光（台湾人，时充汉奸报纸汉口《大楚报》总编辑）接任，后来又由日本方面推荐何庭流（青年党人）接任，警务处长一职后来也由日本方面推荐王达接任。

从1939年底伪省府成立起，到1942年6月何佩瑢因急病身死时，两年多期间内，何佩瑢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以下的几件事：

1. 设立厘金局，在当时伪省府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搜刮。当时伪省府号令所及之地，只是武昌市区和武汉附近有限的几个关卡，伪省府一成立，就赶紧设立了五个厘金局——美其名曰“产销营业税局”，局长吴某、魏某、李某等，有的是具有裙带关系的，有的是积年税棍子、过去办厘金的老手。这些局名义上属于伪财政厅，实际上是何的心头肉，第一任伪财政厅长刘泥清就因为要插手分肥而为何免职。当时这些关卡附近并不是真正能由何控制的地方，所谓“鸡杂鸭杂”各种恶势力还多得很，设了这些局，当然添了一重剥削，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2. 成立伪省市财政管理委员会。当时武汉的肥缺是盐、烟两局，按国民党政府的体制说，这都不属于地方收入系统，伪省府成立前，伪特别市政府等于是代行了伪中央一级政权的职权，现在伪省府成立了，岂肯坐失机会。但是日本军人也早就看到这一点，把这两局拨到伪特别市政府的建制以外。原任盐政局长的孔楚材，因为张仁蠡一系的色彩太浓，就改任伪市府的财政局长，而由搞了几天伪省保安处副处长的李炎汉接任局长。表面上何占了一些优势，可是伪省府在行政上管不着盐政局，李炎汉事事听命于特务部，有了靠山就不买何的账了。这时石星川也在活动把所谓中央机关暂时归伪参议府管辖，但石的活动力很差。伪参议府是一个不省不市的中间机关，总不好管这黑白两项财源。在1942年5月间，何佩瑢和张仁蠡暂时达成一项临时协定，双方共同组设一个伪“省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由伪省财政厅长和伪市财政局长担任委员，委员以下设总务、税务、收支、审核四个股，省市各派两个股长，当然这种毫无缓冲的两头制只会

① 伪湖北省政府于1939年11月成立，1940年10月改组，改省长为主席。何佩瑢就任伪省长的时间是1939年11月5日。

产生一连串的争执。不久该“委员会”就撤销，此后何和张都无法染指两局了。

3. 企图攫取各县伪政权。湖北省这时已有不少的县沦陷，再加上暂时归伪湖北省政府管辖的江西、湖南的几个县，可这些县的伪政权都是先于伪省府而产生的。伪省府成立以后，这些地方算是把“维持会”改称“县政府”，实际上他们一切听命于当地的日本警备队。当时一般伪县长如孝感朱坤宇、大冶张宜臣、江陵周仁等等都是深得日本军人欢心的当地劣绅，对何不买账。何费了很大的力量，撤换了一个黄陂县的伪县长谢鹤，这才争取到别的县对他稍稍敷衍一下。

4. 昙花一现的“共和党”。何佩瑢的“共和党”的秘密，已如前所述，它一直在筹备中，只是顾虑到南京汪精卫的关系，没有正式公开。1940 年是所谓恢复“共和党”的顶点，在汉口珞珈碑路（现珞珈山路）何的官邸内，这些内定的总裁（何本人）、副总裁（湖南政客谭道南，何心目中的华中伪政权成立后的湖南省长）、部长（蔡森、谢鹿萍等）日夜围着鸦片盘子在那里“建党”。何当时决定用辛亥革命后黎元洪都督府所用的旗子（即后来北洋政府所采用的陆军旗，湖北省铸造的大铜元也有这旗子的形象）为“共和党”旗，并密令伪省府各机关编造职员名册，集体加入“共和党”，作为基本党员。1940 年下半年，由于张仁蠡向汪精卫告密，汪又转向日方提出交涉，南京方面日本军部要武汉日军采取慎重态度的缘故，到了 1941 年这个重建的“共和党”就在筹备中夭折了①。何当然是不甘心的。此后他还一度在“东亚联盟”这个组织上用了一些工夫。这个组织标榜着“政治独立、军事同盟、文化沟通、经济提携”四大纲领，本是一些日本人搞的无聊玩意，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何除了把“共和党”的上中层人员安插了几个在里面以外，也无法从中变出任何戏法，不久这个组织也就销声匿迹了。

5. 企图压倒张仁蠡。何佩瑢和张仁蠡的明争暗斗一直在继续着，何处心积虑想得到华中伪政权领袖地位，以便取得对张的领导权。但日军在湖南、江西两省很久不能前进，三省伪政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江西的地方汉奸政权中如伪南昌市市长万照（留日生，娶一日本女人为妻）还时时有不服伪湖北省政府代管的表示，何的得意杰作“共和党”又因汪伪的反对而逐渐消失。何自知华中伪政权的妄想无法实现，就转而向日本军方提出伪市政府改归省辖的意见。原来他看到日本军人当时还不愿让汪伪势力顺利地统治武汉，武汉方面假如只有一个政权，还可以搞点半“独立”，现在省市并立，两方之间有些关系必须有一个上一级的政权来作决定，同时还有双方互争不下的“中央税收”问题，这些都使南京汪伪有词可藉。何提出“省市政府合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用省来辖市。张仁蠡看透这一点，就一反过去对汪伪不通往来的作法而作出一些输诚的姿态。张在来汉后不久，曾经写信给住在北平的旧日上司傅增湘（号沅叔，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教育总长，是一个有名的藏书家。张当时是傅的一个小科员），说明想在湖北刻一部丛书，请傅提出一些意见。傅回信给他介绍汉口的藏书家徐行可，张就派参事徐海铎到徐行可家拜访，想看看徐家的一些精抄本。可是张刻书的说法毕竟是欺

① “共和党”于 1940 年 5 月成立，1940 年 12 月 23 日，汪伪为了“统一”沦陷区内的“东亚联盟运动”，强化汪记国民党，在日军的支持下，迫使何佩瑢宣布解散“共和党”，所有党员集体加入汪记国民党。

世盗名的玩意，不过因此给张知道了徐家藏书中有一部清末名士文廷式所著《纯常子枝语》手写稿40册。文是汪精卫所钦慕的词人（文是江西人，侨居广州），张以2000元“军票”向徐家买得这部手稿，送给汪祝寿，这是在1940年汪、张第一次发生联系时张所认为最得体的进见礼（汪对这项礼物极其重视，不久就刻版印行）。张又在日本人许可的范围内，略略放松国民党在武汉市的活动，与汪伪社会部有关系的国民党人谢伯进也被任为“武汉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样汪伪势力没有进入武汉以前，也就对张仁蠡予以几分支持——至少在张何关系上。因此，张、何任内省市还是并立的。

1941年下半年以后，伪省府用人行政之权已全部移到日本人手里去了。原来伪市政府和伪省政府除了由日本特务部作总的“提线”人以外，各个部门都配备有日本顾问和嘱托，掌握实际权力。在伪省府里，何佩瑢遇事逢迎日本人的意旨，这般顾问嘱托更是气焰万丈，例如伪教育厅的顾问市木，不把伪厅长黄实光放在眼下，秘书处的宫本虽然地位上只是一个嘱托，也常常指挥着秘书长贺遐昌。何的嫡系只剩一个老朽的伪民政厅长汪沄，还有一个伪建设厅长宋怀远，虽说和日本人搭上了关系，总还算是他的翻译。此外伪财政厅长陈维政是日本特务部长落合甚九郎推荐的，这人对何还很恭顺。何最可恼的是宣传处长吕东荃、继任教育厅长何庭流、警务处长王达三人，他们都是由日本特务部中层当权人物从外地找来硬塞给何的。他们关系密切，行动一致，传说他们之间有一个青年党集团，准备把伪省府的领导权拿到手里，必要时取何而代之。何对他们着实心存畏忌，但又无可奈何。

何为了打开与各县之间的关系，1942年春节后不久，“出巡”大冶，在大冶得了急病，赶回武汉不久就死了。

汪伪接管湖北伪府

何佩瑢一死，在汪精卫方面，派什么人来充任这个“先锋”倒不是很困难的问题。他所拼凑的南京伪国府的班子里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叶蓬，一个是杨揆一，他们都是湖北人，一向在湖北作官，都是军人出身而又有些计谋。杨揆一很早就走了陈璧君的门路，一等接管伪湖北省政府的问题发生，汪就以和日本军人搞好关系为理由派杨接任（叶蓬在1935年任汉口警备司令时期，曾经在汉口循礼门的司令部内设置日本军人形象枪靶，汉口日本领事提出抗议，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是政学系的张群，正想排斥叶蓬，就藉故小题大作，撤换了叶的司令职务，日本人称这为“人形事件”。沦陷后叶蓬投伪事敌，曾由汪伪在1941年派叶来武汉组织“绥靖”公署，但局面不能打开，叶后来就回南京去任汪伪陆军部长。因此在1942年日本军人气焰还很嚣张的时候，汪精卫也无法提出叶来接管伪湖北省府）。

杨揆一是在1942年6月间到武汉的，汪伪为了一新湖北人的耳目，给了他全副“仪仗”，他是伪省长兼保安司令，还是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又以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被授权来指导省市党部，他带来一批当厅长、局长、县长的人物，准备大批出笼，可是没有带来一支军队。

汪伪原意本想把武汉方面的一切重要安排，在南京和日本侵略军总头目作出决定，但日军坚持就地解决。汪精卫既然急于取得湖北地盘，也就不敢过多地讨价还价。杨揆一到达武汉，最重要的使命是代表南京汪伪政权和武汉日本军人进行交涉。其结果，日军答应了以下几点：

1. 日本军方所收编的伪军，名义上属于“武汉行营”管辖，用行营所给的番号；各县由日本驻军指挥的小量杂色队伍，改为保安队番号，归省保安司令部管辖。但人事权、指挥权一律不得加以干涉，杨揆一也承认不在湖北招兵买马。

2. 各县都可以悬挂附有黄飘带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

3. 对已成立的汪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活动范围可以稍稍放宽，但不作发展活动。当时的汪伪省党部采取常委负责制，由钱昌义、谢伯进、李藩昌三个常委负责。因为实际上无事可干，杨揆一也懒得去指导（1943 年以后，伪省党部就改为主任委员制，由汪记国民党中委、当时的伪省教育厅长黄大中任主任委员，但同样是无事可做）。各县也一律在伪县长的领导下，挂起县党部的招牌（有些县就由伪县长兼任县党部主任委员，事实上那些县长大多没有汪记国民党党籍）。

4. 财政方面还是在南京由周佛海通过日本派来的汪伪国民政府最高经济顾问交涉的。关于伪中央储备银行分行的设立和汪伪“储备券”的流通，本是出于日本人本身的计划，所以进行很顺利，以汉口为中心的盐烟专卖和统税收入也纳入“中央税收”系统，由伪财政部派一个鄂赣湘三省财政特派员驻在武汉（“特派员”王霞生，特派员公署设在汉口黄陂路）。但关于盐烟统三局的人事和行政，实际上还是日本特务部直接管辖，所谓特派员公署只不过是一个记账和分取一部分赃款的机构而已。

5. 对于伪省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县伪县长的人选，日本军方原则上承认由伪省长决定，但应和特务部协商，伪县长还应该经过特务部征得当地日本驻军的同意，如果驻军推荐新的人选，也必须经过伪省政府同意后发表。

6. 原来从伪特别市政府成立直到何佩瑢的伪湖北省政府，每个厅局部有一个顾问和几个嘱托，顾问实际上是这个机关的太上厅局长，有些机关竟至于一切重要公文都要经过顾问同意盖章，才能生效，这样使得那些厅局长有时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杨揆一对于这些七手八脚的“提线”人，也感到难于应付。经过多次交涉，日本人算是答应了取消顾问一级，只保留了若干嘱托，算是汪伪政府聘用的。这些嘱托的职权，一般也只限于提出意见、通风报信等。此后对伪市政府也同样取消了顾问，而由特务部的一个课长担任伪省市政府的总顾问。

伪省府的日本顾问虽然取消，可是日本军人的权威仍然是高于一切。例如在 1943 年间，日本侵略军曾经统一制定了当时各县伪县政府应拨交当地日军的粮秣数量。以前原是由日军直接命令地方伪政权照缴。这一年根据杨揆一代表汪伪中央和汉口日本特务部事先交涉的结果，这一类重要事项都应经由特务部向伪省政府提出再分令各县照办，特务部就派人持密件要伪省政府立即转令各县。由于时间紧迫，没有向汪伪请示或进行研究磋商的余裕，杨揆一只得把特务部的来文交给此时的秘书长吴明浩去办，吴明浩不愿负这责任，就建议交伪财政厅办理，因为伪财政厅长陈维政是人所共知的日方亲信，交给他就可以推卸责任，同时也是对日本军人的要求“欣然同意”的表示。陈维政当

然也知道杨的用意，但他还是接受了。他吩咐管理赋税的第二科长李永祯办通令各县的文稿，李说这是特交文件，并不属该科职掌范围，他要四个科长共同负责。后来别的科长都认为这与民政厅的职掌有关，陈因此向杨说明：财政厅可以奉令拟稿，但希望民政厅会同办理。结果由财政厅第二科科员夏某到秘书处去办稿，由秘书处负责缮发，因为是密件，所以拟稿直到缮发都集中一处办理。稿面上主管科一栏盖上民财两厅全部科长的八个名章，厅长一栏盖上汪书诚和陈维政两人的章子，吴明浩也以秘书长的身份核稿，杨揆一当然不能不签行。事后吴明浩叮嘱秘书处把来文和会稿一起封存，在封面上亲批“绝密！此卷非经秘书长核准，不得调阅”。他们用了很多气力好像做了一件大事似的，可是事实上各县的日本驻军早已直接命令当地的汉奸政权照办，完全用不着等杨揆一的马后炮，以后日军对于这类事项，就干脆不再通过伪省政府，杨揆一也不再主张他的发号施令之权了。

至于杨揆一上任后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伪省府人事的形形色色。秘书长蒋镇东（也是杨的日语翻译）、民政厅长汪书诚（湖北老官僚）、建设厅长关麟书（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湖北荆州驻防旗人，和杨同是何成浚部下军官，曾任行政专员），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张某，经理处长是何成浚的外甥吕渭村（杨以前长期任何成浚的参谋长，这次重用吕某是藉以和何成浚保持联系）。原来由于日本方面的关系而到伪省政府的财政厅长陈维政、教育厅长何庭流、宣传处长吕东荃、警务处长王达都留任原职。在武昌设有一个市政处，处长刘立蕃（湖北旧军阀刘佐龙之子，日本士官生），也是日方关系而由财政厅科长外调任职的。

杨为人贪财好色，生活腐化到了极点，他过去曾诱骗外甥女为妾，他的外甥凌德源就因这双重关系而一直受到重用，这次随着来汉，位置是行营经理处长，一到汉口就因在当时汉口的“交际花”华香琳那里争风吃醋，和杨的秘书长蒋镇东发生冲突。凌借故向杨告了蒋镇东一状，杨就斥责了蒋一顿，蒋在一上任的时候，就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只好辞职回南京，投奔杨的对头叶蓬去了。这事在南京传开了，伪府中人对杨颇多不满。杨除了陈璧君那条路子以外，在南京别无其他后台，即使陈璧君也只是交易关系，尽管杨的姨太太（凌德源之妹）拜结陈璧君作干女儿，陈也并未把杨看作是死党。杨为了打开出路，只好一面授意凌德源辞职离开湖北，一面电请汪伪另派秘书长。这样南京方面就派了鄂籍的伪立法委员吴明浩接替蒋镇东，算是把这一场风波平息下去。

当时伪省府方面有几个由日本关系而留任下来的厅处长，其中财政厅长陈维政羽翼不丰，对杨还表示恭顺。至于宣传处长吕东荃、警务处长王达和教育厅长何庭流结成一个小集团，一般人称他们为青年党一系（实际上只何庭流是青年党人），他们和特务部中中层以下的日本人勾结得较密，总想伺机而动，取代杨揆一。因为陈维政不和他们一致行动，所以首先想夺取财政厅长的职位（吕东荃在来湖北以前，曾任伪河南省府的财政厅长）。碰巧 1942 年夏天财政厅发生了一个科员罗某伪造支付命令盗窃 4 万余元“军票”的案子，盗窃未遂，就被破获了。吕东荃等就对陈维政等大肆攻击，但是陈因和日本特务部前任部长落合甚九郎的关系很深（这时落合甚九郎调任旅团长，后来兵败死于湖南，曾将陈托给继任的落合鼎五），同时他在伪财政厅也没有任用私人，这次案子很容易证明和他并无什么特别牵连，只是失察而已，因此陈的地位并未动摇。杨揆

一看到陈很恭顺，正好利用他来打击吕东荃一系。吕王何这一小集团形势渐转不利，不久又发生王达逃跑的事，吕何两人就不安于位了。杨后来示意要撤销宣传处，陈维政从减少经费的见地上加以赞同，于是吕东荃辞职离鄂，何庭流也随而去职。南京方面又派了黄大中来接任教育厅长，宣传处并未撤销，由汪伪中央通讯社的殷再纬接任处长。

在王达离开警务处之后，日方提出以在抗战中兵败被俘经汪伪劝降的蒋军杂牌军长公秉藩继任处长。汪伪这时正在大肆搜罗重庆方面的军人，当然极力赞成，杨揆一也只好同意。公担任这个光杆处长，倒是自甘庸碌，不求表现，对杨也做到适可而止的恭顺，杨很想藉他和蒋军杂牌部队中的孙蔚如（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公和孙同是陕西人）拉上关系，因此极力拉拢，彼此很能相安。

杨到湖北来没有带一兵一卒，他兼任伪行营主任当然只是空名，“行营”所辖的所谓“国军”，只是由日本军部所豢养的一些由“皇协军”改编过来的土匪流氓。这些伪军名为第×师、第×师，实际上是人少枪缺的一些乌合之众，其中以邹平凡部略具实力。原来邹部称为“黄卫军”，是由熊剑东编成的，熊本是戴笠系在江南的特务部队将领，被日军俘虏后投降，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八木中佐支持熊剑东在汉阳组织军队，定名“黄卫军”。这支军队在湖北伪军中算是比较有军队样子的，不过熊剑东由于和蒋军往来太密，受到日军的猜忌，不久即调职，由其参谋长邹平凡接管他的军队。

2. 卖官鬻爵争权夺利。杨揆一当然不会放弃捞一把的念头，他看到当时湖北沦陷区内各县的伪县长，靠着卖盐卖鸦片和物资统制大发横财，就想从这些伪县长身上“开辟财源”。杨的办法是：（1）利用另一争夺县长的人所发动的控告，向特务部提出更换县长的要求。不用说这些控告的内容都是事实，日军浪人虽然可以继续庇护这些伪县长，但时候一久，也觉得理由不很充足，往往示意这些伪县长去“私休”；（2）有时各县要换县长，这个新县长就必须取得日本军方和杨揆一两方面的认可，方能上任，杨就“运用”他的同意权。由他发放订下分肥条件的有伪黄冈县长罗荣衮（北洋军阀时期做过夏口县长，后来转任伪武昌县长）、伪黄陂县长陶敦礼（号聘三，后来接罗荣衮任伪武昌县长）、伪黄陂县长程汉卿、伪监利县长李孝怀等人。还有伪沔阳县长曹某，是特务部的翻译，也是先走日本人的路子后取得杨的同意发表的。

当时杨揆一长年住在汉口怡和村“省长官邸”里，陪着自己的姨太太以及别人的姨太太打牌，每个月到武昌伪省政府去三四次点点卯，一切卖官鬻爵的要务，都在官邸里进行。

他还异想天开，利用“县政会议”的名义常常召集各伪县长来武昌开会，题目是“治安”、“财政”，各伪县长决不能不来（因为这些题目是合于日本的国策的）。既然来了，就不能不对杨孝敬一番。伪孝感县长朱坤宇有一次开县政会议时先到怡和村求见杨，手提水果两篓当面送上，杨一提心中有数，从此朱就得到杨的另眼看待。朱每有请求，杨总逾格答应，甚至有一次朱申请价领已经逾期的食盐，按照当时伪财政厅和伪盐政局的规定，每月各县应领的数字过期伪盐政局不再发给，因此伪财政厅对朱的申请不予证明（这时该厅有核发食盐证明之权）。朱早已向伪盐政局讲好了条件，岂肯放弃这笔财源，就写了一个报告给杨，杨在上面加批：“事关民食，既经盐政局同意，可予照

办”字样，交给伪财政厅，陈维政对这事很感为难，我当时是主办科长，他向我说“省长有些事容易受左右包围”，意思是说是杨的左右受了贿，我当请陈加批“事属省座特许之件，今后不得援例办理”几个字，陈沉吟很久说：“省座两个字不必点明吧。”照例上级有批示，下级还须签复，这次伪财政厅签复时，有意重叙照章不予证明的理由，然后说出“事属特许，姑予照发”，刺了杨一次。

除杨以外，伪秘书长吴明浩和伪民政厅长汪书诚也是想在伪县长身上分点肥的，他们对杨的包干办法当然不满。杨对于汪书诚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但对吴明浩开始却不能不让几分，因为吴虽然没有很可靠的后台，可是毕竟是从南京来的，在蒋镇东去职以后，假如再容不下吴明浩，将使得南京方面的反对者更多一层理由。后来杨、吴交恶愈趋尖锐，由杨从南京带来的秘书主任章志荪和吴发生冲突，吴一怒而回南京，从此杨在南京方面又多了一个对头了。

伪建设厅长关麟书和杨同是何成浚属下的旧同事，伪建设厅多少带着一点生财之道，因这就和杨发生冲突，杨就从南京找来了陈承纶来接替他（陈承纶于 1943 年 3 月 5 日任伪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之职）。

3. 杨揆一同陈维政的勾搭。随着日军战事的失利，沦陷区通货膨胀的现象突出的显现出来了，伪省府是个高高在上的空头机关，本身没有收入，只靠所谓中央补助费来维持开支。这种补助费是每半年（当时的预算是半年度制订一次的）作一次调整决定，由于伪中央储备券贬值非常厉害，这笔补助在决定以后的三四个月就不值多少了。而在此以前，伪省府增设了一些机关像经济局（局长蔡文石）、粮食局（局长胡瀛洲）、清乡事务局（局长王遇甲）、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湖北分会（主任委员谢伯进）等，虽说大都只是一些有名无实的机构，可是也毕竟要一些人事费用。在通货贬值以后，伪省府就日陷困境，一些小职员简直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很多人辞职到一些伪县府去谋事，因为伪县府直接取之于民，可以进行实物搜刮。

在此情况下，伪财政厅成了众矢之的，杨揆一希望陈维政能在盐、烟两项收人中想办法。陈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只好硬着头皮向日本军特务部交涉，特务部终于承认了由伪省政府参与决定各县的配发食盐数量。这样，伪省府就可以和各县定一个提成的办法。但陈维政后来想到这样只会替杨揆一开一个生财之道，而他本人只会背上更多的包袱，于是提出一个代替的方案：（1）由伪盐政局和伪戒烟局把下一个月配发各县的盐、烟数量通知伪省府，伪省府有提出改订数量意见之权（事实上从未行使这项权力）；（2）各县向盐、烟两局价领盐、烟的同时，必须持有伪省府的证明书认可规定的数量；（3）伪省府在发给证明书的同时，按照数量缴纳一定的手续费（实际上这项手续费率的决定，每次都预先得到特务部的同意）。在实行了这项办法以后，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伪府的困境。陈维政由于放弃了生财之道的盐、烟支配权，更增加了日本人对他的信任，杨揆一对陈也不能有任何抱怨，因为这段交涉始终是陈出面办理的。至于盐、烟两局的局长李炎汉、沈竹痕以及这两局的日本浪人，对于陈这种不和他们争夺利益的作法，当然是乐于接受的，因此也表示支持。

盐、烟的运输主要是从苏北经水路到湖北。到了 1944 年，运输一天一天地难起来，路上的损失率极大，盐、烟的来源大减，伪省府向各县所分取的手续费是几个月制定一

次的，用伪币计算的收入无法应付瞬息变化的支出。1944 年下半年，陈维政在日本特务部上层人物的授意下，向杨揆一提出伪省府精简机构的秘密建议。杨揆一到任两年以来，伪省府先后添设了不少的局、处或者什么委员会，这些机构事实上大半是没有什么事可做的。设置的原因只是为了根据汪伪中央各部各不相谋的规定，多一个安排人员的机会。同时伪省府各个机关中员额一般不足，原有职员因为衣食无着，有不少的人弃而改就伪县政府的事，所以吃空额的情形逐渐严重。陈维政向杨揆一提出的建议包括以下几点：（1）撤销宣传处、粮食局、经济局、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湖北分会以及“新国民运动”分会秘书处，其职责并入有关厅；（2）伪省府合署办公，政财建教四厅的总务科合并为一，设在政务厅；（3）其他附属机构酌量裁并，各机关员额有所减少；（4）作为这一方案的掩饰，还规定了一些调整薪给，改善公文处理办法的表面文章。

这个计划很容易得到杨揆一的赞同。从实际利益说，当时各机关报的支出预算中都有一笔办公费由总务科掌握，这笔办公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公开的假报销而交入机关头目的私囊的。按照陈的建议，各厅的总务科都合并到伪政务厅的总务科，而伪政务厅总务科长却是杨的私人。当然陈维政作这建议也有用意，这样做可以使杨易于接受，伪财政厅的总务科交出来了，别的厅当然无话可说。

杨揆一接受了陈维政的建议以后，陈就秘密召集伪政务厅的科长卢祯祥和我在汉口珞珈碑路私宅赶拟出一套章则来，他再亲自把这一套章则译成日文，对其他厅处长表明这是日本人的意见。于是这一套方案，就几乎没有什么阻碍地被付诸实行。然而，这仍然没有使他能维持下去。

杨揆一来湖北将近三年的期间中，除了给自己搜刮了一笔财物，对陈璧君有所孝敬以外，对汪伪政权本身没有起到什么有利的作用。在对重庆的接线活动中，杨的旧上司何成浚这时已是失意人物，杨在其他方面的接触面非常有限，在和日军的关系上，他也没有打开什么局面，反而时时要汪伪中央替他解决困难。甚至在 1943 年汪精卫本人还亲自到武汉替他壮声威（汪这次到武汉的主要目的不详，从表面上他在伪省府礼堂穿着“新国民服”大吹大擂的行径来看，似乎他也只是在想取得一些宣传的效果），到 1944 年，在日本军队已处在苟延残喘的形势下，杨揆一本人也只是在那里苟延着，可是到了这一年 12 月间美机轰炸汉口之后，“苟延”的奢望也都难于继续下去，南京伪政权这时已汪死陈（公博）继，实际上周佛海的权力还大于陈，在周的支持下作出了叶蓬出任伪湖北省长的决定。汉口日本军人尽管对叶还不那样欢迎，但在日暮途穷的形势下，也就不便峻拒了。

叶蓬的收场戏

叶蓬在南京当了几年的伪陆军部长，早就想回湖北来一试身手，这次如愿以偿，不用说是很踌躇满志的。南京伪府原来是决定叶、杨对调的，但叶坚持不把伪陆军部交给

杨揆一，结果调伪编练总监任援道为伪陆军部长，杨揆一继任伪编练总监①。叶除接收杨揆一的全部官衔——伪省长、保安司令和行营主任等以外，还解决了以前何佩瑢、杨揆一所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改成了省辖的汉口市；二是在所谓盐、烟中央收入方面，有较大的支配权。尽管如此，在1945年3月末他到武汉的时候，武汉的日军已是气息奄奄，汉奸政权的命运当然是计日可待了。

叶蓬为人骄傲自大，刚愎自用，这次到湖北来，主要是想抓住军队做个实力派。他带来的亲信，首先都安排在行营，只派了一个秘书长萧某到伪省府，厅长一个不动（陈维政仍兼政务财政两厅，陈承纶建设厅，黄大中教育厅）。可是当时的日本军部偏偏要限制他在行营方面的一些行动。首先只允许他从南京带来一个卫队连，其次对于他在湖北成立军队的要求，采取拖延的对策。不久以后叶也认识到局面还不是那么容易被他控制的，要想抓军队，必须有比较充裕的财力，而伪省政府这个地盘是筹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他的注意力也就逐渐转移到伪省府这方面，以便于开辟财源。

这时的盐、烟两局实际上是由特务部和南京最高经济顾问系统的汉口经济顾问管理着，伪财政部派驻汉口的三省财政特派员并没有实权，所以周佛海也支持叶的夺取盐烟收入的计划。叶就命令陈维政向汉口经济顾问高桥和特务部提出，盐烟两局运输量太少，迫使日方承认伪省府有权自运。果然，南京方面运来了一批食盐；而上海当时的“鸦片大王”张某据说是叶的同乡，也极力帮忙，运来了两批毒物，周佛海也批示伪中央储备银行承作抵押借款。

叶来汉不到两个月，在收入方面就打开了一条出路，更加助长了他的骄气，他经常在汉口黄陂路“五花宾馆”召开伪党政军扩大会议，在会上摆出一付“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的面孔。当时在湖北的伪军，原来就是日本军人收编的一些土匪流氓，他们对叶蓬并不心服。叶蓬以为自己可以另起炉灶，常常表示不稀罕这几根破枪，更激起他们对叶的反感，其中以实力较强与日本军人较接近的邹平凡对叶最为不满。其余像李宝琏等，驻区不及邹部的殷富，对邹也有矛盾，还能表面上对叶表示几分服从。

邹平凡的驻地是汉阳近郊一带，自从美机轰炸汉口以后，汉口居民很多逃到汉阳四乡，汉阳县城俨然就成了经济上的一个中心。这时邹与《大楚报》社长胡兰成深相接纳，不放心叶蓬的日本军人对他们的结合尽了很大的力，胡兰成是当时日本大使馆书记官吉田东祐所最赏识的一个文化汉奸，他的文章在当时沦陷区里颇具几分煽动力。他对叶蓬的一切行动，极尽讥评之能事。胡还在汉阳举行几次公开讲演，提出了他对中国出路的看法。他认为延安、重庆、南京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暗示中国应当走“第四条路”。他的论点当然是非常荒谬的，可是在沦陷区中，居然公开指责了南京伪政权，不会不引起很多人的“欣赏”。这种指责也等于是挖了叶蓬的老根，叶威怒之下，亲自拟了一道命令规定“造谣生事者杀……”等等七种致杀之罪。可是这一纸空文又有什么用呢？只落得胡兰成又在这“七杀令”上做了许多讥笑文章。叶手上不但没有可供指挥的军队，而且也没有可以进行文字斗争的阵地，当然恼怒非常。好不容易拼凑出版

① 此处有误。接替叶蓬任伪陆军部长职务的是原伪军事参议院院长萧叔宣，杨揆一则调任伪军事参议院院长。

了一份不成样的报纸《朝宗报》，费了不少精力，但总赶不上胡的《大楚报》的煽动力量。

从叶蓬和胡、邹之间的斗争，也可以看出日军寄希望于南京伪政权，但又不完全满意，甚至很不放心南京的这一班人。他们又想在另一班人身上找出路，可是这一班人是否能胜任对他们寄予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事。日军的上层人物对于胡兰成和邹平凡，还只是作为牵制叶蓬、迫使就范的一个工具。

叶在1945年3月底来武汉，这时敌伪的形势已经面临崩溃边缘。叶为了与南京方面——主要是周佛海——联系应变的办法，几乎每隔一个多月就要到南京去一次。六七月间，有一次晚上在他的汉口岳飞街圣德里私宅，当我向他汇报当天向伪盐政局秘书主任王某联系一件事务的结果以后，他忽然问我："炮响起来了你怎么办?"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接着说："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和日本人也会发生冲突，别人也可能吃掉我们。我们都有联系，又都靠不住。可是只要自己把队伍集中，谁也不能奈何我们。"8月初，叶又飞往南京，当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接着蒋介石就颁发了命令，叶的名义是"七路军总指挥"，叶在南京当然就要赶回汉口待机而动了。

正在日本投降而叶留在南京未回的时候，汉口日本军人示意邹平凡把叶蓬在汉口的卫队连全部缴械，叶的亲信都软禁起来，断绝叶的消息来源。同时准备得到叶回汉的消息后，派军队到飞机场出其不意，制其死命。可是叶临时还是得到消息，飞机改在黄冈蒋管区降落。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在黄冈的"鄂东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李石樵是叶在保定军官学校时的同学。叶只得去投奔他，由他派人护送叶到武昌附近。叶就召集李宝琏等部伪军在武昌明月桥组织七路军司令部。李宝琏等因为眼红邹平凡，同时想到叶现在已是七路军总指挥，也愿意和叶互相利用一番。

邹平凡这时也挂起"汉口守备司令"的招牌来。原来国民党当时各个系统，都派有一些联络人员，一般称为"策反参谋"，其中有一个高参马某接上了邹平凡的线，填发了一张委状给邹。邹当时并不知道这班"策反参谋"随身都带有空白委状，并非都是经过国民党的高级头目的认可。马某当然在邹平凡那里受到上宾的礼遇（抗战胜利后不久，马某因招摇撞骗，劫收财发得太多，被另一部分分赃不均的国民党分子置之狱中）。

邹平凡自以为受到了蒋政府的委状，可是起初还没有下定决心。他一面接收了日军在汉口的仓库，把日军多年搜刮的财物尽量转移变卖；一面也向日军作出一些根据日军意图办事的姿态。当时日军估计武汉地区附近没有蒋军的正规军，蒋军要想来接收武汉必须走很远的路，还得通过包围着武汉的新四军阵地，因此他们认为蒋军至少要在两个月以后才能到达武汉。在这期间亲日的势力可以在日军的支持下扩充实力（这一点在武器和财力方面都没有困难）。将来这一种"第三势力"可以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取得有利的地位，见重于国民党，而日本军人也可以第三势力的"提线"人的资格向蒋介石争得有利的合作条件。

事实上这种"第三势力"的论调，胡兰成早就大肆鼓吹过了，此时日军既然公开支持这一主张，于是在邹平凡暂时掌握了汉口军权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宣布成立了一个"武汉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和策划人物是胡兰成和杨伟昌，而陈维政由于原

来是伪省府的财政厅长兼政务厅长，在叶蓬离汉赴南京时代行伪省长职权，名义上有些方便，更由于他是日本人所信赖的人物，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之一（另一个是杨伟昌，和陈维政是同乡，他由于日本人的支持，担任过伪省合作联合社主任）。

邹平凡在接收了日军仓库以后，态度也逐渐转变。他知道，以他原有的权力，短短一两个月内很难发展成为像样的队伍，倾向于利用“汉口守备军司令”这一点关系，加上他接收日军物资而得来的雄厚财力，向国民党输诚自保。因此在“武汉政务委员会”宣布成立以后不到几天，这个委员会就销声匿迹。大概在日本投降后两个星期左右，胡兰成、杨伟昌和陈维政就相继逃走了。

9月初，国民党的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李石樵带了少数保安队，兼程赶到武昌，但不敢过江到汉口来接收。接着国民党的一小部分正规军也陆续赶到汉口。这时日军虽然还未缴械，却早已不敢过问军队的调动，邹平凡把汉口防务交出以后，由于对接防的军队长官不断有所孝敬，总算没有发生问题。

叶蓬在武昌叮嘱伪省府原充建设厅长的陈承纶出面向李石樵造册移交，虽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交出，李石樵总算看在同学面上照册接收了。

这时武汉属于第六战区，战区司令长官是不属于蒋嫡系的陕西军人孙蔚如，但实权却掌握在陈诚手里，陈调郭忏来担任警备总司令。郭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和叶蓬有同学关系。尽管如此，叶对陈诚还是有戒心的。叶的亲信常常谈论着叶在国民党内的两个靠山（何应钦和戴笠）和两个仇人（一是张群，起因是“人形靶”事件，见前述；另一个是陈诚，在武汉未沦陷前，陈任第六战区司令。叶曾一度被派充任第六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刚一到职就因战略部署的意见与陈不合发生磨擦，两个刚愎自用的人之间的分歧就发展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结果，叶因势力相差悬殊而立被免职，这是叶以后所切齿痛恨的事）。叶在明月桥的所谓“七路军司令部”里命令李宝琏等部伪军靠拢，以免被吃掉，并且做出一付随时拖走的姿态。可是这几支伪军根本不在陈诚的眼下，叶蓬所指靠的只是何应钦和戴笠两条路，本来后一条是他认为最可靠，用的工夫也最多，自从戴笠坠机身亡以后，他就只好依赖何应钦了。当时何应钦名义上是陆军总司令。10月初，叶接到何的电报说，何应钦由湖南乘飞机到南京，路过武汉，嘱叶蓬到机场迎候（后来据传当日并未来汉）。叶蓬到达机场，就被郭忏派兵逮捕。直到张群任行政院长，陈诚就命令将叶解往南京，不久就枪决了。

杨揆一也是在南京被枪决的，张仁蠡是在天津被捕，判处无期徒刑（据说张在解放后被镇压了），武汉在沦陷期间的一段丑剧，就此告终。

以上是关于湖北汉奸政权七年来的大致情况。我的二叔张若柏曾是何佩瑢的机要人员。我在1939年年底，由伪市财政局科员转到伪省财政厅财务人员讲习所任讲师，在1940年省市争夺“中央税”管理权而设置省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时，曾调兼该会的省方两个股长之一；1942年伪财政厅发生舞弊案陈维政受到攻击时，正值财讲所撤销，因为我在该所讲授会计制度，就被调到伪财厅充制用科长，陈的用意是藉此表明他不任用私人。在此后将近三年的期间参与了陈维政的某些活动，由于制用科的主要职掌是办理收支预算，因而与杨揆一、叶蓬等人发生一定的接触，并在日本投降以后，叶蓬命令向

国民党鄂东行署办理移交时由陈承纶出面，由我具体办理。现将所记得的情形摘述如上。

（1965 年）

汪伪时期江西省情琐记

傅大兴*

一

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出笼后，辖有苏、浙、皖三省及湖北、江西、广东三个不完整的省。当时江西省是日军侵华最前线，汪伪势力仅辖该省11个县局，计九江、星子、湖口、彭泽、德安、瑞昌、永修、瑞金、新建、南昌及庐山设治局。

日军在江西省的兵力，约有两个兵团分驻九江、南昌。两个兵团各自为政，当地所有行政均由日军直接处理，汉奸政府不过附庸而已。

汪伪江西省政府共经历了三任伪省长：第一任为邓祖禹（1943年5月—12月），第二任为高冠吾（1943年12月—1945年3月），第三任为黄自强（1945年3月—8月）。高冠吾原为伪维新政府旧人，始掌江苏，继掌安徽，后掌江西。高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受排挤的人物，所以他的调动是每况愈下。记得有一次，高冠吾在由安徽调往江西的一个欢送会上，高借着几分酒意，向欢送他的人说："我高冠吾一向是敬佩汪先生的，可是我不知为什么得罪了汪先生，别人是越调越好，我高冠吾则是越调越坏。"

黄自强过去是汪精卫的政治部长，汪精卫死后，黄失去靠山，与陈公博关系极浅，正在此时，陈正要抓兵权，抓政权，甚至还要抓特务领导权，陈为了牢牢地掌握特工，又将政治部改组为政治保卫部，以老牌特务丁默邨为政治保卫部总监①；以其姘妇、伪立法委员莫国康为机要室主任秘书，企图由莫直接领导特工。另外发表黄自强为伪江西省长兼九江"绥靖"公署主任。

二

江西省地盘残破，财政支绌，各伪县长听命于日军，对省方命令则阳奉阴违。全省税收虽然不少，但在主其事者侵渔之后，收入寥寥，全部行政开支，全赖伪中央补助，一般机关待遇极低。在物价腾贵之下，大小伪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温饱，大都面有饥色。高冠吾因抱消极态度，对省政不闻不问，且最能适应环境，每日饮酒赋诗，藉以消磨时光。

黄自强面对以上情况，迟迟不敢到任，他为了打破这层难关，除要求伪中央增加赣

---

* 作者当时系汪伪江西省财政厅厅长。

① 汪伪政治保卫部于1945年2月8日由政治部撤销后改设，陈公博兼任总监，丁默邨为副监。

省补助外，并与伪财长磋商以“淮盐济赣”办法，以资挹注。经过详细计划，由黄备妥大型木船40只，并以“绥靖”公署特务团作为护运大队，往返运输食盐，预计每次以10万吨计算，可以获利伪“中储券”千万左右，如以之补助伪省府开支，倒也绰绰有余。黄在诸事就绪以后，才有去赣决心。

这时使黄最感头痛的，是伪省府各厅处人选问题。黄本有政治部原班人马，此时已散了不少，所留下来的又都派系复杂、互不相让，经黄慎重选择，才内定伪政务厅长孔熙元、伪财政厅长傅振邦（即傅大兴）、伪建设厅长王国一、伪教育厅长赵宝芝、伪警务处长王铁樑、保安副司令李孝诚、伪“绥靖”公署参谋长廉雪海。

孔熙元，山东曲阜人，为伪社会部长、特务头子丁默邨的嫡系，在黄任伪政治部长时，孔由一法国神父介绍，任伪政治部淮海局局长。孔因宗教关系，得任此职。伪财政厅长傅振邦原为黄自强任伪军委会总务厅长时之会计科长，一向为黄掌握财权，是黄认为最可靠的部下。伪建设厅长王国一原在天津当过律师，是黄妻朱蕙英之姨父。伪警务处长王铁樑是黄日本士官同学，原系东北系军人。伪保安副司令李孝诚也是黄的日本士官同学，原系国民党军人。伪“绥靖”公署参谋长廉雪海，是黄的黄埔同学，在汪伪军委会当过中将参议。以上这些人选，都是七拼八凑，算是班底组成。

我们这些人在从南京未动身以前，江西省旅京同乡会、旅京要人伪考试院长江亢虎，曾经召开了一个欢迎会。江亢虎过去是以国家社会党参加汪伪政权的，江此时年已六旬，妻子均在国外，仅孤身一人在南京居住，在外表上装出一副学者模样，骨子里却是卑鄙可耻。他在伪考试院录用的女职员，又多又漂亮，江在伪考试院无事可作，日夕追逐女性为乐，故外界送给江一个绰号——“花瓶院长”，不为无因也。这一次江在会上发言很多，对黄恭维备至。会后江从口袋里掏出好多履历，要黄替他予以位置。

三

我们到了九江以后，择定于1945年3月20日在伪省府举行联合就职典礼。我在这短短几天中，感到江西省的情形，却是有些特殊。例如过去的九江市政府及一些近代建筑，本来很多，可是都被日军占据，且沿江一带日军又划为军事区，洋行商店林立，因此一全套伪省政府机构，都挤在旧治江州城里，大街小巷都是机关。伪省府设在一个教堂内，各厅处又都不在一处办公，在联系上很不方便，各机关经费奇紧，都在喊穷。

赣省食盐，向来依靠淮盐，沦陷以后，交通梗阻，盐价胜贵，广大劳动人民因为买不起食盐而淡食者已非一日。黄所运的食盐虽多，盐船陆续到达，但在食盐奇缺之下，仍感供不应求，因此获利很多，我们即以此项收入来增加伪职人员待遇和增加各机关经费，当时人心振奋，正好像要死的人打了强心针一样，又能苟延残喘下去。

这时，日本经济顾问要伪省府办理两件大事：第一是配合日军“大东亚战争”，要将江西省改为“战时体制”，撤销全省税务局，所有税收改由伪县政府直接征收。这样一来，此后在征税上，伪县政府可以利用武装力量，强制收税。第二是全省田赋要改为征实，划分全省田亩为三等，这样就便利了征粮，进一步对农民进行榨取。

黄为了贯彻日军这一方案，在九江召开了一次全省“县政会议”，由黄自强亲自主

持，日军出席人员计有九江兵团长、特务机关长和日本经济顾问，会议进行了三天。回忆会议主要内容，约有以下三点：

1. 全省税务局撤销以后，江西全省各县应该即时设立县财政整理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委员，另设副主任委员，专司征税事宜，由省财厅委任之。

2. 自1945年7月1日起，江西省田赋改为征实，并划分全省田亩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田每亩征实一石二斗，中等田九斗，下等田七斗。

3. 先选定九江县为试办区，由省财厅督促实行。

四

这次“县政会议”闭幕不久，驻南昌的日军兵团也要照方抓药，要在南昌重新召开一次“县政会议”。不过此时黄已去南京“述职”，省政交由他的亲戚王国一代理，经特务机关长往返磋商，最后要求在各伪厅处长之中，择一前往，代理黄自强前往出席，黄由南京来电决定由我前往。

我是以伪财政厅长资格代理伪省长黄自强前往南昌的，所以日军特务机关长有阪大佐对我特别客气。当时由九江到南昌的南浔铁路日军正在拆除另有别用，我们改由新修公路前去。我同有阪分乘两辆卧车，日军士兵和我带去的宪兵、副官、秘书、翻译等人分乘卡车。因为沿途恐怕美国飞机轰炸，白日不能行车，趁着夜间起行。翌晨10时左右，方才到达南昌市区。此时，伪南昌县府已经组织市民手持小旗夹道欢迎，我同有阪在伪南昌县长朱方隅陪同下，先到伪南昌县政府休息。

提起朱方隅来，倒有叙述的必要。朱是江西饶州人，清末举人，民国初年当选国会议员，善于吹拍，是一个十足的政客。南昌沦陷后，朱在日军卵翼下，充任伪南昌县长。江西省经历伪省长三次，对朱不敢有所更动，故朱有“南昌王”之称。此时朱正修葺县府，在花园中盖有竹亭一座，异常精致，命名“爱日亭”。朱还题诗亭上，语多取媚日军，极尽丑恶能之事。我在九江时，朱曾在一个庙内请我吃过一次素斋，此番到了南昌，朱对我非常恭敬，对我招待唯恐不周。

日军南昌兵团长召开的“县政会议”地址在南昌兵团部内，我代表黄自强在会上作了致词以后，便算完事大吉。会议也是进行三天，内容与九江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九江“县政会议”是由黄亲自主持，有各伪厅处长陪同，有各机关代表参加。会后，日军兵团长还在南昌偕行社设筵招待。平时南昌因为灯火管制，每晚10时电灯即行熄灭，而这一天因为日军兵团长招待“县政会议”与会人员，全市电灯通宵不灭。

五

最后再谈谈九江帮会几个头面人物。九江位居长江中游，帮会势力很大。日军在沿江侵略作战当中，利用安清帮会船只，为其运粮运械，颇具帮凶作用。在沦陷时期，各地帮会组织都受到日军当局的积极支持，成为地方一大势力，尤其沿江一带为甚，当时汉口、九江、安庆是帮会最活跃的地方。

九江帮会头面人物要算陶思澄了。陶是江南望族，历任道尹、关监督多次，在直鲁军阀张宗昌时代，曾经代理一次山东省长。高冠吾任伪江西省长时，陶任伪财政厅长。此时年已七十，过去虽然显赫，老来却潦倒不堪。黄自强时期，高冠吾左右近人，均随高而去，只有陶思澄却赖着不走，每日必至伪省府向黄表示敬意，偶尔为黄出谋献策，表现无限忠诚。这种软磨硬泡功夫，使黄对陶无可奈何，后来才委陶为伪省府总参议，以备咨询。陶系青帮大字辈，在帮会中威信较高，俨然首脑人物，因陶具有官私两面势力，且辈份高，故拜其门下的，大有人在，陶更借此机会，大摆香堂，敛钱自肥。

另一个帮会头面人物是张远西，张是四大家族宋子文老婆张乐怡之弟，曾任九江市长，可算是一个百万富翁。沦陷以后，张在庐山作了寓公，日军对张优礼备至，张对历任伪省长均有联系，对伪省政多所干预，成为当地一个豪绅。我们随伪省长黄自强上庐山“视察”时，张曾在其住宅请我们吃了一次西餐。张生活欧化，不但喝的酒是自己酿的，罐头也是自已做的，举凡一切与市上所售不同，味道两样，是夕所费，何止千金，豪门生活，固如是也。

（1963年）

我所知道的陈公博

王　以　义*

我和陈公博的关系虽不算怎么深，可是相处的时间却相当长，对于他的情况，就一般和陈公博有过关系的人来说，我可能还算是知道得比较多的一个。我对于陈公博的情况所知道的并不全面，有些更重要的情况可能我并不知道。就是当年知道的情况，因为时间已很久远，大多已忘记，就是知道，也只是一个轮廓。希望知道陈公博情况比较多的人来补充和订正。

陈公博的家世

陈公博，广东南海人，祖籍江西。父亲是清政府的军官，作过都统，但后来不知犯了什么罪，被清政府关在牢里，并抄了他的家。

陈公博是个独生子，其父亲死后，他就和母亲住在一起。稍大一点，就一面读书，一面在报上写点小文章，得一点稿费，借此过活。他最初在广州读商业专门学校，后来又考进了北京大学。

陈公博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被中共开除了党籍。1923年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2月毕业后回国任教，是年加入国民党，结识了廖仲恺先生，为廖所器重，从此官运亨通，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作过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北伐时，他又作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廖仲恺先生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后，陈公博又被汪精卫所看重，从此以后就一直跟着汪精卫跑，最后作为汪精卫汉奸组织的继承人而结束了他的一生。

陈公博的老婆名叫李励庄，是在北京女师大读过书的。她和陈公博结婚后生了一个孩子名叫陈幹。此外，和陈公博没有正式夫妻的名份而关系很密切的有以下几个女人：一个是何家的“大小姐”，她是何焯贤、何炳贤的姐姐，但她的名字却没有人提过，陈公博家里的人都叫他“大小姐”。她和陈公博住在一起，和陈妻李励庄的关系搞得很好，出出进进两个人总在一起，从没听说吵过架。她在陈公博家里的主要是照料陈公博的母亲和儿子陈幹。这位“大小姐”和陈公博没有生过子女。听说她很会搞钱，她经常和李励庄合作，利用陈公博的地位想尽办法搞钱，而且搞了很多的钱。另一个与陈公博同居的女人是何家“三小姐”、何炳贤的妹妹，她和“大小姐”的性格不同，和陈妻

---

* 作者当时系陈公博机要秘书。

李励庄关系不好，因此没有和李励庄住在一起，而是另外居住的。李励庄住在南京的时候，这位“三小姐”住在上海。听说她也读过大学，和陈公博也没有生过小孩。再一个女人是莫国康，陈公博和她有师生关系，以后两个人就一直缠在一起。

陈公博和改组派

陈公博投靠汪精卫后常对人表示，他一生感恩最深的有两个人，第一个廖仲恺，第二个是汪精卫。陈公博能言善道，能写文章，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很快地想出办法来应付。陈公博“风流潇洒”，对人和善，容易与人接近。大家又知道他以前参加过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左派”，因此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是个锋芒毕露、风头很健的人。他自投靠汪精卫后，便成了汪精卫手下两员大将之一。汪精卫的另一员大将便是顾孟余。大家都以陈顾并称。顾孟余遇事总要先考虑考虑，不敢勇往直前，因此一般人多喜欢陈而不喜欢顾。但汪精卫因顾孟余曾经任过北京大学的教务长，在旧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声望，对之却要尊敬一些。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公开地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那时陈公博在武汉。后来汪精卫在武汉站不住脚，陈公博也就离开了武汉。汪精卫等策动张发奎的军队回到广州与桂系争夺地盘失败之后，回到上海。1928 年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等反汪各派激烈攻击汪精卫。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竟因他们的反对，没有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骂陈公博骂得最凶的是号称无政府主义者的吴稚晖，吴稚晖硬说陈公博是共产党。

这时陈公博住在上海，正是他风头很健的时候，他也不甘示弱，在上海办了一个大陆大学，自任校长，同时他还办了一个刊物，名叫《革命评论》①，来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反击吴稚晖等。在《革命评论》发表文章的人，还有刘侃元、施存统、程希孟等，他们同时也是和陈公博一起办大陆大学的。他们的言论一般都是很激烈的。他们批评南京政府腐化的文章，确实为一部分人所欢迎。陈公博在《革命评论》上所写的文章，除了反击吴稚晖、批评南京政府腐化贪污外，还主张中国革命应以工、农、城市小市民为基础（他这种主张遭到顾孟余反对，汪精卫也不赞成，因此陈公博后来也就不再提起了），主张恢复 1924 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恢复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他一方面反对南京政府的贪污腐化，同时也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尤其是国民党中一部分年轻的党员，看到蒋介石公开反革命，大肆屠杀革命青年，听任北洋政府时期的反动势力、昏庸老朽的“西山会议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南京政府里掌握大权，倒行逆施非常不满，因而陈公博这些言论确实使他们受到一些鼓舞。这也就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②,）组织成立的基础。“改组派”成立之后，内部主持的是所谓粤方二届中委的一部分委员，当然包括陈公博在内，而且是个总负责人。“改组派”遥奉汪精卫为首领，因为汪那时正在国外，事先并没有参预。改

---

① 《革命评论》周刊于 1928 年 5 月 7 日创刊于上海，同年 9 月被迫停刊。

② 改组派正式成立于 1928 年，总部设于上海。

组派成立后所办的刊物《前进》[1]，起初是由顾孟余主持的，虽也受到一部分人的注意，但远不如陈公博主办的《革命评论》。

1930年3月，“改组派”首先在北平西堂子胡同挂出了“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简称“海联”）的招牌，以谷正纲、邓飞黄、李平衡、杨全宇等为常委，正式办公。后来联合办事处又办了一个日报，名叫《民主日报》，由邓飞黄主持，陈言任总编辑。另外又办了一个旬刊，名叫《民主旬刊》，由谷正鼎主持。这时陈公博和王法勤都到了北平，他们是代表汪精卫先来北平察看形势的。陈公博先后到过太原、北戴河，和阎锡山、张学良等见过面，交换过一些意见。一次，我同谷正纲去看陈公博，从陈的谈话中，显然可以看出他内心是很苦闷的。当时在北平的“改组派”中，有许多人主张汪精卫不要轻易北上，以免将来造成不良后果，就直接去找陈公博，要他把这种意见转达汪精卫。而汪精卫又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很想北上。陈公博处在中间，确有难言之隐。当时“海联”内部的意见也多半不主张汪来北平，但一接到汪精卫北来确实日期的电报后，也就大忙特忙地做起迎汪的宣传工作了。扩大会议后，陈公博也坐上了一把交椅。可是好景不常，张学良进兵关内，扩大会议就搬到了太原。陈公博到了太原之后，意志更加消沉，经常以饮酒看戏消遣。后来汪精卫溜出太原，陈公博也跟着走了，改组派这个组织也就无形散伙[2]。

实业部长陈公博

汪精卫经过几次反蒋失败之后，深深懂得他自己是个赤手空拳没有实力的人，倒蒋是不容易的。只有拿“民主”这类漂亮的词语作幌子来反对蒋介石，实际上是拉拢蒋介石，因为民主政治正是当时国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梦寐以求的。蒋介石也懂得像汪精卫这样的人，排除出去，不免会兴风作浪，对自己不利；放在手里，还可利用装装门面，不能说没有好处。因此在1932年1月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上，决定改组南京政府，准许孙科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便提出由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实行汪、蒋合作。

陈公博在扩大会议失败后，已经销声匿迹不露头角了。1931年底陈公博任实业部长。他当上了实业部长，什么也不管，专心专意过他的官瘾。现在把他任实业部长时的一些情形，分为以下几点来说：

（一）用人

陈公博在实业部所用的人员包括下面几方面：一、改组派；二、广东同乡同学；三、裙带关系；四、大陆大学学生。陈公博初任部长时，政务次长是郭春涛，原是“改组派”，也是国民党第二届中委。郭春涛去职后，政务次长换上了孙科方面的刘维

---

① 《前进》于1928年6月1日创刊于上海，由顾孟余（公孙愈之）创办，初为半月刊，第四期改为月刊。

② 1931年1月，汪精卫发表宣言，宣布解散改组派。

炽，“改组派”的谷正纲继任常务次长。李平衡担任劳工司长，李走后由科长唐健飞继任司长。秘书厅罗方中任简任秘书。这些都是“改组派”的人。此外“改组派”在实业部担任秘书、科长的还有好几个，但改组派在实业部内始终没有起什么作用，内部暗中互相摩擦倒是常有的事。陈的广东同乡、同学中，首先最得势的要算总务司长梅哲之，但后来因分赃不均与陈公博搞翻了脸，离开了实业部。其次便是参事厅的参事余恺湛。余与梅都是陈公博多年的老朋友，余后来也和陈公博搞得不太好，便到上海去当渔市场（实业部办的）的经理。说到裙带关系，首先要数何家。何焯贤担任商标局长，何炳贤担任国际贸易局长，都在上海。实业部最初只有周炳逵做庶务科长。周是何二小姐的丈夫，后因周倚势凌人，得罪了不少人而被撵走了。继任的是何炳贤的同学叶周达，他是陈公博及其家里都相信的人，因此后来陈公博离开了实业部到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和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做部长，都是派叶周达管钱。梅哲之走后，由何炳贤介绍严继光任总务司长。严是何炳贤的同学，以前是在国际贸易局任秘书的。李励庄方面，只有她哥哥李崇年担任过天津商品检验局的局长。至于莫国康，那时还没有得势，只介绍了她的哥哥莫衡在中央工业试验所当科员。大陆大学的学生，仅温广彝一人做过科员，其余的都是当錄事，最高也只是当办事员。他们常常拦住陈公博的汽车，向陈公博要事作，陈感到很恼火。

（二）行政

陈公博在实业部完全是在行政院汪精卫的掩护下作官。他在实业部任内前后四年，除了办过一些例行公事外，简直没有作过什么事，也不能作什么事。陈公博有时心血来潮，想办一点事，但由于各方面的钳制，终未办成。譬如 1934 年实业部想办一个钢铁厂，把计划提到行政院会议讨论过好多次，并且已经通过了。陈公博便派矿业司长黄金涛去美国与某公司（名称我忘记了）商谈计划及筹款办法，也都有了眉目。但军事委员会一纸公文通知行政院，说资源委员会要办，实业部便只好作罢。后来实业部想办一个铁管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实业部几次碰壁之后，我曾有一次向陈公博建议说，实业部的一些计划受到阻挠，据说是蒋介石部下的人在捣鬼，蒋本人未必知道，问他可否找蒋本人当面说说。陈当时不以为然他说：“我有什么事只跟汪先生说，行政院办不通，我就不管了。”后来过了几个月，有一天，陈公博把一份亲笔写好的电报稿交给我，要我亲自翻好发出去，不要告诉任何人，电报是发给蒋介石的，内容很简单，只说有事想当面和他谈。请他定个日期。但这个电报发出去之后，一直没有接到蒋的回电。还有和陈公博作对的就是陈立夫的 CC 系。CC 是无孔不入的，哪怕是用一个人，他们也要尽力争夺。我记得，实业部派代表去欧洲参加国际劳工会议，CC 不能争到一个代表名额，就是一个顾问名额他们也是要的。此外吴稚晖等人也常来找陈公博麻烦。

（三）贪污

陈公博在实业部贪污的主要来源有二：一为总务。总务司司长梅哲之和陈公博相处得很久，相知很深，正因为这样，他得到陈公博的信任；也正因为这样，他有时就不太听陈公博的话，到后来便因为分赃不均和陈公博闹翻了脸，脱离了实业部去搞农商银行

（后来汪精卫汉奸政府时期，梅哲之和陈公博又因为农商银行的利害冲突而大闹特闹，梅哲之连农商银行的总经理也站不住脚，让位给了何焯贤）。继梅哲之任实业部总务司司长的严继光，与陈本来没有关系，是由何炳贤介绍的。严继光为人非常谨慎，对陈公博是唯命是听的。总务司底下的会计科长陈烈，是会逢迎的人，也是个造假账的能手，他取得陈的信任，离开实业部之后，又跟陈公博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庶务科长叶周达，是替陈公博管家的，当时陈公博公馆的一切开支，完全由庶务科包干。叶周达对于李励庄和“大小姐”另外还要孝敬。我那时和严继光相处得还好，因此严继光便以补贴的名义，每月给我40块钱。至于严继光从总务司贪污，每月给陈公博送去多少钱，我是局外人，不得其详。

二为矿业。矿业司也是一个好搞钱的地方。因为当时各地方的矿，很多是由私人开采，矿主都是各地的大资本家、大地主，他们为了获得厚利，互相争夺矿权，而实业部便是最后裁判的机关。各矿主为了夺得最后胜利，便对矿业司进行贿赂，贿赂的数目大小，当然要以矿主的利益大小为准。矿业司的司长黄金涛，福建人，是陈公博面前言无不听的红人。他进部长室和陈公博密谈时，要侍候陈公博的勤务站在门口，不准别人进去，如果有人闯进去，他是很不高兴的。由此便可看出他和陈公博搞的什么勾当了。1932年，新化办锑矿的大资本家段楚贤和新化一部分绅士争夺采矿权。段楚贤用大量金钱向矿业司进行贿赂，事情被我知道了，那些所谓绅士以事关公益，要我出来帮忙，我就写了一个签呈给陈公博，陈公博不肯批，把它交给郭春涛。矿业司司长黄金涛知道后大发脾气，说：“王某是什么人，他怎么可以干涉矿业司的事，擅自越权签呈到部长?”郭春涛出来给我支持，说：“这是他们县里的事，当然可以签呈。”这样才算过去了。又实业部打算办钢铁厂，本来是应该归工业司管的，但陈公博不要工业司管，而且派黄金涛到美国去接洽，由此也可以看出陈与黄的关系了。

陈公博在实业部究竟贪污了多少，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但他到实业部不久，就在总理陵园盖了一座洋房做公馆，房子虽不甚大，但也颇为可观。同时他又先后买了两部汽车，一部他自己坐，另一部供李励庄和“大小姐”进城以及陈幹上学接送用。

（四）其他

陈公博本来是能言善道，喜欢写文章的，但他在实业部却很少当众做过长篇大论。就是出席总理纪念周，要他讲话，他也只是敷敷衍衍说说了事。至于写文章，只是他后来要何炳贤出面办过一个杂志叫《民族》，他在上面发表过一些文章，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因为当时我对于那些文章的印象不深，人们也不太提及，其销路一定是不多的。那些文章可能是关于国际贸易的多。我只记得他写文章多半是快要下班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人来找他了。他写东西的材料，如统计数字等，大部分是由何炳贤给他准备的。

陈公博的私生活是很糜烂的。他在实业部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六都要到上海去玩。1934年8月，实业部和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在天津合开一个工商产品展览会。我随同陈公博去天津，开完会之后，第二天下午便去北平。到了北平，他告诉我，晚上各玩各的，要我不要找他，并约定第二天在什么地方（地名我忘记了）集合，动

身回南京，第二天我到约好的地方去找他，他正躺在鸦片烟灯旁边，周围都是些爱玩的人，如周作民、何家驹等，我看在眼里，很不自在。

此外，再谈一下陈公博离开实业部的情形。1935 年 11 月汪精卫被刺，他的行政院长当然不能再干下去。汪精卫底下的两员大将，顾孟余已经坚决表示要离开铁道部，蒋介石也不再挽留。蒋希望陈公博继续干下去，并对陈说，如果陈不想再干实业部，随便他换哪个部都可以。陈公博没有答应。蒋最后对陈说，陈如果再不答应，他便去和汪说。汪后来告诉蒋，陈实在不想再干下去了。这样，陈公博才算决定走了。跟着陈离开实业部的有好几个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军委会第五部与陈公博的去欧

陈公博 1935 年 9 月担任了经济委员会合作事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用的一个秘书叫刘益铮。1937 年 2 月陈公博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此时他的兴头已远不如实业部长的时期，但名义上还是掌握了两个机关，聊胜于无。他在民众训练部安置了好几个人，一个是主任秘书郭威白，是何炳贤推荐的，此外就是陈烈和叶周达。陈公博这时很清闲，民训部是不要常去的，合作事业委员会根本不要去。他有一次告诉我，有些同志（指改组派成员）想按时开开会，谈谈问题。此事后来并没有实现，只是说说罢了。因为这时的“改组派”早已没有组织的关系，人心是非常涣散的了，就是勉强召集开会，用什么名义召集开会，开会时谈些什么，这些问题陈公博是无法解决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有一天，陈公博告诉我，中日战争要扩大了。我问他对于战事的看法怎样，他说打打也好，但没有说出什么理由。9 月初，有一天陈公博告诉我，马上要成立大本营，蒋介石要他担任大本营第五部的部长，就要开始筹备，并要我通知程一中、罗方中、刘益铮，由我们四个人担任第五部的秘书。后来我们四人确定分工，程一中管交际，罗方中管文书，刘益铮管陈的私人信件，我管总务。

后来大本营并没有成立，军事委员会则进行了改组，下辖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等六个部。第五部是管宣传的，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人。部长是陈公博，副部长是董显光和谷正纲（最初董显光没有到过部，谷正纲也不常到）。部内于秘书处外，设有四个组。我只记得第一组管军事宣传，第二组管国际宣传，第三组管对日宣传，第四组管什么我记不清了。各组设有组长和副组长，组长都是兼任的。他们的姓名我现只记得第二组的副组长是季泽晋，第三组的组长是杨宣诚，是参谋本部的处长、高级参谋。四个组外，又有专门委员和设计委员等名目，都是空有其名，真正到部内做事的是很少的。四个组的工作，只有第三组对日宣传的工作比较紧张一些。部址设在南京宁海路，是一所不大的洋房。

第五部于 1937 年 9 月下旬正式成立，陈公博那时经常到部办公，也接待过好几次新闻记者。大概是 10 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找陈公博，要他以特使的名义到意大利去向墨索里尼游说，希望墨索里尼和日本散伙。蒋所以要派陈公博去，是因为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是意大利的外交部长，而齐亚诺以前在上海做过意大利驻上海的总领事，常和

陈公博一起玩，两人关系搞得很好。蒋介石希望陈公博利用齐亚诺的关系去找墨索里尼游说。德、意、日三国同盟是它们的“国策”，要以陈公博和齐亚诺私人的关系影响意大利的“国策”，不但陈公博知道不可能，连蒋介石也一定知道是不可能的。蒋介石明知不可能，而偏要派陈公博去，这就另有文章了。陈公博明知不可能完成使命，便不肯去，蒋介石却坚决要他去。我记得有一天，张群（国防最高会议的秘书长）打电话给陈公博，说如果再不同意去，蒋委员长就要下命令了。这时陈公博便不能不同意了。

陈公博是11月9日（或10日）从南京去香港的（他的家眷早已从南京搬到了香港）。他临走时告诉我，要我给他两万块钱。我当时不知怎么答应他。因为第五部的经费本来有限，照当时的情形看，不但要在部内留两万块钱不可能，就是要留两千块也不容易，更何况我虽是管总务，但是管会计的是叶周达，叶周达是陈家的管家，他们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可以乐得不管。

陈公博走后，起初说是由副部长董显光代理，但后来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董显光到部没有两天，一天上午，他找我和一个美国女人见面，他称她什么小姐，董把她的名字告诉我之后，接着就对我说，她是蒋夫人的秘书，蒋夫人要她和我谈谈部内的情形，要我尽量地和她谈。不要有什么隐瞒。他说过这些话之后，便离开了房间，让我单独和那个美国女人谈。她起初问起第五部一般的情形，后来问到第五部的财产，最后她硬说陈公博的那部小汽车不是陈公博的，是第五部的。经过我详细说明自陈公博家眷去香港以后那部汽车放在公馆里没有用，第五部因日本飞机时常来轰炸，需用汽车的时候特别多，因此便把陈家那部汽车借来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又举出一些事例证明，才算了事。我当时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要查第五部的账，为什么不由军事委员会派人来查，不由蒋介石派人来查，而要由宋美龄派人来查？宋美龄为什么不派一个中国人来查，而派一个美国女人来查？这就证明宋美龄插手插到了什么地步了。

第五部搬到武汉之后，马上改组为国际宣传处，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董显光当上了国民党中宣部的副部长，部长是邵力子。国际宣传处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实则是完全独立的。董显光以副部长的名义领导国际宣传处。处长是曾虚白。董显光与宋美龄的关系密切，董显光掌握了国际宣传处，该处便成了宋美龄的御用机关。

陈公博去欧，先到意大利，后到英国。他从香港来到武汉，是在1938年三四月间，住在法“租界”的德懋饭店。他此时不但丢掉了第五部，连中央民众训练部也丢掉了，仅仅是一个空头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做。他在德懋饭店写过一份给蒋介石的报告，主要内容是说他和墨索里尼见过面，谈过话，墨索里尼对于要求意大利和日本散伙是不同意的，但中国方面如果要向意大利购买军火，意方是可以尽量供应的。

是年7月间，陈公博要我替他带一只箱子先去重庆。他和莫国康于10月间坐小汽车经湖南、贵州去重庆。他到重庆之后，住在上清寺一家饭店里。他隔壁房间住的是曾仲鸣。曾仲鸣搞了些舞女在饭店里玩，外边便误传陈公博玩舞女，引得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大发脾气。陈璧君对于“改组派”俨然以家主婆自居，有谁乱搞男女关系，她便很生气，但她对曾仲鸣却是例外。陈公博也不是不玩舞女，但这次却是张冠李戴了。陈公博在饭店里生了一场病，病好了之后，他便被派到成都去做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主任

委员。他临走时，我问他为什么去做省党部的主任委员，他简单地告诉我："是汪先生要我去的。"这是不是汪精卫决定要去河内，便有意要陈公博先借此离开重庆，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陈公博出任汪伪高官及其下场

陈公博在汪精卫出逃河内之前是否曾参加了降日活动，我不得而知，但有几件事可以在此提出，以供参考：（一）据说汪精卫、周佛海等秘密与日本进行和谈，是从 1937 年冬天开始的，那时陈公博到欧洲去了。陈于 1938 年 3 月底或 4 月初从香港来到武汉的，在这段时间内他是不能参加秘密活动的。（二）1938 年 12 月，汪精卫出走之前，陈公博是在成都，汪走后的第三天，陈公博才从成都经重庆飞往河内，据说此行是蒋介石要他去找汪精卫回来的。（三）从汪精卫离开河内到他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这段时间内，陈公博一直是住在香港。记得 1940 年夏天，我曾有意把陈公博找回来，但不知陈公博那时的态度怎样，托何键代为打听（何那时任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键又去找何应钦。后据何应钦说，他打听结果，陈公博仍住在香港，但要把陈找回来是不可能的。我因此便作罢。（四）汪精卫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撤销伪临时政府及伪维新政府，于 1940 年 3 月 30 日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据说最初由伪中央政治会议选出的伪立法院长是梁鸿志，陈公博此时仍住在香港。陈公博此时的态度是在动摇中，汪精卫除了函电敦促外，并派林柏生为代表，一再劝驾。后来陈公博经不起汪精卫的敦促便下了水。因此汪记汉奸政府又取消了梁鸿志的伪立法院长，而代之以陈公博。以后陈公博就在南京汉奸政府中坐上了第二把交椅，终于成了汪精卫的继承人。

陈公博在伪立法院的人事布置，秘书长是彭羲明，湖南人。莫国康曾在伪立法院担任简任秘书，后来改为立法委员。莫在伪立法院是有特殊势力的，只要提到莫委员，大家没有不知道的。立法委员中有十个是原"改组派"的成员，我记得名字的只有陈秋实、旷运文等。这些人在伪立法院中并不起什么作用，只是每月聚餐一次，联络感情。陈公博对这些人，除了每月发给薪水外，还额外津贴"储备券"500 元。伪立法院每次开会，委员总是不能到齐，后来便规定，如果缺席一次，便罚薪 100 元。大家怕罚薪，便只好一齐出席了。陈公博在伪立法院，只是作了汪精卫的工具。汪精卫的卖国意图，要利用陈公博主管的伪立法院通过立法程序，使之成为一种法案，然后伪行政院便可以施行无阻。汪精卫提出的议案，在伪立法院一般是没有通不过的。但有一次（大概是 1943 年春末）汪精卫为侵华日军向沦陷区农民抢夺粮食（名义上是收购），要以伪粮食部的名义发行"公债"，拟具办法，送请伪立法院审查通过。伪立法院在审议时，就因几次到会人数不够，没有开成会。那几次会，我都没有出席。彭羲明先来找我，要我出席，我没有理他。后来莫国康又到我的住处来找我，说："这个案子是汪先生交下来的。你是陈先生的人，如果你不出席，就显得陈先生和汪先生有意见了。"我说："要我出席，除非陈先生下命令给我。"后来这个议案未经审查便直接提到大会讨论。伪粮食部长顾宝衡特出席大会说明。他倚仗汪精卫的势力，趾高气扬地在会上说了一番，引得大家很不满意，争吵了一场，终于不欢而散。汪精卫后为此事大发脾气，还开除了几

个伪立法委员。

陈公博于伪立法院长之外，后又兼任伪上海市长。伪上海市政府的惟一红人是秘书长赵叔雍。赵以前是中报社的记者，对于上海的情形很熟悉，又是个善于钻营的人。上海市是沦陷区一个最好的肥缺，陈公博当然要利用很多的爪牙来大显身手，赵叔雍自然是个最合条件的人。据说赵对陈公博下过很多功夫，有人说他曾经以自己的女儿来巴结陈公博。后来事情传开了，有人故意同陈公博开玩笑，说“尊岳”如何如何。原来“尊岳”是赵叔雍的名字（叔雍是号），也是一般人家岳父的尊称。这样对陈公博说“尊岳”，意义是双关的，也就是取笑陈公博的意思。

最初上海市内的英法等“租界”，伪上海市政府不能行使职权。日军为了便于对英法“租界”地区实行操纵把持，便以中国收回租界为名，于1943年7月把英“租界”（“公共租界”）收回划为上海市第一区，把法“租界”划为第八区，各设“区公署”，署长由伪市长陈公博兼。两“区公署”各设主任秘书一人，分别由吴颂皋、赵叔雍担任，实则各区的政治、经济实权完全操在日军手里。“区公署”内用了很多的日本人，汪伪官员都要仰承日军的鼻息的。1944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就医，将所有职务全部交陈公博代理。陈公博便将伪上海市长一缺让给周佛海。周因兼职太多，任伪上海市长一职只是徒拥虚名，实际上是由罗君强负责。陈公博将林柏生调任伪安徽省长后，便派赵叔雍继林柏生为伪宣传部部长。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死后，陈公博便继承了汪精卫的“大业”，所有汪精卫的大小官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都由他一古脑儿承当，只于国民政府主席加上“代理”两个字。我对此起初很不理解。有一次我问何焯贤，陈公博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称“主席”，而要加上“代理”两个字。何说：“国民政府的主席，应该是蒋委员长的，所以陈先生现在是替委员长看守国民政府，等蒋委员长来了，陈先生就要交给蒋委员长的，所以陈先生现在只能算是‘代理’。”何焯贤这番话，似乎道出了陈公博当时的心情。后来日本投降，陈公博于1945年8月17日在南京召开最后一次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解散伪国民政府，成立伪临时政务委员会，陈公博自任“委员长”，以周佛海为副。他这样做，似乎还打算等蒋介石回到南京，便办理移交。这就更加说明了陈公博对于蒋介石寄以何等的希望。后来陈公博于8月25日坐日本飞机逃到日本，最终由国民政府从日本押解回国，关进监狱，最后在苏州被枪毙。

（1965年）

大汉奸陈公博的下场

陈 天 佐*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大汉奸陈公博和他的姘妇莫国康以及其他汉奸头子陈君慧、周隆庠、林柏生等，在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战事结束后，留在南京办理日军投降事宜）和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谷正之的庇护下，乘日本军用飞机秘密逃往东京。一个月以后，10月3日，这批汉奸就被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押回南京囚禁。原来，陈公博等人所乘日机在南京起飞之前，谷正之拍了一个密电给东京日本外务省，报告陈公博等一行姓名、人数及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时刻等，并说明如中途气候不佳，拟在青岛暂降，等天好续飞，请密派要员到场照料。这份密电是用无线电拍发的，被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室译出。该技术室是一个专事截收各方无线电密码电报的秘密机构，有完备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设备，有精于破译各种密电码并通晓各国文字的专家，室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毛庆祥，负技术方面责任的是计舜廷。据在这个技术室主管日文密电翻译工作的叶锺骅告诉我，陈公博等潜逃之初，他们无法侦知陈等的下落。自从截收到这份日文密电并译出电文内容之后，才知道了他们潜逃后的藏匿所在。于是即由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令冈村宁次转知东京日本当局立即交出陈公博等一行人犯，并电请东京盟军统帅部协助缉拿。东京日本当局只好把他们的藏匿地点报告了盟军统帅部，遂由该部派兵前往京都地方按址捕获。

1946年3月陈公博由南京被押解到苏州，受审时，他在供词中曾这样说："我之飞往日本，是为了避免纷嚣。离宁之际，曾留有一封信给蒋先生，说明暂往日本。如蒋先生要我回来自首，随时可以回来。另外还有一封信给何敬之（何应钦字敬之），也是表明这层意思。这两封信都是送交冷欣主任（时任国民党陆军司令部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留转的。"后来冷欣担任了国民党京沪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常到苏州，我曾当面问过他："陈公博是否有这两封信请你留转?"冷欣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陈公博的供词完全是设词掩饰的谎话。但审讯陈公博的法官不知此中底蕴，因而对这一点未加驳斥。

日军投降后，我被国民政府交通部派往苏州接收敌伪苏州区各电信局所（当时苏州是汪伪江苏省政府所在地，电信机关主要是日军掌管的）。那时，在苏州的国民党中央各机关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苏州各中央机关员工福利会"，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沈鸿霖任理事长，我是理事兼总干事，因经常联系，彼此搞得很熟。有一次我们闲谈时，沈鸿霖对我说："看样子，陈公博的死刑判决十九会批准，等南京命令一到，就要执

---

* 作者曾被派赴苏州接收敌伪电信局所。

行，看来就在目前了。”接着他又说，像陈公博这样的要犯，死刑是秘密执行的，并问我想不想看。陈公博飞逃日本，再从日本押回南京的内幕真相，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后来他从南京被解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每次开庭审讯，我都到场旁听，所以也很想看看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魁首就刑的场面。于是我们就约定在陈公博执行死刑的前夕，由沈鸿霖以“明天早晨请到狮子口（关押陈公博的监狱所在地）去玩”为暗语，打电话通知我去。

1946年6月2日，我从南京接洽公务回到苏州，傍晚时分，在家里接到沈鸿霖打来电话，按照约定的暗语，叫我次日清早7时前“到狮子口去玩”。6月3日我准时到了狮子口监狱，被引到陈典狱长（名字已忘）的办公室。陈典狱长正在把陈公博的死刑执行状递给一个法警，随手又给法警一瓶容量约半斤的白酒，并吩咐他说：“你把这张执行状拿去送给陈公博签名后取回，这瓶酒是给他喝的。”法警就持状携瓶而去。这时，陈典狱长同我说：“执行状昨天下午就到了，为了免得陈犯多经一夜死的恐惧，并为了防止他万一因畏惧而自杀，所以搁到现在才送；一瓶白酒让他喝了，使他减轻行刑时的痛苦。”不到10分钟，这个法警回来了，把已经陈公博签上了名字的死刑执行状交给陈典狱长，一瓶白酒原封未动地带了回来。这个法警向陈典狱长报告说：“陈公博接下执行状，看时身子发抖，呆了一会，长叹一声，连呼‘完了，完了’，就签了名，并且把这瓶酒还给我，摇摇手说：‘不必，不必。’”

8时许，在监狱内院靠左边廊下过弄处摆上公案，江苏高等检察处首席检察官韩焘率领检察二人升座，命法警传陈公博到案。一会儿，陈公博赤足穿拖鞋，身着短服，跟着法警到案。此时警卫森严，空气紧张，陈公博见此情状，顿时神色仓皇，问检察官：“是否马上要执行了?”检察官点首称“是”。陈公博就畏怯地请求说：“可否容我回监去整齐衣冠，并与陈璧君、褚民谊等告别?”检察官准如所请，命法警押着同去。此时，我就要求陈典狱长让我跟着法警同去观看。陈公博先回到他的监房，换了一双黄色尖头皮鞋，穿上蓝布长衫，一面又抚摸着好久未理的长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昨天能知道，还可以理一次发，现在来不及了。”似乎留着长发就刑，不够体面似的。他随即要求法警押着去女监看陈璧君。到陈璧君监房时，她正斜躺在一张小铁床上，见陈公博突如其来，感到惊讶，就问：”你怎么来看我?”陈公博回答说：“我马上要执行了。”陈璧君听说之后，操着粤语颤声地对陈公博说：“想不到你竟死在蒋介石的手里，叫人死不甘心!”说罢，两人握了握手就分别了。于是法警又押着陈公博转回男监，到了褚民谊的监房。褚民谊正俯着身子往他床边的墙上钉牛皮纸，原来他当天早上刚从另外一间监房迁到这里，嫌墙上石灰剥落。陈公博走上前去说明来意，褚民谊默然无语，垂头丧气地伸出手来与陈公博握了一握，依然俯首钉纸，可能是他已经知道自己不久要跟陈公博同样下场，所以也无话可说了（当时褚民谊也已被判死刑，正在等待南京的批示）。

陈公博随即回到检察官的公案前，检察官照例问他姓名、籍贯、年龄之后，宣布罪状，并宣告执行死刑，问他有无遗言。陈公博说：“我正在给蒋介石写封长信，只写了一半，还没写完。”检察官就问他说：“你是否想写完这封信？可以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继续写，够吗?”陈公博颤着身子沉思有顷，回答说：“不用了，来不及了。”稍停，

又继续说："我写好了一本自白书，详细叙述我参与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经过，这本自白书放在我监房桌子的抽屉里，最好能把它送给蒋先生看一看，或是请院里取去存案。"检察官接着就问他身后事有何人照管，陈答："我家里人最近都不在苏州，只有副官陈某（名字已忘）住在本城十梓街××号，可以通知他来料理。"并问检查官："今天谁给我执行？"检察官指着那押着陈公博的法警说："就是他。"陈公博随即乞求这个法警："请你打得好一点，不要太破相。"三个检察官好像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似的，几乎齐声说："他的枪法很好，已执行过很多人，每次都打得恰到好处，不会太破相，你放心。"陈公博这时知道就要执行了，可是他还强作镇静，伸出手来与各检察官一一握手，连称"再见"，而各检察官也竟然忘了自身应该保持的尊严，争着和这个罪大恶极的大汉奸握手。须臾之间，陈公博由两个法警一左一右地押着走过过弄，到了后园，身子还没站定，正在问法警："站在哪里？"法警已从他背后向他的后脑壳发枪，弹从后脑壳射入，右颊穿出，这个大汉奸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罪恶生命。

此时，陈公博就刑的消息方始外传，不一会，新闻记者和看热闹的群众蜂拥而至，他们所看到的陈公博只是横陈在门板上的一具尸体而已。

（1961 年）

陈公博、褚民谊、陈璧君在苏州监狱

郑 质 夫*

1943 年至 1945 年，我在苏北泰州、扬州先后担任汪伪县政府以下的税务所主任及县税务局副局长。当时有些原国民党司法人员和我是同僚，也有一些住在泰州，靠我们津贴维持生活。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这些原国民党司法人员赶往苏州接收汪伪法院，一跃而以胜利者姿态变成接收大员，组成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我和原汪伪苏北税务总局局长卞斐园前往访友，适被原在泰州的高院检察长韩焘所见，当晚派法警将我逮捕羁押于看守所。韩焘将我拘押，意在勒索，但未能得逞，我则受到往日同事吴寿甫等的招呼而得到优待。

1945 年冬，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陈璧君等亦被送来看守所羁押于优待间。看守所挑选一些在押者迁人"作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在看守所优待间是每人一个房间，只是陈、褚二人的房间多一张两屉长桌。我们终日不"收风"，可以自由往来交谈。我因擅长毛笔小楷，被陈、褚选为抄录答辩书，于是我有机会接近他们二人。1946 年 3 月，陈、褚等三人移押苏州监狱，我与一些在押者亦被选一同前往"作陪"。

当时苏州监狱设礼、义、廉、耻四个在押间和一个女犯间。礼字间关押陈公博等大汉奸；义字间关押的大部分是汪伪期间的乡保长之类；廉字间关押盗窃刑事犯；耻字间关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此间管理最严，生活亦最苦，常听到脚镣声。女犯间最小，紧靠礼字间后壁。陈璧君在女犯间内另住一个房间，有侍女陪同。

礼字间最高级，是一幢十间对排的平房（每排五间），中间有一餐厅式的水泥走廊，上有高耸的玻璃气窗，空敞亮爽。每间监房前后有铁柱玻璃窗，光线亦好。除陈公博、褚民谊每间住三人外，其余一般每间住四人，都是些汪伪的高级官员。在进门处有两间并排厢房，原为看守人员住的，此时拨给陈公博、陈璧君等人作为书房。由于女犯间与礼字间近在咫尺，有一条走廊相通，因此陈璧君日间均来书房看报。礼字间一般不收风，下棋、读书、看报听便。狱中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在汪伪时期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如教诲师蒋锽即与我同期任汪伪税所主任之职，因此他们亦经常前来聊天，对陈、褚等三人亦不例外。

狱中的伙食实在使人望而生畏。每天上午 9 时与下午 4 时，由犯人抬来一大桶饭，泥砂交杂，霉气冲鼻，实在不能下咽。另外每人一瓢菜汤，少油无盐。这样的饭菜，礼字间的犯人均望而却步，因此纷纷设法由家人及亲友或雇人每日送来三餐饭菜，且多美味佳肴。少数困难者，吃吃残羹剩饭也足够充饥了。义字间亦有少数人照此办理，或者

---

* 作者曾在汪伪县级税务局任副局长等职。

贿赂看守人员代购食品充饥。其余大多数人及廉、耻两字间，则无此条件，需要吃狱中泥饭淡汤，因此大多数人患有肠胃病及营养不良症。

一

陈公博无论在看守所或狱中，都是装腔作势，沉默寡言。他与褚民谊隔壁相处，但是互不交谈，视若陌生。他对陈璧君则避而远之。据了解，他们在汪伪政权中即有权利之争，形成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包括褚民谊）三派鼎足而立。从陈璧君谈话中得知，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承伪政权，即排挤汪的嫡系，免去褚民谊的伪外交部长职务，经陈璧君力争，才给褚民谊以伪广东省长之职。陈璧君因失去依附，以伪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常往广州，实际上掌握广东省大权。

约在1945年底或1946年初，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将公诉书送交陈公博。他思考了几天，最后伏案三天完成了答辩书，要我用毛笔小楷抄写十多份，每份有十几页。公诉书的内容，是根据国民党当时新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列举他的九条罪状，引经据典，文字深奥，但又离不开法律术语。陈的答辩书类似演讲稿，长篇阔论，既无格局，又无法律语气，但均是针锋相对。例如，公诉书中有“献媚敌寇，为虎作伥，置沦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等语，而陈的答辩书则说“……比之胜利之后，接收大员强占民房，劫夺民财，饱入私囊，弄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恐怕要好得多吧”等等（以上都是大意，原文或有出入）。当公开审讯之日，他照文宣读，并散发给在场的新闻记者。我在抄写时及开庭后，均曾提出意见，说这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揭露当局弊端，于己不利。他则笑笑说：“我的问题，不是法律条文与罪恶问题，法院也无权处理我，不过形式而已。我的问题，要由蒋先生（指蒋介石）决定。”他又说，蒋介石对他的处置，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国共和谈。如果国共不战不和，谈判时间越长，对他越有利。蒋介石为了争取各党各派，以加强对共产党的谈判力量，则他可能获释。如果谈判破裂，内战必起，蒋介石则必进行军事独裁，排除异己，对他不利。若一旦和谈成功，国共合作，蒋介石为了掩盖其勾结敌伪，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事实，则他绝难幸免。他还用寒暑的升降作比喻，向我解释，说从国共和谈问题上可以揣度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所在。第二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当时国民党有亲日保汪的元老派如戴季陶、居正、何应钦等，力图保存汪系，以抗衡掌握接收大权的CC派，因此他（陈公博）是惟一可以利用之人。CC派已将沦陷区物资大部分抢劫占有，他是惟一知情之人，因而必须杀之以灭人证。所以他的安危则系于两派斗争之胜负。这就是他苦思冥想之处。他的答辩书其所以如此写法，并公开散发，就是一种揭露，以争取舆论，进而争取蒋介石的知情，有利于元老派斗争的论证。这是陈公博当时对我谈的大致内容。

我与汪伪吴县县长陈展如陪同陈公博住礼字间一号。当时看守人员对我们有所交待，即注意陈之行动，防止他自杀。当时，每天来找陈的人很多，据说都是国民党要人派来的代表，但陈则讳莫如深，不予透露。有一天晚上陈对我说，形势有变化，恐怕难免于死。他说，国共和谈不顺利，蒋介石要发动战争，不顾元老派的规劝，首先要消灭汪系，以解除后顾之忧。陈公博为了争取蒋的宽宥，决定直接写信给蒋，要我用毛笔正

楷抄送。他考虑了两天，才着手起草。由于他是个大汉奸，当过汪伪政府的“代主席”，在押的中小汉奸和狱中官吏，均以取得他的一纸墨迹为“荣”，于是争相请他写对联、立轴、扇面，礼字间犯人当然近水楼台。他屈于当时环境，只好应付，因此终日忙于挥笔，而他想写给蒋之信，竟未写成即伏法。我还记得他信的开头两句是：“蒋先生：我对汪先生事已了了，但对您的事还没有尽瘁……”

1946年4月，陈公博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初的一天上午，监狱看守长拿来两张宣纸，要陈立即写一幅对联，我将墨研好，他执笔就写，上联是“沧海以能容乃大”，下联是“明月不常圆为心”。当他写到最后“为心”两字时，看守来通知去见人。这时砚中墨已干了，我赶紧添水加研未浓之时，他匆匆忙忙蘸着淡墨写完最后两个字，并加下款“陈公博”三字，就搁笔随同看守前往。他一出铁门，见有一批武装法警在等着，他意识到是临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是执行”，就转身迅速返回礼字间一号。他对我和陈展如说：“现已执行，我们永别了。”他打开皮箱，取出尖头皮鞋、丝袜、毛料西装裤、绸长大褂等，在我们协助下换穿整齐，然后和大家握手，径直走出。后据目睹的看守人员说，陈公博走到刑场后，被法警用手枪击毙。

二

褚民谊曾与汪精卫、陈璧君等同时留学法国。其妻是陈璧君堂妹（有说是陈璧君的丫头），比褚小22岁，因此汪、褚是姻亲，关系密切。抗战前，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褚当行政院秘书长，正事不做，尝为“美人鱼”赶马车于南京街道上，引起很多笑话。汪精卫叛国投敌，他又当上了汪伪外交部长，后任伪广东省长。

褚在狱中，年已64岁，满脸寸余长的络腮胡须，既不谈政治，也不看报纸，昏昏聩聩，很少有人到狱中来看他。他的妻子和儿女可以直接到他房间里来。他在看守所时，也经过一次开庭审讯，答辩书也是我抄的。他的答辩书又长又臭，文不对题，乱说一通。陈公博死后，褚民谊在礼字间就显得突出起来。我被调入他的房间，与汪伪一检察长钱某陪伴他。这时，狱中除一部分人在书房陪伴陈璧君读书、看报、吟诗作赋外，大都围绕褚之左右，闲谈聊天，练拳习武。

褚善于拳术，身体健壮。他在狱中每天早晚两次吹哨集合礼字间的人在中间大饭厅做太极操（他自编的太极操，抗战前在南京盛行一时）。随后他又个别教授太极拳、推手等。我是第一个学会的，被称为大师兄。狱中的两任教诲师，亦请他教授太极拳。有时外面的太极拳手亦进内与褚互相比较，交流经验。他夜晚入睡前，还端坐在床上，闭目练功。他擅长柳体字，因此也经常为人写对联、折扇，但他的行书写得很差。他对昆曲亦有研究。抗战前当行政院秘书长时，曾在南京大戏院登台演出过。他在狱中无聊时，即唱唱昆曲消遣。

1946年8月23日的早晨，褚民谊正在带一些人练太极操之际，陈璧君匆忙来到书房，秘密告诉我们少数人，说最高法院已将褚民谊判为死刑，她准备代为上诉要求复判，并写信给蒋介石。正在计划起草之时，武装法警已进入礼字间，直接对正在教太极操的褚民谊说：“恭喜你，今天请你上天。”法警突然来到，褚与大家楞了一下，褚

“哦”了一声，自进房间揩汗。法警命令各回房间，分别上锁，独二号房例外。陈璧君关在书房中大喊：“请暂缓执行，我为他申请复判。”法警说：“申请归申请，执行归执行。”陈又大叫：“蒋先生太不讲信用。”褚听陈璧君要求暂缓执行无效，乃用水揩洗全身，换上全身中装、丝袜、皮鞋，外加长大褂，然后独自走出，分别到各房间在洞口处和各犯人握手，便随法警而去。后据看守说：褚出了铁门，一法警和他并排边走边谈话，到达刑场时，后跟法警趁褚不介意之际，用手枪从后面射击一枪，子弹由背穿前心而出，褚一个转身仰面倒地。

三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不但是整个礼字间的泼妇，而且在整个监狱中也首屈一指，当时除了陈公博外，她的“名望”最大。而且她泼辣敢言，国民党权贵仍不断与她来往，狱吏怕她说坏话，也曲意奉承。

陈公博、褚民谊先后被处死后（这时陈璧君已被判无期徒刑），礼字间一部分人贿赂法院得以释放，个别年老者由于绝望，则诵经念佛，祈求“超脱”；一部分人则下棋消遣。其余之人由陈璧君纠集于书房中，提供一些诗词、古文和字帖、纸张，指定汪伪立法委员龙沐勋（抗战前曾在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进行辅导。陈璧君把汪精卫的诗诵不绝口，她自己有时也作诗填词。她还订了各种报纸，每天上午先通览一遍，然后选定专题，命我朗读，她再发表议论。她对国共战争消息很敏感，十分注意。到了下午，她有时向大家讲国民党人物野史，很多荒诞不经。

陈璧君在狱中仍是过着奢侈的生活。她身边有一个侍者，可自由出入监狱，送一日三餐和信件报纸。另有一个女看守，名义上是看守陈璧君，实际上则听陈璧君使唤，做交通员，出入不受检查。我们对外通信，带进金钱与物品，亦通过她办理，均不经过监狱。陈璧君除一日三餐外，还有人参汤、高级点心、水果等。有的是其子女送来，有的则是女看守买进。及至褚民谊枪毙后，她情绪暴躁，无事生非，动辄骂人。她子女为了安定其情绪，送来进口货杜冷丁，由她自己在臂上注射。开始每天一针，针后精神旺盛，谈笑自如，日久成瘾。因该货价格昂贵，偶有短缺，则日夜不宁，哭闹不休。有时她取出黄金，由女看守到市场药店寻购，以解瘾癖。由于她情绪日恶，加之杜冷丁成瘾，行动亦见怠惰，虽礼字间书房与女犯间近在咫尺，她也不愿自己行走，每天上下午往返，由青壮年男犯人二名用籐椅手抬接送。凡此种种丑态，监狱亦听之任之。

陈璧君虽身在狱中，与国民党权贵仍接触频繁。她并不外出见人，经常有人直接进入书房密谈，我们均须回避。其子女以及十个干女儿经常出入书房，任意逗留，不限时间，有时即使不叫我们回避，但她们都用广东土语交谈，我们亦无法听懂。有一次，她对我说：“司法院长居正刚才派人来过，我想请你用毛笔正楷抄录一部《资治通鉴》送他，纸笔伙食由我供应。”我当即应允，但后来未及完成我已获释。还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在广州有一幢房子，地板下埋藏有几只箱子，日本投降时，未及撤走，她已被捕。该房后由宋子文占住，宋去南京，房子并未让出，派专人守着，接收大员未敢进人查抄，她女儿曾去见宋子文，要求取出箱子。宋告，当前还不能由你进屋，恐为人所

知，招致麻烦，但嘱放心，已交待看守人员，绝对保持原状，不准移动分毫，俟有机会，再行通知你们进去取物。听说陈璧君和褚民谊在广东搜刮的金银财物，均藏于此地下箱内。由此可见，国民党权贵人物与陈璧君是互相通气的。

四

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些人员，在抗战期间群集于苏北扬州、泰州二地，或投汪伪任职，或寄生汪伪谋求津贴。日本投降后，这些人一变而以胜利者自居，执掌司法大权，结伙成帮，有组织地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日间披着法衣，威风凛凛，对犯人凶狠恐吓，夜晚则诱骗勒索。因此，犯人的判刑或释放，以及判刑之轻重，均以黄金多寡与有无为标准。他们出面联系的人，主要有在汪伪组织任过职的现任书记官吴寿甫、毛寄祯、洪惜如等。这是因为这几人情况了解，人事熟悉。每至夜晚，他们分别邀约各在押人之家属至家中谈判，或遣送到某法官家进行谈判。不数月间，他们都成了富翁，买房置产，家中富丽堂皇，陈设新颖，鸦片灯彻夜不熄，手指金戒透明，真是腐化已极。

高院检察长韩焘，苏北泰州人，敌伪时期住在泰州，我常给予接济。日本投降后，韩焘赶往苏州，摇身一变成了接收人员。韩就任伊始，我到苏州，被其发现，当晚韩即手令法警将我逮捕拘押于看守所内，然后通过与我在汪伪泰州税务所共同任职的现任书记官吴寿甫，将我妻子叫到苏州，住吴家中。吴用哄吓诈骗的手段，索要黄金 10 大条（100 两）送给韩焘，他的酬劳在外，一经办到，立即释放。我妻子实无力筹措，拖延了半年之久，虽经一再威吓，他们的目的仍未达到。韩焘一怒之下，即将我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起诉，交由法官凌服尧（苏北盐城人，鸦片瘾很大，敲诈勒索最凶狠）多次开庭审讯，每次开庭，凌迭以判处死刑相威胁。在这同时，他们通过吴寿甫向我索要金条，由 10 大条减至 8 大条，最后降为 5 大条，我仍无法支付，结果判我无期徒刑。后经最高法院改判为 10 年。

汪伪时期的苏北泰州前后两任商会会长朱受五、吴啸伯（均系工商地主）亦以汉奸罪被捕关押在苏州看守所，与我同住一室。他俩大量贿赂，因而两个月后即获释回家。而另一个汪伪南通商会会长陈士表，拒不行贿，结果被判了 5 年徒刑，与我同押监狱礼字间，后来他再通过贿赂而保释出狱。又汪伪吴县县长陈展如和泰州县长朱汉，亦分别经过贿赂，各只判刑 5 年，服刑一半即行获释。

据陈璧君说，大汉奸周佛海关押在南京监狱，经过与最高法院谈判，讨价还价，最后以 300 根（或 500 根，我记忆不清）大条（每条 10 两）贿赂达成协议，由判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宣判后，周曾派人密告于陈，后来周病死狱中。

苏州监狱门前有一个油条店，专为犯人作保。监狱有规定，服刑一年，即可进行保释，而无论何地何人，认识与否，该店均愿为之作担保，惟一条件，即必须送礼送钱。1948 年 9 月，人民解放军进抵长江北岸，国民党准备逃走，除陈璧君及汪伪省长等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外，，一律交保释放。我们大批获释之人，均是该油条店分别盖章作保的，当然都分别送礼送钱。后据了解，监狱与该油条店有密切经济关系，利益均沾。

（1978 年）

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

周 之 友*

1938年底，我的父亲周佛海脱离重庆国民党政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大汉奸。那时我16岁。周佛海当了汉奸后，虽然有四年时间我在日本读书，即使在国内，有时也不在家里，但毕竟有些时候，特别是最后两年，是在他身边度过的。因此，他的某些汉奸活动我是耳闻目睹的，对他的一些思想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我把所知道的周佛海的汉奸活动，包括实际活动、思想活动和他的一些打算，回忆和记录下来，提供给专门研究“汪伪史”的同志和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志作参考。由于仅仅是回忆，看过的有关材料又很少，一定有很多错误，希望熟悉这方面的同志给以指正。

一、投敌与粉墨登场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周佛海就让我的母亲杨淑慧把我和我的妹妹送到湖南逃难去了，他自己留在南京。当时我家住在南京西流湾8号。我在长沙时，听到一些朋友的父兄谈起周佛海，说他在南京西流湾，和一批人在家谈论一种与当时抗战不同的论调。我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因为年纪小，在我的地位也不敢提出这种事。一直到1938年春节前，周佛海到了武汉，也把我们从长沙接到武汉，那时我便鼓起勇气，向周佛海提起他在南京时的一些情况。

周佛海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时候也愿意和我们小孩子谈谈。虽然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很不高兴，说这些事小孩子不必管，但他也向我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在西流湾8号，你们已到长沙了，胡适、陶希圣及梅思平就住在我们家里，大家一起发表了一些不太支持抗战的言论。”那时我还不知道“低调俱乐部”这个名词，“低调俱乐部”是以后我在他发表的文章中知道的。据周佛海讲，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仗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和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们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的，但是，这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们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抗战有利，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

---

* 作者系周佛海之子。

周佛海后来逃离重庆，是老早就有了准备的，因为他早把我和我母亲、妹妹从汉口送到香港，当时正值1938年春节。我们是从武昌的南湖机场坐飞机到香港的。去前我也问过他：现在是抗战，到香港作什么？他说，你在汉口读不了书，到重庆去也读不了，这两个地方都不安全，飞机轰炸要躲飞机，跑警报，还是到香港去，那里最安全，好好读几年书再说吧。

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人组织了一个“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名为“艺文研究”，实则是一个鼓吹降日反共卖国的宣传机构，是汪精卫卖国集团的大本营，由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国际编译社”，但其公开的名称是“尉兰书店”。我们和重庆周佛海的联系，特别是包裹的邮寄，都是经由这个机构进行的，当然，那时尚不知其性质。

1938年秋冬之交，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汪精卫在重庆搞所谓“和平运动”，其中也有周佛海。当时我思想也不通，现在正抗战，搞什么“和平运动”呢？不久，周佛海果然到了香港，那时候他住在九龙约道里5号。我母亲告诉我后，我去看他。陶希圣、梅思平也住在那里。他们躲在那里，平常根本不到什么地方去。我见到周佛海，就问他：报上登了许多你们搞“和平运动”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首先还是把过去那些汉奸理论给我讲了一通，最后还述说了这样一种论调，他说：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个论调就是所谓的“曲线救国论”。他还神秘地告诉我，为“中日和平”作的秘密接触，首先就是蒋介石命令高宗武到香港收集情报开始的。当时我对这一点是半信半疑。

以后，在香港经常的接触中，他也谈到汪精卫和日本人勾结的情况。他说高宗武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最初和日本人勾结就是高宗武到日本东京去，金城银行的董道宁和梅思平都参加了。日本方面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参谋本部第八课（即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另一个系统就是首相近卫文麿。他还谈到1939年3月军统在河内暗杀汪精卫的事情。他说，军统本来是要暗杀汪精卫的，但搞错了，把曾仲鸣给干掉了。在此之前，1939年1月17日，军统在香港用斧头朝林柏生头上砍了一斧头。他并说在曾被暗杀前，汪还很犹豫，并没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的死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因此，曾仲鸣被暗杀后，汪很快离开河内到上海去了。汪是由影佐和犬养到河内去接的，先坐一条小船，然后再换上日本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北光丸”到上海。

1939年4月，周佛海由香港到了上海。他离开香港前已向我母亲透露他要和汪精卫一起到日本去。果然，他于5月底便和汪精卫一起去了日本。我记得有一张照片，相片上有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翻译杨小姐、董道宁、周隆庠及日本人犬养健，是由与周佛海关系密切的日本人伊藤芳男在汪住的岩崎别墅的假山上照的。

他们那次去东京，主要是讨论“日汪关系”和到底成立不成立汪精卫伪政府，及如何成立伪政府的问题。从汪精卫来讲，当然是越早成立越好，因为自己就是想抓权的，可是日本人不是那么急于成立，日本人还是希望通过汪精卫把重庆方面拉过来，以便使“中日事变”早日结束。但是，在汪精卫和日本陆相板垣第一次会谈中，争执得

最厉害的，并不是成立伪政府本身，而是与此关联的“国旗”问题。汪、周主张继续用三民主义口号，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方则认为这样不好区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主张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汪、周则坚决反对。最后暂时取得折衷，在青天白日满地红上加上一条黄色三角形的写有“和平反共救国”的小旗。但是周仍对此不满，他认为这样的旗帜是不能号召群众的。我记得很清楚，当他和我谈到这件事情时，我就说过从小只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而不知道还有什么黄色三角形小旗。他表示在今后和日本人谈判中一定要把这小旗拿下来。周还告诉我，汪和近卫两人的秘密会谈连翻译都不用，是笔谈的。

周佛海从东京回到上海后，就让我母亲的弟弟杨惺华到香港，要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到上海去。杨告诉我，周佛海准备送我到日本去读书。周佛海当时住在虹口公园后面一条弄堂里，是有日本宪兵保护的，平时他也是深居简出。我到上海后，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影佐祯昭、犬养健、伊藤芳男等人。当时周佛海让我去日本读书，他说我现在搞“和平运动”了，你在香港读书人家会看不起你的，到日本读书好，日本教育是很发达的。我是1939年9月去日本的。其间我去过香港，办理转学手续，后来回到上海。那时周佛海已不住虹口，搬到愚园路1136弄59号，汪精卫住在31号。当时我发现周佛海的活动和在虹口大不相同，来看他的人很多。当时正是他们刚刚召开了汪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紧锣密鼓，搭配班底，筹组伪政府的时候。

那时，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成立政府的主要人物是影佐，其机关是梅机关。影佐过去一直是在伪满洲国做特务工作的，是土肥原手下的一个得力人物，和周佛海关系非常好。周佛海会讲日本话，和别的汉奸比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所以，有关与日本的交涉事宜，都是由周佛海进行的。

周佛海由香港到上海，以及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主要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拉拢人，组织班底。他要把国民党方面的人拉进来。他过去是国民党，也是中统，认识的人很多，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拉人下水当汉奸的主要办法是用钱收买。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杨惺华去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去拉活动经费，这些钱是来自所谓“关余”。当时，用大箱子一拉就是好几箱，两部汽车同时去拉。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担任伪财政部长，掌握了汪伪政府的财政大权，这种拉人工作进行得更多了。汪精卫降日卖国的“和平运动”不仅有日本人的扶持，同时也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1939年春，周佛海等人到香港后，钱新之、唐寿民就给了一笔20万元港币的“捐款”。这笔钱除了一小部分用作活动费用外，其余部分作为他们的“安家费”，由陈璧君、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平分了。

第二件事是搞特务组织。在周佛海到上海前，丁默邨、李士群已由影佐支持干起了特工。周到上海后，就和丁默默、李士群他们搞在一起。汪记国民党六大以后，成立了特务委员会，丁、李的特务组织改组为“特务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周佛海，副主任委员是丁默默、李士群，但具体工作是丁默默、李士群负责。周与丁、李拉上关系，这是周汉奸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他通过操纵特务机构而掌握了汪伪组织相当重要的权力。

第三件事是搞钱。当时除了从日本人那里拿来一些活动经费外，“特工总部”还专

门从事为非作歹的事情，比如开赌场，搞绑票。特工总部设在沪西地区的极司菲尔路76号，人们提及“76号”，便有谈虎色变之感。

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南京还有所谓“维新政府”，头子是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等；北平还有所谓“临时政府”，头子是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等。如何统一“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把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统一到汪精卫系统里来，是摆在汪、周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此就有所谓“青岛会谈”。参加“青岛会谈”的主要三方即汪精卫、周佛海、梁鸿志、陈群、王克敏、王揖唐这些人。影佐也去了，他是支持汪、周的。在影佐等日本人的压力下，梁、陈不得不把他们的招牌拿下来，参加到汪的系统。汪伪政府成立后，王克敏等人表面上也承认汪的领导，但事实上仍搞自己的，比如继续悬挂“五色旗”，军队不叫“和平军”，而叫“治安军”，货币还是“联银券”。这是因为日本人实行“分而治之”所造成的。

1940年1月初，正当汪精卫、周佛海准备“青岛会谈”，筹建伪府的时候，发生了高宗武、陶希圣脱离“和平运动”出走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日汪密约”的事件。这事对积极投敌的汪、周等人来说当然是一个严重打击。那时我在东京，同年暑假我回上海时，听到周佛海谈到此事，仍然余恨未消。在此以前，我在东京已经听到负责接待我们的日本人冈部长二谈过此事。高、陶之所以出走，是由于在筹建伪政府时，高宗武内定的伪外交部长被褚民谊抢走，这使他们非常恼火，同时，他们对周佛海独揽“和平运动”大权也表示不满。当然，高、陶之出走主要是感到汪、周搞的“和平运动”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汪只能在沦陷区筹建“政府”，而不能得到西南军阀支持，没有任何力量，起不了什么作用。陶在香港发表的文章中，还把我到日本读书，说成是作为人质。

周佛海和冈部长二对我谈及此事时，都谈到高、陶出走是经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周密策划的。高的老婆（姓名已忘）抗战前是南京金陵女大毕业生，英文说得很好，认识宋美龄，戴就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和高夫妇建立了秘密联系，答应给他们以巨额美金，送他们去美国。以后高夫妇果然定居美国，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青岛会谈”以后马上就产生了伪政府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问题。那时，日本和重庆方面还另有勾结，这主要是今井武夫在香港和重庆方面的谈判。汪精卫原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部分军队，如张发奎所部，张以前是粤军，是“改组派”的。但后来他们并未响应，汪向日本人开的支票未能兑现，因此一部分日本人对成立汪伪政府有无必要抱怀疑态度。周佛海当时也知道日本人另搞了一套，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阻止，只好等着瞧。虽然如此，汪、周这批人还是坚决主张成立“政府”，不然的话就没有“号召力”。日本统帅部觉得汪精卫已出来了，不成立“政府”也不行，因此，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就在南京搞所谓“还都”，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在安排伪政府人事方面，周佛海起了主要作用，这一点伊藤芳男曾多次和我说过。伊藤说，你父亲在南京“政府”中事实上集大权于一人，他不但管财政金融、警察，也管人事和外交。当然筹建伪府本身就是一场争夺权利的斗争。周面临着几个问题，一是伪府主席是由汪代理还是由汪正式担任。周和日本人都主张代理，好留下与重庆和解的余地，结果照此办理。二是伪维新政府中的几个老头子如梁鸿志、温宗尧等如何安

排，后来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院长和副院长，两个实力派任援道、陈群则担任了伪海军部长及伪内政部长。三是“76号”的丁默默、李士群都想当警政部长，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周采取了自己兼任部长，而让李士群任次长的办法暂时解决。李原先也是属于周佛海一派，不久他投靠了陈璧君的“公馆派”①，由此，周、李矛盾日趋深化。由于李投靠了陈璧君，结果，周不得不把警政部长让给李士群。周的亲信罗君强因为锋芒太露，常常“老太婆”长，“老太婆”短，而得罪了陈璧君。伪府的班子虽然搭了起来，但却埋伏了周与其他汉奸矛盾加深的根子。

二、狗咬狗的争夺

汪伪政府一成立，周和其他大汉奸的矛盾就逐渐展开了。首先是和“公馆派”的矛盾。本来伪府的人事是在汪精卫领导下，由周具体安排的，诸如主席代理，丁、李警卫部之争，褚民谊掌海军部或外交部，罗君强之掌边疆委员会，以及“维新政府”人员安插等问题都取得暂时解决。但是很快，由于周握有实权，相互间的利害争夺就加剧了。首先是周和陈璧君的矛盾。陈把广东视为私产，这就和周的伪财政部在税收上，“中央”对广东的特费补贴上产生多少之争。此外，陈还过问伪政府各部事务，这也引起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的不满。我曾听见周佛海与陈公博在鸦片烟铺上谈论此事，周抱怨陈璧君是“南京宋美龄”，陈公博则劝周要忍耐。“公馆派”还通过林柏生的伪宣传部，掌握了伪政府的整个宣传机构。周想要他的亲信金雄白担任伪中央电讯社社长，遭林拒绝；林想将伪《中华日报》和周、罗控制的《中报》统一，以并吞《中报》，也被周、罗拒绝。到了1941年，林柏生的亲信胡兰成作了李士群的《国民新闻》副总编，公开写社论指责周佛海的财经政策和私生活。我曾听见周佛海和替周办《平报》的金雄白讨论如何对付此事，结果他们决定用所谓正面宣传伪府财经政策，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成功的方法，来回答这些指责。

汪精卫还搞了两项周佛海未能插手的活动。一项是“新国民运动”；另一项是“清乡运动”。对于“新国民运动”，因为这项活动没有什么具体的利害关系，因此周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可是在“清乡运动”上就不同了。周虽然在名义上是汪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但一点实权也没有，实权完全掌握在秘书长李士群的手中。李通过“清乡”事务，又完全投靠了“公馆派”，这也加深了周与“公馆派”之间的矛盾。周佛海为了削弱“公馆派”的力量，打击李士群，到了1943年夏，在今井武夫、冈田酉次等日本人的支持下，通过汪精卫取消了“清乡委员会”。不仅如此，在同年9月，周佛海还进一步勾结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将李士群毒死。

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

---

① 汪伪政府成立前后，陈璧君未担任公开的要职，却在幕后操纵政治势力。她将经常出入汪精卫家门的大汉奸、政客网罗门下，为汪精卫卖国投敌效力，并发展成为一大政治势力，被称之为“公馆派”。其主要人物有陈璧君、褚民谊、陈耀祖、陈春圃、林柏生、李士群等。

李士群和他的老婆叶吉卿年青时都参加过共产党，李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后来叛变了，投靠了中统。抗战前周佛海就认识他，不过那时李的地位很低，周与李没有什么来往。抗战开始后，早在汪、周作汉奸以前，李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影佐祯昭的领导下和丁默默一起组织了特务机关。汪、周到上海后，在影佐的撮合下就成立了伪特工总部，即杀人魔窟“76号”，周任主任，丁默默、李士群任副主任。在初期周、李关系还是很好的，至少在我看到和听到的一些表面现象是如此，李的女儿认杨淑慧为干妈，过年过节送来很多珍贵礼物。当时，李是以部下的态度在周的面前出现的，毕恭毕敬。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每次他到周家看周时，我都看见他一定要把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周家警卫后，自己才上楼。当我问周这是什么缘故时，周告诉我，这是为了表明他别无异心。此外，“76号”也成了周佛海的宴会、观剧、游乐场所。1940年，周佛海给我祖母过生日，就在“76号”连唱了三天堂会。表面良好的关系虽然维持了一个时期，甚至到了1942年也是如此，但是争权夺利的斗争很快就开始。首先是丁默默和李的斗争，丁和周同是湖南人，因此一开始丁是第二把手。但李的势力日益强大，不把丁放在眼里。1940年暑假，我短期回国期间，就曾多次看见丁在周面前抱怨李对他倾轧。

李士群和罗君强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罗是周的亲信，1928年后一直追随周佛海，在汪伪政权里，他是周的一员得力干将。1940年7月，周佛海在上海筹办汪伪税警学校和成立伪税警团，开始李士群也是参加了的，但周为了把持一切，便通过罗君强把李士群及其一派势力排挤出去。1941年，日军要在江南占领区进行“清乡”，让汪伪政权成立“清乡委员会”，罗君强为了争夺秘书长一职，和李士群的矛盾又更加尖锐了。在税警方面，由于周的支持，罗取得了胜利，但在“清乡”方面完全是李的天下。这样李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周的冲突就更紧张了。1941年，李的《国民新闻》更公开攻击周的财经政策。

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看，即使在上述情况下，双方在表面上仍维持良好关系。比如，1941年暑假，我从日本回国，因不愿再去日本，离家出走，到了杭州，周令李电杭州特务头子石林森，把我拦阻。我被迫回日后，周、李又要万里浪对协助我出走的好友进行查询。1942年夏，李还买了飞机票，请我到青岛避暑。可是到了1943年以后，李虽还来周家，维持表面关系，但双方间已充满火药味。比如，罗君强住在税校，不住在家里，出来时后面还有保卫车。他之所以如此，就是怕李士群干掉他。当时，他们互相扬言要对杀。还有李士群与熊剑东的关系。熊原是军统，抗战初期在上海周围打游击，后来被日军俘虏了，投降了日军，日军把他调到汉口，由武汉日本特务机关长落合主持，组织“黄卫军”。后来“黄卫军”改编，调熊到南京，把熊介绍给周，周为了扩大势力，用他为伪税警团副总团长，成为周的两员大将之一，熊与李的关系也不好，但是李士群也想通过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拉拢熊打击周。周就利用这一点干掉李士群。他们设计由冈村出面在百老汇大厦约请李、熊会面，并共进晚餐。事前周佛海给了很多钱，买通了日本的一个下女，让下女下一种毒药。这种毒药是用河豚仔晒干，磨成粉，它有一个特点，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因为死掉了凶手一定会被发现。这样把李士群请到百老汇大厦。事先冈村告诉下女谁坐在什么地方，并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下女看，要她把有毒药的菜送到李士群面前。李士群一向很警惕，到任何地方，既不喝茶，

也不吃饭，说完就走。但那天应日本人之邀，他不能不吃就走，那样有碍于日本人的面子，因此勉强吃了一点冷菜。回去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呕吐出来，但已来不及了，不几天，李士群就在苏州死去[①]。李士群死亡后，周佛海很高兴，但他还借此散布谣言说：李的老婆叶吉卿和医生褚麟荪乱搞男女关系，而把李干掉。他用这种谣言把事情弄得真伪不分。事实上，钱是周拿出的，具体办法是他们商量决定的，主持的人是冈村。冈村和周的关系很深，以后调回日本任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

李士群的死还有一段应提出来。1943 年以后，周不得不和戴笠勾结。周佛海很孝顺他的母亲，他叛逃到上海后，就派人想把她接出来，但老太太不肯，因她和我母亲关系不好。她说：我又不作汉奸，怕什么。戴笠知道周的母亲在沅陵，丈人在湘潭，就把他们关起来了。由于这个原因，周不得不和戴笠联系。和戴笠联系上以后，戴就提出条件，说和戴取得正式联系以前，要有立功的表现，就是要把李士群干掉。戴笠为什么要杀掉李士群呢，这是因为“76 号”先后破坏和逮捕了军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组织和人员。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杀掉李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李的势力日益增大，日本军阀恐怕尾大不掉，因而决定杀李；第二，新任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三课课长辻政信，为了维护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正在大力整顿伪府官吏的贪污现象，而李士群的许多活动，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利益，因此，也同意将李干掉。

周和“公馆派”矛盾之深，还表现在他和我谈论曾仲鸣之死时说过的一句话：“幸亏曾仲鸣死了，否则‘公馆派’又多了一个人。”

周佛海和陈公博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谈一谈。陈公博本是“改组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国民党内地位比周佛海高，抗战前就做过实业部长，他虽然一开始就参加“和平运动”，但一直到 1940 年才从香港到上海，汪伪政府成立时，陈做了伪立法院长，1940 年夏天傅筱庵被军统暗杀以后，才做了伪上海市长，掌握了一些实权。他是汪伪政府中的第二把手，但是弱点是在他下面除了他的情妇莫国康以外，没有得力干将。他虽是“改组派”，但由于和陈璧君关系不好，再加上和周的关系又不错，因此在周和“公馆派”之间，他采取中立态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陈公博和周佛海之间的关系还是好的。他们经常轮流在各自的家里，躺在鸦片烟床上谈论至深夜，用周佛海的话说，这叫做“寓意见交换在谈笑之间”。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对日本人看法一致，都认为日本人派系繁多，政见不一，特别是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以及陆、海军之间，矛盾重重，致使汪伪政权汉奸们不知听谁的才好。如在接受法租界法院问题上，陆军主急，海军和外务省主缓。在对重庆工作上，日本人当时感兴趣“桐工作”和“钱新之——周作民工作”，他们的看法也一致，都认为工作是要做的，但是成功可能性不大，都认为日本人过于乐观，重庆则是要破坏伪府的成立。而且他们还认为日本上层是讲道理的，只是下级干部不好对付。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打死后，关于继承人的问题，周支持陈公博出任，汪精卫主张褚民谊担任，由于周的力主，汪精卫也只好同意。陈出任伪市长后，周佛海还帮助他选定伪市府人员。被任命为副秘书长的胡泽吾，即是周的亲信罗君

① 关于李士群被谁毒死之具体情况，说法不一，此为一说。

强的妹夫，伪财政局长袁厚之是周妻杨淑慧的小同乡的远亲，可见周陈关系之融洽。但是到1944年汪精卫病死，陈公博出任伪代理主席后，周陈关系就逐步恶化，以致在抗战胜利时，双方在南京演出一幕火并，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伪维新派中有两个实力人物，即陈群和任援道，周与他们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特别是陈与周的关系，在历史上，周于1927年被捕时就是由陈群审理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有"狼虎成群"一句话，就是指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杨虎和高等法院的陈群。据周和我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陈群恨不得杀他，但因杨淑慧的营救而没有成功。对此，周是有点旧嫌未消的。因此，伪府成立后，周就说此人颇有拉拢必要，否则障碍必大。周的确和陈经常来往，谈论伪府事务，并说，看来此人是愿意合作的，不像会捣蛋。但他听到一些有关陈群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反映后，又当面含蓄地劝告他：还是团结好。陈是福建人，和日本海军有关系，会讲日本话，在上海搞了个"维新学院"，把其中"学习"好的人派到日本留学，为自己培养干部。1940年陈群到东京，请我吃过一次饭，把他所谓的学生叫来一些，高谈阔论一阵。他还收藏图书，在南京搞了一个图书馆。他除了做过伪内政部长外，还做过伪江苏省省长，这都是有好处的差事。陈在汪、周之间以及以后周、陈（公博）之间从未过于偏向任何一方。他一听见抗战胜利的消息就服毒自杀了。任援道是伪维新派中另一个实力人物，他在苏州一带有好几师军队，当过伪海军部长和伪江苏省省长，1942年，戴笠派了他的堂弟任西泙，从重庆到上海和他联系，抗战胜利后他的部队被国民党收编，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三、主子和奴才

周佛海和他的主子日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如任何走狗和其主子之间那样，既有投靠和效劳的主要一面，又有担心动摇的次要一面。当主子得势时他是一种态度；当主子失败时，他又忙着公开或秘密找新的主人了。

周佛海曾多次和我谈过他对日本人的一些看法。首先他认为日本人经常调动，这使事情很难办。对某一问题双方刚取得一致意见，人换了，又得从头做起。好不容易互相有了了解，性情脾气摸熟了，人换了，又得从头再来。其次，日本各机构之间意见不统一，特别是陆、海军之间，军人和外务省之间，上下之间，都各有各的主张。他特别不满日本下层人员的处事态度，这些都反映了走狗的为难之处。即使对支持他的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周也说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这反映了奴才对主子的矛盾心理状态。周佛海在汪伪集团中之所以握有实际权力，是因为他得到一些日本军阀的支持。支持周佛海的首先是影佐祯昭，他是汪伪政府主要策划人，以后又作了最高军事顾问。每逢我从东京回家度假时，经常看见他到我家吃午饭，并且经常找周进行密谈。周佛海亲口和我说过，影佐够朋友，除了太平洋战争事先没有告诉我以外，其他日本国内外决策，事先都和我通了气。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前，影佐事先曾向周透露日苏关系将有重要改善。近卫将要进行第三次组阁时，影佐事先也曾告诉周，周为此感到欣慰，因为，这对他有利。主子的赏赐与信任，使周佛海感激涕零。1942年6月，影佐调离南京，先是到伪满，后来又调到南洋。我清楚地记得周佛海与罗君强谈论此事时，两人

都是垂头丧气、忧心忡忡的样子。1943 年春，我母亲访日时，正是影佐长女出嫁前，她带了我们兄妹去拜访影佐及其女儿，送了颇为贵重的礼物，即用作和服上的装饰品的翡翠马鞍。1943 年夏，周访问伪满时，还专门和影佐秘密会见。

当然，影佐虽走，支持周的日本法西斯军人还是有的。日本军人中和周关系密切的还有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酋次。川本最初就是伪府军事顾问，1940 年夏他陪周去武汉、北平等地，解决伪中央政府和各该地在财政金融上的“统一”问题。但是周和川本关系进一步发展是在 1944 年，即川本任侵华日军上海陆军部长以后的事。上海陆军部本身就是特务谋略机构，周佛海和重庆的电台联系，川本都是知道的。张子羽就告诉过我，他几次见过川本，并说：“前有影佐，后有川本，这都是支持你父亲的实力派人物。”张子羽当时以第三战区驻沪办事处主任名义在上海担任搜集日伪情报工作。他周旋于日伪群魔之间，不仅和川本等日本人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也深得周佛海的重视与信任。1942 年 3 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本宪兵逮捕，1944 年 5 月，蒋介石驻沪军事代表、上海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伯诚，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周佛海为了与重庆勾结，出面保释了吴开先和蒋伯诚，特别是在 1943 年 4 月派吴开先回重庆时，都得到川本的实际支持。1945 年日本投降前，我经常到上海，川本曾多次请我们全家去吃饭，并看当时禁演的美国电影。1945 年春，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周淑海及其两个小女儿流落湖南，川本派人找到她们，并用飞机接到上海。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佛海在接到蒋介石的委任后去看川本，川本就向他保证，上海日军坚决执行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支持周佛海。由于有了川本的支持，才使周吃了一颗定心丸。日本三井系财阀高岛菊次郎，当时在上海任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总裁，他的儿子高岛秦次是川本的德文翻译，和川本的关系很深，高岛也是在东京照顾我的人员之一。抗战胜利后，当“上海行动总队”已经解散、周佛海决定到重庆去时，他特地要我去高岛家，告诉高岛父子，他将去重庆，并请他们将此事转告川本。高岛父子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再三说：“真想不到你在这时会来看我们，你来得太好了！”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们告诉我，他们经常和川本有电话联系，一定转告，临别时要周佛海保重。周最后一次向日本军国主义者伸出自己的手，以示后会有期，这表明周在已经走绝的路上，仍然幻想会有“又一村”的梦境。

冈田酋次也是最早支持成立汪伪政权，并且一直活动到最后的法西斯军人。他从陆大毕业后，又进了东京帝大经济系，是专门掌管军需和经理部门的人员，日本话叫“主计”。他是伪府经济顾问，周佛海的经济财政活动，他都参与其间，是操纵汪伪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不仅如此，周佛海到东京谈判归还黄金问题，也都有他一同前往。至于周佛海通过顾祝同的丈人及张子羽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进行的物资交换，更是他专管范围。他的公馆设在上海，他经常到我家来，和我也很熟。我妹妹 1945 年春在上海定婚时，他和川本都参加了。

上海日本宪兵队的冈村也是支持周的一个重要人物。冈村大约从 1942 年开始任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他在周佛海的特务活动上支持周。此外，梅机关成员之一，曾任伪府军事顾问，以后当了日军大本营报道部长的谷荻那华雄少将，也是支持周的。

在日本法西斯军人中，臼井茂树、今井武夫、晴气、都甲和辻政信，有的也支持

周，但不及前几人；有的则明确反对。臼井在汪、周搞“和平运动”时，任参谋本部第七课（支那课）课长，是航空兵大佐。当时影佐在现地，臼井在东京，他们都支持周。1939年我到东京读书，就由他指定第七课的藤原岩市大尉，配合犬养健、藤田谦次负责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他的立场和影佐又有不同，1940年臼井和今井还直接和一个自称是“宋子良”的人，进行过中日“和平”的试探，即所谓“桐工作”。为此，日方甚至不惜推迟汪伪政府成立日期。周对此当然不赞成。不过臼井在整个汪伪存在期间，并没有起什么大作用，因为不久他就在缅甸上空作战死了。今井倒是自始至终都参加侵华活动的法西斯军人。但是他对汪伪的态度又不同。一开始他不但进行“桐工作”，而且还进行其他几项对重庆的诱降活动。同时，他还认为汪精卫没有军队支持，没有自己的地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直到日本大本营作了最后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地执行了命令。但是周佛海仍把今井称为“参加和平运动的最初同志之一”。在某些问题上，他也支持周。比如，1943年周主张撤销“清乡委员会”，他和冈田同样是赞成的。可是今井在他的回忆录里发表过对周佛海带指责性的看法。他认为周和军统勾结，抗战胜利时当了“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而其他“和平运动”“同志”都被重庆枪毙，这是“出卖”“同志”，而自己也逃脱不了病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下场等等。

晴气中佐也是梅机关最早的成员之一，后来也任伪府军事顾问，他是负责控制伪特工总部的，因此，和李士群关系很深，是李士群最有力的靠山。李士群后来反对周佛海也是得到他的支持的。从我1943年在东京的一段小小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940年当周、李关系好时，周曾在东京麻布区用特务经费购置了一幢花园洋房，取名“梅华堂”，以招待国内来的人。这个招待所由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指定一个姓“一志”的日本人为负责人。我母亲1941年到日本时，一志就是接待人员之一。她在梅华堂住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和妹妹慧海也在那里住过，因此我和一志很熟，从他口中我才知道他和晴气关系密切。在他看来，晴气、李士群、周佛海是一条线上的，因此对我很客气。可是1943年初我再次去日本时，为整理我的书籍杂物，又去过梅华堂一次，才知道一志已经去苏州作了李士群的顾问。接任的老太婆对我很冷淡，要我把书籍杂物拿走。我回去问了我的房东冈部长二，他告诉我：一志、晴气都是支持李士群反对周佛海的。都甲大佐1941～1942年任第七课课长，后来调南京“派遣军总部”任参谋。他不但不支持周佛海，而且主张直接和重庆搞“全面和平”。都甲曾向周佛海提出一个方案，即在“全面和平”中，应使西南方面集中起来，在南京、重庆之间形成第三势力，迫使渝、宁和谈。周则认为在内战时可以如此，此时不行。1944年春，我在南京时，唐生智的弟弟、军统派到汪伪的唐生明，从上海来为周佛海庆寿。他不会讲日语，要我替他打一个电话给都甲，预约会见时间，我照办了。事后我问周佛海，唐为什么要我找都甲？周告诉我：一则都甲通过唐正在做龙云的工作，二则唐想依靠都甲当上伪湖南省长。当然这两件事以后都没有成功。不过，都甲在其侵华活动中，倒是搞了不少阴谋的，而这些又和周佛海的利益是冲突的。

辻政信是侵华少壮派法西斯军人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人物，是有名的石原莞尔的嫡系。他和周佛海的关系是微妙的，既有矛盾，又有一致。当1943年他第一次看周佛海时，周就认为辻是少壮派军人中佼佼者，辻向周表示，日本所谓“对华新政策”纯属

挂羊头卖狗肉，只有石原莞尔来任驻华大使，板垣征四郎任总司令，方能彻底实现，且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新民会”必须取消，以求中国“统一”。辻并希望汪精卫去东京时向日本政府提出石原、板垣问题。周则表示石原与东条不和，恐怕不能实现，此事且系日本人事问题，汪也不便提出。假使提出，如不能实现，汪的面子反不好看。辻则认为目前在中国之三笠宫亲王回东京后也将向天皇提出，因此定能实现。当然这件事以后并没有实现。又如辻一直主张和重庆直接谈判，这一点和周相同。因此，当他们谈起这个问题时，周表示如辻敢去重庆，周愿一同前往，虽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像这种谈话，关系不深是不会有的。但周、辻之间毕竟分歧是主要的，这种分歧已经影响到周的切身利害。在对重庆问题上，辻认为应该牺牲汪伪，周主张应和重庆谈判，但又认为不应将汪伪踢开。

辻政信对汪伪政府极端贪污腐化特别不满。他认为如此怎能争取民心，决定进行“整肃”。因此，就拿贪污日军军粮的后大椿、胡政开刀。辻曾向人透露暗杀李士群他也参与决定，因为李势力日大，恐尾大不掉。杀李这一点，周、辻虽一致，但尾大不掉这种情况在周的身上也同样存在，再加以周妻杨淑慧，小舅子杨惺华，亲信邵式军、钱大櫆等贪污程度更加厉害，只是碍于周佛海，辻一时不敢下手。后、胡事件不过是杀鸡给猴子看。凡此种种，使周、辻矛盾更加尖锐。因此1943年春当我在东京时，伊藤芳男从上海到东京，住在日比谷水朋馆，我去看他时，他就告诉我，他这次到东京来，是为了替我父亲办一件重要工作。他带来大量款项，准备买通一位陆军省负责人事工作的将官，把辻政信从中国调走。不久，辻政信果然调到新加坡，自称“反贪污”的人，也被贪污炮弹打倒。

1944年8月，周佛海最后一次到日本。他这次去日本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是去探视汪精卫的病情；其次是与刚上任的小矶国昭首相接触，探询日帝对华政策，并由伪中储行向日本银行借了四亿日元贷款；再次，会见一向主张“全面和平”的宇垣一成，交换对“全面和平”的看法。当时日军已全面处于劣势，但法西斯军人宇垣仍然打肿脸充胖子，主张从实力地位出发与重庆谈判“和平”。不久宇垣又到中国一次，不但与陈公博、周佛海继续接触，而且还见了与重庆有联系的周作民。周佛海这最后一次去日的三个目的，正反映了汪伪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得不更加依靠自身难保的日本侵略者，而“全面和平”，又救不了自己和自己的主子。

四、勾结蒋介石

汪、周逃离重庆，当了汉奸以后，重庆接连对他们采取了特务暗杀手段，特别是在河内暗杀汪精卫未成，杀死曾仲鸣，所以汪、周一到上海就组织了自己的“特工总部”，和潜伏在“租界”里的国民党特务形成了杀来杀去的紧张局面。但是，就在这时，周佛海仍然和国民党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派人到香港，到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比如顾祝同的丈人许家住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在上海各种经商便利。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公署秘书长的葛敬

恩，也一直由周资助居住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他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也资助过他。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时的老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和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转达陈果夫、陈立夫“向蒋先生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惟蒋先生之命是从”。陈肖赐的回答却是：“果夫、立夫均有电来，谓蒋仍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谓蒋绝不与汪合作，盼周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这就是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来往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往上海。他们俩我都认识，我也经常在家里看到他们。在初期，周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想要杜、钱，特别是钱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当然这些活动也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他们更寄希望于“周作民——钱新之”这条线。这条线首先是日本人打通的。“满铁”的西义显在香港见了钱新之，推动他到重庆“劝和”，回来后再向汪精卫报告，并由陈公博、周佛海见了周作民，说服他到香港去游说钱新之。周作民去是去了，但行前表示把握不大，结果当然是没有成功。日本人倒是很重视这条线的，西义显曾陪同另一居间人张竞立去过东京，还拿了周佛海的介绍信，见了当时外相松冈洋右，松冈虽对这条线很感兴趣，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另一条完全由日本人进行的是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桐工作”，就是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人很重视此事，为此推迟了汪伪政府的成立，周佛海是反对这事的。日方甚至策划过蒋、汪、板垣三方会谈，当然这些也都没有成功。周反对这事，其原因是他认为重庆这样做，是要阻挠汪伪政府的成立。

特别令我当时感到惊奇的是周佛海居然还和燕京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见过面。我在1941年夏，曾向周佛海提出不再到日本而去美国读书，当时周口头上答应了，并说他可以找司徒雷登，帮助我搞到进入美国的签证。我有点不相信，就问我母亲，她告诉我司徒雷登从北平去重庆时，要经过上海。周佛海在租界一个朋友家里和他见过面，为的是托他到重庆进行“全面和平”的问题。原来司徒雷登在北平，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的意见。他们都同意了。于是当司徒雷登去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当然，由于整个形势不同，这些活动就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在初期是企图搞“全面和平”，把重庆拉过来，以便日本帝国主义达到既能侵略中国，又能尽早结束战争的目的。在中期和后期则是在战争日益对日本不利的情况下，利用“全面和平”的幌子，一面替日本帝国主义摆脱困境，一面为自己寻找出路。而重庆在这接连不断的阴谋活动中，始终是掌握主动的，这一点周佛海自己也是感觉到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帝国主义为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通过周与重庆勾结。同时重庆为了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抗战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

戴笠——程克祥、彭寿。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任周佛海的日文翻译，程克祥则在罗君强的伪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彭寿先是在伪侨务委员会，后来改在伪赈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于是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的被捕使周佛海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程、彭就被释放出来。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秋和1943年秋，先后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由重庆经安徽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还有我的祖母、外祖父等在息烽照的照片。那时我正在南京，程向周汇报时我也在旁听了，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的上海，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一直到抗战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周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是张子羽。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战区与国民党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之军事人员。1945年初，当周计划将上海搞为不设防城市时，顾也来电望周积极进行。因为三战区靠近沪杭地区，本来设想顾将接管沪杭，因此周、顾都寄很大希望于对方。张子羽就多次向我表示这样的意见：将来最快进入上海的定是顾祝同，因此你父亲大有作为。张还替周佛海拉拢胡宗南的关系。胡宗南派驻上海地下工作人员洪复礼，于1943年被日本宪兵逮捕，由张向周说情，周即将洪保出，以后即与周联系。洪提出胡宗南希望共同防止共产党势力扩张问题，以及伪府沪杭地区与西北物资交换问题，但终因胡宗南所据地区与上海相距太远，这条线没有什么发展。

除了这两个主要关系以外，在此时期周还发展一些新的关系，其中我记得主要有刘百川、罗宝等人。刘是抗战前周在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时的老部下，由陈立夫派到上海与周联系，以后又来往于沪渝之间，但受戴笠排挤也没有什么发展。另一个是罗宝，又名罗教植，黄埔一期毕业生。他由三战区屯溪来上海，一直由周资助掩护。一些老的中统关系，如马元放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由周资助回重庆。还有吴开先也由周佛海通过川本芳太郎的关系，由日本派飞机送往湖南转赴重庆，让他“相机”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中日和平”的意见。一直到1945年初，周佛海还根据日本人的要求，通过周作民派朱文雄去重庆，因已接近抗战胜利，也就没有什么进展了。

五、扩充势力种种

自周佛海当了汉奸，直到抗战胜利，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而他和其他政治力量和派别的斗争与联合，又是与这个目的分不开的。首先，从人事方面看，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周起了主要作用，CC系的梅思平、丁默邨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

到伪边疆委员会的委员长，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职。当然这三个人和周关系并不一样。丁、罗一直和周站在一起，梅则不同。由于梅也属于“低调俱乐部”，又是“和平运动”最初参与者，所以两人关系还是很好的。但是梅思平当了伪实业部长后，因鸦片经营、税收等问题，与周日益矛盾，后来投向陈公博。周对其他部长级汉奸如岑德广、赵叔雍、鲍文樾、陈群等都极力拉拢。至于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伪财政部、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人员，是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亲戚和同乡，伪财政部、伪中储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周的小舅子杨惺华，抗战前由我母亲资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技术的人，当了汉奸后，周要他和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管理“特费”（以后由他单独管理），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主要财源之一。杨惺华也参与周的重要政治活动，军统特务程克祥的秘密电台，一度就设在他家。1942 年和 1943 年周两度去日本，也带了杨同行。

其次，拉拢黄埔军校出身和原国民党江苏省教育界及中统方面的人员。这是因为周佛海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做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也是 CC 派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利用师生、部属关系，来建立和发展个人的势力，形成周佛海派系。比如郝鹏举、项致庄、徐肇明、蔡洪田、张仲寰一类人，都是黄埔出身的。徐季敦、董修甲等则是江苏省政府的部属，至于原 CC 系的人则就更多了。

再次，网罗上海财政金融方面的所谓专家，如伪财政部次长严家炽、陈之硕，司长俞绍瀛、张素民，伪中储行的钱大櫆、戴霭庐、柳汝祥、夏宗德等人。周佛海和他们虽然在历史上没有政治渊源，但因周过去在这方面毫无基础，不得不用这些人。为了使这些人成为他的私人势力，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委以要职，予以重用，而且在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贪污，给他们好处。

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钱大櫆以及伪中储行的一些干部，贪污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掌握了财权以后，首先就要统一税收。江淮是汪伪控制的基本地区，因此很容易解决盐税、统税和关税问题，他分别委派阮毓琪、邵式军、张素民掌管，只有特税较麻烦。特税就是鸦片税。本来鸦片的经营由梅思平的伪实业部批准。当时上海为取得一张执照，须花几根金条作为贿赂，而鸦片从产地到销地的运输，则由盛文颐（字幼庵）的“宏济善堂”，以商业机构名义负责的这个机构由日本陆军经理部门牢牢控制，并且派了一个叫里见夫的日本人监督。这样周和梅、盛两人之间就有矛盾，后两人希望税少，周希望税多，最后在经济顾问冈田酉次干预下，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即正式税率不变，再由盛定期送一定款项给周。关于地方税款问题，由于川本芳太郎和冈田酉次的支持，周于 1941 年去武汉时即解决了武汉地方税款向汪伪中央缴纳问题。广州比较麻烦，因为陈璧君把广东视为私产，以后周与陈几次争议，结果名义上广东向“中央”缴纳，实际上又以“中央”向广东补贴方式发给广东，周在这次争夺中是处于失败地

位。最困难的是华北。华北向“中央”缴纳的税款存入“联银”，伪财政部需要支出时，开“联银券”支票，当时市面上“联银券”价值高于“中储券”，是十八比一百，而官价是一比一。周就利用这种办法大肆贪污，我母亲在北平购买大批珍宝和房地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

推广“中储券”也是周佛海扩充财政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沦陷区全面使用“中储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租界”以后的事。那以后，租界里的银行家，如“金城”的周作民，“交通”的唐寿民，“大陆”的叶扶霄，“盐业”的吴震修，“中南”的胡惠春和一些工业资本家，都不得不依赖伪中储行。而伪中储行则通过贷款方式，加深和这些财阀的关系。伪中储行的高级职员用各种方式进行贪污。周本人在伪中储行的户头可以无限制透支，伪中储行用本行支票将透支补上。周的特费开支也都来源于此。

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向我说过：“我一生最大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蓬、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的李长江、杨仲华、荣子恒等人采取直接送钱等手段，进行收买。尤其是他对一些西北军军人如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也都尽量拉拢。这是因为：第一，这些军人都有实力，周更需要利用他们。而周因为掌握财权，这些伪军在领取饷银时需要周佛海给予方便，比如在时间上能早拿一天就可以在市场上放利息，为自己获得利益；第二，由于周佛海与日本军阀的关系，比这些投敌的将领要深，因此当他们有什么重大问题需要打通日方渠道时，往往也求助于周。

但周在扩充军事方面，花费最大心血的是建立一支能完全控制的部队，这就是伪税警总团和伪税警学校。周佛海是把税警团当作他的“正规部队”看待的，他自兼校长并曾兼总团长，让罗君强兼任副校长和总团长，掌管日常事务。到 1942 年，又网罗了熊剑东作为税警团的副总团长。这是一支拥有万人左右的队伍，由于有影佐祯昭的支持，在伪军中是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到 1944 年，周又以物资交换形式，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那里取得一大批美式卡宾枪和冲锋枪。伪税警总团的防区主要在浙东一带，这是富饶之区，与国民党三战区接界，又与新四军浙东部队所活动的地方犬牙相错。

在特工方面周和李士群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充分反映了周在这方面扩充势力的斗争。李被毒死后，不但过去与李关系不好的苏成德、马啸天，更加听命于周，就连李的亲信胡均鹤、万里浪、杨杰等，也纷纷来请周主持特工工作。

六、太平洋战争和周佛海的“应变”

周佛海曾在日本人和他的亲信面前发表过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人不应该同英美开战，以免扩大战线，树敌过多，而应集中力量解决中国问题。他说，重庆国民党政府正寄希望于日本和英美的冲突上，如果日本真和英美打起来，那正上了重庆的当。当然这是周为其主子出谋划策，但也反映了周为自己谋求出路的一种矛盾心理。我母亲的美金十万元存在美商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这说明他是想和美国保持一定关系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周在上海。凌晨影佐祯昭就打来电话，告诉周佛海：日军在太平洋已经和英美进入交战状态，上海日军已进驻“租界”。并向周道歉说，我事先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绝密的。

太平洋战争，无论是对日本或是对汪伪，以及对周本人，都是一个关键性转折点，这一点周心里是很清楚的。

香港被日军占领后，留港的郑洪年、唐寿民、吴颂皋等，到上海都当了汉奸，唐、吴都成了周系统中重要人物。日军占领“租界”后，伪“中储券”能在沦陷区全面使用，周因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支持周的影佐祯昭不久就被调到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做部队长去了。犬养健也因受到“尾崎秀实案件”牵连，到东京候审去了，周失去了重要的支柱。周与汪伪其他派别的斗争也更加激烈。1942 年他曾有过一个“以退为进”的计划，即准备放弃伪财政部及伪中储行，把它们让给“公馆派”，自己到华北去。周曾多次在人面前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偏安江左，而有所为的，必须北上。”当然，周要到华北，必须得到日本人同意，日本军阀中有一部分人如影佐祯昭、川本芳太郎、冈田酉次是支持周的。华北日军一向不听命于“派遣军总司令部”，如果能有一个较有能力的汉奸到北平去，对实行汪伪政权“一元化”有好处。因此当周于 1943 年夏访问伪满，归途经过北平时，冈田酉次就陪同前往。周去伪满除公开的礼节性访问外，主要是想搞好和伪满的关系。他认为没有东北合作，华北是搞不好的。他在北平时，曾和支持他的人广泛接触。当时北平、天津一带的银行家，如北四行、南三行等，也都希望周去北平，他们认为有一个能和日本人讨价还价，多少抢一点东西回来的人，比那些腐朽的北洋政客要好得多。而一些闲居在北平的旧官僚，如张之洞儿子、曾任伪满外交部长的张燕卿，曾任北平市长的何其巩都是支持周的。此外，华北的一贯道也支持周。但是由于华北日军的反对，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1943 年秋，周佛海随汪精卫赴东京参加日本召集的“大东亚会议”①。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陷于不利，为摆脱这种困境，因而对重庆加紧诱降，以便全力对付英美。同时，日本装出一副伪善面孔，实施所谓“对华新政策”。为了“促进”占领区的经济，周和日本藏相贺屋兴宣签署归还三吨黄金的协定，从侵略者牙缝中捞回一点残渣。周还和已不担任公职的犬养健秘密会见过一次。周事先告诉我，犬养明确劝他，日本败局已定，希望他早作打算。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军人和知识分子，认为实施中日“全面和平”，就要和重庆谈判，主张抛弃汪伪。《每日新闻》的吉冈文六曾邀请周参加一次座谈会，公开向周提出：如果“全面和平”成功，汪政权应何去何从？周对此很为恼火。这个问题的出现，反映“应变”之举已经刻不容缓。

进入 1944 年，整个世界局势更加明朗了。在欧洲，意大利法西斯已经完蛋，苏联正步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也开始反攻，并轰炸日本本土。3 月，周佛海因患肺炎及心脏病，病情严重，日本特从东京派来一个叫坂口的心脏病及肺病权威的医学博士

① 1943 年 11 月 5～6 日，日本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危局，召开了由日本及汪伪国民政府、伪满洲国、菲律宾、泰国、印度等傀儡政府参加的“大东亚会议”，并发表了《大东亚共同宣言》。

来为周佛海治病，我也从东京赶回南京。直到4月底，周才逐渐恢复健康。有一天，我问周佛海，现在形势已明摆着，你究竟如何打算？他告诉我：你知道彭寿已去重庆，现在又回来了，我已和军统有联系，今后形势万一有变化，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他说：有两个问题你要考虑：第一，他们都是特务，是不是可靠？现在说得很好，将来会不会不认账？第二，你和重庆来往，假若日本人知道了，你这个头也很危险。他笑了笑说：前途不会有问题，蒋介石有一封亲笔信给他。至于彭寿、程克祥，他们是我保出来的，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允许保他们出来的原因，主要是想通过他们搞"全面和平"。因此，我通过程、彭和重庆进行联系，这是"合法"的。但是，在"合法"当中，我们另外搞了一套，这些是不能让日本人知道的。

周佛海病好后，我们回到上海，周从保险箱里拿出蒋介石那封信给我看。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写的：闻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我问周"知名不具"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你知道我的名字，但因某种原因我不写明。他说：这肯定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因为我认识他的笔迹。我又对他说：蒋的信对你还是不大客气，叫你"戴罪立功"。周说：官样文章总还要维持，在他们眼里，我还是汉奸，能戴罪立功，给我一条路走，就不容易了，这一点我现在也很难和他们讨价还价。我问周：蒋说对你前途予以保证，这只是一句话，有什么更牢靠的保证没有？他说政治上的事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可靠的保证也很难。他把信给我看了之后，又把信放到保险箱里去了。我问他，这封信日本人是否知道，他说不知道。后来，我母亲把这封信托人带到香港，放在外国银行保险箱里了。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关在老虎桥时，还利用过这封信。

有一天杨惺华告诉我，说程克祥想见见我，和我谈谈。我就答应了。我在1943年底的一次宴会上，曾见过程克祥，但是没有讲话，因此这次和程克祥谈话是第一次。程克祥见到我后说：我们知道，你对你父亲当汉奸是不满意的，你想出走，到杭州去过。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和我们有了联系。因此，你不要再反对你父亲了，这会增加你父亲的麻烦。同时现在国际形势明显地摆在面前，美军必胜，日本必败，我们希望你能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支持。我问他你所指的支持是什么？他说：我们知道你最近还要到北平去，北平你只管去好了，我们也不是要你做什么具体工作，只是希望从政治上、道义上支持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你父亲及其周围多说我们的好话。我当时点了下头说：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我都支持。我也向他们提出：你们是否注意到共产党的问题？程克祥拍胸脯说，这个你放心好了，蒋介石在陕西有胡宗南的50万大军，一直没有动，专门预备对付共产党，因此共产党的问题三个月就能解决。我说：怕没有这么简单吧。1945年初，程克祥又来找过我一次，他说现在形势更加发展了，但是你父亲好像对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不太热心，希望能跟你父亲谈一谈，怎么更积极协助我们工作，万一形势有了很快变化，准备工作搞得不好，那就来不及了。程克祥的话有一些威胁味道。我回去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周佛海，他没有表示态度。我妹妹周慧海在旁边，听了以后说：程克祥是什么东西，爹爹的事情要他管个什么？当时我也有这个感觉，因周佛海没说什么，我也就没多说。不久戴笠有个电报给周佛海，要他集中力量抓上海、江浙。假如周保住上海，就是立了大功。因此周必然要做伪上海市长。那时陈公博已做伪行政院代理院长，

能当伪上海市长的人只有周佛海。他任伪上海市长后，把罗君强调来任伪秘书长。他本人兼伪保安司令及警察局长，熊剑东兼副司令，徐肇明是参谋长。

周任伪上海市长时，搞了一个“咨询委员会”，把当时上海有名人物网罗起来，如周作民、唐寿民、叶扶霄、吴震修、颜惠庆、李思浩等。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国际上有种作法，交战双方搞不设防城市。周当然也想把上海搞成不设防城市，但这件事必须经日军同意。他想让日伪军都撤离市区，由警察维持市区治安。对此，日本人也并非完全不同意，特别是川本芳太郎很支持，因为日本甚至已提出能撤离大陆，为什么不能撤离上海。周准备在计划实现后，带着熊剑东的税警团去郊区，而罗君强以伪上海副市长、警察局长名义维持治安。他还准备了几间公寓，每一个公寓里面都有够吃几个月的食物，准备万一情况紧张，就让我和我妹妹住进去。部队撤出上海后，仓库仍留在上海，如果美军不轰炸，对日本人也有好处。另外，在上海的外国人也同意，特别是瑞士，瑞士领事馆人员好几次来找周商谈此事，因瑞士侨民在上海有大量财产（周妻曾通过瑞士领馆买到一笔瑞士法郎）。江浙财阀也支持。周也把此事向戴笠报告过。但后来东京怕这样做会使日本在太平洋其他占领区的大城市也仿效上海，这样会使日本利用城市进行战略防御的计划不能实现，结果未能搞成。

七、戴笠当“孝子”，周佛海效旧主

1945年6月下旬，传来我祖母在息烽病逝的消息，此事对周、戴关系的加强有一定作用。戴笠一听到周母死于息烽，就立即赶去，作为“孝子”为周母收殓。周为此对戴极为感激，戴笠此举乃基于当时形势，想稳住周，好保住上海。周母死的消息是通过程、彭的秘密电台打给周佛海的。周因感激戴，也加强了程、彭在周面前的地位，从此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我家。

周母死后，周在上海玉佛寺大办丧事，共办了七七四十九天，这是周佛海一生大摆排场的最后一幕。花了不少钱，而全部费用都是由伪中储行支付。那时，中国官场有个规矩，父母死后应提出辞职，周也照样提出辞职，陈公博表示挽留，准假一月。

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4日那天，周赶往南京与陈公博商量对策。15日，第一个到我家的罗君强，问我周佛海何时回来，我说已挂长途去南京，但未接通，他要我接通后让周立即回上海。随后程、彭拿一封电报来，是戴笠委任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行动总队司令①，熊、罗为副总司令的委任令。

第一个到我家的日本人是伊藤芳男，问周佛海回来了没有。我和他一起在收音机旁收听日本天皇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广播讲话，他听了以后，垂头丧气，要我在周佛海回上海后，赶快告诉他。

8月16日，陈公博、周佛海在南京召开伪府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取消南京伪政权，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维持会”，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当夜，南京发生周

---

① 此处记忆有误。周佛海担任的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

镐与陈公博的冲突事件。8 月 18 日周佛海电话通知我，说事件已经解决，当天回上海。我和罗君强、熊剑东、程克祥、彭寿都到车站去接。我与周同坐一部车，在车上问他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周说，戴笠发表他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及周镐为南京行动总队司令后，周镐就把南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伪财政部都占领了，挂起了行动总队招牌，杨叔丹的伪财政部警卫总队 800 多人，都戴上袖章，陈公博就派陈皋带伪宪兵司令部的宪兵把西流湾 8 号包围住，要干掉周佛海。这时日本人出面干涉，派了小笠原少佐去见陈，他首先问陈公博为什么要干掉周佛海，陈说周佛海与戴笠有来往，而且在周佛海的庇护下，周镐利用伪财政部警卫队，挂起南京行动总队的牌子，打死了萧叔宣①，这事对我不起。假如你们日本人出来调停的话，得依我三个条件：第一，周佛海必须到我这里来向我解释，为什么事先不把与戴勾结的情况告诉我；第二，周佛海来解释时不能带卫队和武器，最多只能带一个副官；第三，不管周佛海如何解释，都应向我道歉。日本人答应向周传达，但提出要绝对保证周的安全。周接受了陈的三个条件，亲自向陈作了解释。周说：你的地位一向比我高，特别是做了国民政府的代理主席后，地位更比我高，假如我把与戴笠的联系情况向你报告，你很难向我表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假如你同意了，日本人知道了怎么办？假如你不同意的话，我就要吃亏。我不向你汇报，你可避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我才没向你报告，的确对不起你。周解释以后，陈公博未讲话，但陈皋的宪兵立即撤离了，这样周佛海就回到家里，并很快上了火车到上海。

上海行动总队是周佛海由南京回到上海后，找罗君强、熊剑东、程克祥、彭寿等人商量以后，于 8 月 19 日才成立的，到 9 月中旬结束。结束后周佛海到了重庆，所谓上海行动总队的班底，只不过把周佛海能控制的势力，换一个招牌而已。当时周能控制的势力有这样几部分：第一，伪中央储备银行；第二，伪上海市政府、伪上海市警察局；第三，伪上海市保安司令部，伪税警学校和税警总团。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副司令罗君强、熊剑东，秘书长程克祥，副秘书长彭寿，宣传处长彭寿，总务处正副处长杨惺华、马骥良，保安司令部正副参谋长徐肇明、刘明夏，下面有若干大队。总指挥部由保安司令部、税警总团、税警学校组成。

周佛海一到上海，还没来得及与罗君强商量搭班的事，就跑到川本那里，告诉川本他已被重庆委任为行动总队司令，希望了解日本方面的态度。川本表示他和松井都完全执行天皇的无条件投降命令，保证在上海的日军部队决不扰乱社会治安，在国民党军队没有接管上海以前，负责“维持治安”，对上海行动总队也是支持的。然后，周又去见松井，松井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周得到日本人的支持也就放心了。

上海行动总队的任务是：第一，维持上海治安，防止共产党接管上海，防止流氓地痞及歹徒跳出来抢劫。当然这个任务主要是日军维持，但上海警察及保安大队也起了一定作用；第二，把上海的伪政权机构及人员档案、物资器材等，完整无缺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第三，对国民党的地下组织人员及机构，供给活动经费。这些任务周佛海都一一照办了。

戴笠约在 8 月底 9 月初到了上海。周佛海曾告诉我，抗战胜利后戴笠先跑到昆明解

---

① 萧叔宣 1945 年 3 月任汪伪陆军部部长。

决龙云问题，因为龙云问题不解决，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后顾之忧。他到上海后，召见周佛海，对周说："你放心好了，有我戴笠，就有你周佛海。"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也约见了周，说了些安抚的话。约在9月初或中旬，当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全部到了上海，国民党对上海、南京地区获得保障之后，戴笠对周佛海讲：现在委员长想见你，希望你到重庆去。那时丁默默也到了上海，戴笠也对丁讲，可以到重庆去见委员长。于是周佛海便移交上海行动总指挥部的事务，于9月25日乘飞机去了重庆。和周佛海同去重庆的有罗君强、丁默默、杨惺华、马骥良等四人。

八、周佛海的末日——从白公馆到老虎桥

1945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开始逮捕汉奸，陈公博、陈璧君、林柏生等要犯先后被捕入狱，并先后将他们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周佛海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分子，汪伪政权的要犯，本应立即逮捕法办，受到应有的惩治，但他却和陈公博等人的处境大不相同。

周佛海等五人到重庆后不久，周就病倒了。周病倒后，戴笠到上海，要我和我母亲也去，说周病了，因此我和我母亲到了重庆。

周病好以后，戴笠就把我们这些人送进重庆白公馆软禁起来，再也不提蒋介石接见的事了。白公馆位于歌乐山山腰，远远可以望见沙坪坝。这是一幢二层楼的旧式楼房，周佛海和杨淑慧住在二楼左边的大房，后面的小厢房由看护和保姆住；丁默默住在右边的大房，马骥良夫妇住在后面的小房；罗君强住在楼下右边的大房，后面的小房则由两名副官住；我和杨惺华住在楼下左边的大房，后面的小房则由军统管理员魏孔住。白公馆内不但可以互相来往，而且唱歌、打牌、读书、看报都可以，也可以和家里通信，只是必须经过特务检查，惟一禁止的就是外出和外界人见面。生活待遇也很好，我母亲还不时搞点湖南菜。每星期洗澡一次，春节还吃了两次酒席。白公馆院内左侧还有一幢小楼，住着一班警卫。

周佛海到白公馆后，几次写信给戴笠，要戴看他，但戴未来。1946年4月1日，戴来了，周事先不知道。大家在二楼客厅里闲谈，戴未谈及他们问题如何处理，只是一般谈谈形势。周向戴提出，最好请戴先生让我儿子出去读书，他也没做汉奸，何苦和我们在一起，戴笠就答应了。在谈话中周还曾把戴拉到房间里谈了一阵，我当时还以为他们有什么秘密要谈，事后我问周都说了什么？他说没什么。午饭后，戴告诉周佛海，说他就要到北平、南京去。戴走后不几天，我们就听到戴飞机失事摔死了。白公馆的几个人，特别是周、丁，听到戴死后，很恐慌。那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在楼上谈了许久。因为戴说过"有我戴笠在，就有你周佛海在"，现在戴笠不在了，很自然联想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更加悲观。他们认为，应尽快使他们的问题明朗化，不要总是蒙在鼓里。于是，决定由周佛海出面给毛人凤写信，要求将他们送法院。这封信是经我手交给毛人凤的。

在这种穷途末路的环境中，每个人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周佛海闷闷不乐，因为他自己也感到前途不大妙。周在开始时认为还有一点希望，但后来情绪越来越坏，特别是

听到南京、苏州两地的许多汉奸被枪毙时，认为自己也等不到好久了，但他到死仍坚持反共立场。在此期间，他对我说过这样的看法：蒋介石一生面临三次重要选择，一次是1927年，当时反了共，所以是正确的；一次是1936年西安事变，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是错误的；一次就是现在。这也说明周佛海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反共到底。

丁默默一到白公馆，我就看见他和一个警卫鬼鬼祟祟谈论什么。很快我就从母亲那里知道，他通过这个警卫和外面建立了秘密联系。不久，罗君强又告诉我，丁和外面秘密通信后，还布置他的一些老下级，去找他的中统老关系，为他了解情况开脱罪责。当我在1946年4月底离开白公馆时，由于我是第一个离开白公馆的，丁默默——也是大家——都很关心我出去后军统对我的真正对策，比如是否会监视我。丁要我出去后，在重庆《大公报》用登广告的办法，通知他们我出去后的情况，好让他们放心，我当然照办了。除了这些以外，丁还非常关心当时国共关系，他认为国共和谈破裂对他们有利，否则不利。他在大家面前公开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反共老手。蒋先生怎么不派我们用场。丁默默和周佛海住在二楼，所以他们之间经常密谈，罗君强不时也参加。

罗君强在白公馆的表现与丁不同，过去他给我的印象是锋芒外露，可是到了白公馆却比较含蓄了。本来他想把他第五个老婆接来的，不久看出苗头不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罗带了一本圣经，开始他读圣经，以后知道可以买书，他也买了不少书，主要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书。他对自己的命运当然是关心的，但是既不像丁默默那样寄希望于反共，也不像杨惺华那样焦急。他也很注意时局的发展，但不像丁默默那样发表露骨的反共言论。

我的舅舅杨惺华在白公馆几个月的生活中，心情一直很不好。他认为他之所以当汉奸完全是由于周佛海的关系，因此，不断和周佛海争吵。周承认他对杨惺华有影响，但他认为关键是杨自己，所以他反驳说，你不是小孩子，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当我们派专人到湖南去接我的母亲、你的父亲时，他们自己决定不出来呢？再说你到了上海后，不是多次嫌官职不够高，而要求当这当那吗？当你聚敛大批钱财、纸醉金迷时，为什么不说这种话呢？他们争吵了几次以后，杨直到周病死在老虎桥监狱，没有和周说过一句话。杨为了财产的事，还经常和我母亲吵架，他还每晚坐在床上念佛，每天一起来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气色，这些情况当然是令人好笑的。但是我自己和他的关系还好，不但因为我从小和他很好，还因为我当时也有我之所以到白公馆来是受了周佛海的连累的想法，勉强在两人之间找到共同点。杨曾多次写报告给军统当局，为自己表白，并要他的老婆在外面走军统头面人物郑介民、毛人凤的门路，为自己活动。军统元老胡静安曾到白公馆来探望过一次，就是受了我舅母的委托。胡和大家谈了以后，还和杨单独谈了。杨向胡谈了过去给军统做的事情，并请胡为自己帮忙。

和周关在一起的还有马骥良和钱大櫆。马骥良和周佛海在历史上并没有关系，他是随钱大櫆到伪中储行当汉奸后，才成了周佛海的亲信。本来根据他当时的地位，他是没有资格到白公馆的，这完全是因为他成了周佛海亲信的关系。

1946年4月29日，军统的人突然通知我，让我准备行李，说我明天就可以出去了。那时我和成都的朋友也建立了联系，我到成都后辗转回到上海，然后到了苏北解放

区。

我走后，军统很快就改变了对周等人的态度。首先通知我母亲去上海。为什么让她去上海，周佛海也摸不透，是凶是吉，只好去了看。他们和我母亲订了秘密联系办法，让我母亲到了京沪后秘密和他们通信。军统派专机把我母亲送到南京，后又送到上海关起来，主要是追问财产，搞了一个多月，由于我母亲吞金自杀，军统慌了，只好把她放出来，追问财产的事草草收场。我母亲离开白公馆没几天，跟随周去的一个副官从警卫森严的白公馆中逃出，引起军统不大不小的一阵骚动。接着也允许周少海出去了。不久，军统把周等人从重庆送到南京，监押在看守所内，随即开始审判。

当国民党检察官陈绳祖在预审周佛海时，周竭力为自己表白，说他在抗战胜利后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对收回上海是有功的。陈对此笑了笑，并把军统移交周到法院的公文给周看。其中有这么一段："至于周佛海和我局的关系，以及抗战胜利时给以上海市行动总队名义一节，纯属一时利用，判刑时毋庸考虑。"周看后无话可讲。

1946 年 10 月 7 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朝天宫公审周佛海，周为自己写了自白书，竭力为自己的汉奸罪行辩解。国民党虽然想对其宽恕，但因周佛海是为全国人民痛恨的大汉奸，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于 11 月 7 日判处死刑。周不服上诉，被驳回，驳回后周又抗诉，抗诉又被驳回。国民党法律规定抗诉驳回后 24 小时后就可枪毙。因此 1947 年春节前农历三十那天晚上，当国民党法院把抗诉驳回书送给杨淑慧时，杨很恐慌，她立即四处奔走，托国民党要人说情，为周佛海开脱罪责。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机要秘书陈方、CC 头子陈立夫等都是为周佛海开脱罪责的主要人物。陈布雷曾通过陈方向杨淑慧表示，要她不要经常去陈布雷家，因周名气大，经常去的话人家会怀疑有贿赂，对双方都不好。他告诉杨用不着来，称他是周佛海的老朋友，尽他的力量，能帮助的一定帮助。

他们也确实出了不少力，陈立夫曾出示材料，证明周佛海与中统关系和为中统作的工作。陈方很及时地把蒋介石对周佛海的打算事先告诉杨淑慧。当周佛海抗诉被驳回后，陈方对杨说：委座（指蒋介石）已有这样的话，万一要枪毙周佛海，事先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杨淑慧也曾婉转表示，现在情况紧急，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把周佛海的命保下来。当然你过去也讲过，不得到老头子点头，周佛海是不会被枪毙的。但万一到这步就来不及了。不过，万一周佛海落到这种地步的话，我杨淑慧也不是没有办法来报复的。陈方问杨淑慧，你打算怎么报复。杨说：你大概不知道，蒋介石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周佛海，答允给周佛海机会戴罪立功，并保证周佛海今后前途无虑。现在你们已把周佛海关起来，还要枪毙他，这未免太对不起人。假如真正走到这一步，那我也不得不把这封信公之于世。熟悉我母亲脾气的人都知道，她要搞僵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陈方和我母亲很熟，也知道她的脾气。我母亲讲了这些话以后，他当然心里有数，于是他说，你放心好了，我陈方用自己的脑袋保证，无论如何在 24 小时之后不可能把周佛海枪毙，我现在就去请示蒋先生，把周佛海的命运决定下来。结果，1947 年 3 月 26 日，蒋介石公布了特赦汉奸周佛海令，将其死刑改处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两万多汉奸犯中，周佛海成了惟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4 月 4 日，周佛海便被移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

1975 年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上，曾经刊登了《汪精卫卖国记》一文，文中谈到了杨淑慧利用蒋介石给周佛海的信打官司的事，说杨亲自见到蒋介石，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杨淑慧和我都未见过蒋介石，提出这件事也是通过陈方。

周佛海被送到南京看守所后已开始病了，移解老虎桥监狱后，病情恶化，杨淑慧就想让他保外就医，但周佛海“名气”太大，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以及监狱当局都不敢应允。后来，国民党政府答应让周佛海搬到监狱内一间宿舍里，由家属找医生专门替他看病。从此，一直到他死，都是住在那里。1948 年 2 月，周佛海终因医治无效，死于狱中。

（蔡德金整理，1982 年）

我所知道的李士群

马 世 淦

汪伪汉奸李士群，浙江省遂昌县人。我与李士群初次相识，是1926年冬在李的同乡、上海大学同学方山的宿舍中。当时李拟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转学上海大学，先搬来与方同住。据方介绍说，李是CP（共产党员）。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蒋介石封闭，李转学没有成功，不再回美专，也没有进别的学校读书，后来当上了蜀闻通讯社的记者。

1928年我进复旦大学读书，李的妻子叶吉卿（当时尚未结婚）和李的妹夫谢云巢（抗战时期投敌后改名为谢文潮，抗战胜利后与叶吉卿一同入狱）亦皆在复旦读书。李常来复旦校外宿舍住。此时李经济相当困难，经常向我借三元五元，顶多十元，有时还有时不还。后来我在上海做生意，他仍做新闻记者，曾为丁默默主持的《社会新闻》做编辑。他常到我的茶栈里吃饭，叉麻将。他麻将牌总是赢的时候多，另外也还是免不了要向我借点钱，我也总是应付他。他有钱的时候，也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李于1928年起担任蜀闻通讯社记者。他对我说，此通讯社是刘湘出钱做后台老板，什么人都可以骂，只要不骂刘湘就行。并说刘湘脑筋简单，梦想做皇帝。1928年以后很长时期，李士群的名片上一直印着“蜀闻通讯社记者”职衔，并以此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他到我茶栈来吃饭叉麻将，对我的朋友都是用记者名片的。后来李士群对我说他在搞《社会新闻》，并说《社会新闻》是由陈立夫做后台老板，钞票“麦克麦克”（很多很多的意思）。我曾到过三马路绸业银行大楼的《社会新闻》办公室，看见过丁默默、唐惠民、翦建午等人。这些人和李士群当时都是陈立夫在上海的CC分子，而以丁默默为头子。后来丁任汪伪政府的社会部长，翦建午是社会部的什么长，唐惠民是李士群任汪伪江苏省省长时的省建设厅长。

1938年夏，我在上海看到李士群时，他自称是陈立夫派他到上海搞工作的，住在大西路67号，房子很大。当年我曾在此房子里同李夫妻同住过几个月。那时李虽有活动，但很隐蔽。李对我说，陈立夫供给他每月600元做情报工作，活动方法是联络各国驻沪领事的仆欧、汽车夫，了解领事馆和各方往来的情况，接见什么人，访问什么人，从而猜测或证实某国领事馆在沪的活动。据李说，只要能知道某国领事馆进出的是些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进出，结合其他因素，他就有本事猜出某国人在搞什么活动。他又说，猜错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上级不可能拿了情报去同外国人核对。他曾对我透露过，他同一个叫王宝钰的接触，王同几个领事馆的仆欧、汽车夫接触，这些仆欧、汽车夫只知道王宝钰而不知道王上面的人，也不知道其他仆欧、汽车夫的情况。

有一次他做了西装，付不出钞票，要我垫付一下。他对我说，陈立夫不讲信誉，讲

好的活动费不发，还是外国人说话算数，掏钞票爽快。他说的外国人是指日本人。在大西路67号，我没有看到他同陈立夫有什么往来，却看见他同日本人有往来。开初，我还很天真地劝他不要同日本人接触，他的答复是，搞情报工作的还能不同日本人接触吗？据李对我说，他主要是同日本领事馆的书记官清水董三接触。并且说，不要以为替日本人做事就是做汉奸，要知道有很多人想搭日本人的关系还搭不上呢。当知道李士群确实已经投敌当上汉奸后，我就于1938年11月离开了大西路67号。

李投敌当上汉奸后，从大西路67号迁至亿定盘路10号，逐渐发展，最后发展为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在亿定盘路10号一段时间，我适在港渝工作，对情况不了解。

我于1940年返沪时，李的特务活动范围已很大。据吴四宝（又名吴云甫、吴世宝）妻佘爱珍说，极司菲尔路76号组织初期是丁默默负责的，丁颇想将李排挤出去，只是因为吴四宝忠实于李士群，结果反而把丁赶出“76号”。1941年日军宪兵队捉住吴四宝时，佘爱珍口口声声说，当初吴四宝一心一意跟李士群部长走，现在总要李部长救救他。是有根据的。

吴四宝忠实于李士群，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无锡帮流氓头子季云卿的徒弟，王宝钰也是季的徒弟，由于季云卿的徒子徒孙很多，可供李士群利用，李投敌后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是和季云卿的帮会组织分不开的。后季云卿于乘凉时被暗杀。

李在我返沪后同我第一次谈话时，曾希望我参加他们的所谓“和平运动”。不过他知道我对政治不感兴趣，特别是怕做汉奸，怕被暗杀，对于我的不愿参加伪组织他是明白的。

李知道重庆贸易委员会富华公司在上海存有大批可以换取外汇的出口物资，想用非法手段据为己有。李对我说：“重庆的一切财产都归我们接收。这个公司有不少货色，可以接收一下。这件事就归你办。只要把提单弄到手，货物拉到沪西，千稳万妥。要人、要钱、要汽车，我们这里都有。这件事搞好了，你的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弄来的东西“76号”只要一半，其余一半由你支配。富华公司原来的工作人员都可留用，归你指挥。”这件事当然没有实行。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士群是如何想利用我的关系把我推入罪恶的深渊，而他则可以从中大捞一票。

李士群还同我谈过一件事，有一个叫潘三省的，在上海开设黄金交易所，组织成立联易银行，李需派一个人作为代表，监视潘三省每月交出一定的特工经费。李意派我做他的代表，名义是联易银行副经理，只要每月规定的经费收到了，其余的事，可由我自己活动。他知道我在搞投机，这个事对我的投机买卖是很有帮助的。这事当时确实对我有很大的诱惑。李对我说，上海各投机市场，各赌场，伪税务署的邵式军，贩卖鸦片的盛老三（即盛文颐，上海专事鸦片贩卖机构“宏济善堂”老板），都要担负一定的特工经费，而由特工总部负责他们的安全。

此外，李士群还同我谈到要组织一家东南贸易公司，把重庆等地需要的物资运到浙江富阳的场口（沦陷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交易地点），把上海需要的物资从场口运出，日本宪兵队已经同意给以采购和运输上的各种方便，以协助“76号”筹措特工经费。李表示希望我能负责主持此公司，并说明“76号”只要每月能够到手200万元就行，其

余都可由我分配。又说，这个事情好得很，万不可再错过机会，你不干，要干的人多着呢。后来果然有一个叫尤菊生的做了东南公司的总经理。据叶吉卿说，尤的家里很富有，花园洋房很大，妻妾有四五人。尤能唱京剧大面，曾在李宅上台客串，是上海名票，不知为什么会同李士群搞在一起。

李有一兵工厂，能在小型的式样灵巧的手枪上涂金并刻上受赠人姓名和李士群谨赠等字样，有资格作为受赠人的，也就是李拉股的对象，李就以拉其在兵工厂投资为名，大大捞了一票。周佛海、邵式军、盛老三等都是对象，都出钱过的。

每逢过年过节，有关部下，都有年敬节敬送李士群。我曾在李士群的写字台上看见伪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一个红封袋，写明节敬十万元。我又看到过一张李士群亲笔写的领条，写着“兹领到经费××××元（数目记不起来了），此致梅机关”，下面具名是梅之华。我才知道李的组织关系是属于梅机关的，并知道了李的假名。

李住大西路67号时，每次同别人会面，都经过周密的考虑。对刚从重庆出来的人，必从多方面研究对方行动的可能性，从最坏处设想，对方有几种可能可以对他进行暗杀；在各种被杀可能都被排除或妥为防范之后，他认为确实安全了，始与对方会面。他在很多约会中，常常失约不到，他要找人，经常出其不意，突然出现，使对方即使想加害于他，也措手不及。对于有些人，在初次会面时，则经过精心设计，以达到先声夺人之目的。李曾同我谈过收服陆连奎的情况。陆是当时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长，英租界的流氓头子，李和他第一次约会约在外滩华懋饭店见面，当陆一脚跨进约定房间后，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陆拎起电话，即听到李对他说：“陆先生，你已经到了。请稍等一下，我就来。”陆对于一进门就被发觉而打来电话这件事感到很惊奇。那次会谈很顺利，陆对李很迁就，李认为完全是电话之功。原来李在约定房间的对面另外开了一个房间，可以清楚地看到陆推门进去。李说：“这种流氓脑筋很简单，只要弄得他服贴，就会听从指挥的。”陆连奎同李士群勾结后，认敌为父，利用职权，帮助日军宪兵杀害中国爱国人士，后陆被暗杀于六马路中央饭店门口。

李平素常怀恐惧，怀疑随时随地都会有人杀害他，因之他每时每刻都要担心被人杀害并考虑如何防范，他的神经一直是紧张的。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我好像是绷紧了的弦线一样，一碰就会断的。”过不多久，这根绷紧了的弦线果真断了。但是他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他始终把我当做老朋友看待，有时喜欢同我谈说蹩脚时候的困苦情况，或则炫耀一下他的“力量”和“事业”的“成功”，藉以调剂精神。他还常常抽出时间来打儿圈麻将，或者逗逗孩子，其目的在于使过分紧张的神经暂时松弛一下。为防止被别的汉奸特务暗杀，李身上常带有一支手枪，他吹牛说他的枪法非常准，只要有枪在手，三五个人休想近身。其实他是不会打枪的。

他很会喝酒。怕别人在酒里放毒，他和别人喝酒时，会忽然持着对方的酒杯说：“你这酒是假的，是红茶，我同你换一杯喝。”他吃菜，一定等别人先吃了，他才吃，平常总是吃他自己家里特备的菜。有人送他整箱的洋酒、香烟等礼品，他总叫人把原箱在宽大的空屋里摆过24小时再进仓库，因他自己善于给别人送定时炸弹，而他认为定时炸弹经过24小时就没有危险了。

李士群阴险毒辣，藏而不露，甚至对妻子部下也都玩弄手段。李是一个杀人不怕血

腥气的恶魔，但他与人交往，却从无疾言厉色，对待部下很客气，有求必应，又是一个出名的怕老婆。这与他这个大特务的身份似乎很不相称，其实他自有其不可告人的打算。记得上海三大流氓之一张啸林被自己的私人保镖枪杀后，李曾对我说："这不是很奇怪吗？一个人竟会给自己的保镖打死！要是我，决不会让自己人开枪打自己的。"从这个目的出发，他就"宽以待下"。首先，他很会用钱，常常出其不意地送钱给他的部下，他的部下有困难，特别是那些小部下，只要能见到他，当面要求一下，他总会帮助解决的。他公开对部下说："到外面想办法是可以的（意谓抢夺绑票等等都可以），不过要弄得干净漂亮，不要给76号带来麻烦。"他认为这样做，就能够拉住他的部下了。也确实有其他汪伪机关里的小汉奸，因敬佩他的"慷慨"，找门路想卖身投靠于"76号"的，他也总是来者不拒，适当满足这些小汉奸的要求，同时充实自己的特务队伍。有些事情，他不能同意或不愿同意的，就推在叶吉卿的身上，让叶来反对或推翻，使别人只恨叶而不恨李。这就是他待人接物的手段。

他爱玩弄女人，当然是瞒着叶吉卿玩。玩过一次，他便不玩了。他认为这样玩既痛快，又安全。有的女人想盯住他，敲他一下，却因为他是出名的怕老婆，就不敢缠他了。

1940年秋，我从重庆回上海后同他见面，他对我讲了许多话。他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捉小鱼呢？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那边有很多有资历的人已经挤满了，这边随我高兴爬多高就多高。在重庆顶多赚几百块钱一月，你知道我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吗？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现在我有的是力量，你有什么呢？过去我们大讲要'爱国'、要'革命'，还要革世界的命呢，这不是笑话奇谈吗？不要以为潘三省、吴四宝他们是流氓，他们比你聪明得多。"他指指桌上的花瓶说："他们一进屋就能看到这一瓶花，这花是红的，叶是绿的，你却什么都弄不清楚，他们要使别人怕，别人就怕他们，他们要发财，就真的发了财。"他领我去看了他的电报间，有大型收发报机，确实相当大，占用了一个大房间，有不少人在工作。又领我在"76号"院里面走了一转，看到很多房子，并走进一幢办公的房子里去看了一下，是一所大楼房，有很多房间，很多人。李指着空地上停着的几十辆汽车，对我说："你算算看，光是这许多汽车值多少钱？"回到李自己工作的房间后，他指着桌上的一叠公文说："只要我提出，要中将少将都可以。张鲁已经是少将了（张鲁是我介绍给李士群的，李派张任"76号"大队长，后又派张任汪精卫的卫队长）。"那天天气很热，他把房间里的冷气机开了起来，得意地说："上海有几家公馆能有冷气设备呢？你能想到我会有这样的冷气机吗？"在那一天，他确实是踌躇满志，很有点飘飘然的样子。

在李的头脑中，政治上的一些调子，都不过是骗骗人的，他认为必须有钱，而要有钱必先有"实力"，这就是他的逻辑，也是他的目的和信仰。他对我说："钱最可恶也最可爱，没有钱就活不了，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过去为了营救谢云巢，一件皮袍子想当15元，跑进跑出，跑了多少当铺，说了多少好话，结果还是当了12元。现在我开口借200万，就没有人敢少我半只角子。我叫他们从极司菲尔路口爬到76号，没有一个人敢立起来走。这就是力量。"李本是一个穷光蛋，当上汉奸特务后，穷奢极侈，要啥有

啥，样样都是最讲究的，叉麻将，打牌九，输赢大得惊人。不过不赌则已，赌起来他一定是赢的，陪他赌钱的人，自有方法使他赢而不输。李每年都要给他自己、妻子、母亲做生日，每次做生日，都要唱几天戏，大摆酒席。他的高级部下可以吃酒看戏，演员都是名角名票，我曾在李宅戏台上看到过一些有名京剧角儿上演，据吴四宝说，是他托黄金荣拉来的。酒席总是赌场老板送来的，每次都是整百桌的送。在李宅最活跃的赌场老板叫朱顺林、王茂亭，都是沪西大赌场六国饭店的大老板。上海银行界的朱如山、中国银行副经理李祖赍、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伪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伪税务署署长邵式军等都是座上客。有时李宅也放映电影，都由张善琨供应。

1941年12月间，我去吃叶吉卿的生日酒，司席的人把我安排在“贵宾”席里，和不少日军头子同席。原来日军刚刚偷袭珍珠港成功，他们就把两件事并在一起做，在李宅摆起寿堂，收受礼物，为叶吉卿做寿，同时在“76号”摆酒演戏，邀请许多日军高级将领参加，“庆祝日本袭击珍珠港胜利”。日军一面吃酒，一面看戏，其中有一个极端侮辱女性的“脱脱舞”，引得台下日军怪声叫好。

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即进驻上海租界。在南京的汪伪汉奸，都想到上海抢地盘，以发展恶势力。据汪曼云对我说，南京下关车站临时戒严，许多汉奸伪官都被日军驻车站的宪兵曹长挡回去了，只有李士群闯了过来。原来李早有准备，事先准备好汪精卫向日军祝贺“慰问”的信件和一叠汪精卫的名片，当日军宪兵曹长要李下火车时，李就拿出汪的信件和名片对曹长说，你还是请示一下好，我是代表汪精卫主席到上海慰劳你们长官去的，你们不愿意接受汪精卫主席的慰劳，我就不到上海去了。结果只能让他坐车。汪曼云也作为李的随员跟到上海，接收了上海租界法院。

李士群的部下和走李门路的人，每年除送寿礼外，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前都要送礼。每逢春节或李自己的生日，李的比较高级的部下，都要到李的家里排班站立，请李出来接受祝贺，由张鲁高声大喊：“立正！向李部长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此时环顾左右，笑容满面，得意万分。然后由李邀请客人入席，饮酒看戏。李的部下，每年起码要送三次节礼，三次生日礼，送什么，送多少，很伤脑筋。只有我向不送礼，当然也不鞠躬，而李每逢大摆筵席，总要派车接我去看戏吃酒，并要拉我和他坐在一起谈谈，成为特殊的例外。李收受礼品，最欢迎的是现金、金首饰、金器皿、钻石、珠宝等，光是公开摆设出来的金盾，就有几十个，其他名贵的珠宝，几十克拉的钻石、钻镯、钻项圈之类，不计其数。李也喜欢做生意，什么生意都做，反正他做的生意，决不亏本。不过他做生意，一定要做独资老板，拼股起码五成半，所以我的生意里就不能有他的拼股。他做生意有种种便利，处处赚钱。他有一家东南贸易公司，专门在上海、杭州、富阳的场口之间运输和买卖物资，范围很大。李有了很多钱，就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购置房地产，几年之间，李士群搜刮所得，数字是很惊人的。李追求金钱，追求权力，漫无限制，他曾经说：“一切决定于力量，有了力量，日本人用得着，将来蒋介石也用得着，力量就是本钱，蒋介石来了，可以同他讨价还价，不怕他不买我的账。”他不断搜刮金钱，不断充实和扩充他的所谓“力量”，据说他拥有远远超过日军所许可范围的特务名额和军火，甚至有他自己的兵工厂，这都是日本人所最忌的，可能也是日本人决心杀死他的原因。

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浙江省遂昌县人，长李三岁，杭州省立女子中学毕业，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后参加“76号”特工总部掌握财务，是李士群的主要帮凶。其为人狠毒泼辣，为李的部下所惧怕，连吴四宝也怕她，吴四宝看上了一个舞女，给她在外边租小房子，实行姘居，吴的妻子佘爱珍知道后同吴吵闹，吴恼羞成怒，反而大发脾气，拔出手枪。佘爱珍逃到李宅求救于叶吉卿，叶就点起两支人马，一支是“76号”警卫队，荷枪实弹；一支是临时组织的汉奸家属妇女，手执木棍，开向吴的小房子。那个舞女早已闻风逃避，叶叫警卫队把小房子前后门和弄堂通道都封锁了，叫佘爱珍率领所有妇女进入房子，把窗门玻璃等打得稀烂，把洴俱摆饰、衣物统统搬走。叶吉卿对吴四宝说：“我这是代表组织要你安全，你在外面搞小房子很容易出危险，组织有权禁止你。”吴在叶的雌威下，竟不敢反抗。佘爱珍原是上海出名的白相人嫂嫂，对叶吉卿唯命是从，叶的罪恶行为，佘爱珍总是参加的，但有一件事却不敢让叶知道。原来中国银行副经理李祖赍献计，说有一大钻石手镯在银行押款，久未取赎，此时法币大跌，李劝佘以非常便宜的钞票“赎”了出来，此手镯中间是翡翠，四周镶以钻石，很名贵，赎出后，佘从不戴在手上，且不许别人谈起此事，深怕叶吉卿得知后要此镯来看一看，看了不还，佘就没有办法了。抗战胜利后，叶吉卿、佘爱珍皆入狱。

李有二子一女，长子小宝，学名李闻苏，次子小群，学名李凯苏，女孩小名妹妹，学名李秀扬。李对他的儿女宠爱纵容得不得了，1943年他的大孩子13岁时，就有一辆专用的别克大轿车，还养了不少洋狗，给狗造成的狗舍，比普通人住的房子还要考究得多。有一次李小宝到静安寺路一家店铺借用电话，这家店铺不肯借，冲突了几句，李小宝立即带领大批“76号”特务到这家店铺大打出手。李士群对儿子的种种胡作非为，采取放任包庇的态度。他对我说：“我辛辛苦苦拼命为什么呢？无非是让我的老婆多积点钞票，让我的儿子快活些。”以致李小宝后来变得很残酷，常和潘达的儿子比赛汽枪，却把附近邻居的窗户作为靶子，把邻居的玻璃窗都打破了，邻居敢怒而不敢言。李小宝还经常在外边寻事吵架，成为沪西的小霸王。

1943年9月李士群死后，曾在上海大出殡，几百名流氓、小偷、瘪三，和“76号”的汉奸特务喽罗组成送葬的行列，把李的棺材送到万国公墓。抗战胜利后，上海民众把李的坟墓掘掉了。

（1964年）

李士群被毒毙内幕

林涵之

日伪时期大汉奸李士群之被毒毙①，笔者曾亲耳听到参与其事者熊剑东妻子唐逸君的详述，颇可一记。

李士群先后任过伪警政部政务次长、特工总部主任、政治警察署署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以及江苏省省长等伪职，而使他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职位，则是伪特工总部主任。

在日伪时期，上海人提到"76号"，就会毛骨悚然，谈虎色变。其时凡有什么人突然失踪或被暗杀，首先被人想到的，就是"76号"。有时，"76号"竟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启事，声明"某杀人案与本号无关"，故社会舆论哗然，认为"76号"就涉及杀人之事，可以算是一家"黑店"。所谓"76号"，是指当时沪西极司菲尔路的76号门牌，李士群的特工总部就设在那里。除了门牌，门口不挂任何招牌，"76号"也就成了特工总部的代号。

汪伪集团中，有些人的官位看来很大，其实只是一个闲职，例如伪铁道部长，竟连南京城内的小铁路也管不着，全部由日本军部掌握。李士群官位不大，但却是实力派，操纵着生杀大权。在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刚开始，汪还未从河内到上海时，丁默邨（日汪另一个大特务）和李士群已先与日本陆军军部挂上了钩，从军部得到特务经费和枪枝弹药，专门对付抗日志士和共产党。汪精卫鉴于曾仲鸣在河内被刺殒命，故一到上海，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此时，日方向周佛海推荐李士群负责保卫工作。李通过周的引见，立即被汪赏识，并逐步成为汪伪集团中的红人。

然而，正当李士群得意忘形时，却突然在伪江苏省长任上被毒暴亡。李是1943年1月20日被特任为伪江苏省省长的，同年9月6日即中毒得病，延至9日身亡，任职还不到一年，死时38岁。李被毒死，汪精卫深为震动，立即派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去苏州，为李治丧，并带去黄金图章等，作为殉葬品。10月13日，伪国民政府还为李士群举行公祭。汪精卫为李墓碑亲自撰文，称李"才足以济世，而天不永其年"云云。

谋杀李士群的究竟是谁呢？传说纷纭，莫衷一是。社会上的流传，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宪兵队所为；一是大汉奸罗君强、熊剑东与此案有关。李死后，社会上还盛传，李的亲信咬牙切齿，扬言组织"复仇团"，向凶犯还击。罗君强和熊剑东也确实在事后加强了戒备，以防万一。罗住淮海西路汶林路口，熊住江苏路吕希纳路，都偏沪西，而他们每天要去南市陆家浜路伪税警总团部办公（当时在南市设有伪中央税警学

---

① 关于李士群被谁毒死之具体情况，说法不一，此文为一说。

校，周佛海任校长，罗任教育长，熊是副教育长；又设伪税警总团司令部，罗是总团长，熊为副总团长。后来，罗去安徽任伪省长，就由熊任教育长兼总团长，笔者当时即在该处任职）。他们出入本来轻车简从，但李士群死后，就增加警卫，座车前后都有警备车。但这种戒备森严的措施为时不久，因为一则过于招摇，二则示人以目标，反不利于安全；再则，此举更显得做贼心虚，不打自招了。

那么，凶手是否就是罗君强或熊剑东呢？熊剑东是肯定的。此案牵涉甚广，说来话长。

李士群的确是在一次宴会上中毒的。据我所知，那天亲手下毒药的，就是熊剑东的妻子唐逸君，参预其谋者，有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冈村夫妇。熊剑东和李士群本无不共戴天的私仇，只是奉命杀人，幕后有周佛海的指示，还直接按重庆戴笠的密令行事。

李士群与周佛海的关系原本不坏。如前所述，李受汪赏识，其始就是由周引荐的。汪伪政府成立之初，成立伪警政部，周兼部长，李任次长，是上司下属的关系。但客观情况在不断变化，后来李士群的权势日重，对周就不大买账，渐渐飞扬跋扈，俨然要与周分庭抗礼。当时，以汪精卫为中心的所谓“公馆派”和以周佛海为首的“周派”，内部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李士群倒在汪一边，是“公馆派”的主将，这在周佛海看来，李就无异是“叛徒”。

周佛海架设电台，一直和重庆方面秘密往来，通过戴笠，直达蒋介石，企图掌握全部沦陷区的权力。所谓税警总团，名义上隶属伪财政部，实则是周依为心腹的一支私人武装。周、罗、熊三人结为一体，是重庆蒋介石和戴笠所默许的（日本刚宣布投降，上海这支周的部队就立即改为国民党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派周为总指挥，罗君强和熊剑东为副总指挥）。但李士群的野心也极大，养精蓄锐，积聚武装，千方百计要拆周的台。李知道罗君强是周的死党，无可动摇，而且罗是个假军人，只是文官，故作用不大；唯熊剑东却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是个货真价实的军人，如能拉拢熊，无异斩断周的手臂。因此，李多方研究，想把熊拉过去。当时，表面上李、熊是严重对立的，但却暗中通过日本宪兵司令部，想方设法，企图调解彼此间的矛盾。日方内部也不统一：有军部的意见，有兴亚院的意见；军部中还有陆军和海军的不协调，可算得戏中有戏，矛盾重重。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大汉奸们就各显神通，互相对抗，周有周的后台，李也有李的靠山。李要拆周的台，也是得到日方军部中一派支持的。因此，这种权力之争也直接反映了日方对华政策的动荡不定。有一次，李在有日方支持的场合下，劝熊脱离“周派”，并明白表示，愿负责向汪保举熊为国防部长。熊当场表示基本上同意，但有些细节须考虑后再行商谈。过了不久，就由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冈村出面，邀请李、熊进行“商谈”，而正是这一次，一场震惊汪伪集团的阴谋就此萌发了。

这里还须先讲一下冈村和熊剑东的关系，这是全案的关键。熊剑东原名熊靖宇，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时，结识了一个日本同学，十分莫逆，这就是冈村。抗战初期，熊在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总队长康泽领导下，任淞沪特遣支队长。迨国民党军队西撤，熊留下兼任昆山、嘉定、太仓、松江、青浦、常熟六县游击司令。1939 年 3 月，熊到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扩大联席会议时，被日军宪兵逮捕。事发之后，日本《读卖新闻》以

头版头条新闻详细报道了熊的详细情况和被捕经过，并刊载了熊的半身四寸照片。此事引起了在东京宪兵总部工作的冈村的注意，经过调查，知道熊剑东就是当年的好友熊靖宇。于是，冈村利用职权多方庇护，又经种种曲折，终于将熊由日本驻华宪兵总司令部提往东京审讯，这才避免了上海日本宪兵总部欲置熊于死地的危险。后来熊被释放，遣返中国，从东京直去汉口，组织所谓“黄卫军”。其时，冈村也已派到中国任汉口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一年之后，冈村调来上海任特高课长，熊就一起来沪，直至抗战胜利，熊和冈村一直未再离开过。熊在上海掌握着伪税警总团和伪保安司令部的权力，凡与日本方面打交道，因有冈村为后台，故事事通顺。别人往往不明白熊何以如此路路亨通，实则主要是依靠冈村的势力。

熊与周佛海并非真有生死之交，但当时周与重庆一直保持秘密联系，而熊与军统的关系也一直没有断过。熊受任伪职，都是经过戴笠批准的，是军统安排在汪伪集团中的所谓“地下工作者”。所以，抗战胜利，汉奸纷纷被捕，唯独熊受到国民党军委会的明令嘉奖。熊与周在那时观点一致，利害相同，周要重用熊，熊也要利用周。李士群之力图拉熊倒周，完全是一时糊涂，打错算盘。李万万没有料到，当熊假意表示合作之时，周和熊都已接到戴笠的密令，要其迅速结果李的性命。

至此，事情已经清楚：李士群之死，是军统戴笠的命令，交付周佛海和熊剑东执行的。直接行动的是熊剑东，参与其事的是熊妻唐逸君和日本人冈村夫妇。

至于这个谋杀案的具体情况，实际上已无关大体，但却总为人们所乐闻。当时有各种传说。有人讲，日期是1943年9月6日，地点是百老汇大厦，参预宴会者有冈村夫妇、熊剑东夫妇、李士群和夏仲明（李的得力助手兼翻译），还有原属梅机关的两个日本人。李平时很少参加宴会，即使赴宴也不吃东西。席间大家举杯劝酒，李虽也频频举杯，但却滴酒不入，菜一道也没有尝。最后上桌的是冰冻水果，时值夏令，李乃稍稍进食一二匙，而毒药即在水果内。当时无所感觉，席散回苏州后病发，腹中剧痛，医师抢救无效，延至9日，痛极而死。这是一说。

还有人讲，李的中毒是吃了一块糕点。当时酒阑，已近散席，冈村夫人手托瓷盘，中置两客糕点，跪而敬上。这是日本妇人待客的最高礼节，如果不受，即是对主人的不敬。李起初犹豫，但冈村夫人跪地不起，并拿一块自己先吃，然后再次劝进。李不便再拒，就取之咬了一口。岂知先一块无毒，后一块剧毒。这是另一说。

据我所知，这些说法都似是而非。日期确是1943年9月6日，地点则是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冈村的家里。那天是冈村夫人亲手做的日本菜宴客。李士群平时老是暗算别人，当然也谨防别人暗算他，故平时对任何宴会都不参加（如果那一天是熊剑东在家请客，李就不会去）。但李虽搞特工，竟对熊剑东和冈村过去的密切关系了解不深，认为日本高级人员在家里请客，不至于会出问题。但李仍托辞胃纳不佳，自始至终未尝一菜，主人也不相强，这就使李放松了警惕。最终一道是咖啡，在李的一杯咖啡中，就由熊剑东妻子唐逸君亲自放入烈性的败血性细菌。献上咖啡之后，主人若无其事，轻描淡写地对李说：“既不食荤腥，咖啡请进一点。”李情面难却，就呷了一口，想不到偏偏问题就出在这里。

一口咖啡毒死李士群，这是我亲耳听唐逸君讲的。她讲了当时冈村夫妇如何配合，

她如何亲手下毒的经过。一个盘子里放着两杯咖啡：一杯给李士群，一杯是给熊剑东的。因为这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故送上时万万不能搞错。万一弄错，谋杀李士群就会变成谋杀亲夫。唐说，当时她的精神是万分紧张的。她讲的绘声绘色，听者也为之捏一把汗。

李士群一死，日本驻江苏的小林部队和周佛海，按早已密谋的安排，表面上隆重吊唁，实则立刻用武装部队包围李的特工站和军械厂，进行缴械。当时，李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各地，均设有特务机关，武装力量极强，日、周防其哗变，故采取了斩草除根的办法。

当年，笔者在伪税警学校和税警总团部的办公厅工作，熊剑东家我是常客，但谋杀李士群是绝密的，其时我一无所知。我曾以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询问熊剑东，但熊矢口否认。直到抗战胜利，熊亡故后，事过境迁，乃在一次闲谈之中，唐逸君谈出了这段往事。

附注：

①熊剑东：日本投降后，其伪军被戴笠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1946 年 6 月，熊被人民解放军击毙于苏北。

②罗君强：日本投降后入狱。上海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市监狱服刑。60 年代病死狱中。

（沈立行整理，1983 年）

缪斌赴日内幕及其致死原因

何 国 涛*

汪伪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于1945年三四月间，奉何应钦密令前往东京，向敌酋小矶求和一事，是我亲自听缪斌谈过的，以后又经多方证实，确有其事，因草此文，以揭示国民党政府“媚敌求和”的真相。

一

缪斌，字弼丞，号丕成，江苏无锡人。北伐战争时，缪任东征军总指挥部军需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甚得蒋介石重视。钮永建主持江苏省政，缪由宋美龄推荐，谋得江苏省民政厅长肥缺，弹冠上任，以江苏所属各县县长之缺分席出项，从中诈取运动费饱入私囊，发了一笔贪污财。其他方面也多方搜括，声名狼藉。因此有人向蒋介石告御状，蒋见无法包庇，缪遂丢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在北平组织了以王克敏为首的汉奸政府，缪斌也被搜罗在内，任华北的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南北汉奸合流后，缪斌历任汪伪立法院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但在抗战末期，缪逆经常住在上海，看来是另有秘密任务的。

笔者和缪斌相识，是通过陈孚木的介绍，时间在1944年冬和1945年春天。陈孚木当时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还出版了一本杂志，由韦乃伦担任编辑。我常和韦乃伦见面，以后又经常在南洋商业银行见到陈孚木。有一天，陈叫我去见缪斌，因此和缪斌有过一段交往，从中知道这个老牌汉奸正热衷于“和平谈判”，他认为战争拖延下去，必然两败俱伤，早日结束战争，尚能保存一部分实力。我问他是否到南京去办公，他说：“除了开会，我是不常去的。”他又向我暗示：他在汪伪政府里只是挂了一个空头的考试院副院长名义，其实诸事概不过问。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虽于1945年9月下旬发动了缉奸工作，可是雷大雨小，进行极慢。其原因颇为简单，在“曲线救国”的方针下，“渝蒋”和“汪伪”早已默

---

* 作者曾任上海伪《中华日报》编撰、伪《青年日报》主笔，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工作人员。

契，沆瀣一气。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员忙于“接收”，大小汉奸各走门路，由民族败类摇身一变而为四大家族服务的大有人在。笔者当时也以记者的身份被罗致到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第二处，调查敌伪的隐藏逆产，于此可见一斑。当时《新华日报》大声疾呼，发出严惩战犯和立即逮捕汉奸的号召，社会人士普遍响应，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出于无奈法办了一批汉奸。

有一天，我在第三方面军看到一本用复写纸拷贝的漏网汉奸的名册，里面也有缪斌的名字，但在备注栏内，却注着“暂缓执行”四字，可见此中大有文章。我就在这天下午到缪公馆去探听动静。

我到缪寓时，缪斌身穿便服足履拖鞋下楼见我。察情观色，缪公馆里虽显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但主人公隐露得意之形，看不出倒霉的样子。寒暄数语后，我即单刀直入地问：“缪先生近来可跟重庆来的朋友见过面?”他笑了一下，说：“钱大钧曾来过电话，到他公馆去过一次，别的地方不大去。”接着，话题从陈公博谈到周佛海。其时国民党政府因迫于舆论，无法包庇周佛海、罗君强诸逆，已把他们软禁起来。缪斌谈到周佛海时，似有兔死狐悲之慨，情绪略为愣了一下，但随即又趋于平静了。他为了想在我面前显示他不同于汪伪诸逆，突然向我问道：“足下是新闻记者，可知佐藤事件的经过?”我摇摇头说：“不知。”接着他说：“今年三四月间，日本东京到了个化名佐藤的中国人，是奉了委员长（指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去谈和的。他带着重庆方面的谈和条件，会见日本首相小矶。小矶首相接见了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日本方面，对委员长提出的各项条件都能答应，只是对收回东北一项坚持不肯。这次谈判虽经双方多次让步，就因东北问题不能解决，谈判也就搁浅。这就是东京外交界传说纷纭的所谓佐藤事件。”我问：“那个化名佐藤的中国人是谁?”缪斌笑而不答，他对我打了个谜语：“远在天边……”我立即意识到缪斌这样“团团转”式的介绍“佐藤”，分明是“夫子自道”了。我说：“那么，‘佐藤’一定是缪先生了。”缪斌这一回笑得非常得意，显得自己与众不同似的。

他点一点头，又向我补充着作自我吹嘘：“我所以不常到南京去办公，其原因就在于此。我的直接上司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我家里有一架电台，随时可以和重庆直接通电。他们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对日谈和。假使4月间这次和谈能水到渠成，那我今日的处境就又当别论了!”至此我才明白了汉奸名单上的缪斌能“安然无恙”的原因。

三

然而，事有出于意外者，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公开审判陈公博、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陈璧君等一批大汉奸，苏州高等法院的特刑庭突然逮捕了自命为“和谈功臣”的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事有更出于意外者，缪斌被捕以后，立即开庭审判，草草赴刑场执行枪决，报上还刊出缪斌被正法后的照片。

在汪伪汉奸政权的部长级以上的几个大汉奸中，缪斌是最后归案法办而又最早明刑枪决的一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抗战胜利后，麦克阿瑟总部进驻东京，有人向美军总部反映“佐藤事件”的经过。美军总部从东京打个电报，通知美国驻华大

使馆，向蒋介石政府提出查问。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蒋同盟抗日。蒋介石秘密指使缪斌改姓换名，偷偷摸摸地潜入东京向小矶求和，是瞒着美国人暗中进行的。这些勾当，到底说出来不大体面。当美国大使馆查问缪斌的下落时，蒋介石一面极力抵赖此事，一面立即下令逮捕了缪斌，并且迫不及待地枪决了缪斌，好来个死无对证。

这段秘闻，笔者最初得知于一个自东京回国的李屋之口，后听《大众月刊》主办者钱须弥所说类同。这样，缪斌于抗战胜利初期得以逍遥法外，最后却又突遭逮捕，接着是草草判刑，急急正法，分明是为了灭口。

据说，缪斌在苏州高等法院受审，虽然没有当众宣布他曾奉蒋命去东京求和，但他口口声声说奉何应钦之命在沦陷区进行策反工作，曾托友人送一幅“苏武牧羊图”给何应钦表示心迹，当法院判决死刑时，有一记者问他是否要上诉，他毫不思索地回答：“当然要上诉。”并和他家属商量如何向最高法院提出有利证词。

苏州高等法院于1946年4月9日判处缪斌死刑后，经当事人提出不服上诉，复经最高法院驳复不准，于1946年5月21日把大汉奸缪斌明刑枪决。应该指出引起注意的，缪斌是在汪伪大汉奸中第一个判死刑而又是第一个被执行枪决的人。当时的《新闻报》曾以“巨奸伏法第一人”作为标题于第一版刊出此项新闻。

当缪斌绑赴刑场时，监斩官问他有否遗言，他要求取过笔墨，题诗一首：“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当这首诗在报上发表时，记者说是汉奸舞文弄墨的无聊之作。但在抗战胜利后的当时，缪斌临刑以“和平神”自号，这其中大有文章。在他看来，奉蒋命去求和，并不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行为，而是忠于蒋氏王朝的“爱国”行为。

缪斌为什么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蒋介石的“和谈使节”呢？他知道拉破脸面，于蒋脸上固然不光彩，自己也决不会有丝毫好处。他口口声声在法庭上提出“奉命策反”，希望能得到蒋的“恩赦”。然而他的想法是落空了，最后只好吟诗寄愤，这首诗不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写给蒋介石、何应钦等与缪斌干着不可告人勾当的人看的。

（1962年）

汪伪特务头子黄自强

傅大兴*

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汪伪政权为了配合日军作战，首先将伪军事委员会改组为战时体制①，以刘郁芬为总参谋长，黄自强任参谋次长兼总务厅长。我原名傅振邦，任总务厅会计科长，同年秋黄自强调任伪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总监②，我随黄任总监公署会计科长。1943年黄自强任伪军委会政治部长，我任总务处副处长。1945年3月黄任伪江西省长，我任财政厅长，故对黄自强的一生知之较详，特追述如下。

一

黄自强原名黄育山，号嵩坡，台湾人，冒充福建闽侯原籍，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黄因精通日语，且对课程用功，故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期毕业考试时，得以名列第一。

黄自强1929年毕业回国，初在国民党军任职。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黄自强曾被蒋介石派遣去津，刺探冯阎军事情报，因事机不密，致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捕获。同黄自强在日本同过学追随傅作义多年的李大超当时适任天津警备司令部上校科长，他认得黄自强，便笑着对黄说，原来是你小子。黄连说不要开玩笑了，快想个法子救我出去吧。后李在傅的面前百般营救，黄始获释放。当其南返时，并未与李见面，故李不知当时黄自强在蒋介石那里任什么职务和负有什么任务。

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得胜利，黄被任为南京炮兵学校上校教官，炮兵学校教育长项致庄对黄颇为倚重。有一天黄率学生去校外演习，因乘骑不慎，摔伤右腿，虽医治经年，仍留有残疾，黄过去野心极大，受此挫折，自认政治生命中断，心灰意懒，无心上进，后与立法院女职员朱蕙英结婚。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黄以腿疾滞留苏北，乃往依国民党游击部队杨仲华部任参谋长（杨字岳辉，亦日本士官学校二十期毕业）。当时国民党残兵败将云集苏北扬州一带，有的已为日军改编为皇协军，有的虽打着抗日旗帜，暗中却又与日军勾勾搭搭。这

---

* 作者当时系汪伪政治部总务处副处长、汪伪江西省财政厅厅长。

① 1942年8月，汪伪军事委员会下设之办公厅及第一、二、三厅撤销，设总参谋长、次长、总务厅和陆军编练总监公署。1943年10月29日，撤销陆军编练总监公署，另设政治部和航空司。

② 据档案记载，黄自强调任伪陆军编练总监的时间应为1943年4月7日，同年10月29日任新设立之伪政治部部长。作者所记时间有误。

些破烂部队大多人枪不足，装备极差，士气萎靡，纪律荡然。

二

1940年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汪精卫认为武力是政治上最重要的本钱，故在所谓“还都”以后积极点编伪军。驻防苏北的李长江部被编为第一集团军，李任总司令；杨仲华部改编为第二集团军，杨任总司令。黄因与汪有师生之谊，与日本最高顾问部今井大佐也有师生关系（今井大佐过去是日本士官学校二十期战术教官），乃弃杨而去南京活动。

黄自强到了南京，经今井向汪推荐，被任为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主任。到差不过三天，今井首先不满，他曾对汪说，应当叫黄自强独当一面，多负一些责任，不应屈居人下。不过，当时办公厅主任杨揆一也是日本士官学校老牌学生，后台老板是冈村宁次；副主任邹敬芳，本在英国专攻经济，是周佛海的同乡，他在伪军委会，不过是周摆下的棋子，以为他的耳目。这一次汪精卫为了敷衍日本人的情面，忙将邹敬芳调任伪行政院参事厅长，所遗之缺由黄升充。从此伪军委会与日本顾问部之间的联系，均由黄自强一手包办，因而与汪日渐接近。

按黄在汪政权军事汉奸中是后起，而参加所谓“和平运动”又较晚，为了争取汪的信任，他和郝鹏举、张岚峰结成三角联盟，在汪的左右互相吹捧。当时，他和郝鹏举都外示勤奋，在私生活方面，更装得一派正经。他以“不用私人，不要钱，不纳妾，不赌博，不吸烟”为其居官“五戒”，狠狠攻击前办公厅主任杨揆一任用其舅爷当会计科长。我是1939年投靠汪伪的，后经汪手批分发伪军委会任用。这时，我是会计科上校主任科员代理少将科长，是属于杨揆一的人，当时因病不愿随杨去湖北。黄自强约我当他的会计科长，以此说明其“不用私人”，在这样情况下，我便成了他的活广告。

三

1941年冬，黄任伪军委会总务厅长时，原国民党炮兵学校教育长项致庄正沦落上海，生活无着，项早有投汪之意，不过尚少关系，因黄与项私交甚厚，就在汪的面前竭力吹嘘，汪始派黄到上海约项充任参谋次长。黄到了上海后，项正从菜市买菜回家，经黄资助得能到南京供职，项由落魄而致身幕僚，皆黄一人之力①。那知项当了参谋次长后，竟对黄端起老上司架子，使黄难以迁就，大有悔不当初之意。后来项被发表为伪浙江省长，居然跑到黄的前头，使黄更感不满，过去黄总是替项鼓吹，如今再不谈项致庄三个字了。

1942年秋，黄自强调任伪陆军编练总监②，这个编练总监的职权包括整编和训练伪

① 项致庄出任伪职系由周佛海推荐，这在周佛海的日记中亦有记载；项始任职务为伪军委会参谋次长兼总务厅厅长，时间是1943年4月7日。

② 黄调任伪陆军编练总监的时间应为1943年4月7日。

军。不过此时，汪伪军队已经编成以下几个单位：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七个师；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辖五个师；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辖五个师；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辖五个师；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辖五个师；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辖五个师；第七方面军总司令郝鹏举，辖五个师，另外广州“绥靖”公署有五个师，武汉“绥靖”公署两个师，九江“绥靖”公署一个师，伪中央还有警卫师三个师，总计伪军大约为50万人。

至于伪军训练方面，伪中央有陆军军官军校和郝鹏举任教育长的陆军将校训练团，经理总监部有经理训练班，陆军部有军医训练班，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有个军官教导团，由黄兼任团长，该团主要任务负责分期轮流训练伪军下级军官，施以六个月短期训练，盖上伪中央一个烙印罢了。所以当时有人说，陆军编练总监公署这个衙门，形同秋后纨扇，用处不大了。

1942年间，汪精卫曾在北平“视察”，黄自强是随员之一，与汪同住在北平南河沿翠明庄。适遇一江湖相士说黄鼻梁太凹，如果凸了起来，马上便可升迁。黄很迷信相术，这次随汪返回南京后，告了两个星期假，匆匆去沪治疗。他住在美容医院，经过手术，将鼻梁处垫了一块橡皮，鼻子立时凸了许多，好像一个外国人，全编练总监公署人员几乎都不认识他了。不过这个手术却留有后遗症，遇到阴天下雨，黄即感到鼻痛。外界有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作“橡皮鼻子钢丝腿”，真是太恰当了。

1943年9月间，汪伪特务头子、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被毒死，李的老婆叶吉卿由苏州到南京报丧，见了汪精卫放声大哭，并口口声声要汪给她丈夫报仇，汪以事关日本人干的勾当，不敢加以追究，仅对李士群身后优加抚恤而已。

正当此时，李士群手下特务一时群情汹汹，蠢蠢思动，汪精卫恐怕惹下大祸，急召黄自强至其私邸，当面发表把调查统计部改组为政治部，以黄为政治部长，黄以武人不谙特务工作力辞。汪说：你只管替我看着他们不要惹祸就行了。黄始表示唯命是听。

黄自强当了伪政治部长，在其住宅召开了一次政治部筹备会议，实际就是一次分赃会议，决定政治部以下设政治保卫局和情报局，以及秘书室、报导室、参事室、总务处、警卫大队部等几个单位，其人选均由原陆军编练总监公署原班人马担任：情报局长邬其宏①、副局长瞿正之，秘书室主任徐向宸，报导室主任李孝诚，参事室首席参事王铁樑，总务处长沙明如，副处长傅振邦，警卫大队长陈志行。政治保卫局组织庞大，由特务头子万里浪为局长，胡均鹤为副局长，以下又设有分局、支局、分站、支站等等机构。此外还有无线电总站、研究室、感化院三个独立单位，其人员都不予更换。

政治部筹备会议结束，万、胡两人感到相当满意。因他们两人的职权在这次改组中不但没有削弱，相反倒比以前扩大，所谓调查统计部改组为政治部者，只不过换换招牌而已，黄自强的政治部，不过是在政治保卫局头上加上一顶帽子罢了。

黄自强当了部长后，在争夺特务领导权上与万里浪、胡均鹤不断发生明争暗斗，而其个人私生活，更是日趋腐化。他一向标榜的“居官五戒”，除不吸鸦片外，其余的都犯了戒条。他不但任用私人，且私人中有老爷派和太太派之分。老爷派又分化出黄埔派

---

① 应为赵一雪。

和士官派，各派之间，在政治部内互相倾轧，各不相让。有一次，政治部在国府路梁园饭庄举行一个宴会，因为时间尚早，酒筵尚未摆下，属于太太派中的少将参事林立，当着众人说：我姓林的也是一个老革命党了，我过去是和谭延闿一起搞革命的，想不到现在倒有人压在我的头上。林立的话还未说完，首席参事王铁铁举手就打了林立一个耳光，林立正待还手，不料他的狐皮袍子早被王铁铁揪住，于是打得林立围着桌子乱转，幸黄自强到场，林立刻抱头逃去。像这样的丑事，在政治部屡屡发生。

黄本有老婆朱蕙英，此时又纳了南京金粉酒家女侍徐淑英为妾。淑英有弟徐彬，固一无赖子弟，黄自强却说他有天才，是特务中的后起之秀，升迁徐彬为政治部的情报专员。黄还替徐彬拟了一个化名叫“长风”，盖取长风破“万里浪”之意。由此看出，黄的内心是恨透了万里浪。政治部每月有一笔工作费，黄在一个月中总要下几回条子，不是发给徐彬机密费若干，就是发给徐彬旅费若干，据会计科统计，政治部每月的工作费，仅徐彬一人支去的约30%以上。

黄在搞钱方面，又使我追溯到前伪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杨揆一。杨是个硬赃官，虽然他那要钱的手伸得很远，但在外观上却保持一付尊严的样子，真是言不及私。替他搞钱的人就只好体会他的意图办事。彼此不能明说，只是心照不宣。这个老官僚搞钱办法，可谓相当老练。黄自强当了总务厅长后，虽然也是搂钱的，却一反杨揆一的所为，概括地说，黄可称是个软赃官，这种人比起硬赃官还难应付。起始我对杨揆一的搞钱，具有一套经验，但这一套经验对黄自强却用不上。黄自强是要钱的，你给他搞钱或多或少，一点也不能瞒他，他必须问得明明白白，然后装入腰包，有的时候还必须得到他的允许，才敢放手去做。例如：他在伪陆军编练总监任内，伪财政部曾拨给我们“联银券”100万元，用以“点验”华北伪军之用，这笔款一直存在徐州联合银行，许久未有动用，当时我就建议黄自强利用这项巨款到天津充分利用一下，而黄始终犹豫不决，以致放过这个机会。1943年伪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撤销，我将这笔款项带到伪政治部，黄始令我运用，不过这时“联银券”贬值了，不值得再去天津，我便在徐州给他搞了几次粮食生意，利润还不小。除此以外，我知道黄自强是有一个人就利用一个人，政治部参事室参事林立，本是搞木炭生意的，这时南京汽车都改成木炭汽车，黄自强通过日本顾问部许可，在安庆采购木炭运南京销售，名义上是给政治部采购，骨子里是黄的走私买卖。情报局瞿正之去广东也是鬼鬼祟祟的。伪军委会组织了一个去印度尼西亚的“考察团”，团长是廉雪海，黄也插手其间，带回大批钻石，获利不少。政治部有一笔特工基金2000万元，黄自强曾令沙明如和我每人1000万当本钱做生意，因此我们两人开展了竞争比赛，深怕赚的钱少。又有一次，他以政治部“视察”武汉为名，派瞿正之和我两人乘坐汪精卫专机“建国号”，携带黄金500条到汉口去卖。据黄自强说：这批黄金都是从郝鹏举、杨仲华那里借来的。我们这次黄金走私，获利极厚，可是在汉口日军监视下，大宗现款不能从银行运回，最后还是我找到伪湖北省长杨揆一，瞿正之找了伪汉口商会会长涂拔成，好歹才将款子调回。但没料到，此时京沪金价奇涨，我们的钞票虽多，却买不进原来数目，幸亏瞿正之赶到上海扒进，算是没有赔钱。

四

黄自强继李士群之后而成为汪伪特务头子，于是乎各方面的特务，无不奔走于其门下，军统特务、曾经预谋刺杀伪满皇帝溥仪的程克祥，华北日军特务、当过天津社会局长的蓝振德，这时都是政治部的少将专员，往来京沪之间，活动频繁；青帮头子、前张宗昌部下第四军军长顾震，更是政治部的高等顾问。顾经常显示他的党羽很多，潜伏势力挺大。顾曾建议黄自强利用他的青帮势力，渗入特务系统，最后以帮会而领导特工，黄对顾之建议，极表赞同，因此曾有一度盛传伪政治部次长杨振更换为顾震之说，嗣因各方面都对顾不满，一致认为“震不如振”，此说始被搁置。

伪政治部附属机关中有个“感化院”，该院院长鲍君甫，本是一个老牌特务，黄自强受了顾震怂恿，忽然下令将鲍免职，遗缺委了顾的私人接替。据我了解，“感化院”也就是变相的集中营。该院“感化”的对象，主要是国共两党的党员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这个院经常“感化”的人数，总在400人左右，他们都受到非人的待遇，吃不饱，穿不暖，个个骨瘦如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南京市副市长马元放，就是刚从“感化院”放出来的。

政治部淮海分局本应由万里浪派人，黄启强听了顾震的话，令他的小舅于徐彬当了局长[①]，惹得万里浪大为不满。偏偏徐彬到了徐州，为非作歹，民怨沸腾，伪淮海省长郝鹏举为了此事，前往南京，当面要求黄自强将徐彬调回，否则将以武力驱逐。

以上两项人事调动以后，黄又下令“点编”伪政治保卫局所属各分局警卫队，规定尔后政治保卫局警卫队，完全改由政治部警卫大队长陈志行直接指挥。以上这一连串措施，使得李士群手下特务人人自危，尤其万里浪、胡均鹤两人更感不安，他们秘密研究应付办法，果然为时不久，即发生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黄与万里浪交恶后，首席参事王铁铁有一天与黄同乘汽车前往政治部，不料行至中山门，突遇刺客持枪迎击，幸黄的汽车系保险车，未能命中，后王铁铁从车中打出两枪，刺客始仓皇逃去。

一是黄自强去上海，与其妻朱蕙英同住在华懋饭店，有一天连续接到恐吓信两封，都是限黄三日内离开上海，否则将以炸弹相赠。

另外还有一次是特务头子陈恭澍汽车夫枪杀研究室主任余余被捕后供称：他是重庆军统特务打入陈恭澍住宅的，他行刺对象是黄自强和余余。1944年除夕，黄自强曾往陈恭澍宅商谈，不料这个汽车夫将手枪藏在三楼上，趁黄自强与陈恭澍谈话之际，匆匆上楼取枪，行至二楼，忽遇陈恭澍小孩要他抱着买花灯去，汽车夫被陈的小孩纠缠了一段时间，适至下楼，黄自强已经上了汽车而去。当日夜间，余余在陈宅赌了一夜牌九，天快亮了，陈恭澍令汽车夫送余余回家，行至静安寺路，汽车夫遂掏出手枪，将其打死汽车中。

---

① 曾任汪伪政治部情报局局长的赵一雪回忆：担任政治保卫局淮海分局局长是黄自强的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李某。

黄自强经历了以上事件，虽然力持镇定，但内心早已气馁，他过去处心积虑想争夺特务领导权，到了如今，已没有信心了，又想在别的途径上另谋发展。

1944 年 11 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伪国府主席由陈公博代理，陈公博对黄信任不足，黄只得向陈表示辞意，陈借此机会又将政治部改为政治保卫部，任老牌特务丁默默为总监、万里浪为副监，陈公博的情妇莫国康为机要室主任①。陈支持莫国康抓特务领导权，因此莫国康又成了最活跃的人物。黄自强下台后，久无下文，有一次他面谒周佛海诉苦，周始答应外放黄自强为伪江西省长兼九江“绥靖”公署主任②。

五

到了 1945 年，汪伪中央一些大汉奸已经意识到失败就在眼前，为了将来不致于被擒，于是都不要命地抢地盘、抓兵权，以为日后投降的本钱。黄自强当伪江西省长，其动机也在于此。

江西省地盘小，属于江西省的伪军队也少。江西省仅有一个伪第九师，加上伪九江“绥靖”公署各部队，人数不足两个师。黄自强在南京时，对江西满怀信心，他曾对人表示，江西的军队有三个师便可以了，蒋介石不要我们，我可以打游击去。

伪江西省府设在九江，因过去的九江市府被日军占据，偌大一套伪省政府机构，完全挤在旧治江州城内，大街小巷，机关林立。江西省财政支绌，好在我们早有准备，我在南京已与伪财政部商妥，用淮盐济赣的办法，用民船装盐源源运到九江销售，伪省府开支赖以维持。日本人对江西的军政抓得很紧，高冠吾当伪省长最能适应环境，他每天饮酒赋诗，用以消磨时光。黄自强到了江西，当然不甘寂寞，几经交涉，仍然跳不出日本人的圈子。

黄是伪省长兼“绥靖”公署主任，对于如何扩充他的实力，曾经想尽一切办法，但伪九江驻军金亦吾恐怕他的这点实力被黄自强吃掉，便迫不及待地将部队拉走了，当黄自强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看到他许久未说出话来。

黄在金部队离开后，借口向南京述职，居然一去月余不返。有人回到九江说：黄自强在南京大玩特玩，有点乐不思蜀了。我们等了许久，他才由汉口绕道回来。

这年 9 月间③，我奉黄的命令回南京，为他经营辅泰商业银行和上海裕华盐业公司。据我所知，南京辅泰商业银行大约在 1944 年成立，地点在南京太平路，是一帮福建人干的，经理姓陈（名字已忘记），业务一直没有发展。黄自强去南京时，辅泰以六亿元倒给黄，称为黄的独资。黄以四亿元称他的股本，而以二亿元称为我的股本，黄为董事长，任我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上海裕华盐业公司，本是周佛海的，经理是周的舅子杨惺华。这个公司属于官督商

---

① 汪伪政治保卫部于 1945 年 2 月 8 日由政治部撤销后改设，设总监、副监、秘书长等职。陈公博兼任总监，丁默默为副监，6 月万里浪任副监，胡均鹤初任秘书长，6 月升任副监。

② 黄自强出任伪江西省长兼九江“绥靖”公署主任的时间为 1945 年 3 月 3 日。

③ 此处时间有误。

办企业，包销淮南十四县盐业务。这时周佛海是伪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上海市长，一人身兼三要职，进钱门路，五花八门，裕华盐业公司虽然是块肥肉，但在周佛海的眼里，已经不是什么好东西了。黄自强在江西，可以说是苦缺，周为了拉拢黄为己用，故以裕华公司相赠，美其名曰对黄“调剂”一下。这个公司向伪财政部交纳一亿元保证金即可开始营业。资金固然不要多少，而利润却是不小，按黄的经济实力，经营这个企业，还不致需要什么外力。裕华盐业公司董事长是黄自强，黄也叫我担任总经理。黄曾对我说：这两个企业如果经营得法，你就不要回来了，财政厅就另外委人吧。黄此时除了这两个企业外，在北京西城刘海胡同购了一所住宅，系华北汉奸柯昌泗经手给他买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国民党没收汉奸财产，以上两个企业，均被蒋介石的代表蒋伯诚接收。8 月 20 日，黄自强由九江狼狈逃回南京，这时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已经受蒋介石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黄自强住在外面有危险，曾住在任的司令部内。有一天，黄派人将我叫到任的司令部说：“我要走了，到什么地方去，我不便告诉你，希望彼此保重。”言下不胜唏嘘。

1947 年，天津《大公报》登了一个消息说：“汪伪政权政治部长黄自强，于胜利后逃往台湾，这日黄适在咖啡店饮咖啡之际，傍坐一军人因手枪走火，子弹打中黄的要害，登时身死。此刻台湾当局，正电请南京国防部派员检验黄的毙身云。”黄自强就这样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

（1966 年）

我所知道的汉奸叶蓬

蓝 香 山*

我和叶蓬自望鲁高小以至保定军校，同学多年，又属至戚，对他一生较了解。关于敌伪时期材料，在武汉方面，系他当时亲信朱云章供给的，在南京方面，系其弟叶晃供给的。

一

叶蓬，字孛孛，1896年生于湖北黄陂南乡烽火山大地主家庭。清末科举制度未废时，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学习八股、词赋，准备争取功名。1907年，清朝废科举，兴学校，入本邑南路高等小学肄业。1909年，黄陂四路高等小学合并为望鲁高等小学。

辛亥革命时，叶正高小毕业，乃投入湖北学生军，旋编入湖北陆军小学，颇得校长吴元泽赏识。由于考试屡列前茅，胚胎个人风头主义。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即清末第二陆军中学）时，正处袁世凯镇压革命志士高潮，他同意治乱世重用典。1917年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每与我私语应如桓温“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自以为豪放不羁，取名放儿。其父叶金门，黉门秀才，对他慈爱异常，每月寄零用费20元。每逢星期日，他必约我大吃一餐。他不喜穿学校所发布衣布鞋，常着自制呢衣革履。时袁世凯已死，所办模范团解散，陆军部总长段祺瑞挑选一部分学兵插入军官学校第五期，同学认为北洋军阀政府有意搅乱队伍，蔑视学制，群情愤慨，第五期同学以赵承绶为首，第六期同学由叶带头，鼓动全体同学罢课反对，段祺瑞派军学司长齐振林到校镇压，叶被关禁闭。事后，其父寄书申诫，他回复以“燕雀岂知鸿鹄志”。1918年暑假还家，他为反对其父纳丫环为妾，竟以手枪杀父，幸枪弹未入膛，未演惨剧。

二

北洋军阀时期

1918年底，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段祺瑞视为优秀可用者皆派充参战军下级干部，叶蓬被派到湖北王占元部第二师见习，满怀失望。北洋军阀认为保定军校学生带有革命危险性，虽一排长亦不肯委用，他不得已在第二师官佐子弟学校教书，自嗟如辕下驹。

---

* 作者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五军参谋长等职。

此时，从父命在乡完婚。不久与我族妹蓝秀成恋爱，嫌原配土俗，乘其病中投药毒死，嗣又与蓝秀成结婚。蓝母每与我闲谈及此，深责其不仁。萧耀南任湖北督军时，他常在小报以诗捧萧。后任湖北陆军军法处副官，嗣得该处程汉卿怜惜，迁该处监狱所所长，由此开始腐化生活，抽大烟、赌博、讲应酬，入不敷出，乃将其父遗产变卖大部，维持开销。1926 年春萧耀南死，陈嘉谟继任，军法处长易人，他也连带失业。他到蚌埠，由安徽陆军训练处副监范熙绩转荐于陈调元，委为上尉差遣。叶蓬大骂范不识明珠，是侮辱他，并云得机必报复，当我面将委令撕毁，拂袖而去。

国民党统治时期

北伐军兴，夏斗寅部编为独立第十四师，叶蓬随军行进到武汉。当革命高潮中，有志之士莫不向往，他敏感过人，自不失良机，于是投夏任中校参谋，旋任参谋处长。1927 年夏，四川军阀杨森乘武汉空虚，率部八个师沿江东下，夏斗寅部在宜沙一带感受威胁，同时恐惧唐生智编并，进退维谷，谘谋于众。据家叔蓝文蔚说："叶蓬代理参谋长，他和我主张响应蒋介石叛变革命，举反共旗帜，由沙市偷袭武汉，我被派为代表到宜昌与杨森妥协。"夏斗寅部在武汉附近被叶挺将军击败后，拖到蚌埠扩编，叶蓬任教导团团长，自谓青云得路。旋调充万耀煌部第七十四团团长。据他同事王亚翘说："叶蓬烟瘾很大，无论作战行军不离烟枪，他爱人蓝秀成随军生活，每行动必坐轿，四人一班，两班人侍候。他与团里军官不同餐，干部每人每月伙食费不过五六元，他一人月吃 20 元伙食。每有敌情，不仅不愿牺牲，且与万耀煌闹对立。"1930 年，夏斗寅任武汉警备司令，万耀煌调虎离山，推叶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叶在参谋长任内，首先大施镇压手段，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被屠杀者很多，其毒狠不亚于陶屠户（陶均）。同时，在武汉市郊遍筑碉堡，标榜防共。其次向特税处、跑马厅各戏园索贿，月入十万元，与夏斗寅平分。他在汉口青岛路住宅和岳飞街圣德里 4 号住宅即此赃款购买。1931 年夏，武汉大水，暑假我由南京回到武汉，对他说："街上行船，臭气薰天，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你还这样潇洒。"他说："何雪公（何成浚）尚尽情寻乐，我有什么办法。"当时蓝秀成对我说："近来我和何夫人交谊很好。"事后才知，他为了往上爬，不惜金钱，攀龙附风。我回南京时，他说："请代向陈立夫致意。"闻之惊异，想他与陈素不相识，如何很快就勾搭上了呢?

1931 年冬，由于何成浚腐化透顶，叶蓬认为有机可乘，乃帮助夏斗寅挤垮何成浚。夏斗寅遂继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一方面由于夏须利用他搜刮，保持既得收入；另一方面，由于他重贿何府，得何应钦支持，于是继夏任武汉警备司令兼警备旅旅长。1932 年何应钦到武汉视察，在街上看见一步兵团精神饱满，服装整齐，颇为惊异，何说："武汉还有这样的部队吗?"嗣查明为警备旅，颇称道。1935 年举办防空展览会，自命为抗日分子。提倡仇视日货，张贴"还我河山"大标语，其实弹射击靶写"复仇靶"三字，激励军心，因而引起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抗议。1936 年，张群藉叶惹起"外交纠纷"为词，呈准蒋介石撤去叶武汉警备司令兼警备旅长职。叶到南京投靠陈诚，加入复兴社，更名叶一衷，取信于蒋介石，又任铁道部铁道队警察总局局长，负责全国铁道线上护路队和铁道警察管理训练，铁道线上铁甲车队亦属其管训。铁道部长张嘉璈对铁

道上军警无权过问，由复兴社方面控制。叶为巩固自己地位，保荐复兴社干部、队警总局督察处长陈绍平为队警总局副局长，局内主要干部均用复兴社成员，并以张戢吾为机要秘书。他仅挂名义，用人行政一切均操于陈绍平，如铁甲车队大队长曹奇（黄埔一期出身）不能如意指挥，屡欲插人朱云章为队长而被阻挠。每铁道线有警务署，以下分总段、分段以至派出所，他们利用职权压迫人民，走私行贿，军纪废弛。叶想整顿一番，显显身手，乃到各铁道线视察，标榜“维持治安，精兵勤训，整洁仪容”，徒然粉饰门面，无裨益于实际。

当时叶蓬认为蒋介石对政学系亲日派不满，杨永泰可杀，张群也可杀，既可泄私忿，又可称蒋介石意旨。于是派前警备旅中校副官主任程亦鹏，带领前警备旅体操队兵二人暗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他们怀着手枪在张群住宅徘徊，某日乘张群出门上汽车，持枪相击。不料子弹不发，已为张群发觉，程亦鹏被捕，经审讯始知叶蓬主使。由于叶贿嘱，程亦鹏虽始终未将他供出，然事实不能掩盖，张群报告蒋介石，将叶的队警总局长撤职。1937 年秋抗日军兴，我到南京，他对我说：“蒋介石当时唤我去说‘张群是我外交部长，你怎能杀他？’承认恐治罪，不承认有事实，一言未发。”蒋介石当命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带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看管。由于钱大钧斡旋，仍让他住在私宅。不久又让他回居武汉。

1938 年，蒋介石由南京退到武汉，他不甘寂寞，曾托何成浚向蒋介石、托万耀煌向陈诚吹嘘，很想带兵在战场上露一手，久不见明令，满腹牢骚。我从前方回到武汉，他请我和陈铭枢到他家吃饭，他认为日本武力强大，对着中国地图说：“日军人中国像切豆腐一样，想切到哪里就到哪里，中国是无力抵抗的。”虽有恐日的思想，而上爬心仍切。由于几月来活动，得到蒋介石青睐，拟委第八十三师刘戡部副师长，但须经陈诚同意。某日蒋介石召见他说：“你去见辞修（陈诚）吧！”他到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会陈诚，坐在客厅内由陈诚随从递名片，久不见陈诚出。由于陈诚器量最偏窄，成见最深，凡不称其意者，不惜予人以难堪。陈诚的老同学杨正治对我说：“陈诚对人若妓女，凡名妓必招来尝试，一旦玩味，便一脚踢开。”他呆坐良久，问随从：“我名片递上么？”随从说：“已递上，总司令正阅公文。”他索纸笔即席写一函，交该随从再递。半小时后，仍不见陈诚出，他又问随从：“我信递上么？”随从说：“已递，总司令未看，丢在纸篓里了。”他乃出客厅，在该部副官处挂电话，拟与陈诚讲话，陈诚听是他口音，当即将电话挂了，他才退出，感到前途失望。武汉撤退前夕，蒋介石命何应钦为韶关行营主任，发表叶蓬为该行营高级参谋，他认为不屑就，于是退到香港住九龙，由随从刘某经营汽油生意，静待时机。在武汉分手时，他对我说：“抗日战争初起，我从唐孟潇（生智）、钱慕尹（大钧）闲谈中知蒋介石抗日，是为通过上海战败好签字，将东三省割让日本，以免担负历史上卖国责任，未想到前途发展已如斯恶劣。”

三

叶蓬到香港后，我随白崇禧在南岳，正值韶关第七战区和桂林行营成立，需要干部，我向白崇禧推荐叶为第七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或桂林行营参谋处长，白允予考虑。不

日，我在长沙大火夜腿部受伤，到桂林疗养。他寄我第一封信，意图活动，我回信盼他坚决回桂林，他寄我第二封信，表示空名义不就。我未得白崇禧决定。旬日间听说他由赌友周佛海拉投汪精卫去上海了，我大吃一惊，叹息他走上绝路了。1939 年夏，我到香港玛丽医院医疗骨伤，同乡李荐廷、刘少三对我说："叶蓬不得意的心情溢于言表，谩骂重庆政府，反对长期抗日。"事后，叶妻蓝秀成对我说，他到上海参与汪精卫第一次'还都'会议，与杨揆一相标榜，参加伪组织。贺衡夫对我说："当时我在上海，与杨、叶曾会晤，嗣见报载他们参与汪精卫会议，就不敢往来。此时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女已与叶同居。"

1939 年冬，汪精卫收容华北华东沦陷区内国民党军官千余人，拟培养为伪组织军事骨干，举办"中央训练团"，设于上海江湾，自兼团长，以叶蓬为教育长，郭尔珍（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为教育处长，李德言（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为高级教官，黄曦为总务处长，朱云章为上校教官，叶焕如为总队长。那些学员为维持一时饭碗，不得已暂作旅舍，焉能谈到管理训练。这样的地位是不能满足叶蓬欲望的，于是派心腹黄曦、朱云章、张耀辉回武汉进行筹备，以黄曦任筹备主任、朱云章任总务、张耀辉任经理，在汉口三教街一餐厅暗中收容前武汉警备旅留汉干部，为他将来回武汉奠立基础。

1940 年 3 月，叶蓬受汪精卫命，由伪"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拨一个特务营约 500 人带来武汉，叶任驻武汉伪"绥靖"公署主任，实质属于汪精卫的行营，形式上职权范围很广，长江中游各省驻军口头说均可指挥。他初到武汉时，冷冷清清，仅亲信数人，如黄曦、朱云章、张耀辉等迎接。住在汉口兰陵路日军招待所五花宾馆，招待女工均为日高等知识分子、特务间谍，他想玩弄，不能如意。他到武汉后，自命为亲日分子的何佩瑢、雷寿荣、石星川认为他是不得已从敌，日方不相信，对他很藐视。叶为应付环境，不得不以前辈礼遇他们。伪"绥靖"公署设于远东饭店，以萧其昌（留日骑兵学校出身）为中将参谋长，黄曦为少将参谋处长，李德言为少将副官处长，朱云章为上校总务科长，张耀辉为中校经理处长，陈某为军医处长，刘某为军法处长，田重光（留日学生）为政训处长，萧肇基为秘书长，职员共百余人，公役数十人。

他的标榜和措施：（1）和平反共建国。主张汪、蒋、日三方合作，积极反共，维持"东亚共荣圈"，与日本帝国主义"亲善"，所谓"曲线救国"。实际上是为达到个人野心，乘机大抓实力，积累政治上讨价的反动资本。当时日军驻武汉太上"绥靖"公署主任为军司令官大将冈村宁次，执行机关为军特务部，其主持人为森岗少将，后为柴山兼四郎少将，军特务部改组为联络部，部长为落合少将，联络部课长德岛大佐为"绥靖"公署顾问，叶常邀请他们吃喝，奉命惟谨，一切听其指挥和监视。（2）收编伪军。首先，叶自兼武汉分校教育长，招生千余人，拟培养自己干部，校址在武昌抱冰堂。以郭尔珍、叶焕如主持其事，社会失业青年不得已暂受牢笼。其次，派朱云章到各县点收伪军，收编张启黄为第十二师，人约四五千，枪 2000 余支，驻信阳、罗山一带；李宝琏为第十一师，人约五六千，枪 3000 余支，驻随县、广水一带；刘翘旅驻蔡甸、油芳岭一带。当时"黄卫军"直属日军指挥掌握，与他是对立的。（3）吞食公款。他为满足个人欲望，派舅弟蓝海州为武汉分校财务科长，勾同伪"绥靖"公署经理处长张耀辉，利用修建远东饭店抱冰堂，浮报、侵蚀公款 10 万余元。伪"绥靖"公署经费

每月仅5万元，由“三省财政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俞栽拨发，他个人每月支用二三万元，不能按时发工资，致伪“绥靖”公署员工常枵腹。由于军权为日军掌握，各地伪驻军须听日军指挥，他不知为傀儡，满想在地方大举“绥靖”一番，贯彻反共夙愿，终多掣肘，屠刀无法施展。由于各伪军自己带来资本（枪支），又有日军撑腰，根本不睬他，同时防地划分权属于日军，无权调遣，于是伪“绥靖”公署成为层转公文照例表报机关。特别是对日军阀应付困难，虽一军曹常为细故不经通报迳闯入办公室，须客客气气接待。又常受何佩瑢、熊剑东、石星川嫉视，因而时常住南京，后索性偃旗息鼓，转回南京。他去后驻武汉“绥靖”公署改为“武汉行营”，由伪省长杨揆一（此时何佩瑢已病故）兼主任。

1942年8月，叶蓬任伪陆军编练总监，语左右：“这倒是实际工作。”美其名曰主持“全国”军事教育，号令不行于南京，遑问其他。富双英（保定军校出身）任参谋长，黄曦任参谋处长，直属督练处张海帆（黄埔一期出身）任处长，名义上隶属“编练总监公署”，实际由日军联络部指挥。尚有一编余军官教导团，刘国桢（中央军校七期出身）任团长，叶晃任副团长，学员大部分是各省伪军编余的下级军官，一个大队约200人。后来伪编练总监公署撤销，这些学员分编到南京各伪警卫师和某些伪军部队。另有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汪精卫自兼团长，郝鹏举为教育长，有“军官集训班”（一月为期）、“将校集训班”、“学生队”等，权力操于日军联络部，郝鹏举也不买账，大出他初衷所料。

1943年伪编练总监公署撤销，叶蓬转任伪陆军部长，明知空洞无为，也得过一时官瘾。李石戡任次长，黄曦任军务司长，刘国桢任军学司长，叶焕如任总务厅长，梅守仁任军医司长，隶属几个军医院，一个宪兵学校。伪陆军部同伪军联系很少，由于各地伪军受当地日军节制，因此，伪陆军部只是翻印一些军事书籍，发给各伪军使用。当时军学司设有编审科，叶晃任科长，编印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伪陆军部驻有日军顾问，任何工作都须通过日军联络部许可，才敢执行。当时周佛海任伪财政部长兼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为副总团长，辖数个税警团，听命于日军联络部，他不能过问。叶在部长任内，承日军联络部意旨曾考选军官学校学生数十人赴日本士官学校受训，培养亲日分子。1943年汪精卫派大汉奸十余人组织军事代表团赴日本觐见日皇，他和伪总参谋长鲍文樾均系团员，在日参观游览，短期逗留，备受日政府宠待。他承日军阀命，在东京广播，因顾忌开罪于蒋介石，只指孔祥熙、张群、陈诚误国。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主持伪政权，叶蓬利用杨揆一与陈公博的矛盾，于1945年春回到武汉任伪湖北省长兼驻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当时，萧肇基任伪省政府秘书长，陈维政任政务厅长兼财政厅长，警务处先为王寿山，后改为警保处，公秉藩任处长，辖三个伪保安总队，袁世政等为总队长，担任铁路警卫。黄曦为教导总队长，担任伪省府警卫，其亲信陈守方为伪武昌警察局长，程汉卿为伪黄陂县长，朱坤宇为伪孝感县长，陶敦礼为伪武昌县长，罗涤波为伪汉阳县长，朱云章为伪沔阳县长，企图使武汉附近各县纳入他的统治。他的措施：（1）召开伪县长会议。强调“维持治安”“积极反共”，“注意粮食和食盐供应”，“认真征收田赋”，“厉行戒烟（寓禁于征，变相搜括方法）”，实际盐和大烟收入为日军特务部控制，此乃日军统治沦陷区主要财源，他装腔作势，无

非表示迎合日军心理。他又想大捞一把，借重建洪山宝塔之名，命各伪县长及列席各伪军师长，各捐献50万或100万元“储备币”，尽入私人荷包。伪孝感县长朱坤宇贪污昭著，声名狼藉，原拟撤换，终因袖金行贿而转为信任。他虽想举办伪县长训练班，将旧人员可充县长者加以训练，由于各伪县长之去留，决定于当地日军之喜怒，无权过问，徒有空想。(2) 依靠日军联络部。当时日军武汉的军司令官仍为冈村宁次，联络部长为落合少将，该联络部辖三课，第一课主管民政，课长为德岛大佐；第二课主管财政，课长为浅田中佐；第三课主管军事，课长为中村中佐。另有步兵一个联队和宪兵队担任武汉之警备，由于军政财权均为日军掌握，他只有唯命是听。(3) 抓军权。当时有“中央训练团武汉分团”设于武昌抱冰堂，刘明夏为团长，归伪“绥靖”公署指挥。伪“绥靖”公署仍设在远东饭店，叶晃为参谋处长代理参谋长，张耀辉仍为经理处长，少数职员撑持空门面。隶属部队有张启黄一师、邹平凡一军、李宝琏一军、教导团、特务营，并自兼一师，尚有伪独立第十三旅苏振东驻沔阳通海口，司令金亦吾驻潜江，王维哲驻系马口、蔡甸，其中听他命令者仅一特务营，其余均不服调遣。(4) 向蒋介石暗送秋波。蒋介石军统方面为控制武汉情报，曾派特务多人驻汉，少将级近十人，如周振华、范天印等，系经陈绍平派的，他均加委用，这也证明汪蒋日是合流的。1945年，他曾配合日军命邹平凡、李宝琏各带一团兵力向恩施六战区进攻，沿途张贴标语“活捉陈诚”，因此，加剧陈诚对他的恼恨。(5) 恣情享受。当时叶蓬住岳飞街圣德里4号，室内无论走廊、卧室、客厅均用上等地毯铺地，家具均用红木，椅凳尽铺彩缎花垫，沙发铺大红缎面虎皮毯，陈设豪华，并雇中西厨师四人服侍饮食，家庭总务由张耀辉、蓝海州兼管，随从副官陆祥逊、徐楠等四人听呼唤任警卫，雇女工八人，分管衣、帽、寝具、烧烟、洒扫清洁、端茶递水，还不时叫日妓到家轮流烧烟、助其欢娱。当时伪军仗日军信任，穷凶恶极鱼肉地方，与“绥靖”公署对立，叶莫可如何；日军在地方横行，各伪县长不敢反映，纵有所闻，叶装作不知；伪军在地方控制食盐私自贩卖，没收烟土掺料子变卖，强征粮食高价转售，叶不敢制止。他认为地盘不稳，有关风水，特将青岛路住宅拍卖（因该房四周尽是高房，有困于核心之感），还想运转鸿钧，宝贵白头。

抗日胜利前夕，蒋介石唯恐伪军投新四军，积极进行拉拢，于是委叶蓬为第七路总指挥，委任状由陈绍平派人送汉口。他初接委任时，以为转航遇顺风，前途尚有可为，不料蒋介石进行分化，又委邹平凡为武汉守备总指挥。

抗日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到南京与陈公博商议投降事宜时，接汉口亲信电告谓邹平凡明目反叶，将有不利，乃仓皇乘机返汉，归途拟在鄂东降落，依靠同学“鄂东行政专员”李石樵保镳。鄂东无机场不能着陆，不得已在武昌南湖下机潜往鲁家巷。

1945年10月某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率领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第十八军军长胡琏、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从恩施回武汉，郭忏还是挂中将肩章，抵埠时叶蓬着上将军服往迎，郭忏阳与委蛇。第六战区接收武汉前进指挥所此时告结束，该所主任谢士炎曾与叶蓬保持接触，叶的行动早被他们监视。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至戚冯歧吾对我说：“郭忏到武汉数日后，给我电话，说叶蓬仍在大发号令，扩编部队，你陪他来部吧！我陪他到部后，郭忏说：‘陈长官（陈

诚）有命令不让活动，请你住在长官部。’每日供给较好的饮食及三五牌纸烟一听，很受优待。”嗣转押武汉行营军法处，该处长严武（黄埔一期出身）仍加优待。旋又转押军政部南京监狱。蓝秀成曾到南京求何应钦，何说：“事实俱在，我不好说话。”1946年冬，陈诚主张严办。有人说是由陈诚缮好签呈，张群递交蒋介石批准枪决。蓝秀成说叶临赴刑场时，要求法官允许他讲演，他对观众强调说自己是为“和平救国”，不是当汉奸。抵刑场时仍讲风水，要求掌刑兵让他自选一块地就刑，行刑后在其身上检出金条一根，由外甥女婿周黎扬、副官徐楠收殓，暂厝于南京殡仪馆。

（1962 年）

汉奸萧叔宣附逆始末

田 瑗*

在南京汪伪政权成立的初期，萧叔宣是作为一个配角而出现的。他和汪精卫既没有历史关系，又没有明显的政治背景，他所以投入汪伪集团，主要是想更大地满足个人的官职地位的追求；其次是他对于中国抗战有着极端错误的理解和解释。他在给留美儿子萧光灏的回信中曾说："中国长期割据，政令均难贯彻，国人思想也不统一，军事更缺乏精密训练和现代装备，抗战只会招来溃败。汪先生主张停止抗战、对日妥协实是图存上策。你劝我不要卖国，乃昧于现实之言……" 这正是他所以投靠汪伪、同流合污的思想基础。

当时在汪伪政权中，萧叔宣是惟一日本陆军大学出身的老牌将领，又曾在欧美研究过军事，他自视颇高，落落寡合，和汪伪内部各派系都缺乏较深的人事关系，惟一的出路只有依靠日军。日军也乐于利用他的"资望"影响。汪精卫因萧和日本当权的高级将领多有渊源，并且通晓东西洋军事知识，对他常以客卿之礼待之，遇事咨询，称他为"萧先生"，以示优异，企图通过他向日方讨好。

附逆以前的经历

我在萧的左右工作达七八年之久，关于他的经历，有的我曾亲自参加，有的是亲见亲闻，知道得比较翔实。

萧是福州人，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弟兄四人，他和他的二兄萧其昌都是日本陆大毕业，他的兄长萧其斌是日本士官出身。1922 年，萧从日本陆大毕业归国，途经沈阳的时候，由郭松龄介绍，充当东北讲武堂教育长。1925 年冬郭松龄反奉时，萧在郭方，参与帷幄，替郭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奔走拉拢。其后担任京奉铁路总局长。郭失败，萧席卷铁路公款五十余万元溜回福州老家，招兵买马，办起福建省第二旅来，萧自任旅长，我是该旅的营长。全旅驻在福州和闽南一带，征粮派款，荼毒地方，俨然是一方的土皇帝。

一·二八抗战（1932 年）以后，十九路军撤入福建，把第二旅改编了。萧跑到南京，由熊式辉、熊斌等介绍，于 1934 年 2 月，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驻日首席武官，我随他在武官处当秘书。当时中日关系十分恶劣，但萧与日本军人之间，往来仍极密切。酒席酬酢，几无虚夕。他常说："中日究是兄弟之邦，亲善关乎两国存亡，我身为外交

* 作者当时系汪伪军训部科长、汪伪国民政府驻日武官。

官，折冲樽俎，维护两国正常关系，责无旁贷，至于毁誉由人，不去管它。”其实他正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垫平道路。

他在武官任内，也做了一点事，那就是1936年8月，日本内阁召开首脑会议，通过所谓“基本国策”，决定对华发动大规模新的进攻，并根据这个决策颁布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萧从荒木贞夫口里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命我发电报告南京政府，附带请求拨给机密费5万元。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剿共”，仍徘徊于对日和战的取舍，对于这个报告虽未作指示，但机密费由参谋本部如数照发。

1936年底，萧的三年任满，蒋介石派他到欧美考察军事，同时窥探欧洲各国对中日问题所抱的态度。一直到抗战爆发后，他才回到香港。

附逆后的活动

1939年，汪伪拼凑班底，准备登台，由曾醒拉拢，萧遂投靠汪伪政权，从此开始了汉奸生涯。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汪伪以萧的“资历”较高，又是经过几次三番才延揽出来的“人才”，本来想做更有效的利用。但是当时汪伪的局面狭窄，加上梁鸿志派仍然盘踞着许多要职，“新贵”人员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编制需要。在这样粥少僧多的情况下，萧只好屈就了伪军事训练部长的职务①，当时我是伪军训部的军训科长，兼代对日方的联络工作。日本顾问部方面，也认为萧是“材堪大用”，因此在1941年夏季，命萧兼办“将校训练团”和“军官训练班”的事宜。

开办军事学校，是汪伪政权中一项重大的政治措施。这两个教育部门都是调训各伪军中的基层干部，企图在军官中为汪培养忠实可靠的骨干，并通过这些人对他们的部队官兵扩大影响，改变伪军的成份，以便于控制。教育内容除了政治思想由政工人员负责组训以外，军事方面主要以共产党军队为假想敌人，针对共产党军队游击战术的特点，着重训练伪军的机动性、运动战和迎接战斗，并采取了以班为单位的战斗群体作战方法。至于利用地方武装配合搜索、警戒，以发现敌人，防止袭击等，更是重要课目。

起初，萧叔宣对这两个教育部门，加紧控制，亲自掌握，企图把它变成发展个人势力的阵地，在学员中培根播种。但汪精卫不肯放松，派他的学生刘启雄等担任总队长，加强控制，因此萧的政治企图渗透不进去。

这些学员回到原部队以后，由于各伪军缺乏组织、思想工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多没能发挥其预期的作用。

政治幻梦的破灭

1942年8月，萧升为伪军事参议院院长，我是该院的少将参议，同时调充驻日陆军武官。我临赴任之前，萧准备了大批礼物，如福建漆盒、顾绣、珍玩古画等，托我带

① 萧叔宣初任汪伪军事训练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1941年3月24日正式就任部长。

到东京去，转送给他的“恩师”、“知友”，并且再三嘱咐我说：“到那里要和他们紧密联系，找机会开辟道路。”当时萧认为汪伪已渐失掉日本人的信任和支持，前途暗淡，他本人也不愿为实现别人的野心工具。因此，如能得到日方的谅解，他很想回到福建，另起炉灶，搞个独立局面。为此，他常对我说：“福建是咱们的摇篮，发展性也大，有机会咱们还是一同回去搞吧！”其实，他动摇的真正原因是：1942 年秋天，重庆的骑兵司令周孝培（原为萧所办的福建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派骆侠亮到南京来，转达蒋介石的指示，要萧找机会回福建组织军队，将来配合海军在马尾登陆，因此，萧才有这样的打算。我到日本以后，也曾为萧多方奔走，只以当时情形复杂，实现困难，而萧也恋恋于上海的财产，犹豫徘徊，没作进一步争取。

1943 年以后，由于日军长期侵略战争的消耗，造成日本内地的物资奇缺，尤其是糖、酒、肉类和棉织品缺乏。当时我利用汪伪外交官的特殊配给，向日本的当道者们大量馈赠，用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有时也能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情况。一次，西村大佐同我谈起萧其昌摔死之事。西村大佐是汪伪武汉行营参谋长萧其昌的陆大同学。萧其昌堕机殒命以后，他曾向萧叔宣致电慰问。因此萧嘱我要便中前往致谢。1944 年元旦，我到西村家里拜年，顺便转达萧的谢意。这天，他留我吃酒，直吃到天黑。谈话中他问我萧其昌死后，萧阁下（指萧叔宣）有什么感想，我说：“开吊的那天，日本总司令部的高级将领都去吊唁，萧先生很感谢。”他犹豫了半天说：“真可惜！弄错了。”我见他阴阳怪气的样子，便惊异起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连喝了几口酒以后，对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942 年夏天，伪武汉行营参谋长萧其昌堕机殒命，原来是日本人弄错了。内幕是当时伪武汉行营主任叶蓬，原系蒋介石部下，在抗战前期当武汉警备司令的时候，用日本人头像画成靶子，作为士兵练习射击之用。事为日方查觉，对蒋提出严重抗议，叶蓬因此被撤职。迨叶蓬参加汪伪政权充当伪武汉行营主任以后，仍然桀傲不驯，不时和日方摩擦，勾起日本人的旧恨，设计要把他除掉。于叶将回京述职之际，特备专机，供叶乘用，拟于途中以另一日机故意撞击专机后部，乘客虽能丧生而驾驶员可安然无事。不意叶因临时有事，改由其参谋长萧其昌坐此机赴京，驾驶员见身着中将军装的军官上机，未审是叶是萧，匆促起飞，萧遂中途遇险（当时叶、萧同是中将，相貌、服装又颇相同，故易混同）。事件当时，西村是驻武汉日本某部队联队长，对此事知之较详。

我得知此事以后，曾函告叶蓬和萧叔宣，促其加意提防。其后叶故意以烟、色自渎，效信陵君饮酒近妇人故事，再不敢与日本人相抗。

末日及下场

1944 年 3 月，汪精卫因病被送往日本名古屋医大治疗。当时汪伪政府中的大奸巨慝们，虽明知汪伪政权的大势已去，但仍在留恋着寄生腐朽的生活，企图侥幸于万一。在汪去日以后，他们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上海是汪伪政权各项政策策划的中心，经济的源泉，特别是那种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人人垂涎三尺。因此争夺上海是他们斗争的焦点。当时进行这场競逐的有周佛海、任援道、丁默邨、林柏生、江亢虎等，萧

叔宣在上海有着庞大的私人财产，又醉心于那里的美式生活，自然不甘寂寞，于是飞函让我为他奔走。他在给我的信里说："……机会不可放过，希弟为我努力经营之，并附去日金5000元，作为活动费用。"为此，我几次走访大本营支那班长小笠原中佐，求他打通关节。据小笠原对我说："关于人事改组的决定，大本营主要听取驻华最高顾问的意见，你可速到名古屋去找柴山阁下。"于是我乘车到名古屋找柴山。因为当时汪精卫正在名古屋医大治疗，柴山也住在那里监视动静。我向他进行游说之后，他沉思良久，最后对我说："萧先生要到武汉去，可以考虑，上海办不到。"事后我函告萧叔宣，萧不同意，就此拉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汪伪政府的上层人物们，开始看清了他们的坟墓。但他们又向蒋介石遥拜乞求。蒋介石为了抢占地盘，也乐于拉拢他们成为他的利用工具，因此来者不拒，封官授职。周佛海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长，他以军委会大员身分，召集汪伪政府各大汉奸会议，发号施令，布置工作。萧叔宣与周佛海之间，由于争夺权力地位，很久以来就积怨很深，此时自然不愿仰周鼻息，接受他的领导，由意见冲突而发展为争吵，会议未终，萧就悻悻而去，行到院中，被周的卫士开枪击伤，虽送中央医院抢救，终因流血过多而死亡①。

（1964年）

① 萧叔宣1945年3月任汪伪陆军部部长。本文关于萧死之经过记述有误。

张岚峰在豫东的罪恶活动

宋 一 民

张岚峰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日军扶植起来的伪军头目之一。他凭借日军力量，组织汉奸部队作为政治投机和经济掠夺的资本，在河南商丘一带为害地方达七年之久。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由伪军头目成为蒋介石属下的第三路军司令。不久，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部队被歼，他本人也做了俘虏。

现就笔者所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实记录下来，以供史家参考。

一

张岚峰，字腾霄，号子杰，河南柘城县人。他父亲张映宿是前清秀才。他是淮阳中学的学生，1922 年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在豫东被招募为新兵。1923 年冯任陆军检阅使时，把他挑入学兵团任骑兵班长，后升排长。1925 年冯到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由于军队有了很大的扩充，需要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军事学术的青年将校，即从军队中选拔了数十名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军官资送苏联及英、德、日等国学习军事，1926 年春张岚峰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炮科。1929 年毕业回国，在冯玉祥部任炮兵团长和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 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张随孙连仲投蒋，曾任孙部张华堂旅参谋长。他当时感到在孙部不宜发展，又于 1934 年再度东渡日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据与张同去日本的陈扶民说，那时张已与日本特务松室孝良拉上关系），1936 年秋回国。

张回国后，看到宋哲元在华北拥有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地盘，很想参加到这个集团里面并取得一个适当的位置。由于当时的冀察在日本人控制下，而他自己又曾留学日本，并且与北平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相熟识，于是便以“日本通”自命，给宋哲元上了一个条陈（只听宋说过有这个条陈，但不悉其内容），他以为只要得到宋的采纳，就可以平步青云，取得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没有想到宋对他这个条陈并不重视，仅仅委了他一个二十九军军部闲职，当然使他很失望。

张感到在宋部吃不开，便去张家口投靠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刘委他一个参议的名义，担任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任务。适逢七七事变爆发，就从张家口随着刘的部队李金田师（李也是柘城人），辗转回到河南柘城，与柘城地方上的当权派牛乾初、牛子垣、牛星垣等牛氏弟兄搞在一起，并任柘城地方财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8 年 5 月，徐州失陷后，国民党军由河南、安徽撤退，地方官吏弃职逃窜，豫东、皖北一带秩序大乱，所有城镇，既经国民党军队劫掠于前，复被日军烧杀于后，加

之地方豪绅地主借口保卫家乡，纷纷组织壮丁，建立自卫队，要枪要粮，趁火打劫。所有这一切，都给地方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后来张岚峰的伪军就有一部分是由这种自卫队改编的）。

这年6月间，日军先头部队到达河南，占据了柘城，不时出城杀人放火，张之胞弟张俊峰即被日军所杀。当时柘城耿、牛、曹、王等姓的地主武装避开日军，散驻四乡。孙麻子、小狼子、刘小孩、李成等股匪各处窜扰，打家劫舍。柘城地区十分混乱。张岚峰这时已探知占据柘城的日军指挥官是他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教官，认为有机可投，于是在柘城宋屯寨召集乡邻紧急会议，他首先向大家讲述日军烧杀掳掠的残暴行为，然后说现在既无力抵抗，又无处躲藏，为了免遭涂炭，最好是主动迎上去与日军联系，并夸口说，对付日本人，他自有办法。随即在会上骗取了各村庄选送的肥牛20头，作为赠送日军的犒军礼物，张并写了一封日文信，由几个农民打着日本旗子拿着张的信件，赶着20头肥牛，进城送与日军。日军复信邀请张入城见面，张与日军见面之后，日军发给张一批武器，让他火速成立队伍，并由日军介绍张到北平与日军华北特务机关取得联系。这时地方上的一般大地主如牛、曹、白、董、张、陈、王、杨、司、耿、傅等成立起“维持会”，由耿祥生担任会长，“维持会”按照日军的需要供给日军柴米牲畜。8月日军发表张为“豫东招抚使”。

张岚峰把“豫东招抚使”的招牌挂出之后，豫东有自卫力量的如杨茂林、王新民、韩循先等首先向张报名投效；在鲁西打游击的宋子贤、张人杰因受日军压迫，退到虞城、商丘边境，也都愿归指挥；曹大中、李忠义等因与张有亲戚关系，也投到张部。另外还有惯匪侯心月、崔华山、袁天柱等多股也望风来归。张最初将这些匪军收编，共有5000多人，号称万人，大小司令有二三十个，张任司令，李学舜任副司令，潘伯豪任参谋长。因为张与日军上层有关系，同时日军侵华进展太快，后方空虚，急需汉奸部队填充其隙，到了次年（1939年）他已有三个师及直属部队共三万多人。日军把他这部分七拼八凑的伪军编为“救国”第一军，张任军长并兼一个师长，另外两个师长是宋子贤、曹大中。潘伯豪任参谋长，王月舟任副官长，布防在商丘、鹿邑、亳县直达十字河，接近黄泛渡口。

曹大中、宋子贤、张人杰、李忠义等之所以投张，原因是为了免遭日军的消灭，当他们与河西的国民党军取得联系之后，便于1939年6月29日把日军派到他们部队里的“监军”一律处死，把两个师拉走，渡河西去，投奔驻临泉的汤恩伯。这件事当然引起了日军的恼怒，立即把张岚峰叫到开封，追究责任，把张扣押了一个多月。经张百般解释，又经日军多方调查，证明张事前确不知情，才将张释回。

由于张在这次被扣押期间，对日军表示了真诚合作的意愿，取得了日军的欢心，又由于日军的实际需要，所以对张部伪军的扩充给了积极的支持；而跟曹大中、宋子贤等渡河西去的一部分人，以籍隶豫东、鲁西者较多，他们渡河后不久，又陆续返回张部。此外，张又招收了豫东土匪刘效侣等数股人马，所以到了1940年春，张部伪军又恢复了1939年6月29日以前的状况。这时，有一些原西北军的军官如黄宗颜、陈扶民、刘扶青、符子勤、宋俊三等先后参加了张部，分别担任了师长、团长、参谋长等职务。张曾对日军吹牛说：“只要你们大力支持我，使我的力量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不仅

西北军的老朋友们会源源而来，今后还会有人带着队伍来投奔我们。”这些话当然引起了日军的很大兴趣，从而得到了日军更大的支持。到1941年初，张部伪军的人数已发展到四万以上。

张部最初属于河南伪军程希贤（程的伪职名称已记不起）的系统，后来隶属伪苏豫皖边区剿匪司令胡毓坤部。胡的司令部初设开封，1941年移到商丘城外什方院，就近指挥张部。胡的基本部队伪十五师驻徐州附近，至1942年胡的伪司令部撤销，胡毓坤调南京伪军委会总参谋长①（胡在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枪决），所有胡伪司令部人员（胡系奉系将领，他的伪司令部成员多系东北旧军官）归张部编并，扩大了张的伪司令部编制。1942年，汪伪组织发表张部为陆军暂编第一军。半年后，又改为第二集团军（1927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北伐时，部队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张认为自己是冯的继承人，所以在汪伪组织扩大伪军编制时，张非要这个第二集团军的番号不可），1943年又扩编为第四方面军。

第四方面军为张部伪军发展到顶点的时期。伪总司令部辖伪第一军、第八军和挺进军（后改为十九军）三个军，有九个师，三个独立旅，三个直属团，一个执法队，一个通讯营和一个交通大队；再加永城、亳县、鹿邑、淮阳、太康五个县的五个伪保安团，共有六万人。伪总司令部的组织是：总司令以下有参谋长，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务、军医、军械、军法、政训、政务、财务十处，军械处下设修械所，军需处下设军粮局、被服厂、皮革厂、面粉厂，军医处下设军医院，军法处下设执法队、监狱，政训处下设习艺所、孤儿院、《力行周刊》和印刷所，财务处下设华兴公司、禁烟委员会。商丘城内还办了一个军官子弟小学，在亳县办了一个涡北中学（两处学校用人行政及成绩考查统归张的老婆张志兰实际负责）。

二

张岚峰以投靠日军起家，已如上述。但是他也懂得，中日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必须在抗日战争期间作好下一步的准备。在这个时候，他曾作过三种不同情况的估计，第一种估计是：抗日战争以日本战胜、中国战败为结局，中国由战败国的地位变为日本的附庸。他根据这一估计，既同北平的伪组织取得联系于前，又同南京的汪伪组织联系于后，以便在将来的傀儡政府中占一重要位置。第二种估计是：抗日战争在英美的援助下取得胜利，国民党继续执政，这就需要使自己的军队在抗战胜利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而继续存在下去。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同国民党政府秘密取得联系。第三种估计是：中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内战将不可避免地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地壮大起来。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矛盾，就要在国共磨擦当中，尽可能避免自己受到损失。

下面就是张岚峰根据上述三种估计进行活动的主要概况：

对华北伪组织的活动。在他成立伪军的初期，由于他的主子是日军华北军方，他把

① 胡毓坤任伪军委会总参谋长的时间是1945年4月。

全部力量放在如何取得日军华北军方信任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只要日军为他撑腰，自己的力量就能得到保存和发展。因此，在这个时期对于华北伪组织并不放在心上，只是在他去北平与日军勾结的时候顺便与华北伪组织进行一般的应酬联络而已。到了抗战后期，他的兵力逐渐多起来，野心也就越来越大，他看到华北伪组织下面有数万伪治安军，而这部分伪军中的带兵官大部分是他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他企图通过同学的私人感情，把这部分伪军抓到自己手中。他于是一方面与他的这些同学取得密切联系，一方面同华北的大汉奸王荫泰、汪时璟等有了进一步的勾结，希望这些汉奸在日军面前替他吹嘘。他在北平后门帽儿胡同买了一所豪华的住宅（原为冯国璋任总统时的住宅）。从 1943 年到 1945 年是他在北平最活跃的时期，每次由商丘到北平，总要在这所住宅内宴请这些汉奸头子。由于他掌握着枪杆子，又是“日本通”，更重要的是还有日军作靠山，所以当时华北上中层的汉奸们都愿意和他接近。大约是在 1944 年，“华北治安军”的大头目齐燮元有被日军撤换的消息，他的活动就更加积极起来。但是，结果使他非常失望，取齐燮元而代之的，不是张岚峰，而是门致中。事后汪时璟对他说：“我们为此事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日方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日军表面上说门在北方军人中资格老，地位高，号召力大，实际上是日军另有打算，他们在华北扶植有实力的人，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并在几个实力派中间造成矛盾，他们决不会使华北军事实权统统掌握在一人手中。

对南京汪伪组织的活动。1940 年 3 月汪伪政府成立后，张岚峰认为这个政府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不同，与南京的伪维新政府也不同，它们都是地方性的政府，或者是临时性的政府，而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他所组织的政府，就其规模来说，是一个“中央政府”。张并做过这样的推断：假如日军再进一步向西南进攻，截断重庆国民政府的后方交通线，失去了英美的援助，抗战就无法再继续下去，到了那时候，说不定蒋汪两个政府会合流的。因此当汪伪政府成立后，张立即对汪表示拥护。而汪精卫袍笏登场之后，也正需要有枪杆子的人为他捧场，于是电召张岚峰到南京见了面。汪除了大谈其“曲线救国”的汉奸谬论外，还对张夸奖一番，说他的军队训练得好，风纪也好，继承了西北军的优良传统。张岚峰为了取得汪精卫的信任，在 1942 年春便亲率一部分伪军官去南京参加了汪伪组织的军训团受训。

他为了交欢汪伪组织上层人物，在南京珞珈路置有一幢精美的楼房，他每到南京，这幢楼房就成为“公馆派”（当时汪逆亲信人物的总称）的俱乐部。他与周佛海、陈春圃、汪孟晋（汪逆之子，汪伪军委会军需署长）等，在互相利用的条件下，打得火热（这所房子在日本投降后，蒋政府迁回南京，又成为汤恩伯等与张接头密谈的地点）。

由于在南京活动的结果，汪伪组织发表张部为伪陆军整编第一军，半年后就扩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后又扩编为第四方面军。

汪精卫死后，张岚峰同陈公博又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5 年 6 月陈公博到商丘“视察”，与张岚峰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谈话。据事后透露，陈公博看到这年 2 月罗斯福、邱吉尔亲至雅尔塔，与斯大林举行会议，苏、美、英三国发布了关于雅尔塔会议的公报，5 月 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眼见苏、美、英三国很快就可以把大量军队转移到东方来对付最后一个敌人，日本失败是注定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陈公博不得不亲自

出马，同掌握着枪杆子的伪军头目们筹商对策。他除了同商丘的张岚峰进行勾结之外，还同苏北的孙良诚、徐州的郝鹏举、泰安的吴化文、开封的庞炳勋以及武汉的叶蓬等进行了勾结。他企图把这些伪军联合在一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旦中日战争结束，他就可以依靠这些伪军作本钱，向蒋介石作政治交易。当然，这种作法，对于各个伪军头目说来是有利无害的，所以在陈公博离开商丘以后，张曾得意忘形地说陈公博对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如何重视，如何赞扬，还说这次见面谈得很好，谈了很多重大问题，今后一切都有办法。

张岚峰对国民党方面，最初只是与刘汝明、冯治安（冯的秘书王尔石曾在张部任处长、秘书主任等职，是冯派驻张部的联络员）等有些联系。后来，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官员或家属不断往来于蒋管区和敌占区，而界首黄泛渡口到商丘则是一条通路，他为了讨好蒋介石集团，对于路过商丘的蒋集团的人，总是多方掩护，竭诚款待。有一次冯治安的小老婆沈丽英经过商丘前往冯的防地，由于殷勤招待，保护周到，沈丽英就将她的妹妹沈丽芬留给张岚峰做了小老婆。蒋集团军政部门经常派人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进行活动，需要掩护的常是换上张部伪军服装，携带张部护照，然后进入敌占区。由于他对蒋集团派往敌占区的人员提供了便利条件，遂得进一步同蒋集团的特务头子戴笠挂上了钩。戴笠先是派他的部下牛朗初（牛是柘城大地主，与牛乾初、牛星垣等为同族兄弟），作为驻张部的联络员。张为了表示亲密，将次女认在牛的名下作义女。后来戴笠又派了一个比较高级的特务韩愧生带着十几名小特务来到商丘，加强联系。他们究竟搞些什么特务活动，无从了解。但是他们凭借张岚峰势力，大做生意，则是人所共知的。

张岚峰除了同戴笠的联系以外，同蒋鼎文、何柱国、汤恩伯、熊斌等都有信使往还。大约是在1944年，熊斌还派人给张岚峰送来一件新编第三路军的任命状。由此可见，张岚峰对蒋集团的勾结，是取得了成效的。

张岚峰对解放区也有过联系。他的一个师长杜新民和一个团长王继贤，据说当时都是地下党员，他们的政治情况，张是否晓得，是否通过他们与解放区取得联系，无从了解。仅仅知道在1945年6月间，解放区曾派一位代表到商丘来过一趟。张岚峰觉得自己很聪明，仍然耍了他那一套八面讨好的骗人手法，他曾经表示，希望取得八路军、新四军的谅解，并且表示：现在自己的力量还很不够，等到把“华北治安军”拿到手以后，就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宣布起义（张对笔者是这样说的。至于他同解放区代表当面怎样谈的则不得而知）。

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张岚峰还同其他伪军头目孙良诚、郝鹏举、吴化文等有过秘密结合。他们都是西北军集团的旧人，他们也都意识到当汉奸不会有好的下场，因而不能不有所打算。但是他们又不肯立即摆脱自己的汉奸地位，而是错误地认为，只要他们这几个人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团体，采取一致行动，有了雄厚的资本，就可以同各方面进行政治交易，不管大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他们投靠的对象主要是蒋介石集团，而方法是通过旧西北军的关系、如冯治安、刘汝明、曹福林等的中介，使自己的军队变为国民党军的一部分。同时，尽可能避免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以免消耗自己的实力。但是，他们这个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实现，而是各自走了各自的

路，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反人民内战中，有的起义了（吴化文），有的投诚了（孙良诚），有的起义之后叛变最后被消灭了（郝鹏举），而张岚峰所走的路子，则是自始至终甘心为蒋介石卖命，当他的军队开到鲁西不久，就被人民解放军所歼灭，他自己也当了俘虏。

张岚峰为了接待来自各方面的客人，在商丘城内复兴一街十九号搞了一个招待所（解放区的代表不在这里接待）。客人们的身份非常复杂，旧西北军人自然不在话下，其他各方面，只要有人介绍，都在招待之列。十九号招待所，当时在商丘是尽人皆知的。外地客人从商丘车站下火车，只要说一声"我去十九号"，不须讲价钱，三轮斗车（当时商丘有一种客人坐在前边，登车的人骑在后边的三轮斗车）便把客人送到十九号。十九号客人有不少是要求代为输送物资的，有一次因为东西太多（一批西药运送河西），押运人疏忽大意，被日军查获，并将押运人张部军医处长李执中扣押起来。后来经张多方交涉，始将李执中释回。

三

张岚峰在豫东几年中的罪恶活动，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即以武力掠夺金钱，以金钱扩充武力。

张在豫东大量招兵买马，对各地来投奔他的各项人员，他总是来者不拒。他的部队编制几乎每月都有变动。他从 1939 年下半年就开设了修械所（制造步枪、重机枪），以后又设立了制革厂、被服厂和军粮局。凡此种种，都说明每月庞大的开支，绝不是他从上级机构领到的几文有数的饷项所能应付的。1941 年张部划归南京汪伪政府，驻地不动，每月由南京伪财务部门发给"储备券"。"储备券"没有准备金，价值低落，长江以北拒绝使用。而且自 1942 年起整个敌占区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直线上升，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谚语："孔子进天坛，五百当一元"。是指华北敌伪准备银行发行的五百元一张的钞票，左为孔子像，右为天坛图案，只能当一元行使。张部的扩充，又是凭着什么力量呢？当时敌占区的生活必需品，一日数涨，一般劳动人民想购杂合面也不可得。特别是在日军"强化治安"的情况下，豫东地区的太康、睢县、扶沟、鄢陵等县又出现了百年不遇的荒年，树皮草根吃尽后的饥民扶老携幼，四出觅食。商丘南关跑马场曾聚集了几百饥民，由于豫东伪军政当局不肯赈济，三数日后，尽数成为饿殍，遗尸饿犬争食，真是惨不忍睹。在此广大人民遭受沉重灾难的时候，对于张岚峰这个伪军头目来说，不但没有受到影响，相反，他却认为物价波动越大，正好推波助澜，从中渔利。他利用驻区接近界首黄泛渡口，凭借武力大搞生意，后与河西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勾结起来，更是为所欲为利市百倍。后来，又在永城、亳县、鹿邑、淮阳、太康放种鸦片，毒害地方，攫取暴利。

第一个为张部搞生意的是柘城牛星垣和牛的助手范镇坤、张嘉树等。牛在商丘的据点是复兴一街十九号（后来改为招待处）。他贩运日本产品大罗纹、小罗纹卷烟盘纸，德国颜料，中国永利火碱。这些商品渡河后，便有十倍的利润。1941 年以后，日军对于后方封锁交通，除香港和重庆有一线航路外，界首黄泛渡口便成了一个主要交通孔

道。于是投机商人用整列火车贩运布匹、纸张、火柴、纸烟、日用百货，由商丘车站下车后，再用数以千计的人力架子车运送界首渡河。由于国民党政府控制区通货膨胀，而且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不能在沦陷区域行使，于是就采取了物资交换的办法，以西运的货物换回大秦岭、桐柏山等地所产的桐油、生漆和川、陇、云、贵的药材。这些商品的运进运出，都以商丘为转口码头。张部伪军及其属下的师部、团部便到处设置税卡，以保运为名，坐地收税。至1942年日军严格封锁物资，渡河而西的货物悉遭日军查扣没收，一般行商相率敛迹。但是牛星垣所搞的生意因为伪装为军用物品，以张部军用大卡车运至十字河张部驻军韩循先团防地，再换架子车由军队保护通过“真空”地带（从十字河到界首数十里，双方不驻队伍），从界首渡河。几年中的营运，并未遭到一次损失。这就是补充张部军需的一个重要来源。

1943年7月，张部成立财务处，下设华兴公司，内分纸张、布匹、油漆、百货、粮食等部门，并自设堆货栈（筹办造纸厂，未及成立），规模是相当大的。华兴公司开业时，正值日军严格封锁物资，一般商人不敢再冒风险，以致后方日用百货腾贵；而生产的生漆、桐油、药材等土特产品，却积压运不出来。华兴公司用张的名义一方面打通日军驻商丘的部队，一方面勾结河南国民党河防部队，最初试行以货易货的办法，由双方商人协议等价交换商品，华兴公司从中抽取10%的护运费。后来通过军统关系与戴笠、汤恩伯等勾结起来，又取得许多便利条件。华兴公司一手接受河西假伪钞（军统伪造沦陷区的伪钞票，未被人识破）及桐油、生漆、药材等土特产品，一手送出布匹、颜料、纸张、百货，华兴公司不用分文资本，一转手之间，即有高额利润到手。从1943年到1945年，虽然时间只有两年，但华兴公司攫取到手的金钱与货物就大为可观。此外，华兴公司在亳县设庄屯积粮食，在朱集、马牧集各地收集棉花，在亳县、鹿邑各地收买烟土，压价买进，高价卖出，华兴公司在有钱有势的条件下，进行榨取掠夺，自然十分顺手。因而一批一批的巨款上缴到张部财务处，这是张部第二个财源。

侵华日军在军事侵略之下，还实行了毒化政策。他们在河南通过地方伪组织，迫令商丘和马牧集一带播种鸦片，是从1939年开始的。“红红白白四望平，万花捧出古宋城”，出现了触目惊心的奇异景色。张岚峰为了迎合日本主子的意图，同时又可以从中榨取财富，于1941年在亳县、鹿邑驻防区放种鸦片。当时因遭到本部官兵（多为本地人）及亳、鹿两县地方的反对，未即实现。后来，张授言陈扶民（张部参谋长）以筹饷为由，先冲淡了内部反对种毒的意见，后来又通过地方行政机构的疏通和压力，消除了地方上的反抗，终于1943年在亳县、鹿邑、永城等地放种了鸦片。

1943年下半年，张部增设了财务处，同时在财务处内设立了“禁烟委员会”（其实是放种毒品的委员会），会内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处长兼任，副主任委员二人，由副处长兼任，委员若干人，由伪县长、伪区长兼任。所有登记烟农、发种子、查苗、收浆、制砖、售卖俱由该会处理。其办法：先一年秋后烟农在本联保办公所登记种植亩数，按亩数领取鸦片种子。次年麦苗返青时，由联保选派集保长若干人，组成普查小组实地普查，某村烟农若干户，每户各种若干亩，是否与登记领种子数字相符。如有未经登记而自种的，以私种上报处罚。普查结果，联保报区，区报县，县报“禁烟委员会”备案。至清明节以后，由区公所组织复查，派联保长若干人组成复查队，实地复查。发现多种

少报的加重处罚，并追查普查组有无串通作弊的情况。复查队勘出确实缺苗的烟亩，由复查队负责人查明情况，依实核减（如原报十亩，只有八成苗，即核实为八亩）。复查队核实后，作为定案，不能再变动。然后再由“禁烟委员会”秘密派人持册分头抽查，抽查重点，在于清查各级经办人员有无以多报少、营私舞弊的情况。抽查人深入农村访问，同时奖励告发。农历五月下半月新麦登场后，正是烟农割浆、晒土的时候，“禁烟委员会”即选定交通适中的乡镇，分设收土站（一县三五处不等），由“禁烟委员会”选派一人负责，下设鉴定人（辨识成色）、过秤人、记账人、保管人组成收土站。按照烟农烟亩核定册，由联保主任按户催交，每亩无偿征收“协饷”实物（即烟土）10两，由烟农送到指定的收土站交纳。迟交或掺假的严加处罚。烟农交纳10两以外（每亩产烟土最多可产60到70两），可以在张部驻防区内自由出卖。

1944年，“禁烟委员会”即用以上办法在亳、鹿两县征收烟土3万余两，在亳县制成烟砖30余箱；1945年又在亳、鹿、永、太四县征起烟土10万余两，集中鹿邑制成烟砖100余箱。全由柘城县人张淳风负责主持。这些烟砖大多数售与上海烟土大王“宏济善堂”盛幼庵。

麦秋以后是烟土成交季节，外地前来张部防地收买烟土的客人，麇集商丘，先到“禁烟委员会”登记，按照收购计划的比例交押金（押金就成为“禁烟委员会”的收入，并不退还），由“禁烟委员会”指定地区，令其自往设庄收买，并通知驻军加以保护，并由“禁烟委员会”拨借载重卡车代为运送商丘车站。

豫东的烟土，除了外路客人收买外，张部财务处所属的华兴公司也大量收买，当地绅商和张部军官也零星收买，屯积居奇。商丘城内稍大的商号、货栈、旅店、妓院、饭庄，家家开灯供客，街市上公开出卖烟具，日本制毒贩毒浪人来往商丘的人次也日益频繁起来。烟膏店、白面儿馆（即零售海洛英的）触目皆是。后来又听说张曾秘密在鹿邑安平集派人设厂制造海洛英，就在王新民的伪军司令部附近，由王负责保护。

张岚峰是忠实执行日军毒化政策的帮凶。但他却自鸣得意地把放种鸦片说成是开阔了可靠的建军经济来源。

张岚峰在豫东的几年中，搜刮的钱实在太多了（局外人无从知其数字），除了扩充伪军、购买房产、屯积物资和进行政治活动所需的金钱以外，还在徐州由张部独资开了一个“志中银行”，由汪龙玉任经理，时间约为三年，业务相当发达。当他开这个银行的时候，曾经对他的部下说：“这个银行是本军的金融机构，我们要依靠它为本军打下一个经济基础。”但当该行结束以后，银行的全部资产却变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了。

四

如前所述，张岚峰用尽种种方法同各方面拉拢关系，可说是尽了最大的能事。他对于自己的内部，则有意识地制造矛盾，甚至进行暗杀的勾当。

张岚峰由于本人诡计多端，因而对自己的部属也不敢信任。他往往使用权术，把一个权限之内的任务交给几个部下去搞，使之彼此牵制，互相揭发，互相攻击，以便于自己操纵驾驭。本来张部的伪军官就分为两派，一派是原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的人，如

张岚峰、黄宗颜、陈扶民等；一派是原韩复榘的第三路军的人，如杨茂林、史景洲、李金镖等。他们虽然都是原西北军的同事，但是早在冯玉祥统率西北军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大集团中分成了若干个小集团。到了西北军瓦解之后，更谈不上什么旧团体的关系，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凑在一起互相利用罢了。

张岚峰组织伪军的初期，是以原在第三路军的杨茂林为主要支柱的。后来，原二十六路军的人越来越多，二十六路军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两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加深。杨茂林就是在这个矛盾中被张岚峰干掉的。

杨茂林，柘城县人，是1917年冯玉祥在豫东招募的四十三团的新兵。韩复榘长时间带着四十三团。杨茂林曾当过韩复榘的传令兵、随从副官、卫队连长、卫队营长，一直跟在韩的左右，成为韩的亲信。

1938年年初，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扣押解送武汉枪决，杨茂林及其原四十三团的同乡旧弟兄们同时解散回家。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国民党军队西撤，人为的黄河决口造成了中牟、尉氏、鄢陵、扶沟、淮阳直达正阳关，宽70里、长达500里的黄泛区。黄泛以西，成为国民党军喘息整顿的地区；黄泛以东，国民党地方官吏弃职潜逃，形成无政府状态。其不及逃窜的国民党小股部队以及从县区撤出的地方武力，就变为地方上的流寇，到处抢劫。当地豪绅地主以成立自卫队为名，招收壮丁，四出搜索枪支，强借粮食，劫掠乡民，敌寇未到，地方秩序已经大乱。杨茂林看到这些情况，认为浑水摸鱼的机会已到，他纠合由韩部还乡的旧弟兄和其他部分退伍家居的军人，与豫东流寇股匪拉拢合并，用大吃小的办法，很快地拉起一伙人数过千、枪支半数的所谓自卫队。恰好张岚峰的伪豫东招抚使的招牌挂起，杨茂林便首先带着这伙人在张处报了名，请张点验收编，当日就为张担任了警卫。这样，就成为张的基本力量。后来王新民、韩循先、宋子贤、张人杰、曹大中、李忠义等先后投张，张部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1939年6月29日，曹、宋、张、李等拉着两个师渡河投往国民党军，他们不但拉走了张部大部分实力，而且在日军方面为张闯了大祸。这个突然的事件，使张惊惶失措，急得要死。当时杨茂林站在张的面前，痛骂曹、宋等不够朋友，并向张表示，要与张同生死，共患难，拥张到底。曹、宋拉走后，日军追究责任，将张囚于开封，杨茂林始终表示对张的支持，张后被释回到商丘，重新扩编队伍。

杨茂林跟随韩复榘时间很长，他的刚愎残暴傲慢的性格很有点同韩复榘相似。他和张部的同事们，除了同李金镖（李与杨同是韩复榘的传令兵出身，二人是换帖弟兄，李在张部任被服厂、制革厂、面粉厂几个厂的经理）时相过从外，其余的人有往来的很少。他一怒就要杀人，其残暴不在韩复榘之下。1943年7月他升任伪第一军军长后，最后一次由淮阳赴商丘，向其同车人指点经过的村庄说，这庄我杀过多少人，那村我杀过多少人，显示他杀人的"成绩"。

杨茂林自以为是张部的柱石，有时对张也表现了桀骜不驯，使张感到尾大不掉。当1943年春张部扩大编为伪第四方面军时，下辖伪第一、第八两个军。张就想乘此机会升杨为第一军长，将杨的第十七师师长拿掉。杨认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了实权，抗不受命。后来经过多人的劝说，才勉强地接任第一军长交出第十七师师长之权。

杨平日对于来自二十六路军的黄宗颜、陈扶民等看不起，他不和黄、陈等往来，偶

有接触，他的态度也使黄、陈等感到难堪。1942 年黄宗颜接任伪第十八师师长，接事不久，便与日军发生了小冲突。日军提出黄系国民党军官，不能任张部的师长。杨也攻击黄靠不住，恐重演“六二九”（曹、宋拉走队伍之日）的事故，黄马上被调离第十八师。同一年，陈扶民接任张部参谋长，颇得张的信任，但与杨时常发生磨擦，大有势不两立之势。1943 年春，陈扶民任伪第八军军长，辖第十四、第十八两师，驻亳县；杨接任伪第一军军长，辖第十六、第十七两师，驻淮阳。陈与杨势均力敌，平分张部实力。陈、杨二人在张的权术驾驭操纵下，各不相让，明争暗斗，日益尖税。杨为人粗鲁直爽，人们称之为厕坑石头，又臭又硬，自己先孤立了自己；陈则貌为平易近人，实乃居心阴险，他在张部大事拉拢，与中上层实力派打成一片。陈并且联合对杨不满的人，迎合张的心理，向张提出“为了本部的团结一致，为了团体的发展前途，必须将杨茂林干掉”。据后来了解，张最初坚决反对，后来模棱两可，最后就被陈等牵着鼻子走。

杨茂林是怎样被杀掉的呢？事后听说，是陈密令执法队狙击的。时间是 1944 年 7 月一个酷热的晚间，由换着便衣伪装暴徒的执法队执行狙击任务，他们趁着杨与张谈话后，从张的住所返回其住所，经过小梁隅首时，突然狙击，乱枪打死了杨茂林。事后，我亲耳听到小梁隅首一个烧饼铺的伙计说：“当晚正要上板关门了，忽然传来了五六个穿便衣带盒子枪的军人，进人铺中不走，并不买烧饼，好像等人似的。过了好一会，街上铺面都关门了，行人也少了，他们有在外边瞭望的，说了一声‘来了！’他们就一个个都溜出去，分站在街的两旁，这时杨军长坐在一辆人力车上，由南往北缓缓而来，他的三个随从副官跟在车后。这时站在街上的便衣军人喊了一声‘站住！’便一齐向杨开枪了。拉车夫放下车把跑了，杨的副官两人开枪还击，一人趴在车上以身掩护杨受了重伤，杨身中六七枪顿时毙命，便衣军人也有一人受伤，后来被抬走了。”

五

张岚峰在豫东的几年中，地方上流行着“只要会说柘城话，皮带就发叉”（指那些挎武装带当了张岚峰伪军军官的人）这样的口头语，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张部中下级的喽罗，柘城人确实居多数。尤其是张的亲属，在他的包庇纵容下，更是无恶不作。最为突出的是张的叔叔张光甫，在当地横行霸道，罪恶极大。

张岚峰在幼年时即作张光甫的嗣子。张光甫本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因不安于耕作，由张的关系，曾在西北军某部骑兵营担任马夫。当张在豫东当了伪军头目的时候，张光甫便以“老太爷”的身份出现在柘城县城。他强占了南关城濠一段地皮，建起了一所楼房，在地方伪区保长的逢迎下，他搞了七个小老婆。张光甫自封为骑兵团长，聚集了几县的兵痞流氓，加委封官，并倚靠这些人作眼线，在柘城及附近几县搜索马匹，有的发给不及所值的半价，有的竟是抢夺而来，甚至用掳人勒赎方式，将马主抓来扣押，送马来，才放人。他的骑兵团有良马 500 匹，当时柘、鹿、淮几县的好马被他搜罗殆尽。他的住所即骑兵团部，守卫森严，他的会客室，成为审理诉讼的“公堂”。他还私设牢房，把抓来的人非刑拷打。不少善良的农民，在他这里被拷打致死。

张岚峰对张光甫的行为，不但不加约束，有时还称赞他有办法，说他白手搞起个骑

兵团，这就更加助长了他的凶恶行为。后来张岚峰的参谋长及军长们认为这样纵容张光甫乱搞下去，会影响全军的声誉，且恐打乱了几个自给县的行政系统，大家坚持要收回张光甫的兵权。张迫于众议，要求张光甫交出骑兵团，张光甫躺到地下，打滚不起，张竟无可奈何。经过几次研究，将骑兵团内助桀为虐的一批人予以撤换，并限制张光甫不得再问诉讼，擅捕擅杀。张光甫为了保持骑兵团长的位置，当面承认遵命办理，但是不久又恢复了故态。1947 年夏季柘城县再度解放，张光甫被逮捕，经过人民宣判，就地枪决。

六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张岚峰失去靠山。虽然蒋介石由重庆发出电令，承认张为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司令，要其部队原地待命，但由于后方开来的掠夺胜利果实的蒋系部队都以抗战功臣自居，对于这个由伪军变来的第三路军司令自然是看不到眼里。他们只知道向张部要汽车，要马匹，要物资（最初只限于军用物资，后来无物不要），后来竟整营整团地要队伍，来补充他们的空额。张虽毕恭毕敬，奉命唯谨，但是过往的蒋军源源而来，时间一长，就使得张感到无法应付了。有的竟因为主客之间的某些冲突演成小型巷战（刘昌义的部队经过商丘与张部执法队在城内发生械斗）。是年 9 月（农历中秋节之夜）张部第十八师师长杜新民率领十八师全体官兵在永城起义，其后第十四师团长王继贤在亳县又率一部分官兵起义。内部的分化和外来的打击并勒索，使张对于追随国民党的信心发生了动摇。

军统特务韩愧生、牛朗初等虽然不经常与张接触，但这些狗腿子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把张部的情况及张的态度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便于 1946 年 2 月命刘汝明用长途电话通知张："委员长召见，速来南京。"张得到这个电话后，马上兴奋起来，赶到南京后，由刘汝明带领和蒋见了面。他曾向其僚属叙述见蒋的一段经过。他说："委员长对我的出身、学历以及入伍的年月和以往的经历，都非常清楚。委员长称赞我们在商丘这几年应付日军，维护地方，作得对。在沦陷时期出力掩护中央各部分人员由商丘出入，他都很清楚。并关切地问到我家里每一个人。委员长勉励我们好好地干，我们的队伍一定保留下来。……后来同委员长一起进了午餐，饭后又同委员长一起照了像。"蒋介石接见的次日，陆军总司令部为张举行欢迎宴会，许多高级将领，尤其是日本士官出身的将官如汤恩伯等都参加了宴会。张当日醉醺醺地回到住处，表现出十分得意的神情，将见蒋的经过，写成书面材料送回商丘交部队传阅，并将与蒋合照的像片放大带回商丘悬挂在会客室。

张回商丘后，时时向部队讲话打气，大弹其"拥蒋反共"的调子。后以私人关系得到冯治安（第三绥靖区司令官，驻徐州）部拨送一批重迫击炮、重机枪的补充，并由上海买到几十部大卡车，加强了战斗力。1946 年 11 月张部改编为河南省保安队，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任司令，张任副司令，队伍集中陈留，对黄泛区解放军金少山、王其梅、魏凤楼等部进行戒备。当年 12 月又改编为国民党国防部第三纵队，归刘汝明指挥。1947 年 1 月解放军刘邓大军由北向南推进，蒋军方先觉部在金乡被围。蒋令刘汝明军

刘汝珍部与张岚峰部齐头并进，以解救方先觉之困。刘汝珍按兵不动，张亲率一旅一团的兵力，分乘大卡车驰往解围，在金乡以西万福河附近与解放军遭遇，激战一昼夜，张部全部被歼。张只身逃入城武，又从城武逃往曹县，即将越出曹县县境，小溪当前，张涉水登岸，为曹县民兵所俘。民兵将张解往刘邓大军指挥部，首先见到李达参谋长，李系西北军军官学校学生，犹能识张，见张被俘的恐惧与严冬涉水后的寒战，十分狼狈，当予安抚，并脱下自己的皮大衣与张御寒。

张被俘后，曾要求捐献北平的房产（当时北平尚未解放）和私蓄，派人持信与他的老婆张志兰联系，为其亲属所阻挠而未果。据闻张已于1954年病故[①]。张部残余部队，经缩编为国民党暂编二十四师，师长为黄宗颜，旅长为王新民、陈扶民、丁葆仁，分驻砀山、灵璧一带，于1948年淮海战役中全部被歼。

（1964年）

附记：本文大部分材料是由王慰农提供的。经王式九作了文字上的整理和部分材料的补充。前面的署名——宋一民，是笔者的代号。

① 张岚峰于1952年病逝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我参加汪伪政权“中央集训”的经过

杨 绍 权*

1943 年 5 月，我以汪伪政权驻朝鲜元山领事馆随习领事的职务调回南京伪外交部亚洲司办事，当时的工作虽是暂时翻译伪部长褚民谊的日文信件，而主要的原因还是调我回国参加汪记国民党公务员的“中央集训”。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陈国丰（陈璧君的侄儿）于 1942 年冬，曾到日本和朝鲜各地“视察”，对我颇有“好感”，他称我为“具有广东豪华风度”的“青年外交官”，因而向伪政府提出调动回国受训的建议。这一集训是由伪国民政府、汪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新国民运动全国促进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集训时间是 1943 年的 7、8 两个月。地址在南京鼓楼金陵大学原址（沦陷后改为中央大学，是时适为暑假）。共分为两个集训营，一个是“公务员营”；另一个是“青年团营”。“公务员营”的受训人员，以伪中央各院、部及地方各省、市抽派荐任以上文官为对象，虽不限于汪记国民党党员，但主要的是“亲日”分子。每一单位抽派 4～8 名，全营共计 200 名，按照军事训练的编制，编成一个大队，包括三个中队、九个小队。营长及副营长由伪行政院正、副秘书长陈春圃、巫兰溪担任。“青年团营”是由各省市汪记青年团抽派高中以上的团员代表参加，也是 200 名，其所有编制与“公务员营”相同。营长和副营长由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次长冯节担任（过去宣传部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汪伪政权则移置于行政院，因它是和日本军报导部直接联系的情报机构之一）。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恂，亦以广东大学学生的身份，代表广东省汪记新国民青年团总部参加受训。

一、集训的原因和目的

自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国人民抗日力量沉重地打击着日本侵略军。到了 1943 年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展开游击战，歼灭日、伪军，使伪政权陷于日暮途穷之境。而国际上，苏联又已开始反攻希特勒匪徒的侵人。愈来愈不利于“轴心国”的形势，使日本军国主义岌岌欲危。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汪伪政权便利用反共的条件，暗中与蒋介石勾结，相互呼应。为此，伪政权不得不挑选一批“心腹人”来加强“反共亲日”和“联蒋”的培训，以维持汪精卫的统治。所以集训营的“四大纲领”标明为“复兴中华、服从领袖、善邻友好、防止共产”。

我在朝鲜年久，几乎每天读报，读的都是日系的《大阪每日新闻》、《朝日新闻》、

* 作者当时系汪伪国民政府驻汉城总领事馆副领事。

《京城日报》等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报纸，对于国内的具体情形实在陌生。回到南京接触到的事物，感到有些“稀奇”。例如对于汪、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不十分明确，从而这次受训在当时我认为实有必要。

说到汪、蒋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他们互相之间是表面上有矛盾，而在骨子里则是充满着勾结的精髓。这是因为他们在反共战线上的行动是一致的原故。汪精卫在“还都”伊始，就提出了“两个国民政府总归合流”的说法，宣传蒋介石必会因反共的关系而卷土重来。

也正因为这样，汪伪政权内部之间亦是矛盾百出的。汪精卫的亲随心腹，只有陈公博、林柏生、周佛海等人，虽然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秘密筹备组织伪政权时招收了一部分原来“国民政府”的流散分子，但是，中层骨干毕竟不多。在“还都”的初期，只好把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原来的“维新政府”的人员整个包了下来。梁鸿志的所属大部分是福建人，因此他的潜势力在汪伪政权中还相当大。梁和汪虽然是等同的汉奸，但梁是北洋军阀“安福派”的遗物，又是直接依靠日本军部势力起家的，他向日本投降，完全没有任何要求和条件。汪则在政治上要花枪，搞什么“大亚细亚主义”。两人在政治的见解上，颇有分歧，而日本的牵线人更利用这种分歧，使一场木偶剧演得更热闹。所有关于汪记国民党的活动，梁鸿志都拒绝参加。他还在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面前说汪精卫的坏话。汪、梁两人有一段时期甚至避而不见、见而不打招呼。这次集训，汪精卫亲自出马，担任“集训委员会”的委员长，并且还担任最多钟点的讲课，开学及结业典礼亦到场主持。伪政权五个院的院长除梁鸿志外（汪精卫自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江亢虎任考试院长），都在开学典礼时出席训话或致祝词，江亢虎称受训人员为“天子门生”，以捧汪精卫为“正统皇帝”，从中可见汪、梁二人芥蒂之深。

二、集训的课程

集训的目的既如上述，课程当然围绕着这一重心来编订了。在集训的两个月内，除星期六下午为集体娱乐活动外，每天上课六小时，晚间则为课外活动二小时，包括小组讨论、写学习心得等。星期六晚及星期日整天休假，得出营回家休息。课程分为三个部类，即基本理论、辅导讲演及军事训练。

基本理论的项目如下：

名　称	教师姓名	伪　职	课时	内　　容
新国民运动纲要	汪精卫	汪记国民党总裁、伪国民政府主席	9	宣扬亲日，实行反共。指出对这二者从生活和工作上如何进行的具体方针和措施。

名 称	教师姓名	伪 职	课时	内 容
领袖言论	林柏生	伪宣传部部长	6	宣讲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唯武器论”和“反共建国、和平对日”等言论。
三民主义	周佛海	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	9	只讲《民族主义》（一部分）和《民权主义》，以其所著《三民主义理论之体系的分析》为基础，歪曲三民主义。
大亚洲主义	陈公博	伪立法院院长	3	讲孙中山在横滨对华侨的一篇演说词但加以删改、歪曲。
中国国民党党纲	周学昌	汪记国民党中央常务训练团教育长	3	包括国民党党纲、党章、党员须知的分析，并讲党务工作的实施情况。
世界大势的趋向	陈昌祖	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	3	主要分析当时“轴心国”和反法西斯阵营两个营垒的国际形势，结论是“轴心国必胜”。
中国新外交	褚民谊	伪外交部部长、大东亚联盟协会主席	3	讲伪、日双方间的勾结关系和活动的经过。
中国新军事	鲍文樾	伪军政部部长	3	讲伪军分化蒋军和与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对抗的情况。
国民政府组织	徐苏中	伪国民政府文官长	3	包括伪政权的机构、组织系统及“内政问题”。
和平建国原则	唐 蟒	伪国民政府参军长	3	讲伪政权的亲日反共具体方案和实施的概况。

这些所谓的基本理论，是一整套的汪精卫亲日反共的主张和执行的概况。而汪精卫亲授的《新国民运动纲要》则是它的核心。汪精卫说：“孙中山是主张中日合作的，而蒋介石竟走上了依附欧美的道路，背叛了孙中山。但是，这不妨碍于我们的和平建国。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走着走着，终归会有一天大家碰头。现在已经接近脱离摸黑的时候，天亮了，就是全面实现和平之时。如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加强反共，使治安强化起来。我们费尽了心机，来实现亚洲的和平，谁知内部的人还在泼冷水，这要不得……”这番话，就更进一步地把我们推向反人民的罪恶深渊，使我在伪政权的后

期益发加深了自己的罪行。

辅导讲演是围绕着“基本理论”而宣讲的专题报告，以汪伪政权各部门的负责人分担其业务范围的专题。计有：1.《皇军必胜，剿共必成》，由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导部长柴山中将担任；2.《东亚局势与中日邦交的新发展》，由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担任；3.《中国目前军事的进展》，由伪陆军部部长叶蓬担任；4.《中国海军的前途》，由伪海军部部长任援道担任；5.《国民政府的财政与经济》，由伪财政部次长陈之硕担任；6.《中国目前的内政情况》，由伪内政部部长陈群担任；7.《反共和平建国的工作》，由伪经理总监公署总监何炳贤担任；8.《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政策》，由伪粮食管理委员会委员长顾宝衡担任；9.《接收沪津帝国主义租界的经过及其今后实业的发展》，由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①担任；10.《司法行政工作》，由伪司法行政部部长梅思平②担任；11.《调查统计工作报告》，由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担任；12.《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由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巫兰溪担任。以上各项专题报告，得作笔记，但不得携出营外，以防止泄露保密数字，特别是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的数字。所有笔记簿亦于结业时全部缴销，不许携带回家。

军事训练则编成一个大队，包括三个中队，九个小队，每个小队23人。大队长王克翔，原是蒋军的旅长，投敌后升了官，任伪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各中队长是由伪军事教导团调来，他们是该团的上、中校教官。在集训营里的军训课程，都按照伪军官教导团的术科和学科节略讲授，并且进行操演。操典采取“德国式”的，只有操法而没有实弹射击。学科则注重《斥候学》、《筑城学》和《陆军战术》，没有海、空军的有关课程。操演时学员都不很感兴趣，只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那些教官对于“老爷兵”们亦不敢怠慢，在操场上自己口讲指划的时间比较多，以便腾出时间让学员多休息。

每天上午8：00至8：30为“朝会”时间，举行升旗后，高呼“复兴中华、服从领袖、善邻友好、防止共产”的口号，由营长或副营长领呼。呼毕，营长进行检阅，并作《精神训话》。训话的内容，从时事报告到个人生活，无论大事、小事，任便一题，没有什么固定的范围。我们在集训期内，适值伪航空总署举办“第一届首都滑翔飞行表演”，由汪精卫以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颁发奖杯。汪精卫“手谕”全集训营的学员，到小校场会场参观，并指定会后回营讨论，作为军训课程项目之一。

三、营中所见所闻

伪外交部派至营中受训的四名学员，除了我以外，还有总务司电报科科长蔡朝骞（台湾人，东京留学生，精通日语）、总务司会计科荐任科员陆宗亮（广东中山人）、总务司文书科荐任专员林志钧（福建闽侯人）。他们都是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陈国丰的得力助手。我们在受训期内，一切食、宿等费用，由集训营供给。而本人在伪外交部应领

---

① 陈君慧于1943年9月10日接替梅思平担任伪实业部部长。而集训时间则是1943年8月底前。此处有误。

② 1943年7~8月间的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应为罗君强。

的薪俸及各项津贴、补助，一律照支。另外还由汪精卫个人发给加菜金2000元，褚民谊个人发给津贴费1000元，由我们自由使用，不用交到营内。而每次聚餐的加菜，则是由营内公费开支。这时伪钞已脱离“军票”单独流通，物价不断上涨。伪政权的中、下级职员依靠工薪过活，在通货日渐膨胀的情况下，生活感到窶蹙，碰头都是唉声叹气。只有我在朝鲜带回的积蓄较丰，又有这种种的津贴，是比较阔绰的，每餐都有小灶加菜，或鸡或鸭，委托营中炊事员烹制，价格较市上约贵一倍。

在这里，我想插叙一下当时伪职员的生活。伪政权许多低级职员的薪俸本就微薄，由于通货不断膨胀，生活备受威胁，又加上城市的食粮缺乏，真是达到米珠薪桂的地步。有一次我在贡院前街路过，遇见一个身穿制服的伪军中尉，竟然追逐着行人求乞。伪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的几个錄事和科员，互相协议轮流请假，到芜湖等地去“跑小货”。据一个姓易的錄事说，每次从南京背四斤生油，到徐州换回两袋面粉，扣除火车、食宿等费用，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润，补助家人的米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对于伪政权已完全失去了信心。我遇到这些小职员时常听到他们发牢骚：“要想改行跑小货，却没有这许多气力，只可啃着这块骨头，苟延残喘!”。但是，和他们相反，那些高级的伪官吏，则无论衣食住行，都十分阔绰。汪伪驻神户总领事陈谟如，“赴任”之前，在南京六华居设宴招待伪外交部全体职员及亲友，竟摆酒25桌，光是十年老花雕酒就耗去近万元。

伪外交部派去集训的四名学员，并不在一个学习小组里。和我同编一组的10人，现已记不起他们的姓名。因为集训的都是荐任以上的人员，而且又是汪伪各院、部和各省、市选拔出来的符合集训条件的，生活是比较优裕的，那种对于生活的“威胁感”是很少的。他们为着个人利益的打算，则交织着既希望伪政权“长久”维持统治下去而又顾虑着国内外情势允许不允许的矛盾思想。有一个同组的学员，姓王，是伪湖北省建设厅秘书。他知道我是汪伪驻朝鲜元山领事馆的随习领事，表示十分羡慕这样的职位。他说：在湖北境内，情况非常混乱，到处都是人民抗日游击战的力量，伪湖北省政府所辖各处机构，特别是外县各级伪机关，随时会遭受到游击队的袭击，伪官吏的处境异常危险，说不定何时就会丧命。这个伪建设厅秘书，原是伪湖北省主席的女婿，他以“知己”的交情，劝我不宜长返国内，并且表示遇有机会的话，他也到日本或朝鲜当外交官。他自信他的岳父能够有种种把握替他活动成功，因为这个伪湖北省主席是伪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的挚友。

和这个姓王的见解相反的，则是一个伪行政院编纂。他是汪伪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的，学员们都称他为“新状元”。他在伪行政院中，是秘书长陈春圃的得力助手。在这次集训营里，结业考试时，又得了第一名。他却认为伪政权既有日军支撑，又有蒋介石暗中来勾结，情况决不会不利，所以劝我还是留在南京，无须再跑到外国去。我出国多年，对国内的情势掌握不多，而在结业后行止问题上，颇为考虑，每次和同学们谈话，都离不开这一话题。我是赞成和采纳着那个伪湖北省建设厅秘书向我的提议的。在将近结业以前，营长陈春圃接见了学员，举行“个别密谈”，我是这样和他对答的：

陈问：“你这次回国受训一定对国内的印象很好，愿不愿长期留在国内，为我们的直接助手?”

我答："我对祖国的印象很好，不过感到经济情况比较混乱一些。可以不可以借鉴于友邦的经济统制措施，实行政府对物资的统制和管理，进行配给，维持币值，以利于民生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写学习心得时，作为对政府的条陈上书，谈得很详细了，营长大概已经阅过。至于愿不愿长期留在国内工作的问题，也正与这有关，回到朝鲜，在经济上的顾虑是没有的。我在那里年久，人地都相当熟悉，生活上也比较习惯，我还是希望回去。"

陈问："你是广东人，如果有机会的话，回到广东去工作好不好？中山县长包文，即将调到横滨当总领事，他的遗缺，我们看你足以胜任，这是营里对你提拔，去不去呢？"

我答："听说湖北方面的治安还很混乱，广东更远，尤其可以想象出来。我在朝鲜住惯了，还是希望回去的。"

陈说："在国内升得比较快，而朝鲜领事馆的名额有限，晋升是相当困难的。集训的目的原想提拔一批得力人员，作为主席的亲信，为国家出力，但是你始终坚持个人的见解，那就算了。"

四、集训的结果

在集训中，我被评为成绩优良，所以营长陈春圃对我较有印象。我们那一学习小组的辅导员是伪实业部参事陈国樑。这个简任官年龄才28岁，和我的岁数差不多，而且又都是广东人，我们很谈得来，在绩分方面给的特别宽，这就是我能够得到"成绩好"的原因。我当时很庆幸我是一个广东人，到处都受到同乡的"关照"。当然这是汪精卫的"大广东主义"的缘故，在伪政权中，只要是广东佬，那是比较"吃香"的。

结业以后，伪外交部根据集训营所提的意见，于1943年9月发表我派返朝鲜充当驻汉城总领事馆随习领事，并加副领事衔担任学务主任的职务。而和我同时受训的伪外交部总务司电报科科长蔡朝骞亦外调为汪伪驻日本神户总领事，总务司会计科荐任科员陆宗亮则派为汪伪驻湖北省特派交涉员公署第三科科长。

在我出发往朝鲜以前，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陈国丰，于西康路私宅设宴祝贺我受训的完成，并为饯行，被邀作陪的全部都是广东人，多数是汪精卫的亲戚。他们是伪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汪孟晋（汪精卫的长子）、伪陆军修械所中将所长汪德漩（汪精卫的侄孙）、伪行政院简任秘书陈国琦（他和陈国丰都是陈璧君的侄儿），还有伪外交部总务司的几个科长。这些人平日里经常在一起，酒食征逐，聚赌玩娼，而在政治上又联成一气，结为一个"拥汪"的集团。我在南京这几个月中，和他们厮混得火热，集训期间每逢休息，也到西康路找他们。在这次宴会中，陈国丰郑重地对我作了临别的赠言："作为一个曾经受过集训的人，应该深切体会到国家对你的期待，将来你是大有前途的，我们会在部里照顾着你。到朝鲜后，要把集训的精神带给华侨，特别是汉城光华中学的学生，过去单纯重视学术的修养，缺乏政治的水平。你必须站稳亲日反共的立场，

抓紧对侨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灌注服从领袖的思想，使年轻一代坚决拥护先生[1]，这是目前展开思想战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也是在你身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在1943年9到11月的三个月中，担任汪伪驻汉城总领事馆的学务主任，便把“思想指导”工作的重点施于华侨学生的身上，每周到汉城光华中学讲授《领袖言论》一课时。

（1963年）

① 陈等所谓“先生”是专指汪精卫而言，这个称谓，在伪政权的高级官吏中流行。